**毛泽东大传之**

**第六卷**

**五洋捉鳖**

**第1章**

**“我们用了28年办了一件大事，把三座大山搬掉了，也就是头上**

**的问题解决了，看来下一步要解决脚下的问题了。解决脚下的问**

**题还很重，建设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要花更大的气力。”**

话说194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的喜庆日子，天安门城楼上早早就披上了红纱。

大典开始时间定在下午3点，这是周恩来安排的。他考虑到毛泽东总是在夜间工作，上午需要休息。同时也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细，使几十万群众和几万受阅部队能够充分的做好准备。

凌晨2点钟，周恩来打电话给聂荣臻，他说：

“过去我们也搞过阅军，但那都是步兵。如今新中国成立了，这一次阅兵的政治意义非常大，我们不仅要有陆军，而且要有空军和海军，这样才算得上是‘三军将士’。务必做好受阅部队的一切准备工作，所有武器，一律不准有子弹和炮弹。”

周恩来又给新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打去电话，询问受阅飞机能否安全正点通过天安门广场。

清晨6时许，周恩来第3次给毛泽东的卫士值班室打电话，问道：

“主席睡觉了吗？”

“还没有啊。”

“你们要催促他休息嘛！下午两点还要开会，3点还要上天安门，你们要想办法劝他早些休息。”

李银桥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小声说：

“主席，休息吧？”

毛泽东不做声，继续看文件写东西。

从早上8点开始，参加开国大典的群众陆续向天安门广场集中。

举行30万人的群众大集会，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头一回。由于群众很多，到11点钟，许多群众还没有各就各位，这使得组织典礼的周恩来十分焦急，他连续给彭真打去3次电话，并要求负责广场警卫的罗瑞卿调动警察部队，指导群众按规定进入预定位置。

这天上午，毛泽东尚未入睡，叶子龙急匆匆地走来，向毛泽东报告说，蒋介石派美国制造的高空侦察机飞临北京上空侦察，被解放军空军击落，驾驶员在跳伞逃生时，因降落伞绳索断开，被活活摔死。经检查，绳索系被人用化学药品腐蚀过，在外观上用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毛泽东闻言，面色沉郁。他深知蒋介石的为人，为那位驾驶员的不幸感到惋惜。他站起身来，到院子里散步。活动了10分钟后，他对身边的李银桥说：

“银桥，我睡觉吧。”

李银桥帮助他上厕所，洗澡，然后上床。毛泽东说：

“没事了，你去吧。下午1点钟叫我起床。”

下午1点，李银桥径直走进毛泽东的卧室，叫道：

“主席，主席。”

“嗯？”毛泽东睁开眼睛，看见了李银桥，又“嗯”了一声，做了一个深呼吸。李银桥说：

“主席，到1点了。”

“这么快呀！”

他从床上坐起来，揉了揉眼，显然没有睡好，穿衣，下床，刷牙，洗脸，吃早饭。李银桥帮他换上那身参加盛典的礼服——袖子带有黑白条纹的呢料黄制服。

这是一套中山制服，料子是叶子龙买来的黄色美国将校呢，李银桥拿到王府井请王子清师傅做的。王子清是留法回来后专门做剪裁服装的。后来在开国大典之后，李银桥看叶子龙送的衣料还有不少，就又请王子清为毛泽东作了3套式样相同的制服。

此时王鹤滨来了，他了解了一下毛泽东的健康状况。然后，毛泽东就步行来到了勤政殿大厅。

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等国家领导人，在勤政殿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次会议。

会议在通过对中外发表的公告时，张治中听到公告里面有这样几句话：“选举了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暨陈毅等56人为委员”，他问旁边的李立三：

“这样措词可有问题？”

李立三说：

“什么问题？”

张治中说：

“委员56人一语太简单了吧？这是正式公告，何不把全体委员名字都写上？”

李立三表示赞成。张治中说：你说吧。李立三说：还是你说好。张治中便站起身来，说道：

“这是正式公告，关系到国内外观感，应该把56位委员的姓名同时发表。”

毛泽东马上表示同意，他说：

“好，把56个委员名字都写上去，这可以表示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强大阵容。”

大家听了都鼓起掌来。

接着，会议宣布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们就职，宣布中央人民政府于本日成立，宣布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

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

毛泽东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并责成他从速组成政府机构，执行各项政府工作。

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会议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会议结束了，叶子龙对毛泽东说：

“主席，稍微休息一会儿，按时出发，正点到天安门就行了。”

毛泽东笑着说：

“好嘛，事情反正是一个接着一个。我们打了几年的疲劳战，打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又是建国的第一天，又是一个疲劳战。我没有睡几个小时的觉，到天安门上还要连续站几个小时。看来咱们的命运就是打疲劳战吧。”

大家听毛泽东这么说，都笑了起来。周恩来接着说：

“这是高效率的疲劳战，3年解放战争，消灭了敌军好几百万，建立了盼望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效率还不高呀？主席把这一切仅仅说成是疲劳战，这是多么伟大的气魄呀！”

毛泽东乘坐的汽车从勤政殿门口出发，开出中南海的东门，从故宫西华门往南拐弯，在中山公园后面进了故宫阙右门，往南直达天安门城楼的后边。

下午3时，集会在天安门广场上的30多万军民，热情洋溢地期待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庆典的开始。广场上彩旗招展，欢声雷动，歌声、口号声响彻云霄。人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呼：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全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大团结万岁！”

毛泽东率中央人民政府各位副主席和各位委员以及政协常委，沿着天安门北面西侧古砖梯道拾级而上，走了100级台阶，准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早已等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摄影师们，看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来了，立即打开摄像机的旋钮，一边向后退行，一边摄影。

毛泽东身着黄色礼服，左胸前缀着红锦缎飘带，飘带的中央闪着烫金的“主席”二字，飘带的下部，剪裁成了燕尾状。他的脚上蹬着一双肥大的半个月前刚刚按照他的脚定做的被工作人员称之为“礼鞋”的棕褐色牛皮鞋。其他的领导人身着色调和样式各不相同的服装，都在左胸前佩带着红色的锦缎飘带，上面印有他们各自的职务称号。

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则佩带着绿色的锦缎飘带，上面印有“工作人员”、“服务人员”、“记者”等烫金字样。这就是他们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标记和证件。

陈明仁和许多起义将领以及参加政协会议的全体代表、其他应邀嘉宾，则一同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两旁的观礼台。

天安门上的播音员丁一岚在扩音器前兴奋而激动得大声喊道：

“毛主席来啦！毛主席健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天安门上下顿时掌声雷动，欢声如潮，如暴风雨一般，经久不息。“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站在天安门城楼前排正中的毛泽东，挥舞着手臂，面对着扩音器，也高声喊道：

“人民万岁——！”

领袖和人民的心声交织在了一起。此时，在金水桥边阅兵指挥台上的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对着麦克风高声喊道：

“大会全体注意，不要喊！注意！注意！注意！今天是首都全体军民各界，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举行大会。现在准备开会，请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同志宣布大会开始。”

广场上沸腾的人们很快静了下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开始。

按照事先规定的程序：一是国家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升国旗，放礼炮，奏乐；二是国家主席宣读政府公告；三是阅兵式；四是游行；五是观看礼花。

毛泽东向前挪动了两小步，走到麦克风前，朝宽阔的广场环视一下。他的肩膀和胸脯微微起伏，以他特有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正式成立了!”

30万集会群众顿时沸腾起来。林伯渠宣布：

“请毛泽东主席升国旗。”

这次升旗，是新中国第一次电动升旗，站在毛泽东左侧负责技术问题的周志文，悄声对毛泽东说：

“把电钮向右转动一下就可以了。”

毛泽东轻轻地旋转了一下电钮，把它旋到“升”的位置。军乐队奏响了国歌。新中国第一面长460厘米、宽338厘米的五星红旗，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声中冉冉升起。

这面特大规格的国旗，是美术供应社女工赵文瑞用两天两夜的时间，趴在地上一针一线精心缝制出来的。赵文瑞在旧社会是靠给人缝补浆洗维持生活的，解放后被安排到美术供应社工作。

就在五星红旗缓缓升起的时候，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着组成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委员会的54个单位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28年历程。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凝望着国旗，谛听着新中国的春雷。他的鼻翼微微翕动，胸脯起伏不已，泪水在眼窝里打转，终于变成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脸颊滚落下来。**

宋庆龄的眼睛里也闪烁着晶莹的泪花。

所有的军人都举起右手敬礼，所有的群众都注视着国旗。

五星红旗升到22米高的银白色铁杆的顶端，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毛泽东脱口说道：

“升得好！”

接下来，由毛泽东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全文如下：

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况之中。幸赖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援助之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得以消灭反动军队，推翻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

现在人民解放战争业已取得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人民业已获得解放。在此基础上，由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集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吴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赛福鼎、饶漱石、陈嘉庚、罗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康生、林枫、马叙伦、郭沫若、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习仲勋、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毛泽东宣读完毕，新华社记者李普走上前去拿稿子。他见稿子上贴着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名字。原来，这个名单是根据张治中的建议临时补上去的。毛泽东指着字条嘱咐李普说：

“你小心这张字条，千万不要丢了。照此发表，不要漏掉了。”

在这个文件上还有毛泽东用铅笔写的批示：“照此发表。毛泽东”。

就在此时，林伯渠秘书长宣布阅兵开始。

阅兵总司令朱德身着崭新的呢料戎装，走下天安门城楼，乘敞篷车从天安门中间的门洞出来，通过金水桥。迎候在桥南的华北军区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区司令员、阅兵总指挥聂荣臻，乘着敞篷吉普车向前，向阅兵总司令朱德敬礼报告说：

“报告朱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受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请朱总司令检阅。”

朱德向聂荣臻回了礼，大声说道：

“开始吧！”

在军乐队奏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卫胜利成果》的音乐声中，朱德乘敞篷汽车在聂荣臻的陪同下，驱车沿着长安东街、东单广场、直到东交民巷，检阅陆海空各兵种16400名官兵组成的三军部队。

检阅完毕，朱德回到天安门城楼主席台上，在他的左边站着4个野战军的代表：贺龙、刘伯承、陈毅、罗荣桓，他们分别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4大野战军接受命令。朱德十分激动，声音有些颤抖，开始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他大声念道：

全体战斗员、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同志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部队，今天和全体人民在一起，共同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部队，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所援助的蒋介石反动政府的革命战争中，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敌人的大部分已经被消灭，全国的大部分国土已经解放。这是我们全体战斗员、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一致努力英勇奋斗的结果。我向你们表示热烈庆祝和感谢。但是现在我们的战斗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残余的敌人还在继续勾结外国侵略者，进行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革命活动。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实现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作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迅速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毛主席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朱德

朱德宣读完命令，盛大的阅兵式开始了。火红的“八一”军旗在护旗兵的掌护下，伴着《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引导着受阅部队出发了。接受检阅的部队以海军两个师为前导，分列经过主席台前，由东向西行进。一个8000名指战员的步兵师组成12个方阵，在《八路军进行曲》声中开过来了。一个炮兵师在《军队进行曲》声中开来了。一个战车师在《坦克进行曲》声中来了。一个骑兵师在《骑兵进行曲》声中来了，他们分别组成红马连、白马连，5马并行，骑兵们英姿勃勃。其他各部相继跟进。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微笑着挥手向部队战士致意。

年轻的空军在以方槐为领队的9架P-51战斗机、两架蚊式战斗机及6架运输机、教练机编队，在会场上低空自东向西飞行接受检阅。其中，安志敏驾驶的是PT-19型教练机。他们同时推拉3次机头，代表空军战士向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致敬。

广场上30万群众挥舞着帽子、围巾、甚至报纸，热烈欢呼。城楼上，毛泽东顺着周恩来的指引，仰望自己的银鹰，挥手致意。他转对刘伯承说：

“西藏问题需要立即解决，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此时的朱德显得异常激动，他挥动着帽子，不断地向空中的飞行员致意，他说：

“从今天起，我这个三军总司令总算是名副其实的了。”

张澜老先生含着激动的泪花，说：

“我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沈钧儒也激动地说：

“了不起啊！人民的力量就是大，这么多的飞机呀！”

沈钧儒不知道，也许更多的人也不知道，人民空军建军时间太短，飞机又太少，这次接受检阅的飞机，大部分都是按照预定的飞行航线，飞过天安门广场后，绕了一个圈，又重新飞过来一次、两次、三次……

整个阅兵式，前后历时3个小时，《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雄壮乐曲，伴随着部队的整齐步伐，以强有力的节奏，在广场上空激荡，显示了人民解放军的英勇雄姿。

阅兵式结束时，天色已近黄昏。一支近百人组成的大学生军乐队，吹奏着《新民主主义进行曲》，引导着4万名学生汇成的大军向广场中心拥来。他们抬着1.2丈高的用红纱扎的大五星和8根火炬造型的红灯，30人一横排，走过主席台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在城楼上一手扶着栏杆，一只手举在空中不停地挥舞。突然，他面对扩音器吩咐工作人员：

“把水银灯全打亮！”

天安门广场上忽地一下子灯光齐明。游行队伍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工人方队开过来了，高呼：

“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高声回道：

“工人同志们万岁！”

农民方队开过来了，高呼：

“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高声回道：

“农民同志们万岁！”

毛泽东时而鼓掌，时而挥手致意，还不断地在扩音器前高声回应：

“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

游行队伍有秩序地向前行进。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新国家建立起来了，你安排一下，我要尽快去苏联一趟。”

此时，他已经站了好几个小时，周恩来再三劝他去休息一下。

毛泽东走进休息室坐下来，一边吸烟，一边和程潜交谈。工作人员一再劝他吃些点心，毛泽东这才拿起点心，刚吃了两口，第二口尚未下咽，见周恩来快步走了进来，为难地说：

“主席，你预料得对，你刚刚离开了主席台，游行的群众看不见你了，他们都停下来不肯前进了。看来，你还得站下去。”

毛泽东喝了一口浓茶，把口中的点心急速冲下，起身道：

“好吧，疲劳也得去啊！”

他把烟摁灭在烟灰缸中，向程潜抱歉地笑了笑，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匆匆走出休息室，快步向主席台中心位置走去。

这时候，游行的群众正拥挤在金水桥的南侧，仰首提踵，有节奏地齐声高呼：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播音员齐越、丁一岚在麦克风前一再劝说，指挥游行群众按规定通过天安门，但无济于事。在热烈的气氛中，欢呼着的群众看到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上，听到了领袖的声音，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他们潮水般地拥向5座白玉石桥，都想近距离看一看开创新中国的一代伟人。他们跳跃着，欢呼着，眼眶里滚动着泪花，恋恋不舍地离去。一批又一批的游行群众，就是这样从天安门前通过的。

毛泽东不断地挥手、举帽向群众致意，右手累了换左手，左手累了再换右手。他一会儿到主席台西边，一会儿到主席台东边，一会儿向远处的群众致意，一会儿又探着身子向城楼下的群众招手。

警卫处的工作人员尹莘笙是一个小姑娘，她见毛泽东站得太久了，太辛苦了，就从大殿里搬出一把椅子，悄悄地放在毛泽东背后，想让他坐下来休息一下。毛泽东感到了触动，回头一看，明白了小尹的意思，微笑着轻轻地摆了摆手，谢绝了。从午后3点到游行结束，他始终与人民在一起，始终举着手，挥手向群众致意。回到菊香书屋，他似乎没有倦意，在院子里踱步，问李银桥：

“今天站了有3个小时吧？”

李银桥说：

“3个多小时。”

毛泽东自言自语地说：

“还行，我不累。”

李银桥也说：

“人逢喜事精神爽嘛，我也有同样感觉。”

下午7点20分，毛泽东在叶子龙、汪东兴陪同下，又离开菊香书屋，从中南海东门出去，前往天安门，参加焰火晚会。

夜晚的北京城，游行的群众举着大红灯笼，像火龙似地穿梭在全城，使新的首都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

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管理人员在苍松翠柏上，在明清的亭殿上，都披挂上了彩灯。游园的群众载歌载舞，喜气洋洋。

东西长安大街的两侧，各竖起一排高大的钢质灯座，每个灯座上都有十来个硕大的球形灯泡，把大街照耀得如同白昼。马恩列斯和孙中山的巨幅油彩画像，排列在广场北边的路边，与天安门上悬挂的毛泽东的巨幅画像遥遥相对。

广场上灯火辉煌。广播里传出轻音乐，充满欢快气氛。穿着节日盛装的群众，形成了一团团、一簇簇的花朵，在锣鼓声、管弦乐队的伴奏下，舞动着、旋转着、歌唱着。

天安门城楼上，在大殿的前檐下悬挂着一排每一个直径约两三米的圆形红纱大宫灯，大殿的屋檐、飞檐、翘角以及大殿墙壁的壁角，都放出了彩色的灯光，映出一幅由彩灯织成的大殿和天安门的轮廓。

毛泽东来到天安门后侧下车，登上天安门城楼，广场上立时响起一片欢呼声：

“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

无数的群众兴高采烈地一齐拥向天安门前的金水桥畔，热情地高呼：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在麦克风前，也响亮地高呼：

“人民万岁!”

“毛主席万岁！”“人民万岁！”……

领袖和群众相互祝愿的欢呼声在广场上久久回荡。

毛泽东添了一件棕红色的厚毛衣，在儿女们的簇拥下，面朝广场，坐在轻便的藤椅上，吸着烟，让眼前的烟雾任意地在眼前飘动。他等待着和群众共同观看焰火。

晚8点时分，大会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发出命令：

“现在开始放礼花！”

天安门城楼休息室里临时设置的总机，将命令传到位于东华表内侧的指挥所，指挥所立即把早已准备好的信号弹，代替礼花送上天空。

霎时间，一阵轰鸣震动了大地，施放礼花的6个点，烟花齐放，数十门花炮，同时轰响。天安门四周的天空中，顿时升起了火树银花。五颜六色、千姿百态的焰火，加上礼花腾空的炮声、火花的爆炸声，交织在一起，如百鸟齐鸣，百花争艳，在广场上空竞相辉映。这美妙的景象倾倒了数十万观众，欢笑声、鼓掌声和炮声、礼花飞起的爆炸声，交织在一起，动人心魄。毛泽东的儿女们也欢天喜地，他们指点着焰火，争相叫着爸爸，让毛泽东看。毛泽东坐在藤椅上，仰视着天际，香烟含在嘴里，吐出缕缕烟雾，微笑着应付孩子们的嬉戏。

在礼花间断之时，毛泽东与苏联等国的外宾及华侨代表，进行了亲切交谈。

晚9点25分，焰火晚会就要结束了，毛泽东挥动着右臂，在城楼上从西头走向东头，又从东头走向西头，再由西头回到中央，向广场上和在观礼台上的外宾、国家干部、各界人士、工人和农民代表，以及解放军代表致意和告别。广场上又响起一阵阵欢呼声：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也一遍又一遍地高呼：

“人民万岁！同志们万岁！”

城楼上下形成了一道千古奇观。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好奇地说：

“爸爸，人民群众喊你万岁，你喊人民万岁，真有意思。”

毛泽东激动地说：

“**这样才对得起人民啊！”**

后来，陈毅诗兴大发，一连写了8首诗：《开国小言》。他还感慨万千地说：

“看了那个场面，总算不虚此生了。”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黄炎培也即兴吟出一首题为《天安门》的诗篇，并亲笔恭书，呈献给毛泽东。

再说周恩来在焰火晚会结束后，让秘书告诉应邀前来参加开国大典的苏联前驻北平领事馆总领事齐赫文斯基，说是等一会儿，有封信要交给他。周恩来吩咐已毕，急忙驱车来到位于东交民巷玉河桥的中央外事组办公楼，带上王炳南回到北京饭店临时办公室，仔细审阅着新中国的第一份外交文书，只见上面写着：

阁下：

敬启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已于本日发表了公告：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我现将这个公告随函送达阁下，希为转交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 周恩来

1949年10月1日于北京

周恩来核准无误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王炳南匆匆赶回外事组，召集有关人员赶往各国驻京领事处，发送外交部001号公函。

周恩来的秘书也将这一公函转交给齐赫文斯基。齐赫文斯基不敢怠慢，马上将公函译成俄文，让领事馆工作人员发回莫斯科。

此时，毛泽东已经从天安门回到了办公室，看到由彭德怀转发来的西藏第10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两封贺电，一封是给他和朱德的，一封是给彭德怀的。班禅在给毛泽东和朱德的贺电中写道：

北京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钧鉴：

钧座以大智大勇之略，成救国救民之业，义师所至，全国腾欢。班禅世受国恩，倍荷优崇。20余年来，为了西藏领土主权之完整，呼吁奔走，亦未尝稍懈。第以未获结果，良用疚心。刻下羁留青海，待命返藏。兹幸在钧座领导之下，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心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

班禅额尔德尼 叩

班禅在贺电中所说的“羁留青海”的事，最早发生在20世纪的20年代初。那时候，藏传佛教的上层达赖集团和班禅集团因政见不同而失和。1923年，9世班禅额尔德尼因不赞成投靠英帝国主义，被达赖逐出后藏日喀则，流亡于青海塔尔寺。此后，在1949年6月继位的年仅11岁的第10世班禅，仍和前任一样，流亡在青海。9月间，人民解放军打垮了盘踞在青海的军阀马步芳，进驻西宁。10世班禅在堪布会议厅主任计晋美等人的建议下，派员前往西宁，与解放军取得了联系。10月1日，班禅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便立刻发出了贺电。他在给彭德怀的贺电中，请求彭德怀“领导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叛国分子，拯救西藏人民”。

毛泽东看罢贺电，又到院子里散步，转了一会儿回到办公室，感慨地对卫士说：

“胜利来之不易！我们用了28年办了一件大事，把三座大山搬掉了，也就是头上的问题解决了，看来下一步要解决脚下的问题了。解决脚下的问题还很重，建设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要花更大的气力，你说对不对？”

已经是次日凌晨4点多了，毛泽东仍无睡意。卫士弄的麦片粥，他也忘了吃，后来吃了饭，上床又看《史记》。卫士劝他睡觉，他合上书又说：

“我们革命不容易啊！有多少革命同志献出了生命？！”

毛泽东两眼发直，含着泪水说：

“如果他们能看到今天这种场面，一定比我们还高兴。”

欲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过后还有何重大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开国大典结束之后，心里想的是那些为争取今天的胜利而壮烈牺牲的战友们。他说：“我们革命不容易啊！有多少革命同志献出了生命？！”不知现在那些坐享其成的人，还会有谁作如是想？毛泽东又说：“如果他们能看到今天这种场面，一定比我们还高兴。”不知读者看到毛公这句话，是否会联想到你所面对的社会现状？请诸位再设想一下，那些革命先烈“**看到今天这种场面**”，**他们又会作何感想？**

**第2章**

**“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

**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

**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

话说1949年10月2日晚9时，苏联政府外交部副外长葛罗米柯要苏联原驻北平领事馆总领事齐赫文斯基将一份照会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称苏联政府决定承认新中国，同时召回其驻广州的大使；任命齐赫文斯基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周恩来立即派人将这一照会呈报毛泽东。毛泽东的机要秘书拿着苏联外交部的照会来见毛泽东。毛泽东读罢照会，情不自禁地同机要秘书握了握手。这个突如其来不同寻常的举动，让这个跟随他多年的机要秘书有些茫然，一时不知所措。

10月3日，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复电葛罗米柯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热忱欢迎立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此后不久，保加利亚、罗马利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各国，也纷纷致电周恩来等人，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府。

与苏联等国相反，美国国务院在10月3日这一天则公开表示：拒绝承认新中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宣称：

“美国在这项政策做任何改变之前，将与其他大国和国会进行磋商。”

10月3日这一天，寓居香港的卫立煌闻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兴奋异常，亲笔给毛泽东起草了一份贺电，经过香港有关组织，直接发到了北京。

卫立煌是在1949年初为躲避蒋介石对他的迫害，秘密前往香港的。他在贺电中写道：

北京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

卫立煌 江

10月初的一天，毛泽东单独召见程星龄。程星龄为毛泽东对程潜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表示不胜感激，他说：

“主席，您对颂公如此殷切的关怀和优渥的待遇，不仅使颂公感激不尽，我也会终生难忘！”

毛泽东摆了摆手，吸了两口烟说：

“星龄呀！我还没有征求你的意见，还没有谈对你的工作安排哩，怎么就‘终生难忘’哩？”

程星龄说：

“主席，我的工作安排用不着征求意见，干什么都可以。”

“星龄呀，怎么你们醴陵人都是如此呢？子良开始我征求他的意见时，他也是说什么意见都没有。我说，提出意见的，我还好办，什么意见都没有的，我更难办。后来，子良对我说，‘我是军人，还是想在军事上为国家尽点力量。’我说，那你仍旧去带部队吧！我们已经决定把你的第1兵团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仍由你当司令员。这个他满意了。星龄，你有什么意见，还是对我讲好了。”

程星龄犹豫了一下，说：

“主席，对工作的安排，我真没什么意见。但我早就有个愿望，想参加中国共产党，不知够不够资格呢？”

“啊！是这么个愿望。”毛泽东想了一下，对程星龄说：“如果说够条件的话，你早就够了。你早年参加国民党左派，与我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一起，从事反对军阀张作霖的斗争，是最早与我党合作共事的朋友之一。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同情我党，支持我党，早已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了，起到了我们许多党员所不能起到的作用。不过——”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又抽了两口烟，继续说道：

“子良提出继续带兵的愿望，我满足了他。但你这提出加入我党的要求，我认为暂缓为好。你最好还是先参加‘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与你早年参加的国民党左派一样，是革命组织。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民革、民盟、民建、农工、民进、九三等各民主党派的友好关系，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我们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是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星龄，你参加民革，可能像过去那样，要比参加共产党更能发挥出较大的作用！”

程星龄听毛泽东这么一讲，就谦虚地说：

“谢谢主席对我的过高评价，说不上是什么‘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但从这20多年的实践中，我感到中国共产党确实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是国家民主的希望所在。因此我同情支持共产党，作了一些爱国者应做的事情。主席提出要我暂缓参加共产党，先参加民革，我会认真考虑的。但我参加共产党的决心早就定了，望主席在适当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啊！”

毛泽东点点头说：

“‘小同学’，我知道你们醴陵人大都有如此坚毅的个性，说了的就要办到，可谓‘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子良是这样，你也是这样。不同的是子良常年带兵打仗，显得更为直爽，你则一直担任文职，甚为婉约。好吧！那就先如此，我相信你的愿望终会实现的。”

不久，程星龄听从毛泽东的建议，加入了由何香凝、李济深、谭平山等一些革命元老领导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这一时期，毛泽东曾经邀请徐特立老人到中南海菊香书屋作客，他为老师准备了几样家乡菜。席面上，服务员端来了一碗湘笋，一碗青椒，还有一个汤。这是两人都爱吃的家乡菜。毛泽东抱歉说：

“没有好菜吃。”

徐特立笑着说：

“人意好，水也甜嘛！”

入席时，毛泽东让徐特立坐上座，徐特立谦恭地对毛泽东说：

“您是全国人民的主席，应该坐上席。”

毛泽东微笑着说：

“您是主席的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您更应该坐上席。”

毛泽东硬是让徐特立坐了上席。

徐特立在菊香书屋住了几天，要回去了。毛泽东把自己的一件呢子大衣送给老师，说：“北方比南方要冷……”

“不敢当，不敢当！”徐特立连忙推辞：“我带着衣服呢。”

毛泽东真诚地说：

“收下吧，以表我人子之心。”

徐特立接衣在手，激动得老泪纵横。毛泽东拉着徐特立的手，依依不舍，送了一程又一程。

徐特立回到家里，把毛泽东赠送给他的大衣交由老伴收藏起来，后来，他只在庄重的场合才舍得穿一次。

毛泽东还几次接老师黎锦熙到菊香书屋家中叙谈，到中南海同赏荷花。有一次，黎锦熙偕夫人黄鹤寿到菊香书屋赴宴，毛泽东特意给厨师开出了一张纯家乡风味的菜单，有虎皮扣肉、火焙子鱼、香干大蒜炒肉、冬笋腊肉、猪血豆腐汤等。席间，毛泽东不停地为黎锦熙老师和师母敬酒夹菜，宾主谈笑风生，好不畅快。

10月4日，毛泽东正在办公室批阅文件，叶子龙轻轻地走进来，小声报告说：

“主席，138师任昌辉师长派人将你家乡的两位客人送到北京来了。”

叶子龙所说的任昌辉是人民解放军第46军第138师的师长，他率部赴邵阳途经湘潭、湘乡时，特意派人到韶山打探毛泽东亲属的下落。来人在东茅塘找到了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和远房侄子毛远翔，以及毛泽覃烈士的岳母周陈轩等人。他们慰问了周老太太之后，即带毛泽连和毛远翔来到了湘乡县城。

毛泽连，字润发，生于1913年，在堂兄弟中排行老九，是毛泽东堂叔毛尉生的三儿子，即本传第三卷中已经描述过的革命烈士毛泽建的胞弟。

任昌辉师长问毛泽连：

“你想不想见见毛主席？”

毛泽连闻言兴奋不已，连声说：

“想，想，我很想见到三哥呵！”

随后，毛泽连在9月下旬由138师派人护送，从长沙乘火车到达汉口，稍事休息后，于10月2日登车继续北上，于3日抵达北京。

毛泽东听了叶子龙的报告，甚喜，问道：

“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

“昨天到的北京。”

“是哪两个客人？”

“据电话里说，一个是你的堂弟，叫毛泽连，一个是你的堂表弟，姓李，叫什么我记不太清了。”

“呵，是九弟润发来了，太好了！”

毛泽东毫不掩饰自己的兴奋，随即起身，踱着步连声说：

“好！好！明天叫他们来。”

10月5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少数民族“自决权”问题给2野前委等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2野前委，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及各前委：

申哿（9月20日——笔者注）电悉。大体上同意你们所拟“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草案”，惟一项关于党的民族政策的申述，应根据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民族政策的规定。又关于**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问题，今天不应再去强调。**过去在内战时期，我党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它对各少数民族特别表现为大汉族主义）曾强调过这一口号，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今天的情况，已有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我党领导的新中国业经诞生，为了完成我们国家的统一大业，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阴谋，在国内民族问题上，就不应再强调这一口号，以免为帝国主义及国内各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所利用，而使我们陷于被动的地位。在今天应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友爱合作和互助团结，**此点望你们加以注意。

中央 酉微

10月5日上午，毛泽连会同后到京的姑表兄李轲，随着叶子龙一起来到了菊香书屋，成为毛泽东接待的来自家乡的第一批客人。

此时的毛泽连双目几乎失明，他凭借着微弱的目光，对着眼前高大的身影激动得喊了一声：

“主席三哥。”

毛泽东走上前，握着毛泽连的手，凝视片刻，说：

“你是泽连——润发九弟？你的父亲是二叔吧？”

毛泽连泪如泉涌，赶忙说：

“是的，我是润发呀！”

毛泽东提到的二叔，是指毛泽连的嫡亲大伯父毛菊生。毛菊生在兄弟辈中排行第二，因没有娶妻，泽连从小就过继给他当儿子。毛泽东又握着李轲的手说：

“你是李轲，父亲叫李新明吧？老人家还在不在？”

李轲说：

“家父去世多年了。”

“那姑妈呢？”

“还在。”

毛泽东对两位客人说：

“几十年没见面，都有些认不出了。我很想念你们，很想念家乡。你们来了，真是太好了。”

李轲说：

“主席，这次我们来，一是代表家乡问候您，二是向您反映家乡的情况。”

“谢谢。”

毛泽东说着把客人迎进屋里，坐了下来，问道：

“你们什么时候到这里的？”

毛泽连便把138师任昌辉师长派人寻找他们，并护送他们来京的情形一一说了，又说了在来京途中的见闻，他说：

“我们一路上看到人民游行，抬你的像，高呼‘毛主席万岁’呢！”

“怎么不抬蒋介石的像，抬我的像干什么？”

毛泽东的话把两位客人逗笑了。

“主席三哥，这次来到北京，我没有带什么东西，真不好意思……”

毛泽连本来还想再说几句客套话，毛泽东截住他的话说：

“农村没有什么，你们来看我就不容易，还要送份么礼物！我们家过去很穷。我们的曾祖父毛四端是一个贫苦农民，靠他勤俭持家，到后来手里有了45亩田，还有了两个儿子、4个孙子。我爷爷毛翼臣，你爷爷毛德臣，兄弟俩分家时，翼臣公分15亩，德臣公分30亩。但是，你爷爷有3个儿子，再分到你父亲手里，田就少多了。我爷爷只有1个儿子。到我父亲这一辈，我家有15亩，你家只有10亩。所以，你们的家底子薄，人口多，家境会比我们差一些。”

说话间，毛泽东见毛泽连流泪不止，就问道：

“泽连老弟，你这是么子回事？”

毛泽连便把他害眼病的情形说了，毛泽东惋惜地说：

“年纪不大，坏了眼睛，太可惜了。”

毛泽连问：

“三哥，北京城里有郎中吗？”

“有。”毛泽东说：“你就在这里治一治吧。”

李轲连忙插话说：

“泽连家里生活困难，您能不能帮他想点办法？”

毛泽东沉吟了一下，语气温和地说：

“泽连的困难我知道，我了解。不过他的困难要靠当地政府解决。我是国家主席，我只解决大多数人的困难，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如果只解决一个人的困难，只考虑自己的亲属，那么，我这个主席也当不成了。”

毛泽东这么一说，两个客人都不吱声了。毛泽东问李轲：

“你住在哪里？”

李轲说：

“我比泽连后到北京，现在住刘伯承司令员家里。”

“那里太偏远了，不方便。”毛泽东沉吟了一会儿，说：“你还是到这里来住吧。”

工作人员立即按照毛泽东的吩咐，把李轲安排到警卫连营房，和毛泽连住在一起。

10月5日，毛泽东关于陈明仁部整编问题给林彪、华中局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彪同志、华中局，并告湖南省委：

一、程潜、陈明仁按其现在的表现来看，似乎均有决心站在我们方面。在我和他们谈话时，李明灏代其提出人枪太少，问是否可以给他补人补枪，并要求我们速派干部助其整训，要求在打白崇禧及它处时，让其作战立功。

二、你们根据陈部现有人数给以两个军6个师的正式番号是适当的，军委已决定给以第21兵团，第52军、第53军及第214师至219师的番号。我已将此点向程潜、陈明仁、李明灏3人谈了，他们同意这样做。惟陈明仁觉得，应先对干部说清楚，对多余者应有安置，用调训方法使其学习，以安其心。然后宣布缩编为两军6师。我认为陈明仁的意见是合理的。10月10日左右，陈明仁、李明灏2人由此动身经汉返湘，请待他们到达谈清楚后，再定宣布及实行步骤。程潜在京多留若干天，然后返湘。

三、**为使该兵团从陈明仁起，全体官兵，安心供职，增强其彻底改造的决心，表示我们对程、陈及该兵团看成和自己人一样，我们认为如有可能，应在该兵团编整及纪律做得有些成绩的时候，给他们补充一批人枪，其来源可从对白崇禧作战的缴获中取得。**这样一做，可以增强我们对该部的领导权及发言权。**再则在湖南平定及土改实行以后，即在大约一年以后，如该兵团表现好，而我们的地方部队，例如独立师、团等又可以集中时，可以考虑编一个军加入该兵团，使陈明仁有3个军。这对改造该兵团是有作用的。**以上各点大意我已向程、陈、李透露了。

四、程、陈、李提议现在就可以取消湖南军政委员会，程潜到北京任职，陈明仁专任军职不挂省主席名义。我向他们表示，军政委员会需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取消太快，程、陈部下可能会发生误会，对全国影响不好。省府改组亦在全省平定，陈明仁率部向前线推进之时，方有理由实施。目前几个月内，陈的主席职衔仍应兼着，惟陈的实际工作，可以着重于治军。

五、陈明仁几次提出想去前线打仗立功，我说你的志愿是好的，但目前部队未整训，马上去前线，逃兵必多。在作了初步整训之后，如有作战机会，上前线打几仗是很好的。此点亦请你们注意，有可能时，让其参加一二次作战。

六、**程潜、李明灏都说湖南有失业军官15万人之多**，纷纷找他们安插，是一大问题，他们不胜其烦。**我说，此是一社会问题，国家有责任有步骤地给以谋生出路。**

七、以上各点，你们意见如何盼复。

八、程、陈、李等对此次政协会议观感甚好，表示有信心干下去。我告诉他们，补人补枪等事，要待人枪到了手才算数，不要向下面宣布，免引起失望。要他们将现有3万多人整训好，不存奢望，并对可能发生的种种困难和不满意之事，作充分的精神准备。我们方面则尽可能设法帮助他们，尽可能使他们满意些，减少他们的困难。双方这样做法就可能将事情办好。

毛泽东 酉微

后来，陈明仁的第21兵团，果然参加了广西的剿匪战斗，取得了巨大胜利。

10月6日，毛泽东请毛泽连和李轲到家里吃饭，还把毛岸英和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叫来陪客人。他指着毛泽连向傅连暲和毛岸英介绍说：

“这是我的堂弟毛泽连。泽连从小过继给我二叔，我二叔毛菊生去世早，他家很穷。那时候，我父亲毛顺生要买二叔的田，我叫他不要买，拿点钱给二叔用就行了。父亲不肯，我也没有办法，田还是买了。唉！那时我没有权，我母亲也没有权，父亲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过，现在田还是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嘛。我父亲不顾兄弟之情，他只顾他自己。

**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嫡堂兄弟，而买二叔那7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了，全无兄弟之情，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些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救贫苦农民的道路。”

毛泽东停了停，问毛泽连：

“婶母身体好吗？”

毛泽连回答说：

“身体不好，经常有病。”

“婶母会做饭，菜炒得好，要是她身体好，叫她来办伙食，那就好啰。”

“母亲也想来看看主席。”

“她有病，到北京来不好，这么远，要是死在路上，那就糟糕了。我看，先请她在湖南治一段时间，等病治好后，我再接她来北京住一住。”

毛泽连又提起了自己的眼病，他说：

“听说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疗条件好，技术高，我想……”

毛泽东说：

“协和医院是外国人办的，现在还没有收回来。不过，那里条件好，你可以去看看。吃了午饭，叫岸英和傅部长陪你到协和医院去一下。”

吃罢午饭，毛岸英、傅连暲、李轲一起陪毛泽连去协和医院。毛泽东交代毛泽连：

“去治病，要听医生的话，按医生的安排进行治疗，不要霸死蛮。”

经医生检查，毛泽连的左眼已经失明，右眼还有点光。医生说：

“要挖掉左眼，才能治右眼。”

毛泽连起先不同意，后来想想三哥的话，还是同意了。于是，他就在医院动了手术。医院还专门找了一个湖南籍的医生给他喂饭喂水。毛泽连住了一段时间，就要求出院。医院不同意，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在电话上交代，传话给毛泽连：

“暂时出不了院，要好好休息，以后再做手术。”

第2次手术时，医生说要给毛泽连的左眼安一个假眼球，毛泽连拿不了主意，要求出院跟毛泽东商量。毛泽东来电话说：

“让他出院吧，他住不习惯，外面自由一些。”

毛泽连在医院度过了1个月零7天，右眼基本上恢复了视力，就出院回到了菊香书屋。毛泽东见他头上蒙着纱布，想起了上假眼球的事，就对他说：

“视力恢复了，上假眼球就没有必要了。那只是一个模样，没有什么作用，并且那样要花很多钱哩。”

毛泽连点点头说：

“我听三哥的，不上了吧。”

自此，毛泽连在三哥家里进进出出、起居饮食，都由李敏、李讷小姐妹俩搀扶、服侍，生活过得很愉快。他和李轲都舍不得走了。李轲还想请毛泽东批准他留京工作，或介绍回湖南工作。毛泽东想了想，严肃而温和地对他说：

“革命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先烈，我们活下来的人才会有今天，想事、办事，都要对得起他们才是。你们都是作田人，过不惯城市生活，还是回老家作田、种菜、喂猪稳当些。回去把生产搞好，生活搞好。今后大家会有好日子过的。泽连有困难，还是要由当地政府解决。”

他又对毛泽连说：

“过几天，你就回去，搞好生产，照顾好母亲。”

再说10月6日晚，毛泽东复电给美国共产党，他在电报中写道：

亲爱的福斯特同志、但尼斯同志和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的全体同志们：

十分感谢你们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热烈祝贺。请将我的谢意转达给美国共产党全体党员，转达给全美国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对中国人民怀有善意的人们。

诚如你们所说，中国人民的胜利是对于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的胜利。这个胜利，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进步人类对于世界帝国主义阵营所进行的总的斗争的结果之一部分，在这个斗争中，美国的共产党人和一切真诚的民主分子是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

美国共产党人在援助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而反抗美国帝国主义的反动对华政策的英勇奋斗中，享有一个特殊光荣的地位。尽管**美国反动政府野蛮地迫害美国共产党和美国进步势力，非法地审讯美国共产党的11位领袖，即但尼斯同志、威廉姆森同志、温斯顿同志、斯塔彻同志、戴维斯同志、温特同志、汤姆森同志、盖兹同志、波达许同志、格林同志和贺尔同志，**但是事实已经表明了，正确的是美国共产党和美国进步势力，胜利的是美国共产党和美国进步势力的中国友人，而违反正义并因此可耻地失败了的则是美国现在的帝国主义政府。这个事实，不能不鼓励全世界一切暂时尚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民主力量，不能不教育全世界一切暂时尚处于反动派统治和蒙蔽下的人民。

中美两国人民友谊万岁！

毛泽东

10月7日凌晨，毛泽东致电第4野战军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赵尔陆：

林邓谭萧赵：

1. 同意5日12时电5个军靠拢作战的部署。二、**白崇禧指挥机动，其军队很有战斗力，我各级干部切不可轻敌，作战方法以各个歼灭为适宜。**

军委 7日2时

10月一个周末的傍晚，毛泽东派人把马海德和他的中国妻子苏菲、儿子小幼马接到了菊香书屋。

苏菲，原名周素珍，1920年出生于上海普陀区，1935年经友人介绍加入中国左联领导的话剧艺术供应社，1939年8月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文学和戏剧，1942年毕业后分配到延安“鲁艺”实验话剧团，参加《带枪的人》等话剧演出。在延安，马海德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他和妻子苏菲、儿子小幼马曾经与毛泽东、江青、李讷一家住在一个院子里。小幼马又叫周幼马，比李讷小一岁。1949年，苏菲随军进入北平，开始从事电影工作和话剧演出。

且说毛泽东高兴地对马海德说：

“祝贺你呀！原来你算是我们中国人的女婿，现在，你入籍了，就完全是中国人了。”

在大人们说话的时候，小幼马把脸贴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毛泽东转过身来要抱抱他，可小家伙把头埋在沙发里，怎么哄也不起来。毛泽东笑着说：

“怎么高鼻子也怕矮鼻子啊？”

工作人员端来了饭菜，毛泽东与马海德一家人围着餐桌一起进餐。饭后，他又请大家去舞厅跳舞。毛岸英走到苏菲跟前，很有礼貌地邀请道：

“苏菲同志，我请你跳一曲吧！”

苏菲看着比她小两岁的毛岸英，开玩笑地说：

“你叫我阿姨，我就跟你跳。”

毛岸英红着脸不好意思地拉起苏菲进入舞场。没想到苏菲的玩笑话被毛泽东听到了，在第二支舞曲即将奏响之际，他凑到苏菲面前，似笑非笑地说：

“我叫你阿姨，你跟我跳舞吧！”

苏菲立即闹了个大红脸，忙说：

“哎呀，主席——”

“你不要难为情嘛！你刚才对岸英不是很勇敢吗？”毛泽东笑着说：“马海德很勇敢，为真理冲出了国界。你也很勇敢，为爱情敢于冲破世俗观念。我很喜欢你们一家子，希望你们为新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10月9日，毛泽东起草了给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湖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的指示电稿。

原来，毛泽东家乡的亲友们在前一个时期纷纷给他来信，请求推荐或安排工作。就连杨开慧烈士的哥哥杨开智也是这样，本来在湖南农业试验场干得好好的，可他却不安于现状，借五舅向理卿的第3个儿子向三立来京之机，托表弟给毛泽东带了一封信及多张照片，提出要到北京来工作。向三立托毛岸英向毛泽东转交了杨开智的信及照片。于是，毛泽东在给王首道的电文中写道：

首道同志：

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另电请派人转送。

毛泽东

毛泽东在给杨开智的电报上是这样写的：

杨开智先生：

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毛泽东

毛泽东拟好电文或写好信后，通常都是叫卫士通知田家英来取走发出。这一天，田家英又接到通知，来办公室取电报稿，毛泽东对他说：

**“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

后来在散步时，毛泽东又和阎长林谈起了他和杨家的关系，他说：

“我对开慧家里的人，都和我家里的人一样，非常有感情。开慧在家乡搞革命工作，他们都支持。开慧被反动派逮捕以后，他们也冒着极大的风险，千方百计设法营救。开慧被反动派杀害了，他们冒着风险收敛尸体，还营救岸英他们，把他们送到上海交给地下党组织。他们这样做，我是非常感激的。可是，**开慧的哥哥杨开智本来在湖南农场工作很好，现在来信又要我在北京给他安排工作。我如果这么做，不说以后其他的亲友也会提出这类要求，就是只解决他一个人的工作问题，我也是强加于组织，强加于群众啊。**”

阎长林说：

“机关进城以后，各个部门也招收了许多工作人员，**也有许多老同志的家属和亲朋来了，只要历史上没有什么问题，一说也就参加工作了。**”

毛泽东说：

“机关招收新人，那是工作的需要，是完全正常的。我如果把他介绍到机关工作，那就不正常了。”

阎长林说：

“主席对杨开慧同志家里的感情是很深厚的，请他们到北京来看看，给他们谈清楚，他们会理解的。如果主席现在忙，顾不上，过几天再叫他们来可以。最近，机关里许多老同志的家属也来了不少，我的家属也来了，我带着他们看了看故宫，就叫他们回去了。”

毛泽东说：

“是呀，**机关干部的家属和亲友来，都是正常现象，应该来看看。我的亲友要来，就可能变成了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可能形成一种很不好的风气，这一点是可以想象到的。**陈玉英在板仓给开慧当保姆，带着孩子们工作了很多年，受开慧的影响，思想也比较进步。反动派逮捕了开慧，把陈玉英也抓进了监狱。在监狱里，她表现得很坚定，决不屈服。一个农村妇女，在敌人面前表现得这么好，真值得钦佩和尊敬啊！她现在湖南长沙纺织厂做工，不是很好嘛。她也要到北京来让我安排工作，做什么工作呢？我也不好把她放在我家当保姆，这里也不需要。到北京纺织厂做工吗？那还不如在长沙好嘛。**好像有些人在想，只要找到我毛泽东，一切问题都能解决了。我们共产党人是有章法的呀，你不能想怎样就怎样啊！**

你们都在我这里工作多年了，我对你们都很有感情，对你们也都是信任的。**你们如果出去做什么重要工作，我都是支持的。但是，我不好说，让你们到什么地方去做什么官，去当什么长吧？这样，就是强加于组织，强加于群众了嘛。我搞特殊，群众不拥护，对你们也没有什么好处嘛。”**

毛泽东10月9日的电报，虽然使杨开智打消了到北京工作的念头，可他又萌发了在长沙谋取一定职位的想法。他给已经在北京工作的表弟向三立写了一封信，请求向三立替他向毛泽东说情，希望在长沙谋得一个“厅长方面的位置”。向三立接到信后，便给毛岸英写了一封信，转述了表哥的意思和想法。

毛岸英在10月24日给向三立回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写道：

三立同志：

来信提到。你们已参加革命工作，非常高兴。你们离开三福旅馆的前一日，我曾打电话与你们，都不在家，次日再打电话时，旅馆职员说你们已经搬走了。后接到林亭同志一信，没有提到你们的下落。本想复他并询问你们在何处，却把他的地址连同信一齐丢了（误烧了），你们若知道他的详细地址望告。

**来信中提到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它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到根本的胜利。而对于这一层，舅舅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他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中国工作下去。**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而不是个别解决。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不成的。我准备写信将这些情形坦白告诉舅舅他们。

**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殊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宗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殊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殊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群众观点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个人观点之间的矛盾正是我们与舅舅他们意见分歧的本质所在。这两种思想即在我们脑子里也还存在尖锐斗争着，只不过前者占了优势罢了。而在舅舅的脑子里，在许多其他类似舅舅的人的脑子里，则还是后者占着绝对优势，或者全部占据，虽然他本人的本质可能不一定是坏的。

关于抚恤烈士家属问题，据悉你的信已经收到了。事情已经转组织部办理。但你要有精神准备，一下子很快是办不了的。干部少事情多，湖南又才解放，恐怕会拖一下。请你记住我父亲某次对亲戚说的话：“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不可个别解决。”这里所指的生活问题，主要是指经济困难问题，而所谓整个解决是指工业革命，土地改革，统一的烈士家属抚恤办法等，意思是说应与广大的贫苦大众一样的来统一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在一定时期应与千百万贫苦大众一样的来容忍一个时期，等待一个时期，不要指望一下子把生活搞好，比别人好。当然，饿死是不至于的。

你父亲写来的要求抚恤的信也收到了。因为此事经你信已处理，故不另复，请转告你父亲一下并代我问候他。

你现在可能已经开始工作了罢，望从头干起，从小干起，不要一下子就想负个什么责任，先要向别人学习，不讨厌做小事，做技术性的事，我过去不懂这个道理，曾经碰了许多钉子，现在稍许懂事了——即是说不仅懂得应该为人民好好服务，而且开始稍许懂得应该怎样好好为人民服务，应该以怎样的态度为人民服务了。

为人民服务说起来很好听，很容易，做起来却实在不容易，特别对于我们这批有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的没有受过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

信口开河，信已写得这么长，不再写了。有不周之处望谅。

祝你健康！

岸英 上

10月24日（1949年）

后来，杨开智在毛泽东、毛岸英父子开导下，放弃了谋取高官的念头。1949年11月7日，毛岸英收到舅舅杨开智的信后，在给表舅向三立的信中说：

“舅舅曾有信来，思想似已有些转变。”

正是：少时已立志，旨在求大同。百战生死以，何曾谋私营。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与亲友相处，请看本传后面诸多叙述。

东方翁曰：从1927年到1949年，毛泽东经过22年奋斗，终于成功地训练出了一支数百万人的无坚不摧的为民族生存而战、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战的钢铁队伍。而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新政权能不能保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中国将以什么样的面貌立于世界各国之林？已经成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新课题了。后来的实践证明，在这支队伍中，无论是中下层人们的观念，或者是在不少高层领导人的观念中，新政权的建立只不过是实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对“旧社会”的改朝换代而已。前者追求的是“几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而后者追求的则是“级别”，是“官位”，**甚至是“取而代之”。因此，**毛泽东在之后的27年间，在为“主义”的终极目标而孤军奋斗时，就远比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打败蒋介石、打败美帝国主义要困难得多。他面对的既是一个千疮百孔、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烂摊子，而且还要**面对一个影响了他的战友、影响了他的整个队伍的几千年的几乎是不可战胜的传统观念。这就是最后只能以一个他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来结束他那个时代的历史根源了。**

**第3章**

**“有海就要有防，要防就要建海军。过去我们是有海无防，受人**

**欺侮。我们把海军搞起来，就不怕帝国主义欺侮了！再说，我们**

**要解放台湾也要有海军。海军一定要搞，而且要尽快地搞！”**

话说1949年10月10日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4野林彪等并告叶剑英、陈赓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邓谭萧赵，并告叶陈：

10日7时电悉。一、**你们已抓住桂军4个师于祁阳以北**，其余敌军亦正回援，我军有在湘桂边区歼白主力之可能。闻之甚慰。二、完全同意你们的提议，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同主力聚歼白匪。此计划如能实现可以大大缩短作战时间，请即依令实行。三、邓华兵团及曾生、林平等部独立相机夺取广州。如何部署，由叶、方、邓、赖（叶剑英、方方、邓华、赖传珠——笔者注）等商电告。四、**现至湘潭之2野部队，必要时可令参加祁阳地区之歼白作战**。

军委 10日23时

10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张宗逊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宗逊并告德怀，及西北局：

酉佳电悉。

1. 昨日**中央会议已决定18兵团由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同志统率入川**。

二、**向胡宗南作战的兵力，除18兵团外，尚须令刘金轩部及7军予以配合。**在占汉中一带后，刘金轩部除守卫汉中为中心一带地方外，是否以适当部分进入川边策应18兵团，依那时情况再定。7军须准备进占陇南文、武、成、康（指甘肃文县、武都、成县和康县——笔者注）一带。

三、向汉中一带进攻的时间，大约在12月上旬或中旬，请令有关各部于11月下旬准备完毕。

军委 酉真

10月11日傍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即将返回原籍的张元济和他的儿子张树年，并与他们共进晚餐。在座的还有周善培、陈毅、粟裕。

毛泽东在饭后的谈话中，不断提问题，征求大家对于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面的意见。张元济建议说，为使下情上达，报纸应该多刊登一些有真实姓名、地址的读者来信，广开言路。毛泽东表示赞同，他说：

“可先辟一专栏做个榜样。”

张元济建议多修铁路。毛泽东说：

“筑铁路离不开钢。因此，要先办钢铁厂。”

张元济认为内战多年，人民生活艰难，要想国盛民富，一定要发展农业。毛泽东耐心地听着，频频点头。

周善培老先生主张读经，毛泽东默然不语。张元济说：

“普遍读经未必需要，可在大学里辟一专科，研究四书五经。”

临别时，张元济送给毛泽东一部《林文忠公集》，意在请毛泽东在全国解放后，严禁鸦片。毛泽东微笑着和他们一一握手道别。他拉着张树年的手说：

“树年兄，请多多照顾好张老。”

张树年觉得毛泽东贵为人民领袖和国家主席，这样和蔼待人，心中感动不已。

10月11日晚，周恩来到黄炎培家，诚恳地提出请他担任政府公职。

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在旧中国曾多次拒绝政府的高官厚禄。毛泽东在怀仁堂的一次晚会上曾问他：

“北洋军阀政府两次请你当教育总长，你为什么不去？”

黄炎培说：

“我的信念是：看不清真理所在，是不会盲目服从的。”

这天晚上，黄炎培听周恩来说明来意，就说：

“1946年我才68岁，已经觉得年纪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72岁了，还能做官吗？”

周恩来说：

“这不同于在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

黄炎培见周恩来如此说，便答复道，尚需考虑考虑，等他第二天回话。这天夜里，黄炎培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

10月11日午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等人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邓谭萧赵，并告叶陈：

11日10时电悉。

1. 关于调陈赓兵团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接入桂一点，已于今晨答复你们同意这样做，请径令陈兵团执行。

二、关于不要迫使广东之敌退入广西一点，我们认为也是对的，因此15兵团暂时不应进攻广州。除以一部位于韶关、英德一带外，**主力似应由英德以北向西南攻占德庆、高要一带，割断两广联系，使广州处于孤立地位。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则广州一带之敌在我15兵团与曾生、林平等部东西威迫之下，有可能发生内变，向我接洽投降或改编。**如果是这样，则我仍可能早日解放广州，这对于以干部及某些物资接济广西是有利的。

三、关于15兵团是否可以早日去占领德庆、高要一点，请叶方与邓赖商酌电告。

四、曾生、林平等部似宜进至新丰、龙门、佛冈一带，不要去惠州以南。

军委 11日24时

10月12日凌晨，毛泽东关于围歼白崇禧主力问题致电林彪，他写道：

林彪同志：

因为据你们10日7时电，白崇禧全力增援祁阳以北之敌，该敌已完全陷入被动地位，有在湘桂边界聚歼白匪主力之可能，故我们同意你们以陈赓兵团由现地直出桂林抄敌后路之意见。但据你们11日10时电，敌原拟增援之兵力，现已停止于东安、冷水滩、零陵之线，并未北进。似此，**无论祁阳以北地区之敌被歼与否，白崇禧均有可能令其主力退至广西中部、西部及西北部，背靠云贵，面向广西东北部及东部，采取游击战术，不打硬仗，与我相持，我军虽欲速决而不可得。**此时，因陈赓已入广西，广东问题没有解决，广西问题亦不能速决。如我军向广西中部、西部及西北部迫进，则白匪退入云贵。如4野跟入云贵，则不能分兵解决广东问题。如4野不入云贵，则解决白匪的责任全部落在二野身上。因此请你考虑这样一点，即**在桂林、柳州以北祁阳、宝庆以南地区采取围歼白匪的计划是否确有把握，如确有把握，则你们的计划是很好的；否则我军将陷入被动。**为了使问题考虑成熟起见，目前数日内陈赓兵团以就地停止待命为宜。

毛泽东10月12日3时

10月12日清晨，毛泽东起草了给林彪等人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彪同志，并告叶陈方邓赖及刘邓张李：

一、你们11日21时电的意见很好，即如敌守广州或我军有可能在广州或广州以外求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时，则陈邓两兵团仍继续向广州前进。但**请陈邓注意先以必要力量直出广州、梧州之间，切断西江一段，断敌西逃之路，不使广州敌向广西集中。如查明广州一带之敌向广西逃窜时，陈赓兵团即不停留地跟踪入桂。如广州一带之敌并不向广西逃跑，则陈邓两兵团仍执行原计划占领广州不变。**

二、**祁阳以北被歼之7军、48军4个师是桂系精锐。桂系正规军虽尚有46军3个师、48军1个师及56军两个师（此军位于桂林、全州间），但都不是精锐。桂系以外各军更差。**因此4野以主力由祁阳、武冈之线向桂林、柳州之线前进，兵力已很充足。但如何进法值得考虑。数日内可以看清白崇禧的部署。如果白崇禧集中全力守零陵、全州一带，你们可以集中兵力南进，试行抓住该敌。**如白崇禧鉴于此次精锐被歼的教训（此次被歼是出于白崇禧意料的），向桂林、柳州之线大规模撤退，则我军似不宜集中前进，而宜分两路并列前进，以一路出柳州以北，以一路出桂林。**

毛泽东 10月12日6时

10月12日一早，黄炎培叫来了江问渔、杨卫玉和孙起孟等至交好友，征询他们的意见，大家都说他应该接受政务院的职位。

10月1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第1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彭甘，并西北局：

9日酉时电悉。

1. 伊宁民族军必须有一人为新省军区副司令，已见前电。

二、民族军应改名为人民解放军，他们已有此意，并要求我们派政治工作人员去。此事及应编师的数目及具体番号，待你至迪化与民族军负责人商量后再定。

三、民族军应有一部开迪化，另一部开乌苏。此事待与赛福鼎商量后再告。

四、新疆党的领导机关应成立分局，同意以王震为书记，徐立清为副书记，罗元发、张贤约、饶正锡、王恩茂、郭鹏、曾涤、邓力群为委员。自治区只有民主同盟，尚无党的组织（应该建立党的组织），是否可以同盟负责同志数人临时参加分局会议，待考虑后再告。

中央 10月12日

10月12日晚，周恩来再次登门拜见黄炎培，黄炎培高兴地表示愿意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黄炎培的这一举动，反倒使他的子女们感到难以理解。黄炎培解释说：

“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

此时，周恩来还在物色文化部长的人选，他动员沈雁冰出任这一职务，他说：

“雁冰，我受命组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准备任命你为文化部长，特向你征求意见。”

沈雁冰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他闻听此言，不觉一愣，思索了一下说：

“我一向都是搞创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生活可以安定下来了，我不想当部长，只希望继续从事创作。”

周恩来说：

“你说得有道理，但还是请你再考虑一下。”

10月13日下午，周恩来派人把沈雁冰接到颐年堂，他和毛泽东早已等候在那里，与沈雁冰握手后坐下来。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

“在人事安排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所以请你来商量。”

毛泽东也微笑着说：

“我跟恩来商量过了，还是请你出任文化部长。雁冰，文化部长这把交椅是好多人想坐的，只是我们不放心，你是中外知名的大作家，这第一任文化部长，非你莫属啊！所以想请你出来。”

沈雁冰说：

“那为何不请郭老担任呢？”

毛泽东解释说：

“郭老是可以的，但他已经担任了两个职务，一个是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一个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再要他兼任文化部部长，顾不过来。”

沈雁冰见毛泽东如此说，就愉快地答应了下来。

10月13日，毛泽东关于“第1野战军、第2野战军在西北西南地区的作战部署”问题致电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

一、关于由陕入川兵力，已与贺龙、伯承、小平一起确定为18兵团，不牵动其他部队。

二、刘金轩部及7军配合作战。战后7军位于陇南工作。刘金轩部除守卫陕南外，是否抽一部入川，那时再酌定。

三、歼胡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2野进至叙、泸、重庆之线，然后发起攻击，时间大约在12月上旬或中旬，由军委确定。

四、2野主力两个兵团，现到常德、湘潭之线，大约12月可到川南。2野陈赓兵团本月可协同邓华兵团占广州，下月入桂，协同4野主力歼白，大约明年1、2月可入云南。

1. 担负西北任务的3个兵团，以两个兵团（即第1、第2兵团）担任地方工作，另一个兵团（即19兵团）待宁夏工作结束后，不担任地方工作，开至天水、宝鸡、潼关之线专门整训，作为国防机动兵力，以备不虞（此点在数月前已电告）。请准备适当兵力，于数月后接任宁夏地方工作。

六、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2野全军及18兵团，共约60万人。西南局的分工是邓、刘、贺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为军区司令员，邓为政治委员，刘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

毛泽东 10月13日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不使广东敌军逃入广西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邓，叶陈：

据香港10月10日电称，“一、据空军高级人员方面获息，蒋电李、白，弃守广州，坚持广西；并表示，今后对李、白做法，当不予干涉。二、据熟悉桂系的人说，桂残军如退入桂境，当会大部逃散，丧失战斗力。现白匪正大量廉价售卖枪支给地主，拟大量组织地方反动势力，并在桂东演习坚壁清野，连谷种都要毁灭”等语。**请加注意，务不使粤敌逃入广西。**

军委 10月13日

毛泽东又在林彪、邓子恢、谭政等10月12日表扬人民解放军第40军、41军和49军歼灭白崇禧主力的电报上，给程潜写了一个批语。

白崇禧被歼灭的部队是7军两个师及48军两个师，地点在祁阳以北。消灭这些部队时白崇禧坐视不救，他自己退到桂林，各军退到东安、零陵、冷水滩一带，听任7军、48军苦战4天被歼干净。

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程颂云先生阅。毛泽东 10月13日

10月13日晚，毛泽东在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11日关于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情况和经验的来电报告上批示道：

“极为欣慰。”

接着，他起草了给彭德怀等人的《关于学习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验的指示》，全文如下：

德怀、仲勋，林彪、子恢，剑英、方方，小平、伯承、贺龙，一波、澜涛，高岗、富春、林枫，康生：

据饶漱石同志10月11日电称，“我们选择上海附近松江县，创造召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此种会议，已于9月30日举行。我曾赶往参加，并作报告。会议结果良好。经过各界代表的热烈讨论和辩论后，成立了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处理劳资纠纷等实施办法。对党内党外，教育意义均甚大。证明，在各县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不但有迫切需要，而且有充分可能。会议经过和经验，拟全部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计：一、我在会议上的报告，关于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及工商业政策问题（已在10月6日《解放日报》上发表）。二、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报道。三、县委书记关于松江工作与任务的报告摘要。四、介绍松江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拟用《解放日报》社论发表）。上述各件，已于今日由新华社发给中央。如仍需由内部专门总结报告，请电示办理”等语。

上述文件俟收到后即由新华总社广播，你们可以在报纸上看到。你们看了松江县的经验后，请即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务望仿照办理，抓紧去做。并请你们选择一个县，亲自出席，取得经验，指导所属。

　 毛泽东 10月13日

是日晚，毛泽东又给冯友兰写了一封回信。

冯友兰，1895年出生在河南省唐河县，1920年留美，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30年代，著有《中国哲学史》等书。1949年10月1日，冯友兰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开国大典。10月5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内中说：“我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正错误。……我计划于5年之内，如政协共同纲领所指示的，以科学的历史的观点，将我在20年前所写的《中国哲学史》，重新写过，作为一个新编。诚如你所说的，我们不但要知道中国的今天，还要知道中国的昨日。”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友兰先生：

10月5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成，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敬颂

教安！

毛泽东 10月13日

冯友兰收到毛泽东的回信后，有两点很意外的感受：一是“我不料毛泽东的回信来得如此之快，并且信还是他亲笔写的，当时颇有意外之感”；二是“信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我不懂。而且心中有一点反感，我当时想，什么是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

究竟什么是毛泽东所说的老实态度？这个问题使冯友兰困惑了多年。经过30多年的锻炼，他终于慢慢地认识到毛泽东那句话的含义：“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5年之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这么短暂的时间完成是不现实的。”

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第4兵团、第15兵团等部解放了中国南部最大的城市广州。

早在9月28日，叶剑英、陈赓联名签发了《广州外围作战命令》，命令规定：为便利作战指挥，以4兵团为右路军，15兵团为左路军，以两广纵队、粤湘赣纵队、粤中纵队组成南路军，3路大军从南北分别向广州进军。10月2日开始，各路军按照预定部署，向余汉谋部发起进攻，广东战役打响了。第4兵团的3个军沿粤汉路两侧南下，占领韶关，直取广州；第15兵团的2个军，经翁源、从化等南下，形成对广州的钳形合围；两广纵队组织广东地方部队由和平、龙川等地东进东莞地区，切断敌人南逃退路。在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下，国民党行政院长阎锡山逃往台湾，代总统李宗仁飞往重庆，广东余汉谋部则沿西江逃窜。10月14日下午6点30分，第15兵团先头部队从广州北郊攻入广州市区。第4兵团则分路穷追由广州向西南逃窜的敌军主力，在阳江地区将其歼灭，余汉谋率残部逃往海南岛。

10月15日，人民解放军3野第10兵团以伤亡2000余人的代价，强行渡海登上厦门岛，歼灭守敌汤恩伯部27000余人，其中俘虏25000余人。

早在9月23日，第3野战军第10兵团在司令员叶飞率领下，解放了集美，兵临厦门，从北、西、南3个方向，对厦门岛汤恩伯部3万余人形成了半月形包围。

厦门岛长13公里，宽11公里，面积128平方公里。汤恩伯将厦门岛的防御重点放在了北半部。他手里还握有反登陆必备的制海权与制空权——金门料罗湾、厦鼓水道锚泊着4、5艘美式大型军舰，5、6艘小型军舰，厦门北部高崎机场上还有几架飞机。汤恩伯吹嘘，厦门“守三、五年没有问题。”10月15日15时40分，第10兵团31军91师和93师277团，在猛烈的炮火支援下向鼓浪屿发起佯攻，吸引敌军主力；而在北半岛方向一线10公里长的突击正面，主攻登陆部队29军85师、86师，31军92师，在15日19时不发一枪一炮，从鳌冠、集美、刘五店等处千帆竞发，在西北、正北、东北3个方向直插寨上（湖里）、高崎、钟宅（下马）3个登陆点。10月16日拂晓，突击部队在厦门岛北半部全线突破，并迅速向周围扩张。

10月15日这一天，毛岸英和刘思齐在中南海丰泽园举行了婚礼。

原来在9月末的时候，毛岸英和刘思齐商量好，过一些日子就结婚。他们征求了刘思齐妈妈张文秋的意见。婚期初步定下来以后，毛岸英又征求了爸爸的意见，他说：

“爸爸，我跟思齐商量好了，我们准备在星期六的下午结婚，不知道爸爸同意不同意？”

毛泽东说：

“我同意，就这么定了，星期六下午结婚。你们准备怎么办婚事呀？”

毛岸英说：

“我们商量了，越简单越好。为了不给爸爸增加麻烦，我们的婚礼在情报部举行，暂时也住在那里。我们都有随身的衣服，也有现成的被褥，不用花钱买东西。”

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说：

“不花钱办喜事，这是喜上加喜。婚事简办，我完全赞成，就是要改一下旧习惯嘛。应该艰苦朴素。但你们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呀，我请你们吃顿饭，你们想请谁就请谁。你跟思齐的妈妈说说，现在都是供给制，她也不要花钱买东西了。她想请谁来都可以，在我这里吃顿饭。”

毛岸英和刘思齐一商量，就写了一个请客人的名单，有邓颖超妈妈、蔡畅妈妈、康克清妈妈、谢觉哉伯伯、陈瑾昆伯伯等人。毛泽东看了名单说：

“你们只请邓妈妈不行，请了邓妈妈，还应该请恩来；请了蔡妈妈还应该请富春；请了康妈妈，还应该请朱总司令；请了谢老还应请王定国；请了陈瑾昆，还应请梁淑华。还有少奇和光美同志也要请。弼时同志有病住在玉泉山休息，就不要麻烦他了。该请的人由岸英去请，打电话或亲自去请都可以。吃什么也由你们跟他们商量，最好是家常便饭，简单一些。”

10月15日这天下午，毛岸英和刘思齐在情报部机关举行了婚礼。毛岸英身着当翻译的工作服。刘思齐穿着灯芯绒布的上衣，裤子是半新的，方口布鞋是新买的。机关领导和同事们都参加了他们的婚礼，非常热闹。婚礼结束后，他俩早早赶到了菊香书屋。

毛泽东打量着刘思齐，笑着说：

“思齐，你今天是新娘子，从今天起，你就成了大人，不是小孩子了。”

他又像是发现了什么大问题，“咦”了一声，说：

“你是新娘子，为什么头上不插花儿呀？”

说得刘思齐不好意思起来。一会儿，妹妹张少华、张少林和李讷拿来了两朵鲜红的小绒花，插在刘思齐的头上。大家一齐拍手称赞：

“新娘子真美啊！”

晚上七八点钟，客人们陆续赶到菊香书屋院，还带来了小小的纪念品。蔡畅和康克清送的是两对枕头套。王光美送的是一件女式睡衣。

毛泽东自己出钱，在菊香书屋的西屋里办了3桌酒席。桌子中间摆着一个大拼盘，装着湖南的腊肉、腊鱼、腊鸡和香肠，拼盘四周是红烧肉和一些小菜，大部分是湖南的家乡菜。新郎和新娘被安排在正中的一桌，两边坐着周恩来、邓颖超和张文秋。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坐在左边的一桌，其他客人坐在右边的一桌。大家欢聚一堂，非常高兴，祝贺小两口婚姻美满，也纷纷向毛泽东表示祝贺，说他找了一个好媳妇。毛泽东笑眯眯地致词说：

“今天是我家办喜事的一天，也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天。看到儿子结婚，我非常高兴，感谢大家来参加婚礼。我的孩子，这些年来，在艰难困苦中，自己度过来了，今天终于结婚了。孩子长这么大，我没为他操过半点心。今天的这一切，也是在同志们帮助下，岸英自己筹办的，我非常感谢同志们的帮助。”

毛泽东举杯走到亲家张文秋面前，对她说：

“谢谢你教育了思齐这个好孩子。为岸英和思齐的幸福，为你的健康干杯！”

他又向各位客人敬了酒。周恩来对张文秋说：

“你这个做母亲的，也得说几句话呀。”

张文秋说：

“我说什么呢？”

周恩来说：

“你如果一时想不出新词，把主席刚才说的话变成你的话，不也很好嘛。”

于是，张文秋也举杯走到毛泽东面前，说：

“谢谢主席在百忙之中为孩子们的婚事操心。思齐和岸英结婚，这是他们的幸福，也是我的幸福。思齐年幼不大懂事，希望主席多批评指教。”

周恩来笑着说：

“这不是讲得很好嘛！”

大家都笑了起来。席间，毛泽东一边把湖南风味的腊肉、腊鱼、辣椒往徐特立、谢觉哉等老人碗里夹，一边说：

“孩子们的婚事没有要我操心，也没买这买那。吃了饭，请你们到他们的新屋里去看看。”

饭后，毛泽东说：

“今天是非常高兴的一天，因为这是岸英和思齐结婚的日子，这喜酒和便饭，是岸英自己张罗的，他办得还可以，我要表扬他。如果办得不好，我也会批评他的。”

毛泽东要卫士拿出他的一件黑色的礼服呢大衣，对毛岸英和刘思齐说：

“你们结婚了，我很高兴。可是，我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们。就这么一件大衣，略表我的心意。以后，白天岸英穿，也可以防寒，晚上盖在被子上，你俩都有份儿。”

在场的人听毛泽东这么一说，都忍不住大笑起来。毛岸英和刘思齐同声说：

“谢谢爸爸。”

毛泽东的这件礼物非同一般，正是他当年赴重庆谈判时穿的那件呢大衣。大家说说笑笑来到毛岸英的新房。那是机关宿舍的一个普通房间，门上贴着大红喜字，屋里有一张大木床，床上只有两条被子，其中一条还是刘思齐带过来的嫁妆，其余的都是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

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小儿子毛岸青的婚事也很关心。此时的毛岸青进步很快，除了正常上班以外，他翻译的俄文小说在报纸上连载，反映很好。唯一不如愿的事，就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恋爱对象。毛泽东听了他在谈恋爱中遇到的一些不愉快的事儿，就劝他说：

“你谈恋爱找对象，就不要说你是毛泽东的儿子，你就说你是中宣部的翻译不是很好嘛。我劝你找一个工人或农民出身的人，这对你可能还有些帮助。你要求条件高了，人家的能力强，看不起你，那就不好了，整天不愉快生闷气，那还有什么意思呀。”

再说10月15日晚，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回信。

周世钊，字惇元，他在9月28日给毛泽东的长信中，曾将自己1946年写的《书愤》一诗抄寄给毛泽东，其诗云：

人士纷纷粉墨场，独惊岁月去堂堂。沐猴加冕终贻笑，载鬼同车亦自伤。

卅载青毡凋俊骨，九州明月系离肠。烟尘满眼天如晦，我欲高歌学楚狂。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惇元学长兄：

迭接电示，又得9月28日长书，勤勤恳恳，如见故人。延安曾接大示，寄重庆的信则未收到。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城南学社诸友来电亦已收到，请兄转告他们，感谢他们的好意。**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倘有可能，尊著旧诗尚祈抄寄若干，多多益善。**

除台湾、西藏外，全国各地大约几个月内即可完成军事占领。但**大难甫平，民生憔悴，须有数年时间，方能恢复人民经济，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及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水平**，这些任务均有待于文教工作的协助。

陈泽同先生的意见书已收阅，当交此间工业机关研究，请兄为我代致谢意。他的工作问题请告他直接向湖南当局要求解决，不要等候我的答复。谨此奉复。敬颂

教祺

毛泽东

10月15日晚，毛泽东给卫立煌复了一封电报。

前面已经说过，卫立煌是在1949年1月31日，和夫人韩权华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逃离南京，寄居在香港的。10月3日，他在香港通过有关组织向毛泽东发来了贺电。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张枫转卫立煌将军：

酉江电诵悉，极为感谢。谨此奉复。

毛泽东

10月16日，这一天是苏联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罗申在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递交国书的日子，周恩来也将参加递交国书仪式。

毛泽东在接受罗申递交国书仪式之前，需要剃须整容。自从进入北平以后，他的头发虽然较前短了一些，但在平日里，他从不注意修饰，也不剃须。因此，在参加外事活动或者出席大型会议之前，出于礼节上的需要，必须叫理发员王惠给理理发，剃剃胡须。

王惠已经50多岁了，是一位“三八式”的老战士，大家都叫他老王头。王老头剃个光头，矮矮的个子，黑黑的脸庞，大大的眼睛，戴一副老花镜，黑紫色的厚嘴唇，蓄着花白的长胡子，常常微笑着，露出的牙龈也是黑紫色的。他的右腮下面有一块指甲盖大小的黑记，上面留着一小撮长长的毛。王惠不爱说话，只在开心时才会冒出一两句：

“在理发时，毛主席也得听我的。”

王惠的动作慢腾腾的，很不利索了。他在给毛泽东理发或是刮胡须时，往往是用左手按着毛泽东的头顶，右手拿着剃刀，架在毛泽东头上，伸长脖子，眯缝起双眼，左瞧右瞧，半天不动，连旁边的人都有些不耐烦了，他才“唰”地刮一下。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总担心他那不灵活的手，会在毛泽东的面部留下刀痕。毛泽东对于这些，似乎都已经习惯了。这一次不同往常，毛泽东看一眼手表，说：

“你快点。”

王惠慢条斯理地说：

“别着急，着么急呀。”

他换个位置，把刀又架在毛泽东另一侧的脸上，比划着，时间更长，好不容易才又“唰”地来一下。接着退后一步，他像欣赏什么杰作似的，端详个没完。

“哎呀，老王，要快一点么！”

毛泽东说着欠一欠屁股，却被王惠从头顶上按住了。他依然慢声慢气地说：

“叫你别着急么，到时候叫你去就行。”

王惠把毛泽东那颗充满智慧的头颅就那么扶过来扶过去，时而轻剃轻刮，时而左右端详，严肃认真地为毛泽东把面修好。好不容易才刮完脸，毛泽东想抬屁股起身，又被王惠按住了头，说：

“怎么不听话呢？你别着急么！”

毛泽东哭笑不得，在王惠的手掌下强抬一抬头说：

“我要你快一点么。”

“沉住气，听我的，给您刮干净再去。”

王惠居然在毛泽东的后脑勺上拍了两下，那么自然。在场的卫士们一个个目瞪口呆。而毛泽东居然也不发火，只是无奈地用力叹了口气。王惠又给毛泽东刮后脖颈，还不知轻重地“教训”毛泽东说：

“你是国家主席，主席要有主席的样子。啊，又是我的手艺，剃不好我王惠也不光彩么。”

后来李银桥曾经说过：“在我印象中，王惠是唯一在毛泽东面前富于自尊、从内心到言谈举止都一贯将自己放在与领袖完全平等的地位上的伟大而普通的人物！”

欲知递交国书仪式如何进行？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与理发员王惠的故事，读来令人捧腹。毛泽东的自律与王惠的自尊，可谓千古难得一见。这种领袖与工作人员的平等关系，堪为后来者的楷模。

**第4章**

“**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

**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

话说1949年10月16日下午，递交国书仪式如期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毛泽东递交了国书。毛泽东致答词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即承苏联政府首先响应，愿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我相信，中苏之间的友谊，将因贵国政府的这一决定，日益发展和巩固起来。”

这次外事活动，尽管经过了有关人员的精心准备，可在喜庆的氛围中还是出现了不尽人意的环节。像递交国书这类外事活动，在中方还是开国以来的第一次，由于没有经验，就采纳了苏方建议，在递交国书仪式结束后，举行宴会。为此，有关人员在前门外全聚德订购了烤鸭，可是后来当那些烤鸭被送到勤政殿时，已经全部凉透了，不再是皮脆肉嫩，而是咬不动了，弄得大家都兴味索然。自此以后，中国在外国使节递交国书时，就再也不举行宴会了。

这一天，毛泽东在办公室里已经连续工作了一天一夜，值班卫士王振海急了，就去把王鹤滨从睡梦中叫醒。王鹤滨问：

“什么事，老王？”

王振海说：

“王秘书，你赶快起来吧，去劝劝主席休息一下。他工作快一个对时了，还没有出办公室哩，我们劝了几次都没有用。”

王鹤滨急忙穿衣下床，穿过澄怀堂前的大院，来到菊香书屋的过厅，见另外3个卫士正聚在毛泽东办公室门前，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张仙朋见王鹤滨来了，就说：

“王秘书，你是管理主席生活的秘书，又是主席的保健医生，我们催了几次，请毛主席休息，都不行，这回就看你的啦！”

王鹤滨也不说什么，轻轻地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站在写字台东侧约一米左右。毛泽东正专心致志地工作着，目光在文件上不时地左右摆动着，时而还在文件上写着批语，并未察觉有人进来。王鹤滨趁他手中的铅笔停止写字时，轻声劝道：

“主席，该休息一下了，工作的时间太久了。”

毛泽东闻声侧过头来，看了王鹤滨一眼，微笑着说：

“知道了。”

话音未落，又转过头去看文件。王鹤滨只好退了出去。卫士们急切地问：

“怎么样？”

“主席答应休息了吧？”

王鹤滨摇摇头，简单说明了一下，就和大家一起等了起来。好不容易又过了个把小时，眼看已经过了子夜，王鹤滨轻手轻脚地再次走进办公室，走近毛泽东，径直轻声说：

“主席，该休息了，工作的时间太久了。”

毛泽东听到王鹤滨催请的声音，头也未动，眼皮也未抬，手中的铅笔也未停，回答说：

“工作完了就睡！”

王鹤滨瞟了一眼毛泽东左手边那沓子文件，心想，这么多文件，什么时候才能办完呀！没办法，只好又悄悄地退了出来。他明显地感觉到了卫士们投过来的责备的目光，似乎在说：

“原来你和我们也是一样，没有办法使毛主席休息下来。你这秘书是怎么当的？你这保健医生是干什么吃的！”

约摸又过了个把小时，王鹤滨重新鼓起勇气，下定决心，一定要请毛泽东休息，便第3次踏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他加重了脚步，一直走到办公桌旁，刚要张口说话，忽然见毛泽东把手中的铅笔往桌子上一放，随着转椅的转动，把整个身子转了过来，和王鹤滨来了个面对面。看来他也下定决心要排除干扰了。他的目光直逼着王鹤滨，严肃地说：

“你又来了，这工作是放不下的，我去睡觉，谁来替我办呀！”

毛泽东说罢，看着王鹤滨呆呆地站在那里，一脸窘态，就又用稍微和缓而又无奈的口气说：

“你来替我办？啊？”

意思是你看怎么办？是你来办，我休息。还是让我继续办，你不要再来干扰。毛泽东这一招真厉害，有谁能代替他呢！王鹤滨没辙了，只好败下阵来。这一夜，一直到东方泛出了鱼肚白，毛泽东还没有走出办公室。

10月17日，毛泽东关于“4兵团应乘胜追击占领高要德庆等县”致电林彪等：

林彪同志，并告剑英陈赓：

广州敌逃跑方向，不是向正西入广西就是向西南入海南岛。我4兵团似应乘胜追击，直至占高要、德庆、封川、高明、新兴、云浮、郁南、罗定等县，必要时并占领梧州，然后停下来休整待命，听候你的统一部署入桂作战。因为**占领上述诸县，一则可能歼灭逃敌一部或大部，使15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消灭残敌，平定全粤；二则即是对于入桂作战完成了部队的展开。**是否可以这样做，请按情况酌定。

毛泽东 10月17日

10月间，毛泽东接到了小友许志行从上海发来的一封信。许志行在信中说，新华社捎信的人因上海尚未解放，慌忙之间竟把毛泽东给他写的信弄丢了。

原来在不久前，毛泽东就接到了小友许志行发来的一封信，信上说，自从长沙一别，20多年未见面。他以前南下回到了上海等地，在书报行业做编辑或在学校里当教师。他现在上海格致中学教书。毛泽东立即复信一封，让新华社的人带往上海。

毛泽东看了许志行这次来信，就又给他写了一封信，鼓励他好好工作。这封信直接从邮局挂号寄给许志行所在的学校。此后，毛泽东又和许志行通了3封信，都是他亲笔所写。后来，许志行一直在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写作教研组岗位上工作。

10月中旬，毛泽东电令第4野战军12兵团司令兼湖南军区司令员萧劲光即刻进京。萧劲光交代完手中的工作，急忙启程赴京，面见毛泽东。毛泽东向萧劲光询问了家乡的情况，然后说道：

“劲光同志，这次召你进京，是想借用你萧司令员哟。现在全国的作战任务虽然还很繁重，但组建一支空军和海军的任务，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空军的筹建工作已经差不多了，中央决定让刘亚楼去当司令员。现在要着手筹建海军，想让你当司令员。先给你打个招呼，听听你的意见。”

萧劲光一听可急了，连忙摆手说：

“主席，这个可使不得。我是个‘旱鸭子’，又不懂海军，哪能当海军司令员？我晕船挺厉害，连海船都坐不得。”

“我就是看上了你这个‘旱鸭子’哩。”毛泽东哈哈大笑：“你这个同志，是让你去组织指挥，去当司令，又不是让你去当水手！”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接着说：

“20多年来，我们同日本人打仗，同国民党反动派打仗，都是钻山沟，钻青纱帐，主要在陆地上。可是现在要建设空军，建设海军了，总得有人去领个头。我们建设海军、空军，要向苏联学习，要依靠苏联援助。你和刘亚楼都有很长的斗争历史，又都在苏联学习过，有文化，懂俄语，比较了解苏联军队，又懂得我军一整套优良传统。我看，中央选定你们当司令，还是合适的。”

他看到萧劲光不再推辞，就继续开导说：

“**有海就要有防，要防就要建海军。过去我们是有海无防，受人欺侮。我们把海军搞起来，就不怕帝国主义欺侮了！再说，我们要解放台湾也要有海军。海军一定要搞，而且要尽快地搞！”**

10月19日上午，毛泽东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政务院副总理及下属委、部、会、院、署、行主要负责人的任命：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贺 龙 刘伯承 林 彪 陈 毅 徐向前 叶剑英 聂荣臻 高 岗 粟 裕 张云逸 邓小平 李先念 饶漱石 邓子恢 习仲勋 罗瑞卿 萨镇冰 张治中 傅作义 蔡廷锴 龙云 刘斐，共22人。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朱 德 周恩来 刘少奇 彭德怀 程 潜，共5人。

徐向前为总参谋长，聂荣臻为副总参谋长。

15名政务委员中，党外人士9人，他们是：谭平山 章伯钧 马叙伦 陈劭先 王昆仑 罗隆基 章乃器 邵力子 黄绍竑。

政务院副总理共4名：其中有董必武 陈 云；有党外人士2人：郭沫若 黄炎培

李维汉为政务院秘书长

政务院所辖34个部、会、院、署、行，担任主要职务的是：

外交部副部长有：王稼祥 李克农 章汉夫

重工业部部长：陈云，副部长何长工，何长工行代部长职务

财政部部长：薄一波 铁道部部长：滕代远

燃料工业部部长：陈 郁 贸易部部长：叶季壮

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内务部部长：谢觉哉

劳动部部长：李立三 法制委员会主任：王 明

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

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 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

后来在1954年由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 由董必武任最高法院院长

以下是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14人，共计15个正职，他们是：

郭沫若 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科学院院长（兼）

谭平山 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 章伯钧 交通部部长

黄炎培 轻工业部部长（兼） 傅作义 水利部部长

李书城 农业部部长 朱学范 邮电部部长

梁 希 林业部部长 沈雁冰 文化部部长兼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马叙伦 教育部部长 李德全（女）卫生部部长

史 良（女） 司法部部长 胡愈之 出版总署署长

何香凝（女） 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

10月19日下午，毛泽东关于西南地区作战方针致电林彪，并告叶剑英、陈赓，他在电文中写道：

林彪同志，并告叶、陈：

18日12时电悉。

1. 你们准备先以大迂回抄断敌退云南之路，这一计划是很好的。

二、西南重心是四川，我2野主力必须于12月占领叙府（今宜宾——笔者注）、泸州、重庆一带，贺率18兵团则于1月占领成都一带，并迅速扩占全川，布置明年春耕，方有利于生产建设。因此，不论白崇禧是否退云南，我3、5两兵团只准备以一个军（即18军）进占贵阳，并经营贵州；其余5个军、两个兵团部及2野直属队，均由湘西分路直取叙、泸、渝（留一部于遵义一带），务于12月达到该地区，设立西南军政委员会，统筹西南全局。否则150万人的财经问题将陷于极大困境。这里所说的150万人，是指我军60万人（其中2野全军50万人，贺部10万人)，张群所属国民党川、滇、黔、康4省军政人员据说有90万人，主要是在四川。

三、根据你所说的大迂回方案，估计白崇禧部可能有一半或更多被我歼灭于广西境内，退到云南去的或者不很多。现在假定白匪主力退至云南，加上贵州之敌亦退至云南，加上云南卢汉等部，共有敌军15万人左右，我仍应只以陈赓兵团10万人，加上地方游击部队（据说有2万余人）去对付，方有主动。因为路远粮缺，往返不易，如去两个兵团（20万人），有陷入困境之虞。估计陈赓以10万人入云南，采取各个歼敌方法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不过时间略为延长些罢了。

四、请根据上述方针进行部署。

五、刘、邓于明日或后日由京经汉赴湘，指挥2野向四川进军。3、5两兵团，请令其补齐棉衣，进至湘黔边境待命。

毛泽东 酉皓

10月2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介绍王稼祥出任驻苏大使，他在电报中写道：

斯大林同志：

兹介绍王稼祥同志给你。王稼祥同志到苏联的任务，是除担任我国驻苏大使、并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资格、兼管对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一般的外交事务外，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他是我党的中央委员），和你及联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请你及联共中央同志们站在同志的立场上，随时给他以指导，使他的工作获得较多和较好的成就。我在这里预先向你表示谢意。

当晚，王稼祥一行离开北京赴任。

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把中国人民的友谊带到苏联去——欢送王稼祥大使离京赴苏》的社论。

10月21日，周恩来召集第1次政务院扩大会议，宣告政务院正式成立，政务院总理、副总理、政务院委员以及下属34个机构的负责人正式就职。

10月21日下午，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了一份便函，他写道：

乔木：

我军于昨日到达迪化。请写评论一篇，能于明日见报为好。关于人民解放军入新的消息及评论，不要有‘占领’字样，均称到达某地；评论中并应提到得到新疆军政当局同意并欢迎人民解放军迅速开进的。

毛泽东 10月21日下午3时

10月22日，毛泽东接见了新疆代表团。

新疆代表团已经圆满完成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拟于明日返回新疆。毛泽东关切地问周恩来：

“送他们的飞机准备好了吗？”

周恩来说：

“准备好了一架飞机和技术过硬的机组。”

毛泽东说：

“好。今晚和苏联专家组织一个检查组，对飞机和机组人员再进行一次深入的检查和了解，做到绝对有把握再起飞。”

他转向赛福鼎说：

“明天，你在未得到恩来同志可以起飞的通知之前，不要上飞机。你等候恩来同志的电话。”

赛福鼎听了毛泽东的话，极为感动。他拿出早在10月15日就已经写好的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说：

“主席，我早就写好了入党申请书，不知我具备不具备共产党员的条件，请你指示。”

赛福鼎双手将申请书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显得很高兴，不停地点头，说了声：“好！”就把申请书装进衣兜。

第二天，赛福鼎和代表团成员起得都很早，一直等待着周恩来的电话。正8时，周恩来打来电话说：

“一切准备就绪，可以起飞，请你们去机场。”

赛福鼎等人赶到机场，周恩来早来了，他握着赛福鼎的手说：

“祝你们一路平安。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入党要求毛主席批准了。我带来了毛主席的批示，交给你。”

周恩来从衣兜里取出批示，他知道赛福鼎读汉文还有困难，便左手拿着他的入党申请书，右手指着毛泽东在上面的批示，一个字一个字地念道：

同意赛福鼎同志入党。此信由赛本人带交彭德怀同志，即存彭处。待新疆分局成立后，由赛同志向分局履行填写入党手续。

毛泽东 1949年10月23日

周恩来将毛泽东的批示交给赛福鼎，紧紧握着他的手说：

“祝贺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到了酒泉后，请将它交给彭老总。”

赛福鼎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批准了他的入党要求，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他紧紧地握着周恩来的手说：

“衷心感谢毛主席、周总理给了我政治生命，今后我一定加倍努力，不辜负党对我的期望。我还要感谢毛主席、周总理为我们安全返回新疆，给予的高度重视和为此所做的大量工作。”

周恩来说：

“今天毛主席还给彭老总拟了一份电报，通知他，你去酒泉，要他和你再具体谈谈新疆的工作。彭老总和王震同志在等着你们呢！好，再见！上飞机吧。”

赛福鼎一行到了酒泉，王震、徐立清等人在机场迎接，将他们安置在招待所。不一会儿，彭德怀在王震和秘书、参谋的簇拥下来了。落座后，赛福鼎拿出毛泽东的批示，递给了彭德怀。彭德怀看过后，高兴地说：

“好哇，祝贺你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大军。今天我们收到中央的一份电报，上面也提到你入党的问题。”

彭德怀叫秘书取出电报，接过来说：

“先给你念一下有关你入党的部分，‘赛福鼎为代替阿合买提江的领袖人物，曾留学莫斯科，做过新疆省政府的教育厅长。据我们了解，此人是好的，此次已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他现申请入党，我们认为是可以的。’”

彭德怀刚读到这儿，王震就带头鼓起掌来。毛泽东在这份给彭德怀和西北局的指示电中还写道：

“维吾尔族人口300余万，为新疆的主要民族。”“人民解放军只有和维吾尔族（以及其他民族）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才有可能建设人民民主的新疆。”

10月24日，毛泽东同绥远方面党内负责人进行了特别重要而坦诚的谈话，还特邀傅作义先生在座。谈话记录全文如下：

绥远和平解放谈了大半年，现在才实现第一步，董其武他们9月19日已发了起义通电，我和朱总司令也发了回电。现在要走第二步，就是实现合作。这一步很重要。要坚决执行中央的这个电报，这是党对绥远的基本方针，不但要求他们执行，共产党更要执行。

绥远属内蒙古区域自治的范围，省下面要成立盟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伊克昭盟，华北局要与西北局商议，取得他们的同意，划归绥远领导，伊盟政府驻地可在东胜或别处。乌兰察布盟也要成立盟人民政府委员会。伊、乌两盟都设立军分区。两盟的蒙族和汉族都要有人参加政府委员会，这也要同他们商议。

绥远要成立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直属中央领导，省政府、军区归军政委员会领导。由傅作义任主任，乌兰夫任副主任，统一领导绥远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傅作义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他管辖的地区人多，有120万人口，绥东解放区只有80万人口；军队也是他的多。军区也要统一起来，由傅作义任司令员，乌兰夫、姚喆任副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傅先生可再提名别的副司令员和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政府由董其武任省主席，奎璧任副主席。政府也是统一战线的，一定要合作好。**你们要使同志们了解这种合作的必要性和意义所在，有什么好处，原因在哪里。应当说，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打仗，是为人民求解放；和平解放，团结改造，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你们回去开个党代会或干部会，薄一波去一趟，讲一个来钟头，花几天时间，让同志们把这个问题讨论透。这是统一战线问题，傅先生也要做工作。

对绥远起义人员实行团结改造的方针早已定下来了，实际工作就按傅先生提出的4个原则3个步骤去进行，工作要有步骤地开展，做出更大成绩来给全国看。要合作把事情办好。双方过去是敌人，现在成了朋友。当然，合作后也要估计到可能发生一些问题，还要经过艰苦的工作与斗争。一年能办到算好，否则可以用两年。没有战争了，有些事情不能进行得很快，快了就会出毛病。要先做思想改造工作，后改革旧制度，有步骤地达到目的。原则问题中央电报上已经讲过：**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军队现在暂不变动，待条件成熟再按解放军制度整编。这个问题在党内要特别讲清楚，争取一年达到目的，但也不能性急。蒋介石统治了22年都没有弄好，我们一年完成还不算好吗?**

**部队要组织生产，生产也是作战。干部要参加生产指挥和劳动。劳动可以改造思想，改造人。战士看到干部也挖地，官兵关系就可以改善，这就是政治工作**。政府工作人员可以在业余时间搞生产，每天劳动一二个小时，主要是种菜、养猪。

我们对起义人员的方针是又团结又改造。只有团结，没有改造不行。**反动阶级、反革命分子的阴谋破坏活动是不会罢休的，他们还要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时间还会很长，绝不能麻痹。**过去是敌人，现在成了朋友，这是有条件的。凡愿意同我们合作与可能争取同我们合作的人，都要耐心帮助、教育、改造，很好地同他们合作，从改造中逐步肃清过去反动派的一切遗迹和对他们的政治影响，以马列主义思想代替国民党的反动思想。对那些坚决反对改造和破坏改造的反革命分子与特务，必须打击与镇压。要争取团结多数，他们内部也一样是两头小、中间大，思想激进的可以鼓励，进步缓慢的可以等待。对基本方针要拥护，但允许有差异。对他们不能用粗暴的方法，不能下大雨，要像下小雨一样才能渗透进去。要按照他们的具体情况和能够接受的程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强迫灌注。

关于政治工作人员，师以下暂时不派。对派去的同志要进行教育，要他们注意研究情况，了解别人的心理，懂得新的工作方法，使这些干部去后不致发生问题。要使他们知道，如果搞不好是会被别人赶出来的，即使不被赶出来，你站不住，也是要出来的。我们在接收石家庄的工厂时就有教训。我们派去的干部不能在业务上给予帮助，又不作具体调查研究，只是大讲了三天反帝反国民党的大道理，讲完了又没有新的，人家就不愿意听，不赞成你。他们后来重新当学生，和工人一起学习、劳动，调查研究，开展对敌斗争，业务上成为内行，才成了工人的贴心人，谈话别人也爱听了。我们有许多同志，对新情况、新事物不作调查研究，自己又不懂得，就在那里办事，不懂货就不识货，这怎么能办好事情呢？对新部队也一样，你不了解情况，还是用老办法不行。派去的人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要估计到可能闹别扭。事实上，双方都在观察，看对方对自己怎么样。那边情况比较复杂，不但人是旧社会出来的，还有国民党特务隐藏在群众中，北平和平解放时又有12000军官回到绥远，他们没有起好的影响，在那里做了“政治工作”。这值得我们检讨，过去没有把这件事办好，是因为在一种敌对的情绪下，没有把他们当同志看。共产党这次派去的同志要表示态度，承认我们过去工作没有做好。我也在做工作给同志们看，使我们今后同他们合作得好。最近归绥方面的学习高潮，证明可以用合作的方法改造这些人，团结他们。在这方面，傅先生也要担负责任，采取友好态度。我们的同志去了，一定要采取友好态度，不能排挤他们；你排挤他们，他们不信任你就是有道理的。那12000人也要使他们感到与共产党合作有好处，新政策好，思想能进步，生活有保证并能改善。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我们的工作就算失败了。**要使绥远200万人民，10万军队、干部都感到合作有好结果，会比过去更好，这样他们才相信我们。**如果只停留在口头上，他们就会不满。总之，做好事，不做坏事，他们就会欢迎，这一条一天天地得到了证明。双方加重责任，双方做好工作，就能解决问题。**傅先生到归绥走一趟起了作用，你可以做给他们看，这样对人民有利，将来可以造就出很多好干部。**当然，共产党的责任更大。我们派去的人，他们见了会精神紧张起来，比如怀疑共产党是不是讲理，看不看得起人，是不是挤得人站不住，没处去，没饭吃，没法生活，没有工作岗位。你们要做好工作给人家看，使他们政治上进步，生活上有保证，发展有前途，这样才感觉我们好，才能佩服我们。切不能采用国民党特务的那套办法。

和平改造是可能实现的，现在有这个条件，应当有信心。我们有300万党员、400万军队、4亿人民作保证，还怕不成功吗？归绥方面也要有信心，看到前途。过去我们研究绥远问题，就认为有可能和平解决，对这一点是有信心的；但是用和平方法能不能都顺利解决，还存有疑问。现在事实已经证明能行。傅先生去归绥时，也有人怀疑，怕没有前途，只要有前途他们就愿意合作。你们要特别注意，人家就是怕没有前途。北平和平解决后，我们就手软了，认为对绥远不好再用兵打了，于是出现了绥远的和平解放。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和平合作问题。现在形势很好，全国快解放了，归绥方面也在学习马列主义。你们去了还有一个互相观察的时期，你们说话要兑现，不能骗人。**共产党去了，如果做的同说的不一样，就跟国民党一样了，先甜后辣，别人会说我们学了蒋介石“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傅先生也会失信于人。**所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要同人家越搞越好，使他们相信我们。特务也要给饭吃。新政协各方面的人都有，没有人说开得不好的，主要是工作小心谨慎，与人协商，与人为善。新政协给全国做了一个榜样。

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又有了政协全国委员会，我当主席有责任使各个方面都有利，使别的党派也有利，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绥远也一样要注意，归绥就有两个“党”，我们的与傅先生的。军政委员会就架在这个矛盾之上，要处理好。现在全国都在执行统一战线，华中、华南的政府也一样是统一战线的政府。农村和城市的情况不同，没有别的党派参加政府，但也有非党干部。没有非党干部参加政府就会出毛病。**共产党要永远与非党人士合作，这样就不容易做坏事和发生官僚主义。**苏联也是共产党与非党合作，《真理报》说，政府干部中党员占四分之三，其他是非党干部。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长期合作。双方要把干部都当成自己的干部看，打破关门主义。关门主义过去是有的，“三怕”的说法就是证明。没有统一战线，革命不能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搞统一战线哪能怕麻烦，怕捣乱，怕人家吃了你的饭？切不可叶公好龙。长征二万五千里不是因为有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这次政府的名单中，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别人在民主革命困难时期拥护共产党，为我们说过好话，帮过忙，我们胜利了不能不要人家。傅先生交出了北平，解决绥远问题就要有所不同。**这证明我们的政策正确，今后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国民党的1000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包括绥远的在内，特务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没有这一条不行，眼睛里只看到绥东解放区80万人民就会弄错事情。湖南有10万失业军政人员和广大的孤寡没有人管，如果只管共产党的孤寡就会出乱子，那就不是大禹治水，而是伯鲧治水了。因此要统筹全局，要使干部懂得一有前途，二顾全局。用和平方法改造过来，也会有不愉快的事，要经过曲折与激烈的斗争才能实现。抗战初期，蒋介石认为共产党是政治问题，想用“溶共”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是不怕火的真金，越溶越强大，最后把蒋家天下夺过来，为人民所有。**新政协讨论通过我们提出的《共同纲领》，是我们同资产阶级直接交锋的开始。资本家想要我们只搞农业，由他们搞工商业和交通运输，这怎么行？我们不但要学会搞政治斗争，还要学会搞经济工作，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绥远组织政府，也要用协商的办法，互相打通思想，这样做事快得多。不同意的先不要办，即使同意，也要看是心里愿意还是嘴上愿意，若勉强就缓办。军队也要协商。这是中国的特点。上面要得到傅先生同意，下面要得到干部们同意。特别是军队，不同意就办，最容易出乱子。**你们对党外同志要当成自己人看待，同他们长期合作**。这回工作若做好了，对双方的干部都是一大进步。这是过去我们从未做过的，要用新的方法去做，要用心。问题摆在面前，要我们去好好工作。

10月2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正式任命第4野战军第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萧华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为参谋长，常乾坤为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长，王弼为副政委。

10月26日，毛泽东给延安各界复了一封电报，他在电文中写道：

延安的同志们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

接到你们的贺函，使我十分愉快和感谢。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 1949年10月26日

10月27日，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叶飞、韦国清率领的第10兵团第28军和29军一部，在攻打金门岛的战斗中失利。

金门岛位于厦门岛以东、台湾岛以西，距大陆最近处约5.5海里。该岛处于台湾海峡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国民党军第12兵团司令长官胡琏的第18、19军，接替第22兵团李良荣司令长官的防务，驻守金门，加上第22兵团尚未撤走的一个军和部分海军，总兵力30000余人。

此时，3野第10兵团的司令员叶飞正忙于接管城市，对国民党守军的实力估计不足，便把攻占大小金门岛的任务交给了第28军的副军长萧锋和政治部主任李曼村等人。第28军在进攻前准备不足，没有很好地组织步炮协同，甚至连应变措施都没有。第一梯队28军82师244团、加强246团3营和84师251团，加上29军85师253团，共计9086人，登上200艘登陆船（大部份为渔船），在船工、民夫350人的协助下，于10月24日晚9时驶向大金门岛。在这支登陆部队中，连一个师级领导人都没有，各团之间互不统属。从25日凌晨开始，登陆部队与国民党守军连续激战3昼夜。由于海上刮着3、4级东北风，通讯不畅，各团均失去上级指挥，更重要的是后援不继，致使进攻大金门岛的指战员，在毙伤国民党军9000余人的同时，大部壮烈牺牲，3900余人被俘，只有几个人泅水回到了大陆。这在解放军战史上是一个少有的重大损失，全军震动。

金门失利后的第二天，28军副军长萧锋和政治部主任李曼村到厦门面见兵团司令员叶飞，他们面色苍白，失声痛哭。叶飞说：

“哭什么？哭解决不了问题，你们应该鼓励士气，准备再攻金门。这次攻金门失利，我身为兵团司令，由我负责，你们回去吧。”

萧锋、李曼村刚离开叶飞的办公室，叶飞就收到了第3野战军的批评电：“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最大者，其主要原因是因为轻敌和急躁所致。”并要求10兵团“将此次经验教训深加检讨”。

10月28日，毛泽东因为张家口地区发生鼠疫，已经死亡60余人，疫情严重地威胁到了京津地区，遂致电斯大林，请求他空运生菌疫苗400万份，血清10万份，到北京急用。并请求他派一支防疫队，来中国帮助防治鼠疫工作。

斯大林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刻派遣一批医生、防疫人员，携带大量药品赶赴中国。

10月29日，毛泽东关于“绥远起义部队的军政领导人员应同时委任”问题致电薄一波，他写道：

一波同志：

10月28日信悉。绥远两个军及一个骑兵师，可以编入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并颁发番号；所列两军及骑师的军事指挥人员亦可照准，惟须与政治委员及政治部主任同时委任，方能使政治工作在军中建立威信，此点请与傅宜生商酌。如果他认为此时发表政治委员及政治部主任有不便处，则军事人员可以事实上先行到职，而正式委任则待政治人员商定后一同行之。**在绥远军队中实行认真的政治工作制度是一件大而艰难的事，必须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并须由傅宜生亲自领导方能行得通，否则难免出乱子。**

毛泽东 10月29日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各野战军前委、各大军区的指示电，他写道：

各野战军前委、各大军区：

据第3野战军粟裕、袁仲贤、周骏鸣3同志10月28日致第10兵团叶、陈及福建省委电称，10月“27日8时电悉。你们以3个团登陆金门岛，与敌3个军激战两昼夜，后援不继，致全部壮烈牺牲，甚为痛惜。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当你们前次部署攻击厦门之同时，拟以一个师攻占金门，即为轻敌与急躁表现。当时，我们曾电你们，应先集中力量，攻占厦门，而后再转移兵力攻占金门，不可分散力量。但未引起你们深刻注意，致有此失。除希将此次经验教训深加检讨外，仍希鼓励士气，继续努力，充分准备，周密部署，须有绝对把握时，再行发起攻击。并请福建省委，用大力为该军解决船只及其他战勤问题。至失散人员，仍望设法继续收容”等语，特为转达，请即转告各兵团及各军负责同志，引起严重注意。**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稳步地有计划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

军委 10月29日

后来在11月1日，第10兵团党委扩大会议在厦门老虎山洞召开，总结金门失利的教训。萧锋发言说：

“金门战斗的失利，是领导判断失误，指挥也有失误，是骄傲轻敌的结果，是违背了毛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指示，也违背了粟裕首长指示的3个条件。这次失利是我对福建人民犯了个极大的错误，请求10兵团党委、3 野前委给我应得的处分。”

叶飞总结说：

“金门战斗的失利，主要责任在我，我是兵团司令员、兵团党委第一书记，不能推给萧锋，他有不同意见，我因轻敌听不进，临开船时，在电话上我还坚持只要上去两个营，萧锋掌握好第二梯队，战斗胜利是有希望的。是我造成的损失。请前委、党中央给严厉处分。”

会后，叶飞在给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3野并报中央的电报上说：

“我们检讨造成此次金门作战之惨痛损失原因，主要是我们急躁胜利冲昏头脑，盲目乐观轻敌所造成。直到已发现胡琏兵团已开始从汕头船运增援金门，仍要求应在援敌未全部到达时予以攻击，在船只不足的情况下，未断然下决心停止攻击，这是最严重的罪行。”

叶飞还在电报上请求处分。毛泽东批示：

“金门失利，不是处分的问题，而是要接受教训的问题。”

欲知后来毛泽东如何处理金门问题，趣事尚多，且待以后慢慢叙述。

东方翁曰：本传在第二卷及本卷叙述的毛泽东与许志行从初识到以后数十年间的交往，体现了一代伟人与一介平民之间的一段不平凡的动人情感。从驱张运动开始，毛泽东在自身艰难困苦之际，对素不相识的许志行竭力相助，倾心培养，直至大革命失败，最终把一个贫困潦倒的有志青年培养成为教育方面的有用之才。而且在新中国建立前后，他对这位小友依然是念念不忘。真可以说是贫贱交，毋相忘。笔者写到此处，叹为观止。

**第5章**

**“殷鉴不远。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要记取项羽的教训，切不**

**可骄傲自满，对敌人更不要心慈手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

**名学霸王’。现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蒋介石到了台湾，**

**还想要反攻大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将革命进行到底。”**

话说1949年10月3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对于他派遣医生、防疫人员，携带大量药品赶赴中国疫区的慷慨援助，表示“甚为感谢”。

10月30日，毛泽东批转了薄一波呈送的《关于华北各城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情形和经验的报告》。他在报告上批道：

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同志们：

现将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同志1949年10月29日给我的一个报告转发给你们。这个报告总结了华北各城市所开各界代表会议的主要经验，写得清楚明确，可为一切各界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会议所取法。因此，请你们认真研究一下，并且印发给全党干部研究（中央已印2000余份，发给中央直属各部、委、社、院校的同志们）；同时**请你们用电报发给你们所属各市委、省委、区党委，并转发到地委、县委及一切中小城市的党委，引起全党干部的注意。同时，希望你们注意总结你们自己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报告中央，是为至盼。**

毛泽东 1949年10月30日

10月30日（重阳节）晚，大概在7点左右，值班卫士通知王鹤滨去陪毛泽东进餐。王鹤滨来到毛泽东的住所，见毛泽东正在洗漱。餐桌的中央放着一个火锅，木炭已经把火锅里的水煮沸了，放在火锅周围的蔬菜中，最惹眼的是一碟子洁白如雪的长长的菊花瓣。王鹤滨感到很新奇，心想：

“菊花瓣也能吃吗？”

毛泽东从起居室走了出来，用手示意王鹤滨坐下。他见王鹤滨不住地用目光好奇地瞟着那碟菊花，就说：

“王医生，吃吃看，咱们不赏菊花了，来吃它吧。”

王鹤滨用筷子夹起一些菊花瓣，在翻滚的火锅里一蘸立刻就软了，吃在口中嫩而可口，清香中稍带一点甜中有苦的菊香药味。

“王医生，怎么样？还可以吧！咱们的老祖宗很早以前就知道吃菊花了。”

毛泽东说罢，也夹了一筷子向火锅伸去，煮了一下，放在嘴里慢慢地品味着，说：

“你知道屈原吧，他就是‘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那个时代吃菊花，大概寓意着高洁、清贫之举。我们也来个夕餐秋菊之落英。这菊花瓣是工人同志从栽培的菊花上特意采下来的，咱们也来个清贫之举！”

毛泽东说着，又夹起一些花瓣伸向火锅的沸汤中。

10月31日，毛泽东关于兵力部署的几点意见致电林彪等，他写道：

林彪同志，并告子恢，剑英，陈赓及刘邓：

关于兵力部署的几点意见：

1. 我们已占领广州及广东的大部，广州、香港、澳门之间的海上残敌尚未肃清，陈赓兵团即将入桂作战，内外敌人可能窥伺广州。白崇禧匪部如被程子华、陈赓切断逃往云南、安南的道路，有东窜入粤可能。因此**在广西问题彻底解决以前，邓华兵团（两个军）必须全力镇守广州（主力）、韶州（一部）之线，不要进攻雷州半岛，更不要攻海南岛。**华南分局决定邓华兵团迅速离开广州南进的计划是不妥当的。必须等候广西问题解决以后，从广西调出4野一个至两个军到广州、韶州线，邓华兵团方能南进。

二、**全国国防重点是以天津、上海、广州3点为中心的3个区域**。2野入云、贵、川、康后，3野只能防守华东，置重点于沪、杭、宁区域，以有力一部准备取台湾，没有余力兼顾华北。现在华北只有杨成武3个军及其他6个二等师位于京、津、山海关一线，一旦有事，颇感兵力不足。除令1野以杨得志兵团（3个军10万人）位于宝鸡、天水、平凉区域，有事可随时调动外，4野在广西问题解决后，拟以5个军位于两广，担任广州为中心之两广国防；以3个军位于河南，准备随时增援华北；其余各军，位于湘鄂赣3省并以主力位于铁道线上，可以向南北机动。在目前3个月至5个月内，4野除完成各省剿匪任务外，如能做到，甲、解决广西问题，乙、修通粤汉湘桂两路（这是极重要的），丙、利用铁路运输完成上述国防部署，就是完美无缺的。请你们十分注意粤汉湘桂两路的修复和守备。

三、陈赓、程子华须同时向柳州、南宁动作，方能完成围歼白匪任务。现敌鲁道源兵团似正准备由桂林以南转入柳州地区，估计是准备去云南的。而我陈赓部刚才解决粤敌，须休息若干天方能行动。程陈两部何时可以开始入桂作战，望告。

四、据有经验者称：**由百色入云南的道路上瘴气（恶性疟疾）为害，不利行军**。因此，陈赓部在解决广西问题后应准备循柳州、贵阳道路入滇，不一定走百色。

五、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毛泽东 10月31日

1949年11月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重申关于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指示电，他写道：

“关于新华社9月16日《六评白皮书》社论中所称对待旧人员的原则和办法，中央曾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指示，全国各地党的组织、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必须一律遵照执行，必须避免过去北京、上海、南京等处粗鲁的、不负责任的遣散大批旧人员（北京万余人，沪宁2万余人）的错误，不要重犯。”

11月初，周恩来和几位外交部副部长经过一个月的紧张筹备，报请毛泽东批准，外交部工作人员选调工作基本完成。

这些工作人员可谓人才济济，主要来自4个方面：一是原中央外事组主要人员。二是从全国各大军区、各大行政区调来的领导干部，其中有：第7兵团兼浙江省军区副政委姬鹏飞，第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耿飚，中央军委政治部第1室主任黄镇，山东军区副司令员谭希林，南京警备司令袁仲贤，淞沪警备司令部副政委韩念龙，南宁警备司令彭明治，第5兵团政治部主任王幼军，济南市市长姚仲明，军委机要通讯干部学校校长曹祥仁，中南军大副校长倪志亮，中共内蒙古分局宣传部长吉雅泰，东北局社会部副部长冯铉。中组部还从全国60多个军中各抽调了1名师级和2名团级干部，共计180多人，限期到北京报到。他们中有符浩、韩叙、余湛、朱启桢、李清泉、宋之光、康矛召、凌青等。三是从各文科大学选出来的毕业生。四是起义的旧中国外交人员，他们有着丰富的国际知识和外交经验，在外交部担任专家或顾问，其中有何思敬、周鲠生、钱端升、梅汝璈。一时间，各路人马纷纷到京，分别住在新华饭店、解放饭店、方家胡同5号等处。他们先到中组部报到，由中组部把他们介绍到外交部，外交部人事处又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审查，最后经周恩来报请毛泽东批准任用。

11月3日，新中国派出的第一位外交使节王稼祥向苏联领导人递交了国书。

11月3日下午1时，周恩来与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召集王炳南、董越千、柯柏年、乔冠华等人开会，研究外交部的机构设置问题。这是外交部组建后的第一次会议。

会议决定外交部下设苏东司、亚洲司、欧非司、美澳司、国际司、情报司及条约委员会、外交政策委员会。司下直接设科。外交部办公厅下设秘书处、交际处、机要处、人事处、总务处。

会议还决定11月8日正式召开外交部成立大会。

11月3日晚8时，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第7兵团21军61师师长胡炜开始指挥部队从桃花岛出发，攻击登步岛。

登步岛是舟山本岛东南的一座小岛，面积仅14平方公里，它南邻桃花岛，北望全国最大的渔港沈家门（现为舟山市普陀区），61师如果乘胜攻占登步岛，进攻矛头即可直指舟山本岛。由于战前缺乏有效侦察手段，对敌情判断失误，以为敌人只有4个营，所以61师首批登陆部队只有7个连队。登陆部队趁夜色顺利占领了流水岩、炮台山等制高点，但未能在天亮前按预定计划占领鸡冠礁码头。守军利用码头于4日凌晨6时30分增援了1个团。4日晚9时，61师除181团外，胡炜师长亲率11个步兵连和一个炮兵连登陆登步岛，兵力达到两个团。与此同时，守军的又一批援军也抵达登步岛，其守岛兵力达到了6个团，其224团、201团、200团、199团和一个警卫营先后在飞机轰炸、舰艇运输增援下进行反扑。5日傍晚，胡炜果断决定主动撤出登步岛战斗，并于午夜时分成功撤回桃花岛。

登步岛战斗共毙伤俘守军3394人；解放军死380人，伤953人，无一人被俘虏。

11月间，江青带着李讷从莫斯科回到了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她在苏联治疗休养了6个月，还在苏联带李讷去割了扁桃腺。

那天，江青一进家门，看到毛娇娇，就一把搂着娇娇，抱住她，在她的脸上亲吻了一下。娇娇小时候跟着江青生活过，因为那时候她太小，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这是她长大后第一次见到江青。江青满脸笑意，那股热情劲显得比多年未见的亲生母亲还要亲。江青又叫过来李讷，对她说：

“快叫姐姐！”

两个小姐妹免不了也亲热了一会儿。12岁的娇娇和9岁的妹妹李讷，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有时，小孩子之间也免不了发生一些小摩擦。每当姐俩产生纠纷时，毛泽东从不问她俩谁对谁错，谁是谁非，也从不会各打50大板，他总是说：

“当姐姐的要照顾小妹妹哟。”

“妹妹要听姐姐的话，要互相帮助哟。”

“你们要友好……”

“手心手背都是我手上的肉。你俩都是我的好孩子，你们要相亲相爱哟。”

毛泽东说着，还把大手在女儿们面前翻过来背过去。小姐妹俩在爸爸的开导下，自然就会和好如初了。

后来，江青经常在人前夸娇娇好，说娇娇懂事，说她爱娇娇，说娇娇和她好得跟亲生母女一样。江青还夸娇娇是个绘画天才，又夸娇娇四肢灵活，双腿又细又长，将来会在体育方面出成果。

有一天，毛泽东把娇娇叫到跟前，说：

“娇娃，你怎么不肯叫她妈妈？她很难过呢。”

娇娇低着头，不说话。毛泽东又说：

“她会对你好的。”

娇娇不抬头，还是不说话。

“你就叫她一声妈妈，这对你不会有损害嘛，怕么子哟！”

毛泽东有点急了。娇娇想起妈妈在她来北平的时候，一再嘱咐她，要听爸爸的话，不要惹爸爸生气，就顺从地点点头，算是同意了爸爸的规劝。

据李敏回忆说：有一天，毛泽东主持召开家庭生活会，江青和她的姐姐李云霞，还有娇娇、李讷以及警卫员、炊事员等都参加了。回到父亲身边时间不长的娇娇，感觉会议气氛非常严肃。毛泽东在那里算账，一天饭钱多少，菜钱多少，劳动人民一天吃多少。江青未说话，李云霞也没有说话。而娇娇、李讷听了父亲的话，都哭了。娇娇很不理解不满意父亲这样的说法，以至在多少年以后她还在抱怨说：“那场面谁不记得呀？我们这样的家庭，要与普通的劳动人民去比，我有什么话说呢？当时李讷虽然只有8岁，也哭了，我13岁，才到父亲身边，还不是主要说给我听的？”

那时候，娇娇有一个比她小一点的同学，也住在中南海，她们两家的情况类似，她的妈妈也是后妈。她和娇娇在苏联一块学习过，现在又在一个学校学习，又都是住校，关系很要好。有一次，她对娇娇说：

“我回家后感到很苦恼，后妈不喜欢我，嫌弃我。我想我妈妈，觉得生活过得挺不愉快。”

娇娇劝她说：

“你最好不要老回家，咱们都住在学校，多和同学们一起学习、生活，也很快乐。每两周或一周回一趟家就行了，我就是这样。”

谁知那个同学回家后又遇到了不高兴的事，就说：

“还是娇娇姐姐的话对。”

她后妈听了，以为是娇娇在挑拨她们母女的关系，就找到毛泽东说了这事。毛泽东说：

“这事让江青去处理吧。”

她转身去找江青，说明了来龙去脉，又说：

“主席说让你处理。”

江青让人找来娇娇，说：

“当阿姨的面，说说你跟她女儿说了些什么？不许说谎。”

娇娇说：

“我没说什么呀！”

“你好好想想，没说什么，阿姨怎么会找到我们家来呢？”

那个同学的妈妈当着娇娇的面又把那话说了一遍。江青问道：

“是这样说的吗？”

娇娇说：

“是。”

“你说这干嘛？”

“她说回家后挺苦恼，挺不高兴，我劝她多在学校跟同学补补课、玩玩，一周一次，两周一次回去，这样大家都高兴。我就是这样。我们家挺好。”

那女人一听，娇娇的话跟她女儿说的一样，没有挑拨的意思，就说：

“还是娇娇大点，懂事……”

江青也感觉娇娇的话有道理，就说：

“以后说话注意点，跟阿姨道个歉。”

娇娇心里想，我没错，为什么要道歉呢？就说：

“阿姨再见。”

转身走开了。后来，娇娇小学毕业后，要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了，毛泽东决定给女儿起一个正式的学名。有一天，毛泽东把娇娇叫到跟前，很认真地说：

“我的娇娃要上中学了，成个大孩子了。成个大孩子就得有个大名。爸爸再给娇娃起个名字。”

娇娇不解地问：

“爸爸，我有名字呀！我不是叫毛娇娇吗？”

毛泽东微笑着说：

“娇娇是你在陕北保安刚生下来时取的小名，现在长大了，该给你起个正式的学名，而且这个大名要有深刻的意义。”

娇娇听了父亲的话，高兴地伏在椅子上，看父亲究竟怎样为自己取名。毛泽东从书架上取下来一本《论语》，翻到《里仁》篇指着一句话念道：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他向娇娇解释说：

“讷，就是语言迟钝的意思；敏，则解释很多。”

他又打开《辞源》，指着‘敏’字说：

“敏字有好几种解释，如敏捷、聪敏。《论语·公冶长》中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敏捷而通情达理。敏，还可解作灵敏、迅速。敏捷多智等；杜甫写思念李白的《不见》诗中说：‘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我想好啰，我的娇娃名字就一个单字敏。但不一定叫毛敏，可以叫李敏。”

“为什么呀？爸爸，我干嘛要姓李呀？大哥叫毛岸英，二哥叫毛岸青，他们都跟爸爸姓毛，我为什么不姓毛？”

娇娇睁大眼睛，十分不解。毛泽东用手拍拍女儿的头，说：

“娇娇，爸爸姓毛，这是不错的。但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爸爸曾经用过毛润之、子任、李德胜等十多个名字，爸爸特别喜欢李德胜这个名字。”

“爸爸，你给我讲讲李德胜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给娇娇讲起了他在转战陕北时的化名的由来，说他最喜欢的还是这个时期的“离得胜”的谐音——李德胜。正因为如此，他把这个姓给了两个女儿，又从“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中各取一个字，给女儿命名，小女儿叫李讷，大女儿就叫了李敏。

后来，毛泽东让保健医生王鹤滨带李敏、李讷到师大女附中报名，领到了两张学生注册登记表，需要填写家长的姓名。王鹤滨不敢做主，带着登记表回到中南海找毛泽东，他说：

“主席，这学生注册登记表上，有一栏要填写家长的姓名，如何填写？”

毛泽东推开登记表，看都不看，就说：

“你带去的学生，就填你的名字嘛！”

王鹤滨只好在家长一栏里填上了自己的名字。

毛泽东虽然开口必称“娇娃”，但对李敏的要求还是很严的。李敏除了要学中国话，认中国字，毛泽东还要求她必须天天抽空练习毛笔字。为此，他为李敏写出了由浅入深、由易变难的仿帖，让李敏一笔一划扎扎实实地练习基本功。第一个仿帖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0个数字；第二个仿帖是：“毛娇娇学写字”。可惜李敏没兴趣，她不但没有练好字，就连爸爸写给她的仿帖也没看住，不知道叫谁给拿走了，连毛笔和砚台也不翼而飞了。文房四宝丢了两宝，剩下的两宝纸和墨也没什么用处了，李敏干脆就送了人，从此与文房四宝绝交。

毛泽东除了关心李敏在学校的学习，还要求她在休闲的节假日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而且，还不许她读俄文版的，这几乎是一道不可更改的命令。对于李敏来说，难度真是太大了。有一次，毛泽东问她：

“娇娃，我给你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读了多少？读懂了多少？”

李敏知道，这是爸爸在检查自己的学习，就如实地说出了她读《三国演义》的感受，她说：

“这本书我越读越糊涂，越糊涂越乱。三家谁和谁打？怎么打？在什么地方打？我都搞不明白了。我的脑子乱成了一锅粥。再看下去，就要把我加上，成了四国开战，就更乱了。我实在是读不下去了。爸爸，请您网开一面，放我一马吧！”

谁承想，毛泽东听了，并没有下赦免令，他说：

“糊涂了，就先把这部著作放下，再看另一部吧。”

李敏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又读完了那本难啃的《红楼梦》。

毛泽东为了提高李敏中国古典文学水平，还专门请了一位老师，给她讲解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有关古典名篇名著。凡是初中生、高中生应该掌握的古典知识，他都要李敏学习掌握。

11月8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

我国人民“政府成立第2天即获得苏联的无条件承认，并很快即获得各新民主国家的同样的承认，这件事给了我们以有利的地位，使许多经常摇摆的人们稳定下来，觉得人民政府势力大了，不怕帝国主义了。又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抛入被动地位。”

毛泽东在这份电报里还表示了希望在12月份赴莫斯科拜访斯大林的愿望。

11月9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说：

“我们已请科瓦廖夫（苏联驻中国经济专家组组长——笔者注）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12月初动身去莫斯科。至于恩来同志是否应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请斯大林酌定。”

接着，毛泽东关于“邓华兵团可以分出一个师协同梁广纵队肃清南路敌军”问题致电林彪等，他在电文中写道：

林彪同志，华南分局，并告陈赓：

据广东南路区党委6日电称，湛江只有敌4000余人，我有一个主力师配合南路纵队即可歼灭湛江之敌，全面解放雷州半岛，可以加强南路支援解放广西及琼崖的基地等语。**我曾告诉你们，在广西问题解决以前，邓兵团主力的任务在于保卫广州区域及广韶线而不要去南路，这是正确的，你们亦已同意这样做。但如果去一个师，即可解决南路问题，则是可以的和必须的。**由邓兵团（不是由4兵团）分出一个师（可以是一个最强的师）去南路，协同梁广纵队肃清南路之敌，有很多好处。如果你们亦同意，即可作此部署。

毛泽东 11月9日

11月9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由朱德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随后，全国地方县级以上、军队团级以上各级党委均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

11月11日，毛泽东为军委总政治部起草给聂荣臻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聂薄张张：

戌江电悉。**同意所提调任改编董其武部两个军7个师之师以上政治干部配备全部名单。所有这些政治工作干部必须调集一起有计划地给以去绥远军队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的训练，并完全研究明白，然后派去，否则不要派去，务望注意为要。**

军委总政 戌真

11月11日这一天，中央军委宣布，以刘亚楼为司令员的空军领导机构在北京成立。至此，空军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

11月12日，斯大林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毛泽东在自己的住处，对周恩来说：

“恩来同志，我看现在我到苏联去一趟比较合适了。”

周恩来说：

“今年是斯大林同志70寿辰。他60寿辰时，主席在延安不是还写了祝贺他生日的文章吗？”

“是呀，一晃10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啊！”

“12月21日，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人，都要到莫斯科去为斯大林祝寿，主席选择这个时候去苏联很合适。”

“我可是只管去祝寿喔，有关双方商谈、协定、签约之类的事情，还得靠你这个政务院总理哟。”

“主席可以先在苏联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恢复恢复，有关中苏双方商谈的具体工作，我到苏联后，按主席的意见和政治局的决定去办。”

“好哇。”

毛泽东点点头，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抬头凝视着中南海天空中的一弯新月。

12日晚，毛泽东复电给斯大林，他写道：

斯大林同志：

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12月初旬动身。同时请你允许科瓦廖夫同志与我一同去。

毛泽东

毛泽东访苏在即，为祝贺斯大林70大寿，接受江青的提议，决定准备一批山东土特产——大葱、萝卜、白菜等，作为送给斯大林的生日礼品；并决定筹备山东土特产这件事，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出面办理。

第二天，山东有关方面派人将礼品的样品大葱、白菜等，送到了菊香书屋的大院里，说是请毛泽东过目。王鹤滨等人一看，感到很吃惊，没想到山东的大葱一棵竟有2斤多重，一颗白菜也重达20多斤。毛泽东看到这些蔬菜的样品，自然是非常满意。王鹤滨是留苏归来的人，他在苏联期间，看到一些妇女或儿童手持筷子粗细的葱，加上小手指粗细的胡萝卜，在车站的铁路旁叫卖。他在列宁格勒见到苏联公民到医院探视病人，有的拿上两三棵筷子粗细的大葱，像中国人送水果一样送给病人吃。由此可见，苏联这一类蔬菜是非常奇缺的。王鹤滨说，为毛泽东献策的谋士，一定是一位苏联通。

11月间，宋庆龄因事要回上海，毛泽东委派江青代表他为宋庆龄送行。宋庆龄对江青的印象不错，她和别人谈起江青，说：

“有礼貌，讨人喜欢。”

11月1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发出《关于大量吸收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指示》，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西北局：

一、**据青海省委迭次反映，马匪余党，在许多地方煽动群众，组织反抗**。此次兰州会议上请予以严重注视。除大力剿匪，省委地委县委集中注意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外，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目前时期应一律组织联合政府，即统一战线政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此外，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各省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存在地方的地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或干部训练学校。请你们注意这一点，**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

二、西北局诸同志是否已到兰州，你们的会议何日开始。此次会议议程甚多，恐须开会一星期左右。**今后西北政治中心定于何处，西安还是兰州，亦须有所决定。**望以主要议程见告。

三、请令王震台和我们通报。

　 毛泽东 11月14日

接着，毛泽东关于“须重视对定海作战的各项问题”致电粟裕等，他写道：

粟裕同志并告陈饶：

舟山群岛共有敌军5万人，并有颇强的战斗力，你们以两个半军进行攻击是否足够？**鉴于金门岛及最近定海附近某岛作战**（即11月3日的登步岛战斗——笔者注）**的失利，你们须严重注视对定海作战的兵力，部署，准备情况及攻击时机等项问题**。**如果准备未周，宁可推迟时间**。提议你们派一要员直赴定海附近巡视检查一次。如何盼复。

毛泽东 11月14日

11月14日，毛泽东给堂侄毛远翔写了一封回信。

毛远翔，字玄夫，他是毛智珠的第三个儿子，1924年出生，1942年加入共产党，曾任中共湘潭县银田区委书记、湘乡县凤音乡武工队政委。韶山解放后，他代表毛泽东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慰问人民解放军。此时他正在中国人民革命大学湖南分校学习。毛泽东在给他的回信中写道：

远翔贤侄：

10月15日来信收到，很高兴。

毛泽东 11月14日

11月15日晚，毛泽东给在辛亥革命新军中共过事的辎重营文书毛煦生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前后3函奉悉，迟复为歉。先生仍以在乡间做事为适宜，不要来京。家计困难，在将来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可能获得解决。”

毛泽东还关切地询问他们辎重营营长毛子奇“尚在人间否？”

接着，他又给在西安市部队上做财会工作的堂弟毛泽青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运才弟：

来信收到，甚慰。望努力工作。

毛泽东

入冬后的一天下午，毛远志来到双清别墅看望伯伯，毛泽东见她冻得瑟瑟发抖的样子，心疼地说：

“看你好冷啊，怎么不多穿点衣服？”

毛远志说：

“只发了一套棉衣。听说还要发一件棉背心，还没有发下来。”

毛泽东让江青拿来他的一件旧棉衣和一顶旧军毡帽给了她，还问她：

“你丈夫哪里去了？”

毛远志说：

“他已经南下了，在江西军区工作。我也要去江西了。”

“去江西？那好。”毛泽东高兴地说：“要去看看老区的人民，不要忘记他们啊！”

11月18日晚，毛泽东在菊香书屋接见了向三立。

这天下午5时许，向三立刚下班，毛岸英就来了，二人一起乘车去中南海。来到菊香书屋时，正是夕阳西下，毛泽东外出散步去了，院子里只剩下几位工作人员。毛岸英叫向三立稍事休息，自己则去倒茶。不一会儿，江青回来了，她身后拥着李敏、李讷，还有刘思齐。毛岸英向江青介绍了向三立，并让李敏、李讷喊“表舅”。

毛泽东散步回来了，走进菊香书屋，来到客厅。毛岸英迎上前去，指了指已经站起来的向三立，对父亲说：

“爸爸，三立表舅来了。”

“主席!”

向三立激动得喊了一声。

“向先生。”毛泽东朝他点点头，热情地向他伸出手去，说道：“你是开慧的表弟。来北京多久了？”

“报告主席，我来北京已经两个多月了。”

“现在哪里工作？”

“在中央财经委员会。”

“哦，对了！你会打算盘。”毛泽东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笑着说：“听岸英和田家英秘书讲过，你擅长财会工作，便推荐你到了中央财经委员会。”

“谢谢主席的关怀！我一定好好工作，为人民服务。”

“你初到北京，工作和生活习惯吗？”

毛泽东关切地问。向三立说：

“工作愉快，生活也习惯。只是餐餐吃馒头有些不习惯，不过我想以后慢慢会习惯的。”

这时，有人进来向毛泽东报告说：

“东北有一位领导同志来看主席。”

毛泽东去了一会儿，又回来同向三立拉家常。江青走了进来，毛泽东向她介绍说：

“这位是向三立同志，是杨开慧的表弟，是湖南来的。”

又对向三立介绍说：

“她是江青。”

江青说：

“刚才我们已经见过面了。”

向三立连忙喊了一声：

“江青同志。”

江青笑着同他握了手。外面来人报告说：

“主席，开餐了。”

毛泽东说：

“吃饭去吧，等会我们再谈。”

众人来到餐厅，毛岸英、刘思齐夫妇正和弟弟毛岸青、妹妹李敏、李讷在说笑。李讷见父亲来了，就说：

“我们家院子里放了许多瓜。你们看，爸爸像个瓜吗？”

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向三立暗暗吃惊，想不到孩子们在毛泽东面前竟敢如此放肆。毛泽东依旧是满面春风，和蔼地说：

“瓜有许多种，有南瓜，冬瓜，葫芦瓜。”

李讷俏皮地说：

“爸爸的肚皮像南瓜。”

大家又笑了起来。向三立被他们父女之间和睦、融洽、欢乐的气氛感染了。晚餐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无拘无束地进行着。毛泽东对向三立说：

“今天是星期六，有客人来，特意让厨师加了两道菜。辣味菜你习惯吃吗？”

向三立也是湖南人，自然是习惯吃辣椒。

“吃吧。”毛泽东又说。他边招呼边吃菜，夹了一块红烧肉和几片鲜蘑菇，还嘱咐向三立说：“多吃菜，随便吃吧。”

他又嘱咐毛岸英说：

“你照顾三立表舅一下。”

毛岸英要给向三立敬酒，向三立忙说：

“我不太爱喝酒，请上饭吧。”

毛岸英就让服务人员给向三立端上了米饭。毛泽东已经喝了几口葡萄酒，见向三立如此，就向他敬酒。向三立连忙起身说：

“主席，我已用饭。我们湖南老家的习惯是用饭不再喝酒。”

毛泽东说：

“老习惯也可以打破呀！吃饭可以喝酒，边吃饭边喝酒也行。”

向三立只得喝了一口酒。众人吃完饭回到客厅，李讷端来两盘又红又鲜的苹果，拿起一个让向三立吃。毛泽东见了，就说：

“给客人吃水果要拣大一些的。”

李讷按照父亲的意思，又选了两个又大又红的苹果送给向三立，说：

“表舅吃这个。”

毛泽东难得从百忙中抽出时间和家人共度周末，兴致依然很高，他接过刘思齐为他沏好的一杯茶，喝了一口，就讲起故事来：

“古时候有两个秀才，一个姓刘，一个姓李，两人都爱作对联，一见面就想对对子。有一次，两人又见面了，商定对对子，谁对不出就要受罚。**李秀才先出上联：‘骑青牛，过函谷，老子姓李；’刘秀才一看李秀才用了老子李耳的典故，心想：‘他要占我的便宜，没门！我也非损他一下不可。’于是，他略加思索对了下联：‘斩白蛇，兴汉室，高祖是刘。’**刘秀才以汉高祖刘邦自比，来对‘老子’，高过李秀才一筹。李秀才不得不服，就说：‘高明，高明！你赢了，我服输。’”

刘思齐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称赞道：

“爸爸，那个刘秀才真有学问。”

毛泽东说：

“思齐呀，那个刘秀才是你的祖先，他崇拜汉高祖刘邦。那个李秀才可算是我的本家，因为我在延安时曾化名李德胜。但我不信老子的观点学说，他提倡出世思想，清静无为。你说得对，**人家多有学问，对历史掌故如此熟悉，能运用到实际生活中来，并且一用就活，一下把人吓到了。这就是知识的力量。知识一旦灵活运用，就可以变成武器，用来保卫自己。所以，你们要努力学习，积累丰富的知识，尤其是要学习历史和古典文学。**

刘邦出身贫苦，没有多少兵力，没有万贯家财，却能称霸一方，统一天下，并且使汉朝长治久安。其原因主要是他善于用人，他手下两个重要的谋士，一个是张良，一个是韩信，这两个人都能够为他所用。刘邦的对手楚霸王项羽却是个孤家寡人。当初，他的势力比刘邦大多了，拥有庞大的军队，统治着中国大块富庶之地，兵强马壮，不可一世。但他有勇无谋，刚愎自用，不听谋士的进言，鸿门宴放走了刘邦。当然，项羽心肠好。鸿门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项羽却不肯杀刘邦，刘邦说了几句好话，他就心软了。范增向他进言，他却不杀刘邦，而把刘邦放了，等于放虎归山。项羽没有理睬他的话，结果被范增言中。刘邦逃走后，势力不断扩大，与项羽争雄，结果打败了项羽。项羽被围在垓下，只得别姬自刎。项羽也不善用人和招贤纳士。韩信去拜访项羽，项羽却看不起韩信，结果韩信却被刘邦所用，为建立汉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殷鉴不远。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要记取项羽的教训，切不可骄傲自满，对敌人更不要心慈手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现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蒋介石到了台湾，还想要反攻大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将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停了停，又说：

**“刘邦的治国之道，任人唯贤，广纳贤才，治理好国家，实现长治久安，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孩子们见父亲讲完了，一窝蜂地走了，只剩下毛泽东和江青、毛岸英、向三立。毛泽东喝了一杯茶，问起向三立的大哥向钧被捕和牺牲的经过。

向钧是杨开慧的五舅向理卿的长子、六舅向明卿的侄子，自幼读新学，1921年8月考入长沙岳云中学，通过表姐杨开慧介绍，认识了毛泽东，读了毛泽东许多文章，深受影响，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担任学校学生会代表；1923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岳云中学、兑泽中学两校的党支部书记。1926年9月，他任中共衡山地方执委会书记。毛泽东在衡山考察时，对衡山的农民运动给予很高评价。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向钧组织衡山各界群众举行反对蒋介石的大会。随后，他作为湖南代表参加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极力赞成和拥护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等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的批评；7月受省委派遣，前往湘潭恢复党的组织；8月底随毛泽东、彭公达、毛福轩到株洲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部署秋收起义。毛泽东去安源，他留在株洲，负责领导株洲暴动；1927年秋、冬，在改组湖南省委的两次会议上，先后当选为省委农民部部长和组织局负责人，并任湘鄂赣军委委员。1927年冬的一天，向钧到长沙参加党的秘密会议。由于叛徒告密，他和6名与会同志一起被捕；1928年1月24日，被杀害于长沙教育会坪，年仅22岁。临刑前，向钧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毛泽东对向钧的英勇牺牲，深表惋惜。良久，他又问道：

“明卿先生还好吗？”

向三立答道：

“身体还健康。”

“他如今还住在平江乡下吗？”

“是的，他还住在老家。”

毛泽东回忆起往事，深情地说：

“我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时，明卿先生从事地下交通工作，常给我通风报信。有一次是他及时报信，才使我脱离险境。后来，我住在长沙清水塘，他常去看我，与我谈当时的局势，高谈阔论，给我以信心。”

向三立认真地听着，想不到叔父还有这么一段不平凡的经历。毛泽东停了一下，又说：

“你叔父向明卿先生是个忠厚老实人，是个好人。过一段时间，我还想请他到北京来作客哩。”

毛泽东渐渐地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他说：

“我小时候在家里，母亲对我非常好，她心地善良，为人厚道，同情穷人，常常和我背着父亲接济那些困难的亲戚和穷苦人。我离开家后，母亲得一种病，叫淋巴腺炎，脖子上长着瘤子，全身奇痒。这病现在并不难治，可惜那时候医学不发达，没有药物治疗，母亲就那样过早地去世了。”

毛泽东说到这儿，似乎有些哽咽了，他继续说：

“我母亲要是还活在世上，那该多好啊！她死的时候，才53岁，要是到现在，也才80多岁。”

向三立说：

“主席，您不必难过。您没有辜负您母亲的希望。您母亲若是九泉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到他的父亲，他说：

“我父亲勤劳俭朴，精打细算，善于持家。但他为人固执，严厉，吝惜钱财。他每天起早贪黑，自己推脚车，贩运粮食，为家里积攒了一些钱财。他会做生意，那时候常贩卖谷米，运到湘潭、长沙去销售，运货回来，销售给乡亲们。赚的钱，用来买田，放高利贷。只几年我们家就发了，用几百银洋发展到十几亩田，几十亩田，成了当地的一个富户。父亲对我们很严厉，总是叫我们劳动，不准我们躲懒，并说他辛辛苦苦劳动都是为了发家致富，都是为了替我们兄弟造福。可我们都没有继承他的财产。父亲真是用心良苦啊？”

毛泽东说到这儿，关切地问向三立：

“你知道韶山那边的情况吗？我家那座房子还在不在？是不是破了？”

向三立说：

“听韶山的人说，那房子还在。过去国民党没收了，现在人民政府又收回来了，并且做了一些修理。”

毛泽东点点头，说：

“我家里过去很穷，祖父是贫农。到我父亲手里，积攒了一些钱财，买了一些田，家里逐渐富了。我父亲可算是一个富裕中农。”

向三立说：

“主席家总不能划富农吧！”

“不好。我们应当实事求是，按政策办事，该划什么成份就划什么成份。”

毛泽东郑重地说着，又陷入了深思。向三立问：

“主席是不是想家了？想回去看一看？”

“是的！”毛泽东深情地说：“我很想回去看看，只是现在没有时间。新中国刚成立，百业待兴，有很多事情要做。下一步怎么走，还有待研究和探讨。总之，要把国家治理好，暂时没有时间去考虑别的。”

毛泽东又谈到了他是如何走出韶山冲，怎样到长沙读书，受过哪些老师的影响。他说：

“杨怀中先生其实是个伦理学家。他留学多年，在日本、德国读了不少书，治学严谨，在逻辑学、伦理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对王阳明的理学也有很深的研究，他是一位很好的老师。”

向三立说：

“杨姑爷在世时酷爱读书、藏书，去世后没留什么家产，却留下了不少藏书。原来，1937年抗战之前，杨姑爷还留有不少书，放在板仓那座阁楼上。我过去到板仓去，常见到那些书，都是很有价值的书。”

毛泽东忙问：

“那些书还在吗？”

向三立说：

“解放后我就不知道了。”

毛泽东说：

“那些书如果散失了，多可惜呀！”

少顷，他突然问：

“开慧是怎样牺牲的？她牺牲时，你在哪儿？”

向三立说：

“霞姐牺牲时，我才13岁，在板仓附属实业高小上小学。霞姐带岸英兄弟到我家住了一年多，住到1930年。其间，何键又多次派人追捕，均摆脱了。她后来回板仓去了，不久就被何键逮捕了。这一年10月，被害于长沙浏阳门外的识字岭。”

毛泽东听了，不禁黯然神伤。他点燃了一支烟，沉痛地对向三立说：

“开慧要是在你家，就不会出事的啊！”

向三立也说：

“是啊，如果当时霞姐不回板仓，继续在石洞住下去的话，多少受一些保护，不至于那么容易遭到何键的包围、逮捕，乃至杀害。可她不想连累向家，更不想亲戚为她而担惊受怕，毅然带着孩子回了板仓。”

毛泽东又谈到杨展，说：

“你在《新湖南》报上写的那篇文章，我和江青都看了，写得不错。看了你的文章，我对杨展有更多的了解。”

毛泽东所说的文章，是向三立在1949年9月2日发表的《悼念杨展》一文。向三立说：

“杨展到延安后常和我通信，谈延安的情况，谈对革命形势的看法，使我很受鼓舞。1941年后，我就没听到她的音讯了，我猜想她可能牺牲了。”

“杨展到延安后，我们不常在一起。后来，她去了华北抗日前线。再后来，听说她牺牲了。”毛泽东深情地说：“展儿是在华北抗战中牺牲的。她是一个好孩子，爱学习，向往革命对革命事业充满热情。为了中国革命，我们党牺牲了许多同志，何止杨展一人呢？”

他见向三立流出了悲伤的眼泪，又安慰道：

“杨展是为革命牺牲的，你们不要难过。只有好好地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才对得起牺牲的同志，也才是对展儿的最好纪念。”

向三立想起自己曾在穷途末路时去广州粤中盐务局谋职，感到内疚。他说：

“比起杨展来，我的思想落后多了，我曾为生活所迫去了广东，为旧政府做过事。这是不应该的。”

毛泽东说：

“这也难怪你呀，那是因为生活所迫，何况你在那里还学会了本事。要不，你到北京来，怎么能从事会计工作？你不是先学农业后搞财会吗？如今你参加了工作，建设新中国，需要大批人才，你的那些本事不是都可以用上吗？”

向三立闻言，倍受鼓舞。毛岸英见父亲谈到了建设问题，就插话说：

“有一位中学老师，提出您的著作中的一些说法不一致，比如《农村调查》、《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中，一些观点不统一。”

毛泽东说：

“**一个人的思想是变化的，而且也有时代的局限性。我的那些文章不是一个时期写的。某些观点难免不一致。现在看来还要做些修改才行。”**

欲知毛泽东后来与亲友们的密切交往，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章着重记述了毛泽东与亲属、故旧的故事，显示出这位伟大的政治家的浓浓的人情味，值得一读。在儿女面前，毛泽东既是严父，又是慈母，且善于寓教于乐。为人父母者当如是也！

**第6章**

**“对我们党做了好事的朋友，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

话说1949年11月21日，毛泽东牵挂着任弼时的病情，亲自给斯大林去电，请求安排任弼时到莫斯科治疗，斯大林复电表示同意。不久，任弼时便去了莫斯科。

11月21日下午，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选举聂荣臻为北京市市长。接着，会议通过了《关于统一征收营利事业所得税和营业税提案》、《关于开办业余补习学校的决定》、《关于救济失业员工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

据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本市妓女情况和处置方针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中统计，北京有各种妓女2000余人，其中挂牌营业的明娼即妓院，共有230户，妓女1421人；暗娼有170家，有妓女近400人；经常跑旅馆、公园、市场、马路拉客的游妓，已查明者100余人；暗门子则数目不详。明妓主要集中在著名的八大胡同：即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

是日晚6点，北京市公安、民政、妇联、卫生等部门出动2400名干部，执行封闭妓院的决定。行动由公安部长兼任北京市公安局长罗瑞卿亲自指挥。一部分干部首先把各个妓院的老板和领家（老鸨）集中到派出所开会，解放军士兵和公安人员于晚8点持枪分乘卡车，到了八大胡同口，堵住所有妓院的门口，并登上房顶，控制最高点。到天亮前，北京244个妓院全部封闭，收容在册妓女1268名。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说：从此，在人民的首都，妓院绝迹，妓女解放。

毛泽东看了报纸，高兴地对聂荣臻说：

“你们这个决议很好，是办了件大好事。”

此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将妓女收容到8个教养院，“集中妓女加以训练，改造其思想，医治其性病，有家可归者送其回家，有结婚对象者助其结婚，无家可归者，无偶可配者，组织学艺，从事生产”。

北京在一天之内一锅端，并且一次性集中收容改造妓女的形式，被称为“北京模式”。后来，青岛、秦皇岛、洛阳、长沙等地都是按照“北京模式”进行了禁娼。

在11月21日这一天，还发生了一件事不得不交代一下，就是贺怡在江西老苏区寻找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儿子毛毛时，不幸出了车祸。

此前，贺怡为了让姐姐贺子珍和毛泽东破镜重圆，曾千方百计打听毛毛的下落。有一天，她找到毛泽东说：

“在江西丢掉的毛岸红现在已经找到了。”

毛泽东听了贺怡介绍的情况，感觉与他记忆中的时间、地点、岁数和相貌均不相符。可贺怡不甘心就此罢手，决定亲自去查找毛毛的下落。

那一天，贺怡带着刚刚找到的亲生儿子贺麓成，乘着吉普车连夜赶路，在经过泰和县桥头的丰塘村时，车子突然坠入3米多深的水沟，司机（后人猜测他是国民党特务）很快便逃跑了。贺怡与同行的古柏之子古一民当场死亡，古柏夫人曾碧漪与贺麓成及警卫员3人负伤，被村民救起。毛毛没有找到，年仅38岁的贺怡为了姊妹情谊，白白地搭上了一条性命。

贺麓成本名毛岸成，1956年夏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后来，贺麓成在钱学森麾下，成为一名新中国培养的优秀的导弹专家和航天专家。贺怡与毛泽覃还有一个女儿，叫贺海峰。

11月22日，张治中乘飞机由北京飞往兰州，准备就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一职。

此前，张治中鉴于新疆和平解放后军政事务百端待理，便写成了数千言的书面意见呈送给毛泽东，介绍了新疆的一般情况，就今后的长治久安提出许多重要意见。毛泽东非常重视，立即推荐张治中到西北兼任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11月中，他曾找张治中谈话，幽默地征求张治中的意见说：

“文白先生，我们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吧？”

张治中得知毛泽东是希望他到西北去和彭德怀合作，就说：

“现在你是领导，谈不上什么国共合作。不过西北人民和部队袍泽常常怀念我，我也常常怀念他们，你如认为我有去西北一趟的必要，我愿意做彭老总的顾问。”

毛泽东笑着说：

“你去当彭德怀的副手，委屈了吧？你过去是西北4省的军政长官，现在是副手，委屈了吧？”

张治中连忙说：

“哪里哪里，我诚意接受，听命令，听吩咐。”

毛泽东高兴地说：

“那就好，那就好！今后你可以来往于西安与北京之间。”

11月22日晨，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彭德怀，他写道：

德怀同志：

张治中于今（廿二）日上午9时由北京起飞，下午4时左右即可到兰州，请注意迎接。

军委 11月22日上午6时

后来，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正式宣告成立，由彭德怀任主任委员，张治中任副主任委员。张治中虽然兼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但他主要是在北京中央人民政府任职，这就需要在北京解决一处常住寓所。毛泽东、周恩来交代主管部门妥善解决。张家最后选中了北总布胡同14号院。这里原来是北洋军阀孙连仲的官邸，宫殿式的房舍，高大宽敞，富丽堂皇，仅餐厅就能摆几十桌。毛泽东对张治中的生活起居无微不至的关心。有一次，张治中病倒了，毛泽东马上叫江青带了他的亲笔信，到张家去慰问张治中。

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人，对西藏问题作出重要指示。

此时的西藏地方政府还被玩弄“西藏独立”阴谋的上层反动分子控制着。西藏官员会议在1949年11月1 9日决定：派僧俗官员分头去英美等国争取支持和援助。他们还在广播电台上用英、汉、藏语对外广播，谬称“西藏从来就是独立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西藏是侵略行为；并向联合国写信，控告中国的“罪行”。甚至，以“外交局”名义给毛泽东写信，要求“不要让军队进入西藏”。同时，他们扩充军队，购买武器，囤积粮草，调整军队部署，企图以武力来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对此，中央人民政府根据毛泽东的决策，一面命令人民解放军积极准备进军西藏，一面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北京谈判。

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等的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并告贺龙、习仲勋、刘伯承、邓小平：

1. 复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电略加修改，即可发表。

二、经营西藏问题请你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目前除争取班禅及其集团给以政治改造（适当的）及生活照顾外，训练藏族干部极为重要。**西藏问题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来看，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负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是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打西藏大概需要3个军**，如何分配和何人指挥现在还难决定。但**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它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做出计划**。你意见如何？盼告。

毛泽东 11月23日

上述电文中所说**复班禅电**，一共有两封：一是毛泽东与朱德联名的复电，二是经毛泽东审阅并“略加修改”的彭德怀的复电。

毛泽东在他和朱德致班禅的复电中写道：

“接读10月1日来电，甚为欣慰。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彭德怀致班禅的复电是这样写的：

“来电敬悉。查西藏乃中国之领土，在国民党卖国政策下，遭受帝国主义之蹂躏，致全藏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今我人民解放军在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领导下，即将解放全国，摧毁国民党残余，驱逐英美帝国主义者一切侵略势力，求中国领土之全部独立与解放，登全民于衽席，西藏解放，已可预期。尚望先生号召藏族人民，加紧准备，为解放自己而奋斗。”

上文最后“尚望先生号召藏族人民，加紧准备，为解放自己而奋斗”一句，是毛泽东添加上去的。

毛泽东将这两封电报一并发给彭德怀，由彭德怀转发给班禅。

11月24日下午，毛泽东致电林彪并告陈赓，为解决他们二人在关于围歼白崇禧主力的战役部署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做出了裁决。

原来在大西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于11月22日解放了广西省会桂林。坐镇南宁的白崇禧仍决心与人民解放军进行最后一搏，让他的主力部队张淦的3兵团秘密地向博白、陆川一线集结，准备夺取雷州半岛，尔后逃向海南岛；命令鲁道源兵团向东佯动，以掩护张淦兵团的行动。第2野战军第4兵团司令员陈赓鉴于敌我双方的态势，计划将13军放在廉江，示形于敌，诱敌上钩；将14军、15军和43军隐蔽配置在廉江以东及东北地区，以逸待劳，打白崇禧一个措手不及。他将这一计划电告给林彪。此时的林彪却错误地判断鲁道源的第11兵团是向遂溪以东方向逃跑，他认为这正是歼敌于运动之中的好机会。因此，他要4兵团离开雷州半岛，北上围歼鲁道源兵团，只留1个师在廉江。陈赓认为必须以第4兵团坚守廉江，切断白崇禧集团向海南岛逃跑的退路，否则，无异于放蛟入海，后患无穷。他对副司令员郭天民说：“13军以1个师守廉江，便会受敌3面攻击，如果张淦兵团趁机以全力向南突击，廉江防线就有被突破的危险，白崇禧就会从雷州半岛逃入海南岛，后果不堪设想。”他立即电告林彪说：“13军、14军自现在位置转入新位置，须3日行程，是否有贻误战机的危险？为此建议，是否就现态势，首先求得歼灭张淦兵团，然后再歼灭鲁道源兵团。”林彪复电说：“我决心已下，不能更改。命令各军按规定的时间、路线出动，歼灭鲁道源兵团。”陈赓本来只是暂归林彪指挥，他见林彪态度如此强硬，为了大局利益，便致电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并转林彪、刘伯承、邓小平，详细地报告了他的战役部署，同时在报告中说，各军正待命行动，准备随时执行4野的命令。毛泽东仔细研究了广西战场的情形，认为战役的关键还是不能让白崇禧的主力逃到海南岛去。为此，他在给林彪与陈赓的指示电中写道：

林彪同志并告陈赓：

根据4野22日谍息，白崇禧决于23日起令其所部共16个师，由博白、郁林、北流、容县、岑溪之线，向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攻击。这是歼灭该敌的好机会，为此请你们注意：

1. **陈赓所率4个军，除1个军仍照陈赓前提部署由罗定、容县之线迂回敌之左侧背外，主力似不要进入广西境，即在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布防，置重点于左翼即廉江、化县地区，待敌来攻而歼灭之。**同时以一部对付余汉谋之配合进攻。

二、桂林方面之我军迅速分数路南下，攻敌侧背，置重点于左翼，即宾州、贵县、郁林之线，但未知时间上来得及否。

三、**白匪主力即确定向雷州半岛逃窜，我程子华兵团即应分数路宽正面，第一步向百色、南宁之线，第二步向龙州、南宁之线攻进，以期尽歼逃敌于龙州海防国境线上。**

四、以上是否可行，请按情酌定。

毛泽东 11月24日16时

林彪面对毛泽东的指示，不能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于是，陈赓调兵遣将，一举将白崇禧的3兵团和11兵团主力全线击溃。至此，白崇禧才发现自己上当了。陈赓此役活捉张淦等20名中将军官。12月1日，白崇禧乘飞机逃往海南岛。

在广西战役中，除少数敌人逃入越南外，其余全部被歼，共计17.3万人，实现了毛泽东在广西境内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作战计划。

11月25日，经济战线上著名的“米棉之战”，正式拉开了序幕。

原来在“银元之战”后，投机资本家并不甘心认输，他们认为“银元之战”是人民政府依靠政治力量取胜的，所以他们就又将投机目标转向粮食、棉纱、棉布、煤炭市场。在他们的哄抬下，全国物价一日三涨，上海涨价尤甚。上海的国民党特务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即大米、棉纱、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平抑物价的工作。毛泽东针对投机商人的猖獗活动，经过调查研究，指示以陈云为首的中财委依靠刚刚建立起来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调运和集中足够的粮食、棉纱、棉布等重要物资，选择适当时机集中抛售，给投机商人以毁灭性打击。从11月15日开始，中央人民政府每日从东北调运1000万至1200万斤粮食入关，加紧华中棉花东运，把陇海沿线积压的纱布运至西安。天津、上海、西安等大城市都准备了足够抛售的粮食、棉布、棉纱等物品。11月25日这一天，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集中抛售。大量物资涌入市场，使投机资本家措手不及，吞食不下。11月26日，各大城市市场物价立即下降。政府连续抛售10天后，粮、棉等商品价格猛跌30％到40％。投机商人哄抬物价的阴谋彻底破产，竞相抛售存货，可此时的市场已经饱和，愈抛愈贱，愈是不易脱手。有不少投机商人是借高利贷抢购囤积的，结果不仅所囤积的货物亏本，而且还付出了很高的利息，两面挨耳光。许多投机商因亏损过多而不得不宣告破产；许多私营钱庄也因贷给投机商人的款项无法收回，纷纷倒闭。

“米棉之战”后，投机商人一蹶不振，从此很难再成气候了。毛泽东说，米棉之战“不亚于淮海战役”。

11月25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他访苏的时间问题以及在此期间国内的工作安排问题。会议决定：

“毛泽东同志定于12月初赴苏。在毛泽东同志出国期间，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职务由刘少奇同志代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朱德同志代理；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由周恩来同志代理。”

11月26日上午，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的第5次全国干部会议闭幕，会议作出的《政治决议》明确提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思想教育全党；以政协的共同纲领为农工党的行动纲领。

会议结束前，一位农工党中央的负责人告诉大家说，下午有重要活动。

这天下午，一辆大客车把代表们从住地辛寺胡同接出。农工党中央负责人在车上告诉大家：

“我们去中南海，毛主席接见大家。”

意外的喜讯，引得车厢里立刻腾起一片欢呼。汽车驶进新华门，在一排平房前停下。这是一间简朴的会议室，几排长条桌，前面放着几把藤椅，桌上放有几包“海燕”牌香烟。

毛泽东来了，他脸上挂着微笑，轻轻地鼓着掌。农工党的干部们都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使劲地鼓掌。毛泽东坐下来，点燃了一支香烟，口里吐出大团大团的烟雾。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端详着毛泽东：只见他满头浓发，宽阔的蕴满智慧的额头和慈祥的面容上，充满着微笑。

农工党中央主席章伯钧和秘书长黄琪翔先后介绍了第5次干部会议的情况，毛泽东专注地听着，不住地轻轻点头。他开始讲话了，先朝大家扫视了一遍，然后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

“你们知道杨六郎镇守三关口的故事吧？我现在也坐在关口上，我在看你们过关呐。”

毛泽东风趣幽默的话，引起一阵轻轻的笑声。毛泽东接着说：

“我说的三关，可不是杨六郎的那个三关。我说的第一关就是战争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你们大家都过得很好，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这一关，就不是那么好过了，大家的出身或多或少同封建土地都有些联系，我希望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搞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顺利地通过这一关。**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

讲到这里，毛泽东停顿了一下，抽出一支烟，点燃了，又恳切地说：

**“只要大家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他把手掌使劲一劈，加重了语气：

**“你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11月27日，毛泽东关于“吸引更多胡宗南部于重庆聚歼”的问题致电刘伯承等：

刘邓，并告贺李：

据报蒋介石令胡宗南以汽车800辆运其第3军到重庆。请注意：

1. 是否能吸引更多的胡宗南部到重庆。

二、**我向重庆方面攻击之各军是否有必要稍为迟缓其行为，以利吸引较多之敌军据守重庆而后聚歼之。因为蒋介石自己在重庆，可能打一个聚歼汤恩伯于上海那样的好仗。**

毛泽东 11月27日

11月28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修改并通过了195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草案。

11月28日晚8时，毛泽东致电刘伯承等，他在电文中写道：

刘邓张李，并告贺李，林谭萧：

感酉电悉。**我所顾虑者，是怕重庆敌人利用我西路3个军尚要12月10号才能占领泸州，我11、12等军向重庆进得太早，不敢据守，向上游或向成都逃掉。**但如你们认为罗广文被歼后，重庆已无多兵防守，势必早日逃走，不如迅速占领重庆，较为有利，则你们早日夺取重庆的计划是适当的。**如重庆之敌并无逃走之意，则11、12军于歼灭罗广文后，于重庆上游渡江占领江北一段，然后看情形再定攻城计划，似较适宜。**请依情况发展酌定之。

毛泽东 11 月28日20时

11月28日晚，毛泽东身着灰色呢子大衣，脚穿棕色皮鞋，与江青一起来到警卫连的营房，看望住在这里的毛泽连和李轲。

此前，毛泽连二人在北京游览了名胜古迹。由于天气逐渐寒冷，毛泽东把自己的一件旧呢子衣服给了毛泽连，但两位客人还是适应不了北方的气候，打算立即回家过冬。毛泽连见三哥又来看他们，就说：

“三哥，我们在北京住了这么久了，家里人一直在惦念着我们，我们也想回家去了。”

毛泽东说：

“你们再住一段时间，等天气好一点再走吧。”

毛泽连说：

“麻烦三哥这么久了，不住了，我们回去。”

毛泽东听堂弟这么一说，便说道：

“也好。你们早些回去，免得家里人挂念你们，也免得你们挂念家里的事情。你们走的时候，替我带几封信回去。”

毛泽东回到办公室，挥笔疾书，首先给他小时候的塾师和堂兄毛宇居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宇居家兄：

惠示并诗敬悉，极为感谢。此间情形，泽连当可面达。顺问阖族各前辈同辈后辈们安好，贵宅各兄弟子侄均健康！

毛泽东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诗，是指毛宇居来信中所作的歌颂毛泽东的《导师颂》两首。后来，毛宇居先后担任了湖南文物保护委员会委员、湖南文史馆馆员职务。

毛泽东接着给八舅文玉钦的三儿子、比自己大3岁的表兄文南松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南松兄：

来示读悉，甚为高兴。

祝你健康！祝各表嫂健康！

毛泽东

毛泽东又给他的堂弟毛泽荣写了一封信。毛泽荣，字冬青，小名逊五、宋五、胜五。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宋五弟：

接到你的信，极为高兴。我这里的情形，可问李祝华（即李轲，字祝华——笔者注）、毛泽连二位便知。托毛、李带上皮衣料一件，为弟御寒之用。

顺致健康！

毛泽东

最后，毛泽东给他在湘乡东山学校读书时的同学熊经春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经春学兄：

李、毛二位来，接到手示，极为感慰。尚望努力进修，为人民服务。敬复。顺颂

学祺！

毛泽东

他将4封信分别装入信封，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闻讯解放南京时的照片，端详片刻，装入写给文南松的信内，派秘书将这些信件连同一些礼物送到警卫连营房，交给毛泽连带回家乡。礼物主要是皮箱、衣物和钱，分作几份，泽连母亲、泽荣、文家，还有李轲的母亲，都有一份。毛泽连、李轲在12月上旬回到了韶山，在山区小村庄和唐家圫的轰动自不必说。后来，毛泽东每年都定期从自己的稿费中给堂弟寄去200元，帮助他解决困难。一直到1958年吃饭不要钱为止。

11月29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2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首次提出了关于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总体设想，即：“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

会议讨论了中央政治局通过的195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草案。

会议指定由周恩来、陈云、黄炎培、薄一波、马寅初、施复亮、章乃器等，对概算草案作进一步修改。

11月29日晚，毛泽东应徐悲鸿之邀，为“国立美术学院”题写了院名。他在给徐悲鸿的复函上写道：

悲鸿先生：

来示敬悉。写了一张，未知可用否？顺颂教祺！

毛泽东 1949年11月29日

1949年12月1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报，要山东分局协助中央办理访苏的礼品。他在电文中写道：

“斯大林同志今年12月21日70大寿。中央决定送山东出产的大黄芽白菜、大萝卜、大葱、大梨子做寿礼。请你们接电后于3日内（即12月4日以前）购买每样5000斤共20000斤，由中央派飞机到济南接运。飞机于12月4日到济南，请注意时间。你们采购上列各项物品（大黄芽白菜、大葱、大梨、大萝卜）时，请注意选择最好的。”

12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4次会议，讨论195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说：

“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

毛泽东用**“有困难的，有办法，有希望的”**这3句话概括了国家的财政状况，他说：

“**我们的财政情况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既然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就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他还说：

“我们的情况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估计明年要比今年好。**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

会议通过了195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

会议制定了《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规定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具体职责是：省市县各级人民代表会议，负责听取和审查相应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决定相应各级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和政策，审查和通过相应各级人民政府的有关事宜。选举省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县人民政府县长、副县长和与之相应的各级人民政府委员，组成各级人民政府。

会议还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并以这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任命李达为湖南大学校长。

此前，毛泽东在和李达的谈话中说，希望他能够留在北京工作。李达却说他要回湖南继续从事教育工作。毛泽东只好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决定由他出任湖南大学校长。

李达离京前，由毛泽东、李维汉、张庆孚作历史证明人，并由刘少奇作入党介绍人，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且不要候补期。这是对李达脱党后20余年的政治表现的最好结论。李达每谈起这件事，总是激动地说：

“这么多年了，毛主席还没有忘记我，是毛主席的关怀和鼓励，才使我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啊！从此，我‘守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我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后来在1950年2月17日，李达走马上任，成为新中国建立后湖南大学的首任校长，开始了创办社会主义大学的教育生涯。

再说12月2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4次会议结束后，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对各省、市人民政府主席的任命通知书，其中任命国民党起义将领、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邓宝珊为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任命通知书下发后，毛泽东专门约邓宝珊谈话，他说：

**“蒋介石不信任你，始终不让你当甘肃省主席。我们让你回甘肃工作，献身桑梓，相信你一定会做好工作。”**

邓宝珊说：

“我曾是反动阶级的一员，再不准备参与军队和政务，想和傅先生一起在河套地区办农场、搞水利，为国家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毛泽东说：

“**8年抗战，先生保护边区功劳很大。解放战争，你又积极促成北平和平解放，更是立下奇功。你是甘肃人，对甘肃省情很了解，在甘肃的人脉关系很广，威望很高，所以治理甘肃非你莫属，**你一定要接受我的建议，回去治理好甘肃。”

毛泽东考虑到在延安时期，邓宝珊和彭德怀有过两次榆林之战的疙瘩，就特别关照他说：

“西北的工作由彭德怀、贺龙、习仲勋负责，你以后跟他们在工作上会经常打交道，他们都是很好的同志，容易相处。你去之前是不是先给他们发个电报，有个联系更好一些。如果你觉得可以，把电稿拟好后送给我，我替你发，你看怎样？”

邓宝珊对毛泽东的关怀非常感激，当即说道：

“我没有想到的，主席都为我想到了，我一定照办。”

毛泽东又叮嘱他说：

“**民族问题和农业问题，是困扰甘肃的两大难题，你的担子很重啊！**”

第二天，邓宝珊就给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发去了电报。过了两天，毛泽东转来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的复电，对邓宝珊到甘肃任职表示祝贺和欢迎，词意恳切。邓宝珊很受感动，原来的一些担心也就释然了。

12月间的一个下午，天上飘着鹅毛大雪，毛泽东打电话约湖南籍几个老人吃饭。符定一来到颐年堂，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

“您是我学生时代的老师，我的好多知识就是跟您学的。”

刘斐赶到中南海颐年堂时，见章士钊、符定一已先一步到了，由毛泽东、林伯渠、李维汉陪着说话。不一会儿，工作人员进来报告说，仇鳌老先生到了。毛泽东急忙迎了出去，搀扶着老人说：

“先生一路劳顿，辛苦了。”

原来，仇鳌是在几天前才来到北京的。先前，毛泽东曾在9月和10月间两次电邀仇鳌来京，仇鳌感到盛情难却，便在秘书陈曼若、奠均一及其侄子仇硕夫陪同下到了京城。如今他见毛泽东如此谦恭亲切，便说：

“老朽让毛主席费心了。”

“哦，与先生一别20多年，怎么忘了我的名字，我叫毛泽东，字润之，可没有改名主席哟！”

仇鳌见毛泽东如此说，便笑了，说道：

“好，好，我还叫你毛润之。”

二人步入院内，章士钊、符定一、刘斐等人迎了出来。毛泽东指着仇鳌对众人说：

“亦山先生大家都很熟悉，不用我介绍了。”

仇鳌与章士钊、符定一、刘斐自然是老相识。林伯渠和李维汉在仇鳌到京后已经见过面，李维汉还曾陪同他在城内多处游览参观。仇鳌目睹北京的巨大变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曾赋诗述怀：

天回地转客里明，万户千门旧帝京。高阁红旗翻晓日，交衢小队舞新声。

黄袍梦醒销荧惑，紫盖人归识太平。阅尽兴亡乔木在，冲塞古柏亦峥嵘。

且说毛泽东将众人引入客厅，拉着符定一的手说：

“您是我过去的老师和校长，今日请您坐上座。”

符定一谦让说：

“你是主席，还是请你坐上座吧。”

“哪有学生坐上座的道理！”

毛泽东说着，把符定一拉到了上座的位置，符定一只得坐了。待众人落座后，毛泽东对仇鳌说：

“亦山先生，今天我设家宴为你接风洗尘，特地邀请了我们这几位湖南老表作陪。我们湖南人和别人坐不来，比如周恩来，他们不吃辣椒。**此味只有湘人知，人间能得几回闻哟**！”

大家闻言都笑了，接着便海阔天空地谈论起来。仇鳌等人又从瑞雪兆丰年，讲到几个人都已年过半百，有的已近古稀，又没有学过马列书籍，是老朽无用了。毛泽东听他们如此议论，就有意识地讲起了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他语重心长地说：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小时也上过私塾，读过孔孟的书，也信过神，母亲生病也去求过神佛保佑哩，旧社会的东西对我都产生过影响。有段时间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派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我才逐步接受了马列主义。我们青年时代，一批朋友去法国勤工俭学，我没有去，打定主意走自己的路。**”

毛泽东稍停了一会儿，环视着大家，又说：

“**哪里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呀！我也是逐步认识社会，走上革命道路的，最重要的是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哩！我的出身最多不过是个小学教员嘛，有什么了不起啊！”**

说话间，工作人员端上了酒菜，毛泽东亲切地给客人们夹菜斟酒，他自称酒量不济，偶尔呷几口，已是满面红光了。看看酒过三巡，毛泽东端着酒杯，起身对仇鳌说：

“亦山先生，你为共产党，为新中国的建立做了许多好事，我敬你一杯。”

仇鳌听毛泽东如此说，想起他在两封邀请电文中都曾赞扬了自己，便说：

“润之言重了！湖南和平解放，老朽不过是顺乎民意，效了一点顺水推舟之劳而已。你再三提及，老朽实在不敢当了。”

毛泽东却说：

“湖南得以和平解放，当然有先生的大力支持。但是，我所说的，不仅如此哟。早年我们在长沙闹革命，先生赞助最力，为我们筹集了几千块大洋，这笔钱很顶用，为我们党的事业帮了大忙啦！对我们党做了好事的朋友，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

他见众人面面相觑，一副茫然不解的样子，便微微一笑，放下酒杯，不慌不忙地点燃了一支烟，将仇鳌在1920年如何帮助他创办俄罗斯研究会，1921年8月他又利用仇鳌的船山学社社址和经费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事，讲述了一遍，然后再次端起酒杯问道：

“大家说，我毛泽东这杯薄酒，亦山先生当不当喝？”

“喝，一定要喝呀！”

众人疑惑顿释，异口同声地说着。仇鳌只得站起身来，哽咽着低低地说了声“谢谢”，双手接过酒杯，一饮而尽。

席间，毛泽东提出要学贯古今的符定一先生出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符定一表示谦让，他说：

“这个职务只要老而矣的文人当就可以了。”

毛泽东补上一句：

“还要才、德、望啰。”

符定一只得答应了。

这一天，刘斐等人听了毛泽东的那些话，都觉得他的用意是很深的；他对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也是永记在心上的；由此深受启发和鼓励，同时又“都自愧识浅，十分敬佩毛泽东的学识、记忆力和过人的谦虚精神。”

在冬季的一个星期天，毛泽东叫上几个孩子一起到南海冰场去滑冰。孩子们当然高兴了，像一窝蜂似的跑向滑冰场。李敏和李讷争先恐后地换上爸爸买来的冰鞋，毛泽东穿着大衣站在旁边看着她们。一切都准备好了，李敏一起身，一甩手，还未迈开脚步，就听“啪”的一声，一个结结实实的屁股墩摔倒在冰上，痛得呲牙咧嘴。她回头一看，妹妹李讷也摔在冰上，正在挣扎着往起站呢。李敏咬着牙忍着痛赶紧站起来，谁知越急冰就越滑，越滑就越站不起来。好不容易站起来，又摔了个四脚朝天。她再一看妹妹，李讷正双手支撑着，撅着屁股往起爬呢，还没站起来，两脚往后一滑，又趴在了冰上。姊妹俩相视一笑，看看站在冰场旁的爸爸，爸爸也正冲着她们笑呢。

姐俩看到爸爸鼓励的眼神，就忍着疼站起来，再练，再摔；再摔，再练。不到规定的时间，谁也不许退场。“噗通”，李讷又摔倒了，她毕竟年龄小，疼得太厉害，受不了了，就哭起来。

“好了，收兵吧！”

毛泽东说。第一次滑冰就这样结束了。回到家里，毛泽东问：

“怎么样？有何感想？”

李敏说：

“学滑冰太难，太难了。冰太滑，两脚又总是不听使唤，太难。”

“难就对头了，要知难而进嘛！”

李讷说：

“摔得太疼了。”

“好嘛，不摔不打不成才，摔摔打打长得快嘛！”毛泽东说：“今天挨摔，明天就少摔或不摔了。下周继续练摔。”

有一个周末，中南海又要举行晚会了，叶子龙知道毛泽东晚上没安排什么太急太多的事情，又怕自己请不动毛泽东，就让他的女儿燕燕和二娃子把李敏、李讷叫来，把请毛泽东跳舞的任务交给了孩子们。叶子龙还特别交代她们：

“等主席吃了晚饭，你们就拉着他领你们到海边散步。记住，不要光顾着让主席给你们讲故事，就忘了大事，8点钟，你们几个一定要拉他到春藕斋去跳舞。我告诉你们，主席如果不跳舞，就会越来越胖，长成个大肚子。肚子大，就走不动路了。你们要是真关心主席，就要拿出实际行动来，让他去跳跳舞，活动活动身体。好，8点钟就看你们的啦！”

是日晚，毛泽东一吃完饭，4个孩子相约来到他身边，前呼后拥地拉着推着他到南海边散步。她们边走、边说、边笑、边玩，还时不时地看表，一看快到点了，拉着毛泽东就往春藕斋走。

“快点，快点，到时间啦！”

二娃子推着毛泽东的腰说。毛泽东问：

“干什么去呀？”

几个孩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说。她们怕说了毛泽东就不去了，只是拥着毛泽东走。

“干什么去呀？你们不说，我可就坐下不走了。”

毛泽东说着，做了个就要坐下的架势。这一下可把4个孩子吓了一跳，她们异口同声地说：

“叫你跳舞去。”

毛泽东一听，乐呵呵地笑了，说：

“跳舞去，那好。去跳舞是不是该换双鞋子？”

他说着伸出脚来让她们看。孩子们见毛泽东答应去跳舞了，可高兴啦，跟着毛泽东回到房间，这个忙着找胶底皮鞋，那个忙着脱毛泽东脚上的布底鞋，又忙着把皮鞋给毛泽东穿上。毛泽东边走边问：

“你们不会跳舞，为什么要拉我去跳舞呀？”

“我爸爸说——，说什么来着？”

二娃子一时学不来她爸爸的话，就回头问她姐姐。李敏抢着说：

“叶叔叔说，您不跳舞就会长个大肚子。”

燕燕接着说：

“您肚子大了，就走不动路了。”

“呵呵呵。”毛泽东笑着说：“好，我去跳舞，不要长成个大肚子！”

在舞场里，大人们都随着舞曲跳起来。叶子龙高兴地冲着4个孩子直点头，几个孩子也冲着他笑了笑。孩子们看着大人跳得起劲，自己不会跳干着急，于是一商量，手拉着手也下了舞场。她们一会儿跟在毛泽东后面，学他一左一右地上下摆动式，一会儿跟在周恩来后面，学他潇洒自如的4步舞，一会儿又跟在朱德后面，学他那四平八稳的慢步舞。她们4个在舞场里像穿梭似的玩着、跳着、蹦着，给舞会增添了不少欢乐气氛。

李敏的好朋友除了李讷、燕燕和二娃子，还有周恩来的侄女秉德。她们几个虽然年岁不同，班级不同，但一到节假日，总爱在一块玩耍。她们几个人还经常到南海边用手捞鱼虾。有一次，她们捞到了不少小鱼、小虾，就想着煮汤解馋。找谁帮忙呢？大家一讨论，就决定去找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慈祥，说话又风趣。于是，她们就风风火火地去找他，见到毛泽东就七嘴八舌地说：

“毛伯伯，毛伯伯，您看，我们捞来好多小鱼小虾……”“毛伯伯，我们把小鱼小虾都拿来了，和您一起吃饭行吗？”

“好啊！那你们就来吧！”

毛泽东痛痛快快地答应了，几个孩子又一窝蜂似的把小鱼、小虾送到厨房。这顿饭，餐桌上除了往日的几个简单的菜之外，又多了一盘苦瓜和一盆新鲜的鱼虾汤。几个小女孩吃得高兴、热闹、开心，可就是谁也不去动那一盘苦瓜菜。毛泽东说：

“你们从小就要学会吃苦，不学吃苦怎么行啊！”

孩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是没有一个人动筷子。

在毛泽东身边，不光是孩子们这样随便，工作人员也是如此，他们好像与自己家的老人生活在一起一样，很自然，显得无拘无束，充满着温馨。年轻人喜欢玩，喜欢动。只要不影响工作，毛泽东从不限制他们任何有益的活动。他不止一次地对他们说：

“我可没你们自由，他们都管着我。想吃的东西不能吃，想去的地方不能去。我是一点自由都没有啰！还是你们好哇！”

一个卫士说：

“主席，您也发牢骚啊！”

“我也是和你们一样的人嘛！我又不是不吃不喝不吭不响的泥菩萨嘛！”

年轻人听他这么说，都笑了起来。

毛泽东平时吃饭除了和家人一起外，还喜欢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吃。他常常招呼身边一两个人，随身卫士或机要秘书，跟他一块儿边吃边聊，说说笑笑。他说：

“我一个人吃不下饭，和你们边吃边聊，我可多吃一点饭。工作时，我全部精力用在办公桌上。如果我一个人吃饭，没有人说话，我脑子还会在办公桌上。同你们边吃边聊，我就换脑子休息。”

这正是：忙里偷闲一伟人，最是难得性情真。儿女后生常绕膝，旧友新朋座上宾。

欲知毛泽东有何重要国事活动？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说：“**对我们党做了好事的朋友，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他在宴请仇鳌时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当时在座的章士钊先生，也是对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有过帮助的人。在以后的20多年间，毛泽东对这位老朋友一直念念不忘，且关怀备至。为了帮助老先生，他曾经用10年的时间，每年从自己的稿费里拿出2千元，共计2万元，以还债的名义送给老人。这种感恩的事例，在本传中不胜枚举，请读者诸君慢慢往下看。

**第7章**

**“军队的生产运动，必须严格禁止开商店从事商业行为。干部中如有企**

**图以走私、囤积、投机希图暴利的思想，或发现此种行为，必须迅速予**

**以纠正和制止。因为这些不仅违背正确的生产方针，搅乱经济秩序，而**

**且势必发生贪污腐化，毁坏自己同志，为法令所不容许。”**

话说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为了落实他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2次会议上对军队提出的“飞鸟尽，良弓变”的方针，以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

人民解放战争已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基本的胜利。人民解放军除在几个战线上必须专心致志追歼残敌以竟全功外，已有大量军队进入整训，或不久即将进入整训。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在和平时期，在不妨碍军事任务的条件下，应有计划地参加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帮助国家的建设工作。”这里给了我人民军队除了保卫国防、巩固治安和加强整训这些伟大任务以外的一个光荣而巨大的任务。因此，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而外，应当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这一生产任务是必须而且可能实现的。这一生产任务之所以必须实现，是由于国内外反动派所发动的长期的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给了人民以严重的灾害，给了经济以严重的破坏。我们今天要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要医治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要从事经济的文化的国防的各种建设工作，国家的收入不足，开支浩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项巨大困难。克服此种困难的方法，首先是全国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逐步地恢复与发展生产。而人民解放军则必须担负一部分生产任务，方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克服此种困难。这一生产任务之所以可能实现，是因为人民解放军绝大多数来自劳动人民中间，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各种生产技能，并曾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担负过生产任务，具有生产的经验与劳动的传统。**人民解放军的广大的干部们和老战士们都懂得，军队在参加生产之后，不仅战胜了困难，减少了政府的开支，改善了军队的生活，并且经过劳动锻炼，还提高了军队的政治质量，改善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这一生产任务之所以可能实现，还因为在战争结束了的地区，人民解放军除了担负保卫国防，肃清土匪，巩固治安，加强训练等项任务之外，已有余裕时间参加生产建设工作。所有这些，都是人民解放军能够实现生产任务的条件。

人民解放军参加生产，不是临时的，应从长期建设的观点出发。而其重点，则在于以劳动增加社会和国家的财富。因此，各军区首长，必须指导所属，从1950年春季起，实行参加生产建设工作，借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并节省一部分国家的开支。此种生产建设工作，应形成一种运动，以利推广。此种**生产运动应订出较长时期的计划和具体的步骤。生产项目应在人民政府允许之下，以农业、畜牧业、渔业、水利事业、手工业、各项建筑工程、各项可能从事的工业和运输事业为范围，禁止从事商业。**军队领导机关应根据驻地情况，调查研究，今冬做好准备。

**根据过去的经验，军队的生产运动，必须严格禁止开商店从事商业行为。干部中如有企图以走私、囤积、投机希图暴利的思想，或发现此种行为，必须迅速予以纠正和制止。因为这些不仅违背正确的生产方针，搅乱经济秩序，而且势必发生贪污腐化，毁坏自己同志，为法令所不容许。**此外，**在进行农业生产时，必须注意不要因开荒引起水患，不要因争地引起人民不满**。

为了使军队正确执行生产任务，开展生产运动，兹规定：

一、在师、军及军分区以上各级，成立有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的代表参加的生产委员会，其任务为掌握生产方向，审定生产计划，监督生产计划的实施，检查违法行为。

二、建立军队的生产合作社，建立合作社的各级领导机关，在军队生产委员会的监督和领导之下，掌管全部生产资金、生产活动和生产结果的处理。合作社系统和军队指挥系统平行，相互密切联系，但不相混淆。

三、**实行公私兼顾原则，公平合理地分配生产红利，其中应有40%为生产者个人所有，其余为该生产单位及国家所有，借以建立公私革命家务，一方面做到军队部分自给，一方面使生产者个人有所收获。此项个人收获，或自己留用，或寄回家用，或存储于合作社备用，由个人自己决定。**

四、在土地缺少地区，除参加各种可能的手工业、工业、水利事业、运输事业和建筑工程之外，军队首长可和当地人民政府商量并在农民自愿原则下，参加劳力、资金、肥料、农具，与农民伙种，使之增加产量，公平分配成果。但必须注意不得强制执行，**不得与民争利。**

五、各军区部队的生产计划，须与各大行政区和各省人民政府的生产计划相结合，统筹生产资金。**所有军队生产资金均作为投资，必须计算利息和订定还期。所有军队生产事业均须照章纳税，并遵守人民政府一切法令，不得违犯。**

上述各项，望各军区首长严格注意，务使我人民解放军1950年的生产建设工作获得显著的成绩，并随时检查，纠正可能发生的错误和缺点。各地人民政府对当地军队的生产工作则有予以指导和协助的任务。

主席 毛泽东 1949年12月5日

接着，毛泽东批复了刘亚楼等关于各地机场修复问题的报告，他写道：

华东局及华东军区，华北局及华北军区，华中局及华中军区，西北局及西北军区，东北局及东北军区并告政务院周总理、中财委陈薄及空司刘常王王（指刘亚楼、常乾坤、王弼、王秉璋——笔者注）诸同志：

据空军司令刘亚楼等同志11月28日电称：

1. 空军司令部刚刚成立，暂时无法照顾到筹划全国各地机场建设的总预算。但我们认为，全国各军区及各级政府，目前主要应该是派定专人保护和管理各地现有机场及其现有设备，做到不再被破坏或偷窃；同时，可进行各地方本身所能负担之经费和人力（可动员一部分部队参加）范围内的修理工作。至于各地机场大的修复工作，由于目前国家经济困难，除华东外，可以暂缓一步，待空军司令部有力量来整个筹划这件事情时，提出计划，经军委批准后，再来进行。否则，必然形成无政府状态。

二、华东范围，则有不同之处，因那里需准备执行战斗任务。但也并不是在华东地区的所有机场，都要立即修理（如苏北就可以暂缓），而是首先修复与行将执行的战斗任务有关联的机场。其修建程度，亦可限于为执行战斗任务所需要的范围，以免经费开支过大。这种修复计划，据华东军区司令部航空处报告，他们已经制就，并已向3野前委请示。在目前空军司令部无力量来审核这种预算的情形下，提议由空军司令部审核某地机场是否立即开始修理，而修理经费则由3野前委指定后勤机关审核之，然后报告军委批准之。

三、以上处理方法，如认为适当，请军委通知各军区及我们遵照执行，并告中财委等语。

我们同意此种办法。**请华东军区及各军区即照此办理，请中财委即照此支付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经费而拒绝支付一切可以减省的经费。**

中央军委主席 毛泽东 1949年12月5日

此时，毛泽东访问苏联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他选定由“首都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护送他到山海关。负责中国段沿途保卫工作的有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和铁道部公安局副局长冯纪等人。从北京到满洲里，铁路沿线每一公里都设置了一个哨位。周恩来给各地党政军一把手打招呼说：一定要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万无一失。许多地方都是由县委书记、县长出马，站岗放哨，护路护桥。

护送毛泽东到边境线的还有李富春、李克农等。

毛泽东此次访苏的主要随行人员有4人：政治秘书：中央候补委员陈伯达，翻译：师哲，机要：叶子龙，警卫：汪东兴；其他人员还有医生、机要员、卫士、厨师陈秉承、沈剑心、李家骥、田树彬。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和苏联在中国的经济专家组组长柯瓦廖夫一起陪同前往。

行前，毛泽东向随行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宣布了3条纪律：1、此次出访，对外不宣传，不带记者。2、沿途各地可允许当地的党政军领导2人到车上看望，其他人不要来。3、在中国境内沿途不下车，不准向地方要东西。

1949年12月6日晚8时30分，毛泽东一行乘车来到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前来送行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聂荣臻、滕代远、罗瑞卿、李克农、毛岸英。毛泽东由周恩来、滕代远引导，登上列车。车门两侧分别由罗瑞卿、杨奇清、冯纪和任远守卫。整个站台上异常肃静，没有一个闲杂人员。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说：

“代远、瑞卿和奇清、克农同志随你到满洲里。还有铁道部公安局副局长冯纪和政治保卫处的任远，也要一路送你到满洲里。要不要认识一下？”

毛泽东笑着说：

“是不是刚才在车门口见到的两位？我们已经认识了嘛！”

周恩来请示还有什么指示，毛泽东高兴地说：

“看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喽。”

晚9时，毛泽东乘坐的主列车从前门火车站第一站台正点出发。

这次出访的专列由前卫车、主列车、后卫车3部分组成。前卫车由5个车皮组成，上边乘坐的是50个警卫战士和一些铁道工作人员，已经在半个小时前出发了。后卫车也有5个车皮，乘坐着50个警卫战士，装载着给斯大林的贺寿礼品：山东大黄芽白菜、大萝卜、大葱、大鸭梨各5000斤。湘绣斯大林大元帅全身像一幅，杭州都锦生丝织斯大林像两幅，江西景德镇瓷烧斯大林相片两块，江西景德镇瓷烧带斯大林像盘子10个；24人用的江西景德镇瓷西餐用具全套（共100余件），铜底烧瓷寿盘一对，景泰蓝茶具（大小共5件）两套，康熙青花大瓷花瓶一对；象牙雕刻的宝塔一尊，象牙雕刻的女英雄像一对，象牙雕刻圆球3个，象牙雕刻八仙一套共8个，象牙雕刻的龙船一具；湖南湘绣被面30条、枕套60个，江西南丰桔1000斤，冬笋500斤及浙江的龙井茶、贵州的茅台酒、上海的名烟等。

毛泽东乘坐的主列车的编号是9002，共有10节车厢，一个连战士在前几节车皮内警卫。毛泽东和叶子龙、汪东兴、李家骥乘坐一节有4个房间的公事车厢，前边一间是会客室，毛泽东在中间的一间，其他几人用后边两间。陈伯达、师哲同用一节公事车。同车送行的滕代远、罗瑞卿、李克农、毛岸英同用一节公事车。其他的随从人员都在中间的车厢里。主列车还有餐车、行李车等。按规定，事先让列车员将毛泽东的车厢整理就绪，一切物品安放妥当，没有按铃叫人，不许进去。

这时，冯纪、任远敲门进入车厢，请毛泽东休息。他们举手敬礼说：

“报告主席，我是……”

毛泽东一挥手，微笑着说：

“你是冯纪，你是任远，我们已经认识了么。任远，任重道远。好啊！”

任远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天不早了，请主席休息吧！车上备有一切用具。”

毛泽东看见列车上备有毛巾、香皂、牙刷、牙膏等，立即让冯纪、任远把东西收起来。他从随身带的一个小布袋里取出洗漱用具，说：

“我自己有，不需要公家另准备。”

列车到达天津车站后，地方负责警卫的人上来报告说：

“在专列要经过的铁轨中间发现一颗手榴弹！”

罗瑞卿大怒道：

“简直乱弹琴！”

杨奇清也说：

“怎么才发现？不是早就清理过了吗？”

李克农叫人把那颗手榴弹拿来看看，原来是颗长满铁锈的旧弹，已锈成一个铁疙瘩，不可能再爆炸了。罗瑞卿当即和杨奇清商定，由他在天津站下车，对此事进行彻查。后来查明，此事是一个白俄籍“职工”所为。在铁路内部的检查中，天津铁路管理局管内的杨村铁路大桥的桥墩上还发现了一个炸药包，被及时排除了。

毛泽东的专列在唐山站停车，加煤上水。站台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铁路工作人员紧张有序地忙碌着。列车检修工张志英像往日一样，从车尾朝车头方向检查过去，走过两节车厢，无意中看见一节车厢的车窗里有个熟悉的面孔正在依窗而望。他定睛一看，啊，差点喊出声：毛主席，是毛主席！此时，车外的气温已经相当低了，为了检查车厢内的温度，张志英轻轻地拉开车门，走进毛泽东的车厢。他看到毛泽东正在看报，本想尽量不惊动毛泽东，但毛泽东还是发现他进来了。张志英马上立正，向毛泽东敬了一个礼。毛泽东望着张志英点头示意。

清晨，一轮红日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列车经过一夜的运行，到达河北省秦皇岛境内的山海关车站。毛泽东早已起床，打开窗帘，见窗外冰天雪地，朝霞满天，心情好极了。望着那气势雄伟的天下第一关，他深深地呼吸了几口气，想下车看一看。他身穿呢大衣，脚蹬方口布棉鞋，手里拿着香烟，从车厢的中间走到杨奇清跟前，笑容可掬地说：

“公安大臣，这里停多久？”

杨奇清说：

“半小时。”

“嗯，下去看看可以吧？”

毛泽东完全是一种商量的口吻。杨奇清便对一旁的汪东兴说：

“外面风大，你帮主席加点衣服！”

毛泽东说：

“这就对了。**历史上秦始皇、汉武帝、曹操、唐太宗等都在这里留下过足迹，我们就要出关了，到此岂有不下车之理！**”

说罢，他第一个走下列车，来到站台上。滕代远、李克农、杨奇清等人赶忙走上前去。警卫人员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在这里下车散步，因此没作任何警卫部署。毛泽东见到天桥，就说：

“‘天下第一关’在什么地方？到天桥上看看去。”

上了天桥，毛泽东向身边的人介绍说：

**“山海关，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因关在山海之间而得名。”**

他看见不远处的山海关城楼上写有“天下第一关”几个大字，马上向滕代远提出要去那里看一看。滕代远问任远：

“有没有小汽车？”

任远回答：

“没有准备汽车。”

毛泽东说：

“那就算了。听说孟姜女坟也在此地？”

任远说：

“没有坟。在城外有段城墙塌了，传说那就是孟姜女万里寻夫哭断长城的地方。”

“原来如此！”

毛泽东笑了笑说。一行人下了天桥返回到列车上，专列重新启动。毛泽东问师哲：

“罗长子怎么不见了？”

师哲报告说，在天津站发现了一颗手榴弹，罗部长留在那里进行深入调查。毛泽东说：

“罗瑞卿还是很负责的嘛！”

专列过了山海关，气温已下降到零下40℃，毛泽东乘坐的车厢暖气管道冻裂了，几组暖气片全坏了。滕代远急忙指挥列车段段长张宇，把地毯卷起来，发动餐车烧开水，想用热水从两头把冻坏的管道烫通，但费了半天劲儿也不见效果，只好请毛泽东到另一节车厢休息。

毛泽东换了车厢后，继续工作。除了处理国内的一些电报外，他还提出搞些调查研究，找几位沿途党政负责同志上车谈话。机要秘书叶子龙马上将毛泽东的指示通过电台传达到有关县市。毛泽东在绥中同县委书记谈话；在锦州同锦州市市长谈话。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调研的题目太多了，问得太细了，连统计数字包括百分比都不放过。

7日晚，列车到达沈阳车站。高岗一行人上车看望毛泽东。高岗提出要送毛泽东到满洲里，毛泽东没有同意。因为要检修列车暖气管道，毛泽东临时下车，到东北人民政府交际处的沈阳文化宾馆休息了半天。在沈阳和哈尔滨，毛泽东同当地铁路局负责同志谈话，了解铁路运输生产、管理、职工生活等方面情况。

毛泽东原乘车厢的暖气设备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博克图一路修理，也没有修好。毛泽东说：

**“不是车厢冷，就是拉不动，这火车比老牛车还慢，你们还说胜利品呢，还是美国出的。美国的东西就那么灵？我历来不相信，有些人迷信洋货，怎么样，结果害了自己。”**

12月9日，列车到达中苏边境满洲里。毛泽东在这里需要换车，因为中国铁路是窄轨，苏联铁路是宽轨。苏联迎候毛泽东的是一辆设备很好的高级专列，设有会议室、卧室、休息室和浴室，显得气派堂皇。

列车在苏联境内行驶30分钟后，停在赤塔州奥特堡尔车站上，赤塔州苏维埃主席乌若夫、外交部交际司副司长马特维耶夫、外贝加尔军区司令部代表和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迎接毛泽东。毛泽东和他们亲切握手，互致问候。

苏方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拉夫伦捷夫致欢迎词，毛泽东检阅了仪仗队。

列车又继续向前行驶了。毛泽东望着车窗外的皑皑白雪，弹了弹香烟上长长的烟灰，口里喃喃自语：

**“西伯利亚，千里冰封呵，西藏大约也如此吧？**”

他让工作人员拿来西藏的资料，认真地翻看着。他不断抖落烟灰，构思着给中共中央电文的内容，他写道：

“为不失时机地解放西藏，打击帝国主义侵略扩张野心，促使西藏向内地转化，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

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很快就把毛泽东的电文传到了西北军区彭德怀手上。

尔后，毛泽东与苏方派来担任翻译的汉学家费德林，谈起了中国古典文学。

费德林在1943年获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屈原的生平与创作》，曾得到郭沫若的指导。他在《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一书中说，1949年毛泽东率代表团赴苏联访问期间，他任苏方翻译，作为斯大林、毛泽东两巨头的翻译；书中还说：在毛泽东访苏期间，两人接触非常密切。关于这次谈话，他在书中记载，毛泽东在谈到屈原时说：

**“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12月9日这一天，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在雅安起义。刘、邓、潘部师级以上军官也在四川彭县联名发出拥护起义的通电。

当天，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通过共产党方面在雅安的秘密电台致电毛泽东和朱德，电文如下：

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并转各野战军司令暨全国人民公鉴：

蒋贼介石盗窃国柄廿载于兹，罪恶昭彰，国人共见。自抗战胜利而还，措施益形乖谬，如破坏政协决议各案，发动空前国内战争，紊乱金融财政促成国民经济破产，嗾使贪污佥壬横行，贻笑邻邦，降低国际地位，种种罪行，变本加厉，徒见国计民生枯萎，国家元气断绝。而蒋贼怙恶不悛，唯利是图。在士无斗志，人尽离心的今天，尚欲以一隅抗天下，把川、康两省8年抗战所残留的生命财产，作孤注之一掷．我两省民众，岂能忍与终古。文辉、锡侯、文华等于过去数年间，虽未能及时团结军民，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然亡羊补牢，古有明训，昨非今是，贤者所谅。兹为适应人民要求，决自即日起率领所属宣布与蒋、李、阎、白反动集团断绝关系，竭诚服从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野战军刘司令员、邓政治委员之领导，所望川、康全体军政人员，一律尽忠职守，保护社会秩序与公私财产，听候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之接收，并努力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反对派之残余，以期川、康全境早获解放。坦白陈词，敬维垂察。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 叩 1949年12月9日

12月9日深夜，云南省主席卢汉通过广播电台宣布起义，致电中央政府、中央军委、人民解放军、各级政府。电文如下：

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并请转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司令员、副司令员、各政委、全国各军政委员会、各省市人民政府、各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鉴：

人民解放，大义昭然，举国夙已归心，仁者终于无敌。抗战8年，云南民主思潮，普遍三迤。革命原有历史，响义何敢后人！不意胜利甫临，国民党反动政府，私心滔天，排斥异己，遂发生云南政变，且借机将数万健儿，远戍东北；地方民众武装，剥夺殆尽；全省行政首脑，形同傀儡。以特务暗探，钳制人民之思想；以警察宪兵，监视人民之行动；诛求无厌，动辄得咎，官民束手，积愤莫伸；父老则冤苦填膺，青年则铤而走险。人民革命洪流，实已席卷地下。解放全滇，有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决非任何反动势力所能遏阻。只以压力太大，不忍轻率从事，重苦人民。

汉主持滇政，忽忽4载，效傀儡之登场，处孤孽之地位，操心危而虑患深，左支吾而右竭蹶，懔威胁之多端，实智穷而力屈，既负滇人，复负革命。年来居心行事，无不以云南1200万人之祸福为前提，此中委屈不敢求谅于人，亦不敢求恕于我；苟执形迹而罪我，虽百死而不辞。时机未至，不惜委屈忍耐，权为应付；时机已至，不惜任何牺牲，解放云南。兹以坚决之行动，尽应尽之义务，但求有利国家，有利人民。自本日起，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云南全境解放；并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所宣布之人民解放军约法8章及第2野战军司令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对川黔滇康宣布之4项办法，暂组织临时军政委员会，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命令。至于汉个人只求云南解放之完成，即当引退而待罪。如有反动势力为害乡邦，汉当率领三迤健儿负弩前驱，迎头痛击，完成人民解放大业。谨此宣言，诸维公鉴。

卢汉 率全体文武官员暨全省民众 叩 亥佳 樱

12月11日，毛泽东、朱德便复电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对他们率部起义表示欢迎，并指示他们通令所属，遵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约法8章”和第2野战军的“4项号召”，改善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为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肃清反动残余，建立革命新秩序而奋斗。

这一天，毛泽东又以他和朱德的名义复电卢汉，他在电文中写道：

昆明卢主席勋鉴：

佳电诵悉，甚为欣慰。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现我第2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已进驻重庆，为便于具体解决云南问题，即盼迅与重庆直接联络，接受刘邓两将军指挥，并望通令所属一体遵行下列各项：

一、**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进驻云南，并配合我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反革命军队**。

二、执行人民解放军今年4月21日布告与今年11月21日刘邓两将军的4项号召，保护一切国家财产，维持地方秩序，听候接收。

三、**逮捕重要反革命分子，镇压反革命活动。**

**四、保护人民革命活动，**并与云南人民革命武装建立联系。

又：**为向云南与全国人民正式宣布此次起义并取得各方谅解计，似以另发一通电，对过去作进一步检讨，再由我方电复并于互相同意后发表，较为妥当。**专此，并希裁复。

毛泽东 朱德 12月11日

卢汉复电表示，完全接受中央指示，起义通电于12月20日正式发表。

且说毛泽东的专列行至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他照例由师哲陪同，下车散步，刚刚走到月台上，忽然觉得头晕目眩，随即满头大汗，那高大的身躯即将倒向地面。师哲和后边的卫士急忙上前扶住，将他搀回到车厢内。

12月15日，中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王稼祥及夫人朱仲丽，还有在苏联学习的孙维世（周恩来的干女儿），从莫斯科乘车到数百公里外的基洛夫车站迎接毛泽东。此后，孙维世也参加了翻译工作。

12月16日中午12点，毛泽东一行抵达莫斯科北站雅罗斯拉夫车站。苏联党政军领导人除斯大林以外，布尔加宁、莫洛托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维辛斯基、孟希科夫、葛罗米柯、西尼洛夫等都在车站迎接。克里姆林宫的大钟“当当当”地敲响了，表示对毛泽东的隆重欢迎和崇敬。毛泽东在苏方的欢迎仪式上，发表了简短的书面演讲，他说：

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我这次获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最愉快的事。中苏两大国人民是有深厚友谊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友谊。我相信，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于新民主主义国家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努力，由于中苏两大国的共同愿望和亲密合作，特别是由于斯大林元帅的正确的国际政策，这些任务必将会充分实现并获得良好的结果。中苏友好与合作万岁！

莫斯科的天气实在冷得厉害，隆重的欢迎仪式很快就结束了。罗申把毛泽东一行送至莫斯科西南郊27公里处的原斯大林战时别墅里，说了声：“你们好好休息”，便离去了。

斯大林的战时别墅并不大，地面上有3层，1、2层住人；地下室有住房、厨房、作战设备等。毛泽东和叶子龙、师哲住在1层。毛泽东住的是一个套间，里间是卧室，中间是办公室，外间是会客室。陈秉承、李家骥、田树彬等人住在1层西边的3个房间里。陈伯达住在2层东面的一个大房间里，汪东兴和沈剑心住在2层的一个房间里。2层的其它房间留给周恩来等人。

毛泽东在他的卧室里伸手按了按摆放着的一张高级弹簧床，皱着眉头说：

“我睡不了这种床。”

卫士说：

“主席，我们把垫子掀了，铺上块木板就行了。”

毛泽东说：

“好，不能去麻烦人家，我们自己想办法。”

卫士建议说：

“我们可以请大使馆的同志帮忙解决。”

毛泽东同意了。不久，大使馆就派人送来了一块木板，大家一起动手，撤掉了弹簧床垫，换上了木板，摆上了毛泽东的书籍和用品。

一安顿下来，毛泽东就想起了斯大林要在中国投资建立工厂的事。

据赫鲁晓夫回忆，有一次，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中苏双方共同建立一个国际机构来开发新疆的天然资源。后来又提出让中国划出一块合适的地方给苏联建立一个橡胶园。毛泽东立即回电说：

**“我们同意在越南海岸对面的海南岛上为你们建立一个橡胶园。但是我们有一些条件，明确地说，就是我们建议你们向我们提供必要的贷款、机器和技术援助，由我们自己来建立和经营这个橡胶园。我们将给你们运去橡胶作为你们这种帮助的报酬。”**

后来，斯大林有一次突然喜欢起菠萝罐头来了，立即指示始终跟在身边的秘书马林科夫说：

“给中国人发个电报，说我希望他们拿出一块地方来，让我们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厂。”

尼·谢·赫鲁晓夫在一旁斗胆说：

“斯大林同志，那里以前已经有好多外国工厂了，共产党刚在中国取得政权，如果现在苏联，一个社会主义伙伴国家，也要在中国去建立自己的工厂，那肯定会伤害毛泽东的。”

斯大林拒绝了赫鲁晓夫的意见，电报照样拍了出去。两天后，斯大林收到了中国人的回电。毛泽东在电报中说：

**“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假如你们对菠萝罐头有兴趣，可以给我们一笔贷款，由我们自己来建一个罐头厂。我们用这个厂生产的罐头来偿还你们的贷款。”**

毛泽东自然也不会忘记：1949年1月米高扬在西柏坡要吃活鱼的傲慢神态。本来吃东西并不讲究、连死鱼、剩鱼都吃的毛泽东，现在却对随行的中餐厨师严格下令说：

**“你只能给我做活鱼吃，他们要是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出去。”**

果然，苏联人送来的鱼全是死鱼。厨师遵照毛泽东的命令，给挡了回去。苏联人慌了，找来翻译一问，才知道毛泽东只吃活鱼，不吃死鱼。苏联人只好向中国客人郑重保证，马上抓活鱼送来。自此，克里姆林宫的大小人物都知道，毛泽东吃鱼很讲究，不是活鱼不吃。

12月16日傍晚，毛泽东前往克里姆林宫拜会斯大林。

晚10时整，斯大林率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在他办公室的小会议厅里迎接毛泽东。毛泽东一进入敞开着的门厅，斯大林便站起身来，离开办公桌走上前去，毛泽东也快步走过去，同斯大林紧紧握手。斯大林说：

“你好！欢迎你的光临！”

毛泽东也热情地说：

“非常高兴见到您！”

斯大林又是握手，又是拥抱。这是他们二人的第一次会面。斯大林注视着毛泽东，端详了一下，高兴地说：

“欢迎你来苏联访问。想不到你还很年轻嘛，很健壮嘛。”

毛泽东说：

“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及我个人向斯大林同志和在座的苏联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元帅同志们问好！感谢你们对我的邀请。”

斯大林回过头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等一一介绍给毛泽东。大家在大厅内围成一圈，互相问好祝愿。斯大林非常激动，对毛泽东赞不绝口，他说：

**“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

毛泽东说：

**“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斯大林在为自己在中国问题上出过一些不正确的主意而深感内疚，他赶紧截住毛泽东的话头说：

**“你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宾主在大会议桌两旁落座，双方会谈开始。一边是苏联有关领导及翻译费德林，坐了一长串，斯大林坐在中间。一边是毛泽东，还有翻译师哲。斯大林说：

**“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国际革命的力量的砝码加重了。我们真心诚意地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含笑说道：

“中国人民的胜利离不开苏联人民的支持和帮助，我代表中国人民衷心地感谢苏联人民和斯大林同志，愿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

斯大林关切地问道：

“中国的战事是否会很快结束？”

毛泽东说：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陆上的作战非常顺利，很快就会把国民党军彻底逐出大陆。只是在海上岛屿作战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这并不能阻挡人民解放军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步伐。”

斯大林取下叼在嘴上的烟斗，笑着问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你这次远道而来，很不容易，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不能空手回去，你有什么要求？我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你有什么想法和愿望？”

毛泽东委婉地说：

**“我这次来，一来是为您祝贺寿辰，二来是看看伟大的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然后，中苏两国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斯大林和苏方人员不懂毛泽东这种富有哲理又很幽默的语言，一个个目瞪口呆。毛泽东不愿意亲自与苏联人谈具体问题，他对斯大林说：

“我想叫周恩来同志来一趟。”

斯大林不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惊讶地反问道：

**“周恩来是什么人？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来？请他来干什么？”**

毛泽东见斯大林不明白他的意思，不高兴地说：

“周恩来同志是中国的总理。他来了，就可以商量一些事情了。”

双方会谈进行了2个小时，将要结束时，斯大林对毛泽东说：

“我们想得到你的著作，可以把你的著作译成俄文。”

毛泽东说：

“我正在审阅我的著作。我计划在1950年春季完成审阅工作。我想得到苏联同志的帮助：第一，同俄文翻译一起搞好译文。第二，在编辑中文原稿方面得到帮助。”

斯大林愉快地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推荐了曾在三四十年代担任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院长、国家联合出版社社长、苏联科学院哲学所所长的哲学博士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尤金。他还说：

“这个人你们不熟悉，他有理论修养，我们经常使用他，你看合适不合适？”

毛泽东说：

“这样的人最好。”

欲知此后毛泽东在苏联的活动情形，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据赫鲁晓夫回忆，斯大林曾经向毛泽东提出请求，由苏联在中国建立橡胶园和菠萝罐头厂。毛泽东均以维护国家的主权为原则，**巧妙地婉拒了友邦**。这一类外交事务值得后人深思：是主权重要，还是蝇头小利重要？为了眼前利益，放弃主权、出卖资源而引狼入室，到底是功是过？

**第8章**

“**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我们必须**

**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

话说1949年12月18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详细地介绍了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的情况，他在电文中写道：

“一、我们一行于16日上午12时到莫斯科，住斯大林别墅。下午10时谒见斯大林元帅，情意恳切，谈两小时。谈了和平可能性，条约、借款、台湾及毛选出版等项问题。我方为我一人。苏方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及维辛斯基等4人参加，是一小型会谈。师哲、费德林二人当翻译。

二、**斯大林说，美国人很怕打仗，美国人叫别人打，别人也怕打。看他这种说法，仗是很难打起来的，和我们的估计一样**。

三、**关于条约问题，斯大林说，因为雅尔塔协议的缘故，目前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如果改变原有的，重订新的，就会牵连到千岛群岛的问题，美国人就有理由要拿走千岛群岛。**因此旅顺为苏联租借30年多一点，目前在形式上不要改变，但在实质上苏联实行撤兵，由中国军队进驻。我说撤得太早也不利。他说可想办法使苏联撤兵不成为袖手不管让中国同志独当其冲。他的意见是，签一个声明，照上述内容解决旅大问题，如此即可使中共取得政治资本。**我说，照顾雅尔塔协议的合法性是必要的。惟中国社会有一种感想，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似乎失了存在的意义。他说，原条约总是要修改的，大约在两年后可以修改。**

四、关于是否要中国外长来此的问题，他说签订一个声明似乎外长不来也可以。我说，待我考虑一下是否连借款、民航、通商等事一起同时签订协定，如果同时鉴定协定，则外长似宜来此。

五、请你和恩来商量并召集政治局诸同志加以讨论，目前是否有签订一个简单通商协定（包括新疆在内）规定每年交换货物的品种及总数量之可能与必要，以便决定恩来是否来此。同时对上述条约问题提出意见，速告为盼。”

12月18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份给林彪的关于“渡海作战必须注意的问题”的复电，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中央转）：

10日14时电悉。

1. 庆贺你们歼灭白崇禧的伟大胜利。

二、同意你的部署，即陈赓略作休整即入云南，4野入桂各军休息20天，大部分散剿匪，另以43军及40军准备攻琼崖。

三、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3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力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因为潮水需12小时后第一次载运船只方能返回运第2次，而敌可用海空军切断我之运输，故非选择时机一次载运一个军渡海登陆，并能独力攻进，建立基地，取得粮食，便有后援不继，遭受重大损失之危险。**3野叶飞兵团，于占领厦门后，不明上述情况，以3个半团9000千人进攻金门岛上之敌3万人，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灭。你们必须研究这一教训。**海南岛之敌，可能较金门敌人战力差些，但仍不可轻敌。**请告邓、赖（即邓华、赖传珠——笔者注）及40军、43军注意，并**望你向粟裕调查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以免重蹈金门覆辙**。

四、湖南省政府可于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改组。但**程潜除任中南副主席外，其湖南军政委员会仍应存在，即使无具体工作，留一招牌亦有作用。**此点程在京时，我已向他当面谈过，请加注意。

五、关于城乡、公私、工商、劳资等相互关系，比重问题，已托邓子恢同志向你转达，有何意见，望告。关于军队参加生产问题，请回汉口后统筹办理。

六、整个中南6省的工作重心，已由军事转到经济与土改，希望你们于明年1月间成立中南军政委员会，集中力量领导全区经济工作，并积极准备土改条件。

毛泽东 12月18日于远方

此时，林彪已任命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为渡海兵团最高指挥员，由他与15兵团政委赖传珠、副司令员洪学智组成了渡海兵团指挥部。

担任渡海作战任务的部队是15兵团以李作鹏为军长的第43军、以第12兵团副司令员兼40军军长韩先楚率领的第40军，另外还配属加农炮、高射炮各1个团与工兵一部，总兵力达到10万人。

12月20日，刘少奇按照毛泽东18日的电文精神，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会议一直开到21日凌晨才结束。

12月21日凌晨，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在会议结束后，联名致电毛泽东说：

“今日政治局会议，大家赞成如果苏联同意现在签订关于旅顺、借款、航空及通商协定，恩来同志即去莫斯科一次。”“但是如果苏联方面并不准备现在签订借款、航空、通商诸协定，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

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大寿诞辰，苏联政府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了盛大的祝寿活动。

毛泽东在王稼祥陪同下，参加了斯大林70寿辰的庆祝活动。他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向斯大林敬献了绣有“福如东海”的横匾；宣读了给斯大林贺寿的礼单：中国精美的陶瓷、湘绣、茶叶、竹笋等和山东出产的5000斤大黄芽白菜、5000斤大萝卜、5000斤大葱、5000斤大梨。

在庆祝大会上，斯大林让毛泽东居各国兄弟党领导人之前，紧挨着自己并肩站在一起。按照祝寿活动的安排，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代表讲话后，将有13个外国领导人讲话。在这13个外国领导人中，毛泽东被排在了第一个。毛泽东在致词中说：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我这次能参加庆祝斯大林同志70寿辰的盛会，衷心至为愉快。

斯大林同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事业作了极其杰出和及其宽广的贡献。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到斯大林同志的友谊的重要性。

在这个盛会上，我谨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庆祝斯大林同志的70寿辰，祝福他的健康和长寿，祝福我们伟大友邻苏联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幸福与强盛，并欢呼世界工人阶级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空前大团结。

毛泽东的祝词受到热烈欢迎，全场与会者两次起立，长时间地鼓掌。毛泽东最后高呼：

“世界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伟大的斯大林万岁！世界和平与民主的堡垒苏联万岁！”

他的致词一结束，全场再次起立，长时间地鼓掌。斯大林在热烈的掌声中，与毛泽东亲切握手，把大会热烈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是日晚8点，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为庆祝斯大林70寿辰举行盛大的宴会，宴请了各国来宾。毛泽东、陈伯达、王稼祥、朱仲丽、师哲、叶子龙、汪东兴、陈秉承、沈剑心、李家骥、田树彬、孙维世都参加了宴会。

斯大林和毛泽东坐在一个包厢里，菜肴、酒水和点心摆满了一桌子，凉菜很多，热菜只有3道。毛泽东首先向斯大林敬酒，各国代表也轮流向斯大林敬酒。

席间，穿插着各种文艺节目，有音乐、舞蹈、杂技等。演出结束后，观众都回过头来欢呼：“斯大林！毛泽东！”“毛泽东！斯大林！”

毛泽东举手向群众致意，高呼：“斯大林万岁！光荣归于斯大林！”

全场的欢呼声、口号声和掌声，响成一片，经久不息。宴会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1时才结束。

毛泽东不习惯苏联这种马拉松式的宴会方式，宴会一结束，他感到很累。王稼祥安排他来到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办公楼上休息。这是一栋旧式洋楼，有一个不大的院子，毛泽东住在2楼，他说：

“我不知道苏联的宴会怎么这样长，吃也没吃好，看也没看好，鼓了一晚上掌。我们回去不能学这个。吃饭就好好吃饭，看戏就好好看戏。**宴会的人那么多，每道菜一人一份，他们的服务员真太辛苦了。**”

12月22日5时，毛泽东回到驻地休息。

12月22日下午4点30分，王稼祥夫妇来到毛泽东下榻处。王稼祥报告毛泽东说：

“主席，现在波兰、捷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都表示，想和我们做生意。”

毛泽东说：

“好啊，这是好事。我们也愿意同他们做生意。这样**除了苏联以外又有3个国家即将同我们发生通商贸易关系。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英国、日本、美国、印度也会有生意和我们做。**”

他立即约见苏方联络员科瓦廖夫来谈话，并要求他把这次谈话记录转交斯大林。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希望在12月23日或24日举行预定的会见，商谈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协定等问题；还有拟请周恩来到莫斯科完成协定签字手续。

12月22日晚，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说：

“**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已与斯大林约好23或24日谈一次。”

12月23日下午6时，王稼祥来向毛泽东报告说：

“苏共中央政治局及斯大林同志从明天开始同我们会谈。”

毛泽东决定，由王稼祥、陈伯达参加谈判，师哲为中方翻译。

12月24日晚，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第2次会谈。这次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关问题，包括越南问题、日本问题、印度问题、西欧问题等。

据汪东兴1949年12月24日日记记载：“今天，毛主席和斯大林开始正式会谈。我跟着主席去了，因会谈戒备森严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就在克里姆林宫值班室里等候。5小时后会谈结束，回到驻地，毛主席问我：‘吃过东西没有？’我说：‘喝了一瓶汽水。’毛主席说：‘等的时间太久了，下次不要跟去了，让苏方负责保卫安全，你们在驻地等我。’”

12月25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会谈的情况，其中写道：

“昨（24）日晚11时半第2次会见斯大林同志于他的别墅（我们住的是他的另一个别墅），长谈5小时半，到今晨5时才毕。一面吃饭，一面谈话，极为酣畅。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陈伯达、王稼祥、师哲等7位同志参加，谈了很多问题。”

12月25日中午，斯大林与毛泽东通了电话。

据汪东兴12月25日记载：“中午，苏联上校报告说：‘斯大林同志有电话来，请毛泽东主席接电话。’毛主席通过翻译孙维世与斯大林交谈。斯大林同志在电话中十分关心毛主席在苏生活是否习惯，表示要前来看望，但他的保卫人员和保健医生不让他出门。毛主席对此表示感谢，劝他不要来了。从北京出发时我带了一本书《瀛台泣血记》，到莫斯科后抽空看了三分之二。毛主席在我坐的椅子上发现了这本书，借去看了。晚上，我们看了一个卓别林主演的喜剧片。”

12月26日晚7时，毛泽东与斯大林继续会谈。

据汪东兴12月26日记载：“毛主席起床后，叶子龙同志向主席报告说：‘王稼祥同志来电话说今晚7时继续会谈，他晚6时左右来接主席一起去。’今天的会谈一直进行到夜里12时才结束。”

在这次会谈中，斯大林将苏联派往东北铁路系统的专家科瓦廖夫写给他的一封信，交还给了毛泽东。斯大林解释说：

“这封信是科瓦廖夫自己写的，不是我们授意的。他不是搞政治的，只是一个技术人员，却往政治里钻，这是很不恰当的。”

毛泽东接过来这封信，看了一遍，一笑了之。他心里明白，这封信是高岗专门授意科瓦廖夫写成的，并请科瓦廖夫把信寄给了斯大林。在这份材料中，高岗搜集了刘少奇在天津对发展民族工商业问题的讲话；罗列了周恩来在组建政务院中任用的民主人士，某某某是反动派，某某某是满清的遗老遗少。

汪东兴在这天的日记中还写道：“毛主席处理完国内的事在会客室里散步，推门出来看我在看书，问我：‘又在看什么书？’我说：‘在中国大使馆借了一部《水浒》。’主席说：‘《水浒》这部书有100回本，有120回本，你看的是哪种？’我说：‘我借的这部是120回的线装本。’主席说：‘有时间就看点书是增加知识的办法之一。孔子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12月27日，莫斯科已经下了整整一天一夜的雪，地上的积雪有一尺多厚。毛泽东起床后见雪下得很小了，就边穿衣服边往外走。卫士们提醒他别感冒了，他好像没有听见一样，径直走到外面去了。

毛泽东轻轻地踩在雪上，顺着墙根走，裤腿上鞋里全是雪。他走了几步，便驻足观赏起来，完全沉醉在美丽的雪景之中。就在他身后的不远处，几个卫士和俄文翻译们像孩子一样打起了雪仗，一个卫士用雪团打中了孙维世，孙维世一边笑骂他坏，一边抓起雪团还击。毛泽东扭头一看，孙维世简直成了“白雪公主”，便也笑嘻嘻地加入了战团，从侧面袭击她，竟然正好打在她的衣领里，在场的人忍不住都哈哈大笑起来。

12月28日深夜，毛泽东对汪东兴说：

“等我把国内的事情处理完了，我有话对你讲。”

办完公，毛泽东把汪东兴叫来，对他说：

“最近，斯大林同志交给我一份关于中国内部问题的信，这封信涉及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矛盾。我们党内有些同志很有本事，他提供材料，让别人写，跑到洋人这儿告洋状了。你知道什么叫告洋状吗？”

汪东兴说：

“就是向洋人告状嘛。”

毛泽东点点头，不再说什么。

12月29日，毛泽东起床后在院内散步。他喜欢走积雪厚的地方，苏联上校怕他冻坏脚，劝他不要走积雪厚的地方。毛泽东让孙维世告诉他：

“雪是干净的，下过雪后，空气新鲜，对人体有益，踩完了雪回到房内换一下鞋袜，不至于冻坏脚的，请上校放心。”

接着，毛泽东关于“可在先头阻止李弥余程万部向越南缅甸前进”问题致电刘少奇：少奇同志：

请告刘邓转知卢汉及云南我军，只可在李弥、余程万之先头阻止其向越、缅前进，不可向其后尾威胁或追击，以免该敌过早退入越南。卢汉及我军均应向该敌进行政治工作，策动该敌起义。

毛泽东12月29日

是日晚，吃过晚饭后，毛泽东同工作人员一起看了一个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记录片。尔后，他办公到深夜方才休息。

12月30日，印度继缅甸之后承认了新中国。

此时，英国也想承认新中国。

12月30日下午2时，王稼祥来到毛泽东住处，他说：

“现在各国驻苏大使、新闻界人士正在打听主席的行踪，纷纷议论说毛主席不知去向了。”

毛泽东听了大笑起来，他说：

“毛泽东现正在莫斯科某地休息，怎么不知去向了？”

王稼祥说：

“有一个星期报纸上未见报道你的活动了。”

毛泽东说：

“近来确实外事不多。坐冷板凳。”

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布由毛泽东起草的祝贺新年告前线指战员和全国同胞书：

【新华社北京31日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今日发表告前线指战员和全国同胞书，热烈地祝贺新年，祝贺1949年所获得的伟大历史胜利，并提出了1950年的任务，全文如下：

第1野战军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张宗逊、赵寿山诸同志，第2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诸同志，第3野战军陈毅、饶漱石、粟裕、谭震林诸同志，第4野战军林彪、罗荣桓、邓子恢、谭政诸同志，全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全国同胞们！

当1950年的新年来临之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向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致热烈的祝贺，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在1949年内所获得的伟大历史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将士忘我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积极的支援之下，在1949年内已经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歼灭了敌军260万人。由于这个伟大历史胜利，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已被永远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被巩固地建立起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在1950年的光荣战斗任务，就是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歼灭蒋介石匪帮的最后残余，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不让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我们的领土上有任何立足点。

随着战争的胜利结束，中国人民已经可能并且必须把主要的力量逐步转入和平建设工作。中国人民在1950年需要医治战争创伤，克服战后的财政经济困难，恢复工农业生产和交通事业。在这些方面，应该获得比1949年更大的成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相信，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全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必能胜利地完成自己的伟大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万岁！

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49年12月31日

是日下午，毛泽东对身边的人说：

“今晚要过年了，在国外过新年我还是第一次，在伟大的苏联莫斯科过新年更有意义。晚饭除苏联菜外再加两个中国菜。明天吃饺子就难办了。”

工作人员说：

“毛主席想吃饺子，大使馆可以包好了送来。”

毛泽东说：

“我是吃米饭长大的，北方人不吃饺子过不了年。”

接着，毛泽东关于“进攻海南岛应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为原则”致电林彪，他写道：林彪同志（中央转）：

转来邓赖洪27日电已悉。同意该电所取方针，即努力争取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但**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卒莽撞造成过失。为此，邓赖洪应速到雷州半岛前线亲自指挥一切准备工作，并且不要希望空军帮助。**

毛泽东 12月31日

这天下半夜，毛泽东办完公，在会客室向汪东兴要海南岛的地图看。他边看边说：

“海南岛现在正是好季节，我军要解放海南岛不要错过好时机。”

1950年1月1日，《人民海军》报创刊号刊登了毛泽东为该报的题词：

　　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毛泽东

1月1日这一天，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致电毛泽东。

胡志明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我个人方面，曾经有过两个时期荣幸地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4—1927年，我到广州，一方面注意着我国的革命，一方面从事着中国共产党交给的工作。当时，中国工农运动正蓬勃发展，农民运动已开始扩大，尤其是在湖南（由毛泽东同志领导）。”“为了推动农民运动，毛泽东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我参加了翻译内部材料和对外宣传工作。”在此期间，胡志明参加了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二大”，并获准在会上发表演讲，由李富春任翻译。胡志明所说的另一个时期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于1938年底从莫斯科经新疆、西安到达延安，住在枣园。后来，中共中央按照他的要求，安排他以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八路军工作人员的身份，南下衡阳和西南各省考察。1942年8月，胡志明在广西边境被国民党逮捕；一年后经周恩来委托冯玉祥帮助获释，遂留在广西活动，直到1944年9月回到北坡附近，直接领导越南革命运动。

胡志明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写道：

“越中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今后这种友谊将更加紧密起来，进一步发展两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并保卫世界的和平。”

元旦这天下午，苏方联络员科瓦廖夫和翻译费德林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终于忍不住发火了。此时，他来到苏联已经十几天了，前来为斯大林祝寿的其它外国领导人早已都走了，而他还在这里坐冷板凳，实在窝火得很。他说：

“我到莫斯科来，不是单为斯大林同志祝寿的。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干，我们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睡觉的吗？我现在的任务是3个：吃饭，拉屎，睡觉。**你们还要保持跟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

科瓦廖夫和费德林马上将毛泽东的谈话向斯大林做了汇报。后来经过王稼祥的联络和说明，斯大林这才了解了毛泽东所说的搞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的真实意图。马上同意让周恩来到苏联，进行中苏之间的谈判工作。

再说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北京，他在电文中写道：

少奇转乔木：

广西全境、广东之南路及雷州半岛，西南全境（除李弥、余程万二部及西昌胡宗南一部外），西北全境，残敌均已肃清。请用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致各野战军的贺电，电稿写好后告我看一下再发。

毛泽东

是日晚，毛泽东接到北京转发来的彭德怀12月30日的电报。

此前，彭德怀根据毛泽东11月23日的电报指示，将西北军区联络部长范明对西藏的调查结论，向中央和毛泽东据实禀报，他写道：

中央并报毛主席：

1、前电示准备1950年夏秋配合进军西藏，据调查由哈拉木伦山口，经奇里湖塔木萨齐到日喀则之线，以西属后藏，以东属前藏，全藏人口不到200万。前藏拉萨附近地区及雅鲁藏布江流域人口较密，农业为主，畜牧次之。后藏多属游牧区，住居不固定。从于田、和田翻越昆仑山至西藏边境黑河由盐湖，需行17天，纯小路，骡马不能通行，人烟稀少。据闻，由黑河由盐湖至拉萨，骑行需要40天，一说需两个月。从南疆入藏甚为困难，飞机飞越昆仑山亦须特种装置。另哈什噶尔经浦犁、帕米尔高原东腹道，驮马可行，唯须经印度境内，东行入藏。北路好走，但因政治限制，故不可能。

2、由青海大河坝经博塞图库特尔别里布图、经唐古拉山口（即青康藏3省交界上系雪山，须5天才能通过积雪），黑河至拉萨，此道步行须2天半，除接近拉萨之3天系农业区外，全系游牧区。

3、由青海玉树经西康、恩达、嘉黎、太昭至拉萨，此路较上述之大路易走，唯大河坝、玉树至昌都北系游牧区，昌都嘉黎、太昭系农业区，可就此取部分粮食。

总之由青海、新疆入藏困难很大，难以克服。由打箭炉分两路，一路经理唐、科青，一路经甘孜、昌都。两路入藏，较青、新两路均易。如入藏任务归西北，须在和田、于田、玉树屯兵屯粮，修筑道路，完成入藏准备，需要两年。且由南疆入后藏及由大河坝入前藏两路每年只有4个月（即5月中旬至9月可通行，其余8个月，因大雪封山不能行动）。

4、兰州、西宁两处，现在藏民训练班共约300人（系甘、青两省藏民）。松潘、懋功亦派有代表数十人，到兰州致敬。班禅已回西宁塔尔寺。如入藏归西南军区担任，上述藏民群众训练班，将来可能争取部分送2野随军入藏。

彭德怀

毛泽东连续看了几遍，心事重重。他相信彭德怀的调查不会错，由西北入藏不可能，只有从西南进军了。

1月2日凌晨4时，警卫撤走第2个丢满烟头的烟灰缸，毛泽东伸了伸懒腰，把拟好的电报稿交秘书火速发回国内。他又问汪东兴说：

“2楼除陈伯达和你住的房子外，是否还有空房？”

汪东兴说：

“还有1间主房。”

毛泽东说：

“这间房留给总理用，等总理一行来莫斯科后，你从2楼搬下来，把你的房间让给总理的随从人员住。”

“照主席的意思办。”

工作人员马上把毛泽东起草给中央和彭德怀并转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的电报，发了出去。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上写道：

中央、德怀同志并请转发伯承、小平、贺龙3同志：

1、德怀同志12月30日关于西藏情况及入藏路线的电报业已收到阅悉。此电请中央转发刘邓贺3同志研究。

2、**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和解放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3、既然由西北入藏每年只有5月中旬至9月中旬共4个月时间可以通行，其余8个月大雪封路，不能通行，则由西康入藏之时间恐亦相同。而如果今年4月中旬至9月中旬不向西藏进军，则须推迟至1951年才能进军。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4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占领西藏。为此，建议：甲、请刘邓贺3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1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乙、迅速占领打箭炉，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丙、由现在（1月上旬）至4月中旬以前共3个半月内，被指定入藏的军队，应争取由打箭炉分两路，推进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区，修好汽车路或大车路，准备于4月中旬开始入藏。丁、收集藏民，训练干部。戊、闻西藏只有6000军队，而且是分散的，似乎不需要我在上次电报中提议的3个军，而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4个师共约4万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用，唯需加以特殊的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器。己、入藏军队可定为3年一换，以励士气。

4、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西南刚才占领，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现又给以入藏任务，但因任务重要，且有时间性，故作如上建议。这些建议是否可行，请西南局筹划电复为盼。

毛泽东 1月2日上午4时于远方

刘伯承、邓小平在重庆曾家岩接到毛泽东1月2日的电报后，来回传阅了两遍。刘伯承把手插在袖管里，邓小平则不停地抽烟。

此时，从地理位置和经济、时间上看，最适合入藏的是占领西康省会雅安的贺龙的62军，可是，毛泽东已经点明2野是主力，总不能把这个最艰巨的任务推出去吧！而在2野3个兵团9个军中，10军的战斗力最强，派他们去最合适。可是，10军军长杜义德身体差，进藏有困难。刘伯承和邓小平商量来商量去，颇费脑筋。邓小平说：

“让‘地主’去吧？”

刘伯承被邓小平说糊涂了，问道：

“谁？”

“张国华。”

张国华因为他的18军以前的随营学校干部多，被战友们戏称为“地主”。经邓小平点明，刘伯承才醒悟了，笑着说：

“我也正在打他的主意，好，就叫他去！”

1月2日，苏共《真理报》头版头条刊登《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答记者问》，内容如下：

记者问：中国目前的情况如何？

主席答：中国的军事正在顺利进行中，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转入和平的经济建设。

记者问：毛泽东先生，您在苏联将逗留多久？

主席答：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要的时间。

记者问：您现在考虑的是哪些问题？可否见告？

主席答：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它问题。此外，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城市和地方，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

《答记者问》发表后，谣言不攻自破。毛泽东在散步时高兴地说：

“我曾讲过，帝国主义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

1月2日下午8时，莫洛托夫、米高扬奉斯大林之命，在王稼祥陪同下，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征求毛泽东对中苏新条约的意见，并安排毛泽东一行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观等具体事宜。在谈到中苏签订条约的事情时，毛泽东说：

“中苏签订新的友好同盟条约，使中苏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固定下来，这样做对双方都有极大的利益。”

莫洛托夫说：

“是新的条约，周恩来总理可以来莫斯科谈判签约。”

1月2日晚11时，毛泽东致电中央，通报了在莫斯科出现的新情况，他写道：

中央：

一、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昨1月1日决定发表我和塔斯社记者谈话，已见今日（2日）各报，你们谅已收到。今日下午8时，莫洛托夫、米高扬二同志到我处谈话，问我对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我即详述3种办法：

（甲）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的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它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不要来。（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

当我详细分析上述3项办法的利害之后，莫洛托夫同志即说，（甲）项办法好，周可以来。我仍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同志说，是的。随即计算周来及签订条约的时间。我说，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同时又谈到我外出游览的问题，商定晋谒列宁墓，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看一看，并看一看兵工厂、地下电车（这两项是莫、米二同志提的）、集体农庄等处。又谈到和苏联各负责同志谈话的问题（到现在我还没有出门去单独看过他们任何一人）。

二、你们收到此电后，请于5天内准备完毕。希望恩来偕同贸易部长及其他必要助手和必要文件材料，于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不是坐飞机）来莫斯科，由董必武同志代理政务院总理。对外不要发表，待周到莫后才发表。

三、以上是否可行，5天准备时间是否足够，是否还需多一二天准备时间，有无叫李富春或其他同志同来协助之必要，均请考虑电复。

毛泽东 1月2日下午11时

1月3日凌晨4时，毛泽东再次致电中央，进一步说明签订新约的意义，他写道：

中央：

昨日下午11时电谅达。恩来同志出国来苏须在政务院会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旧条约比较在旅大问题上可能有部分地变更，但具体内容尚待谈判。为防御日本及其同盟者的可能的侵略这一目标及承认外蒙独立则仍为新约的基本精神）**，贷款协定（我们提出的要求是3万万美元，分几年付支，我们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是因为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民航协定（有利于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及贸易协定（和苏联确定易货范围对于我们确定发展生产的方向是有利的，同时亦有利于和其他外国订立通商协定）。此外还应约集政府委员之在京者开一座谈会作同样报告。在两次会议上，应指出**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毛泽东 1月3日上午4时

欲知毛泽东在苏联期间的下一步活动情况，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在毛泽东逝世后，“外蒙独立”这个复杂的历史问题，成了国粉一类人颠倒历史的一个小插曲，说是毛泽东把外蒙古丢了。只要查一查历史资料就会看到，早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外蒙古就趁着各省宣布独立之机，开始酝酿“独立建国”。1921年11月25日，蒙古人民党在俄国帮助下，成立了蒙古君主立宪制政府。1924年11月26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并宣布独立**。对此，**北洋政府不予承认**。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在《雅尔塔协定》中规定：“**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雅尔塔协定》关于中国问题的规定。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承认了外蒙古独立**。那么，毛泽东是怎样对待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呢？请看：1949年12月18日，正在访苏的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说：“**关于条约问题，斯大林说，因为雅尔塔协议的缘故，目前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如果改变原有的，重订新的，就会牵连到千岛群岛的问题，美国人就有理由要拿走千岛群岛。**”“**我说，照顾雅尔塔协议的合法性是必要的。惟中国社会有一种感想，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似乎失了存在的意义。他说，原条约总是要修改的，大约在两年后可以修改。”**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电报中，又提出了在不签订新条约情况下的一种设想，他说：“**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它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权衡再三，毛泽东在1月3日给中央的电报中强调了签订新约的好处，他说：“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由此看来，毛泽东是不承认外蒙古独立的，但从大局着想，接受了斯大林提出的“**原条约总是要修改的，大约在两年后可以修改**”的意见。后来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当毛泽东又提出外蒙古回归中国的问题时，赫鲁晓夫却拒绝讨论外蒙古问题**。此后，苏共蜕变，中苏交恶，斯大林原来提出的“**原条约**（中华民国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总是要修改的”**机会，就一直没有出现。这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怎么可以说是毛泽东把外蒙古弄丢了呢？

**第9章**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先建立汽车制造厂，然后建立拖拉**

**机厂，再后建立坦克制造厂、飞机制造厂。轻工业方面原来**

**有点旧厂子，如食品厂、纺织厂、造纸厂、卷烟厂、糖厂，**

**这些工厂正在修理，逐步恢复生产。”**

话说1950年1月4日晨，毛泽东给刘少奇和江青发了一封电报。

原来，江青在1950年1月1日给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发来了一封电报，在电报上提出请求，要到“新解放区”去看一看。毛泽东历来是遵守党纪的带头人，并且对家人的要求也特别严格，在给刘少奇转江青的电报上，他是这样写的：

少奇同志阅转江青：

1月1日来电已悉。同意你去新区看一看，但须得少奇同志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话，则应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由中央组织部写介绍信给新区党的组织。因此还须和廖鲁言同志谈好，并得到他的同意。**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以上统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做决定。

毛泽东 1月4日上午4时

江青这次出行，维克多曾在《江青同志》一书中描述说：

“由于渴望参加中国东部的土地改革运动，她乘上了去上海的火车。”“当她乘坐的火车驶进火车站，她发现了高岗和饶漱石。他俩分别主持党的东北局和东南局。”“很明显他们已知道了她的计划。她一踏上上海站台，他们就提出在他们认为是‘他们的管辖区’内，由他们安排她的所有活动。她大多是与饶漱石打交道。一到上海，她就告诉他，她想直接下到农村，开始有关土改的调查。他以许多特务正在附近活动而无法保证她的个人安全为由阻止她。他频繁地来看她。有一天，她决定去上海市区逛商店，饶漱石坚持陪她去商场，不管她是否想单独去。从那以后，她不是被一个安全局的局长陪同，就是饶漱石书记亲自陪同。不论到哪里，他们都是被持枪的秘密特工所包围，使她感到好像要被绑架，总使她回忆起早年在上海的日子里惊恐的感觉。”“他已经显示出对她的负责，但是又不知怎样能使她很自然地感到高兴。一天，他邀请她参加他主持的党委扩大会议，首先把她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他坐在江青对面，在介绍时戏谑地称她为‘朝廷特使’。这激怒了她，但她没说什么。”“既然她不能到任何地方，她就求助上海市市长陈毅，告诉他，她感到灰心丧气。他鼓励她出来见一些文化圈里的人士，她对这个圈子有着个人和职业上的密切关系。因为太忙不能陪同她，陈毅指派副市长潘汉年陪她去剧院、电影院和参加发生在那时的其它文化活动。”

江青在上海期间，一度离开上海，前往无锡，考察了茶叶业和丝绸业，然后返回上海。不久，江青又到了武汉郊区进行考察。2月初，由于天气寒冷，她在一场寒潮袭来时患了感冒，由感冒而咳嗽，进而演变成为支气管炎。江青不得不从武汉近郊农村回到武汉治病。在武汉治疗了一段时间，效果也不怎么好。她终日低烧，失眠，特别是右肋下时有疼痛。江青只好离开武汉返回北京。途经济南时，她乘便下车回到故乡探望亲人。这是她去延安之后第一次回老家。令她最为痛心的是，母亲栾氏已经在1948年年初病故了。江青对母亲感情很深，在哥哥李干卿和警卫员的陪同下，来到母亲墓前，大哭了一场。李干卿在和妹妹闲聊时说：

“因你从香港给我寄钱来，宪兵队把我找了去，打我，让我给你写了两封信，你收到了吗？”

江青说：

“我都知道了，以后不要再说这些事啦。”

回到北京以后，经医生会诊，江青得的是慢性胆囊炎，肝也不好。自此以后，她便一边工作一边治病。

再说1月8日，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在重庆西南军区所在地致电中央并转毛泽东，表示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决定由18军担任入藏的任务。同时提请：在康藏两侧之新疆、青海两省及云南邻省各驻防部队，如可能时则予以协助。

1月10日，周恩来率领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以及赖亚力、柴树藩、程明升、常彦卿、沈鸿、苏农官、王勋、聂春荣、罗维、何谦，还有新疆的赛福鼎和邓力群。

1月10日，毛泽东复电中央并转刘、邓、贺及西北局，他在电文中写道：

中央并请转刘邓贺及西北局：

1. 完全同意刘邓贺1月8日电之进军西藏计划。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

二、按照彭德怀同志所称，4个月进军时间是从5月中旬算起，则由1月中旬至5月中旬尚有4个整月的准备时间（我前电写成3个半月是写错了）。只要刘邓贺加紧督促张国华及18军等部，在时间上是来得及的。

三、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叫什么名称及委员人选，请西南局拟定电告中央批准。这个领导机关应迅即确定，责成他们负责筹划一切，并定出实行计划，交西南局及中央批准。西南局对其工作则每半月或每月检查一次。第一步是限于3个半月内完成调查情况，训练干部，整训部队，修筑道路及进军康藏交界地区。有些调查工作及干部集训工作，需待占康藏边界后才能完成，并为促成康人内部分化起见，务希于5月中旬以前占领康藏交界一带。

四、关于西北局方面应协助之事项，请西南局与西北局直接遇事商定，并请西北局筹划各项应当和可能协助之事项，指导所属妥为办理。

五、关于中央负责之一部分侦察工作，请聂令二局注意办理为要。

毛泽东 1月10日

接着，毛泽东关于“大力做好解放海南岛的准备工作”给中央转林彪的指示电：

中央转林彪同志：

一、1月6日电及转来邓、赖、洪1月5日电均悉。

1. 既然在旧历年前准备工作来不及，则不要勉强，请令邓、赖、洪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用大力于几个月内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此事是否可能，请询问华南分局电告），**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

三、**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只要能一次运两万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金门岛是3个不同建制的团又无一个统一的指挥官，由3个团长各自为战），就能建立立足点，以待后续部队的继进。**

四、**请要15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并令冯白驹受邓、赖、洪指挥，把琼山、澄迈、临高、文昌诸县敌军配备及敌海军情况弄得充分清楚，并经常注视其变化。**

五、**同时由雷州半岛及海南岛两方面派人（经过训练）向上述诸县敌军进行秘密的策反工作，勾引几部敌军于作战时起义，**如能得到这个条件，则渡海问题就容易得多了。在目前条件下，策动几部敌军起义应该是很可能的。此事应请剑英、方方、冯白驹诸同志特别注意用力。华南分局应加以讨论，定出具体的策反办法，并于3、4个月内获得成绩。

毛泽东 1月10日

1月11日，毛泽东晋谒莫斯科红场上的列宁墓，敬献了花圈。花圈的缎带上用中俄两种文字写着：“献给列宁——革命的伟大导师 毛泽东 1950年1月11日”。

毛泽东的随同人员有：王稼祥、陈伯达、师哲、叶子龙、汪东兴、陈秉承、沈剑心、孙维世、李家骥。

这一天，毛泽东还拜会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

1月14日晚10点，毛泽东在王稼祥及其他随员陪同下，乘火车去列宁格勒参观访问。

1月15日，毛泽东一行到了列宁格勒，在火车站受到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库兹涅佐夫、市委书记利亚诺夫等领导人的欢迎。毛泽东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感谢。库兹涅佐夫等要安排毛泽东到著名的斯莫尔尼宫休息，毛泽东说：

“为了争取时间，不要太麻烦了。还是多看些地方才好。”

毛泽东参观了市内的艺术馆，参观了基洛夫机器制造厂、卫国战争中列宁格勒战线的防御工事和已经成为博物馆的那艘炮击冬宫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他站在巡洋舰前，非常感慨地说：

“伟大的10月革命从这里一声炮响，革命的潮流从此不可阻挡。”

毛泽东一行回到市内，下榻于斯莫尔尼宫。

晚上8点，毛泽东一行出席列宁格勒市委招待会，饭后去基诺夫剧院观看芭蕾舞《巴亚捷尔卡》。演员们的精彩表演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演员们在掌声中6次谢幕。毛泽东派王稼祥登台向演员们献了花篮。毛泽东离开剧场时，全场观众起立鼓掌，他向观众们挥手致意。

第二天，毛泽东要去看看波罗的海。乘汽车来到波罗的海，他看到大海与陆地已被厚厚的冰层连在一起，分不出界限了。下车后，毛泽东在冰层上踱步，举目眺望，激动地说：

“这真是千里冰封啊！”

苏联朋友告诉他说，我们此刻正站在波罗的海的冰层上，冰层的厚度大约有1米至1.5米。毛泽东听罢，笑着说：

“我的愿望是要从海参崴——太平洋的西岸，走到波罗的海——大西洋的东岸，再从黑海边走到北极圈。那时才可以说，我把苏联的东西南北都走遍了。”

陪同人员听到毛泽东如此豪迈而气势非凡的话，纷纷鼓起掌来。毛泽东提出要去看看列宁曾经在芬兰湾住过的茅草房。汽车开到了茅草房附近，很遗憾，茅草房已经完全被大雪覆盖，看不清楚了。

1月17日，毛泽东离开列宁格勒，下午5时回到了莫斯科。

1月17日晚，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份给刘少奇的复电。

原来在1月15日，越南外交部长黄明鉴向周恩来发来照会说：“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政府和人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49年10月1日宣言，宣布承认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增强中国与越南两民族之间的友谊和合作，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互换大使。”这份照会由在京的刘少奇转给了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和正在赴苏途中的周恩来。周恩来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基火车站，与毛泽东电话联系，商定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率先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

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复电中说：

“对越南政府要求建立外交关系，应立即答复同意。起草了一个复文，请于明（18）日广播发表，同时由内部电台发给胡志明。请将越南政府要求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声明，由我外交部转送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

1月1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毛泽东起草的以周恩来名义发表的致越南外长黄明鉴的复电：

“我很荣幸地接到贵部长1950年1月15日要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电报。我现在通知贵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是代表越南人民意志的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愿意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藉以巩固两国邦交及加强两国的友好和合作。特此复电，并希察照为幸。”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正式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准备与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越南将此视为最大的支持。后来，他们把1月18日定为“外交胜利日”。

1月18日下午，莫洛托夫来看望毛泽东，并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月12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一个长篇讲话材料交给了毛泽东。

艾奇逊在讲话中散布谣言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4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莫洛托夫提出建议说：鉴于艾奇逊的谣言，中、蒙、苏3国各发表一个官方声明，对艾奇逊的谣言予以驳斥，以正视听。毛泽东表示同意这种做法。

1月19日晨5时，毛泽东就1月12日艾奇逊的谣言，亲自起草了一个1500字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稿，他写道：

【新华社北京20日电】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本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驳斥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无耻造谣。胡乔木署长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月12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长篇讲演中，造了一连串的谣言。美国帝国主义的官员们以艾奇逊这类人为代表，一天一天地变成了如果不乞灵于最无耻的谣言就不能活下去的最低能的政治骗子，这件事实表示了美国帝国主义制度在精神方面堕落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艾奇逊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4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美帝国主义者们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扫荡之下，除了造作这样的谣言之外，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所谓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走狗，苏联已经或正在或将要吞并中国这种低能的造谣诬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此外不会有别的结果。**……1950年1月14日，被中国人民政府逮捕审判并驱逐出境的前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赏了艾奇逊一个清脆的耳光。据塔斯社1月14日华盛顿电称：“前美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返美后，曾与国务院官员谈话。此次谈话后，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他说，除掉行使共管铁路的条约权利以外，并未看见苏联有监督满洲的任何迹象。瓦尔德同时指出，并未看见苏联有吞并满洲的任何迹象。他回答满洲共产党的政权是否受北京的监督时，瓦尔德称：所有共产党的政府，都是受高度的集中管理。据他所知，满洲乃系共产党中国之一部分。”人们可以看见：在西半球的土地上发生了怎样的故事。一个说：满洲与苏联合并。一个说：并未看见。这两个不是别人，都是美国国务院的有名的官员。

毛泽东要工作人员立即用电报将稿子发给北京“刘少奇同志并告乔木”：“用乔木名义写了一个谈话稿，请加斟酌发表。”

毛泽东还特别要求工作人员：“1、用密码，不可用明码；2、精密校正，不要错字；3、今（19）日必须发出，并使刘少奇同志能于今夜或明晨收到。”

1月19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合法权利”周恩来致联合国电，他写道：

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先生、秘书长赖伊先生，并请转达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各会员国代表团：

1950年1月8日我曾向联合国发出照会，**要求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将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予以开除**，**此抗议照会已承赖伊先生复电表示收到并转达安全理事会各会员国。**

现在我再通知你们，主席先生和秘书长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张闻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会议和参加联合国工作，包括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及其工作的代表团的首席代表。**

我并要求你们，主席先生和秘书长先生，回答我的下列两项问题，即：

一、何时开除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出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我认为这样的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到现在还这样留在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是完全不合理的，应当立即开除出去。

二、以张闻天为首席代表的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何时可以出席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并参加工作。我认为应当迅速出席会议并参加工作。

以上各项，请予速复为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 1950年1月19日

1月20日，周恩来和李富春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苏方把周恩来一行安排在莫斯科东北郊，离毛泽东的住处很远。

下午5时，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对汪东兴说：

“你去把房子调整一下，给总理一行准备房间。”

1月21日，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同时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声明，驳斥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所散布的“**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的谣言。

1月21日晚上，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要向代表团所有成员宣布纪律：1、所有文件不能遗失，不能泄露出去；2、个人不能私自出去会客，有事要请假；3、日常生活中有困难找李富春同志解决，不能向苏方接待部门索要东西。”

1月22日下午，斯大林和毛泽东举行第3次会谈。中方陪同人员有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和翻译师哲；苏方陪同人员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和翻译费德林。斯大林就驳斥艾奇逊谣言一事问毛泽东，中国政府是否发表了声明？毛泽东回答说：

“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

斯大林问：

“胡乔木是什么人？”

毛泽东说：

“是新闻署长，是以他的名义发表声明的。”

**斯大林听了非常不满意，当面指责中方只发表了一个“一文不值”的个人谈话。他还说这打乱了苏方的步调，“给敌人留下了可钻的空子”。**

斯大林一通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激怒了毛泽东。此后，毛泽东好长时间一言不发。周恩来向斯大林作了一些解释。斯大林说：

“今天我们两国领导人开始举行正式会谈。毛泽东同志可以谈一下你的意见。”

接下来，毛泽东和斯大林就中苏条约问题，中国长春铁路问题，旅顺口问题，大连问题等，各自发表了意见。毛泽东说：

“斯大林同志曾经谈到过中苏关系问题是否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现在新中国成立了，形势根本变化了，在新的情况下，我们也认为中苏两国的关系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为好。中苏两国的合作的内容，应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帝国主义国家的重新侵略。”

斯大林说：

“我同意谈判条约问题，还有中长铁路问题、旅大问题、贸易问题、借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等，都需要谈。”

毛泽东说：

“中长铁路问题、旅顺大连问题，可以写在另一个协定中。”

斯大林说：

“可以。中苏条约应是一个新的条约，对《雅尔塔协定》可以不管它。旅顺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限定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个是现在就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

毛泽东说：

“我们同意前一个办法。”

斯大林说：

“大连问题由你们中国自己解决。”

毛泽东说：

“中苏条约中涉及的许多具体问题，我提议双方委托几位同志具体去谈。中方由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去谈。苏联方面请斯大林同志指定。”

斯大林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由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同中方进行具体谈判，起草条约和有关协定。

会谈在主要问题、原则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进行得比较顺利。

两个小时后，会谈结束了，斯大林邀请中方人员到他的住处共进晚餐。斯大林特意把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请到自己的车上，让客人坐在后排主位上，但毛泽东毫不领情。双方的气氛依然很沉闷，**中方翻译师哲为了打破尴尬，自作主张提出请斯大林访问毛泽东的住处，斯大林表示以后可以去。毛泽东听了很生气，对师哲说：**

**“你和他谈的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去作客。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

在斯大林的别墅里，**晚餐也进行得很沉闷。毛泽东仍然余怒未息，一言不发。晚餐结束后，斯大林亲自去放留声机，又命人邀请毛泽东跳舞，被毛泽东拒绝了。主人和客人全都离座走进舞池翩翩起舞，斯大林又让三四个人轮番邀请毛泽东，甚至几次生拉硬拽，毛泽东仍然置之不理，他那高大的身躯就是始终不肯离开座位。**

1月23日，周恩来、王稼祥、李富春与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会谈。苏方拿出了一份“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案。**这个草案是以1945年8月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条约为基础草拟的。**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说：

“**把我们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马上译成俄文，交给他们。他们拿的那个草案对我们无效。”**

1月23日晚，刘少奇不经中央讨论，不经毛泽东同意，对东北局的一份报告作了批示。

此前，东北局就农村出现两极分化，出现了新富农，请示中央组织部：允许不允许党员雇工，允许不允许党员成为富农，是否都应当参加变工组？中组部就此又请示刘少奇。刘少奇为中组部在东北局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了，要将财产交出去也交不出去，将来在实行集体化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即使东北将来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认为当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

写罢批语，刘少奇又同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等进行了谈话。由安子文整理的谈话记录全文如下：

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3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在东北，现在这种农户大概不会超过农民的10%。其中真正富农所占的比例，必然更少。这种有3马一犁一车的较为富裕的农户，在数年之后，可能与应该发展到80%，其中有10%的富农，其余20%的农户，是没有车马的贫农。现在东北，应该使这种中农得到大量的发展。

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据说东北有70%的农户参加了互助。**变工互助之所以能有这样多，就是因为个体经济的破产，农民不得不变工。将来的发展，个体经济都能独立地生产，变工互助势必要缩小。农民发展生产，有了3匹马，还是可以变工的，也可以单干。也唯有发展有3匹马的农户，还参加变工时，才真正是自愿了。

**现在有70%的农户参加变工互助，将来会缩小，这是好现象，证明经济发展了，农民成为中农的更多了，他能够单干了，这也是应有的现象。**70%的农户有了3匹马，将来才好搞集体农庄。因此，现在既要宣传与说明变工互助的好处，但又要允许他单干。

**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要防止急性病。**正因为是两个阶段，所以不能混为一谈，转变得早了，是不对的。六届五中全会的时候，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集体农庄是要使用机器从事大规模生产，它否定了个体经济。例如在一个村庄中建立集体农庄，只应建立一个，若建立两个，开始也可能有，但必然有许多困难，很难办。

苏联在开始实行集体化的时候，曾有30%的农民不肯加入，但为了集体的大规模机器生产，对不愿加入的农民，可以把他的地调剂到农庄的边沿上去。因此，在实行集体化时，个体生产在全国说是可能的，在一个村的集体农庄之中，则不能不加入。而且那时，大家都用机器生产，他却硬要单干也是不会有的。

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是一个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苏联开始集体化也没有机器，但是在国家计划生产之下，各农庄已定了货，一二年内机器工具一定会来，因此集体农庄也能巩固了。如无此种条件，只有马和犁，坚持几年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现在的变工互助，供销合作社，具有培育农民的集体观念的作用，将来加上机器工具的条件，才能够领导实行集体农庄。

**什么叫作剥削？现在还必须有剥削，还要欢迎剥削，工人在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今年关里大批难民到东北去，关外的富农能剥削他，他就会谢天谢地。过去每年有100多万劳动力到东北去，若富农不剥削便不能生活。**

富农雇人多，买了马，不要限制他，现在要让他发展，没有坏处，这不是自流。将来我们对富农有办法，让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将来再予以限制，三五年之后再予以限制，用国家颁布劳动法，把雇农组织起来，提高雇农的待遇，征土地税，多累进一些，多加公粮等办法，予以限制。但事实上那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是很少的，雇农不会多，国家还要大量动员农民到工厂去做工人。斯大林曾经写过信，请求集体农庄动员农民到工厂去。因此，现在限制单干是过早的，现在能够单干是很好的。也不可认为反单干的农民便是集体主义，因为他还无力单干，是不能去单干的贫农。这不是自流，现在让多流出一些富农来也很好。什么才是放任自流呢？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让农民都有3匹马一副犁就很好。**对于不让雇工、不让单干的，不能放任，对于去干涉有3匹马的，不能放任。**

**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也还是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圣西门是一个资本家，但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当时是空想的。假如今天东北有个资本家要照圣西门的办法去做，那么他可能办成功，而不会垮台。

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交公也交不出去，国家也不会要他的油房要他的马，不得已他只好暂时私有，如果他现在发展了生产，将来在实行集体化时，又能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但是，一般的，不会都这样。即使东北将来有10000个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会有100万党员，这10000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而且，在10000人中可能会有5000是愿意留在党内的。因此现在的农民党员，是可以单干的。我们的党规党法上允许党员单干而且也允许雇人，**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但能单干与应该单干是两回事，我们允许党员单干，并不是我们鼓励他们去单干。

后来，高岗看到中央组织部关于富农党员问题的批复以及刘少奇对安子文等人的谈话记录后，并未正面提出不同意见。到了2月间，他进京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将中组部的批复和刘少奇的谈话记录送交毛泽东。毛泽东看罢，不置可否，将此件批给陈伯达看。非常明显，他对刘少奇的谈话是不满意的。

再说1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陈伯达、李富春在一起开会，毛泽东提议，一边讨论修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一边将修改稿译成俄文文本，尽快递交苏方。

接下来，毛泽东等人边讨论边修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伍修权、师哲、戈宝权、徐介藩则在另一间房子里将修改好的文本译成俄文，并打印出来。

随后，周恩来立即将修改好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

1月25日，中苏双方开始讨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

1月25日下午，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通报了几天来中苏会谈的进展情况：

“22日，我们连师哲共6人与斯大林等同志会商，决定各项原则问题及工作进行办法。23日，周、王、李3人与苏方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3人会谈几个具体问题。24日，经我们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现正起草第2个文件，即关于旅顺、大连、中长路协定，大约今日可以完成草案，并已决定在3天内准备好第3个文件，即中苏易货协定。总之，工作是颇为顺利的。”“兹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发上，请中央加以讨论，并以意见电告。”

1月28日，毛泽东对汪东兴说：

“我们这次来苏联访问，苏方派来保卫我的上校和两位中校、3位少校昼夜值班，还有他们派来的司机、厨师、服务员对我们态度十分友好，工作周到，你带上2瓶茅台酒、2盒龙井茶、2床湘绣被面等礼品，代表我，去克里姆林宫拜访一下苏联的卫戍司令，谢谢他们。”

1月30日，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会见新疆人民政府主席赛福鼎。毛泽东说：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其中涉及新疆问题，请你抓紧阅读条约草案，有什么意见，尽快向谈判代表提出来。”

周恩来问赛福鼎：

“你能看汉文吗？有困难的话，请邓力群同志帮助读给你听。”

赛福鼎说：

“没有太大困难，汉文写不好，但可以看懂。”

1月31日，毛泽东派汪东兴代表他去看望正在莫斯科治病的任弼时。

1月31日这一天，青海的班禅堪布会议厅再一次代表西藏爱国人民，致电中央人民政府说：

“顷闻西藏拉萨反动当局，以‘亲善代表团’名义，派遣非法代表，赴英美等国活动，表示‘西藏独立’，企图勾结帝国主义，反抗人民政府，以达其脱离祖国出卖西藏的阴谋。西藏系中国领土，为世界所公认，全藏人民亦自认为中华民族之一。今拉萨当局此种举动，实为破坏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违背西藏人民意志。

**谨代表西藏人民，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本厅誓率西藏爱国人民，唤起西藏人民配合解放军，为效忠人民祖国奋斗到底。**”

1月31日晚，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通报了中苏双方谈判的进展情况：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件，中苏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大连协定1件，附议定书1件，贷款协定1件，附议定书1件，以上5件草案均经双方看过修改过，今日再谈一次即可大体定案。此5件明1日起可以陆续发给你们。”“同过去情况不同的，即是**苏方已应我方要求，将中长路、旅顺口在3年内无条件交还给我们，大连则在1年内将产权交还给我们，惟自由港地位待对日和约订立后解决，系为应付美国，实际上亦完全由我处理。**”

1950年2月1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报告说：

“胡志明离开驻地已有1个月，赤足步行17天才进入中国地界。他年已60，身体瘦削，但尚健康。胡志明离开越南时，只有两个人知道他来中国，所以只能在北京逗留数日。”

毛泽东立即复电刘少奇说：

“请你们热情接待，并代表我们问候胡志明主席。”

此后，刘少奇、朱德、聂荣臻、李维汉、廖承志组成中方谈判小组，与胡志明会谈。刘少奇建议胡志明去苏联，拜会斯大林，利用毛泽东、周恩来在莫斯科的机会，共同争取苏联政府的援助。

2月3日，胡志明自中国东北乘飞机直抵莫斯科。毛泽东亲切会见了他。

斯大林得知胡志明到了莫斯科，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会见了胡志明，听取他关于越法战争情况的介绍。胡志明向斯大林提出请求苏联派军事顾问和提供弹药援助。斯大林对胡志明的请求未置可否。

斯大林在和毛泽东会谈时，对毛泽东说，他希望援助越南抗法战争这个职责，还是主要由中国来承担，因为中国和越南在历史和现实中有许多联系，双方比较了解，地理位置也接近。而援助中国的经济建设则是苏联的重要任务。斯大林还说：

“我们已经打完了世界大战，大量的武器是用不上了，我们可以运许多到中国去，你们可以留下来，其中适用于越南的，你们也可以运一些到越南去。”

这样，**中苏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苏联援助中国的建设，越南抗法战争则由中国援助。**

2月3日，毛泽东据刘少奇的请示报告，复电说：

“刘斐宜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长，贺耀祖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陈铭枢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长，黄琪翔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长；唐生智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上述人事安排，请考虑。我们返京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后，可能还会有些变动。”

2月4日，毛泽东召见正在苏联学习的刘亚楼，他说：

“我们不但应该有强大的陆军，还应建立强大的空军，强大的海军。现在有起义的伞兵第3团，将来要归你空军建制。”

刘亚楼说：

“这个伞兵团现在归第3野战军陈毅、粟裕同志指挥，他们的素质如何，我不大了解。”

毛泽东说：

“有一支伞兵部队好。以此为基础，加强党的领导，结合跳伞技术训练，可以不断提高这支跳伞部队素质。”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关于“对起义的伞兵第3团加强政治训练”致电粟裕，他写道：

粟裕同志（中央转）：

　　一、前起义过来的伞兵第3团，现在还有多少人，跳伞技术程度如何，他们中间的政治工作进行得怎样，有无党员的发展，一般的政治情绪如何，望电告。

　　二、**这批伞兵盼加强对他们的政治训练，我们需要以这批伞兵作基础训练一个伞兵部队，作为台湾登陆作战之用。**

毛泽东 2月4日

2月6日凌晨，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派飞机轰炸了上海市，炸毁了上海电力公司，破坏了上海水电动力设备；炸死市民500余人，伤1000余人。

后来查明，是潜伏在上海的国民党军统特务罗炳乾用电台向伪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报告了华东重工业轰炸目标，蒋军便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六”轰炸事件。

2月6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及部分随从人员参观莫斯科汽车制造厂和飞机制造厂。毛泽东在休息室对周恩来等人说：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先建立汽车制造厂，然后建立拖拉机厂，再后建立坦克制造厂、飞机制造厂。轻工业方面原来有点旧厂子，如食品厂、纺织厂、造纸厂、卷烟厂、糖厂，这些工厂正在修理，逐步恢复生产。”

2月7日，毛泽东、周恩来参观莫斯科郊区的集体农庄。晚饭时，毛泽东一边吃饭，一边说：

“**集体农庄机械化程度很高，大面积生产很有气派。但给我个印象，亩产量并不高，合中国1亩产粮150公斤。产量这样低，原因不是管理问题就是肥料问题。这样的产量与中国的牛耕人种差不多。**”

周恩来说：

“是不是因为气候问题？”

毛泽东说：

“不单是气候问题。**加拿大和苏联的气候条件相似，为什么加拿大的亩产量要比苏联高呢？这里面的原因值得研究。”**

2月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大连的协定以及中苏关于贷款的协定这3个草案。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立即将会议结果电告毛泽东。

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的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旁的一个客厅里隆重举行。

毛泽东和斯大林都亲自出席了签字仪式。苏方出席签字仪式的还有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赫鲁晓夫等主要领导人。中方出席签字仪式的还有李富春、陈伯达、王稼祥、赛福鼎。

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和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3个文本上签了字，并先后发表了讲话。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于1950年4月11月生效，有效期为30年，到1980年4月11日期满。

记者们在签字仪式上争先恐后地抢拍这一历史性的镜头。斯大林的个子比毛泽东矮一些，为了显示他的身材高一点，每当记者拍照时，他总是要往前移动一两步。这样，照片上的斯大林就会比毛泽东高一点。此时此刻，毛泽东虽然不满，也只好隐忍不发。照完相，斯大林对师哲说：

**“你们的翻译工作没有做好，耽误了贸易协定文本的印制，否则，今天在这里可以同时签署贸易协定，那多好呀！”**

**师哲把他的话翻译给毛泽东，毛泽东听了以后，终于忍不住了，他气愤地说：**

**“缺点和错误总是中国人的！”**

签字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庆祝中苏两国缔约成功。

席间，毛泽东对斯大林说：

“斯大林同志，我们希望举行一个小规模的招待会，但不在我在克里姆林宫的住所举行，而是在像酒店那样的地方举行。”

“为什么不在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不解地问。毛泽东回答道：

“你看，斯大林同志，**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招待会的地方。对于我国，一个主权国家就不很适当。”**

斯大林说：

“对。**但是我从不出席在饭店或外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从不！”**

**毛泽东说：**

**“但是我国招待会没有你出席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恳切要求你，请同意出席。”**

**斯大林只好说：**

**“好吧，毛泽东同志，如果你这样希望，我去参加。”**

宴会时间很短，中午12时后，毛泽东就回到了住处。王稼祥立即着手告别宴会的准备工作。他担心斯大林出席酒会的承诺再变卦，又特意会见了莫洛托夫外长，送上给斯大林的请帖，郑重地说：

“我今天带来了中国人民的愿望，我请你将请帖转呈斯大林同志，务必请斯大林同志出席这次招待会，这将象征着我们中苏间兄弟般的牢不可破的友谊的永存。”

2月15日晚，中国政府以王稼祥大使的名义，在莫斯科米特勒保尔大旅社（大都会饭店）举行盛大鸡尾酒会，庆祝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和毛泽东访苏成功。

下午6点半，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亲自站在米特勒保尔大旅社宴会厅门口迎接来宾，客人们陆续来到，包括苏联的高级干部和各国驻苏使节，约500人。不一会儿，斯大林率领苏共政治局全体委员也准时到了。毛泽东和斯大林握手后，把他及其他政治局委员请进了大厅里面的小会宾室里，大多数人被安排在宽敞的大厅里。周恩来首先致祝酒词，他说：

“我们两国所签订的条约和协定，将使中苏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将使中国人民不会感到孤立，而且将有利于中国的生产建设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中苏友谊要世世代代传下去，感谢苏联的无私援助，中国要向老大哥学习。”

斯大林在热烈的掌声中，也站起身来致答词，他说：

“今天的这个场面热烈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精神，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中苏友好情谊要保持下去，这些周恩来都说过了，也代表我的意思。”

他看到南斯拉夫大使没有到场，接着说：

“**本来社会主义大家庭应该像周恩来讲的那样更圆满、更完美些，但遗憾的是南斯拉夫大使却未能出席。这个责任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自己脱离了我们的大家庭，想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可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南斯拉夫人民迟早要醒悟过来，回到大家庭里来的。我们可以耐心等待他们清醒过来。”**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斯大林在这种喜庆的场合，突兀地批评南斯拉夫人，在毛泽东听来，总有一种敲山震虎的感觉。**尽管如此，鸡尾酒会还是始终洋溢着欢快、团结的气氛。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频频举杯，祝福斯大林身体健康。斯大林也举杯祝福毛泽东身体健康；他还举着酒杯对周恩来说：

“周恩来同志，我祝你万事如意！”

斯大林不住地称赞中国的葡萄酒味道好。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既然斯大林同志喜欢，你就派飞机再送几箱。”

斯大林眉开眼笑地说：

“一个月前，我70大寿时，你们的大白菜、大萝卜、大葱、大鸭梨，一共2万斤，还送几箱葡萄酒，再加上中国共产党的深情厚谊，这份礼够重的。”

一番话说得毛泽东和周恩来哈哈大笑。胡志明趁机对斯大林说：

“斯大林同志，我也要向你请示。”

斯大林开玩笑地说：

“你怎么能向我请示？我是部长会议主席，你是国家主席，官比我大，我应该向你请示。”

胡志明说：

“你们同中国同志订了个条约，趁我在这里，我们也订个条约吧！”

斯大林看了一眼胡志明，说：

“你是秘密来的，怎么同你订约？否则人家要问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

胡志明幽默地辩解道：

“这很简单，你派飞机把我送到天上去转一圈，然后再派人到机场迎接我，在报上发个消息，不就公开了？然后，我们两国就签订条约嘛！”

斯大林感慨地说：

“你们东方人想象力太丰富了！”

酒会一直进行到午夜，宾主尽欢而散。

2月16日，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宴会，庆祝中苏会谈成功并欢送毛泽东回国。毛泽东和斯大林在宴会上亲切交谈，多次干杯，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斯大林对中国的关心和支持是诚心诚意的，毛泽东对这次访问感到满意，达到了预期目的。

毛泽东在谈话中曾说到同国民党军队战斗的艰苦岁月，他当着周恩来、王稼祥的面，指着王稼祥对斯大林说：

“他曾经犯过错误，但后来改正了，现在工作得很好，是个好同志。”

毛泽东还说到有一次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了，形势极端的危险，多次冲锋都没有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指挥员就号召战士们要“不畏艰险，视死如归”。

苏方翻译费德林本来是一个中国通，可他却感到毛泽东所说的“视死如归”这个警句很费解，于是就请毛泽东用汉语写在纸上。毛泽东拿起笔，飞快地用他那特有的笔锋写出了8个大字。但是费德林还是不明白“归”字的含义，就又请毛泽东解释一下。毛泽东说：

“这是12世纪古代中国一位著名统帅岳飞使用过的一种说法。中国字‘归’，在这里不是通常说的‘回来’‘再来’的意思。在历史上，‘归’的意思是‘回到原本状态’。虽然在中国有许多人知道岳飞的名字，但远不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个成语的真正含义。**这个成语应当这样来理解：‘蔑视一切困难和痛苦，像看待自己回到原本状态一样看待死亡’。”**

**斯大林耐心听完费德林对毛泽东所作解释的翻译，略加思索，小声地对费德林说：**

**“看来这是一位天才的统帅，表现出大无畏精神和雄才大略。”**

宴会结束后，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向斯大林赠送了绸缎和屏风，向其他领导人赠送的也都是绸缎和刺绣之类。周恩来还给苏方所有的服务人员包括没有见过面的服务人员，赠送了礼品，一个不漏，每人一份。这些礼品放在一个长条桌上，每份礼物上都写了服务员的名字。

2月17日晨，毛泽东起草他和周恩来关于发表新区土改征粮指示给刘少奇的电文：

少奇同志：

关于新区土改征粮指示草案电收到。一般甚好，而且亟须适时发出。惟第4部分因涉及分配土地问题本身，可否暂缓发表。因斯大林同志曾在我向其报告土改政策时，提议将分配地主土地与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即使目前农民要求分配富农多余的土地，我们固不禁止，但也不要在法令上预作肯定。**我们虽对中国半封建富农作了解释，并说明对资本主义富农并不没收，他仍举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为例，要我们把反富农看成是严重斗争。他的中心思想是在打倒地主阶级时，中立富农并使生产不受影响。**去年11月政治局会议时关于江南土改应慎重对待富农的问题亦曾提到过，因此事不但关系富农而且关系民族资产阶级，江南土改的法令必须和北方土改有些不同，对于1933年文件及1947年土地法等，亦必须有所修改。故我们主张目前政务院只发表新区土改征粮指示的前3部分，而将第4部分留待我们归后讨论。如须修改，则可推迟至4月再行发表另一关于土改本身的文件。如同意，可向党外民主人士解释第4部分为今年秋后方始实行的政策，不妨从长计议，待毛主席归后再行决定及发表。

　　 毛泽东 周恩来 2月17日7时

2月17日上午，毛泽东关于“积极防空保卫上海”问题致电刘少奇等，他写道：

少奇同志即转饶漱石同志：

丑文电悉。**积极防空，保卫上海，已筹有妥善可靠办法，不日即可实施。上海工厂不要勉强疏散，尽可能维持下去。但对上述防空办法，务须保持秘密，以期一举歼敌**。我们今夜动身回国。

毛泽东 2月17日上午9时

2月17日下午6时，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到中国驻苏大使馆看望使馆工作人员和留学生，与他们共进晚餐。饭后还举行了舞会，进行联欢。

当晚，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准备离开莫斯科。毛泽东临上汽车时，苏方服务员都哭了，他们都觉得毛泽东比亲人还亲。管理食堂卫生的老太太说：

“毛主席理解我们，关心我们，不浪费电。毛主席自己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出出进进都有规矩，这使我们感动得不得了。”

莫洛托夫把毛泽东送上汽车，又先于毛泽东赶到火车站。

苏联政府在车站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毛泽东发表了告别演说，他说：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我和中国代表团同人周恩来同志等这次在莫斯科会见了斯大林元帅以及苏联政府其他负责同志，**我们相互间在中苏两大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充分了解与深厚友谊，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人民可以看得见：业已经过条约固定下来的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将是永久的，不可破坏的，没有人能够分离的，而这种团结，不但必然要影响中苏两大国的关系，而且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将来，影响到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

留在苏联的时期内，我们曾经参观了许多工厂和农场等，看见了苏联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看见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同志和联共党的教育之下所养成的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相互结合的作风，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人历来的信念，即：苏联经济文化及其它各项重要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

我们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以及在十月革命策源地列宁城，受到了热情地招待，当我们离开这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时候，特向斯大林元帅、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致衷心的谢意。

中苏永久友好和永久合作万岁！

苏联人民万岁！

世界革命导师与中国人民的挚友——斯大林同志万岁！

送行仪式结束后，莫洛托夫把毛泽东送上火车，临别时，他对毛泽东说：

“斯大林同志再三让我告诉你，要保护身体，在路上，在国内，都要保重。”

晚10点30分，毛泽东一行乘火车离开了莫斯科。

欲知毛泽东在归国途中有何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详细内容。

东方翁曰：在中苏谈判期间，有两件事凸显了毛泽东的情感世界和主权意识。一是当苏方拿出**以1945年8月中华民国和苏联签订的条约为基础**拟出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之时，毛泽东果断地说：“**他们拿的那个草案对我们无效！”并**迅即将中方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译成俄文，交给苏方，争得了谈判的主动权**。二**是毛泽东向斯大林表示，中方准备举行一个招待会，不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要在酒店那样的地方举行。他解释说：“**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招待会的地方。对于我国，一个主权国家就不很适当。”**同时，他还使“**从不出席在饭店或外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的斯大林，也答应出席中方的招待会。此其时也，在斯大林面前，各国共产党领导人无不唯命是从，只有毛泽东是个例外。不卑不亢的品格，率直无隐的个性，让“世界革命领袖”斯大林刮目相看，这就是毛泽东！

**第10章**

**“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中央对吃喝风已经三**

**令五申，我看要坚决刹住，可有的领导同志就是听不进去。我们**

**国家的建设还刚刚起步，我们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

**的作风永远不能丢，特别是我们的党员领导同志首先要做好表率。”**

话说1950年2月23日，毛泽东就回国行程给王稼祥转刘少奇、高岗一封电报：

王大使转刘少奇高岗二同志：

我们一行因沿途参观今（23）日可到伊尔库次克。计26日可到满洲里，尔后拟于海拉尔、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四平街、铁岭各停留一二小时至三四小时，到沈阳拟停留一二天。请高岗同志通知上述各地负责同志保守秘密，每处只要少数负责干部迎接招待，不要使多数人知道，尤其不要公开发表消息。尔后至打虎山、锦州、山海关、唐山、塘沽、天津，均拟略作参观，均要保守秘密。到北京下车时，亦只要有少数党内党外人士（100人左右）至车站迎接，不要使多数人知道，待到北京后方才发表消息。请照此布置为盼。

毛泽东 2月23日

胡志明随毛泽东在回中国的途中，向毛泽东提出对越南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毛泽东说：

“我们的顾问都是土顾问啊。”

胡志明说：

“土顾问我们也要！”

2月24日，政务院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全文如下：

自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强迫输入鸦片，为害我国已百有余年。由于封建买办的官僚军阀的反动统治，与其荒淫无耻的腐烂生活，对于烟毒，不但不禁止，反而强迫种植，尤其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曾有计划地实行毒化中国，因此戕杀人民生命，损耗人民财产，不可胜数。现在全国人民已得解放，为了保护人民健康，恢复与发展生产，特规定严禁鸦片烟毒及其他毒品的办法如下：

一、各级人民政府应协同人民团体，作广泛的禁烟禁毒宣传，动员人民起来一致行动。在烟毒较盛地区，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应把禁烟禁毒工作作为专题讨论，定出限期禁绝办法。

二、各级人民政府为使禁烟禁毒工作进行顺利，得设禁烟禁毒委员会。该会由政府民政、公安部门及各人民团体派员组织，民政部门负组织之责。

三、**在军事已完全结束地区，从1950年春起应禁绝种烟；在军事尚未完全结束地区，军事一经结束，立即禁绝种烟，尤应注意在播种之前认真执行。在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如有种烟者，应斟酌当地实际情况，采取慎重措施，有步骤地进行禁种。**

四、从本禁令颁布之日起，全国各地**不许再有贩运制造及售卖烟土毒品情事，犯者不论何人，除没收其烟土毒品外，还须从严治罪。**

五、**散存于民间之烟土毒品，应限期令其缴出，我人民政府为照顾其生活，得分别酌予补偿。**如逾期不缴出者，除查出没收外，并应按其情节轻重分别治罪。

六、吸食烟毒的人民限期登记（城市向公安局，乡村向人民政府登记），并定期戒除。**隐不登记者，逾期而犹未戒除者，查出后予以处罚**。

七、各级人民政府卫生机关，应配制戒烟药品，及宣传戒烟戒毒药方，**对贫苦瘾民得免费或减价医治。烟毒较盛的城市，得设戒烟所。**戒烟戒毒药品的供应，应由卫生机关统一掌握，严防隐蔽形式的烟毒代用品。

八、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中央直辖市人民政府，各按本地区情况，依据本禁令方针，制定查禁办法及禁绝种吸日期，呈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施行。并于批准后，印发布告，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

希即依照执行，并转令所属遵照。

此令。

总理 周恩来

2月26日，毛泽东一行到了中国边境城市满洲里。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给斯大林、维辛斯基发出了致谢电。为毛泽东送行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等人，将火车上的东西移送到中国火车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嘱咐满洲里负责人，要尽最大努力把苏联工作人员招待好。

2月27日，专列在东北境内行驶。毛泽东的情绪格外好，一会儿往左看，一会儿往右看，从客厅到走廊，从走廊到客厅，来回踱步。这是毛泽东考虑重大问题时的习惯动作。活动了一阵子，他回到位子上，稍微平静了一些，自言自语地说：

“还是家乡好。过去听说东北是个好地方，真是名不虚传啊！”

他突然转过脸，对李家骥说：

“家骥，你看这里多辽阔，**将来我们在这里好好开发，搞几个基地，再开发新疆，中国的粮食问题就能解决了。”**

毛泽东还谈到了他在林业、畜牧业、工业方面的种种设想。

是日下午2点15分，专列开进了哈尔滨火车站。毛泽东把毛巾递给工作人员，高兴地说：

“把材料收拾起来，我们下去看看。”

这时，随行人员也都过来了，汪东兴问：

“主席，车已停，是否现在下车？”

毛泽东说：

“恩来知道了吗？”

“总理已下车了，正等您。”

“好。”

毛泽东精神抖擞地向车门走去。早已在站台上恭候的高岗、罗瑞卿、滕代远、杨奇清、汪金祥和松江省委书记张策、哈尔滨市长饶斌等人，急忙走上前去，和毛泽东握手问候。

毛泽东在高岗、罗瑞卿、张策、饶斌等人陪同下，乘车经月牙街、红军街、邮政街来到颐园街住所。这是一座欧式风格的建筑。毛泽东下车时，看着身边的司机有点胆怯，就搭话说：

“司机师傅贵姓？”

司机忙说：

“主席，我免贵姓崔，叫崔洪松。”

“谢谢你为我们服务。”

毛泽东下车后，径直向大楼门口走去。不少警卫人员和工作人员在门口欢迎毛泽东，毛泽东与大家一一握手，他说：

“同志们辛苦了。”

一位高个子青年很有礼貌地说：

“主席旅途辛苦了，请您到客厅休息。”

毛泽东由饶斌引领来到会议室，稍事休息；又由王化成陪同到2楼休息。汪东兴介绍说：

“王化成同志是从延安来的，现任市公安局长。”

下午3点30分，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乘车去哈尔滨车辆厂视察。途中，毛泽东看着路边的市容，问身边的饶斌：

“广告牌上为什么都是外国字，过去的宣传画为什么还未涂掉？”

饶斌说：

“没来得及。”

毛泽东说：

“我们应当学会管理城市和改造城市。”

4点左右，毛泽东来到了车辆厂。这个车辆厂是沙皇时期俄国建立的工厂，也是毛泽东在建国后视察的第一个工厂。在厂领导陪同下，毛泽东参观了锻冶分厂。5吨汽锤正在锻压一个车辆大轴，烧得通红的钢锭，在工人的操作下，翻来翻去，五六分钟就变成了大轴。厂方领导费立人说：

“这个工厂建厂早，设备陈旧。”

毛泽东说：

“设备虽然陈旧，但很重要。你们要保护好管理好这个工厂。”

周恩来说：

“在苏联，2000人到3000人就是大厂，你们5000人就算很大的工厂了。”

毛泽东说：

“越是大工厂，越要管理好，发挥好作用。哈尔滨是全国解放最早的城市，这个厂又是全市最大的厂子，所以，应给全国做出个好样子。”

来到机械分厂，毛泽东看到地上配料摆放整齐，通道干净，对周恩来说：

“你看，这里的文明生产搞得好。”

周恩来转过脸对费立人说：

“其他分厂也应这样。”

毛泽东主动和一位60岁的老工人握手问候：

“你好啊！”

老工人说：

“毛主席，您辛苦了。”

毛泽东笑着说：

“咱俩都一样。”

出了机修分厂，毛泽东问费立人：

“工厂还有附属机构吗？”

费立人说：

“有，厂内有卫生所、食堂，厂外还有俱乐部、厂办技工学校。”

“俱乐部干什么？”

“开会，演节目。”

“你们办不办职工夜校？”

“没有职工夜校，但工厂办了很多业余政治学习班。”

“政治是要学的，工人还应多学点文化知识。”

周恩来问道：

“你们厂技术人员从哪里来的？”

费立人说：

“多数从老工人中选拔出来的。”

“对，应该从实践中培养技术人员，将来从大学生中培养技术人才。”

毛泽东问费立人：

“你懂不懂管理工厂？”

费立人不好意思地朝毛泽东笑笑，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不懂。我是新调来管业务的。”

毛泽东微笑着说：

“不懂要学习。我们都不懂，我们都要学习。你们要好好学会管理工厂。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必须做好。”

周恩来补充说：

“要管好工厂，培养人才，多出产品，多出干部，为全国的车辆厂树立个榜样。”

5点多钟，毛泽东一行人在返回途中，登上哈尔滨国际旅行社5层楼楼顶平台，俯瞰全市，毛泽东问道：

“哈尔滨市有多少外国人？”

饶斌说：

“全市60万人口，外籍侨民1万多，分别属于40多个国家的侨民，其中苏联侨民最多。”

毛泽东说：

“要把哈尔滨这个消费城市改造成生产城市。教育干部进城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他又和副省长李延禄攀谈起来。李延禄在1938年曾经到过延安，那时候，他向毛泽东汇报过东北抗联的情况。毛泽东对李延禄说：

“抗联开展游击战是有成绩的，但也有缺点。你现在可以写一下抗联史，成绩不能抹煞，缺点也要写，写出来对党对人民有好处。”

李延禄听毛泽东这样说，连连点头。

回到住处，已经是6点多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与张策、饶斌、李延禄、东北铁路总局局长余光生进行了座谈。张策说：

“主席这次行程万里，一定很累了吧？”

毛泽东说：

“我去的时候是坐老牛车，前边拉后边推，才上了兴安岭。”

一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众人请毛泽东对松江地区的工作指示方向。毛泽东喝了一口茶，点着烟吸了一口，说：

“我们刚刚建国，首要任务是肃清国民党残余，镇压反革命。同时要集中精力，恢复经济建设。还有很多工作，但这两点是重点。一定要发挥你们自己的优势，把粮食抓上去。**黑龙江是个好地方，过去只听说过，这次在火车上亲眼看到，果然名不虚传。你们要把这个自然优势利用起来，特别是荒草原、森林等资源，把他们改造成为畜牧基地、森林基地、粮食基地，那就太可观了。**当然，这需要做很多工作，克服很多困难。”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看了大家一眼，问道：

“你们有没有这个决心啊？”

张策等人都说有决心。毛泽东说：

“对，应该有个雄心壮志。”

周恩来说：

“在恢复经济的同时要有个计划，把新的建设统筹考虑进去。”

这天晚上，省市领导为毛泽东、周恩来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毛泽东让周恩来请胡志明一起共进晚餐。

宴会由张策主持。毛泽东一看满桌子的菜肴这么丰盛，立时一肚子的不高兴，只是碍于胡志明在场，没有说什么。他只在3个蔬菜盘子中夹了一点菜，吃了半碗大米饭，便放下了筷子。

晚餐结束后，毛泽东回到2楼办公室看报。此时，松江省市负责人都来了，毛泽东放下报纸，非常严肃地对饶斌说：

“我们国家还很穷，不能浪费，不能搞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吃米饭和蔬菜就可以嘛。”

饶斌连忙说：

“请主席放心，今后我们一定照办。”

省市领导请毛泽东题词，毛泽东满口应允了。王化成很快找来了毛笔、宣纸、砚台和墨。毛泽东问张策：

“你们让我写点什么？”

张策说：

“省市委请主席指明今后工作方向；松江日报请主席题报头。”

毛泽东站在长方桌旁，拿起两只毛笔说：

“这支斗笔太大、太重，用不着，就用这支大羊毫吧。”

他放下斗笔，手执大羊毫，在砚台墨池蘸蘸，先为省委题写了“学习”、“奋斗”、“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3幅字；接下来为市委题写的是：“发展生产”；为哈尔滨市正在召开的第二届团代会题写的是：“学习马列主义”；一气呵成，书写了5幅题词。其中的“学习”、“奋斗”两幅，被人们视为绝妙的格言。毛泽东最后又为《松江日报》题写了报头。

省市领导看着这些珍贵的墨宝，都很高兴，还有再让毛泽东题写几份的意思。毛泽东看出了他们的心思，笑笑说：

“能把这些做好就很好了嘛。”

晚上休息时，毛泽东走进省市领导为他准备的卧室，看看房间里豪华的摆设，又看看高级沙发床和新被褥，感叹道：

“噢，这么漂亮！”

他用手按了一下床，是弹簧软床，就笑着对李家骥说：

“还是换我们的东西吧，这些让他们拿去，睡硬板床。我没有这个福，享受不了这些东西。”

李家骥马上让服务人员重新进行了安排，又把火车上毛泽东用了多少年的2条白被子、2条灰毛毯子和毛巾被、荞麦皮枕头都抱了来。

这天夜里，毛泽东的警卫工作由市公安局负责。按规定，毛泽东一上床，周围的人员就可以撤下来。可是，公安局长王化成安排的是：由4个人坐在大门口警卫，他自己则守卫在2楼毛泽东卧室的门口。

2月28日早上，毛泽东一觉醒来，情绪很好，高兴地说：

“睡了5个多小时，太好了。”

毛泽东简单吃了一点饭，由省市领导陪同回到专列上，离开了美丽的哈尔滨。

专列到达长春火车站后，毛泽东换乘汽车沿着斯大林大街向地质宫前的新民大街缓缓行驶。他手里拿着地图，一边观看街道两旁风景，一边询问街名沿革、风俗人情。车子来到长春市银行，毛泽东下车与欢迎他的长春市党政干部一一握手。在银行会议室里，毛泽东听取了市委领导关于长春市遭受战争破坏的情况、以及政治情况、经济恢复和城市管理工作。他听说有的房屋因为没有保护好遭到破坏，就说：

“这个问题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进城后要学会管理城市、建设城市，人民的财产一定要保护好，现在房子多用不着，将来还不够用呢。**”

毛泽东问长春市银行行长高翔：

“你多大了？”

高翔马上站起来，说：

“虚岁26岁。”

毛泽东示意他坐下，笑着说：

“还是一个娃娃行长。”

在座的人都爽朗地笑了起来。毛泽东说：

“东北国营经济是占优势的，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银行要支持国营经济。”

他询问了银行的职工情况，党团组织的发展情况，他说：

“要加强思想工作，教育、改造留用人员。”

他又问：

“你这个小鬼，领导这么大的银行，怎么领导法呀？”

高翔思索了一下说：

“根据主席的教导，坚决依靠群众。具体的业务多是留用人员在做，我们一边领导他们，一边向他们学习。”

毛泽东“哦”了一声，笑着说：

**“我们有马列主义，他们有技术，把马列主义和技术结合起来，用马列主义统帅技术，就能把这么个大银行领导起来。”**

高翔介绍说，长春市银行的前身是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的伪满中央银行。毛泽东指着房舍说：

“这是用中国人民的血汗建造起来的，是中国人民的劳动成果。”

高翔又介绍说，楼内的设备有的用了，有的用不着，留作参观展览。毛泽东说：

“过去那一套，我们不要全搬用。进城了，还得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我们现在不用的那一部分，作为橱窗展览展览也好嘛。”

2月28日傍晚时分，毛泽东乘专列到了沈阳，住在和平宾馆。他在会客厅会见了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的领导干部。周恩来向大家说明了毛泽东在沈阳的活动安排，宣布会见结束。毛泽东来到2楼会议室，一位领导干部上来报告说：

“饭已准备好，是否……”

叶子龙马上说：

“主席要休息一会儿，等等再吃饭。”

那人走后，叶子龙让李家骥去看一下饭菜准备的情况。李家骥来到食堂，说明来意，服务员对他说：

“都是东北特产，不用看，差不了。”

李家骥走进食堂一看，已经备好的饭菜非常丰盛，比北京政协开会还好。他心想，这么干要坏事，非挨批评不可。

毛泽东稍事休息后，在高岗等人陪同下来到食堂，一进餐厅，李家骥就发现，毛泽东的脸沉了下来，因为胡志明在场，他也没说什么。毛泽东和周恩来先向胡志明让座。就餐开始后，毛泽东只吃了面前的空心菜等几种菜，喝了几口葡萄酒，又吃了点饭，并礼节性地请胡志明多吃多喝，不大一会儿，他就放下了筷子，点着了烟。

整个晚宴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在沉闷的气氛中结束了，宾主之间始终没有出现欢声笑语，餐桌上剩下了不少的菜肴。回到会议室，毛泽东一脸不高兴地对高岗等人说：

“今晚菜太多了。这比我一贯主张的4菜1汤的标准超得太多了，我看这就是大吃大喝。别忘了，**我们的国家刚解放，家底还很薄，现在还有不少老百姓连饭都没有吃的，我们却在这里大吃大喝。同志们，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们一层一层仿效下去，这么吃起来，不但会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我们的国家还可能会吃穷、吃垮台。**你们应该重温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这顿饭菜是高岗交代安排的，他看毛泽东的脸色很难看，也不敢解释什么，只是连连称是。叶子龙看毛泽东说得这么重，怕众人搁不住面子，就借故小声问毛泽东：刚才收到的那封电报怎么处理？这样，才算把话头岔开了。

1950年3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领导干部会议上讲了3个问题：一是恢复经济建设；二是肃清反革命、国民党残余势力；三是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他在讲到第3个问题时，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

“我们的基层组织是贯彻中央精神的，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是也存在问题，包括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在内。”

他一面吸烟，一面说起这几天的切身经历，他说：

“这次和恩来同志路过东北，主要想了解一下东北的工作情况，了解东北地方工业生产情况。发现浪费太大。我在哈尔滨就说过不要大吃大喝，饭菜不要搞得太多太好，谁知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比北京开全国政协大会还搞得丰盛。这就是比吃喝的苗头，这个风气很不好。我和恩来不是为了吃喝，搞得那么丰盛干什么？”

毛泽东越说越生气，把吸完的烟头往烟灰缸里一摁，愤愤地说：

**“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中央对吃喝风已经三令五申，我看要坚决刹住，可有的领导同志就是听不进去。我们国家的建设还刚刚起步，我们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永远不能丢，特别是我们的党员领导同志首先要做好表率。”

这天晚上，东北局在和平宾馆举行了文艺晚会，请毛泽东、周恩来、胡志明等观看，表示对毛泽东、周恩来访苏归来的祝贺。

3月3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乘车去沈阳市橡胶厂视察。这个厂子远在沈阳郊区，路也不好走，他们一行4点多钟才到了厂区。

橡胶厂是个大厂，是东北地区的骨干企业。厂长曹为东率领干部和工人对毛泽东一行热烈欢迎。

在曹为东陪同下，毛泽东来到炼胶车间。工人们一见毛泽东来了，顿时欢呼起来。毛泽东来到工人孙元庆身边，仔细看他如何操作。毛泽东说：

“你工作很认真，很熟练，祝你进步！”

说着伸出手要与孙元庆握手，孙元庆手上沾了油污，正想在工作服上擦擦，毛泽东已抓住了他的手。

毛泽东视察了每个车间，就要告辞了，曹为东说：

“请主席、总理对我们今后的工作做做指示。”

毛泽东说：

“希望你们把工作搞得更好，为化工行业做个榜样。”

是日晚，毛泽东在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谈到了他的访苏观感，他说：

“我们参观了苏联一些地方，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建设历史。他们现在的工厂有很大的规模，我们看到这些工厂，好像小孩子看到了大人一样，因为我们的工业水平很低。但是，他们的历史鼓励了我们。我们参观了列宁格勒、莫斯科、西伯利亚的几个工厂，我们又看到了那些已经发展起来的农庄，问了这些工厂、农庄发展起来的历史。他们现有的许多大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很小或者还没有。汽车工厂、飞机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只能搞修理，和我们现在差不多，不能造汽车，不能造飞机。过了若干年以后可以造一些，但造的数目也很少。**他们那时比欧洲小国丹麦造的还少，而现在一个工厂一年能造出几万台汽车。这一历史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从极小的修理汽车、修理飞机的工厂，发展到制造汽车、制造飞机的大工厂。其它方面，将来我们的发展也是很大的。现在没有的，将来我们可以制造出来。**苏联同志告诉我们，我们会很快发展起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就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登上专列，告别了沈阳这个东北最大的城市。到了山海关，杨成武上了专列。他是专门来迎接毛泽东的。叶子龙对杨成武说：

“司令员，主席请你去谈谈。”

杨成武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向毛泽东敬礼问好。毛泽东在谈话中问他：

“你们华北部队，对使用傅作义系统的干部有意见。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和思想啊？”

杨成武说：

“有。不光华北有，西北和东北以及西南的部队也都有。”

“什么意见？”

“说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早革命不如晚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

“哪个讲的哟？具体点。”

“1军军长贺炳炎。说傅作义又升官又发财，既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又是什么水利部部长，老子革命一辈子，什么也没有。”

“这话怎么传的？”

“到处传的，不止一个人。”

“成武啊，你可要做工作，这是个大政策。”

“不那么好做呢，过去傅作义太猖狂。集宁战役没打好，聂老总叫我率3纵队和独1旅、2旅、4旅赶去张家口，保护中央局的退路。3纵队政委胡耀邦，他看到敌人进张家口，一个劲儿哭。”

“胡耀邦还哭？娃娃。”

“他就是那种性格，爱哭，感情丰富，好事坏事动情就哭。那时傅作义撒传单，叫主席毛润之，问：你是先生还是我是先生？说我们较量一下就知道了。如果较量之后我输了，就叫你毛润之一声先生。现在我占了张家口，你输了一场，该叫我一声先生。如果你在全国输了，我就永不会叫你先生了。这些传单撒得满世界飘，他也太狂了。我们的干部、战士都对他印象极深，现在他彻底输了，反而受到重用，所以大家都有牢骚，说革命不如反革命。”

毛泽东凝神片刻，慢条斯理地说：

“成武啊，我们全国胜利了，就比方呢，我们建起了一座非常高大的非常雄伟的大厦，这个高楼大厦里边非常宽敞亮堂，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你就要挂上一些字画，摆上一些古董，养些漂亮的花，牡丹花，芍药花，各种花，不能空空如也。所以我们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派，特别是知名人士，这项工作非常重要。**要教育我们的干部，不能以为建立起新中国就要享福，还要和各民主党派团结起来，把中国从睡狮变成雄狮。**你今天同我谈话谈得很好。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国家，不要那么简单，那么单调，清一色。你现在通不通？”

“通了。”

“傅作义、孙兰峰、董其武都是你的老对手，我讲的，你真通了？”

“是真通了。”

“那好，你回去要向聂荣臻汇报，要开会，把我讲的都要传达。你还要在华北解放军报上发个社论，教育全军。”

3月4日晚，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回到北京。党政军各领导人和民主党派领导人及著名民主人士到车站迎接。

梁漱溟也在车站迎接毛泽东。早在开国大典上，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曾对各方朋友说：“今天，梁漱溟先生没有来，很遗憾。”毛泽东也想起了这位老朋友，发出邀请，请梁漱溟到北京来。梁漱溟应邀在1950年1月中旬离开重庆，经武汉来到了北京。

毛泽东见到梁漱溟很高兴，说道：

“梁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您身体可好？家眷来了吗？改日再约您长谈，再来一个通宵也成。”

这个昔日里曾经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论和谈中的一个难题》、《敬告中国共产党》，对国共两党“各打50大板”以示中立和公正、奉劝共产党不要以武力统一中国的梁漱溟，见毛泽东如此礼贤下士，和蔼可亲，不忘旧情，一时激动得除了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不住摇动外，竟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回到菊香书屋，毛泽东让李银桥去香山接来韩桂馨一起吃饭，他还特意让厨师多准备了几样菜。在饭后闲谈中，他向韩桂馨详细询问了香山的一些情况。韩桂馨无意中说起一位领导干部在香山找了一处幽静的山坡，在给机关施工时顺便也为自己盖了一幢二层小楼，只是还没有住进去。毛泽东听了，脸色变得难看起来。韩桂馨便没有再说下去。

3月5日下午，毛泽东召来了那位在香山为自己盖房子的领导干部，当着坐在一旁的周恩来、聂荣臻的面，双手叉着腰，站在那里上上下下打量着那个人，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气，大声吼道：

“你的派头真不小呢！我看你和过去的帝王将相差不多了！”

那位领导干部吓得头上直冒冷汗，垂着头不敢正视毛泽东。毛泽东背着手在房间里大步地来回走着，突然又向那人劈头喝问：

“你这么干，还配当共产党的干部吗？老百姓要戳着我们脊梁骨骂呢！我早讲过进城以后不要学做李自成，你为什么装傻？”

那人低着头胆战心惊地说：

“主席，我错了……”

“你错了？当初盖房子不晓得错？”毛泽东越说越气：“我看你是明知故犯，仗着手中有点权，有意拆我们的台！”

他点燃了一支烟，狠吸一口。周恩来和聂荣臻面面相觑，谁也不便插话。突然，毛泽东将吸了两口的烟使劲儿地掐灭，大手一挥，厉声喝道：

“拉出去枪毙！”

周恩来和聂荣臻被惊得从沙发上站了起来。那人更是被吓得软了身子，摇摇晃晃地险些瘫倒。毛泽东又连说两句：

“拉出去，拉出去毙了。”

周恩来和聂荣臻见状，不得不上前劝慰，说是请主席暂息雷霆之怒，等将问题调查清楚后再作严肃处理。毛泽东依旧盛怒道：

“我们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来这里享受的，更不允许贪污腐化！这样下去，就成了李自成了！”

周恩来说：

“主席讲得对！这件事需要调查清楚，按法律程序办……”

聂荣臻说：

“我们一定要严肃处理，绝不宽怠！”

那位干部也回过神来，惶恐地说：

“我一定吸取教训，愿意接受党给我的任何处分。”

毛泽东这才余怒未消地对聂荣臻说：

“那就交给你去办吧！”

这位犯错误的领导干部姓戴，他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参加红军，在战争年代，曾得到毛泽东题词嘉勉和中央军委传令嘉奖。建国后，他任中央军委技术部部长，中央机要局副局长，北京市东城区委书记兼区长。为这次重大错误，他不仅被关了监狱，而且也失去了参加1955年军队授衔的资格。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对人对事，历来是见微知著。他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是超乎常人的。无论是部下或是对手，他们的优点、缺点，毛泽东都了然于胸。对于部下，尽管知其所短，但毛泽东从来都是用其所长，不计其小节，做到了知人善任，在使用中教育，在教育中使用。这一点，不少人包括后来反对他的人都忽视了。纵观毛泽东和高岗的交往，高岗的才干和缺点，毛泽东是非常清楚的。当斯大林将告洋状的信交给他时，他一眼便看穿了党内高端存在的矛盾，可他也只是一笑了之，后来也没有追究高岗的责任。回到东北，高岗一路陪侍在侧，破格接待，毛泽东一忍再忍，终于在忍无可忍之时，呵斥高岗等人：“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他的训斥，既是对高岗的严重警告，也是对高岗的耐心教育。可惜高岗对毛泽东的话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腐化变质，权利欲膨胀，争权夺利，最终变成了刘宗敏，死于对头之手，岂不是自作孽不可活？

**第11章**

**“在报纸刊物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为了巩固党与人民群众**

**的联系、保障党和国家的民主化、加速社会进步的必要方法。”**

话说在1950年春的一个周末，京剧高派须生李和曾到中南海为中央领导人演出，他清唱的是《辕门斩子》。毛泽东一边听，一边打着节拍。唱完以后，李和曾来到毛泽东面前，说：

“主席，请您多多指教。”

“你唱得很好。”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又问：“你参加党组织没有？”

李和曾回答说：

“1949年参加党组织的，年限很短。”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鼓励他说：

“要好好学习。唱古装戏，要多看历史书，对历史事实，对古代人的言行举止和语言，都应当好好研究。”

1950年春，毛泽民的发妻王淑兰与朱丹华一起，带着毛远新来到北京，把他送到了毛泽东身边。

原来，王淑兰听说毛泽民还留下了毛远新这条根，心情特别激动，立即到江西和朱丹华、方志纯商量，让毛远新恢复毛姓，送到毛泽东身边去生活、学习。朱丹华深明大义，自然同意了老姐姐的意见。不久，她趁着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和王淑兰一起，把毛远新带到了菊香书屋。朱丹华对毛泽东说，毛远新想在北京读书。毛泽东对侄儿说：

“你在我这儿是温室里的花朵，跟着妈妈可以经风雨见世面。”

毛远新对伯伯说：

“我住在学校，又不住这里，怎么会是温室呢？”

就这样，毛远新留在了毛泽东身边，王淑兰也留在北京工作。

毛远新比李讷小半岁，他们一起在北京育英小学学习。育英学校是专门为高级干部子女和烈士子女创办的学校。每到星期天，毛远新便和姐姐李讷、李敏一起回到毛泽东、江青身边。江青待毛远新视如己出，她喊毛远新的小名，叫“小豆子”，毛远新就喊江青“妈妈”。一到寒暑假，毛泽东就派人把毛远新送到朱丹华身边住些时日。

后来，毛远新在1954年小学毕业后，考入了北京市101中学。

再说在1950年春天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召见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刘斐。刘斐对毛泽东说：

“我的体会，《共同纲领》是4路纵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共同前进，向左看齐，跟工人阶级走。”

毛泽东听了，笑着说：

“是的。不过以后还要展开，变成横队哩！”

过了一会儿，邓子恢来了，将要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的贺贵严也来了。毛泽东是让刘斐与邓子恢、贺贵严见面的。邓子恢即将去中南主持军政委员会工作；刘斐到中南任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长、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体委主任。毛泽东指着邓子恢对刘斐、贺贵严说：

“他叫邓子恢，是个老实人，现在请他到中南组阁，请你们去当他的阁员哩！”

刘斐说：

“我是水利问题的门外汉，恐怕胜任不了工作。”

毛泽东鼓励他说：

“不懂你就学嘛，有问题你就去请教群众嘛。要边学边干，哪有天生的内行呀！”

正说话间，工作人员报告说仇鳌老先生来了。毛泽东闻言，便起身出门相迎。他握着仇鳌的手，一面寒暄一面搀扶着老人走进客厅。邓子恢、刘斐等人与老人一一相见。仇鳌刚一落座，就微笑着问毛泽东：

“润之，你今天接我到这里来，一定有事吧？”

“是啊，无事怎好叨扰先生呢。不过不忙，我们好久不见，一会儿再说。来请喝茶。” 毛泽东说着，将刚沏的一杯茶放在仇鳌面前，又挨着老人坐下来，接着说：“我这里没有什么好茶叶。这还是我们一位湖南老表送给我的，虽然说不上好，可它是家乡味呀！**民以食为天。有关衣食住行的这些东西我们太需要了，但我们太少了。国民党给我们留下这么大一个烂摊子，一下子挺难对付哟。”**

仇鳌说：

“老朽以为，时下物品匮乏，的确是治国之一大难题。但是，物是死物，人是活人，人可治物。所以，目前国家最亟需的应是人才。”

毛泽东微笑道：

“亦山先生所言极是。**只要有了人，一切事情都会好办。**但我们和蒋介石打了这么多年仗，现在要搞国家建设，过去的经验用不上了，所以，单靠共产党人恐怕是不行的。”

仇鳌说：

“你说得很对，现在国家必须广纳人才，发挥社会各界贤达的力量，让国家机器尽快运转起来。”

毛泽东兴奋地拉着仇鳌的手，笑着说：

“看来我们是英雄所见略同。今天我请先生来就是为了此事。我们想请先生出山，就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及参事室主任之职，不知先生意下如何呀？”

“这个……”一生无意于仕途的仇鳌颇感意外，他说：“老朽无才，恐怕难以当此重任。况且我年事已高，老病缠身，是否……”

毛泽东说：

“这个不足为虑。你老的身体我是知道的。人们不是有句口头禅，叫作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吗，你老只开开会就行了，喜欢听就听，不喜欢听就起身走嘛！我看先生就不要推辞了。”

仇鳌见毛泽东如此诚恳，便不好再说什么，他把手中的茶杯往桌上一放，说道：

“好，承蒙共产党这样瞧得起我，我就豁出这条老命了。”

是日晚，毛泽东与众人共进晚餐。在送仇鳌上车时，他又回头叮嘱刘斐说：

“为章，有什么困难你要向群众请教呀！”

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将在勤政殿接受罗马尼亚新任驻华大使鲁登科递交国书。

按周恩来的安排，被选拔和培训出来的十几个驻外大使提前来到勤政殿，准备躲在八扇红木屏风后面，利用屏风的缝隙，偷偷观看递交国书的仪式。

毛泽东在接受递交国书仪式之前，要先见见这些预备大使们。他来到勤政殿，和众人一一握手，坐定之后，对周恩来说：

“这些同志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

几位预备大使说：

“我们连外国话都不会说，怎么搞外交？”

毛泽东说：

“班超、张骞不是也不懂外文么，出使西域一样不辱使命。你们不会外交，但是，还是要你们去干外交，因为首先你们跑不了！**你们出使，可以学学沈括的办法，他每到一地，都把那里的大山河流、险要关口画成地图，还把当地的风俗人情也调查得清清楚楚，并叫随员背得滚瓜烂熟。所以和辽国谈判，他对答如流，有凭有据，辽国没有空子好钻哪！**现在你们去的都是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更不要担心。”

有人问：

“是不是可以像改造旧工商业主一样，改造利用旧外交人员，让他们出使？”

毛泽东坚决地挥挥手，说：

“新中国外交官将不利用国民党的旧外交官，完全靠我们自己，靠你们去培养新一代外交干部，这也叫另起炉灶。”

毛泽东走到黄镇面前，问道：

“黄镇，你原来那个名字黄士元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

黄镇答道：

“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

毛泽东说：

“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

他大手一挥，用浓重的湖南口音朗诵起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两句：

“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可毁其节。”**

吟诵毕，他又接着说：

“派你出去，一定要完璧归赵喽。你也做个蔺相如吧。”

有人提出对实际的外交活动不熟悉，周恩来说：

“让你们来，不就是要你们观看一个外事接见活动的嘛。”

递交国书仪式就要开始了，十几位预备大使匿身在屏风后，只见毛泽东大步走到地毯的一端，鲁登科大使手持国书庄重地走上前来致词。5分钟后，毛泽东接过国书，对大使致答词。最后，双方寒暄几句，握手告别。

毛泽东和外宾一走，预备大使们一个个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耿飚大发感慨：

“这嘀哩咕噜一大堆，哪个记得住呀？”

黄镇说：

“反正是事先写好的，多花点时间背下来就是了。”

姬鹏飞出了一个主意，他说：

“我看关键是要翻译同志练得熟，我们到时候照那意思随便说几句就成了，反正人家也听不懂。”

袁仲贤是个急性子，他说：

“干脆咱们就在这儿趁热打铁演习一番，如何？”

大家听他如此一说，无不抚掌称好。袁仲贤自告奋勇演印度人，王幼平演驻罗马尼亚大使。大家各就各位，认真演练了一番。

后来，袁仲贤果然去了印度，耿飚去了瑞典，姬鹏飞驻民主德国，王幼平驻罗马尼亚，韩念龙驻巴基斯坦，黄镇则去了匈牙利。

3月11日，毛泽东在给张治中的复电中，对张治中为和平解放台湾所做的工作，寄予很大期望。他在电文中写道：

张副主席文白先生：

寅微电敬悉，极感盛意。先生现正从事之工作（对台统战工作——笔者注）极为重要，尚希刻意经营，借收成效。

毛泽东 寅真

3月11日晚，有关部门为毛泽东设宴洗尘，祝贺他访苏成功。胡耀邦向毛泽东问好，毛泽东问他：

“来团中央多久了？”

胡耀邦答道：

“半年了。”

毛泽东说：

“小伙子上台威信不高哇！半年不行嘛，要两年才解决问题，不要怕嘛，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原来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提名胡耀邦到北京工作，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有些人不服气，毛泽东有所耳闻，他这个话就是讲给在场的老资格的人听的，目的是支持胡耀邦的工作。

梁漱溟也应邀出席了这次宴会，毛泽东特意来到他的座位前打招呼。他见梁漱溟吃素餐，又不饮酒，便笑道：

“梁先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一定长寿。”

他还邀请梁漱溟次日晚到颐年堂作客。

3月12日下午，毛泽东关于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致电邓子恢等，他写道：

邓子恢同志并告林彪、饶漱石、叶剑英、彭德怀、邓小平同志：

1. 子恢寅真电悉，同意你不随林来北京开会而派李雪峰来。

二、请就你们现正召开的各省负责同志会议中征询关于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电告我们，**即是说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请你们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些。这样做的理由：第一是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是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的。**

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问题，去年11月有饶漱石、邓子恢、李富春3同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中，我曾提出过，惟未作详细的分析和未作出决定，现在已到需要作决定的时机了，决定之后需要修改土地法及其他有关土改的文件，并颁布出去，以利新区各省土改干部的学习，方有利于今年秋后开始土改，否则将错过时机，陷于被动。因此，不但请中南局，而且请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的同志们对此问题加以讨论，并请将此电转发所属各省省委各市市委加以讨论，将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收集起来迅速电告中央，以凭考虑决策，是为至要。

毛泽东

3月12日下午5时许，毛泽东派车接梁漱溟到中南海颐年堂，林伯渠在座相陪。一番寒暄过后，毛泽东问梁漱溟对国事有何高见？梁漱溟直言相告，他说：

“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是不容易呵！”

毛泽东摆摆手，笑道：

“**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共产党靠大家，大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梁先生这次到了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

梁漱溟的回答，完全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他说：

“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

毛泽东对梁漱溟怀疑新政权的稳固性拒绝参加政府工作，感到不悦。但他很快便转换了话题，又东南西北、古今中外地扯了起来。该吃晚饭了，梁漱溟说：

“我是食素的，有一两样菜就行了，但你们吃什么自便，不碍我的事。”

毛泽东笑着大声说道：

“我们也通通吃素食，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

服务员端上饭菜，江青也来到了餐厅，与梁漱溟、林伯渠打过招呼，坐在毛泽东身边陪同客人一同进餐。毛泽东向梁漱溟建议说：

“你不是在山东、河南农村搞过乡村建设吗？你现在可以看看解放后有何变化，然后再去东北的老解放区看看，比较比较。具体行程我让李维汉、徐冰安排，他们会通知地方政府接待你的。”

梁漱溟欣然接受了毛泽东的提议。

3月1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禁演旧剧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他写道：

东北局并转宣传部：

东北戏曲改革工作，由于在编写修改剧本上采取了与旧艺人合作的群众路线，获得了成绩，这是好的。但**你们提出号召，要在1951年底前在全东北肃清含有封建、迷信、淫荡等毒素的旧戏曲，则是一种急性病，机械执行起来将发生很不好的结果。**不知实现这一号召的根据及执行计划如何？如果你们依靠行政命令的办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则是错误的。近据东北来京艺人所谈及沈市报上消息，因你处禁演旧戏太多，能唱的戏太少，以致有些地方（如沈阳）的旧剧班无法维持下去，艺人生活很成问题，有些戏院，就“贴新戏，演旧戏”应付政府。如根据你们这一号召，并以行政命令的办法来实行这个号召，今后将会禁演更多旧剧。戏曲新报载李纶的《应禁演的和可上演的旧剧剧目及说明》，其中“应禁演的旧剧”，到该报第7期止，已列有142出之多。该报第36期载锦州市文联从现在可演的225出中，除立即禁演一部分旧剧外，并计划在今年10月底以前分3期禁演92出，同时又规定各戏院、茶社上演新节目的比例，本年内要达到30%。这种限期消灭旧戏的办法是不妥当的。因为新旧戏的斗争，是属于群众思想的问题，同时也是关系旧艺人职业的社会问题。过多地禁演旧戏，一方面使旧艺人无戏可演，势必大批失业；另一方面又因新戏在数量与质量上都还不能满足市场需要，致使群众无戏可看，引起群众不满，同时新戏如不讲求改进，粗制滥造，亦将反而影响其在群众中的威信与推广的前途。

**现在人民已经取得政权，旧艺人亦归向我们。对于一般旧戏，原则上不应采取禁的政策，而应采取与演这些戏的旧艺人共同商量修改的政策。对于演新戏，也不应用法令来强制执行，而应采取自愿和鼓励帮助的原则。只有这样做，才能既团结旧艺人，又改革了旧戏。**

**对于东北文艺工作者及政府文化机关工作人员中的某些“左”倾幼稚病的观点和作法，望东北局加以纠正。**并将东北戏剧改革实际情况与经验告知。

中 央

3月14日，毛泽东给湘潭县良湖乡广福村农民郭仕逵复了一封信。

本传前边说过，毛泽东早在1925年8月底在家乡韶山组织农民运动时，湖南军阀赵恒惕要捉拿他，湘潭县议员郭麓宾闻讯后，派侄子郭仕逵给毛泽东送信，帮他脱险。1949年10月5日，郭仕逵写信给毛泽东说，他的生活困难，希望在外省给他安排一份工作。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仕逵先生：

去年10月5日来信收到，迟复为歉。先生处境困难，深为系念。工作问题，仍以就近设法等候机会为宜，不宜远出省外，徒劳往返。

顺问近安！

　　 毛泽东 1950年3月14日

3月14日，毛泽东复信给湖南军政委员会顾问刘揆一先生，他在信中写道：

霖生先生有道：

去年12月27日大示奉悉，极为欣慰，迟复为歉。征粮流弊，政府已发令纠正，不知近日有所缓和否？匪祸必剿，首恶必办，是为定则；惟剿办须有策略步骤，以期迅速解决，安定全境。湖南匪患闻已大体解决，是否如此，先生所知如何？尚祈便中见告。敬颂大安，不具！

毛泽东 1950年3月14日

3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他写道：

中南局，华东局，西南局，西北局，华南分局，陈宋、贺李（指陈赓、宋任穷、贺龙、李井泉——笔者注），新疆分局，山东分局，并告华北局，东北局，内蒙分局，并转各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

最近各新解放区的股匪有许多地区业已肃清，另有许多地区的股匪则正在清剿中。但在股匪业已肃清地区，又发生多次反革命的武装暴动，杀害我们干部多人，抢劫甚多公粮和物资，并在各地工厂、仓库、铁路和轮船上进行了多次的破坏。这证明在这些地区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仍然是十分猖獗的；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亦给了反革命分子以造谣和鼓动群众的机会。对于这些反革命活动，各地必须给以严厉的及时的镇压，决不能过分宽容，让其猖獗。为此，中央特作如下各项指示：

一、**对于一切手持武器，聚众暴动，向我公共机关和干部进攻，抢劫仓库物资之匪众，必须给以坚决的镇压和剿灭，不得稍有犹豫**。**在捕获这些匪众后，必须严加追问，以便捕获其首要和组织者处以极刑。**如果我们部队来不及镇压，匪众早已星散者，亦须派部队和得力干部前去出事地区严加清查，**力求清出匪首和组织者，加以处罚，不得敷衍了事**。

二、**在我们统治地区进行反革命的活动和组织，有确实证据者，须处以极刑或长期徒刑。为了反革命的目的而杀害我们干部，破坏工厂、仓库、铁路、轮船及其他公共财产者，一般应处以死刑。**不是为了反革命的目的，而是为了其他目的，例如私人仇杀及偷窃公共物资等，亦须处刑，但应与反革命行为加以区别。

三、在剿匪地区，**对于土匪过去的犯罪行为，只要他们投降，改邪归正，一般是可以既往不咎的。**但对于继续抵抗我军的土匪首领，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分子，窝藏与勾结土匪的豪绅地主，继续抵抗、不愿改邪归正的惯匪，应加以严厉处罚，处以长期徒刑或死刑。对于参加土匪部队的一般群众，则令其改过生产。

四、**在实行上述各项镇压反革命活动和土匪的行动中，决不应发生乱打乱杀、错打错杀的现象。此事应由各省委、省政府的负责同志亲自掌握。死刑及长期徒刑应经法院审讯和判决，在判决后，应经省政府主席或省政府委托之专员或其他负责人批准后，方得执行。**但这种审判和批准的手续应该简便迅速，以便在情况紧急时能及时地加以镇压。如果在某地发生乱打乱杀、错打错杀现象，则必须立即坚决地令其停止，然后加以审查。

五、为了有效地镇压反革命活动，在我们工作有缺点的地方，必须迅速认真地纠正缺点，以便安定民心，孤立反革命分子。某些地方有灾荒或有一部分贫苦人民缺乏食粮的现象，必须认真地组织群众生产救灾，并以一部分公粮出卖，到实在困难的时候，对实在无法度过灾荒的某一部分人，还须给以救济，或借给一部分粮食，在收获后归还。只有一方面认真地安抚人民，纠正自己在工作中及作风上的缺点；另一方面，给反革命分子的暴动捣乱破坏行为以严厉的镇压，又对其胁从分子、罪恶不大的分子给以宽大处理，令其改过自新，才能巩固地建立人民的革命秩序。

　 中共中央

3月20日，毛泽东复电张治中说：

“寅佳电悉。1、同意先生来京面叙，何日启程盼告。2、沿途护卫请剑英布置。”

3月间的一天下午，陶峙岳赴北京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受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接待，陶峙岳感到兴奋和荣幸。

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陶峙岳，因为陶峙岳是湖南宁乡人，毛泽东满面春风地握着陶峙岳的手，说道：

“陶将军，我们还是湖南老乡哩。”

毛泽东态度诚恳，平易近人，使陶峙岳想起了1930年蒋介石在蚌埠火车上接见他的情景：蒋介石只是略一点头，鼻子里哼哼几下，那不可一世的态度，与毛泽东形成鲜明的对照。

陶峙岳向毛泽东汇报了新疆的工作，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听着，频频点头。毛泽东插话时，对陶峙岳提出了3点要求：

1、改造起义部队，使他们真正成为人民的军队。2、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必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以加强民族团结。3、积极建设祖国边疆和保卫边疆。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与陶峙岳共进晚餐，席间虽无山珍海味，但那几色湖南家乡风味菜肴，使陶峙岳倍感亲切。毛泽东像对待老朋友一样，边吃边谈，垂询备至。毛泽东和陶峙岳一直谈到深夜，毫无倦态之容。他们谈话的内容涉猎甚广，不仅谈国家大事，也谈到陶峙岳的家庭情况。毛泽东还诚恳地对陶峙岳说：

“要好好学习，不断进步，过好三关。第一关是解放战争关，现已过去，过得很好。第二是土地改革关，不久就要过去。第三是社会主义关，现在还没有开始，要有思想准备。”

3月间，香港拍摄的电影《清宫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风风火火地上映。身为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的江青看过影片之后，认为这部影片“内容反动”，宣扬“卖国主义”。她在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还说：

“拍摄放映这样的电影，应该向中央请示。”

“请示谁？”中宣部长陆定一不客气地说：“他们拍片子，肯定是请示了有关领导。你说影片不好，还有说好的呢，我们该听谁的？总不能拍一部片子到处去请示中央领导吧。”

胡乔木也慢条斯理地插话说：

“这部影片我们请示过少奇同志，他说：‘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影片，拍得不错’。”

江青把这些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说：

“电影《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影片，应该进行批判。”

江青将毛泽东的话转告给陆定一，陆定一向刘少奇做了汇报。刘少奇说：

**“这是主席听了他老婆的话，无事生非。江青在30年代和文化界的一些领导同志关系搞得不好，总想找他们的一些把柄。此事宜大事化小，千万不要让江青小题大做，乱了我们的工作。”**

3月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财政经济、土地改革和军事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主要是抓了一个财政问题。目前财政经济的好转还只是财政的好转，并不是经济的好转；财政的好转也只能说是开始好转，根本好转需要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目前财政上已经打了一个胜仗，现在的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业。”

“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

“**我们是一个大党，策略上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我们现在胜利了，要巩固胜利，更要注意，要反对‘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

3月30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份极其特殊的《中央为公布新的土地法征求各地对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电报，全文如下：

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华南分局，西北局，陈、宋（指陈赓、宋任穷——笔者注）并转各省委，并告东北局，华北局：

为准备秋收后在一些省区实行土地改革，拟以中央人民政府名义公布新的土地法及划分阶级的决定。在新的情况下，过去公布之土地法大纲及1933年文件，经我们研究后，有些地方已可做肯定的修改，有些问题则仍须征求各地意见。兹将拟征求各地意见的诸问题开列于后，望于研究后在20天内答复。

一、土地改革可否分为两个阶段，两个阶段的间隔不是几个月，而许是几年。**在第一阶段内，采取中立富农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即是说只没收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牲畜、农具、粮食、房屋，而对富农的土地财产一律不动。照此办法，无地少地的农民能分到多少土地，相当于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几十？

二、对富农的政策，如只没收分配其出租的土地，其余的土地财产一概不动，这是否仍能达到中立富农之目的？照此办法，连同没收地主之土地，加以分配后，无地少地的农民又能分到多少土地，相当于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几十？

三、在这种“僧多粥少”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规定：1、对向来不依靠农业为生的人，原则上一律不分给土地。2、不动富农时，雇工可否不分地，而只适当地改善其工资待遇？

四、假如富农的财产全部不动，而地主一般又没有多少耕畜、农具和存粮，农民分得土地后，生产资金的困难有无办法解决，又如何解决？

五、**高利贷问题究应如何处理？能否规定出一个一般性的标准作为高利和普通利息之间的界限，并规定出适当的处理办法，以便使农民既能免除过去高利贷的盘剥，而今后农村借贷关系又不致搞死**；还是在新的土地法中不提高利贷问题，还是只废除地主的债权，而其他一律不废？

六、对南方的鱼塘、桑田、竹园、茶山等特殊土地应注意哪些具体问题，你们的处理意见如何？此外，还有哪些特殊土地问题应该在新的土地法中加以规定？

七、江浙部分地区有所谓田底权与田面权（即永久使用权，但与永佃权又有不同，因为田面权还可出租和买卖）问题，在分配土地时，对田面权特别是中贫农的田面权应如何处理？其他地方是否也有此问题？

八、在分配土地时对典当地应如何处理？

九、分配土地的方法应如何规定？以乡（行政村）为单位分配土地有无困难，分配土地的单位以如何规定为宜？

十、县政府内可否成立吸收开明绅士参加的土地委员会负责处理土地改革事宜，还是即由农协办理？

十一、南方富农的收入与剥削的情况比北方均较为复杂，在划分阶级计算总收入与剥削收入时，是只按其在农业上的总收入与剥削收入计算为好，还是连同其在副业及其他方面的收入与剥削收入一起计算为好？这两种不同计算方法在实际上会产生何种不同的结果？

十二、佃富农是否可以参加农会？

十三、在分配土地时，有无留出一部“公共事业田”之必要？

十四、东北华北虽已完全实行或大部实行了分配土地，但对以上各项问题，仍望就你们的经验及所见电告。

中央 1950年3月30日

1950年4月2日，毛泽东应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的请求，为《人民教育》杂志创刊号题词：“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

他在给马叙伦的复信中写道：

夷初先生：

示悉。遵嘱写了几个字，是否可用请酌。

此颂 日安！

毛泽东 4月2日

4月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在民族杂居地区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指示》，他写道：

西南局并西北局、中南局、华南分局、华东局、山东分局、华北局、东北局：

3月27日电悉。西南汉族与藏、苗、彝等族杂居的专区和县的各级政府，若当地少数民族占多数时，原则上应按各民族人口比例，分配当地政府委员会及人民代表会议的名额，大量吸收少数民族中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若当地少数民族占少数时，各少数民族在当地政府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这样**组成民族民主联合的政府，在取得少数民族信任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方面，作用很大，应该特别注意**。这样的各级联合政府中，少数民族的委员就可以反映他们民族的要求和意见。政府凡在处理关涉到少数民族的工作问题时，必须和少数民族的委员充分协商，力求取得他们的同意，然后做出决定。在初解放的地区一时不可能依上项原则组成政府委员会，则可先成立民族协商委员会，遇有关系民族的重要问题，先经协商委员会协商，取得大多数同意，然后提交政府决定执行。但此系过渡方式，必须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早日成立依据上项原则组成的政府委员会。同时民族杂居地区政府的各种工作，无不与当地各个民族相关联，因此当地的整个政府都要作少数民族的工作，即不需要再设立民族事务委员会，以免减轻政府委员会及所属各部门对少数民族工作的责任，以致有关少数民族的问题不能很好的解决。省级政府如贵州、云南，需要设立民族事务委员会，如青海、新疆，即是包括两个以上具有相当数量人口的多民族省份，其政府组织也应依据上述民族杂居的专县政府组织原则，不必另设民族事务委员会。已设立者可使之成为研究和联络性质的机构。你们如有不同意见或其他意见，望告。

中央 1950年4月3日

1950年春的一天，杨开慧的叔叔杨昌恺之女、烈士杨开明的胞妹杨开英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一见面就握着她的手，亲切地说：

“你就是友妹啊！”

杨开英乳名友妹，比杨开慧小14岁。杨开慧牺牲后，杨开英常常看望向振熙，在伯母跟前尽一份孝心。她与杨开智也情同手足。1949年冬，杨开英在湖南大学毕业后去大连参加工作，任教于大连工学院。杨开英从小患有肺病，家里无钱医治，参加教育工作后，常年劳累，病情日益加重。她这次来北京治病，顺便看望毛泽东。

这是毛泽东多年来第一次见到杨家人，显得格外兴奋，详细询问了杨开英的近况、杨老太太向振熙和杨家亲戚在解放前的经历及目前的生活状况。在谈到杨开慧时，毛泽东的眼眶湿润了，他动情地说：

“友妹，你霞姐是积极主张武装斗争的。你霞姐是有孩子在身边英勇牺牲的，很难得啊！”

杨开英听了，不断发出感叹，喃喃地说：

“是啊，霞姐是很坚强的。她为革命而牺牲，死得其所！”

毛泽东看着身体虚弱的杨开英，怕她沉浸在哀伤中，就转换了话题，说道：

“友妹，你的病怎样啊？是不是好些了？”

杨开英说：

“正在治疗，打针吃药，病已经好多了。”

“有病就治，该休息就休息，该住院就住院。大连不方便，你就来北京治疗吧。”

毛泽东看到杨开英病得不轻，就想叫她留在北京治疗，并嘱咐她说：

“友妹，你要多保重身体呀！”

杨开英自觉不便在中南海久留，她感激地点点头，也说道：

“主席，您也要保重啊！”

杨开英返回大连后，调任大连育英中学教务处副主任。

4月10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3次会议上，讲到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说：

“条约定下来比不定好。定下来，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不然人家整我们，给我们增加困难。现在把两国的友谊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我们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为建设，也为外交，而外交也是为建设。**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

4月12日，周恩来将第1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工商组讨论的发言记录稿分送给毛泽东和刘少奇。他还嘱咐叶子龙立即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对这份发言记录稿读得非常仔细，在那些党内干部发言的重点部分又画、又圈、又点，在打问号的地方还密密麻麻地写下了大段的批语：

一、在发言记录稿谈到“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处，毛泽东批道：“**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

二、在发言记录稿谈到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和排挤处，毛泽东批道：**“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三、在发言记录稿谈到私营工商业“要求划分阵地，要河水不犯井水，我们不允许”处，毛泽东批道：**“应当划分阵地，即划分经营范围。讲得很幼稚。”**

四、在发言记录稿谈到“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处，毛泽东批道：**“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

五、在发言记录稿谈到“我们的政策，是要‘与民争利’。但他们所谓的‘民’，是资产阶级。我们则要争于人民有利的事情。我们说，我们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老百姓点灯’。但这里的‘州官’是人民，我们放火可以，你们点灯就违反群众利益”处，毛泽东在旁边重重地画了一道杠，批道：**“完全错误的说法。”**

六、在发言记录稿谈到“‘与民争利’，表现在粮食、花纱布、火柴、百货、盐的控制”处，毛泽东批道：“**除盐外，应当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

七、在发言记录稿谈到“百货公司必须建立，不然即不能稳定物价”处，毛泽东批道：**“建立百货公司，并不是代替全部商业。”**

八、在发言记录稿谈到“大资本家要停工，我们就让他停工。我们有钱，就接收过来”处，毛泽东批道：“**这是不对的**。”

批完以后，他让工作人员将这份材料先后送给彭德怀、林彪、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薄一波、彭真、胡乔木以及发言者本人传阅。

接着，毛泽东在第4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关于中南部队复员问题给邓子恢、谭政、赵尔陆和陶铸的电报上加写了一段话：

“**应积极地提出复员是为了返回家乡发展生产和建设民兵，回乡后应服从区乡政府领导，在人民中起模范作用，而不可乱来。**”

4月13日，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此后，印度尼西亚第一任驻华大使莫诺努图拜访毛泽东，并向毛泽东递交国书。这天上午10时，莫诺努图在紫禁城的朱红大门前，受到中国礼宾司司长的欢迎，乐队奏起中国和印尼国歌。莫诺努图的6名随从留了下来，被领进另一个房间，去喝香槟，吃中国甜点心。莫诺努图被领进一个古色古香的大厅。大厅两旁摆着明代瓷花瓶，一条巨大的红色地毯铺在中间。莫诺努图穿过大厅，一扇门轻轻打开，他走进装饰相同的第2个大厅。这时，又一扇门打开了，毛泽东就站在那里，他高大、沉着、慈祥。

在接见外国大使前，罗瑞卿见毛泽东穿着浅色衣服和一双棕色皮鞋，就说：

“主席，你还是换上深色衣服和黑皮鞋吧。”

毛泽东问：

“为什么？”

罗瑞卿说：

“按照国外惯例……”

毛泽东打断了他的话，不屑地说：

“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按国外惯例呢！”

毛泽东宁可不经意地穿着旧衬衫、旧裤子。最后，他还是接受了一种折中方案：穿中山装和棕色皮鞋。

毛泽东接受了大使递交的国书。一直陪同在旁的周恩来，把大使领进隔壁的房间。在房间里，毛泽东和莫诺努图就爱国主义与和平问题，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例行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起身离去。莫诺努图随着周恩来从另一个门走了出去。

4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7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们国家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整个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有3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军政费用的大量节减。这些应当争取逐步实现，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时就可以出现根本的好转。**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

“《共同纲领》的规定，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各种社会经济成份，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必须充分实现，方有利于整个人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现在已经发生的在这方面的某些混乱思想，必须澄清。”

4月13日晚，毛泽东为祝贺向振熙80寿辰，准备让长子毛岸英回湖南省亲。他神情沉重地对毛岸英说：

“你现在可以回家一趟了，代我给你母亲扫墓。带些东西，代我为老太太上寿。再到湘潭老家看看，向乡亲们问好。”

毛泽东又说：

“你妈妈是个很贤惠的人，又很有气魄，对我帮助很大。她的父亲杨昌济老人是个进步人士，对我资助不少。你外婆也是一个贤德高尚的人，她全力支持我和你妈妈的事业，我很怀念……”

他的眼睛湿润了，声音有些哽咽。

接着，毛泽东以他和江青的名义分别给杨老太太向振熙和杨开智夫妇写了信。在给杨老太太的亲笔信中，他写道：

向老太太尊鉴：

欣逢老太太八十大寿，因令小儿岸英回湘致敬，并奉人参、鹿茸、衣料等微物，以表祝贺之忱，尚祈笑纳为幸。

敬颂康吉！

毛泽东 江 青 1950年4月13日

杨开智，字子珍。毛泽东在给他们夫妇的信中，这样称呼：

子珍、崇德同志：

来信收到。你们在省府工作，甚好，望积极努力，表现成绩。小儿岸英回湘为老太太上寿，并为他母亲扫墓，同时看望你们，请你们给他以指教为荷。

此问近佳！

毛泽东 1950年4月13日

4月15日，毛泽东给《人民空军》杂志题词：

“创造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

4月16日晚，毛泽东给陈毅发去了一封复电。

陈毅是在4月15日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之际，致电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了上海的“四月危机”及他们的工作。他还说：“多年来的毒，到目前已到迸发的时候，其困难和紧张是自然的。我们力争比较转得好一些，力争痛苦少一些。本你的指示精神去办，可以办得下去的。”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陈毅同志：

删午电悉。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能照正确原则解决，取得各方同意妥慎进行，甚好甚慰。**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你们把握了这一点，就可以减少阻力，就有了主动权。会议情形，望随时电告。

毛泽东 4月16日22时

4月18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宴招待晋京汇报工作的董其武。作陪的有周恩来、宋庆龄、张澜、林伯渠、聂荣臻、薄一波、傅作义、郭沫若。

下午6点钟，毛泽东来了，他笑容满面地握着董其武的手说：

“董其武将军好吗？”

董其武答道：

“好！是毛主席挽救了我。”

宴会结束后，毛泽东和大家一起到怀仁堂，观看了文艺演出。

是日晚，毛泽东给早年东山高等小学堂的旧交毛森品写了一封信。

毛森品是毛泽东在湘乡县东山学校读书的同学，后来，又一同进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学习，两人关系很好。解放后，毛森品几次致信给毛泽东，提出请毛泽东推荐工作，毛泽东很委婉地加以拒绝，他在复信中写道：

“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

后来，毛泽东又两次给毛森品写信，曾前后3次赠款给毛森品，前两次各寄200元；第3次托同是同学的萧三带去现金150元。同时表达了对另一位旧交毛钦明烈士、即毛森品的哥哥的怀念之情。

18日这天晚上，毛泽东又给在长沙第10中学任教的李淑一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李淑一在1月17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祝贺他领导中国人民扭转乾坤的胜利，并把杨开慧牺牲的情形及自己在白区20多年的痛苦生活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淑一同志：

来信收到。直荀牺牲，抚孤成立，艰苦备尝，极为佩慰。学习马列主义，可于工作之暇为之，不必远道来京，即可达到目的。肖聃、午亭两位老先生前乞为致候。顺颂

健康！

毛泽东

信中提到的直荀就是柳直荀；肖聃即李淑一的父亲；午亭即柳直荀的父亲。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柳直荀是湖南长沙人，是毛泽东早年的战友，曾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李淑一是杨开慧的同学，在长沙私立福湘女子中学时两人住在一个寝室里，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李淑一与柳直荀二人就是经杨开慧介绍认识的。柳直荀参加过南昌起义，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政治部主任、第3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32年5月，在洪湖地区被王明“左”倾路线忠实执行者夏曦主持的“肃反”运动杀害。

4月19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

一、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教育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在报纸刊物上作关于这些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在今天是更加突出地重要起来了。因为今天大陆上的战争已经结束，**我们的党已经领导着全国的政权，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很容易危害广大人民的利益，而由于政权领导者的地位，领导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在党内党外拒绝批评，压制批评。**由于这些新的情况的产生，如果我们对于我们党的人民政府的及所有经济机关和群众团体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公开地及时地在全党和广大人民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由于这样的原因，**中共中央特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二、为了公开地并且在报纸刊物上正确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应当在党内和人民中进行两方面的教育。第一，**要教育党员特别是干部认识：在报纸刊物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为了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保障党和国家的民主化、加速社会进步的必要方法。**使得人民群众能够自由地在报纸刊物上发表他们对于党和人民政府的批评和建议，纵然这些批评和建议并非完全成熟与完全正确，而他们也不会因此受到打击与嘲笑，乃是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性和积极性，吸引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的严重步骤。因此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必须对于反映群众意见的批评采取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革命态度，而**反对对群众批评置之不理、限制发表和对批评者实行打击、报复与嘲笑的官僚主义态度。**这在今天是主要的方面。第二，要同时教育报纸刊物的编辑人员、记者、通讯员和人民群众去区别正确的批评和破坏性的批评。**我们所提倡的批评，乃是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农民）以促进和巩固国家建设事业为目的的、有原则性有建设性的、与人为善的批评，而不是为着反对人民民主制度和共同纲领、为着破坏纪律和领导、为着打击人民群众前进的信心和热情，造成悲观失望情绪和散漫分裂状态的那种破坏性的批评。**报纸刊物的编辑人员、记者、通讯员和试报组，应当欢迎和领导正确的批评而反对破坏性的批评。对于这种破坏性的批评，特别是反革命分子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的言论，则是应该而且必须加以拒绝的。

三、为了保障在报纸刊物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得以顺利而有效的进行，中共中央特规定下列各项办法，望各级党委与党报工作者切实地加以执行：

（甲）凡在报纸刊物上公布的批评，都由报纸刊物的记者和编辑负独立的责任。过去在许多地方曾经实行一种办法，就是把批评党和政府的组织与人员的稿件送给被批评的组织和人员阅看，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才加以发表。这种办法，在战争期间调查不便的条件下，曾经避免了许多不完全符合实际的和不周到的批评，但是在现时的条件下继续采取这种办法却是害多利少的，不对的。在今后，报纸刊物的人员对于自己不能决定真伪的批评仍然可以而且应当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但是只要报纸刊物确认这种批评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

（乙）对于工农通讯员的稿件，同样适用上述办法。工农通讯员的工作，除由报纸领导外，并应由所属生产单位的党的组织加以协助。工农通讯员的活动状况，应列为检查报纸工作和各生产单位党的工作的项目之一。任何人不得滥用权力压制工农通讯员在报纸刊物上的批评，或加以报复。

（丙）读者来信中的有益的批评，凡报纸刊物能判断其为真实者，应当加以发表。投书者应将真实姓名住址告知报社，但报社得依投书者的要求代守秘密。

（丁）批评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后，如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如有部分失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作出实事求是的更正，而接受批评的正确部分。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加以打击，即应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处理。上述情事触犯行政纪律的法律的部分，应由国家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予以处理。

1. 规定列宁《论我们报纸的性质》，斯大林《论自我批评》、《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毛泽东同志《论自我批评》，和《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和苏维埃的报刊的决议》作为各级党委和党报党刊在讨论和执行本决定时的学习资料。

五、本决定适用于党所领导的报纸和刊物，但党外报纸和刊物在同样精神上采取同样正确的态度批评党的组织和人员时，党也应当按照同样的办法给予应有的合作和支持。

欲知毛泽东以后如何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对于重大问题总是认真调查研究、反复讨论斟酌而后作出决策。他在1950年3月3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电报《为公布新的土地法征求各地对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拟出征求意见诸问题有13条之多，这种做法在中外历史上实属罕见，但在他个人则是一贯的作风。这一类史实本传多有记述，而上述这一篇尤具特色，故立此存照，昭示后人。

**第12章**

**“真正了不起的是人民，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历史靠人民来书写。人**

**民要和平，和平就一定要实现，谁敢逆潮流而动，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话说1950年4月19日晚，毛泽东给表兄文运昌写了一封回信。

文运昌几次给久违22年的“润之老表主席”来信，以浓重的笔墨祝贺表弟的丰功伟绩和对表弟深深地思念，叙说了文家亲人几十年的痛苦遭遇；提出了他想到的治国之策。他在最后还写道：

“又：姑父姑母玉照，代为保管好。姑母像，挂在我的家中，每岁正月初八日，我内室杨氏虔诚祭拜。姑父像，在南松弟家。你老表像都在一起，容貌威严，少时可畏。异日，我五弟兄专为送上北京，作人生难得有之亲爱，亦作世间难得有之亲爱，定当大笑于云霄。”

文运昌又附上了他写给四表弟毛泽民的信。

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运昌仁兄如晤：

接到你的许多信，感谢你的好意，因忙迟复为歉。吾兄健存，儿孙众多，可为庆贺。地方工作缺点甚多，应予纠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见告。泽民、泽覃均已殉难，知注并闻。顺颂

安吉

毛泽东

毛泽东又复信给向明卿老先生，他写道：

明卿先生惠鉴：

去年10月12日来信早已收到，因事迟复为歉。令侄向钧同志是共产党员，1927年曾任衡山县委书记，是个忠实能干的同志。1927年国民党叛变被捕，光荣殉难。以上这些，先生可以报告湖南省委。唯抚恤一事，须统一行之，不能只顾少数。如省委未能即办，先生亦宜于体谅。此复，

敬颂大安！

毛泽东

接着，毛泽东给贺晓秋写了一封回信。

贺晓秋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反映说：乡下分了田，生活有了保障，农民大多可以凭本事自食其力。但有些工作还要完善，有些缺点要迅速改正，要顺理民意，体察民情，要给农民以看得见的权益。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晓秋贤弟如见：

去年12月22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所说各项工作缺点，应当改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告我。接到晓明一信，我分不清谁是兄谁是弟，请你来信说明。

此问安好

毛泽东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晓明，与贺晓秋同是毛泽东二姑妈贺毛氏的儿子。

4月21日，毛泽东召见李维汉、徐冰谈统战工作，他说：

“对民主党派及非党人物不重视，是一种社会舆论。不仅党内有，党外也有。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对民主党派要给事做，尊重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干部一样。要团结他们，使他们进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如党派经费、民主人士旅费等。**华南分局陪送张治中来北京的人，一下车就向张治中要求交路费。聘请到东北去工作的教员，发现是民主党派分子的，就不愿意要，让他们在东北周游一下又送回去，等等；这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要求平等、博爱、自由，我们这样做就不是平等，不是博爱而是偏爱。手掌是肉，手背是肉，不能有厚薄。**我们要解放全人类，资产阶级、地主也要帮助他们解放，改造他们。这就是博爱。要实行民主。**现在有人有好多气没有机会出，要让他们出，除了泄密的、破坏性的，都让人家说。所以，政治局最近通过了一个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出的气不外是两种，有理的，应当接受；无理的，给他说理。**我们要有气魄，不怕骂，只要君子动口不动手。不让讲话就会闹宗派主义，党内也一样。”**

4月21日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军队分批复员以减轻人民负担”问题给邓子恢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邓谭赵陶，陈饶粟，刘邓贺，彭习张：

一、4月12日林彪同志给邓谭赵陶关于**中南区今年复员53万至60万人**的电报谅已收到。我们**希望这个复员工作能于5月至8月4个月内做到，以便节省出9月至12月共4个月的经费，减轻人民一部分粮税负担。**请中南局专为此事开一次会议，详尽地讨论一下，并**订出在4个月内分批复员而又不出乱子的具体计划和具体办法**。此种计划和办法希望能在5月1日以前电告我们审阅，并请电告4个月内分批复员53万至60万人这项巨大工作有何困难，是否可以克服这些困难。

1. 请饶陈粟亦照上述意图做出华东区复员计划，亦于5月1日以前电告我们。**华东区只留下军队及地方武装共100万人。**

三、**请刘邓贺考虑一下是否可以亦照上述意图办理复员工作，只留下军队及地方武装80万人而又不出乱子**。

四、请彭习张考虑电告西北方面可以复员多少人，并是否可于4个月内办理完毕。

中央 4月21日

4月23日，毛泽东给陈毅复了一封电报。

陈毅在4月21日来电说，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传达了毛泽东4月13日的讲话精神，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和民主人士“表示欢迎，其悲观失望情绪可相对减少”。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目前几个月确实应当用大力来做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维持生产与救济失业的艰巨工作。”

4月25日，毛泽东签署中央军委命令，任命陈锡联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

4月27日下午，傅作义来到董其武的住处，一见董其武就笑着说：

“其武啊，你要受到明师真传了。”

董其武一听就猜到是毛泽东要召见他。果然不错，只见傅作义又说道：

“今晚，毛主席要召见你和高克林书记。”

董其武听他这么说，非常高兴地换上了一身新的灰士林平面布中山装，带上自来水笔，立即和傅作义一起去找高克林，乘车去中南海。

晚7时，傅作义、董其武、高克林到了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已经在此等候了。在场的还有周恩来、朱德、聂荣臻、薄一波。董其武向毛泽东恭恭敬敬地行了礼，走上前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毛泽东把董其武和高克林让到附近的座位上，询问了绥远的情况，对董其武称赞道：

“你的文章我看到了，工作还是很有成绩的嘛！”

毛泽东所说的文章，是董其武4月14日在政务院28次会议上的工作汇报全文。4月17日，新华社将此文向全国各新闻单位发了通稿；《人民日报》、《绥远日报》都在4月18日第一版上全文刊登。毛泽东接着说：

“起义是一件好事，给你的复电是我亲笔写的，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争进步嘛！蒋用钱用官来破坏你们，不得人心嘛！他们终于失败了。”

他指着傅作义对董其武说：

“他和我们打交道多了，你还没有和共产党共多少事。有人害怕共产党，共产党也是人嘛，有什么可怕哩？不过是多一个党小组，这个党小组每周要过一个党日。党日是干什么的？党日是对共产党员工作有成绩要表扬、要巩固、要提高；对做错的事要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搞别人的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

毛泽东问董其武：

“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吧？”

董其武答：

“不是。”

毛泽东说：

**“共产党与人共事是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桌面上是什么，背地里也是什么，不和蒋介石一样。蒋介石和人共事是讲权术的，搞宗派的，搞码头的，他是私嘛。共产党没有私，共产党人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嘛。”**

他问董其武：

“你能听懂我的话吗？”

董其武说：

“听懂了。”

他又强调说：

**“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众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

顿了一下，毛泽东又说：

“咱们国家经过多年战乱，需要3年好好恢复生产。你回去争取把军队改造好，争取把地方各民族领袖团结好。**香港有不少资本家想回来，我们欢迎他们回来。建国需要钱，为建设美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奋斗。”**

毛泽东谈古论今，滔滔不绝，谈话持续了3个小时。董其武听得几乎入了迷，也顾不上记笔记了。傅作义对毛泽东说：

“主席日理万机，时间宝贵，请休息吧！以后和他们谈话的机会还多嘛！”

毛泽东站起来，风趣地说：

“看，傅先生给我下命令了。那就谈到这里吧！”

他最后叮嘱董其武说：

“你告诉起义人员，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是希望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过去两种制度，有不少是反人民的事情，人民不追究过去了，只看将来。”

毛泽东和傅作义、董其武等人一一握手告别，直送到门口。董其武几次回头，望着还站在门口的毛泽东，心中充满了幸福的感觉。这一夜，他辗转反侧，几乎彻夜失眠，深感毛泽东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伟大人物，真是太感动人了。

4月28日，毛泽东给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北京大学师生员工在4月20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们在信中写道：

毛主席：

我们学校为了纪念“五四”，预备盛大庆祝，并举行与“五四”运动有关的史料展览，想请您给我们一幅题字，以增加展览的价值。希望您答应我们的请求。因为还要匀出装裱的工夫，更希望早几天写给我们。谢谢您！

敬祝身体健康！

国立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 谨启 4月20日

这一天，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也给毛泽东寄去一信，请他为学生会的刊物写点文章。

毛泽东收到这两封信后，在4月21日即为北大写了题词：“祝贺五四三十一周年，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4月28日，他又在给北大学生自治会的复信中写道：

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诸先生：

4月20日来信收到。叫我给你们的刊物写点文章，我是高兴的，可惜我近日颇忙，不能应命，请予原谅。敬祝

进步！

毛泽东

4月28日这一天，自4月16日发起的海南岛战役经过半月作战，人民解放军日夜兼程前进，进抵万宁、陵水、榆林、三亚、八所、北黎一线。捷报传到中南海，毛泽东欣然命笔，给胡乔木写了一个短笺，他写道：

乔木同志：

海南岛即将全部解放，请起草一个贺电，待榆林港解放时即发表。

毛泽东 1950年4月28日

4月（庚寅年农历三月中——笔者注）末的一天，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到城西跨车胡同看望齐白石老人。

第二天下午，天气晴朗，章士钊带着毛泽东的嘱托，邀请齐白石到中南海丰泽园与毛泽东相会。齐白石在看护夏文珠的陪同下，乘坐毛泽东派来的小汽车欣然前往，到了菊香书屋。毛泽东向客人介绍了夫人江青，又介绍了两个女儿及其名字的由来，齐白石说：

“噢，怪不得主席的两位千金名李敏、李讷呀！”

毛泽东和齐白石一见如故，共同的乡音，缩短了彼此的距离，他们用地道的湘潭话谈天说地，论古道今，相见恨晚。毛泽东告诉齐白石，政务院将聘请他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

丰泽园里两株海棠，有3丈多高，正值鲜花盛开之际，艳丽动人。毛泽东、齐白石、章士钊在江青引领下，兴高采烈地观赏了海棠。章士钊兴致所至，即兴吟出了5首七绝：

其一 赤制由来出素王，汉家图箓夙开张。微生也解当王色，粉粉朱朱壮海棠。

其二 棠梨本色自婀娜，海外移根作一家（时与毛夫人论海棠来源——诗人发表时自注）。莫怨东风多顾藉，却教异种出檐牙。

其三 故苑春深花满畦，重来亭馆已凄迷！残年不解胡旋舞，好下东郊入燕泥。

其四 七年曾住海棠溪，门外高花手自题。高意北来看未已，分甘原属旧棠梨。

其五 相望万里羽音沉，海曲羁人怨诽深，几度低回旧词句，海棠开后到如今。

毛泽东、齐白石闻之，齐声称道。齐白石又说：

“实现和平，只能寄厚望于中国共产党。现在，百年战乱结束了，天下太平，老百姓安居乐业，我多年的夙愿实现了。**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收拾破碎山河，共产党了不起，毛主席了不起。”**

毛泽东说：

**“真正了不起的是人民，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历史靠人民来书写。人民要和平，和平就一定要实现，谁敢逆潮流而动，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晚上，毛泽东、江青和齐白石、章士钊共进晚餐，特意准备了以豆豉为主料的几样湖南风味菜。齐白石细细品味，觉得十分可口，连连称好，说：

“好久没有吃过这样的家乡饭了，今天真是幸运。”

毛泽东亲自为齐白石夹菜敬酒，十分热情。他说：

“你原名纯芝，我原来叫咏芝，小名都为阿芝，你我可称得是同乡同名的兄弟。你年长，我该尊你声老哥哟！”

说得众人都哈哈笑了起来。

齐白石向毛泽东敬酒，称赞他是一位“有道仁君”，是个大能人。他为家乡出了这样一个大能人而自豪。毛泽东笑着说：

“咱们是各有长短。搞政治是我的专长，可我却没有画画的天赋，只能当个读者。你我都是用自己的知识专长为人民服务嘛。”

酒酣之间，齐白石说到自己艺术上的“衰年变法”，说是人贵有革新精神。毛泽东说：

“我也在变，从童年时代读四书五经，到后来搞了个中国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接着还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人在变，世道也在变，宇宙万物都是在变的，革新与革命，在变革上同出一理。人生在世，就要不断接受新事物，吸收新东西，在新的时代为新的社会服务。”

这时，朱德也来相陪。齐白石说：

“我终于看到太平盛世了。使民善耕种，处世要和平，这是我一个木匠一个老农一个老百姓的愿望。”

毛泽东说：

“这也是我们大家的共同愿望。”

齐白石说，祝毛泽东、朱德安康；毛泽东、朱德也祝齐白石长寿。齐白石说：

“在我的余年里，要为这个太平盛世多多出力，多画些美好的东西。”

毛泽东说：

“中国画艺术，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要好好挖掘整理，继承发展，传给子孙后代。**我们共产党要比历代皇帝、比国民党更加重视中国画。听说国内外不少收藏家在收藏你的字画，我也是白石艺术的爱好者，是否也可以收藏你的作品呢？”**

齐白石说：

“当然可以。知我者恩人也，恭敬不如从命。”

毛泽东说：

“看来，充当半个收藏家，我还是满可以的。”

说完，大家都笑了。

天色渐晚，齐白石、章士钊起身告辞。齐白石在夏女士的搀扶下，走出客厅。毛泽东、朱德一直送他们上了小汽车。

齐白石回到家里，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天真地把每个细节都告诉了家人，他说：

“因为都是湘潭人，口音一致，每句话都听得真真切切。”

他还说，毛泽东给他夹很烂的菜，敬他几杯葡萄酒。临别时，朱德总司令还特地亲自送他上车。后来，齐白石常对人说：

**“我一辈子见到有地位、有名望的人，并不在少，哪有像毛主席那样的诚挚待人，和蔼可亲，何况是人民的领袖、国家的元首哩！”**

后来，齐白石和毛泽东还有一次非常有趣的交往，这里不得不说一说。那也是毛泽东请齐白石到家中作客，由郭沫若作陪。毛泽东首先向齐白石敬酒，感谢他赠送印章和国画。齐白石闻之一怔，问道：

“我什么时候为主席作过画？”

毛泽东笑着对秘书说：

“把画拿来，请画家亲自鉴别鉴别。”

不多时，秘书拿来一轴画作。郭沫若接过，展开一看，见这幅画画的是一棵郁郁葱葱的李子树，树上落着一群毛绒绒的小鸟，树下伫立着一头憨厚的老牛，老牛正侧着脑袋望着小鸟出神。整幅画构图别致，独具意境。尤其是那头牛，从牛头到牛背至牛尾，只一笔勾出，其势其情，无定法，无定调，而自成格调，足见白石老人的功力过人。

这一幅画原是齐白石练笔时的弃墨。早在新中国建立前，齐白石为了表达对毛泽东的崇敬和爱戴，挑选出名贵的寿山石料，操起刻刀，精心镌刻了朱、白两方“毛泽东”印章，用这幅丢弃的画作包裹好，赶在开国大典前夕，托诗人艾青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见到这幅画，非常珍惜，便让人用全绫装裱好收藏起来。

齐白石闻知事情原委，不好意思地说：

“主席，都怪我疏忽大意，这废作说什么也不能给您，您若喜欢这种笔墨，我回去马上再给您画一幅。”

毛泽东微笑着说：

“我喜欢的就是这一幅嘛。”

郭沫若趁机凑热闹，忙插话说：

“白老这件墨宝是送给郭沫若的。”

“送给你的？”

齐白石诧异地问。郭沫若指着画说：

“这不，画上标着我的名字嘛！”

齐白石再看看画，上面没有一个字。他看着郭沫若，摇摇头。郭沫若见齐白石认真的样子，不由得笑了起来，指着画问道：

“这树上画了几只鸟？”

“5只。”

“树上5只鸟，这不是我的名字吗？”

郭沫若故意把“上5”两个字紧紧连起来，而且语气很重。齐白石手捋长髯大笑起来，说道：

“好！郭老的大号正是‘尚武’，您真是诗人的头脑哇！”

毛泽东却说：

“不然！你二位没看见画上标有本人的名字吗？”

“您的名字？”

郭沫若、齐白石闻言一愣。毛泽东哈哈大笑，怡然自得地说：

“请问，白老画的是什么树？”

“李子树。”

“画得茂盛吗？”

“茂盛。”

“李子树画得茂盛——李德胜——这不是敝人之名讳吗？”

齐白石一听更乐了，他说：

“如此看来，拙画还有点意思。那么，劳驾二位在卷首赏赐几个字，如何？”

郭沫若说：

“我听主席的。”

毛泽东说：

“我听画家的。”

齐白石一抱双拳，说：

“多谢，多谢。”

他将画平铺到旁边桌子上，郭沫若将毛笔递给毛泽东，说：

“请主席先写。”

毛泽东接过笔，略一思索，写道：

“丹青意造本无法；”

郭沫若一看，毛泽东是借用了苏东坡的句子，只是把“我书”换成了“丹青”，巧妙地把苏东坡对自己书法的自谦，变成了对白石老人的赞赏，的确出手不凡，而且是如此的精当。他想起了陆游的一句诗：“此老胸中常有诗”。于是，他接过笔写道：

“画圣胸中常有诗。”

这样，下句与上句就配成了一联，而且对仗工整，一丝不苟！齐白石喜出望外，他说：

“二位大家如此夸奖白石，我可要把它带走啦！”

毛泽东看看郭沫若，说：

“两位政治家斗不过一个艺术家呀！”

一句话说得3人都笑了。

1950年5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所属各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地委同志们；各军区党委，并转所属各兵团军师党委同志们：

由于我党已取得全国胜利，**由于两年多以来党的发展已增加了党员约200万人，其中很多人的思想作风极为不纯，还没有来得及给以有计划的教育训练；由于老党员老干部中亦有很多人骄傲自满，发展了严重的命令主义作风，任意违反党与人民政府的政策，采取蛮横态度去完成工作任务，破坏党与人民政府的威信，引起人民不满，甚且有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犯法乱纪等极端严重现象发生，这些情况，迫切地要求各中央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地委及各大军区党委，在中央的总领导下，领导全党全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严格地整顿全党作风，首先是整顿干部作风。**此项整风运动的主要方式，是阅读某些指定的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此项全党整风任务，要求在今年夏秋冬3季内完成。而在各个现正准备进行土改的新区，则要求在今年夏秋两季首先完成整干任务，以便秋后开始的土改工作能够顺利进行，避免发生严重错误。为了有领导有组织有准备地进行整党整干工作，并避免过去整党时所犯的错误起见，中央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及所属各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各大军区党委，根据自己具体情况，做出整党整干计划，电告中央审查批准，然后按此进行。此项计划，请于最短期内电告为盼。

　 中 央

接着，毛泽东就《关于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地问题》致电邓子恢，他写道：

子恢同志并告漱石：

4月25日电悉。一、**鉴于富农出租地数量不大，暂时不动这点土地影响贫雇农所得土地的数量也不会大，现在我的意见仍以为暂时不动较为适宜**。二、但你们可根据你们自己的各项意见起草一个土改法令草案，由子恢同志于5月15日以后中央开会时带来（子恢同志动身日期另外通知），在中央会议上作最后的讨论和决定。三、如华东局是赞成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土地的，则请华东局起草一个和华中不相同的土改法令草案，以便在中央会议上对照讨论。

毛泽东 5月1日

5月1日这一天，人民解放军占领海南岛全境，共歼灭国民党军33000人。

随后，人民解放军又相继攻占广东沿海的担杆岛、万山群岛、南澳岛、南澎岛等岛屿。至此，人民解放军在中南战场上先后歼灭了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部等共43万人，占领了除西沙、中沙、南沙诸岛外的中南全境。

5月5日，由胡乔木起草、毛泽东审批的中央军委的贺电，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公布：

【新华社5日电讯】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本日电贺海南岛解放。电称：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及广东前线林彪、罗荣桓、邓子恢、谭政、叶剑英、方方、邓华、赖传珠、冯白驹同志，和参加解放海南岛战役的全体军民同志们：

我广东前线人民解放军克服敌人陆海空军的抵抗，在琼崖纵队和海南岛人民的协助下，英勇登陆海南岛，并迅速扫荡残敌，完成全岛的解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向参加解放海南岛战役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和支援这一战役的广东军民致以热烈的祝贺，向长期奋斗的琼崖军民致以热烈的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应当利用海南岛战役的经验，积极准备，为解放台湾、西藏，彻底消灭全部残匪而奋斗。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5月7日，毛泽东就文涧泉表兄代表唐家圫亲友们在1月向他祝贺当上国家主席，并请求为他的本家好友文凯安排工作的来信，复了一信，他写道：

涧泉表兄大鉴：

1月16日来信收到，甚以为慰。唐家圫现在尚有多少人？有饭吃否？十哥、十七哥还健在否？便时请你告我。文凯先生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弟亦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运昌兄连来数信，已复一信寄白蚌口，不知他收到否？南松兄第2次来信已收到，感谢他的好意。此复，顺祝

健康！

毛泽东

接着，他又给赵浦珠写了一封回信。

赵浦珠生于1886年，是毛泽东七舅母文赵氏的侄儿，他的堂妹赵先桂就是毛泽覃指腹为婚的第一个妻子。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与赵浦珠在长沙一同投入湖南新军辎重营当兵，交往益深。后来，他曾在多个中学、农业学校、女子职业及师范学校任文史教员和校长。新中国建立后，赵浦珠在土改时被划为地主。他写了《感时》诗8首，歌颂毛泽东；又写了一封信，请求毛泽东帮助他；连同诗一起寄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在这封回信中写道：

浦珠先生姻兄左右：

惠书及大作收到敬悉，甚为感谢。乡间减租土改等事，弟因不悉具体情形，未便直接干预，请与当地人民政府诸同志妥为接洽，期得持平解决。有便尚祈时示周行。唐家圫诸亲友并致问候之意。此复。顺颂

健吉

毛泽东

5月8日，毛泽东给毛泽庆的妻子宋氏写了一封回信。

毛泽庆是与毛泽东同一祠堂的远房兄弟，字有升，1910年9月出生于湘潭县姜舍镇泉映村颜家湾。他读完私塾后在家务农，大革命时期创办学校，以教书为生；1938年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延安期间，曾多次见到毛泽东，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教诲，很快成为一名八路军的优秀干部，1945年奉命随部队开赴东北，担任过合江省北满军区参谋长，不幸于1947年在合江病故，终年37岁。新中国建立后，毛泽庆的妻子宋氏写信给毛泽东，询问毛泽庆的情况。毛泽东接信后，对毛泽庆的下落也非常系念，向毛远耀、胡觉民等人逐一询问毛泽庆的情况，这才知道毛泽庆已经病故了。

毛泽东在给宋氏的复信中写道：

宋女士：

去年12月来信收到。毛泽庆同志情形不甚清楚，只知其在东北工作，听人说他已病故。他是一个努力工作的同志，极为可惜。此复。顺祝

安吉

毛泽东 1950年5月8日

接着，毛泽东给湘潭县第三区区委宣传委员毛逸民写了一封回信。

毛逸民在1950年1月3日以家乡基层干部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韶山人民的生产、生活和当地社会状况，请求政府对韶山的烈士家属给予特殊照顾。毛泽东接到信后，没有轻易答复。他考虑再三，才写了这封回信。他在信中写道：

逸民同志：

1月3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感谢你详细地将乡里情形告诉我。乡里贫苦人民生活困难，烈士家属更加困难，暂时只好忍耐一点，待土地改革后就可能好一些了。那时，人民政府也可能给人民以一些帮助，例如贷款等。人民就可以逐步改善自己的生活。

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内的事，全国有几百万户烈属，都要照顾，不能单独地特殊地照顾少数地方。但最困难的人民，当地人民政府在减租时土改时及青黄不接的岁月，应当尽可能给以照顾。

你在乡里做工作，很好，可以常常来信，告我以乡中情形。

请代我问候乡里的同志们，希望大家努力和进步。

毛泽东 1950年5月8日

毛泽东又给韶山杨林炉门前罗鹤楼的二女婿黄谱臣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谱臣兄：

1月24日来信收到，很高兴。兄在广西铁路方面工作，很好，希望你继续努力此项工作，不必往别处，也不必回乡。你的夫人是否仍是罗鹤楼先生的次女，如是，请替我向她致问候之意（黄谱臣的原配罗氏病逝于1921年11月——笔者注）。此复，

顺颂大安！

毛泽东 1950年5月8日

毛泽东还给革命烈士毛福轩的弟弟毛春轩写了一封回信。

1949年12月，毛春轩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介绍了家乡的情况，并提出希望毛泽东为他儿子毛浪秋、毛福轩的儿子毛迪秋介绍工作。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春轩叔祖大鉴：

去年12月来信业已收到，甚为感谢。浪秋、迪秋诸位均宜在家工作，不要来北京，以免浪费时间。此复顺祝

春安

毛泽东 1950年5月8日

5月10日，毛泽东给族侄毛照秋写了一封信。

毛照秋的父亲毛旭梅，是毛新梅烈士的胞兄。1925年韶山第一个党支部建立后，毛照秋及父亲毛旭梅、叔父毛望梅、毛仙梅，均在毛新梅的影响下参加了农民运动。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照秋贤侄：

去年12月18日来信收到。家中困难，应在土地改革后在生产中去陆续解决。你父亲旭梅健在，甚慰。请你代我致问候之意。

祝你工作顺利！

毛泽东 1950年5月10日

5月12日，毛泽东给表兄文南松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文运昌给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写信，随信开列了一个14人的名单，都是毛泽东外婆家的亲属，要求照顾安排工作或保送升学。文南松在正月的来信中，也请求毛泽东为其胞兄文运昌介绍工作。毛泽东在给文南松的复信中写道：

南松表兄：

正月来信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运昌兄给我多次信，我回了一信，寄南县白蚌口，不知他收到没有？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十哥、十七哥还在否？十一哥健在甚慰，他有信来，我已回了一信，不知他收到否？你说乡里缺粮，政府不发，不知现在怎么样？还是缺粮吗？政府一点办法也没想吗？来信时请详为告我。此复，即问

近安

毛泽东 1950年5月12日

5月12日，毛泽东又给在长沙工作的毛远悌写了一封回信。

毛远悌，是与毛泽东出了五服的堂弟毛泽癸的儿子，生于1924年，1946年加入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湖南省总工会印刷厂担任经理，先后两次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想到北京读书学习。毛泽东在给他的信中写道：

远悌贤侄：

再次来信收到了，很高兴。你做印厂工作很好，应将此项工作做好，不要来北京。学习事将来有机会再说。远翔是否尚在革大学习，有信请转交。远翔略历我忘记了，务请告我。

此祝进步！

毛泽东

接着，他写了一封由毛远悌转交给毛远翔的信，他写道：

远翔贤侄：

两次来信收到，甚为高兴。你应在湖南设法求得工作，不要来北京，这里人浮于事，不好安置。你的文字已通顺，用力学习，当会有更大进益。

此复，即问近佳

毛泽东

你父母相片收到，请你替我问候他们。

5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还给周文楠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毛泽东接到了周文楠来自沈阳的一封信，信中附有她母亲周陈轩给她的信。周陈轩在信中说：4野路过韶山时，许多人纷纷到毛泽东故居参观，她趁机打听外孙毛楚雄的下落，却没有一点消息。老人在信中还说，自己在韶山独自生活，无人照顾。周文楠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她想接母亲到东北一起生活，但从韶山到沈阳，千里迢迢，需要时间、经费，非常为难。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文楠同志：

来信收到，甚慰。接你母亲去东北和你一道生活一事，我认为是好的。我可以写信给湖南方面发给旅费，惟你母年高，一人在路上无人照顾是否安全，是否需要你自己去湖南接她同去东北方为妥当，请你考虑告我。如你自己去接，我给湖南的信即由你带去，附件还你。江青她们都好。祝你健康！

毛泽东

不久，周文楠携带毛泽东的亲笔信，由沈阳启程南下湖南，路过北京时，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询问了周外婆在韶山的生活情况。周文楠问毛泽东，毛楚雄牺牲的事，该如何讲给周外婆听，毛泽东说：

“**你告诉周外婆，就说我说了，楚雄是个有志气的孩子，是韶山人民的好儿子，送他到国外很远的地方学习了，也不能通信。免得老人家受刺激。时间长了，慢慢也就好了。楚雄年龄不大，为国捐躯，虽死犹荣。**以后要好好照顾周外婆，经常安慰她老人家，让她安度晚年。”

后来，周文楠把母亲接到东北。1954年，周老太太被推选为哈尔滨政协委员。老人和女儿始终生活在一起，颐养天年。逝世后，她的骨灰被安葬在毛泽东故居对面的山坡上，与毛泽民的发妻王淑兰之墓紧邻。周文楠则在1992年9月5日病逝于哈尔滨。

再说5月13日，毛泽东在陈毅5月10日的报告上批示道：

子恢、剑英、小平、德怀、一波、高岗、彭真、黄敬各同志：

兹将陈毅同志5月10日来电转发给你们作参考。上海打退4月危机的经验及目前采取的各项政策，是各地大城市党委值得研究的，请将此项报告转发各主要城市党委研究。

毛泽东 5月13日

陈毅的报告是这样写的：“三四月份，上海社会秩序比较混乱，敌特活动表面化，税收公债政策受到攻击，劳资关系紧张，人心浮动。这些情况以4月上旬最紧张。上海市在解决上述问题稳定局势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经验和政策主要是：调整公私关系，实行公私兼顾；改善劳资关系，照顾双方利益；适当减少税收，救济失业工人；开展自我批评，纠正工作中的缺点等。”“税收问题在上海目前来说，暂时表现出政策与任务不协调的现象，3、4、5三个月的4千亿（每月）比较重了一些，必致走到超过实际利润去收税。”“如果6月份上海能从4千亿降为3千亿左右，在稳定情绪、减少商店关门即起大作用。不知对整个货币回笼作用有否影响？请陈云、薄一波考虑电示。”

5月14日，毛泽东在给陈毅的复电中写道：

陈毅同志，并告漱石：

一、5月10日报告收到，甚好甚慰。所取方针是正确的。

二、6月征税减少1千亿的问题，待研究后由陈云、薄一波答复你。

三、我们决定6月中旬召开政协全国委员会，通过土改法令并讨论调整工商业问题。你不是全国委员会委员，但有些问题须事先和你商量，请你于6月1日来中央一次，留两三天，即可回去。如果你觉得马上来为好，亦可以马上就来。如何？盼复。

毛泽东 5月14日

后来，经毛泽东批准，陈云、薄一波复电陈毅说：

“如果你认为上海6月份税收须从4千亿减为3千亿左右，我们同意。具体减多少，请与华财委商定。”

5月14日这一天，毛泽东电召许光达从兰州回北京，委派他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

1个月后，毛泽东签署中央军委命令，任命许光达为装甲兵司令员兼政委。

5月15日，毛泽东给毛宇居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宇居兄：

迭接数函，极为感谢。乡间情形，尚望随时示知。邹普勋（享二）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时，如兄手中宽裕，请酌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弟归还。另纸请交邹普勋为祷。

即颂 健康

毛泽东 1950年5月15日

这一天，毛岸英带着父亲的叮嘱回湘省亲。他首先到长沙看望外婆，向外婆奉上了人参等礼物。毛岸英的到来，使杨老太太十分高兴，她指着人参说：

“这如何要得，你父亲的身体比我重要呀！”

毛岸英笑道：

“我父亲说，您比他更需要进补，吃了人参，愿您老活100岁。”

杨老太太见大外孙如此说，喜笑颜开，说：

“**别看你爸爸是个大人物，他也有赤子之心。**过去我常给他做些好吃的，现在不能给他做吃的了。”

之后，毛岸英由在湖南省交际处工作的毛远翔和毛新梅烈士的儿子毛特夫陪同，回到板仓给母亲扫墓。在杨开慧墓前，毛岸英放声大哭。他告慰母亲说：

“妈妈！现在解放了。爸爸要我替他回来给您扫墓来啦！妈妈！儿子想念您，我们都想念您啊！”

毛岸英回到韶山后，看望了众乡亲。他本来还要遵照爸爸的嘱托，前去杨林炉门前看望罗鹤楼的侄儿罗石泉舅舅。没想到罗石泉得知毛岸英回到韶山冲的消息后，立即从杨林赶来韶山冲，同外甥毛旭一起到毛鉴公祠与毛岸英会面。毛岸英转达了父亲的问候，详细询问了罗家的情况。临别时，毛岸英送给罗石泉一盒茶叶，还有鹿茸和旧币20万元。

罗石泉在1940年曾写信给毛泽东，要求赴延安参加革命。毛泽东回信要他留在当地秘密开展革命活动。罗石泉在1940年11月遭到逮捕关押，直到1941年2月，才由邻里保释出来。

后来在5月21日，毛岸英依旧在毛远翔和毛特夫的陪同下，各骑一匹赤色的高头大马，从韶山冲出发，沿着父亲少年时常走的路线，由滴水洞抄小路来到唐家圫曾外祖父家，看望各位亲朋好友。这一来，可喜坏了众亲友，唐家圫老老少少40多口人，忙里忙外，像招待贵客一样招待这位毛泽东的后人。

毛岸英离开唐家圫后，又专程去杨林看望了堂叔毛泽峙和堂表叔李轲。

在这几天时间里，毛岸英还看望了保姆孙嫂陈玉英。他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完成了父亲的嘱托，也了却了自己多年的心愿，依依不舍地回到了北京。

欲知毛岸英此后的情况如何，请慢慢往后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对董其武说：**“共产党与人共事是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桌面上是什么，背地里也是什么，不和蒋介石一样。蒋介石和人共事是讲权术的，搞宗派的，搞码头的，他是私嘛。共产党没有私，共产党人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嘛。”**这掷地有声的肺腑之言，不仅教育了像董其武一样的有良知的人，同时也成为一面让蒋介石一类政治骗子心虚的照妖镜，使他们那个“谎话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的信条，成为一块遭人唾弃的遮羞布。老百姓为什么说人民不死，毛泽东永恒！请认真读一读这一段话，你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

**第13章**

**“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3个条件，即：1、土地改革的**

**完成；2、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3、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

**争取这3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3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

**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3个条件而努力奋斗。”**

话说1950年5月中旬的一天，一名卫士抱着一些礼品和信件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把东西小心地放在桌子上，高兴地说：

“主席，你看这是什么？”

毛泽东打量着桌子上的礼品和信件，小声数着：

“两只火腿，两只板鸭，一大包海米……”

他严肃地交代说：

“信，我收下，这些礼品交给杨尚昆主任处理。”

卫士说：

“不行，这是杨主任交给我的任务……”

就在这时，另一个卫士也提了一个袋子走进来，说：

“主席，这是杨主任刚才要我转交给你的。”

毛泽东生气了，说道：

“今天，你们这个杨主任怎么啦？是不是有意让我违犯党的纪律啊！”

“杨主任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口袋非你处理不行，请你先看信，后做处理。”

“不看！一并退给杨主任。”

“主席，这封信你不能不看。”一脚踏进门来的杨尚昆说着走近毛泽东，又说：“否则，我们怎么向这位吃了一辈子苦的妇女交代啊！”

“怎么回事？”

毛泽东疑惑地问。杨尚昆从那个袋子里取出一条毛围巾，一双毛手套，还有一封信。他把信放在毛泽东面前，说：

“主席，你看了她写给你的信，就明白了。”

说罢，他转身出去了。毛泽东打开信，只见上面写着：

“我出身河北省蓟县一个贫农家庭，家中无地，租种地主的地，一年到头除去交租所剩无几。父亲得了肺病，还得下地，做小贩，不够吃，我每天都得去挖野菜，一过年节，父亲只有外出躲债。一家11口人，病死饥死了9口，只剩下我和母亲。以后，我娘儿俩来到北平，给人养兔子，纺线，过着受剥削的生活。日本鬼子的侵略，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米价一天3涨，生活没有保证，日子实在难熬啊！

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北京解放了。人民的领袖毛主席1949年春进了北京，10月1日在天安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的心里高兴极了，那一天我代表着街道居民参加了庆祝游行，幸福地第一次看到了毛主席，幸福得流下了眼泪。天气渐渐冷了，我想着毛主席冷，就动手剪下自己养的兔子毛和以前收着的一些纺成线，织成一条围巾和一双手套。要把这一自己的劳动成果作为礼物献给毛主席。”

毛泽东看罢署名为张秀清的来信，站了起来，捧起那条毛围巾和毛手套有些激动了，看着看着，两眼渐渐湿润了，感叹道：

“这是老百姓一针一线织成的啊，这是老百姓热爱共产党的一颗心啊！”

他稳定了一下情绪，指着先前那些火腿等礼品，问卫士：

“这包东西是谁转来的？”

卫士说：

“杨主任告诉我，这是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同志转来的。”

“信收下，围巾和手套也收下。”毛泽东用低沉的声音交代说：“请你把火腿、板鸭、海米交给杨主任，说这些东西作为礼品回赠给张秀清这位女工。由王冶秋或郑振铎去办这件事。”

卫士按照他的吩咐，包好东西，准备往外走。毛泽东叫住他，又说：

“不要走，我要给这位女工回封感谢信呀！”

他随手提起笔写道：

张秀清女士：

去年冬承惠珍品，极为感谢。兹有薄物数件奉上，尚祈哂纳为幸。

毛泽东

后来在5月21日，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在北海团城接见了张秀清，握着她的手说：

“你送给毛主席的礼物，毛主席收到了，主席很高兴，并让我问候你身体好！”

他又指着桌子上的东西说：

“这是毛主席送给你的，还有这封亲笔信。”

张秀清捧着信，看看桌子上放着的礼品，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她说：

“请您转达我祝毛主席身体健康。”

郑振铎说：

“主席的信让我们收藏吧！”

张秀清说：

“不给，我舍不得！你们分享毛主席送的东西吧。”

5月16日，毛泽东给周自娱的第3个儿子周起鹗回了一封信。

周起鹗，1907年出生于长沙，他在国民革命军第6军参加过北伐战争，蒋介石政变后解甲归田。湖南和平解放后，他进入西南军政大学学习，后来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农业厅工作。他在信中打听1940年从长沙去延安的姑母周文楠的下落，并要求调动自己的工作。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起鹗先生：

去年10月来信收到，甚为感谢，菊年现名周文楠，在沈阳人民法院工作。先生仍以在现地工作为好，虽不过意，犹胜于失职者，尚以安心从事，然后徐图改进。

此复 即祝康吉

毛泽东

5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海南岛及沿海诸岛占领后的处置方法”给广东军区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广东军区，15兵团，并告中南军区：

据粟裕同志5月16日致7兵团关于占领舟山群岛后的处置称：“所有各岛敌之机场、码头、仓库、军营及各种交通、各种建筑设备，应妥为全部看管。特别敌海岸前沿阵地工事，副防御设备，及纵深要点工事，应指派专门部队警备看管，不准破坏。发现群众乘隙拆毁破坏各种建筑设备，应予以防范制止，并动员说服服从我军各项规定。至匪军侵犯群众利益，搬用木料砖石，修筑工事等，亦需说服他们，暂时忍耐，待秩序恢复，经我军许可后，再作处理”等语，我们认为这一处置是正确的。海南岛、广东临海中的各岛及沿海岸线亦应照此处置。过去你们是如何处理的，望告。

军委 5月18日

5月19日，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由孙继先等指挥第7兵团解放了舟山群岛，歼敌1.2万人。

舟山群岛战役发起于1949年8月，人民解放军逐步攻占了渤海湾的长山列岛和闽南的东山岛，最后攻占了舟山群岛。至此，除台湾和澎湖、金门、马祖岛屿外，华东地区全部为人民解放军占领。尔后，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成立了以粟裕为总指挥的前线指挥部，投入了3个兵团、12个军，共50万人的兵力，并一部分海军、空军，开始了渡海作战的全面准备工作，计划在1951年春夏之交实施渡海作战，解放台湾。

5月20日下午，田家英将一份公文放在毛泽东的写字台上，说是沈阳市政府报来的一份文件。毛泽东放下手中的笔问道：

“沈阳市政府有什么大事啊，为什么一定要报给我呢？”

田家英说：

“是这样的，沈阳市5月11日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市中心修建一座纪念塔。”

毛泽东说：

“像这样的事，他们自己就可决定嘛！大不了，再报给东北局书记高岗同志就解决了嘛。”

田家英说：

“主席，您还不知道，他们要在这座纪念塔上，铸上一座主席您的铜像。”

“什么？他们要在纪念塔上铸上我的铜像？”

“对！他们在报告上提出：请摄影家代摄主席的八寸站像四幅，寄给他们。”

毛泽东有些生气地说：

“一幅也不给！”

说着，他打开这份公文报告，一边看一边用毛笔批示，在“修建开国纪念塔”旁批道：“这是可以的”；在“铸毛主席像”旁批道：“只有讽刺意义”；在报告的上端大笔一挥，写下：“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

毛泽东写罢，严肃地说道：

“原件退回！告诉有关部门，这是违反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今后，谁再做这类事情，要通报批评！”

5月20日晚，毛泽东致电饶漱石并告邓子恢等人，他在电文中写道：

饶漱石同志并告子恢，小平，德怀，高岗：

1. 你托廖鲁言带回的口头意见已收到，都是对的。其中说中央及中财委的政策方案都是正确的，但**中央的业务机关分配给地方的具体任务与工作布置有很多太重行不通，是指一些什么事，请列举具体内容电告以便纠正。**（二、文选编辑者略去——笔者注）

三、嗣后凡有中央业务机关规定任务方案在地方上窒碍难行者，请各区负责同志一经发现立即电告以便改正。

四、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紧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各中央局会议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不得以为只是财经业务机关的工作而稍有放松，各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亦是如此。**中央政治局现在几乎每次会议都要讨论财经工作**。

五、此电请转分局，各大市委、省委、区党委。

毛泽东 5月20日

5月2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各军区党委并转各级党委：

一、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一年来党的组织也有很大的发展。据1949年年终统计，**全国党员总数已达450万人以上，去年一年内即发展新党员140万人左右**。在党的发展中，一般都注意了工人成份，注意了公开发展，有的并且注意了在各种斗争中吸收优秀的分子，所以获得了一定的成绩。

二、但一年来党的发展工作是有严重缺点的。一般地说，**当条件不成熟或不完全成熟时，即开始了实际上是大量发展的行动，因而没有保证新发展党员一定的质量。有的则不适当地实行“自报公议党批准”的建党方法，放弃了党的领导。**有的则因为党与群众的关系上存在着关门主义，而错误地认为在党员的发展工作上也存在着关门主义，并强调提出反对关门主义，其结果是**将一些不够党员起码条件或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的人吸收到党内来，把党员降低到一般群众的水平**。

三、由于中国革命已经在基本上获得了胜利，我党已成为全国人民所公认的领导政党，由于**5年来党的发展已增加了党员330万人，其中很多人的思想作风极为不纯，**还没有来得及给以有计划的教育训练，这就使目前党的发展工作，必须采取严格审查的方针和稳步前进的办法。

四、**今后发展党的重点，应放在城市中，首先是工人阶级，**在3年到5年内要从产业工人中接收三分之一的人入党。这一任务，在今天全国胜利的条件下，是可能与必要完成的。但必须有一定的步骤，而且要作许多工作。首先要加强职工会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与教育工作，待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提高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大量的、但同时又是经过个别审查的进行发展党的工作。在这以前，应该是也只能是审慎的、负责的个别接收。

五、为了保证无产阶级成份在党内有一定的比例，**今后对农民党员的发展，应加以限制。**在老区，党的发展一般地已达到了人口的3%至5%，还有若干县份甚至到7%至10%，因此，今后的任务不是继续发展，而是如何加强党的教育和调整党的组织问题。即是说，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逐渐地把目前觉悟程度不够的党员提高到共产党员的水平，而对于那些毛病很大、经过教育又不愿改正的党员，应逐渐地采取一种适当的方法，劝告其退党或开除其党籍。然后，对于群众中真正的优秀分子，并经长期工作考验证明其确已具备了党员的条件时，应个别地、慎重地吸收入党。在新区农村中，目前暂不发展党的组织，应集中力量在各种斗争中组织和教育广大的农民，发现与培养真正的积极分子，俟土改完成后，再来进行发展党的工作。在今后三五年之内，农民党员以不超过人口的1%为标准。

六、关于“自报公议党批准”的建党方法，是有缺点的，这很容易被误解为尾巴主义，也很容易在实际工作上使党陷于被动。这种方法以后不应继续提倡和采用，而以公开建党的口号来代替它。所谓**公开建党，是指党在劳动人民中间应公开地进行关于党纲和党章的宣传教育，普遍提高他们的觉悟；在考察一切要求入党的人时，不仅听取介绍人的报告、本人的意见及党内的反映，而且还要采取各种方式征求群众的意见，使党的领导与群众的意见相结合，才能对被考察者有较全面的认识。**因此，公开建党就必须防止不重视群众意见（或形式地征求群众意见）和放弃党的领导这两种偏向的发生。公开建党的目的，是为了更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把党放在群众的切实帮助与监督之下，建设一个有战斗力的纯洁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党。

　 中 央

5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委，各野战军军区党委：

一、**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决在全世界发动签名，要求禁用原子武器，此项运动已在欧洲各国及中国若干大城市展开。我们应当支持这一运动，利用这个方法来广泛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团结国际友人的宣传，争取有几千万人在和大宣言上签名**。

二、反对侵略战争，拥护世界和平，这是全世界当前的主要斗争任务。但由于中国现仍处于解放战争中，由于中国人民对于国际事情不熟悉，而蒋匪特务关于世界三次大战的欺骗宣传亦因此尚有若干市场，所以我们在进行反对新战争、反对原子武器的宣传运动时，必须注意以下各点：1、**不要简单地讲反对战争拥护和平，要讲反对侵略战争拥护世界和平。**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是反对侵略战争拥护世界和平的伟大贡献。2、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是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全世界人民反对战争，但是并不害怕战争，帝国主义以全世界战争吓人，但是战争真的打起来，帝国主义必然灭亡**。这是我们关于战争和平问题的全部观点，必须完全说明。以苏联、中国为中坚的世界和平势力，已经超过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但帝国主义冒险家是不自量力的，各国人民必须团结奋斗，保持警惕，揭露阴谋，方能破坏敌人的计划。3、**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杀人的武器，因此必须禁用**。但原子弹并不能决定战争胜负，且苏联亦已有原子弹，因此并不可怕。4、签名运动是有用的，表示全世界的和平势力大，造成侵略分子孤立，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

三、签名运动的领导，在已设和大分会地方由分会负责，应设而未设者迅速设立，无分会地方即由工农青妇团体与中苏友协负责。签名运动的时间暂定6、7、8三个月，人数暂以3000万为目标，步骤是由大城市而中小城市而乡村，由有组织群众（工厂、部队、学校、农协）而无组织群众。方式由各地按具体情况自行选择，但必须在事前事后研究群众的思想动向，决定宣传内容，**防止特务造谣，严禁强迫命令**。

四、北京和大委员会决派萧三、艾青、赵仲池等同志去沪、杭、宁、汉、长沙、广州、西安各地作旅行讲演，并巡视工作（除保卫世界和平的工作外兼及各地中苏友协工作与文艺工作），望予协助。

　　 中央

5月间，中央军委遵照毛泽东“人民解放军应在1950年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有总部、军兵种领导人和军区参谋长以及部分军、师参谋长参加的全军参谋长会议，会议由聂荣臻主持，朱德讲了话。

此时，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了550万人，而解放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好转，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经中央军委、毛泽东批准，确定分期分批复员或转业百余万人，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全国陆军统编为国防军和公安部队。中央军委成立公安指挥部，统一指挥全国军事系统中的公安部队和属于政府系统的人民警察。

参谋长会议还明确了各级司令机关的地位、职责和编制，制定了《司令部工作条例》，加强了参谋人员的培训，使司令部工作逐步实现正规化。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李银桥从报上看到中直机关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招生的启事，他对毛泽东说：

“主席，我想上学去。”

“嗯”毛泽东抬头看了他一眼，问道：“到哪里去上学呀？”

“中直机关干部文化补习学校。”

“上学是件好事。不过，你非要现在去吗？”

听得出来，毛泽东有点不愿意。可李银桥坚持说：

“我今年都23岁了，再不上就没有机会了。”

“噢，23，嗯，是不小了。”毛泽东沉吟了一会儿，终于说：“那好，你去吧。”

李银桥多年来与毛泽东朝夕相处，可真的要离开了又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儿。他低声说：

“主席，我去学完了再回来。”

“好啊，随时欢迎你回来。”

毛泽东立刻高兴起来。李银桥拿出一个本子，说是请毛泽东题个词留念。毛泽东提起笔，想了想，写道：“努力学习，学好后再做工作，为人民服务。”

李银桥带着毛泽东的期待，满心欢喜地去上学，可他到那儿一看，大失所望，这哪里是什么学校呀，只有一个大院子，既没有课堂，也乱哄哄的。他在那里呆了一个星期便回到了毛泽东身边。毛泽东高兴地说：

“回来好啊，回来继续工作。”

自此以后，毛泽东便常常把卫士们和警卫部队战士们的学习挂在心上了。

5月24日，毛泽东在章士钊向他推荐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李傥的信中批示道：

“请周（即周恩来——笔者注）酌办。章士钊只荐此一人，似宜用之。”

他又在李傥的自传上写了一段批语：

“李自谓已66岁，有妻室之累，无儿可依，觉悟前非，力图晚盖，精力尚能做事，希望给予一工作。”

5月27日，毛泽东给在湘乡县刚刚上任3个月的县长刘亚南写了一封信。

原来，毛泽东在不久前接到文运昌、文涧泉、文梅清、文南松4个表兄一封联名信，他们在信中说，乡下的土改有问题，干部执行政策出现“左”的偏差和工作过粗的现象，对地主的批斗态度厉害了一点；把一些不够划地主成份的人也划成了地主。再就是打人，违反了土改法。这些做法不妥，要及时纠正。另外，他们还在信中提出文家生活困难，请表弟帮助解决生活所需，或指示当地政府给予救济。

毛泽东反复看了这封信，心里很清楚，乡下土改工作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有没有文家兄弟所说的那么严重呢？文家兄弟都是贫农出身，却如此同情地富，为地富开脱，这是立场、原则问题，应当批评教育。不过，事情还未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还得先写封信给湘乡县长，了解一下情况再说。于是，他就在给刘亚南的信中写道：

亚南同志：

兹有湘乡四都文氏兄弟4人来信，附上请你看一下。他们对当地区、乡政府的工作有些不满意的话，未知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假如可能的话，请你派一个同志去调查一下，以其结果告我。**文氏兄弟都是贫农，信上则替地富说话，是何原因？**亦请查明告我。**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民的不满**。此祝

健康

毛泽东 1950年5月27日

刘亚南在1950年6月初接到了这封指示信，他捧读再三，仔细揣摩信中的意思。他又抽出文家兄弟联名写的那封信，看了半晌。他心想，在湘乡县有不少来自北方的南下干部，把北方土改中一些做法带到南方来，以至于在工作中出现一些偏差，虽然已经纠正了一些“左”的做法，可还有一些干部为了尽快掌握基层政权，有点急于求成，给各个乡、村、保规定指标，要划出一定数量的地主。但不管怎么说，土改的成绩还是主要的吧，何况文家兄弟都是贫农，他们怎么会“替地富说话”呢？于是，刘亚南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派了两名机关干部到唐家圫所在的石城乡调查土改情况。他自己也亲自下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

原来，石城乡的自然条件属于穷山恶水，土地贫瘠，很少有什么大户富户。而**在唐家圫蹲点的石城乡土改中心组组长，是湘乡四区区政府的刘秘书，此人系地主家庭出身，解放前当过乡长，为了掩盖他的历史，表现其革命性，就伪装积极。他以为越“左”越好，越“左”越革命，就在划成份时，把一些不够条件的人也划成了地主。**除了曾经当过国民党师长的贺瑞亭被划为地主外，家境稍好的农民钟瑞南、刘国坤等人，也被错划为地主、富农。

钟瑞南、刘国坤等人找到文家兄弟，连连叫屈，请求为他们说话。文运昌对本地的情况是清楚的，他知道刘国坤虽然当过伪保长，但财产很少，家境并不宽裕；尤其是钟瑞南，家里很穷，仅仅是人懒一点，不大做工夫，也被划成了地主。文运昌和许多旧知识分子一样，性情憨直，心地善良。在亲朋的恳请下，他几次出面为错划的地富说情，甚至干预当地政府的工作，因而与基层干部产生了严重对立。

此时，距唐家圫不远的另一个区，有位姓萧的地主，在当地有许多劣迹，镇反时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关在县城死囚房里等待执行。萧家因过去与文家有些交往，也知道文运昌与毛泽东的关系甚为亲密，便送来一些酒、肉、鸡之类的礼物，还抬来一顶布轿，请文运昌去说情。文运昌开始还说些推辞话，但他经不住萧家人的阿谀奉承和软泡硬磨，耳朵软了，就坐着那顶轿子去了区公所。

常言说国法大如天，无论文运昌怎样说情，区公所硬是不肯放人。文运昌面子上过不去，就在区公所说了些出格的话，引来许多人围观。区里的干部看他年纪大了，再三劝阻，文运昌却是越说越起劲，越说越火大，竟开口骂起人来。区干部一时性起，管你是什么“皇亲国戚”，扰乱公务，就把你抓起来。于是，不由分说就把文运昌关进谷仓里禁闭起来。

有一位女副区长担心把事情闹大，便去和文运昌谈话，对他的言行进行了批评教育，好说歹说，直到把文运昌说得低头认错为止，方才把他放了出来。

那个被关押的姓萧的地主，身怀绝技，掌握了不少祖传秘方，看病很有一套。这时候，有一位干部得了重病，县医院虽然全力抢救，也是回天乏力，眼睁睁地看着他就要撒手西去。有位干部提出，不妨让姓萧的死囚犯看看，病急乱投医嘛。于是，萧某被带到病房，给病人把了脉，开了处方，其中有蜈蚣之类的剧毒药。许多人认为这个阶级敌人是有意报复，他开的方子吃不得。唯有那奄奄一息的病人表示，管它是什么药，都要吃。没想到一剂药下肚，果然奇迹出现，病情大为缓解；三剂药服完，病几乎好了。人们无不惊叹。

**人民政府对于那些有悔改表现、又掌握有造福人类的某些技能的犯罪分子，总是给予重新做人的机会，予以宽大处理的。萧某正是这样一个幸运者。由此，他被改判死缓，又因服刑表现好，改判为有期，以至减刑提前释放。**文运昌兄弟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因之对此事在认识上产生了误差，以为是文运昌闯入公堂的结果。自此，文运昌又把女副区长的批评当成了耳旁风，常常为人鸣不平，时有“包打天下”的惊人之举。

正当文运昌有些自鸣得意的时候，石城乡副乡长毛提臣找到他说，石城乡的土改比较“左”，但自己不敢向南下干部反映。文运昌觉得，再向当地政府说什么也是白说，不如直接上书北京，向润之表弟告“御状”。于是，他找来文涧泉、文南松、文梅清3人商议，3人公推文运昌执笔，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信。

刘亚南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了土改工作中的第一手材料，遵照毛泽东的嘱托，立即将土改的成绩和问题，以及整改的措施，写了一个详细汇报材料，寄给了毛泽东。

5月29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对西南局《关于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条件》的批复。

西南局在5月27日报告中央的《关于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条件》中是这样写的：

中央：

接中央17日电后，我们即着手研究，现提谈判条件如下：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

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

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

六、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八、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

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究既往。

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

以上10条请审查。我们意见，这10条全文作为秘密谈判，不宜全文公布，以免帝国主义捣鬼。但可将这些内容分别地在广播中解释。如果谈判不成，需要战斗进军，只要在三、五两条文字上略加修改（精神不变），就可作为公开宣布的约法10条。

毛泽东在给西南局的批复中写道：

西南局并告西北局：

西南局5月27日发来的与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条件，除**第8条末句“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应改为“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外，余均同意。所提此项条件暂不公开发表，但可将其内容分别地在广播中作适当解释的办法，亦可同意。

中 央

1950年6月3日，宋庆龄在上海因病不能到北京开会，致信毛泽东，她写道：

毛主席：

在京畅聆谠论，深感万分愉快。告别以来，倏忽二旬，想您最近身体健康，甚盼及时珍重，作充分休息。

我返沪后即着手筹备救济总会宣传部工作，因事属创举，不得不周详计划，昕夕从事，刻无暇晷，致最近旧疾复发，正在诊治之中，故本月恐未克来京开会，尚希见谅。

兹附上由美国转来之斯诺先生函一封，即请查收。我对渠最近之思想是否正确一时无法侦知，因久未阅其著作，故不易臆测。如有复函，我可代为转寄。

此致敬礼！

宋庆龄

毛泽东得知宋庆龄身体有病，叮嘱上海市委领导前去探望。

6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建国后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他在报告中实事求是、全面而科学地分析了建国以来的国内外形势。关于国际形势问题，他说：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中苏条约，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地和较快地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又正在推动着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大战是能够制止的。**”

关于国内问题，毛泽东说：

“**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3个条件，即：1、土地改革的完成；2、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3、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3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3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3个条件而努力奋斗。我和大家都相信，这些条件是完全有把握能够在3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其实现的。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了。

为此目的，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团结起来，做好下列各项工作：

1、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2、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3、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之下，人民解放军应在1950年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4、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5、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必须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6、必须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必须认真地开好足以团结各界人民共同进行工作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7、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8、坚决地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组织的指示，关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指示，关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指示，关于全党整风的指示。”

这一天，毛泽东还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一部分内容是对他的书面报告作了说明，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主张，全文如下：

七届二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胜利，也是十月革命以后一个带世界性的大胜利。斯大林同志和许多外国同志，都感觉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我们有许多同志，因为在这个斗争中搞惯了，反而不那样感觉。关于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我们还要在党内和群众中间，做广泛的宣传。

在伟大胜利的形势下，我们面前还有很复杂的斗争，还有许多困难。

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1亿6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1亿6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3亿1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同时，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

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这件事虽然现在有困难，但是我们总要想各种办法来解决。

我们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只拿出20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我们实行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就会拥护我们。我们也要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了。**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就是那些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有些知识分子老了，七十几岁了，只要他们拥护党和人民政府，就把他们养起来。**

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要向干部讲明这个道理，并且拿事实证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是必要的。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过去是我们的敌人，现在他们从敌人方面分化出来，到我们这边来了，对这种多少有点可能团结的人，我们也要团结。团结他们，有利于劳动人民。现在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

团结少数民族很重要。全国少数民族大约有3千万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的改革。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改革。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是可以改革的。但是，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刘少奇、陈云、周恩来、聂荣臻也分别在全会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财政经济、外交与统一战线和军队整编问题的报告。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约见了卢汉。宋任穷作为云南省委书记陪同会见，这是他与毛泽东分别14年后，重新见到了自己的领袖。

毛泽东和卢汉寒暄后，高度评价他毅然率部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称赞他此举减少了因战争带来的损失，为人民解放军进入云南创造了条件，为提前结束西南战役做出了积极贡献，为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毛泽东还对卢汉和宋任穷说：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位置很重要，你们双方要搞好团结，密切合作，有事多商量，共同把云南建设好。”

谈话结束后，宋任穷送走卢汉，去找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聊天。不一会儿，毛泽东派人来把他叫了去。毛泽东说：

“10多年不见了，我们也聊聊嘛。”

接下来，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上层知名人士也不少，有当过内阁总理的李根源，有龙云，有同我们打过仗的杨池生、金汉鼎，还有一批著名的工商界人士和少数民族头人，你们在云南一定要注意掌握好政策，特别是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会议期间，毛泽东又召集粟裕、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研究解放台湾的问题。粟裕汇报说：

“据最新敌情通报，台湾守军兵力增加到40万人。我解放台湾兵力亦应相应调整。我们原计划集中3野全军攻台，以第9、第7兵团为第一梯队，其余部队为第二梯队。目前3野全军约50万人，其中战斗部队30万至38万人，和敌人相比不占优势。建议军委从其他野战军抽调3至4个军投入，使攻台作战更有把握。”

毛泽东问：

“蒋介石这些兵是从哪里跑过去的？”

粟裕说：

“4野解放海南岛，驻海南岛7万蒋军逃到台湾，舟山群岛12万蒋军也撤到了台湾。50万大军攻台，基本上都是陆军，‘过得去’是个大问题，单靠海军舰船运送是不够的。我算了一笔细账，每人在船上占的面积约0.6平方米，加上武器装备和物资，约需船只76万吨，也就是千吨以上的船只575艘。第一梯队以6万人计算，每艇载25至30人，需要登陆舰2000艘。目前征集到的船只还不到一半，第二梯队及预备队都还无船可乘。建议中央统筹建造足够的渡海运输舰船，并把华东、华南、华北、东北沿海船只统一编成几支运输船队。”

毛泽东点点头，说：

“你这账算得很细，很具体。海上运兵确实是个大问题。”

他转对周恩来说：

“这个问题要很好重视。”

粟裕又说：

“鉴于解放台湾之战已不仅是3野部队参加，建议中央派刘伯承同志或林彪同志主持攻台。鉴于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短期内难以解决渡海舰船，建议攻台作战推迟一些时间，确有把握再行动。”

周恩来说：

“海上作战和陆上作战大不一样，受气候、风浪、潮汐影响很大。我们在这个方面缺乏经验，金门之战有深刻教训，没有足够船只，不能急于求成。”

粟裕听他提到金门之战，激动得站了起来，说：

“金门作战的教训在于没有充分准备，根子在于骄傲轻敌。由于轻敌，对蒋介石垂死挣扎的顽固性认识不足；由于轻敌，对敌情侦察不细；由于轻敌，对海战特点没有很好研究；由于轻敌，在运兵船只明显不足的情况下便发起进攻。金门之战教育了我们，攻台之战没有充分准备，不应轻易发起。”

毛泽东示意粟裕坐下来，他说：

“粟裕同志提出的攻台指导思想‘充分准备确有把握后再行动’很好，所提3条建议，2条很好，增加攻台兵力和统筹建造船只，中央和军委要专门研究部署。”

毛泽东转向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问道：

“你们觉得怎么样？”

他见大家没有异议，接着说：

“第3条建议，**派伯承或林彪主持台湾战役，中央不采纳，解放台湾之战还是由你粟裕来指挥，中央和军委信任你。**”

刘、周、朱、彭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就说：

“好，**我正式宣布：解放台湾之战仍由粟裕指挥。现在要加紧准备，没有绝对把握不发兵。”**

6月9日，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了总结报告。

七届三中全会鉴于王明迟迟不写检查，通过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决定中写道：

“全会认为，**王明同志至此时为止，对于他过去所犯的错误是拒绝反省的，对党中央所采取的态度是不诚恳的，对不遵守二中全会决定向政治局写声明书的行为是无纪律的行为**。因此，**三中全会决定，王明同志仍应执行二中全会的决定，对于他在内战时期及抗日时期所写的各种文章、小册子和其他文件中所犯的原则错误，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借以证明他自己是深刻地认识了并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而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有所改正。**”

王明因在天津视察工作没有参加七届三中全会。7月30日，中央办公厅把全会文件转给他后，他才看到了这一决定。8月17日，王明给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写了一封信，表示准备在病情允许和工作安排好之后写声明书，要求中央给他提供相关资料，并征求完成时限。他强调，由于各种原因，写好声明书“需要相当久的时间”。8月18日，毛泽东在王明的信上批示道：

刘、周、朱、任、尚昆阅。

王明的声明书应在11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开会以前写好，并送交政治局。王明的笔记本及武汉时期的报纸，请尚昆清查是否有保存。以上两点，由尚昆口头通知王明。

毛泽东 8月18日

后来在9月上旬，王明突然向中央提出了要去苏联治病的请求。党中央和毛泽东考虑到他确实有病，在同苏联方面交涉获准后，同意了他的请求。1950年10月25日，王明和他的夫人孟庆树、两个孩子王丹芝和王丹丁以及中央派遣的保健医生陈锋禹、保姆陈启珍一行6人，在警卫秘书田书元的护送下，由北京乘火车出发，经东北去苏联。他在苏联一呆就是3年多，于1953年12月9日回到国内，继续在法制委员会工作，仍然不提写检查的事。1954年4月，他的旧病复发，住进了北京医院，此后一直在静心养病，再没有工作过。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决定将政务院改名为国务院，并精简调整撤销了一些部委，法制委员会也在撤销之列。自此，王明在政府中再没有担任任何职务。1955年10月，王明在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他转交中央，称自己因病不能出席，并主动提出因长久不能工作，请求中央解除他中央委员的职务。中央批了他的假，但并未撤销他中央委员的职务。王明再次提出去苏联治病的请求。经中央同意，他和夫人、孩子、保健护士、警卫员、保姆一行在1956年1月30日从北京乘飞机出发，于2月1日抵达莫斯科。中央后来还专门派了两名针灸大夫赴苏达半年之久，协助苏联方面给王明治病。

欲知七届三中全会后毛泽东有何重要活动，且看下一章介绍。

东方翁曰：从“四面八方”思想的产生到“不要四面出击”战略、策略的提出，可以说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后保持了最清醒的头脑。相比之下，党内那些高级领导人的右的思想和“左”的倾向，无疑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正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全国的工商业得到了合理调整，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据统计：1950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23.4%。其中，工业增长36.4%，农业增长17.8%。粮食增长16.9%。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即使在这一年又出现了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出兵抗美援朝的重大战事，国家的财政从1951年起也依然做到了收支平衡，且略有节余。到1952年，依然是在战争的条件下，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77.5%，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36年还高出了20%。在3年内恢复国民经济的目标终于胜利地实现了，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成就。

**第14章**

**“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军队，要有自力更生的思想，有克服**

**困难的精神，有克服困难的办法和能力，这个国家、党、人民、**

**军队，才是坚强的，才有胜利的希望。”**

话说1950年6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了乌兰夫、刘格平《对新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意见》。

乌兰夫、刘格平在4月14日向中央报告的《对新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意见》中说：

“我国少数民族大都信仰宗教，**新疆的大多数少数民族俱信仰伊斯兰数（即回教）**。宗教对少数民族束缚、毒害很大，相当地阻碍其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的发展。新疆回教中的阿訇、满拉等借宗教权势干涉政治，剥削人民，亦很严重。但少数民族的宗教问题，是一个历史性、民族性的群众思想信仰问题，它与少数民族落后的经济、文化及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联。在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未得到相当的发展、人民的觉悟未大大提高以前，宗教在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中还会保有深刻的影响，因此对于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态度应该十分慎审，切忌急躁。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信教自由政策。在少数民族广大群众的觉悟未提高前，不要轻言改革。少数民族中的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在有了初步的觉悟后，往往产生一种盲目地反宗教情绪，必须加以教育或制止，绝不要把他们的这种情绪当做少数民族广大群众觉悟的表现。回教中的阿訇、满拉等在群众中都有一定的影响，有的甚至被视为“神圣”，因此，对于他们的态度亦应十分慎审，目前不要去反对他们一般的宗教剥削和宗教权利，而只采取慎重，稳妥的步骤，使他们不要干涉政治、司法和国家的学校教育，以便逐渐做到政教分开。至于勾结匪特及帝国主义的阿訇、满拉，在弄清问题取得证据之后，必须依法惩处，并在群众中揭露他们的罪恶。但这样的阿訇、满拉还是极少数，并应区别首恶、胁从，分别处理，不要一律逮捕。在处理时除揭露他们的罪恶外，必须向群众说明，系治他们的叛国罪、破坏治安罪，而不要提及他们的宗教身份，以免影响多数守法的阿訇、满拉及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

毛泽东在转发《对新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意见》的批语中是这样写的：

新疆分局，并西北局，并告各中央局：

**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乌兰夫、刘格平对新疆分局关于少数民族宗教问题所提出的意见，中央认为是正确的，特发给你们，望你们注意**。

　 中 央

6月12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浙江萧山县破坏手工业行为的通报》起草了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级党委：

兹将华东局辰世（即5月31日——笔者注）致浙江省委并各省、区党委并中央电转发你们。中央除同意华东局的处理意见外，并认为：**萧山县此种破坏手工业的行为，是严重地破坏了我党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根本方针，是一种自杀政策，是绝不能允许的。**对负有造成此种错误之主要责任的党员干部，应给以必要的纪律处分。为了防止今后继续发生此类错误行为，各级党委，特别是新区准备实行土地改革地区的党委，应即认真地教育其所属党员干部，坚决执行保护手工业的政策。**对地主经营之手工业，亦应同样保护，不得侵犯。应将消灭地主之封建剥削与保护地主经营的手工业严格区别开来，绝不能把反对封建地主的斗争，用之于反对手工业主的身上。**须知目前广大农村的日用品甚至重要的出口品（如茶叶、桐油等），仍须仰赖手工业生产来供给，手工业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对手工业的政策，是扶助、改进、推广的保护政策，而不是乱划阶级、乱斗争、乱征税的破坏政策。**对农村、墟镇等地的各种手工业，如造纸、榨油、纺织、轧花、缫丝等等，必须严格保护，不得侵犯；否则就会严重地脱离群众并大大地阻碍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税收政策上，亦应严格地执行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所已规定之税率，分别视各种手工业的规模大小、经营状况等不同情况作合理的征收，其应免征者并须免征；不得以单纯的完成任务的观点而乱征乱派，使手工业窒死。望通告各地党政机关依照上述精神认真执行。凡各地遇有此种情况本身无把握解决者，必须向上级请示。即使本身认为系按政策解决者，亦须向上级报告，以便遇有错误，上级得及时纠正。

　 中 央

6月13日晚，准备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2次会议的一些著名人士，应毛泽东之邀，先后来到了颐年堂宴会厅。毛泽东站在门前迎候客人。潘汉年把荣毅仁介绍给毛泽东。

“荣先生来了，欢迎你！”毛泽东握着荣毅仁的手说：“老先生好吗？”

他说的“老先生”是指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荣毅仁深深地弯下腰，朝毛泽东鞠了一躬，说：

“毛主席好！托毛主席的福，还好。”

毛泽东说：

“荣先生，你是大资本家呀！”

周恩来在一旁插话说：

“他是中国资本家中的少壮派。”

荣毅仁毕恭毕敬地说：  
“哪里，哪里。”

毛泽东说：

“你来了，很好！”

6月1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举行第2次会议，毛泽东致词说：

诸位委员、诸位同志、诸位朋友们：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第2次会议现在开会。在这个会议上，有会务工作、土地改革工作、经济和财政工作、税收工作、外交和统一战线工作、文化和教育工作、军事工作、法院工作等项报告，希望予以讨论。其中，**以土地改革问题为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我们希望在此次会议上通过一个土地改革法案，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后付诸实施，首先使十余万正在准备进行土地改革工作的干部早日学习这个法案，以便在今年秋天大约有1万万农业人口的地区能够顺利地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工作。自然，其它各项报告都是重要的，凡有意见都可发表，凡有提案都可付审议，只要能行者都应采纳，我们有伟大而正确的共同纲领以为检查工作讨论问题的准则。共同纲领必须充分地付之实行，这是我们国家现实的根本大法。

我相信，经过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我们的会议是会顺利地完成自己的任务的。现在全国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正在进行巨大的工作，为克服困难，争取经济状况的好转而斗争。我国的一切人民事业均在循着新的轨道向前发展，每天都可以看见进步，看见成绩，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止人民事业的前进。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其选出的全国委员会，是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民主人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组织，在全国人民中有很高的威信。我们必须巩固这种团结，巩固我们的统一战线，领导全国人民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接着，会议听取了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的会务报告和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

6月15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准备向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作的军事报告稿时加写了4段话，他写的是：

1. 在这个时期内，原在对方的许多爱国军人率部起义，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这对于迅速地瓦解敌军及较好地维持地方秩序，是起了作用的。

（二）若**从去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开始渡江作战之日算起至今年5月为止，则歼敌数为正规军183万人，非正规军及土匪98万人，共计281万人**。

（三）华东、中南、西南3区还没有详细的报告来。这3区荒地较少，军队垦荒不多，但种菜养猪等工作则已在普遍地进行。西南区的人民解放军因剿匪还是严重任务，其生产任务今年尚不能过多。

（四）为此目的，**人民解放军的各部分，包括起义部队在内，必须巩固地团结起来。全军必须维持良好的纪律，改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全军应在今年复员工作做好之后，从今年冬季开始，来一次从上至下的整风运动，克服一切不良现象。**必须教导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不要骄傲自满，不要以功臣自居，不要看不起起义部队和地方部队，而要谦虚谨慎，耐劳耐苦，对敌人很勇敢，对同志对人民则很和气，借以团结全军全民完成自己光荣伟大的任务。**

6月19日，毛泽东看到反映学生健康水平下降的材料后，给教育部长马叙伦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马部长：

另件奉还，此事宜速解决，**要各学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的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殊待遇。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高教会已开过，中、小两级宜各开一次。以上请考虑酌办。此致

敬礼

毛泽东

6月21日，政协会议对毛泽东审定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又一次做了修改，草案对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进一步完善，规定：

“**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它财产，不得侵犯。**富农所有之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富农租入的土地应与其出租的土地相抵计算。”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

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2次会议闭幕，毛泽东致闭幕词（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题目是：《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全文如下：

此次会议总结了过去时期的经验，决定了各项方针。

这种总结经验和决定方针的工作，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做的，是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集合在一起来做的。这里，不但有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们，而且有中央人民政府、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及各省市人民政府的许多工作人员列席参加讨论，而且有各省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代表们列席参加讨论，而且有许多特邀的爱国人士列席参加讨论。这样，我们就能集中广泛的意见，检查过去的工作，决定今后的方针。这种方法，我希望我们以后继续采用，并且希望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和各省市人民政府也采用这种方法。**我们的会议在暂时还是建议性质的会议。但是在实际上，我们在这种会议上所做的决定，中央人民政府是当然会采纳并见之实行的，是应当采纳并见之实行的。**

我们一致同意了全国委员会的会务报告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各项工作报告。这里有土地改革工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经济和财政工作，税收工作，文化和教育工作，法院工作等项报告，这些报告都是好的。在这些报告中，适当地总结了过去时期的工作经验，规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针。我们这次会议所以有这样多的议题，是因为我们的新国家成立以后，各方面工作都在开创，都在发展，全国人民正在蓬蓬勃勃地在各个战线上开展真正人民革命的伟大斗争，在军事战线上，在经济战线上，在思想战线上，在土地改革的战线上都是从古未有的极其伟大的斗争，各项工作都待总结，都待指示方针，所以我们有了这样多的议题。我们的会议按法律规定是每年开会两次，其中将有一次为议题众多的会议，一次为议题较少的会议。中国是一个大国，实际的人口超过4亿7500万，又处在人民革命的伟大历史时期，这种情况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也就这样做了，我想我们是做得对的。

我们这次会议议题众多，中心的议题是将旧有土地制度加以改革的问题。大家同意刘少奇副主席的报告及中共中央建议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并对土地改革法草案作了若干有益的修改和补充。这是很好的，**我为新中国数万万农村人民获得翻身机会和国家获得工业化的基本条件而表示高兴，表示庆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当赞助这种改革，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更应当采取这种态度。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地通过这一关。**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只要人们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步入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我认为讲明这一点是有必要的，这样可以使人们有信心，不致彷徨顾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们不要我了，我虽想为人民效力也没有机会了。不，不会这样的，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么，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

在这个远大目标上，在国外，我们必须坚固地团结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及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对此不可有丝毫的游移和动摇。在国内，我们必须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必须巩固我们这个已经建立的伟大的有威信的革命统一战线。不论什么人，凡对于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工作有所贡献者，我们就欢迎他，他就是正确的；凡对于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工作有所损害者，我们就反对他，他就是错误的。要达到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的目的，必须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采取这种方法时所用的标准，主要是我们现时的根本大法即共同纲领。我们在这次会议中，即根据共同纲领，采取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是推动大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很好的方法，是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我希望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都采用这种方法。

政协会议结束后不久，政协常委李四光参加了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接见参加会议的代表们。他亲切地握着李四光的手说：

“李四光先生，你回来了，欢迎你。你在政协会上的发言讲得很好！”

毛泽东所说的李四光的发言，是指李四光就他在欧洲的所见所闻，在政协会议上深刻地揭露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毛泽东仔细地听取了他的发言。

李四光，1889年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一个偏僻贫穷的山村里。1904年他被保送到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造船机械，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革命失败后赴英国学习地质学，1920年回国就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此后经过多年努力，李四光开创了中国地质力学。1948年，他赴英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年会，滞留海外。1950年5月6日，李四光不顾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阻挠，偕夫人回到北京，受到了热烈欢迎。

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

朝鲜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国家。1910年8月，朝鲜开始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按照美军上校腊安·腊斯克的建议并经美苏两国同意，美苏两国军队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区占领了朝鲜。1948年8月15日，美国破坏朝鲜的和平统一，支持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以李承晚为总统，单方面建立了大韩民国。大韩民国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1948年9月9日，朝鲜北部以金日成为首的共产党人，鉴于美国破坏朝鲜国家统一的局面，在苏联支持下，通过人民代表会议，宣告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任命金日成为内阁首相。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1948年末，苏美两国先后从朝鲜撤军。李承晚政权同金日成政权围绕着国家的统一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李承晚政权在美国支持下，大力叫嚷“北进统一”，“南北分裂是必然用战争来解决的”，他们同时加紧了战争的准备。朝鲜北方在这种情况下也做了必要准备，加强了人民军队建设。朝鲜南北双方在“三八线”上不断发生武装冲突，对抗不断升级。

金日成在1950年3月30日至4月25日访问了苏联，终于说服**斯大林同意他的“先发制人的作战计划”，**于6月25日，以朝鲜人民军7个师的兵力，大举越过三八线，对李承晚集团展开了全面进攻。

6月27日，美国对朝鲜半岛的事态迅速做出反应，杜鲁门总统发表了一个声明，公开宣称：“对朝鲜的攻击已无可怀疑地说明，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要使用武装的侵犯与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部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

就在这一天，美国肆无忌惮地直接武装干涉朝鲜内政，派遣海军和空军入侵朝鲜领海、领空，进攻朝鲜人民军，对朝鲜城市狂轰滥炸。杜鲁门在宣布出兵朝鲜的同时，公然声称：

**“我已命令第7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

于是，美国**第7舰队在6月27日开始向台湾海峡出动，侵占中国领土台湾，阻挠、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

6月28日上午，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给毛泽东送来了一封致谢信。

原来在6月下旬，毛泽东应张奚若教授转呈清华大学师生员工的请求，为清华大学题写了校徽。他一连写了6幅“清华大学”的字样；并自我推荐说：“右下草书似较好些。”

清华大学师生员工在感谢信中写道：

“谢谢您在百忙中给我们写了校徽。我们带上您亲手所写的校徽，就好像您随时随地在领导我们前进一样。我们将更好地工作和学习，更好地改造我们的学校，使之成为真正的人民大学，我们以佩带您所写的校徽而感到无限光荣，且得到莫大的鼓舞。”

6月2 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紫光阁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8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法》在总则中写道：

“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下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8次会议上发表讲话说：

“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该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杜鲁门在今年1月5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美国这样暴露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面目，这对于中国和亚洲人民很有利益。美国对朝鲜、菲律宾、越南等国内政的干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全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都将站在被侵略者方面，而决不会站在美帝国主义方面。他们将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因为它没有人民的支持。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者的任何挑衅。”

会议结束后，来自外地的与会者们纷纷和毛泽东握手告别，赛福鼎本来也想上前和毛泽东握握手，可他见毛泽东一边握手，一边像是在寻找什么人，就有些迟疑了。就在这时，毛泽东看见了他，径直向他走来，握着他的手问道：

“赛福鼎同志，你什么时候回去？”

赛福鼎回答说：

“我明天就回去，不知主席还有什么指示？”

“没有什么，走，我们谈谈。”

毛泽东边说边往外走，赛福鼎在后紧紧跟随。快出门了，毛泽东回头问道：

“你的翻译呢？”

赛福鼎马上叫来翻译尹善，一块儿跟着毛泽东，一直走到毛泽东的家里。一进院门，江青迎了出来。毛泽东向江青介绍说：

“这就是赛福鼎同志。”

他又将江青介绍给赛福鼎，接着问江青：

“饭好了吗？”

“都已摆好了，可以吃了。”

“准备好的菜都撤了，准备清真菜，请赛福鼎同志一起吃。”

赛福鼎见江青面有难色，欲言又止，便说：

“谢谢主席和江青同志，我一会儿回饭店吃饭。”

毛泽东已知江青为难的缘故，就说：

“这好办。你给北京饭店打电话，请他们派一回族厨师，带上牛羊肉过来做。让孩子们也一起吃。”

说罢，引着赛福鼎进入客厅，让赛福鼎坐在沙发上。赛福鼎心想，毛主席刚作了长篇讲话，现在又如此真诚地接待自己，心里很是过意不去，便说：

“主席，你今天太累了。不用管我了，你还是早点休息吧。”

“随便聊聊。这也是一种休息的好办法。”

毛泽东说着，看看手上的香烟快吸完了，赶紧吸了一口，灭掉烟蒂，又换上一支，点燃了，不慌不忙地说：

“你们新疆是块地大物博、矿产丰富的宝地。维吾尔民族，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民族。她在历史上虽然建立过自己强大的汗国，但和内地在政治、经济方面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她保卫了我们国家的边疆，为国家的统一做出过重大的贡献。在历史上，维吾尔族人民还多次派远征军帮助中原王朝平定叛乱。**现在北大任教的翦伯赞就是你们维吾尔人，他是湖南桃源县人，但祖籍是新疆，是明代受朝廷之命平息武陵叛乱后定居在湖南的维吾尔人的后裔。你可去湖南看看那里的维吾尔人。尽管他们的语言变了，但从他们习俗、服饰、语言中，仍可找到维吾尔民族的特征。**维吾尔人纯朴、善良、勤劳、好客、宽宏、大度，这些都是维吾尔族人民突出的美德。其他的少数民族，也都具有这样的美德。维吾尔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总之，新疆是个好地方，各族人民是热爱祖国的好人民。”

他口气一转，又说：

“但因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尤其是清朝和国民党，还有一个盛世才，长期以来，对新疆各族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使各族人民处在悲惨的境地。让各族人民摆脱目前的困境，使他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任务。”

毛泽东的话使赛福鼎既惊奇又佩服，更是激动。他没有想到毛泽东是这样了解新疆的历史和现状，这样赞美维吾尔人民和其他少数民族，把新疆各族人民看做是骨肉同胞，看做是自己的父老兄弟。就在此时，工作人员进来报告说：

“可以吃饭了。”

毛泽东把赛福鼎请到餐厅，挨着自己在餐桌旁落座，江青和尹善分坐在两边相陪。毛岸英、毛岸青、毛远新和一位毛泽东亲属的孩子也来了。毛泽东指着赛福鼎向孩子们介绍说：

“这位是赛福鼎·艾则孜同志，是新疆的维吾尔族。”

他又指着毛岸英向赛福鼎介绍说：

“他是我的大孩子，叫毛岸英。在苏联学完大学回来。”

说完便请客人用餐。赛福鼎得知毛岸英是从苏联回来的，就边吃边用俄语询问他在苏联的学习、生活情况，又问他对苏联的印象如何。毛泽东非常注意地观察着，见他们聊完了，就问赛福鼎：

“怎么样，他的俄语及格不？”

“完全及格，讲得流利而标准。”赛福鼎满意地说：“而且充分显示了俄罗斯人的性格。”

毛泽东说：

“我的俄语不行，但看得出来，他讲俄语不困难。”

说罢转向毛岸英，说：

“大学毕业了，但你学的那点书本知识是不够用的。你还需要继续学习，还要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要去基层，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在劳动中锻炼。”

他看了赛福鼎一眼，继续对毛岸英说：

“我把你交给赛福鼎同志，你随他到新疆去。新疆是个好地方，那里的人民非常好，他们会欢迎你的。你要拜各族人民为师，好好为他们服务。为此，首先你要学会维吾尔语言和文字。”

赛福鼎听毛泽东如此说，便非常高兴地对毛岸英说：

“欢迎你去新疆工作。新疆人民的心像哈密瓜一样的甜，你很快就会爱上新疆人民的。而且掌握了俄语后，你也能很快学会维语。”

毛岸英急切地问：

“你什么时间回新疆，这次能带我去吗？”

赛福鼎望了望毛泽东，毛泽东接口道：

“新疆是一定要去的，不过你应先去最艰苦的环境锻炼，以后再去新疆。”

说罢，**他把目光转向年幼的毛远新，说：**

**“你爸爸就是在新疆被盛世才杀害的。你将来更应去新疆，去完成你爸爸未完成的事业，好好为各族人民服务。**”

**赛福鼎也对毛远新说：**

**“新疆人民没有忘记你爸爸。他在新疆办公的地方，他用过的东西都完好地保存着。你长大后，一定要去新疆工作，新疆人民会欢迎你的。”**

毛泽东转向毛岸英，问道：

“刚才赛福鼎同志说，新疆人民的心像哈密瓜一样的甜。讲得好，真善美都是甜的。我问你，哈密瓜为什么那么甜？你知道吗？”

“可能是新疆的气候、土壤和内地不一样的缘故吧。”

毛岸英回答说。毛泽东又问毛远新：

“你说呢？”

毛远新眨了眨眼，想了想，又摇摇头，表示不知道。毛泽东说：

“有3个条件，这就是土壤、气候和栽培技术。第一，新疆的土壤是碱性土壤，这种碱性物质的化学名字叫碳酸钠；第二，新疆的气候是大陆性气候，炎热少雨，昼夜温差大，适于植物多纳少吐；这两条是主要的，再加不可缺少的第三条，就是群众长期以来从选种到种植总结出一套先进的技术，所以哈密瓜是甜的，一般甜度达16%，最高可达20%。赛福鼎同志，我讲的对吗？”

“对，对。”

赛福鼎非常佩服毛泽东。他感到自己在毛泽东家里既是客人，又是学生，今天是毛泽东给自己上了一堂生动的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课。离开毛泽东的家，他对尹善说：

“**毛主席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他完全可以和列宁齐名。”**

6月28日这一天，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以外交部长名义代表中国政府就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声明发表声明，全文如下：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指使南朝鲜李承晚傀儡政府挑起朝鲜内战之后，于6月27日发表声明，宣布美国政府决定以武力阻止我台湾的解放。美国第7舰队并已奉杜鲁门之命向台湾沿海出动。

我现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声明：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美国政府这种暴力掠夺的行为，并未出乎中国人民的意料，只更增加了中国人民的愤慨，因为中国人民许久以来即不断地揭穿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霸占亚洲的全部阴谋计划，而杜鲁门这次声明不过将其预定计划公开暴露并付之实施而已。事实上，**美国政府指使南朝鲜李承晚傀儡军队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进攻，乃是美国的一个预定步骤，其目的是为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越南和菲律宾制造借口，也正是美帝国主义干涉亚洲事务的进一步行动。**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的中国人民，必能胜利地驱逐美国侵略者，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类，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只要我们不受恫吓，坚决地动员广大人民参加反对战争制造者的斗争，这种侵略是完全可以击败的。中国人民对于同受美国侵略并同样进行反抗斗争的朝鲜、越南、菲律宾和日本人民表示同情和敬意，并坚信全东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必能把穷凶极恶的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制造者，最后埋葬在伟大的民族独立斗争的怒火中。

周恩来同时还代表中国政府致电联合国，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要求美国从朝鲜撤军。

此后，周恩来又先后在8月30日、9月24日和9月27日3次致电联合国，抗议美军入侵朝鲜的暴行。

6月30日，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6月30日这一天，杜鲁门命令美国陆军在朝鲜对北方人民军作战。

6月30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援越顾问团师级以上干部、部分团级干部和机要人员约40人，早早来到中南海颐年堂，等待中央领导人接见。

前文已经说过，早在1950年1月间，胡志明向毛泽东提出了援越抗法的请求。为此，中央军委在4月17日下达指示，从第2、第3、第4野战军中各选1个师的全套顾问（包括师、团、营3级），从3野选调顾问团团部人员，从4野选调一个军官学校的全套顾问及教员，组成了赴越军事顾问团。

此时，偌大的颐年堂里空荡荡的，没有沙发，没有地毯，一头摆着两张木桌，上面连茶水、香烟也没有，桌前放着几十张椅子和凳子。颐年堂除了雕梁画栋以外，什么奢侈的摆设也没有，唯一有价值的是挂在墙上的清代宫廷画。

“首长来了。”

有人小声说了一句，众人立刻站了起来。朱德第一个走了进来，随后是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刘少奇、朱德和韦国清、梅嘉生、邓逸凡握手寒暄。待众人落座后，刘少奇说：

“今天请诸位来，要谈什么大家心里都明白。本来毛主席、周总理都一起来，和大家见见面，由于朝鲜打起来了，情况你们也都看了报纸，主席这几天很操劳，他是夜间工作，白天睡一会儿觉，现在正在休息，我们就不打搅他了。周总理现在忙着开会，也不能来了。那么就由我和朱总司令来和大家谈谈吧。”

接下来，刘少奇和朱德先后讲了话。朱德正说得起劲，不知谁喊了一声：

“主席来了！”

众人连忙站起来使劲地鼓掌。刘少奇迎着毛泽东说：

“他们已经来了个把小时了。这几天你太疲劳，想让你多睡一会儿。”

“哎，事情太多，睡不着啊。”

毛泽东挥了挥手。他与韦国清、梅嘉生、邓逸凡握手，又走到屋子中间，和顾问们一一握手，亲切地询问每一个人的姓名、年龄、籍贯和职务。

“主席，给大家说几句吧。”

刘少奇说。毛泽东道：

“你们都讲了，我再讲就要重复了。”

朱德说：

“主席，你就讲一点吧，大家都希望听到你的教诲。”

毛泽东说：

“朱老总，你言重了，‘教诲’二字从何谈起。”

刘少奇说：

“主席，你就别客气了，大家来了都是希望看看你，听听你的声音。”

韦国清、梅嘉生、邓逸凡等人也附和着说：

“主席，你就说几句吧。”

毛泽东看着众人，默默地点点头，双手向下按了按，说：

“你们都坐下吧。”

待众人重新坐定，他走到顾问们中间坐下，说道：

“同志们，这次你们去当顾问，是一件大事、新事，我们党和国家、军队是第一次向外国派顾问团，这个意义很重大，是我们的光荣。你们是执行一项很重要、很光荣的任务，希望你们做出好成绩，取得好经验。**随着国家和军队的建设，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还可能更多的派顾问出去，帮助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解放斗争，这是国际主义的问题，是共产党人义务所在。**

世界上还有许多受压迫、被侵略的国家，他们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我们不仅仅是同情他们，还要伸出手去援助他们。不可因为我们打败了蒋介石，就认为我们的任务都完成了。我们还**要看到帝国主义力量还很强大，他们不会甘心在中国的失败。他们在朝鲜、越南的行动，是想造成对我们包围的形势。一有机会，就会直接对准我们。所以，帮助他们，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着想。唇亡必齿寒，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为了帮助兄弟民族，我们去工作是一举两得的事。**这是我们要派顾问团的根本原因。

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革命斗争中，许多外国朋友参加了我们的斗争。胡志明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就参加了，还有越南人为中国的革命事业流血牺牲。另外还有其他国家的。大家都知道，这些人就是在国际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才这样做的。他们能够这样做，我们为什么不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俗话：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从积极方面说，就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还有一个原因，春节期间我不是去了一趟莫斯科吗？胡志明也去了，他是去寻求苏联援助的。在莫斯科，斯大林不了解胡志明，说不知胡志明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说胡志明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见一见他为好。这样，斯大林就见了。但是在胡志明提出请求苏联援助、派顾问时，斯大林没有同意。在回国的路上，我和胡志明又谈了这个问题，胡志明则要求我们派出顾问团。我说物质援助我们应尽力而为，至于派顾问团，我们不大好办，因为我们的干部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没有进学校的门，只是打仗有些经验。可是胡志明还是多次要求。我就说，我个人没有意见，还要回去同中央的同志商量一下，要派，也是当顾问呀。”

毛泽东说到这里，众人不禁都笑了起来。毛泽东接着说：

“既然斯大林不愿派顾问，那也就只能由我们给越南人民一些援助了。我从苏联回来，中央研究了一下，大家一致同意派顾问团。现在已经派了罗贵波先去越南，根据他们了解的情况，才决定派这样规模的顾问团。这就要大家辛苦一次。中央还准备叫陈赓同志先去一步，他和胡志明是老朋友，我们在边界上帮越南人整训了一些部队，装备了武器。

你们嘛，这次请韦国清当顾问团团长，本来是叫他去联合国工作的，但是联合国在美帝国主义等国操纵下不让我们进去，还要那个蒋介石。以后我又想让韦国清去英国当大使，但英国对我们总是三心二意的，那里只能降格了，不派大使了，这样就叫他去越南当顾问团团长。他同意，这很好，共产党人哪里需要哪里去，舒服的环境可以去，艰苦的地方也能去。只要工作需要，其它都不计较。这一点，你们要学习韦国清。

你们去的任务，就是协助人家打仗。现在他们还是游击战，没有打过较大的仗，主要是分散打游击。法军现在主要是控制城市、交通线、沿海港口，越军则占着广大农村。这和我们抗日战争的情况差不多。但是光打游击战不行，要取得胜利，还要打大一点的仗。能打攻坚战，能打运动战，才可以转入反攻，打败法国。要打大一点的仗，就要集中大一些的部队。目前他们已经组建了一些，由我们帮助装备。以后还要进一步集中一些有战斗经验的部队，编成正规部队，经过训练以后打一些大的仗。当然，不能削弱游击战。有些游击队升级了，还要扩大游击队，这方面你们有经验。总的说来游击战结合必要的运动战，还是以游击战为主。但**你们主要是帮助他们组建正规部队，教会他们打正规战。游击战他们自己有经验，由他们自己去搞。**

向运动战转变要注意步骤，多做调查研究。口不要张得太大，先打几个小一点的仗，锻炼部队，提高信心，初战必胜嘛。解放战争的原则不要忘记，每次都要集中优势兵力，一定要有3倍、5倍甚至更大的优势兵力，不打就不打，要打就打赢。运动战仍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占领城市据点为次。所以，你们去了要先集中部队，加强装备和训练。”

毛泽东又说：

“顾问就是顾问，实际上是参谋，给人家的指挥者当好参谋。参谋的职责是协助别人。”

毛泽东说到了罗贵波到越南后处理的最为棘手的事情。

原来，一直在中国工作的洪水回到越南后，担任了军区司令员，屡建战功。但是他和总司令武元甲的矛盾却越来越深，已经到了怒目相视的地步。胡志明告诉罗贵波说，如果洪水愿意返回中国工作，越共中央也同意，并请毛泽东批准。毛泽东在北京接到罗贵波的电报后，回电说，同意让洪水回北京。由此，毛泽东提醒大家，要虚心，不能骄傲，看不起人家。否则，搞得不好也会损害两国关系。他说：

“要使越南人了解自力更生的重要性。革命要争取外援，但不能依靠外援。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穷，不可能把他们的需要包下来。穷，也是事实。百多年来，内忧外患，战争连年不断，我们是搞得很穷。但我们援助被压迫民族是无私的，尽一切努力的，我们援助是有限的。这样就得靠他们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去赢得最后胜利。”

毛泽东说到激动处，突然站了起来，提高声音说：

“**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军队，要有自力更生的思想，有克服困难的精神，有克服困难的办法和能力，这个国家、党、人民、军队，才是坚强的，才有胜利的希望。**胜利了，才有力量建设自己的国家，才能富强，才能真正的独立解放，才能真正的胜利。”

毛泽东充满激情的话，使顾问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毛泽东用手向下按了按，接着说：

“最后，讲一讲保密问题。这件事要特别注意，‘顾问团’的名字不要随便叫，要搞个代号。如果帝国主义知道我们派了顾问，一定要大做文章。所以，你们的行动要绝对保密，不可张扬，连亲友也要保密。要多穿便衣或者越军的军服，我们的军衣一律不能带去。到了越南后不要随便外出，不要单独外出。作战时要十分慎重，不要太靠前，免得被敌人俘去。当顾问千万不能代替人家指挥，也不必冲锋陷阵，到第一线去。你们要多想点办法，严守机密。”

毛泽东转脸问朱德：

“顾问团的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

朱德说：

“报告主席，已经全部准备就绪，经过此次召见后就要出发了。”

“顾问团要带的东西定下来了吧？”

“这个问题还未最后定夺，他们有个单子，我的意见是叫下面再研究研究，有些东西似乎不那么必要。”

“哦，还有什么不那么必要？”

“也没什么，就是手表、皮鞋、派克钢笔之类的东西。”

毛泽东哈哈大笑，将手一挥，说：

“总司令批了就行了吧。不要叫别人研究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你就大方一些吧。手表、皮鞋、钢笔，统统满足他们的要求。第一次派顾问团嘛，代表我们的国家，我们再困难也不在乎这点东西，门面这还是要装饰的，你们看呢？”

朱德说：

“好吧，既然主席同意了，我就按单子给他们发下去。”

毛泽东笑哈哈地问顾问们：

“大家说好不好？”

“没有意见！我们听主席的安排。”

众人异口同声。

“好了，我的话讲完了。”

毛泽东将目光投向刘少奇、朱德，问道：

“你们还有什么指示吗？”

刘少奇说：

“该说的主席都说过了。”

“你呢？朱老总。”

朱德说：

“我也全说完了。”

毛泽东说：

“你们都没有事情说了，我就将顾问们全带走了。”

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毛泽东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你们都这样干什么？我毛泽东又不是什么凶神。”

毛泽东依然显得有点高深莫测。朱德说：

“主席，你就快点将事说明了吧！”

“我是要带顾问们去参观一下中南海。”毛泽东笑着说：“防止到了越南，别人问起中南海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叫‘海’，你们全不知道。”

顾问们闻听此言，顿时鼓起了掌。毛泽东在众人的簇拥下，信步走出了颐年堂。

邓逸凡，原名邓福坤，学名邓国雄，曾用名邓惠民、邓彦，1912年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县水口镇峤峰堡村。他在领受任务后，回到家中告诉了妻子周志中。周志中听了，失声痛哭，说：

“好不容易盼来安定生活，又要分离。”

邓逸凡只能好言劝慰。后来，邓逸凡回国探亲，周志中提出：

“你再去越南，我们就离婚。”

邓逸凡思之再三，向上级提出了自己不想再去越南的想法，但是又表示服从组织决定。领导批评他是享乐主义。于是，邓逸凡就怀揣着离婚协议书，返回越南前线。战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主席授予邓逸凡将军二级军功勋章。

1950年7月1日，《人民日报》根据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报道了党中央关于进行全党整风的决定。报道中写道：

“党的巨大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党内教育的任务。为了巩固中国人民革命的辉煌胜利，进一步改善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以便顺利地实现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伟大任务，必须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

7月2日，毛泽东复电给越共中央，他在复电中写道：

“同意先打高平的意见，对高平的具体作战方案等陈赓去后，由你们最后商定。以后如何作战，由你们自己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我们如有意见，仅供你们参考。因为你们比我们熟悉情况。”

在夏日的一个周末，王鹤滨知道毛泽东要去双清别墅，赶紧收拾好医药箱来到毛泽东身旁，只见毛泽东和他的孩子们已经站在了颐年堂东侧的大院内，好像是在等什么客人。

不一会儿，叶子龙从大门外带来了一群客人，为首的那一位身材高大，足有2米有余，已经年近不惑，长着一副长长的面孔，他就是袁水拍。

袁水拍（1916-1982），原名袁光楣，笔名马凡陀，诗人。袁水拍的身后跟着他那位身材瘦小的夫人和他的两个儿子。毛泽东拉着袁水拍的手，亲昵地说：

“你年纪轻轻就出版了诗集，可喜可贺！”

袁水拍谦虚地说：

“主席过奖了，那算不得是诗。”

毛泽东说：

“《马凡佗山歌》我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就读过。”

宾主寒暄过后，就带着孩子们上路了。汽车到了香山，驰过慈幼院的大门东侧，爬上一个小坡，停在了一个不大的停车场里。毛泽东和客人沿着松林间的小路向北走去，走了约百十米，到了一个院落前，顺着院内的一条蜿蜒的走廊，将客人带到走廊中的一个六角小亭下，宾主坐在了小圆石桌旁，谈笑风生。

王鹤滨怕影响毛泽东和客人的谈话，就和李敏、李讷、刘思齐、毛远新，还有江青的姐姐李云霞，李云霞的儿子王博文，叶子龙的两个女儿燕燕和丽娅，以及客人的两个儿子，走到小亭南侧水池边玩耍。招待人员为他们送来了冷饮，孩子们欢声笑语，好不高兴。摄影师侯波为他们一一摄影留念。

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紧急决议，以美国军队为主组成所谓“联合国军”，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该司令部使用联合国军旗帜”，扩大侵朝战争。

7月7日这一天，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林彪、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以及各军种兵种负责人萧华、萧劲光、刘亚楼、杨立三、李涛、许光达、滕代远、谭政、万毅、苏进、贺晋年、赵尔陆及东北军区的负责人。

会议着重讨论了加强东北边防的军事部署问题。

7月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根据联合国决议，任命美国驻远东部队总司令兼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担任所谓“联合国军”总司令。

随后，美国纠集英、法、加拿大、澳大利亚、土耳其、新西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希腊、哥伦比亚、泰国、菲律宾、南非、埃塞俄比亚15个国家，将这16个国家派出的作战部队组成了所谓的“联合国军”。此外，意大利、挪威、瑞典、丹麦、印度5个国家也派出战地医疗队，参加“联合国军”。连同南朝鲜的军队，统统归麦克阿瑟指挥。

7月10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继续研究加强东北边防的军事部署问题。会议一致通过了一个《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重组第13兵团，作为军委预备队，组成东北边防军，必要时支持朝鲜人民军作战。由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李聚奎为后勤部司令。

欲知东北边防军如何组建，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0年6月19日写给教育部长马叙伦的信，文字不多，却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他在信中说：“**要各学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毛泽东所说的**前者，规定了新中国教育的基本原则是健康第一，后者则从经济方面体现了中、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建国伊始，中小学、中专以上院校就全部实行了义务教育，特别是中专、专科以上高等院校，所有经费均由政府支出，包括学生的吃、住、书本资料费和贫困生助学金。这种制度一直持续到毛泽东时代终结，圆了不少贫寒学子的升学梦。鄙人就是受益者之一，大学3年，每月享受政府补贴的22元生活费、4元助学金（即零花钱）。这种体制与“教育产业化”之体制相比，无疑有天壤之别！

**第15章**

**“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

**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

**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文化学习。”**

话说1950年7月10日，毛泽东复电给粟裕并告陈毅、饶漱石，他写道：

粟裕同志并告陈饶：

来电悉。**有病应当休养可以缓来，但仍希望你于8月上旬能来京，那时如身体已好，则担任工作，如身体不好则继续休养。**

毛泽东 7月10日

7月11日，文化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加强电影管理，颁布了《电影新片领发上演执照》、《国产影片输出》、《国外影片输入》和《电影旧片清理》4个暂行办法。同时，中宣部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电影指导委员会”，以加强对电影事业的领导。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委员有：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田汉、蒋南翔、丁玲、江青、邓拓、阳翰笙。

这一天，文化部还成立了戏曲改进委员会。

7月11日这一天，毛泽东将程潜关于解决湖南夏荒问题的信批给中南局和湖南省委，他在批示中写道：

中南局、湖南省委：

兹将程潜所提关于湖南民食的意见发给你们。所称再拨二千万斤赈济米一点请即加研究，如有必要宜即照拨并宜速办。

毛泽东 7月11日

7月1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起义部队中的领导机关应实行军政委员会及军政组制度”给中南等各中央局及军区的指示电，他写道：

中南、西南、西北各中央局及军区：

**在起义部队中的领导机关应为军政委员会及军政组制度，不应如主力一样为党委制，以便吸收起义将领参加一起工作，利于团结和改造部队。**兹将绥远改造傅部经验一件发给你们作参考，请你们指导所属有关部分注意研究此种经验。

军委 7月12日

7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上批示道：

“同意。照此执行。”

此后，中央军委命令：由驻河南等地的战略预备队原第4野战军第13兵团所属38军、39军、40军，驻黑龙江地区的42军，炮兵第1、第2、第8师和4个高炮团，1个工兵团，1个战车团，1个汽车团等共计25.5万多人，组成“东北边防军”；于7月底到8月上旬，全部到鸭绿江北岸的本溪、风城、辽阳、安东、通化、集安、宽甸等地集结，开始整训。

从组建东北边防军起，毛泽东就考虑：一旦出兵用什么名义？如何既投入新中国的主力部队同美国军队作战，又使中美两国从国际法的意义上不进入战争状态？还不至于把作为盟国的苏联拖下水爆发一场世界战争？尽管他已下定了不惜打烂了重新建设的决心，作好了美国公开向中国宣战的准备，但是，这毕竟是中国在美国武装侵略面前迫不得已的选择，只是想达到制止侵略的有限目的，并不希望扩大战争的规模。毛泽东依然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考虑到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惯例，力求在军事行动的范围和名义上有所节制，使“朝鲜战争局部化”，不至于成为中美两国之间乃至世界性的全面战争，这样才能减少侵略者的口实，使自己在国际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毛泽东和周恩来研究的结果，觉得用“支援军”的名义比较合适。初步意见定下来以后，决定再征求一下民主人士的意见，毛泽东说：

“多征求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阅历多，有许多经验，此类事情他们办法多。”

果然，周恩来一征求意见，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立即求见毛泽东。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同听取了黄炎培的意见。

“有个问题要考虑呀，”黄炎培诚恳而关切地望了望毛泽东，又望望周恩来，说道：“**自古道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仗就不好打。”**

“我们叫支援军，”周恩来说：“顾名思义，支援朝鲜人民嘛。”

黄炎培摇摇头，反问道：

“这样叫，是不是师出无名？需要考虑。”

周恩来问：

“怎么是师出无名呢？”

黄炎培说：

“**支援军，那是派出去的。谁派出去支援？国家吗？我们是不是要跟美国宣战？**”

**“哦，有道理，有道理！”毛泽东伸手从笔筒里抓起一支铅笔，将“支援”二字一划，改写为“志愿” 两个大字。**然后掷笔于桌，欣然道：“**我们不是跟美国宣战，不是国与国宣战，我们是人民志愿的么，这是民间的事儿，人民志愿去朝鲜帮助朝鲜人民的，不是国与国的对立。**”

志愿军参战，从国际法的意义来讲，只是中国民间志愿组织的武装队伍入朝，由朝鲜政府指挥作战，中美两国仍不处战争状态。周恩来兴奋地做了一个手势，他说：

“对，世界上有许多志愿军的先例，马德里保卫战就有各国来的志愿军。”

黄炎培频频点头，笑道：

“师出有名则战无不胜。”

7月17日，中央军委致电华东局、唐亮等转粟裕，电文中写道：

华东局，唐张周转粟裕同志：

毛主席前电粟要他于8月上旬来京，依情况或留京休养担任工作。现粟已去青岛休养，甚好。**请粟于8月上旬来电报告身体情况。如病重则继续在青岛休养，不要来京，如病已愈则盼来京。**

军委 7月17日

7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转发《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关于匪特暗害阴谋及我保卫工作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兹将公安部政治保卫局6月11日关于匪特暗害阴谋及我保卫工作报告一件发给你们。请你们加以充分注意，指导所属加强保卫工作，彻底粉碎国民党匪特的暗害的阴谋，**有效地保卫一切党的领导同志、工作干部及党外民主人士，是为至要**。

作出上述批示之后，毛泽东又召来周恩来，听取罗瑞卿有关国民党匪特大搞暗害阴谋活动的情况汇报。他开门见山地对罗瑞卿说：

“今天，我和总理请你来，是想听听近期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全国范围内的治安情况。”

罗瑞卿报告说：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残留在大陆的政治土匪、国民党特务以及各种反动会道门势力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第3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机会到了，于是便纷纷从阴暗的角落里跑出来，进行各种反动活动。他们炸毁桥梁，破坏工厂矿山，烧毁仓库器材，抢劫粮食财物，残害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甚至组织武装骚扰和暴乱事件。河北交河县发生反动地主反攻夺地事件93起；福建省发生19起反革命武装暴乱；广西各地干部被杀3000多人。更不能容忍的是，他们还把暗害的矛头对准了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

毛泽东听罢，转向周恩来，说：

“恩来，我们手软是不行的。从目前形势发展来看，你我从苏联回国之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个镇压反革命的文件是很不够的！”

“是的，”周恩来严肃地说：“看起来，我们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才能建立与巩固革命秩序，才能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才能顺利地进行生产建设与社会变革。”

毛泽东提议由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会议，明令颁发一个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文件。

周恩来、罗瑞卿去后，毛泽东在聂荣臻转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边防军特种兵负责人万毅和中南军区特种兵司令部政治委员邱创成和副司令员匡裕民7月16日关于炮兵观察队赴朝鲜前线考察问题的请示电上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聂：

暂时不要去。何时去，将来再定，并须得到军委批准。

毛泽东 7月18日

接着，他在中央军委给中南军区拟复的电文“军委原则上同意你们组织观察队到朝鲜前线去作实地考察，但须俟外交部与朝鲜大使交涉”一句后边，加写了一句话：

“并须斟酌去的时间，避免过早暴露目标。此项时间由军委决定示知。”

7月18日晚，毛泽东收读了江苏无锡师范附属小学吴启瑞老师写给他的一封信。

这吴启瑞的丈夫叫王人路，王人路的父亲就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数学老师王正枢，本传在第一卷、第二卷中多有描述。1948年底，年仅49岁的王人路身患脑溢血病，在临终前拉着吴启瑞的手说：“天快亮了，毛泽东与吾父交厚，8个孩子全靠你了，将来如有危难之事，你可去找毛大哥。”1950年5月22日，月工资仅有47元的吴启瑞不得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2000多字的长信：“毛主席：容我自己来介绍，我叫吴启瑞，是无锡师范附小低年级的教员……解放以来，对于时政及各种理论文件越读越感兴趣，但限于时间，不能充分学习，很少收获，深感苦闷，而造成这苦闷的因素，乃是为了背着8个小孩的包袱，使瑞终日碌碌于生活的挣扎，筋疲力尽。”“今受生活的威胁，小儿等体力不良顾虑，万乞主席睹世交之谊，垂念小儿等孤苦体弱，特予提携，准予小女心月和小儿心丰、心支加入苏南区干部子弟班。裨小儿等生活入于正规，增加体格，瑞得全心全意努力业务时政的学习……”

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这封长信，王正枢、王人路的名字映入眼帘，使他思绪万千，30多年前自己与王正枢先生及其家人往来的情景似乎就在眼前。他提起笔在吴启瑞的第一页信纸上写了一个批示：

请陈丕显同志酌处。写信者是有8个孩子的母亲，在无锡师范附小当教员，请求将她的3个孩子加入苏南干部子弟班。

毛泽东 7月18日

7月19日凌晨，毛泽东给吴启瑞老师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启瑞先生：

5月来信收到，困难情形，甚为系念，所请准予你的3个小孩加入苏南干部子弟班，减轻你的困难一事，请持此信与当地适当机关的负责同志商量一下，看是否可行。找什么人商量由你酌定，如有必要可去找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同志一商。我是没有不赞成的。就是不知道该子弟班有容纳较多的小孩之可能否？你是8个孩子的母亲，望加保重，并为我问候你的孩子们。此复，并颂教祺。

毛泽东 7月19日

接着，他在信封上写了寄信地址：无锡市大成巷四号，交给工作人员发出。

7月20日，毛泽东关于苏联来华之空军师的驻地和人民解放军空军混成旅改装训练问题，复电给斯大林，他在电文中写道：

菲利波夫同志：

在研究了我们出动到中朝边界上的部队之空中掩护问题，以及我国空军转入使用喷气飞机并接收两个苏联空军师的一切器材的问题之后，我们欢迎您的提议，并对您及苏联政府给我们的帮助致特别感谢之意。

**我们拟将您派来掩护我们部队的喷气式空军师，驻扎在沈阳附近，两个团驻鞍山，一个团驻辽阳。这样驻扎，在与驻在安东附近的我国空军混成旅所属驱逐团协同动作之下，可以解决掩护部队以及保护沈阳、安东、抚顺工业区的问题**。

我国空军驱逐部队转入使用喷气式飞机的问题，提议按下列程序进行：

以巴基斯基喷气式机团为基础，于最近两个月内建立起改换飞机训练的机构。将准备移交给我们的喷气式飞机，所需之160组飞行人员，分成两批训练。第一批是将我现有空军混成旅所属的60组驱逐机飞行人员，派去进行改换飞机训练。当这一批改换飞机训练结束的时候（1950年12月到1951年1月），即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联合航校1951年1月份毕业生中选出第二批（100组飞行人员），去进行改换飞机训练。这样，我们就能在1951年3月到4月间，完成新喷气飞机的接收工作。至于接收两个苏联空军师的一切器材，也只能在那时全部完成。

为了及时实现拟定的改换飞机训练计划，需要建立一个能容纳60个人学习的训练机构，并供给这个机构以教练用的飞机、器材、模型、挂图和最低限度必需数量的训练指导员及教员。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提议派遣我国空军司令部的代表和空军顾问长空军少将普鲁特可夫同到莫斯科一趟。

以上各点是否可行，请予酌定告知为盼。

谨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毛泽东 7月20日

接着，毛泽东在周恩来关于淮河水灾的报告上作了第一个根治淮河的批示。

原来在不久前，安徽、河南交界连降大雨，淮北地区受灾之惨重，为百年来所仅有。毛泽东看到报告中有一份电报说，‘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489人。’他一边流着泪，一边在“被毒蛇咬死者”和“统计489人”这两个地方，都画了横线。接着，他在给周恩来的批示中写道：

周：

**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如何，请酌办。

毛泽东 7月20日

7月20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商议援助越南的事情。毛泽东问周恩来：

“恩来，罗贵波同志去越南多长时间了？”

周恩来说：

“他们是1月初从北京出发的，经过50多天的艰苦跋涉，才到达中越边境。”

刘少奇补充说：

“罗贵波一行是3月10日到达越南，与胡志明等越共中央领导人见了面。”

“韦国清和顾问团到达了越南没有？”

朱德说：

“他们已经到达了越南。”

“近来越南战场的情况怎么样？”

朱德说：

“情况比我们预料的要差些，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韦国清难以与胡志明等人沟通。”

“为什么？”

朱德说：

“韦国清主要的时间都用在了前线，而越共最高指挥当局有时做出的决定，令他们完全难以相信。”

“那韦国清为什么不到胡志明、武元甲等人身边当顾问？”

朱德沉思了片刻，说：

“具体情况我们现在也未能得到。可能是权衡轻重，前方战场上更需要他。”

毛泽东转向周恩来、刘少奇，问道：

“恩来，少奇，你们看该怎么办？”

周恩来看了刘少奇一眼，对毛泽东说：

“我们就再派一名高级指挥员去，直接与胡志明、武元甲接触，作为他们最高权力机关的参谋。”

“再派一位？”

刘少奇见毛泽东正在沉吟，也说：

“恩来说得不错，有必要再派一名高级指挥员去。我们刚刚收到罗贵波的电报，他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说这样可以在越南中央产生一种我们特别重视援助他们的印象。”

“电文中有没有说越共方面的态度？”

刘少奇说：

“电文中没有说，但罗贵波说越共方面希望与更多的中国指挥官接触，以期得到更多战斗指挥方面的经验。”

“越共没有提出？”

周恩来说：

“主席，我们已经先后派了两批军事顾问到越方，他们当然不好再提出更多的要求。”

“嘴都张开了，再多说一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嘛！”

周恩来说：

“人，我们已经派出了许多，再多派几个过去，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

“是呀！好人我们已经做了，当然要一直做下去。”毛泽东停了停，又问朱德：“朱老总，你看派谁去最合适？”

朱德说：

“是不是派林彪去？”

毛泽东摇摇头，说：

“不行！**林彪在军事指挥上确实不错，但他不能给人做参谋。如果他去了，不是他给胡志明当顾问，而是胡志明给他林彪当顾问。**”

刘少奇提议说：

“邓小平呢？”

周恩来立即提出反对意见：

“不行，新中国刚刚建立，许多工作都才起步运转，**邓小平若去了越南，他的那份工作没有谁可以挑得起来。”**

毛泽东目光直射周恩来：

“恩来，你说让谁去？”

“陈赓。”

“陈赓！好。”毛泽东说：“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4兵团司令员。此人还是位较为合适的人选。朱老总，少奇，你们俩还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了，主席。”

“好。”毛泽东将手一挥：“就再派陈赓到越南去，帮助越南人民抗击法国殖民者。”

不久，陈赓受命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率领王砚泉、朱鹤云等20多名随员，奔赴越南，协助胡志明进行抗法战争。后来，陈赓同胡志明主席在越南密林中亲切会见，胡志明吟诗道：

“乱石山上高士卧，茂密林中英雄来。”

在中越边界战役全歼法军两个精锐兵团3000余人的那一天，胡志明兴致勃勃地赠诗给陈赓，他写的是：

携杖登高观阵地，万重山拥万重云。义兵壮气吞牛斗，誓灭豺狼侵略军。

中越边界战役结束后，陈赓回到了国内。不久，他又受命率部奔向了抗美援朝的战场。

且说7月22日，周恩来、聂荣臻因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副司令员萧劲光、副政治委员萧华尚不能到职，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建议说：

“请主席考虑边防军目前是否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并统一一切供应，将来粟、萧、萧去后，再成立边防军司令部。”

7月23日，毛泽东在周恩来、聂荣臻7月22日的报告中作了一个批示。

周恩来在报告上批注：“主席：此事系聂及刘亚楼今日见面时谈及者，如主席同意请批交聂办。”

报告中说：“调往东北的部队预计8月上旬可以全部到达指定地点，苏方限苏联空军喷气式师于8月3日前全部到达指定地点。这些部队到达后指挥与供应即成大事。原来军委确定之边防军指挥机构虽从作战上来说较为有利，但目前似有困难：一、边防军粟裕司令员需要休养，副司令萧劲光、副政委萧华一时还难以离京北去。二、东北军区高司令员等感到层次太多，有所不便。三、边防军的供应需要强有力的后勤组织才能胜任，而中南只能组织轻便的后勤机构，刚到东北恐亦有困难。基于以上情况，请主席考虑边防军目前是否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委指挥，并统一一切供应。将来粟、萧、萧去后再成立边防军司令部。中南李聚奎到东北后即兼任军区后勤部长，所带之后勤机构即合并到东北后勤部中，因东北军区后勤部太弱，不能胜目前的大任。这样部队指挥既可免生脱节现象，供应问题也较容易解决。”

毛泽东在报告中批示道：“同意。”

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颁发了经政务院7月21日第42次政务会议通过，经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批准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在大陆上基本结束，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已先后成立**。但在某些地区，特别是有些新解放地区，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仍在采取武装暴乱和潜伏暗害等活动方式，组织特务土匪，勾结地主恶霸，或煽动一部分落后分子，不断地从事反对人民政府及各种反革命活动，以破坏社会治安，危害人民与国家利益。因此，**积极领导人民坚决地肃清一切公开的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迅速地建立与巩固革命秩序，以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并顺利地进行生产建设及各项必要的社会改革，成为各级人民政府当前重要任务之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对于一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解除其武装、消灭其特殊势力后，仍须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假如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必须予以严厉的制裁。”各级人民政府必须遵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对一切反革命活动采取严厉的及时的镇压，而在实行镇压和处理一切反革命案件中，又必须贯彻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不可偏废，以期团结人民、孤立反革命分子而达到逐步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目的。**为此，特对重要反革命分子的处理，呈经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批准作如下的原则指示：

一、对一切手持武器、聚众叛乱的匪众，必须坚决镇压剿灭，并将其主谋者、指挥者及罪恶重大者，依法处以死刑。

二、对以反革命为目的而杀害公职人员和人民、破坏工矿仓库交通及其他公共财物、抢劫国家和人民的物资、偷窃国家机密及煽动落后分子反对人民政府的一切活动、组织或谍报、暗杀机关，应彻底破获并逮捕其组织者及罪恶重大者，依法处以死刑或长期徒刑。

三、对怙恶不悛的匪特分子和惯匪，依法处以长期徒刑或死刑。

四、凡勾结、窝藏上述三项重要反革命分子而情节重大者，依法处以长期徒刑或死刑。

所有上述各项反革命案件，经当地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判决死刑者，其批准手续，在新解放地区，由省人民政府主席或者人民政府授权之当地专署以上首长批准后执行，在东北、华北及西北老解放地区，由省人民政府或大行政区人民政府主席批准后执行，在中央及大行政区直属市，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及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主席批准后执行。上述各项重要反革命分子之判决死刑者均不得上诉。

所有上述各项反革命案犯的处理，均应切实调查证据，认真研究案情，并禁止刑讯逼供。**在实行镇压反革命活动中，应防止乱打乱杀，如发生此种情形时，应予迅速有效制止，并查究责任，依法处理。**

各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地区，关于反革命分子挑拨的民族冲突事件的处理，应按具体情况妥慎决定，并及时请示上级人民政府批准。

政务院总理 周恩来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沈钧儒

7月31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率高级代表团抵达台湾访问。次日，他与蒋介石签订了《共同防卫协定》，决定美蒋双方海陆空军归麦克阿瑟统一指挥，以“共同防守”台湾。自此，美蒋勾结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最大障碍。

1950年8月1日，毛泽东向全军发出由他起草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除西藏、台湾等处尚待解放，各地残余土匪尚待剿灭之外，已经基本上结束。**国家的伟大的经济建设工作和文化建设工作，已经开始。今后人民解放军的任务，除必须解放西藏、台湾及剿灭残余土匪外，主要的就是要进行国防建设，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可能侵略，维持国内治安，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同时，也要尽可能地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作和其他工作。我全体人民解放军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国内革命战争的伟大任务，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爱戴和拥护，今后必须为完成新的任务而奋斗。**鉴于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般的文化水平太低的情况，为了要完成伟大的新任务，就必须提高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水平，并从军队中培养大批的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因此，中央决定，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文化学习。**为此，特规定下列各项：

一、全军规模的文化教育，自1951年1月正式开始。务求**在3年之内，使一般战士及初级小学程度以下的干部达到高级小学的水平，使一般相当于高级小学程度的干部达到初级中学的水平，然后再继续提高。**

二、在连队的教育时间内，暂规定以60%的时间进行文化教育，以30%的时间进行军事教育，以10%的时间进行政治教育。但某些起义部队在1951年内其文化教育时间应酌量减少，而增加政治教育时间。全军连队教育的时间分配，如因情况变化而需要改变时，当以命令改变之。

三、各部队应按在职教育与离职教育衔接并进的方法，而以在职教育为重点，举办下列各种文化学校：（1）在职的半日文化学校，由团以上各级普遍举办。这种半日学校，应按情况设立初小、高小、中学或专修等班级。在工作繁重、入学干部众多的机关部队，分为上午与下午两部上课。（2）为离职干部办的速成小学和速成中学，暂由军及省军区以上各级举办。速成中学可分为普通初级中学与完全中学两种。一级军区可举办离职高级干部的文化补习班。（3）连队采取学校的形式，进行基本上完备的初小教育与高小教育。（4）各军政大学，在一年或一年半内，以文化教育为主。部队其他学校，除军委规定或批准者外，暂时不办，或改组为文化学校。

四、一切在职干部与战士，凡需要学习与补习文化者，不论职别，均应无例外地依照文化课程的考试甄别，参加在职文化教育的适当班次，并认真地进行学习。

**各级干部，首先是经历多年斗争而文化水平甚低的工农出身的干部，凡能离职学习者，均应由各级领导机关有计划地分批或轮流抽调，经过考试，送入速成小学，或速成中学，或高级干部的文化补习班去学习。**一部分优秀的青年战士，也可选调入学。

五、在职与离职文化学校的教育，应一律采取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教育方针。学校课程，应参照普通小学中学的课程予以精简、重编，保持其科学的系统，减去不必要的课程，增加必要课程的内容。小学以国文、算术为基本课，兼有少量的自然、历史与地理常识课。中学亦须着重国文、数学，但应辅以自然、物理、化学、历史及地理诸课。此外，各种学校均须有一定的军事课及政治课。各种基本课程均应采用中央审定的课本。在中央未发审定的课本之前，可选用既有的课本。

**一切文化学校均应建立正规与合理的考试、分级、编班、升级、留级、毕业及发文凭等项制度，**制定各种必需的条例及规则，确立学生的自觉纪律，规定教员的责任。

各种文化学校的教育，以上课为主要方法，同时重视自修与辅导等活动，以利切实与迅速地进行教育与学习。

六、各级在职与离职文化学校的领导人员和教员，由各一级军区统一调配。首先应从各部队的知识分子干部中调用教员。不足之数，由一级军区筹划，从军政大学、人民革命大学、各地普通的大学、中学编余人员及失业知识分子中抽调或招聘之。干部学校的教员应力求优良称职。

七、军队文化教育所必需的经费，应由一级军区政治部造出预算，经上级批准，由各级供给部门负责及时供应。

八、部队文化教育工作，应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为了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得在团以上各级党委领导下，设立包括司、政、后勤及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与学校负责人在内的文化教育委员会，负责计划文化教育的课程、时间、经费、设备及调配教员、学生等事宜。教育工作的实施，则由各级政治机关及学校负责人领导进行之。

九、**全军文化教育工作的管理机关为军委总政治部。**全军文化教育的实施方案及其他必须统一处理的重大事项，军委总政治部必须按时予以解决。

十、今年尚有5个月，凡没有担负作战任务及巨大工程任务的部队，除进行整风、生产、整编复员、军事训练，从政治训练等项工作外，应对调动、招聘和训练教员，调收学生，筹办校舍、课本及其他教育用具等事，完成准备工作，务期明年一月能一律开学。同时，可立即开始进行重点试办，取得经验。

主席 毛泽东

8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了朝鲜局势，他说：

“如果美帝国主义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们。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

是日晚，毛泽东审阅了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一个报告。聂荣臻在报告中说，准备派出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朝鲜一侧，以确保鸭绿江大桥的安全。毛泽东当即批示道：“同意。”

8月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高岗的指示电，他写道：

高岗同志：

8月4日电悉。

1. 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请高岗同志负主责，**于8月中旬召集各军师干部开会一次，指示作战的目的意义和大略方向，叫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务使士气旺盛，准备充分，部队中的思想问题必须予以解答。我们当令萧劲光、邓华、萧华参加这次会议。

二、在上述方针下，部队的集结部署由你按情况酌定。38军如以调驻四平铁路沿线为有利，可即照这样调动。

　　　　 军委 8月5日

接着，毛泽东在周恩来关于治淮问题的报告上作了第2个根治淮河的批示，他写道：

周：

**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8月份务须做好，由政务院通过，**初秋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毛泽东 8月5日

8月10日，毛泽东亲自签发了对载涛的委任令：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委任令

兹委任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

主席 毛泽东

载涛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叔叔，这位曾任清宣统军咨府大臣、禁卫军训练大臣的王爷，一夜之间成为解放军的一员、国家高级干部，行政级别为13级，月工资近200元。他接到委任令后，百感交集，老泪纵横，没有想到像自己这样的人在新中国也会有新生，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当人民解放军马政局的顾问。他还纳闷地说：“我从没有见过毛主席，他怎么会知道我载涛其人呢？”于是，载涛恭恭敬敬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达他枯木逢春的喜悦和感激之情。他还高兴地对人说：“新中国诞生了，我载涛也新生了！”

后来，载涛又先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每月另发车马费50元。

8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华东军区工作给陈毅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毅同志，并告饶：

同意8月8日来电所述各项检讨及各项方针和办法。我们认为这些检讨及所提方针办法是正确的，是适合华东我军的情况的，望即鼓励全体同志照此执行。**台湾决定1951年不打，待1952年看情况再作决定**。**金门岛可决定在1951年4月以前不打，4月以后待命再打。**军区机构是否搬上海的问题，请漱石同志考虑决定，我们认为如能实行陈毅同志每月去南京一次，或唐、张每月至华东局汇报一次的办法，不搬是可以的。撤消3野前委，组织军区党委及其人选均同意。关于部队在3年内（1951年春季开始）加强文化教育一项任务问题，最近军委有训令发出，你们收到后请根据华东我军情况考虑实施办法。此外，3野前委在6月初决定并发出同时附一信请军委给以指示的那个关于继续实行六大方针的决定，不是用电报发来的，而是用信件送来的，到7月底我们才看到，耽误一个多月之久，已经不需要答复了。**我们感觉在方针政策和工作计划的报告请示方面，华东军区和中央军委的关系，比较华东局和中央的关系，其密切的程度要差一些。此点请予以研究和改正，以便不但在若干具体事件的解决方面，而且在方针政策和工作计划的解决方面（这方面是更加重要的），你们与我们之间保持更密切的联系。**

军委 8月11日

8月18日，毛泽东复电给西南局，他在电文中写道：

“你们关于向昌都进军各电均悉。今年如能进到昌都当然是很好的，问题是：（一）甘孜到昌都一段很长的道路是否能随军队攻进速度修筑通车；（二）昌都能否修建机场及是否适于空投；（三）**1个师进攻昌都是否够用，藏军似有相当强的战斗力。必须准备打几个硬仗。这方面你们有足够估计否？**我们对于以上几点尚不清楚，请分析电告为盼。”

接着，毛泽东复电给高岗，他在电文中写道：

高岗同志：

一、8月10日送来你在边防军干部会议的报告收到了，这个报告是正确的。

1. 萧劲光同志来告有关边防军的各项问题，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

三、**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延长至9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毛泽东 8月18日

此时，朝鲜战场的形势是，朝鲜人民军在8月中旬已前进到朝鲜半岛南部的大田、大邱等地，**歼灭了南朝鲜军队的大部和美军第24师一部，解放了南朝鲜80%的地区**。但人民军前进到洛东江边时，李承晚的军队炸毁了洛东江上的所有主要桥梁，固守待援。李承晚7个师的残部和先后到达朝鲜的美国几个师的援军，收缩在洛东对岸以釜山为中心的狭小地区。敌军高度集中，后方供应迅速及时，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使人民军进攻受阻，双方形成胶着状态。

美军一面自空中和海上继续增兵，一面出动数百架飞机，轰炸朝鲜北部城镇和交通要道，严重破坏了人民军的供应线。

8月19日，中共中央将由毛泽东等人圈阅的《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各军区党委”，《指示》中写道：

**“一、我国的天主教、基督教一方面是宗教问题，另一方面在长时期中又被帝国主义用为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其一部分组织又被帝国主义用为进行间谍活动的机关。**两个宗教在我国都办有教堂、学校、医院及其他文化事业及救济事业机关，都受外国津贴，都有大量外国教士占据领导地位。全国天主教教士（依靠宗教为生的神父、修女、修士等）中，外国人几占半数（12000人中占5500人），基督教教士中外国人占17%（10000人中占1700人）。天主教在组织上是统一的，属罗马梵蒂冈教皇所管，基督教则组织上不统一，分成许多派系；天主教的活动比较注重乡村，并有大量土地，基督教则比较注重城市，并有青年会、女青年会为其外围团体。

**二、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无神论者，认为宗教有害于人民的觉悟，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群众性的宗教问题，从来是当作一种有历史必然性的社会问题和群众问题来处理的，从来是反对单纯的依靠行政命令简单急躁的办法来处理宗教问题的。**根据解放前的统计，中国天主教徒约300万人，80%左右在农村。基督教徒70万人，70%左右在农村。农村中的教徒，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城市中的教徒，绝大多数是贫苦市民、工人、小贩等。教徒中妇女几及一半。其中**很多人信教很深。如果不采取谨慎步骤，不但不能使广大教徒从帝国主义影响下解放出来，而且还会使他们对我们发生极大反感和敌意，适中帝国主义之计。**此外，**这两个宗教在世界多数国家都有很多信徒，如果我们所采步骤不适当，还会被帝国主义用来造成外国教徒群众的恶感。因此，我们对待目前中国的天主教、基督教，应当不帮助他们的发展，并反对其中的帝国主义影响；同时坚持保护信教自由，并在其中扩大爱国主义的影响，使天主教、基督教由帝国主义的工具变为中国人自己的宗教事业。**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我国基督教、天主教中的帝国主义影响受到严重的打击，**在土改已经完成的地区，广大人民反对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基督教、天主教，一部分教徒也已不再信教。但帝国主义者，由于政治的经济的侵略已告失败，正在力图保持他们在教会中的影响，经过教会来保持在我国的帝国主义影响和加紧进行间谍活动。**帝国主义的这种阴谋，是完全违反我们民族与人民的利益的，是我们所必须反对的。

四、为了把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教会，变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宗教事业，需要进行一系列艰苦的复杂的工作。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进行群众的反宗教运动，而是领导人民大众，坚决实现共同纲领，实现土地改革，争取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广泛进行唯物主义与科学知识的宣传，来逐渐缩小宗教的市场；同时，在基督教、天主教内部，利用各种机会和经过有爱国心的教徒，向教徒群众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揭露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与间谍活动的阴谋，领导和支持其中的爱国分子，团结虔信的教徒的大多数，反对仍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少数反动分子，有步骤地使教会摆脱帝国主义的影响及其经济关系，把教会变为由中国人自治、自传、自养的宗教事业。**对于教会中进行破坏活动与间谍活动的特务分子，不论是外国人或中国人，均须依照共同纲领第7条坚决惩处，但在惩处这些特务分子时，不要牵连整个教会、教堂或教会学校等，而要把那里的教徒的大多数也团结到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一同反对帝国主义和特务分子。**

五、在上述基本方针之下，我们正**鼓励基督教中有爱国心的分子吴耀宗等，签名发表宣言，号召以逐渐脱离帝国主义的影响与经济关系，实行自治、自传、自养为教会今后的目标**。对于这个签名运动，各地的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应从旁予以适当的赞助，经过适当关系，组织有爱国心的教徒，签名响应，并在教徒中进行宣传。但在势力更大的天主教中，现在尚未发起此种运动，望各地注意团结天主教徒中有爱国心的分子，以求在适当时机发起同一运动。所有这些宣传运动，一概不得采取强迫命令办法，尤其不可由教外的人包办代替。”（以下略）

8月19日，毛岸英给孙嫂陈玉英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孙嫂：

你的信我前天才看到，这是因为我自你们那里返回北京后，马上又被公家派到别处去了，前天才回来。

你在信上感谢我照顾你，这我决不敢当。我对你并没有丝毫特殊，**组织上对你照顾是把你当作对革命有一定功劳的人看待的，这是你二十几年前在敌人威吓面前，在敌人监狱中挨骂挨打坚定不屈的应有代价，这是你的光荣。**但你千万不要以此而自高自大，这也要那也要，若如此那就会把你自己的光荣历史玷污了。我想你不会这样的，你将仍是一个老实的、朴素的、对人好的、为众人做事的、因而为众人所尊敬的孙嫂。

你的身体千万也要注意，同时又要好好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不要使人家觉得解放后，你似乎有了“后台”就不听话了，不好好工作了，这是不对的。我们是劳动人民，我们以此为光荣，但因此**我们永远应当是世界上最忠实、最纯洁、最勤劳、最朴素、最刚强而又善良的人们，望你永远不失这种伟大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保持这种伟大的优良品质。**

岸英 上

岸青问你好！我父亲也问候你，并望你决不退步，跟着大众前进!

8月20日，毛泽东给徐海东写了一封回信。

徐海东是在7月17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了自己的病情，并表示感谢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海东同志：

7月17日来信收到。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求痊愈。此复，顺祝愉快。

毛泽东

接着，毛泽东应湖南大学校长李达的请求，为湖南大学题写了校名。

此前，李达来北京参加一个会议，在和毛泽东一起吃饭时，他从袋子里拿出一封信，递给对面的毛泽东，说：

“润之，这是湖南大学学生会以及全体学生给你写的信，请求你把湖南大学改名为‘毛泽东大学’，他们想在你的领导下让学校获得更大发展。”

毛泽东看了信，笑着说：

“坚决执行党的决议，不得以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学校。”

李达问：

“你能给湖南大学题个校名吗？”

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在8月20日这一天，他一连写了3张，供校方选择，并在给李达的信中写道：

鹤鸣兄：

校名照写如另纸，未知是否合用？我不会写更大的字，你们自己去放大。

顺祝健康！

毛泽东 8月20日

写好后，他即派人将信和题字送给李达，李达非常高兴。此时提议请毛泽东为湖南大学题写校名的副秘书长、经济系主任涂西畴也在北京，他就给涂西畴打去电话说：

“毛主席日理万机，很快满足我们的要求，这是对湖大数千师生员工的巨大关怀，勖勉我们努力把湖大工作做好，早日改造成新大学，为革命和建设多培养人才。”

8月23日凌晨，毛泽东给罗石泉写了一封回信。

此时的罗石泉已经62岁，年老多病，家口众多，而他任教的小学又是族立学校，薪水没有保证，生活十分困难。所以他曾写信给毛泽东，希望能到北京来工作。

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石泉兄：

来信收到，甚以为慰。在地方上做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较为适宜，不必来京。此复，顺问

康吉

毛泽东 8月23日

罗石泉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安下心来，继续教书育人。1951年病逝于家乡。

8月23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批准昌都战役计划。他在给西南局的电示中写道：

西南局，并告西北局：

8月20日电悉。

1. 你们力争今年占领昌都并力争留3000人巩固昌都的计划是好的，你们可以照此作积极准备，待本月底下月初判明公路已通至甘孜无阻，即可实行进军，期于10月占领昌都。这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

二、**现印度已发表声明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惟希和平解决勿用武力。英国原不许西藏代表团来京，现已允许。如我军能于10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现我们正采争取西藏代表来京并使尼赫鲁减少恐惧的方针。西藏代表到京时，我们拟以既定的10条作为谈判条件，争取西藏代表签字，使10条变为双方同意的协定。果能如此，则明年进军拉萨会要顺利些。你们于占领昌都后只留3000人在那里过冬，今年不进拉萨，并将主力撤回甘孜，在西藏方面看来，可能觉得是我们向他们表示好意的一项措施。

三、30架飞机事在筹备中，但需时间，短期内你们不要靠望。

1. 你们16000人由甘孜向昌都进军，粮食全靠部队携带及牦牛载运，其中3000人须有过冬粮食，准备撤回的主力13000人至少须有往返期间3个月粮食，甘孜是否已有这样多的粮食，部队及牦牛是否有这样大的运输力，仍望查告。

五、昌都等处可能购买一部分粮食及肉类，你们是否已准备一批金银及藏民需要的货物如绸、茶等带去。

毛泽东 8月23日

这天下午，毛泽东给中央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写信，催问空军为解放西藏所做的工作进展到何种程度。他写道：

“李涛同志，西南军区为进军西藏，需要30架高空运输机。请询空司是否已着手筹备，飞机和驾驶员何日可以筹妥，最近3、4个月内有希望否？问明告我，并加督促为盼！”

欲知昌都战役结果如何，请往下继续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0年8月1日向全军发出由他起草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他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为穷苦人办夜校、学文化。直至一生，为普及、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素质和科学知识，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竭力使劳苦大众脱离愚昧状态，从古到今，唯有毛泽东。他才是真正的人民领袖！**

**第16章**

**“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

**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

话说1950年夏，毛泽全由南京到北京开会，抽空去看望堂兄毛泽东。他们自1938年8月在延安分别后，已经12年未见面了。毛泽东非常高兴，问道：

“泽全，延安分别后，你到哪里工作去了？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呀？”

毛泽全说：

“我改名王勋，到苏北新四军兵站搞后勤去了。”

“好嘛！你连姓也改了。姓王也好，王字的笔画端端正正，不像毛字，底下还有一个尾巴呢。”

毛泽东说完，对身边的陈毅说：

“他是我的堂弟，叫毛泽全。”

陈毅笑道：

“知道啰，我们在皖南和盐城新四军指挥部都见过。现在我是华东军区司令员，泽全同志是华东军区的干部，还用得着主席来介绍吗？”

“原来你们早就是一家人啦！”毛泽东也笑了，他转向毛泽全问：“你的工作做得怎么样？”

毛泽全谦虚地说：

“水平低，许多事没有做好。”

陈毅忙说：

“这不是事实嘛。皖南事变时，环境那么恶劣，泽全同志带领他的那个兵站，突出重围，这就很了不起嘛！”

毛泽东很高兴，笑着说：

“你们工作有成绩，我心里就高兴。居功不骄傲，这更好！”

他又问毛泽全：

“你成家没有？”

毛泽全说：

“1943年春结的婚，爱人叫徐寄萍，也在部队工作。”

“你有几个孩子？”

“3个女孩。”

1950年8月2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准备对付敌军可能向潮汕及海陆丰登陆袭击”给邓子恢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邓谭赵，并叶方：

华南分局转来潮汕地委未寒电已悉。台湾敌人向潮汕及海陆丰举行登陆袭击是极有可能的。你们必须：一、加强侦察工作，务使我军在敌举行登陆袭击之前，获得可靠情报；二、加强兵力，**请考虑从西面抽调一部兵力（例如一个强的师）及一部炮火加强东面，确保潮汕及海陆丰沿海防线，并派一个军级指挥部去担任指挥，遇敌袭击时能坚决歼灭之；**三、**加强党政军民各方面的作战准备，清除干部中的和平思想，军队及地方武装解除其生产任务，集全力于准备作战。**该区情况及你们意见盼告。

军委 8月25日

8月26日，新中国最高美术学府的院长徐悲鸿，收到毛泽东一封亲笔信，只见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悲鸿先生：

有李苦禅先生来信，自称是美术学院教授，生活困难，有求助之意。此人情况如何，应如何处理，请考虑示知为盼。顺颂教祺。（李信附陈）

毛泽东

信中所说的李苦禅，原名叫李英杰，早在30年前曾参加过蔡元培、李石曾创办的“留法勤工俭学会”，与同在北京的毛泽东、徐特立有过交往。解放后，他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学院个别领导不知何故竟让这个堂堂的教授每周只上两节课，其余时间要去陶瓷系工作室画茶壶、茶碗，后来又干脆让他脱离了教师队伍，去看大门、卖戏票。一家6口人全靠他每月只有12元的薪水度日。李苦禅为此常常借酒浇愁。与李苦禅有过患难之交的凌子风了解到他的委屈之后，给他出主意说：

“大哥，有党和政府给咱做主，你不要怕，这是新社会，不像过去了。你可以写信告状，给毛主席写信！你与他当年在勤工俭学会不是有过几个月的同窗之缘吗？如今下头这样对待你，大概上头不知道吧！如果知道，定会开恩解决你的困难的！”

李苦禅说：

“同窗之事都过去30年了，这位当年的毛润之可能早就忘了我，更何况他现在日理万机，能管这点儿小事吗？”

“怎么不管？党进城之后就是要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

李苦禅觉得凌子风的话有些道理，就高高兴兴地对妻子李慧文说：

“贤弟叫咱告状伸冤，咱就泼个胆给毛主席写封信吧？”

李慧文忙劝道：

“算啦，咱们就不要打扰毛主席啦！”

“好汉做事好汉当，用不着你多操心。”

李苦禅见李慧文如此说话，便没好气地一把推开她，拿起酒瓶咕咚咕咚喝起来，大半瓶白酒下肚，身子便不由自主了。他冲到画案前，提笔就写：

润之先生：

余乃昔日勤工俭学之李英杰也，尝与君同工同读，今有不平之事，激愤陈词于下……

刚写到这里，李苦禅又感到不妥，自言自语道：

“有什么事说什么事，扯同学关系干什么。”

他一把扯去信纸，又拿起酒瓶喝了一大口，重新铺开纸张，挥笔疾书。那积压在心头的郁闷从笔端泫然而下，转眼间写满了5张宣纸。其中云：

“今有不平之事，激情陈词于下。”“余乃堂堂教授，却被无理剥夺授课之权利。”“共产党理应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

李苦禅写好后，糊了个牛皮纸大信封，将信装了进去，上写：“中央人民政府 毛泽东主席收”几个大字，送往邮局。

李苦禅酒醒后十分懊悔，也不知道自己在一气之下究竟写了些什么，现在信件已经发出，是福是祸，只有听天由命了。而此时的徐悲鸿，看了毛泽东的信后立即来找李苦禅，将这一好消息告诉给他。李苦禅那紧锁的愁眉一下子舒展开了，禁不住兴奋地吟道：

人世悲欢皆虚幻，七情六欲一念牵。一旦悟通烦恼处，心中净土连西天。咄！咄！无染无垢超三界，白藕脱泥即苦禅。

几天后，一位文质彬彬、衣着朴素的干部，在美院教授王朝闻的陪同下，登门会见了李苦禅，他说：

“李教授，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他很关心你的问题。主席说刚刚建国，有许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现在国家经济很困难，一时对美术工作者关心不够，欢迎你经常提出宝贵意见。”

当李苦禅知道眼前这位干部，就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时，激动得久久说不出话。告别时，李苦禅不安地说：

“毛主席工作很忙，还为我操这么大心，真过意不去。”

不久，李苦禅的教授职务得到了恢复，工资也由12元增加到62元。加上李慧文的40元工资，家庭生活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到了1952年，李苦禅的工资又升到了120元。

再说8月27日，毛泽东关于朝鲜局势致电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

**为了应付时局，现须集中12个军以便机动（已集中了4个军）**，但此事可于9月底再做决定，那时请你来京面商。

毛泽东 8月27日

接着，毛泽东在邓华、洪学智、解方关于选派干部去朝鲜战场了解情况的报告中对周恩来写了一个批示。

邓华等在报告中说：兹选定兵团侦察科长崔醒农、第40军第118师参谋长汤景仲、第39军参谋处长何凌登、炮8师副师长黄登保，以驻朝鲜大使馆武官名义，去朝鲜了解情况。另外，东北后勤是否也派人去，以及去与大使馆接洽手续等，均请速示。

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批示中写道：

周：

请令这些人和柴君武（后改名柴成文——笔者注）一同来京，由你面授机宜，然后去朝工作。

毛泽东 8月27日

8月29日，毛泽东就西藏代表团来京问题写信给周恩来，他在信中写道：

“请注意进攻昌都的时间。**请考虑由外交部适当人员向印度大使透露，希望西藏代表团9月中旬到达北京谈判，我军就要向西藏前进了。**西藏代表团如有诚意，应当速来，并请印度政府予该代表团的旅行以可能的协助。”

毛泽东还指示外交部说：

“去电申健（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负责办理西藏代表团经印度到北京谈判的有关事宜——笔者注），叫西藏代表团马上动身来北京。电中请说明希望该代表团接电后迅即动身乘飞机至香港，转乘广九、粤汉、京汉火车，9月中旬到达北京。”

接着，毛泽东又给他在湖南一师时的历史老师刘策成写了一封回信。

刘策成在一师给学生上第一堂课时，身穿粗布长衫，腰系布带，头剃平头，脚着布鞋，如同农村农民，走上讲台就自报姓名：“吾叫刘武，字策成也。”他上课非常认真，又博闻强识，深受同学们的尊敬。大家说他是“活历史”，不用带教本上课的老师。那时候，毛泽东酷爱历史，除了课堂上认真听课外，还感到不满足，经常在课余找刘策成先生个别请教、探讨，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后来毛泽东在筹建文化书社时，刘策成也曾积极入股支持。解放后，他在1950年上书毛泽东，请求工作，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策成先生：

惠书敬悉，甚为感激。先生欲为人民事业有所贡献，极为钦佩。地点似以在长沙为宜，那里熟悉先生的人较多，商量较为便利，尚祈斟酌，顺致敬意。

毛泽东 8月29日

后来，刘策成还是被安排在中央文史馆为馆员。

8月30日，北京师范大学在迎接新中国诞生一周年之际，打算更换校徽，校长林砺儒致函毛泽东说：

“我校拟更换徽章，随函附呈徽章式样一枚，恭请惠题‘北京师范大学’6字，藉光黉宇，永宝纪念。”

林砺儒原是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长，著名教育家。中央人民政府是在1950年2月任命他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为此，毛泽东还特邀林砺儒到中南海晤谈，详细询问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发展历史及现状。

林砺儒写罢便函，随函转送一本书和一张宣纸，委托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转送给毛泽东。不久，北京师范大学就收到了毛泽东的题字，凡3行，右上角有“送师大校长”字样，其中一行字后画一圆圈，写有“一般用”3字，就是说，他满意的是画圆圈的一行字。**“北京师范大学”这6个字，三疏三密，力道沉稳，中宫紧收，舒展有致，自然天成，成为毛泽东题写的各个大学校名中最优秀的书法作品之一。**

8月31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关于导淮工作的报告上作出第3个根治淮河的批示。

周恩来在报告中转呈了华东军政委员会8月28日转给他的中共苏北区委对治淮的意见的电报。转报的意见的第3项是：“如今年即行导淮，则势必要动员苏北党政军民全部力量，苏北今年整个工作方针要重新考虑，既定的土改、复员等工作部署必须改变，这在我们今年工作上转弯是有困难的；且治淮技术上、人力组织上、思想动员上及河床搬家，及其他物资条件准备等等，均感仓促，对下年农业生产及治沂均受很大影响。如果中央为挽救皖北水灾，要苏北改变整个工作方针，服从整个导淮计划，我们亦当竭力克服困难，完成治淮大计。”

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周：

此电第3项有关改变苏北工作计划问题，请加注意。导淮必苏、皖、豫3省同时动手，3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

　 毛泽东 8月31日

8月31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另一件报告上批示道：

“购30架高空运输机，支援西藏进军。”

后来，周恩来又批准将刚从苏联购进的吉斯-150运输车拨出200辆，专供修筑甘孜机场用。

1950年9月1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等，他在电文中写道：

陈毅同志并告饶：

在此所谈各问题，你写电报时，为保密计，请用有线电发来，不要用无线电。嗣后**凡机密电报，均请注意用有线电，不用无线电。只有非机密者用无线电。党政军均是如此。党政军对下面亦应如此，凡有有线电设备之处，均用有线电，以达保密之目的。在此敌我斗争日益尖锐之时，保密问题值得引起我们极大注意**。

毛泽东 9月1日

9月3日，毛泽东复电高岗，他在电文中写道：

高岗同志：

8月30日来信收到。兹复如下：

一、**友军作战方面，可能发生如来信所说的困难。但估计一时尚不便改变，还须打一个时期（也有此种必要），到无可打了，损伤也大了，就会逐渐改取守势。友方人员的后备力甚大（已动员报名百万以上），装备是有的，故估计可以坚持颇久的时间。**

二、2000辆汽车，可以筹办。

三、铁道纵队待需要时可调动，目前尚不需要。

四、弹药北移有必要，请即办。

五、整个空军攻防计划，是照顾了你所说的情况的，正在筹办。

六、**必须以现代战争观点教育部队，切记不可轻敌，**你的意见是正确的。柴君武可于9月上旬或中旬率少数人以大使馆员面目去实地调查作战情况，当令其于中旬或下旬送回第一批调查结果，即可以之教育部队。专人研究，请即就东司及13兵团设立，并进行研究。**林、粟均病，两萧此间有工作，暂时均不能来，几个月后则有可能，估计时间是有的。**

七、对省级主要同志只讲边防，不讲其他。

八、工业迁移，问题甚大，以从积极防空着手，主要的不迁，只迁某些部分为宜。

以上各项中，有几项须具体去做的，当由周副主席负责予以解决。

此复，及祝健康!

毛泽东 9月3日

有事请随时来信。

9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9次会议上发表了题目为《朝鲜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话，他说：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大。过去，我们对于朝鲜战局的估计有速决和持久两种可能性：所谓速决，就是朝鲜人民军乘胜追击，把美军和李承晚的残余伪军赶到海里去。现在美国在朝鲜已经增加了它的军队，因而战争持久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加了。**朝鲜人民是可能坚持这个持久的战局的，他们动员的人力已超过100万，朝鲜人民军队现在有十几万人，今后还能继续补充。朝鲜人民斗争很勇敢，美国飞机一面炸桥，朝鲜人民就一面修桥。开始时是白天炸黑夜修，后来则是随时炸随时修，飞机来了，朝鲜人民只在旁边躲一躲，然后还是照旧去修桥。战争开始时，美帝国主义原以为用空军一炸，朝鲜人民就会害怕，结果却碰了一个钉子。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朝鲜人民在日本长期统治和压迫之下，一旦站立了起来，就绝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来侵略他们。朝鲜人民在日本长期的奴役之下，已经变得非常坚决了。东方其他民族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也锻炼得非常坚决了，中华民族就是这样一个坚决战斗的民族。**虽然在我们的斗争过程中，有时曾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我们不是靠观音菩萨来救命，而是靠自己的双手去克服困难。**在今天，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虽然增加了，但是最后的胜利还是属于朝鲜人民的。因为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对于朝鲜人民的同情已经和正在不断的增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发动中国内战时，世界的同情就在中国人民方面，越到后来，这种同情就越到中国人民方面来。中国战争是带有世界性质的。**中国战争在东方第一次教育了世界人民，朝鲜战争是第二次教育了世界人民。全世界的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朝鲜战争虽然持久不如速决的好，但持久了更可以教育朝鲜人民和世界人民。**

**美帝国主义在今天是有许多困难的，内部争吵，外部也不一致。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3个弱点，合起来是1长3短。3个弱点是：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希特勒的战线是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日本东条的战线是从中国东北到南洋，都比美国从柏林到朝鲜的战线短。在运输路线上，希特勒从柏林到莫斯科，也比隔着两个大洋要短。**在战斗力上，美军不如德、日的军队，这一点不仅郑洞国知道，就是我们八路军也是早就知道的。敌人是不可怕的，它的装腔作势和气势汹汹是吓唬人的。但是，美帝国主义也可能在今天要乱来，它是什么都可能干出来的。**假如它要那样干，我们没有准备就不好了，我们准备了就好对付它。所谓那样干，**无非是打第3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对战争打起来的时候，不是小打而是大打，不是短打而是长打，不是普通的打而是打原子弹，我们要有充分准备。你如果一定要那样干，我们就跟上来。**

我们要随时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来侵略。我们所进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要考虑到敌人就在面前这个情况来讨论和决定。1951年的国家概算，也应当这样来制定。

9月6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将第50军编入东北边防军。

9月8日，毛泽东在华东军区9月5日关于9兵团北调执行办法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9兵团全部可以统于10月底开到徐济线，11月中旬开始整训。该兵团在徐济线整训期间仍归华东建制，惟装备及整训方针计划受军委直接指挥为适宜。

　　　　 毛泽东 9月8日

接着，毛泽东在聂荣臻的报告上作了两个批示。

聂荣臻在报告中说：柴君武昨日返京，今下午约他一谈，因我方使馆人员不能下去，故了解情况不多，亦不深刻。现将书面报告草稿（指柴君武的《目前朝鲜战争局势报告提纲》，这个提纲从5个方面汇报朝鲜的形势和看法：一、战局发展的3个时期。二、现有敌人兵力番号位置判断。三、人民军兵力番号位置。四、观感。五、朝鲜各收复城市工作）先呈上，如要面讯时请告时间。

毛泽东批道：

聂：

请周约柴君武一谈

毛泽东 9月8日

周阅后，刘、朱、任阅，退聂。

请周约柴君武一谈，指示任务和方法。13兵团同柴去的几个人是否要其来京与柴一道面授机宜，请周酌定。柴等出发之前，似应约李周渊大使一谈，告以柴等任务，征求金（指金日成——笔者注）的同意，俟得同意后方能出发。

毛泽东 9月8日

9月9日，毛泽东为军委总政治部起草关于“开展连队民主运动加强战斗力”给各大军区党委及政治部的指示电，他写道：

各大军区党委及政治部：

兹将中南所属48军开展连队民主运动计划一件发给你们，希望你们亦**发动所属在有领导有秩序的条件下，开展一次连队的民主运动，提高连队官兵觉悟程度，改善连队官兵关系，达到连队爱兵尊干加强战斗力之目的。**48军的计划，可发给各军参考。

军委总政 9月9日

9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将驻扎在西北地区由杨得志指挥的第19兵团调至陇海铁路沿线，集结待命，做到随时机动，作为第二线兵力，以策应东北边防军。

为适应形势的需要，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还极为重视加速特种兵的建设，决定从苏联购置装备，扩编空军、装甲兵、地面炮兵、高射炮兵。同时，加强了沿海地区及东北地区重点城市的防空力量。这些富有远见的战略应变措施，为保障国家的安全和援助朝鲜人民进行反侵略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争取了主动的地位。

9月11日，柳亚子一家迁居紫禁城西之北长安街39号，毛泽东亲自为他的新居题赠“上天下地之庐”6个字。这里环境幽美，柳亚子自己说：“精神自好，大非昔比了。”

9月15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秘密从日本和太平洋地区调遣了强大的陆海空兵力，亲自指挥7万多美军，在300多艘舰艇和500多架飞机的支援下，在朝鲜的西海岸仁川港登陆。

此时正在洛东江对岸布防的美军和李承晚的10个师，也配合北面的登陆部队，开始向北进攻。

金日成首相派内务相朴一禹来到辽宁安东，向中国边防军通报了情况，他说：

“自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战局急剧变化。由于敌人沿着铁路、公路急速北进，而且派飞机狂轰滥炸，交通全被破坏了，朝鲜部队只好沿着山区的小道往北撤，很多主力部队现在还滞留在南方，联系不上，情势危机。”

9月1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粤桂等地军事部署及对剿匪等项工作”给邓子恢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邓谭赵苏并各军区党委：

9月13日电悉。

1. 同意你们对粤桂5个军的部署。甲、目前形势下，海南岛有43军1个师已足；该军主力仍可位于大陆，并可照你们部署以1个师开钦防。乙、你们于南宁西南地区集结1个师继续剿匪，并准备与43军调驻钦防之1个师配合歼灭由越南窜入之残匪，是很必要的。惟**请注意，这两师兵力不要太迫近越南边界，要距边界远一点，如匪军由越回窜，则诱其深入百余里或200余里，然后我军以必要力量切断其来路，由西向东歼灭之，切忌打得太早，迫其逃入越境，麻烦甚大。**为歼灭该敌，我两个师及地方部队，须指定一个能干的军级人员统一其指挥。丙、广州、佛山、花县、英德及其以东地区经常保持4个师是必要的。惠州及其以东，包括潮汕、海陆丰区域须经常保持两个师，以便及时歼灭可能由台湾方面乘机偷袭之敌。

二、你们对48军的部署是对的，该军收缩地方工作的时间如来不及，可以推迟至明年1月底或2月底集中完毕。

三、湖南之两个军，请你们考虑，在明年春季集中1个军于机动位置，明年夏季或秋季再集中1个军，是否可行，盼查明电告。

四、主力各军明年的剿匪工作、军事训练、文化训练和生产任务须作必要的调整，不使互相冲突。即是说，**凡有匪的地方，必须争取于明年彻底剿灭；文化教育须用大力推行；军事训练亦须占有一定时间完成一定整训任务，务使武器不生锈，装具不遗缺，战斗意志不降低。**为达上述目的，则生产任务不能太多，应以改善部队生活为主，不以增加国家财富为主。如不减少生产时间，则文训与军训两项任务即不能完成。此问题为全军共同问题，除请你们考虑外，亦请西北、西南、华东、华北、东北各军区负责同志加以考虑，以其意见电告为盼。

军委 9月16日

接着，毛泽东在东北军区司令部关于上古龙村12日发现美机一架的电报上给周恩来写了一个关于抗议美机美舰对我侵袭问题的批语，他写道：

周：

**东北及上海、山东沿海（渔民发现的）均继续发现美机或美舰侵袭，置之不理是不妥的，若每次抗议则不胜其烦，似宜每隔10天或半月汇集多案抗议一次，**请酌办。沿海事件，军委有材料。

毛泽东 9月16日

9月的一天，毛泽东把表侄女章淼洪（朱光少将的妻子）请到中南海吃午饭。他一见章淼洪就说：

“今天请你来，有两件事要你办一下。”

章淼洪问：

“什么事？”

“我想让你回湖南一趟，马上动身。一是去接你的九表舅王季范和我的同学周世钊，二是请你顺便到你外婆家去一下，找你的舅舅文运昌他们做做工作。”

章淼洪闻言，高兴地说：

“好，我一定完成您交给的任务。”

毛泽东转身对江青说：

“你去把那封信拿来。”

江青从毛泽东的书房里拿出一封竖式信封，章淼洪接过一看，是湘乡县县长刘亚南写来的那份材料，心中顿时一沉。

“淼洪，”毛泽东郑重其事地说：“刘亚南给我写了信，我看了，很好！你回去代表我向他问好。就说：‘你不要有思想顾虑，要大胆工作。’另外，你回湘乡，到唐家圫去一趟。跟你舅舅他们说一说，做做他们的工作，要他们尊重地方政府，奉公守法，做老实农民。”

章淼洪说：

“叫我回去可以，他们是我的亲舅舅，我怎么好说呢？”

毛泽东说：

“你就不会说是我说的吗？”

章淼洪不吭声了。毛泽东又交代说：

“你的态度一定要严肃点！”

后来，章淼洪回到唐家圫，探望并做通了舅舅文运昌、文涧泉、文南松、文梅清的工作。她又到湘乡县找到县长刘亚南，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她说：

“你给主席的信，主席收到了。乡下的情况他都知道了。主席叫我回湘乡来，专程看望你，并告诉你不要有顾虑，大胆工作。文家亲戚都要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缺点，该批评的批评，该教育的教育。主席还交代说，对文家不要有任何的特殊照顾，而要同其他农民一样同等对待。不要因为是我的亲戚就可以不听当地政府的话，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有什么缺点错误，要帮助他们改正。主席很忙，他说就不另给你写信了，要我向你问声好！”

“谢谢主席。”刘亚南郑重地对章淼洪说：“请你转告主席，我一定按主席的指示，把工作干好！”

刘亚南问起毛泽东的身体和生活状况，章淼洪说：

“身体很好，就是忙了点。主席平时爱吃辣椒、炒豆豉辣椒、辣椒酱、苦瓜皮、盐姜等。还喜欢将辣椒煨着吃。”

刘亚南听了，说：

“请你代我向主席问好，祝他老人家身体健康长寿！”

章淼洪告别刘亚南，离开了湘乡县城，返回长沙，准备接王季范、周世钊北上。王季范已应邀先期赴京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她就到湖南第一师范，邀周世钊一同赴京。

关于文运昌，在这里也需要交代一下。后来刘亚南看文运昌是个读书人，又多年从事教育，在当地有些名望，便把他请到县里当上了人民代表，参政议政，给予他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待遇。不久，文运昌又经王季范等人向王首道推荐，担任了湖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后来，他又当上了湖南省文史馆馆员。

9月18日，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向国内发报，报告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谈最近朝鲜战况并准备长期作战的情况。

9月18日这一天，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截获了日本人山口隆一寄往日洲产业株式会社的一封航空信件，投送地址是：日本国东京都涩谷区神泉町20番地7号第一绿C管理室。这是东京美国盟军司令部情报处（CIC）的所在。信中的内容是：“所购灭火机定于10月1日发货。**一切按既定计划进行。**致以热烈的问候！”信件中有一张手绘的天安门草图，上面绘有华表、金水桥、天安门城楼，还有两条又黑又粗的抛物线，一条指向天安门城楼顶部中央，旁边有日文注解：“从日本买来的消防压水机，能超过这个屋顶。”另一条指向天安门中央主席台的一个人，左边用日文写着：“到现在水还是达不到这里。”信中还有一段文字是：“**每当政府祭礼之日，政府中有名望的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军队分列式和民众行列，以前的消防压水机仅能压至毛主席所站位置**……”

这个草图引起北京市公安局和公安部保卫局的高度重视。山口隆一的职业是**法文图书馆“**中文部图书目录编辑”，而不是经营消防器材的商人，他画这个图的用意是什么？信中提到“**10月1日发货”**，**正是在新中国的国庆节**。山口要用什么手段在天安门搞破坏呢？于是公安人员密切监视与山口隆一有来往的人员，很快便牵出了一个美国间谍，此人叫李安东，是意大利人。公安部长罗瑞卿请示周恩来后，于9月26日逮捕了李安东和山口隆一，并对李安东在甘雨胡同住宅进行了搜查，缴获迫击炮1门、手枪1支、手枪和步枪子弹235发；随后在1951年又逮捕了与此案有牵连的意大利人马迪懦和法国人魏智，还有哲立、甘斯纳及中国人马新清，并在马迪懦家中缴获了迫击炮弹、步枪子弹、手枪子弹等259发，手榴弹8枚，迫击炮弹弹头和底火、兵器零件等273件。1951年8月17日，北京市召开公判大会，由罗瑞卿亲自担任公诉人，对李安东等人进行宣判。李安东、山口隆一被判处死刑。马迪懦被判处无期徒刑。魏智、哲立、甘斯纳及中国人马新清均被判处有期徒刑。判决后，李安东、山口隆一被处决（马迪懦、魏智、哲立、甘斯纳在监禁一段时间后，被驱逐出境）。8月1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版刊登了北京市人民法院判处美国特务间谍李安东死刑的新闻。起诉书说：**“李安东和山口隆一合谋，妄图于1950年10月1日我国国庆节大会时，炮击天安门检阅台，一举谋杀我参加国庆大典的国家元首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首长。**”

再说9月19日，毛泽东为早年老同学张维的母亲80寿辰书写了一副对联：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

9月20日，毛泽东获悉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要为他修缮韶山故居和修通从长沙通往韶山的公路，立即写信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和省委第一副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并告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他在信中写道：

克诚、首道并告子恢同志：

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现正进行在我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

毛泽东 9月20日

接着，毛泽东在罗荣桓关于提升一位军长为兵团副司令员的报告上批了“同意”后，又写道：

荣桓同志：

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持久。请考虑。

9月21日，毛泽东将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9月16日关于治淮工作给华东局和中央的报告批转给周恩来。他在报告上作出第4个根治淮河的批示：

周：

**现已9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拖，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

毛泽东 9月21日

9月22日下午，王季范被接到中南海与毛泽东会晤。

本传前面已经多次讲到了王季范，尚需补充的是，毛泽东早年在长沙进行革命活动的时候，曾有几次被国民党军警追捕，都因王季范救援掩护，方得度过难关。自1927年“马日事变”后，他与表兄一别20多年，未曾谋面。

王季范一直在长沙、湘乡等地从事教育工作。他同情和支持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曾多方赞助进步学生、进步老师的革命活动。全面抗战爆发后，王季范提出请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介绍其独生儿子王德恒前往延安参加抗战。徐特立当即表示，一定鼎力相助。没多久，王德恒便辞别父母、妻儿到了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那时候，他的女儿王海容才1岁多，儿子王启华尚在襁褓中。1940年春，王德恒从抗大毕业，1944年随王震的支队回到了湖南，在桃源县工作，进行地下活动。不久，他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年仅30岁。噩耗传到延安，毛泽东深感悲痛。但因事关军事机密，他未将王德恒牺牲的消息告诉王季范。在此后数年间，王季范照旧年复一年地给表弟毛泽东和儿子王德恒写信。他多次拜托毛泽东对王德恒严加管教，使之成材，为国为民效力。他还反复告诫王德恒，务必要聆听毛泽东的教诲，不可一日懈怠，为表叔也为家人争光。

此次王季范来京，是应毛泽东的邀请，在9月21日与夫人萧拾英一起，由儿媳萧凤林、孙子王启华、孙女王海容陪同，离开长沙，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他们刚下火车，毛泽东即派秘书前来迎接，把他们一家人接到北京饭店住下。

毛泽东见到王季范分外高兴，他久久握着表兄的手，深情地说：

“九哥，你终于来了。”

王季范带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眼里充满了泪花。他也激动地说：

“润之，我早就想来看你了。只是学校里的事情分不开身啊！”

“九哥，当年我在湖南读书时，闯了祸，张干校长要开除我。多亏你帮忙，才了结了那桩公案。”

“润之，那时候你的胆子也不小啊！”

二人说罢，哈哈大笑。王季范把家人一一介绍给毛泽东，王启华、王海容都亲热地叫毛泽东“主席公公”。毛泽东把王季范引进菊香书屋，在陈设简朴的客厅里坐下来。他说：

“九哥，我们两人分别已有23个年头了吧？”

王季范扳着指头算了算，说：

“对了。想不到时间过得这么快，我们都是两鬓白发了。”

王季范一家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心里很不安，他对毛泽东说：

“润之呀，像我们这种对革命没有贡献的人，住在那样高级的北京饭店里，实在感到惭愧和不安啊！”

毛泽东说：

“这些年，你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可大啰！”

“润之，快莫这么讲，我有什么贡献？还不就是摆摆粉笔么。”

毛泽东正色道：

“九哥，不说你对我有大恩大德，就是你过去搞了几十年的教育工作，为国家民族培养出多少人才！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就是有贡献的么！更何况你对革命事业一直很同情，鼓励学生参加革命，还把九哥你唯一的儿子德恒送到延安学习。”

毛泽东想起两年前王季范向他提出的治国方略，又说：

“九哥，你提的那3条建议——用贤才、立法制、崇道德，极好。我一定谨记在心，尽量采纳。”

王季范看着毛泽东眼睛里布着红丝，便问道：

“你晚上是不是没有睡觉啊？”

毛泽东笑了笑，说：

“这是我的习惯，从延安时起，我就养成夜里工作的习惯。”

王季范关切地说：

“现在进城了，情况不同了，你该改改这个习惯了，不要影响了身体。”

毛泽东摇摇头，笑道：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这个习惯恐怕难得改了。”

毛泽东和王季范共进晚餐，他拿起酒杯，给王季范斟上一杯低度葡萄酒，王季范推辞道：

“润之，你是国家主席，让你敬酒，岂敢岂敢！”

毛泽东说：

“九哥，你是我的老师，学生尊敬老师，应该应该。”

晚宴结束后，毛泽东把王季范请到书房叙话，这才把王德恒在延安的情况及回到湖南桃源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事一一告诉了表兄。他望着年近古稀、须发花白的王季范，垂首恭立，悲从中来，好半天，才哽咽着说：

“九哥……你把德恒交给我，可我没有照看好他，自当难辞其咎啊！”

说着，禁不住两行热泪潸然而下。儿子牺牲的消息，令王季范老泪纵横，肝胆俱裂。但他见毛泽东如此自责，便极力忍住心中的悲痛，安慰毛泽东说：

“润之老弟，快莫这样讲。为了国家安宁，你几十年东奔西忙。为了人民翻身，表弟媳杨开慧慷慨就义，泽民、泽覃兄弟血染疆场……德恒以你作楷模，为天下安宁、百姓安居乐业而壮烈牺牲，他死得重于泰山，自当含笑于九泉。家人也以他为荣，夫复憾哉？！”

毛泽东紧紧握住王季范的双手，说：

“九哥，你说得极是哩！德恒是个好伢子，这也是你当父亲的教育之功！人民是忘不了的，我毛泽东也是忘不了的！你要节哀，多多保重，还要照顾好他的一双儿女，他们是烈士遗孤啊！有何难处，可以直接找我。我们是一家人，不必客气……”

自此以后，王季范在北京和毛泽东过从甚密，时常成为毛泽东家中的座上宾。王季范觉得毛泽东对自己礼遇太过，深感不安，心里只想为国家做点实事。有一天，他见到毛泽东便直言道：

“润之，我应命来京，是想替国家做事。你交点事给我做，我心里会踏实一些。”

“九哥莫急。”毛泽东从容地说：“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哪会没有事情做？我已经替你盘算了一件事——政务院参事。任务是为国家建设出谋划策。这职务是不是小了一点？”

王季范一听，连连摆手，说：

“润之，你随便给点事做就行。政务院参事，重任在肩，我哪能干得了啊！”

“不！”毛泽东摇摇手，说：“你过去搞了几十年教育工作，见多识广，深孚众望。完全干得了。你给我提出3个治国重点，不是有‘用贤才’一条吗？古人说：‘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我们要建设新中国，就是要选贤任能，唯才是举。你是我的表兄，但更是贤才，我就是请你出来工作嘛！”

王季范听了，很是感动，恳切地说：

“润之，我想加入共产党，你看行不行？”

毛泽东稍微思索了一下，没有正面回答，他说：

“九哥，过去你一直同情共产党，支持革命事业，如今这么大年纪了，还在为党为人民工作，实在可敬可佩。至于想加入共产党，你可以缓缓，因为全国刚解放，共产党发展党员采取慎重态度，吸收党员较少。你最好先参加一个民主党派。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加入民主党派，是很光荣的。你留在党外，更利于这方面的工作，更能发挥你的作用。”

毛泽东一席话说得王季范心里亮堂堂的，他高兴地说：

“润之，我照你说的去做。”

不久，王季范就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参事一职。后来，他还被选举为第1、2、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再说在9月23日晚，毛泽东邀约梁漱溟到家中谈话。

此前，梁漱溟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4月至9月中旬先后到河南、山东、平原3省农村及东北城乡进行了考察，刚回到北京不久。梁漱溟来到菊香书屋，一番寒暄过后，毛泽东即吩咐江青上菜吃饭。梁漱溟歉意地说：

“我因有约请，已经吃过晚饭了。”

江青听他如此说，便端来一盘时鲜水果请他品尝，这才转身来到餐桌旁与毛泽东一起用餐。毛泽东草草用了饭，点燃了一支烟，问起梁漱溟在各地考察的情况，梁漱溟一一做了汇报。毛泽东建议说：

“你看了新解放区，又看了老解放区，但都在北方，还没有看到南方，你还可以再到广东看看。趁热打铁，你的收获会更大。”

梁漱溟说：

“我今年外出的时间长了，想休息一下，挤时间把参观的见闻感想写出来，访问广东就缓一缓吧。”

毛泽东说：

“也好。先写写观感，去南方的事以后再谈吧。”

接着，毛泽东问起他居住的条件如何？梁漱溟说他一家寄居在西城辟才胡同南宽街的一个亲戚家里，住房并不宽裕，生活亦有不便之处。毛泽东当即说道：

“为使你生活、写作更清静些，我让人安排你住到颐和园里边去，你就在家等候安排吧。”

徐冰很快便派人把梁漱溟一家接到了颐和园内石坊附近的一座小巧而精致的四合院里居住。梁漱溟对毛泽东非常感激。有一次，两人在颐和园信步漫游，梁漱溟走在毛泽东稍后半步，腰身向前躬着，头伸在毛泽东的身前，竖着大拇指，仰望着毛泽东的脸色说：

“毛主席呀，您真伟大哪！真伟大。”

梁漱溟一生极少赞扬人，这次他是真的被感动了。但是毛泽东听了并不高兴，皱起眉头拂了一下手，说道：

“不要这个样子，我们是私交，是老朋友了，这个样子不好嘛。”

此后，梁漱溟在颐和园一住就是两年多，直到有关部门安排他一家人搬到了积水潭边的小铜井一号院居住。

9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向参加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代表们致祝词，他说：

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代表同志们！

中共中央向你们的会议致热烈的祝贺，并对你们的工作表示感谢和敬意。

你们在消灭敌人的斗争中，在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斗争中，克服了很多的艰难困苦，表现了极大的勇敢、智慧和积极性。**你们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向你们学习，同时号召你们，亲爱的全体代表同志和全国所有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同志们，继续在战斗中学习，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只有决不骄傲自满并且继续不疲倦地学习，才能够对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做出优异的贡献，并从而继续保持你们的光荣称号。

**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这两件事都有赖于同志们和全体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道，和全国工人、农民及其他人民一道，团结一致，协同努力，方能达到目的**。当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第一个国庆纪念节日快要到来之际，你们在这里开会，是有巨大意义的。我们祝贺你们的会议获得成功，庆祝你们在今后工作中获得伟大的胜利。

毛泽东在会议休息时，接见了出席会议的代表们。

“老毛，您咯胖呀！”

一位代表双手拉着毛泽东，重重地抖了抖，大声地和他打招呼。毛泽东微微一愣，周围的人全都吃了一惊。毛泽东定睛仔细一看，终于认出来了，朝那人的肩头轻轻地打了一拳，叫到：

“罗瞎子，是你呀！”

“老毛，您到底还记得我这个小萝卜头！”

那人说着，眼泪便扑簌簌地掉了下来。毛泽东哈哈笑了，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

“咯还记不得？‘苟富贵，勿相忘’嘛！”

原来，那位被毛泽东叫作“罗瞎子”的劳模，来自10年内战时期的老苏区。那时候，毛泽东到苏区乡里搞调查，遇到的乡政府主席就是眼前的这位劳模。毛泽东问他的姓名，他自报家门说叫“罗瞎子”。毛泽东说：

“这个名字是绰号，你总得还有个真名吧？”

这位乡政府主席摇摇头说：

“咱家里穷，没上过学，斗大的字不认识一升，是个睁眼瞎，就叫罗瞎子。从小就这么叫惯了，如今在乡政府里当主席，更不能叫官名。要不，人家会说我摆架子哩！再说，自家人这样称呼我，无拘无束，怪亲热的。”

毛泽东连连称赞道：

“好，说得好！‘**苟富贵，勿相忘’！就是日后革命成功了，我们也不能像陈胜那样忘了自己共过患难的父老兄弟。”**

毛泽东接着讲了《史记》中陈胜称王后家乡的父老在殿上直呼其小名，陈胜因此恼羞成怒的故事。罗瞎子听了，哈哈大笑，他摇着毛泽东的手说：

“要是你以后当了皇帝，不，要是革命成功了，你管天下，我该怎么称呼你呢？”

毛泽东说：

“那你照样喊我老毛就是。”

“好，我记住你的话了。”

罗瞎子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在与他分别近20年后竟然还没有忘记当初那句“苟富贵，勿相忘”的诺言。

9月26日，这一天是中秋节，毛泽东和第一届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一起吃饭，农民代表李顺达和工人代表马恒昌分别坐在他的左右。毛泽东说：

“中国山地很多，南方有井冈山、大别山，山西有太行山、吕梁山，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不能不要山区。你们住在山区，**要好好建设山区，以后要把山区建设成社会主义新农村。”**

接着，他举起酒杯，又对李顺达说：

“你住在太行山，那个地方石厚土薄，你做出了贡献，我敬你一杯。”

此后，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为全国战斗英雄代表题词：

“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

欲知英模们在新中国的国防和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请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苟富贵，勿相忘”，典出司马迁《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第十八》，原文是：“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后来，陈胜揭竿而起，果真成了秦末农民起义军之王，史称陈王。曾经和他一起种田的老伙计记得他“苟富贵无相忘”的话，就去找他。陈胜却把老伙计给杀了，“由是无亲陈王者”。毛泽东熟知历史典故，随手拈来，教育下属。近20年后，他与故旧相逢，当即道出当年的诺言，且躬身力行。正所谓“圣人以身体之”，“力行近乎仁”，伟哉毛泽东！

**第17章**

**“明神宗那么黯弱，还懂得要派兵援朝，打败日本侵朝部**

**队。今天，新中国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明王朝能做到的**

**事，中国共产党还能做不到？”**

话说1950年9月27日下午，刘少奇带着从越南归国的罗贵波，来到菊香书屋。朱德、周恩来已经先期到了，就坐在毛泽东身边。刘少奇介绍了罗贵波回国后汇报的情况。毛泽东听完，从沙发上站起来，对罗贵波说：

“越共中央长征同志来电报，催你尽快返回越南工作，胡志明同志希望你当他的总顾问。你要做好在越南长期工作的思想准备。”

刘少奇插话说：

“原定你在越南工作3个月，现在看来不行了，做长期打算吧。”

周恩来补充说：

“中央已内定你是将来中国驻越南的首任大使。”

毛泽东说：

“我们中越两党联系的任务由你来继续完成。你是我党派出的第一位联络代表，也许还是唯一的联络代表。目前，我们根据朝鲜的情况准备抗美援朝，派志愿军赴朝参战，同朝鲜军民并肩战斗，抗击美国侵略者。我们又根据越南的情况，决定继续援越抗法，秘密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财经援助，还派去顾问帮助越南作战和工作。**不论是抗美援朝还是援越抗法，都是国际主义，爱国主义，意义同样重大，同样光荣**，只是援助的方式各有不同。”

他话锋一转，突然问起罗贵波的爱人及家庭情况。罗贵波说他爱人叫李涵珍，是1933年参加红军的长征干部。毛泽东高兴地“哦”了一声，说：

“这么说她是经过战争考验的老同志，很好嘛。她干过什么工作？”

罗贵波说：

“她干过机要工作、组织工作、干部工作。”

毛泽东马上说：

“好！让她也到越南工作，做你的助手。胡志明同志向我们提议过，让你们的爱人到越南去，合适的我同意带去。”

刘少奇说：

“越南当前迫切需要解决财经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和货币问题。我们挑选了几位搞财经工作、银行工作、粮食工作的干部到越南担任顾问。他们同你一起先行一步，以后还要选其它方面的顾问，组成帮助越南党政工作的政治顾问团，你是总顾问，又是政治顾问团团长。”

毛泽东说：

“**当总顾问不能照搬苏联的一套，而越南也不是中国，你不能照搬中国的一套。一切要从越南的实际出发，在人家面前要老实、诚恳，我们革命成功的经验要介绍，失败的教训也要讲。”**

9月27日这一天，毛泽东以周恩来名义起草给高岗和邓华的电报，他写道：

高岗、邓华同志：

兹将9月20日经倪志亮转致朝鲜同志一电转发给你们，**阅后即销毁**。朝鲜同志已同意此项建议。

周恩来 9月27日

上述电文所说“9月20日经倪志亮转致朝鲜同志一电”也是以周恩来的名义发的，电报全文是这样写是：

9月18日电悉。请转告金日成同志：我们认为你的长期作战思想是正确的。朝鲜军民的英勇是令人感佩的。**估计敌人在仁川方面尚有增加可能，其目的在于向东延伸占领，切断朝鲜南北交通，并向三八线进逼。**而人民军必须力争保住三八线以北，进行持久战方有可能。因此，请考虑在坚持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下如何保存主力便于各个歼灭敌人的问题。**在目前主力暴露于敌人阵前，相持不下，消耗必多，而敌人如果占领汉城则人民军后路有被切断的危险。因此，人民军主力似宜集结机动，寻敌弱点，分割歼灭敌人**。在作战上，必须集中兵力，每一次作战以少数兵力及火力分路钳制多数敌人，而以多数兵力（3至5倍）及火力（2倍以上）的绝对优势，围歼被我分割的少数敌人（例如一个团）。**作战最忌平分兵力，最忌只能击溃或阻止敌人而不能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只要能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哪怕每次只歼灭敌人一个团一个营也好，积少成多，就可逐步将敌人削弱下去，而利于长期作战。**如果美军火力配备强，一时难于突入分割，则宜考虑先以李承晚伪军为对象，集中主力，每次歼灭其一二个团，每月歼灭其一二个师，**半年后即可尽歼伪军，剪去美帝爪牙，使美帝陷于孤立**，然后各个歼灭之。在持久战的原则下，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困难方面。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的动员和使用，必须处处长期打算，防止下级发生孤注一掷的情绪。**敌人要求速决害怕持久，而人民军则速决既不可能，唯有以持久战争取胜。**以上所陈，系站在朋友和同志的立场提出，供你们参考，是否有当，尚祈考虑见复。

9月28日，美军占领汉城，切断了位于朝鲜半岛南部洛东江边的朝鲜人民军主力的退路。人民军腹背受敌，被迫实行战略退却。

此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经总统杜鲁门批准，曾在9月27日电示麦克阿瑟说：

“假设俄国人或中国人没有宣布进行干涉的意图，或没有进行实际干涉”，你可越过三八线，消灭朝鲜军队。

9月28日这一天，周世钊和章淼洪一起，在长沙登车北上。

9月29日清晨，列车到达许昌，章淼洪下车去看望爱人朱光，周世钊就在许昌逛了几个小时，口吟《五律·过许昌》一首：

野史闻曹操，秋风过许昌。荒城临旷野，断碣卧斜阳。

满市烟香溢，连畦豆叶长。人民新世纪，谁识邺中王。

后来，周世钊到京后，将此诗赠给毛泽东，又把毛泽东读过的《伦理学原理》原件，交还给毛泽东。

原来，这一本《伦理学原理》原件，是由毛泽东的同学杨韶华保存下来的。杨韶华在1950年9月15日得知周世钊将去北京，就托周世钊将毛泽东读过的《伦理学原理》原件，奉还给毛泽东。杨韶华并在书后附记：

“此书系若干年前，毛主席润之兄在小吴门外清水塘住所借阅者，嗣后各自东西，不复谋面，珍藏至今，深恐或失！兹趁机敦元学兄北上之便，托其奉还故主，藉镜当时思想之一斑，亦人生趣事也。”

毛泽东复得这本书，高兴地翻看了自己写在书中的评语。他说：

“我当时喜欢读这本书，有什么意见和感想就随时写在书上，现在看来，这些话有好些不正确了。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新的启发和帮助。”

谈话中，周世钊向毛泽东提出想参加共产党，毛泽东也婉言劝他先参加一个民主党派。他说：

“现在全国解放不久，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和在农村发展党员，采取慎重的态度，吸收党员比较少，你最好先参加一个民主党派。民主同盟是知识分子的组织，你参加民盟好了。”

他还说：

“民主党派的工作也是党的工作。做好了民主党派的工作，也就算是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友好关系，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中国共产党和各个民主党派的生命是：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所以我说，做民主党派的工作是光荣的，民主党派的工作是大有可为的。”

再说9月29日夜，毛泽东收到了周恩来关于朝鲜战场的报告，报告中说：

“美帝国主义已公开表示将进军三八线以北。从倪志亮27日电看来，三八线北已无防守部队，似此情况甚为严重，敌人有直趋平壤可能。”

9月30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周年。

是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复电中除了表示感谢之外，还提到了尤金在中国的工作问题。他写道：

“尤金在这里工作了两个多月。但是，关于帮助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现在还没有完成，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并且我们希望他能到山东、南京、上海、杭州、长沙、汉口、西安、延安、沈阳、哈尔滨等地参观，并向我们的干部做一些政治理论报告、讲演等，以上两项工作，共需4个多月时间。因此我请求你允许尤金同志在中国的工作时间延长至1951年1月底或2月底，是否可以这样做，请予复电为盼。”

9月30日中午，全国政协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新中国成立1周年国庆招待会。有意思的是，这次发出的请柬上特别注明：每位受邀嘉宾可以携带一个孩子出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便带上爱女——只有14岁的章含之来到了怀仁堂。

怀仁堂里金碧辉煌，宾客济济，身着盛装的人们脸上无不洋溢着节日的喜悦。章士钊穿一件藏青色中式夹衣，章含之穿着新做的蓝色海空绒背带裙，头上扎着一朵红格子花蝴蝶结。章士钊一进大厅，看到几位熟识的老人，就互相问候聊起来。

毛泽东满面春风微笑着走进大厅，全场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毛泽东一边走，一边不断地向来宾致意、问候。他走近章士钊父女俩，拱手向章士钊问候道：

“行老，近来可好？”

章士钊拱手说道：

“托主席的福，还好！”

两个老朋友紧紧握手。章士钊指着章含之说：

“这是我的女儿，带来见见毛主席。”

章含之只是一个劲儿地笑，眨巴着大眼睛，天真地看着毛泽东。毛泽东用大手轻轻地拍拍章含之的头，微笑着说：

“好嘛，好嘛！有多大了？”

章含之不说话，章士钊说：

“她今年14岁了。”

毛泽东和蔼地对章含之说：

“你父亲是大学问家，你要好好向他学哩！”

章含之笑笑，点点头，仍然没有说话。毛泽东又去向其他宾客问候。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带着江青又来了，他将江青介绍给章士钊。江青和章士钊都很客气地打招呼。这是章士钊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毛泽东看看章含之，微笑着说：

“小孩子和我们在一起没意思吧？”

章含之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我提议，你们都到外面去耍，吃饭再回来。”

章含之听毛泽东这样说，可高兴坏了，立即就要往外跑，江青一边笑着拉住章含之，一边又招呼了几个孩子，朝大门外走去。大门口有十几个跟章含之大小的孩子也高兴地跟在江青后面，在中南海里玩起来。

庆祝大会开始了，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

“中国人民密切关心着朝鲜被美国侵略后的形势。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周恩来的这个讲话，后来刊登在10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这实际上是对美国当局发出的一个严正警告。

是日晚，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在使馆地下室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应邀出席。

1950年10月1日，全国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周年，首都各界40余万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大会。柳亚子等民主党派人士应邀登上天安门，参加首届国庆节。

上午11点，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在国歌声中，礼炮齐鸣28响。

阅兵式开始。受阅部队以空军和海军学校的学生为前导，依次为步兵、炮兵、战车、摩托化部队和骑兵。当步兵行进时，空军飞机在会场上空由东向西飞行受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用英武雄姿向全世界展示了共和国子弟兵不畏强敌、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

毛泽东亲自授予张治中、陶峙岳一级解放勋章。表彰他们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和稳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毛泽东参加完国庆活动回到办公室，见到了著名画家齐白石送来的两样贺礼：一是他自己用了半个世纪的石砚；二是他分别题款多年珍藏的两幅书画精品。其中一件是1937年写的篆书对联：海为龙世界；云是鹤故乡。另一件是他画的雄鹰图，画中巨鹰雄立，顾盼生姿，颇有叱咤风云的气魄。此后，毛泽东也以礼回谢齐白石。

10月1日这一天，“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根据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下达了“联合国军”第2号作战命令，命令正在三八线南侧待命的“联合国军”部队，从陆地和海上同时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麦克阿瑟还向金日成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金日成“放下武器，停止战斗，无条件投降”。

是日深夜，金日成首相紧急召见中国大使倪志亮和政务参赞兼武官柴成文，他说：

“希望中国尽快派集结在鸭绿江边的13兵团迅速过江，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反击敌人。”

倪志亮不敢怠慢，立即向国内报告，并将金日成和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的求援电报发往国内。

周恩来在接到倪志亮报告的同时，还收到了斯大林发来的电报。他急匆匆地来见毛泽东，递上几份电报，说：

“主席，这是金日成同志和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发来的加急电报。还有斯大林同志发来的电报。”

毛泽东看罢倪志亮的报告，又看金日成的电报，只见上面写着：

毛泽东同志：

……自9月中旬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我方遭受到极大损失，局势对我们已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敌人利用约千架各种作战飞机，不分昼夜轰炸我们的前方与后方，使我们的兵力和物资受到了难以估量的损失，情况是非常严重的。目前，敌人的主要登陆部队已与其南线部队连接为一体，切断了我们的南北部队和物资供应。如果敌人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在敌人进入“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我们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能直接出动，赴朝参战，援助我军作战。

我们谨向您提出以上意见，请予以指教。

金日成 朴宪永

斯大林的电报则是在分析了朝鲜战场的局势后，要求中国立即派出至少五六个师到三八线，以便让朝鲜人民军组织起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战斗。

毛泽东读罢电报，对周恩来说：

“恩来啊，你还记得《左传》上宫之奇对虞公晓以利害的那段话吗？‘虽然，假吾道以伐虢，虢无虞救必亡，虢亡，虞不独存。’”

周恩来说：

“是啊，主席，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我们决不能置之不理。”

毛泽东说：

“明神宗那么黯弱，还懂得要派兵援朝，打败日本侵朝部队。今天，**新中国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明王朝能做到的事，中国共产党还能做不到？**目前的局势，对朝鲜人民军极为不利，我看他们速战速决的时机已经失去了。可是，**我认为局势还没有斯大林估计的那么黑暗，金日成同志还没有到要组建流亡政府的地步。美国侵略者也不会那么走运。他远涉重洋来干涉别人国家的内政，想把社会主义阵营一举打垮，有那么容易吗？当今的世界，有那么多国家和人民要革命，那么多的民族要解放，这是一个历史潮流，它美国怎么能挡得住？手伸得太长，只能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恩来啊，我们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你看如何？”

周恩来说：

“主席，我完全赞成！”

10月2日凌晨，彻夜未眠的毛泽东，给高岗、邓华发出紧急电报，他在电文中写道：

高岗，邓华同志：

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三、请邓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

　　　　 军委 10月2日2时

他还在周恩来给倪志亮的电报稿上加写了一段话，要倪志亮转告金日成：

“尽可能将被敌切断的军队分路北撤外，**凡无法撤退的军队应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切勿恐慌动摇。**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

尔后，他又起草了一封很长的给斯大林的复电稿，准备在下午召开的中央会议决定出兵以后，立即发给斯大林。他在电报稿上首先写道：

“**还在今年4月间，金日成同志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要严重地注意外国反动军队侵略朝鲜的可能性。7月中旬、7月下旬和9月上旬，我们又3次告诉朝鲜同志，要他们注意敌人有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后路的危险，人民军应当做充分准备，适时地向北面撤退，保存主力**，从长期战争中争取胜利。”

接下来，毛泽东就中国出兵入朝作战的计划问题写道：

“1、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2、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3、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军，主要是歼灭其第8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2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么，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

4、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的12个师（五六个不够）于10月15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5、根据我们所知的材料，**美国1个军（两个步兵师及1个机械化师）包括坦克炮及高射炮在内，共有7公分至24公分口径的各种炮1500门，而我军的1个军（3个师）只有这样的炮36门。**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1951年2月才有300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因此，我军目前尚无一次歼灭1个美国军的把握。而既已决定和美国人作战，就应准备当着美国统帅部在一个战役作战的战场上集中它的1个军和我军作战的时候，我军能够有4倍于敌人的兵力（即用我们的4个军对付敌人的1个军）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即用2200门至3000门7公分口径以上的各种炮对付敌人同样口径的1500门炮），而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的1个军。

6、除上述12个师外，我们还正在从长江以南及陕甘区域调动24个师位于陇海、津浦、北宁诸线，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预计在明年的春季及夏季，按照当时的情况逐步使用上去。”

10月2日午后，高岗匆匆飞抵北京。

下午3时左右，毛泽东召集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高岗及代总长聂荣臻等人，在菊香书屋的东厢房召开会议。毛泽东拿出一份电报递给高岗，说：

“这是金日成来的急电，我们都看了，给你看看。”

毛泽东对大家说：

“**朝鲜的形势已如此严重，现在不是出兵不出兵的问题，而是马上就要出兵，早一天和晚一天出兵对整个战局极为重要。**今天先讨论两个迫切问题，一是出兵时间，二是谁来挂帅。”

高岗放下电报，问道：

“挂帅人选不是已经决定为林总了吗？”

林彪满脸倦容，他以缓慢低沉的声音说：

“我们打了几十年仗，10年内战，8年抗战，4年解放战争，人心思和，现在再去出兵打仗不得人心呐。国内困难也很多，经济是一个烂摊子，军队没有改装，还有十几万土匪在活动。对国民党作战我们有把握，美国高度现代化，加上原子弹，能否取胜？我没有把握。请中央慎重考虑这个问题。”

聂荣臻也说：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

毛泽东神情有些烦躁，他知道高岗刚刚赶来，对许多事情还不清楚，就解释说：

“挂帅人选原来考虑派粟裕同志，但粟裕确实有病，正在青岛休养，前些日子他托罗瑞卿给我带来的信中，谈到病情仍很重，我回信就劝他安心休养吧。**后来由于美军和其他帮凶国家的军队大批进入南朝鲜，飞机、大炮、坦克大量增加，形势越来越严重，我们认为出兵援朝已不是几个军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可能各个野战军将来都要参加援朝作战。**根据这一变化，常委几个同志又考虑派林彪同志来挂帅。谁知林彪同志认为我们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各方面都未就绪，他强调美国是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1个军就有各种火炮1500门，而我们1个军只有36门。美军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舰艇，而我们海、空军才刚刚开始组建。我军入朝作战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他认为在敌我装备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如若贸然出兵，必然是‘引火烧身’。其严重后果不堪设想。”

毛泽东吸了几口烟，接着说：

“前些日子，我找林彪同志谈了一次话，说明我们为什么冒险出兵，不出兵将来会有什么结果，出兵有哪些有利条件，对美帝国主义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可是，**林彪同志表示说，他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哎呀呀，他有这‘三怕’，怎么率兵打仗呢！**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我的意见还是彭老总最合适了。”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朱德就说：

“对，还是老彭靠得住噢！”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接着说：

“**美国企图在3个战场同中国作战：即朝鲜、越南、台湾。同美帝国主义较量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在什么地点。**”

毛泽东高瞻远瞩，他认为：**我们现在出兵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利用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时机，选择了一个有最有利的地形、最便利的交通、最便利的物资及人力支援、最便利的政治动员和最便利于取得苏联间接帮助的战场——朝鲜**。他认真分析了此时的政治形势，他说：

“美帝国主义虽然是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但它所进行的是侵略的非正义战争，失道寡助。在军事上，它妄图称霸世界，在全球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战线由西欧到东亚，顾此失彼。而英法等国已不是强国。在此形势下，美国资源的优势就不能不受到限制和抵消，而**原子武器已非美国独有**（1949年8月29日，苏联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笔者注）**，且不能决定胜负**。美国如果竟敢在此时爆发世界战争，则其失败将更加彻底，因为现在美国的军事准备尚未完成，而和平民主阵营势力则大于美英势力。”

“中国抗美援朝是正义之举，必然是得道多助；中国经济虽然很落后，但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人民的全力支援，有经过多年战争锻炼的人民军队，出国作战背靠祖国，有深远的后方，支持得起长期战争。只要我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

毛泽东主张：抓住时机，出兵作战，使我国在战略上处于政治上有理、军事上有利的主动地位。

最后，毛泽东提议，将今天会议的情况以他的名义择要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告给斯大林。他还对周恩来说：

“你明天想办法派一架专机，到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我们常委明天做些准备工作，4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周恩来说：

“好，我同意主席的意见。我现在就通知杨尚昆同志，请他就此作出安排。”

由于会议上多数人不主张出兵，毛泽东此前起草的给斯大林的回电就被暂时搁置了起来，而以他的名义交给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的另一封回电是这样写的：

“1950年10月1日来电收悉。我们原先曾打算，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派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然而，经过慎重考虑，我们现在认为，采取这样的行动将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第一，派几个师的兵力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们的部队装备很差，与美国军队作战没有取得军事胜利的把握），敌人可能会迫使我们退却。

第二，最大的可能是，这**将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其结果苏联也会被拖进战争**。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十分严重了。

**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的**。当然，我们不派军队援助，这对于正处在如此困难之中的朝鲜同志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我们自己也于心不忍；但是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的整个和平恢复计划就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因此，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同时积极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更为有利。由于暂时的失败，朝鲜应该换一种斗争方式，进行游击战。

我们将召开一次党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都要出席。**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希望与您商量一下**。**如果您同意，我们准备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同志飞往您的疗养地，同您讨论这件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局势。**”

10月3日凌晨1点，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被从睡梦中叫醒，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紧急约见他，要他通过尼赫鲁总理向美国当局传话：

“美国军队正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请将此点报告贵国政府总理。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和平解决。朝鲜战争必须即刻停止，侵略军队必须撤退。否则，中国很快将介入朝鲜半岛事务。”

岂料尼赫鲁将此话转告杜鲁门之后，杜鲁门竟然不屑一顾地说：

**“潘尼迦充其量不过是共产党宣传的传声筒罢了，周恩来的声明是对联合国的恫吓。”**

10月3日晚，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国庆歌舞晚会，毛泽东出席了晚会，来京参加国庆盛典的代表们向毛泽东献旗、献礼，表示敬意。

柳亚子正好坐在毛泽东的前排，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样的盛况，亚子先生为什么不填词以志盛？我来和。”

柳亚子闻言，略加思索，当即填了一首《浣溪沙》。词前有序云：

10月3日之夕于怀仁堂观西南各民族文工团、新疆文工团、吉林省延边文工团、内蒙古文工团联合演出歌舞晚会，毛主席命填是阕，用纪大团结之盛况云尔！

浣溪沙

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姊妹舞翩跹，歌声唱彻月儿圆。

不是一人能领导，那容百族共骈阗，良宵盛会喜空前。

次日，毛泽东果真和柳亚子一词，且用毛笔在宣纸上手书了全文，其内容是：

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

1950年国庆观剧，柳亚子先生即席赋《浣溪沙》，因步其韵奉和。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10月4日上午，周恩来派飞机到西安，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兼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令他立即上飞机到北京开会，一分钟也不准停留。

下午3时，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林彪、陈云、彭真、张闻天、高岗、罗荣桓、聂荣臻、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杨尚昆、胡乔木。

下午4点零5分，彭德怀乘飞机到达北京西郊机场。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李树槐前来机场迎接。李树槐说：

“彭总，行政处已在北京饭店为您安排好了住宿。毛主席交代说，请您先到北京饭店休息一下，然后再去中南海参加会议。”

彭德怀高声说：

“不是命令我一分钟也不能停留吗？我不需要休息，请司机同志直接开车到中南海毛主席那里去！”

汽车通过西四牌楼，进入中南海西门，停在了丰泽园门前。彭德怀下车后，随李树槐走向颐年堂。周恩来首先迎出来与彭德怀握手，说：

“彭总，会议在下午3点就已经开始了，来不及等你。因为政治局会议定得很仓促，昨天就准备派飞机去接你，可是天气不好，只好推迟到今天。所以搞得你很紧张吧？吃过午饭了吗？”

“吃过了。”

彭德怀一边回答，一边随周恩来进入会议厅。毛泽东起身握着彭德怀的手说：

“你来得正好哇！恐怕催你催急了点，可是也没有办法，这是美帝国主义不让我们休息嘛。”

彭德怀笑笑说：

“让我一分钟也不能耽误，立即进京。你的命令一下，我家里就是着了火也得赶来呀！”

待彭德怀坐定后，毛泽东又说：

“老彭啊，现在我们的邻居朝鲜家里着火了，我们还能安之若素吗？我们的总理早就警告过美国侵略者，说你不要过三八线，你要过了这条线，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可是人家硬是不相信，硬是过来了。我们怎么办呢？究竟是出兵参战，还是听之任之？请你彭老总也准备发个言。”

说罢，他看了看高岗，说：

“高岗同志，你是站在高高的山岗上，站得高，看得远呀，很想听听你的高见。”

“**我还是那个意思：要慎重。**”高岗说：**“我们国家已经打了20多年的仗，现在刚刚统一，元气还没有恢复，再打，怕是经济上负担不起。**现在是政权到手，百废待兴，打仗又不是用拳头，是件很费钱的事。**还是林彪同志那个意见，我认为应该认真考虑**。我军装备落后，大都是缴获的日本人的三八大盖，7个军的炮火才顶美军1个军，坦克更别提了。**一旦过江后顶不住，让美军杀过鸭绿江来，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看还是加强东北边防为好，免得引火烧身。”**

周恩来说：

“积极进攻是更好的防御。我们鸭绿江1000多里防线，需要多少部队？年复一年都准备打，不知它哪一天打进来，东北还怎么搞建设？**跟美国这一仗，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既然早晚都要打，还不如早打为好。既然美国决定从台湾、朝鲜、越南3条战线包抄我们，我们还是选择朝鲜和他们较量为好。**一方面朝鲜北方多山地，对美军机械化行动不利，而便于我军打运动战。而且朝鲜与苏联接壤，也便于我们获得苏联的援助。在朝鲜打，胜利的把握要大一些。”

“依我看，**既然早晚都要打，那不如晚点儿打为好。”高岗坚持说**：“美国战争潜力很大，从他们的南北战争结束到现在，将近100年了，美国本土没有遭到战争破坏，成为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如今，美国的钢产量，每年达到8000多万吨，是我们的140多倍。而且**它手里还拥有原子弹**。而我们，大家都知道，百孔千疮，百废待兴。不如等我们经济发展了，部队的武器装备改善了，特别是我们的海空军建立起来了，那时候再打，恐怕更有把握一些。”

其他一些反对出兵的人，也说出了不少理由，他们说：

“国内还不稳定，全国解放没有完成，经济建设没有起步，武器装备有待改善，海空军还未建立。”

彭德怀见与会者的意见完全相左，谁也说服不了谁，自己思想上还没有准备，也就没有发言。毛泽东看彭德怀还没有要说话的意思，就站起身来，语重心长地说：

“**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受啊。我们确实有困难，一些同志不主张出兵，我是理解的，但我们是个大国，不打过去，见死不救，总不行呀！**

同志们，我这个决心可不容易下哟！别说此举关系到三军数十万战士的性命……打得好那没什么说的，打不好，有可能危及国内政局，甚至断送国家的前途江山，那我毛泽东对历史、对人民都没法交代。不过，朝鲜亡了国，我们会怎么样？我们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再说，中朝是邻邦，唇齿相依，我们要是不管，那社会主义阵营还不是一句空话？这场战争，尽管我们有不少柔弱之处，但我们可以以柔克刚，以己之长击人之短。第一，美国战线太长，它在全球搞军事基地，好比十个指头按跳蚤，动弹不得；第二，美军作战部队与后方相距太远；第三，美军进行的是一场不义战争，多行不义必自毙；第四，美军士兵骄娇二气缠身，这些‘塌塌米’部队过惯了舒服日子，士气必然不高；第五，**有同志担心美国的原子弹，但苏联也有原子弹，而且中国国土广大，人口不集中，原子弹作用小。决定战争的因素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武器。”**

接着，他又宣布说：

“我看美帝国主义要打，但饭也要吃，觉也要睡。现在休会，明天继续讨论。”

散会后，中央管理科的人把彭德怀送到北京饭店休息。

10月5日上午9时左右，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到北京饭店，约彭德怀同去中南海，毛泽东想听听他的意见。彭德怀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刚一坐下，毛泽东就说：

“老彭，昨天你没有来得及发言。我们确实存在严重困难，但是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呢？”

彭德怀也不愿多说什么有利条件，就非常干脆地表态说：

“主席，昨天晚上我反复考虑，赞成你出兵援朝的决策。”

毛泽东见他如此说，便问道：

“你看，出兵援朝谁挂帅合适？”

彭德怀反问道：

“中央不是已经决定派林彪同志去吗？”

毛泽东说：

“我们的意见，这担子还得你来挑，你思想上没这个准备吧？”

彭德怀沉默片刻，说：

“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北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

是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颐年堂就是否出兵援朝问题继续讨论。彭德怀听了几个人的发言，仍有两种不同意见。他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关于出兵的意见，他说：

“**老虎总是要吃人的。不同美帝见个高低，要想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因此，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可是，如果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果让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

毛泽东听完彭德怀的发言，非常高兴。他一拍桌子说：

“我们国内当前存在着一些困难，这是事实。但我认为今天老彭的发言是一针见血，很有说服力。现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犹豫退缩，担心害怕都没有用，这些心理和情绪正是敌人所希望的。”

说到这里，毛泽东从桌上拿起一封信晃了晃，说：

“你们看，**连傅作义先生都给我写信，认为应该出兵朝鲜，不然后患无穷。民主人士尚且如此，我们共产党人还怕什么？**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在敌人进占平壤以前，不管冒多大风险，有多大困难，必须立即出兵朝鲜。**既然它打到咱们家门口来了，我们还能退避三舍吗？当然要打，而且要打胜，打出中国人民的威风！就这样定了，我们的口号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关于由谁挂帅的问题，既然林彪同志说他有病，那就让他专心养病。我提议，这场战争由彭德怀同志挂帅！”**

彭德怀没有推诿，接受了指挥志愿军的任务。

傍晚时分，在南海畔有人说彭德怀：

“看来你还不服老哟。”

自此以后，林彪退出了权力中心，住在北京西城区毛家湾，固守不串门、不作客、不探视病人的“三不主义”，度过了长达10年的漫长岁月。这是后话。

且说10月5日晚，毛泽东在菊香书屋邀请原湖南一师的师友王季范、徐特立、熊瑾玎、周世钊吃饭，在座的还有谢觉哉等人。大家谈起往事，周世钊问毛泽东：

“张干这个人主席可还记得？”

毛泽东连说，记得，记得。周世钊说：

“年过花甲的张干现在还在长沙妙高峰中学教数学。”

“哦，还在吃粉笔灰？”毛泽东说：“张干这个人办事果断，很有魄力，是个很有才干的人，很会讲话，才30多岁就当了我们一师的校长，不简单哩。原来我不高兴他，我估计他要向上爬，爬上去很容易，结果他没有向上爬。”

“是的，润之。”徐特立说：“张干年轻有为，而且有股韧劲。”

熊瑾玎说：

“当时我常说，‘张干张干，肯干肯干’，他有一种湖南人特有的蛮子精神。”

“张干是有向上爬的本钱的，如果他下决心向上爬，一定爬得上去。经过几十年还没有爬上去，没有进入仕途，可见他没有向上爬的决心，这就算有一定的操守。”毛泽东说罢，又转向周世钊：“他解放前吃粉笔灰，刚才听你说，他现在还在划粉笔，这是难能可贵的。”

王季范说：

“依我看，当年的《驱张宣言》主要是触犯了张干的自尊心，他的自尊心很强。说他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的，这倒不见得。”

毛泽东不无自责地说：

“九哥说得有道理。现在看来，当时赶走张干没有多大必要。每个学生多交10元学杂费也不能归罪于他。至于多读半年书，有什么不好呢！”

周世钊趁机说：

“张干年老多病，一家6口人，现在十分困难，全靠他微薄的工资，有时竟无以为炊。他托我向主席提出要求，适当给以照顾。”

“哦！惇元，你怎么不早说呢？”毛泽东说：“对张干这样的老教育家，应该照顾，应该照顾！”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应邀为湖南第一师范题词：

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

尔后，毛泽东对徐特立说：

“徐老，你是第一师范的老师，也为第一师范写几句话吧！”

10月6日，徐特立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给“第一师范写几句话”的函文中写道：

惇元校长足下：

嘱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题一有关校风的短语，特立对于师范教育没有突出见解，而教育政策已由政协纲领第9章明确规定，但把政策变为现实就必须有正确的思想和作风，就学校说来就是校风。“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是我们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作风，由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自1935年以来，就成为我们全党的党风。这种作风是对学习对工作对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对一切人一切事业都是需要的，它不是高深难了解的理论，也不是艰巨难做到的工作，是一句极平常极老实的口号，但它的本质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没有它，一切革命，一切建设，一切工作和学习，都会有偏差，都会有走上歪风的危险。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曾经培养了不少的革命人物，同时也有反动的人物，即正风和歪风并存，结果正风终占了上风。**新民学会的领袖人物是今天人民共和国创造的领导人物——毛泽东。他在学生时代之学习目的是改造中国，此外无它目的，结果他的学习胜利了，成为一个彻底了解中国历史任务的中国通。毛泽东同志的作风是老老实实的作风，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特立希望第一师范以毛主席的作风——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作为校风。**

特立

10月6日这一天，周恩来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召开有各地区党政军高级干部参加的中央军委会议，根据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讨论入朝作战方案和布置有关方面的工作。他在讲话中说：

“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敌人逼着我们非打不可。我们的自卫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最后一定会胜利。现在朝鲜政府一再要求我们出兵援助，我们怎能见死不救呢？党中央、毛主席决心已定，因此现在不是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考虑出兵后如何去争取胜利的问题。”

朱德也在会议上讲了话。

10月7日，美军在开城地区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12个小时以后，联合国大会在美国操纵下，通过了一个“统一”朝鲜的决议。

与此同时，美国派出B-29重型轰炸机和其它战机，对中国东北边境城市辽宁安东（今丹东）、吉林辑安（今集安）等地进行频繁的轰炸和扫射，炸毁建筑物、工厂及车辆，炸死炸伤中国平民，袭击正常行使的商轮。美国还派出飞机袭扰山东半岛的青岛、烟台等地。大有将战火引入中国境内之势。

10月7日下午，毛泽东到北京饭店看望周世钊、王季范。在谈到解放战争后期人民解放军过江前的情况时，他说：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老大哥方面也来了意见，斯大林同志也劝阻我们打过长江，认为还是划江为界、南北分治的好。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听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如果按他的意见办了，一是对不起中国人民，二是对不起死了的秦始皇。**所以，除了1948年12月我为新华社写了篇《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外，还写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首诗。”

毛泽东说到动情处，有板有眼地吟诵起来：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0月上旬的一天，毛岸英来到丰泽园菊香书屋看望父亲。

此时的毛岸英自苏联归国已经5年了，父亲觉得他在基层锻炼还不够，便让他到北京机器总厂下放挂职锻炼。毛岸英在给好友蔡博（蔡和森之子）的信中是这样写道：

“我现在任北京机器总厂党的副书记，工作的内容要比过去机关工作不知丰富多少倍，缺点是我不懂技术。但我已下决心并开始学习技术……从工具机，动力机，《技工理化》，《工艺数学》，《机械制图》学起。工厂的人数比起鞍钢来是少得可怜，但它的前途是无限的，如果党不调动我的话，我准备在这个工厂连续不断地做10年工作，随着它进步而进步，发展而发展，搞出一套完整的工厂中党的工作经验来。”

就在几天前，毛岸英回到菊香书屋，看到父亲卧室大床的床头放着一本打开着的《东周列国志》，拿起来一看，见父亲在上面划了线的一段内容是：“假吾道以伐虢，虢无虞救必灭，虢亡，虞不独存……”，他知道父亲正为出兵朝鲜的事紧张的做着工作。这一道划线，这个唇亡齿寒的道理，深深地触动了他。回到工厂后，他立即通过组织申请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将此事报告给毛泽东，请示怎么办？毛泽东也想让毛岸英到朝鲜去，再次经受战火的考验，就说：

“那就让岸英去吧。”

聂荣臻考虑到毛岸英是毛泽东两个儿子中唯一健康的一个，便婉言相劝。毛泽东说：

“**正因为他是我的儿子，所以，就得入朝作战。我毛泽东的儿子不去，难道只能让别人家的儿子去吗？**”

毛岸英今天就是为这事来找爸爸的。按规定，毛泽东那些不在菊香书屋住的亲人来看望他，都必须先经值班室报告，在毛泽东同意后方可入内。刚刚接班上岗的李家骥见毛岸英来了，就主动地和他打招呼。毛岸英问：

“我爸睡了吗？我有事找他。”

李家骥让他等一下，拿着当日的报纸来到毛泽东办公室，见毛泽东正在阅读文件，就把报纸递了过去，说：

“主席，岸英想看看你，还说有事。”

毛泽东说：

“好，让他来吧。”

毛岸英来到爸爸办公室，说：

“爸爸，我想入朝参战，你同意吗？”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问道：

“你想到朝鲜，和思齐商量过吗？”

毛岸英和刘思齐新婚不久，不忍心启齿，况且事情尚未定下来。他见父亲这样问，就含糊地说道：

“她会支持我的。”

毛泽东又吸了一口烟，说：

“好哇！既然你自己有要求，思齐又同意，我支持你的行动。你去朝鲜，锻炼一下也好嘛，可以在战火中经受考验！”

这时，江青来到值班室，问李家骥：

“主席睡觉了吗？”

李家骥就把毛岸英来了，还听见他说要去朝鲜参战的话，汇报了一遍。江青一听，吃了一惊，便径直去了毛泽东的办公室。

毛泽东一生中的子女虽然不少，但是经过战争已经所剩无几。现在两个女儿尚未成年，小儿子毛岸青身体又不好，只有毛岸英发展最全面，最有前途，也最为毛泽东所器重。赴朝作战，毕竟是很危险的事。因之聂荣臻劝说在前，现在江青也要来劝说毛泽东了。她说：

“岸英在工厂里负有重要责任，离不开，就不要去参战了。”

毛泽东自然是不为所动。后来，周恩来也劝说过毛泽东，仍然无济于事。只要是毛泽东定了的事，他是不会反悔的。

欲知后来毛岸英如何走上朝鲜战场，情况如何？且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下决心领导一个刚刚从战火中获得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要再次面临血与火的考验，去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美国一决雌雄，这是需要何等的气魄和胆略啊！那时候的中美两国在国力上的悬殊，今日说来，简直让人不可思议：1950年美国钢产量是8772万吨，工农业总产值是2800亿美元；而中国同时期的钢产量只有60万吨，工农业总产值也只有100亿美元。除此之外，美国还拥有原子弹和世界上最先进的常规武器装备，并具有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就连实力远比中国雄厚的苏联，也不敢因援助朝鲜而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由此可见，毛泽东要说服中共中央决策层中那些在出兵问题上意见不一的其他成员，是多么的困难啊！而他竟矢志不渝，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第18章**

**“现在美国把战火烧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以便**

**更好地对付帝国主义。那些‘小蒋介石’不杀掉，我们这个脚下就天**

**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人民。无论是杀、关、管，都**

**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要大张旗鼓，不要搞孤立主义、神秘主义。”**

话说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让工作人员将搁置了多天的2日凌晨起草给斯大林的长电，交给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让他转发莫斯科。

10月8日上午，毛泽东发出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赴朝参战的命令，全文如下：

彭高贺，邓洪解（指彭德怀、高岗、贺晋年，邓华、洪学智、解方——笔者注）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们：

1、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2、中国人民志愿军辖13兵团及所属之38军、39军、40军、42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1师、2师、8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

3、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5、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6、**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50年10月8日于北京

毛泽东同时将中国人民志愿军即将出国援朝的事项，电告中国驻朝大使倪志亮，要他转告金日成，他在电文中写道：

倪志亮同志转金日成同志：

一、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反对侵略者；二、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方勤务工作及其他在满洲境内有关援助朝鲜的工作，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负责；四、请你即派朴一禹同志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二同志会商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有关的诸项问题。（彭、高二同志本日由北京去沈阳）

毛泽东 10月8日

这天上午，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命令，准备飞往沈阳，他到中南海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设家宴为他饯行，由毛岸英作陪。彭德怀问毛岸英：

“岸英，你在哪个单位工作？”

毛岸英说：

“北京机器总厂。”

“工人同志对朝鲜战争有什么反映？”

“工人同志们都表示要支援朝鲜人民。彭叔叔，你不是在招兵买马吗？我第一个报名当志愿军。”

彭德怀说：

“岸英，现在国家最缺的是经济人才，你在工厂好好锻炼，也能干出一番大事业嘛。”

毛岸英说：

“现在是‘唇亡齿寒，户破堂危’，我怎么能安心在后方工作。**我是国家主席的儿子，应该带头去朝鲜。**”

彭德怀看着毛岸英认真的样子，把目光投向毛泽东说：

“你看这孩子！”

毛泽东说：

“岸英想跟你去打仗，你是司令员，你看收不收这个兵吧。”

彭德怀说：

“主席，我这个司令是你封的嘛，我哪能到主席家里招兵买马呢？”

毛泽东说：

“你就收下他吧。**岸英会讲俄语、英语，你到朝鲜，免不了要跟苏联人美国人打交道吧？**”

彭德怀说：

“那好吧，就让岸英当我的翻译官吧。想不到，岸英这孩子是我接受的志愿军里的第一个人！”

谈到彭德怀的指挥所设立的位置，毛泽东的意见是，为了保证安全，免遭敌机轰炸，可设在鸭绿江北岸一个隐蔽的位置。彭德怀不同意，他主张过江入朝，与金日成在一起，以便协同两军，统一指挥作战。

关于志愿军出国的宣传问题，彭德怀向毛泽东建议说：

“在战斗打响之前，应绝对保密。打响之后，新华社在报道和广播方面也应注意分寸。要设法转移敌人的视线，使其产生判断上的错觉，以便我军各路部队迅速隐蔽过江，取得战斗的主动权，力争初战胜利，以提高士气，稳定人心，扭转朝鲜的被动局面。”

谈话结束后，彭德怀立即带着毛岸英及临时指挥人员飞赴沈阳。

10月9日，毛泽东以周恩来名义起草给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倪志亮并告高岗的指示电，他写道：

倪大使并告高：

齐子（8日子时——笔者注）电悉。一、中央已委托高岗同志负责处理一切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问题，**嗣后关于此类事务均向高岗同志直接接洽，由高岗同志答复。**坦克学校和军官学校的问题请高处理。二、使馆驻地同意你的意见。

周恩来 10月9日

10月9日，美军继续向三八线以北推进。

10月9日上午，彭德怀、高岗在沈阳召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定，进行战前动员，要求各部在10天内做好一切出国作战的准备工作。

司令部一声令下，聚集在东北的几十万边防军，立即换上了轧出许多道线的军装，人称“国际服”，中国人民志愿军诞生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3兵团所辖第38军、39军、40军、42军及炮兵1师、2师、8师等，均已经准备完毕，待命出动。

即将入朝的第13兵团负责人有：司令员兼政委邓华，副司令员洪学智、韩先楚，参谋长解方；第38军军长梁兴初，政委刘西元，辖第112、113、114师；第39军军长吴信泉，政委徐斌洲，辖第115、116、117师；第40军军长温玉成，政委袁升平，辖第118、119、120师；第42军军长吴瑞林，政委周彪，辖第124、125、126师。

10月9日这一天，斯大林复电中共中央说，对于中国出兵朝鲜抗击美国侵略，表示支持。但他又说，苏联出动空军支援尚有一定的困难。

斯大林在复电中还就毛泽东9月30日给他的电报中关于延长尤金在中国的工作时间一事说：

“来电请求延长尤金留中国的时间已收到。现通知你，尤金留中国可以到今年年底，以便完成《毛泽东选集》的准备工作及在中国各城市党的干部会上的讲演。”

周恩来立即赶到菊香书屋，拿出斯大林的电报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一看，脸就变了颜色。如果丧失了制空权，志愿军地面部队和后勤补给线就会暴露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之下，志愿军就要付出比预想高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伤亡代价！他生气地说：

“斯大林这是怎么搞的？迟不说早不说，单等我们下达了出动的命令，才说空军没准备好？”

周恩来说：

“主席，斯大林哪儿是没有准备好，我看没准备好只是一个托辞。他是从骨子里看不起我们，他们还是对我们能不能以劣势装备打败世界头号强国心里没底。如果他们出动空军掩护我军，怕一旦我们没打好这一仗，把他们也卷进去了。苏联不敢冒与美军直接对抗的危险，生怕会引起第3次世界大战。”

毛泽东说：

“恩来，我们马上召集各位政治局常委，大家一起议一议。”

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决定，由周恩来和林彪去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周恩来、林彪代表中共中央，立即秘密飞往莫斯科，同斯大林商谈抗美援朝和苏联给予军事物资支援特别是提供空中掩护问题。

周恩来、林彪到了莫斯科以后，得知斯大林正在黑海边的阿布哈兹区疗养所，就又马上飞抵克里米亚，去见斯大林。

10月9日下午，毛泽东召见公安部长罗瑞卿，商量如何镇压潜伏的反革命分子问题。

原来，从1950年1月到10月间，国民党潜伏的残余势力、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獗。特别是在朝鲜内战爆发以后，他们乘着美国发动侵朝战争，猖狂地进行造谣活动，他们说：“第3次世界大战就要打起来了”，“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机会到了”。他们还炸毁桥梁，杀害干部，盗窃机密，抢劫财物，焚毁仓库。据统计：全国发生暴乱816起，有4万名干部和群众被杀害，仅广西一省就有7200人被杀害。在1950年的夏季，北京还流传着这样的谣言：“鼓楼冒烟，石狮子流泪，万寿山闹鬼，要改朝换代了。”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一些干部思想上还存在着骄傲轻敌，和平麻痹的倾向，他们的政策界线也非常模糊，怕犯过去“左”的错误，怕引起社会恐慌，因此对敌镇压不力，该杀不杀，该捕不捕，重罪轻罚，久押不问，或对捕获的匪特“四捉四放”、“八擒八纵”，以致有的案犯竟然说公安局是“公安店”，法院是“司法旅馆”，在监狱中的案犯们流传着这样的话：“迟进来，早进来，迟早进来；迟出去，早出去，迟早出去。”正是这种右的偏差，使反革命分子气焰越来越嚣张，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却受到了严重挫折。他们批评一些地方政府“睡觉了”，“宽大得没了门框”，“不替人民作主”。有的党外人士也不满意，他们说：“能除暴安良者，万民才能归顺。”

毛泽东问罗瑞卿：

“你们对待目前潜伏的反革命分子怎么办？”

罗瑞卿说：

“现在反革命分子活动十分猖獗，人民批评我们宽大无边，要求镇压反革命。我们商量了一下，主张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

毛泽东点点头说：

“我赞成你们的意见。**现在美国把战火烧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以便更好地对付帝国主义。那些‘小蒋介石’不杀掉，我们这个脚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人民**。**无论是杀、关、管，都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要大张旗鼓，不要搞孤立主义、神秘主义。**”

毛泽东要罗瑞卿、彭真等4人，连夜起草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指示。

10月10日凌晨2时，彭真、罗瑞卿将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草稿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只字未改，当即批示发向全国，全文如下：

为了打击帝国主义的阴谋破坏和彻底消灭蒋介石残余匪帮，为了保证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为了巩固与发展中国人民的胜利，“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必须对于一切“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予以严厉制裁”；“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必须提高警惕性”。**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和肃清反革命残余问题，所给予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明确指示**，也是全国人民目前迫切的要求。

但是，有不少干部和党委，或者由于在胜利后发生了骄傲轻敌思想，或者由于在新的环境中受了腐朽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以致把统一战线中的反对关门主义问题与在对敌斗争中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问题相混淆，把正确地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与乱打乱杀相混淆，把“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误解为片面的宽大。因此，**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偏向，**以致有大批的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这不仅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而且引起了群众的抱怨，说我们“宽大无边”、“有天无法”。这种右的偏向，必须采取步骤，加以克服。为此，特作如下规定：

一、各级党委，对于已被逮捕及尚未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应即领导与督促主管部门，根据已有的材料，按照“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经过审慎的研究，分别地加以处理。

**对于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特别是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作恶的反革命分子，应依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加以镇压。当杀者，应即判处死刑。**当监禁和改造者，应即逮捕监禁，加以改造。对于这些案件的执行，**必须公布判决，在报纸上发布消息（登在显著地位），并采取其他方法，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

对于罪恶较轻而又表示愿意悔改的一般特务分子和反动党团的下级党务人员，应即实行管制。加以考察。这些分子如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则应予以严厉制裁。

对于真正的胁从分子、自动坦白的分子和在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有所贡献的分子，应分别予以宽大的待遇，或给以适当的奖励。

二、**对于帝国主义的特务间谍组织和特务间谍分子，必须予以严厉的打击**。已逮捕者，应分别情况，依法惩处，未逮捕而有证据或有重大嫌疑者，应依上级指示，予以逮捕。

三、关于反革命案件的检查，应由检察、公安部门负责。其审判，仍由人民法院或军管会军法处负责。目前法院工作，应以处理反革命案件为重点。

为了防止在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中发生“左”的偏向，各级党委**必须坚持反对逼供信和禁止肉刑，必须注意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在判处死刑时，党内必须经过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受委托的地委批准。其中如有特别重要分子，则须报告中央批准。关于外国人的处理必须经过政务院批准。**

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情形，公安和司法部门应按级向上级作定期报告。

四、法院、检察、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武器，各级党委应加强自己对于它们的领导，并适当地充实其干部。监狱管理必须严密，必须有可靠干部负责。

五、关于执行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工作情形，各中央局必须于本指示发出1个月内即11月10日以前，作出第一次报告，并订出今后执行中央方针的计划，电告中央批准，然后照此实行。

各中央局所属的分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关于在自己区域执行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工作情形及自己的工作计划，必须于本指示发出40天内即11月20日以前，向各中央局作第一次报告，此项报告同时发给中央一份。此后各中央局及分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均须每4个月由党委书记负责，向中央及中央局作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的专题报告一次。

后来，历史学家把**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抗美援朝运动**并在一起，统称为建国初期的**三大革命运动**。

10月10日，斯大林会见了周恩来和林彪。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参加了会见。尽管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定出兵朝鲜，但**周恩来在会谈中还是以出兵或者不出兵两种可能性与斯大林商谈**。他说：

“斯大林同志，中国由于长期战争，连年遭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许多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如果现在又卷入战争，不仅人民的困苦生活无法改善，而且国家的经济恢复工作也无从谈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出兵朝鲜，面临许多大的实际困难。不但要担负战争消耗的重担，而且军队的武器装备和接济也困难重重。战争绝非儿戏，一旦陷入，如何收场？如果这场战争僵持不下，还可能牵涉到各兄弟国家。如果中国要出兵，那就需要苏联同志给予武器装备和提供空中支援。”

**斯大林默默地听着，不出兵是他料想中的事。这次会见周恩来和林彪，他也没有打算谈出兵的问题，如今见周恩来如此说，便缓缓地说**道：

“请原谅，**苏联空军目前尚不能出动，**因为空战很难划定界限，如果和美国发生全面冲突，会影响中国。”

周恩来说：

“我们尚在其次，主要是朝鲜同志困难更大。”

斯大林点点头说：

“现在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进入朝鲜北部，如果朝鲜没有后援，至多只能维持一个星期。**如果让敌人占领整个朝鲜，美军和伪军将陈兵鸭绿江、图门江。那时我们，特别是中国的东北恐怕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了**。他们随时可以从空中、陆地、海上对我们进行骚扰。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考虑到。”

周恩来表示赞同，他说：

“我们必须设想到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制定出取胜的措施和对策。”

斯大林说：

“周恩来同志，你们此次来，就是来通知我们这件事的？”

周恩来说：

“是的，斯大林同志，**没有苏联空军配合作战，我们暂不出兵。**”

斯大林说：

“朝鲜与其进行无谓的抵抗，不如保存其有生力量，先在中国建个流亡政府。”

林彪插话说：

“朝鲜同志可以进入山沟森林，进行长期的游击战争，转战于南北各地，以待时机。”

斯大林对林彪的建议不屑一顾，他继续谈美军占领朝鲜后对中国造成的威胁，他又说：

“我们曾经设想过帮助朝鲜同志的办法，但我们苏联早已声明过，我们的军队已经全部撤出朝鲜了，**现在再出兵到朝鲜去有困难，因为这等于苏联同美国直接交战。如果中国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苏联可以供应武器装备；在作战时，苏方还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但空军只能在后方和前沿活动，不能深入敌后，以免被敌人击落后俘获飞行员，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二战后，我们剩余了许多军火，如果中方出兵，可以帮助中国军队建立起多兵种、现代化装备的军队。在战争中改装部队是最好的办法，可以随时发现缺点，随时改进。”

斯大林还表示，如果中国军队出动，苏联空军最多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能出动。

斯大林这一番话，言外之意是中国应当出兵，而且有苏联援助，还可以得到很大好处。但**由于周恩来已经讲了一大堆困难，而且已经明确表态：中方认为现在以不出兵为宜，他也不好明说中国还是出兵好。**所以这次会谈，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结果。

10月10日下午，毛泽东致电倪志亮转金日成并告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倪转金并告彭：

1. 庆祝人民军克复蔚珍、竹边地区的大胜利。

二、**现敌军大部北进，后方空虚，建议凡人民军无法北撤者均留于南朝鲜，开辟敌后战场，这在战略上是必须的而且是很有利的。如有人民军四五万人留在南朝鲜担负此项任务，则对北部作战将大有帮助。**

三、**敌似正在准备从镇南浦至新义州一线可以登陆之海岸举行新的登陆作战，切断平壤至新义州的交通线，而这一交通线是必须保护的，请彭与朝鲜同志研究保护方法，如敌登陆则应坚决歼灭之。**

毛泽东 10月10日

10月1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10月10日关于印度对西藏问题的态度给外交部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外交部：

应告袁大使：一、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首先希望不经战争进入西藏，故要西藏代表团九月来北京谈判，该团故意拖延，至今尚未动身。**现人民解放军已向昌都前进，数日内可能占领昌都。如西藏愿意谈判，代表团应速来京。二、朝鲜问题应照周总理9月30日演说内容答复之，即中国不能坐视其邻人受侵略而置之不理，扩大战争的责任应由侵略国担负。外交部拟电送阅。

毛泽东 10月11日

此时，毛泽东还在牵挂着张干、罗元鲲的窘迫生活，致函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他写道：

首道同志：

张次仑（别号张干）、罗元鲲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年均70多岁，一生教书未做坏事。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张为校长，罗为历史教员。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又据罗元鲲先生来函说，曾任我的国文教员之袁仲谦先生已死，其妻七十岁饿饭等语，亦请省府酌予接济。以上张、罗、戴3人事，请予酌办见复，并请派人向张、罗二先生予以慰问。张、罗通讯处均是妙高峰中学。戴住新化，问罗先生便知。顺致

敬意！

毛泽东 1950年10月11日

此前，罗元鲲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反映了他家的情况，同时也反映了袁吉六夫人戴常珍的生活困难，信中附诗一首云：“袁胡教学有何奇，横扫千军笔一支。一字千金何处报，其妻老病绝粮时。”

湖南省政府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将1200斤救济米和旧币50万元，分两次送到张干家中。同时对罗元鲲和袁吉六的夫人戴常珍予以救济。

再说10月11日这一天，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其中说到，苏联完全可以满足中国提出的飞机、坦克、大炮等项装备。但是**苏联空军还没有准备好，要暂缓出动，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

10月12日，毛泽东给在沈阳的彭德怀、高岗发去一份加急电报，他写道：

彭、高：

1、**10月9日命令暂不实行，13兵团各部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2、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

毛泽东

10月12日这一天，进军西藏的18军从南面包抄的部队进占西藏芒康，藏军第9代本德格·格桑旺堆率340余人宣布起义。

10月13日下午，彭德怀应召和高岗一起带着毛岸英自东北回到北京。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彭德怀、高岗研究出兵问题。

此时已经是下午6时。毛岸英骑上一辆自行车，匆匆赶到北京机器总厂，向领导和工友们告别。毛岸英又赶往医院，去看望因做阑尾炎手术住院的妻子刘思齐。等他到了医院，天早已黑下来了。

毛岸英小两口刚刚结婚一年时间，在这一年里，毛岸英住工厂，去湖南，很少和刘思齐见面。刘思齐见毛岸英这么晚来看她，有点诧异，就说：

“这么晚了，你还来干啥？”

毛岸英平日里难得与妻子厮守在一起，现在又分别在即，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自己出国作战是军事秘密，不便告诉妻子，但走前又不能不交代点什么。毛岸英坐在刘思齐病床前的凳子上，掏出手绢，不断擦着脸上的汗水，说道：

“我明天将要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出差，所以急急忙忙赶来告诉你。我走了，通信不方便，你如果接不到我的信，可别着急呀！”

“那是个什么地方？”

“嗯，这你就别问了……你知不知道有个朝鲜半岛？美国侵略者在那里打得很厉害。”

“怎么，你……”

刘思齐似乎已经猜到什么。毛岸英连忙把话头岔开：

“啊，不不，我这是考考你的政治哩！”

毛岸英脸上露出不自然的笑，像一个大孩子在哄一个小孩子。他依依不舍地站起来，说：

“我走了，你出院后，每个礼拜六要去中南海看看爸爸，不要因为我不在你就不去。希望你好好照顾岸青。能答应吗？”

“嗯……”

刘思齐点点头，咬住了嘴唇。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夫妻短暂的相见，竟是她与心爱的新婚丈夫的诀别。

毛岸英离开医院时，已经是夜间11点了，又骑车到岳母张文秋家辞行，他说：

“妈妈，我要出国，来向您告辞。”

“多保重，早些回来。”

“是。弟弟岸青一直是我照顾，我走了，托付给您了。”

“你放心，我会照顾他。”

毛岸英向岳母鞠了一躬，说：

“您没有儿子，我和岸青没有妈妈，我们兄弟就是您的儿子。”

毛岸英要走了，他说：

“妈妈，我那块手表不顶用了。您那块自动表，借给我用吧？将来回国再还给您。”

张文秋取出她那块一直舍不得戴的手表，笑着说：

“那我就送给你吧。哪有女婿借丈母娘的表再还之理，这就算我这个当妈妈的送给你的纪念。”

10月13日夜晚，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结束后，让工作人员通过驻苏大使馆给周恩来发去了一份急电，把会议的决定告知周恩来。他在电文中是这样写的：

周恩来同志：

1、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两个月后，苏联志愿空军就可以到达。6个月后可以收到苏联给我们的炮火及坦克装备，训练完毕即可攻击美军。**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2、**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引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3、真日（即11日——笔者注）菲里波夫（即斯大林——笔者注）和你联名电上说，**苏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不知他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保持20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

4、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除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

5、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只对上述第三、第四两点没有把握，因此，请你留在莫斯科几天，与苏联同志重新商定上述问题，并以电报速复为盼。

毛泽东 10月13日22时

中国驻苏大使馆接电后，立即派人将电报送给了周恩来，周恩来读罢电报，通过莫洛托夫转达给斯大林。斯大林的答复是：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作战。

斯大林的决定，对中国出兵作战十分不利。周恩来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心并没有因此而动摇。

10月14日凌晨，毛泽东起草了给陈毅的复电，他写道：

陈毅同志：

12日21时电悉。一、宋兵团（指第9兵团，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笔者注）后尾部队酉俭全部离开上海、常熟地区是可以的，宋兵团仍照前定计划在泰安、曲阜区域集结整训一时期待命开东北；二、高射炮团仍须即开东北；三、上海人民代表会议何日开幕盼告。

　　　　 毛泽东 10月14日1时

10月14日21时，毛泽东给周恩来发去了一份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的电报，主要内容如下：

“一、我已告彭德怀，在他到德川研究情况后，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3道防御阵线。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平壤美军、元山伪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之一路。**现在的决心是打伪军，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军。**如时间许可则将工事继续增强，在6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亦不去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即在6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我们这样做是有把握的和很有利益的。

二、美军现尚停留在三八线，它进攻到平壤需要时间，由平壤再向德川进攻又需要时间。如平壤美军不向德川进攻，元山的伪军估计也难于单独进攻，这样就给我军的开进及修筑布防的时间。

三、**我军决于10月19日开动，**先头军步行200公里至德川需7天，休息一二天，可**于10月28日在德川、宁远线以南地区开始构筑工事。全军26万人渡过鸭绿江需要10天时间，即要到10月28日才可以渡江完毕。**

四、**为着准备在11月内在敌进攻德川区域时打一个胜仗，我们决定还是出发26万人（12个步兵师、3个炮兵师）均开进为好。**在工事已经修好敌又固守平壤、元山不敢来攻的情况下，再将军队的一半左右开回中国境内练兵就粮，打大仗时再去。

五、在我军开进半数修筑工事期间，朝鲜人民军方面还是继续抵抗，尽可能迟滞美、伪两军前进为有利。”

周恩来看罢毛泽东发来的电报，立即命人找来莫洛托夫，要求他再次安排会见斯大林。周恩来见到斯大林后，递上了毛泽东的电报，说道：

“斯大林同志，毛泽东同志和政治局刚刚拍来电报，**我们中央已经再次作出决定，立即出兵朝鲜，没有苏联空军，我们照样参战！**”

斯大林听了翻译的话，又让翻译读了电报，许久没有缓过神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喃喃地说：

“还是中国同志好，还是中国同志好……”

说着说着，泪水溢满了这位“钢铁意志的人”的眼眶。他立即指示莫洛托夫与周恩来协商援助军火的种类、数量和运输问题。

由于形势紧迫，周恩来和莫洛托夫只谈到了军火的种类和数目，**而没有谈及毛泽东在13日电中提出的他所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在回国的飞机上，有人提醒说这次没有谈到军火的价格问题，周恩来说：

**“苏方援助我国的军火应该是无偿的，是作为对我方出兵抗美援朝的补偿。我下次会见斯大林时，要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争取做出明确的规定来。**”

令人遗憾的是，历史再也没有给周恩来提供机会。因为后来斯大林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他与中方人员会谈的机会减少了许多，周恩来和他见了面也没有再提起过这一问题，直至斯大林逝世。

10月15日凌晨1时，毛泽东以周恩来的名义起草了一份电报，要倪志亮大使转交金日成。他在电报中写道：

“请即派一位熟悉道路的同志于16日到安东接引彭德怀同志和金日成同志会面。如倪大使找不到金日成同志，则请倪大使派人去安东接引。”

10月15日清晨，彭德怀、高岗、毛岸英乘飞机自北京飞回沈阳。

彭德怀在沈阳一面部署志愿军出兵援朝的各项准备工作，一面又利用短暂时间视察了**鞍山钢铁厂和沈阳兵工厂。当他参观了刚试制生产的6管火箭炮实弹射击后，又惊又喜地称赞工厂的负责同志说：**

**“你们工作很有成绩！我们也有自己的火箭炮了。”**

这一天，金日成派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来到沈阳，会见了刚刚从北京返回的彭德怀。朴宪永告诉彭德怀说，平壤正在告急，请求中国尽快出兵。

10月16日，彭德怀和高岗赶到鸭绿江北岸的安东，召开志愿军师以上干部会议，宣布了中央决心出兵朝鲜的决定。

10月16日这一天，在昌都战役中，第18军154团和青海骑兵支队抢占恩达，切断了昌都藏军西退之路。

10月17日下午5时，毛泽东电告彭德怀、高岗，要他们18日到京。电报中还说：

“对出兵时间，以待周（指周恩来——笔者注）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

10月18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听取了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汇报，确定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出动时间。毛泽东说：

“**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

欲知志愿军入朝后战况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周恩来在与莫洛托夫协商苏联援助中国抗美援朝的军火时，**没有提出毛泽东事先特意嘱咐的“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这一要紧问题，双方既没有说明这些抗美援朝的军火是无偿援助，也没有明确规定战后一定要中方偿还。可是后来到了中苏两党两国交恶时，列宁、斯大林的不肖子孙赫鲁晓夫却乘人之危，向中国讨要这笔军火费。毛泽东为了国家的尊严，勒紧裤带，迅速偿付了这笔按半价折算为13亿美元的债务，导致中国人民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雪上加霜**。外交上一个小小的疏忽，就白白赔上了13亿美元！这岂不是中国人民的一大憾事、一大笔冤枉债？后来，毛泽东在最困难的时候说是“天灾人祸”，自然也包括了这一笔冤枉债。

**第19章**

**“它一天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天，一年不撤退，就打它一年，十年不撤**

**退，就打它十年。这样一来，它就伤亡多，受不了，到那时，它就只好心**

**甘情愿地进行和平解决。只要它愿意和平解决，我们就可以结束战争。”**

话说1950年10月18 日晚9点，毛泽东电令第13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等人，他写道：

邓、洪、韩、解并告贺副司令：

4个军及3个炮兵师决定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19日）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4时即停止，5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为取得经验，**第一晚（19日晚）准备渡2个至3个师，第二晚再增加或减少，再行斟酌情形**，余由高岗、德怀面告。

毛泽东 10月18日21时

10月19日清晨，彭德怀、高岗由北京乘飞机火速赶回安东。

当天黄昏时分，彭德怀急于与金日成首相会见以了解战况，带了参谋杨凤安、两名警卫员和一部电台，乘一辆吉普车，跨过了鸭绿江大桥。

10月19日，在昌都战役中，第18军从北面包抄的部队攻占类乌齐。

10月19日这一天，中央军委任命周士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员，钟赤兵为政委。

10月19日下午，毛泽东已经接连几天几夜无法入睡，连吃3次安眠药还是无法入眠。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致中央中南局、华东局、西南局负责人的电报，电报中说：

“美国扩大朝鲜战争的嚣张气焰，**迫使我们为了捍卫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与和平，必须挺身而出**，**保卫中国，支援朝鲜。**”

10月19日17时30分，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头部队第40军一部，经鸭绿江铁桥，进入朝鲜战场。

傍晚时分，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来向毛泽东汇报说：

“我志愿军已经开始秘密跨过鸭绿江了。”

毛泽东听完了汇报，只对卫士长说了一句“睡觉！”就走进了卧室。

此后，中国人民志愿军4个军、12个步兵师、3个炮兵师，大约26万人，分3路从安东、长甸河口、辑安过鸭绿江，秘密入朝。

早在志愿军过江之前，各部队都进行了紧张的战备训练和充分的思想动员，并在出征前进行了庄严宣誓。志愿军炮兵第1师第26团第5连指导员麻扶摇为此写出了一段激情的诗句：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保祖国，就是保家乡；

中华好儿郎，齐心团结紧，打败美国野心狼。

这首充满激情的战斗诗篇，作为出师誓词，他在大会上进行了宣读。后来，这首诗被新华社随军记者陈伯坚采访到，由他修改了几个字，征得作者同意，在全国作了报道。著名作曲家周巍峙见到这首诗，很快便谱了曲，使之成为著名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再说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毛泽东、中央军委在5月份提出的裁军百万的计划不得不中止，相反又进行了扩军。后来到1951年10月，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人民解放军总人数增加到了611万人。

毛泽东在志愿军入朝前，曾考虑到初次出国作战，情况不明，又要以劣势装备对付现代化优势装备之敌的进攻。因此设想入朝第一阶段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山区建立根据地，并在该线以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线。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待条件具备后再行反攻。可是在志愿军入朝后，他马上发现了战场上的一个重要情况，就是敌人没有料到中国会出兵参战，因而他们在占领平壤后，毫无顾忌地分兵多路向中朝边境疯狂冒进，妄图在11月23日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毛泽东根据这一新情况，及时改变了原定的防御作战计划，决心利用敌人判断失误和兵力分散的弱点，突然发起进攻，击敌于轻举冒进之中。

10月21日凌晨2时30分，毛泽东致电倪志亮、柴成文转彭德怀等人，他写道：

倪柴，即转彭德怀同志，并告邓洪韩解及高贺：

1. 伪首都师由咸兴向长津前进。伪3师似将进至咸兴。伪6师改由破邑向北，目的地第一步在德川，第二步可能向熙川。伪7、8两师第一步向顺川军里安州，第二步可能向泰川龟城。以上5个师的最后目的地是江界新义州一线。截至此刻为止，美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

二、估计伪首伪3两师要7天左右才能进到长津，然后折向江界。我军第一仗如不准备打该两师，则以42军的一个师位于长津地区阻敌即够。42军的主力则宜放在孟山以南地区（即伪6师的来路），以便切断元山平壤间的铁路线，箝制元平两地之敌，使之不能北援，便于我集中3个主力军各个歼灭伪6、7、8等3个师。

三、如伪6师（较强）由破邑（在铁路线上）至德川的路上能有朝鲜人民军一部作有力的阻击，则该敌可能要到10月24日或25日才能占领德川，如果我40军（全部）能于23日赶至德川宁远地区，则可以绕至伪6师的后方（由东面绕至南面铁路线附近），让出正面给他军使用（38军或39军），如果太迟，则敌将先占德川。

四、**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如何部署，望彭邓精心计划实施之**。

五、**这一仗可能要打7天至10天时间（包括追击）才能结束，我军是否带有干粮？望鼓励全军，不惜牺牲，不怕艰苦，争取全胜。**

六、彭邓要住在一起不要分散。

　　 毛泽东 10月21日2时半

1个小时后，毛泽东又致电邓华并告彭德怀等人，他在电文中写道：

邓华同志并告彭及高：

1. 你们是否已前进，我意13兵团部应即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现在是争取战机的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进攻的问题。**

二、如部队渡河须有机构在安东指挥，则可留适当同志率一部机构留在安东，你和其余同志率必要机构即住彭处为宜，望酌定。

毛泽东 10月21日3时半

10月21日，印度政府给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说：

“假如因为中国政府在西藏的军事行动，而使反对中国参加联合国的国家有机会来歪曲中国的和平目的，那么中国的地位将会因此而削弱。”

10月23日，毛泽东复电给彭德怀、高岗，他在电文中写道：

彭，并告高：

22日戌时电悉。你的方针是稳当的，我们应当从稳当的基点出发，不做办不到的事。朝鲜战局，就军事方面来说决定于下列几点。

第一是**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3个甚至4个伪军师**（伪3师将随伪6师后跟进，伪1师亦可能增援）。此战如果是一个大胜仗，则敌人将作重新部署，新义州、宣川、定州等处至少在一个时期内不会来占，伪首伪3两师将从咸兴一带退回元山地区，而长津可保，新安州、顺川两点是否保守也可能成问题，成川至阳德一段铁路无兵保守向我敞开一个大缺口，在现有兵力的条件下，敌人将立即处于被动地位。**如果这次突然性的作战胜利不大，伪6、7、8师主力未被迅速歼灭，或被逃脱，或竟固守待援，伪一、伪首及美军一部增援到达，使我不得不于阵前撤退，则形势将改到于敌有利**，熙川、长津两处的保守也将发生困难。第二是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如果我能利用夜间行军作战做到很熟练的程度，敌人虽有大量飞机仍不能给我太大的杀伤和妨碍，则我军可以继续进行野战及打许多孤立据点，即是说，除平壤、元山、汉城、大邱、釜山等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我无飞机无法进攻外，其余地方的敌人都可能被我各个歼灭，即使美国再增几个师来，我也可各个歼灭之。如此便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或者待我飞机大炮的条件具备之后把这些大城市逐一打开。如果敌人飞机对我的伤亡和妨碍大得使我无法进行有利的作战，则在我飞机条件尚未具备的半年至一年内，我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第三**如果美国再调5个至10个师来朝鲜，而在这以前我军又未能在运动战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国师及几个伪军师，则形势也将于我不利，**如果相反，则于我有利。

以上这几点，均可于此次战役及尔后几个月内获得经验和证明。我认为我们应当力争此次战役的完满胜利，力争在敌机炸扰下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进行有力的作战，力争在敌人从美国或它处增调兵力到朝鲜以前多歼灭几部分敌人的兵力，**使其增补赶不上损失**。总之，**我们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毛泽东 10月23日

10月23日傍晚，毛泽东致电邓华等人，他在电文中写道：

邓洪韩并告彭：

**敌进甚急，捕捉战机最关紧要**。两三天内敌可能发觉是我军而有所处置，此时如我尚无统一全军动作的处置，即将丧失战机。因此，**你们应迅速乘车至彭处，与彭会合，在彭领导下决定战役计划，并指挥作战**。何日动身，何时可到，望即告。

　　 毛泽东 10月23日17时

10月23日这一天，毛岸英和彭德怀办公室的其他成员随第13兵团司令部一起入朝。

原中国人民志愿军组织部部长任荣后来回忆说，出发前，上级对他说，有位俄文翻译搭乘你的车。一上车，任荣就觉得这位俄文翻译有点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两人一问一答交谈了好久，翻译告诉他，自己新婚不久，父亲支持他来朝鲜。任荣说当时只是对这位知书达理的俄文翻译颇有好感，同时又觉得他父亲思想很进步，至于他父亲是谁，既没问，也没想到要问。直到后来，他才知道这位俄文翻译竟是毛岸英。

10月24日晨，已经会见了金日成的彭德怀和朴一禹率指挥人员转移到大榆洞。那里空无一人。山谷中有朝鲜金矿工人挖的一个废弃矿洞，大概有两三公里深，司令部的各个部门都在里头安家，也就是用破木板子把它间隔起来。在矿洞口外的山坡上有几处简陋平房，其中一处是较为宽大的铁皮顶木板工具棚，是金矿工人放工具的地方，里头有用木头板子搭建的大桌子。彭德怀在黑暗的矿洞里办公很不适应，他说太闷太潮了。他看上了那个工具棚。他说，我不怕飞机，我到山上住。他的倔脾气也是出了名的，于是，那个工具棚就成了彭德怀的办公室和宿舍。

这天下午，第13兵团司令部也按照毛泽东的电令赶到大榆洞，与志愿军司令部会合。毛岸英便来到彭德怀的办公室工作。

是日晚，彭德怀在他那大木板棚办公室内召集第13兵团邓华等人开会，他说：

“好了，形势很严峻，大家不用多说了，下面我来宣布一下，志愿军领导的分工。战争时期，军情紧急，我没有和你们商量就定了。分工是这样的：邓华任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分管干部和政治工作。洪学智任第二副司令员，分管司令部工作、特种兵和后勤工作。韩先楚任第三副司令员，不具体分工，到部队去督促检查作战问题。解方任志愿军参谋长。杜平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和直接参加谈判。志愿军党委：由彭德怀任书记，邓华任副书记，洪学智、韩先楚、解方、杜平任常委。为了便于工作，便于和朝鲜人民军协调，我们志愿军的领导中要有一位朝鲜同志。我同金日成同志商量，确定为朴一禹同志。他的职务是副司令兼副政委，同时还担任我们党委的副书记。”

此时，毛岸英的一切背景只有彭德怀、邓华、洪学智等几个人知道，其他的人只知道他是彭德怀身边的一位姓刘的俄文翻译。按照彭德怀的指示，毛岸英只在他的身边和办公室里协助秘书和参谋们做一些机要工作，既没有配备枪，也没有查哨任务。白天，毛岸英和其他工作人员都在彭德怀的办公室里工作，晚上彭德怀在办公室的行军床上休息，毛岸英和办公室副主任兼彭德怀的军事秘书杨凤安就在用稻草搭的地铺上睡觉。后来不到一周，他们身上长满了虱子。毛岸英和其他工作人员每天吃的都是后勤上配给的粗高粱米，连青菜都没有。彭德怀对他很关心，多次提出让毛岸英和他一起吃饭，毛岸英都谢绝了。

10月24日这一天，昌都战役历时18天胜利结束，此役经过大小战斗21次，歼灭昌都藏军总部及3、7、8、10共5个代本的全部和2、4、6共3个代本的大部，争取藏军第9代本起义，毙、伤、俘藏军（包括投降、起义者），共6100余人，占藏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俘代本以上文武官员18名，英、印特务福特等4名，缴获山炮3门，重机枪9挺，轻机枪48挺，各种冲锋枪、步枪3000余支及其它军用物资。

昌都战役的胜利，解放了昌都广大地区，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咽喉要道，促使西藏集团迅速分化，粉碎了帝国主义及西藏上层反动分子企图以军事力量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梦幻。

10月25日凌晨，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复电给彭德怀，批准了他对志愿军司令部的人事安排。

10月25日上午，南朝鲜军1个加强营由仅距大榆洞十几公里的温井向北镇进犯，被志愿军第40军1个团以拦头、截尾、斩腰战术，将其大部歼灭，打响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一枪，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也就在这一天，志愿军发起了第1次战役，东线以两个师钳制敌人，西线集中16个师的优势兵力，准备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当美国人从伪军方面得知中国志愿军入朝的消息时，马上报告“联合国军”总部，麦克阿瑟把报告随手扔到一边，说道：

“几个乡巴佬，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他命令各部队加速前进，一定要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

10月25日下午，毛泽东闻知任弼时病情恶化，便召集周恩来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国家其他领导人，到任弼时家中去看望他。

原来，任弼时在莫斯科经过几个月的治疗，病情有所好转，就在1950年4月回到了国内，向中央要求恢复工作。经过中央研究，同意他每天只工作4个小时。但是，任弼时一工作起来就不分白天黑夜。10月24日夜晚，他的病情再度恶化。

10月25日晚，志愿军第66军军长肖新槐、政治委员王紫峰奉命率领军部及第196师、第197师、第198师由辽宁安东入朝参战，隶属志愿军总部。

10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军区、各省市委：

**美军扩大侵朝并直接侵略台湾，严重威胁我国安全，我国不能置之不理。为了使全体人民正确地认识当前形势，确立胜利信心，消灭恐美心理，各地应即展开关于目前时事的宣传运动。**宣传中应注意之点如下：

一、宣传的基本内容有二：（一）我国对美军扩大侵朝，不能置之不理。（二）我全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应有一致的认识和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

二、为了正确认识朝鲜形势对中国的关系，应说明：

（一）从中国方面说，**中朝唇齿相依，美国侵朝与侵华是分不开的**。1、**美在发动侵朝的同时公开侵略台湾，并连续轰炸扫射我东北边境**。2、美国不顾我国警告和苏联建议，悍然越过三八线而直趋中朝边境。3、从北朝鲜缴获文件及其他方面证明，美国确有侵占朝鲜后进一步侵占我国东北的阴谋计划。4、美国此种计划与以前日本对华侵略历史如出一辙，日本是第一步侵略朝鲜、台湾，第二步侵略东北，第三步侵略全中国。由于这一切，为了我国的安全，不能对美军侵朝置之不理。

（二）从朝鲜方面说，朝鲜人民军在强大美军登陆仁川后的退却是必然的和必要的，但朝鲜人民反对美国的斗争仍然在继续着，经过持久的正确的努力，仍将转入反攻。在此种形势下，我国的支援对朝鲜人民的继续斗争有重大意义，而朝鲜人民的继续斗争，对我国安全亦有重大意义。

（三）美国如果竟敢在此时爆发世界战争，则其失败将更彻底，因为现在美国的军事准备尚未完成，而**和平阵营势力则大于美英势力。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但不能听任美国侵入中朝边界而置之不理。**

三、为了正确地认识美国，应说明：

（一）**美国是中国的敌人**。就目前说：1、美国公然侵略我国的台湾省。2、美国公然轰炸扫射我东北同胞。3、美国不顾我国警告，公然扩大侵略朝鲜，向中朝边境进攻。4、美国公然继续援助蒋介石匪帮。5、美国不让我国参加联合国和安理会及盟国对日委员会等。6、美国扶植并武装日本反动派，积极准备对日单独媾和。7、美国领导帝国主义各国，在外交上与军事上共同压迫和包围我国。8、美国在我国内部进行各种特务破坏活动。

就历史说，**美国亦一贯侵略我国**，例如：（1）1844年与满清订立望厦条约，首创治外法权与利益均沾条款，其后又陆续订立许多不平等条约。这证明美国早已对中国从事政治侵略。（2）1862年帮助满清镇压太平天国，1872年进攻朝鲜（当时为中国藩属），1873年进攻台湾，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进攻中国。这证明美国早已对中国从事武装侵略。（3）1917年蓝辛石井协定承认日本在华特权，1918年巴黎和会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特权，五四运动即由此而起。（4）1925年五卅惨案与1927年下关惨案中参加屠杀中国人民。（5）在蒋介石叛变后的10年内战期间，积极援助蒋介石屠杀压迫中国人民，并控制中国政治经济。（6）在日本侵华期间大量供给日本以军事物资。（7）日本投降后积极侵略中国，订立中美商约，企图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8）日本投降后积极援助蒋介石发动进攻人民的反革命大内战，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

（二）**美国是全世界的敌人**。1、美国是和平的敌人和国际侵略战争的大本营。美国的大资本家以发杀人财为职业，其侵略及于5大洲，积极准备和鼓吹世界第3次大战，压迫和平运动，拒绝禁止原子武器。2、美国是民主的敌人和法西斯反动的大本营。美国国内已成法西斯恐怖世界，特务横行，除大资本家及其走狗外，美国人民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在一切为美国所控制的殖民地，美国均竭力扶植蒋介石李承晚一类血腥独裁者。在一切为美国所操纵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均竭力促使其政治法西斯化。3、美国是文化的敌人和人类精神堕落的大本营。美国统治者迫使科学、艺术、宗教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科学不用于建设而用于战争，艺术不提倡进步而提倡堕落，宗教不参加和平活动而参加间谍活动。美国统治阶级以威胁利诱摧残人民的道德观念，美国侵略者在朝鲜等地的野蛮与希特勒、东条英机无异。

（三）**美国是纸老虎**。美国虽竭尽全力对年轻的小国朝鲜取得暂时胜利，但这也只等于蒋介石占领延安，最后仍然要失败，仍然是纸老虎。美国不但在政治上是孤立的，在军事上亦有严重弱点：1、战线太长，腹背受敌，战线由西欧至东亚，超过希特勒与日本。、2、后方太远，必须横渡大西洋太平洋，不如希特勒与日本。3、士气不高，实战经验不多，战斗力弱。4、同盟者不强，西德日本尚未武装起来，英法意等国现已非军事强国。5、在此种形势下，美国资源的优势不能不受到限制和抵消，且在西欧失败后即将丧失此种优势。6、**原子武器已非美国独有，且不能决定战争胜负。国土愈广，人口愈不集中，原子武器的作用愈小**。

四、宣传的方法，以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和部队内部讨论为主。讨论开始前，应由负责同志召集党内外干部会议作有系统的报告，然后由干部分别在所属部门内作报告，然后举行讨论。对于有代表性的党外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中的爱国分子，应在事先与他们谈通，使他们在社会舆论上起积极作用。在讨论中大体可由朝鲜问题入手，然后转入反对亲美恐美问题。应鼓励各人自由争辩检讨，以求尽量在思想上彻底解决，**使人人对援朝表示积极有信心不怕困难，对美帝国主义表示不共戴天，使亲美恐美情绪与抗日运动中的亲日恐日情绪同样不能容身。**为帮助讨论的进行，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部队均应多出大幅墙报，多作专题讲演，多置有关书报，并可利用适当的实际问题（例如反对奸商投机、奸人造谣、特务活动等），组织街头宣传，及发起自愿的向人民解放军和朝鲜人民写信表示敬意和决心等。在农村中，则应结合当前工作（例如加强地方武装、镇压反革命活动等）来进行简要通俗的宣传。各地文艺界和出版界应大量生产各种艺术作品和小册子，以应宣传的需要。

五、在一切宣传中均应注意保守国家机密，并应注意**防止特务分子故意提出激烈口号造成群众的惊慌和我们的被动。一切负责人不要谈到援助朝鲜的具体方法问题，在被询问时可说我们相信中央人民政府必能决定正确的对策，**我们虽不知道中央决策的内容，但人民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在中央未有新的指示前，在报纸上应多发表反对美国扩大战争侵略朝鲜、台湾，反对亲美恐美以及加强国防和治安的评论、消息和信件，**对援朝则限于发表同情鼓励朝鲜人民坚持斗争，相信必获最后胜利的文字**。

六、本件应在干部和宣传工作人员中迅速详细传达，各地群众讨论中的重要情况望告。

　 中 央

10月26日晚，志愿军第50军军长曾泽生，政治委员徐文烈奉命率军部及第148师、第149师、第150师，由吉林辑安和辽宁安东两地入朝参战，隶属志愿军总部。

10月27日凌晨，毛泽东在对北京市第二届第3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建议中央考虑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铜像的决议案中批示道：“不要这样做。”

10月27日，任弼时的病情越来越严重，逐渐陷入了昏迷状态。

原来在早晨起床时，他突然“啊”了一声，就不能说话了。北京医学界的名流傅连暲、金茂岳、力伯畏（女），还有协和医院的著名教授张孝骞、刘士豪，北京医院的心血管专家吴洁主任，立即为任弼时会诊，诊断结果是脑溢血，而且出血量很大。卫生部副部长苏井观带着针灸学专家朱琏赶来了，他们提出对病人进行针刺急救，征询家属意见。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用茫然的目光看了看昏睡的亲人，说：

“死马就当活马医吧！”

朱琏马上将银针刺入了任弼时的人中，刚一起针，任弼时面部鼓胀的血管立即陷落了下去，潮红的面部色泽瞬间变成了苍白，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在中午12点36分。任弼时与世长辞了，年仅46岁。

10月27日下午，毛泽东约见周世钊、王季范二人，告诉他们“志愿军已经出国”了。周世钊听到这个消息，不无忧虑地说：

“国民党反动统治被推翻，全国得到解放，这是建设新国家的大好机会。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建设，志愿军出兵援朝，是不是会影响和平建设呢？”

毛泽东解释说：

“不错，我们急需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出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6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还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3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毛泽东还说：

“你们都知道，**我是不打无把握之仗的**。这次派志愿军出国，虽然是有人不同意的，他们认为没有必胜的把握。但我和中央一些同志经过周详的考虑研究，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胜利是有把握的。我们估计，**美帝的军队有一长三短。**它的钢铁多、飞机大炮多，是它唯一的优势。但它在世界上的军事基地多，到处树敌，到处设防，兵源不足，是一短；远隔重洋，是它的第二短；为侵略而战，师出无名，士气十分低落是它的致命伤；**虽有一长，不能敌这三短**。**我们要进行持久战，一步一步消灭它的有生力量，使它每天都有伤亡，它一天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天，一年不撤退，就打它一年，十年不撤退，就打它十年。这样一来，它就伤亡多，受不了，到那时，它就只好心甘情愿地进行和平解决。只要它愿意和平解决，我们就可以结束战争，**我们原来是要和平的。”

10月28日，毛泽东来到任弼时家中，仔细端详着任弼时的遗容，直至将遗体入殓。他强忍着泪水，劝慰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要注意身体，把孩子们好好养大，让他们好好学习，长大了继承父亲的遗志。

后来，毛泽东又扶着任弼时的灵柩久久不放，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公祭大会。会场上高悬着毛泽东的题词：

“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1950年11月1日下午16时40分，志愿军第39军用82毫米苏制“喀秋莎”火箭炮，向围歼的目标云山城外围的南朝鲜军第1师阵地进行猛烈攻击，发起云山战斗，亦称云山战役。紧跟在炮火之后，志愿军步兵开始向云山发起冲击，在突破了南朝鲜第1师的防线后，没想到竟与正在和南朝鲜第1师换防的美军骑兵第1师第8团交上了手。这是中美之间在朝鲜战场上的第一次较量。第39军348团2营在一座公路桥上与美国士兵进行了白刃战。第39军116师346团冲入城内，云山城的美军开始向南逃跑，但他们的后路已经被截断了，第39军115师345团抢占了一个叫诸仁桥的公路路口。

11月2日拂晓，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命令其部队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掩护下，全线撤退。

在第39军围攻云山的时候，第40军向宁边发起攻击，击溃了向云山增援的南朝鲜第8师的两个团，并与从泰川撤退下来的美军第24师展开激战，首次缴获了美军的无后坐力炮和火箭筒。

云山战斗共歼灭美军骑兵第1师第8团大部、南朝鲜军第1师第12团一部，歼敌 2046名，其中美军1840名，缴获飞机4架，击落敌机1架，击毁和缴获坦克28辆，缴获汽车116辆，各种炮190门及大量的枪支弹药。

11月2日傍晚，毛泽东致电志愿军总部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他写道：

彭邓，并告高：

一、宋陶（即9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副司令员陶勇——笔者注）先头27军主力（两个师及军部）照你们意见开辑安，其一个师则依高岗同志建议迅开朔州从正面对付大安洞之敌，保障后方交通线，俟任务完成后再开辑安归队。

二、**请注意使用38军全军控制安州、军隅里、球场区域，构筑强固工事，置重点于军隅里，确实切断清川江南北敌之联系，歼灭美2师北援兵力及伪6、7、8师余部，并尽可能向南伸出直到平壤附近。只要此着成功，即是战略上的胜利**。125师，则控制德川据点及顺川、元山间铁路线。我39军、40军、66军及50军主力，则担任逐步地各个地歼灭清川江以北以西之敌伪1师、美骑一师、美24师、英27旅等部。能于半个月内达成任务，即是很好的。以上请按情酌定。

　　 毛泽东 11月2日19时

不久，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他写道：

彭邓并告高：

1. 各电均悉甚慰。**全局关键在于我38军全军以猛速动作攻占军隅里、价川、安州、新安州一带，隔断南北敌人联系，并坚决歼灭北进的美军第2师，此是第一紧要事，其余都是第二位。**

二、伪8师全部及伪6师之19团都在清川江北岸之胡沙洞、凤舞洞等处。只有伪7师在清川江以南之军隅里、松亭、价川等处。

毛泽东 11月2日22时

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革、中国民盟等民主党派、团体和民主人士发表《抗美援朝联合宣言》，全文如下：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的行动正在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安全。全中国人民早已集中注视美国侵略者在朝鲜的行动以及在中国领土领空领海上的行动。

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是无止境的。美帝国主义者在今年6月25日发动侵朝战争，**他们的阴谋绝对不止于摧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他们要并吞朝鲜，他们要侵略中国，他们要统治亚洲，他们要征服全世界。**4个月来的事实，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在美国指使朝鲜傀儡李承晚发动向朝鲜人民的进攻以后，**美国总统杜鲁门随即命令美国海空军到朝鲜进行战争，他同时命令美国第7舰队侵入我国台湾领海，武力干涉我国解放台湾；**他同时命令增强对越南、菲律宾等地的侵略。这些事实，证明了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的目的是要侵略中国，侵略整个亚洲。

从美帝国主义者在6月发动侵朝战争以后，其侵朝空军曾多次侵入我国东北的领空，屠杀我国的人民，炸毁我国的财产。其侵朝海军竟在公海之内炮击我国的商船，破坏我国的航权。到了最近，美帝国主义者的狰狞面目更加暴露出来了。美帝国主义者及其帮凶们的武力侵占汉城以后，一意孤行，不顾我国的警告，越过朝鲜“三八”线，并以大量陆军向鸭绿江、图们江汹涌逼进，直接威胁我国东北国境。

今天的情势已经十分明显了。美帝国主义者正袭用着当年日寇先侵略朝鲜随后侵略中国的故技。谁都知道，朝鲜是一个较小的国家，但其战略地位则极重要。美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的目的，主要地不是为了朝鲜本身，而是为了要侵略中国，如像日本帝国主义者过去所做过的那样。**历史的事实早已告诉我们，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止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援朝鲜人民。**

全国人民现已广泛地热烈地要求用志愿的行动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这种要求是完全合理的，完全合乎正义的。诚如周恩来总理所说：“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这两句话是代表中国4万万7500万人民说的，它反映了人民的意志，体现了人民的要求。中国全体人民团结一致，保卫家乡，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的坚强意志，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摧毁的。

中国人民是酷爱和平的。我们以前一向要和平，我们今后永远要和平。我们要中国的和平，我们要亚洲的和平，我们要全世界全人类的持久和平。我们主张朝鲜问题应当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军应当从朝鲜撤回去。然而美帝国主义者及其帮凶们不但不愿意撤退侵略军，停止侵略战争与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反而向“三八”线以北，向中国的边境鸭绿江、图们江疯狂地发展这种侵略战争，这样就迫使我们认识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如果想要得到和平，就必须用积极行动来抵抗暴行，制止侵略。**只有抵抗，才有可能使帝国主义者获得教训，才有可能按照人民的意志公正地解决朝鲜及其他地区的独立和解放的问题。**正义是在我们方面，是在中国、朝鲜、越南、菲律宾的人民方面，是在全亚洲的人民方面，是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方面。帝国主义侵略者是违反正义的，是丧失同情的，是自陷于孤立的。侵略者必定要走向最后失败，而最后胜利必归于正义的人民。

中国各民主党派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国民主同盟 民主建国会

　 中国人民政协无党派民主人士 中国民主促进会 中国农工民主党

中国致公党 九三学社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1月4日，志愿军在追击中歼灭英军1个榴炮营和美军1个加强连。但紧靠两条腿跑路的志愿军，毕竟追不上机动能力很强的机械化部队。

11月4日下午3时，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提出休整部队，结束第1次战役，准备再战。

黄昏时分，敌军主力已全部撤退到清川江以南。

11月4日夜，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他写道：

彭邓并告高：

1. 据伪总长4日14时50分令2军团称：“为适时地夺回德川、熙川，望第2军团担负此次攻击作战，并限5日12时前提交新作战计划及攻击时间”等语。**敌于收集各部略加整理后有向我军举行反攻之可能，请令我军各部注意，于其反攻时各个歼灭之，尤其注意德川方面。**

二、目前敌各部甚混乱。美2师出动两个团，一在顺川以北，一在顺川布防，平壤空虚。美25师有一个野炮营在新安州，起掩护作用。请令我38军彻底击溃当面之敌，使其组织不成新防线。

毛泽东 11月4日22时

11月5日凌晨1时，毛泽东复电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彭，并告高：

一、11月4日15时电悉。同意你的部署，请你按当面情况酌量决定。

二、**德川方面甚为重要，我军必须争取在元山、顺川铁路线以北区域创造一个战场，在该区域消耗敌人的兵力，把问题摆在元山、平壤线的正面，而以德川、球场、宁边以北以西区域为后方，对长期作战方为有利**。目前是否能办到这一点，请依情况酌定。

毛泽东 11月5日1时

不久，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他在电文中写道：

彭邓并告高：

1. **我38军对当前之敌伪7师部队似尚有机会歼灭其一二个团**，请令该军尽可能争取之。

二、**敌有可能乘我疲劳组织反攻一点亦请注意**，令各部不要松懈。

　　 毛泽东 11月5日上午3时

在抗美援朝第1次战役中，志愿军经过13个昼夜的连续行军、作战，歼敌15800余人，赢得了初战胜利，把进犯之敌从鸭绿江边打退到清川江以南。

11月5日夜，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宋时轮、陶勇及高岗，他写道：

彭邓并告宋陶及高：

1. 各电均悉，部署甚好。

二、**江界、长津方面应确定由宋兵团全力担任，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尔后该兵团即由你处直接指挥，我们不遥控。9兵团之1个军应直开江界并速去长津。

毛泽东 11月5日22时

11月7日，毛泽东重读柳亚子作于10月间的《浣溪沙》一词。

原来在1950年10 月4日、5日晚，柳亚子在中南海怀仁堂两次观看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演出的歌舞剧《和平鸽》，他为演员们精湛的技艺和优美的舞姿所感动，填写了《浣溪沙》一词，并抄送毛泽东，表达了热爱和平、憎恶侵略的强烈愿望。

柳亚子在词前作有小序云：

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演出《和平鸽》舞剧，欧阳予倩编剧。戴爱莲女士导演兼饰主角。4夕至5夕，连续在怀仁堂奏技，再成短调，欣赏赞美之不尽矣！

白鸽连翩奋舞前。工农大众力无边。推翻原子更金圆。

战贩集团仇美帝，和平堡垒拥苏联。天安门上万红妍！

毛泽东重读《浣溪沙》，深为柳亚子的爱国热情和正义精神所感动，恰值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第1次战役胜利的捷报传来，便挥笔写下了《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

颜斶齐王各命前，多年矛盾廓无边，而今一扫纪新元。

最喜诗人高唱至，正和前线捷音联，妙香山上战旗妍。

后来，柳亚子从1951年2月起患脑动脉硬化症，神经衰弱，后又得急性盲肠炎。他由此长期医治，不能视事。1958年6月25日，柳亚子病逝于北京医院，终年72岁。在柳亚子追悼会上，毛泽东赠送了花圈。此乃后事。

11月7日，金日成与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到志愿军总部大榆洞与彭德怀会面，毛岸英第一次担任俄文翻译。

彭德怀介绍了志愿军第1次战役的情况以及发动第2次战役的计划。毛岸英用流利的俄语向苏联大使作了翻译。大使对毛岸英的翻译很满意，称赞毛岸英说：

“你是一个优秀的俄语翻译。”

会谈结束后，大家提议，让毛岸英将会谈内容整理后交给毛泽东。毛岸英马上在办公室的蜡烛下整理会谈记录。

从11月7日开始，原第3野战军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副司令员陶勇奉命率第20军、第27军、第26军共15万人分批秘密入朝。

是日晚，第20军军长兼政委张翼翔率第58师、第59师、第60师及第89师，由吉林辑安入朝参战。

此后，第27军军长彭德清、政治委员刘浩天率第79师、第80师、第81师及第94师，于11月12日由吉林临江入朝参战；第26军军长张仁初、政治委员李耀文率第76师、第77师、第78师及第88师，于11月19日由吉林辑安入朝参战。

欲知志愿军如何再接再厉，朝鲜战局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细细品味毛泽东10月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一文，不禁使笔者想起了他在《论持久战》中引用的“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古语。这句话出自于《礼记·中庸》，意思是说，做任何事情，有准备就可以成功，没有准备就要失败。在《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中，毛泽东首先提出：“**美军扩大侵朝并直接侵略台湾，严重威胁我国安全，我国不能置之不理。为了使全体人民正确地认识当前形势，确立胜利信心，消灭恐美心理，各地应即展开关于目前时事的宣传运动。”**接着，他从“宣传的基本内容”到“正确认识朝鲜形势对中国的关系”，从“正确地认识美国”到“宣传的方法”，一一条分缕析，要求宣传工作要做到：“**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使人人都知道**“美国是中国的敌人”“美国是全世界的敌人”“美国是纸老虎”“使人人对援朝表示积极有信心不怕困难，对美帝国主义表示不共戴天，使亲美恐美情绪与抗日运动中的亲日恐日情绪同样不能容身。”**这便是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豫”，因此，“立”也就在其中了。纵观毛泽东一生，他最大的法宝就是**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理论**使他无往而不胜。抗美援朝不仅仅是派兵入朝作战，更重要的要使中国社会各界人人都觉得抗美有责，个个都是为援朝做事。这样，一场前线将士义无反顾、舍生忘死，后方各界勇于支前、争先恐后的**人民战争**就发动起来了。志愿军在第一次战役中初战胜利，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至于“抗美”到底要抗到什么程度？毛泽东在10月27日同周世钊、王季范谈话时就明确地说过：“**一步一步消灭它的有生力量，使它每天都有伤亡，它一天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天”，“伤亡多，受不了，到那时，它就只好心甘情愿地进行和平解决。只要它愿意和平解决，我们就可以结束战争，我们原来是要和平的。**”那么，无往而不胜的“战神”如何才能**让美军撤退并**“**心甘情愿地进行和平解决**”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第20章**

**“争取在本月内至12月初的一个月内东西两线各打一二个仗，共歼敌七八**

**个团，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间铁路线区域，我军就在根本上胜利了。”**

话说1950年深秋的一天，毛泽东邀请邵力子和傅作义到中南海颐年堂会晤。邵力子、傅作义按照约定时间准时到了颐年堂。傅作义先行下车，然后扶着邵力子下车，毛泽东神采奕奕地迎上前来，和二人一一握手，说道：

“欢迎，欢迎，先生和将军都很准时呵！”

邵力子说：

“主席是珍惜时间的人。”

傅作义说：

“军人第一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第二是以时间的准确为生命。”

毛泽东笑眯眯地说：

“那就让我们只争朝夕地进屋吧。”

三人来到客厅门口，主人示意客人先进，客人谦让着，毛泽东朗声一笑，说：

“客人不进，只有主人先行了。”

宾主落座后，邵力子发现书桌上文房四宝还没有收拾，写好的字幅上墨迹也未干透，就问道：

“主席正在写字？”

“是啊”

毛泽东看着邵力子神秘地笑了一下。邵力子望望毛泽东，一下子还没有反应过来。毛泽东接着说：

“我刚才作了个谜，想请你这位清朝举人给解一下。”

他说着站起身，拿起宣纸递过去，邵力子双手接过，见宣纸上面写着两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治淮”。

“邵先生，我这可是个续字谜啊！”毛泽东说着，拿起一支烟，用火柴慢慢点燃，又悠然地吸了一口。他见邵力子一副既认真又纳闷的样子，便朗声大笑起来，说：“邵先生，我这续字谜，只有两个字。”

说着，他用手指着放满文房四宝的书桌。邵力子顿时大悟，也笑了起来，说道：

“方案！”

“对啊！”毛泽东笑着说：“今天，我请二位来，就是为治理淮河的方案，听听你们的意见。”

他又风趣地对邵力子说：

“先生当年做过西京王。记得我们红军一到陕北，就听到老百姓美传先生是大禹治水。先生重视黄河水利，先生修建了泾惠和洛惠两大渠，还有龙门闸、风陵渡的工程，很浩大嘛。陕西的老百姓至今仍在流传先生当年治水的故事。”

邵力子说：

“主席太过奖了。当时是国民党执政时期，我那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怎能与今天共产党和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相提并论。无足挂齿矣！”

毛泽东说：

“先生在那时的作为，今天看来也确实是难能可贵啊！今天请先生来，一是想听听先生的意见，二是如果先生能离京去实地考察，那是最好不过。这就是我那续字谜的谜底。”

“行，行，可以去考察。”

邵力子连声答应着。毛泽东转过脸对傅作义说：

“将军是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长。虽然将军带兵打仗几十年，但将军博学水利工程，对我国的水利情况是了解的。请将军拟定一个全面的兴修水利方案。要想改变我国的贫困面貌，看来首先要大兴水利建设。能把几千年来的水患化害为利，那可是造福于民啊！”

“对，对！”傅作义也连连点头。

11月9日，毛泽东就第2次战役的方针、部署等问题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并告高岗，他在电文中写道：

彭邓朴并告高：

一、8日15时电悉。目前部署及下一步作战意图，均很好，请即照此稳步施行。

1. 苏联汽车不久可到第一批，损车虽多，是可以补充的。以平均每天损车30辆计，一个月损车900辆，打一年仗也不过损车10000辆左右。并且损坏之车，有些可以修好，有些可以取回若干零件，又可缴获一部分，故汽车是完全有办法的。

三、要修几条（不止一条）宽大公路通达德川、宁远、孟山区域，这是极重的战略任务，后面各路均须修好修宽，请抓紧办理。

四、**争取在本月内至12月初的一个月内东西两线各打一二个仗，共歼敌七八个团，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间铁路线区域，我军就在根本上胜利了。**请高贺用一切可能方法保证东西两线粮弹被服（保障御寒）之供给。

毛泽东 11月9日

11月1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他写道：

彭邓朴：

**美军陆战第1师战斗力据说是美军中最强的，我军以4个师围歼其两个团，似乎还不够，应有一个至两个师作预备队。**9兵团的26军应靠近前线，作战准备必须充分，战役指挥必须是精心组织的，请不断指导宋陶完成任务。

毛泽东 11月12日

11月13日，周恩来起草了一封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以毛泽东的名义给斯大林的电报。毛泽东在审阅电报稿时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据我的观察，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现在我志愿军16个师在朝鲜西北战线方面，已给了敌人第一个打击，已经初步地立稳了脚跟，只要能再给该线敌人（8个师）以一个至两个较大的打击，就能将该线的防御局面改变为进攻局面，而这是有可能的。东北战线方面，我志愿军仅有两个师，敌人（5个师）还很猖獗，现正增派8个师去，准备给敌人一个打击，转变该线的战局。”

11月14日上午10时，毛泽东致电湖北省武汉市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

陶铸同志：

**为防止台湾蒋军可能会乘机向我广东沿海进犯，有增强广东兵力之必要**。为此，必须提前肃清广西匪患：这一方面因为广西匪患到目前为止，仍在以更加嚣张的势头继续发展，而无丝毫减弱之表现，确已十分令中央担忧；另一方面，只有先肃清广西匪患，才能从广西抽出部队增强广东，以应付广东方面可能的事变。希望你接电后，迅即前往广西帮助工作一时期，全力以赴，限期肃清广西匪患。

毛泽东

11月17日，也就是藏历10月8日，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在布达拉宫举行了亲政典礼，17岁的他开始掌管全藏政教事务。达赖喇嘛亲政后，写信给毛泽东说：

“在我尚未成年之时，发生了汉、藏冲突的事情，甚感痛心。如今西藏僧侣人民同声吁请我亲政，实难推却责任，不得已于藏历10月8日亲政，盼望毛主席关怀，施恩于我本人和全体西藏人民。”

11月17日下午，毛泽东就“广东广西的工作安排和兵力部署”致电中南局等：

中南局、中南军区党委会并告华南分局：

1. 军区党委会11月13日的报告收到了，各项计划及布置均很好，请即按此逐项坚决实施。

二、中南局关于广西工作的决议也是很好的，你们派陶铸去广西帮助工作很有必要，陶铸是否已动身去了，如未应速去。我已电叶剑英同志去广西帮助一时期，叶定11月21日动身去，叶不宜离开广州过久，大概在广西住1个月左右即须东返，因此陶铸应在广西久留一会，直至剿匪问题基本解决然后回来。

三、**为了对付敌人可能在广东登陆进犯，必须准备使用5个至7个军**。除广东现有3个军外，拟在5个月后从广西抽出1个军（位于梧州待机），使用陈明仁部当作1个军，以上5个军确定用于广东。此外，准备于明年3月集中的第46、第48两个军拟位于衡州机动位置，依情况需要，可以使用于北方，也可以使用于广东。

四、为此必须用全力剿灭土匪，陈明仁部应加紧训练1个月，于12月20日左右向广西出动参加剿匪，任务完成即开广东。**陈明仁部到广西剿匪考验一次是很必要的**。

五、广东修通几条主要公路很有必要，应立即办理，所需费用由政府开支。

毛泽东 11月17日

接着，毛泽东致电陈毅、饶漱石，他在电文中写道：

陈饶：

戌铣电悉。

1. 你们决定加强华东军区的领导和集中进行工作，陈毅同志住南京主持军区工作，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亦逐渐将一部分支前机关分住南京，同时**加强上海军事指挥，调王建安为司令、郭化若为政委，**这些决定，我们认为是正确的，请即照此执行。

二、目前军事工作极为重要，除军队的整训，海空炮工各兵种的建设，公安部队、地方部队与民兵的建设等项重要工作外，**闽浙两省剿匪工作极为重要，特别是福建匪患必须使用四五个主力师用全力穷追猛打、限期肃清，该省剿匪成绩较他省为差，必须检讨原因。**我提议从现在起，和广泛展开土地改革工作相配合（福建必须迅速实行土改），限6个月内剿灭一切成股土匪，责成叶飞、鼎丞全力以赴，做出成绩。**只要福建的土匪消灭，土改完成，即令蒋介石登陆进犯，也是容易对付的。**

三、**华东一切工作要以美国和蒋介石登陆进犯为假想的基础去作布置**。

毛泽东 11月17日

11月18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并告高岗，他写道：

彭邓朴并告高：

1. **你们释放一批俘虏很对，应赶快放走，尔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

二、敌方对我实力还认为是6万至7万人，“并不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这点对我有利。

三、美、英、法对我毫无办法，悲观情绪笼罩各国，**只要我军多打几个胜仗，歼灭几万敌军，整个国际局势就会改观。**

毛泽东 11月18日

11月19日，宋时轮的第9兵团3个军12个师约15万人，已经全部进入了朝鲜战场，并在东线迅速完成了战役集结。

这一军事行动，美军竟一无所知。美方在战后承认说：“这是当代战争史上的奇迹”！第9兵团入朝后，志愿军在一线的总兵力增加到9个军30个师38万余人，在东西两线上都占有兵力上的优势。

11月21日，毛泽东在志愿军入朝10天战情报告上给周恩来写了两段批语：

周：

**这是老报**，今天再看，他们的意见是对的，**不是换班休整，而是有缺即补，连续作战。请加注意。**12月份，宋兵团须补一批，估计五、六千人，13兵团也许还要补一点，估计四、五千人，共约万人。明年1月起，大约每月须补一万一二千人。请按此筹划为要。

毛泽东 11月21日

请电话询高岗，对宋兵团所要求的棉帽、棉鞋、棉手套、棉大衣，是否已在前送，送到什么程度？

毛泽东

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短评：《斥美国对西藏的阴谋》。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于11月1日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军队的入藏行动是“侵略”。美国政府在11月15日又怂恿萨尔瓦多驻联合国代表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所谓的“中国入侵西藏”提案。

11月22日下午，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乔木同志：

请你负责用中央名义起草一个指示，纠正写电报的缺点，例如：不要用子丑寅卯、东冬江支等字代替月日，要写完全的月日，例如11月22日。署名一般要用完全的姓名，不要只写姓不写名，只在看报的人完全明了其人者，允许写姓不写名，例如刘邓，陈饶等。地名、机关名一般必须写完全，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允用京津沪汉等省简称。还有**文字结构必须学会合乎文法，禁止省略主词、宾词及其它必要的名词，形容词和副词要能区别其性质，等等**。请你为主，起草一个初稿，再邀杨尚昆、李涛、齐燕铭、薛暮桥及其他你认为有必要邀请的同志开一次或两次会，加以修改充实，然后送交我阅。

毛泽东

尔后，毛泽东致电中南局等，他在电文中写道：

中南局，华南分局，广西省委，并告西南局，西北局：

**在时局紧张的情况下，必须限期剿没股匪，加速进行土改，发展地方武装和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我党我军方能取得主动，否则有陷入被动的危险。**福建是和两广同样解放较晚，土匪甚多而尚未肃清的省份，过去福建省委认为今冬明春不能大规模地进行土改，现在他们接受了中央及华东局的意见，决定于11月25日召集地委书记及军分区司令会议，重新布置工作，将土改与剿匪相结合，扩大土改县数至36个县。此种计划很值得广东广西两省仿行，请邓谭、叶方、张莫（邓子恢、谭政，叶剑英、方方，张云逸、莫文骅——笔者注）诸同志加以研究，并提出意见告我为盼。

毛泽东 11月22日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19兵团党委并告各大军区的指示电，他写道：

19兵团党委，并告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华北各军区：

1. 据志愿军司令部11月21日电称，“调来参加出国作战任务的部队，有不少事前缺乏思想准备与必需的物资器材准备。如高射炮14团，由关内只带来40几辆汽车，最近调来5个高射炮营，每营只18辆汽车又大部需要修理，思想无准备，冬装也未发，9兵团及66军，也有同样情况，这对作战是有影响的。请对于将开到东北参加出国作战之部队，先将东北、朝鲜气候及兵要情况、作战情况简要介绍，使其在思想上、物质上先有所准备，以免临时仓促”等语。**你们应在19兵团部队中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要有同美国人作战的高度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克服各项可能的困难，只要能如此，美国人是可以战胜的，美国军队比起蒋介石的某些能战的军队其战斗力还要差些**。至于装备等项待你们到达山东后当为你们解决。

二、**各军区，特别是华东、华北、华南，同样须对部队进行打美国人的教育，提高斗志，准备随时打击侵略者。**

中央军委 11月22日

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各中央局、华南分局和各大军区等指示电，他写道：

各中央局，华南分局，各大军区并转所属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及军区：

据华南情报局11月19日息：“美帝近将派2000余空军人员赴台湾，图假蒋匪名义轰炸大陆。闻台匪现正为此批人员赶修房屋及进行其他准备工作”等情。这是完全可能的，**你们应即加紧准备防空，特别是沪、宁、杭、榕、厦、穗、汕、青、济、京、津等处要迅速准备妥当，战胜敌人的空袭，切勿麻痹疏忽，是为至要。**

　　　　　　　　　　 中央军委 11月22日

11月24日上午，周恩来在政务院第63次会议讨论少数民族问题时发表讲话说：

“孙中山先生曾在国民党第1次代表大会上，就以‘民族自决’的口号把它肯定了下来。**在我们制定《共同纲领》的时候，毛主席曾提出了以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决的原则，**因为这样做对于加强民族间的团结与合作是有利的。现在，从一年来的少数民族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毛主席在当时的预见是十分正确的。**”

11月24日，联合国大会总务委员会讨论决定：延期审理萨尔瓦多提出的所谓“中国入侵西藏”提案。

这一天，麦克阿瑟发出了“**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的命令。“联合国军”在东西两线同时发动全面进攻，目标直指鸭绿江边的朔州、碧潼和朝鲜最高首脑机关所在地江界。

同时，美军侦察机曾两次飞临驻扎在朝鲜平安北道大榆洞金矿的志愿军司令部上空侦察。此前，洪学智副司令员安排1个工兵连，在距离彭德怀的大木板棚办公室不远的山坡上挖了个防空洞，达到了可以工作的程度。

11月24日晚，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人，他在电文中写道：

彭、邓、朴、洪，并告高、贺（即高岗、贺晋年——笔者注）：

1. 你们本日7时的作战部署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照此执行。

二、**请你们充分注意敌人降落伞部队在我后方降落，应控制必要武装力量及汽车在你们及后勤部手里，准备随时扑灭这些空降敌人。**敌人已有一组谍报人员在云山以东地区降落，并称正向鸭绿江边移动，请注意扑灭。

**三、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

**四、此次战役中敌人可能使用汽油弹，请你们研究对策。**

五、**你们释放美俘的行动，已在国际上收到极好的效果。请准备于此次战役后再释放一大批，例如三四百人**。

毛泽东 11月24日22时半

**正如毛泽东所料，美军轰炸机的“斩首行动”严重威胁着志愿军的领导机关，几个小时后便在空袭中使用了凝固汽油燃烧弹**。

**11月25日晨，毛岸英和高瑞欣在美军轰炸机对志愿军司令部的空袭中壮烈牺牲。**

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警卫团5连文化教员的董安澜，曾参加了对毛岸英二人的搜救工作。据董安澜回忆，那一天他正在一个废弃的矿洞里教一排战士们唱歌，突然，5连指导员邵发亮从洞外冲进来，急匆匆地说：

“司令部作战处办公的地方被炸起火！请你立即带一个班上去，把文件抢出来！”

董安澜随即带郭班长和11名战士冲出洞口，远远看见离司令部不远的一座房子被炸起火了。那是作战处在洞外临时办公的地方，房顶上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火势异常炽烈。董安澜和战士们奋不顾身地冲向起火处，冲进房去。这时，邵发亮指导员又跑来说：

“董教员，情况有变！不要再找文件了，房子里还有两位同志呢，得迅速把他们找到救出来！这是101首长（彭德怀的代号——笔者注）的指示。”

战士们心急如焚，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寻找着。

“这里有人！”

火海中有人喊了一声。战士们循声扑过去，只见一位同志倒在墙角下，全身是火。大家一边扑打他身上的火，一边往外拖。

“这里还有一位！”

又是一声呼喊。一位战友正在火堆中边拉边扒。这位伤员被一根带火的房木死死地压在下面。他身上已经烧焦了，脸烧煳了，完全看不清模样。

关于毛岸英牺牲时的一些细节，本传早些时候采用的是曾任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室主任兼彭德怀办公室主任的成普在1972年提供的回忆材料，内容大致如下：

11月25日上午，工作人员在志愿军总部作战室里将第2次战役所有战斗命令下达以后，彭德怀司令员可以休息一下了，他和衣躺在一间小屋的行军床上。毛岸英还在作战室靠北墙的大火炉子前，签收有3个“A”的加急电报。大概在11点前后，有3架美军B-29型轰炸机嗡嗡震响，掠过志愿军总部的上空，向北飞去。作战室的参谋们以为美机是去北面轰炸什么目标，也就并不十分在意。成普却是十分上心，他匆忙走进彭德怀睡觉的小屋，喊道：

“彭总，敌机来了，赶快防空！”

彭德怀睁开惺忪的睡眼，虎着脸，呛了成普一句：

“怕什么啊，你这么怕死呀！”

一句话把成普噎住了。恰在此时，洪学智副司令员从防空洞里跑到作战室来了。他也是看到美机后过来叫彭德怀的。成普就像遇上了救星，喊道：

“副司令员，快把彭总叫起来！”

洪学智掀起彭德怀的被子，伸手就去拉彭德怀：

“彭老总，快快快，快躲飞机去！”

彭德怀笑骂道：

“你这个娃子啊，这么怕死啊！”

“不但我怕死，还怕你死呀！”

洪学智说着一把拖起彭德怀，又在他后面推搡着，绕过毛岸英身后，向门外的防空洞走去。毛岸英这会儿也登记完了电报，伸手从子弹箱子里抓了一个大苹果吃起来。没想到美机又从北边飞回来了。这一次还是美军那3架B-29型轰炸机，它们飞临志愿军总部上空，向总部所在地投下了100多个银白色的亮点。这就是凝固汽油燃烧弹，它是用铝作包皮，在阳光照耀下显得明亮而刺眼。成普大喊：

“不好！快跑！”

他的话音未落，炸弹已经下来了，房顶上落了几十个。顿时，熊熊烈火腾空而起，蔓延成一片火海。成普冲了出去，面部受了轻伤，可是离房门较远的毛岸英和高瑞欣却没跑出来。

毛岸英牺牲时只有28岁，尸体已经无法辨认，只有凭苏联手表残骸才确认是他。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只发现一只很小的帆布包，里面有几件换洗衣服和日用品，一把小剪刀，还有一批他珍爱的书籍。

后来本传在互联网上征求意见时，黑龙江有一热心网友对这个材料中的“毛岸英吃苹果”一说提出了质疑。笔者按照网友的要求又进行了一番考证，结果还真查出了不少问题。关于毛岸英牺牲前的细节，众说纷纭，除了成普的“吃苹果”说，还有曾任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室参谋赵南起的“处理急件”说，彭德怀的警卫员郭逢光的“处理战报”说，以及作战室副主任杨迪（2003年发表《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等多人为适应反毛需要恶意炒作的“蛋炒饭”说、“煮鸡蛋”说、“烤苹果皮”说。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志愿军司令部在毛岸英牺牲后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的造假的问题。

史学工作者**滕叙兖曾研究过毛岸英牺牲时的一些细节，根据志愿军刚刚入朝生活条件极差的情况，他否定了做“蛋炒饭”、吃“蛋炒饭”说和“吃苹果”、“烤苹果皮”说，却支持毛岸英“从彭德怀的床底下拿出鸡蛋”，在很小的手炉里“一个一个地煮鸡蛋”的“煮鸡蛋”说。**在他发表的材料中，尽管有不少自相矛盾的说法，但他的贡献却是揭开了志愿军司令部电报造假的问题。

滕叙兖在材料中是这样说的：彭德怀办公室那个“木棚子陷入一片火海，知道毛岸英没有出来以后，彭德怀吓糊涂了，他痛不欲生，瘫坐在地下，大喊，我怎么向主席交代啊，怎么岸英死了，没法交代啊！这个时候也没必要保密了，他的喊叫，周围人都听到了：岸英是谁啊，是主席的儿子？像徐亩元、杨迪、成普这些干部，此时才突然明白，死者有一人是毛岸英。彭总又讲，我死，也不能让他死呀，我怎么交代啊！我跟主席有担保的。”“出了这么大的事，事关毛主席，当然要开会研究如何向中央报告。上午，彭、邓、洪、杜、解，还有朴一禹，开了紧急的碰头会。”“彭德怀拿笔简单写了几句话，大致意思说：主席，今天敌机轰炸，岸英未来得及跑出来，牺牲了，详情容我再报。其他几位副司令员坚决反对说，彭总，这个事情不能由你一个人负责，要负责我们集体负责，要以志司的名义发电报。”“志司所有的领导都要保护他们的司令员，要集体承担责任。其他领导也在检讨自己，特别是洪学智说，我怎么没有注意到岸英和小高还在里面啊！彭德怀说，我都糊涂了，不知道怎么办好，大伙儿研究一下吧。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取得的共识是：不能如实汇报。”“大家都心慌意乱，这个电报怎么起草，大家研究了几个小时都定不下来。到了中午谁也没有吃饭，下午3点来钟，才勉强凑出这么一个电报来。”“《彭德怀传》的第428页，把志愿军司令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一字不差地登出来了：

军委并高、贺：

我们今日7时已进入防空洞，毛岸英同3个参谋在房子内。11时敌机4架经过时，他们4人已出来。敌机过后，他们4人返回房子内，忽又来敌机4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两名参谋跑出。毛岸英及高瑞欣未及跑出被烧死。其它无损失。

志司 25日16时”

滕叙兖说：“凑出的电报是什么意思呢？第一条，就是说7点钟我们已经下防空洞了，‘我们’是指大家，说明大家都守防空纪律，没说毛岸英没下防空洞，等于给彭总开脱。至于毛岸英同3个参谋什么时候又回到房子里，语焉不详。回去干嘛？没说。那里头有什么重要事啊？没说。为什么司令员没回去，需要他一个翻译去作战室？也没说明白。反正就是去了。美国飞机轰炸时，两个参谋跑出来了，而毛岸英、高瑞欣未及跑出，可能是战争的偶然因素吧。慌乱中的志司领导，包括彭德怀，谁也没有感到这个电报有如此多的漏洞。已经是下午4点了，如果照实说是7点钟轰炸，上述电报那些话就无法自圆其说，所以志司领导就把轰炸时间给延迟到11点，到下午4点钟发电报，还可以说我们下午做了讨论。要不这么长时间你们干嘛去了，这么重大的事不赶快汇报？都不好交待。”

滕叙兖说：“这份电报漏洞百出，周恩来接到这个电报后就觉得有疑点。你看，第一，既然已经开了防空会，7点钟就进入防空洞，毛岸英4人为什么还留在房子里？第二，到11时敌机飞来前，在长达4个小时的时间里，这4个人在房子里干嘛？有什么非常重要的紧急军务要处理？第三，4架敌机飞过上空，4个人已经出来了，为什么不进防空洞而是又返回房子？这个房子到底有什么秘密而要冒死看守? 第四，‘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在战场上谁会抬头去数一数有多少枚炸弹？也数不清呀！第五，说有‘二名参谋跑出’，以燃烧弹投下后的火焰和高温，别说近百枚，仅一两枚、两三枚的威力，屋里的人都要被烧死，怎么可能从屋子里跑出来？第六，在敌机飞临大榆洞上空的紧急情况下，即便作战室有重大机密需要留人值班，彭德怀和志司其他领导也绝不可能让严加保密和保护的‘刘翻译’去啊。真实的情况，只是毛岸英和高瑞欣在房子里头，其他参谋没在屋子里。电报上说‘我们7时已经进入防空洞’，其实7时彭德怀和洪学智还没有进防空洞，他们在半山腰临时掩体里亲眼看到木棚子淹没在火海里。那么为什么说是11时？历史就是这么错综复杂，官方的党史学家也未必看明白这里头所隐藏的秘密。后来有一采访者采访过杨迪，向他求证美国飞机到底几点钟来的。杨迪说，说实话，是7点多钟来的，不是11点，杨迪还留下了文字为证。这里我可以负责任地讲，志司当年发给军委的电报里头有假。**别以为公开出版的历史书都是真的，作为史学工作者就是要去伪存真，还原历史。**”

滕叙兖提倡“还原历史”是完全正确的。其实，要还原历史也不难，滕叙兖在叙述毛岸英牺牲前后一些细节的时候，也有不少相互矛盾的话，去掉那些不实之词，他的一些重要说法是可以揭开这个历史之谜的。请读者注意下面几段话：

滕叙兖说：“邓华（在接到毛泽东22点的指示电以后——笔者注）就报告彭德怀，当天晚上要开个紧急防空会议。由参谋长解方来组织会议，正式开会时彭德怀研究作战没参加，韩先楚到前线去了也没参加，其他人都参加了。邓华、洪学智、解方、杜平这几个主要领导都在，处级干部也参加了。会议决定，明天早晨所有志司的人员，6点起床，天亮之前赶快吃早饭，7点以前务必下矿洞。开完会以后，”“到6点多钟，天蒙蒙亮的时候，首先是杨凤安和成普来到作战室，他俩进来以后看彭总合衣而睡，就看了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要拿出去，因为防空有纪律，军事资料、地图文件等都要收好，而且不能出烟火。所以有的人说作战室‘冒着烟’而被美国人发现，那是瞎扯。他俩看了一圈，出去碰到洪学智，说彭总还躺着。洪学智就说，他怎么还躺着呢，把他叫起来。”

滕叙兖说：“洪学智冲进作战室把彭德怀抓起就往外拽。洪学智犯的‘大错误’就是没有关注到屋里还有两个人，他满脑子想的是司令员不能出事。他把彭德怀拽起来就往外推，彭德怀还不高兴，说你们怕死，你们躲着去，我不怕。在混乱当中，洪学智就光顾着拽彭德怀出去。”“让杨凤安把彭总的铺盖卷、行军床，连同毛笔、墨盒、电报稿纸等办公用品一起，‘强行’搬进防空洞。”

滕叙兖说：“彭德怀被洪学智拽到作战室旁边的山坡以后，还要杨凤安、成普和杨迪，说你们把刘翻译、高参谋都喊出来。但也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彭德怀还没下山进矿洞，还在半山坡上，离作战室不太远的时候，山边的飞机轰鸣声就响起来了。很快飞机就俯冲过来了，直奔山腰上这个木头棚子。要承认美军的指挥系统相当精准，他们认准了这个地方肯定有问题，俯冲之后就投弹，那是凝固汽油弹啊。在这种危急关头，警卫战士把彭德怀和洪学智都推到山坡上的临时掩体里，看着前面那个木棚子着火了。”“真实的情况，只是毛岸英和高瑞欣在房子里头，其他参谋没在屋子里。”

由此可以看出，**毛岸英二人随着彭德怀为部署第2次战役忙了一夜，彭德怀躺到了床上休息，他俩正在处理文件，眼看着极不情愿的彭德怀被洪学智等推出了办公室的木板棚，在不知道防空会议决定的情况下，瞬间便葬身于火海之中**。滕叙兖在研究材料中还曾提到，彭德怀说过他再晚出来十几分钟也会被烧死。这也可以作为上述结论的一个佐证。

**这就是历史真相！至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那些莫衷一是的“蛋炒饭”说、“处理急件”说、“处理战报”说、“吃苹果”说、“烤苹果皮”说、“煮鸡蛋”说，以及志司在电报中提出的“返回房子”说了。因为有志愿军司令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定了调子，所有工作人员必须和司令部领导高度保持一致，谁还敢再说明真相？！于是，当后人问起此事之时，那些司令部里的工作人员就只好胡乱编一个故事罢了**。

再说周恩来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大吃一惊，决定暂时压下这一电报。他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杨尚昆和叶子龙，还叮嘱他们说：

“告诉主席身边的所有工作人员，暂时不要告诉主席。”

这一天，叶子龙给毛泽东送文件，在办公室门口碰上了王鹤滨，他非常郑重地低声说：

“鹤滨同志，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了。毛主席尚不知道，还瞒着他哩，怕他知道后，精神上受不了，这是周总理的指示。”

王鹤滨闻言非常震惊，问道：

“岸英同志是怎么牺牲的？”

叶子龙说：

“敌机飞临上空，其他的同志都迅速躲进了防空洞，他没有去躲避，结果，一颗炸弹下来，正落在他所在的房上，爆炸了……”

11月25日晚，恰逢月圆之夜，志愿军在西线的两个军按照志愿军司令部原先“投入9个军的兵力，以西线为重点，分别在西线和东线对敌人的总攻势发动反攻”的决定，在德川和宁远向南朝鲜的两个师发起猛攻，打响了入朝作战的第2次战役。

11月27日，志愿军第9兵团第20军位于长津湖西侧，第27军位于长津湖北部和东北部，冒着摄氏零下30度的严寒，分别以美军陆战1师两个团和第7师的31团级战斗队为主攻目标，首先在东线向“联合国军”发起了反攻。

在这个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的“长津湖战役”中，9兵团以15万人对美军10万人，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重大的军事胜利。

11月28日清晨，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等，他写道：

彭邓朴洪，并告高贺，宋陶：

1. 庆祝你们歼灭伪2军团主力的大胜利。

二、**目前任务是集中我42军、38军、40军、39军歼灭美骑1师、第2师、第25师等3个师的主力。只要这3个师的主力歼灭了，整个局势就很有利了。**

三、美骑1师（两个团）正向德川、顺川、成川之间调动，目的在巩固成川、顺川地区阻我南进。我42军应独力担任歼灭该敌。

四、美9军团指挥之第2师、第25师，在球场、院里、军隅、价川一带，我38军、40军、39军应担任攻歼该敌。

**这是很重要的一仗，望令各军努力执行之**。

毛泽东 11月28日5时半

11月30日，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举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游行大会，大会致电毛泽东说，全国各阶层都已团结一致，共同为完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到底。

11月30日下午，毛泽东签署中央军委命令，任命刘伯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陈士榘为训练部长，陈伯钧、陶汉章为训练部副部长，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兼干部管理处主任，刘忠为院务部部长。

毛泽东为军事学院题词：“努力学习，保卫国防。”

朱德为军事学院题词：“为建设现代化的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

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等，他写道：

彭邓朴洪并告高贺，宋陶：

1. **请不要提出过冬休息的口号，只在两个战役之间作必要的休息整训。**此种整训只要情况许可，在一个大战役之后，可以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如情况许可则延长，不许可则缩短。部队整训宜在前线适当地点实施，**打残破了的部队，可以在较安全的地点，但以在鸭绿江以南朝鲜境内由各军军部直接掌握和监督为有利。**以上是否可行，请考虑酌定。

二、**此次作战规模很大，东西两线各军伤亡可能超过4万人**，请高岗同志加速对新兵的征集训练工作，争取于12月中旬有几万人补入部队。新兵征训情形望告。

毛泽东 11月30日

1950年12月1日午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等，他写道：

彭邓朴洪，并宋覃（指宋时轮司令员、覃健参谋长——笔者注）：

1. **伪2军团向三登集中，美24师由平壤开三登一带，伪1师现到肃川，有开顺川、慈山讯，美骑1师在顺川、慈山并未过大同江。因此我42军亦不应过大同江，而应在大同江以东向成川、三登一带寻伪2军团残部及美25师作战，从侧面威胁平壤**。请酌定。

二、**美7师主力及伪3师1个团由惠山西犯，企图切断我厚昌、长津间补给线，请宋覃令在厚昌之一个师向东迎阻该敌，务使该敌不能西进。**

毛泽东 12月1日12时

12月1日，战斗在东线的志愿军**第9兵团第27军全歼美军第7师32团，成为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成建制地歼灭美军的唯一战例。**

彭德怀在回忆文章中曾写道：

“全歼美军一个整团，一个人也未跑掉，只有在第二次战役中有过一次，其余都是消灭营的建制多。”

12月1日这一天，彭德怀因为第38军113师在第2次战役中打得很出色，亲自写了一份嘉奖令，他写的是：

梁、刘并转38军全体同志：

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的某些顾虑，发挥了38军优良的战斗作风，尤以**113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三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百余，终日轰炸，反复突围，终未得逞，至昨（30日）战果辉煌，计缴坦克、汽车，即近千辆，被围之敌尚多。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之敌，并注意阻敌北援。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

38军万岁！

彭、邓、洪、韩、解、杜

12月2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彭德怀、邓华、朴一禹等的指示电：

彭邓朴洪解并告高贺：

1日电悉。如果安州、新安州一带之敌确已退至肃川以南，则我西线各主力军应在肃川、顺川之线以北地区调整位置，休息4天至5天，整顿队势，补充粮弹，准备继续作战，配合东线，扩大战果。**如果安州、新安州一带尚有敌人，则应待歼灭该敌后，再作调整。我42军则应待歼灭新仓里之敌后，再行停止**。**大约再看一两天，再下调整令为宜**。

军委 12月2日5时

12月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等，他在电文中写道：

彭邓朴洪并告高：

**在调整部署，休息数天，并弄清敌人部署后，请考虑以4个至5个军攻击顺川、肃川线，以必要兵力突破并伸入该线以南钳制大部敌人，集中主力歼灭顺川、慈山地区之一个美国师（现在是骑1师），夺取顺川、肃川一线及其以南一块地区，然后在该线以南构筑防御阵地，以一部兵力（1个军左右）防守之，主力便可移至平壤、元山间作战**。为此目的，66军似应在此战结束后才能东移。42军则可于休息数天后即向平壤以东三登一带寻求小股敌军作战。以上是否可行，请考虑酌定。

毛泽东 12月2日

接着，毛泽东复电给天津工商业联合会，他写道：

天津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李烛尘先生、副主任委员毕鸣岐先生、朱继圣先生、天津市工商业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游行大会的42989位爱国同胞们：

你们在10月30日给我的电报看到了。你们认清了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反动性质，你们不受他们的欺骗，不怕他们的恐吓，坚决地站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立场上，并在10月30日举行了正义的示威游行，这是值得欢迎的。**美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人民做了很多的欺骗宣传，一切爱国者都不应相信这些欺骗言论。**美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侵略中国的台湾，轰炸中国的东北，并使用各种流氓手段恐吓中国人民，一切爱国者都应有决心反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不受他们的恐吓。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军的英勇行为，是值得赞扬的。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工商业家，凡属爱国者，一致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完全正确的。我**希望全中国一切爱国的工商业家，和人民大众一道，结成一条比过去更加巩固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这就预示着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斗争中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

毛泽东 1950年12月2日

12月2日午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彭德怀、邓华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彭邓并宋覃：

1. **庆祝我9兵团的两次歼敌大胜利**。

二、据新华社驻通化记者报告，**30日下午，侵占惠山镇之敌军搬运物资，有撤退模样，惠山镇以西之新架坡镇敌军已于30日午后撤退，敌军侵入惠山镇兵力约2500人等语。美7师似已从惠山镇撤退**。我26军驻厚昌之一个师，除留一部仍驻该地向东警戒外，主力可以南下作战。

三、**我9兵团除应加紧歼灭被围之敌外，并应准备与必然增援之两个李承晚师和美3师一部作战**。

军委 12月2日24时

12月3日凌晨1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等，他写道：

彭邓朴，宋陶覃并告高贺：

**我9兵团数日作战，已取得很大胜利，不但在下碣隅里地区将陆战第1团及其他数部增援队基本歼灭，而且在新兴里地区将美7师1个多团完全消灭。**敌方在数日内可能增援的部队，**只有两个李承晚师和美7师1个多团。如我军能将这些增援队各个歼灭，在朝鲜战局上将起很大变化**。因此，（一）请宋覃考虑，将26军迅速南调，执行打援任务。（二）**对柳潭里地区之敌，除歼灭其一部外，暂时保留一大部，围而不歼，让其日夜呼援，这样便可吸引援敌一定到来，使我有援可打。如果柳潭里地区之敌被我过早歼灭则援敌一定不来了，他们将集中咸兴一带，阻我南进，对我下一次作战不利。**以上意见是否可行，请宋覃就当面情况统筹决定为盼。

毛泽东 12月3日上午1时

12月3日，毛泽东在“关于改变1951年部队教育时间比例的指示”中写道：

军委曾于本年8月1日颁布指示，自1951年开始，全军教育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现为适应目前形势的发展，需要加紧部队的军事训练，特将部队训练教育的时间重新规定如下：

甲、各军区一般部队训练时间比重为：军事60%，政治30%，文化10%。

乙、离职的速成中学：文化80%，军事10%，政治10%。

丙、某些起义部队：须要继续改造者，可规定政治60%，军事30%，文化10%。

丁、各军事学校：按各学校计划执行。

主席 毛泽东 1950年12月3日

12月3日这一天，麦克阿瑟在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中说：

“**这支小小的军队（**指联合国军——笔者注）**，在目前情况下，事实上是在不宣而战的战争中面对着整个中国。除非积极地、迅速地采取行动，胜利的希望是渺茫的。而实力不断地损耗，以至最后全军覆没，那是可以预期的。”**

尔后，**他马上命令东西两线军队向三八线总退却。**

欲知“联合国军”总退却后，抗美援朝战争能否速胜？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志愿军入朝作战前后提出的战略方针和战役目标，一是因“美军火力配备强”，“先以李承晚伪军为对象”，“**半年后即可尽歼伪军，剪去美帝爪牙，使美帝陷于孤立”**（见9月20日指示电）；二是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歼美军有生力量，迫使它来到谈判桌上；三是释放美军俘虏，“**应赶快放走，尔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见11月18日指示电），以此推动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来一个釜底抽薪，促使美国从朝鲜撤军。尽管在志愿军发起攻击后，第1次战役就遭遇了美军，毛泽东要“**尽歼伪军”**的方针不可能实现了，但仅仅在云山战斗中志愿军就以歼灭近2000人的战绩，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第2次战役尚未结束，麦克阿瑟鉴于美军的重大伤亡，已经哀叹“**胜利的希望是渺茫的。而实力不断地损耗，以致最后全军覆没，那是可以预期的。**”谁能够想得到，战争刚刚进行两月有余，就取得了这样惊人的战果！毛泽东的战略谋划已经初现辉煌！

**第21章**

“**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

**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

话说1950年12月3日晚，毛泽东在菊香书屋会见了来到北京的金日成，在座的还有周恩来、高岗。

此前，金日成先是由朝鲜到达沈阳，又同高岗一起来到北京的。宾主落座后，金日成说：

“我首先代表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无私援助表示感谢！感谢你们派出了中国人民的最优秀的儿女，特别感谢你们派出功勋卓著的彭德怀将军，帮助我们打击美国侵略者。朝鲜人民将世世代代牢记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是你们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予了最有力的援助！”

毛泽东笑着说：

“我们一家人不要说两家话。我们两党两国人民是相互支持，相互援助。”“原先我一直担心两个问题，一是志愿军过江后能不能在朝鲜站住脚，经过第一次战役，这个问题解决了；二是靠现有的装备，能不能和装备现代化的美军交战，交战后能不能取得胜利。现在这个问题也解决了。事实证明，我们不仅可与美军交战，而且能战而胜之，看来原来的担心不必要了。”“目前，战争虽未结束，但胜利已不是空中楼阁。下一步将如何办？是需要我们好好研究的。”

金日成说：

“我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而来的。前几天，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在朝鲜战场不排除使用原子弹的可能。这一消息在全世界各方面引起了恐慌和严重抗议。不知毛主席对此如何看法？”

毛泽东说：

“这是一种恫吓，是赤裸裸的核讹诈。**不要说苏联已经掌握了核武器，杜鲁门不敢冒险打一场原子战争，就是像对付日本一样，也在朝鲜投原子弹，那杜鲁门也没有义务事先通知对方，让对方先做做准备呀！说来说去，杜鲁门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威胁与恐吓。”**“那么中国共产党人会不会被杜鲁门吓住呢？不会的！今天的中国人民，已经是在先进阶级的领导下站起来了的人民，她不会再屈服任何外来的压力。”

他燃着一支香烟，望着金日成，又说：

“具体到朝鲜战场嘛，既然美国敢于诉诸武力，那么中国志愿军就奉陪到底。打了一次战役，二次战役，胜利了，但还不够，还要接着打。你敢越过三八线北进，那我为什么不能跨过三八线南进？”

金日成兴奋地说：

“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看法，应当乘胜前进。中国志愿军打得很英勇，这次歼敌3.6万人，其中美军就有2.4万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

周恩来插话说：

“斯大林同志看到二次战役的情况通报，得知我军三里所、龙源里、松骨峰阻击战的悲壮惨烈，他流泪了。他称赞这是一支伟大的军队。”

毛泽东说：

“这就是中国先进阶级的军队，当她明确自己肩负的使命后，必然是一往无前的！”

说着，他习惯地把手用力往前一推，接着说：

“**战士们是为祖国为人民而战**。靠的是一股气，一股革命的正气。我看志愿军打败美军，靠的就是这股气，美军就不行，他们钢多气少，你看呢，金日成同志？”

金日成说：

“对，志愿军武器装备差，还是打败了美军，靠的是革命精神和无畏的气概。当然，还有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的正确领导，这也是至为重要的。”

毛泽东说：

“还有朝鲜人民军嘛！我们是并肩战斗。”

周恩来对金日成说：

“关于中朝两国军队如何协调统一指挥的问题，彭德怀同志几次来电询问，我看这个问题应该尽快解决好。”

高岗也说：

“是啊，一个战场应统一将令，这样有利于作战。上次我到朝鲜，彭总说，由于**中朝军队指挥不统一，时常发生误会，甚至有时自己和自己打起来，结果却让被围的美军逃跑了。**”

毛泽东说：

“**这个问题要立即解决，虽是误会，也等于是犯罪**。应该建立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部。”

金日成点头说：

“是的。关于统一指挥问题，我的意见是，中国志愿军作战经验丰富，若组成中朝联合军司令部，应由中国同志为正，朝鲜同志为副。这个意见劳动党政治局讨论过，已经同意。”

“啊，那我们就当仁不让啦。”毛泽东说：“**我们这方面准备推出彭德怀同志任联合军队的司令员兼政委**，你们看如何？”

金日成说：

“很好。我们这方面，劳动党政治局决定让金雄同志担任副司令员，朴一禹同志为副政委。”

“那好嘛！”

毛泽东连连点头。周恩来说：

“以后，联合司令部的命令由彭、金、朴3人签署，统一战场指挥。不过，后方的动员、训练、军政、警备等事宜仍需由朝鲜政府直接管辖，联合司令部可以向后方提出要求和建议。”

高岗建议说：

“铁路运输和抢修与战争关系密切，应该归联合司令部指挥。”

毛泽东强调说：

“联合军队司令部，我看应该是有内有外，有合有分。联合司令部对外不公开为宜，仅对内行文用之；另外，**联合司令部仍分两个机构：一个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一个是朝鲜人民军参谋部，合驻一处办公，便于协作、研究解决问题。”**

金日成表示同意。接着双方领导人就杜鲁门和艾德礼在华盛顿会谈进行了一番议论。周恩来说：

“杜鲁门宣布要在朝鲜战场使用核武器，这在国内外引起一片慌乱。英国工党左翼百人签名请愿，要求艾德礼首相反对美国使用原子弹。敌人的日子并非好过啊！”

毛泽东说：

“是啊，英国有个香港利益问题，而绝不是对我们共产党人有什么好感。我看，**美国是不会轻易放弃朝鲜的**。不过，**现在战场的主动权已经掌握在我们手里。**”

金日成说：

“就朝鲜战争的发展前途问题，我想听听毛泽东主席的意见。”

毛泽东掸了掸烟灰，望着金日成说：

“据我看，**战事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出现意外情况，拖长时间。我们至少准备打一年，朝鲜方面也应作长期的打算，并且仍应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你们现在比从前是更强了，不是更弱了。当你们越过三八线直向大邱进攻不计后方空虚的时候，你们是最弱了。现在你们既懂得胜利又懂得失败，有了经验，你们就更强了。”

“是的，你说得对，我们是应该作长期打算，立足长期，争取短期解决。”金日成说：“过去我们的确缺乏长期打算，只想尽快解决，缺乏克服困难的准备，对于美军在仁川登陆，也缺少必要的准备，应该记取过去的教训。”

周恩来说：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我看朝鲜战场再不会有第二次仁川失败了。我们应该加强东西海岸的防御，特别是将来战线拉长以后，应该有备无患，随时准备反击敌人的登陆作战。”

金日成问：

“**假如敌人要求谈判停战，我们如何办？敌人打败了，已经放出了要求停火的空气。”**

周恩来说：

“敌人有可能要求停火。目前印度等13个亚非国家，正酝酿提一个议案，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恐怕核心是先停战，而且要我们停在三八线。”

毛泽东说：

“你们的分析是对的，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美军仁川登陆以后，大军越过三八线北进，为什么不提出停战？现在战败了却要停。要停也可以，但有条件：必须承认应该撤出朝鲜，而首先撤到三八线以南。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美帝如承认撤兵，联合国有可能在同意中苏参加的条件下，主张全朝鲜人民在联合国监督下选举自己的政府。但**美帝和蒋介石一样，诺言、协定都是不可靠的，故应从最坏的方面作准备**。”

金日成说：

“我很赞同您的意见，我们不应给敌人以喘息之机，要乘胜前进，拿下平壤，拿下汉城，迫使敌人从朝鲜撤兵。”

毛泽东：

“我准备立即给彭德怀同志发电，让他派一支部队向平壤前进，相机占领平壤。平壤是你们的首都，收复了这座城市政治意义大。西线部队经过连续作战，已经很疲劳，需要休整一下，也需要补充粮草弹药。”

金日成说：

“我们已就此向各地党组织发出号召，要最大限度地支援中国志愿军，尽可能快地帮助志愿军解决粮草问题，这一点请你们放心。”

周恩来说，他已和高岗商量过，准备在东北召开一个铁路运输会议，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一定要保障铁路畅通，建立一条炸不毁、打不烂的钢铁运输线。毛泽东说：

“**只要运输问题解决好了，我们要人有人，要粮有粮，他杜鲁门愿意打多久，我们就奉陪多久！**”

金日成感激地说：

“毛泽东主席，中国方面对我们的帮助是巨大的，朝鲜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毛泽东把手一摆，说：

“不要感谢，我们是战友嘛！如果要感谢，倒**要谢谢杜鲁门哩，他让我们摸了美军的底，无非是个纸老虎！**”

毛泽东这番风趣的话，使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正是：决胜于千里之外，强虏丧胆；

运筹于帷幄之中，料事如神。

12月4日午后，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及宋时轮等，他写道：

彭邓朴，宋陶覃：

1. 伪首伪3两师因火车甚少其主力由步行撤退，何时到咸兴尚难定。**敌已下令由下碣隅里以飞机撤走被围之美军5、7两团，望宋陶覃迅速控制下碣隅里飞机场不使敌军撤走，并对5、7两团之南退部队予以歼灭，只留下其在柳潭里地区之固守部队围而不歼，以利钓鱼。**

二、请宋陶覃将黄草岭、古土水、下碣隅里、囦水里（囦yuan，古同渊，囦水里位于咸镜南道长津郡西南——笔者注）至柳潭里一带详细敌我情况，防敌飞走部署及打援部署电告为盼。

毛泽东 12月4日13时

12月4日深夜，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等，他写道：

彭邓朴洪并告高贺：

**大体上可以确定平壤敌人正在撤退，其主力似已撤到平壤至三八线之间，其后卫似尚在平壤以北及东北地区。**你们应于明（5）日派1个师或1个师的主力，向平壤前进，相机占领平壤。

毛泽东 12月4日23时半

接着，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了一则关于朝鲜战场战况的电讯，他写道：

【新华社4日讯】本社记者从朝鲜战场发来的消息：在朝鲜人民军与我国人民志愿军大举反攻的情况下，**美国侵略军的第2师、第25师，土耳其旅，李承晚匪军的第6师、第7师、第8师等部，受到了歼灭性的打击，各该部残敌，均向南面狂奔逃命**。在此次作战中受打击较少的美侵略军骑兵第1师、步兵第24师，英澳第27旅及李承晚匪军的第1师等部，则交番掩护，节节南逃。英勇的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全线追击，业已占领安州、新安州、价川、肃川、顺川、成川、江东等城。东线方面，被朝鲜人民军及我国人民志愿军在咸兴北面长津湖一带地区所切断和包围的美侵略军陆战第1师、步兵第7师两个师的主力，已被歼灭一大部分，残敌继续被歼击中。又咸兴向北面增援的敌军，已被数次击溃，并受到了歼灭性的打击。侵占城津、清津及鸭绿江边惠山镇等处的美侵略军步兵第7师一个团及李承晚匪军的首都师、第3师等部，正在慌忙地向咸兴、元山方向逃窜。**东西两线敌军，恐慌万状，急于逃命。平壤城内之敌，正在罪恶地屠杀人民，焚毁物资及该城发电设备，大火弥漫平壤城。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正向平壤方向攻进中**。

12月5日晨，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宋时轮，并告高岗，他写道：

彭宋，并告高：

1. 彭12月4日24时电所述战役部署甚好，望即照此执行。12月4日18时电所述经验总结，亦是很好的。此次**西线歼敌2万余，是一个大胜利**。金日成已回朝鲜，关于方虎山部队的使用问题，请直接向金提出。

二、宋陶覃12月4日22时5分电部署意见很好，望即执行。除歼灭被围之敌及准备打援外，**如能以1个军的主力再歼灭社仓里地区美3师的两个团，则意义极大**。

毛泽东 12月5日7时

12月6日，西线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收复了平壤。

是日晚，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了一则收复平壤的电讯，他写道：

【新华社6日讯】本社记者从朝鲜前线报道：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本日解放平壤。**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侵略军以及李承晚匪军残部，向平壤以南溃退。**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的正规部队，于12月6日下午2时进入平壤城。

12月9日，朝鲜人民军在东线收复元山，切断了敌人陆上退路。

12月11日，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致电彭德怀并报中央军委，他在《第九兵团对东线作战的检讨》中说：

“这次作战打得很不好，不仅未能全歼美陆1师及第7师，反遭巨大减员，严重缩小战力，主要原因是：

一、对朝作战情况研究不够。小白山系朝境最高最寒冷的地方，温度已经降到零下20多度，遍地积雪数尺，山高路滑，咫尺天涯，人烟稀少，一切粮草均需自己负担，国内运输线延长数百里之遥，经常供不应求。部队入朝后，即日夜生活于野外，战时即使有米亦无法煮熟（白天防空，晚上作战），偶尔煮熟送上火线均成冰冻，无法破碎，更无法吃，便造成严重的、普遍的饥饿现象。体力日益削弱，战力随之降低，加上冬装未补齐（部队入朝后，发的东西都无法前运），仅靠薄棉服应付零下二十几度的寒冷，特别是此地最近每夜下雪，衣服普遍湿透，无法烤干，形成大批的冻病、冻僵，直至不少数量已经冻死的严重现象。（例：**某师某团某连，除一个掉队与一个通信员外，全连攻击新兴里敌时，受敌火力压制即卧倒冰地上，但最后打扫战场时，发现全连采取战斗队形，死于该处，细察尸体大半无任何伤痕和血迹**）。担架民夫少，且系临时动员的老百姓，未经必须的教育，大批逃亡，战场伤员无人抬送或抬送不及时，致有大批伤员冻死的极端严重情况。由于敌人沿公路及两侧行动，我围歼敌人时，必须翻山越岭，山上路少甚至无路，各种火炮无法运送参战，弹药运送亦困难……”

二、由于仓促进入战斗，准备不充分，对地形、道路侦察不清楚，特别是敌情不明，以致盲目性的吃亏太大。

三、第26军南调时间过迟，对第二梯队军使用得不及时。

（以下四至六点略）

12月1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他在电文中写道：

彭，并告高：

12月8日18时电悉。

1. **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

二、此次南进，希望在开城南北地区，即离汉城不远的一带地区，寻歼几部分敌人。然后看情形，如果敌人以很大力量固守汉城，则我军主力可退至开城一线及其以北地区休整，准备攻击汉城条件，而以几个师迫近汉江中流北岸活动，支援人民军越过汉江歼击伪军。如果敌人放弃汉城，则我西线6个军在平壤、汉城间休整一时期。

三、明年1月中旬补充一大批新兵极为重要，请高加紧准备。请高、彭考虑是否有必要和可能，从前线各军（东西两线共9个军）抽派干部至沈阳加强管训新兵的工作。宋时轮部目前即须补兵一部，恢复元气，是否可能，请高筹划见告。

四、空军掩护铁道运输线正在筹备，有实现可能，但最后确定尚待商办。

毛泽东 12月13日

12月14日，**美国鉴于“联合国军”在朝鲜的失利，操纵联合国通过了一个决议：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要求各方“立即停火”。**

12月14日这一天，毛泽东给张干写了一封回信。

张干在10月30日给毛泽东的信中是这样写的：

润之吾弟主席惠鉴：

敬启者，近接懋斋、惇元诸弟致汉溟（罗元鲲）先生函，深感吾弟关怀干的生活。干服务教育界42年，小有储蓄，已为去岁秋征（实收谷182石，征去了77石）及今年减退消耗殆尽，不得已来省教书，又复旧病浚发，卧床月余，几无以为炊，幸王省主席奉吾弟之命，厚赈兼金（人民币50万元）。经国万机，不遗在远，其感激曷可方喻？今乡里既不可居，省垣又难工作，6口之家，贫与病迫，无实至为可虑。

本年2月16日，闻吾弟签订中苏条约，当时曾作贺函，闻未收到，兹另纸补呈，敬希钧鉴。专此布谢，并颂政祺。

张干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次仑先生：

10月30日惠书及为中苏条约所致贺函，均已收到。甚为感谢！生活困难情形，极为系念，已告省府有所协助。此复，敬颂

教祺！

毛泽东 1950年12月14日

未几，张干收到了毛泽东的这封亲笔信，全家传阅，欢庆殊荣。他对家人说：“这是一字千金呀！只有毛泽东这样的伟人，才不记前怨啰。”

12月15日，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电示，与朴一禹、洪学智、韩先楚、解方研究后正式决定：放弃原定过冬休整的计划，坚决克服因连续作战部队异常疲劳、兵员不足及供应不足的困难，打过三八线去。

12月17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等，他在电文中写道：

彭并告高及告宋陶：

**9兵团此次在东线作战，在极困难条件之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由于气候寒冷、给养缺乏及战斗激烈，减员达4万人之多，**中央对此极为怀念。**为了恢复元气，养精蓄锐，以利再战，提议该兵团在当前作战完全结束后整个开回东北，补充新兵，休整两个月至3个月，然后再开朝鲜作战**。在此期间内，即**由西线6个军，配合朝鲜人民军，在南朝鲜作战。每一战役，以歼灭美李军1万人左右至多两万人为目标，兵力似已够用**。因为在南朝鲜作战，补给线甚长，好打的战役机会，须经过精心选择和充分准备才能获得，太多的兵力也用不着。只有在进行最后决战的时机，才需要增加大的兵力。如果在两三个月内有使用更多兵力的机会，亦可照高岗同志提议，考虑将杨得志兵团使用上去。但**杨兵团亦须加强装备，补充人员（该兵团11万人，能作战者约9万人）**。如使用该兵团，亦以在明年1月下旬或2月开动为适宜。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毛泽东 12月17日

12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各中央局、各大军区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各中央局，大军区，并转所属各分局、军区，各省市区党委、军区，兵团及军，并告军事学院：

兹将我志愿军38军在第2次战役中的经验总结，转发给你们，这是极重要的经验，望注意研究。**在志愿军的作战经验中证明，我军对于具有高度优良装备及有制空权的美国军队，是完全能够战胜的**。

中央军委 12月18日

电报中所说的38军在第2次战役中的作战经验，是志愿军司令部在12月16日给各军转师、炮司、9兵团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所转述的：一、携带足够干粮是战役顺利进行的主要保证；二、山区路小且窄，团以上部队运动以平行道路并肩前进较好；三、到达攻击位置，军、师、团、营均应组织坚强的观察所，沟通电话，及时了解战场情况；四、迂回部队之先头应加强炮火，遇敌抗阻时，即以炮火轰击，配以小部队围歼或驱逐之，使主力继续前进；五、**为彻底消灭敌人，部队应不怕疲劳，采取大的迂回包围，猛插敌后，断敌退路**；六、**部队发起攻击时，首先以精干部队突破敌阵地，抢夺敌炮兵，使敌失却支援，使我顺利歼敌；**七、**对突围之敌应采取头击、腰击、尾击三种打法，力求先将敌人打乱，再分股分段歼灭之**；八、执行阻击任务时，为减少伤亡，力量部署应采取纵深配备，第一线兵力不应超过三分之一；九、战后组织班排小部队分片搜山，并在交通要道设置拦阻部队，防敌零散逃窜。

12月18日这一天，毛泽东给陈叔通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陈叔通鉴于市场萧条、私营工商业大批停工歇业的状况，直接上书毛泽东，陈述自己的看法，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叔老：

来示诵悉，已告陈云、薄一波两同志酌办。全国有500万工商户，其中商业行户大约有300万，在整个经济事业由旧的轨道转入新民主主义轨道中，当有一大批商行和手工业需要转业和改组，这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应当妥为指导这件事。敬问

安好！

毛泽东

12月19日，毛泽东就镇压反革命分子的问题致电黄克诚等，他写道：

克诚同志并告子恢同志：

12月7日的综合报告收到，很好，你们的方针是正确的。**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使社会各界没有话说**。

毛泽东

据有关部门统计，在1950年这一年，新解放区有近4万名干部和群众被反革命分子杀害，其中仅广西就有3000多名干部被害。

12月19日这一天，西藏上层分子由于在神前打卦抽签决定达赖出走，于是，达赖任命大堪布本珠仓·罗桑扎西、孜本鲁康娃·泽旺绕登为司曹，即代理摄政，留守拉萨，主持一般政务；而达赖喇嘛自己则于深夜2时换上普通衣装，悄然离开拉萨。

后来，达赖在1951年1月2日抵达与印度只有一山之隔的亚东，在那里组成临时政府，主管西藏内外的政教大事。

12月21日，毛泽东关于朝鲜战场的形势和作战部署，致电彭德怀、高岗及9兵团的宋时轮、陶勇，他写道：

德怀同志并告高岗同志及宋陶：

19日24时电悉，答复如下：

1. 在你所述的情况之下，9兵团即在咸兴地区休整，只将重伤病员运回东北，抽出干部回东北带训新兵，较为妥善。

二、杨得志部现己集中徐州、济南间地区，开了干部会，朱总去讲了话。如有必需，3月中参战无问题。目前仍以在徐、济间整训一时期为宜。待要使用之前一个月可开至沈阳、安东间，补一部新兵（该兵团9个师，平均每师只有6000余人，极不充实），如友方装备那时己到，可将装备改换即开朝鲜参战。

三、你对敌情估计是正确的。必须做长期打算。

四、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并企图诱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进行休整是必要的。

五、打法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即目前美、英军集中于汉城地区不利攻击，我应专找伪军打。就总的方面说，**只要能歼灭伪军全部或大部，美军即陷于孤立，不可能长期留在朝鲜。如能再歼灭美军几个师，朝鲜问题更好解决。**就此次战役说，如果发展顺利，并能找到粮食，则春川、加平、洪川地区可能寻歼较多的伪军。

六、在战役发起前只要有可能，即应休息几天，恢复疲劳，然后投入战斗。在打伪1师、伪6师之前是这样，在打春川之前也是这样。总之，主动权在我手里，可以从容不迫地作战，不使部队过于疲劳。

七、如不顺利则适时收兵，到适当地点休整再战，这个意见也是对的。

八、增加汽车，速运棉鞋、大衣、棉衣、被毯，极为必要。请高岗同志设法解决。

毛泽东 12月21日

12月22日，周恩来奉命就联合国14日通过的停战决议发表声明，声明中说：

“**决议提出先停战后谈判，显然是为着美国可以取得喘息时间，准备再战，至少可以保持现有侵略阵地，准备再战。**”“因此，**在没有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做基础，来讨论停战谈判，都将是虚伪的，都将适合美国政府的意图，**而不可能达到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善良愿望。”

12月24日晨，毛泽东的办公室里烟雾弥漫，卫士李家骥已经给他倒了两缸烟灰了，可他还在一根接一根地吸烟，一会儿坐在沙发上，一会儿站起来来回踱步，一会儿又回到办公桌前坐下。李家骥知道他正在思考重要问题，就不敢打扰他。过了一会儿，李家骥见他站了起来，嘴巴动了几下，像是想吃东西的样子，就赶紧凑过去说：

“主席，该吃饭了。”

毛泽东看都没看他一眼，来回踱了几步，又回到办公桌前坐下，拿起铅笔飞快地给彭德怀写了一份电报稿。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

**目前伪军及美军一部在三十八度至三十七度之间站住脚跟，组成防线，对于我军各个歼灭该敌，最为有利**。目前**伪军集中于我有利，分散则于我不利。**因此不但我军于此次战役后收兵休整可以向后撤退一步，使伪军又能集中起来，构成防线，以利下一次歼击，而且对于原定人民军第2、第5军团深入敌后分散敌人兵力的计划，值得重新考虑。该两兵团在此次战役后暂时和志愿军一同休整，不要南进，待下一战役后再行南进，似较适宜。究应如何，请你酌定。

毛泽东 12月24日

他写完了，放下笔，让李家骥叫来秘书，将电文交给秘书，交代说：

“马上发出，等候回电。”

李家骥见秘书转身离去，趁着这个机会劝道：

“主席，利用这个间隙吃饭吧。”

“好，吃饭。”

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李家骥很快就把早已准备好的饭菜端了上来，毛泽东实在是太饿了，他抄起筷子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李家骥忍不住劝道：

“主席，你慢点吃。”

毛泽东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问道：

“怎么还是你值班？”

李家骥说：

“主席，我这是又上一班了，你已经两天两宿没有睡觉了。”

毛泽东吃完饭，一抹嘴，又来到办公桌前。李家骥劝他睡一会儿再工作。他说：

“唉，没办法，还有事没办完。”

他一边看文件，一边问：

“几点钟了？”

“快8点了。”

李家骥回答。毛泽东自言自语地说：

“又过了一天。”

其实是又过了一夜，他把白天和黑夜弄颠倒了。李家骥刚收拾完碗筷，叶子龙来了，吩咐李家骥说：

“聂代总长要来，你安排一下。”

李家骥满脸不高兴，埋怨说：

“主席两天两宿没睡觉了，怎么还安排事？”

叶子龙不客气地说：

“你懂什么，不安排行吗？”

不一会儿，聂荣臻匆匆来了，走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这时，江青从北房里走了出来，问李家骥说：

“主席还在办公吗？”

李家骥回答说：

“正在接见聂代总长，研究朝鲜作战问题。”

江青有点着急地说：

“你们怎么不劝呢？”

李家骥说：

“我们怎么劝也没有用。江青同志，我们说话不好使，还是您说说吧！”

江青停顿了一下说：

“你叫子龙和王医生来。”

聂荣臻走后，江青和叶子龙、王鹤滨几个人轮番做毛泽东的工作。李家骥去为毛泽东收拾烟灰缸和换茶的时候，见江青和王鹤滨正在劝毛泽东休息，毛泽东生气地说：

“我还有事，你们去吧。我也不想这样做，有什么办法呢？是他们逼得我这样，你们要劝就去劝他们吧！”

江青只好退一步说：

“我们不是不让你工作，是怕你累着，那就处理完手头的事再休息吧。”

毛泽东无可奈何地说：

“你们走吧，我会安排好的。”

江青和王鹤滨退出了办公室。王鹤滨回到卫士值班室，问李家骥：

“主席今天生谁的气？”

李家骥说：

“主要是太忙太着急。”

“不对，他怎么说谁逼他，让我们有本事劝他们？”

李家骥笑笑说：

“那是让你劝劝美帝国主义别侵略我们，这样主席就不用忙于考虑打仗的事了。”

王鹤滨拍了拍脑袋，猛然醒悟：

“哎呀！我好糊涂！”

这天上午，机要秘书来过多次，传送电文。大约在10点多钟，毛泽东处理完事情后对李家骥说：

“好，我睡觉吧。”

毛泽东和往常一样，来到院子里，要活动一下再睡。李家骥马上叫来了王鹤滨。毛泽东见李家骥和王鹤滨都在院子里陪着他，便微笑着说：

“王医生，你还陪我呢？有你安排，我一定能睡个好觉。”

王鹤滨说：

“主席，您太累了。”

毛泽东会意地笑笑，说：

“世界头号帝国主义打到我们家门口了，我能睡好觉吗？”

王鹤滨说：

“主席您说得对，工作已经处理完，该睡了吧。”

“好，睡觉去！”

毛泽东一扬手向卧室走去。又一个3天两宿的连续工作终于结束了。

12月24日，长津湖战役结束，志愿军收复兴南，除东部沿海的襄阳外，将“联合国军”赶到三八线以南，解放了三八线以南的瓮津、延安两个半岛。

第2次战役共歼灭敌军36000余人，其中美军24000余人。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取得了由防御转入进攻的主动权，初步扭转了朝鲜战局。

在若干年后，美军战史是这样记载美军陆战1师战败撤退之路的：

“在陆战队的历史上，从未经历过如此悲惨的艰辛和困苦，这简直是一次地狱之行。”

“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在自己的回忆录《北纬三十八度线》中在对美军这次撤退有过这样的描写：

“这是一次漫长而曲折的撤退，一路上战斗不断，似乎是在一寸一寸地挪动。”

战后多年，陆战1师的作战处长阿尔法·鲍泽上校还心有余悸地说：

“幸亏中国人没有足够的后勤支援和通信设备，否则陆战1师决不会逃离长津湖……我相信，长津湖的冰天雪地和中国军队不顾伤亡的狠命攻击是每一个陆战队员心中永远也挥之不去的噩梦。”

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1951年1月1日的日记中是这样评价两次战役的：

“自我志愿军入朝取得了两个战役的胜利以来，我国的地位提高了，说话响亮了，民主阵营的声势也增加了。另一方面，帝国主义阵营则日呈分崩离析之势。无论在美国内部、美英之间、英国内部、英法之间、其他国家与美英之间，其矛盾都增加了，裂痕扩大了。美帝是愈发被孤立起来了。主席决定志愿军入朝之举，实是万分英明的有远见的决定，事至今日则已如黑白之分明。如果当时要让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诚如主席所说，不仅要近视、短视，而且必须远视、长视。决不可以眼前的，忽视了前途、远景！‘高瞻远瞩’盖即指此也。”

12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朴一禹并告金日成及高岗，他写道：

彭朴并告金日成同志及高岗同志：

一、彭朴12月26日给吴周转告金雄等同志电，已阅悉，你们的处置是正确的。

二、在此次战役结束后，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第2、第5军团），均应撤退至利于休整的适当地区，休整一个月至两个月，补充新兵，恢复体力，总结经验，筹备粮弹，修通道路，补齐衣被鞋袜，**整顿纪律，改善中国同志与朝鲜同志的关系（那些以恶劣态度对待朝鲜同志的人们应受到严格批评，重者应予以撤职处分**），改善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严格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好居民群众工作（包括帮助受难人民解决一部分物质困难），并**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动员（不消灭朝鲜境内的敌人不回国）**，为春季作战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

三、现在的形势和11月间的形势相比已经改变了，11月间决定派人民军两个军团深入朝鲜南部的计划，现在应加改变。现在敌人在三十七度至三十八度之间构筑防线，是有利于我军各个歼击的。**美军主力守汉城区域，其一部守浦项、釜山区域，在这两者中间，直至春川、江陵之线则是伪军9个师，这样，就使我军能够不要走很远的路便能找到伪军及一部美军作战，而各个歼灭之。**因此，**人民军第2、第5军团如果现在插入朝鲜南部，威胁敌人后方，就有分散敌人，使敌人变更部署，不敢在三十七度以北地区建立防线的可能，而汉城美军则有放弃汉城集结大田、大邱一带的可能，这样，将使我军作战发生很大困难，不易各个歼灭。**因此，**不但人民军2、5军团现在不要深入南部，而且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在此次战役后，应当后退几十个公里进行休整，使美李两军感觉安全，恢复其防线，以利我军春季歼敌**。此点要使朝中两国各主要干部充分明了。

四、**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

毛泽东 12月26日

欲知毛泽东“**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预言是否准确？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2月3日晚同金日成谈话中说，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放言，在朝鲜不排除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是赤裸裸的核讹诈”。“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威胁与恐吓。”**他还说：“**战事有可能迅速解决”，**美军**“战败了”**要停战。“**要停也可以，但有条件：必须承认应该撤出朝鲜，而首先撤到三八线以南。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未雨绸缪，料事如神，这是毛泽东最突出的特点。难怪他无往而不胜！

**第22章**

**“民主人士到各地去视察，各地不要以此为累赘。让他们去听听农民**

**的诉苦，看看农民的喜欢，我们有些什么缺点和错误，也可以让他们**

**看看，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情。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年难逢。应该欢**

**迎他们去看。”**

话说1950年冬季的一天，毛泽东接到了家乡韶山乡政府的一封来信，他拆开一看，才知道是乡政府因为给自己家划成份的事而犯难了。

原来，韶山乡的土地改革也到了划分阶级的阶段，韶山乡农会主席兼乡长毛寅秋颇感为难，应该给毛泽东家划什么成份呢？按原有财产，应划富农；可是，把富农的成份划在一个革命领袖家，又于心不安。于是，他就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敬爱的毛主席：

家乡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您的亲切关怀下，土改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现在已经到了划分成份、分田的阶段了。您老是知道的，韶山是山多田少，初步推算，人平均9分3左右，不知您老家有几口人分田？特向您汇报，请指示。

乡政府郭秘书看到信上只有寥寥数语，就提醒说：

“那成份的事，还没讲呢。”

毛寅秋说：

“主席一看，就会晓得我们的意思。”

毛寅秋料得不错，毛泽东看信后，就派次子毛岸青回到韶山，传达毛泽东的嘱托：

1、定为富农成份。2、将所有财产和全部土地给农民。3、带来300元，作退押金交给乡政府处理。

另外，毛泽东还让毛岸青交代毛寅秋乡长说：

“人民的政府要实事求是办事，执法不徇私情，照政策办事，人民会相信政府。”

毛寅秋乡长听了，十分感动，都一一按毛泽东的指示办了。

12月29日，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惇元兄：

嘱写的字（为一师书写的校牌“第一师范”——笔者注）给你写了，不知可用否？

临行一信，长沙一信，都收到，很感谢！所说各事都同意，可以做（有些是要逐步地做）。师范教育会议，待与马先生一谈，大略是可以的罢。

晏睡的毛病正在改，实行了半个月，按照太阳办事，不按月亮办事了。但近日又翻过来，新年后当再改正。多休息和注意吃东西，也正在做。总之如你所论，将这看做大事，不看做小事，就有希望改正了。

祝您及您的同事们工作顺利，新年快乐。

毛泽东

接着，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他在电文中写道：

彭德怀同志并告高岗同志：

12月28日20时电悉。同意你的计划。此次战役如发展顺利，以66军或42军占领春川、洪川，以人民军一部占领襄阳、江陵，分储粮弹，准备春季攻势。其他各军，于战役完全结束敌人新部署亦已明了之后，即分置于粮运较为便利地区（不论三八线南北），部署休整两个月。所谓三八线在人们脑子中存在的旧印象，经过这一仗，也就不存在了。我军在三八线以南或以北休整，均无关系。但如不打这一仗，**从12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如我军能照你们目前部署，于**1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则对民主阵线及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大众影响甚好，对帝国主义则给以新的一击，加重其悲观失败情绪。**菲里波夫（即斯大林——笔者注）同志对志愿军的领导认为是正确的，他批评了许多错误的议论，他了解朝鲜作战中的困难，他自动提议增加汽车2000辆，解决你们的困难问题。**军委已通令全国军队（除新疆及西康外），每连抽老兵20人，如进行顺利，可于2月间集中第一批4万余人补充志愿军**。敌军新指挥官**李奇微中将已到汉城，代替已死的沃克中将，他一到就下令美伪军各部死守，不许后退，这对我军寻找伪军及一部美军歼击，甚为有利。**假如他在此次战役后固守汉城不退，则对我更为有利。我们现在不怕敌人固守汉城及三十七度线以北区域，只怕他退出该线而扼守大邱、釜山狭小地区。但后一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你们要准备对付这一种情况。

毛泽东 12月29日

尔后，毛泽东还致电邓子恢、谭政、赵尔陆、苏静，他在电文中写道：

邓谭赵苏：

一、12月24日关于总结秋季剿匪经验的报告收到阅悉，甚好甚慰，已发华东、西南、西北3区参考。

二、对桂粤湘3省剿匪仍望加紧督促，务于5月31日以前彻底完成剿匪任务，使广西的1个军（是否45军适宜）及21兵团能于6月上旬集中梧州地区待命调动入粤，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湖南应准备以1个军至迟于5月间最好能在三四月间集中郴州、衡州线上待命。总之**广东有事须由4野负责独力应付，保证战胜可能入侵之台湾匪军，巩固广东防务，望按此方针筹划剿匪工作及兵力部署。**

毛泽东 12月29日

12月30日，毛泽东致信西藏阿里地方政府代表才旦朋杰、扎西才让，他写道：

才旦朋杰、扎西才让两位先生：

你们的来信，已经收到了。我很高兴知道你们同到达你们那里的人民解放军结成了朋友。**人民解放军开入西藏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西藏人民解脱外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压迫，所以一切开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到处都同西藏人民结成了朋友。**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对待西藏各界人民的办法，已经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司令部的联合布告内说得很详细，现在已命令前线部队将这个布告抄给你们，希望你们用各种方法把它散布开去，并多多地寄到拉萨方面去。你们对这个布告如有什么意见，请告诉我。你们所提出的5条请求，其中第2条已在布告里说明白了。其中第1条，第3条，你们两个邦保（应为本保，藏语“官员”的译音——笔者注）要同当地解放军军官进行和谈，我完全同意。至于西藏高级官员如要进行和谈，也可以把和谈的意思经过当地解放军军官转达给我。其第4条，人民解放军入藏部队都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决不侵扰老百姓。如果西藏官员都像你们一样同解放军合作，那么开进的部队就可以少一些。其第5条，人民解放军官兵的行动，只要不妨碍军事秘密，可以预先通知你们，这件事由当地军官同你们商量办理。

我感谢你们的来信，并问候你们和两个邦保的人民。

毛泽东 12月30日

12月30日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管理部在向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呈交的工作总结报告中，提出把“研究军衔实施的准备工作”列为1951年的工作任务。

这是军队中第3次提出划分等级制度，毛泽东再一次把它压下了。

12月31日，毛泽东读罢杨之华请求他为即将出版的《瞿秋白文集》题词的来信，沉思良久，提笔写道：

“瞿秋白同志死去15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留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

12月31日17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的6个军和朝鲜人民军的3个军团在约200公里的战线上发起第3次战役，向三八线预有防御准备之敌实施进攻。志愿军以42、66军为左翼突击集团，以39、40、38、50军为右翼突击集团，在上半夜突破了“联合国军”防线纵深15至20公里。

1951年1月1日，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辖西藏东部两个办事处28个宗（县），主任为王其梅，副主任和委员中有阿沛·阿旺晋美、平措旺介、大活佛帕巴拉等人。

之后，昌都地区又成立了僧俗人民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工作委员会，以阿沛·阿旺晋美为主任。

1月2日，“联合国军”为了避免其10余万兵力在汉江北岸被中朝军队从右翼迂回包围，开始了全线撤退。

1月2日下午，叶子龙来到毛泽东办公室送文件，他尚未离开，毛泽东指着材料带着怒气说：

“把岸英调回来，他怎么搞的，把材料写成这个样子，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

此时的毛泽东还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调不回来了。叶子龙见他发脾气了，不好再隐瞒下去，只得说了实话。他沉痛地说：

“主席，岸英同志已经牺牲了，这是另一个翻译同志写的。”

突然听到毛岸英牺牲的消息，毛泽东感到万分震惊。他双眉紧锁，眼睛盯着叶子龙久久不动。老年丧子是人生的巨大不幸。毛泽东久久沉默，陷入极度的悲痛中。

叶子龙也不敢多说什么，赶紧从毛泽东的办公室出去找江青，出门就遇到了王鹤滨，他忧郁地说：

“没办法，岸英牺牲的事，毛主席知道了。”

王鹤滨急忙问：

“主席是怎么知道的？”

叶子龙就把他如何送文件，毛泽东看了材料如何不满，自己不好隐瞒，就把毛岸英牺牲的事说了的经过，简单叙述了一遍。

叶子龙见到江青，请她赶快去劝劝毛泽东。二人来到毛泽东身边，室内非常静，几乎连呼吸声都能听到。江青和叶子龙简单汇报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毛泽东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江青也不敢多劝，垂着头，满面悲凉。好一阵，毛泽东轻轻欠身，那身子好像突然沉重了许多，似乎支撑不起来。他又抬抬眼皮，痴呆的目光慢慢地移向茶几上的香烟。他想去拿烟，颤抖的双手几次都抽不出一支烟。李银桥慌忙上前，帮他取出一支烟，又给他点上了火。毛泽东慢慢地深吸了一口，然后又把烟从口和鼻子里慢慢地吐出。不知是烟熏或是过于悲哀，毛泽东的眼睛湿润了，但他没有哭出来，只是“唉”了一声说：

“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又嘱咐了一句：

“这件事暂时不要告诉思齐。”

周恩来获悉毛泽东已经知道了毛岸英牺牲的消息，立即派人把彭德怀1950年11月25日的电报送往毛泽东办公室，**给毛泽东和江青看**。他还附上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但已送少奇同志阅过。**在此事发生前后，我曾连电志司党委及彭，请他们严重注意指挥机关安全问题，**前方回来的人亦常提及此事。高瑞欣亦是一个很好的机要参谋。胜利之后，当在大榆洞及其它许多战场多立些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士墓碑。”

叶子龙将彭德怀的电报和周恩来的信面呈毛泽东，电报和信都不长，毛泽东却看了很久。叶子龙一直静静地站在那里。毛泽东强压着悲痛，只说了一句话：

“唉！战争嘛，总要有伤亡，没有关系！”

老年丧子的巨大悲痛，毛泽东强忍住了。可是，儿媳刘思齐每周末都要回家看望老人，每一次回来，都要问爸爸，收到岸英的信没有？岸英为何几个月不给我来信？翁媳间的每一次见面，刘思齐的每一次发问，对毛泽东来说，无疑是感情的再一次创伤。毛泽东不忍心让年轻的儿媳遭受这残酷打击，为了让刘思齐安心学习，他总是强颜欢笑，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宽慰她。有好几次，他都扳着指头向刘思齐讲述革命先烈的事迹，讲述他们毛家5位亲人为党为人民壮烈牺牲，以及5位烈士生前的经历和牺牲时的情景。可是，刘思齐毕竟还是个才20岁的孩子，根本领会不到爸爸的深意，只接受了老人所说的“干革命就会有牺牲”的道理，至于爸爸的暗示，她根本就没有往这方面想。就这样，毛泽东始终没有说出他们家的第6位烈士，他不忍心亲手把这一层包含着噩耗的薄纸撕开。

毛岸青知道大哥牺牲的消息后，非常痛苦。他想起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大哥，一起流落上海街头，一起携手在苏联学习进步，从今往后，再到哪里去找多年形影不离、关心他、爱护他的大哥呢？毛岸青悲痛难抑，他的精神分裂症又严重了。

有一天，王鹤滨走进卫士值班室，看到毛岸青与几位卫士在说话，毛岸青说：

“你们说，毛主席伟大，我是他的儿子，伟大不伟大？”

毛岸青这些病态的语言成为年轻卫士们取笑的话题。作为医生，王鹤滨则感到心情沉重。毛岸青见王鹤滨来了，高兴地说：

“王医生，你对我最好，为什么别人对我都不说真心话？”

此时，毛岸青尚能清楚地回答医生的问话，可是不久，情况又严重了。一个护士告诉王鹤滨说：

“他没有病，他告诉我，这些病都是他装出来的！”

毛岸青在行动上也出现了严重问题，在中南海的岸边马路上散步时，必须跟上两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在两侧保护，不然，他就往水里跳。王鹤滨问他：

“岸青同志，你怎么安定不下来呀！你要控制自己才好，怎么能往水里跳啊？”

毛岸青认真地说：

“就是脑子里的那个小家伙作怪，他老是对我说：‘跳进水里去，跳进水里去……’我没有办法摆脱他；可那个小家伙有时也好，对我有说有笑，没有他我也感到寂寞，又离不开他。”

说完，他马上又侧耳在听什么，眼神固定在空中的一个地方。

后来，毛岸青见了王鹤滨也不再理睬，完全被他脑子里“小家伙”控制了，他看王鹤滨的目光是那样的淡漠，就好像是从来没见过的陌生人一样。毛泽东问王鹤滨：

“王医生，岸青的病情怎么样？”

王鹤滨说：

“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

毛泽东忧虑地问：

“那怎么办？”

王鹤滨果断地说：

“需要送医院治疗！”

毛泽东沉思了片刻，手里拿着的一支烟，在指间滚动着。自言自语地说：

“岸青需要住院治疗，去哪里好呢？”

又思考了一会儿，他对王鹤滨说：

“我本来不愿意因为自己的孩子有病，去麻烦苏联政府。”

又顿了一下，他接着说：

“我再考虑一下……”

结果，毛泽东不得已还是送这唯一的儿子去了苏联。毛岸青在苏联一直待到1958年6月以后才回国。之后又到青岛去疗养。

再说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问题复电给华北局并告绥远省委：

华北局并告绥远省委：

绥远省委关于冬季工作补充指示及华北局所提的几点注意，中央均同意。惟在绥远补充指示第6点所指出的必须掌握的3条原则中，应增加一条“坚持保存富农经济的方针，富农所有的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这一条是今后减租、土改中必须坚持的，这与你们规定的调剂富农所经营耕种之公地也并无矛盾。

中央

1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各大军区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各大军区并告志司，9兵团：

兹将华东、中南两区12月30日对其所属的指示电发给你们参考。**此次在全国范围内征调老兵（除新疆及入藏军），不但对志愿军的补充有极大意义，对整个人民解放军亦有极大意义，因为这样就使整个人民解放军的各部分均有志愿人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这件事的教育意义是很大的。请各大军区均认真进行这一征调工作，按时完成任务。

军委 1月4日

1月4日这一天，在朝鲜战场上，中朝军队解放了汉城。

1月5日，中朝军队渡过汉江。

1月6日，毛泽东派人把中共中央华东局给所属党委的关于土改的指示送给黄炎培看。

原来在1950年底，黄炎培收到江苏许多地主写来的告状信件，信件中说“斗争过火了”，“偏差很大”，要求“和平土改”等等。黄炎培由于不明真相，他怀着不安的心情，向毛泽东转达了这些信件。

黄炎培看了毛泽东送来的文件，提出要亲自到苏南去看一看。毛泽东十分尊重他的愿望，同意他去做实地考察。

1月7日，中朝军队突破了三八线敌军防御，将“联合国军”驱赶至“三八线”以南，前进80至110公里。

1月8日，第3次战役结束，此役共歼灭敌军19000余人，先后解放了仁川、汉城。

中朝军队在追击战中虽然没能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但却迫使“联合国军”退守至“三七线”附近，粉碎了敌人固守三八线，重整败局，准备再犯的企图。

1月9日，毛泽东在给邓子恢、谭政、赵尔陆，并告叶剑英、方方的指示电中写道：

邓谭赵，并告叶方：

1月6日电悉。

1. 广西方面剿匪进展顺利，据陶铸说3月以前南北两重点区剿匪即可完成。似此45军应即于3月内集中梧州整训，湖南的46军应于2月内集中郴衡（郴州、衡阳——笔者注）线上整训，只要这两个军能于2、3月内集中上述地区，就可应付万一。

二、江西南部的48军情况如何，如有紧急需要，该军是否亦可向广东调动？盼告。

三、21兵团在广西南北两重点区剿匪工作完成后，如广东方面无紧急需要，应开到广西西北部剿匪以求锻炼，否则亦应集中梧州整训，究应如何届时再做决定。

四、广东剿匪工作现在是否已特别抓紧进行，何以很久没有剿匪成绩的报告？请叶方检查电告。

毛泽东 1月9日

1月10日，毛泽东给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苏南区委书记陈丕显写信说：

“黄炎培先生收到许多地主向他告状的信，我将华东局去年12月所发关于纠正肃反工作中缺点的指示及1月4日关于纠正土改工作中缺点的指示送给他看，他比较懂得了一些。黄先生准备于本月内赴苏南各地去巡视，我已嘱他和你们接洽，到时望将全面情况和他详谈。”

毛泽东在黄炎培临行前，特地去看望了他，告诉他说：

“你去看看很好，可以听到各级领导干部、农民和地主富农3方面的意见。对于苏南已土改地区，可择好者、坏者各看一二考察之。”

后来，黄炎培到了苏南，经过半个月的考察，心里亮堂了，他在上海工商联举行的大会上兴致勃勃地说：

“新中国人口中80%的农民翻身了，组织起来了，真正扬眉吐气了，表明新中国的确站起来了。”

1月14日，毛泽东复信给1950年自新加坡归国定居的新民学会老友李思安，他写道：

思安先生：

两次来信，均已收到，甚为欣慰。同意你来北京，如果你愿意和蒋竹如同学她们一道进革命大学学习一时期，则可以进该校；否则另想工作办法。来时可持此信向中共中央统一战线部李维汉部长接洽入学或工作问题。此复，

顺致敬意

毛泽东 1月14日

后来在1951年9月，经李维汉安排，李思安参加华北大学政治研究院第3期学习班学习，毛泽东接见了她和蒋竹如、戴毓本、周敦祥等。毛泽东在上述信中对李思安的“先生”之称，显现了他对李思安的尊敬之情。

1月1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转金日成，他写道：

“**今后敌人统帅部的方针有两种可能。（一）在中朝两大军队压力下，略作抵抗，即退出南朝鲜。**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我们的充分准备工作的结果，因为敌人知道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我们的军事力量更加强大了，敌人才知难而退。（二）**敌人在大丘、釜山地区作顽强抵抗，要待我们打得他们无法再打下去了，方才退出南朝鲜。**如果是这样，我们必须做充分准备才能再战，否则就会重复去年6月至9月间朝鲜人民军曾经犯过的错误。有一种可能，即客观形势迫使我们在2月间就要打一仗，打了再休整，再去完成最后一战的准备工作，这一点也要估计到。”

次日，毛泽东又把这个电报转发给斯大林。

1月15日，毛泽东给教育部长马叙伦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夷初先生：

关于学生健康问题，前与先生谈过，此问题深值注意，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的解决此问题。中央华东局1月11日电报一件附上请察阅，其中第三项即谈到此问题，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请与各副部长同志商酌处理为盼！

敬礼

毛泽东

1月16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并告饶漱石，他在电文中写道：

陈毅同志并告饶：

寒午电悉。

1. 同意你的第一步和第二步计划，福建有4个军已很够了。厦门必须确保，有31军全部位于厦门及其附近当能担负这个任务。该军战斗力如何盼告。

二、**厦门必须多储粮弹，布置积极防空（不是消极防空），对守军指战员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加强纵深工事，务必长期确保厦门。**

三、**空军准备赴朝鲜参战，不可能顾及华东。**

四、除福建首先是厦门为敌人进攻重点已有部署外，江浙两省鹭海亦需准备对付敌人进袭，因此24军应在常州地区照常整训，不要去福建。华东全军除剿匪者外，均须提高警惕，加强整训，准备对敌。

五、请督促福建担任剿匪的4个师2个团积极动作，每星期要有成绩，成绩多者应受奖励，少者应受批评，犯错误应受处罚，务必早日肃清匪祸。

六、**华东全军应完全自力担负歼灭蒋匪进攻部队，不要希望外援**。

七、**江浙散匪必须限期肃清**。

毛泽东 1月16日

1月17日，毛泽东在给张宗逊、并告习仲勋及贺龙、邓小平的指示电中写道：

宗逊并告仲勋及贺邓：

1月9日电悉。同意你的提议，用青海骑兵支队携带一个半月的粮食配合西南军队入藏，到拉萨及日喀则后由西南负责解决给养问题。请即照此作准备，并请注意：一、**从青海藏人中招收少数志愿兵，例如二三百人马，给以训练武装，加入骑兵支队**；二、班禅集团随军入藏的各项准备工作；三、该支队受18军指挥，并编入18军序列。

毛泽东 1月17日

接着，毛泽东将中南局转报的湘西第47军报告，转发给各中央局和分局负责人，他在批语中写道：

饶陈，邓谭，邓贺，习张，薄聂刘，高贺，叶方诸同志：

顷接中南局转来湘西47军关于镇压反革命情况的报告，在湘西21个县中杀了匪首恶霸特务4600余人，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华北新区约有2000万左右人口是在1949年及1950年两年内用比较和平的方法分配土地的，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至今这些地方的地主威风还有很多没有打下来，贫苦群众不敢抬头。**一贯道等会门甚为猖獗，有众200余万。故现在须重新提出镇压反革命的问题。而在**华北老区及东北老区则因对反革命镇压彻底，人民高兴，生产积极，匪患绝迹。**当然，**我们不应重复华北老区在1946年及1947年许多地方所犯过的乱捉乱杀错误，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各新区必须注意这一点。**只要不杀错，又注意策略（事先事后向各界人民多做宣传解释工作，注意时间地点，分期分批，分军队地方等等），**对于真正的匪首恶霸及坚决的特务分子，必须在人民群众拥护的基础之上，坚决地处以死刑。**特别是那些土匪猖獗，恶霸甚多，特务集中的地方要大杀几批。**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只要我们不杀错，资产阶级虽有叫唤，也就不怕他们叫唤。**现当反美土改两个高潮的时机，请你们抓紧此事，善为处理。湘西四十七军关于镇压反革命情况的报告附后。

毛泽东 1月17日

1月18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大使袁仲贤向中央报告说，在亚东滞留的西藏达赖喇嘛临时政府有到北京谈判的动向与要求。

原来，达赖喇嘛在亚东收到了毛泽东通过袁仲贤转给他的信，毛泽东在信中祝贺达赖亲政，并希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毛泽东的信使达赖及其大多数随员深受感动，经过多次协商讨论，达赖喇嘛在1月18日这一天，派曲配土登和扎萨索康由亚东赴印度，给驻新德里的中国大使袁仲贤带去了哈达、礼品，呈交了达赖喇嘛、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官员会议签署的致中央人民政府的3封信。达赖在信中说：

“过去，我年幼未掌权期间，藏汉之间友好关系屡遭破坏，对此深感遗憾。近日已通知阿沛及随员从速赴北京。但因路途遥远，不易及时赶到，力争取时间，我们将再给阿沛派去助手，经印度前往北京。我现派出信使扎萨素康苏巴和堪仲曲配土登。他2人带去全体噶伦、西藏会议及人民的详细书面报告，向您呈报。请您将增进藏汉友好关系的纯正善良愿望，向尊敬的毛主席及时转呈。并请及时回复，以便使我放心，附赠哈达1条，上等地毯1床。”

1月19日，毛泽东在审改彭德怀准备在中朝高级军事干部联席会议上的报告时，特意加写了一大段话，他写道：

“**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和人民军，在朝鲜五年来的斗争中有了伟大的成绩，他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了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权，建立了英勇的人民军，和苏联、中国及其他人民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现在又正在和美国侵略军及李承晚匪军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因此，**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的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得到。”

尔后，毛泽东还特意用电报把这段话转告给志愿军党委。

1月19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党的第2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与会代表，并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中国共产党第2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是1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出席和列席这次会议的有：华东局的陈同生、刘仁寿、李宇超、史永；中南局的张执一、饶彰风、周季方；西南局的程子健、杨松青；西北局的汪锋、范明；华北局的平杰三、李乐光、崔月犁、李之楠、范新三、刘洪涛；东北局的王光伟；全国政协王伯评、张尧民、马正言、马冠英；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杨静仁、刘春；政务院党组的于刚；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分党组的陈于彤；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分党组的吴凡我；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分党组的何成湘；监察委员会分党组的张鹏图；中央人民政府党委的梁光；中共中央青委的高棠、唐亮；中共中央妇委的蔡畅、罗琼；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的刘华峰；华北革命大学的崔仲远；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杨翊；中央政治秘书室的田家英。中央统战部出席和列席的有：李维汉、徐冰、廖承志、连贯、童小鹏、金城、张力之、夏英喆、程绯英、孙超、王伟业、邓巨云、王育平、鲁明、石磊、许立、李启薪、陈华、洪水、肖贤法、王福林、张铁生。各地代表19人，中央和国家机关代表20人，中央统战部22人，共61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有两个：一、反美帝统一战线；二、帮助民主党发展组织问题。会议由李维汉主持并致开幕词。

在谈话中，代表们汇报说，工商界、上层知识分子及宗教界均已先后参加了抗美援朝运动。毛泽东说：

“对佛教问题的处理，要研究一下，要使他们参加到运动中来。佛教改革如何作，要他们里面的开明分子商量一下。他们中有人说，他们没有信佛教的自由，庙都被占了。信佛教的人也不少，不要不理会。北京市恐怕要给他们腾出几个庙来，五台山关系蒙、藏两个民族，恐怕要重修一下。”

他问起西北、西南抗美援朝运动的情况，西北、西南的代表回答说，运动已在大城市及部分小城市中展开。毛泽东说：

“**应该趁此时机展开，这是一个极大的教育。小城市如天水的商人最近曾有电报给我，说他们已经举行了游行示威。这次运动应普遍开展，普及到所有的工厂和农村，使得家喻户晓，大家都参加进来。”**

在谈到运动如何进一步开展时，毛泽东说：

“可找几位这方面的负责同志谈谈，好好研究一下。”

有代表反映，在朝鲜战争中，特别是美帝在仁川登陆后，谣言较多，思想混乱，当时我们在宣传上还做得不够。毛泽东说：

**“在宣传上应当采取攻势，对特务造谣，镇压一下好。反美、土改、镇压反革命，是当前三大运动。**”

中南代表反映，在土改中，农民进城捉人影响工商业。毛泽东说：

“不可不捉，不可多捉。匪首恶霸是要捉的，但应合法地捉。”

中南和两南代表报告，武汉和西南设立了城市联络组和减租退押调处委员会，作为适当处理土改和减租退押、城市联系问题的机关。毛泽东说：

“设立这样的机关好，在几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都要设立（县城是否设立，可以考虑），并且民主党派参加，由市政府管理，区别可捉者捉之，不可捉者则不捉，双方兼顾，合理解决，以免发生无政府状态。退押是要退的，也可经过这类机关商量。退多退少，适当处理，能多退则多退，不能多退则酌量少退。”

他问到华东情况，华东代表回答，苏南各地现在情况好一些。毛泽东说：

“黄炎培先生准备去苏南看看土改，我向他说：你们去看看很好，可以听到各级领导干部、农民和地主富农3方面的意见。”

各地代表反映，地方上有些负责人对民主人士去视察尚不免有所顾虑，毛泽东说：

“**民主人士到各地去视察，各地不要以此为累赘**。让他们去听听农民的诉苦，看看农民的欢喜。我们有些什么缺点和错误，也可以让他们看看。**这是一件有益的事，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应该欢迎他们去看。**”

有地方代表反映，对于民主人士的视察和批评，缺乏积极的欢迎态度，毛泽东说：

**“分土地，镇压反革命，发动群众，都是好事。土改一项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都没有做过，我们才做。**我们做了什么坏事情呢？有什么怕人家看的呢？10个指头有9个是好的，最多只有1个指头不好。你们对民主人士不要估计不足。要知道**除了恶霸、匪首和特务分子以外，对于工商业家、宗教界、校长、教员、开明士绅和爱国分子，我们都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团结和教育他们，决不能置之不理，**而要采取积极态度。这个办法屡试屡验，结果总是好的。一切消极态度都是不对的，**有话应当让他们说，写万言书也好，我们可以给大家看看，好的接受，不好的解释。有人看到毛病要骂怎么办？共产党连帝国主义都不怕，还怕人家骂？**对民主人士要进行教育，并让他们参加活动。如果不进行教育，有事不让他们与闻，这是不对的。”

关于统战工作会议的第二个议题，即各民主党派组织的发展问题，毛泽东说：

“这一问题要好好解决一下，不然我们所做的和所讲的不一致，下面同我们不一致，就不好。去年说要巩固，今年说要发展，如果今年还只是一个巩固，那是不行的。因为社会上有他们的阶层和人物存在，所以就应当发展。中国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所有民主党派不到2万人，今年发展一倍也不过4万人，并不算多。这个问题应当写出几条，指示一下，应该在运动中使民主党派进步，放手让他们去做，好处多于坏处。这是积极的有益的方针。”

各地代表反映，关于民主党派发展问题，有些地方干部思想上还有若干阻碍，如果没有党委有力的支持，就不易贯彻。毛泽东说：

“应该使全党了解，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是可以进步的。**这次绥远23兵团已经调到冀中，这个部队的军长、师长都是原来的人，过去和我们打过很多仗，连这个部队都可以进步，为什么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就不可以进步呢？我们应采取积极态度去办，不要怕麻烦。要使他们了解抗美、土改、肃反是必要的，并且使他们参加。**搞国家政权总是有麻烦的，怕麻烦就不要政权好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过去找他们来都不来，现在来了，你们又怕麻烦。”

李维汉提到，有关统战部门本身的工作还缺乏一个章程，此次会议准备拟出几条，毛泽东说：

“对统战部的编制、任务、范围和作法均有所规定，这是好的。直到地委一级均应有统战部门的组织才好，是如何办，也研究一下。”

有代表反映，主席去年说过，注意统战工作的，在党内还是少数，这个状态，今年在若干地区没有多大改变。毛泽东说：

“这个少数派是正确的，只要坚持土改与肃反，这就不是右倾，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要用积极态度去组织民主人士、民主党派，教育他们，使他们参加斗争，带领他们共同前进，这对劳动人民是有益的，对进入社会主义是有益的。少数派会慢慢扩大，主要依靠好好说服人家。应当每年开两次统战会议，一次大的，一次小的，各中央局至区党委都应如此。**不要怪别人，只怪你们自己没有招兵买马、积草囤粮。不要使自己陷于孤立，要好好做出成绩来给大家看。**你们要很好地取得党委书记和组织、宣传等部门的帮助，善于经过党委和党委负责同志，把我们的国家建设起来。你们当中要出些专家，要熟悉人物和历史，精通此中门道。”

1月2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转发河南省委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和给中南局的电报。

中共河南省委1951年1月13日向中央的报告说：河南省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纠正右倾倾向后，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一重大的革命行动，在社会各方面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巨大反响：工农基本群众很高兴；地主阶级不再气焰高涨；民主人士中除左倾者积极拥护外，另一部分表示“摸不着底”，缄默寡言；工商界也表示沉默、小心，有“莫谈国事”之味；城市学生和机关新干部中，也有些震动。而有些地区的领导已为胜利所迷惑，开始出现不清醒的现象。根据上述情况，省委决定一般停止逮捕，杀人要更加讲究策略，严禁草率从事的现象。该放者经过一定手续，通过群众，迅速处理释放，有意识地把空气松弛一下。同时结合抗美援朝及土改等群众运动，广泛进行宣传工作，讲明政策，说明理由，稳定各阶层群众。但对漏网的反革命分子，则继续追踪缉捕，务使归案。

毛泽东在批语和电报中是这样写的：

一

华东局，西南局，西北局，华北局，东北局并请转发所属省市区党委：

我们认为河南省委1月13日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报告是正确的，特发给你们参考。我们希望各省委市委区党委都有一个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总结性的报告。

中央 1月21日

二

中南局并转河南省委：

我们收到了河南省委1月13日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报告，我们认为这个报告是很好的，业已转各中央局及各省市区党委参考。请中南局亦将这个报告用电报转发湘鄂赣粤桂5省参考，请这5省每省写这样一个总结性的肃反报告。

中央 1月21日

1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在给陈毅并告饶漱石的电报中写道：

“一、同意即将25军开往福建，使福建共有4个军。

1. 浙江的21、22两军，上海附近的23、24军，照你们部署不变，浙江加紧督促剿匪，务于2、3两月内完成任务。

三、**杨得志部准备入朝参战，但2野3个军已集中河北，第2批3个军亦可于6月以前集中河北。如江浙有事，可给你们3个军使用。但你们应尽现有力量加强整训，准备独力歼灭台匪可能的进犯。**”

接着，毛泽东起草了关于镇反部署给上海市委的电报，他写道：

上海市委，并告饶陈：

你们1月6日关于1950年11月12月的综合报告，由华东局转来，业已收到，甚好，甚慰。在这个报告中提到了今年一二月份的几项中心工作，也是好的。其中说到你们准备在1月份中给予反革命分子以有力打击，望你们对此进行周密的侦察布置。布置好了，同时动作，做一次准确的逮捕。然后好好清理审讯，处决一大批真正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请你们在华东局直接领导下，斟酌情形，妥善处理。南京方面，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

毛泽东 1月21日

1月22日，毛泽东将对西南局《关于城市工作会议报告》的批示发给邓小平等人：

小平同志并告漱石、子恢、仲勋、一波、高岗各同志：

1月8日综合报告收到阅悉。方针正确，成绩很大，甚慰。你们的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开得有成绩，甚好。假如可能的话，在今年5月1日以前，请你再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对城市工作，主要是对工会工作，对工商业的领导方向，和对城市政权问题，加以深入研究，并做出某些决定，为四中全会讨论工会工作准备材料。四中全会准备在5月开，请按此部署工作。

　 毛泽东

接着，毛泽东把邓小平的工作报告送给年近80高龄的张澜副主席，并手书一封信：

表方先生：

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同志给我的报告一份，**送上请察阅（可要您的秘书念给您听）**，可以看出西南工作的一般情况。**阅后请予掷还**。先生身体好吗？甚为系念。顺致敬意！

毛泽东

尔后，毛泽东又起草了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判刑问题给叶剑英、黄永胜、萧向荣、林平并告中南局的指示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叶黄萧林并告中南局：

1月17日电悉。广东情况已明了，你们的部署是正确的，希望努力完成任务。此外，望注意镇反工作。**凡与剿匪有关的匪首恶霸大特务，可由军区军分区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凡与剿匪无关的反革命重要分子，则由地方法院及军管会的军法处判处死刑；乡村普通恶霸及不法地主，则由农民斗争、监视及由人民法庭判刑，如此分三方面进行，可期迅速，又较妥当。**广东必需有计划地处决几千个重要反动分子，才能降低敌焰，伸张正气，望妥慎布置施行。

毛泽东 1月22日

1月23日，毛泽东在转发广西镇反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陈饶及华东军区党委会，邓谭及中南军区党委会，贺邓及西南军区党委会，张习及西北军区党委会，聂薄及华北军区党委会，并请转发所属各军区、兵团及军的党委会：

请你们检查一次军队中军以上党的领导机关及负责同志对于中央1950年10月10日关于纠正在镇压反革命活动中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是否引起了注意，是否传达了这个指示，自己在剿匪工作及帮助地方工作中是否有过这种右倾偏向及是否克服了这种偏向，将检查结果向军委做一次报告。**根据广西方面的报告，广西军区在剿匪工作中，曾经犯了惊人的右倾错误，宽大无边，不杀匪首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以致匪祸猖獗，达于极点，土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极大**。广西于去年9月起开始纠正此种错误，3个月中，正确地杀了匪首惯匪及其他首要反动分子3000余人，情况就完全改变过来，匪焰大降，民气大伸。现将中南军区政治部1月16日转来广西报告一份转发给你们阅看，这是一篇极有价值的报告，希望你们认真研究，并做出自己的结论报告我们。

毛泽东 1月23日

1月24日，毛泽东复电给张云逸，并告邓子恢、叶剑英，他写道：

云逸同志，并告子恢、剑英：

1月16日电悉。广西工作大为开展，歼匪90000余，处决匪首恶霸3000余，土改亦已发动，匪焰大落，民气大伸，成绩甚大，我及中央同志都很高兴。云逸同志患病亟须休养直到病愈为止，到广州后请叶方妥为照料。

毛泽东 1月24日

接着，毛泽东为转发华东局关于镇反应注意之点的电报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子恢，剑英，小平，仲勋，一波，高岗同志：

华东局给福建省委电所说肃反应注意之点，我以为是对的。即**为了打落敌焰，伸张民气对匪首惯匪恶霸及确有证据的重要特务和会门头子，应当放手杀几批。为了不致弄错，使自己陷于被动，对尚无证据的特务及会门头子，应当进行侦察，取得确证，而不要随便捕人杀人。**分清这两种情况的界限是必要的，请你们转知所属注意为盼。

毛泽东 1月24日

1月25日，毛泽东接到了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关于西藏达赖喇嘛临时政府愿意来北京谈判的报告。他在给袁仲贤的复电中，确定了“一应接见，二应同意来北京”的方针。13天后，达赖喇嘛的代表曲配土登和扎萨索康从新德里带回了袁仲贤大使给达赖喇嘛和西藏官员大会的复信，信中说：

“毛主席令我代表祝贺你的执政”，“中央同意而且欢迎你加派代表经印度飞机到香港转广州赴北京。我们驻印度大使馆给以一切旅行上的便利和帮助。”

1月25日这一天，在朝鲜战场上，毛泽东在1月14日电报中的估计**“有一种可能，即客观形势迫使我们在2月间就要打一仗，打了再休整”，果然应验了。**“联合国军”乘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尚未得到充分休整之机，由西向东发起了进攻。

抗美援朝战争第4次战役开始了。

1月26日，毛泽东出席印度驻华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并发表了讲话。他说：

“印度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印度人民是很好的人民。中国、印度这两个民族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几千年以来是很好的。今天庆祝印度的国庆日，我们希望中国和印度两个民族继续团结起来，为和平而努力。”

1月27日24时，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报告了朝鲜战场上的形势，电文如下：

“一、美军约3个团（后续部队不详）分3路越金良场里、水原线北数里，有相机攻占汉城市、江北岸桥头阵地模样，企图以此稳定联合国内部目前严重混乱象。**为增加帝国主义阵营矛盾，可否以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与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均在汉江以南）北撤15至30公里消息，如同意，请由北京播出。**

二、**敌继续北犯，我不全力出击，消灭1个师以上，保持桥头阵地甚为困难；出击将破坏整训计划，推迟春季攻势，且目前弹、粮全无补充，最快亦须下月初旬才能勉强出动。我暂时放弃仁川及桥头阵地，在国内外政治情况是否许可**。现拟125师向长湖院里、原州间出击，112师向利川西南地区出击，求得各消灭伪军一部，试行能否牵制敌人北进。如不可能停止敌人北进，政治上又不许可放弃汉城、仁川，即须被迫部署反击，但从各方面考虑，甚为勉强。以何者为是，盼示复。”

1月28日晚7时，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复电中写道：

“一、1月27日24时给我的电报及给各军准备作战的命令均已收到。

二、**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4次战役，以歼灭两万至3万美李军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区域为目标。**

三、在战役准备期间，必须保持仁川及汉城南岸桥头堡垒，确保汉城，并吸引敌人主力于水原、利川地区。战役发起时，中朝两军主力应取突破原州直向荣州、安东发展的计划。

四、**中朝两军北撤15至30公里，发表拥护有限期停战的新闻是不适宜的，敌人正希望我军撤退一段地区，封锁汉江，然后停战。**

五、**第4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有利。而敌人则想于现恢复仁川及汉城南岸桥头堡垒，封锁汉江，使汉城处于敌火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是我们决不能允许的。**

六、**我军没有补兵，弹药也不足，确有很大困难。但集中主力向原州、荣州打下去，歼灭几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的力量还是有的。**请你在此次高级干部会议上进行说明。此次会议应即作为动员进行第4次战役的会议。

七、**我中朝两军在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区域以后，再进行两个月至3个月的准备工作，然后进行带最后性质的第5个战役，从各方面说来，都比较有利。**

八、宋时轮兵团，应即移到平壤、汉城、仁川、水原区域休整，并担任巩固该区域，防止敌人在仁川及镇南浦登陆。在将来的第5次战役中，该兵团即担任西部战役之作战。

九、**执行第4次战役时，请你考虑将中朝两军主力分为两个梯队，各带5天干粮，第一梯队担任突破及一段追击，第二梯队担任又一段追击，以便能使战役持续10天至12天，歼灭更多敌人。**

十、你的意见如何盼告。”

欲知彭德怀会不会执行毛泽东关于“**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4次战役，以歼灭两万至3万美李军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区域为目标**”的作战方针，请看第4次战役的结果便知端的。

东方翁曰：关于持续了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很少有人知道，开战不到3个月就已经决定了敌我双方的胜负。前面已经说过，从10月25日开始，志愿军主动出击，连战皆捷，第1次战役便击退了联合国军和伪军，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第2次战役重创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扭转了战局。战役尚未结束，美国就被迫操纵联合国通过了一个关于先停战、后谈判的决议。到1951年1月8日第3次战役结束，短短两个多月的作战，志愿军便掌握了主动权，取得了这场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何其神速也！毛泽东以大智大勇，击败了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为中国打出了一个持续几十年的和平环境，在他那神话般的军事生涯史上续写了浓墨重彩的辉煌篇章。至于后来朝鲜战争持续到1953年才结束，那是因为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而不断捣乱所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其结果，侵略者还是落了个甘拜下风的下场。

**第23章**

“**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推行这个运动，已**

**推行者深入之，未推行者普及之，务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

话说1951年1月28日，毛泽东给张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表方先生：

西南去年剿匪工作，颇有成绩，消灭匪众80余万，缴枪40余万，残余匪众已不足4万，两三个月内即可完全剿灭。送上西南军区最近由地面送来之总结报告一件，假如您有精神的话，可以一阅。可以慢慢看，一星期内还我即可以。顺致

敬意！

毛泽东

1951年2月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指示：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党委：

目前朝鲜战争仍处在艰苦紧张的阶段。**美帝在遭受重大失败后，除在朝鲜继续进行困兽般的挣扎，在联合国劫持利用其仆从国家诬我为侵略外，正在对日进行片面媾和的活动，并企图重新武装日本作为美国侵略亚洲的爪牙，策动蒋介石匪帮作进攻大陆的准备并在中国内地加强其各项破坏工作。**

在此情况下，我们必须进一步在全国普遍开展各阶层人民的抗美援朝、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及铲除匪特镇压反革命活动的运动以与前线胜利相配合相呼应。在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在工农群众中，应广泛进行时事教育，开展蔑视、鄙视、仇视美国帝国主义与提高民族自信心自尊心的运动。**那种认为工农不关心时事，抗美援朝在工农群众中不成问题，或者认为抗美援朝运动会影响其他工作，因而不认真在工农群众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和时事教育的意见是错误的，必须予以克服。**

目前爱国运动应以下列3事为中心：

一、**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争取全面的公正的对日和约。**现在美国已积极进行对日片面媾和阴谋，反对美国这一阴谋将成为中国人民和东方人民的巨大政治斗争，各地应即抓紧杜勒斯在日本活动期间展开这一运动。在进行这一运动时，应向群众指明：1、中国人民受日本侵略最久最烈，抗日作战牺牲最大，决不能允许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和片面媾和。2、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和片面媾和计划的内容（包括各国的片面媾和，重新商讨台湾主权，琉球小笠原归美国管理，美军无限期驻日，日美军事合作等，见去年11月26日各报）完全违背国际协议，其目的为准备侵略战争，威胁远东和平。3，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和单独媾和的计划，是侵略中国、破坏远东与世界和平的计划，是毁灭日本和日本人民的计划，中日人民应共起反对。4、美国这一计划危害朝鲜、菲律宾、澳洲、新西兰、印尼、马来亚、越南、泰国、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锡兰、蒙古、苏联各民族人民的安全，东方各民族人民应共起反对。5、美国这一计划实行起来有种种困难，要受各方面反对，所以是可以打破的。

反对美国计划应与周恩来外长代表我国政府在1950年12月4日的声明及苏联马立克代表苏联政府于1950年11月20日递交美国杜勒斯的备忘录的双方主张联系起来解释。

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可采下列方式进行，在乡村和城市中应采不同形式：1、**游行示威，以反对武装日本为中心口号。2、集会，可以在一个工厂，一个村庄，一条街道的范围内举行，也可以在较大范围内举行。在这些集会上进行控诉、回忆，通过准备好的决议或函电。3、各团体向日本、美国及东南亚各国的政府、议会、党派、团体或个人写信，群众亦可大批联名写信，警告美日政府不得单独媾和重新武装，鼓励日本人民和东南亚人民共起反对。**这些信稿应由各市委和县委准备或审查，并由反侵略委员会统一规定译寄方法。

二、**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这一工作的内容包括：1、根据中央1月12日指示及反侵略委员会1月14日通知募集慰劳品救济品。2、根据中央1月22日指示及反侵略委员会1月25日通知组织慰劳团赴朝鲜前线。3、写慰劳信给志愿军。此信亦可联名写，其内容亦应由市委县委准备或审查，已写过的地方不再写。对于进军西藏、守卫新疆和内地剿匪的部队，亦应发动西南、西北和剿匪省区的群众写信慰问。4、春节慰问志愿军家属，与慰问人民解放军家属一同做，不必分开做。

三、**发起订立爱国公约。**为了巩固全国人民爱国运动的成果，许多地方人民创造了订爱国公约的办法，这个经验应争取在全国各地各界人民中普遍推广（已经订立过的可以不再订，但必要时可另作补充）。爱国公约的内容，可由各地各界群众按具体情况和需要自行议定，不要强求一律，但不应过繁，使群众记不住，亦不应过简，使群众觉得无新鲜之处。大致范围可以如下：1、拥护毛主席，拥护人民政府，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人民解放军，拥护共同纲领。2、努力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反抗美国侵略。3、反对美帝国主义，拥护解放台湾，肃清美国在华侵略势力。4、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5、协助政府肃清特务，消灭反革命谣言。6、工人农民努力生产，职员努力服务，学生努力学习，商人努力城乡交流，服从政府经济政策，反对投机。7、爱护国家财产，保守国家机密。

以上3事要尽可能在一次进行，以免群众多开会多签名。各地工作中情况和经验，望随时报告。

　 中央

2月间的一天，中南海派人来到中联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成立于1月间，毛泽东提议由王稼祥从苏联回国担任中联部部长兼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笔者注）招待所，告诉在招待所工作的王淑兰说：

“王大姐，主席要接见您。”

王淑兰急匆匆地赶来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正在客厅里等她呢，见她来了，便从沙发上站起来，迎上前去。王淑兰亲切地喊了一声：

“三哥。”

“四嫂，请坐。”毛泽东依然按老习惯招呼着弟媳，说：“请坐。在北京生活得习惯吗？”

“习惯。托主席的福啊。”

“想家吗？”

王淑兰摇了摇头，问道：

“三哥有什么事吗？”

“回韶山去如何？”毛泽东说：“听说韶山已经修复了我们家的房子，准备对外开放，屋里有很多客人，你回去帮我去招呼客人，莫怠慢了客人。”

王淑兰听三哥如此说，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毛泽东又嘱咐她说：

“据说当地人民政府还准备为我修一栋房子，并修一条路通韶山。你回去后了解一下，看是否属实，马上写封信告诉我，并叫他们立即停止此事。”

王淑兰说了一声“好！”，便回到了招待所。几天后，她离开了居住将近一年的北京，回到韶山，与毛月秋老人一起，当起了毛泽东故居的接待和解说员，接待了成千上万前来参观的海内外宾客。

2月初，春节快要到了，毛泽东问王鹤滨：

“王医生，你的老家在哪里呀？”

王鹤滨说：

“冀中军区，白洋淀。”

毛泽东听后笑了笑，又问：

“家里还有什么人哪？”

“有父亲，母亲。一个姐姐早已出嫁了，哥哥在保定地区工作。”

“你回家探过亲吗？”

“1949年的初夏，我在香山门诊部工作时，父母来看过我了。”

毛泽东认真地说：

“你应该回家去看看父母哟！”

王鹤滨心想，这里只有我一个医生，哪能离得开呀？就说：

“主席，工作离不开。”

毛泽东说：

“我派你回家去看看父母，另外，回到家乡看看农民们生活得怎么样。”

王鹤滨说：

“主席，那我明天就走。”

“好嘛！”

毛泽东赞许地点了点头，满意地笑了。

2月5日是农历除夕夜，北京到处回荡着喜庆的鞭炮声。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接到通知，说是毛泽东亲自请昆剧演员韩世昌、白云生去怀仁堂演出《游园惊梦》，而且点名要“堆花”。

著名昆曲演员丛兆桓回忆说：“看到毛主席那样喜欢昆曲，重视祖国传统艺术，我们感到，昆曲的春天来到了。”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逢过春节，毛泽东都要看昆曲。

是日晚，梅兰芳剧团也在怀仁堂参加了春节晚会演出，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观看了梅氏父子演出的《金山寺》、《断桥》折子戏。

2月6日是正月初一。这天中午，毛泽东在丰泽园菊香书屋设家宴招待来自家乡的客人。宴会前，他拉着两位老人的手，面朝其中的一位老人，向两个女儿李敏、李讷和侄子毛远新介绍说：

“这是我九哥，是我的姨表兄，他家住在湖南湘乡十四都。没有他，就没有我。”

孩子们听了，都感到惊讶。这位老人就是王季范先生。王季范在同辈兄弟中排行第九，后辈人都称“九阿公”，毛泽东一直叫他九哥。毛泽东介绍的另一位老人就是周世钊。

2月6日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春节团拜会，周恩来站在门口迎接客人。他见政协委员张恨水穿着一套很不像样的藏青色中山装来了，就上前握着张恨水的手，问道：

“张先生近来是否生活有困难？”

张恨水闻言一愣，说：

“没有哇。”

他见周恩来一直盯着自己的衣服看，这才恍然大悟，笑道：

“原来总理是看见了我这身衣服呀！总理还记得1945年在重庆时，毛主席送我的延安生产的粗毛呢吗？这就是用那块儿呢料做的。不过，也难怪总理认不出它，因为它老褪色，所以我就把它染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至于生活上嘛，我有固定收入，还有再版书稿费，政府对我很照顾，总理不必挂心，一点问题也没有。”

周恩来一听哈哈大笑，他说：

“不错不错，你把颜色一改，我还真没认出来。好，好，从这一点看出，张先生没有忘旧哇！”

团拜会开始了。周恩来拉着茅以升的手向毛泽东介绍说：

“主席，这位是北方交通大学的校长，茅以升同志。”

“知道，知道。”毛泽东满面笑容地握着茅以升的手，借“毛”与“茅”姓读音相同，与茅以升开玩笑说：“咱们是一家人嘛！”

茅以升，1896年1月9日出生于江苏镇江，1916年赴美留学，1919年获得美国卡耐基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33年8月，年仅37岁的茅以升承接了建造钱塘江大桥的任务并任工程处处长，1937年10月建成由中国人自己设计的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双层大桥。1949年9月，茅以升在新政协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那时候，毛泽东曾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你是造桥的专家，很好嘛！是为人民做好事呀。”如今，茅以升见毛泽东还是这样亲切和蔼，诙谐幽默，便提出请求说：

“主席，我们北方交通大学的全体师生，都万分渴望您为我们学校题写校名。”

毛泽东笑着说：

“我的字写得不好，**我给清华大学题的字，有个同学来信说，你写的算个啥，有的字，我就认不清楚。山东一位老先生，给我一封信，说我有一篇文章中一个字，用的不恰当。一字之师嘛。**”

话尽管如此说，几天后，毛泽东还是在两幅军委信笺上题写了“北方交通大学”校名，让铁道部转送给兼任铁道研究院院长的茅以升。此后，该校的校名和校徽一直沿用着毛泽东这一亲笔题字。

再说毛泽东在团拜会上谈笑风生，与各界著名人士和社会名流亲切交谈。他对梅兰芳说：

“昨天看了《断桥》，你的白娘子扮相与众不同，想得很妙，浑身穿白，头顶一朵红绒球。”

梅兰芳回到家里，高兴地对夫人福芝芳说：

“毛主席看戏可真仔细，这么多年，从未有人谈过白娘子的扮相。的确，我是费了很多时间来研究，才改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2月6日傍晚6时半，毛泽东在清华园火车站登上了南下的专列，沿着京广线铁路向南驰去。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去石家庄审定《毛泽东选集》的稿件。

此前，**毛泽东鉴于朝鲜战局已经稳操胜算，便把主要精力转移在了国内事务上**。他交代负责安全警卫工作的汪东兴说：

“搞《毛选》，在北京事情太多，要找个地方，集中精力搞出来。《毛选》现在中国需要，苏联也催着要，要集中突击一下。要找个地方，离北京不要太远。不准占老百姓的房子，也不要住招待所。”

汪东兴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选中的是石家庄西郊的一所保育院。

专列到达保定车站时，夜幕已经笼罩了大地，视线缩得很小。毛泽东欣喜地透过车窗向车站望去，只见轻柔的大片雪花在橘红色的路灯光前漫舞，闪着点点反光，纷纷扬扬。

专列驶过保定车站，并没有向石家庄开去，却驰进了保定南郊与飞机场之间的桃上村附近的岔道上，在这里停了下来。毛泽东非常欣赏这个大雪纷飞的美妙夜景，他决定在专列上过夜。

毛泽东夜宿旷野之中，随行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立刻忙乎起来。杨尚昆、罗瑞卿、滕代远，加上叶子龙、汪东兴，他们必须把专列的行踪告知北京，还要通知石家庄和保定，安排好明日专列行进的时间，布置好夜晚的警卫工作。专列上的警卫如同中南海的菊香书屋一样，由卫士轮流值班就可以了，专列外的警卫任务，就需要借助于地方武装力量来担任。罗瑞卿带着汪东兴冒着大雪走下车去，检查地方警卫的布置情况。

许久，罗瑞卿、汪东兴回到专列上，罗瑞卿进了毛泽东的卧室，汪东兴路过王鹤滨等人的车厢时，见他们尚未入睡，便坐了下来。他大概是经过车外的冷风一吹，加上检查警卫工作，显得有些亢奋，已经毫无睡意，想找人聊聊，便说：

“一个简单的警卫工作，不检查也是不行的，谁会想到他们竟会这样布置警卫哩！”

趴在被窝里的王鹤滨听他这么一说，立时瞪大了眼睛，不解地问：

“发生什么事情啦？”

汪东兴说：

“发生问题还得了！没有发生问题，我还担心得要死哩。我跟罗部长下车去查看一下警卫布置得如何，好家伙！几挺机枪都把枪口对准了专列，机头都打开着，子弹也压上了膛，如临大敌，只剩下搂扳机了。”

接着，他便绘声绘色地把事情的原委讲了一遍。

原来，汪东兴和罗瑞卿一起下车后，看到本地来负责警卫的武装部队几挺机枪枪口都对准了专列，对专列形成了一个包围圈，便找到带队的连长，质问他：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连长立正报告说：

“保卫首长！”

汪东兴说：

“你们的任务是来保卫首长的，那么为什么把枪口都对准了列车？”

“因为首长在列车上，如果列车上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好对付。”

“怎么对付？射击？隔着车皮你们能区分谁是首长，谁是敌人？如果每挺机关枪都哇哇地叫起来，我们不是全部给报销啦？”

“哪……”

连长回答不上来了，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汪东兴说：

“列车上由我们警卫了，请你们来，是为了对付万一有敌人从外部袭击列车，是不是？你们的任务是不让可能的敌人接近列车，对吗？”

连长顿时醒悟了，立刻指挥战士们将枪口转了个180度，指向了漆黑的田野，解除了对专列的“包围”。

故事讲完了，汪东兴又说：

“真不知道这些同志是怎么考虑警卫工作的，不检查一下，那还得了。”

说罢，起身向他的卧铺走去。

2月7日清晨5点半，毛泽东的专列到达石家庄市，早有市委市政府领导人在火车站迎候。毛泽东一行被送到西郊的一所大院里。

这处建筑就是汪东兴选中的解放后新建的保育院。毛泽东的居室在院子北侧，是一座青砖红瓦房，中间有高高的砖砌拱门，两侧是窗户。里面的房间很宽敞，有一张双人床，床头放了一个小桌，桌上有一盏台灯。大院的西侧有一座小白楼，工作人员就住在这座楼里。

安排已毕，杨尚昆、罗瑞卿、滕代远返回北京，留下来的是汪东兴、叶子龙、罗光禄、李树槐、王鹤滨、李银桥、孙勇和张木奇等几个卫士。

2月7日，毛泽东关于“在朝鲜战场轮番作战的兵力编成”致电周恩来并告聂荣臻，他在电文中写道：

恩来同志，并告聂：

在你计划轮番作战兵力时，请将杨得志3个军，西南3个军（先开两个，另一个军于到达河北后教育两星期接着开），杨成武两个军（在66军及50军回来接防后开），47军（2月底集中岳州，3月初开东北，训练两星期开前线）及董其武兵团两个军（先补充10000人，武器方面似亦须有所改善，准备4月间开前线负守备任务），编成为第2番作战兵力。而以现任第1番作战兵力中的第13兵团6个军撤至后方补充休整3个月至4个月（其中50军、66军并同时担任天津、营口线守备，其他4个军位于平壤、沈阳之间休整），改为第3番作战兵力。9兵团全部则回华东任守备。补充计划，9兵团回华东再补，13兵团需于撤到休整地点后即予补足。**西南已到之两个军，杨成武两个军，董其武两个军，须令其立即开始出境作战的各项教育，应召集这些军的负责人来京开会授予任务**。**西南第2期3个军，须令其于2月准备完毕**，3月开始出动，4月到达河北。

毛泽东 2月7日

2月8日下午，毛泽东一觉醒来，立即让值班卫士去找王鹤滨。他一见王鹤滨就说：

“咳呀呀！怎么办？王医生，不得了啦，我快被臭虫吃掉啦，真咬死人哪！”

一边说着，他一边用双手使劲挠痒，还把睡衣撩开，让王鹤滨看身上那些被臭虫咬的手指甲盖大小的疙瘩。

“王医生，你看，快想个办法吧。”

王鹤滨没有想到毛泽东的居室里竟然有这么多的臭虫！他为自己没有事先检查一下感到内疚，马上用碘酒涂在毛泽东身上被咬的部位，一是防止被抓破的皮肤感染，二是起到止痒的作用。王鹤滨又叫来卫士们，把床铺和家具抬到院子里，放在阳光下晒，用开水浇，用针尖把隐藏在木板缝里的臭虫挑出来。臭虫的数量可真不少，有大有小，有肥有瘦，一个个吃得肚皮鼓鼓的。战士们把这些臭虫一个个碾得粉碎，替毛泽东报了一咬之仇。王鹤滨又把门窗关闭，在室内喷洒了杀虫剂。众人好一番忙活，终于把毛泽东的居室重新整理好了。

2月8日这一天，毛泽东为转发山东分局镇反工作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一波、澜涛、高岗、秀山同志，并告漱石及山东分局：

看了山东分局2月5日致华东局及中央的电报，甚为高兴。漱石及山东分局所采方针办法，是完全正确的。**山东分局在此电中所述恶霸匪首会门特务活动猖獗情形，在华北、东北有同样情形的地区，务须给以同样的处理，应杀者均杀之，应判徒刑者均判徒刑，应管制者均给以管制，务使反动势力彻底肃清，民气伸张，政权巩固。**

毛泽东 2月8日

2月9 日下午，毛泽东起床后，王鹤滨又来了，他问：

“主席，怎么样？还咬吗？”

毛泽东说：

“臭虫没有再光顾了，好厉害的东西！”

他在这里一直工作到4月底，住了近3个月，再也没有听到说挨咬的事了。他每天埋头审阅稿件，批阅文件，白天有时在院内散步，有时走出大院，到马路上或田野散步。

叶子龙经常背着一支气枪出去转悠，有时打得一两只斑鸠，便亲自到厨房烹调，改善一下毛泽东的伙食。

2月10日，毛泽东为中央对华北局部署镇反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华东局，山东分局，中南局，华南分局，西北局，西南局，东北局：

下面是华北局2月9日关于重新部署镇压反革命的计划，可以看出华北存在的问题及应取的方针。华北局的报告中又提出了用整风方式审查留用人员及新知识分子的问题，这在华北是应该开始做了，在取得经验后再向你们通报。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各区则尚未到时机，还须等待一个时期，但亦应当开始注意这个问题。**据湖北公安厅报告，已在省级机关中逮捕匪特、地霸、盗匪、反动党派、会门等160名，其中省委占20%，省府占74%，中原大学占3%，军区占1%，内有处长5名等情，可见问题之严重，**故必须开始引起注意。

中央 2月10日

2月16日始，原第1野战军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副司令员郑维山、张天云率第64军、第63军、第65军先后入朝。

李志民，1906年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高坪区西坑村，读过私塾，高小毕业，教过书，当过小学校长。1925年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家乡开展武装斗争，12月调入红5军。此后，他先后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红1方面军长征、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西征战役、北岳区反“扫荡”、大清河北战役、平绥路战役、保南战役、正太战役、青沧战役、保北战役、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察绥战役、平津战役、太原战役、兰州战役、宁夏战役等。

郑维山，1915年出生于河南省新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郑国麒是参加黄麻起义的老战士。1930年，郑维山参加红军，1934年不到20岁就担任了红30军88师政委，他是红4方面军出了名的“夜老虎”。1947年6月，郑维山接替杨成武担任晋察冀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他带领的3纵被誉为“华北劲旅”。

张天云，1913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1929年参加红军，参加长征时，担任红25军第78师2团政委。

2月16日晚，第64军军长曾思玉，政治委员王昭率第190师、第191师、第192师由辽宁安东入朝参战。

此后，第63军军长傅崇碧，政治委员龙道权率第187师、第188师、第189师，于2月17日由辽宁长甸河口入朝参战；第65军军长萧应堂，政治委员王道邦率第193师、第194师、第195师，于2月21日分别由辽宁安东、长甸河口入朝参战。

2月l7日，毛泽东复信给黄炎培，对镇反问题作了重要解释。

原来黄炎培在苏南考察结束后，回到北京立刻写了一个《访察苏南土改报告》，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他在报告中肯定说：“苏南的土改基本上是办得好的。好在哪里？农民站起来了。”同时，黄炎培也坦率地说：“由于群众在几千年专制高压之下，一旦解放出来，行动往往容易过火，苏南的一些地区，短期曾出现过‘乱打乱杀’的现象，所幸的是政府发现后，立刻做了纠正。因此，‘有领导地放手发动群众’我们应认定是一句名言。”

黄炎培在报告中还提出建议说：“鉴于抗美援朝期间匪特猖狂横行，党中央纠正前一时期镇反运动中出现‘宽大无边’的右的偏向，镇压反革命这个严厉的趋向，是客观条件的要求，是合乎需要的。但需要将法令当作处理一切的依据，尤其要注意一个‘准’字，在镇反工作相当彻底的地方，今后不需要更严厉了。”

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复信中写道：

黄任老：

刚才送上广东纠正宽大无边情报一份，现又送上广西的一份，请参阅。这两处是最典型的例子，其它地方不如此两处之甚，但亦大体相去不远，引起群众不满，极为普遍。**不杀匪首和惯匪，则匪剿不净，且越剿越多。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的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当然，**对可杀可不杀的那一部分人，应当判处徒刑，或交群众监视，用劳动去改造之，不要杀。**如同宽大应有边，镇压也应有边，无边是不对的。已经解决了问题，群众已经满意了的地区，即不应再杀人了。

顺致敬意！

毛泽东

2月18日，毛泽东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通报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他写道：

中央于2月中旬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各项重要问题，兹将决议要点通报如下。

一、**22个月的准备工作。“3年准备、10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都明白。**准备时间，现在起，还有22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

二、**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推行这个运动，已推行者深入之，未推行者普及之，务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

三、土改。1、农忙时一律停一下，总结经验。2、争取今年丰收。3、依靠县农民代表会及训练班。4、积极造成条件。凡条件不成熟者，无论何时何地不要勉强去做。5、土改完成，立即转入生产、教育两大工作。6、同意华东分期退押的办法。7、劝告农民以不采非刑拷打为有利。8、土改后，增划区乡，缩小区乡行政范围。

四、镇压反革命。1、**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2、严密控制，不要乱，不要错**。3、注意“中层”（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分为外、中、内3层。“外层”是指清查隐藏在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中层”是指清查隐藏在军政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内层”是指清查隐藏在共产党内的反革命分子——笔者注），谨慎地清理旧人员及新知识分子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4。注意“内层”，谨慎地清理侵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 十分加强保密工作。5、还要向干部做教育，并给干部撑腰。

五、城市工作。1、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今年必须召开两次城市工作会议，议程如中央所通知，向中央作两次专题报告。2、加强党委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实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3、向干部做教育，**明确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4、工厂内，以实现生产计划为中心，实行党政工团的统一领导。5、**力争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6、在城市建设计划中，应贯彻为生产、为工人服务的观点。**7、全国总工会及各上级工会应着重解决下面的具体问题。8、党委及工会应着重典型经验的创造，迅速推及各处。

六、整党及建党。1、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这是主要方面，必须加以肯定，并向各级干部讲明白。但是存在着问题，必须加以整理，并对新区建党采取慎重的态度，这方面也要讲明白。2、整党、建党，均须由中央及各中央局实行严格的控制，下面不得自由行动。3、整党，应以3年时间实现之。其步骤，应是以一年时间（1951年）普遍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党员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并训练组织工作人员。同时，进行典型试验。然后，根据经验进行整党，但城市可以在1951年进行整党。整党时，首先将“第四部分人”（把党员分为4种人：一是具备党员条件的；二是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或者有较严重的毛病，必须加以改造提高的；三是不够党员条件的消极落后分子；四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叛变分子、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笔者注）清洗出去。然后对“第二部分人”、“第三部分人”加以区别，对其中经过教育而仍确实不合党员条件者劝其退党，务使这些退党者自愿地退出，不要伤感情，不要重复1948年“搬石头”（指整党运动中发生的“左”的偏向，抛开原有的党支部，将原基层干部一律撤职，有的地区甚至大批停止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党员的党籍——笔者注）的经验。4、城市及新区建党必须采取慎重的方针。城市着重在产业工人中建立党的组织。乡村须在土改完毕始能吸收经过教育合于党员条件者建立党的支部，在头两年内乡村支部一般不要超过10个党员。无论在城市和乡村，均应对于愿意接受党的教育的积极分子，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经过这种教育然后将其中确实合于党员条件者吸收入党。

七、统一战线工作。1、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1951年召集两次会议，讨论统一战线工作，并向中央作两次关于这方面的专题报告。2、必须向干部讲清楚为什么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理由。3、知识分子，工商业家，宗教家，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必须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将他们团结起来，并加以教育。4、认真在各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是两项中心工作。

八、整风。一年一次，冬季进行，时间要短，任务是检查工作，总结工作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错误，借以教育干部。

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此前，罗瑞卿受命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送交毛泽东审阅修改。毛泽东同罗瑞卿连续3天边议边修改。其间，**毛泽东亲笔改动了3次，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政策方针，从而使镇反工作有法可依，量刑有准，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2月21日这一天，彭德怀从朝鲜回到北京，直奔中南海，听说毛泽东正在西山，他又驱车赶往西北郊的新6所。在毛泽东住处前，彭德怀被工作人员叫住了，说：

“主席工作了整整一夜，刚刚睡下。”

“前线军情如火，走开！莫要拦我！”

彭德怀一把推开工作人员，直闯毛泽东的卧室。就在此时，卧室里传来了毛泽东的声音：

“我以为哪个铜锤花脸在叫板哩，原来是彭大将军在闯宫，我岂敢不见。请进！”

彭德怀进入房间，歉意地说：

“对不起，主席，影响你休息了。”

毛泽东正披衣下床，笑着说：

“哪里哪里，彭大将军千里归来，本该高接远迎，不睡觉我也高兴啊！我这个人顽固不化，旧习难改呢！俗话说：日出而作，日没而息。我反其道而行之，是日没而作，并且一直工作到东方红，等到太阳升的时候，我两眼一闭，那是一片漆黑哟！”

二人落座后，彭德怀向毛泽东汇报了朝鲜战场上第4次战役的战况，他提出兵员不足和后勤保障的问题。他还说，朝鲜战争不能速胜。毛泽东说：

“**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

他还风趣地说：

“你的名字叫石穿，我的乳名叫石三伢子，我们两个都是石头。”

彭德怀说：

“主席是块宝石，我彭德怀不过是块顽石罢了。”

毛泽东笑着说：

“我也是一块石头嘛，我们两块石头，一起扔向杜鲁门，一起扔向麦克阿瑟！”

彭德怀最后谈到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他还以内疚的心情检讨说：

“主席，你让岸英随我到朝鲜前线后，他工作很积极。可我对你和恩来几次督促志司注意防空的指示不重视，致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当承担责任，我和志司的同志们至今还很悲痛。”

这个话题又勾起了毛泽东内心深处的悲伤，他点燃香烟，一支支地抽着，听着，默默无语，有时还闭上眼睛，然后抬起头来，凝望着窗外那萧疏的柳条，轻轻地念叨着庾信的《枯树赋》：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念罢，又自语道：

“开慧，岸英和你一样，是为革命为人民牺牲的，人民将永远怀念你们。”

是啊，他一家为革命早已牺牲了5位亲人——他的夫人杨开慧、四弟毛泽民、六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侄儿毛楚雄。如今，自己年纪大了，大儿子毛岸英却又为中朝革命事业而捐躯——他已经是毛家的第6位烈士了。毛泽东默默地掐着指头算了算，又自语道：

“岸英刚满28岁，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彭德怀看着毛泽东那痛苦的样子，暗暗吃惊，心想：怎么，主席还不知道？他只好硬着头皮负疚地说：

“主席，我没有保护好岸英，我有责任，我请求处分。”

毛泽东忍着巨大的悲痛、缓缓地站起来，望着彭德怀，说道：

“你莫要讲嘛，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嘛！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反抗侵略者，中国人民把自己最优秀的儿女，组成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牺牲了多少个优秀战士。**岸英是属于牺牲了的成千上万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不要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不要因为是我——党的主席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而牺牲，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每个战士不都是父母所生的吗？**你回去要讲，岸英是志愿军的一名普通战士。至于岸英的遗体没有运回国内，埋在朝鲜的国土上，体现了我们与朝鲜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革命精神，也说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是用革命烈士的鲜血凝成的。你们做得好，做得很好。”

他点燃了一支烟，又叮嘱说：

“现在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各种飞机约1000多架，你们千万不能疏忽大意，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司令部的安全。”

彭德怀走出毛泽东的房间，一方面为毛泽东的豁达胸怀所感动，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恼火。他感觉毛泽东对于这个消息有些吃惊，误以为自己是第一个向毛泽东报告毛岸英牺牲消息的人。他气得连连跺脚，心想：

“你们要是早点告诉我，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我讲话也可以做点准备。”

2月21日晚，毛泽东就符定一来信中所说他乡里减租退押及房契等问题复了一封信：

宇澄先生：

来示敬悉。退押事及房契一件已交统战部李维汉部长，与先生商酌处理，请与统战部接洽。章先生信奉缴。顺颂日安。

毛泽东

信中所说章先生即章士钊，他曾写信给毛泽东推荐民主人士，由符定一转交。

2月25日，周恩来和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共同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开会，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参战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的问题。

彭德怀此次回国往来7天，很快就回到了朝鲜战场上。

2月25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转发北京市委镇反计划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各大城市市委：

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说来，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主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下面是北京的镇反计划，请你们研究仿办。其中说到拟先召集区以上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和各大工厂大学校，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次会，报告反革命情况及各种罪行和犯罪证据，提高大家对反革命的仇恨，然后再分批执行，这是完全必要的，各地都应这样做。

中央 2月25日

2月27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川东区党委镇反工作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华北局，并转分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

下面是川东区党委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的报告，我们认为**这个报告完全正确。其中所说给胆怯同志撑腰，派干员出去检查，强调策略，严格批准手续几点，都是很必要的。**

中央 2月27日

2月2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向各界人士解释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的指示电：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并转分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各省军区：

请注意利用中央政府发布惩治反革命条例的机会，结合当地反革命活动的具体情况，向知识分子、工商界、宗教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广泛地解释镇压反革命的完全必要，使他们赞同我们的方针。**中央司法部长史良所写的《坚决正确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一文，写得很好，她是司法部长，又是民主人士，各地应注意利用此文说服那些存有错误思想的社会人士及胆怯的人们。**将史良此文和中央的条例，彭真的报告及《人民日报》2月22日社论印成一本，广为传播，并组织党内外学习。

中央 2月28日

他又为转发西南军区关于镇反工作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华东军区，中南军区，西北军区，华北军区，东北军区并告西南军区各负责同志及党委会：

下面是西南军区党委会2月15日的报告，其中所述各项，值得十分注意。望你们自己及所属省军区，对于镇压反革命及管训旧军官两大问题，参考西南经验，作正确的处理。**所谓胁从不问，是指被迫参加而未作坏事，或未作较大坏事者。至于助恶有据，即是从犯，应当判罪，如主犯判死刑，从犯至少判徒刑，有些罪大的从犯应判死刑，不在胁从不问之列。**军队中混入反革命分子问题，必须引起充分注意，并着手审查清理，以其结果上报。

毛泽东 2月28日

欲知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结果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著名画家徐悲鸿在1950年11月给在国外的陈西滢写了一封信，劝说好友归国。他在信中是这样描述新中国的：“兄等须早计，留外终非久法。**弟素不喜政治，惟觉此时之政治，事事为人民着想，与以前及各民主国家不同。一切问题尽量协商，至人人同意为止。**故开会时决无争执，营私舞弊之事绝迹。弟想今后5年必能使中国改观，入富强康乐之途。兄等倘不早计，尔时必惆怅无已。”斯言极是，且极具预见性。几十年后，一些社会残渣余孽重新泛起，颠倒历史，把毛泽东时代的清明政治描述得一团漆黑，岂不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第24章**

**“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

**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话说1951年3月1日，毛泽东起草“关于朝鲜战局和我军采取轮番作战方针给斯大林的电报”（见《毛泽东军事文选》），他在电文中写道：

一、**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企图与我进行消耗战**。**在过去一个月当中，敌人当站住阵地之后，经过调整补充，便寻找机会向我作试探性的进攻，其目的在一方面不容许我在前线作必要的休补，另一方面则利用其技术条件消耗我军**。同时，敌人对朝沿海的袭扰，运输线的不间断地轰炸，均甚为积极。我军补充物资只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能达前线，有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在途中被炸毁。**在目前一个半月内，因我新军未到，老军未补充，敌人有重新进出三八线南北地区的可能。**

二、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中国志愿军已决定编组3番轮流的部队，即将现在朝鲜作战的9个军30个师作为第一番志愿部队；将正从国内调去的6个军及现在朝鲜即将补充的3个军（有两个军现在元山、咸兴地区休整）共9个军27个师作为第二番志愿部队，约4月上旬可全部到达三八线地区，接替现在汉江前线的6个军的任务；将准备从国内调去的6个军及第一番志愿部队中的4个军共10个军30个师作为第三番志愿部队，准备6月中调用。上述10个军中的4个军，因打了5个月，必须补充休整；在第二番志愿部队接替前线任务后，即调至平壤、元山地区休补，兼顾海防。第一番志愿部队中其他两个军，则调回国内整补。**在过去4个战役中，中国志愿军战斗的与非战斗的伤亡及减员已超过10万人**，正将补充老兵新兵12万人；今明两年准备再有伤亡30万人，再补充30万人，以利轮番作战。

三、根据1、2两月份的作战经验，我因有3个军在咸兴以北战役中损伤较大，从事休整，致现在前线作战的只有6个军，减员甚大，未获补充，因之我无后备力量，在战役胜利时不能扩张战果，在敌人增援时不能打敌援兵。同时，我军南进，后方线长，供应很困难，还须留兵守备。故**在敌人未被大量消灭前及我尚无空军掩护条件下，我如过早逼敌南退，反不利我分割歼敌**。鉴于此种情况，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9个军于4月上旬达到前线以前，敌之陆军还较我占优势，我应避免进行战役性的出击，而以第二番志愿部队6个军及朝鲜人民军4个军在南汉江以北地区进行防御，迟阻敌人。但必须估计，在今后一个半月内，敌人有可能寻机进攻，逼我应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军拟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9个军到齐后，再进行有力的新的战役。**我们计划在我第二番部队到达后，在4月15日至6月底两个半月内，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军及李承晚军建制部队数万人，然后向南汉江以南推进，最为有利。

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3月2日，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他写道：

乔木同志：

3月1日《人民日报》载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写得很好，请为广发各地登载。并为出单行本，或和李俊龙所写文章一起出一本。**请叫新华社组织这类文章，各土改区每省有一篇或几篇**。

毛泽东

信中所说的李俊龙，是国务院参事，他所写的《战斗中的湖南农民》一文，刊登在2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

3月3日，斯大林复毛泽东3月1日电说：

“您3月1日的来电已收到。我们同意您关于今后在朝鲜的作战方针。假如您能在安东地区留下两个空军师掩护电站和该交通线的话，我们同意派遣两个驱逐机师即第15师和第324师在别洛夫将军指挥下进入朝鲜境内作战，以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若朝鲜已有一条金属跑道，我们则可从苏联再提供两条金属跑道。与此同时，必须起码再建筑四处水泥机场，因为只有金属跑道是不够的。我希望机场工程在劳动力和器材方面能得到保证。您若同意，我们可给一些高射武器掩护机场并再供应你们一些高射炮（已令炮司分批调3个高射炮师去朝鲜）。增订的6000辆汽车可在今年下半年中交货。”

3月间，毛泽东和老友周世钊聚会，周世钊问起毛岸英为什么要上前线的问题，毛泽东深情地说：

“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极力主张派兵出国的，因为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我的这个动议，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最后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做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要抗美援朝，我们不只是物资的援助，**金日成同志的告急电报是明写着‘亟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要作战，我要有人，派谁去呢？我作为党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上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年轻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去农村劳动锻炼过，这是很不够的，一个人最好的成长环境就是艰苦！在战斗中成长要比任何其他环境来得更严更快。基于这些原因，我就派他去朝鲜了。”

3月7日，“联合国军”集中20多万兵力，在几百架飞机支援下，向中朝军队阵地发起全线进攻。中朝军队且战且退。

3月8日，毛泽东致信在北京的陈伯达、田家英说：

“《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请即重排清样两份，一份交伯达看，一份送我再看。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须修改。其它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不知你们感觉如何？此点待将来再决定。你们暂时不要来，待《矛盾论》清样再看过及其它文看了一部分之后再来，时间大约在月半。”

3月9日，毛泽东为转发罗瑞卿关于浙江省镇反情况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及区党委：

一、兹将罗瑞卿同志关于浙江情况的报告一份转给你们，其中所述浙江各项镇压反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关于登记反动党团及特务分子的经验，值得各地研究和采用**。关于此项登记工作，凡未办及未办得好的，请你们做出自己的决定和计划，并向中央作报告。

二、目前几个月，各地领导同志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向下面指导的重心，仍然是对那些优柔寡断的市委、地委、县委给以检查和督促，使他们坚决行动起来，严厉镇压反革命。当然，**在那些已经实现了彻底镇压方针的地方，则要停一下，不要多捉多杀了**。**无论什么地方，都要有计划，讲策略，作宣传，不杀错，这些也是当然的。**

毛泽东 3月9日

3月11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张春桥写给编辑部的一封信。

张春桥，小名善宝，1917年出生于山东巨野县城。其父张开益，母亲宋蕙卿。1932年张春桥进入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次年，16岁的他即发表小说《银铃》、《秋》。1934年中学毕业后，17岁的他又发表了一些文艺评论文章和一些反映民众生活的白话诗。1935年5月，张春桥到了上海，不久在《大晚报》及《大晚报》副刊《火炬》上不断发表文章；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八一三”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张春桥曾写过一篇题为《中国为什么胜利》的报告文学。9月3日他在《立报》上发表《武装民众》一文。张春桥在上海两年多时间里，先后发表文章40多篇。9月中，他离开上海回到济南；12月踏上了奔赴延安之路。1938年8月，张春桥在延安重新办理了入党手续，几年后他被任命为《晋察冀日报》副总编。1947年张春桥奉调出任《石门日报》社社长，不久被任命为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社长，1951年改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

张春桥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这封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编辑同志：今天读到《人民文艺》第87期所载周巍峙同志《略谈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创作》一文。我完全同意他对我和卢肃同志合作的《毛泽东之歌》的意见。”

他信中所说的《毛泽东之歌》，原是他在1941年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期间作词、由卢肃作曲的赞扬毛泽东的歌曲，其歌词是：

“密云笼罩着海洋，海燕呼唤暴风雨。你是最勇敢的一个，不管黑暗无边，夜雾茫茫，从不停息你战斗的号召，从不收起你坚强的翅膀。

在南方，在北方，从中原，到边疆，你响亮的声音，鼓舞着斗争中的人民，温暖着受难者的心。

敬爱的毛泽东同志，我们光荣地生活在你的年代，学着你的榜样，跟着你的火炬，走向光明幸福的新世界。

敬爱的毛泽东同志，你是胜利的旗帜，光明的象征，我们光荣地生活在你的年代，学着你的榜样，跟着你的火炬，走向光明幸福的新世界。”

这首歌问世后，曾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不仅在解放区广为传唱，新中国成立后也曾流行一时。1951年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所作的“1950年全国流行歌曲调查”中，这首歌高居排行榜第3位。后来，著名音乐史学家向延生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中也曾评价说：“由张春桥作词、卢肃谱曲的‘献给中央二十周年’大合唱中的《毛泽东之歌》，是一首优秀的颂歌题材的歌曲，演出后很快就在边区传唱开来。”

此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的周巍峙则对这首歌曲提出了批评意见，他在1951年2月11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略谈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创作》一文中是这样写的：

“我们的诗人和音乐家也写了不少歌颂毛主席的歌曲，这些歌曲有的已在广大群众中流行。但在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当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应该严肃地认真地加以考虑。”“如由张春桥作词、卢肃作曲的《毛泽东之歌》。词中虽也着重说明了毛主席刚毅的战斗精神，以及他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但他所选取的形象是暴风雨中的‘海燕’，是‘黑暗无边，夜雾茫茫’。对伟大领袖与迅速发展的人民力量缺乏有力地描绘。”“有人认为它的情调受了宗教赞美诗的影响，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虽然这个歌曲是10年前的创作，在新解放的城市中，也曾为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所欢迎，但从整个思想情感来看，却和现在人民的距离很远了。”

周巍峙在文章中还插入曲谱，对《毛泽东之歌》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提出了批评，说“曲调过于平淡，情感沉郁”，“更带有感伤的成份”。

对于周巍峙的这些批评意见，张春桥虚心地接受了。他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这封信中写道：

“他所指出的许多缺点，是1941年‘七一’前写成这个作品时我们就感到了的。1943年整风时，我对这支歌曲也曾进行检讨，和巍峙同志这篇文章的意见基本上也是一致的。经过整整10年，每当听到人们还在唱这支歌时，内心实在不安，它成了我的一个精神负担，并且一天比一天沉重。虽然也曾想重写一支新歌，但思想感情很不成熟，始终未敢落笔。**我衷心地希望有新的歌曲来代替它。我想，现在人们还在唱它，并不是因为它好，而是迫切需要一支歌来表达对领袖的敬爱。**我自己也仍愿在这方面努力。这支歌人民广播器材厂曾灌过唱片，为了不使它再推广，我已请人民广播器材厂停止发行。谢谢你们。”

对于张春桥的来信，《人民日报》也写了个编者按，其中说道：“这个歌曲，除人民广播器材厂停止发行外，各地广播电台应即停止播送。”

再说3月11日下午，毛泽东在西南军区党委1951年3月6日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给各军、各军区等单位并报军委总政的电报上加了批注，并为转发这个电报写了一个批语。

电报内容和毛泽东的批注如下：

自去年接到中央镇压反革命指示之后，我军区部队在西南局统一领导下是坚决地执行了这一指示的，因此在剿匪与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问题上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但由于在军队内部缺乏专门研究布置，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尚未引起各级党委的普遍重视。（**毛注：西南如此，各军区各省各军恐怕也有此种情形。）**有的对反革命存在着“重案轻处”、“重纪律犯轻政治犯”或“地方严部队宽”的倾向。对待旧机关旧职员的态度不够严肃，对其中有严重问题的分子注意不够。党内干部中轻敌麻痹遗失机密的现象不断发生。军区党委认为上述缺点必须立即纠正，这不仅关系到清匪发动群众和社会治安，而且是直接关系到部队内部政治上组织上纯洁与巩固的重大问题。（**毛注：正是这样。**）为此决定：

一、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之惩治反革命条例、彭真同志关于同一问题的报告、《人民日报》2月22日社论、史良部长“坚决正确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专论等4个文件，各区必须认真地组织干部学习，并结合实际进行一次检查。师及军分区以上党委应将检查结果分别向党内党外干部进行传达报告。凡对反革命丧失警惕，重案轻处，甚至和平共处的倾向，务必得到揭发批判与纠正。（**毛注：必须如此。**）

二、继续加强清匪与捕捉匪首运动，密切结合群众斗争，防止因剿匪胜利而麻痹松懈。对现有管押的积案应立即组织清理，遵照惩治反革命条例迅速判刑。今后凡属处理土匪案件，应统由军队结合地方执行，并每月向大军区报告一次。

三、加强对留用旧军官、旧人员的工作。各部队与机关应进行一次普遍的清理。（**毛注：很对，应进行一次普遍的清理。**）对这些人员除继续进行团结争取改造外，对其中个别有破坏活动的分子也必须坚决逮捕法办。对伪装投降起义混入我军之一切反革命分子，应迅速加强审查侦破，弄清材料，分别处理。只有坚决地肃清与镇压其中的反革命分子，才能更好地团结教育多数。片面地强调教育改造，放松了对他们政治上的警惕是错误的。（**毛注：很对，应当这样办。**）

四、各地现有集训尚未处理的旧军官旧人员中的特务恶霸分子，应即作出计划，迅速分别处理，不得拖延。上述第3、4两项军区另有专门指示，望注意研究执行。

毛泽东为转发上述电报的批语是这样写的：

军委直属各军事领导机关及军事学院，各大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并转各省军区党委：

请你们也照西南军区党委会一样，对于学习4个镇反文件及传达报告的问题，对于清匪问题（在有清匪任务的地方），对于留用旧军官旧人员的问题，此外还有在机关中部队中混入其他反革命分子的问题，及保密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不论过去已有检讨或尚未有检讨，均一律重新作一次检讨，**并对自己直属机关部队及各兵团军师，发出必要的指示并定期完成任务。**我们认为在一切军事机关学校部队中引起注意镇压反革命分子问题，并作出正确的处理，是目前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凡对此任务忽视者，应当受到批评。**你们的检讨及指示，应送军委一份。

毛泽东 1951年3月11日

3月13日，中朝军队在“联合国军”的反攻中，主动撤离汉城。

3月14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他写道：

“3月13日《光明日报》载有一篇天津通讯，题为《天津天主教徒奋斗前进积极展开自立革新运动》，写得很好，请予广播，并在《人民日报》转载。同日该报还刊登了天津津沽大学教授张羽时的一篇文章，题为《和天主教教友们谈怎样爱教》，说明天主教革新的理论根据，很有说服力，请考虑在《人民日报》转载。”

3月15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说：

“《矛盾论》的原稿请即送来。凡校对，都须将原稿连同清样一起送来。以前的一切原稿均请送来。”

3月16日，志愿军第3兵团领导机关在北京组成，由陈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王近山，副政治委员杜义德，参谋长王蕴瑞，政治部主任刘有光，副参谋长李懋之；下辖原第2野战军第3兵团第12军、第4兵团第15军、第18兵团第60军。

此后，第60军军长韦杰（原军长张祖谅因任川西军区司令员，由韦杰继任军长）、政治委员袁子钦率第179师、第180师、第181师，于3月17日由安东入朝参战（第60军后来又隶属第20兵团）；3月18日，王近山副司令员（陈赓尚未到职）率志愿军第3兵团领导机关由安东、长甸河口渡江入朝；第12军军长曾绍山、政治委员李震、副军长兼参谋长萧永银率第31师、第34师、第35师，于3月21日由长甸河口入朝参战；第15军军长秦基伟、政治委员谷景生率第29师、第44师、第45师，于3月25日由安东入朝参战。

3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关于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被反革命分子刺杀身亡事件的通报。

黄祖炎，1908年出生于江西南康；曾两度调到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任秘书长，兼任毛泽东的秘书，先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4年。本传第三卷中曾经说过，1934年9月毛泽东到于都县进行调查研究，由于操劳过度，加上身体虚弱，得了疟疾，高烧不退，昏睡在床。黄祖炎和警卫员陈昌奉、吴吉清等人日夜守护在他的身旁。长征前，黄祖炎被调到了中央地方工作部，不久，他患了肺炎，过草地时，发高烧瘫倒了。毛泽东知道后劝他把烟戒掉，并半开玩笑地使了激将法，说：“你要是能戒了烟，那我就戒饭了。”黄祖炎还真的把烟戒掉了。毛泽东对黄祖炎很信任也很关心，到达陕北后，便把黄祖炎从红军总政治部调到身边，让他兼任中央机关党总支副书记。西安事变后，国共实现了第2次合作，毛泽东派黄祖炎去赣南协助陈毅等组建新四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先后担任中央长江局高干训练班主任、新四军第2纵队4师副政委等职。1950年3月，黄祖炎担任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1年接替廖容标兼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就在3月13日那天晚上，济南市政府礼堂里灯火通明，山东军区文化部召开的文化工作座谈会正在进行着，参加会议的200余名干部都身着军装，佩带手枪。黄祖炎讲完话走下讲台，坐在第一排的中间位置，其余座位因许世友等军区领导未出席都空着。大约在21时10分左右，惠民军分区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长王聚民手持左轮手枪，越过第3排，枪口贴近黄祖炎的头部，“砰”一声，击中了黄祖炎。

凶犯王聚民与黄祖炎有何深仇大恨？为什么要枪杀他？原来这王聚民出身于山东文登县一个地主家庭，他1940年参军，入伍前是一个小学教员。解放后，他的父亲在土地改革中被斗，家里的土地也被贫下中农分了，他便以组织名义向当地群众施压。当地群众联名写信向他所在部队反映情况，并揭发其1938年曾向敌人密告过两名地下共产党员。此信被人误拆，内容传入他耳，他认为大事不好，遂行凶报复，枪杀高层领导，致使黄祖炎遇难。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立即将黄祖炎遇害的消息报告了党中央和毛泽东。

毛泽东闻讯后十分震惊，遂于3月18日拟出了通报，发往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志愿军党委及其他有关单位。他在《通报》中写道：

“为吸取黄祖炎被害教训，中共山东分局于事发第二天即3月14日，向所属单位发出7条指示，指出：**黄祖炎同志被刺，说明了阶级敌人当我坚决镇压反革命日益深入之际，用刺杀、暗害的恐怖手段来进行报复，企图以此混乱我内部，动摇我镇反的决心，这一事件也暴露了我组织内部的不纯和保卫工作的松懈无力**。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要以这次血的事件教育全党，加强机关和首长的保卫。”“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

接着，毛泽东为转发黄敬关于天津镇反补充计划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大中市委，省委，区党委：

各大中城市的镇反工作，过去几个月一般劲头很小。这主要是由于领导机关对反革命的严重性及镇反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而来。从2月起，先有北京市，现在又有天津、重庆两市动起来了，这是好现象。**大城市是反革命分子及其领导机关潜藏的最主要的巢穴，必须用很大的力量去对付，必须认真研究，周密布置，大杀几批，才能初步地解决问题。**下面是天津的计划，这个计划是正确的。天津准备于今年一年内杀1500人（已杀150人），4月底以前先杀500人。完成这个计划，我们就有了主动。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毛泽东 3月18日

毛泽东还电示饶漱石和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西南局书记邓小平、西北局第一书记习仲勋，他在电文中写道：

漱石、子恢、小平、仲勋同志：

**民主人士及大学教授愿意去看土改的，应放手让他们去看，不要事先布置，让他们随意去看，不要只让他们看好的，也要让他们看些坏的，这样来教育他们**。吴景超、朱光潜等去西安附近看土改，影响很好。要将这样的事例教育我们的干部，打破关门主义的思想。

　　 毛泽东 3月18日

3月20日，毛泽东为转发中南局关于城市镇反指示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市委及5万人以上的中等市委：

城市镇反工作极为重要。最近华北、东北两区各大中城市均已动作起来了，反映极好。重庆亦已实行第一次大逮捕，反映如何，待报。中南局已于3月16日发出城市镇反的指示，这个指示是正确的，特转给你们参考。**应在一切大城市中等城市及小城市（包括县城及大市镇）布置镇反展览会，此种展览会作用极大。**

毛泽东 3月20日

他还为转发北京市委关于人民群众拥护镇反的情况报告写了一个批语：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凡工作好坏，应以群众反映如何为断**。**直至现在党内还有不少干部不了解坚决地正确地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你们应将镇反经验及群众欢迎镇反的反映随时通报各地，使此项经验及反映迅速传播，以利仿行，并使胆怯的同志振奋起来。下面是北京人民欢迎镇反的反映，可以看看。

毛泽东 3月20日

3月20日这一天，毛泽东又致函胡乔木，就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作出指示，他写道：

“1、宣传会议可自5月5日至15日开10天，如15日以后四中全会还未开会，再延长5天，否则不要延长。2、理论教育决定可先以草案发各地，通知照发。3、选集提前发表的少数文章，待看后送你，4月或可发表一二篇。《学习》上不要发表我的文章。”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第3个问题，是指《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编选问题，后来在1951年10月12日出版发行。此前，邓拓在1944年5月主持编选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未经毛泽东改定。

3月23日，毛泽东在向各地转发罗瑞卿的镇反考察报告时批示道：

“当此镇反工作紧张时期，上级派出负责同志或工作组去各地检查和帮助工作，有很大作用，请你们尽可能派人出去为要。”

3月24日，毛泽东关于同意上海市委镇反计划给饶漱石的指示电，他写道：

饶漱石同志转上海市委：

同意3月15日上海市委的镇反计划。这次计划有具体执行的步骤，有时间，有准备杀关管的数目字，比过去大进一步了。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要大捕大杀几批，首先要取得党内思想的一致，关于这一点，可参看沧县地委的经验。其次要取得各界人民的拥护，关于这一点，可参看北京市委的经验。他们是先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一个一般拥护中央镇压反革命条例的决议，然后进行大逮捕。如果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不久要举行，也可以这样做，否则可以先逮捕。**北京市取得各界代表人物拥护的方法主要是一次100多人的小型会议，又一次5000人的大会。前者除说明情况外，还陈列典型的证据和案情给他们看，结果引起群情愤激，一致要求坚决镇反。后者已于3月24日召开，主要由苦主登台控诉，以期争取5000个代表人物的拥护，会后即大杀一批。**由北京的经验看来，民主人士和资产阶级是可以取得他们拥护的，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得好。**镇反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镇反包括：（一）社会上的反革命；（二）隐藏在军政系统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三）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镇压这3方面的反革命，当然要有步骤，不能同时并举，但是对于党政军的某些最重要部门特别是公安部门则须及时清理，将可疑分子预作处置，使这些机关掌握在可靠人员手里，则是完全必要的。在可能的条件下也可以将一二两项同时做，例如西南军政委员会直属机关的清理工作已经在做，并且有成绩。

毛泽东 3月24日

3月27日，毛泽东给李达写了一封信。

此前，毛泽东的《实践论》在1950年底重新发表后，李达写出了8万多字的《〈实践论〉解说》一书。他在写作此书时，每写完一部分就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百忙中为他修改。凡是书稿中写有“毛主席”3个字的，毛泽东都通通圈去，改为“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写道：

鹤鸣兄：

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践论〉解说》第2部分，均收到了，谢谢您！《解说》的第1部分也在刊物上看到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极大的作用。待你的第3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第2部分中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两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加斟酌。如已发表，则在印单行本时修改好了。

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顺致

敬意！

毛泽东 3月27日

写罢，毛泽东又加了一句：

“《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

3月29日，毛泽东看了《光明日报》刊登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吴景超，在考察西安附近土改回京后所写的《参加土改工作的心得》，写信给胡乔木说：

“写得很好。请令《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令新华社广播各地。”

3月30日，毛泽东在转发山东分局关于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山东有些地方存在着劲头不足的偏向，有些地方存在着草率从事的偏向，这是全国各省市大体上都存在的两种偏向，都应注意纠正。特别是**草率从事的偏向，危险最大。因为劲头不足，经过教育说服，劲头总会足起来的，反革命早几天杀，迟几天杀，关系并不甚大。唯独草率从事，错捕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请你们对镇反工作，实行严格控制，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

毛泽东 3月30日

接着，毛泽东为转发川西区党委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华北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及地委：

**除抗美援朝工作必须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一起去做不必再说外，土改、镇反两项工作，也必须使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参加，越多越好。**请你们计划一下，在今年夏、秋、冬3季的土改工作和镇反工作，从各大城市中等城市分几十批组织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教授、教员、资本家下乡去参观，或参加工作。只要他们愿意去，就要欢迎他们去。不要怕他们去，不要向他们戒备，因为他们不是反动派。好的坏的，都让他们去看，让他们纷纷议论，自由发表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至于城市中的镇反工作，更要让他们参加，整个城市的人民都要讨论镇反工作，大家注意对付反革命。下面是川西区党委的报告，请你们看一看。

　　 毛泽东 3月30日

他又为转发黄克诚关于湖南镇反问题的意见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黄克诚同志，并告子恢，漱石，小平，剑英，仲勋，一波，高岗同志：

我认为黄克诚同志3月23日的意见是正确的。**镇压反革命无论何时都应当是准确的精细的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并且完全应由上面控制。**捕人要仿照天津专区发拘捕证，照证捕人的办法，不能乱捕。凡各地有如黄克诚所说“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者，应立即加以收缩，进行检讨，并作出结论。畏缩不前尚未开展者，则应当推动其开展。请你们严密注意这两种情况，好好掌握，不要出乱子。如你们认为有必要，请将此电转发各省市。

毛泽东 3月30日

毛泽东还为转发中南局关于加强镇反宣传工作的指示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大军区，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地委及地方军区并告中央各直属部门：

**对镇反工作宣传不足是普遍的现象。对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报纸揭露太少。对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各界民主人士参加镇反工作，真正与闻其事，各地做得太少。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北京、天津两市最近两星期来大有进步，对镇反大张旗鼓，广泛宣传，普遍揭露，**利用几十人，百余人，几百人，几千人乃至万余人的会议，利用报纸和广播电台，利用展览会，大肆宣传，使家喻户晓，使全体人民及各界民主人士均参加镇反工作，粉碎了神秘主义，小手小脚，畏首畏尾的作风，收效非常之大。**中南局现亦发了指示，扩大镇反宣传，可为各地参考。

毛泽东 3月30日

尔后，他起草了一个关于召集各界代表人物开会通报镇反情况给东北局的指示电：

东北局：

3月19日电悉。你们开座谈会讨论镇反工作的经验很好。**在各城市及新区进行有计划的大批逮捕反革命之前及逮捕以后，要召集更多的各界代表人物开会，北京曾召集一次5500人的会，天津曾召集一次10000多人的会，均是各界代表人物，不是普通群众。在下面则应召集代表人物的和普通群众的两种会，使家喻户晓。**

毛泽东 3月30日

3月31日，毛泽东关于播发许建国等在天津镇反大会上的发言写了一个电话稿：

用电话告乔木：

将3月30日天津报纸所载镇压反革命大会上许建国的报告全文，黄敬结论全文及王淑云（被恶霸迫害致死的搬运工人王士英、王士宏的妹妹——笔者注）的控诉词（采用进步日报的稿子）加以广播，并将天津这次开会情况写一条新闻广播。

毛泽东 3月31日

接着，毛泽东给湖南衡山的故友彭友胜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友胜先生：

3月14日来信收到，甚为高兴。你的信写得太客气了，不要这样客气，你被划为贫农成份，如果是由群众大家同意了的，那是很好的。工作的问题，如果你在乡下还勉强过得去，以待在乡下为好，或者暂时在乡下待住一时期也好，因为出外面怕难于找得适宜的工作位置。**如果确实十分困难，则可持此信到长沙找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程星龄先生，向他请示有无可以助你之处。**不一定能有结果，因程先生或其他同志都和你不相熟，不知道你的历史和近来的情况，连我也是如此，不便向他们提出确定的意见。如果你自己愿意走动一下，可去试一试。去时，**可将你在辛亥革命时在湖南军队中工作过并和我同事（你当副目，我当列兵）一点向他作报告，**再则将你的历史向他讲清楚。

此复，顺致敬意

　　 毛泽东 3月31日

毛泽东又给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省文教委员会主任程星龄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彭友胜寄来的原信。他在信中写道：

星龄兄：

此人叫彭友胜，据我过去的印象是个老实人，40年的历史不清楚，**辛亥革命那一年在湖南军队充副目（即副班长），我在他那一班充列兵，后来在广州见过一面。**现来信叫苦，我已复信叫他待在乡下，不要出外；如果十分困难，又出于自愿，不怕无结果，则可持我的复信到长沙找你，向你请示：是否可以对他有帮助。我在复信上已说明，不一定有结果，因为程先生他们不清楚彭的历史，连我也不清楚，不便提出确定的意见。他来见时，请你加以考察，如果历史清白，则酌予帮助，或照辛亥革命人员例年给若干米，或一次给一笔钱叫他回去；如有工作能力又有办法，则为介绍一个工作而不用上二项办法。请酌定。

毛泽东

1951年4月1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说：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矛盾论》，请不要送去翻译，校对后再送我看。”

4月2日，毛泽东致电饶漱石，并告邓子恢等人，他在电文中写道：

漱石同志，并告子恢，剑英，小平，仲勋，一波，高岗，德怀同志：

同意漱石同志3月29日报告的各项意见。**关于镇压反革命，目前重点仍在“外层”，**但对“中层”、“内层”的首脑机关及要害部门必须及时加以清理，对某些已有材料或可疑的分子必须及时进行处理，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华东局并规定了几项清理和处理的步骤和办法，都很正确和必要，请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加以注意。**志愿军虽然处在作战的环境，亦须加以注意，保证各级首脑机关及各要害部门的安全和纯洁。**

毛泽东 4月2日

接着，毛泽东为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大张旗鼓经过群众进行镇反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区党委，地委：

**镇压反革命无论在城市在乡村均必须大张旗鼓，广泛宣传，使人民家喻户晓。**北京的方法，请各地一致仿效。**镇压反革命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最主要的是捕人杀人名单的批准权必须控制在地委市委一级手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现在可以说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各级党委的注意力，主要应放在精细审查名单和广泛进行宣传这两点上，抓住了这两点，就不会犯错误。北京市委因为抓住了这两点，所以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毛泽东 4月2日

4月3日，毛泽东应梅兰芳之邀，为中国戏剧研究会成立题词：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4月5日，毛泽东给他的堂兄兼塾师毛宇居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毛宇居写了一篇《毛主席轶事》，其中有言：“在私塾数年，略解文字，最爱《三国演义》、《说唐》、《水浒传》。”“后到省求学，知识日开，大有世界观，各师友无不爱赏之。有次由省归来，吾房祖简臣公与之戏问道：你读书将来做何事？他应声答道：我要为翻天覆地之事。”3月份，毛宇居将文章抄好后，寄到北京，请毛泽东过目并交报社发表。毛泽东接到毛宇居的信和文稿后，仔细看了，觉得以不发表为宜，就给毛宇居写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写道：

宇居兄：

历次各信及最近长函均收，甚谢。诸承关怀，具见盛意。惟轶事有些内容不适合，似以不印为宜，原稿奉还。复颂兴居佳胜！

乡友便此致候。

毛泽东

毛宇居的这篇《毛主席轶事》终究没有问世，直到他1964年逝世，始终被锁在湘潭档案馆里。

4月7日，毛泽东为转发福建省公安厅关于镇反情况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漱石，子恢，剑英，小平，仲勋，一波，高岗同志：

兹将福建公安厅关于福建镇反工作的报告转给你们参考。**福建有些地方情况特殊，反动派多，处决的比例较大，这是可以理解的，别地自不应援例也杀这样多，但有些情况相似者，亦可仿照办理。福建方面最值得重视的经验是发动最广大群众参加镇反工作和派遣工作组下去巡视镇反工作。**

关于工作组，我认为各省都应当注意，即由省级机关组织几个有训练有能力的工作组，分往各专区，直到县级去巡视，有偏差者帮助纠正，积案太多者帮助清理，不敢放手者帮助开展工作，发动群众不足者告知发动参加的办法。这样的工作组，对于坚决而正确地开展镇反工作，当有很大的帮助，请你们研究推行为盼。

毛泽东 4月7日

4月7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说：

“1、送来的文件，缺少《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军委给解放军的命令》一篇，请补印送校。2、请将《兴国调查》中《斗争的各阶级》这一章的原文清出送阅，在我这里的印件中缺少这一章。3、已注文件，请速送阅。”

4月9日，毛泽东在病中“关于13兵团的任务”问题致电彭德怀，他写道：

德怀同志：

**我尚在休养，对朝鲜战况不甚清楚，请将你对敌情的估计和我方企图撮要见告**。关于13兵团的任务，在新的战役中除以一部位于元山、咸兴防敌登陆外，**主力（应补充新兵）似宜位于战场附近，担负歼灭敌可能降落的伞兵，协助各兵团作战，**待战役完结该兵团始进入正式休整。这样是否妥当。又朝鲜人民军已补充否。

毛泽东 4月9日

4月10日，毛泽东为镇反工作中的两个突出经验起草了一个通报，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大中城市市委，区党委：

据中央公安部3月22日报告称：最近一时期的镇反工作有两个突出的经验：第一，**有计划有准备地大规模地在同一时间内搜捕大批反革命分子**，从北京、天津、河北、平原、察哈尔的实际行动，证明这是一种搜捕社会反革命的有效的不可少的步骤。**这种方式给敌人打击最大，给群众教育极深刻，社会波动亦不大。只要掌握准备充分、对象准确、组织严密、指挥统一、行动迅速、严明纪律、及时宣传等项原则，就可以保证不会抓错，而取得群众拥护与社会同情。**第二，北京、天津、张家口等城市的经验证明，召开城市中市级和区级的各界代表会和协商委员会扩大会，并有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宗教界，工商界的许多代表人物参加，以揭露反革命罪恶，宣传镇反政策，消除民主人士的思想疑虑，动员各阶层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方法，是成功的。综合这几个地方的经验：

1. 是负责首长亲自主持，公安机关作镇反情况报告，有准备地分类作案件介绍，只介绍重大案件和首恶人犯，不是报告所有人犯。**用活人、活事讲解政策，激发对反革命的仇恨，取得各界人士的拥护**。

二、是会上**展览反革命罪证、图片、案卷、供词和真凭实据，打消各种疑虑。**

三、会前要充分准备，会中要坚持原则。既定处决的案犯，坚持不能变动。

四、要上下结合，动员群众的力量，说服民主人士。

五、要分别对待，对诚心拥护但有疑虑者要耐心解释，提高其认识；对别有用心者要用事实铁证使他无话可说。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应当推广等语。这两点总结很好，请你们注意照办。

毛泽东 4月10日

接着，毛泽东为转发天津市委关于企业系统查出内奸的情况报告写了一个批语：

漱石，子恢，剑英，小平，仲勋，一波，高岗，荣臻，伯承，陈毅，贺龙，宗逊，谭政诸同志，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区党委及省级军区各负责同志：

据天津市委报告，在企业系统查出13名混入党内的奸细，其中满玉华窃取了工会副主任职务，杨友亭窃取了天津市各界代表会的代表，市府救灾委员会委员，纺织工会执行委员，中纺三厂工会主任等要职等情。请你们密切地注意这个内奸问题，从天津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毛泽东 4月10日

4月11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魏巍撰写的关于抗美援朝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事迹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毛泽东读了这篇文章，当即批示道：“印发全军！”

4月11日这一天，由于“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损失惨重，迫使杜鲁门中途易帅，麦克阿瑟被解职，由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4月11日晚，原第4野战军第47军军长曹里怀、政治委员李人林率第139师、第140师、第141师，由辽宁安东入朝参战，隶属志愿军总部（后来隶属第9兵团）。

4月13日，毛泽东为转发南京市委镇反工作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关于在镇反工作中有计划地统一逮捕和有计划地广泛宣传这两点，现在华北、华东、东北3大区均已实行，或者正在准备实行。请中南、西南、西北3大区亦研究这样做。如不能做到各大中城市同时动手统一逮捕，至少应做到一个城市统一逮捕（重庆、兰州已是这样做了）。**至于事前事后使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宗教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真正与闻其事，并向全体人民展开宣传讨论，使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更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是南京市委的报告，可为参考。**过去该市手面太小，不敢大张旗鼓杀人，现已彻底转变，做得很好，大有成绩，并且跑到许多城市的前面去了。**

毛泽东 4月13日

毛泽东又为转发济南市委镇反工作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下面是济南市委关于镇反工作的报告，很好，请各大中市委注意研究，照此办理。

**我希望各大中市委均有一个报告给中央。**现已收到北京、天津、青岛、济南、重庆、兰州等6处的报告和上海、南京、杭州3处的计划，均很好。**请各未报告的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例如各省省城及汕头、梧州、衡州、宜昌、九江、安源、芜湖、无锡、苏州、宁波、厦门、石家庄、唐山这一类城市，均向中央做一个镇反工作的报告**。

毛泽东 4月13日

接着，毛泽东复电给彭德怀。

此时，第4次战役尚未结束，彭德怀在艰难的全线防御战中，提出了一个下一阶段的反攻作战计划，他在4月10日24时关于第5次战役部署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我作战企图，拟从金化至加平线，利用这一带大山区劈开一个缺口，将敌人东西割裂，然后用9兵团和19兵团对西线敌人进行战役两翼迂回，3兵团正面攻击，以各个分割歼灭敌人。**力求在三八线北歼灭敌人几个师，得手后再向纵深发展**。攻击时间，如敌进展快，**我拟4月20日左右开始，**各兵团4月15日可集结完毕，时间较仓促些；如敌进展不快时，待5月上旬出击。

毛泽东在复彭德怀电中写道：

德怀同志：

4月10日24时电悉。一、完全同意你的预定部署，望依情况坚决执行之。二、**为防敌从元山登陆，似须以42军主力位于元山城内及其附近，确保元山，**请酌定。

毛泽东 4月13日

欲知朝鲜战场第4次战役的结果和第5次战役如何展开？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在朝鲜战场第3次战役后，毛泽东见大局已定，便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国内镇压反革命运动方面。就本章内容可以看出，从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重要性，到镇压反革命的方针、政策、方法，和镇压反革命的宽严尺度及各地的具体情况、参照经验，毛泽东对部下无不是耳提面命。有时，他竟然不厌其烦地一日数电，**目的就是要发动一场镇压反革命的人民战争，而又唯恐在运动中出现差错。**真可谓是呕心沥血矣！

**第25章**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

**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

**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

话说1951年4月中，毛泽东抽空陪同程潜、王季范、程星龄驱车前往十三陵游览，并与他们合影留念。

十三陵位于北京市西北方向的昌平县境内，离北京市区有百里之遥。所谓十三陵，是指明朝13座皇帝的陵墓，又称明十三陵或明陵，它们是成祖朱棣的长陵、仁宗朱高炽的献陵、宣宗朱瞻基的景陵、英宗朱祁镇的裕陵、宪宗朱见深的茂陵、孝宗朱祐樘的泰陵、武宗朱厚照的康陵、世宗朱厚熜的永陵、穆宗朱载垕的昭陵、神宗朱翊钧的定陵、光宗朱常洛的庆陵、熹宗朱由校的德陵、思宗朱由检的思陵。此外，还有几个埋葬后妃和夭折皇子的坟墓。

这一带是燕山山脉的一条支脉，以长陵所在的天寿山为主峰，东西均有山峰环抱，形成一个极为理想的山谷盆地，13座陵墓就分布在这片大约4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而且各靠一座山峰。整个陵区大体上坐北朝南，两侧有虎、蟒二山拱卫，而西南方向就是人口稠密的区域。

毛泽东一行由十三陵护林工作者王富有导游，先看长陵。长陵大门内，工作人员郭玉奎正在翻晒药材。毛泽东看到大殿石阶上晒有很多药材，就问：

“这是从山上采来的？”

王富有说：

“是我们俩在巡陵路上，见到陵旁山坡的药棵子，顺手采来晒干卖给收购站，换来钱改善伙食。我俩都是津贴制，生活不宽裕。”

毛泽东笑着说：

“很好，这是个好主意。”

一行人进入长陵墓隧洞，又走上宝城，观看矗立在那里的“大明成祖文皇帝之陵”的石碑，再看看周围山景，还登上丘顶松柏林间，毛泽东说：

“这个成祖永乐皇帝朱棣，敢在北京建都城，敢把自己的陵墓放在这里，不怕蒙古人的铁骑，是个有胆识的人。这个皇帝长住土木行宫，理政练兵，很少在京城金殿办公，不忘戎武，这很不容易了。”

出了长陵，毛泽东说：

“我们去看看嘉靖皇帝陵，那叫什么陵？”

王富有说：

“叫永陵。”

毛泽东一行乘车向南走，拐入永陵道口，在永陵村头的坡下停了，下车顺着一条路步入永陵。

这里的大殿已经毁坏殆尽，只剩下宝城上的一通“大明世宗肃皇帝之陵”石碑。陵园内十分荒芜，松柏树木极少，村民还在这里拦着一群山羊。

毛泽东走在前面，上宝城绕了一周，登上墓顶土丘，一边看一边往下走，他说：

“永陵是朱厚熜皇帝陵。这个皇帝特别迷信，20载不亲朝政，偏听偏信，重用奸臣严嵩达20年之久，还将清官海瑞下了大牢。这个皇帝死后，他的儿子隆庆皇帝才放出海瑞。”

走出永陵，毛泽东说：

“去定陵看看吧。”

一行人驱车来到定陵门口，待工作人员打开门锁，步行进入定陵。定陵的规模仅比长陵小一点，大殿已毁。王富有引着毛泽东游了宝城，这里的碑楼全是由石块雕琢砌成，碑刻“大明神宗显皇帝之陵”几个大字。毛泽东说：

“这个碑楼不怕火烧嘛！”

他绕着巨大的碑楼看了一圈，说：

“定陵葬的是万历皇帝，他叫朱翊钧，就是京剧唱二进宫里的李艳妃抱的小皇帝，他10岁登基。这个人长大了，酒色财气都好，极度奢侈腐败，长期荒政，他是明亡的种子，是个无道昏君。他当了48年皇帝。”

毛泽东一行又踏上墓丘，观赏了松柏林。回到定陵门口，毛泽东问：

“南边能看到的是哪个陵呀？”

王富有说：

“是庆陵，万历是他的父亲。庆陵皇帝墓，已经破烂不堪了，您去看看吗？”

毛泽东说：

“时间太长不去了，耽误你这么长时间，谢谢你喽，我们送你到定陵桥上。”

王富有说：

“您刚才在3个陵讲的话，我都听清了，也记住了，对我教育很大，希望您今后再来逛陵。”

毛泽东面带笑容地握着王富有的手，说：

“再见吧！”

4月15日，志愿军第3、第19兵团入朝参战，分别在伊川、铁原、平康地区和南川店、市边里、兔山地区完成集结，原在元山地区休整的第9兵团也在平康、洗浦、淮阳地区完成集结。联合国军发觉志愿军后续兵团到达，加上连续作战部队损伤严重，因此除在铁原、金化地区继续发动进攻外，在其他地区基本上停止了进攻。

4月16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说：

“此9篇请送陈伯达同志阅后付排改正。其中，和英国记者谈话，和中央社记者谈话，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等4篇，我已照原件修改，请即照此改正，新送来这4件稿子我就不必看了。以上这些及昨付第2次看过的一大批，都可付翻译——惟其中的一篇，即《井冈山的斗争》，请送来再看一次。”

4月17日，毛泽东就“注意对付敌可能降落的伞兵”问题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

德怀同志，并告高岗同志：

4月14日电悉。你对于38军、42军的部署及开辟中间运输道路的计划，均甚好。但**尚有一事请注意，即敌人若从中间各地降落伞兵，例如敌冒险以一个伞兵团在熙川、球场、德川区域降落，以一个伞兵团从破邑、谷山、遂安、伊川区域降落，到处乱窜，扰我后方，此种可能性很大，请速筹对策**。50军现在何处休整，是否可以用于这一地区的防卫。

毛泽东 4月17日

接着，毛泽东为转发西北局关于加强镇反宣传工作指示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西北局这个指示强有力地指出在镇反工作中展开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并规定了5条办法，一切地方都应当这样做。**凡属现在仍然小手小脚，不敢大张旗鼓作宣传，不敢吸引广大党外人士共同参加镇反工作，以致引起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的地方，尤其要即刻改变作风，并且愈快愈好。**

毛泽东 4月17日

毛泽东又为转发宿县地委关于运用农代会布置镇反工作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及地委：

**皖北宿县地委运用农民代表会议布置镇反工作，审查镇反工作及审查基层干部和党团员的经验，一切新区均应照此办理，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

毛泽东 4月17日

4月19日，毛泽东在罗荣桓、罗瑞卿等人的一份联名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

原来在4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兼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公安部长罗瑞卿、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与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就济南反革命刺杀事件的经过、王聚民的历史和行凶原因以及应当汲取的教训，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

“兹将罗荣桓、罗瑞卿诸同志关于黄祖炎同志被刺案调查报告发给你们研究。像王聚民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很早就有许多罪恶表现，全党全军如有类似这样的人，务须注意及时处理。”

4月21日，历时**87天的第4次战役**结束，中朝部队战斗损失共53000人，歼敌78000余人。

**是役，联合国军主动出击，步步进逼；中朝军队与主动出击的前3次战役不同的是，且战且退，进行所谓的“主动防御”，全线防御，结果，双方打成了一个消耗战。**战至3月底4月初，中朝军队全线转移至三八线以北附近地区，联合国军则再次越过三八线。4月21日，**联合国军被阻止在开城、长湍、高浪浦里、文惠里、华川、杨口、元通里、杆城一线，**第4次战役因中朝军队准备反击遂告结束。

4月22日，为了粉碎美军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实行南北夹击的阴谋，中朝两军发动了反击作战的第5次战役。

4月22日傍晚，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和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3人，在第18军联络部长乐于泓和平措旺阶的陪同下，从陆路抵达北京。

4月下旬，毛泽东特意邀请他在湖南一师的国文老师袁吉六先生的夫人戴常珍到北京参加“五一”节观礼。他还为袁先生书写了碑文：“袁吉六先生之墓”。

4月26日，在亚东的藏军总司令凯墨·索安旺堆和僧官土丹旦达2人由印度乘飞机经香港到京。

4月27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等官员一行14人到达北京。

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代表，在北京车站和飞机场均受到了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及各界代表上千人的欢迎。他们被安排在豪华的北京饭店。

4月27日这一天，毛泽东给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司徒美堂先生写了一封回信。

早在4月上旬，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司徒美堂南下广东侨乡鹤山视察土改，他以所见所闻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粤中侨乡的土改》专栏文章。4月14日，司徒美堂上书毛泽东，报告土改情况，还说他要在广东农村再参观一段时间，并将农民献给毛泽东的礼物一并委托致公党的黄鼎臣带往北京。毛泽东接到司徒美堂的报告和礼物，立即复信给司徒美堂，他在复信中写道：

美堂先生：

4月14日来信收到，甚慰。鹤山农民同志们送来的礼物也收到了，请先生转告他们，并致谢意。先生在南方暂留一时期很好，希望先生能于6月上旬返京，面聆教益。

敬祝健康！

毛泽东 4月27日

后来，这封复信由粤中报制版刊出，侨乡农民也十分高兴。

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关于同意志愿军第5次战役作战方针的电报上加写了一段话，他写的是：

“**请注意在此次战役中，对伪1师、美3师、25师、24师、土耳其旅及英28旅给以尽可能大的打击，目前这几天似乎还有此种可能，如能在此战中歼灭敌军15000至20000人，则于今后作战很有利。**”

4月28日晚，周恩来身穿深灰色呢制中山装，和李济深副主席、陈云副总理、黄炎培副总理一起，宴请了西藏和谈代表。

周恩来宣布了中央人民政府参加和谈的代表名单，首席代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代表：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军长张国华，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

周恩来说：这次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和平谈判，要以‘十条’为准，‘十条公约’规定的内容是谈判的基础。

此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又先后接见了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代表，向他们耐心解释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

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首席代表李维汉，代表张经武、孙志远（张国华尚未赶到），与西藏地方政府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及其他4位全权代表，在北京军管会交际厅进行第一次谈判。

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和谈10项条件和西藏的实际情况，主动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尽量听取和采纳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建设性意见。谈判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根据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制定一系列合乎西藏实际的方针、政策的过程。

4月30日，毛泽东为转发西南局关于镇反问题给川北区党委的指示写了一个批语：

各中央局，并即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

**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损失劳动力。**

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不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有特殊情况者可以超过这个比例，但须得中央局批准，并报告中央备案。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例如北京人口200万，已捕及将捕人犯10000，已杀700，拟再杀700左右，共杀1400左右就够了。其**原则是凡有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应坚决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中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如他们在劳动中能改造，则第二步可改判无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凡判徒刑一年以上者，一般都应组织他们劳动，不能吃闲饭。）这样，主动权抓在我们手里，尔后要怎样办都可以。

这个问题，即将提到5月10日在北京开会的公安人员会议上讨论，并做出决定。你们有何意见，可告你们那里来京开会的公安人员带来，或打电报来。

下面是西南局给川北区党委胡耀邦同志的指示，这个指示是合于上述原则精神的，特转发以供参考。

毛泽东 4月30日

1951年5月1日，春光明媚，阳光灿烂。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彩旗如林，歌声如潮。各族人民满怀胜利的喜悦，庆祝劳动人民自己的节日。

城楼上红灯高挂，红旗飞舞，许多领导人早早地来到城楼上，兴高采烈地看着沸腾的广场。他们当中有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有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有各行各业的英模代表，有志愿军归国代表，有专程来京参加观礼的各少数民族代表，还有一些兄弟国家的领导人。

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首席谈判代表李维汉和全权代表张国华等人陪同下，西藏代表团的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等也早早地来了，在城楼休息室里等候着毛泽东接见。

上午10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张澜、李济深、沈钧儒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热烈的欢呼声中登上城楼。彭真宣布大会开始。

不久，典礼司司长余心清来到休息室，通知李维汉、张国华，毛泽东会见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的时间到了，他说：

“请客人去吧！”

班禅穿了身桔黄色的缎子藏袍，显得庄重、潇洒。阿沛·阿旺晋美是噶夏政府的噶伦，穿了身藏袍，头戴礼帽。他俩的这身装束，在整个天安门城楼上十分显眼。当他们走向毛泽东时，很多人投以友好而好奇的目光。班禅庄重而又十分恭敬地向毛泽东献上哈达，然后双手合十，虔诚地为毛泽东祈祷祝福。毛泽东慈祥地握着年仅13岁的班禅的手，对他说：

“很久以来中国的历史，西藏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过去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对国内各少数民族实行羁縻压迫的政策，这是反动的，不好的。但是，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维护了我们国家的统一，使西藏没有被帝国主义霸占去。这一点还是应该肯定。”**

他勉励班禅要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为西藏和平解放作出贡献。他还亲切地说：

“要搞好团结。**国内各民族要团结，西藏内部也要团结。要与达赖喇嘛搞好团结**。你可以给达赖发电报，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主张和平解放西藏，保护寺庙，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阿沛·阿旺晋美也向毛泽东敬献哈达。毛泽东高兴地接过哈达，举起来，轻轻地挥动，满脸笑容地让周围的其他领导人看。他亲切地紧握着阿沛·阿旺晋美的手说：

“谢谢你们啊，欢迎你们到北京来！你们从远道来，一路风尘，一定很辛苦了！”

阿沛·阿旺晋美说：

“我们在来京的路上，受到各地负责人的热情欢迎和照顾，看到各族人民空前团结的盛况。路过重庆时，刘伯承、邓小平等西南军政委员会首长接见了我们，还转达了毛主席对西藏人民的关怀和对我们的问候。一到北京，周总理代表毛主席亲自到车站迎接，这使我们深受教育。”

毛泽东笑着说：

“为了祖国团结统一，你们跋山涉水，不远万里来到祖国首都，你们是应当受到欢迎的。”

他又对阿沛·阿旺晋美和李维汉、张国华说：

“**你们要好好谈，有什么问题都摆在桌子上。可以争论，可以吵架，但不要分手，都是一家人。家里的事情，大家要商量着办，就能办好。要谈出团结，谈出进步。**祝你们谈判顺利，取得成功。祝你们在北京生活得愉快。有什么困难就找李维汉同志解决。”

5月2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克服目前学校教育工作中偏向的指示》：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委、区党委、大市委：

据2月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集的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中反映，现在各地学校教育工作中，存在着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若干地区的党、政、军机关及人民团体，往往为了眼前某些需要，不顾国家长期培养人才的计划，不遵照中央的规定，**随便抽调学生参加工作，致使学生情绪时常波动，学校无法按照一定计划进行工作。**

二、**在中等学校中，动员全体师生参加中心工作，常常停课数日以至数周，甚至有达两三个月之久者，极大地影响了学校教学计划的完成**。

三、专署以下政府中教育行政干部常常全体被派去参加中心工作，根本不管教育，以致学校教育工作陷于长期无人管的现象。**我们应该认识在土改完成后，生产和教育是两件最重大的工作。各地对于上述妨碍国家教育顺利进行的情形，应即迅速加以制止和纠正。**西南局于3月19日已发下关于学校教育改革工作的指示和决定，对上述一、二两点，已作了明白的规定，现转发你们供参考。对专署以下教育行政机构及其经常工作的建立与健全，亦望予以注意。

中央 5月2日

5月初的一天下午，中央3大新闻单位《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和中央广播事业局的负责人到中南海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胡乔木的办公室去看文件。

原来在建国最初的两年里，中央文件是不下发的，每隔两个星期，他们这些人都要去看一次。这一天去的人有《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副总编辑安岗，新华社社长陈克寒、总编辑吴冷西，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副局长徐迈进和温济泽。

温济泽在《缅怀毛泽东》一书中记载了他们这天下午的活动，他写道：下午2点去了中南海，4点左右，胡乔木说毛主席要和你们见见面。我们一听当然很高兴，那时文件不多，不到4点半，我们就看完了。我们跟着胡乔木来到毛主席办公和居住的菊香书屋。主席站在办公室的门口，胡乔木一个个介绍，主席与大家一一握手。寒暄了几句，毛主席就转脸向大家说：

“请你们来，是想了解各方面人士和人民群众对我们党、对党的政策有什么反映，有什么意见。”

安岗记得毛主席办公室陈设简单，几个旧沙发围成一圈，靠窗的办公桌上有一方砚台，几支毛笔，一个招呼人用的圆形按铃，一只茶杯，一盘点心。

毛主席说这是进城以后第一次同新闻单位的人见面。有些人毛主席在延安时就认识。毛主席是第一次见安岗，就问：

“你叫什么名字？”

安岗说：

“我姓安。”

毛主席开玩笑说：

“你是我们的安公子。”

大家听了都笑了。接着毛主席又问：

“十三妹在干什么？”

安岗说：

“十三妹在抱小孩。”

毛主席鼓着掌，连说好。（当时安岗夫人樊亢刚生孩子不久。安公子、十三妹是《儿女英雄传》中的男女主人公）。气氛一下子轻松起来，安岗的心也放松了。毛主席听完邓拓汇报后，说：

“你们对那些全国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像张申府、焦菊隐等人，要多向他们请教。”

毛主席说了一大串知识分子的姓名，最后提到吕叔湘、朱德熙两位语言大师时说：

“要请他们多为报纸写点文章。”

毛主席还说：

“一张报纸要办得让人喜欢看。这是办报人应该研究的一门学问。《中央日报》连蒋介石都不爱看，老百姓不喜欢，我们的报纸不要办成《中央日报》，要办成老百姓喜欢的报纸。”

此时正值春耕时节，许多农民到小城镇开辟肥源，如果当年在根据地办报，开展积肥运动早登上报纸头版头条了。进了城，这个问题怎么办？安岗向毛主席请教：

“进城后，城市与农村是不是要并重，不能进了城，就忘了农村，也不能因为农村报道多，不去开辟城市报道。”

毛主席听了表示赞同，他说：

“**进城后，不要忘了农民。要利用城市更好帮助农村解决问题，如肥料、农村人口就业等问题。”**

说到肥料问题，**毛主席建议在田间地头搞个养肥的处所，把找到的肥料积攒在里面，用的时候很方便，不用从家里拿了。当时农民刚分了土地，毛主席认为光分了地还不够，还应该让农民富起来。**

大家谈得很随便。毛主席问得很仔细，从工人、农民、市民、学生、教育界、科技界、文化界、工商界、民主党派，到国民党起义人员，都问到了。毛主席正说着话，一位年轻同志撩起门帘走进来，说：

“主席，大军区的司令员都在等您呢！”

安岗以为毛主席的谈话就要结束了，很有些依依不舍，不料毛主席对那位年轻同志说：

“让他们自己先谈吧！”

胡乔木悄声告诉安岗，那位年轻的同志是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同志。

5点多钟时，毛主席兴致还很高，这时有同志说要准备上晚班，还有人要去参加罗马尼亚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就站起来向毛主席告别。毛主席也站起来说：

“你们还有晚上没事的吧，留下几个，我们再谈一谈。”

最后留下了邓拓、安岗和温济泽。毛主席叫来勤务员，说：

“小鬼，你告诉厨房加3个客人的饭。”

公务员提来一个四屉饭盒，其中3个菜，一个汤，一个炒鸡蛋似乎专门加的。又拿来一盆饭，一瓶红葡萄酒。毛主席给每人斟了一杯酒，他说他只能喝一杯，要大家随便喝。大家举杯祝毛主席健康，不过都没有喝干。

安岗记得端上来两盘红烧肉，但毛主席没吃红烧肉，大家也都没好意思吃。毛主席吃的是义利甜面包，用手掰着吃，也吃点小菜。

大家边吃边谈，毛主席问起大家过去的经历，温济泽和邓拓30年代初期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谈起那时在王明“左倾”路线下工作的一些情况。毛主席说当时我们的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从历史谈到教训说：

**“我们现在一定要注意实际，一定要密切联系群众。我们进城了，今后要更加注意各方面的人对我们的意见，不仅要注意赞扬我们的意见，拥护我们的意见，更要多听反面的意见，批评我们的意见，多注意把这些意见，及时反映给中央。”**

临走的时候，毛主席站起来，一一跟大家握手。安岗清楚地记得：“他的手很重，我被他握得很疼，但感觉很好。”

5月5日，毛泽东特派江青持亲笔函到张治中家中慰问。

原来张治中和邵力子同是治淮视察团的负责人，他在即将动身前却病倒了。毛泽东在亲笔函中写道：

文白先生：

来信读悉。闻病甚念。视察团有邵先生领导也就可以了，您可以安心休养，以期早愈。

即颂痊安！

毛泽东 5月5日

5月7日，毛泽东在谭震林5月1日《关于杭州市逮捕反革命分子情况给华东局转报毛主席的报告》上作了6个批注：

1. 在报告概述杭州市逮捕各类反革命分子情况部分，他在“汉奸75人”后面批道：“**有血债及其他引起群众痛恨的汉奸分子，应当在此次镇反中解决。”**

二、在报告到由于事前准备充分，审批手续严格，各方面力量组织得好，逮捕秩序很好，均未抓错这一段末尾，他批道：**“应当这样慎重地做，有些地方草率从事是错误的。”**

三、在报告逮捕前后的宣传动员工作的末尾，他批道：**“不做好宣传工作，不要杀人。”**

四、报告谈到虽然逮捕和枪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但反革命的坚决分子还在顽强地反抗，已经发生向公安分局打枪、书写反动标语、制造谣言转移群众反特斗争视线等。对潜伏的反动组织只是开始发现，有了一点线索，还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他批道：**“我公安机关对于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的侦察工作，在许多城市都很差，应当在此次镇反中认真建立这个工作。”**

五、在报告吸收党外人士参加镇压反革命工作，审查案卷，核实材料，讨论量刑问题这一段末尾，他批道：**“各城市均应当这样做，不要怕麻烦。”**

六、报告还谈到杭州市确定5月份以镇压反革命为中心工作，以工厂工人、学生、居民、农民为发动群众的主要对象，以小型的控诉会、公审大会作为发动群众的方式。对文化教育界、宗教界、各民主党派、工商界有意识地放后一步，而依靠其自己的力量，进行一定的工作。他批道：**“这样做很好。”**

接着，毛泽东为转发谭震林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谭震林的报告很好，杭州的经验可在一切尚未这样做的城市应用。**特别是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审查反革命案卷一事，各地必须认真地做，坚决地打破在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

　 毛泽东 5月7日

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镇反问题的指示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地委：

兹将华北局5月6日关于镇反问题的指示电转给你们。中央认为华北局这个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各地均应照此施行。兹定于6月1日起全国除现行犯外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专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办理。各地一律照此执行。**清理积案是目前几个月内的一个极其艰巨的工作，各地必须调集大批干部，在几个月内将积案基本处理清楚，整理监狱，组织劳动改造工作**。在清理期内，各地除现行犯及由各中央局决定的少数地方外，一律停止捕人，待积案清理完毕后再捕应捕之人。兹定6月1日至9月30日计4个月为清理积案时间，亦即停止捕人时间。在此4个月内，“中层”及“内层”重点审查必须认真进行，有少数要犯须逮捕者须报请中央局批准。

中央 5月7日

5月8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并转各省军区，各兵团及志司，并告中央及军委直属各部门，各特种兵司，中央政府各党组：

中央已决定，**在共产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内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它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估计在上述党政军教经团各界清出来的应杀的反革命分子中，有血债或有其他引起群众愤恨的罪行或最严重的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只占极少数，大约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可能占十分之八九，即可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他们和农村中的匪首、惯匪、恶霸不同，也和城市的恶霸、匪首、惯匪、大流氓头及会道门大首领不同，也和某些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特务不同，即没有引起群众痛恨的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他们损害国家利益的程度是严重的，但还不是最严重的。他们犯有死罪，但群众未直接受害。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杀了，群众是不容易了解的，社会人士是不会十分同情的，又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又不能起分化敌人的作用，而且我们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因此，中央决定对于这样的一些人，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如果这些人中有若干人不能改造，继续为恶，将来仍可以杀，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下面是东北军区保卫部在军区系统逮捕第一批204名反革命分子的报告，发给你们阅看，请东北军区即照上述原则处理。各地党、政、军、教、经、团中清出来的反革命分子，请各地均照上述原则处理。其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大约占死罪分子的十分之一二），为慎重起见，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此外，**对于农村中的反革命亦只杀那些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凡人民不要杀的人一律不要杀。**其中有些人亦应采取判死缓刑的政策。**人民要求杀的人则必须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

中央 5月8日

笔者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死缓”这一重要刑名，是毛泽东的首创，在古今中外的法典中前所未有。**后来这一刑名被列入了新中国的刑法之中。

5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对土地改革业已完成地区的地主参加劳动生产及就业问题的指示》，他写道：

华东局、西北局、西南局并告中南局：

兹将中南局4月23日关于地主参加劳动问题的电报发给你们，望你们注意处理这个问题。**在土地改革业已完成、对地主的斗争已经相当彻底的地区，领导上应该说服农民主动的向那些表示服从的地主和缓一下，以便争取多数地主参加劳动，耕种自己所分得的土地，维持自己的生活。对于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或有其它技能，可以从事教书或其它职业者，应允许他们从事其它职业，或分配教书工作给他们。对于确实没有农业劳动力，而能作生意者，可以允许他们作生意。**但对于有劳动力，能从事农业劳动，又无其他职业者，则应强制他们劳动，不允许他们游手好闲以讨饭为生。**在他们从事农业劳动时，如有实际困难，亦应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底财，可以允许他们挖出来，投资生产，不再没收。**他们**以后生产所得，不论多少，均不再没收**。但他们不论从事什么职业，不论到什么地方，均应加以监视，使其出处明白，行踪清楚，不得改名换姓，改变成份籍贯，到处鬼混。**对于那些狡猾的至今不表示服从而表示顽抗的地主，则应继续加以斗争，使他们服从，并在可能时，亦可把他们编成劳役队强迫他们劳动。**在土地改革后，适当地处理地主，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望各地加以注意，并将经验报告中央。

中央 5月10日

接着，毛泽东为转发广东军区党委关于执行中央镇反指示的检讨报告写了一个批语：

各大军区党委会，并转各省军区及各行署军区党委会：

**直到今天为止，关于各省军区和各行署军区党委会向军委作镇反工作的报告的还很少。我们要求每个区省级军区（包括各行署军区）党委会必须一律向军委作此项报告一次，限于7月1日以前交齐，由各大军区政治部主任负责督促。届时不交报告者，将受到通令批评。**下面是广东军区党委会的报告。这个报告揭发了很多极端严重的现象，认真负责地处理了自己的问题，特发你们参考，并予通令表扬。

毛泽东 5月10日

5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在新区组织和建立供销合作社问题的指示》：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区党委：

兹将中南局4月4日关于新区组织合作社问题的电报发给你们参考。中南局在这个电报中提出了新区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乡村受土改影响，地主富农已不敢也无力经营土产运销，私营下层商业倒闭，有很大破坏，而国营贸易也无力全部解决土产运销的问题，因此，农民土产品销不出。农民在贸易上第一个要求是把土产卖出去，甚至不大注意出卖土产的价钱。在此情形下，唯一可想的办法，就是由党和政府及农民协会领导群众组织起来，自己想办法来推销土产，并换回农民所需要的物品。这就是领导农民组织合作社以推销土产的办法。**目前在新区除尽力建立国营贸易并组织私商来推销土产外，组织农民群众的合作社来推销土产，已成为迫不及待的一个办法。**应放手地普遍地在推销土产的基本要求之下来组织新区农村合作社，而不必过分小心，束手束脚，使农民的困难不能解决。为此，中南局4月4日电报中所提出的办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其中**有些说法是不妥当的，例如：“三分社会七分资本”等**。望各地加以考虑，并立即试办。如可普遍推广，应立即予以推广，以便能及时地解决农民的问题。同时，为了使新区合作社组织不致太乱，并避免过多的失败起见，特提出以下各项原则，望各地注意掌握：

一、农村合作社在党的区委领导下以集镇为基点建立基层社，在较远乡村设立分店。

二、合作社以推销土产为主要任务，在土产推销之后，再购回社员所需要的物品卖给社员，而不要将资金和人力用在其他经营上，忽视土产的推销。并须特别注意为那些滞销的土产品打开销路。即使经销这些土产品没有多的利润，亦应尽力经营，而不要只注意在那些行销的土产品上去与人竞销。为了使这个目的明朗起见，合作社的名称在最初甚至可定为土产推销合作社，而不要定为供销合作社。

三、合作社股金，由需要推销土产者自愿交纳，并可用土产品交纳，要推销的土产品多者多交，少者少交，无土产品可销只购买消费品者可更少交，可分数等，由社员民主决定每等最低限额，但愿多交股金者，可以不加限制。

四、合作社盈余分配，暂时亦可只分两部分：即公积金和股金分红。其余社员福利基金、文化教育费等暂时可不要，以后再说。如此，股金分红亦可提高到盈余的40%至50%，公积金占50%至60%。

五、土产品在本地推销，基层合作社可以自办，但远地推销必须依靠省县合作社或国营贸易机关。因此，必须建立省县合作社才能为土产打开远地销路。为此，基层合作社的股金和公积金必须提一部分交省县合作社作为远地经营土产的资金，交多少可由下级社民主决定。同时，为了经营土产品的大批远地推销，上级与下级合作社的资金和国营土产公司的资金可以互相调配统一使用。

六、为了补助资金缺少的困难，对土产品应多作代销、赊销、定销，少作现销。特别对滞销的土产品应该如此。赊销与现销比例，由合作社和社员自由议定。

七、合作社在掌握土产品后，出卖土产品应依照下列原则：1、国家及合作社需要的、在市场上缺少的物资，应优先卖给国家及合作社，并须降低利润若干卖给国家及合作社（无利润或利润太少者不降低），不得高抬价格，优先卖给私商。2、国家及合作社不需要或要不了的物资，可以向市场推销并卖给私商。并可设立批发的及零售的销售店进行广泛的推销。为了便利推销，减低成本，伸长销路，可以有计划地开设加工工厂，并可用租赁、合营、代加工等办法利用私人的工厂、工具和技术。

八、**合作社不要兼办信贷业务，农村信贷将来应由银行领导办理**。中央已另有通知。又为了使合作社业务不脱离群众起见，应**坚决反对合作社去经营那些与推销土产和供给社员必需品毫无关系的而只是单纯的以赚取利润为目的的市场交易。**

**掌握以上各项原则去经营合作社的业务，同时又注意合作社组织上的民主生活（每个社员一个表决权），就不会使合作社走到错误的路上去，而且也不能把这些办法看作是资本主义路线。**因为**资本主义的商业经营的唯一目的，是追逐利润**。而这种合作社商业经营的目的，则是为了推销土产并换回社县的必需品，它虽然也有利润，但追逐利润并不是它的目的，就是说，**它对于那些利润不高甚至没有利润但社员迫切需要的土产推销，它也要去经营，而对于那些虽有高的利润但对社员土产推销和必需品供给无关的交易，也不要化费资金和人力去经营。这就已经脱离了资本主义经营的路线。**因为它在根本上不以追逐红利为主要目的，股金分红的比例稍大一些，也不改变合作社的根本性质。望各地根据以上各项试办，并将意见和经验报告我们。

　 中央 5月11日

5月15日，第3次全国公安会议通过了一个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镇反工作的决议。

此前，公安部为贯彻落实毛泽东5月7日批示和5月8日起草的《决定》，于5月10日在北京召开第3次全国公安会议，5月15日通过了会议决议草案，并报请毛泽东审批。

毛泽东在《决议》草案中加写了几段话，主要有：

“**全国各地已经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这就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召开各种代表会，干部会，座谈会，群众会，在会上举行苦主控诉，展览罪证，利用电影、幻灯、戏曲、报纸、小册子和传单作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

“关于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

“决定从6月1日起，全国一切地方，包括那些至今仍然杀人甚少的地方在内，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处理。任何地方不得要求改变此项决定。”

接着，毛泽东为转发察哈尔省万全县镇压反革命经验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即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地委，并请各地委将此件一直转发到县委和小城市的市委：

兹将万全县的经验通报给你们，请你们仿照办理。

全国各县市的镇压反革命工作是如何进行的，**是否向群众大张旗鼓地做了宣传，是否举行了群众的控诉会，群众的反映如何，请每个县委书记和市委书记（除已写的市）都向我写一个报告，交地委和省委转送给我。我希望全国二千余县委和市委的书记同志都和我直接通信一次。**这些通信收齐后将发一通报，**其中最好的经验将如万全县一样转发各地作参考。**

毛泽东 5月15日

毛泽东又为转发中南局关于纠正镇反中关门主义倾向的指示写了一个批语：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及地委：

兹将中南局5月12日的指示电发给你们，请仿照办理。中央公安部正在组织15个视察组，每组3人，分赴华东、中南、西南、西北、东北各省区检查镇反工作，定于6月16日由北京出发。请你们即派若干视察组先去各县市实行检查，迅速纠正已经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中南方面杀人最多，宣传最少，极不相称，存在着很大的关门主义倾向，必须立即纠正。**从中南局5月12日的电报看来，中央和中南局历次指示在汉口这样的地方并未实行，等于说空话，必须立即派人下去检查，问明责任，纠正错误，不可一刻延缓。

此电请你们一直转发至地委，并请迅速转去。

毛泽东 5月15日

毛泽东还为转发4军党委关于镇反工作总结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大军区首长并告志司首长：

兹将4军党委对于镇反工作的总结报告转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责成你们的政治部负责督促所属各军，除已作总结报告者外，一律作一次总结报告。拖延不报者应去电催促**。

毛泽东 5月15日

5月15日这一天，邵力子率领各民主党派及中央有关各部委负责人共32人，组成“中央治淮视察团”，分赴皖北、河南、苏北3省工地和南京、上海、海宁等地视察。

此前，毛泽东为了支持邵力子的工作，特意亲笔题写了“一定要把淮河治好”几个大字，邵力子命人把毛泽东的题词标在4面锦旗上，准备把这4面锦旗分别赠送给豫皖苏3省及治淮委员会。邵力子说，我们走到哪里，就让它飘到哪里。

当邵力子来到淮河岸边的时候，眼前依然是疏落的荒村，歪歪斜斜的泥搭茅屋，解放的欢欣并不能冲洗淮河两岸乡亲们脸上的菜色，穿着褴褛衣服的老人和孩子们，在阳光下曝晒着嶙峋瘦骨，妇女们黑色的眼珠中，也缺少那本来应有的闪亮的神采，劳动热情高涨的千千万万民工们，吃的是野菜粗粮，喝的是稀汤。望着这一切，邵力子的心也像淮河的水一样翻滚了起来，他深感人民太苦了，建国的任务繁重啊！他的耳边又响起了毛泽东在1950年深秋对他和傅作义所说的话。是啊，一定要把淮河治好！主席提出要根治淮河，太及时啦！

邵力子在安徽的治淮工地上，恭恭敬敬地把毛泽东题写的锦旗，献给了那些勇敢的治淮英雄们。他广泛地接触群众，慰问民工，听取意见，勉励大家，尽力帮助解决困难。就这样，这位70多岁的老人，奉毛泽东之命，行程6783公里，历时52天，踏遍了淮河两岸的山山水水、大小城乡。

且说5月15日晚，一道红色电波划过长空，从北京传到了韶山。只见电报中写道：

王淑兰同志：

5月9日来信收悉，欢迎文涧泉、文运昌两兄弟来京一叙，请持此电去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见刘道衡同志，请他为两位文先生购买两张快车头等火车票，并请给路上用费，即可来京。

毛泽东 5月15日

第2天上午，王淑兰派人前往唐家圫告知文涧泉、文运昌。唐家圫的亲友们欣喜若狂，文涧泉、文运昌立即整装出发，赶往韶山招待所。

5月1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因在朝鲜战场上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无望，便和国务卿艾奇逊作出了“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为”的决策，准备与中朝两国进行停战谈判。

艾奇逊找到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让他通过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传信给中朝方面：美国准备以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

5月16日下午，毛泽东看了戚本禹起草的秘书室工作报告，就**必须重视人民来信问题**在给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的指示中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县委；各大行政区、各省市区、各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党组，并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党组：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下面是专门处理人民给我来信的秘书室关于处理今年头3个月信件工作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我认为这个报告的观点是正确的。

　 毛泽东 5月16日

接着，毛泽东起草关于将捕人杀人的批准权一律提高一级给邓子恢等人的指示电：

子恢同志，并告饶、邓、习：

5月11日电收到。为了不使步骤混乱难于掌握（目前中南、西南两区已有难于掌握的形势，必须严重注意），**捕人杀人的批准权必须一律提高一级，不许有例外**。在土改区可由省派代表至专区，由专区派代表至县，掌握材料，用电话向专区请示批准捕人，向省请示批准杀人，这样对于捕杀少数人仍是便利的。

毛泽东 5月16日

5月15日、16日，《人民日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连续转载了《文艺报》5月10日刊登的一篇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文章——杨耳所撰写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么?》；《人民日报》并加了编者按，号召文艺界对《武训传》进行深入讨论。

原来早在4月下旬，文艺界出现的有关电影《武训传》的争论，已经引起了毛泽东的严重注意。他观看了这部影片，感觉《武训传》的上映以及对武训的大肆渲染，说明在旧知识分子的头脑中仍然残存着封建主义思想流毒。他便问江青：

“这部影片的脚本，你看过吗？”

江青回答说：

“没有，他们拍什么片子是从来不让我参加会议审查的。周扬、夏衍、田汉这些人霸道得很呢！对武训这个人，我小的时候听说过，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夸大了。”

毛泽东说：

“提倡什么‘武训精神’，难道他比共产党还要高明吗？这部电影提出的问题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要注意了。我看你还是研究一下这部影片，然后准备写文章。”

江青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对《武训传》剧本和影片进行了认真研究。她找到周扬说：

“《武训传》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

江青并没有说明这是毛泽东的意思。周扬听罢，不以为然，他以为是江青在挑刺，便说：

“你这个人啊！有点改良主义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嘛！”

毛泽东听了江青的汇报，这才不得不指示《人民日报》转载杨耳的文章并加上编者按。

《武训传》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呢？说来话长，这部电影是由孙瑜根据历史人物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编导、由赵丹主演的一部传记片。影片的主人公武训，是山东堂邑人，排行老七，故名武七，绰号“豆沫”，生于1838年，卒于1896年。后来，他名字中的“训”字，是清政府在其死后为表彰他“行乞兴学”而赐给的，意在“为天下后世训”。

武训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幼年丧父，随母流浪乞讨。稍长，他曾给地主扛活，后一直行乞。年青的武训在扛活和行乞的困苦生活中，十分羡慕富家子弟进学堂念书，有时到私塾学堂附近逗留、观望，往往招来欺凌、侮辱和被驱逐。由此他以为没文化是受苦受难的根由，便决心行乞兴学，好让穷人孩子们都能上学读书，免受富人的欺压。他为了攒钱“兴义学”，讨得富人的施舍，便装出笑脸，任人拳打脚踢，竖蜻蜓逗人乐，学狗爬任人骑，表演喝脏水、吃屎尿、吞蛇蝎，以博富人的围观、取乐。只要能讨到钱，什么屈辱都能忍受。这样积蓄下来的钱，一分也舍不得花，全部委托地主给他放高利贷，购置土地，租给农民。30年的行乞生活和放债、收租，终于攒下了一笔钱，办起了3所义学。他的“行乞兴学”，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嘉奖，死后被称为“义乞”、“乞圣”。

导演孙瑜在谈到编导电影《武训传》起因时说：“远在1944年的夏天，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北温泉送给我一本《武训先生画传》，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我，于是就改编成了和现在大致相同的《武训传》电影剧本。”

这部影片自1948年夏开机拍摄，后因淮海战役正酣，南京岌岌可危，制片厂经费困难，被迫停机。1949年2月，上海昆仑公司买来了《武训传》的拍摄权和部分胶片。全国解放后，上海市文化局和艺术界认为《武训传》仍有拍摄价值，脚本由编导者作了部分修改，在1950年12月由昆仑公司完成拍摄，1951年初先后在上海、南京、北京、天津和全国各城市放映。仅两三个月间，北京各界观众就多达13万人次左右，绝大部分人都为武训“行乞兴学”的“奇行”所痴迷。在此期间，各种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评介文章，大都肯定了武训和影片《武训传》，说电影《武训传》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这些文章还颂扬说，**武训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使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是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者，是人民的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武训坚韧不拔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和行为，是永垂不朽的，是值得学习的榜样；武训兴学之革命意义，和太平天国那样的革命有某种相同之处——都是为了劳动人民的解放，只不过是一个重在革命武装，一个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武训是一个劳动人民的伟大典型；武训这种忘我精神，为广大贫苦阶级服务的精神，任何人都会深深地受到感动。**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12月30日至1951年3月下旬，上海的《大公报》、《文汇报》、《新闻日报》、《新民晚报》，北京的《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大众电影》、《北京文艺》，天津的《天津日报》、《进步日报》等报刊，发表赞扬或者肯定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文章，有30余篇。**《大众电影》还把《武训传》列为1950年10部最佳国产影片之一。**与《武训传》放映的同时，1951年还出版了3本关于武训的书，一本是孙瑜的电影小说《武训传》；**一本是由李士钊编写、孙之隽绘画的《武训画传》**；一本是由柏水撰写的章回小说《千古奇丐》。这些书同样受到了赞扬。**郭沫若也曾为《武训画传》题了封面，作了序言。**

直到1951年3月底，文坛上才开始出现了对《武训传》的不同意见。而对《武训传》的严肃批判，则是贾霁在4月下旬打响的第一炮。

文艺界对文艺作品的讨论和批判，并非自此始。早在1951年1月，以陆定一为部长、周扬为副部长的中宣部就开始抓批判工作：1月10日，《文艺报》载文批判了3部作品，即《愤怒的火箭》、《驴大夫》和《不拿枪的敌人》。2月10日，《文艺报》刊载陈企霞的文章，批判碧野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4月间，各种报刊对电影《荣誉属于谁》，展开了批判。

4月25日《文艺报》第4卷第1期发表的贾霁的文章——《不足为训的武训》，说武训和《武训传》对于历史以至于今天，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武训的行为是不值得赞扬歌颂的。

5月10日，《文艺报》又在第4卷第2期发表了邓友梅的《关于武训的一些材料》和杨耳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么?》一文。**杨耳在文章中说：陶行知先生在蒋介石反动统治下表扬“武训精神”，没有什么“积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在反动统治下宣扬‘武训精神’，比起今天人民取得了政权之后宣扬‘武训精神’，它的危害决不可能更小些。相反，倒不如说是可能更大些。因为，在反动统治下面宣扬‘武训精神’，就会更直接的‘降低和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战斗力’，**那不更加是不应该的吗?”

但总的来看，此时的文艺界对电影《武训传》还是一片赞美和歌颂之声，持否定意见的文章只是少数。这便是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转载杨耳文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5月20日，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显著的位置上。

《人民日报》为批判一部电影而发表社论，这还是头一遭。毛泽东在社论中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构成了这篇社论的主题。他写道：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以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开展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它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毛泽东在这篇社论中还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点出了43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及其48位作者，为开展大批判树立了箭靶。

毛泽东这一尖锐地批评，同他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阐述的文艺方针是完全一致的，即要求革命作家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去描写人和社会矛盾，要求革命文艺必须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革命作家必须和新的时代相结合写出新人物，新世界。

毛泽东在这篇社论中的措辞激烈，批评尖锐，对电影《武训传》的编导、演员和颂扬武训及《武训传》的人们是一个巨大的震动，使人们感到事态的严重性。

这一天，《人民日报》还在“党的生活”专栏上刊发了《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的短评。短评中说：

“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看过歌颂武训的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对这样重要的思想政治问题保持沉默，都应当积极起来自觉的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如果自己犯过歌颂武训的错误，就应当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担任文艺工作、教育工作和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与武训和《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北京、上海、天津、山东、平原等地文化界的干部，尤其应当自觉地热烈地参加这一场原则性的思想斗争，并按照具体情况作出适当的结论。”

此后，中央文化部、教育部，中共上海市委，纷纷发出通知，号召批判《武训传》。昆仑影业公司立即通电全国，停止放映《武训传》。全国掀起了一场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群众性的讨论和批判运动。这次讨论和批判，集中在3个问题上：

一、武训是什么样的人物？二、《武训传》是什么样的影片？三、歌颂武训和《武训传》是什么思想？

批判者认为，武训不是什么“劳动人民的典型代表”，他是封建统治的维护者，封建制度的崇拜者，封建道德的支持者。**历代反动派表彰武训，是想老百姓都像武训那样服服贴贴当“顺民”，不惹是生非，不犯上作乱**。这样的历史人物是不值得人民歌颂和学习的。

于是，原本为《武训传》叫过好的《大众电影》编辑部以及戴白韬、梅朵等人，纷纷登报公开检讨。电影《武训传》的编导孙瑜、主演赵丹，也作了检讨。郭沫若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查》一文。

然而，此时的周扬却依然说：“武训这个人，究竟有没有进步意义，不能武断地下结论，要听听群众的意见，要请示少奇同志，要做调查研究，不能急躁鲁莽。”

胡乔木也说：“《武训传》本质上是好的，革命的，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真理究竟在谁手里，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毛泽东没有想到批判《武训传》的阻力竟然会有这么大，他说：

“看到了吧，有人还想秋后算账呢。那好，通知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研究，现在就把这个问题来一个彻底解决，看看到底武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底值不值得如此歌颂？”

欲知批判《武训传》的问题能否彻底解决？请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一提到“文化革命”，人们就会联想到毛泽东在上个世纪中期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其实，有很多人不知道，“文化革命”是毛泽东一生都在不断地追求的一个革命目标。由于种种原因，他在“文化革命”方面的活动不得不时断时续。本传前面讲到的他在年轻时创办《湘江评论》等报刊及其发表的有关方面的重要文章，便是他“文化革命”的初期活动，而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前前后后的活动，以及这次批判《武训传》，后来在1954年又批判电影《清宫秘史》等等活动，又何尝不是“文化革命”呢？！遗憾的是，在毛泽东逝世后，封资修文化又借尸还魂、死灰复燃，其泛滥程度比起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正说明了新旧文化之间的斗争尚未有穷期！

**第26章**

**“‘零敲牛皮糖’，采取消耗敌人的战略！不打大的，消耗敌人，**

**杀伤敌人，疲劳敌人，叫他不能休息！紧紧把他拖住，积极地**

**打，必须打，不打拖不住，消灭一个算一个！”**

话说1951年5月2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子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省级军区，军分区，兵团及军师党委：

**随着各项建设事业的成功和对工作人员政治教育的深入，随着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特别是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开展与深入，目前所有混进我们机关中的各种反革命分子和各种政治上有问题的分子，主要是一部分留用人员和一部分新吸收的知识分子，已处于一种极端紧张不安的状况中。**有些人亟求洗清嫌疑，或交清历史，卸掉包袱，好专心为人民工作。有些人亟求声明坚决与反动党派断绝关系，重新做人，或者立功赎罪。有些人苦闷失眠，神经失常。有些人逃跑、自杀。**只有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仍怙恶不悛，冒险作破坏活动，或企图长期埋伏、待机活动。**这个问题不解决，有很多人已难安心工作，党和国家的各项任务也将因而难以顺利完成。因此，我们必须抓紧时机，从现在开始，在今年夏秋两季，采用整风方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机关工作人员普遍的初步的加以清理，以便弄清情况，处理一些最突出的问题，提高我们组织的纯洁性。为此特作如下各项指示：

一、清理的范围，应包括各民主党派和政府、军队、民众团体及财经文教等机关的一切工作人员和干部学校的学生。主要是其中的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打击的对象，主要应是各种反革命分子。**清理的重点和步骤，首先应该是首脑机关和要害部门，然后是一般的机关，最后是所有部门的干部和勤杂人员。在政府系统和民主党派及各种带统一战线性质的机关、团体中，应以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府各项法令为政治思想武器，在北京应由全国委员会常委，在城市应由当地协商委员会等机关负责组成总的领导机关来主持。在学校和工厂中进行此种清查工作时，亦必须有党外人士参加此种清查工作委员会，应避免由共产党员孤立的去做。必要时可建立党组来加强领导。但在党内和青年团内，政治上、思想上仍应以党纲党章或团章为标准，并由党委或团委来领导。

二、因为目前工作极为繁忙，同时在若干地区和若干部门中，又缺乏强有力的老的骨干，因此，除首脑机关和要害部门外，一般的尚不应采用普遍审查的方法对所有工作人员都逐个进行精雕细刻的审查。应该首先采取整风方式，即从学习镇压反革命的文件和由首长作报告开始，经过思想酝酿，然后号召有问题的人（不是一切人）用真诚老实的态度，向国家（或党）交清自己的历史，坦白出隐藏的问题，并检举所知道的反革命分子、嫌疑分子、或别人隐藏的问题。在首长报告时，应对所有人员说明：过去对历史有隐瞒和夸大者，应声明改正；没有说清楚者，应补说清楚；与反动组织有关系、进行过反革命活动者，应自己坦白出来；有反动违法物件者，应自动交出来。如此，有罪者可以减罪，罪轻者可以免罪，无罪者可以卸掉包袱，并可进一步取得人民和国家的信任。如果不说老实话，有问题不坦白，将来在任何时候被发现，均将被视为对国家人民或对党不忠实。如果知道别人有反革命行动或有反革命嫌疑，而不向国家机关适当的人报告，并加以隐瞒，亦将被视为对国家人民或对党不忠实。经验证明，这样做了以后，有问题或隐瞒历史的人，即可大批自动坦白或被别人报告出来，因而可以发现很多问题，并把很多人的政治面貌弄清楚。

对于已经坦白的人，领导机关应该及时地按其问题的是非轻重和坦白的忠诚程度，分别作出适当的结论。使已经彻底坦白的人安心工作，以便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并使领导骨干和审干中的积极分子能够集中力量，继续审查问题严重或坦白不彻底的分子。

三、采用上述方法，有问题的人，可以坦白一大批，但真正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或有严重罪恶的反动分子，除在被迫情况下避重就轻地“假坦白”以外，一般是不会坦白的。因此，**对于证据确凿但不悔改的反革命分子，特别是有血债的分子，特务间谍分子和恶霸地主，应该加以逮捕审判**（逮捕时应向所在单位的群众宣布理由），对于反革命的嫌疑分子或有严重历史问题的分子，应从要害部门、机要部门坚决地调开，集中训练、审查，或调往非要害部门工作，由主管部门继续加以侦查。对于历史不清楚的人，应进行调查，以便弄清他们的历史。

四、我们的政府是各个革命阶级、各个民主党派联合的政府，同时又有大批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老干部和党员只占较少数。因此，在进行清查时，必须切实注意经过思想酝酿，以老的和其他一切可靠的干部为骨干，依靠多数组成队伍，一方面要号召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中间一切有问题的人，老实坦白清楚，另一方面，又**必须严格防止把这种运动简单地变为“老干部整新干部”，“党员整非党员”，“工农干部整新旧知识分子”，或“专整留用人员”的运动**，致使党员或老干部陷于孤立。同时，为了防止逼供信的偏向发生，并使有问题的人容易坦白起见，除典型的报告外，一般地不应采用大会坦白方式，应尽量采用小会坦白，书面坦白，或向主管部门、向直接领导的首长坦白的方式。除开对于那些已有确实材料拒不坦白的分子，在审查时可加以追问外，对于其他一切人的坦白，均应采取自愿原则，不得强迫，**经验已反复证明逼供信的结果，总是使问题越弄越乱，必须坚决反对。**

五、**现在流行的有“被斗户”“被镇压户”“党团分子”“留用人员”“流散军人”“会道门分子”等口头语，这些口头语，用在整顿队伍清理机关工作人员中，是不妥当的和有害的。**我们在清查中间，对于所有的工作人员，主要的应根据他本人的政治态度、思想状况、工作表现和具体的经历来处理他的问题，他们的家庭状况和过去的出身，只可以作一种附带的联系的观察，而不应笼统地根据他是不是“被斗户”等关系来处理他的问题。此外，在处理各项坦白问题时，必须采取严肃的和谨慎的态度，切不可粗枝大叶，**尤其不可不分是非轻重的大批的洗刷新旧知识分子。**

六、清理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无论是采用哪种方式来进行，都是一种繁重细致的工作，都必须由首长负责主持。同时，现在又是在极端忙碌的工作过程中来进行，因此，在运动开始后，各部门领导同志间必须有适当的分工，必须指定一定首长专门负责领导，根据各地初步的经验，一个单位从学习文件、听报告到坦白完毕，约须4、5个星期的时间，最紧张的时期是2、3个星期以后。那时，即不得不停止若干工作（如停止半天工作，或轮流停止工作2、3天等）。但不可拖得时间太长，以免影响工作太大，及发生逼追或僵持的现象。关于审查与工作时间的配备，可由各机关首长按照具体情况决定。

七、全国各地除对机关工作人员普遍的作一次初步的清理外，并应对于首脑机关、要害部门进行重点清查，取得经验，以便在今年冬季进一步地加以清查。

接着，毛泽东为转发东北军区党委关于在军事系统进行镇反和清理工作的指示写了一个批语。

东北军区委员会指示的主要内容是：（一）对已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应立即组织力量加强审讯工作，从审讯中证实已有材料，发现新的材料，弄清具体罪恶事实，然后按其问题轻重拟出名单、意见，实行分别处理。但严禁刑讯逼供。（二）对已有材料但尚不够逮捕条件的反革命分子及复杂分子，应继续收集材料，研究分析，如经查对证实，可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调离重要部门，留部队继续审查，由军区集中劳动管训继续审查，或予以清洗的办法处理。（三）部队应进行一次有重点、有步骤、有对象的审查工作，把混入部队的各种反革命分子清查出来，面目不清者弄清，以纯洁内部。

毛泽东在转发批语中写道：

华东、中南、华南、西南、西北、华北各大军区：

兹将**东北军区5月18日关于在军事系统进行镇反和清理工作的指示**发给你们参考。这是根据最近中央指示而规定的方针和办法，除时间一点外，**各区均应当照此办理**。

毛泽东 5月21日

5月21日这一天，中央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经过第6轮谈判，顺利地通过了曾由毛泽东亲自审阅并修改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草案）。

5月22日上午，毛泽东将来自湖南的客人文涧泉、文运昌一行接到了家里。

文涧泉、文运昌和王淑兰是在5月17日持毛泽东的邀请电到了长沙，当晚下榻在省委交际处。5月18日，文家兄弟等在长沙休息1天。5月19日，湖南省委统战部派人护送文家兄弟和王淑兰，还有毛泽建丈夫陈芬的外甥女、在长沙工作的陈国生，乘开往武昌的特快软卧列车，经汉口直达北京。中央办公厅派人到车站迎接，安排他们在惠中饭店住下。几天后，毛泽东让秘书田家英开车去惠中饭店，把文涧泉、文运昌、王淑兰和陈国生接到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会晤。毛泽东把夫人江青叫出来作陪，向客人作了介绍。众人寒暄已毕，毛泽东问道：

“十七哥怎么没有到北京来？”

在毛泽东的5个表兄中，十哥文泮香已于1949年作古，此时仅存4人：十一哥文涧泉、十六哥文运昌、十七哥文梅清，二十哥文南松。文运昌非常直率地说：

“这一次你又没有邀请他来，他怎么好来？”

毛泽东莞尔一笑，说：

“那么我再派人去接他来，他总会来吧？”

“会来，会来。”

文氏兄弟连声说。毛泽东又亲切地问：

“两位表哥来了多久了？”

文运昌回答说：

“前天到的。”

“住在哪里？”

“住在惠中饭店。”

“北京怎样？习惯吗？”

“习惯，这里风景很美，空气很新鲜。”

“我给你的信收到了吗？”

“就是1950年4月那封信么？收到了。”

“我没见你回信，所以，又给二十哥写信，特意提到你。”

毛泽东所说的给二十哥的信，就是在1950年5月12日写给八舅父文玉钦的三儿子、他外婆家最小的表哥文南松的复信。文运昌见表弟再一次提起此事，便说：

“我怕打扰主席的工作，所以没及时给你写信。”

“原来如此。”毛泽东朗声笑了，他接着说：“十六哥要求推荐工作的事，我没有办到，还请你多多包涵呐！”

文运昌摇摇头，说：

“主席工作繁忙，打扰你了，真不好意思，我的工作问题已经托人解决了。”

毛泽东点点头，说：

“解放以来，找我解决问题的亲朋好友很多。解决了你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别人的问题，我干脆都不干预。不过，就是家里有困难的，我都给予一些帮助。我是国家主席，必须为大多数人服务，不能只解决少数人的问题。因此，对你也不能例外。”

“我理解主席的心情。”

文运昌顺口说了一句。毛泽东转身问陈国生：

“带了什么东西来？”

陈国生闻言一惊，自己来京时走得匆忙，忘记带礼物了。毛泽东一问，她有些窘迫，很歉意地说：

“三舅，真对不起，我们什么东西都没带。不知您需要什么？”

毛泽东摇摇头，笑着说：

“我是问你们带了什么书信报告没有。”

陈国生这才想起毛泽东向来要求来京的亲友不带任何礼物，只要他们事先准备一些材料，或要求当地政府写一个调查报告，或带几件家乡的书信，以便了解乡下的情况，她就连忙说：

“我们带了一些情况。准备向您汇报。”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

“先莫慌，等吃了饭再说吧。”

中午，毛泽东和江青与客人共进午餐。陈国生坐在江青身边，江青问她：

“你什么文化？”

陈国生说：

“高小毕业。”

江青说：

“我也是高小毕业。”

陈国生兴奋地说：

“我在茶厂的抗美援朝动员会上登台发了言，控诉反动派的罪行，表示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

江青听了很感兴趣，对毛泽东说：

“她参加了动员会，还做了控诉报告哩！”

毛泽东点点头，他的注意力一直是关注着两位表兄吃饭。午饭很普通，只做了一些炒肉片、青椒和番茄之类的菜。文涧泉、文运昌还不习惯城镇人的生活，不吃番茄。毛泽东有些不悦，埋怨江青说：

“人家喜欢吃的不搞，他们不吃的搞这么多。”

江青连忙说：

“没有菜，两位表哥多喝杯酒吧。”

毛泽东拿起一瓶葡萄酒招待客人，他一边倒酒，一边故意问：

“你们看，这是什么酒？”

陈国生喝了一口说：

“是甜酒。”

毛泽东摇摇头，说：

“这是葡萄酒。古人说：‘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就是讲的这个。这是你们在乡里吃不到的哟！”

文运昌与文涧泉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连说：

“好酒，好酒！”

饭后，毛泽东详细地向文涧泉等人询问了地方工作，又询问了外婆家文氏诸表兄弟的生活和健康状况。他还说：

“我小时候住在外婆家，舅舅、舅母待我很好。舅舅教我读书识字，舅母在油灯下纺棉花，我就在旁边听外婆和其他长辈讲故事，就在油灯下看小人书。可惜现在他们不在了。”

“难得主席一片孝心！有您这样的外甥，我们的父母在九泉之下，一定欣慰不已了。”

文运昌毕竟读过不少书，说话总是文绉绉的。毛泽东又说：

“十一哥，十六哥，你们过去为我受过牵累，吃过不少苦头，没有过上好日子。现在人老了，身体差了，应该享受享受。”

他转对陈国生说：

“以后，你要好好照顾他们，让他们过些好日子。”

陈国生忽然想起为舅母毛泽建修墓的事，就说：

“泽建舅妈的墓埋在衡山金紫峰麓，只有一块石碑。我们想把墓修一下。您是不是可以跟政府说一声？最好请政府拨一笔钱。”

毛泽东想了想，婉转地说：

“在革命的艰苦岁月，我们牺牲了很多的同志。现在刚刚解放，政府搞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哪有钱修墓呀？况且全国有那么多烈士！我父母的墓还是一个草坟，当地许多人建议为他们修墓，我都不让修呢！”

陈国生听毛泽东如此说，便不作声了。毛泽东问起堂弟毛泽峻的情况，文运昌说：

“毛五阿公住在林场，婆婆老倌相依为命，没有钱，生活困难，饭都吃不饱。”

毛泽东说：

“我听泽连说过，毛五阿公想带一个礼，可是他没钱。我准备给他写封信寄点钱去。你们回去后，也代我问问他好。”

正在此时，工作人员进来催毛泽东休息，客人们就起身告辞，毛泽东把他们送到丰泽园门外。

文涧泉、文运昌、王淑兰、陈国生回到惠中饭店，毛泽东又派人给他们送去一筐蜜橘、鸭梨、红枣等水果。

5月22日，斯大林致电克拉索夫斯基（苏驻华总军事顾问——笔者注）转毛泽东，全文如下：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满州和北朝鲜边境上的空战终于使我们确信，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如有优秀飞行员使用，完全可以对付美国和英国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尤其是轰炸机。至于米格-9喷气式歼击机，虽不如英美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但却完全适用于同轰炸机以及不够现代化的战斗机作战，非常适用于大规模训练喷气式飞机飞行员。你们从苏联得到的歼击机航空兵师目前已有10个，其中6个为米格-9歼击机师，4个为米格-15歼击机师。为使中国歼击机航空兵师能够成为更加富有战斗力的歼击机航空兵，应用米格-15歼击机取代米格-9歼击机。为此，需要从苏联给你们运去372架米格-15飞机。我们由于飞机不够一直未能做到这一点，但现在已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打算将这372架米格-15飞机无偿提供给你们**，仅付从苏联到中国的运费即可，运费可从军事贷款中扣除。至于你们现有的米格-9飞机，可以留供你们大规模训练喷气式飞机飞行员之用，还可用以同轰炸机以及不够现代化的战斗机作战。你们的已学会米格-9的飞行员可以很容易地掌握米格- 15飞机，在我们苏联为此仅需不足10天的时间。我们已拟定了将372架飞机运往中国的计划：第一批为72架，6月20日以前运抵；其余各批也将陆续运抵，保证你们到8月初以前能得到全部372架飞机。对此您如无意见，我们即认为此计划是可行的。

敬礼！

菲利波夫 1951年5月22日

5月23日，毛泽东复电给谭政，他在电文中写道：

谭政同志：

5月17日电悉。（一）华南各军军事训练的方针是正确的。（二）希望你于秋季再去广州一次，检查各军的工作和海防工作。**你去时最好再找一、二个在朝鲜作战有经验的高级干部同去广州，向干部们作报告，提高军事训练和政治工作。**

毛泽东 5月23日

5月23日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以李维汉为首的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庄严的签字仪式。朱德副主席主持了签字仪式，李济深副主席、陈云副总理也出席了签字仪式。

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维汉等4人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等5人，先后在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上签了字。《协议》全文如下：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与其他许多民族一样，在伟大祖国创造与发展过程中，尽了自己的光荣的责任。但在近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了中国，因此也就侵入了西藏地区，并进行了各种的欺骗和挑拨。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于西藏民族，则和以前的反动政府一样，继续行使其民族压迫和民族离间的政策，**致使西藏民族内部发生了分裂和不团结。而西藏地方政府对于帝国主义的欺骗和挑拨没有加以反对，对伟大的祖国采取了非爱国主义的态度。**这些情况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陷于奴役和痛苦的深渊。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打倒了各民族的共同的内部敌人——国民党反动政府，驱逐了各民族的共同的外部敌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此基础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的大家庭之内，**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自己的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央人民政府则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自此以后，国内各民族除西藏及台湾区域外，均已获得解放。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和各上级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下，各少数民族均已获得充分享受民族平等的权利，并已经实行或正在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

为了顺利地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西藏的影响，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和主权的统一，保卫国防，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获得解放，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与国内其他各民族享受同样的民族平等权利，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中央人民政府于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际，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来中央举行谈判，以便订立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951年4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到达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当即指派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于友好的基础上举行了谈判，谈判结果，双方同意成立本协议，并保证其付诸实行：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

二、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

三、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力。

四、**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五、**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

六、**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

七、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

八、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

九、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十、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十一、**有关西藏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十二、**过去亲帝国主义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坚决脱离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仍可继续供职，不咎既往。**

十三、进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同时买卖公平，不妄取人民一针一线。

十四、**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

十五、为保证本协议之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员外，尽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工作。

参加军政委员会的西藏地方人员，得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地区、各主要寺庙的爱国分子，由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代表与有关各方面协商提出名单，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十六、**军政委员会、军区司令部及入藏人民解放军所需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西藏地方政府协助人民解放军购买和运输粮秣及其他日用品。**

十七、本协议于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首席代表：李维汉（签字盖章）

代表： 张经武（签字盖章）张国华（签字盖章）孙志远（签字盖章）

　　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签字盖章）

代表：凯墨·索安旺堆（签字盖章）土丹旦达（签字盖章）土登列门（签字盖章）

　　桑颇·登增顿珠（签字盖章）

　　 1951年5月23日 于北京

5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召见李维汉和张国华，一见面，他就高兴地对二人说道：

“好哇，你们办了一个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要靠我们的努力。”

他话锋一转，关切地问张国华：

“进藏部队能否吃饱肚子？”

张国华汇报说：

“部队生活是苦一点，勉强可以吃上饭，但情绪很好，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完成进军西藏的艰巨任务。当然也有个别部队嫌进藏艰苦，不想到西藏去。”

毛泽东说：

“**去年我就讲过，你回去再告诉他们，进藏对个人来说，一点好处也没有，但你是共产党员，党需要你去，你去不去？**”

张国华汇报说：

“昌都战役后，等待谈判结果的进藏部队，一面休整训练，一面开荒自救，解决吃粮问题。同时进一步开展了解放全西藏的教育，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并掀起了学习藏语、突破语言关的群众性学习运动。”

毛泽东听了，满意地说：

“好！部队要一面进军，一面建设。**要坚持‘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方针，不能增加藏族群众的负担。**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

5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门前等候着班禅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成员们的到来。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一行人一到，毛泽东就热情地和他们一一握手。班禅向毛泽东献上哈达和礼品。礼品中有红缎锦旗一面，上面用藏汉两种文字绣着“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另有绣在黄缎子上的献词一份，镶嵌“毛主席万岁”的金盾一座，藏制长寿铜佛一尊，藏制银满扎（状似银塔）一套及金丝缎、藏香等西藏名贵产品，还有20世纪初西藏抗英战士使用过的武器弹药等珍贵礼品。阿沛·阿旺晋美也向毛泽东转交了达赖喇嘛的信和礼品。

毛泽东把班禅和代表们请进客厅落座，通过翻译一一询问了他们的姓名、年龄及在政府中的职务，还问他们到北京身体适应不适应，生活习惯不习惯？代表们站起来回答时，毛泽东让他们坐下说话，还让他们吃糖、喝茶、抽烟。毛泽东问：

“你们和李维汉谈得怎么样？”

阿沛·阿旺晋美说：

“谈得很好，已经达成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

毛泽东高兴地说：

“好哇，这是件大好事，大大的好事。”

他又问：

“你们怕不怕革命？”

有位代表说有些害怕。毛泽东笑了起来，他说：

“你们不要怕，**革命是解放人民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解放军进军西藏是解放人民，为人民服务的。**藏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是我们祖国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在历史上，西藏地区的人口曾达到1千万人，现在藏族人口减少到1百多万人了，这样继续几百年，藏族就会灭绝的。**你们希望不希望发展呀？我们共产党要帮助所有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还要帮助发展人口，对藏族人民也是这样，你们怕什么呢？你们不用担心民族衰亡。”

毛泽东又用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故事，鼓励代表们为加强汉藏人民的团结做贡献。毛泽东还对阿沛·阿旺晋美说：

“我们共产党是帮助你们发展西藏的文化经济事业，不是为了办坏事，如果有汉族干部欺负你们，你来找我们。”

晚上，毛泽东为庆祝协议的正式签订，将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

在宴会开始前，毛泽东又同班禅、阿沛·阿旺晋美等谈了话。他打开一本国民党时期的地图册，对阿沛·阿旺晋美说：

“你看，**国民党把工布江达以西也划给西康省，这是不符合历史的。我们把它改过来，今后还是以金沙江为界，金沙江以东为西康，以西为西藏。这样就符合历史，**你看怎么样？”

工布江达这个地方就有阿沛·阿旺晋美的庄园，他满意地说：

“中央的修改符合历史事实，我完全拥护，感谢中央对西藏的关怀。”

这天晚上，应邀出席宴会的有班禅大师及其堪布会议厅官员；西藏的5位代表；中央的4位代表及有关人员。毛泽东让阿沛·阿旺晋美坐在他的右边，让第10世班禅大师坐在他的左边。应邀作陪的有朱德、刘少奇、李济深、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以及在京的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及首都各界著名人士180余人。毛泽东在致词中说：

“**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满清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接下来，朱德、李维汉、班禅、阿沛·阿旺晋美也先后讲了话。班禅身着黄袍走上讲坛，真诚地说：

“多少年来没有解决的中国内部的民族问题——西藏问题，在毛主席领导下胜利地解决了。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国各民族大家庭的一大喜事，中央人民政府、达赖与班禅3方面的团结，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才能实现。”

毛泽东在宴会上亲自为阿沛·阿旺晋美和班禅大师夹菜，异常亲切。

是日晚，毛泽东提笔给达赖喇嘛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达赖喇嘛先生：

感谢你经阿沛·阿旺晋美先生带给我的信和礼物。

西藏地方政府在你亲政之后，开始改变以往的态度，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遣以阿沛·阿旺晋美先生为首的全权代表来到北京举行谈判。你的这项举措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友好基础之上，经过多次商谈，已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个协议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于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从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异民族的压迫，站起来，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业而努力。**我希望你和你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地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我特派张经武代表同你的代表们一道前来你处，以资联络。如你有需要他协助的地方，可随时与他接洽。附来礼物，至希收纳！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1951年5月24日

后来张经武在7月16日会见达赖喇嘛时，转交了毛泽东这封亲笔信与《协议》抄本。

5月25日，毛泽东签署了“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全文如下：

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已于本月23日在北京签字，我人民解放军为了保证该协议的实现与巩固国防的需要，决定派必要的兵力进驻西藏。为此，特决定如下：

一、进军部署：

（一）西南军区之18军除留两个师（53师、54师）于甘孜、昌都地区担任修筑甘孜机场与甘孜、昌都段公路任务外，52师进军西藏任务不变。该师应以1个团进驻拉萨，两个团（缺1个营）进驻丁青、乌所、黎嘉、太昭地区，师部进驻太昭，另以1个营编成独立支队，由硕督地区出发，沿雅鲁藏布江之贡布地区西进，担任宣传与侦察任务。

　　（二）西南军区之14军126团应由德钦地区进驻察隅地区。

（三）西北军区之骑兵支队应由玉树进驻囊谦地区，并仍属西北军区建制。

（四）西北军区由新疆准备入藏之部队，除先头部队继续侦察到达噶大克的道路外，主力继续修通公路，以备随时入藏。

二、物资补给：

（一）补给关系，除18军与14军入藏部队由西南军区负责补给外，骑兵支队仍由西北军区负责补给。

（二）粮食，除14军126团与骑兵支队分由云南与西北军区负责补给外，18军入藏所需之粮食应以组织牦牛、汽车等运输为主，并在当地收买一部，不足数则由西南空司负责组织空投及其他方法解决之。

（三）修路：

Ａ、甘孜-昌都-丁青-乌所-太昭-拉萨公路由18军负责抢修，力争于明年年底完成。

Ｂ、西宁-黄河沿-玉树-囊谦-类乌齐-丁青公路由西北军区负责修筑，并将黄河沿-玉树-囊谦段继续修通。

Ｃ、敦煌-柴达木-黑河-拉萨线为我对西藏将来油料补给的预定路线，应由西北军区派人进行实地勘测。

（四）机场，除18军应迅速完成甘孜机场的修建任务外，并应在丁青一带选建一临时着陆场，在拉萨修建一普通机场。

三、此次进军系在和平协议下的战备进军，**各部万勿以和平协议已成而松懈战斗意志与战斗准备，因协议虽然签字，但尚未付诸实施，同时帝国主义必会用各种阴谋手段来破坏我们和平解放西藏的实现，因此应提高警惕性，随时都有应付意外情况的充分准备，同时必须加强部队的政策纪律教育，以保证解放西藏巩固国防任务的圆满实现。**

四、各部接此训令后，应立即进行各种准备工作，并随时将准备情况报告军委。进军行动待军委进军命令颁布时实施之。

主席 毛泽东 5月25日

毛泽东还指示中央驻西藏代表张经武、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等人说：

“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

接着，毛泽东关于苏联无偿提供米格-15飞机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1年5月22日电报，已经收到。**我对您关于无偿提供给我们372架米格-15飞机，用以改装6个米格-9歼击机师的意见，表示完全同意，对您关于将这些飞机运送到中国的计划及支付其运费一事，亦表同意。我十分感谢您对中国空军建设工作的关心。**

此致敬礼！

毛泽东 1951年5月25日

5月下旬，毛泽东从朝鲜前线召回志愿军副司令邓华、参谋长解方及38军政委刘西元、39军军长吴信泉、40军军长温玉成、42军军长吴瑞林。

原来在抗美援朝第5次战役中，由于中朝军队口张得大了，企图一次战斗消灭美军3个师，但由于美军是摩托化部队，中朝军队靠两条腿走路，不易对美军形成包围。即使志愿军对美军形成包围，也无空军配合，坦克极少，炮兵和反坦克武器也不足，对被围之敌也啃不动，吃不掉，部分美军不仅突围跑掉，还使志愿军蒙受了一定的损失。

毛泽东先与邓华谈了一天，又与4个军负责人进行长时间的面谈，详细询问了解战场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在谈话中，他专心到忘了抽烟，一支刚点着的香烟在烟灰缸上燃光了。当吴瑞林汇报到42军占领军事要冲熙川时，毛泽东说：

“我看了彭总的电报。好啊！高级指挥员在现场了解情况，若遇威胁全局的问题，就应当机立断。兵法曰：‘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这是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又是个有战略意义的大问题，我从来就是采纳下面的意见的。**你们这次一面执行，一面报告，不是等批了再执行，这样做是对的，不然就会耽误大事呀！”**

吴瑞林对毛泽东一再问“42军艰难到什么程度”？只说了一句“在牛背（山脊梁）上打仗”。**此前周恩来已详细问了42军的艰难，他还特地嘱咐过吴瑞林：“对于你们的困难，你不必向主席提了。主席在考虑全局战略问题。你可以向主席说，我已找你谈了。主席一定要追问，你可以说，‘和总理谈过了，他已经办理了’。”**

毛泽东与众人一起共进晚餐，尔后，几个人又在灯下继续长谈。此时，毛泽东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志愿军为什么一次难以歼灭美军1个团。他问吴瑞林：

“你们集中1个营消灭美军1个连，可不可以？”

“可以，我们干过。”

“集中1个团消灭美军1个营可不可以？”

“可以，也干过。”

毛泽东说：

**“‘零敲牛皮糖’，采取消耗敌人的战略！不打大的，消耗敌人，杀伤敌人，疲劳敌人，叫他不能休息！紧紧把他拖住，积极地打，必须打，不打拖不住，消灭一个算一个！”**

他又对吴瑞林说：

“**4次战役，美军在你们42军防线面前一天只能前进不到1公里，我们伤1人，美军要付出27人的代价。你们干得不错！把美军‘敲’得不轻，‘敲’得他哇哇叫啊！**‘零敲牛皮糖’！我一直在考虑，要向前线指挥打仗的人调查研究一下，从你们4个军在前线的一些打法和这次个别谈话，已得到解决！**这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战争！**”

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志愿军回国汇报的全体人员。他站在地图前，对众人说：

“杜鲁门、丘吉尔之流，与中国蒋介石一样，从来不把中国人民看在眼里，那蒋委员长只好跑到台湾去喽，美军及其帮凶军队从鸭绿江滚回洛东江去了。但他们不服气，又增兵回击，还想回到鸭绿江边来。那个麦克阿瑟是一门大炮，他吹牛皮说，要圣诞节到鸭绿江边饮马。**美国那个第8军军长沃克坐汽车被摔死了，换来了一个什么李奇微**，看起来他是个少壮派，还要来和我们较量较量。”

听了这番风趣的话，大家都笑了。毛泽东接着说：

“我们新入朝的部队没有经验，吃了一点小亏。彭老总要你们回去，制止这个新来的少壮派。”

最后，毛泽东谈了国内形势和面临的任务，以及完成这些任务的大体时间。然后，他指着吴瑞林说：

“根据你们42军在4次战役中的经验，打下去，对我们是很有利的。你们要好好总结经验。”

他又交代邓华：

“邓华同志，志司派人帮助他们总结一下，这对今后作战有好处。我们的作战方针是‘零敲牛皮糖’。”

5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随后又将电文发给斯大林，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

**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1个整师，甚至1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1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现在我第一线有8个军，每个军歼敌1个整营，共有8个整营，这就给敌以很大的打击了。假如每次每军能歼敌两个整营，共有16个整营，那对敌人打击就更大了。**如果这样做办不到，则还是要求每次每军只歼敌1个整营为适宜。这就是说，打美、英军和打伪军不同，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军则在几个月内还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1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这样，**再打三四个战役，即每个美、英师，都再有三四整营被干净歼灭，则其士气非降低不可，其信心非动摇不可，那时就可以作一次歼敌1个整师或两个、3个整师的计划了。过去我们打蒋介石的新1军、新6军、5军、18军和桂系的第7军，就是经过这种小歼灭到大歼灭的过程的。**我军入朝以来5次战役，已完成这种小歼灭战的一段路程，但是还不够，还须经过几次战役才能完成小歼灭战的阶段，进到大歼灭战的阶段。至于打的地点，只要敌人肯进，越在北面一些越好，只要不超过平壤-元山线就行了。以上请你考虑电告。

　　 毛泽东 5月26日

5月26日这一天，斯大林关于向中国提供米格飞机问题致电毛泽东，全文如下：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对您的谢意十分感谢。但最主要的还不是我们所珍视的谢意，而是我们俄国人犯了一个错误：原先估计米格-9歼击机能比得过英美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现在，经过北朝鲜空战之后，此估计的错误已显而易见了。这一错误的意义在于，如不纠正这一错误，它会有损于中国的空防。既然造成这一错误的责任完全应由我们——俄国人来负，那么我们就责无旁贷地要消除我们的错误，用米格-15歼击机来取代米格-9歼击机，其费用应由我们来负担，即无偿向中国提供。**我们既然认为加强自己盟友——中国的国防是我们的目的，那我们也就只能如此行动。**至于你们现有的米格-9歼击机，我们本该将其带回苏联，由于这些飞机目前对你们的需要来说要比我们大许多倍，因此，我们决定将其留给你们。你们曾为我们买来了天然橡胶，那就让米格-9歼击机留给你们，作为我们对你们所给予援助的回报。**

敬礼！

菲利波夫 1951年5月26日

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即将赴朝鲜战场担任志愿军副司令的陈赓和参谋长解方。他充满自信地说：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在军事科技手段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战争中，我们不能抱着老的作战经验不放。**我们在国内战场上连续打了20多年的仗，取得的作战经验毕竟来自现代化程度不高的国内战场，我们用老办法打歼灭战就不适应新情况了。美军不像蒋介石那样笨拙地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很注意保持战线的连续和完整，必要时不惜放弃汉城，也要发挥其有效的机动性。**李奇微接受了教训，动了脑子，发明了什么‘磁性战术’来对付我们。美军的‘磁性战术’，就是企图让我军吃不掉他们，又甩不掉他们，以达到疲惫和消耗我军力量的目的。我们也要来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湖南家乡用稻米精制的一种粘力很强的传统糖块，一般是几斤或十多斤一块，名叫牛皮糖，糖味很甜，群众很喜欢吃，但必须用铁锤一小块一小块地敲下来，才便于吃。”**

他最后又嘱咐说：

“将朝鲜战局的长期性、艰苦性讲清，使全体干部和战士有充分认识与思想准备。”

欲知朝鲜战场上后来的战况如何？请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1年5月26日给彭德怀的指示电中说：**“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1个整师，甚至1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1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现在我第一线有8个军，每个军歼敌1个整营，共有8个整营，这就给敌以很大的打击了。假如每次每军能歼敌两个整营，共有16个整营，那对敌人打击就更大了。”**“这样，**再打三四个战役，即每个美、英师，都再有三四整营被干净歼灭，则其士气非降低不可，其信心非动摇不可。”**这样浅显的道理，其他人怎么就想不到呢？！毛泽东往往在平凡之中显示出他那与众不同的大智慧。只要认真研究，就会发现他的伟大之处其实就寓于平凡之中。

曾任美国国防部部长助理的戴维逊是这样评价毛泽东的：“根据情况正确地改变战术和手段，这一点他在朝鲜做得很出色。”“如果你对毛泽东的一切都记不得，那么你只要记住，他是一切战略家中最重实效、最主张批判地接受经验的一个。”美国西点军校一个军官也说过这样的话：“西点军校崇敬的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两个兵家泰斗，一个就是毛泽东。还有一个是孙武子。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善于以弱击强、以弱胜强的军事家。”斯言不虚矣！一个连敌人都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伟人及其辉煌战绩，岂是得志宵小想抹煞就能抹煞得了的么？！

**第27章**

**“我们的指导方针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

**争取以和平方式达到结束战争的目的。**”

话说1951年5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重要社论。毛泽东在这篇社论中加写了许多重要段落，论述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和平解放西藏的具体方针、政策，如：

“一切进入西藏地区的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必须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必须恪守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必须严守纪律，必须实行公平的即完全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去进行贸易，**必须防止和纠正大民族主义倾向。**”“**如果他们不守纪律，如果他们欺负西藏人民和不尊重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如果他们犯了大汉族主义的原则错误，那么，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就应负责及时纠正。”**

5月28日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正式对外公布和平协议。至此，帝国主义分子和少数阴谋分裂分子企图分裂西藏的梦想彻底破产了。

后来，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于7月21日由亚东启程，于8月17日返回了拉萨。

5月28日下午，毛泽东致电饶漱石，他在电文中写道：

漱石同志：

5月11日报告收到。同意你的各项意见。**华东各城市的反革命分子应当再逮捕几批，到逮捕干净时为止。**各城市的捕杀批准权，如你认为有必要，可以推迟1个月到7月1日再收回至上一级，以利继续捕杀。此外**请注意你自己及各级主要负责人的安全防卫**。

毛泽东 5月28日

5月29日，斯大林关于打英美军战术问题致电毛泽东，全文如下：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我看过了您给彭德怀关于打英美军战术的电报。该电报中所述计划，我觉得是冒险的。这样计划仅能成功地实施一次或两次。英美军很易识破这种计划，从而他们会改变其战术，使你们不可能每次都不受损失地把敌主力引到北面。**如果你们在前线后方有构筑很好的防御工事，能迅速将敌主力吸引到这里，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倒不妨再冒险试一试采用这一计划。然而，据我所知，你们目前在朝鲜尚无这样的工事。因此，这里的危险性就在于，英美军一旦识破了你们的计划，就不会给你们以实施机动的可能性。而由于你们是第4次重复这一计划，那也就很容易被英美军识破。此外，还应考虑到，英美军向北推进时，将一道接一道地建立起新的防线，从而使你们在一旦需要实施进攻时难以不付出巨大损失就能突破英美军防线。这当然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拿蒋介石军队作类比，这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第一，你们现在所对付的是不同的军队；第二，还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认为，英美军会像蒋介石那样愚蠢，使你们能够按照你们的选择每次歼灭敌一个整营地歼灭其军队。**还应注意到，**如果平壤再次落入敌人手里，这一方面会降低朝鲜人民和朝鲜军队的士气，另一方面将提高英美军队的士气。**看来你们将要准备一次重大的战役，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局部机动，而是为了给英美军以沉重打击。

菲利波夫 1951年5月29日

5月31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前驻苏联大使凯南非正式拜会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说美国政府准备与中国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愿意恢复战前状态。

5月31日夜，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

请答复下列问题：一、杨口、华川、涟川之线以北，文登里、金化、铁原、朔宁之线以南地带过去所筑阵地坚固程度如何？**我军扼守此线不让敌进，而于该线寻机多打小歼灭战，以求逐步削弱敌人，可能性如何？**二、你是否正在部署在文登里、金化、铁原、朔宁之线以北，金城、平康、伊川、南川店之线以南地带构筑第二道防御阵地，扼守该线的可能性如何？三、42军在阳德地区，40军在沙里院地区做了工事否？

毛泽东 5月31日22时

1951年6月1日晨，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军反坦克武器和反坦克部队的问题。听说近来敌人的坦克增多了，**我军必须增强反坦克武器，足以征服敌人的大量坦克，才能阻止敌人坦克的猖獗和大量歼灭敌人的步兵。**你对此事有何意见，我军现在配备的反坦克武器是否够用，哪些武器最有用，每团是否应配备一个专门的反坦连，望告。

毛泽东 6月1日

6月1日，陈赓被中央军委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兼任第3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6月2日深夜，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

1. 金日成同志6月3日晚可到北京，他可能提出作战方面的意见。因此你准备给金雄同志的电报请暂时不要发出（此电也还须作部分的修改）。

二、看了志政6月1日20时对目前政治工作的指示电及3兵团政治部5月31日给15军及60军政治部的指示电，这两个文件均很好。**目前提高斗志，停止敌进，稳定局面，极为重要。**

三、3兵团政治部的电报里说，“担任阻击的部队必须彻底地把休整的思想转变过来，认识阻击的意义”。这样指出很有必要。因此3兵团似应分为两种部队，一种是**战斗力没有破坏或没有很大破坏的部队，留在前线担任阻击，继续作战，打些小胜仗，振奋士气，锻炼自己**。一种是战斗力有很大破坏的部队，这必须调至谷山地区整补，以备再战。19兵团则主力应留在前线作战，一部分残破部队则开至近后方整补。又志司5月27日的新兵分配数字，19兵团占5万余人，3兵团只有几千人，是否须根据3兵团近日减员情况有所调整。

毛泽东 6月2日23时

后来，志愿军司令部在关于阻击战的指示中转述了毛泽东这样一段话：

“**在目前，多打小规模的歼灭仗，削弱敌人，降低敌人士气，**逐渐地进行打大规模的歼灭仗。只要我**各级指挥员精心研究情况，很好地布置兵力，组织炮火，每个军一次求得歼灭敌人一两个建制连到一个建制营，是完全可以作到的**。并且在目前敌人冒进情况下，是最有利于我捕歼敌人的机会。”

6月3日，毛泽东会见了从朝鲜来到北京的金日成。他们商讨了可能到来的停战谈判问题。他们一致认为，谈判可以，但美国必须停火，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6月3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写道：

菲利波夫同志：

您5月29日的电报收到了。

在美国不向朝鲜增加大量兵力（例如增加3至4个师）及不从我后方海岸线大举登陆的条件下，就敌人现有兵力来说，它是不可能越过平壤、元山线的。**几个月来，敌人因为兵力不足，对于越过三八线附近的临津江也不敢冒险。而对于我们，则希望它越过临津江，便于打击它。因为临津江以北是朝鲜境内横宽距离最长的地方，敌人一越过该江，它的右翼就完全暴露出来，利于我军打击。**

**因为我军技术条件比敌人差得很远，无法迅速解决朝鲜问题，而决定用长期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它，则需要有一个逐步削弱敌人的阶段，然后转到最后解决问题的阶段。**

在削弱敌人的阶段中，打的地点和打的方法，必须适合情况。在三八线附近地区，山地甚多，利于防御，距后方近，补给较易。而在汉城附近及汉城以南这两个条件就差远了。

敌人现在不但火力很强，战斗意志也还未衰落。**我军过去总想用大包围的办法，企图一次解决敌人一个至几个整师，结果没有达到目的，而包围和歼灭敌军的几个连至一二个营的机会则较多。因此，不要做现在我军还不能做到的事，不要企图打大规模的歼灭战，而应精心设计，寻找机会，多打小规模的歼灭战。这样就可能逐步削弱敌军，振奋我军士气并可减少我军伤亡。**

在三八线以北，我军已在文登里**、**金化、铁原、朔宁线、高城、下县里、昌道里、平康、安峡、金川线、通川、淮阳、洗浦里、伊川、南川店线布置三道野战防线。在目前的一段时间内，我军准备在这三线削弱敌人。第三线到平壤、元山之间还有很长的距离。就敌人现有兵力来看，它很难越过第三线。

**我军每次进攻时，只能由战斗员自己携带7天的粮食和弹药。用完了，停下来，等候补给。如果没有解决敌人，只好撤回来。这是因为敌人用大量空军封锁我军战线的近后方，我们的车辆大部被击毁，粮弹送不上去。敌人已经完全明了我军的这种情况。当我军前进时，它就全线后撤。等候我军粮弹用完，它就举行反攻。我们现正组织人力运输队，使用最原始的手推车，试图解决这个火线上运送粮弹的问题。**

敌人已增加了坦克，我们正在想办法增强反坦克的火力。苏联的高射武器起了很大的作用，4月份和5月份打下了二百多架敌机。征服敌人的坦克，则还要想办法。此外，大炮也还要增强。

七个多月的作战，我军（不包括朝鲜人民军）伤亡15万余人，敌军（包括南朝鲜军）伤亡与此大略相当，大体上成为一与一之比。

彭德怀同志最近有几个电报，现发给您，供您参考。

毛泽东 1951年6月3日

6月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

据国民党方面5月31日东京情报称：“联军将从东线向西北推进。自元山起，至开城止一斜线，压迫共军撤至平壤之北。可能另组元山登陆部队，以促成共军提早放弃临津江以东地区”等语。此种阴谋应肯定是真实的。**我全军应振奋精神，加速准备，粉碎正面之敌及从侧面登陆之敌。**

毛泽东 6月4日

6月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

“我们感觉我们在朝鲜进行的战争，在财政方面，在正面作战方面，在敌人从后方海岸线有登陆可能性的威胁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们想派高岗同志于日内乘飞机去莫斯科向您作报告，并向您请示解决各项重要问题。同时，**金日成同志现在北京，他愿意偕高岗同志一道去和您商量这些问题。”**

6月5日，斯大林关于防御作战等问题致电毛泽东，全文如下：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已收到您6月4日的电报以及彭德怀同志的两个指示。**我同您一样认为，不应加快朝鲜战争的进程，因为持久的战争，第一，能够使中国军队在战场学习现代战争；第二，将动摇美国杜鲁门政府和降低英美军队的军事威信。**我在自己的电报中主要谈的是，如果在接近前沿的后方没有强大的防御工事，匆忙地进行机动是危险的，要能够迅速地把主力调到那里去。彭德怀同志写道，他在后方建立3条防线。如果这样做，防线就将是真正巩固的，事情就会进行得更好，军队就不会陷入包围。**您抱怨说，你们那里大炮、反坦克炮和其它武器很少。两个月前我已通知您，波兰人放弃了自己的订货，因此我们能在今年给您额外的供应，并相应地增加 1951年度的军事贷款额。**周恩来同志欢迎我的这个通知并告诉我们，您很快就会寄来新的订单。但是，没有收到您的订单，是怎么回事？原因何在？我再次通知您，如果您想要的话，我们可以向您提供新的大炮、武器。

**彭德怀同志认为应加强敌人后方游击队的行动，这是对的，是绝对必要的**。彭德怀同志谈到英美军队有较高的士气，而**中国军队中则出现了“严重的右倾情绪”**。**我认为，这是由于你们采取先是稍稍向前推进，然后又数次重复后撤的局部性的机动，给你们的部队造成中国人和朝鲜人力量弱小的印象，而给英美军队造成他们强大的印象**。我担心，这种情况可能破坏中朝军队的士气。我认为，如果不准备和不实行对敌人的重大打击，消灭其3-4个师，就不可能消除这些不健康的情绪。这种打击将导致中朝军队和英美军队士气的重大转变。当然，这不是广泛的和大规模的进攻，而只是对敌人进行短暂和重大的打击，但这将是使敌人清醒和提高中朝军队的士气的一次打击。此外，这样还可以使您能够在以后进行更广泛和更有效的局部战役，这是消耗敌人所必需的。

菲利波夫 1951年6月5日

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清华大学吕叔湘、朱德熙两位先生的文章，题目是：《语法、修辞讲话》，同时发表了《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社论。

这篇社论是由中宣部秘书室主任黎澍起草的，胡乔木作了修改，并送毛泽东审阅。

社论稿送回报社时，副总编辑安岗正值夜班，看到毛泽东在送审小样上作了多处修改，还在最后部分加写了一段话，他写的是：

“我们的同志中，我们的党政军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中，我们的文学家、教育家和新闻记者中，有许多是精通语法、会写文章、会写报告的。这些人既然能够做到这一步，为什么我们大家不能做到呢？当然是能够的。”

6月9日，即农历五月初五日，这一天是傅作义的生日，毛泽东特意请傅作义和华北的几个人去吃饭。进餐时，毛泽东谈笑风生，傅作义感到非常温暖和亲切。

傅作义回到家里，对人说：

“毛主席真细心，真伟大，令人钦敬之至。”

此时，有人说民主人士是招牌，有职无权。傅作义反驳说：

“我这个部长就是有职有权，水利部党组李葆华同志非常尊重我，我也尊重李葆华同志，我们互相商量，没有感到有什么隔阂。”

6月10日，高岗和金日成乘坐斯大林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

6月10日这一天，第5次战役结束。中朝军队取得了歼敌82000余人的胜利，志愿军也付出了伤亡75000人的代价。自此，双方的战线胶着在“三八线”附近，进入战略对峙阶段。

6月11日凌晨，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

1. 你6月4日20时给金雄同志的电报指示甚好，有了这个指示，你5月31日给金雄的指示草稿可以不发了。

二、已和金日成同志谈好目前两个月不进行大的反攻战役，准备8月进行一次有把握的稳打稳扎的反攻。

三、六七两个月内如不发生意外变化（即登陆），我们必须完成下列各事：甲、以积极防御的方法坚持铁原、平康、伊川3道防线，不使敌人超过伊川线；乙、**迅速补充3兵团及19兵团至每军45000人，并有相当训练；丙、13兵团各军休整完毕；丁、加强各军师火力，特别是反坦克反空军炮火；**戊、迅速修通熙川至宁远至德川的公路至少一条，最好有两条，并**于熙川、德川、孟山地区屯积相当数量的粮食，以备万一之用**。你意如何盼告。

毛泽东 6月11日4时

6月12日，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听证会，魏德迈在会议上说：

**“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

杜鲁门也认为，**即使联合国军打到鸭绿江边，战争也不能结束。再打下去，美国将付出无止境的更大损失，而且苏联没有直接在亚洲用兵，其重要兵力仍然在欧洲，美国如果深陷朝鲜战争，欧洲将有被苏联夺走的后顾之忧。**

基于此种考虑，美国高层有了结束这场战争，从朝鲜脱身的打算。结束这场战争的途径有两个：一个是通过战场取胜，结束战争；一个是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第一个途径显然是不行了。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寻求谈判。

6月13日，斯大林关于停战和空军使用问题致电毛泽东，全文如下：

北京

致罗申请尽快交给收电人。

“致毛泽东同志：

今天同您的来自中国东北和朝鲜的代表进行了谈话。提出了3个问题：**第一、关于停战。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第二、关于军事顾问。如果您很需要他们，我们愿意满足您的要求。第三、关于供应60个师的武器。我们方面没有反对意见。**我在这里不谈细则，您的代表们将告诉您这些情况。

我们认为，16个中国空军师中至少8个歼击机师现在就投入使用是绝对必要的。我们考虑，除了两个或3个米格-15战斗机师以外，你们可以从中国中部和南部把5个或6个米格-9战斗机师调到前线，这些师将有效地反击轰炸机。**你们前线的8个歼击机师可以完全满足前线的需要。**根据我们的资料，你们的飞行员已经准备好飞行。应当使你们尽快投入战斗，以便他们成为不是书本上的而是战斗中的飞行员。我们培训前线作战的飞行员用了5-6个月时间。培训中国飞行员有7-8个月足够了。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是你们前线最重要的问题。

**会谈结束后我们收到情报，英国人和美国人最近打算代表16个反对朝鲜的参战国向你们和朝鲜人提出停战建议。**但是，**在提出这个建议以前，他们想对你们的军队进行一次打击。可能这是传闻，但也完全是可能的，很可能这不简单是传闻，而且会有相应的行动。因此，建议加强防卫并不让敌人前进。**

菲利波夫”

罗申：

请把这封电报内容告诉克拉索夫斯基，我们将给他专门指示。

菲利波夫

这一天，毛泽东关于停战谈判问题致电高岗、金日成，他写道：

高岗和金日成同志：

我已收到你们6月13日的电报。**关于如何提出停战谈判的问题，我们认为现在由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对朝鲜和对中国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最近两个月内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都应采取防御态势。**

**最好这样做：1、等待敌方提出。2、最好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声明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可以同时进行上述两种方法，即一方面由苏联政府进行试探，另一方面，如果敌方提出停战问题，朝鲜和中国将表示同意。**最好请你们交换意见并同菲利波夫同志共同解决。3、停战条件：恢复三八线边界；从北朝鲜和南朝鲜划出一条不宽的地带作为中立区。绝不允许中立区只从北朝鲜领土中划出的情况发生。南北朝鲜彼此有所交错。**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不提出这个问题作为条件，因为中国可以援引联合国实际上已成为侵略工具，所以中国现在不认为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有特别意义。应当考虑一下，是否值得把台湾问题作为条件提出来？为了同他们讨价还价，我们认为应当提出这个问题。**在美国坚持台湾问题单独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将做出相应的让步。为了和平事业，我们首先解决朝鲜问题。请你们向菲利波夫同志提出并获得他的指示。4、我们已命令第13兵团司令员邓华等立即返回前线并坚决守住现有防线。6月和7月份将加强准备。8月份我们将进行较大的战役。如果敌人不在我们的后方派遣大规模空降部队，我们的上述目标就可以达到。如果敌人不向朝鲜派遣新的增援部队和不派遣空降兵，8月份我们就会比现在强大得多。5、我们现在正计划向前线调动空军部队。

毛泽东 1951年6月13日

接着，毛泽东请罗申转发他关于停战和防御等问题给斯大林的电报：

菲利波夫同志：

您今年6月13日的电报，我已收到。

今天我收到了高岗和金日成同志的电报。我已将我们对停战问题的意见电告高岗同志，以便让他将此意见转告您并得到您的指示。关于此事的详情，我这里就不述了。

彭德怀同志非常需要战略和战术方面的苏联顾问。希望您能尽早派出。

鉴于有8个歼击机航空兵师要参加战斗，我已按照您的建议，指示总参谋部制定一个计划。此外，我还向彭德怀同志下达了指示：我军务必固守第二和第三道防线的防御阵地，并且为自己再建立一道新的防线。

**6月份前线态势将是：我军兵力较弱于敌军。到7月份，我们将强于6月份，而8月份将更强一些。我们准备在8月份给敌以更强有力的打击。**

毛泽东 1951年6月13日

6月14日，杨成武应召来到中南海颐年堂。他见了毛泽东，立正敬礼，口称：

“主席，我来了。”

毛泽东招一下手，说：

“坐下吧，请坐。听恩来、荣臻同志说，你们‘首都兵团’已经做好了入朝准备，这很好。”

杨成武说：

“指战员的士气很高，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都表示不怕牺牲，要多打胜仗。”

毛泽东说声“好”，就给杨成武介绍了战场上的情况，他又说：

“你去！**你要赶赴朝鲜前线，稳定战线。**现在是运动战转向阵地战。**美国人说我一生不愿打阵地战，这次我就打他一个阵地战！在三八线打！成武啊，不准轻易放弃一寸土地，你莫给我丢脸！”**

杨成武挺身而起，说：

“男儿有志在四方，马革裹尸固其常。**主席，我决不辱没京津卫戍部队的光荣！”**

“呵，是的，老百姓叫你们‘首都兵团’么。”毛泽东起身做个手势：“走，吃饭，今天我请客。”

在院子里的凉棚下，方桌上摆着4碟菜，1瓶通化红葡萄酒，4只高脚玻璃杯。毛泽东、江青请杨成武和他的副政委张南生共进午餐。

江青斟满酒，毛泽东起身举杯，杨成武、张南生也忙起身，端起酒杯。毛泽东说：

“成武啊，我跟你喝一杯酒。”

杨成武说：

“主席，应该我先敬您酒。”

“不，今天我先敬你。希望你们到了朝鲜，一定要尊重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主席，尊重朝鲜人民军和人民，要爱护那里的一草一木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干杯！”

毛泽东说罢，一饮而尽，杨成武跟着一饮而尽。毛泽东一口菜不吃，又端起杯说：

“**再敬你第二杯。你必须守在三八线！你只许在38度线和38.5度线之间机动，多退一步也不行，除非经我批准。干杯！**”

“干！”杨成武与毛泽东碰了杯，一饮而尽。毛泽东依然不坐也不吃菜，第3次举杯，说：

“**第3杯酒我要求你们兵团在今后作战，重要电报除发志愿军司令部外，同时还要发北京，发给我。我毛泽东要给美国人打一个阵地战。干！”**

毛泽东这是第一次用这么大的酒杯，一口菜不吃连干3杯酒。

不久，原华北军区第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副司令员孙继先率领第67军、第68军入朝作战。

第67军军长李湘、政治委员旷伏兆率第199师、第200师、第201师于6月21日晚由辽宁安东入朝；第68军军长陈仿仁，政治委员李呈瑞率第202师、第203师、第204师于6月24日晚由辽宁长甸河口入朝。

后来杨成武回忆说：“毛主席敬我3杯酒，我在三八线坚守阵地2年，创下3项记录：**日歼敌最高记录；战役歼敌最高记录和歼敌总数最高记录。”**

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不得不说一说，他就是王蕴瑞。

在杨成武率部进入朝鲜以后，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为由，要求调王蕴瑞出任第20兵团参谋长。这是王蕴瑞第6次出任参谋长。他在朝鲜战场上，先后协助过邓华、杨得志、杨勇3位志愿军司令员。

王蕴瑞，1910年出生于河北省巨鹿县一个农民家庭。他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参谋长，先后给陈再道、陈赓当过参谋长。就在王蕴瑞即将到第20兵团上任之际，到朝鲜作战的第3兵团司令员陈赓知道了，陈赓找到周恩来，硬是将王蕴瑞改任第3兵团参谋长。后来王蕴瑞先后协助陈赓、王近山指挥了上甘岭战役。从1955年4月起，王蕴瑞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

且说6月15日，毛泽东在华北局1951年6月12日给中央的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

华北局在报告中说：中央关于“判处死刑，缓期2年，劳动改造，以观后效”的新精神下达后，河北省通县区村干部和群众中有不少反映。**有的干部认为缓期执行就是完全宽大，以观后效就是一笔勾销。群众对已捕的积极催案，要求及早杀掉。**在反革命分子中也发生了极大影响。已捕的反革命分子，原先的思想情况是不说，等死，“听天由命”。有的怕说多了，罪上加罪。听了贯彻新精神的报告后，开始动摇，认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政策，给了他们立功赎罪，争取活命的一线希望，情绪大为安定，不少人提出要求坦白。目前在押反革命分子的唯一顾虑是2年之后是否还会杀掉，再三要求解答。

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

河北省通县反映的情况值得注意。**缓期2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它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犯而不处死，**如果这样做，那就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向区村干部和人民群众解释清楚，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只对那些民愤不深，人民并不要求处死，但又犯有死罪者，方可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

毛泽东 6月15日

6月16日，《学习》杂志第5期发表了署名杨耳的文章《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毛泽东在此前审阅了这篇文章，还在其中加写了一些重要文字，他写道：

“**武训的中心事业是所谓行乞和办‘义’学。这件事，迷惑了很多天真的孩子般的不用脑筋的老好人，**其实是一个骗局。武训也许想过要为穷孩子办学堂，但事实只能为有钱人的子弟办学堂，不可能有真正的穷孩子进他那样的学堂。”“我们说，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

不久，《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准备对山东武训家乡进行实地调查。这个调查团由下列13人组成，他们是：

《人民日报》 袁水拍；中央文化部 李进，也就是江青；还有钟惦裴，他是周扬的秘书；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 冯毅之；平原省委宣传部 宇光、杨近仁；平原省文联 王燕飞；《平原日报》社 陈蕴山；聊城地委宣传部 司洛路；堂邑县委 段俊卿、赵安邦；临清镇委宣传部 赵国壁；临清县委宣传部 韩波。

毛泽东在调查团出发之前指示说：

**“武训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经死了几十年了；武训办的义学也不重要，它已经几经变迁，现在成了人民的学校。重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怎样看待这件事——对武训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应该歌颂？还是应该反对？”**

关于江青在这次调查活动中的情况，负责她生活问题的警卫员李家骥曾回忆说：“我对江青有3点印象：一是以普通工作人员出现，积极工作，没搞特殊，吃派饭，与基层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工作是深入细致的。二是江青身体不好，在农村工作20多天，很不容易。当时她因病容易出汗，尿频尿急，有时找不到厕所，困难是可以想象的。我们当时担心她挺不下来，结果还是坚持到了最后。三是与袁水拍等其他工作人员配合很好。对我们服务人员态度也比较好。”“一天在我值班时，主席对我说：‘江青争强好胜，身体不好，这次调查很顺利，没出大问题，她也挺了下来，多亏了你们帮助和照顾。’看来主席对江青在这次调查中的表现也是满意的。”

6月19日，毛泽东关于抓紧镇反和清理工作问题致电陈毅，他在电文中写道：

陈毅同志：

看了几个你们属下的镇反工作报告及你们对这些报告的批示，证明华东军区系统内的镇反和清理工作，业已活跃起来了，甚好甚慰。望你抓紧这个问题，贯彻到底，**务达纯洁内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惟各单位的报告和你们对这些报告的批示，发给我们备案即可，不必要求我们每件再作指示，以免延迟时间。

毛泽东 6月19日

6月21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示署名为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的一些修改问题。

此前，胡乔木受命为刘少奇起草在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稿，他花了一星期时间写出了草稿，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送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却批示：“此文以胡乔木同志名义发表。”胡乔木立马去找毛泽东，他说：这么一来，怎么向刘少奇同志交代？毛泽东说：少奇同志那里由我去打招呼，另外找人起草报告。于是，胡乔木便稍加修改，交《人民日报》排印，并定于6月22日见报。为此，胡乔木就给毛泽东写出了上述请示修改此文的信。这封信及毛泽东的批示原件如下：

主席：

《三十年》《人民日报》要求明日增出1张一次登完，现其余均已排好，希望能把改的一页清样马上看一下，在12点前退回。

对陈独秀说是当时“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拟改为“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是否较妥？（毛泽东批示：可以。）

“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已经完全胜利。”此处用“方式”意义不明确，拟改“原理”或“道路”或“战略”或“方针”，请示何者较妥。（毛泽东批示：“方针”为好。）

叙述整风时说“党抓紧了这个局势比较稳定的时期”，但前面说这是敌人扫荡最残酷最紧张的时期，似有不合。可否改为：“党抓紧了这个局势较少变化的时期进行了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这种教育在战争和革命猛烈发展和迅速变化的时期曾经是难于大规模进行的。”（毛泽东批示：这样好。）

第1次代表大会代表人数各说都是13人，惟李达说是12人，理由是包惠僧非代表。两说不知孰是？（毛泽东批示：是12人。）

以上各点请指示。

敬礼！

胡乔木

此时，毛泽东还收到了仇鳌从长沙寄来的一封洋洋数千言的长信，信中说：

“将马恩列斯及你的著作深刻研究，大足以创造另一世界及另一国家之经济文化，这是无可置疑的。惟党一接近实际政治，最易停滞与腐蚀。从来讲主义、谈革命，在宣传革命的时期，属于破坏方面，无所顾忌，易于成功；而**革命战争胜利后，迄至掌握政权，进入主义的建设，千头万绪，学识不够，经验全无，不独难见成功，而且时有错误，遂不免自起怀疑，顿生停滞现象**。在此期间，最宜鼓起勇气，克服此种困难，使既定政策能逐步实现。又，同志们在地下工作期间，正好如孟子所谓：‘劳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此皆能忍受。一旦革命成功，上述各种情况忽然消逝，取昔日敌人之所有者而尽有之，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皆达愉快，不免在有形与无形之间，使革命的伟大前途，因腐蚀而发生障碍。此则当前问题未可丝毫忽略得的。好在你党有一革命武器，即批评与自我批评。但须时时把握这个武器，不仅自己党员，就是党外人士，亦应争取共同掌握，相互运用，则一切艰难皆可克服。”

仇鳌这封信有两个特点：一是见事早，新中国刚刚建立，他就提出了如此尖锐的问题；二是语言直，通篇没有颂词，没有谀词，没有八面玲珑的话。毛泽东看罢，将信放在桌子上，点燃了一支烟，微笑着自言自语道：

“到底是亦山先生啊！”

他当即回信给仇鳌说：

“共产党就是需要您老这样的诤友。”

6月21日下午，毛泽东关于苏联援助武器装备问题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菲利波夫同志：

1、高岗同志回来转达了您对各个问题的意见。我认为所有的意见都是对的，我们就应该这样做。至于种植橡胶树的问题，我们想马上着手计划。我希望苏联政府派代表来帮助我们拟订计划。

2、**我军在朝鲜参战8个月的经历清楚地表明了我军与敌军在装备上的较大差距，迫切需要改善我军装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派高岗同志去请您供应60个师装备的原因，对此您是答应过的。这是我们在朝鲜参战部队今年起码的要求。高岗同志回来后讲，**您认为我们各个师的装备不足并建议各个师加强坦克和火炮。我认为这完全正确。**这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所必须的。我已致电徐向前同志根据您的意见进行全面的谈判。

3、根据徐向前同志与苏联总参谋部的代表进行预备谈判后发来的电报，**从按苏联总参谋部计算的60个师装备的总数中，今年将只供给16个师的装备（其中含3个朝鲜师的装备），其余44个师的装备将在1952—1953年提供。这与朝鲜战场的需要和时间是相抵触的。**

4、为满足朝鲜战场的迫切需要，请您研究一下高岗同志转给徐向前同志的申请，以及从7月到今年年底按每月六分之一的比例提供全部轻武器、大炮、坦克、飞机、汽车、汽车备件及燃滑油料、药品和其他军用物资的可能性，以便使赴朝参战各部队根据现实的编制得到补充。这对军事行动的展开是有利的。

5、在具备了按照我们的申请单于今年已供应了装备的情况下，按照苏联总参谋部提议的新编制的部队所必须而目前不足的装备数，可以在明年供应。与此同时，我们将按照所供应的装备，改编那些优秀的师，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60个师逐步改成新编制。

6、**由于我们的申请晚了3个月，因此给我们带来了很大损失**。**今天却突然带着这么大的数目去找您，并希望在6个月内提供所有一切，这给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特别在运输方面。不知能否做到这些，请您尽力而为。**

毛泽东 1951年6月21日

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主张朝鲜战场双方停火谈判，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当天，美国总统杜鲁门迫不及待地发表演说，同意马立克的建议。

毛泽东把朝鲜金日成首相秘密请到北京协商。金日成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坦率的交谈，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说道：

**“我们的指导方针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争取以和平方式达到结束战争的目的。**”

金日成还想进一步扩大战果，再多收复一些失地。周恩来说：

“我们已经将敌人赶到三八线以南，扭转了朝鲜战局。但是我们的技术装备仍然处于非常悬殊的劣势。现在谈判条件成熟了，应该边打边谈。”

毛泽东说：

**“要做好两手准备，谈得拢就谈，谈不拢就打。”**

金日成最后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双方还就谈判代表问题进行了研究。

6月24日，斯大林关于向中国提供装备问题致电毛泽东，全文如下：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转毛泽东同志：

您6月21日的电报收悉。

1、您应当从马立克的发言中知道，我们关于提出停战问题的承诺已经兑现。可能停战问题会有进展。

2、**关于装备60个师，我应当直言不讳地对您说，要在一年内完成这些订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般地说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们认为，在今年内提供10个师以上的武器装备就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只有在1951、1952、1953年和1954年上半年内，也就是3年内有可能完成60个师的订货，但仍有很大困难。这就是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们的最后意见。**我曾经千方百计想缩短这个期限，那怕缩短半年也好，但遗憾的是，经过检查，结果没有可能。**

我将以专门的电报更详细地告知这一切以及当前中国师的编制问题。

菲利波夫 1951年6月24日

欲知后来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情况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面对美帝国主义急于要求停战谈判，毛泽东在1951年6月13日给高岗和金日成的电报中却说：“**关于如何提出停战谈判的问题，我们认为现在由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对朝鲜和对中国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最近两个月内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都应采取防御态势。”“最好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声明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如果敌方提出停战问题，朝鲜和中国将表示同意。”**妙哉，妙哉！大智慧如毛泽东者，在他的同辈人之中，在这一类事关全球局势的重大问题决策上，无论是哪一位，都是难以企及的！

**第28章**

**“美国人打不下去了，就要停下来，我们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建设**

**我们的国家，战争是美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我们反对战争，但不**

**害怕战争，它需要打多久，我们就能打多久，一直打到它认输才停。”**

话说1951年6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华北局镇反工作指示写了一个批语。

华北局在给各省委的指示中说：各地在传达第3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后，曾引起一部分群众以至中下级干部的怀疑、不满与情绪低落。其根本原因，一是传达不深入，简单从事。二是一部分党的领导机关不重视中央公安会议的决议，也不审慎地研究当地当时具体情况，盲目办事。如有的县本来已决定杀掉而又完全应该杀的人，也因收缩杀人权而停止下来。为纠正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上述偏向，各级党委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第3次公安会议的决议，有计划地召开各种会议传达、讲解公安会议的精神。务使家喻户晓，人人明白，以鼓舞广大群众镇反的信心和勇气，巩固并发展镇反成果。同时由于各县区镇反工作发展不平衡，各级党委必须组织力量，一个县、一个区、一个村地去具体检查，具体研究。检查的最好方法就是召开各级的代表会议。

毛泽东在转发批语中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中央完全同意华北局6月24日给各省的指示，请你们注意此项问题，并照华北的办法处理之。

中央 6月25日

6月26日，毛泽东在符定一的来信上写了一个批示。符定一在信中汇报了中央文史馆的筹备情况，催促尽快批准成立，以便解决一批旅京老人的生计困难；并提出如果迟延开办，则请政府先发表一批老人名单，先期照单接济。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请齐燕铭同志办。**生计太困难者，先行接济，不使挨饿。**

毛泽东

6月下旬的一天，文运昌一行来京已经将近两个月了，他给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了一封信，报告了旅京情况，流露出无比的欣喜之情。他写道：

首道主席勋鉴：

前月奉毛主席电邀来京，临行匆促，不及辞谒，深以为歉。两月以来，暂游京门，甚得主席优遇。近月更拟游览天津、北戴河、山海关等地，益广识见。

此时，陈国生要回湖南了，便来到中南海向毛泽东辞行。她在谈话中说到文运昌给王首道写信的事及上述信中的内容。毛泽东沉吟片刻，说道：

“文十六阿公是摇鹅毛扇的。”

陈国生不解其意。这样含蓄的话，她哪里理会得？毛泽东的意思是，文运昌在信中如此炫耀，又耍小聪明，是另有深意的。他自然想起了文运昌在大革命失败后离开革命组织，在粤军1师师部担任过咨议和在广东揭阳担任过警察所长这一段历史。但这些话他不好明讲，只说了一句话：

“两面派。”

第二天，陈国生便离京回了湖南。

6月间，毛泽东召见了16军政委陈云开等人。

毛泽东对即将派往朝鲜战场的16军极为重视，因为这支部队以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的一支合成军，军部就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以“陆海空联合指挥所”的编成来建设的，而部队的两个主力师都增编配有一个炮兵团和一个坦克自行火炮团。所以在部队入朝前，毛泽东曾两次接见16军的领导，1951年6月这是第一次，军长尹先炳因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未能参加。毛泽东对陈云开说：

“我看过你在遵义剿匪的电报，干得不错，你们在剿匪中当了模范，在抗美援朝中要再立新功。”

毛泽东还说：

“我看战争形势对中朝方面有利，我们掌握了战争主动权，美帝国主义是一只纸老虎，外强中干，他们有原子弹也不怕，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在全世界人民的支援下，中朝人民有能力打败它。再说，**美国人打不下去了，就要停下来，我们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建设我们的国家，战争是美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我们反对战争，但不害怕战争，它需要打多久，我们就能打多久，一直打到它认输才停。**”

接着，毛泽东用了很长时间讲怎样带兵，怎样打仗，特别强调做好思想工作，加强仇美教育。毛泽东说：

“美国人是打‘钢’，我们是打‘气’，他们钢多气少。”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请16军的领导在全聚德吃饭。聂荣臻对陈云开说：

“主席给你讲的时间最长。”

陈云开说：

“主席知道我水平低，要讲细一些。”

后来，在7月7日，16军奉命抽调90个建制排共3646人，组成两个团，到友军参加入朝作战。

6月30日，美军司令李奇微致信中朝两军司令官，说希望举行3方停战谈判；他还提出谈判地点在停泊于元山港的一艘丹麦伤兵船上。

6月30日这一天，毛泽东关于停战谈判等问题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菲利波夫同志：

1、您的两份电报（发自1951年6月24日和1951年6月28日）收到了。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1）至于提供60个师装备的期限，我们应该只依据苏联的生产和运输能力来办，即在3年内完成60个师装备供应，而在1951年完成10个师的供应。（2）**您建议的现代化的中国陆军师的编制结构很好。我们采纳。在有了根据这种编制装备起来的60个师之后，中国军队将比现在强大得多。**

2、马立克的讲话保证了我们在进行和平谈判方面的主动权。

1951年6月28日我通过罗申同志收到了葛罗米柯同美国驻苏联大使柯克谈话内容的主要精神。谈话的最后说：“每一方应该只能有两个代表参加。此外，这些代表应该是有关军队的指挥员，而不是政府代表。因此中国志愿军的代表应该参加谈判，但不是作为交战方中国的代表。”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

金日成同志发来的电报收到了。他在电报中问：如果李奇微要求开始谈判，应该如何答复。**我已通知金日成同志和彭德怀同志，我们应该一边认真观察战斗形势，以便不使敌人有机会利用这个对其有利的时机，另一方面金日成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应该讨论这个问题并做好准备，在敌人要求开始谈判的情况下，派合适的代表进行谈判。**

至于如何答复李奇微，在收到李奇微的要求后，应该讨论答复的内容和措辞。您对此问题是什么意见？**如果谈判开始，最好您亲自领导他们，以免出现不利的局面。**

我把金日成同志的电报发给您看。

毛泽东 1951年6月30日

接着，他将“金日成关于美国对停战的反应致毛泽东电”转给斯大林：

致菲利波夫同志

金日成同志的电报：

“毛泽东同志! 今年6月23日马立克的广播讲话引起了美国人对停止朝鲜战争行动的兴趣。**合众国际社今年6月28日从华盛顿的报道中说：‘美国将军和高级军官们对停止朝鲜战争行动的盼望日益增加。**李奇微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就停止战争行动的可能性问题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从不断传来的报道中得知，一旦李奇微接到美国国防部的指示，他就同朝中军队司令员举行谈判。联合国部队司令部将发布这方面的报道。我们应如何对待这一点？如果李奇微想进行谈判，我们应当如何回答？请您立即通知您对这个问题的具体建议。金日成 1951年6月29日”

毛泽东 1951年6月30日

6月30日下午，毛泽东关于停战谈判问题再次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菲利波夫同志：

**敌军司令李奇微今天发表声明，建议交战双方代表在元山港外的一艘丹麦医疗船上举行停止军事行动的谈判，同时他宣称要求此事立即有相应的停火的保障。**

我现在通知您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请您研究并给予回复，还请您将此直接通知金日成同志。

1、**金日成同志大概应在7月2日或3日答复李奇微**。在这个答复中，他应当同意双方代表进行停战谈判，提出会谈的时间、地点和参加者人数的建议。

2、至于谈判地点，李奇微建议在元山港。**考虑到元山是北朝鲜海军基地，敌人打算在那里进行登陆，我认为不宜同意在那里举行谈判。可否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市举行谈判。**

3、为了保证我们的代表有时间对会谈进行充分准备，我认为指定7月15日为会谈开始日是适当的。

4、**由于这次会谈时间紧迫而且非常重要，请您同金日成同志保持直接联系，亲自领导这次会谈，同时把情况通报给我。**

毛泽东 1951年6月30日16时50分（北京时间）

这一天，斯大林关于停战谈判问题复电毛泽东，全文如下：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您关于停战谈判问题的电报收到了。我们认为，**应立即通过广播答复李奇微，同意与其代表进行关于停战谈判的会晤**。这个协议应由朝鲜人民军总司令和中国志愿军司令员，也就是金日成和彭德怀签署。**如果没有中国志愿军司令员签署，那么，美国人会认为朝鲜单方面的签字不具有任何意义。**应坚决拒绝把元山地区的丹麦医疗船作为会晤地点。应要求在三八线的开城地区举行会晤。正如您指出的，**现在您掌握着停战的主动权，所以美国人将不得不在会晤地点的问题上做出让步**。您今天要给李奇微发出大致如下的答复：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您28日关于谈判停战的声明收到了，我们授权向您声明，同意与您的代表会晤，以进行停止军事行动和确立停战的谈判。我们建议以三八线的开城地区作为会晤地点。如果您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在7月10—15日同您的代表会晤。朝鲜人民军总司令 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

在电报中，**您建议从莫斯科派人去领导停战谈判，当然，这是不需要的，也是毫无意义的。您，毛泽东同志，可以领导谈判。最多，我们可以在某些问题上提一些建议。我们也不能和金日成保持直接的联系。您应该同他联系。**

菲利波夫 1951年6月30日

1951年7月1日，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

“一、**经过8个月的激烈战斗，对朝鲜战争是长期的，认识上更深刻了**。美为维持东方和世界政治地位，依靠技术优势，故不甘失败。惟战争激烈，远隔重洋，人员物资耗费太多，运输亦困难（比我们好），兵力分散，长期坚持下去，力量削弱。苏联益见强大，美感久陷朝鲜作战，战略上失败，马歇尔派感觉比较锐敏。在武装日本中，虽有顾虑，但结果还须武装。

二、**我步兵强，人员多，但运输极困难。朝鲜地形狭窄，我军作战受到很大限制**。在我空军不能维护交通运输和必要的、部分的配合作战前，此种优势目前难以发挥应有的有效作用。我只有决心作长期打算，准备好各项有利条件。作战方面，在汉江、昭阳江以北及三十八度五线以南地段，进行反复拉锯战。平均两个月进行一次较大反击战役，打退敌进攻。如此我以21个军以三番或18个军作两番进行战斗，似此每月需补充兵员30000。每年战费7至8亿美元（以1950年比值计算）。上述概算，估计人力可支持，财力有困难。但从全国开展节约和开源（主要生产）运动，似亦可克服。

三、目前部署：志愿军以20军、26军（现在只用1个师）、42军、64军（人数很少）、47军，人民军2、5两军团（人数很少）担任防御战。如敌北犯甚急时，我阻击玉昌道里、剑不里、玉洞里、安峡、秀龙山线预定阵地，举行战役反击，争取迟滞至8月中旬时为有利。19兵团、3兵团即可大体准备完毕。否则，即以38军、40军、20兵团两个军与现在担任防御的部队，进行中等性的战役；反击仍须尽可能争取至8月初旬举行为有利。

四、**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方针是完全必须的。**我能掌握和平旗帜，对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均有利。坚持以三八线为界，双方均过得去。**如美国坚持现在占领区，我即准备8月反击。在反击前，还须放他前进数十里，使军事上、政治上于我更有利些。**”

这一天，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名复电给李奇微说，同意举行3方停战谈判；同时建议在“三八线”以南的开城进行谈判。

中朝方面确定的停战谈判代表是：首席代表为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副代表为志愿军副司令邓华、志愿军参谋长解方、朝鲜人民军司令部侦察局局长李相朝和张平山。

毛泽东因这些停战谈判代表不是专门的外交人员，便选定了两个谈判高手赴朝助阵，一个是外交部副部长兼军委情报部长李克农，一个是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际新闻局局长乔冠华。他在周恩来陪同下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见了李克农、乔冠华。周恩来首先向李克农、乔冠华交代了任务，他说：

“你们准备一下，明天坐火车到安东，接着到平壤见金日成，准备谈判。”

毛泽东对李克农说：

“我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乔冠华也要去。”

乔冠华问毛泽东：

“准备去多久。”

毛泽东说：

“三五个星期就够了。”

他要李克农立即组织工作班子，并强调说：

“外交部、军队都出人。”

此时，李克农正哮喘病复发，每天靠药物控制，服了镇静剂方能入睡。他担心自己的病会误了大事，便说：

“主席，是不是派其他更合适的人去？比如伍修权、姬鹏飞去？”

毛泽东略略迟疑了一下，坚定地说：

“还是你去吧！”

李克农毅然决然地说：

“那好，我准备一下，马上就出发！”。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设便宴为李克农和乔冠华饯行。

7月2日清晨，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金日成等人：

……

三、李克农率乔冠华及其他助手，于7月2日22时由北京乘车去安东，于7月4日傍晚由安东动身去平壤（不去联司），大约于4日早上，或5日晚上，可到金日成同志那里，和金日成同志及出席和谈的代表们（人民军的和志愿军的）会商有关和谈会议的一切问题，请金日成同志派人于适当地点接引他们。

四、**请彭德怀同志命令位于开城地区的军队负责首长迅速布置在开城开和谈会议的房屋（如果没有房屋就须使用帐篷）用具和食品等项，布置可靠的警戒，务必保障会议的安全，不许出乱子。**敌方代表团的宿舍（可能有几十个人，包括新闻记者），我方代表团的宿舍及开会的会场，均须布置得妥当一点。此外，还须为李克农、乔冠华等布置一所宿舍（距会场一二公里）。为此，请联司派一懂事的有能力的负责干部即去开城地区指挥上述布置事宜。开城情况如何，请速查告。

毛泽东 7月2日上午4时

7月2日深夜，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高岗并金日成，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高岗同志，并金日成同志：

在和敌方代表准备谈判及实行谈判期间，大约有10天到14天，请你们严格和充分地注意下列各点：

1. 争取在10天内，用极大努力，加强第一线部队的人员特别是武器和弹药的补充。请高岗同志将后方应运人员、武器、弹药等，尽这10天内外运入北朝鲜境内。必须准备着一经签订停战协定，这些人员和物资就不能运输和调动了。

二、极力提高警惕。**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空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

三、**杨成武两个军及50军，须令其迅速开到指定地点，防止敌人乘机在元山登陆，我38、39及42军则应准备对付敌人可能在西边登陆。**

四、请你们设想在停战协定成立以后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并预筹对策。

　　 毛泽东 7月2日24时

7月3日，毛泽东关于停战谈判我方建议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菲利波夫同志：

在双方军事代表开会期间，我们打算主要提出以下5点：

1、“双方应该同时下达停火命令。双方的陆、海、空军部队在下达停火命令后，应该在朝鲜全境停火并暂停一切其他敌对行动。”

这一点敌方是能够无条件接受的。

2、“双方的陆、海、空军应该撤离到距三八线十公里处，并在距三八线南北各十公里的地区建立非军事区。非军事区的民政机关应该是1950年6月25日前的形式，即三八线以北受朝鲜人民政府管辖，三八线以南受南朝鲜政府管辖。”

对方可能会有一些分歧，但我们认为，我们的建议是绝对公平的，敌方将难以驳斥。

3、“双方应该停止从外面运送装备、部队和**补给（包括陆、海、空军的运送）到朝鲜，以及运送到朝鲜前沿地区。”**

我们想，对方同样会就此问题提出建议，因而我们打算在这一点表现出主动，**而拒绝我们这条建议的后半部分也许更好些**？

4、**“成立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以监督1、2、3点的执行情况。进入该委员会中立国的代表应未参加朝鲜战争，数量相等，并由双方挑选。”**

我们想，对方也会提出类似的建议，因而我们打算在这方面表现出主动。但执行这一点会遇到许多困难。对方提出的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将在中朝边境和朝鲜重要的交通站监督我们的军事物资运输。或者我们不要这个主动，等对方提出建议后我们再采纳？请告知您的意见，怎么做合适，完全拒绝成立监察委员会看来也不合适。

5、“双方应该把战俘遣送回国。在停止军事行动4个月内，分批办理战俘相互交换的全部事宜。”

对方可能会建议进行一比一交换。我们应该要求遣送全部战俘，但被对方俘虏的北朝鲜人的数量相比之下更多一些，这些人已加入南朝鲜的部队，所以这一定会引起争议。

我们提出的上述主要5点意见，应该在双方军事代表会议上得到准许。

此外还有几点：

1、“所有的外国军队，其中包括中国的志愿军，在规定的时间内（如在3-4个月内）应该分批完全地撤出北、南朝鲜。”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但对方的代表可能会认为，此问题与政治问题有连带关系，不应该在这个会议上批准。请您研究并告知我方是否应该提出这一点。

2、“南北朝鲜的难民在规定的时间内（如在几个月内）应该返回到他们以前的居住地。”

金日成同志坚持提出这一点。但实现它很难。看来南北朝鲜的代表就此问题会产生许多意见分歧和争吵，有可能对其它重要问题的解决带来影响。是否可以提出这个建议？如果带来争吵并得不到批准，那么把它拿到国际政治性大会上去讨论。

请告知您对上述几点的意见。此外，昨天我们把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同志和他的助手派去了朝鲜。大约在1951年7月5日，他可到达金日成同志那里，并同他和其他同志讨论与和平谈判有关的各个问题。此后他将前往开城附近，在那儿秘密地指导谈判。

我把金日成同志就此问题阐述意见的电报也发给您。

毛泽东 1951年7月3日

接着，毛泽东将金日成关于停战谈判问题给他的电报，转发给斯大林：

致菲利波夫同志：

金日成同志的电报。

“毛泽东同志！我建议成立一个由3人组成的代表团。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代表团团长）、外务副相朴东柞和一名志愿军代表。在双方代表会谈期间，我们建议提出以下几点：1、从何日何时起（平壤时间）双方应该停火并停止其他的一切战斗行动。2、从何日起双方部队应该在三日内撤离到距三八线10公里处，并在该地区建立非军事区。3、双方应该停止陆、海、空军从三八线通过。4、从北朝鲜领海开走所有的外国舰艇，并解除对三八线以北海域的封锁。5、**自停火之日起，两个月内从朝鲜撤走所有的外国陆、海、空军。**6、自停火之日起，两个月内相互交换俘虏。7、被美国和李承晚的部队从三八线以北地区强行赶走的公民应该返回家园。请您阅过电报后马上给予答复。金日成 1951年6月30日”

毛泽东 1951年7月3日

这一天，斯大林关于停战谈判我方所提建议问题致电毛泽东，全文如下：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您7月3日发来的电报收到了。关于你们建议的前两点我们没有异议。**第3点的第2部分可以删掉，但如果美国人提出这样的建议，可以采纳它。第4点不必提出来。但如果美国人提出有关联合国监察委员会建议，那么这个建议应予拒绝，理由是联合国处于交战国的地位，而提出你们的关于由各方同意指定的中立国的代表组成委员会的建议。**第5点应该提出来并予以坚持。

至于您其他的两点（关于撤出所有外国军队和关于难民的问题），这两点建议应该提出来并予以坚持。

菲利波夫 1951年7月3日

7月4日凌晨，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他写道：

彭：

**开城地区如埋有地雷，须加撤除，特别是李奇微代表的飞机降落地、汽车通道及会场附近，必须撤除干净，保障安全，不出乱子为要**。

毛泽东 7月4日上午4时

7月4日晚，毛泽东致电金日成并李克农、乔冠华，他写道：

“一、金于7月4日13时的电报，李、乔于7月4日12时由安东发来的报告，均收到了。

二、李、乔及邓华均可于7月5日拂晓到金处，请金召集李、乔、邓及南日、金昌满，金波、柴军武（即柴成文——笔者注）等立即会商一次，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应于7月5日傍晚即由平壤出发于6日早上或晚上到开城地区准备各项事宜，早一点去较好。

三、如果你们同意早去，则给李奇微的第二个通知就不要发了。但如果你们认为于7日上午我们仍有必要派若干人利用白天乘车去开城帮助会议工作，则那个通知仍可于6日上午发表。究竟是否发表那个通知，请金于明（5）日告我一电。但李、乔、南、邓、金、金、柴等同志，最好于5日夜车即去开城，愈早愈好。

毛泽东 7月4日21时

7月7日，毛泽东在空军司令部将派部分空军部队进驻朝鲜各机场的报告上批示道：

“为不给敌人以口实，不要去。”

7月7日下午，毛泽东约周世钊、蒋竹如两位老同学在江青陪同下到中南海划船。他们的话题转到《左传》和《楚辞》时，谈起了屈原与屈瑕（楚武王封子暇于屈，即为屈服，其后人以“屈”为姓，屈原便是其后裔）的世系关联，毛泽东说：

“《左传》和《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一读的价值。”

7月8日，朝鲜战场上的双方联络官会议在朝鲜开城高丽里广文洞的来凤庄举行。双方交换了代表名单，决定于7月10日上午开始谈判。

“联合国军”的首席谈判代表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中将；其他成员有：美国远东海军副参谋长奥尔林·勃克少将，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克雷奇少将，美国第8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治少将，南朝鲜军第1军团军团长白善烨少将。

中方代表为了戏弄美李军代表一下，就说：

“为了便于识别，以免误伤，希望你们的代表乘坐的车辆上，挂上醒目的白旗，除代表以外的人员，要佩戴上醒目的白袖章。”

美李军方面代表见中方代表说得很认真，还真的就答应了。

7月9日，毛泽东仔细审阅了南日、邓华准备在首次谈判中的发言稿，他在给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写道：

“南日、邓华两个发言稿均可用。**惟南日稿内称‘愿意接受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先生的提议并准备举行停战谈判’，改为‘愿意接受停战谈判’，将‘接受苏联’以下21个字删去，因为李奇微的声明在文字上并无愿意接受马立克提议的表示，如果南日这样说，可能引起对方的无谓的批评。**邓华发言稿中所说马立克提议一段则是好的，不会引起批评的。**如果你们认为南日发言稿中应有提到马立克提议的话，应在另外的地方去说**。”

接着，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纪念建军24周年的指示稿上加写了一段话，他写的是：

“**我前方部队，必须鼓励士气，继续英勇作战，千万不可有丝毫的松懈，不要作此次可以和下来的打算，而应作此次和不下来、还须继续打、还须给敌人以大量的消耗和歼灭，然后才能和下来的打算。**只有我们做了此种打算，才于争取最后胜利有益处，否则是没有益处的。”

7月9日这一天，曾经被毛泽东风趣地称为“救命菩萨”的湖南一师同窗好友李声澥，即李中，病逝于湖南南县。

原来，李中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回到原籍以原名兴办学校。1951年，毛泽东得知他在故乡从事教育工作，仍十分感念这位1919年初在浦口借钱给他的“救命菩萨”，便先后3次写信邀请李中到京一晤。李中在应邀赴京途中不幸患了重病，不治而亡。

7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代表团同联合国军代表团在三八线以南的开城来凤庄举行首次停战谈判。

这一天，美李军代表来到开城的时候，还真的应中方的要求在车上悬挂了一面白旗，使得中朝方代表忍俊不禁，美李军代表这才感觉不对头。后来他们就要求不坐汽车，而是改乘直升飞机来。

10日上午10时，双方谈判正式开始。在谈判大厅里，东西横向放着一张长方形条桌，桌面上铺着一幅墨绿色的台布。双方代表在桌子两侧相对而坐，彼此都显得有些紧张。美方首席代表、美国远东海军司令长官乔埃，是一个急性子，谈判一开始，他便开口道：

“我们双方代表都是军人，我希望大家说话能像子弹出膛一样，直率迅速地解决面临的问题。”

乔埃怎么也想不到，中朝方面代表团实际上分为前方、中间站和后方3道线，第一线直接出面的是南日、邓华等人，第二线是乔冠华和负责联络的柴成文，第三线则是幕后指挥的李克农。李克农还负责将每天谈判的情况，上报毛泽东、金日成和彭德怀，随时请示。李克农实际上成了中朝代表团的负责人，由于他的身份不便公开，大家就称他为李队长，而把乔冠华叫作乔指导员。

第一次双方会谈自然是无果而终，问题就卡在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上。李克农随即将会谈的情况报告给毛泽东。乔埃则向李奇微诉苦说：

“中国人真难对付！他们把朝鲜人推到前面，同我唇枪舌剑地辩论，自己却躲在背后出鬼主意。”

7月11日，毛泽东复电给李克农说：

“撤兵一条必须坚持。”

7月11日这一天，毛泽东就修改后的《武训历史调查记》，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

请读者注意，这个《武训历史调查记》原是武训历史调查团辛勤工作的成果，是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过的，笔者本无须多费口舌。但鉴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毛泽东身后又要翻案，便不得不多费一点笔墨了。兹将《人民日报》1951年7月23日刊登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前言部分及部分结论摘录如下，供诸君研究：

“为了彻底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在武训问题上的混乱思想这一个目的，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发起，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这个调查团是由下列13个人组成的：袁水拍（人民日报社），钟惦棐，李进（中央文化部），冯毅之（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宇光，杨近仁（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王燕飞（平原省文联），陈蕴山（平原日报社），司洛路（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段俊卿，赵安邦（中共堂邑县委），赵国璧（中共临清镇委宣传部），韩波（中共临清县委宣传部）。此外，尚有堂邑、临清、馆陶的许多县、镇、区、村的干部同志参加了这个调查工作。假如没有这些同志帮助，我们的调查工作是很难完成的。**根据调查的材料执笔写成本文的，是袁水拍、钟惦棐、李进3人。**

我们在堂邑、临清、馆陶等县，先后进行了二十几天的工作，调查了5部分材料：

一、**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

二、武训的为人

三、武训学校的性质

四、武训的高利贷剥削

五、武训的土地剥削

被我们直接或间接访问过的当地各阶层的人们共有160多位。那些亲自见过武训的老年人（多数），或者是确知武训某些情况的壮年人（少数），是我们直接访问的对象。

我们在堂邑亲自访问了下列诸人：武克科（武庄人，78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武玠（武庄人，70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武金池（武庄人，72岁，过去是贫农兼木匠和油漆匠，现在是中农），武克亮（武庄人，78岁，过去是富农，现在是中农），武金兴（武庄人，武训的曾侄孙，45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武金兴之妻（43岁），武金栋（武庄人，78岁，青年时候当过雇工，后来学武训，不务正业，到处以‘义学’名义磕头募捐，讹诈劳动人民，搜括了不少的钱，土地改革时，农民坚持要斗他，分了他一些土地，他现在是个中农），陈福临（武庄人，79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武明之妻（武庄人，84岁，武训的族弟妇），赵维汉（柳林镇人，72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郭缙武（柳林镇人，78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郭继武（柳林镇人，79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新中农），郭金鉴（柳林镇人，87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韩祝龄（柳林镇人，72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穆仲山（柳林镇人，66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杨光汉（柳林镇人，70岁，杨树坊之孙，过去是恶霸地主，现在是中农，被判了徒刑），郭培先（柳林镇人，75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杨光炬（柳林镇人，66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杨鉴远（柳林镇人，75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赵朝熙（柳林镇人，67岁，过去是富农，现在是中农），赵棣（柳林镇人，65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石东海（夫人砦人，74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李四德（夫人砦人，77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杜汝真（夫人砦人，77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张洪鲁（夫人砦人，86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萧振如（萧集人，70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萧泗汉（萧集人，70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萧桂树（萧集人，64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萧洪飞（萧集人，71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萧怀祥（萧集人，70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唐勤习（连二砦人，75岁，武训的外孙，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张春华（连二砦人，82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张铸（连二砦人，82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梁老梦（连二砦人，82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林雪亭（乔庄人，69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范昌期（乔庄人，81岁，秀才，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倪瞻云（倪屯人，81岁，秀才，过去是破落地主，现在是中农），路思铎（东路堂人，72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梁亭桂（万庄人，70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路兆平（万庄人，84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路延林（后路堂人，103岁，过去是由佃户变成的地主，现在是中农），路文显（后路堂人，71岁，过去是富农，现在是中农），潘耕申（王二砦人，70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潘耕历（王二砦人，78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王立成（小刘贯庄人，81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宋克义（赵郎砦人，51岁，黑旗军领袖宋景诗的堂兄弟的孙子，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王维修（王樊庄人，70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崔金如（崔庄人，75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王汤传（崔庄人，75岁，过去是富裕中农，现在是中农），张玉池（中布砦人，29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我们在临清亲自访问了下列诸人：魏浚哲（临清镇吉士口街人，73岁，过去充当过衙役、商人，现在是城市贫民），冀熙亭（临清镇东夹道人，73岁，过去做过钱庄的领东掌柜，现在是贫农），赵名选（临清镇锅市街人，85岁，过去是富商，现在是富裕中农兼杂货店经理），孔昭文（临清镇车营街人，65岁，过去和现在都是搬运工人），陈茂林（临清镇后关街人，65岁，过去是店员、经纪，现在是城市贫民），郭宗周（临清镇吉士口街人，67岁，开小茶馆），于明轩（临清镇锅市街人，70岁，秀才，过去是自由职业者，现在是中农），赵镜波（临清镇大寺街人，76岁，过去和现在都是富商），郭华亭（临清镇后关街人，38岁，过去是中农，现在是自由职业者），朱镜波（临清镇大寺西街人，78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医），张紫绶（临清镇锅市街人，70岁，过去是银楼资本家，现在是中农），李汉邦（临清镇东关街人，86岁，过去是衙役，现在是城市贫民），张琴轩（临清镇南场街人，73岁，过去和现在都是城市贫民），李玉岭（临清镇吉士口街人，69岁，过去是衙役，现在是小摊贩），刘季重（临清镇人，62岁，贫民）。

我们在馆陶亲自访问了下列诸人：丁发训（西二庄人，79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侯士太（西二庄人，67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李文兰（西二庄人，79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李俊（西二庄人，74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侯子廷（西二庄人，71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王保西（西二庄人，79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汪宪章（杨二庄人，78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汪景东（杨二庄人，49岁，过去是富农，现在是中农），汪毓芳（杨二庄人，39岁，中农），刘继先（杨二庄人，72岁，贫农），徐兰田（庄科人，83岁，中农），马朝臣（庄科人，74岁，中农），张晓峰（薛店人，74岁，贫农），陈雨亭（薛店人，79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李周氏（薛店人，76岁，中农），牟世英之妻（薛店人，82岁，贫农），李协元（薛店人，74岁，中农），李四（薛店人，72岁，中农），夏连全（塔头人，68岁，中农），王永成（塔头人，88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以上堂邑县50人，临清镇15人，馆陶县20人，共计85人，都是我们在二十几天中分别地直接访问过的。

此外，我们还收集了临清、馆陶、聊城、冠县等《县志》、《山东通志》、《山东军兴纪略》、《兴学始未记》和《兴学创闻》等清末或民初的著作和1934年国民党人郭金堂等出版的《武训先生九七诞辰纪念册》，除《兴学创闻》无甚可取外，其余都是很重要的材料。可惜没有找到清末的《堂邑县志》，我们在堂邑、临清、聊城、馆陶、冠县等县及北京、济南两处的图书馆，都没有找到这部书，有人说是因集稿未刊被火灾损失了。”

在《武训历史调查记》中，关于武训剥削的结论是：

“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遵从反动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大地主武训以‘兴义学’为手段，对农民进行了十分残酷的剥削。我们从被访问的农民口中，知道武训凭借特权，可以规定租种他土地的佃户不得退地不种，可是武训却可以随时抽地不给某一佃户续种。武训凭借特权，还可以随时涨租子。遇到荒年欠收，却又不准有任何减免，而是‘死租子’。农民们说：‘武训的租子不能欠，不交不行。’在我们所能见到的那些地亩文约上，没一处是直书‘武七’这个名字，而是一律尊称为‘义学正’。从这里也看得出当时这个地主的地位的特殊和威风不少了。因此，我们说，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难道还不确切吗？”

江青在此处又加了一句话：

“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了，用武训这个僵尸欺骗中国人民的恶作剧应当结束了，被欺骗的人民也应当觉醒了。”

调查团将《武训历史调查记》呈送给毛泽东后，毛泽东从文字上对每一部分都作了认真修改，重要的改动和加写的地方多达15处。他在武训兴办“义”学一处加写的是：

“**只有地主阶级能够垄断文化，办学校。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学文化的机会的。**在封建地主阶级看来，使用简单工具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农民，也没有要使他们受教育学文化的必要。这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规律，是唯物史观所指示的法则。**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并取消地主与农民间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成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这种可能。”**

再说毛泽东在给胡乔木的信中写道：

乔木同志：

此件请打清样10份，连原稿交江青。排样时，请嘱印厂同志校正清楚。其中有几个表，特别注意校正勿误。

毛泽东

后来在7月23日至28日，《武训历史调查记》在《人民日报》上连载，不久，又印成小册子发行。长篇《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实际上为武训历史作了结论。

7月12日，美李谈判代表提出要带20名新闻摄影记者进入谈判会议区域，并在未得到朝中方面同意的情况下，就单方面带了20名记者前往开城采访，遭到了朝中联络员的拒绝。美李代表团便以此为借口中断了谈判。

7月13日，美李代表又提出在开城及其附近地区划出一个中立区，并称你方如同意这些建议，会议即可恢复，不致迟延。

7月14日，毛泽东致电李克农并转金日成、彭德怀，他写道：

“李奇微的通知是以划中立区为主题，来掩盖他因记者这个小问题而引起会议停顿的不妥当行动。**我方为取得主动起见，决定同意他划中立区的提议，也同意他将新闻记者作为他代表团工作人员一部分的办法，以取消敌方的一切借口。**”

这一天，毛泽东还为中朝方面重新起草了给李奇微的复信，他写的是：

李奇微将军：

你的7月13日的来信收到了。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论，使和平谈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起见，我们同意你所提的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进行期间的中立区，在此区域内双方停止任何敌对活动，及将武装人员完全摒除于会址区域及你我代表团通往会址区域的通路之外的建议。至于这个会址区域的大小及其它有关的具体问题，我们建议交给双方代表团在一次会议上去解决。

关于引起这次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和划中立区的问题无关的。后一个问题自从7月8日贵方联络官提过一次之外，贵方的代表团再也没有提出过。而联络员的任务是讨论细节问题的，无权讨论想划中立区这样性质的问题。

**此次引起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一个小问题，值不得为这个问题引起停会，更加值不得为这个问题而引起会议的破裂**。贵方代表团曾经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我方代表团当时认为在会议还没有任何成就，并且连议程也没有通过的时候，各国新闻记者来到开城是不适宜的，这个问题因而没有取得协议。

我们坚持一切问题必须由双方协议才能执行的原则，我们认为这个原则是公平的，无可辩驳的。新闻记者问题既然没有达成协议，就不应当由贵方一方片面地强制执行。

**为了不因这件小事而使会议陷于长期停顿或破裂起见，我们现在同意你的建议，即请贵方新闻记者代表20人作为你的代表团工作人员一部分**。我们已命令我方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也给贵方以便利。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

1951年7月14日

欲知朝鲜战争停战谈判能否继续进行下去？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人民日报》1951年7月23日刊登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前言部分及其结论，如果认真研究一下，便会明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吹捧《武训传》的那些人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主张批判《武训传》的文化革命派之间的谁是谁非了。毛泽东在修改《武训历史调查记》时加写了一段话：“**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并取消地主与农民间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成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这种可能。”**他是这样说的，也正在这样做，还真的实现了“**农民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联系到旧时代的教育制度和现代的工农大众子弟交不起学费、上不起学的社会状况，还不能发人深思吗？！

**第29章**

**“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

**即尚未采取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

**力阶段，则中国的合作化，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

**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

话说1951年7月15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重新开始。

7月15日这一天，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对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情况，他写道：

“古人说，能战然后能和。我们也是如此。我方昨天采取了一个步骤，对于剥夺敌方的借口以利会议续开一点，将是有益的。”

李克农在谈判期间病情日益恶化，有一次在开会时竟然昏死过去了。毛泽东只好派伍修权去接替他，他却说“临阵不换将”，坚决不肯回国。毛泽东只好让伍修权留下来协助他工作。

7月17日，毛泽东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这几天来，我们在中立区及新闻记者问题上，在议程中的军事分界线及监察和停战的机构问题上，都已做了让步，有可能使他们发生错觉，因为在他们继续拒绝讨论的情况下，我们仍会继续让步。因此，**你们必须在撤退外国军队问题上，不要顾虑对方拒绝讨论，要继续驳斥对方拒绝讨论之非，而且不要去争论这是军事问题或是政治问题，而应着重说明这是保证停战的必要条件，以免掉入敌人故设的逻辑陷阱**。……**我们不提议休会，不表示破裂，但也不怕他们破裂。**我们提此条是有充分理由的（**各国派兵到朝鲜是来作战的，不是来旅行的，为什么停战会议有权讨论停战，却无权讨论撤兵呢？**显然这种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方坚持会议既然有权讨论停战，也就有权讨论撤兵）。”

7月19日，李克农在谈判会议结束后致电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他写道：

“**南日又根据发言稿精神，就撤军一事，向对方连续发起进攻，使对方对南日所问为何不同意撤军及停战后将军队留驻朝鲜的目的何在二问题，局促无词，窘态毕露。**南日今天在会上发问灵活机敏。对方至无法答复时，以抽烟遮掩，并频频搔首，作无可奈何状。会中我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对方完全陷于被动。”

7月20日，毛泽东关于撤退外国军队问题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菲利波夫同志：

在恢复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谈判后，在5次会议期间，我方和敌方代表根据日程安排就3个问题达成协议。

1、为建立非军事区，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作为减少朝鲜敌对行动的主要条件。

2、在朝鲜实施停火和停战的具体措施，包括建立监督履行停火和停战情况的机构，其权力和职责。

3、针对俘虏问题的措施。

**关于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问题，敌人坚持反对列入议事日程，认为，不应列入停止军事行动的谈判讨论的范围，它在和平谈判解决之前应延缓。**虽然我们的代表多次驳斥敌人的理由，但是敌人像以前那样，看不出有让步的迹象。根据凯南和马立克的会谈、目前谈判进程以及与朝鲜和远东问题有关问题的发展，**可以看出，敌人希望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目的在于在战争中避免进一步伤亡和拖延时间**。**关于其它问题，包括外国军队撤出朝鲜问题，敌人希望继续维持目前的紧张局势，以便更好地在国内强行动员和在国外进行扩张。所谓和平谈判，这是一句空话。**如果敌人把停止军事行动之后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提交联合国讨论，那么我们未必能同意。我们甚至可以假设，和平谈判进行时，敌人仍会像以前那样，在争论的过程中把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和其他问题搁置一旁。**如果朝鲜能真正实现停火，敌人可能会经过一段时间后单独撤军。**但是如果在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协议中通过外国军队可以部分撤出朝鲜，那么在执行这一条款时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但是目前远东持续的紧张局势中，敌人在政治上已失去重要基础，因此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这样做。那么，看来我们应重新研究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的问题。**以前为了恢复北、南朝鲜，我们建议和同意在三八线停止军事行动。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我们的武装力量只能把敌人赶出北朝鲜，但还不足以把敌人赶出南朝鲜。如果战争拖延下来，敌人可以受到更大的损失，而我们自己在财政上也会受到很大攻击，并且那时我们也很难进行国防建设。如果时间拖延，例如6—8个月，我们可能会把敌人赶出南朝鲜，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会付出很大代价。目前这种可能性还不存在。**如果谈判破裂，我们想再打几个月。如果关于三八线的问题遭到破坏，那么我们有能力逐步把敌人驱逐到三八线以南。那时我们重新开始停止军事行动的谈判，主动权像过去那样还会在我们的手中。如果关于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的谈判破裂，那么在战争进行数月之后恢复谈判时，敌人可能重新拒绝这一条款。如果那时同意不把此条款列入停止军事行动的会议议事日程，那么我们会陷入更为不利的状况。**如果新的谈判又破裂，那么我们将被迫进行长期的战争，以解决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即在实际上解决在目前条件下无法完成的将敌人赶出南朝鲜的任务。**在做出这样的分析后，**我认为需要表述我本人对解决这一复杂问题的新的想法，即最好是不要提出把外国军队撤退问题作为停止军事行动的必要条件，这样做要比通过长期军事行动的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为好，而在军事行动中很难得到所需要的结果。**

马立克同志说：双方从三八线撤军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而外国军队撤退问题可以在停止军事行动之后进行讨论。如果我们现在不同意，而将来同意不把这个问题列入停止军事行动谈判的议事日程，那么最好现在就同意，而把这个问题留给以后去解决，以便使它成为我们手中的武器，就像外国军队撤出台湾、单独对日和约及重新武装日本的问题一样。

如果您认为我提出的问题和观点正确，那么在收到您答复之后，经金日成同意，我给我方谈判代表下达新的指示。如果您反对，请把您的观点告诉我们，并给予指示。

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毛泽东 1951年7月20日

7月20日这一天，美国政府指令其谈判代表说：

“联合国军代表在不给予对方任何承诺的范围之内，可以提出能使对方单方面进行议论的广泛议题。假如对方连这个也不接受的话，联合国军代表可以同意在将来的某个时间讨论相互缩减军队的问题。”

这说明他们也不愿意承担谈判破裂的责任，准备在讨论撤军问题上作出让步。

7月21日，斯大林关于停战谈判撤军问题致电毛泽东，他在电文中写道：

毛泽东同志：

您7月20日来电收悉。**我们认为你的观点是正确的，即不再坚持把撤走外国军队一项列入议程。在谈判中你们充分利用撤军一条，一方面显示出你们热爱和平，另一方面揭露敌方不想加快和平进程。现在则可以与事无损地把此事向后推而同意不把它列入议程**。

菲利波夫

7月26日，**停战谈判双方通过了一个5项内容的谈判议程**：1、通过议程。2、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3、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4、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5、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

7月26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

7月24日电收到。敌人是否真想停战议和，待开城会议再进行若干次就可判明。**在停战协定没有签订，战争没有真正停止以前，我军积极准备9月的攻势作战是完全必要的**。

毛泽东 7月26日

7月27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终于进入了实质性谈判阶段。**

7月28日，江青在“电影指导委员会”的会议上，介绍了武训调查团的工作，她还肯定了4月份报刊上对电影《光荣属于谁》的批判。

7月间，邵力子从淮河流域视察回到北京以后，给毛泽东写了一份考察报告。没过几天，毛泽东亲自给邵力子打电话说：

“先生的报告拜读了，觉得很好，也符合实际。中央已研究决定，先从淮河向水患宣战。”

7月间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毛泽东在罗瑞卿等陪同下来到颐和园散心，想起丁玲和她丈夫陈明借住在颐和园云松巢写作，就对罗瑞卿说：

“好久没有见丁玲了，去看看她吧。”

说罢，他便径自往丁玲住的云松巢走去。警卫员赶紧前去通报。

此时，丁玲担任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委员、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文艺报》和《人民文学》主编以及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等许多职务，成为新中国文艺界的实际领导人之一和最活跃的人物。警卫员跑上云松巢，向陈明通报说：

“有一位首长要来看望丁玲同志。”

丁玲、陈明夫妇和看望丁玲的甘露，都猜不出是哪一位首长来了，赶忙迎了出去。

7月的北平，天气正热。罗瑞卿陪着毛泽东踏着山坡上的台阶拾级而上，毛泽东显得有点气喘，上身的衬衫都被汗湿透了。丁玲见了，急忙上前，拉着毛泽东的手在门前廊下的一排椅子上坐下来歇一歇。毛泽东告诉丁玲：

“今天来昆明湖散散心，到这里后想起了你们在这里写作，就来看看你。”

丁玲听了，非常欢喜，连忙和甘露等人切西瓜，又招呼罗瑞卿和警卫员等围着毛泽东坐在一起，一边吃西瓜，一边谈天说地！毛泽东朝四周望望，只见古松翠柏环绕，环境清幽，笑着说：

“这地方不错嘛，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呐！毕竟是胜利了，条件也大大不同了。”

他又问丁玲：

“丁玲呀，你又在这里写什么大作呀？”

丁玲说：

“一天到晚都在忙事务，写不了什么。这几天在赶写一篇批评萧也牧的作品《我们夫妇之间》的文章。”

毛泽东笑着说：

“哎呀，这些秀才呀，冇得几天，又是《武训传》，又是什么《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弄得好起劲啰！”

他似乎像是在看一出荒诞剧似的。说起这个话题，联系到现实的文艺思想斗争，针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他语重心长地说：

“**急不得，也迁就不得。他们可是我们建设用得上的宝，要耐心、细致地做工作，好好团结他们，关心他们。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是要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

毛泽东讲得很亲切，那份对知识分子的诚恳，令在座的人都很感动。此时，警卫员上来说：

“主席，游船准备好了。”

毛泽东便起身告辞，还鼓励丁玲多出好作品。众人依依不舍地送毛泽东到昆明湖划船去。

就在这年夏季的一天，天气十分闷热。中午刚过，毛泽东上穿细纱织成的背心，外面罩着一件白色的长袖衬衣，领口松散着，两只袖子卷到肘弯处；下着一条浅灰色的宽大而长的单裤，坐在院子南边树下的一张藤椅上乘凉。他那高而宽阔的前额上，布满了细细的小汗珠。他把双臂放在藤圈椅的扶手上，线装的书卷握在下垂的左手里，右手夹着一个插着半截香烟的烟嘴，苍白色的烟灰已经有1厘米多长了。

王鹤滨来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用右手朝右前侧的藤椅伸了伸，示意他坐在自己的身旁。王鹤滨怕打扰毛泽东的思绪，轻轻地坐下来，陪着毛泽东静静地坐着。

就在这时候，毛泽东的两个女儿在菊香书屋的通道中因讨论蒋介石而争执了起来，李敏说：

“蒋介石是中国人。”

李讷则说：

“蒋介石不是中国人，因为他太坏。”

“他是中国人。”

“他不是中国人。”

“他坏，他坏也是中国人呀！”

“他是坏人，坏人就不是中国人！”

姊妹俩争执不下，就想起了爸爸。她们认为爸爸学识渊博，世界上没有爸爸解答不了的问题。李讷说：

“咱们找爸爸去，让爸爸评评理，看谁说的对。”

说着，她就向院里跑去，李敏也紧紧跟在后面。李讷束着两条小而短的辫子，并排在脑后。李敏也束着两条辫子，浓黑而粗长，辫梢搭在双肩，用蓝色的锦缎带打着蝴蝶结。姊妹俩在白色衬衣的翻领下都系着红领巾，妹妹穿着刚刚过膝的小裙子，姐姐的裙子较长，裙边的下摆拖到了脚面。跑在前面的李讷，白皙透红的鸭蛋型脸庞上，嵌着两只大而发亮的眼睛。跑在后面的李敏，皮肤略黑于妹妹，瓜子型的脸，黑黑的大眼睛，有两道比妹妹浓黑的双眉。李讷跑到毛泽东跟前，喘着气，蹲下身子，双手扶着爸爸的双膝。李敏来到爸爸的身后，双手搭在藤椅靠背圈上，从爸爸的右肩伸过头去，望着爸爸笑笑。

“爸爸，你说，蒋介石是不是中国人？姐姐说他是中国人！”

急性子的李讷一边问，一边用两只小手掌使劲地摇晃着爸爸的双膝，急切盼望得到爸爸的回答。毛泽东俯视着膝下的小女儿，面带微笑地说：

“蒋介石是中国人！”

李敏听毛泽东如此一说，高兴得撑着藤椅背圈，用力向上挺挺身子，有意让妹妹看看她得意的神态。李讷急了，把小嘴撅了起来，不服气地又问：

“蒋介石那么坏！他还是中国人？”

毛泽东认真而耐心地说：

“蒋介石确实很坏，但他还是中国人。现在他跑了，跑到我们中国的台湾省去啰！”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口烟，又轻轻地吐出来。李敏就怕闻到烟味，用手把飘到她面前的烟左右拂开。毛泽东带着沉思，像是对女儿、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蒋介石这个人很坏，外国人想要他，我们还不给哩。”

李讷问：

“那为什么不给外国？”

“因为，他是中国人！”

毛泽东说完，乐呵呵地笑了。李讷这才明白了，中国人里也有坏人。姊妹俩得到了答案，心满意足了，又一前一后地跑开了。

关于蒋介石的这个话题，引起了毛泽东沉痛的回忆，他以低沉的语调对王鹤滨说：

“蒋介石杀死了我的夫人杨开慧，杀死了我的兄弟毛泽民、毛泽覃，还杀死了我的妹妹毛泽建和我们毛家的毛楚雄。蒋介石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优秀的中华儿女、革命志士！蒋介石也曾悬赏要我的头！”

他说着，将手中的烟嘴用食指弹了几下，使烟头上的灰落入烟缸中，将烟嘴放入嘴中，慢慢地用力吸了一口，继续说：

“西安事变，捉住了蒋介石，为了民族的利益，我们没有杀他，还是把他放了。”

毛泽东凝视着前方，沉思着，从他口中吐出来的烟，在眼前形成了层层上升的薄薄的烟幕。他说：

“我在青年时代，有着一个抱负，觉得中国这样衰落下去是不行的；但我那个时候尚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曾在程潜的部队里当过兵，站过岗，放过哨，受过军事训练，在部队里的时间很短，就离开了，我发现那个时候当兵，并不是拯救中华民族的道路。”

他停顿了一下，吸了两口烟，接着讲：

“我到了北平，临时在北大红楼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图书馆的工作给了我很大便利，使我能阅读到很多书籍，在这里我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第1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形势是非常好的哟，革命胜利的客观条件都已经具备了。那个时候，如果党内有个好的领导者，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革命取得胜利就会比现在要早好多年，少牺牲多少革命的同志啊！”**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又轻轻地吐出，一缕青烟向上袅袅的飘起。他非常痛惜地接着说：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把革命的大好形势断送了。他不要农民，不要武装，当蒋介石向我们杀来时，毫无抵抗力量，许多革命志士死在了蒋介石的屠刀之下，代价是巨大的啊！**大革命的失败，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20多年**。那时的革命者尚很幼稚，对当时党内的大人物陈独秀，未能阻止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虽然有很好的革命成功的客观条件，革命还是失败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第1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果实断送了，他本人也被蒋介石抓进了监狱。陈独秀出狱后，曾向党中央写过信要求回到中央来……”

王鹤滨第一次听说这件事，忍不住问：

“主席，中央答应他回来吗？”

毛泽东又吸了两口烟，说：

“中央接到陈独秀的信后，给他回了信，告诉他，要回来是可以的，但他必须公开承认错误。”

王鹤滨又问了一句：

“主席，他承认错误了吗？”

毛泽东说：

“陈独秀没有公开承认错误，他也未能回到中央来。”

1951年8月1日，毛泽东为“9月战役兵力部署和粮弹储备”致电彭德怀和高岗：

德怀同志并告高：

1. 以20兵团替换9兵团1个军或两个军的部署甚好，但9兵团的主力仍以作9月战役的第二线兵力（第二梯队）为宜，不要调远了。

二、13兵团的38军、39军、40军应在8月上旬调至第一线积极准备9月战役，而从3兵团及19兵团中抽出3至4个军接替海防兵力。

1. **在最前线修建多数粮弹储备库，为9月战役储备充分的粮弹，使作战时能随缺随补，此点极关重要。**闻你已在筹备，未知情形怎样。

四、以上各点盼复。

毛泽东 8月1日

8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撰写的《读〈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他这篇读后感，一是称赞《调查记》，二是再次检讨自己的错误。他称赞《调查记》是“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的一篇“实事求是的记载”，“这在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的思想混乱上是有很大的贡献的”。他检讨说，武训原来是“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在读了《调查记》后深感“瞠然自失”的心情下，他对自己曾“附和过”歌颂武训的错误，“重新再检讨一次”。

8月8日，文化部副部长周扬迫于舆论压力，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论文《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是他在批判《武训传》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为批判运动作了肯定性的结论。

8月间，毛泽东召见刘少奇、薄一波和刘澜涛谈话，解决他们和山西省委及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陶鲁笳之间持续了将近半年的争论问题。

原来早在1951年3月间，山西省委在晋东南老区试办了10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之后，于4月17日给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报告中说：**“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要后退。”“**必须在互助组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的趋势。**”“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了私有基础，但对私有基础是一个否定的因素。**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该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

**山西省委的这一正确意见，遭到了华北局和刘少奇的反对。**5月4日，华北局在给山西省委的批复中写道：“**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办法来逐步动摇、消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5月7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批评山西省委提出的要组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做法说，用合作社的办法使中国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6月3日，刘少奇在同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和山西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陶鲁笳等人的谈话中，又说：“**在农业生产上，不能发动农民搞生产合作社**，只能搞互助组。”“**现在农村阶级分化，正是将来搞社会主义的基础，将来我们依靠政权，下个命令就能剥夺它。**”“农业集体化要等机器，不要机器不妥当。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使农业能用机器耕种和土地国有为条件。”

山西省委在农村夏收以后，将1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丰产增收、吸引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事实材料，上报给华北局和中央。7月3日，刘少奇背着毛泽东，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在转发山西省委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消弱直至否定私有制，把农村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7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藕斋给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作报告时又说：“将来实行社会主义，不是先从农村，而是先从城市，即先工业国有化，然后才是农业集体化。”“农业集体化要经过一个大的运动来达到，而不是零散地慢慢地建立，十几年后，就发动一个运动，经过两三年搞起来。”“农业集体化不是逐步进行的，不是单纯依靠农村条件，而是依靠城市，依靠强大的工业。”“**将来富农要以阶级姿态出现的，甚至有些村支部、村政权会被富农操纵。没关系。这就是‘养肥猪’政策。养肥了将来更容易剥夺他。现在富农固然有剥削，但也有好处，能稳定中农，有利社会生产。**现在农村阶级分化，正是将来搞社会主义的基础。”“**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可轻易动摇、削弱和否定农民的个体所有制。**”

山西省委和华北局及刘少奇之间的这一场争论，一直是背着毛泽东的，在毛泽东发现问题之后，马上把刘少奇和薄一波、刘澜涛叫去谈话，明确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批评了刘少奇提出的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制和“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的错误观点。据薄一波后来回忆说：

“**毛主席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化，依靠统一经营形成的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

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马上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至此，围绕着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终于结束了。陶鲁笳等人在这场争论中始终能够坚持原则，不唯上、不让步，实在令人钦敬。

正是：直道为良谋，精钢不做钩。为民谋幸福，哪怕风雨稠。

浩然有正气，高压难低头。斯人留亮节，千古说风流。

后来，陶鲁笳从1953年7月起开始担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1958年5月当选为中共中央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60年10月任华北局书记，1965年9月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政治部主任，1973年7月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政委，同年8月当选为中共中央第十届中央委员。

再说在开城实质性谈判中，美方反对中朝方面提出的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提议，他们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阵地后方，企图不战而攫取1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对它的“海空军优势的补偿”。中朝方面代表立即反驳说：

“如果你们没有海空军优势的话，早就被赶到海里去了。”

美方代表恼羞成怒，他们叫嚣说：

“那就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8月18日，“联合国军”果然在东线发动了所谓的“夏季攻势”。

与此同时，“联合国军”为配合其夏季攻势，依仗其空中优势，对朝鲜北方的工厂、矿山、农田、水库以及运输补给线，实行了大规模的狂轰滥炸，这就是他们的所谓“绞杀战”。

8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并告高：

你对邓华同志8月18日电丙项作战方案的意见如何？邓华说“在军事上我应有所准备，纵目前不进行战役反击，也当尽可能作战术的反击，收复些地方，推前接触线，更好地了解敌人阵地及其坚固程度”。我认为这个意见值得认真考虑，**请你计划一下，9月份能否进行此种战术反击，如何进行法，须用多少兵力，胜利把握如何，敌人的反应将会如何，请就这几点考虑电告。**

毛泽东 8月21日

8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向拉萨进发。

另外，还有新疆军区入藏骑兵支队、西北军区独立支队在18军之前，云南入藏部队在18军之后，分别向西藏进发。

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克服无数困难，翻越10余座雪山峻岭，穿过茂密的原始森林和一望无际的草原、沼泽地带，克服了高寒缺氧、断粮疾病的袭扰，先遣部队于9月9日到达拉萨。

8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彭德怀并告高岗的指示电，他写道：

彭并告高：

我军已决定9月不作大规模反攻战斗，敌人又有企图在镇南浦登陆的消息，因此，**38军、39军及40军均应位于原驻地，加强训练，并准备对付镇南浦方面的可能登陆。**

军委 8月26日

8月27日，毛泽东关于敌人在中立区进行破坏问题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菲利波夫同志：

**因为敌人在军事分界线问题上没能走出在谈判过程中陷入的僵局，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挑衅活动。**8月19日，敌人换上伪装，袭击了我在开城中立地区的军事警察部队，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在双方代表调查之后，敌人宣称他们无罪，这是我南朝鲜游击队所为，因此，他们对此不承担责任。

在这之后的8月22日夜，敌机对开城中立地区投掷了9枚炸弹，向我代表团居住的房屋射击。虽然那天晚上来了一些美军联络军官进行调查，但是敌人厚颜无耻拒绝承认自己的行为，而坚持认为在那里找到的碎片和形成的弹坑不是空投炸弹所致。之后敌人一反常态，**宣称袭击是来路不明的飞机所造成的**。

**敌人胆敢进行厚颜无耻的挑衅，是因为他们认为，我方不敢因此而使谈判破裂，所以他们想利用这一措施对我施加压力**。……**我们宣布暂时停止谈判，直至对方对发生的行为承担责任。在我们得到满意的答复以前，不恢复谈判。**同时**我们还要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但是我们不想主动宣布谈判破裂**。我们认为敌人不敢公开承认他们的挑衅行为。拖延谈判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拖延导致谈判破裂**。我们在加紧准备反击敌人在正面战场上可能的进攻。同时严密防守北朝鲜东、西海岸的港口，以免敌陆战队登陆。在近几天敌机侵入沿海城市青岛、上海、福州，这是有挑衅目的的。与此同时，敌人想侦察我沿岸地区的防空情况。针对这一问题，我们想加强我们在朝鲜的指挥和沿海地区的防空。在下一次电报中通知您为在朝志愿军工作的军事顾问的派遣方案，同时请您提供需补充的炮兵装备。

第二种情况，**谈判拖延的结果，敌人可能找到走出僵局的办法，在军事分界线问题上达成协议。**现在我们想利用谈判的间隙，进行冷战，以揭露敌人厚颜无耻的挑衅行为。但是我认为敌人不会公开承认自己的挑衅行为。……

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您是否认为有必要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请您根据以上情况给予指示。

毛泽东 1951年8月27日

8月29日，斯大林关于同意中方谈判立场致电毛泽东，全文如下：

北京

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

您8月27日的电报收到了。**我们同意您对目前开城谈判情况的评价和你们的立场**，对美国人为压制中朝方面的挑衅事件需要得到一个满意答复。像以前一样，我们的根据是**美国人更愿意继续拖延谈判**。**您建议邀请中立国代表作为在目前谈判阶段的监督员和观察员参加谈判，我们认为这没有益处。此建议的不利方面是，美国人将认为中朝方面比美国人更需要尽快签订停战协议。**对此问题如果您坚持这个观点，那么应向金日成通报此情况。

菲利波夫 1951年8月29日”

8月3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他在电文中写道：

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1年8月29日的电报收到了。**我同意关于我们在邀请中立国代表作为现阶段谈判的监督员和观察员问题上表现出主动性是不适宜的**。此情况我已通知金日成同志。

毛泽东 1951年8月30日

1951年9月3日晚，毛泽东约梁漱溟到菊香书屋谈话。

原来在1951年春，中央组织赴西南土改考察团。梁漱溟至此悟出，毛泽东去年要他到南方看看的用意，便主动向中央统战部报名参加。梁漱溟所在的分团有20余人，由章乃器任团长，自5月初出发，到四川考察土改情况，于8月30日返回到北京。

梁漱溟来到菊香书屋时，章乃器刚刚告退。毛泽东亲切地握着梁漱溟的手说：

“土改团的情况，章乃器先生刚才来讲过了，我们不用多谈，先开饭吧。”

他知道梁漱溟吃素，就一个人陪他吃饭。饭后，毛泽东问道：

“对土改，对四川，你的印象如何？随便聊聊吧。”

梁漱溟说：

“对土改，我看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与要求，土改是深得民心之举，也很必要，很及时。但是，毛病也不是没有，有些政策执行得不好。比如**政策规定不许可打地主，但我亲眼看到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为受到体罚，一块儿跳河自杀。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后果不好。”

毛泽东说：

“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的，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分田分财，给他出路。大多数地主不会自杀，也不至于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于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执行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执行好土改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

“但愿如此。”梁漱溟把话题一转，又说：“解放不过两年，四川就出现了安定的情势。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那么快，是我没有料想到的。”

此后不久，梁漱溟在10月间写出了《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和《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等文章，他写道：

“**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

梁漱溟的自我检讨与反省，说明他在事实面前，终于承认在延安与毛泽东的争论，毛泽东是正确的，他自己是错误的。

9月4日，在朝鲜西线战场上，志愿军部署了42军、47军、64军3个军。47军在中间，防守斯琴里到退溪院里一线。47的左翼是42军，42军126师正好与防守斯琴里的47军139师衔接。47军的右翼是64军，64军190师正好与防守退溪院里的47军141师衔接。

这一天，第47军防守中部骄阳一线的140师，正准备与正面的美军骑兵1师鏖战。

9月5日清晨，美军的进攻打响了，骑兵1师向志愿军第47军140师发起了进攻，这骄阳一线正是3个军防线的中心。

美军和以前一样，用火炮、坦克和飞机猛轰140师的阵地，随后又用坦克和装甲车开路，骑兵跟进攻击。战斗打得异常惨烈，骑兵一师发起的3次大规模进攻，均被打退，140师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伤亡上千人。

曹里怀面对美军的猛烈进攻，判断其主攻方向就是骄阳。当晚战斗结束后，他命令139师和141师分别放弃斯琴里和退溪院里，向骄阳一线靠拢。

然而李奇微此次的作战意图，却是以骑兵1师的进攻牵制志愿军第47军，在佯攻的同时，集中美、英、加、土等几个国家的联军，在9月5日这一天乘坐第3舰队的船只，绕道金浦登陆，登陆后立即向川谷里进发，到6日清晨，突然出现在志愿军第47军的后方，离47军已经不远了。

此时，曹里怀正在为防御骑兵1师的进攻做准备，后方突然出现了混乱，敌军已经对47军形成了合围之势。曹里怀顿时吓坏了，不但47军陷入危机，两侧的42军和64军也同样陷入危机，只要有一个点被敌人突破，整个防线就有崩溃的危险，这对3个军5万多人而言，简直是灭顶之灾。他赶紧向彭德怀发报求助：

“47军即将陷入重围。”

彭德怀收到电报，也不知所措，一边捶桌子：“这个曹里怀。”一边喊：“快发报，向毛主席求助。”

毛泽东此时正在开会，他立即宣布散会，一个人陷入了沉思。前线的彭德怀和曹里怀是如坐针毡，苦苦地等了一个小时，终于收到了毛泽东的回电。毛泽东在电报中说：

**“敌军虽要合围我军，但我军有生力量并未受损，即令47军运动起来，破除心理上的故步自封。敌军主力出现在后方，正面战场上部队数量应该不多，应立即放弃正面作战，联合两翼的42军和64军将计就计，从3面反围剿敌军登陆部队。”**

彭德怀看完电报，如拨云见日，心中豁然开朗。他当即命令曹里怀，留下140师断后，其他两个师立刻向北进军。同时，他又电令42军军长吴瑞林、64军军长曾思玉，立即向中部移动，配合47军一起，围歼美英等军登陆部队。

9月6日晚，当美英等联军还在计划着合围志愿军时，志愿军却抢先打响了反围剿作战，李奇微的计划再一次破产了。

再说9月初，江青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会议上点了副部长周扬和胡乔木的名，批评他们“抗拒”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9月6日这一天，江青在“电影指导委员会”第10次会议上，对拍摄电影《南征北战》发表了意见，她表示支持。

此后，中直机关从各部委抽调一批干部参加土改工作，方法是自己报名，组织批准，组成一个新解放区土改工作团，到新解放区去贯彻党的土改政策。

一天傍晚，毛泽东和江青一起出去散步，江青问道：

“听说机关要抽调人参加土改？”

毛泽东边走边说

“你想去吗？”

“我也想下去锻炼锻炼。”

“你身体能行吗？到农村是很艰苦的，要与农民三同，而且斗争也很复杂。你要慎重考虑。”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还是去吧。我会注意的。”

9月7日，原华北军区第23兵团司令员董其武、政委高克林率第36军、第37军主力入朝参战。

第36军军长王建业（代）、政治委员康健民辖第106师、第107师，第37军军长张世珍、政治委员帅荣辖第109师、第110师，由辽宁安东、长甸河口入朝。

第36军、37军主力参加抗美援朝，原任务是负责机场的抢修、维护和警戒，可由于美军空袭频繁，志愿军司令部便改变原计划，上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将这4个师整编为新69军，以董其武为军长，负责板门店以西阵地的防御。

9月8日，毛泽东关于请苏联派遣军事顾问问题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致菲利波夫同志：

我在今年8月27日给您的电报中曾通知您，我们想**请苏联政府派遣军事顾问到驻朝鲜的中国志愿军部队工作。在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并同军事总顾问克拉索夫斯基同志协商后，我们认为必须派出83名顾问**：

1、志愿军司令部顾问共10人，其中包括：总顾问1人、参谋长顾问1人、作战顾问1人、侦察顾问1人、通信顾问1人、后勤顾问1人、军事交通顾问1人，炮兵顾问1人，坦克和自行火炮顾问1人、工程兵顾问1人。

2、5个兵团顾问共10人：每个兵团2名顾问，即兵团司令兼兵团参谋长顾问1人、作战顾问1人。

3、21个军的顾问共63人：每个军3名顾问，即军长兼军参谋长顾问1人、炮兵顾问1人、坦克和自行火炮顾问1人。

上述顾问最好于1951年9—10月取道北京前往朝鲜。

请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并将您的决定通知我们。

此致敬礼!

毛泽东 1951年9月8日

9月10日，斯大林关于派遣军事顾问问题致电毛泽东，全文如下：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9月8日的电报收到了。**我们同意派遣一名首席军事顾问和军事专家小组作为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的军事顾问。**关于向军或兵团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我们认为，在首席军事顾问进入实地熟悉情况，并根据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后，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派遣陆军大将扎哈罗夫作为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的首席军事顾问。**如果您同意我们的决定，那么陆军大将扎哈罗夫近日前往北京，尔后到达在朝志愿军司令部所在地区。

菲利波夫 1951年9月10日”

9月中旬的一天，江青对卫士李家骥说：

“主席已同意我下去搞土改，你愿不愿意随我去？”

李家骥说：

“我听组织安排。”

江青说：

“我已决定去参加土改，如果你愿意随我去，要有个思想准备。”

第二天，汪东兴对李家骥说：

“主席安排江青同志下去搞土改，我们准备抽3名同志跟去，有你，有李黑丑（即李德华——作者注），贾士兴，你有什么意见吗？”

李家骥回答说：

“我服从组织安排，走前还要做什么准备吗？”

汪东兴说：

“这次到农村搞土改，是与地主阶级大较量，斗争一定很激烈，你们去的工作主要是做好保卫、生活、后勤工作，同时也是去锻炼锻炼。”

9月12日，斯大林关于派遣军事顾问问题致电毛泽东，全文如下：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在9月8日关于指挥人员军事顾问的电报已收到了。我们同意为在朝鲜的志愿军总部派遣军事顾问，对此我们认为，有5名军事顾问就足够了。**关于向军和兵团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我们认为，按照朝鲜的实际看是不适宜的，我们不同意向军和兵团派遣军事顾问。**在您同意的情况下，我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派遣指定的军事顾问前往北京，尔后到达指定位置。在得到您答复后，我们将通知军事顾问的名字。

菲利波夫 1951年9月12日”

欲知斯大林向志愿军军级和兵团级派遣顾问如何决定？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7月17日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电中说：在美国“继续拒绝讨论的情况下，我们仍会继续让步。因此，**你们必须在撤退外国军队问题上，不要顾虑对方拒绝讨论，要继续驳斥对方拒绝讨论之非，而且不要去争论这是军事问题或是政治问题，而应着重说明这是保证停战的必要条件，以免掉入敌人故设的逻辑陷阱**。”当他7月19日从李克农的报告中得知**南日“就撤军一事，向对方连续发起进攻，使对方”“局促无词，窘态毕露”、“以抽烟遮掩，并频频搔首，作无可奈何状”**之后，便在 7月20日致斯大林电中说：“**在三八线停止军事行动”“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我们的武装力量只能把敌人赶出北朝鲜，但还不足以把敌人赶出南朝鲜。”“我本人对解决这一复杂问题的新的想法，即最好是不要提出把外国军队撤退问题作为停止军事行动的必要条件。”**这就是他一贯强调要坚持的“有理，有利，有节”原则的一个典型事例：在敌方“继续拒绝讨论”、我方“继续让步”的情况下，一定要“**继续驳斥对方拒绝讨论之非”，**争得个“**有理”**，在对方理屈词穷的时候，我方就不能不考虑如何**有利**而且**有节地**解决问题，即不把“**外国军队撤退问题作为停止军事行动的必要条件”**。这就叫见好就收！因为他明白，不这样做，**“我们仍会付出很大代价”，**“**这样做要比通过长期军事行动的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为好，而在军事行动中很难得到所需要的结果。”**多么清醒的军事统帅啊！堪为后世之表！

**第30章**

“**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

**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

**其无穷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

话说1951年9月13日，毛泽东关于入藏部队可以生产与筑路并重致电邓小平：

小平同志：

　　我先遣支队已到拉萨，张国华所率部队不久亦可到太昭、拉萨一线。关于这些部队1951年的任务是以修筑公路为主，还是以生产粮食解决给养为主的问题，张国华在京时曾对我说应该是筑路而不是生产。张并认为明年一年即可修通甘孜至拉萨公路。但据后来所得情报，明年修通是不可能的，也许需要两年至3年才能修通。似此，**如果我军不从事生产，则给养将成严重问题，靠藏政府供给，或靠购买，则对藏民影响不好**。因此请你考虑是否可以定为**生产与筑路并重，即令甘孜到拉萨沿途所驻部队以一部分担任生产，以一部分担任筑路，在生产季节以较多的人从事生产，在其他季节则以全力筑路**。此点在现在就应确定，以便在冬季有所准备。此外，关于兵力分布问题，似应在几个月内在日喀则和日喀则到拉萨的中间地点各派一部分军队进驻，并在这些地方布置生产，使班禅能回后藏，并便于展开工作。原先决定明年不进驻上述各点的计划似应改变，惟进驻时间可在张国华到拉萨和西藏政府的关系完全弄好之后，即在三四个月之后为适宜。以上望复。

毛泽东 9月13日

9月15日，这一天是中秋节，文涧泉、文运昌旅京一晃4个月过去了，毛泽东在菊香书屋第3次会见文家二位表兄，和江青一起与客人共进晚餐。吃过晚饭，江青和工作人员一道收了餐具清洗去了。文运昌对毛泽东说：

“我们住也住了，该去看的地方也去看了，连机场的飞机都看了，想跟你合一张照拿回去给老乡看看，证明我们到了你这里，行么?”

毛泽东笑道：

“不照相就表示你没在毛泽东家里住过么?”

他随即叫来江青，说：

“表兄说住也住了，看也看了，还要有个照片为证哩。我一个人恐怕还证明不了，还得你这个居家的堂客在场才行哩!”

江青听说要照相，忙回到里间穿上她那一身自己很喜欢的外套，跟毛泽东和客人一起来到颐年堂外的地坪上，站在毛泽东右边，文涧泉、文运昌依次站在毛泽东左边。4个人面对摄影师的镜头，显得非常亲切、融洽。摄影师按动快门，留下了毛泽东与外家亲人分别数十年之后的第一次合影。

文涧泉又对毛泽东说：

“我汽车、火车、轮船都坐过，只有飞机没有坐了，我想坐飞机回去。”

毛泽东劝道：

“坐飞机太贵了，坐火车好。”

文涧泉不同意，他说：

“你一个国家主席，我不相信买不起飞机票。”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十一哥，不是我买不起飞机票，而是国家正在搞建设，缺钱花，大家都要节约，国家主席更应该带头啊！”

毛泽东从自己的稿费里开支，付给文涧泉、文运昌各300元钱作路费，二人这才高高兴兴地回宾馆去了。

第二天，文涧泉、文运昌准备启程南下，毛泽东派工作人员分别送两个表兄合影一张，皮箱一口，羊皮袍一件。另外，还有两大箱礼物。那两个木箱足有一个成年人那么高。

此前，毛泽东曾对文涧泉说：

“十一哥，外婆家有三大房，这几十年来多了很多人，我都弄不清了。你帮我造个花名册，要详细一点，好让我心里有个谱。”

文涧泉虽然读书不多，记性却很好，他花了几天时间，按文家的亲疏、辈分排列，造了一份上百人的花名册。毛泽东接过花名册，翻了翻，连声说：

“好，好，很详细。”

于是，毛泽东让江青吩咐工作人员按名册给外家诸亲人买了两大箱礼物。这些礼品有：所有健在的表兄、表嫂各2丈2尺咔叽布料，纱袜2双，毛巾2条；所有表侄儿、表侄女、表侄媳各蓝咔叽布料6尺，纱袜1双，毛巾1条；所有侄孙辈在学儿童每人赠笔记本、画册、铅笔等文具一套，学前儿童每人赠袜子1双、各色糖果2斤、玩具2件。玩具中有木枪、皮球、洋娃娃、老虎、小白兔等等。

文涧泉见毛泽东为众多乡亲添置衣料，要求给他缝制一件长袍。毛泽东摇摇头说：

**“平均每人只有1丈多布票，哪有那么多布来缝长袍。”**

说罢，他让工作人员把自己的一件旧长袍拿出来，送给文涧泉。

如今客人要走了，毛泽东派中央办公厅两名工作人员护送他们回湘，并嘱咐工作人员，回来时护送十七表哥文梅清上京。

文涧泉、文运昌回到家里，按册分发礼品，文家人无不万分高兴，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赶来，顿时成了一个欢乐的海洋。

这里众人正热闹着，毛泽东的十七表哥文梅清却兴冲冲地离开唐家圫，来到了韶山招待所。此时，来到韶山招待所的还有毛泽东的堂兄兼塾师毛宇居，毛泽东少年时的好朋友张有成张木匠，他们将和文梅清一起进京看望毛泽东。

9月17日，中直机关在政协礼堂召开动员大会，凡是参加土改的人员都要到会。正在值班的李家骥找人替班，和李德华、贾士兴一起跟着江青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后，李家骥回到毛泽东住处接了班，毛泽东问他：

“到哪里去了？”

李家骥回答说：

“和江青同志到政协礼堂听土改动员报告去了。”

“能听明白吗？”

“能明白。”

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和蔼地说：

“这次下去搞土改要注意3点，一是要认真领会和执行党的政策，在新区搞土改与过去在老区搞土改有区别，政策也有变化。一定要吃透这个精神。要结合工作实际执行政策，不能上下一般粗，也不能各地都一样。这样才能避免犯大错误。二是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不能包办代替。要对农民搞好宣传工作，讲清土改的意义，尤其要讲明土改与群众利益的关系，让群众起来为自己的利益闹翻身搞土改。三是要认清新区的复杂性。新区与老区不同，那里刚解放，国民党溃败后有些反动派、特务暗藏起来，他们和我们搞暗的，阶级斗争非常复杂，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才能驾驭这个复杂的局面。”

李家骥没想到老人家讲得这么具体，比动员报告讲得还细，就马上说：

“我一定认真理解主席的指示。”

毛泽东说：

“我这是就总体而言，你本人这次下去有两项任务，一是搞好保卫工作；二是搞好土改工作。回来向我汇报。”

李家骥高兴地说：

“保证完成任务。”

9月20日，毛泽东关于苏联提供军事顾问和武器装备问题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致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1年9月12日发来的电报已收到。**感谢您满足我们提出的给我们提供6亿卢布军事补充贷款和向驻朝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派遣军事顾问的要求。**

关于给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除您同意给志愿军司令部派遣5名军事顾问外，我请求你们研究是否可以在必要时再派5名军事顾问到5个兵团司令部工作。如果您同意这一点，那我希望这10名军事顾问能在今年9月底或10月上旬到达北京，尔后他们即将被派往前线。

我们知道，为了生产和运输今年9月8日电报申请单所提出的军用物资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这批物资不可能与原先订好的用来装备10个师中6个师的武器装备和物资同时运到。根据原先规定的给10个师提供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的期限，我们制定了按照新的编制组建的10个师的战斗训练计划。这一计划从8月份开始付诸实施。如果给这10个师提供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的计划不变，那我们的战斗训练计划就可无须改变而如期进行。这样，**在1952年3月就可完全结束按照新的编制组建起来的10个师的训练。如果战争继续进行，这些师到时候就可投入战斗。因此**，**我们认为改变给这 10个师提供武器装备和战斗物资的计划是不适当的**。而且，为了满足今年最后两个月内前线的需要和加强朝鲜境内交通线的对空防御，我们要求苏联政府于1951年年底给我们提供价值大约相当于1951年9月8日申请单提出的军用物资总值1/5的弹药和军用物资。我们主要需要高射炮炮弹及其他弹药。详细的申请单附于本电报之后。价值相当于1951年9月8日申请单所提出的总值4/5的军用物资和满足军事需要的汽车，请苏联政府于1952年上半年提供给我们。如果您同意，那我们就补充提出详细的申请单。

请您研究我的电报，并将您的决定告诉我们。

申请单……

此致敬礼!

毛泽东 1951年9月20日

9月20日这一天，江青告诉李家骥说：

“再有两三天就要下去了，地点是湖北。这次参加土改比到山东搞调查时间长，条件差，困难多，甚至危险也大，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还要准备好带的衣物。”

9月23日，毛泽东家乡的客人文梅清、毛宇居、张有成和中央办公厅两名工作人员一起到了北京。

9月23日傍晚，中直机关土改工作团就要出发了，毛泽东对整装待发的李家骥说：

“你们人少任务重，要准备吃苦。江青身体不好，对农村情况不熟悉，你们多帮助她。”

汪东兴也交代李家骥说：

“这次下去，江青同志仍化名李进，这样便于工作。你要保证江青同志的安全。安全工作除了自己努力，还要依靠当地党组织和群众。据说你们去的地方过去还是国民党的模范乡，地富反革命很猖狂，更应提高警惕，更应依靠地方。”

随后，江青乘火车离开北京。她召集李家骥、李德华、贾士兴3人开了一个小会，问大家是否有充分准备，并强调了在车上的注意事项。

送走江青等人，毛泽东派人去接文梅清、毛宇居、张有成3位客人。文梅清一行从新华门进入中南海，来到颐年堂。工作人员立刻迎上去，请他们到会客室休息。

不一会儿，毛泽东从颐年堂里屋走出来。只见他神采奕奕，满面笑容，缓步朝客人们走来。文梅清等见了，连忙起身喊道：

“主席，你好！”

毛泽东见到久别的乡亲，兴奋不已，用浓重的韶山口音连声喊道：

“哎呀！来访客，来客啦！”

他见客人们既兴奋又有些拘谨，便一边同他们一一握手，一边爽朗地说：

“快请坐，快请坐！十七哥身体好吗？宇居大哥还蛮健哩！有成兄气色也不错嘛！”

他特意叫厨师做了几道家乡菜，有腊肉、火焙鱼、豆豉炒辣椒、肉片汤等共有9大碗，与文梅清3人共进晚餐，又将孩子们和工作人员都叫来陪客，并指着客人向他们一一介绍：

“这是我的十七表哥，这是我的宇居大哥，这是我少年时的好朋友。他们都是我的客人，是从湖南老家来的，你们都叫他们伯父。”

李敏、李讷、毛远新等一一礼貌地称呼了长辈，向客人鞠躬。然后，大家一起入席就餐。

饭后，文梅清拿出从家乡带来的酸枣饼、辣椒酱，给毛泽东品尝。毛泽东尝了一块酸枣饼，连说：

“好吃，好吃。”

接着，他又拿起那瓶辣椒酱瞧了瞧，对工作人员说：

“很好，很好，我从小就喜欢吃这个。”

毛宇居拿出家中自制的槟榔，请毛泽东品尝。毛泽东见到槟榔很高兴，拿起一瓣就往嘴里放。一旁的保健医生担心他的牙齿吃不消，连忙劝说：

“不要用。”

毛泽东笑着说：

“这是我们家乡的习惯，我们湘潭人爱嚼槟榔。我的牙齿用了几十年了，从未检查过，嚼一嚼没关系，没关系。”

这天晚上，毛泽东派人把文梅清3人送到惠中饭店休息。

此后，毛泽东尽管十分繁忙，还不时地挤出时间把文梅清3人接到家里叙谈。在谈到1927年国民党没收他家的家业，1930年何键派人挖掘他家的祖坟及杀害他的亲人时，毛泽东非常泰然地说：

“咯样又奈我何！”

毛泽东问起毛碧珠的情况，毛宇居叹了口气，说：

“莫问到他还好点呵，如今划了个富农成份，蛮造孽呢！”

毛碧珠，又名毛笔珠，谱名毛泽田，是毛宇居的小弟，生于1895年，小毛泽东两岁，自幼与毛泽东一起玩耍。1925年春，毛泽东回韶山搞农运，毛碧珠参加了农会。后来毛泽东去广州，就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毛碧珠随后也来到广州，在毛泽东身边从事书报管理工作，不久又返回乡里务农。由于他为人精明，经营有方，很快就买了几亩田，生活比较富裕。解放初，毛碧珠家境已经开始衰败，但他还是被划为富农，有8亩田分给了穷人，日子过得比较艰难。

毛泽东了解了毛碧珠的情况，半天没吱声。他知道，根据毛碧珠的现状，划为富农比较勉强。但他不能干预地方工作，只能对毛碧珠的困难表示同情。

后来在毛宇居第2次来京时，毛泽东还惦记着毛碧珠，在毛宇居回韶山时让他捎给毛碧珠4丈布料，说是给大人小孩做几件衣服。

再说9月下旬，参加朝鲜战场观光团的前60军军长张祖谅回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此前，张祖谅在朝鲜观光期间，见第60军180师在战斗中损失惨重，便强烈要求重返60军领导岗位上去，打好翻身仗。中央军委很快就批准了他重回60军的要求。

为此，毛泽东专门召见了他，向他说明了180师在朝鲜战场上失利的主观原因。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180师的失利，除了一些客观的原因外，从主观上看，山西战场，你们60军打得好，解放大西北，解放大西南，也太顺利了。打胜仗一帆风顺是好事，但同时也孕育着失败的可能。不谨慎，不把敌人当回事，哪有不失败的！”

他见张祖谅掉了一颗牙齿，又风趣地说：

“怎么办呢？我看180师北大荒不用去了。番号不用改了。你晚去几天，到协和医院把牙补上，到朝鲜后，拉大嗓门，说话声音大一些。动员部队打个翻身仗！”

9月26日，斯大林关于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装备问题致电毛泽东，全文如下：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对您9月20日关于军事顾问和提供补充装备的问题通知如下：

关于派遣军事顾问。关于5名军事顾问在朝志愿军总部工作问题，我们已下令作战部挑选和派遣相应的人选，于10月上旬到达北京。

**关于军事顾问在兵团司令部工作问题，我们坚持我们以前的观点——军事顾问不能派遣到兵团。我们的根据是，特别是在作战条件下，在兵团任命军事顾问不利于兵团的指挥，因为军事专家在兵团要对其战斗行动负责，这样会不可避免走上代替兵团指挥员的错误道路，这是不能允许的。**

关于补充贷款（6亿卢布）和1951年底前提供弹药和军用物资问题。**根据生产和运输条件，如我们所通知您的那样，实际上不可能保证在今年年底前提供您在9月8日提出的申请单总价值的1/5，同时又提供6个步兵师的装备和物资**。我们可以接受您们的补充订货，在1951年提供相当于总价值的1/5的军用物资。但是6个师的装备和物资将推迟半年提供，像我们通知您的那样。

根据上述贷款，我们在收到您1952年的申请贷款后，将进行研究，然后通知您满足的这一要求可能和时限。

菲利波夫 1951年9月26日”

9月26日上午，在暑假期间应毛泽东之邀来到北京的张干、李漱清、罗汉溟、邹普勋，一起游览故宫，陪同他们的是一名办公厅干部。11时许，毛泽东派车来接他们到家里吃饭。张干高兴地捋着花白胡子说：

“啊！终于要见到润之了！”

一辆浅绿色的小轿车进入新华门来到丰泽园，停在菊香书屋门口。毛泽东笑盈盈地迎上前去，与自己的师友一一握手问好，把他们请进客厅落座。张干望着毛泽东说：

“润之，你身体还这么好！”

毛泽东说：

“这是在一师洗冷水澡锻炼出来的。”

张干趁机道歉说：

“一师闹学潮那阵，我曾主张开除你，真对不起啊！”

毛泽东凝望着30多年未见的老校长，缓缓地摆摆手，说：

“我那时年轻，看问题片面。当时我虎气太盛，要是像现在这样学点猴气，就不会发动‘驱张运动’了。过去的事，不要提它了。”

张干见毛泽东这么说，感动得流下了泪水，他说：

“总之，还是我不对，身为老师，我深感愧疚。”

毛泽东诚挚地说：

“老校长，您言之过重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这颗‘寸草心’，是怎么也难报答自己老师的‘三春晖’啊！”

说罢，他叫来自己的子女，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老校长和师长，诙谐地说：

“他们是你们的太老师，你们平时常给我说，你们的老师怎么好，怎么好，这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也很好。”

孩子们去罢，张干问起了萧子暲。毛泽东说：

“他么，后来去了苏联，成了国际著名诗人，笔名萧三，现在也住北京。”

“我真想看看他。”张干说：“他是湘乡人吧？”

“老校长，您记性真好。我把请您到北京的消息告诉他，他一定会请您到他家里作客的。”

“谢谢，谢谢！当时你们两个，都是我们一师的才子啊！”

李漱清也说：

“是啊，润之跟我读私塾时，就已经写得一手好文章。”

毛泽东说：

“次仑先生，您和罗元鲲先生都没有加入蒋帮，这很好。我从未听人说过你们的坏话。”

张干说：

“明哲保身而已。”

“在旧社会，这就很不容易啊。”毛泽东说罢，接着问：“先生现在还教书么？”

张干说：

“在妙高峰中学教几点钟数学。”

“您老年事已高，就不要再教书了。学校应该给予优待，薪水照发。”

张干见毛泽东如此关切，便连声说：

“谢谢，谢谢你的关照。”

12时15分，服务员端上了饭菜，头一道菜是海参，接着是鸡、鱼、肉。毛泽东请张干、李漱清坐上席。张干让着李漱清说：

“李老，您是润之童年私塾时代的启蒙老师，请坐首席。”

“你是润之的校长啊！一校之长，当然要坐首席。”

80高龄的李漱清也谦让着。毛泽东笑道：

“好，就依李老的话，还是让我们的老校长坐首席吧。”

张干只得坐了首席，毛泽东不断给4位师友夹菜，又端起酒杯一一敬酒。他对张干说：

“次仑先生，我祝您老桃李满天下，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了很多好事。”

张干赶紧站起身，举起酒杯激动地说：

“祝愿我的学生、我们的国家主席万寿无疆！”

饭后，毛泽东陪张干、李漱清4人参观了中南海，晚上又陪他们看了一场电影。送走客人，毛泽东派人给4位老人送去了日用物品，每人一份，有被子、褥子、布毡一床，毛呢服一套，枕头一对，枕巾一方，面巾一条，袜子一双，香皂、牙膏、牙刷各一。工作人员还特意告知客人：

“这是主席用他的稿费买来赠送给您的。”

张干说：

“润之还是青年时期那个脾气，一丝不苟，一尘不染。”

9月27日下午3时，毛泽东专门委派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等人，去为张干、李漱清、王季范诸位师友检查了身体。

9月29日，在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不甘心“夏季攻势”的失败，又发动了所谓的“秋季攻势”。

此前，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兼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指挥空4师，在9月25日、26日、27日大战美国空军，3天击落美机26架，击伤8架，首创击落美国最先进的F-86飞机的战绩。毛泽东看到战报后，挥毫写上了一个批语：

“空4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

9月29日下午，毛泽东在章士钊的来信中作了一个批示。

原来，章士钊在9月28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信，他在信中说，张之洞、段祺瑞**遗属**生活窘困，住宅被法院判归政府没收，生活难以为继，希望政府给予特别照顾等。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请彭真同志查明情形，酌量处理。”

他还在章士钊的信中写了一些旁批：章士钊在信中说：“曩者传谈偶及前清遗老及北洋军阀皆不是人民敌人，政府可能予以照顾。”毛泽东批道：“**因时间已久，人民已淡忘了，非谓过去也不是人民的敌人。”**章士钊信中说：“按其征讨复辟、对德宣战以及晚年抗日南下诸节，皆不失为革命荦荦大端。”毛泽东在**“晚年抗日南下”处批道：“只此节可取。”**章士钊信中说段祺瑞所遗吉兆胡同住宅“所谓经敌人购买一节”，“乞公批交有司彻查，加以了解，能不没收最妙，万一不能亦希别筹照顾方式。”毛泽东批道：**“此事可商。**”

9月30日晚，毛泽东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晚宴上，对坐在他右边的著名的胸外科专家、医学教育家黄家驷教授说：

“中国是一个有4亿多人口的国家，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而我国医生的数量在世界上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有一支中医的队伍，中医加西医，我们的力量就大得多了**。”

1951年10月1日，首都军民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周年盛大庆典。

毛泽东让王季范到惠中饭店送来观礼证，用车接文梅清等人参加国庆观礼。文梅清、毛宇居、张有成、张干、李漱清、邹普勋、罗汉溟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登上观礼台，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这么高的礼遇。

上午10时，天安门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部队和群众游行。

此次阅兵新的特点是：**一批身经百战和功勋卓著的解放军高级指挥员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学员的身份参加了阅兵式**，并走在受阅部队的最前面；一些新兵种纷纷亮相，其中有火箭炮部队，防空兵部队等；**民兵大队第一次出现在阅兵式上**，他们是华北老解放区民兵的代表，都是战斗英雄和工作模范。

阅兵式结束后，由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及各工商团体组成的队伍，如潮水般拥来，场面十分壮观。

毛泽东、朱德站在城楼上向人民群众频频招手致意，从上午一直坚持到下午4时，始终神采奕奕，毫无倦意。

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把他的湖南同乡粟裕叫到身边。粟裕是在9月间才从苏联病愈回国的。毛泽东问粟裕：

“恩来和总司令和你谈过了吗？”

粟裕知道毛泽东所说的是周恩来和朱德昨天谈到毛泽东点了他的将，要他到总参做副总参谋长的事，就说：

“谈过了。谢谢主席对我的信任，但我担心干不好！”

毛泽东说：

“我相信你，同时也相信我的选择不会错，你肯定干得了，干得好。当然总部工作不同于战区，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很快就会适应的，掌握了工作规律，一通百通，路路畅通。”

粟裕说：

“请主席多指示，我一定努力学习，努力工作。”

毛泽东端详着粟裕的面相，突然好奇地问：

“你是少数民族吧？是不是苗族？”

粟裕回答说：

“我们家乡湘西会同县少数民族很多，苗族、瑶族、侗族、土家族都有，我们家是汉族。”

毛泽东的眼光没有错，直到粟裕逝世后，经历史学家、民俗学家们严密考证，确认粟裕一家是由湖南省通道县迁到他的家乡湘西会同县的侗族人。这些专家还不无遗憾地说：“早知粟裕是侗族人，1955年授衔，根据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肯定会出现一位侗族元帅。”

后来在11月12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粟裕在总参谋长徐向前及第一副总参谋长聂荣臻（此时徐向前病休，聂荣臻代总参谋长）之后，为第二副总参谋长，兼华东军区副司令员。1954年10月31日，中央军委任命粟裕为总参谋长。

且说国庆节过后，毛泽东派专车送张干、李漱清等人游览了明十三陵等京津名胜，还让他们乘飞机鸟瞰了长城风光。王季范又将张干接到家里，商谈湖南第一师范建校问题，并赞成张干提出的在长沙城南辟一公园，兴建毛泽东纪念馆。

10月4日，毛泽东关于军事顾问和武器装备问题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致菲利波夫同志：

您今年9月26日发来的关于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军用物资问题的电报已收到。我们同意您的意见。

1、请派5名军事顾问于10月上旬到驻朝志愿军总部工作，给兵团的军事顾问可以不派。

2、请苏联政府于1951年底即10—12月按照我在9月20日发给您的电报所提出的申请单（该申请单所列物资价值约相当于9月8日申请单所提物资总值的1/5）给我们发出120门85毫米高射炮、7种火炮弹药、6种火炮轮胎和10万发反坦克手榴弹，这些都是目前我们所迫切需要的。我们同意从10月开始暂停发出供余下的6个师所需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待到1952年4—6月全部发出这些物资。

3、请苏联政府于1952年1—3月给我们全部发出价值相当于1951年9月8日申请提供的物资总值4/5的其他各项军用物资。我们将用电报发出详细的申请单。请于1952年7月开始发出其余50个师所需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根据您原来的通知，全部60个师所需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应于1954年上半年发货完毕。**现在，**由于发货期限推迟半年，全部60个师所需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发货的结束时间也推迟半年，即于1954年底发货完毕是否恰当。**请将您的意见告诉我们，以便我们对此做好准备。

4、今年6月高岗同志在莫斯科就60个师所需武器和军用物资的交货问题进行谈判时，曾达成一致意见，**确定上述武器和军用物资的总价值将由中国政府用军事货款于8年内分期偿付。**不久前，我国商业部接到了驻中国的苏联商务代表处的通知，说相应的中国机构代表同它签订了提供3510辆汽车和1900辆自行车的贸易合同（这些汽车和自行车包括在第1批5个师的军用物资内）。请苏联政府考虑，**是否可以将汽车和自行车的价款列入60个师所需军用物资项内用军事货款偿还，如果这样做对你们有困难，则请将此通知我们，以便我国代表就上述数量的汽车和自行车同驻中国的苏联商务代表处签订贸易合同。**

请您考虑我的电报，并将您的决定通知我们。

此致敬礼!

毛泽东 1951年10月4日

10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依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方针，确定从5个方面解决财政困难：节约兵力，整编部队；精简机关，精简人员；收缩开支，清查资材；提倡节约，严禁浪费；训练民兵，准备实行义务兵役制。

10月7日，斯大林关于军事顾问和军用物资问题致电毛泽东，全文如下：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10月4日的电报收到了。我现在回答您电报中的问题。

关于5名军事顾问。在志愿军总部工作的军事顾问将在近日派往北京。

关于提供装备。**根据6亿卢布的补充贷款，120门85毫米高炮、炮弹、反坦克手榴弹和炮车用轮胎，按照您9月20日申请单（申请价值1.09亿卢布贷款，即申请单总价值的1/5），将在1951年底之前，在我们确定的时限内提供给您。**

根据上述贷款，相当于申请单总价值4/5的1952年的军用物资，其提供期限在接到您申请单后通知。其余6个师的军用物资，其提供时限将推迟半年，在1952年7月之前提供。同样根据6亿卢布的补充贷款，因为我们需要保障新的大规模供货，所以50个师的装备和军用物资提供的限期也不得不推迟半年，即在1954年底完成供应。

**您提出要我们重新研究把为战斗师提供的汽车和自行车列入军事贷款的可能性问题。根据1951年2月1日关于军事贷款的现行协议，汽车牵引器材的结算至今都是按照商业协定办理的。您所说的结算方法，与现行的协议和据此形成的结算办法相矛盾。我们财政部门和军事部门认为没有理由修改现行条款，并反对改变条款，我们同意他们的意见。**

菲利波夫 1951年10月7日”

10月10日，毛泽东给表侄文炳璋写了一封复信。

文炳璋是文南松的次子，1949年6月参加共产党地下武装——湘中纠察队，同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此时，他在广州中南军区防空部队通讯连服役。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炳璋同志：

7月5日来信收到，谢谢你。乡里来人说，你家生活情况有一些改善。你可安心在部队工作。此复，顺祝

进步

毛泽东

10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封致志愿军党委的电报，他写道：

志愿军党委亲爱的同志们：

你们9月20日的电报早已收到，我们认为你们的总方针是正确的。**邓华同志现来北京，中央已将最近关于志愿军战略方针，节约兵力，节约资材，节约经费及两岸迫近敌人可能登陆处筑工事等项决定告诉了他，由他向你们转达。**希望你们联系实际情况规定具体执行办法，**争取朝鲜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央对于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表示欣慰与慰劳。目前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目前国内情况很好，全党及全国人民热烈支援你们。国际形势也于我们有利，敌人困难甚多。**我们也有困难，有些是很大的困难，但是可能克服的。只要同志们继续努力，并和朝鲜同志始终团结一致，最后胜利是可以取得的。**

　　 中共中央 10月14日

10月14日这一天，毛泽东给陈叔通写了一封回信。

陈叔通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已经75岁了，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还要求到农村去看土改，并亲自参加土改。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叔老：

10月9日惠示敬悉，谢谢您。看土改事，同意您的意见。惟冬季气候是否适于先生身体，请加考虑，春季去似乎好些，那时还有土改。又先生这样高龄，只宜去看土改，不宜去做土改。并且看可以多走地方，做则限于一区一乡。还有，**不单是土改一事，抗美、镇反、生产、教育、统战等项工作，都宜在视察之列，如果精神上顾得及的话**。有一份关于西北少数民族工作的报告，可以一阅，阅后请予掷还。致以

敬礼！

毛泽东

后来，陈叔通到农村看到了那里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分高兴。到了六十年代初，《中国建设》杂志印尼版请他写一篇有关新中国成就的文章，他就以毛泽东新发表的诗句“敢教日月换新天”为题，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大加赞扬；此文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0月22日，在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发动的秋季攻势宣告失败。此役中，中朝军队歼灭“联合国军”79000余人。

10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首先致词，他说：

“各位委员，各位同志们：

我们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现在开会了。在这次会议上，除了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之外，应邀列席的尚有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民解放军、工业劳动模范、农业劳动模范、老根据地代表、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工商业家、各种专家、宗教界、少数民族、华侨、妇女、青年、省市协商委员会及其他方面的代表人物，尚有许多政府工作人员。”

“**在过去一年中，在我们国家内展开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3个大规模的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即将基本肃清。土地改革，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以外，即将于1952年全部完成。全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空前广泛地团结起来，向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我们的国家已经实现了空前未有的统一。西藏问题业已用和平的方法予以解决。国防力量业已增强。人民民主专政业已巩固。而我们的金融和物价则继续保持着稳定，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也已前进了一大步。”

“**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

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因此也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

“我们的敌人认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摆着重重的困难，他们又用侵略战争来反对我们，我们没有可能克服自己的困难，没有可能反击侵略者。出于敌人的意料之外，我们居然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居然能够反击侵略者，并获得伟大的胜利。**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

10月23日这一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1周年之际，决定授予彭德怀一级国旗勋章。决定中说：

“以一级国旗勋章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因为他在朝鲜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战争中，以卓越的指挥艺术，指挥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给予美国侵略者以歼灭性的打击，给了朝鲜人民军以莫大的帮助。”

军事秘书杨凤安接到这一通知后，立即报告给彭德怀，彭德怀却说：

“我有什么功劳值得授勋的，我不过在后方作了些具体工作，这个勋章应该授给那些战斗英雄，我哪能比得上他们的功劳大？”

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副司令员洪学智、参谋长解方劝他说：

“这是朝鲜政府的正式决定，彭司令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当之无愧的，请彭司令还是慎重地接受为好。”

彭德怀还是不愿意接受，并向中央军委提出不接受勋章的意见。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复电彭德怀，命令他要尊重朝鲜政府的决定。后来在10月25日晚，朝鲜政府代表团在志愿军司令部驻地大矿洞内，举行了隆重的授勋仪式，金斗奉委员长代表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和政府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最高勋章——一级国旗勋章，佩戴在彭德怀的胸前。

授勋仪式结束后，彭德怀指着勋章对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说：

“这勋章授给我不合适，第一应该授给高麻子，第二应该授给洪麻子，如果没有他们两人昼夜想办法支援志愿军的粮弹物资，我的指挥再高明再正确，也是打不了胜仗的。”

彭德怀所说的高麻子是高岗，洪麻子是洪学智。在抗美援朝时期，毛泽东发给志愿军的电报开头多是：“彭邓洪韩解杜”。其中的“洪”就是指洪学智。

洪学智，1913年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1929年春，洪学智正在豫东南的深山里放牛，共产党的秘密组织联庄队找到他，问他愿意不愿意“吃大户”？他说：“哪有不愿意的呢！”于是，他参加了联庄队，晚上到地主家里杀富济贫“吃大户”，觉得痛快极了。同年5月6日，洪学智参加了皖西地区立夏节起义，加入了商城游击队，后来，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0月24日下午，毛泽东关于请求苏联增派高炮部队入朝等问题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致菲利波夫同志：

1、当前敌驻朝航空兵主要致力于破坏我军交通线。

洛博夫将军领导的航空兵部队和中国航空兵部队在过去的空战中取得了巨大成绩。苏联和中国的高炮部队在高炮射击中也取得了巨大战果，它们在掩护交通线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但是，我们兵力数量不够，它们不可能更加可靠地保障交通运输，因此**请您考虑能否由苏联政府再派1个由3个团编成的高射炮兵师到朝鲜北部以加强对铁路运输和安州地区机场的对空防御。**

2、已完成战斗准备的中国航空兵部队大部分集中在中国东北地区，准备参加朝鲜战斗，因此，在中国境内的防空兵器不够。此外，在1951年11-12月，中国的航空兵学校将有463名飞行员完成雅克-11的飞行训练。

根据您原来指定的计划，预定组建3个米格-9歼击机师、1个图-2轰炸机师、1个伊尔-10强击机师、2个拉-11侦察机团、1个拉-9歼击机团、1个里-2运输机团。

考虑到我空军现状，在组建上述师和团之后，中国同志自己在1952年3月15日以前这个要求的期限内不能完成战斗机飞行人员的训练任务，因此请苏联政府给予下列援助：

1、给中国派出3个喷气歼击机师和3个有技术装备的航空技术营来训练中国的3个歼击机航空兵师和6个米格-9航空技术保障支队，同时也是为了北京、上海、广州的对空防御。

2、给中国派出1个团人员（不带技术装备）和1个带技术装备的航空技术营来训练中国的2个侦察团和2个拉-11航空技术保障支队。

3、给中国派出1个团的人员（不带技术装备）和1个带技术装备的航空技术营，来训练中国的1个歼击机航空兵师和2个伊尔-10航空技术保障支队。

4、中国空军自己可以胜任组建和训练1个图-2轰炸机航空兵师、1个拉-9歼击机航空兵团和1个里-2运输团，但到1951年12月则请给轰炸机师派出14名顾问，给拉-9歼击机团派出5名顾问。如果您许可的话，其余顾问则从训练师和团的人员中指派。

请告知您对上述问题的决定。

此致敬礼!

毛泽东 1951年10月24日

欲知斯大林如何答复毛泽东，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0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扩大会议上致词说：**“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斯言极是！**抗美援朝一战打出军威，打出国威，打出一个世界政治新格局**，为中朝两国人民打出了一个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建设新环境！这铁一般的事实是任何一个不肖子孙都不能够否认的！

**第31章**

**“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

**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

**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

**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

**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

话说1951年10月25日，在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谈判代表又回到了谈判桌上。双方谈判的地点由原来的来凤庄改在位于开城东南8公里的板门店进行。

前面已经说过，美国人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战场上也同样得不到。“联合国军”经过夏季、秋季两次攻势，以15万7千多人的代价，换来的只是把战线平均北移了5公里。因此，他们不得不又回到了谈判桌上。

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4路部队已经全部到达拉萨及江孜、黑河、隆子、日喀则、亚东、阿里等边防重地，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喜马拉雅山，插遍了青藏高原。

这一天，进驻拉萨的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西藏地方政府官员、3大寺活佛，以及各族各界僧俗群众2万多人夹道热烈欢迎。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在欢迎仪式上致词说：

**“过去，无论是清朝的军队，美国的军队，国民党的军队，来到西藏时，我们都没有欢迎过，唯有这次人民解放军到拉萨，我们热烈欢迎，因为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

10月26日下午，毛泽东复电给达赖喇嘛。

西藏达赖喇嘛在10月24日致电毛泽东，表示拥护协议并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

毛泽东在给达赖喇嘛的电报中说：

“我感谢你对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努力，并致衷心的祝贺。”

至此，中国所有领土除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岛屿尚被蒋介石军队占据以外，全部获得了解放。

1951年11月1日，全国政协一届3次会议闭幕。毛泽东在会议闭幕前夕，接见了27岁的“毛泽东号”机车第3任司机长、全国劳动模范、列席政协会议代表郭树德。他和郭树德亲切握手，说：

“你回去向工人同志们问好！”

是日晚，毛泽东将与全国政协一届3次会议全体代表在中南海怀仁堂共进晚餐。

郭树德进入宴会厅后找不到自己的座位，便被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引到了一号桌。他坐下后蓦然看到桌子上摆着“毛泽东”的席卡，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席卡的位置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他与毛泽东同桌，就坐在毛泽东对面，激动的泪水顿时溢满眼眶。

不久，在全体代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走进宴会厅。此后，坐在毛泽东对面的郭树德几乎没有动过筷子，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毛泽东。他的口袋里装着一册10月12日新发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他想请毛泽东签个名，可不知如何开口，只是怔怔地激动地看着毛泽东。坐在对面的毛泽东认出了下午接见的郭树德，放下筷子，朝这位火车司机走来。郭树德赶紧站起身来，拿出崭新的《毛泽东选集》，双手捧着，恭恭敬敬地递给毛泽东，说：

“主席，我想请您签个字。”

毛泽东微笑着从秘书手中拿过钢笔，欣然在扉页签上了“毛泽东”3个苍劲有力的大字。郭树德手捧这本有着毛泽东签名的书，激动万分。

这是唯一一本有毛泽东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也是郭树德所在的“毛泽东号”机车组的传家宝，后被中国革命博物馆作为文物永久收藏。

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决定：增补林彪、高岗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1月8日下午3时，毛泽东邀请张干、李漱清、罗汉溟和邹普勋到中南海瀛台合影留念。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是我头一次和自己这么多老师一起照相，值得纪念。”

晚上，毛泽东再一次和4位客人一起吃饭，尔后，又陪他们看了一场电影。毛泽东对张干说道：

“次仑先生，将来建设我们的新中国，老师是一支最重要的力量，请您老回去以后，好好和教师谈谈这个问题。”

11月10日，毛泽东派人接文梅清、毛宇居、张有成到中南海吃午饭。

此时，文梅清等人在北京已经住了2个月，毛泽东曾多次陪同或派人陪护他们外出游览，还让秘书安排他们坐飞机到天津参观。

11月11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邓华、陈赓并志愿军党委的电报中写道：

彭邓陈并志愿军党委诸同志：

11月8日来电收到。我们认为志愿军党委决定各项是正确的，望即照此施行。如此，你们在朝鲜，我们在国内，一致配合进行大规模的切实可行的精简节约，加上国内的增产运动，明年的一切工作就很好做了，就确有把握完成任务了。**我们和敌人进行的谈判能成功固好（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即使不成功，我们也确有把握使战争继续打下去，直到争取胜利为止，同时毫不妨碍国内的国防建设和其他建设，各项工作均可蓬蓬勃勃地发展下去了。**

毛泽东 11月11日

11月11日下午，毛泽东又邀文梅清等人到家中共进晚餐。饭后，毛泽东笑着对毛宇居说：

“今晚，我跟你回韶山去。”

毛宇居不禁一愣，前几天毛泽东说过，什么时候有空了要回韶山看看。难道今晚就要动身么？毛泽东观察着毛宇居的神情，诡异地笑笑，又说：

“是啊，我们今晚一起回韶山，去看看你自己！”

说罢，他和众人一起来到大厅里看电影，银幕上出现了几个大字：解放了的中国。

这是一部中苏合拍的彩色电影纪录片，其中有不少韶山的镜头。毛宇居年轻时就留须，是一位美髯公，如今白发银须，笑容可掬，自然是摄影师捕捉的对象，既有他的中近镜头，又有他的大特写。毛泽东笑道：

“宇居大哥，我们不是回韶山了么？还看见了你自己嘛！”

老先生在银幕上看到了自己的形象，那个兴奋劲儿简直是无法形容。他一回到招待所，立即吟诗一首：

银幕一开画来传，老夫笑貌及苏联。从今四海为家日，几度观光及壮然。

11月12日，张干、李漱清等人在北京已经住了60多天，准备回湖南了，一位工作人员提着一包东西来找张干，他说：

“张老，毛主席本想亲自来给您老送行，但这几天实在太忙，特地让我代表他来向您老表示歉意。”

说罢，他打开包，取出毛泽东送张干的零用钱150万元，还有一瓶鹿茸精，递给张干，并嘱咐他每次饭前20分钟服20滴，一日两次；接着又给其他客人分发了礼金和礼品。

张干回到湖南不久，便被聘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参议室参议，后被聘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顾问。

且说11月13日，斯大林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电，全文如下：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今年10月24日电报我们收到了。因为我远离莫斯科，我的复电晚了一些。

1、我们认为，保障北朝鲜交通枢纽的安全应主要由歼击机航空部队负责。为此我们紧急建议加快南市和泰川地区机场建设，以便在最短时间内在此降落中方空军部队。

高炮部队的主要力量只需掩护主要的大型目标，现在应由苏军的5个高炮师负责掩护机场和安东-新义州地区的鸭绿江大桥。

根据朝鲜所出现的局势，加强高炮的掩护是必须的。我们认为，中方司令部可以从苏联提供的1854门高炮和3268挺高射机枪中拨出装备各师所必需的180门高炮和一些高射机枪。在12月，我们将根据补充的军事贷款向您再提供120门85毫米高射炮。

2、关于苏联向中方派出3个米格-9喷气式歼击机航空兵师及飞行员和3个航空技术营的要求，我们不能满足。**因为米格-9飞机我们已不生产，我们也没有米格-9飞机。**如果需要进一步派遣我方飞行员训练米格-9飞机的中国飞行员，可以使用在安东、唐山和公主岭驻扎的3个歼击机航空兵师的教练员，为期3个月。完成所有训练大纲后做返回苏联的准备，返回苏联的时间不晚于1952年3月中旬。

对于1个强击机航空兵师的训练，我们的军事专家认为，作为中方第5和第11强击机航空兵师顾问的在中国的苏联飞行员，可以成功地完成这项任务。

为了训练中国的侦察团，我们将从在中国的洛博夫将军部队的侦察团中派遣教练员。

将向贵方派遣图-2轰炸机航空师和拉-9航空兵团的顾问，共计19人。如果您同意我们的决定，我们将下达相应的命令。

我们有责任提醒您注意，我们临时派去训练中国米格-9飞行员的顾问应按期准时返回。

菲利波夫 1951年11月13日

11月14日，毛泽东关于停战谈判和国内情况等问题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致菲利波夫同志

**在恢复朝鲜停战谈判以后，由于近两个月来前线损失惨重，以及美国国内外的停战要求增强，美国方面接受停战条件的可能性增大了。**但是与此同时，考虑到对内对外政策的需要，美国政府仍然企图保持国际紧张局势，因此在谈判过程中，美国人积极打探消息并玩弄花招，力图拖延谈判。

确定分界线是谈判的主要问题。敌方要把分界线划在我军深远后方，而不是建议在当前战线的基础上确定分界线，对之做出某些改变，并将开城地区纳入缓冲地带。目前，在签署停战协议时，敌方已提出要求确定以双方军队实际接触线作为分界线，没有把开城地区纳入缓冲地带。我们则坚持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并确定以双方军队当前的接触线作为分界线，在就全部议程达成协议时如有变化则对双方部队接触线做出改变。目前敌方正就这一问题同我们进行争论，但是我们认为，这一争论不会持续很久。

**我们之所以建议在当前战线地区停止军事行动，我们之所以同意推迟解决以三八线作为分界线问题和在召开政治会议之前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等问题，不仅因为目前进行的谈判是停战谈判，以及敌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立即以三八线以北的东部山区来交换三八线以南的西部低地，而是因为在敌方拒绝放弃东部山区的情况下，我们在那里也有有利于防御的山区；至于三八线以南的西部沿海平原地区，则它对我们有利，是因为那里居住着比东部地区多得多的居民，还因为那里有丰富的农产品，而且，开城地区是夺取汉城的前哨阵地。**

金日成同志今年6月在北京讨论停战条件时曾就此问题发表了这样的意见。这次，停战条件也是征得他的同意的。

关于对谈判监督问题的讨论，我们早就打算建议建立停战机构，双方代表均参加这一机构，由该机构承担对停战条件的执行进行监督和在缓冲地带进行监督的任务。但是，敌方一定会要求在双方后方建立监督，以便限制双方援军和军用物资的调遣。我们打算同意在双方1—2个边境居民点建立监督，并同意您的指示，建议给中立国，即未参战的国家赋予监督职能，我们打算邀请苏联、波兰和印度这3个国家承担此项任务。可能美国人一开始会反对。若是这样，我们就建议由瑞典和一个拉丁美洲国家派出代表。

至于交换战俘，我们反对按一对一的原则交换，我们建议按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交换。我认为，该问题不难达成一致意见。

关于由有关国家政府召开高级会议问题可能有3种方案：

1、召开目前正在进行谈判的双方政治代表会议（可能美国提出这一方案）。

2、召开4国参加的会议：苏联、中国、美国、英国以及北朝鲜和南朝鲜的代表。

3、召开7国参加的会议：苏联、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埃及以及北朝鲜和南朝鲜的代表。

请您指示，从国际局势来看这3种方案中哪种是最佳方案，或者请您提出新方案。

目前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力求在今年达成停战。与此同时，我们应进行必要的准备以应付敌方拖延谈判和破坏谈判。**考虑到谈判可能还会拖延半年或一年，我们已开始节省在朝鲜战场的人力和物力，并实行长期积极防御策略，以坚守目前我们所占领的阵地，重创敌人的有生力量，从而取得战争胜利。**

**在国内，我们准备整编军队，精简机构，厉行节约，增加生产，进一步加强抗美援朝运动，以保证继续进行朝鲜战争，保证财政和进一步稳定物价，以及加强国家建设，主要是国防建设。**

**今年，由于抗美援朝，中国政府的预算支出比1950年增加了60％。预算总额的32％直接用于朝鲜战场（苏联政府给我们提供的军事贷款尚未包括在内）。**因此，如果现在不厉行节约，那么明年的预算还会增加，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财政，并导致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这本身也会给前线造成困难，同时也会给后方建设造成困难。当然**通过谈判取得和平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是我们并不害怕拖延谈判。事实就是这样，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与此同时，我们能够顺利地在国内采取各项措施，来保证稳定，以及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请您就上述问题给予指示。

毛泽东 1951年11月14日

11月14日，毛泽东安排文梅清、毛宇居、张有成乘飞机去察哈尔、保定游览。

11月15日，毛泽东派人到惠中饭店，送给毛宇居皮箱一个；邀文梅清、毛宇居、张有成共进晚餐；饭后在颐年堂外合影留念；还一起观看了京戏。

话到此处，不得不说说毛泽东看戏的一段轶闻。

在1949年开国大典前后，以及在建国后最初几年的国庆节，各地戏剧界的名优大师，都荟萃于京华，献演于中南海的紫光阁和公安部礼堂，可谓是百花争艳，蔚为壮观，形成了梨园史上的空前盛况。艺术家们认为，能向毛泽东献艺，能在中南海演出，是对自己的最高奖赏。毛泽东对艺术家们的精湛表演，也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此一时期，唯独京剧须生中的佼佼者马连良，还一直没有去中南海登台的机会。叶子龙曾数次向毛泽东汇报，马连良要求给他献艺。但毛泽东始终没有表态，原因是马连良在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时期为日伪演出，特别是为川岛芳子演出和到伪满洲国演出的历史问题。后来，彭真也替马连良向毛泽东求情，说是由谭富英主演诸葛亮，与马连良合演《借东风》，毛泽东这才勉强到场观看了演出，终于了却了马连良的一桩心愿。

11月15日这一天，中宣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向中共中央呈上了关于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的报告，其中提出“拟调任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同志为中央宣传部政治教育处处长”；“拟调任山西省委副书记陶鲁笳同志为文化教育委员会干部教育管理局局长”；“拟任江青同志为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

11月16日，毛泽东对上述报告作了批示，他写道：

乔木同志：

此件很好，可照此实行。惟赖若愚调总工会为秘书长，陶鲁笳是否能调出待考虑，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也值得再考虑一下。

毛泽东

由此，江青的任命被取消了。

11月16日下午，毛泽东派秘书徐业夫到惠中饭店，看望文梅清、毛宇居、张有成3位亲友。

11月17日晚，毛泽东派人送给文梅清、毛宇居、张有成3人被单各1块。

11月18日，毛泽东邀请文梅清、毛宇居、张有成3人看电影《幸福的生活》。

文梅清、毛宇居、张有成3人就要离开北京了，毛泽东叮嘱他们说：

“你们这次来，在北京、天津参观了许多地方，看到了祖国建设的成就，回去后要好好宣传，把这些情况介绍给家乡的群众，发动大家努力工作，搞好生产，把家乡建设好。”

毛泽东又送给3人呢大衣、衬衣、皮鞋、枕头、枕巾、洗脸巾、皮箱等，每人1份。

另据湘潭红友提供的信息，毛宇居在1951年11月19日的日记中记载：毛泽东还将白酒6瓶，备用的毛笔、铅笔和收藏的墨盒等文具赠予毛宇居，以寄托深情。

11月19日，斯大林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致电毛泽东，全文如下：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电报收到了。我们同意您对谈判目前形势的评价。谈判全过程表明，美国人虽然在拖延谈判，但是他们更需要尽快结束谈判。**这是根据总的国际形势得出的结论。

我们认为正确的做法是，**中朝方面应继续在谈判中采取灵活战术，实行强硬路线，不能有急躁和尽快结束谈判的表现。**

在确定分界线和在1—2个边防站进行检查问题上，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

我们还同意关于履行检查职能的委员会人选问题。

在交换战俘问题上，您的立场完全正确，敌人很难对此提出异议。

至于在签订停战协议后，为进一步解决朝鲜问题而召开会议的可能的方案，我们认为，召开目前谈判双方政治代表的政治会议是适宜的，但必须要有北、南朝鲜的代表参加。

菲利波夫 1951年11月19日

11月20日，文梅清、毛宇居、张有成一行3人登车南下。

11月20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转发东北局书记高岗11月1日《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的批语。

高岗根据东北地区揭露出来的一些干部有严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问题，在报告中写道：“从两个月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还可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如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医政处长李廷琳勾结私商光明药行经理丛志丰共同作弊，高价卖给公家，低价从公家买出，投机倒把，伪造发票、偷税、报假账，总计使国家损失人民币61.3亿余元（旧币——笔者注）。”

高岗在报告中称：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达5亿元。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

一叶知秋，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东北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可能带有相当的普遍性。东北的现象充分表现了资本家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本质。党和国家政权肌体的腐败已见端倪，不能等闲视之。他在批语中写道：

各中央局，并请发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同级政府党组和各同级军区，并告中央和军委各部门首长、中央政府各部门党组：

兹将高岗同志于本年11月1日所作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一件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展开这个运动和这些斗争之后，每一部门都要派出必要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情况，总结经验，向上级和中央作报告**。

中央 1951年11月20日

1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文学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的指示》：

各中央局并转各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同级政府文化部门的党组和文艺团体的党组：

一、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1951年11月23日向中央所作的报告，认为这一报告是正确的。

二、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自己和当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负责同志都注意研究这个报告，**仿照北京的办法在当地文学艺术界开展一个有准备的有目的的整风学习运动，发动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文艺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发扬正确思想，整顿文艺工作，使文艺工作向着健全的方向发展。**为使这一整风运动获得良好的结果，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的负责同志和宣传部负责同志必须亲手抓紧对文艺界整风运动的领导，先将你们的计划报告中央和中央宣传部批准。

三、中央这一指示和中央宣传部的报告可以在党内刊物上发表，并可给党外同情分子阅看。

　　 中共中央 1951年11月26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在给“毛主席和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我们决定在文艺干部中进行一次整风学习，借以澄清文艺界的各种错误思想，认真建立党对文艺工作的有效的领导。为了准备这个学习，首先由中央宣传部召集党的主要文艺干部十余人举行了文艺工作会议，取得了一致意见。然后，由全国文联常委会召集了两次会，决定在北京发动数百文艺干部参加整风学习运动。”

“中央宣传部所召集的文艺工作会议的参加者，有胡乔木、周扬、丁玲、赵树理、李伯钊、陈沂、艾青、何其芳、周文、吕骏、江青、阳翰笙、袁牧之、陈波儿、张庚、严文井、林默涵等。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对文艺领导工作的检查、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时讨论了加强电影工作、整顿戏剧工作、调整和加强文艺刊物的具体方案。”

“在党内，关于文艺工作特别是日益重要的电影工作，很少向中央请示和报告。文艺工作中的党员缺少严格的政治生活，文联党组和文化部党组很少检讨思想和创作的问题，很少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很少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在党外，文联及其所属各个协会都陷于瘫痪状态。

会议指出周扬同志应对以上现象负主要责任（周扬同志作了详细的自我批评），同时指出其他同志也都负有一定的责任，并相互进行了热烈的批评。为了克服文艺界的上述倾向，会议决定由文联动员北京文艺界各方工作人员约700人进行一次整风学习。”

“整顿文艺刊物，使成为严肃的战斗的武器。决定将《人民戏剧》、《人民音乐》、《新戏曲》、《北京文艺》停止出版，集中力量办好《文艺报》和《人民文学》，使前者成为领导性的艺术评论和文艺学习的刊物，后者成为领导性的发表创作指导创作的刊物。同时，加强《说说唱唱》使成为指导全国通俗文艺的刊物，并定期地选印剧本和歌曲，以供应全国广大的需要。”

“根据宣传部文艺工作会议的建议，文联常委会已决定发起北京文艺界的学习，并已组织一个包括各文艺部门负责人（党的和非党的）的学习委员会，由茅盾、周扬、丁玲、欧阳予倩、阳翰笙、蔡楚生、陈沂、田汉、沙可夫、马思聪、李伯钊、江丰、袁牧之、老舍、林默涵、严文井、朱丹、马少波、吴雪、李广田等组成，来负责领导这一学习。文联将于11月24日召集各部门文艺工作干部开一次学习动员大会，由胡乔木、周扬、丁玲等分别作报告，说明文艺界进行整风学习的意义和目的，并有若干党内外文艺工作者讲话。学习人员按工作关系编成小组，阅读指定的文件：（1）毛主席《实践论》；（2）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3）毛主席《反对自由主义》；（4）斯大林给别德内依的信；（5）联共中央关于文艺问题的四个决定及日丹诺夫的报告；（6）《人民日报》社论《必须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然后结合工作进行检讨。”

11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起草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地委、青年团团委、各同级政府的党组和教育、公安两部门的党组或党委：

兹将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一件发给你们，请你们加以研究，遵照执行。

中央 1951年11月30日

毛泽东批转的那个指示，分析了各类学校的政治思想状况，指示中说：虽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抗美援朝运动和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运动以来，学校已经有了很大的改革，但是，仍然存在着各种不同程度的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的情况。

指示明确要求立即开始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用1至2年时间，在全国所有大中小学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开展学习运动。在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培养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基础上，在全国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专科学校以上（即大学一级）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活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11月30日这一天，北京城寒风凛冽，大雪纷飞。

午夜时分，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的灯光依然亮着，毛泽东皱着眉头，认真地翻阅着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二书记刘澜涛11月29日关于刘青山、张子善严重贪污受贿的报告。他的心情十分沉重。

刘青山和张子善都是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严峻考验的老干部，曾经同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进行过英勇的斗争。

刘青山出生于1916年，雇工出身，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河北高阳、蠡县农民暴动，后被国民党逮捕，在敌人严刑逼供下，坚贞不屈。1937年他被选送抗大学习；后历任冀中区任河（任丘、河间）县委书记、八地委组织部长、地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他任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

张子善出生于1914年，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参加了狱中的绝食斗争和卧轨斗争，在敌人面前表现出共产党人的英勇气概；后历任河北献县县委书记、八地委组织部部长、十地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他任天津地委副书记兼专员、天津地委书记。

刘青山、张子善在全国胜利后两年多的和平环境中，经不起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作风的侵蚀和引诱，堕落蜕化了。他们在政治上极力造成一个“惟我独尊”和“挥霍有道”的空气。刘青山说：

“老子们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

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利用职权，勾结奸商，贪污、盗窃、受贿和肆意挥霍公款共达171亿6272万元（旧币），其中有勾结奸商张文义等人，倒卖钢材，使国家蒙受21亿元的损失；动用专区地方粮款25亿元，宝坻县救济款4亿元，干部家属救济费1.4亿元；贪污防汛款盘剥治河民工工资等22亿元；贪污修飞机场节余款和群众房地补价款45亿元；向银行骗贷40亿元等等；情节十分恶劣。他们甚至派人伪装解放军到东北盗运木材牟取暴利，用侵吞的巨款到香港购买高级轿车。刘青山还吸毒成瘾，并且在政治上成为独霸一方的恶棍。这样，他们就完全堕落成为人民的敌人了。

刘青山、张子善贪污受贿的款项，按当时的币值标准和市场物价指数，可买粮食近2000万斤，棉布800万尺，足够50多万人吃一个月并做一身衣服。

多行不义必自毙。正是在毛泽东11月20日批转高岗的报告倡导开展大规模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第二天，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行为在11月21日的河北省党的第3次代表大会上被揭露出来了。

毛泽东翻阅了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严重贪污受贿的报告材料，提笔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转发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特大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报告的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兹将华北局1951年11月29日给中央的报告发给你们研究，**望你们注意发现所属的同类事件而及时加以惩处**。

中 央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西南局书记邓小平的报告的批语，他写道：

邓小平同志，并告各中央局并请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

一、你于11月25日给我们的电报以及早已送来的1952年工作要点，均收到了，你们的方针和部署均好，我们均同意。除早已将西南局1952年工作要点转发你们参考外，现又将小平此电转发你们参考。此电第3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

　　 中央 1951年11月30日

1951年12月1日清晨，毛泽东已经工作了整整一夜，他放下笔，伸个懒腰，搓搓脸，朝门口走去，踏出门槛刚走了一步，便立住了脚，显出异常惊喜的神情。纷纷扬扬的雪花使他激动，他睁大了眼睛，仰天凝视，目光从天空缓缓地移向树梢，屋顶，再移向像铺设了白色毡毯一样的庭院，久久一动不动。他见卫士张木奇抓起一把扫帚去扫雪，便急切地喊道：

“不要扫！”

他指着地上扫帚扫过的痕迹，皱起了眉头，不无责备地说：

“这是你扫过的吗？她的伤口刚合上你就忍心又割一刀！”

张木奇怔怔地立在原地。是的，黎明时他刚扫过一次，现在又落了薄薄的一层雪，这就是刚愈合的伤口？

毛泽东步下台阶，小心翼翼，走出两步，又停了下来，回头看看自己留在雪地的脚印，目光里闪烁着孩童一般的惊喜！再看看面前的雪地，这位叱诧风云、改天换地的巨人，被亿万人民欢呼为万岁的领袖，竟然犹豫了。他不忍心再把脚踏向那洁白无瑕的雪地，把已经抬起的脚缩回去，慢慢地落在原来的脚印里，两只脚始终保持着一前一后的姿势，站立不动。他伸出右手，用手背和衣袖去接那些飘落的雪花，欣赏着宇宙最伟大的创造和最精彩的表演。

“主席，走一走吧。站久了会感冒的。”

张木奇依然站在原地，远远地提醒说。他不敢过去，怕践踏了毛泽东所迷恋的雪地。毛泽东似乎没有听见，他手背上的雪花在融化，一颗晶莹的水珠颤颤欲滴。他用舌尖轻轻地一触，那水珠便不见了。毛泽东轻轻地咂咂嘴，像饮了甘露一般微笑了。他终于慢慢地退了回去，站在廊檐下绕着庭院观雪景，久之，步出小门，沿中海散步。他不走已经扫过的道路，而是踏着积雪走，倾听着脚下那咯吱咯吱的声响，似乎是在欣赏一首特别美妙的音乐，时而回头望望自己留下的脚印，时而停留在松柏树旁，观赏枝丫上那千姿百态鬼斧神工的琼枝银花。

雪使毛泽东流连忘返，忘却了时间，忘却了一切。李银桥见他在外边呆久了，就追过来劝他说：

“主席，该回去了。”

“银桥，”毛泽东突然开口问道：“你有没有贪污？”

“没有。”

李银桥坦然回答。毛泽东又问：

“你现在不贪污，以后贪污不贪污？”

“不贪污！”

“那就好。**你来的时候像这些雪。以后也要保持，反腐蚀，不要让糖衣炮弹打中。**”

毛泽东说罢，继续在雪地上走。他边走边问：

“你喜欢雪吗？”

“喜欢。”

李银桥回答。毛泽东说：

“**农民喜欢雪，瑞雪兆丰年。害虫不喜欢。一下雪，苍蝇就没有了**。我也喜欢雪，我们都喜欢雪。”

12月1日这一天，中共中央下发了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毛泽东在这个《决定》中加写了几段话，他写的是：

“**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3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现在必须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中央人民政府不久将颁布惩治贪污的条例和惩治浪费的条例，各级领导机关必须仿照实行惩治反革命条例那样，大张旗鼓地发动一切工作人员和有关的群众进行学习，**号召坦白和检举，并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督促和检查。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典型的贪污犯，必须动员群众进行公审，依法治罪。**

浪费和贪污在性质上虽有若干不同，但**浪费的损失大于贪污，其结果又常与侵吞、盗窃和骗取国家财物或收受他人贿赂的行为相接近**。故严惩浪费必须与严惩贪污同时进行。浪费的范围极广，项目极多，又是一个普遍的严重现象，故须着重地进行斗争，并须定出惩治办法。

**反贪污斗争和反浪费斗争的开展和深入，必将接触到各方面存在着的各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央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在此次精兵简政的工作中，在展开全国规模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在进行反对贪污和反对浪费的斗争中，同时展开一个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凡在其所属机关、部队、团体、学校或企业中发生了严重的贪污现象或浪费现象，而事前毫无觉察、事后又不厉行惩治者，称为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虽然没有亲手参加贪污行为或浪费行为，亦应以失职论处，决不宽恕。

**为着有力地彻底地消灭贪污现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现象，必须奖励那些不贪污、不浪费和毫无官僚主义习气的模范的单位和人物**，从这些单位和人物与那些贪污者、浪费者和官僚主义者之间划出明显的界线来。”

欲知毛泽东倡导的在党内开展的“三反”斗争如何发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1月20日转发高岗《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的批语中，提出要在全党开展一场“三反”斗争，可谓是见微知著。第二天河北省便挖出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大案。中共中央在12月1日就下发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的确是雷厉风行。须知，此时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同时又要在全党内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是需要怎样的胆略和气魄啊？！

**第32章**

**“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

**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

**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

**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

**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话说1951年12月3日，毛泽东给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写了一封信，随信送上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的绢本楷书长卷《双鹤瑞舞赋》墨迹。他在信中写道：

振铎先生：

有姚虞琴先生经陈叔通先生转赠给我一件王船山手迹，据云此种手迹甚为稀有。今送至兄处，请为保存为盼！

顺祝健吉

　　　　　　　　　　　　　　　毛泽东 12月3日

原来在前些时，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知道毛泽东很崇敬明清之际的湖南籍思想家王夫之，也知道画家姚虞琴有一王夫之的稀世墨迹，便在与姚氏商酌之后，将此物赠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见后，十分欢喜，又怕放在自己身边会损坏，于是连忙让人给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送去，请他加以保存。

姚虞琴，浙江余杭人，近现代著名爱国画家，与齐白石齐名，时有“北齐南姚”之誉。早在日本侵华期间，姚虞琴画兰不带土，寓国土沦丧之意。

不久，毛泽东获悉郑振铎将墨宝交给故宫博物院珍藏，甚为欣慰。但他又不愿将墨宝赠与之事过分张扬，便批复道：

“此物似乎只可收藏，不必陈列展览。”

12月4日晚，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批转北京市委开展反贪污斗争的报告的指示》：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请速即转发所属分局，各省委，各市委，各区党委，各地委和各县委；各大军区党委和志愿军党委，并请速即转发所属政治、军事、后勤各部门，直到团级为止：

一、中央批准1951年12月4日晨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工作人员的贪污现象及今后展开反贪污斗争的意见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是完全正确的。

二、中央责成你们在接到本指示3星期内，至迟在一个月内，**有计划地初步地检查自己单位和所属下一级各单位工作人员的贪污现象，仿照北京市委所订各项办法，发动党内外最广大群众（包括各民主党派及社会民主人士），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

三、中央责成你们大体上仿照北京市委的报告样式，在收到本指示后一个月内，向中央作第一次关于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的报告。所有中央和军委各部门，均分别向中央和军委作报告；所有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各分局，各省委，各市委，各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均按级向中央及其上级作报告。**县委以上的报告，除发其上级外，均同时直接发中央。**有电报的地方，用电报发来。**无电报的地方，从邮局寄来**。军事系统二三两级军区的报告，除发其上级外，同时直接发军委。**军区以下的报告，由军区收集转寄军委。志愿军各部的报告，由志愿军党委收集转寄军委。凡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凡推迟报告时间者，须申明理由。**

四、本指示及北京市委的报告，须组织科长以上的党员阅读，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中央 1951年12月4日20时

12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

华东局、福建省委，并告各中央局，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党委：

福建省委办公厅12月7日15时电询问，可否将中央12月4日发来之北京市委反贪污运动报告和中央的批示以绝密文件印发至县委，以便统一展开反贪污运动和统一执行关于反贪污问题向中央的报告制度等语，兹答复如下：

1. 应当发至县委，军队则发至团党委，并且应当在党内刊物上登载，使更多的同志看到，**使科长级以上的党员都能看到。这是半公开的文件，不是“绝密文件”**。

二、中央于12月4日转发的北京市委报告，12月5日转发的中央贸易部党组报告，12月7日转发的中央财政部、人民银行总行、中央轻工业部、中央水利部等各党组报告，以及尔后转发的各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一概照上条办理。

三、**所有地方县委以上均应向中央作报告，军队团级以上均应向军委作报告，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这点已在中央12月4日指示中说清楚了。

四、**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贪污分子，浪费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当然大多数不是反革命分子（可能有一部分人即是反革命分子），他们的罪名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但这个问题现在已极严重，必须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去进行斗争，一样的用死刑和徒刑等对待他们，并且一样的要查明情况，心中有数（犯贪污的占全体工作人员的百分之几，轻者重者最重者又各占百分之几），精密地掌握这一斗争。以上各点，请加注意。

中央 1951年12月8日

此前，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兼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指挥空3师在12月2日、5日、8日大战美国空军，3天共击落敌F-86飞机9架，F-84飞机4架，击伤F-86飞机2架。此次空战规模空前，战果辉煌。毛泽东闻讯，欣然命笔，批道：

“向空军第3师祝贺。”

12月11日，毛泽东给毛泽连、毛远悌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泽连、远悌：

来信收到。慰生六婶及泽连均不要来京，也不宜在长沙住得太久，诊病完了即回韶山为好。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要来京，也不要在长沙住得太久。泽连家境困难，待将来再设法略作帮助，目前不要靠望。远悌在印厂工作，可在工作余暇进行学习。请你们代我问六婶好！

祝你们都好！

毛泽东

接着，毛泽东为转发华北军区后勤部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并转各级军区直至团级，志愿军党委：

1. 兹将华北军区后勤党委会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报告一件发给你们参考。这是军事系统在中央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号召下向中央反映情况的第2件。第1件是装甲司令部许光达等的报告，已发给你们了。

二、**军事系统各部门，特别是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极为严重。**很多党员，甚至负责干部，沉埋于事务工作，政治思想极不发展，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因此**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许多人本位主义极为浓厚，只顾小局，不顾大局。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必须在整个军事系统，特别着重在后勤部门，展开整党整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并**号召一切指战员参加这个斗争**。

　　 毛泽东 1951年12月11日

12月12日，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在西安隆重举行，汉、回、蒙古、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等14个民族的代表451人出席了会议。会议致电毛泽东，表示了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和信心。

12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你们的这次代表会议，决定进一步团结各族人民，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开展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很好的。**帝国主义过去敢于欺负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各民族不团结**，但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

12月13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土地改革工作报告写了一个批语：

中南局并告华东局、西南局、西北局、华北局并请转发各省、市、区党委：

一、中央批准中南局1951年12月10日关于中南区土地改革工作进行状况的分析和1952年土地改革工作方针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是完全正确的。**中央认为，在目前这种时机，在全国各新区的土地改革大约已完成了一半，但尚有一半必须集中大力去做才能完成（已分配完毕者尚有复查问题），如果只顾赶急图快，就有流于形式不能切实解决问题的危险的。**这种时机，中南局同志们提出这一分析，是适时的和完全必要的。请各中央局和各省、区党委不要因为中央提出依土地改革完成情况适时的转移省级以上的主要领导方向到城市和工业方面的方针，而放松了对于1952年土改工作的领导，如果这样做，那就会犯错误。中央指出：关于农村和城市、土改和工业的领导上注意力的分配和领导重点的转移问题具体解决，请各中央局、各省委、区党委精密地掌握着，不要分配不适当和转移不适时。

二、将中南局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仿照办理，并**请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中央

12月15日，毛泽东为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起草了一个党内通知，他在通知中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一、兹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一件发给你们，请印发到县委和区委。**请即照此草案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这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这个决议草案可以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但不要在党外报刊上发表，因为还是草案**。

二、这个草案比10月间发给一些同志带回去的草案有了一些修改，请将10月草案收回作废。

　 中央 1951年12月15日

12月17日，毛泽东给王震复了一封电报。

王震是在12月14日给毛泽东并习仲勋、张宗逊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就新疆军区生产会议内容及明年生产计划提出，准备派军队党员干部帮助当地农民组织10个集体农庄。毛泽东看罢王震的报告非常高兴，他在复电中写道：

“在你的计划中有利用军队集体劳动的经验，试办10个农民的集体农庄的计划，这个计划很好。**中央在即将发出的关于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里，已将每省试办一个或几个集体农庄一点加上去了。**这种集体农庄在目前当然只能是少数的，即每省只能办一个至几个。”“**各军区和各地方，凡已有用机器耕种收割的国营农场和个别集体农庄（例如河北天津县廊坊地方的农民集体农庄），或准备这样做的国营农场或集体农庄，均望将这看做一件大事，用力经营，随时总结经验报告中央。**”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西南局关于开展“三反”斗争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并请各中央局转发分局及省市区党委：

兹将西南局12月13日关于在西南方面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请在党内刊物上予以登载，使科长以上的干部都有机会阅读**。**西南局指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是由于没有像镇压反革命一样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动，没有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这是完全正确的。西南局所规定的6项办法，也是正确的。

　　 中央 12月17日

是年冬，胡志明在罗贵波陪同下秘密访问中国。罗贵波记载了这一外事活动。

一天下午，罗贵波陪着胡志明来到颐年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迎出门外，他们先后与胡志明拥抱问好，就像久别重逢的兄弟一样亲切。

胡志明说一口相当流利的带有广东味的汉语，可以不用翻译。他把越南抗法战争和根据地的建设及中国顾问在越南工作的情况，作了简要介绍。他还对毛泽东说：

“我们中央政治局要求罗贵波同志参加我们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对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多提出意见，多帮助我们。但是，他太谨慎了，太谦虚了。我希望你们交给他多提意见这个任务。毛主席，你们是否同意？”

毛泽东说：

“我们同意，但是他向你们所提的意见或建议仅供你们参考，你们认为他提得对，就采纳，不对，就不采纳，由你们自己决定。”

胡志明显然是被毛泽东的真诚感染了，他站起身来动情地说：

“我和越南同志们，从你们的行动中感受到对我们帮助的真心实意。”

吃饭的时间到了，周恩来因有其它外事活动提前告退。毛泽东和胡志明、刘少奇、朱德、罗贵波一起走向餐厅。餐厅与会客室只用一道屏风隔着，一挑帘就进去了。这间餐厅并不大，只摆着一张餐桌。胡志明看到端上来的一盘辣椒，对毛泽东说：

“听贵波同志介绍，毛主席非常爱吃辣椒，是不是没有辣椒就不能下饭？”

他见毛泽东笑容满面，就接着说：

“我们越南人也喜欢吃辣椒，我们那里的辣椒跟中国的辣椒不大一样，长得像小树，有一两米高，小小的辣椒朝天长着，吃起来可真辣。”

“喜欢吃辣椒的不是我一个人，少奇同志和我是湖南人，湖南人喜欢吃辣椒。朱总司令是四川人，四川人吃辣椒也很厉害。”毛泽东说着，指一指罗贵波：“他是江西人，也是吃辣椒的。离你们近的云南人也爱吃辣椒。可我们这些吃辣椒的人，吃法就各具特色，做法也就有别了。”

胡志明说：

“我们是把朝天椒放在鱼露（越南人泡制的一种酱油——笔者注）里，再加上一些柠檬，配在一起吃。”

毛泽东说：

“我们吃辣椒成习惯，可不是因为乡土习俗养成的习惯，那是在1932年到1934年，中央苏区遭受国民党经济封锁，根本吃不上盐。为了搞到一点食盐，我们不少同志花了很大代价，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那时候可真艰苦啊！没有盐，下饭才难哩！我和大家一样用辣椒代替盐，用没有盐的辣椒下饭，可算是好菜呀！”

饭后送走胡志明，毛泽东把罗贵波留下，继续谈话。他说：

“胡志明同志要你参加他们政治局会议时，对他们各方面的工作多提意见，多给以帮助。你可以提，但是不论是提意见或提建议，都要说明仅供他们参考。你要注意调查研究，不能主观，要从越南的实际出发，结合中国的经验，不可生搬硬套。提意见或提建议都要慎重，要考虑好，要准备好，要认真负责。帮助人家就要帮助好，不强加于人。要十分注意尊重胡志明同志和尊重越南劳动党中央的领导。不能有钦差大臣的架子，尤其不能有大国主义。你持谨慎态度是对的。”

刘少奇补充说：

“你要注意，不要超越你的工作任务范围，重要问题事前或事后要请示报告毛主席，报告中央。”

毛泽东接着问罗贵波：

“长征前你在中央苏区，应该知道李德此人吧？”

“是的，我知道李德。”

罗贵波回答。毛泽东说：

“李德是德国人，苏联十月革命时期他在苏联红军中立过战功，颇受斯大林赏识，把他派到中国来，到中央苏区做军事顾问。不久，他掌握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指挥权，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做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而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到处吓唬人，包办代替，盛气凌人，指手画脚，强加于人，像个钦差大臣，神气十足。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实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你在越南工作，一定要切记李德在中国的教训。要向顾问团的全体同志讲这个教训，让大家记住这个深刻的教训。告诉顾问们，帮助人家不能照搬我们原有的办法，生搬硬套。帮助人家要帮助得好，只凭主观愿望是行不通的，要根据实际情况才能帮助好。**要有老实谨慎的态度，少讲我们是怎样‘过五关斩六将’，多介绍我们是怎样‘走麦城’的，我们也有过失败。在帮助人家的过程中，要经常检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每天一次，3天一次，最少每周一次，来检讨我们哪些做得对，哪些不对。**”

12月20日，华北局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转报了河北省委关于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意见。

此前，河北省委在12月14日向华北局报告了关于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意见，报告中写道：“刘青山、张子善凭借职权，盗窃国家财产，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私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河北省人民政府在12 月16日也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的材料，报告给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华北局的意见是：“为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2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

华北局在报告中还附上了河北省委征求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青山、张子善量刑的意见：地委8名委员一致同意处死刑。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干部中，对刘青山同意判死刑的有535人，同意判死缓的有8人，同意判无期的有3人，同意判有期的有6人；对张子善同意判死刑的有536人，同意判死缓的有7人，同意判无期的有3人，同意判有期的有6人。

毛泽东为慎重起见，请党外人士传阅并听取他们对刘青山、张子善量刑的意见。

12月2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继北京市委之后，在大城市中，**武汉市委已经发动了一个大张旗鼓的、雷厉风行的、吸引广大群众参加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他们做得很勇敢，公开揭露和惩处了一批敢于压制群众批评的担负重要职位的干部。**他们所定的方针、步骤和办法都很适当。中央希望天津、济南、青岛、上海、南京、杭州、南昌、广州、长沙、重庆、成都、昆明、西安、太原及其他大城市，一律发动这样一个斗争；希望这些大城市的市委都有武汉市委这样勇敢和有步骤有办法；都向中央写一个有分析有内容的报告。请将武汉市委的报告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中央 12月22日

接着，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1. 中央批准中央直属总党委于1951年12月20日向中央所作的报告，请总党委即按这个报告所定计划施行。

二、将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作参考；并**请考虑在各大行政区一级直属党组织和各省市区一级直属党组织亦组织总党委，以期统一这些党组织的领导，定期召开各部门和各大单位的代表大会，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健全党的生活，提高工作效率，团结党外人员，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克服资产阶级对于党的侵蚀作用。

　　 中央 1951年12月22日

12月23日，江青从武汉回到北京，她又病倒了。

据李家骥回忆说：“江青这个时期体质弱，有多种疾病，加之工作条件不好，又累，她是硬挺的。犯病时常常痛得浑身出汗，我劝她去医院看病或休息几天，她都拒绝了，而且告诉我，不能对别人说有病的事，怕产生影响。她还让我别担心，说这是慢性病，有药，服后会缓解的。据我所知，她一直是带病坚持工作的，所以回到北京后就病倒了。”

江青带病整理完在湖北搞土改工作的总结材料，上报中直机关和毛泽东。毛泽东听了汇报，看了材料，表扬他们干得好。

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制止动员群众向中央写致敬信、发贺电和送礼的指示》。

此前，“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在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中说：“今年以来，我们发现有一部分致敬信是由地方党、政机关动员群众写的”，“从7月开始，又有大批群众拍发的致敬电报”。“群众对党与革命的热情，应由群众自然而然地表露出来，决不应由党、政机关普遍动员去写信发电，表示庆祝。这样做，必然引起群众不满。”“今年4月主席在批发我们的工作报告中，曾经指示说：‘组织群众成批地写致敬信是不好的，以后不要这样做。’但这一指示至今尚未引起地方上的注意，而且情形更为发展。”“关于赠送礼品”，“不仅耗费巨大，影响也不好。”

毛泽东在《关于制止动员群众向中央写致敬信、发贺电和送礼的指示》中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中央邮电部党组：

兹将中央办公厅秘书室1951年10月下旬向毛主席所作的报告，发给你们阅看。在这个报告中所说关于**某些党、政机关动员群众写致敬信、发祝贺电，以及机关团体和群众给中央送锦旗、送礼品的事情，不但是一种浪费，而且是一种政治错误**。报告上所举的件数，仅是寄给毛主席的，若加上中央人民政府及中央其他同志所收到的，数字尚不止此。在秘书室作这个报告以后，又**收到湖南的长沙、常德、会同、沅江、耒阳、宁乡和川东的忠县、辽西的阜新寄来一字不写的白纸信共94件。有的群众来信说：写信是“接奉上令”，是“奉农会指示”。各地的邮电部门在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的统一布置下，从今年“五一”以来，采取发广告、作讲演、挨户劝说、下乡宣传等方式动员群众拍庆贺电报。**有的群众反映说：“经费困难，请免了吧!”有的群众认为“这是变相的敛节礼”。这样动员群众来写信拍电，不仅非常勉强，而且已经发生了一些强迫命令的情形。送礼物是不必要也不应该的，动不动制送锦旗，更是铺张浪费。各地党委对于这些现象应当认真纠正，必须养成朴素节省的风气，必须制止任何一种浪费民力、物力的事情。**今后任何党、政机关及群众团体均不许动员群众写信发电。这种事情一定要出于群众的自动与自愿。机关团体一概不许送礼。**非有隆重大事，不得送锦旗。过节不许送食品。对于要送礼物的群众，应作适当解释，劝其不这样做。**鉴于这一问题虽然中央曾经提出过，但未引起各级党委注意，特再电达，望即经过党组用适当方法通知当地机关团体，切实遵行**。

**此报应在党内刊物上登载。**

中共中央 1951年12月25日

12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停止整党学习全力转入“三反”运动的指示》：

各中央局：

据新华社西南总分社12月22日内部情况报道说：“西南区已停止了原订计划的整党学习，全力转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均已开过党代表会议。川东、川西、川北、川南、西康及重庆市已作了一般号召。其他各地也将进入动员阶段。西南贪污浪费现象相当严重，据近来初步发现的材料：**工业部约800亿元，其中萧子言和陈松柏两大贪污案即达200亿元。**财政部初步检查为300亿元，其中以粮食局系统最严重。**川西粮食局贪污分子勾结奸商，将粮食支付书偷去给奸商到各库取粮，损失公粮10万斤**。川北财政厅金库被贪污分子盗走一箱人民币，贪污分子还留一字条说：‘我生活困难，暂先支借一下’。建筑中的贪污浪费最普遍，据初步了解已达数百亿元。交通系统贪污浪费约500亿元”等语。**中央认为西南局停止原订整党学习计划，全力转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是完全正确的，请各中央局也照这样做。**

　 中央 12月26日

12月27日，李家骥跟着毛泽东去散步，毛泽东问他：

“这次参加土改有什么感想？”

李家骥说：

“很受教育。”

“哪方面受教育最深刻？”

“关于阶级斗争。”

毛泽东点点头，说：

“土改，在农村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必然触及各个阶层的利益，他们都必然站出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一旦利益对立，就会产生矛盾，甚至是尖锐的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

毛泽东还特别问江青表现怎么样？李家骥便如实地做了汇报。

原来在9月25日，江青和土改工作团就到了武汉，接待人员将他们安排在中南局交际处。这是一所刚盖好的房子，条件还算可以。江青正想去拜访一些老同志，没想到邓子恢等人马上就来看她了。她笑着对邓子恢说：

“邓老，我应该去看你，还劳你大驾到我这里来。”

此后，在延安时期和江青熟识的老同志络绎不绝地都来看望她，直到晚上10点钟以后还有人来，工作人员都感到有点儿应接不暇了。没办法，江青只好向湖北省委负责人李先念求援。第二天，李先念派人接江青和卫士们到他的大楼里去办公。省委驻地的安全警卫非常严格，江青这才消停了下来。

9月29日，土改领导部门安排江青的工作地点是武昌县新屋乡。这是一个处于武汉市南部的一个郊区乡。江青想早点介入工作，进入角色。李先念劝她说，别着急，省里安排准备过了国庆节再进点。

此时，中南局来人说，要接江青去中南局过国庆节。李先念为了让江青好好休息一下，就说：

“不麻烦你们了，省里已经安排好了，就让江青同志在这里过节吧。”

10月3日，江青已经看完了不少有关材料，与李家骥等3人又听取了武昌县委办公室主任和新屋乡负责人关于当地情况的汇报：新屋乡有多少湾多少人口，其中男女各占多少；有多少土地，现在占有情况；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有多少等等。

这时候，省里进驻这个乡的土改工作组的人员尚未确定，说是到4日才能定下来。后来确定的干部有4人，他们是左光真、任玉磊、夏炎，还有一个姓韩的。武昌县也抽了几个人参加工作组。这样，整个工作组共十几个人，主要负责人由省里的干部担任，江青是负责人之一。

10月11日，李家骥和李德华、贾士兴跟着江青正式进驻新屋乡姚家湾。这里是全乡条件比较好的一个大湾，又处于重要的地理位置。

武汉的天气和北京大不相同，在北京，早晚已经明显地感觉到凉凉的秋意，而以火炉著称于世的武汉，此时还很热。江青和卫士们穿着单衣单裤，农民们却仍然穿着短裤、赤脚光膀子。江青和卫士们在农村跑上一天，汗流浃背，全身泥土，这才领略到了武汉“秋老虎”的厉害。就在进湾这第一天晚上，李家骥、李德华、贾士兴蓦然间听到了枪声，立刻紧张起来，他们害怕江青不安全。第二天，湾里谣言四起，纷纷传言：“现在搞土改，国民党回来还得把土地还给主人”。整个村子人心惶惶。还有人叫号：“谁敢向工作组反映情况，就打烂他的狗头。”江青闻之，也感到形势严峻。她对李家骥等人说：

“我们必须深入下去，摸清情况，才能分清敌我，明白团结谁，依靠谁，打击谁。否则两眼一抹黑，不知如何动作，不仅被动，而且必定犯错误。”

她决定，不管好人坏人，赞成土改还是反对土改的，都要见，都要听，全面掌握情况。

此后，江青等用了3天时间，召开了不同类型的会议，详细摸底：一类是中农会、贫农会、雇农会；二类是富农、地主会。他们向各类人员讲清形势，交待政策。对第一类人重点是让他们认识到土改是推翻封建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动员他们积极参加土改，自己站起来，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对第二类人，是让他们认清形势，顺应历史潮流，接受党的土改政策，老老实实，接受改造，配合工作组工作，脱胎换骨，自食其力，重新做人。江青还敲山震虎地说：

“对那些反对共产党，与政府对立，不与工作组配合，四处散布谣言的人，我们绝不会客气。”

她和工作组还特别重视做好干部工作，相信和依靠当地干部和党的组织。为此，工作组多次召开乡干部会，让土改队员也参加。江青在会上说：

“用什么态度参加土改，是对党员干部的重要考验。有3种态度，一是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积极地投身到土改中，一心一意把土改工作搞好，这是最好的，这些党员干部占多数，我们搞土改重点靠这些同志在第一线组织领导；二是虽然不反对土改，但对党的政策学习不够，理解不深，积极性不高，似乎可搞可不搞，他们是半心半意搞土改，这种人也不少，要提醒他们，不要落伍，赶快跟上来，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这场伟大斗争中的作用；三是出身不好，家里有剥削行为，甚至是富农或地主，或者有这样的亲属，在我们党内肯定有这种人，我们乡里的有没有我不知道，这种人思想有矛盾，有斗争，甚至很激烈，有的人可能在大是大非面前迷失方向，这种情况不多，但必须提个醒，请他们千万注意别倒向敌人一边。”

江青的讲话对这个乡的党员干部震动很大。会后她又与重点党员干部和工作队员个别谈话。这些工作起到很大作用，党员干部的思想很快统一到党的政策上来，大家都表示一定在工作组指导下，积极参加土改，把新屋乡的土改工作搞好。

江青常常工作到深夜，和党员干部一起分析形势，研究下一步工作。她还经常和李家骥3人讨论问题。有一次，李德华向她汇报说：

“现在有坏人挡道，阻碍我们工作开展。”

江青问道：

“哪几个挡道？你说说看。”

李家骥说：

“一个是恶霸地主黄麻子，一个是乡长。他们俩影响着全局。我们必须把这两个人搬掉。”

李家骥说的黄麻子叫黄金龙，此人人高马大，有钱有势，无恶不作，人们都不敢惹他。乡长为了个人利益，也不敢得罪他，还和他勾勾搭搭，一起干坏事。江青为了搬掉这两个绊脚石，带着李家骥3人到县公安局去求援。县公安局负责人陈光义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江青提出打掉这两个坏人的想法，陈光义当即表示全力支持工作组的工作。

后来，江青建议当地党组织召开批斗黄金龙的大会，并请陈光义派人参加。会议由土改积极分子主持，五六个受害人用血的事实揭露了黄金龙的罪行。台上血泪控诉，台下口号震天。在这群情激愤中，江青发表了讲话，她用简短的语言阐明这次土改的伟大意义，痛斥黄金龙的罪行，最后号召广大贫苦农民起来与封建地主势力斗争，真正翻身做主人。

批斗会结束后，一些地主、富农、一贯道、土匪纷纷主动向工作组交待问题。

新屋乡有40多个湾，很分散，远的湾离江青住的地方有二三十里路，为了不把时间浪费在路上，他们到哪湾工作都吃住在农民家里，从不搞特殊化。李家骥考虑到江青身体不好，这个乡的情况复杂，阶级斗争激烈，为她的安全负责，劝她别下去了，让她在乡里或在姚家湾听汇报。江青很不高兴，她说：

“我们到这里是工作来了，不是享受来了，要工作肯定会遇到困难，要吃辛苦，甚至牺牲。你们的心意我明白，但是我不能那样做，只有深入到群众中，和农民同吃同住，打成一片，才能交上朋友，才能心连心，才能和我们说真话，一起斗地主恶霸，把土改工作开展起来。至于我个人身体能否坚持，我会尽力克服困难，我个人安全也不要考虑太多，和农民群众交上了朋友，他们也会保护我们的。”

李家骥觉得江青说得有道理，又是领导，只好按她的意见办。李家骥等和江青到几个湾去抓落实，进一步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搞清各湾土地、人口以及占有的具体情况。甚至把这里一头牛与多少粮食交换等具体的问题都搞清楚了。每个湾的人员情况，包括成份、历史、表现，特别是一些情况复杂的人，搞得一清二楚，而且专门安排人监视他们，掌握他们的动向。江青高兴地说：

“来的时候两眼一抹黑，现在心明眼亮，心里踏实，对以后工作充满信心了。”

江青脸上常常笑容满面，她那轻盈的身影，得体的一举一动，带有山东味的普通话，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并致以亲切的问候。

进入11月份，按工作计划应该进行分田了。工作组和乡、湾干部、贫下中积极分子在一起进一步核清各湾土地和人口及占有情况，在此基础上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及本地实际情况开始作分配土地的计划。做计划必须准确，为了准确，还要一一丈量，这些工作很具体，很麻烦，又必须做好。江青和地方干部有条不紊地、一步一步地、一个湾一个湾地往前推进。

11月间，在江青和新屋乡干部积极配合下，县里一举破获了一个反革命组织——“反共救国军”。这是一个在全县范围内活动的反革命组织，土改中出现一些反常现象或多或少都与他们有联系。黄金龙在被批斗后，表面上老实，但在暗中仍然制造谣言，参与“反共救国军”的反革命活动。工作组根据他的表现，逐级上报请示，把他给枪毙了。

江青和工作组的其他成员，还对党员干部进行审查，培养和发现新的积极分子，酝酿建立新的乡、湾两级领导班子。积极分子曹洪宽和一名妇女在工作中表现非常好，被吸收到乡级领导班子中，还有不少积极分子入了党，有的还当了省市级劳动模范。

12月17日，江青结束了在新屋乡的土改工作，进行工作小结并向省委汇报情况。李先念对江青的工作很满意，他说：

“江青同志，你是主席身边的人，常得到主席帮助指导，与我们基层不一样。大家反映你江青同志水平高，为各地做出了榜样。”

李家骥3个人议论起这段时间的工作，也都认为江青是有能力的，从内心佩服。李德华说：

“江青不简单，有独立工作能力，有驾驭全局的能力。”

李家骥说：

“江青聪明，干啥像啥，工作中就像演戏一样，一言一行，都很得体。”

毛泽东听完了李家骥的详细汇报，高兴地说：

“好，你们做得好。”

再说12月28日，毛泽东就陈毅等人在12月25日和26日电报中汇报的华东军区进行“三反”的情况，复电陈毅等人，他写道：

陈毅同志，并告各大军区，志愿军及各中央局：

12月25日长电及12月26日短电，均已阅悉，很好，望即照此执行。我们的方针是必须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和整编工作结合起来，并力争于3月底完成第一期整编。抓得紧，并配合得好，是可以完成的。但**如因“三反”斗争妨碍了整编工作，则宁可稍微推迟若干天（例如半个月）去完成整编，决不可让被整编的人员带着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精神去转业和进学校，**这一点，陈毅同志说得很好。华北西北两大军区，华南军区和广西军区，均有报告照这样做。李达、王新亭二同志昨来北京面报，西南也是这样做的。**请中南军区务必注意此点，务必将整编和“三反”结合去做，二者不可缺一。如果下级军区有不清楚者，务必明确地坚决地指示之，至要至要。**

毛泽东 12月28日

12月29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问题。毛泽东神色凝重，目光又一次盯在了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材料上。他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薄一波、彭真等人说道：

“对那些有贪污腐败行为的人，还应区别轻重大小，经过深入的调查，实事求是的分别处理。但是，**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大贪污犯，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饶恕的。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只有坚决地、毫不手软地这样做，才能使我们的党和人民革命队伍坚强和巩固起来，才有可能不再受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

会议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社送审的“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的新闻稿时，郑重批示：

“应于30日见报。”

后来在公审大会召开前，曾经担任过冀中区党委书记的天津市委书记黄敬，找到薄一波说：

“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

薄一波说：

“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

黄敬坚持要薄一波向毛泽东反映一下。薄一波只好将黄敬的意见如实地转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回答说：

“**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当懂得这个道理。”

12月30日下午，毛泽东为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一周通报，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告各中央局：

西南军区党委会12月27日所发一周通报，很好，很正确，很有力量，在“三反”斗争中表现了革命军人的战斗姿态，毫无畏首畏尾拖泥带水模样，读之使人十分高兴。请你们于收到后即刻仿照办理，并即刻转发给各级军区直至团级，一概仿照办理。**各级领导同志都要学贺龙同志那样亲自“上前线”，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并且务必于1952年1月上半月取得显著成绩，下半月取得更大的成绩。**各大军区都应发关于“三反”斗争的每周简报（1月份应发4次简报），互相比赛战斗成绩，由中央加以评判。此电和西南军区的一周简报均请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使广大干部能够看到，越快越好。**

　　 毛泽东 1951年12月30日下午4时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中央、大区、省市3级一切工作部门必须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的指示，他写道：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并转第二第三两军区；志愿军：

一、中央一级大行政区一级和省市一级共3级的一切工作部门，例如党的宣传部、组织部，政府的财政部（厅或局）、公安部（厅或局），军区的司令部、后勤部，再加各民众团体，除每一民众团体只要总报告不要各部门的报告以外，**所有一切工作部门，均应分别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政府中凡与党外人士在领导工作上合作的部门，用党组名义作报告**。在1952年的头4个月内，须每月作一次报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人有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须推迟时间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这些报告各级党委应负督促之责。

二、其余照12月4日20时电执行不变。

　　 中央 1951年12月30日

12月31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三反”运动的情况。他特别谈到不法资本家经常用给回扣等行贿手法收买拉拢国家工作人员。毛泽东说：

“这件事不仅要在机关检查，而且应在商人中进行工作。**过去土地改革中，我们是保护工商业的，现在应该有区别，对于不法商人要斗争。**”

薄一波后来回忆说：“看来，毛主席正在考虑这件事（即“五反”运动——笔者注）。”

12月31日晚8时，毛泽东因中南军区迟迟不送“三反”报告很不满意，便提笔在华东军区党委关于结合“三反”进行整编给所属装甲兵党委的电报上，写了一个给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谭政并告各大军区的批语，他写道：

“**就全军情况来看，最落后的是中南军区，至今没有一个彻底发动‘三反’斗争的号召文件**。相反的被整编一事所吸引，生怕发动这个斗争妨碍整编。”“务望中南军区和各大军区取一致步骤，务必‘在1月份全军整整齐齐进入三反斗争’。”

毛泽东写完批语后，才看到了刚刚送来的中南军区的两个材料，一个是军区党委12月29日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给所属军内各级党委的指示，内中提出必须以开展“三反”斗争作为当前中心工作；一个是谭政12月30日15时关于将整编和“三反”结合进行给军委主席的电报。他又开始高兴了，立即指示将批评中南军区的电报停发，并给谭政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谭政同志：

此件及12月30日15时电均阅悉。此件很好，你们对整编与“三反”的矛盾已大体上解决了，你们就有了主动。但有两点不妥，我已批在文内，请考虑改正。此外，请注意：

1. 对各军区以电话电报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

二、亲手抓紧直属部门，3天一会，5天一报，照西南的办法，做出成绩，取得经验，通报各处。 盼望你们的捷报。

毛泽东 1月1日2时

此时，已经是1952年1月1日凌晨2时了，毛泽东依然毫无倦意，又在信封上写了“尚昆派人飞送”这几个字。他想了一下，又把值班秘书罗光禄叫来，说道：

“尚昆同志睡了，你直接去办。要谭政同志亲收，要取回他的收条。”

接着，毛泽东又致电林彪，并附上谭政的报告。他在电文中写道：

林彪同志：

接到谭政此电及另一文件后，已将批评中南的电报停发，因为谭政的思想已扭转过来了。谭写的另一文件是基本正确的，有两点不妥处，我已批在文内，于今夜派专人送给谭政，并告诉他一些做法。你病如何，望好好养护。

毛泽东 1月1日上午3时

尔后，毛泽东一直工作到7时半，从12月31日上午11时算起，已经连续工作20个小时了，在卫士们的不断催促下，他这才放下文件，上床休息。

欲知毛泽东如何继续领导“三反”运动？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2月29日的书记处扩大会议上说：“**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大贪污犯，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饶恕的。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只有坚决地、毫不手软地这样做，才能使我们的党和人民革命队伍坚强和巩固起来，才有可能不再受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

他还对薄一波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真乃金玉良言也！

**第33章**

**“尽可能查出一切大中小贪污犯，既不嫌少也不怕多，有多少就**

**应查出多少**。**特别注意查出大贪污犯，不达目的，不应停止。”**

话说1952年1月1日上午8时，罗光禄带着毛泽东给谭政的亲笔信，乘专机直飞汉口。

1月1日下午5时半，毛泽东邀请张澜、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马叙伦、章伯钧、马寅初、郭沫若、傅作义、张奚若、彭泽民、邵力子、茅以升、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杨尚昆、齐燕铭到颐年堂聚会。

6时半，毛泽东和张澜等被邀请者又一起赶到怀仁堂，参加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新年团拜会。毛泽东在团拜会上发表了简短的元旦祝词，他说：

祝我们全体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人民志愿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全国人民，在各个工作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抗美援朝战线上的胜利！祝我们在国防战线上的胜利！祝我们在土地改革战线上的胜利！祝我们在镇压反革命战线上的胜利！祝我们在经济和财政战线上的胜利！祝我们在文化和教育战线上的胜利！祝我们在社会各界首先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战线上的胜利！

**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同志们，我们在上述一切战线上，在1951年，都已取得了胜利，有许多是极其伟大的胜利。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所有这些工作，在1952年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团拜会结束后，还有一场晚会。演出开始了，灯光渐渐地暗了下来，刚刚入场的华罗庚跟随服务员正在寻找座位，突然听到有人喊道：

“华罗庚，到这里来坐。”

华罗庚顺着声音望去，隐约看见一个人正在向他招手，便走了过去，定睛一看，叫他的人竟然是毛泽东。毛泽东望着发愣的华罗庚微笑着说：

“华先生，你好啊！”

华罗庚赶紧说：

“好，主席好！我准备了一篇稿子，来得晚了。”

毛泽东让华罗庚在自己旁边的空位上坐下来，一边看演出，一边和他聊天。坐在旁边的梁思成也不时插上几句话。毛泽东聊到高兴处，伸出手拍着华罗庚的肩膀说：

“华罗庚先生，你也是苦出身嘛，希望你能为新中国多培养些好学生。”

华罗庚十分激动，连连说：

“主席，我一定努力工作，一定努力工作，决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省常州金坛县一个贫民家庭，读完初中，他便进入职业学校学习，由于交不起学费，读了一年半只好辍学，一边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一边自学数学，1930年写出了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刊登在上海《科学》杂志上，轰动了中国数学界。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请华罗庚到清华大学工作和深造；后来，华罗庚又到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和深造。1938年，他回国后被聘为昆明西南联大教授，写下了《堆垒素数论》。1946年，华罗庚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为客籍教授、伊利诺伊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华罗庚毅然归国，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教授。

1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向中央呈报了《关于各种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调整与建设计划的报告》。聂荣臻提出的计划是：将全国工程部队增至21个师，共21万人；另以19个师，计19万人，组成屯垦部队。

1月4日，毛泽东在聂荣臻《关于各种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调整与建设计划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这个计划很好。按照铁道兵团的经验，**以40万军队转为工程军和屯垦军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在经济上是很合算而大有利的**，**国家又立即增加40万工业工人和使用机器的农业工人。**应即刻筹办，并请苏联帮助，中财委订购工程和农业的机器，开办工程学校和农业技术学校。

毛泽东 1月4日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他写道：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

**请你们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10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在干部会上应指名批评落后的，单位及其领导人，指名奖励做得好的单位及其领导人，宣布撤职的名单及理由。中央直属总党委于12月31日下午召开党政军团群部长至处长级的数百人的扩大党委会，由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宣布中央决定，限期1月1日至1月10日，各院委、部、会、院、署、行、局、处及其下面的一切单位，务须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坦白检举，于1月11日送来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并在会上指名宣布几个部是做得很好的，几个部是中等的，很多部是落后的，并指出部长姓名。……（此为发布者删节——笔者注）这样一来，全场振奋。当日回去，连夜开会。元旦整日开会，很多部长、副部长到一下团拜会就回去，戏也不看了。至1月3日差不多所有单位都开了坦白检举的群众会议。纷纷送来报告。**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现规定每10天开一次，除重病不得请假**。估计到1月底，中央一级可以基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经验，供你们参考。此外，中央已指定薄一波同志（他是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用电话和各大区负责同志联络，在目前“三反”紧张时期，每3天至5天通话一次，检查各区“三反”进度。中央此电，连同薄一波同志给毛主席的信及中央财政部党组第4号报告均可在党刊上发表。

中央 1952年1月4日

《指示》中所说薄一波给毛泽东的信，是指他1952年1月3日为报送财政部党组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写给毛泽东的信。他在信中提出了4个问题：一、有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私商勾结，使国家受损失，私商肥起来。二、化大公为小公，挪用巨款，已成为有机关生产的部门的通病。三、财经机关最可怕的还是掌握审批权限的部门发生官僚主义，一不小心即造成巨大损失。四、中财委发动群众的主要一条经验是首长彻底作自我检讨。

薄一波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代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

1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北京市委《关于“三反”运动开展情况和继续开展这一运动的意见的报告》作了一个批示。

北京市委在报告中说，目前“三反”运动已进入高潮，现在斗争的内容和规模比运动开始时所想象的要复杂和大得多。在公务人员方面，有各种侵吞、盗窃、骗取公家财物和贪占公家便宜的行为；有私设工厂、商店，假公济私，利用公家各种有利条件牟取暴利的行为；有利用职权地位敲诈勒索的行为；有各种接受贿赂，勾结包庇商人盗骗国家财物的行为；有各种浪费和违反制度、化大公为小公等行为。在工商界方面，主要是贿买和勾通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和对公家高卖低买，而最普遍的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勾引工作人员贪污。

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各大军区，并告志愿军：

一、批准北京市委1952年1月5日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这个报告是正确的。

二、将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和地委，在各大中小城市中一律仿照办理，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3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3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此种部署应当是内部（各机关、学校、部队和公营企业）和外部（私人工商界）同时进行，领导机关和法庭密切配合，报纸和广播则作大力宣传，并注意组织机密消息的内部通报。在大城市，并可专为此事出版内部报刊。

三、在这个斗争中，**对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应酌予照顾，注意组织“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

四、本指示及北京市委的报告可在党刊上发表。

中央 1952年1月5日

接着，毛泽东给薄一波、彭真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薄一波、彭真同志阅。

请你们对贪污浪费轻重大小如何处理问题加以研究，于10天内将惩治浪费条例起草出来，并将惩治贪污条例加以修改，于1月16日交我为盼。

　　 毛泽东 1月5日

1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根据抗美援朝战争的形势，批准了周恩来报请批复的《军事整编计划》。

到1952年底，全军共缩减3个兵团、19个军、73个师，精简219.9万余人；加强了海军、空军、特种兵和院校。全军总人数降为406.4万余人。军费开支大幅下降。

1月9日，毛泽东接到了山西大学历史系罗元贞教授在元旦寄来的贺年信。罗元贞在信中提出了他对毛泽东的《七律·长征》诗的看法。他认为，第3句“五岭逶迤腾细浪”中已出现一个“浪”字，而在第5句“金沙浪拍悬崖暖”中又出现一个“浪”字，显得重复，且使“悬崖”的“悬”字缺乏诗意，不如把后一个“浪”字改为“水”、把“悬”字改为“云”好。

毛泽东觉得罗元贞的意见提得很好，立即把他原诗里的两个字改了过来，又给罗元贞教授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元贞先生：

1月1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此复。

顺颂 教祺！

毛泽东 1月9日

1月14日，毛泽东在遵义军分区关于“三反”运动的综合报告上批道：

“遵义分区这个报告比刚才转发的集宁分区的报告接近事实得多。**一个分区，一个军，一个小市，一个县，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这是决然无疑的。凡说那里只有浪费而无贪污，或贪污甚少者，必不可靠，千万不要相信。**在一阵风停止浪费之后，必须立即穷追贪污。**不能自己解决贪污问题者，上级应即派遣检查组下去督追，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

1月15日晚8时半，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周恩来、朱德、陈云、薄一波、杨尚昆、杨立三、安子文、萧华、彭真参加了会议。会议听取了薄一波关于最近“三反”运动情况的汇报；讨论了“三反”运动下一阶段的工作。

1月18日，毛泽东为转发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关于华东部队“三反”分3个阶段进行和建议把士兵代表会议定为经常制度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陈毅同志，并告各大军区、志愿军和各中央局负责同志：

1月16日报告收到。

一、“三反”斗争应当照你所说的3个阶段去做，但请注意在第2 阶段中要集中精力，**尽可能查出一切大中小贪污犯，既不嫌少也不怕多，有多少就应查出多少**。**特别注意查出大贪污犯，不达目的，不应停止。**2月10日转入整编，仍须以专门机构担负继续穷追大贪污案和处理未了问题。此点极为重要，请各大军区一齐注意。

二、我完全同意把士兵代表会议规定为经常制度，每月或每两月开会一次，每次开一天至两天，做两个工作：通过领导者的检讨报告和通过财经报告。这个建议极好，可以在“三反”后保持群众民主斗争的锐气。即请你和唐亮同志起草几条简单的具体办法电告中央考虑决定，发布施行。各大军区和志愿军党委对此有何意见，望即商量电告。

三、将陈毅同志这个报告发给各大军区和志愿军同志们参考。

毛泽东 1月18日

1月18日晚8时半，毛泽东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到会的有周恩来、朱德、陈云、薄一波、彭真、黄敬、刘澜涛。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天津的“三反”问题。这次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2时才结束。

1月19日，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召开了一个有1000余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宣布要集中力量打老虎（贪污1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叫“大老虎”，贪污1亿元以下1千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此时的1万元旧币折合后来的人民币1元）。

1月22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宣传文教部门应无例外地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

兹将西北局1月11日所发西北宣传文化教育部门“三反”运动情况的报告，转发你们参考，并就宣传文化教育部门“三反”运动中，应注意之点，指出如下：

一、西北局指出目前一切宣教部门均应无例外地进行“三反”运动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事实证明，无论党的宣传部，政府的教育、文化、卫生、出版、新闻部门，教育系统的学校行政人员和干部学校的学员，文化系统的电影厂、电影公司、影剧院、放影队、文工团、旧剧团、图书文物机关、美术机关、对外联络机关，卫生系统的药厂、卫生材料厂、医药公司、医院、卫生院、医学院校，出版系统的印刷厂、书店、出版社，新闻系统的报社、广播台，通讯社，以及科学机关、科学团体、文艺团体、中苏友协分会、抗美援朝分会等，其中均有严重的贪污腐化问题，西北局电中所说还只是很小一部分。尤其有大批经费和私商、外商有关的方面，例如修建、企业管理、医药器材经营、电气照相器材经营、广播印刷器材经营、机关生产等方面，均可能有1亿元以上的大贪污分子（“大老虎”）。 至于浪费与官僚主义，更不消说。

二、在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应依学校情况作不同处置。在干部学校中，学生是离职学习和带职学习的干部，应与学校行政工作人员同样进行坦白检举。**在普通学校中，对中学和中学以下的学生一般不要进行坦白检举，以免发生偏向，但应向他们进行适当的“三反”的教育，他们如自己犯过贪污（如贪污捐款和团费、会费，偷窃学校公物等）或知道家长有贪污行贿等行为亦应坦白或向政府检举，但不可要求造成群众运动。**各级学校的行政工作人员，均应进行坦白检举运动，各级学校的教师和高等学校的学生均应参加“三反”运动的学习，其有贪污浪费行为者亦应坦白。但**学校校长、教师何者应当众检讨，何者应当着全体学生检讨，何者应由学生和工作人员当场质询或斗争，则应由当地党委事先加以研究和控制。一般地说，使这些人物在群众斗争中洗洗澡，受受自我批评的锻炼，拿掉架子，清醒谦虚过来，对他们自己或对今后工作都是有利的，但应看各人缺点错误或罪行大小如何以及各人政治态度如何给以不同的帮助，除少数过失很大、态度恶劣者外，原则上都应帮助他们“过关”并予以适当的照顾。**

三、“三反”运动是目前最实际的思想改造，故教育界、文艺界的思想改造学习未开始者应由“三反”开始，已开始者亦应转入“三反”，**在“三反”斗争中解决资产阶级思想问题，**然后再回到原定计划。在其他宣传文化教育部门中，在“三反”的实际斗争告一段落后，亦应认真地有系统地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作一检讨。

四、本电及西北局宣传部的报告可在党刊上发表。

　 　 中央 1月22日

1月23日，毛泽东关于“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大老虎”的批示：

中央和军委各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 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

凡属大批的用钱管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哪一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贪污犯（“大老虎”）。**有些人以为党的机关，宣传和文化教育机关，民众团体，用钱不多，必无“大老虎”，这是不正确的。**早几天还以为中央文教机关一个“老虎”也没有，经过最近两天的寻找研究，就发现至少可以捉到15个贪污1亿元以上的“大老虎”。因此，请你们注意，**在每一部门、每一地区“三反”斗争激烈展开之后，就要将同志们的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不要满足于已得成绩。**在这方面，要根据情况，定出估计数字，交给各部门为完成任务而奋斗。在斗争中还要根据情况的发展，追加新任务。例如中央一级，在1月18日以前查出的1万名贪污分子（其中有很多人款数甚少，情节甚轻，迹近贪污，实际不能叫作贪污）中，只有18名1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至1月18日，认为可以再查出50名。最近两天又有增加。估计将来还有增加。这一经验务请你们注意。**要向同志们指出：如果他们不愿意包庇大贪污犯，以致将来查出来（总有一天会查出来）自己要受指责和处分，就应组织一切可用的力量为搜尽一切暗藏的大贪污犯而奋斗。**下面是空军党委1月22日关于布置搜寻大贪污犯的报告，可供你们参考。

毛泽东 1月23日

空军党委在报告中布置的搜寻大贪污犯的办法是：一、重新调配组织力量，一面从问题大体上弄清楚的单位调一部分干部去增援问题较多的部门，另一方面各部门内部亦进行调整。二、要进行“搜山”，在普查的基础上进行抽查，发现线索然后跟踪深入。在普查中，后勤部着重注意以下4个方面：1、查加工订货的数量、质量和交货时间。2、查订单与货物的规格数目是否相符。3、查银行存账，4、与商人对账，从外面寻找线索，以便内外夹攻找“老虎”。已经逮捕的大贪污分子也要组织力量审讯，从中发现线索。三、确定重点，领导干部分工包干。

1月25日，毛泽东在转发志愿军19兵团党委“三反”报告给志愿军党委并告东北局的指示电中说：

“**照我推测，在100多万志愿军中很可能捉到几百个大小老虎，你们应为此目标而奋斗。这些大小老虎是资产阶级安置在我军内部的堡垒，他们已经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叛变人民的敌人，如不清出惩办，必将为患无穷。在未清出以前，还以为他们是可靠的同志。只有在清出以后才使人们大吃一惊，原来他们已成了暗藏的敌人。**为了清出他们，必须对于有贪污嫌疑的人大胆怀疑，收集材料，试行探查，就可发现许多老虎。这是极为要紧的一个阶段。”

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地委，并告各大军区和志愿军党委：

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在一个大城市中，在猛烈展开“五反”之后，大约有3个星期就可以形成。只要形成了这个统一战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于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顺利地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北京市的斗争是成功的，这里已经形成了“五反”的统一战线，已使占6%的反动资本家陷于孤立，约有占1%至2%的最反动的资本家（其中大多数是投机商人）即将予以惩办（少数已予逮捕）。而在目前，给这样一个数目的资本家以惩办是完全必要的。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2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请你们速作部署。**下面是北京市委1月23日给中央的报告，请你们加以研究，并仿照办理。此报告可在党刊上登载。**

中央 1月26日

1月27日，薄一波将署名“东北一党员”的一封信转给了毛泽东，信中揭露高岗和东北个别干部贪污腐败、铺张浪费的问题。毛泽东把这封信批在很小的范围内传阅。这件事使高岗大为恼火，他认为薄一波故意给他脸上抹了黑。

据萧一平回忆说：“尽管署名‘东北一党员’，但事实上，是由我执笔、杨春茂同志补充后共同完成的。”“我自己对东北的问题有些看法，特别是对高岗的问题。但要不要揭露高岗的问题，我是深有顾虑的。高岗不是一般的高级干部，当时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为了防止打击报复，写这封信用了匿名信的形式，署名‘东北一党员’”。“当时，杨春茂是鞍山市市委书记。他是我的老上级，是个省级干部。他比较了解情况，同时他也受高岗的排挤、打击，到马列学院学习就是高岗用亲信把他排挤出来了。”“信写成了之后他建议让薄一波转呈，因为毛主席比较忙，有可能看不到这封信。薄一波同志当时是全国增产节约运动委员会主任，把信寄给他也是合情合理的。”

1月下旬，毛泽东根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的规定，指示周恩来亲自安排西北军区调集解放军2000余人，征用马匹、骆驼4000多匹（峰），护送班禅回西藏。

不久，毛泽东又特派习仲勋专程到西宁为班禅送行。他还致电班禅说：

“我完全同意你的这种志愿，即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与达赖喇嘛紧密团结，为彻底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驱逐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影响，巩固边防和建设新西藏而奋斗。并祝你顺利到达目的地。”

1月31日，毛泽东关于中立国观察机构等问题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致菲利波夫同志：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中，由于敌方在朝鲜停战谈判过程中处心积虑地拖延谈判，至今未能达成最终协议。**但在停止军事行动的主要问题上，例如，在双方之间划定军事分界线和建立非军事区问题上，已达成3点协议。在制定朝鲜实现停火和停战的具体措施，其中包括停火停战条件，观察机构的人员、权力和职能等问题上，已达成6点协议（协议全文附后）。此外，对“战俘处理”问题，敌方原则上不可能表示反对释放全部战俘。因此，谈判不会拖延太长时间。尽管敌方在停止军事行动后限制进行恢复和建设机场以及“自愿遣返”战俘这种轻率要求的借口下，力图拖延谈判，但由于我方坚决反对其建议，而且由于敌方很难制造在朝鲜继续进行战争的舆论，以及**其仆从国和美国本身也都渴望停止朝鲜战争，**因此，近日来敌方不得不放弃对限制在朝鲜恢复和建设机场问题的讨论，而开始讨论协议的细节问题。从敌方所提停战协议的具体条款来看，该协议仍然不是最终协议，亦即敌方仍然把限制在朝鲜进行恢复和建设机场以及自愿遣返战俘列入协议条款，同时还**声 称，这些条款只能通过，没有商量的余地。由此可见，达成最终协议的可能性有所增长。毫无疑问，我们从未指望而且现在也不指望这种可能性。**同时，我们警惕地注视美国统治集团的阴谋，他们由于其国内外矛盾加深而仍然执行拖延政策，甚至可能破坏谈判，以使国际局势更加紧张。但是我们已准备好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给敌人以坚决打击，使其计划破产。当前，双方在谈判中已开始讨论细节问题。为了达成最终停战协议，必须得到您对下列问题的具体指示。

1、关于由中立国代表组成的观察机构。美方提出双方各自邀请其武装力量没有参加朝鲜军事行动的3个国家，每个被邀请的国家指定1名高级军官作为建立中立国观察机构的代表（双方中立国共6人）。我们打算同意这一程序，并邀请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派出代表，以便他们能够平等地同美国邀请的3个国家的代表商讨问题，并且享有否决权。

2、上述每个中立国均应派出1名副代表，他们可以以其代表的名义参加观察机构会议。所有的代表都可从其本国公民中挑选其作为顾问的助手。所有被邀请的中立国都可提出必要数量的行政工作人员来建立秘书处，负责保存记录，分发文件和译本。

3、中立国观察机构的职责是：（1）实际监督和观察双方遵守协议——在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后不得通过双方协议规定的后方卸载点将增援物资、军事人员、战斗飞机、装甲车、坦克、武器装备和弹药从外面引入朝鲜，双方军事人员的轮换应按协议规定的规模并按同等数量进行。（2）报告任何一方所发现的在非军事区以外发生的破坏停战协议事件的发生地点，并进行现场观察。观察机构应根据停战委员会双方或一方的要求，立即派出中立国观察小组进行检查和观察，并将检查结果报告停战委员会。

4、同时根据第3项协议第1款有关的职能的规定，**美方还提出，在停止军事行动后，双方都应提供关于在朝鲜参战的地面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准确地点的情报资料，并且不得变更己方军队的配置位置，也不得集结己方兵力。我们打算不同意这一点，因为这不是已达成的协议条款所规定的。**

5、至于在按规定应进行观察的后方卸载点，美军提出确定在南朝鲜的汉城、仁川、襄阳、原州、忠州、大田、安东、晋州、群山、大邱、顺天、釜山——共 12处。在朝鲜北部相应规定为新义州、满浦、江界、惠山镇、会宁、清津、新安州、咸州、金口、平壤、镇南浦、元山、碧潼、城津、海州——共15处。每一处都应规定在从该卸载点中心向外30里半径范围内为中立国活动区。**我们认为，敌方提出的点太多，活动区面积太大，而且开放点的数量不相等。我们拟同意双方都开放3—5个点。**在朝鲜北部为新安州、清津、咸兴、满浦和 1个机场；在朝鲜南部为釜山、仁川、水原、丽水、葫口岛。我们还打算提出，中立国小组活动半径应规定为由卸载点中心向外5公里。

6、中立国观察机构属下应设若干中立国观察小组。每个小组应至少由4名中级军官（上校-少校），即由每一方所邀请的中立国代表中的2名军官组成。必要时可在观察小组属下设立分组，由双方从其代表中各派1人共2人组成。美方提出建立40个中立国观察小组。我们认为这一数量太多。如果可以达成协议，双方各自开放5个后方卸载点，为履行观察机构职责建立16个中立国观察小组足够了，其中10个小组常驻互相议定的卸载点，6个小组作为派往出事地点的预备小组。

7、中立国小组观察机构和停战委员会应设在同一地点。**中立国观察小组在执行检查和观察任务时无权研究各种武器装备和弹药的结构和性能。**关于报告中立国观察小组的工作结果，我们认为，正式报告应由该小组的大多数成员所通过。未被大多数成员所通过的报告或个别人员的报告不能作为正式报告，只能用作参考资料。

8、中立国观察机构及其下属各小组的物资供应由双方的军方保障。双方应给观察小组提供运输工具将其成员运往各卸载点和发生破坏停战协议的地点。

所有上述8条都涉及到中立国在双方后方地区内非军事区以外进行观察的问题。**请您考虑，我们的观点是否正确，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如果您同意我们的意见，您认为是否有必要事先将此通知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党的领导同志。**请予答复。

附：关于第2项议程所达成的协议全文另电告您。

此致敬礼！

毛泽东 1952年1月31日

1952年2月1日，毛泽东发布中央军委《关于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全文如下：

军委关于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胜利地完成了解放中国大陆的伟大事业。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挫败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把它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革命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物价保持了稳定，工农业生产获得了很大的恢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爱国革命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以空前巨大的规模开展着。全国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英勇奋斗所获得的这一切胜利，为我们祖国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铺平了道路，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但是我们从来不满足于已得的胜利，我们总是在巩固胜利，发展胜利。同志们要知道，**中国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而我们已做了的工作，还只是向这个方向刚才开步走。同志们要知道，在新民主主义建设中，以及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国内外的敌人会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和抵抗，我们还必须大力加强国防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国防，来保障祖国的建设；而发展工农业生产，又是加强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同志们还要知道，胜利了的中国对东方和世界和平的国际责任，而要更好地担承伟大的保卫东方和世界和平的责任，要依靠我们对祖国建设的努力。

我们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从创建之日起，就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英勇奋斗，艰苦奋斗。今天，我们人民解放军，将在已有的胜利基础上，站在国防的最前线，经济建设的最前线，协同全国人民，为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继续奋斗!

为此目的，**除各特种兵和大部分陆军，应继续加强正规化、现代化的训练，警惕地站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保卫祖国国防外，我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师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师的改编计划，将光荣的祖国经济建设任务赋予你们。你们过去曾是久经锻炼的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我相信你们将在生产建设的战线上，成为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你们将以英雄的榜样，为全国人民的，也就是你们自己的未来的幸福生活，在新的战线上奋斗，并取得辉煌的胜利。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

此令

主席 毛泽东

2月2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饶漱石病休由陈毅代理各项职务的决定》：

华东局并陈毅、粟裕二同志：

接2月1日14时粟裕同志来电，知饶漱石同志病情严重，必须休养。中央决定：饶漱石同志立即开始休息2个月，各项职务由陈毅代理，由谭震林同志秉承陈毅同志主持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日常实际工作。关于饶漱石同志休养地点，我们认为必须离开上海，最好到北京来。请粟裕同志再到上海和饶漱石同志当面商量决定，并和漱石同志同车来京为盼。

中央 2月2日上午2时

2月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和地委；各大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并转各省军区党委、兵团党委、军党委：

一、中央同意中南局组织部《关于将整党报告改为“三反”报告的通知》并转发各地参照仿行。

二、事实证明：“三反”运动是一个更加现实与深刻有力的整党运动。**如果不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三反”运动，则党内许多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就不能尽情地被揭发出来，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分子就不能得到适当地惩处，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与危害，也就不能彻底克服和肃清。**所以，整党工作必须与“三反”运动相结合，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党员八项标准的教育，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

三、“三反”运动又是了解干部，教育干部的一种最好的方法。各级党委、政府、群众团体和部队的领导机关，在“三反”斗争中，应该对所属干部作一次深刻的考察和了解，**必须毫不迟疑地开除一批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贪污蜕化分子出党，撤销一批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那些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沓、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其中有些也应当开除出党），对于开除这些人出党和撤销这一些人的职务，不应当有可惜的观点，这是毫不可惜的，如果没有开除和撤销他们的决心则是错误的。**过去我们党内对于这类坏人所存在的自由主义思想，必须坚决地加以克服。与此同时，必须大胆地、坚决地提拔一批有德有才的优秀分子到各种工作的领导岗位上来。这是党的组织建设上的一个严重任务，望各级党委加以注意。

四、**本指示和中南局组织部的电报可在党刊上发表**。

　 　 中央 2月3日

2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工矿企业如何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一、**所有国营、公营工矿企业，都必须认真地开展群众性的“三反”运动；彻底揭发并消灭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彻底揭发并消灭国营企业中资产阶级的经济侵蚀、组织渗透和思想影响。这是胜利地完成增产节约迎接国家建设的中心关键。**

二、工矿企业的“三反”运动，必须以检查业务，即检查行政管理中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为重点。特别要着重检查基本建设，原材料的采购供应，仓库物资，成品推销，会计出纳等项，**要在这个运动中捕捉大贪污犯和经济内奸，检举不法私商，惩戒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克服严重的浪费现象**。

三、**在斗争中要注意防止和纠正把斗争的锋芒转移到工人群众方面的错误倾向。**在各个厂矿企业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部分工人曾经犯过一些错误的贪图小便宜，使用公家的东西，旷工、懒惰、浪费原材料等等。消灭这些现象是一个教育的过程。这些问题，一般应该推到“三反”后期以坦白教育的方式加以解决，面向将来，不咎既往。对于工人群众最重要的是通过“三反”运动，大大地加强阶级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教育工人改正旧社会遗下来的恶习，在自觉的基础上加强劳动纪律，保护国家利益。有些厂矿企业把斗争锋芒集中在工人群众方面，这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坚决纠正。

四、**在“三反”运动中，必须贯彻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发动工人群众，发扬工人群众的积极性。**正在进行民主改革的企业，必须以“三反”为中心，完成民主改革。民主改革不彻底的厂矿企业，要在“三反”运动中补足这一课。民主改革已经彻底或补足之后，要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生产方面的改革，开展合理化建议和生产竞赛，创造和推广先进经验，进行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切实建立和健全经济核算制。

五、工矿企业的“三反”运动，一律由当地党委统一领导。有不服从领导的，以违纪论处。

六、在“三反”期中注意领导生产，不要脱节，不要因此减产。如因“三反”忙不过来，致有部分的减产，也不要减产过大，并要在“三反”以后的增产中弥补“三反”期间减产的损失。

　 　 中央 2月4日

接着，毛泽东发出《关于限期向中央报告“打虎”预算和县区乡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和地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

一、中南军区党委2月1日电所报中南军区直属机关部队计划打“大老虎”106只，“小老虎”357只，我们认为是适当的，这是一个初步的预算，以后可以按照情况随时追加。请中南军区督促所属各级军区和各军迅速订出自己的“打虎”计划，报告中央。中南军区的计划发给各地参考。

二、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市委和地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及其所属各级军区和各军，凡至今尚未做出“打虎”预算的，限于电到3日内做出此项预算，报告中央。并须准备随时自动追加预算，随时报告中央。

三、省级和地委级做此项预算时，可以包括县区乡3级可能打出的大小“老虎”数字；但全国各地2月份实行“三反”和“打虎”一般应限于到处委一级为止，一般不要发展到县区乡3级去。应待**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地委诸级的“三反”基本完毕，“打虎”基本胜利，腾出手来，配备骨干，组织大批“三反”工作队，加以明确的政策和方法的训练，如同派遣土改工作队或整党工作队下乡土改和整党那样，派遣下去开展“三反”，才是适当的，否则可能发生大错误。此点务请同志们加以注意。**有些省区已在县级及区级展开“三反”的不必停止，但2月份重点仍应放在省地两级，兼及部分的县级。3月份应完成县级的“三反”，并准备好去区乡帮助县级领导区乡“三反”的干部，拟以4、5两月基本上完成全国区乡两极的“三反”工作。果能如此，就是一个大胜利。东北局规定“县区两级目前只以本身力量发动坦白检举，待省市搞完后再抽出力量彻底解决问题”这是可以的。华北局的方针也是这样。我们认为凡已经完成土改的地方或正在整党的地方，应即将原来的土改工作队中的若干人和整党工作队调至省城加以训练，转变为“三反”工作队，凡有贪污嫌疑的人都不许参加，待命（待各中央局和省委之命）下乡进行“三反”。 但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和地委在目前即派出少数工作组选择少数区乡进行贪污浪费的调查和进行“三反” 的典型试验，则是完全必要的。你们对于此项工作步骤有何意见，盼告。

四、平原省武陟县县级机关已初步清出一千万元以上的“老虎”18只，其中有一只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该县继续搜捉，还可能超过此数。此事应引起各级党委严重注意。凡说县一级无“老虎”或很少“老虎”的，应即以武陟县的证据驳倒他。

五、根据河北省香河县9个村的初步调查，有贪污行为的村干部，多者占村干部总数的72%，少者占13%，平均为33%。9个支书中7个贪污，9个村长中8个贪污。其中有一个村干部独自贪污公粮一万斤以上，是个“小老虎”。凡说乡村干部中没有或很少贪污的，凡说乡村虽有贪污但是没有“老虎”的 （当然不是说每乡都一定有“老虎”），应即以香河县的证据驳倒他。

六、接高岗同志1月26日的报告，全东北计划捉“大老虎”500只，昨日（2月3日）据报，已增加至2000只。军委直属系统早几天承认捉“大老虎”100只，昨天追加了150只，共计250只。连同中央一级其他系统的300只，共计550只。此外尚有已经通报你们的华北的经验。由此可以估计，每一个小省应有大小“老虎”几百只，每一个中等省和大省应有大小“老虎”一二千只至3000只。根据华北局的计算，其中应有 “大老虎”10%以上。这些都包括党政军民学的工作人员在内，但不包括私人工商界和私立学校。东北、华北和中央一级的经验，可供你们做“打虎”预算的参考。

毛泽东 2月4日

欲知“三反”运动的结果如何？请诸君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2年1月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中说：“**请你们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10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接着，他非常严厉地警告“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这些下属说：**“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正所谓令出如山倒，挥手起风雷！据薄一波回忆说：“**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斯言极是矣！

**第34章**

**“‘三反’运动对于共产党来说，是一次深刻有力的整党运动，**

**在‘三反’运动中暴露了不少党员的严重错误，其中有些人则**

**在运动中证明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

话说1952年2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给华东军区党委的复电稿中加写了一句话：

“我全军对于贪污腐化犯法乱纪情节严重的分子，必须一律予以惩办，不得姑宽。”

这天中午，毛泽东突然对卫士李家骥说：

“我的腰不舒服，今天晚上不下雪明天肯定下雪。”

李家骥听毛泽东说得这样肯定，心中免不了半信半疑。第二天早晨，天上果然下起雪来。毛泽东一边观赏着院子里的雪景，一边和李家骥开玩笑说：

“小李，如果我们打赌，是不是你输了？！”

李家骥只好点头称是。毛泽东又问他：

“你知道雪花有几瓣吗？”

“我没有数过。”

李家骥如实地回答。毛泽东笑着说：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数数嘛！”

2月8日，李敏因为放寒假过春节，她对爸爸说：

“我想到上海看望妈妈。”

毛泽东说：

“好嘛，你去吧！”

“我怎么走呀？我还没有一个人走过这么远。”

“买票，坐火车走嘛！”

“那，我就一个人去呀？”

“那么多人乘火车，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呢？”

“我有点怕。能找个人送我去吗？”

“你是大孩子了。莫要人送，自己走。”

李敏知道爸爸决定了的事，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该动身了，毛泽东又一再提醒她别忘了带上药，还特意让李敏把外国朋友送给他的香烟带给妈妈。

以后每年放寒假，李敏都要去上海看妈妈。临行之前，毛泽东不光让别人帮助李敏准备收拾打点行装，还亲自出马，为女儿前前后后的忙活，一会儿让人去买北京的特产茯苓饼和蜜饯，一会儿又让人去“六必居”买酱菜。就这样左一包右一包，直到李敏拿不动为止。毛泽东知道女儿从不爱吃零食，这都是为贺子珍买的。

毛泽东还让李敏带足往返路费、住宿费、伙食费和零花钱。因为贺子珍在上海的房间太小，加上李敏就太挤了。毛泽东每次都让女儿吃住在一个宾馆里，其它时间就和妈妈在一起。

且说2月9日下午1时，工作人员为了让毛泽东在紧张的工作之余稍微松弛一下，特意为他放映了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是他自元旦晚会以来的第一次娱乐活动。

2月9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中小贪污分子分别处分问题的补充指示》：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地委；各大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并转各级军区党委和军师党委：

**鉴于贪污1千万元以下的中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人数的95%至97%，带着很大的群众性，中央已规定除对其中情节严重者应予以刑事处分外，其情节不严重者一般应免予刑事处分，而由其工作机关按其情况，予以不同程度的行政处分，以示严肃。**其**有在革命工作中一贯表现好，偶犯贪污错误，数量甚小者，还可以免予行政处分。此外尚有一些迹近贪污、按其实际不能叫作贪污者，不应以贪污论。**如此规定，大约有85%以上的中小贪污分子可免刑事处分（即不送法院，不判徒刑），而只给以行政处分，便于争取团结和教育改造这一批人，以利开展“三反”斗争和建设工作。关于行政处分的项目，除中央已规定撤职、降级、调职、记过等4项外，兹再增加警告一项，共为5项。**估计有很多小贪污分子，例如50万元以下而情节不严重者（此类人占全体贪污人数的70%上下），只须给以警告就可以了。**关于贪污1千万元以下而免予刑事处分者，如是党员团员，他们的党籍团籍问题，如何处理，中央尚无成熟的意见，请你们根据“三反”斗争中处理贪污分子的情况提出意见，电告中央考虑。关于一切应给刑事处分的人均须立即开除党籍团籍，中央已有通知，请你们一律遵行。关于1千万元以上的贪污犯（即所谓大中小老虎），也应按其情节分为死刑、死刑缓期、无期徒刑、各种有期徒刑以及免予刑事处分而给以行政处分等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法院已于2月1日审判7名大贪污犯的事件中，给了方向的表示。

中共中央 2月9日

接着，毛泽东又在草稿上给刘少奇等人写了一个说明，他写道：

刘、朱、周、陈、彭真、林彪、聂荣臻各同志：

此件主要目的，是行政处分中增加警告一项，使大多数小贪污分子减轻对抗情绪，利于团结改造。是否适当，请审示。

毛泽东 2月9日。

是日晚，毛泽东针对打出了一些假“老虎”的现象，在给高岗并告各同志的电报中写道：

“**第10军的几个师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

2月10日，在古城保定2万多名群众参加的公审大会上，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临时法庭审判长宋志毅宣读判决书说：

“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家资材，剥削民工灾民，勾结奸商非法经营谋利，瓦解国家企业机关及贪污受贿……奉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令准，判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本人全部财产。”

在空阔的保定东关大校场刑场上，行刑人员奉命向刘青山、张子善宣布说：

“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一、对你们行刑子弹不打脑袋，打后心；二、行刑之后，你们的家属可以殓尸安葬，棺木由公费购置；三、你们的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四、你们的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

刘青山、张子善听了，无不放声大哭。这哭声，不知是悔恨还是感激；那泪水，浸泡着两个已经腐烂的灵魂。就在此时，两声枪响同时爆出，两名曾是共产党高级干部的罪犯，结束了他们才30多岁的年轻的生命。

2月12日，毛泽东在转发第66军党委关于打虎经验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将全部应有的而不是无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干净，否则运动结束，势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遗祸将来。**”

2月14日下午，天刚下过大雪，位于建国门内路北一个新建院子里的海军司令部接到空军打来的电话说，毛泽东到了空军司令部，马上就到海军司令部来。萧劲光司令员放下电话，令警卫员到门口看看情况。警卫员刚下到楼梯口，毛泽东就到了。萧劲光和副司令员王宏坤、副政委刘道生、参谋长罗舜初赶到楼梯口，见罗瑞卿、刘亚楼随侍在毛泽东左右，立即恭恭敬敬地敬礼问好，尔后把他们迎入司令部办公室外间的会客室。毛泽东兴奋地说：

“瑞雪兆丰年，看样子今年是个好年景。”

接着，他问了正在开展的“三反”运动情况，又说：

“今天，我来和你们商量一件事，现在抗美援朝需要飞机，我们打算集中外汇解决一下空军的问题。原来计划了2亿卢布，准备再给海军购买几艘驱逐舰，几十条鱼雷快艇，但这样外汇就不够了。是不是可以先给空军买飞机？你们要买的舰艇再往后推一推，怎么样？国内的钱有，不成问题，就是外汇不够。”

萧劲光和刘道生当即表示说：

“坚决拥护毛主席和中央的决定。空军、海军都是党的军队，就这么办，把有限的外汇先给空军买飞机吧！”

王宏坤和罗舜初也都表示同意。

“好”毛泽东高兴地说：“就这样说定了。国内的钱，有。**你们是不是买点材料，自己造，打下个基础。上海的江南造船厂过去不是造过一千多吨的船嘛。”**

萧劲光他们说，江南厂，还有其它一些造船厂，都可以造，先造几十吨的小艇。去年青岛造船厂就已造出了几条小艇，今年打算让江南厂再试制几条大一点的。毛泽东听说国内船厂可以造小艇，就连声说：

“**很好，很好。造小艇，来得快，花钱也不多，还能起作用，可以积累经验，把我们自己的造船工业逐步搞起来。”**

2月17日，毛泽东在转发中南局“打虎”新计划报告的批语中，告诉各中央局、各大军区说：

“在运动紧张期内必须指定一部分得力干部负责日常工作，维持正常财经工作的进行，生产、运输、金融、贸易均不能停顿。在当地‘三反’运动正式发动1个月至多1个半月后，就应逐步增加领导日常工作的干部，这点很重要，请各同志注意。”

2月20日，毛泽东在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打虎”情况和部署的报告上批示道：

“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

2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五反”斗争策略和部署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中南局、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一、同意2月19日中南局关于“五反”斗争策略和部署的报告。

二、将这个报告发各中央局参考。

三、**请各省委就省城的“五反”加以精密研究，作出结论，以便正确地指导省城及全省城市的“五反”斗争，务使“五反”在全国范围内不出大的偏差**。

四、因为“三反”、“五反”同时进行并要同时保证不犯错误，必须将县区乡三级的“三反”及县城和县范围内的市镇的“五反”，除少数典型试验外，一律坚决推迟到春耕完成以后去做。

五、省城以外的中等城市，例如四平街、石家庄，苏州、衡州、汉中、遵义等处如何**进行“五反”，日前尚无经验，请各省委区党委令各地委精心研究，请示批准，有计划地去做，只许做好，不许做坏。**各中央局和省委还应派员帮助一二个地委研究一二个中等城市的“五反”部署，并以经验电告中央为盼。

中央 2月23日

2月23日晚，毛泽东就上海市委的报告复了一封指示电。

原来在2月中旬，毛泽东鉴于上海“三反”、“五反”运动比较落后，就把陈毅从南京调回上海，领导上海的“三反”、“五反”运动。2月20日，陈毅在上海召开2000多人的干部大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批评了上海运动开展不力的现状，当场宣布对一些领导干部给予撤职和停职反省的决定，逮捕法办了少数人。2月21日，陈毅以上海市委的名义将工作情况报告给毛泽东。

毛泽东在给陈毅等的复电中写道：

陈毅、谭震林二同志，上海市委各同志：

市委2月21日报告收到。你们2月20日的会议开得很好，我相信你们的打虎作战会开展起来。希望你们从2月25日至3月10日，分为3期，每期5天，共15天，抓紧检查督促，改进方法，基本上完成上海市各系统内部的“三反”打虎任务。**从3月11日起阵容整齐地开展上海市工商界的“五反”斗争。**

毛泽东 2月23日下午9时

2月26日，毛泽东在转发中直机关党委关于“打虎”工作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此件很好，发各同志参考。**强调要材料，要证据，普遍推行算大账、算细账，追赃款、追赃物的方法，严禁逼供信的方法，是目前打虎作战是否能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所在。**

毛泽东 2月26日

这一天，毛泽东看到新华社福建分社给总社的一份电报上说：“美蒋特务最近计划谋害陈嘉庚以嫁祸于我，破坏‘五反’运动。”

原来，陈嘉庚在1950年把他的全部财产捐献了出来，准备用于扩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新校舍。几个月后，他回到祖国在家乡福建集美定居，决心把他创办的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发展起来，为新中国培养更多的人才。

毛泽东在电报上批示道：

周总理：

请指示福建当局加强对陈嘉庚的保卫工作，或劝陈来京。如何，请酌处。

毛泽东 2月26日

2月27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分步骤开展城市“五反”斗争的指示》中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对所辖境内的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应分为3个步骤开展‘五反’斗争**。例如河北境内，第一步，在北京、天津两个大城市开展‘五反’，这是由中央直接领导的，3月10号以前可以基本上解决问题。第二步，在唐山、石家庄、秦皇岛、保定4个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开展‘五反’，这是由华北局和河北省委领导的。他们计划在第三步开展通县、泊头、辛集、杨柳青、沧县、邢台、邯郸、汉沽、临清、胜芳等10个城镇中的‘五反’，这是次于上列4市的10镇，也是中等城市，待4市取得经验以后再行开展10镇的‘五反’，由省委和地委领导。**对一般县城则坚决停止，以后再说。**”

2月29日，毛泽东根据中央的调整部署和派去上海指导运动的薄一波给中央的汇报，复电同意上海关于“五反”运动推迟到3月20日以后进行的请求。他还在复电中写道：

“这样既有利于现在的‘三反’，也有利于3月20日以后的‘五反’，也有利于全国的经济形势。”

关于对贪污分子的处理问题，毛泽东在给陈毅的复电中又写道：

陈毅同志：

2月25日的电报收到。

1. **因为你们打虎进展较速，你们的打虎突击可以在3月10日基本结束，转入打虎的正常轨道上去。**但正式宣布须按具体情况，有些（可能是多数）转入正常，有些仍须突击。

二、**中央正在考虑不单是50万元以下而且是100万元以下的所谓贪污分子，一般不算作贪污而算作占小便宜或公私不分，以便解脱更多的人，利于教育**；**但少数情节恶劣者仍应算贪污。**此点中央当另有通知。

三、军队不要举行公审。

四、连队“三反”尚无经验，可先在若干单位试行，连队的严重问题是军阀主义，也有贪污，应来一次改革，但做法应与机关有别，以教育为主，同时搬掉若干坏的。

五、最近西南军区党委有一个方针和部署的计划，今日已发你处，请加参考然后确定你们的部署。

六、其余均同意。

毛泽东 2月29日

1952年3月1日，毛泽东关于在“五反”中不提反暴利口号的批语中写道：

各同志：

西南局2月29日的电报是正确的，发给你们参考。当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处提出反暴利的口号时，大资本家即迅速接受，因为这个口号可以被他们利用去威胁中小资本家，说他们的利润也有暴利。就目前时期来说，**真正违反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暴利，已包括在“五反”的各项对象，故只应提“五反”，不应再提反暴利。**隐匿侵吞敌产、逃走外汇两事，国家已有法令，又可包括在‘盗窃国家财产’一项内。倒卖金银、偷卖鸦片白面两事，国家亦有法令，可依法办理，**不必于“五反”外另立项目，变为“六反”“七反”**。

毛泽东 3月1日

3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罗瑞卿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

一、兹将罗瑞卿同志关于长沙市公安局违法乱纪行为的报告发给你们及所属公安司法机关。**请你们务必注意在此次“三反”中全面检查和彻底解决所属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违法乱纪行为，不惜将违法乱纪和贪污蜕化分子撤消职务，严重者判处徒刑。其最严重而有民愤者，应予枪决。**

二、王丕敏（长沙市公安局长，有重大受贿行为——笔者注）应予枪决，公开宣布罪状，并赔偿受害者的损失。

三、长沙市委市政府和湖南公安厅对于长沙市公安局如此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负有责任，应由湖南省委省政府对情况加以周密审查，分清责任轻重，给以适当处分，并将结果报告中南局和中央，同时通知全省党政机关，引为鉴戒。

四、与此同样，各地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如发现有与长沙公安局同样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当地党委政府和上级公安司法机关亦应受到适当的处分，以为放纵不法行为及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工作者的鉴戒。

　　 中央 3月4日

3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是从头天晚上一直工作到这天下午6点10分才休息，大约有20个小时。他在晚上11点50分起床后，又开始继续工作。叶子龙为了减少毛泽东的工作量，特意嘱咐值班秘书说：

“军队，军以下直属机关及师；地方，分局直属机关及地委、专署和县，关于‘三反’的报告，均不送给主席看。”

3月5日，毛泽东在薄一波3月3日关于上海市“五反”准备工作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略），并在报告中多处作了批注。

薄一波在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上海有私营工商业16.3万户，根据已经掌握的材料，进行了分类排队，确定了应予保护和着重打击的名单。报告还说，运动展开后，**必须加强领导，规定纪律，严密控制。**毛泽东在此处批注道：

**“严密控制，非常需要。有些城市控制不严，出了乱子。”**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加直发山东、青岛、南京、华南、云南、新疆：

一、中央批准北京市委建议《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认为这是正确的。其中除第7第8两条由党内掌握不得发表外，其余各条将由政务院通过发表。各地党委所订处理标准和办法与此有出入者，照此修改之。各地如因特殊情况须作若干改变者应报中央批准。这个文件所采取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将来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1951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望各级党委在“五反”中掌握这几条原则。

二、**在“五反”目标下划分私人工商户的类型，应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5类。**就大城市说，前3类约占95%左右，后2类约占5%左右。各个大城市略有出入，大体相差不远。中等城市则和这个比例数字相差较大。

三、**这5类包括资产阶级和非资产阶级的独立手工业户及家庭商业户，不包括摊贩，**北京有摊贩4万户，将来要给以处理，但在此次“五反”中还来不及处理，各大城市也可以暂时不去处理摊贩，但对独立手工业户和家庭商业户最好给以处理，北京、天津两市正在处理。各中等城市在“五反”中最好给独立工商户及摊贩均给以处理。不雇工人店员（但有些人家带了学徒）的独立工商户在我国各大中城市数目很大，北京约占5万工商户中的38%，计1万9千户左右。他们中许多是守法的，也有许多是基本守法部分违法的（即有小额偷漏税，即所谓有小问题的），也有少数是属于半守法半违法即偷漏较大的，有的竟达一两个亿，有些家庭商店人手多，不雇店员，比雇上二三个店员的小资本家贸易额大得多，因此偷漏税也多些。北京的资产阶级有3万1千户，其中雇佣工人、店员3人以下的有1万7千5百户，占35%，我们既要在此次“五反”中处理这一大批小资本家，给他们做出结论，也应尽可能努力将和小资本家数目大略相等的独立工商户加以处理，给他们做出结论，这对于目前的“五反”和今后的经济建设都是有利的。这两种工商户一般都无大问题，给他们做结论是不困难的，做了结论以后，我们就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但个别城市如认为先给其他工商户做结论，而将独立工商户的结论放在后面去做，较为方便，也是可以的。

四、**根据城市的实际情况，我们决定将过去所定的4类工商户改为5类，即将守法户一类改为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两类，其他3类不变。**在北京5万工商户（包括独立工商户，不包括摊贩）中，守法户约占10%左右，即约5千户。基本守法户约占60%左右，即约3万户。半守法半违法户约占25%左右，即约1万2千5百户。严重违法户约占4%左右，即约2千户。完全违法户约占1%左右，即约5百户。将完全守法户和有些小问题的基本守法户分开，又**将基本守法户中偷漏税1百万元以下的和偷漏税2百万元以下的分别对待，即1百万元以下者，指出错误，免予补税，2百万元以下者，指出错误，免其1百万元的数目，补其1百万元以上的数目，这样做，可能发生很大的教育作用。**

五、行贿性质严重，必须严肃处理。但行贿的人很多，在北京，除掉小额回扣不算行贿，被人勒索不算行贿以外，尚有1万3千多户，约占工商户总数的26%，即超过四分之一。其中，行贿1亿元以上者169户，5千万元至1亿元者172户，3千万元至5千万元者195户，1千万元至3千万元者642户，1百万元至1千万元者3161户，1百万元以下者8748户。中央原定补退罚者限于4%左右，补退罚捉者限于0.5%左右，补退罚关者（包括杀几个在内）亦限于0.5%左右，3项共计约5%（中等城市则小于这个比例，有的只占3%，有的还少些）。**行贿者既如此之多，若只处罚少数人而对多数人不予处罚，则很不妥当，若均给处罚，则受罚者超过全工商户四分之一，打击面又太宽了。故于北京建议第6条中加上“情节轻微者除外”一句。**北京拟于实行处理时将行贿1百万元以下的8700多户免予罚款，而于通知书上载明行贿错误，给以警告处分。此点亦请你们注意。

六、各大中城市，有些市委，对于各类工商户的情况极不明了，如何分别对待这些工商户的策略观点又不明确，工会和政府工作队（或检查组）的组织和训练甚为潦草，便仓卒发动“五反”，引起了一些混乱，望这些市委提起注意，迅速加以克服，此外，检查违法工商户，必须由市委市政府予以严密控制，**各机关不得自由派人检查，更不得随便捉资本家到机关来审讯。又无论“三反”“五反”，均不得采用肉刑迫供方法，严防自杀现象发生，已发生者立即订出防止办法，务使“三反”“五反”均按正轨健全发展**，争取完满胜利。

七、**县区乡现在一律不进行“三反”“五反”**，将来何时进行及如何进行，中央另有通知，**个别已在县城试做“五反”在区试做“三反”者务须严格控制，不得妨碍春耕和经济活动。**中等城市也不要同时进行“五反"，而要分批进行，并须在严格控制下进行。这几点前已通知，现再重复说一遍。

　 　 中央 3月5日

1952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六，毛泽东过去的一个警卫员翟作军来看望毛泽东。江青正在和毛远新打牌，马上放下手中的牌，热情地欢迎翟作军的到来，她还叫来12岁的李讷和15岁的李敏，和客人见面问好。

吃晚饭时，毛泽东为招待翟作军加了几个菜。李讷来了，站在毛泽东的后面，搂着他的脖子说：

“爸爸，你可真有本事，你怎么找了一个这么漂亮的老婆呀！”

说着，她还得意地瞟了母亲一眼。毛泽东闻言，也高兴得咯咯咯地笑了起来。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

翟作军见江青和孩子们还是穿着十分普通的布衣服和布鞋，江青在饭前饭后又一直忙里忙外，殷勤招待客人，照顾孩子们，非常感动。

初春的北京，天气还是很冷的。在中南海大院内南海北岸的向阳处，柳树的梢头已经略略现出鹅黄色，可是，3月的西北风刮在人们脸上，依然有一种刺疼感。

这一天，毛泽东起床后已经是上午11时了，这是一个特例。他通常是晚上工作，早上才睡下，下午两三点钟才起床。值班卫士通知王鹤滨说：

“王秘书，主席要到外面去散步，快！”

汪东兴没有通知到摄影师侯波，摄影的任务只好又落在了叶子龙身上，叶子龙已将照相机挂在了胸前。

汽车开出了中南海，向德胜门外开去。穿过德胜门不远，毛泽东示意周西林停车。他下车后沿着街道东侧人行道向北漫步，街道上行人熙熙攘攘，不算太拥挤。王鹤滨跟在毛泽东身后，没有引起行人的注意。毛泽东看到右边一个敞开的大门，门旁挂着“德胜门外区政府”的牌子，便走了进去。值班室的一位年轻人看到毛泽东一行人走了进来，急忙出来，站在毛泽东面前打招呼说：

“同志们都下班吃饭去了，就我一个人值班，你们等一下，我去叫他们。”

看来，他没有认出毛泽东。毛泽东说：

“不用了，我们是随便来走走的。”

毛泽东上车后，周西林继续往北开，向前走了五六里，毛泽东看到大道左边有一片用高粱秆子夹成防风墙隔住的菜畦，示意停下来。

北京北郊的大地尚未苏醒过来，到处可见片片残雪覆盖在地上，北风带着哨音迎面袭来，毛泽东不得不眯起双眼，向着两块菜地走去。汪东兴、叶子龙、王鹤滨和卫士王振海跟在后面。菜地的主人见有人来，就走了过来。他认出了毛泽东，非常惊喜。

这是一位农民装束的老人，大约有60岁左右，中等身材，身穿一身青布棉衣棉裤，黑色的棉鞋，裤腿还用黑色的带子缠扎着，显得很干练。毛泽东走上几步，伸过手礼貌而热情地握住了菜地主人的手，问道：

“贵姓？”

“不敢当，姓吴。”

“这是你家的菜地吗？”

“是，是我家的地。刚才我的小儿子告诉我，菜地里来了客人，我就急忙赶来了。”

“生活得怎么样？家中有几口人？”

“解放后，生活好多了，家中有老伴和3个儿子。老大和老二都参加了革命，当了兵，我是光荣军属哩！”

“这是你对国家的贡献哟！”毛泽东把话题一转，问道：“村里搞‘三反’了吗？”

“搞了，我还是村里的监委会主任哩。”

“区政府的干部中有人欺负群众吗？”

“没有见到区政府干部欺侮百姓的事。但是，有的干部手脚不太干净。‘三反’运动真是好政策。”

“听讲话，你不像农民？”

“啊，是这样，我当过兵，上过军官学校，时逢军阀混战，当过几年见习排长，在二十年代初，就解甲归田了。”

“啊，你可不是一般的农民，有知识，有见地，有经历。你我都是国家的干部，要共同努力，把我们的国家搞好。”

“是，毛主席！”

吴姓老农显然又露出了接受任务时的军人风度。毛泽东在告别的时候，以夸奖的口吻笑着说：

“你种了不少菜地呀！可称是吴家菜园了！”

“是，是，吴家菜园，吴家菜园！”

老农高兴地笑了。

3月11日，毛泽东给程潜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程潜将他3月6日在中南军政委员会召开的研究荆江分洪工程计划联席会上的发言，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程潜的发言材料后，很受启发，他在回信中说：

“在联席会议上的发言，使我明白了江湖利病所在，极为有益。”

毛泽东还将程潜的意见转交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周恩来组织有关人员进行了认真讨论。3月31日，政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

毛泽东在荆江分洪工程开工之际，送给工程处一面大锦旗，他在锦旗上的题词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

后来，30万军民通过75天的奋战，在1952年汛期到来之前，将荆江分洪工程这一大型的水利工程，以震惊中外的空前的高速度顺利地建成了。这一工程在1954年战胜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时，3次启闸分洪，发挥了重要作用。

3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分局并转各大市委：

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各大学“三反”斗争的情况和经验的报告，已于2月22日由主席批发各中央局宣传文教部门参考。中央认为北京各大学中进行的“三反”运动一般是健全的，有巨大成绩，其中有许多经验值得在各地推广。事实证明：高等学校中的“三反”运动是极其具体、深刻和有效的思想改造运动。我们应该要求在此次“三反”运动中基本上消灭学校中的贪污浪费现象，克服官僚主义，揭发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从而确立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权，在各地高等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时，望注意以下几点：

一、**在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应该深入发动群众，特别要依靠学生群众推动教师，批判和打击现在学校中仍普遍和严重存在着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如崇拜英美、狭隘民族主义、宗派主义、自私自利、对人民国家不负责任、保守观点等）**，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在极大多数学校现在仍然居于实际的支配地位，严重地阻碍教育的改革和国家建设人材的培养。为了有领导有准备地进行这个运动，党委应当配备有力的领导机构及工作团，如果因为“三反”“五反”任务繁重，抽不出手，则宁可将高等学校的“三反”运动，推迟到机关“三反”运动基本结束之后去做。在“三反”运动中，当师生员工群众，通过初步揭发贪污浪费的事实，已经发动起来，学校中已经形成了领导核心之后，应即转入以大部力量并有准备地在教师中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以小部力量在职员工人中进行反贪污斗争。**在教师中的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斗争，是严肃地自觉地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群众性的思想改造运动。**对各学校中严重存在着的各种具体的特别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应该充分揭露，并予以彻底批判；每个教师必须在群众面前进行检讨，实行“洗澡”和“过关”。这样教师和学生群众的觉悟都可以大大提高，也就可以为进一步的思想改造运动和教育事业的改革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在师生觉悟程度和积极性普遍提高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反贪污浪费斗争，也就更加有劲和有效。

二、根据北京经验，在强有力的领导下，放手发动学生群众，依靠他们帮助教师进行思想检讨，这是极有效的方法。对于教师应该采取争取最大多数“过关”，孤立和暴露最少数坏分子的方针。教师过关一般可以用分层过关的办法，即：1、先让大多数政治思想上没有严重问题的人很快过关。2、再帮助一批思想作风上有较大毛病，但愿意改正错误力求进步的人过关。3、少数政治上或思想上有严重问题的人，在群众的揭发、检举和严格的检查下，进行多次反复的检讨，然后过关。4、直到最后每校总有极少数政治上或经济上有极严重问题的人过不了关的，对于这些人行政上可按其情节给以停职调职或撤职等各种处分。我们有意识地这样做，使教师们分批过关，既可以使大多数的教师们普遍地提高觉悟，更加积极和团结，靠拢我党，又可以暴露和孤立政治上反动的坏分子和教师中的贪污分子，给他们以应有的打击。据天津报告，天津高等学校教师中约有13%本身即是资本家，或资本家的顾问和高级职员，这种情况与北京不同。在进行教师中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中，仍应基本上运用北京的经验，并依照具体情况，创造新的经验，报告中央。

三、在“三反”思想斗争中，各高等学校的校长，著名的教授和著名的民主人士，如政治上思想上有严重问题，估计不容易很快过关者，对他们究应采取何种方式，达到何种要求，应先请示中央或中央局（分局）后进行。

四、**在反贪污斗争中，如高等学校的校长、教务长、秘书长、教授、副教授本人有贪污行为者，原则上应按一般贪污分子处理。对他们中间有特殊技术或在科学上有较大贡献的人，如情节较不严重、民愤不大而又愿坦白立功者，则可同意其个别向学校节约检查委员会直接交代，彻底坦白，不当众宣布其罪状，准其将功赎罪。如情形并不严重，可在各人检讨中提及，不要登报，也不要在群众中发动斗争，如其贪污行为发生在解放以前，则作为思想问题处理，一般地不要追赃，不要处罚。**贪污情节严重须逮捕法办或交群众大会斗争者，应经中央或大行政区节约检查委员会批准。

五、学校浪费，其性质严重和数量很大者，应由中央或大行政区节约检查委员会会同同级教育部给各该校直接负责人以适当处分。

六、在学校“三反”运动中，对于有政治问题的教师员工，除现行犯应及时处理，有特务嫌疑者和公安部门商酌处理外，有其他政治问题的人可先尽量在群众面前予以揭露，然后挂下笔账来，留待清理“中层”时处理，其中如有担任政治、历史等课教职者，可即停止其课程或改变其职务。

七、**有些地区学校在“三反”中已发生教师自杀的事件，各地对此必须警惕，妥为防止。**

八、各地区在高等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时，应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计划布置进行，首先领导上必须有充分的决心，掌握明确的方针与要求，并应调配得力干部，事先作好准备工作，**务使这一运动一是能够放手发动群众，一面又在严格地控制下正确地进行**，对党的工作基础还是很差的学校，应另派工作组去进行工作。

九、各地科学研究机关的高级研究人员中的“三反”运动，亦参照上述各点进行。

　 　 中央 3月13日

3月15日，毛泽东邀约黄炎培到他的住处晤谈，对民建会的工作相互交换了意见。

此前，黄炎培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有不少工商业者怀有严重的恐惧心理，担心产业将被没收，对生产经营没有信心，抱着吃光花光拉倒的消极态度。于是，上海一度出现咖啡馆、舞厅和饭馆反常繁荣的“三多”现象。黄炎培建议中央领导作一次鼓舞人心的报告，讲清政策，消除工商业者的不安情绪。

此次晤谈，据黄炎培的日记记载：“毛主席约谈，对民建会的方针、路线都有明确指示。如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私人资本发展的限制，吸收会员的对象，以及‘三反’、‘五反’运动后选择会员的标准等重要问题都有指示。对民建会员的学习问题也指出：马列主义要学习，但一般人首先应该学习并接受共同纲领。”

3月2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在“三反”运动中党员犯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给予党内处分的规定》，全文如下：

中央及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所属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

**“三反”运动对于共产党来说，是一次深刻有力的整党运动，在“三反”运动中暴露了不少党员的严重错误，其中有些人则在运动中证明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因此，必须利用“三反”运动的结果对于我们党的组织进行一次严肃的整理。**对于在“三反”运动中所发现的犯有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错误及其他严重错误的共产党员，除根据《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予以应得的刑事处分或行政处分外，同时在党内应根据党员所犯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及其他严重错误的程度，过去一贯在工作中的表现并结合党员的八项标准和整党的其他规定，分别予以适当的党内处理。

一、对于有轻微的贪污行为而不以贪污论处的党员，必须严格地进行批评教育，令其进行深刻的检讨，在思想上划清界限。对其中在工作中一贯表现好，现在又基本上具备党员的8项标准，一般可免予党纪处分。对其中有工作中一贯表现不好，检讨不深刻，又不够党员条件的，则应分别情况，给以党纪处分；如并犯有其他严重错误者，则可开除党籍。

二、对于在工作中一贯表现好，基本上具备党员8项标准，仅因偶尔犯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错误，情节不严重，而受到行政处分的党员，应酌情予以劝告、警告或撤销工作的处分；但对于在工作中一贯表现不好，又不够党员条件的，则应给以严格的党纪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三、**党员中如有在“三反”运动中受到刑事处分的分子，应一律开除党籍。**

四、党员中如有勾结私商，和资本家站在一起，向国家进行盗窃和资本家分肥的分子，替资本家当坐探，出卖情报给资本家的分子，接受资本家贿赂，掩护资本家向国家进行盗窃或压迫工人的分子，应一律开除党籍。对于一贯表现好，偶尔丧失立场，或偶尔泄密，或受了资本家的欺骗，情节不严重而能坚决改正错误者，则可减轻处分，或不给处分。

五、**党员中如有进行集体贪污，情节严重的分子，应开除党籍。**

六、党员中如有以贪污所得进行放高利贷，或向私人企业入股，或雇人经营农工商业牟利者，在党内应从严给以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七、党员中如有进行敲诈勒索，贪赃枉法者，应从严给以党纪处分，情节严重者应一律开除党籍。

八、**党员中如有堕落蜕化，在政治上、思想上完全变质，无法挽救的分子，应一律开除党籍。**但在工作中一贯表现好，因一时受资产阶级影响而腐化堕落，尚可挽救，本人又愿坚决改正错误者，则可不开除党籍，而给以留党察看或其他处分。

九、**党员中犯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情节严重，在"“三反”运动中拒不坦白、而逃跑或自杀的分子，应一律开除党籍。**

十、对于犯有铺张浪费或官僚主义错误的党员，如一贯在工作中表现好，基本上具备党员8项标准，现在又能改正的，则可免予党纪处分。对其中错误较大的，亦可酌予劝告、警告、撤销工作等处分。如一贯在工作中表现不好，又不够党员条件的，则应予以严格的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十一、**在“三反”运动中如发现有确系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应一律开除党籍。**

十二、关于党内处分的手续，应由各机关、各部队党的组织负责，和处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问题一道作出决定，如系劝告、警告处分，须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报上一级党委批准，如系撤销工作，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等处分，经支部大会通过后，一般党员则须报请上两级党委批准。干部党员，在一般情况下，则应按照干部管理制度，报请主管党委批准（如地委书记、专员须报中央批准）。在特殊情况下，必须先作处理者，应于事后报告，请求追认。被处分的党员如有不服处分者，可以向上级党委申诉。

十三、**此件不在党刊上公布**。地方暂发至地委，部队发至团委。某些县委已进行“三反”并即将进行处理工作者，亦可发给。此件由上述各级党委印发给各机关各部队党委负责同志作为在“三反”运动中党内处理的依据。各地如有意见须对此件加以补充修正者，望经各中央局报告中央，由中央补充修正之。

中央 1952年3月20日

3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必须达到的八项目的的指示》（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一、中南局关于加强私营厂店工人店员工作的指示一件发给你们参考。

二、在此次“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我们必须达到下述目的：

（甲）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情况不明，是无法进行计划经济的。

（乙）**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贪污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狗。各地工会均发生此种走狗及动摇于劳资之间的中间分子，我们必须在斗争中教育并争取中间分子，对于有严重罪行的资本家走狗则予以开除。**

（丙）改组同业公会和工商联合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们及其他业已完全丧失威信的人们出这些团体的领导机关，吸引那些在“五反”中表现较好的人们进来。除完全违法者外，各类工商业者均应有代表。

（丁）**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及大失人望的人，增加一批较好的人，使之成为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纲领和“五反”的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各部分资本家的秘密结社，例如“星四聚餐会”等，则应设法予以解散。

（戊）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尽量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纲领），逐步缩小私人商业；国家逐年增加对私营产品的包销订货计划，逐年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重新划定私资利润额，既要使私资感觉有利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夺取暴利。

（己）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

（庚）从补、退、罚、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

（辛）**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强党的工作**。

以上8项，你们有何意见，望告。其中**关于工人监督生产一项，须待几个大城市选择几个大的和中等的厂店，在取得资本家同意后试办取得经验，方能由中央最后作出决定。**请你们于“五反”进行中注意研究这个问题，并以自己意见随时电告。

中央 3月23日

欲知毛泽东提出的八项目标能否实现，请诸君慢慢往后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2月9日为中央起草的《关于中小贪污分子分别处分问题的补充指示》和3月5日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都是政策性非常强的纲领性文献。在《补充指示》中，他说：“**贪污1千万元以下的中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人数的95%至97%，带着很大的群众性”，“对其中情节严重者应予以刑事处分外，其情节不严重者一般应免予刑事处分”，“由其工作机关按其情况，予以不同程度的行政处分，以示严肃。”“在革命工作中一贯表现好，偶犯贪污错误，数量甚小者，还可以免予行政处分。此外尚有一些迹近贪污、按其实际不能叫作贪污者，不应以贪污论。”**在《标准和办法》中，他说：“**行贿者既如此之多，若只处罚少数人而对多数人不予处罚，则很不妥当，若均给处罚，则受罚者超过全工商户四分之一，打击面又太宽了。”**因此，**“将基本守法户中偷漏税1百万元以下的和偷漏税2百万元以下的分别对待，即1百万元以下者，指出错误，免予补税，2百万元以下者，指出错误，免其1百万元的数目，补其1百万元以上的数目。这样做，可能发生很大的教育作用。”**真是英明之至**！**

**第35章**

**“我们的“五反”斗争，主要不是为了搞几个钱，而是为了改造社会。”**

话说1952年3月27日，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央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处理意见的指示稿时，又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果要求他们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取消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其结果不是造成混乱，就会逼出伪装，这是对统一战线不利的，也是不合逻辑的。**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五反’中，我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

3月28日，毛泽东关于国防和经济建设等问题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致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2年1月28日关于中国海军建设问题的电报和1952年3月15日关于中蒙铁路建设问题的电报已收到。非常感谢您对中国建设问题的关心和帮助**。

**制定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总计划以及计算为此所需经费和外汇实际总额等问题，我们一向希望待到朝鲜谈判前景较为明朗的时候来搞**，情况一旦明朗，我们将立即向您提出关于总计划的报告，以便您对我国的国防和经济建设有个清楚的概念，尔后根据需要和可能决定给我们提供援助的数额和方式。

现在可以认为，朝鲜谈判能够达成协议。如果在4月份可以达成协议，那我们就在11月中旬派某些负责同志到莫斯科向您提出关于国防和国家经济建设方面基本建设五年计划初步方案的报告，请苏联政府在派出专家及提供技术、设备和材料等方面给予系统援助，而且给予贷款。如果您同意，那我们就开始准备该报告需要的所有材料。

**关于您在电报中提到的各种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所需要的援助，现通告如下**：

1、旅顺港海军基地问题。**由于非法的美日和平条约特别是美日安全条约的缔结，我们认为中国政府有根据也有必要请苏联政府让苏军留在旅顺港地区，并在1952年底不撤出旅顺港。**如果您同意，那我们就委派代表准备于今年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就此问题进行谈判。

2、为了加强中国的海岸防御，我们完全同意您在1951年12月22日和1952年1月28日的电报中所作的指示。根据这两份电报所提出的计划，我们进行了初步计算并得出结论，需要向苏联订货的总额约为18亿卢布。为了完成中国海军人员训练计划，上述订货必须在1955年底以前全部到位。但中国政府在这3年内无力偿还这笔外汇。因此我们请苏联政府对中国国防建设包括海军在内以提供贷款的方式予以援助。至于具体计划，我们打算由我国代表于今年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时当面提交。考虑到关于中国海军建设问题的谈判推迟进行是不适宜的，因此我们打算于4月上旬派出中国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同志及其参谋长罗舜初同志和两名中国海军的工程和造船专家到莫斯科与苏联海军部的同志进行谈判。如果您同意，那我们就下达指示，派这些同志前往莫斯科。

3、按我们计算，从1951年2月1日开始，你们按提供军事贷款协定条件3次提供的军事贷款总额的剩余额是4亿多卢布。我们打算用这4亿多卢布购买我们的空军所必需的飞机、设备和弹药。详细申请单另行电告。用这4亿多卢布购买飞机和航空物资之后的余款购买其他武器装备的申请单只能在上述物资的价款结算清楚之后才能提出。

4、**给60个步兵师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问题**。除1951年给4个师提供的武器和军用物资以外，按修改后的计划，另一批物资提供应在今年4月开始。国内军队整编也将在今年4月开始。**如果没有新的变动，我们希望在1952年获得16个师的武器和军用物资，1953年获得20个师的，1954年获得20个师的。**在我们所获得武器装备的4个师中，有3个师的武器装备将转交朝鲜人民军前线。至于60个步兵师武器装备的军事贷款，我们也打算委派代表前往莫斯科就其办理的具体程序进行谈判。

5、从中国北部开始延伸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铁路修建问题。**如果您认为修建这条铁路比修建从中国西北部通往苏联的铁路更为紧迫而且更有必要，**考虑到苏联同时开始修建该铁路从乌兰巴托向中蒙边境延伸的这一段，则我们准备于今年下半年开始进行勘察工作，于1953年开始修建。至于这一铁路的运行路线，我们认为它始于集宁站或包头站进入中国的绥远省，经中蒙边境的哈顺延伸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乌兰巴托，比从张家口延伸到乌兰巴托要好。当然，最后决定要在对该铁路修建路线进行预先勘察之后才能做出。

**顺便说说，如果修建一条从中国西北部的兰州经玉门、哈密、乌鲁木齐到中苏边境的霍尔果斯，总长2000公里，与苏联的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干线相接的铁路，则这对苏联和中国都更为有利。**我们不知道苏联政府对此问题的意见，苏联政府在修建这一铁路的事业中能否以铁路设施援助我们。

6、**种植橡胶树问题。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多次研究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急需苏联专家方面的援助，以及技术援助。但按中苏合资公司形式创办中苏股份公司来开发橡胶，在中国目前政治情况下不太合适。因此对种植橡胶树问题，我们建议同苏联政府缔结提供贷款和技术设备协定，该协定规定保证以提供生产的橡胶偿还贷款，并给苏联提供年产橡胶量的50％以上，而且按优惠价格提供，即按世界市场价打一定折扣。**

对上述两个问题，如果您同意，我们将委派代表于5月中旬前往苏联，与苏联政府进行具体谈判。至于我们对栽种橡胶树的专家和设备的需要，我们将给您另发电报告知。

请对上述所有问题给予指示。

此致敬礼！

毛泽东 1952年3月28日

1952年4月1日，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学习刚刚重新发表的哲学著作《矛盾论》时，有人在讨论中说：

“我们和美帝国主义有没有统一性或同一性？”

这个问题一提出，众人各抒己见，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正反双方互不服输，谁也说服不了谁。反方的保健医生王鹤滨自荐去向毛泽东请教。他走进菊香书屋的院落，来到毛泽东办公室门口，又停下了脚步，迟疑起来，心想：为了一个学习问题，去打扰毛泽东，合适吗？正在此时，毛泽东和江青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毛泽东问：

“王医生，有什么事情吗？”

王鹤滨只好说：

“我们正在学习主席的著作《矛盾论》，有的同志提出，我们和美帝国主义有统一性或同一性。我不明白，我们怎么会和美帝国主义有统一性或同一性呢？”

毛泽东肯定地回答说：

“我们和美帝国主义者是有统一性或同一性的。”

“主席，是个怎么样的统一性或同一性呢？”

毛泽东看着王鹤滨固执而幼稚的眼神，改变了直接回答问题的方式，他问道：

“我们中国在什么地方呀？”

“在地球上。”

“对！中国在地球上。美国呢？也在地球上，而且位置正好与我国相对着。它在地球的那一面，中国在地球的这一面，但都是在地球这个统一体上的，对吗？”

毛泽东看着王鹤滨，知道他对中国和美国在空间上的统一明白了后，又接着解释道：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场上，缺少一方就讲不成抗美援朝的战争了。”

江青插话说：

“问题应该是强调我们同美国帝国主义者的斗争性，而不是我们与他们的统一性！”

4月2日，斯大林关于苏军撤出旅顺等问题致电毛泽东，全文如下：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

请将下列各点转告毛泽东同志：

“第一，迄今为止，我们认为，**苏军尽快撤退出旅顺港完全符合您的愿望**。正因为如此，在1950年根据您的愿望缔结条约时已做出决定：即使不缔结对日全面和平条约，苏军也不迟于1952年撤出旅顺港。**您3月28日电报提出的问题完全不同了**。您现在抛开条约而认为苏军应不定期或在1952年以后留在旅顺港，说是因为日美缔结和平条约而使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您坚持这一点，则我们同意满足您的要求。**但这里必须注意，这种违约应合理地给外界提出论据，以免得出印象，认为是苏联做出这样的决定来束缚您。**可能需要缔结新的旅顺港条约。关于这一切，应当同您或您的代表团进行谈判。

第二，**我之所以在电报中曾提醒您不要忘记乌兰巴托-张家口铁路问题，不仅因为朱德同志提出过这个问题，还因为1950年当您在莫斯科时您本人也曾把这条铁路的问题作为中国的重要事情提出过。**我们认为，从中国的利益来看这条铁路是最必要的，因为：（1）它是迅速通往中国首都给她提供援助的最短路线；（2）修建这条铁路要比修建新兰铁路快好几倍；（3）由海路给您供应液体燃料不可靠，于是乌兰巴托-张家口或乌兰巴托-集宁铁路就是运输液体燃料最短最有保障的路线。

**从您的电报中可以看出，您不相信铺设这条铁路线是适宜的，因为您把它同新兰铁路加以对比。既然这样，我们可以撤销修建乌兰巴托-中国的铁路线问题。**至于铺设新兰线，则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个新问题，如果您愿意，那我们就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对其他问题，过几天再回答。菲利波夫”

请电告执行情况。

4月6日，毛泽东起草了给西南局、西藏工委并西北局、新疆分局“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他写道：

“**西藏至少在两三年内不能实行减租，不能实行土改。**”“**我们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但也要准备对付坏分子可能率领藏军举行叛变，向我袭击，在这种时候我军仍能在西藏活下去和坚持下去。”**

“西南局4月2日电报的全部意见中，只有一点值得考虑，这就是短期内改编藏军和成立军政委员会是否可能和得策的问题。我们意见，**目前不要改编藏军，也不要在形式上成立军分区，也不要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仍旧，拖下去，以待一年两年后我军确能生产自给并获得群众拥护的时候，再谈这些问题**。在这一年两年内可能发生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上层统战政策发生了效力，西藏群众也逐步靠拢我们，因而使坏分子及藏军不敢举行暴乱；一种是坏分子认为我们软弱可欺，率领藏军举行暴乱，我军在自卫斗争中举行反击，给以打击。以上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都对我们有利。”

在一个周末的傍晚，毛泽东的值班卫士通知保健医生兼生活秘书王鹤滨：

“王秘书，主席叫你去陪吃饭。”

王鹤滨的爱人在上海医学院上预科，大儿子王子冀跟着他生活，他刚让朱宝贵从托儿所把孩子接回来。此时，朱宝贵已经走了，没有人可以托付照顾儿子，他只好抱着孩子，急步向菊香书屋走去。

毛泽东从起居室里走了出来，看到多了一个小朋友，增加了兴趣，他问：

“这位小客人是谁呀？”

王鹤滨说：

“主席，这是我的大孩子，叫子冀，生在河北省平山县的朱豪村。”

“你还有几个孩子？”

“还有一个儿子，生在北京，叫子燕。”

“王医生，很好嘛，身兼二职哟，既是爸爸又是妈妈。”

毛泽东说罢，弯着上身，把脸贴近孩子的头部，和蔼地问孩子：

“小娃娃，你几岁了？”

孩子没有说话，怯生生地伸出4个手指。毛泽东又微笑着问：

“啊，你的妈妈呢？”

“妈妈，妈妈上学去啦。”

毛泽东又问：

“你想妈妈吗？”

“想妈妈，我想妈妈。”

问完了，毛泽东又为孩子夹菜。孩子嘴里吃着，视线却停留在一小碟红绿相间的炒辣椒上。毛泽东夹来的菜，他也不管不顾了。毛泽东看见了，高兴地说：

“啊！小家伙，你想吃炒辣子啦，是吧？这东西可好吃哩！”

说着，夹起一截红辣椒，在孩子面前晃晃。果然，孩子那张小嘴凑了过去。王鹤滨想，这湖南口味的炒辣子，自己吃一口都要出汗呢，孩子要是吃了，哭闹起来怎么办？主席这餐饭也要搅得吃不成了。便把孩子拉了过去，说：

“主席，不要给他吃。”

毛泽东就把辣子放到自己嘴里，而且装出很好吃的样子嚼了起来。孩子双目紧紧地盯着毛泽东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又把眼睛盯在那碟炒辣椒上，右手的小食指也戳在嘴唇上。毛泽东又夹起一段红辣椒对孩子说：

“你吃吧，可好吃了，不要听你爸爸的。”

孩子又伸长脖子要吃辣椒。王鹤滨说：

“主席，不能给他吃！”

说着又把孩子拉了过来，孩子奇怪地看着他爸爸。毛泽东第二次受到阻拦，就把夹起的辣椒放回碟子里，带着批评的口吻说：

**“你让他吃嘛！怕什么？让他上上当。不要把孩子教育成那样，让孩子认为大人都是好人，大人也有坏人嘛！”**

4月7日，**毛泽东决定将彭德怀从朝鲜战场调回北京，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由陈赓代理志愿军司令员和政委**。第3兵团由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代理司令员兼代政委。

4月9日，斯大林关于苏军撤出旅顺等问题致电毛泽东，电文内容是：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转毛泽东同志

续上电（即续4月2日致毛泽东电——笔者注）：

“第四，关于按计划给60个师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问题。到1952年底，如果没有困难，我们力求满足您的要求，力求给您提供16个师的武器。

第五，我们研究了您关于在1952年给20个航空兵团提供飞机的电报。**根据我们之间按中国空军发展计划达成的协议，我们同意在今年继续给中国提供飞机，但考虑到我们的能力，以及要按同我们西方的人民民主国家已缔结的协定提供飞机，在1952年底以前剩下的9个月中，我们只能给您提供15个团的飞机，即450架。**我们的军方认为，在一年之内要建立大量航空兵是困难的，因为除飞行员之外，还需要大量的工程专业人员和技术员，以及不少于10-15个机场及其飞行服务和保障器材。迄今为止，在中国由于上述原因还有4个团的米格-9喷气歼击机被搁置在仓库中未加利用。至于您在电报中所提到的教练机和其他各种飞机，只有在收到您的具体申请单之后才能对此问题进行研究。

第六，我们同意您订购岸炮、护卫舰以及其他海军武器和物资。关于这些武器和物资的交货期限，将与贵国海军代表另行商定。显然，1955年年底前全部交货是不可能的，必须延长2-3年。

第七，我们同意您关于就支付60个师和海军所需武器和物资价款条件问题与贵国代表进行谈判的建议。我们建议在谈判中还根据我们商定的提供计划确定所提供的航空物资的支付条件。

第八，我们准备于5月份接待贵国代表团商讨上述问题，并同意中国海军代表于4月份来莫斯科。第167号密码电报。结束。菲利波夫”

1952年4月9日

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并告各大军区党委转各省军区和军党委：

**在这次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中，从铁路、航运、邮政、公安、司法、税务等部门，并从很多地区，暴露出为数甚多的国家机关内部人员包庇或勾结奸商、毒贩、流氓、甚或反革命分子贩运毒品、金银、私货的各种罪恶活动，在若干部队工作人员中亦有发现。**这些罪恶活动给予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是很惊人的。这是旧的中国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污毒，全国解放以后在很多地区虽曾有所减少，但就总的情况看来，问题依然严重存在。为了根除这种旧社会的恶劣遗毒，在全国范围内有重点地大张旗鼓地发动一次群众性的运动，来一次集中地彻底地扫除，是十分需要的。为此，特做如下各项指示：

一、首先集中解决贩毒问题。贩卖毒品、贩卖金银、走私三者虽互相牵涉，又往往同时暴露，但以毒品流行对于国家的损失最大，对于人民的毒害最深，因此，在这次运动中应集中解决贩运毒品问题，如果同案牵涉到贩卖金银、走私问题时可并案处理。对于与毒品无关的贩卖金银、走私案件，可按政府已公布的法令处理。对以反革命为目的的毒犯，应以反革命论处。

二、**要根绝制造、贩卖毒品或包庇掩护毒犯的现象，必须依靠广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斗争的积极性。**因此，目前正在进行“三反”、“五反”的地区，应对此问题引起重视立即指定专人着手整理和研究现有材料，继续发现内外线索，遇有重大案件，组织专案侦察，适时破案，首先做到掌握全盘情况。然后在“三反”、“五反”运动末期，腾出手来，有重点地在机关和社会上运用现有的“三反”、“五反”的队伍开展一次肃清毒品流行的运动。“三反”、“五反”即将结束的地区，机关和社会即可同时开始，或先从机关开始，或先从社会上开始，均应注意密切配合，以收内外夹击之效。目前对“三反”、“五反”中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除情节特别严重，不得不立即逮捕者外，一般可暂不逮捕，已经逮捕起来的毒犯，也暂不结案，待反毒运动发动后，集中处理，以壮大声势。

三、铁路、交通是毒贩借以偷运毒品的线路；公安、司法、税务等部门是毒贩巴结收买内部人员求得包庇掩护的主要对象；边防、海关是毒品出入国境的要隘。所以这次运动应以铁道、公路、海运、河运、邮政、海关、公安（包括边防）、司法、税务等部门做为重点，在各级人民政府集中领导下，认真进行，务将一切毒犯肃清。至于地区，一般应以大中城市、边防口岸以及过去烟毒盛行的地区为重点，即以毒品之主要产地，毒品的集散枢纽和出入国境的“关口”，为展开运动的重点地区。至于哪些另外地区应作为重点，由各中央局自行选定。

四、对于运动中被揭发或自动坦白的毒犯，在处理上应采取严厉惩办与改造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打击惩办少数，教育改造多数，即：**制造者、集体大量贩卖者从严，个别少量贩卖者从宽；主犯从严，从犯从宽，惯犯从严，偶犯从宽；拒不坦白者从严，彻底坦白者从宽；今后从严，过去从宽。打击的重点放在集体大量的制毒、贩毒犯与严重违法的工作人员。**对情节不是特别严重，只要彻底坦白，真诚悔过，检举立功者，可减轻或免予处分。**对于单纯吸食毒品者，不应作为这次运动的斗争对象。因为吸食毒品的人，数量很大，不可能在这次运动中完全戒绝，也不应该把他们同制毒、贩毒犯同等看待。**而且只要能够做到根绝制毒、贩毒的现象，则吸毒的现象，将会逐渐消灭。

五、关于种毒问题，目前主要发生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应在今后工作中逐步解决。内地的种毒问题，必须检查禁止，在这次反毒运动中，如不能同时解决，则可在运动结束后，另行处理。

中央 1952年4月15日

4月20日，一封宽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函，寄往南方，信封上面写着：湘潭第4区云源乡杨林 毛泽荣同志收 毛寄。

前文已经说过，毛泽连和李轲从北京回韶山时，毛泽东曾托他们捎去对堂弟毛泽荣一家的问候和礼品。此后，毛泽荣多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北京看望三哥。毛泽东就此事给堂弟写了这封信。毛泽荣接到信后，打开信封，几行灵动有力的毛笔字映入眼帘：

泽荣贤弟：

多次来信，均已收到。你今年不要来京，明年再讲罢。顺祝

健康！

毛泽东 1952年4月20日

毛泽荣看罢信十分不悦。

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4月22日，毛泽东关于苏联向中国提供飞机问题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致菲利波夫同志：

1、我们同意苏联政府关于1952年向中国航空兵提供够装备15个航空兵团的各型飞机的决定。**今年年底前，现有8个航校将有足够组建26个团的飞行和技术人员毕业**。此外，现在还有一个轰炸机团没有飞机。因此，除了已向苏联订购的装备15个团的飞机、以及库存的装备4个团的米格-9飞机外，还有8个团有飞行技术人员而没有飞机。这些团可能被分配到各相应部队中去接受飞行训练（按每两架飞机3个飞行员分配）。

2、**在我军航空兵现有19个米格-15歼击机团中，有15个团（配置在安东及其附近各机场）参加朝鲜作战。**由于作战和训练中的损失，**19个歼击机团共缺少154架米格-15飞机（按每团31架飞机的编制计算）**。为了提高战斗力、保障继续作战，以及保障飞行人员有相应数量的飞机来继续提高飞行技术，**我们请苏联政府除了您今年4月9日来电中所指的用于装备15个团的飞机外，再允许中国政府在1952年从苏联政府那里获得100架米格-15飞机。**我们希望您能尽快地把这些飞机派往中国。请把您对这个问题的决定告诉我们。

3、1952年各型教练机所需数量详细申请单，已通过克拉索夫斯基同志向您寄出。为了保障各航校飞行训练的正常进行，我们希望您同意申请单中的飞机数量。

此致敬礼！

毛泽东 1952年4月22日

4月2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因北太平洋公约组织军队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被提名为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而辞职，任命李奇微接替艾森豪威尔职务；由美陆军野战部队司令马克·克拉克，接替李奇微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及美国远东军总司令。

4月2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对待富农的政策问题给华东局的复示”，他写道：

华东局并告各中央局、分局请转各省、市、区党委：

关于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对待富农的政策问题，华东局4月17日来电所提各项意见，中央认为基本是正确的，但须做如下的补充：

一、**对现在已参加了互助组或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富农分子，如果他是带雇工入组入社的，则应坚决向农民解释清楚，经过组员社员多数通过，把他清洗出组出社。如果他原系土改前的旧富农或土改后的新富农，现在并未带雇工入组入社，而是利用互助组内工资订得低，利用农业合作社内土地、耕畜、农具的报酬高，以剥削别人劳动者，则可按来电第二项办法处理，使之不能在组内社内进行剥削。但如果农民愿意利用他的耕畜和农具，则不必一定要逼使他出组出社；**并应根据4月9日中央转发各地参考的陕西省委关于这一问题的意见，从政治上组织上对他们加以控制，防止他们进行破坏。

二、**但另一方面，也不要把互助组、合作社内耕畜的工价和农具的使用报酬压得太低，否则对于奖励发展耕畜和购置农具是不利的，对于目前尚缺乏耕畜和较大的农具的多数新翻身农民也是不利的。**有些农民不愿将富农清洗出组出社的主要原因，即在于要利用他们的耕畜和农具。

三、对于富农与富农自行组织的所谓“互助组”，应明确指出它是富农的合股组织，并不是互助组。因为**互助组是劳动农民在个体经济基础上，本自愿互利的原则，集体劳动，互助合作；而富农与富农之间的合股组织，是富农联合起来剥削雇佣劳动的，富农与雇农之间是雇佣与被雇佣，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根本不是互助合作的关系，与互助组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我们虽然不要以法律禁止富农为了生产而相互联合起来，但应不准富农盗用互助组的名义，以免在农民中和农村干部中引起思想混乱。**

以上各点，连同华东局来电一并发各地参考，并可在党刊上发表。

中央 4月29日

4月30日，班禅额尔德尼给毛泽东发来一封电报，电文中写道：

敬爱的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

在您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已于4月28日顺利到达拉萨……在当天下午和达赖喇嘛会晤于布达拉宫，对祖国的伟大成就及我们今后的团结，实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等工作的问题，彼此做了友谊交谈，从而使我坚信今后在您的正确领导下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西藏军区的积极帮助下，与达赖喇嘛亲密团结，彻底实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把西藏建设成为自由幸福的新西藏。特电奉闻。谨祝

身体健康！

班禅额尔德尼

195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清理“中层”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

1. 北京各高等学校在“三反”运动中进行了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收效很大。各地高等学校中的“三反”运动，在中央3月13日指示后，也陆续开始转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阶段，这个运动对于高等学校来说，是政治改革的一个重大步骤，这个运动的目标是：**1、彻底打击学校中的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如崇美、亲美、恐美、反共、反苏、反人民的思想），划清敌我界限。2、暴露和批判教师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如宗派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划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初步树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3、肃清学校中的贪污浪费现象，树立爱护公共财物、廉洁节约的新风气。4、具体了解高等学校教师的政治情况与人事情况，以打好在学校中进行清理“中层”工作和进行教育改革的基础。**

根据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经验，在这次运动中，可以而且应该让60%至70%的教师，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检讨以后迅速过关。15%至25%的教师，是要经过适当批评以后再行过关，13%左右的教师，是要经过反复的批评检查以后始予过关；只有2%左右是不能过关，需要作适当处理。这样的比例大体上是合适的。这样做，我们就能做到争取、教育多数教师，孤立和打击少数坏分子，以达到团结改造高级知识分子的目的。各地可参考北京、上海经验，掌握适当比例，防止“左”或右的偏向。

二、具有严重政治问题或思想十分反动不能过关的教师，人数既甚少（根据北京、上海情形约2%左右），情况又各人不同，对他们的处理办法，应视各人具体情况、社会地位、检讨程度、业务能力等等条件，分别考虑决定，有些人并可留待清理“中层”时处理，但这些人除一部分可以仍留校教书外，决不能让其继续担任校内各种行政领导职务（关于北京各大学处理此类教师的经验另行通报你们以供参考）。**属于此类教师的处理应经中央局批准，其中校长、副校长、院长、系主任及全国著名之教授的处理，应经中央批准。**

三、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完毕以后，各地可以选择很少数的重点学校，集中干部力量，接着即转入清理“中层”的工作。北京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已经这样做了，根据他们的经验，只要事先做好准备工作，转入清理“中层”工作是很自然的，而且可以迅速收效。学校清理“中层”工作的方针，除照去年11月30日《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执行外，并须注意下列各点：1、必须有充分准备（包括干部、材料、计划、步骤等），集中力量搞完一两所学校以后，再抽出力量转入其他学校。2、除依靠学校党团和群众力量外，当地党委必须选派一些得力干部，并密切配合公安部门人员，组成工作组到学校中去实际领导这一工作。工作组并可吸收其他高等学校（尚未进行清理工作的学校）的少数党员干部参加，以便他们取得经验，回到本校去进行清理“中层”工作。3、交代历史应先从党、团员开始，动员党团员带头，树立模范然后推及党外。4、每个学校清理工作时间不要太长，以3个星期左右为宜。为了集中全校力量，进行清理工作，在必要时，并经过当地教育部（厅）批准学校可以暂时停课，但时间不宜太长。在进行工作中应首先将大多数无问题或问题不大的人迅速解放，以便集中力量来处理较少数问题复杂的人。对于学校中有政治问题的人，除了极少数有血债或严重的现行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这种人不是每校都有的）以外，其余都不必逮捕，而尽量采取改造和教育的办法来处理，这样更为有利。5、进行清理“中层”的工作必须坚持不追不逼，启发自觉的原则，这是保证清理工作不发生偏向的主要关键。另外，又要保证清理工作的严肃性，认真负责地把应当弄清楚的问题尽可能审查清楚，不能潦草从事。做好学校清理“中层”的工作，除开正确的领导外，一方面要依靠校内群众的发动，一方面要依靠公安机关的配合和协助，二者不可缺一。6、对于校长教授等处理的批准权与第二项规定同。清理学校“中层”工作是改革高等学校的重要关键，必须认真做好这件工作。

四、估计经过“三反”运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清理“中层”工作以后，学校中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实际支配地位被打倒了，对教师学生的政治情况我们获得充分的了解了，学校中党的威信大大的提高了，教师学生的政治觉悟也大大的提高了，就需要进一步考虑在高等学校中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机构，以便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巩固和扩大高等学校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阵地，并在这样基础上来贯彻高等教育的改革。因此希望你们在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清理“中层”工作的过程中考虑下面两个问题：

第一，在清理“中层”工作中，加强学校中执行这个工作的机构（一般称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充实它的干部，准备在清理工作完毕以后，选择少数几所条件较好的学校，首先将这种办公室转变为属于学校行政系统之内的经常性的政治工作机构，这种机构的名称，可以为“政治辅导员办公室”，将来可以发展为“政治辅导处”。它的任务是管理全校的政治工作，包括领导思想学习，掌握教师学生政治情况，历史材料，主持毕业学生政治鉴定，领导全校教职员工社会活动等等。这种政治工作制度目前尚无经验，须从工作中去逐步创造。首先是重点试验，然后逐步推广。北京燕京大学准备首先试行。希望通过这种机构逐渐培养出一批得力的学校行政干部。

第二，在清理“中层”工作完毕以后，应该在教师中开始建立有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一时尚不能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学校中，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结束以后，亦须布置一定的思想学习，这些工作必须有计划和准备。

对于上述两个问题，请你们研究后向中央提出意见。

今年暑假前，希望在全国各主要大学中大体上完成清理“中层”工作，其中极少数学校，并可试行建立政治辅导员制度，其他学校的清理“中层”工作可在暑假中进行。一部分条件较差的学校亦可推迟到下学期或寒假中去进行。

各地接到此指示后，望详细研究，并将意见和进行的步骤计划报告中央。

中央 1952年5月2日

在春夏之交的一天，毛泽东邀请丁玲到中南海吃午饭，饭后又一起泛舟中南海上聊天。毛泽东问起丁玲对周扬的看法，丁玲便不假思索地讲了一通。

后来，丁玲的好友杨桂欣在1993年《炎黄春秋》第7期上发表了《“我丁玲就是丁玲”》一文，文中转述了丁玲关于那次和毛泽东一起吃午饭一起泛舟中南海上聊天的前前后后的情况回忆。丁玲是这样说的：

“让我最后悔的，还是在中宣部当文艺处长的时候，江青也在中宣部挂职。一天，中宣部开会，江青来了。上午散会时，江青突然对我说：

‘丁玲，中午到我们那里吃饭去。’

我说：

‘这怎么可以呢？’

江青便拉下脸来：

‘你以为是我让你去的吗？’

我明白了，便跟她一起去中南海，和毛主席一起吃午饭。主席中午不休息，叫了一条船，在中南海上游着，同我聊天。这次，主席先问我对周扬的看法。看来，他这次找我，就是专为此事。我一个劲儿说着，全都是说周扬的缺点，当然都是以事实作依据的，只谈具体的情况和我自己的看法。听着，毛主席突然问我：

‘周扬总还是有些优点吧？！’

我真后悔自己不会做人，为什么不先说周扬的优点和长处呢？一个人，一个革命者，都是既有优点和长处，也有缺点和毛病的，应该一分为二呀。而我在这个关键时刻，偏偏忘记了一分为二，忘记了谈周扬的优点和长处！后悔也来不及了。不等我补充自己的意见，毛主席便对我说了：

‘我看，周扬同志还是有些长处的，他有行政组织工作的能力，也有一定的理论水平。而在这两个方面，我看你丁玲是不如他呢！’

毛主席说的是实际情况，我当然服气。但我为什么在他征求我对周扬的意见的时候，竟一个劲儿说周扬的缺点而不说他的长处呢？毛主席这次找我谈周扬后，我就很少到毛主席那里去，甚至根本不去，也没有产生过主动找毛主席谈情况、谈心的念头。现在想来，这是自己吃大亏的一个客观原因。要不然，我也常去找找主席，那么，那些打我‘小报告’的人，不管他们用嘴巴，还是用作协党组报告的名义污蔑我，都决不会容易得逞的。这就是教训啊！”

5月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问题的指示》：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委、区党委、北京、天津、沈阳、济南、青岛、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广州、重庆、成都、西安及其他已经进行“五反”的城市市委：

一、谭震林同志5月5日报告一件，杭州市委5月6日报告一件，上海市委财委5月6日报告一件，现均转发你们。中央认为这些报告是正确的，望各地对这些报告所提出的问题认真加以研究，并予仿行。

二、**在“五反”斗争中，工作组和工人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时必须合理地降下来，使合乎经济情况的实际，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之后还有盈余**。谭震林同志提出上海清算出10万亿违法所得数，超过了资本家1951年的实际所得，他们准备降至4万亿，提出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比例。我们认为二分之一的比例太多，三分之一的比例则稍微少一点，以照三分之一略多一点为适宜。薄一波同志回京报告，广州新药业原定违法所得1千亿元，由我们几次主动核减，最后定为360亿元，出于资本家意料之外的宽大，大家高兴。这个比例即是比三分之一稍微多一点。请各市委衡量全局，大体按此比例定案，我们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

三、补退时间，除少数确能和确愿早日补退者以及极少数应没收者外，大多数资本家的补退时间一律推迟到9月或10月开始为适宜。数大者可分多年补退，一部分还可作为公股不要交出现金。这样于活跃市场防止失业是完全必要的。**罚款可只施行于极少数人，判刑尤其要少，**杭州的处置很好。

四、各城市应照杭州那样，由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亲手审查几家大厂店，做出模型，说服干部和工人（必须适当地着重地去说服他们），同时即向一切违法资本家宣示我们的宽大和认真的态度，显示**我们的“五反”斗争，主要不是为了搞几个钱，而是为了改造社会。**杭州市的经验很具体生动，值得大家一看。

五、此外调整城市交流，在付工缴费方面不应当采取苛刻政策，应当说服干部积极从事经济工作，不要采取消极态度等项都是很重要的，天津市委亦提出了工缴费不应苛刻的意见，统望各地注意。

六、**工人监督生产一事，势在必行，但不宜行得太急，中央同意目前只在少数厂店举行典型试验，待资本家喘过气来，到秋季或冬季再行逐步推广。**

七、**工人福利问题，必须解决，但又必须解决得合乎实际的经济情况，不能太低，但又决不可太高，致陷自己于被动。**

八、总之“三反”和“五反”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毫无疑义应当进行“三反”和“五反”，不进行这一正义的斗争我们就会失败，**现当“三反”“五反”最后定案之际，我们必须本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的原则，好好结束这场斗争。**你们对于上述各点有何意见，请即电告为盼。

中央 5月9日

5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转发一个报告的批语（参看《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中写道：

“**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的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欲知“三反”、“五反”运动如何结束，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2年3月28日关于国防和经济建设等问题致斯大林的电报中说：“**按中苏合资公司形式创办中苏股份公司来开发橡胶，在中国目前政治情况下不太合适。因此对种植橡胶树问题，我们建议同苏联政府缔结提供贷款和技术设备协定，该协定规定保证以提供生产的橡胶偿还贷款，并给苏联提供年产橡胶量的50％以上，而且按优惠价格提供，即按世界市场价打一定折扣。”**他在争取**“苏联专家方面的援助”、“提供贷款和技术设备”、**解决**“种植橡胶树问题”之**时，而不忘维护民族和国家的主权，婉言谢绝了苏方关于“**中苏合资公司形式创办中苏股份公司来开发橡胶”**的提议，巧妙地提出以中方“**生产的橡胶偿还贷款，并给苏联提供年产橡胶量的50％以上，而且按优惠价格提供，即按世界市场价打一定折扣。”**厉害吧，实在是高明！

**第36章**

**“共产党员不准许剥削他人（不论是封建剥削或资本主义剥削），不**

**准许党员去作富农，也不准许党员去作资本家、地主或高利贷者。”**

话说1952年5月16日，毛泽东应陈嘉庚之邀，欣然为集美解放纪念碑题词，写了“集美解放纪念碑”7个大字。他还给陈嘉庚写了一封回信，同时寄上了题字。他在信中写道：

陈委员：

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写了集美解放纪念碑7字未知合用否？先生近日身体如何，时以为念！

顺致敬意

毛泽东 1952年5月16日

5月2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推迟县区乡的“三反”和中小城市的“五反”的指示》，全文如下：

中南局转湖北省委并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

中南局5月15日和湖北省委5月10日电悉。你们关于县区干部“三反”计划的原则是好的。但是，由于过去各地“三反”“五反”的影响，使社会经济生活和城乡交流发生了阻滞现象，现在已经进行了“三反”“五反”的地方，正在结束“三反”“五反”，并大力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与城乡交流，对于尚未进行“三反”的县区乡和尚未进行“五反”的城市，中央已决定一律推迟进行，即在秋征以前凡未发动“三反”的县区乡和“五反”的城市，均不再发动，待今年秋征以后或明年再有步骤地来进行。因此，你们准备在6月开始进行的县区“三反”运动不要进行，并告诉所有县区乡的干部：**在目前应集中力量作好生产、城乡交流及土改复查等项工作，在这些工作中立功和改正错误，有罪者，在将来的“三反”中亦可将功折罪，而不要不安心工作，一错再错。在此期间，如有个别贪污分子自愿交代贪污事实及交出赃款者，亦可接收，但不要发动群众运动去追查。**对于集中休整的土改工作队和业已调换工作的干部，则可以参照广西省委整顿土改工作队的经验进行整顿。

　 中央 5月23日

5月23日，班禅额尔德尼致电毛泽东，他在电文中写道：

敬爱的毛主席：

由于您的英明领导和伟大的民族政策感召，于1951年5月在祖国首都胜利地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使西藏人民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羁绊和压迫，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给西藏人民开辟了走上幸福繁荣的新道路……使我等行辕全体同仁……得以光荣而安全地返回西藏，和达赖喇嘛亲密团结的晤面，和西藏人民亲密地团聚了，**使西藏民族内部将近30年的分裂在您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从此团结起来了**……西藏僧俗贵族官员和广大僧俗群众从实际行动和生活中认识到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是真正为西藏人民谋幸福的伟大纲领，是西藏人民的光明表现！这是西藏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藉此庆祝《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1周年纪念的伟大节日，班禅谨以特别兴奋和感激的心情，向您——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致以崇高敬礼！

班禅额尔德尼 敬上

这一天，达赖喇嘛也致电毛泽东，向毛泽东致敬并庆祝《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1周年。

毛泽东迅即复电给达赖和班禅，他在电文中写道：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先生：

感谢你们5月23日的来电。值此西藏和平解放周年节日，你们来电表示愿为彻底实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而努力，极为欣慰。我庆祝你们和全体西藏人民更加亲密地团结起来，与全国各兄弟民族人民，同心协力，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和繁荣幸福的新西藏，并庆祝你们的成功和健康！

毛泽东 5月23日

不久，班禅一行在6月间离开拉萨，返回到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实现了第9世班禅生前的最大宿愿。

5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

**“三反”运动对于全国人民来说是一次最深刻最生动的教育，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是一次严格的考验，对于共产党的组织来说，是一次实际有效的整理，同时又大大的创造了建党的有利条件。**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各地原订的整党建党计划，除方针与政策不应有所改变外，在整党建党的步骤上与方法上必须适应新的情况加以改变。

一、全国党、政、民各级机关的“三反”运动，现正陆续进入处理阶段和建设阶段，对于犯有错误的党员，结合党员标准进行处理，中央已有指示。而在“三反”运动的建设阶段中，结合党员的8项标准进行一次教育，是能够更好地提高所有党员的觉悟程度与改正某些党员的缺点和错误的。此项作法，在利用“三反”建设阶段的机会，所费时间并不很长而收效甚大。至于有些机关，目前因业务繁忙，时间紧迫，不可能抽出时间学习党员的8项标准，则应在“三反”运动的最后阶段中先解决党内的主要问题，如划清思想界限，清洗坏分子等。以后仍须抽出一定时间，进行党员标准的学习，以便普遍提高党员的觉悟程度与解决“三反”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全国各级机关的整党工作，应争取在1952年内全部完成。

“三反”运动使各级机关中原有的非党积极分子受到了锻炼，同时涌现出大批新的积极分子。党对这些积极分子的思想情况与历史情况，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因此，应在各级机关中积极地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和接收新党员的工作。要求今后一年内（1952年6月至1953年6月）**在机关60万青年团员及其他优秀分子中，按接收新党员的手续，吸收20%的人入党，这是完全必要与可能的。**

二、在工厂、矿山、企业中的“三反”“五反”运动，大大地提高了工人、店员的觉悟程度。“目前首先应该着重在产业工人中吸收新党员与建立党的组织”的条件更加成熟。因此，应**争取在一年之内随着工矿企业中的民主改革、生产改行以及增产节约、生产竞赛等运动，有领导、有计划地分批接收工人、店员中的优秀分子40万人入党**。具体要求：有全国360万产业职工中接收10%，150万店员中接收3%。至于全国现有工、矿、企业中的近2万个党的基层组织，仍须在“三反”“五反”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所有党员的条件。在城市集中的条件下，应采取轮训或业余训练的办法，学习党员的8项标准，并根据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精神，清除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妥善地处理丧失党员条件及不够党员条件的党员。争取在今年内，使所有工、矿、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完成整党计划，达到整党的目的与要求。

三、**全国大学、专科学校，现有15万学生**，其中党员很少。全国约150万左右的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党员更少。这说明我们党过去在学校中的工作，是很薄弱的。但经过抗美援朝、思想改造以及此次的“三反”运动，情况已大为改变。**高等学校的学生群众与大、中、小学的大部教职员，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日渐提高，尤其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与清理“中层”运动中，涌现出大批的青年优秀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在不断地斗争中，提高了阶级觉悟，更加相信共产主义，于是纷纷要求入党。对于这批经过锻炼的革命知识分子，如果采取不敢或不肯接收入党的关门主义的态度，是错误的。为此，在一年之内要求：**在各学校的“三反”、思想改造和清理“中层”之后，在大学生中接收10%的人入党；在大、中、小学的教职员中接收3%的人入党。**这样在学校中积极地进行发展党员的工作，才能**加强党在学校教育工作中的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巩固和扩大学校教育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贯彻学校教育的改革工作，更好地、更多地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

四、在农村中，因为尚未进行“三反”，大部地区的区级机关和一部地区的县级机关亦未进行“三反”，现在全国县区机关正集中全力进行生产和城乡交流的工作，在秋收以后，全国都要进行秋征，在新区的农村中还须进行土改及土改复查和民主建政等项工作，在老区的农村中则须进行整党建党工作。因此，在农村中的“三反”以从县区机关的“三反”和整党建党工作，必须和上述各项工作密切地结合起来进行，而不要分裂开来进行。为此，各级党委必须立即准备并作适当的布置，以便能够在秋征以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去进行上述各项工作。县区乡3级脱离生产的干部，除开担任生产和城乡交流的财经工作干部仍应全力照常工作外，担任党务及土改工作的干部凡可抽出者，应即抽出，适当地分批集中，在新区，以准备秋后土改成土改复查及民主建政和建党等项工作为目标，在老区，以准备秋后整党建党工作为目标，进行一个时期的整训，并在这种整训中抽出10天至20天的时间进行“三反”，解决集训的绝大多数干部的“三反”问题，少数问题严重而复杂的干部则由地委集中另行处理。担任财经工作干部的整训和“三反”，则待以后另行办理。如此，可以准备好今年秋后乡村中的工作。乡村中的“三反”（中央将另发指示），在老区应在整党中进行，即由整党工作队领导在党内以批评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可吸收群众中少数积极分子参加），而不在群众中进行，在新区乡村中的“三反”，则在土改或土改复查及民主建政中采用整风、审查鉴定干部、改善干群关系的方式进行，不单独提出，三反”的口号。如此，方能使乡村中的“三反”及整党建党和其他各项工作均能配合进行，否则，必致互相妨碍，使今年在乡村中的许多重要工作受到损失。在老区乡村中，根据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方针和政策完成整党，清除坏分子并令那些不够条件的党员退党以后，应在那些必要而有条件的乡村中接收一些新党员，因为不少乡村党的组织在调出若干优秀党员后，它的积极性大为减弱，必须吸收一些新的积极的成份，方能振作起来。在新区乡村中，在完成土改复查及民主建政后，应在积极分子中进行党员8项标准教育，并接收那些愿为党员8项标准而努力上进的优秀分子入党，在一般新区农村中，应有5个党员以上（一般不超过10人）的支部，才能加强党对农民群众的领导作用与农村中各项建设工作。全国有12万个新区乡村，还有2万个老区乡村没有党的组织，应争取在今后一年内建立党的组织，此外，在老区已有党的组织的乡村中还应接收一些党员。如此，在农村中要接收将近100万党员。这是必须认真地进行许多工作才能作好的。

**各级党委必须利用“三反”运动的结果，以积极的态度，讨论研究，并认真地进行整党建党工作，一切借口工作忙，任务大，时间紧迫而忽视整党建党工作的现象，都是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

省市区党委以上党委，应即根据这个指示拟订自己的整党建党计划，并立即进行准备。执行情形随时报告中央。

中央 1952年5月30日

1952年6月6日凌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统战工作部起草的《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上批示道：

罗迈（即李维汉——笔者注）同志：

此件已阅，略有修改，请再酌。**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毛泽东 6月6日上午3时

毛泽东在批示中所说的“略有修改”，是将《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中的“中间阶级、中间阶层”的提法，改为“**资产阶级、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即雇有少数几个工人或店员的小资本家）、一部分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分子以及和这些阶级、阶层相联系的知识分子”**。

6月9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处理农村中富农成份的党员的党籍问题的新规定》：

华东局组织部并告各中央局：

5月10日来函及附件均悉。

关于处理农村中富农成份的党员的党籍问题，1949年7月中央组织部复东北局组织部的电中“暂保留其党籍”的规定，今天已不适用，应即作废，特作新的规定如下：

一、目前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地改革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即将全部完成。土地改革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党在农村的农业政策，基本上是“组织起来”实行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所以农村中党的组织和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积极地宣传并以实际有效的行动，即以模范带头作用，来实现党的这种政策。因此对于已成为阻碍或破坏劳动互助生产合作的富农成份的党员，必须加以严肃地处理，以贯彻党的政策，保持党的纯洁。

二、**在处理农村中富农成份（不论是旧富农或新式富农）党员的党籍时，首先应说明：目前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允许社会上富农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的，但共产党员则不准许剥削他人（不论是封建剥削或资本主义剥削），不准许党员去作富农，也不准许党员去作资本家、地主或高利贷者，今后农村发展生产的方向是逐渐走向农业集体化。所以要作一个共产党员就必须取消他的剥削他人的生产方式，积极地参加互助合作运动，如果他接受党的这种意见，他的其他方面，亦未丧失党员条件，自应保留其党籍，党办不应当以富农来看待他。如果他不愿意放弃他的剥削行为，继续进行富农的或其他方式的剥削，则应无条件地开除其党籍。**

三、**对于富农家庭出身、不直接参与剥削行为的党员，只要他能坚持党的立场，划清他与剥削者家庭的界限，则其本人的党籍不应受家庭成份的影响。**

中央 6月9日

6月13日，政务院发出了关于结束“五反”运动几个问题的指示。指示要求说：

“对于工商户处理的原则是：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为了更好地结束这一运动，达到消灭‘五毒’、改造工商业者和在消灭‘五毒’之后顺利发展生产，必须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虎头蛇尾，草率结束；一种是不肯将计算较高的工商户违法所得的数目合理地降下来，即不愿意根据实际违法情况，认真核实，正确定案。”

荣毅仁是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户，在“五反”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根据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受中央委派到上海领导“五反”运动的薄一波和上海市长陈毅认为，把他定为基本守法户好。他们将此意见报告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又转报给毛泽东主席。毛泽东说：

“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

荣毅仁这个“标兵”一树，在上海和全国各大城市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安定了人心。

与之相反，在“五反”运动中被清查出来的上海反动资本家王康年，则在1953年2月28日被上海市人民法庭判处死刑，于当日下午执行枪决。

早在抗战期间，王康年就在上海北京西路434号景星里设大康行西药部，用玉米粉改装为表飞鸣、阿斯匹林粉等假药，贻害病家。抗战胜利后，他将大康西药行迁至汉口路456号3楼306室，改名大康药房，专营西药投机贩卖；由于投机、抛空头栈单，到期无货兑现，负债千万余元，药房倒闭。上海解放后，大康药房复业。新中国成立初期，王康年借西药供应紧缺之机，在向37个国家机关销售药品和医疗器械中，以行贿、嫖妓等方式腐蚀国家工作人员85人，行贿金额2万余元。骗到订货款后，他采取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以少充多等手法应付交货，如用次消发噻唑片充好消发噻唑片、用2000倍显微镜充2500倍显微镜等等；或拖延交货，甚至有23个国家机关的定货一直未交，价值7万余元。1951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华东荣军学校向王康年订购氯霉素、消发灭定粉等6种前线急需药品，金额3万余元，他一直拖延不交货，志愿军5次催货，他将前线不需要的冷热水袋、玻璃片，甚至已生锈的医疗器械发往前线应付，贻害志愿军伤病员的治疗。王康年还用诈欺伎俩向银行骗取大量贷款，拖欠不还，套购大量外汇，偷漏国家税收；盗窃、诈骗国家资财总计金额26.1万余元。王康年大肆宣称：“大康就是干部思想改造所。凡来大康做生意的干部都可以得到改造。”他最终被判处死刑，的确是罪有应得！

6月14日，毛泽东在中共北京市委6月11日“关于中小学生费用负担及生活情况给中央和华北局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

北京市委的报告说，目前中小学生所负担的费用，对于劳动人民的家庭和低薪制工作人员来说，是相当重的。**目前中学的人民助学金标准低，名额少，小学根本无助学金。为了改善这种状况，计划接管全部私立中小学，公私立中小学一律免收学杂费**。报告还说，目前干部子弟学校中，学生所得待遇极不一致，一是学校之间伙食费和津贴费的标准高低不同，二是同一学校之内又有大灶和中灶之分。干部子弟入普通学校的设有公费生，其公费补助按家长革命历史和职位分为3等。上述差别对干部子弟和一般学生都影响极坏，应该改变。

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周总理：

一、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

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

毛泽东 6月14日

6月15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关于争取胜利结束“三反”运动中的若干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从去年12月开始的伟大的“三反”运动，到5月底为止，就全国一般情况，发动群众和“打虎”的阶段均已胜利结束，处理阶段也已经或快要结束，建设阶段已经或即将开始。为了胜利结束“三反”运动，反对虎头蛇尾，草率收兵，中央对于“三反”运动处理阶段和建设阶段中的若干问题，特作如下的规定：

第一，结束“三反”运动的两项重要工作。

为了完满地结束“三反”运动，首先必须作好正确定案和适当处理的工作。处理的原则是：**“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其次是切实作好建设阶段的各项工作。建设阶段的要求，在于系统地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划清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思想界限，改进“三反”运动中所发现的工作中的各种缺点，以便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巩固“三反”运动的成果。

第二，关于处理阶段工作中的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定案工作应采取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不枉不纵的方针。“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必须作到如实合理地解决问题。**有些地方听任“老虎”翻供，不问真假，放纵真虎归山，这是极端错误的。也有些地方只要贪污分子不翻供，所供情节又大体合理，在不予判刑的条件下，专凭口供定案，这同样是不对的。定案工作的中心环节在于认真调查和全面分析材料，必须在人证、物证和贪污情节等方面，找出可以定案的根据，有全部证据者定全部，有部分证据者定一部分，无证据或证据不足的案件一般应实行全部或部分具结了案的办法，以后如发现有不实者再从重处分，现在就有确实证据而翻供或拒不坦白者应从重处理。总之，对于各项案件除案情十分重大或情节复杂一时不易结案者，应留作专案务须继续研究弄清外，一般案件均应尽可能在6月内弄清实情，力求定案，并处理完毕。在处理阶段结束以后，如未了案件过多，是不利于工作的。至于某些案件国家损失甚大，而本人确无贪污证据者，应以渎职论，得分别情节，给予不同的行政或刑事处分。

定案时，必须严格遵守中央关于计算贪污时间和对赃款赃物一般不折算现价的规定。此外，还应照顾到一些特殊情形：**对于那些一贯表现尚好的老干部，虽贪污在一百万元以上，只要贪污情节不严重，坦白彻底，真诚悔过，可不以贪污分子论；对于那些有专门技术，政治上又靠拢我们，虽贪污数字较大，只要其贪污情节不严重恶劣，而又坦白彻底，真诚悔过者，亦可不以贪污分子论。**

二、赃款赃物原则上应予追缴，但又必须根据贪污分子不同情况，分别处理，尤其不得穷追乱追。追赃虽与定案有直接联系，但一般地应先定案，后追赃。定案以后首先要查赃，应从各方面调查分析，判断赃款赃物的来龙去脉及现有数量，进行追赃。对真诚悔过，积极退赃者，从轻处理，对有赃不交，狡赖顽抗者，应予严办。追赃时，应明确交代政策，力求作到贪污分子自觉退赃，并须作好家属工作，使其协助退赃，但绝不许可把贪污分子家属当作贪污分子对待。凡确实追不出者，应主动免追。如赃款赃物在农村者，不得直接派人到农村追赃。为了及时结案，凡赃情已经查明，赃款一时不能起出者，可由机关人民法庭转地方人民法院办理。凡各地追赃已达原计算贪污款物总数百分之四十左右时，即应根据具体情况，适可而止。机关内贪污分子打欠条、订长期退赃计划等办法，害多利少，一般不宜采用。

三、为了定案追赃，经过市节约检查委员会有领导地传讯有关工商户，对于甄别定案有极大作用。对于传讯处理方针，应依照1952年5月20日中央关于争取“五反”斗争胜利结束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中的规定办理。传讯工作切不可无计划地零乱地进行，必须抽调对“三反”、“五反”有经验的干部，首先把所有与传讯有关的材料，加以研究整理，拟定传讯计划，然后在市节约检查委员会统一领导下进行。对于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和半守法半违法户，如不传讯即无法对贪污分子定案追赃时，可以传讯，但须适可而止；对于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则须抓紧传讯，但须防止追逼。在“五反”中已作结论的工商户，如传讯对证时，态度老实，虽承认了原来未承认的“五毒”行为，亦可不变其原来的结论。各地传讯的时间，一般以10天左右为宜，绝不许可拖得太久，否则对工商界波动太大，对生产不利。

四、**处分及量刑必须遵守“少数从严、多数从宽”的原则**。有些地方在处分及量刑时，一般偏高。其具体表现为：在行政处分中，多用“开除”；在刑事处分中，多用“徒刑”和“劳役改造”，而不愿判“机关管制”，以及企图过多地判处无期徒刑及死刑的倾向。为了克服这种偏向，在行政处分中，应尽量少用开除办法，在刑事处分中，应严格遵守中央所规定的判刑比例及批准手续。为了避免处分（包括党内处分）和量刑上先重后轻，畸轻畸重的现象，应实行对一个地区或一个大单位的贪污分子和犯其他错误人员的排队的办法，实行大体上的比较，统一处分和量刑的具体标准。但在“三反”运动初期已经处理的人员，如果对其处理没有原则错误，则不必改变。在审判时，应认真作好人民法庭的工作，吸收非党人士参加领导，如此，既能对非党人士有所教育，同时也可以取得他们的监督，杜绝某些单位的草草了事现象，使我们的审判处理工作作得更好。

第三，建设阶段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三反”运动必须经过建设阶段，才能完满结束。**“三反”建设阶段的工作，实际上是对于“三反”运动的总结，这是巩固“三反”成果、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觉悟程度和工作效率的重要关键。**只许作好，不得潦草从事。**建设阶段一般应解决下述几个问题：即交代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适当地结合整党，系统地进行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

一、关于交代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交代与资产阶级关系的工作，各地在国家工作人员中，除依中央在1952年4月5日的指示可以不进行交代的人士外，一般均应利用“三反”运动的群众声势，认真进行。在交代关系中所发现的各种问题，应分别地作如下的处理：

1、确属坐探者，应根据情节，从严惩治，最严重者判处无期徒刑直至死刑。但偶尔泄露经济机密者，不以坐探论处，对其错误行为，一般只予批评，情节严重者，应受适当的行政处分。偶尔出卖经济情报者，亦不以坐探论处，应视其情节按贪污罪从重处理。至于带有反革命性的“双皮坐探”，则按惩治反革命条例办理。

2、交代反革命案件者，由公安部门处理。

3、交代本人是资本家者，只予登记，暂不处理。区别并处理国家工作人员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与一般资本家的问题，中央将另作规定。

4、交代出一般政治问题或亲戚朋友是反动阶级分子或资本家者，只予登记，不需处理。

5、交代家庭是反动阶级成分或资本家者，**只要站稳立场，思想上与家庭划清界限，不必断绝与家庭的关系。**

6、在交代关系中如发现本人的政治立场十分不稳者，应不得担任或调入国家首脑部门和机要部门的工作。

二、关于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目的，在于划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阐明工人阶级思想在国家中的领导作用并正确认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克服在中国资产阶级问题上的一切不正确观点**。这种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工作，应密切与各部门的业务相结合，针对资产阶级思想在各部门的具体的特殊的表现，引导群众进行细致地深刻地批判，并在批判之后，树立起新的观点和业务方针。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时，应对于因“三反”而来的暂时的消极情绪及其他错误思想，及时加以教育，如：某些人怕负责任，不敢领导，不愿作财经工作和总务工作，不愿再和资本家来往，如非来往不可时，则宁“左”勿右，以及借口所谓“打虎精神”发展强迫命令的作风，对犯小错误受轻微处分仍留机关工作的人员，采取冷淡歧视的态度和有些“打虎”积极分子以“功臣”自居，闹地位、闹待遇等等，所有这些消极情绪和错误思想，都必须在“三反”运动建设阶段中，加以克服。

三、关于如何与整党相结合。“三反”运动本身对共产党来说，就是一次很深刻的整党运动。党员干部特别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党员干部，在群众运动的烈火中，已受到了一次严格的锻炼。“三反”以前已按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整党的单位，“三反”运动对于他们事实上是进一步的整党运动。“三反”以前未按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进行整党的地区，可以在“三反”建设阶段同时或在“三反”结束以后，划出一定时间，进行对于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的学习，其目的在于普遍提高党员的认识。所有民主补课，干部鉴定，犯错误党员的处理工作，均应在这一阶段内结合进行。

四、关于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思想建设之外，必须有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组织建设的中心内容是整编。整编的目的在于确立编制，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制度建设的内容包括民主制度，新的财务制度，基本建设制度，人事制度，工作、生活、学习等制度及监察和检查制度。制度建设的中心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的关键在于首先健全机关党内的民主生活，而党员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则是最适当的组织形式，应定期召开，认真进行；其次则为机关内的民主生活的建立，而机关工作人员的代表会议和小组会议，以及每年一次的民主检讨制度，均应按期进行。

本指示发至地委、师党委，望迅速下达，认真研究，切实执行。并望于7月上旬，对所属单位的“三反”运动，作出全面总结，层报中央。

1952年6月15日

这一天，中共中央立即发出指示电，电文是这样写的：

中央及军委所属各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分局转各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党委：

兹将《中共中央关于争取胜利结束“三反”运动中的若干问题的指示》发给你们，望即研究，加以执行。

中共中央 6月15日

6月20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二届代表大会及北京第一届体育运动会在天坛举行。

此前，大会秘书组在会议筹备期间，请毛泽东为大会题词，毛泽东欣然命笔，题写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毛泽东和傅作义应邀参加了开幕式。开幕式结束后，毛泽东走到傅作义身边小声说：

“宜生，到外面走走吧！”

两人步出会场，走到祈年殿前，毛泽东指着大殿一角经过了修补的地方，漫不经心地问：

“还记得吧？”

傅作义当然记得，那还是在1949年初，解放军为阻止蒋介石从天坛临时飞机场抢运武器和亲信分子，不得不炮击临时飞机场，不慎将殿角炸掉了一块儿。毛泽东拍着傅作义的肩头，笑着说：

“宜生，你看这一块我们补得如何？”

傅作义连声说：

“不错，不错！不仔细看还真的看不出来了。”

毛泽东说：

“**如果我们兵戎相见，补也补不得喽，你是保护北京的大功臣啊，应该给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怎么样？”

傅作义连忙说：

“哪里，哪里，主席不抓我的罪过，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6月下旬，毛泽东决定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员的陈赓从朝鲜回国任职。由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邓华担任志愿军代司令员和政委。

6月23日，陈赓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进了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亲切地会见了他。毛泽东握着陈赓的手说：

“我们‘最可爱的人’回来了，辛苦了!”

众人在沙发上就座后，周恩来朝陈赓扬扬手说：

“陈赓，你从前线回来，谈谈你的感受吧。”

陈赓汇报了朝鲜的战事，又说：

“我军缺乏现代化装备，部队缺乏精通科技的人才，造成了在朝鲜战场上的困境，只能靠坑道对付敌人的飞机大炮，许多战斗由于装备技术落后而不能取得胜利。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落后了，在战争中就要挨打。现在最急需的是要培养前方已有的部分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维护和使用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有时炮上坏了个螺丝，在3个连队找不到一个会修的技术人员。”  
     毛泽东凝视着陈赓，又转向周恩来、朱德说：

“**美帝国主义想要打败我们绝不可能，我们一时要把美帝赶出朝鲜也不可能。**我们的军队是一支政治素质最好的作战勇敢的人民军队，只可惜技术装备太差。我去苏联访问时，斯大林曾向我建议说，有必要组建一所高等军事技术院校，我决定接受这一建议。军事工程学院一定要办，不能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

毛泽东转对陈赓说：

**“中央决定创办军事工程学院，那个草案你看到了吧**？谁来办？你来办吧！这次调你陈赓回来，就是要你创建这所军事工程技术学院。”

陈赓说：

“这个我可是隔行，恐怕办不好。”

毛泽东说：

“你隔行，你说我们党内还有哪位懂行？你指出来。办学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可随时找总理，找我，还有苏联顾问的帮助，凭你陈赓的才智和干劲，一定能干好。你放手去干好啦。”

周恩来也说：

“你是合适的人选。你当过红军学校的校长，红军干部团不是很出色吗？你干不了，别人连你这点经验也没有。你刚从前线回来，了解朝鲜战争的实际情况，你对敌我双方技术条件的悬殊差别是有体会的吧!”

陈赓见毛泽东和周恩来如此说，便说：

“好吧。请主席放心，请总理、总司令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6月23日，毛泽东给毛泽连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润发贤弟：

5月8日的信收到。你的眼病脚病未好，甚念。仍以在家养病为宜，不要来京。因为湘雅医院诊不好，北京也不见得能诊好。此复。

毛泽东 6月23日

1952年7月4日，毛泽东关于补充炮兵弹药和器材问题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致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2年6月13日来电已收到。有一些迹象表明，**在朝鲜停战谈判中，敌方似乎会有转变（关于这一点另行通报），尽管如此，也不排除敌方将拖延谈判的可能**。6月份，敌人在朝鲜战场的某些地段上加强了军事行动。**6月23日敌人对鸭绿江水丰水力发电站进行集中轰炸，结果发电站被毁。**所有这些事实说明，敌人企图对我们施加军事压力，我们认为，敌人可能发动新的局部进攻。**为了给予敌人坚决打击和反击，以及进一步巩固既有阵地，我们急需补充一些炮兵弹药和器材，以保证顺利完成上述任务**。在1952年5月31日我给您的电报附录中，已提出了炮兵武器和弹药申请单。请您研究一下提供炮兵弹药、燃滑油料和火炮零部件的可能性，这些都是我们在5月31日申请单提出，请在今年8月至年底提供并计算在军事贷款项目下的。这份电报也附有这类申请单。

请把您的决定通报我们。

申请单……

毛泽东 1952年7月4日

7月7日，毛泽东在给少年时期的朋友张有成的信中写道：

有成兄：

前后来信都收到了，谢谢你。**你于阴历五月初一给我的信很好，使我晓得乡间许多情形。粮亏猪贱，近月好些否？**文家诸位给我的信均收到，便时请你告他们一声，并问他们好。**乡里禁酒是因缺粮，秋收后可能开禁，你们也可以喝一点了。**

此复，顺问

安好!

毛泽东 1952年7月7日

就在这年冬天，张有成忽然得病，不治去世。他的亲属到1953年8月才写信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得悉后，即发去唁函：**有成兄病逝，深为悼念。**

7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应注意的问题的指示》：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

**华东工业会议的报告和东北、华北关于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已收到。**中央同意华东所提当前城市工作的方针和东北、华北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各项部署和意见，并提出以下两点，请加注意：

一、增产节约运动，是当前经济工作方面的一个全面任务，其意义和目的，是要在“三反”运动胜利的基础上，依靠广大职工的空前的觉悟程度和劳动积极性，不仅要努力完成今年的生产财务计划和增产节约计划，而且要改进生产管理，改善劳动组织和提高技术，打下经济核算制的必要基础，从而**结束将旧企业转变为新企业的改造过程，使我们能掌握成套的新的经营管理的经验，以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任务**。因之，除了制订增产节约的奋斗目标，并动员和组织广大职工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外，必须注意经营管理工作的改进。其次**在组织增产节约运动和竞赛运动**时，应该注意根据各种产品供销的不同情况，分别地、具体地规定各个厂矿在增产节约运动中的具体奋斗目标和竞赛重点：**凡原料足、销路好的厂矿，应该首先注意增产，并在增产中力求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成本。凡销路好，但原材料供应有困难的厂矿，应首先注意节约，从节约原材料中来争取增产。凡销路和原材料供应都有困难的厂矿，则应努力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新的品种。**以上3种厂矿，都应具体地分析自己的内部情况，首先集中力量解决最关键的一环，从而推动全面，保证全国生产在各方面能有节奏的、平衡的前进。在增产节约运动中，由于技术与劳动组织的改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产生职工多余的问题。我们决不能因担心有剩余职工，而不敢坚决地实行企业的改革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不应将多余的劳动力轻率处理**，**从国家的长远利益着眼，对因生产改革多余下来的职工，必须坚决采取包下来的方针，用轮训的办法，提高工人的政治、文化与技术水平，以准备国家建设的需要。至于多余职工的工资，仍应计入各厂矿成本之内**（今年是已经编入财务计划内的），而另从节省原材料、节省运输，减少管理费、加速资金的周转中来努力降低成本。

二、**在私营企业中，我们的当前任务是巩固“五反”运动的胜利，迅速结合生产与生活，建立正常的劳资关系，团结资方，及时转入生产**。因之，第一，在杜绝资本家再施“五毒”、认真执行劳资两利政策的条件下，亦应根据各个行业的不同情况**制订增产节约计划，组织竞赛，**动员劳资双方为完成这一计划而努力。第二，**在增产节约的基础上，应根据各地各业的不同情况，通过劳资协商的方式订立集体合同，合理地解决工资、工时及工人迫切要求而又可能解决的福利问题，适当地改善职工的生活待遇和劳动条件。**至于监督生产问题，除在大城市选择一、二个适当的工厂，进行试点，积累经验外，目前不普遍实行，待劳资关系走入正常及生产恢复后，准备今冬明春重点实行。

三、**此电及华东、东北、华北3个报告，可在党内刊物上登载。**

　 　 中央 7月8日

欲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结果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2年7月8日《关于目前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应注意的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意义和目的是“**结束将旧企业转变为新企业的改造过程，使我们能掌握成套的新的经营管理的经验，以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任务。**”为此，他提倡在“各个厂矿”以及“**私营企业中**”，广泛地**组织增产节约运动和竞赛运动。**请注意，这里所说的“运动”，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活动，而是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运动，是人民战争**。这在经济恢复时期，的确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开创性的重大举措。同时，《指示》中还特别强调要照顾公私企业中职工的利益：在“各个厂矿”中，“**不应将多余的劳动力轻率处理**，**从国家的长远利益着眼，对因生产改革多余下来的职工，必须坚决采取包下来的方针，用轮训的办法，提高工人的政治、文化与技术水平，以准备国家建设的需要”**（继续发工资）**。**在私营企业中，“**合理地解决工资、工时及工人迫切要求而又可能解决的福利问题，适当地改善职工的生活待遇和劳动条件。”**这些措施，与后人令数千万产业工人下岗、买断工龄、了无生路的做法相比，无疑是有着天壤之别！太史公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把他这句话用来赞扬毛泽东，那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第37章**

**“我们国家有前途，有希望。过去我们想，国民经济是否3年**

**可以恢复。经过两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而且**

**已经开始有计划地建设了**。**”**

话说1952年7月10日，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向南京军事学院第一期毕业学员签发训词。他还批示道：“特指定军事学院刘院长（即刘伯承——笔者注）代表军委向该院高级速成系和上级速成系第一期毕业之学员宣读军委主席之训词。”训词全文如下：

军事学院刘院长、全院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员并高级速成系、上级速成系第一期毕业的全体学员同志们：

标志着中国人民建军史上伟大转变之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其高级速成系及上级速成系的第一期已学习期满，举行结业了，特致以兴奋的祝贺。

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这是刘院长的努力、全体苏联顾问同志的努力，以及全体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员和学员共同一致努力的结果。特致以感谢和慰问之意。

中国人民的建军历史，已经走过了25年的长期路程，其革命经验之丰富，在国际上除苏联以外，无与伦比。但在中国人民尚未获得全国胜利之前，由于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其军事建设又尚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也就是处于装备的简单低劣，编制、制度的非正规性，缺乏严格的军事纪律和作战指挥的不集中、不统一及带游击性等等，这些在过去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而也是正确的。可是，自从中国人民获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之后，这种客观情况已经起了基本上的变化，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客观条件已完全具备了这种可能，只需加上不疲倦的主观努力，就一定可以实现。**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为此，就需要克服在过去时期曾经是正确的，而现在则是不正确的那种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简单现象和游击习气等等，而必须加强整个工作上、指挥上，而首先又应该是从教育训练上来培养的那种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这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

同时，为了组织这种复杂的、高度机械化的、近代的战役和战斗，没有健全的、具有头脑作用的、富于科学的组织和分工的司令机关不可。过去那种不健全的、效力不高的，甚至是极不胜任的司令机关，今后就必须大大地加强起来；过去那种只重视政治工作（重视政治工作是对的，今后也还必须重视）而忽视参谋工作的现象，必须加以坚决的改变；**过去把一些比较弱的、缺乏组织能力的，甚至是犯了一些错误而积极性不高的人来做司令机关的工作**，因而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对司令机关的缺乏威信，影响到若干指挥人员不愿意当参谋长、不愿意当参谋，这种现象必须加以根本上的改正。**今后必须挑选优秀的、富于组织和指挥才能的指挥员到各级司令机关来，以创造司令机关新的作风和新的气象**。这同样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

军事学院全体的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员、第一期毕业的学员和正在学习的学员同志们：军委希望你们在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的光荣事业上，继续努力；并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把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的精神，贯彻到所有部队中去。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52年7月10日

7月11日，毛泽东决定由杨得志担任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

7月11日，毛泽东给他的堂兄和少年时的私塾老师毛宇居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宇居兄：

归去后来信均收到，甚慰。有复邹普勋一信，请代转交。接毛泽连的来信，六婶病故，他自己又跌断了脚，不知实际情况如何，脚尚有诊好的希望否？他未提到要钱的话，不知他的生活尚过得去否？暇时请查明见告。接张有成兄的信，乡里缺粮猪贱，不知现在好些否？有便望将乡情赐告。为了了解乡间情况，拟待秋收以后，邀李漱清、邹普勋二位来京一游，请你征求他们二人意见告我为盼！

顺致敬意！

毛泽东 7月11日

7月13日，“联合国军”停战谈判代表提出了一个关于遣返战俘的方案，其中说，遣返朝鲜人民军战俘占人民军战俘中应被遣返总数的80%左右，而遣返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则只占志愿军战俘中应被遣返总数的32%。

7月18日，毛泽东关于不接受敌方遣返战俘方案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致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发去7月15日3时我致金日成同志的电文和金日成同志今年7月16日21时给我的回电，供了解情况。**

“致金日成同志，并抄送李克农同志。

我们给李克农同志写好电文后，接到您今年7月14日18时的电报。对该问题经过两天研究之后，我们一致认为，**目前正当敌方对我们狂轰滥炸之际，接受敌方实际上没有任何让步的、具有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我们来说是极不利的**。我们可以看看这一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

不接受敌方建议只会有一弊，就是给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然而，战争已经开始了，中国已经开始帮助朝鲜，朝鲜人民也已经确实站在了保卫全世界和平阵营的最前线。朝鲜人民牺牲的代价是取得了在三八线地区阵地的巩固，保卫了北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地区。朝鲜和中国人民，尤其是两国的武装力量，在同美帝国主义斗争中得到锻炼并获得经验。在斗争进程中，朝鲜和中国人民增强了自己的实力，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促使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得以发展。这也迫使美帝的主力被牵制在东方并蒙受着连续不断的损失。同时，**作为全世界和平支柱的苏联得以加紧自身建设并对全世界各民族革命运动发展给予影响。这将意味着延缓新的世界大战的发生。**如此强大的运动正好说明，朝鲜人民不再是孤立的。

首先，中国人民愿意竭尽全力确保朝鲜人民度过难关。因此我们现在请求您坦率地向我们提出朝鲜局势要求迫切解决的各种问题。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解决您的问题，那我们将同您一起去请求菲利波夫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至于**接受敌方建议一事，肯定会带来巨大危害**。首先，在敌方狂轰滥炸压力之下接受其挑拨性和欺骗性建议将使我们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其次，敌方会不断地利用我们这一弱点向我们继续施加压力并导致敌方新的挑拨行径。那时我们将处于不利地位，再想向敌方施加压力时，可能会遭受更大的损失，上述的优势也将失去其自身意义。这是糟糕的一步，并会因这一步而输掉全局。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接受敌方建议必然会使敌方更加自负傲慢并有损于我们的威望。如果我们表现出坚决不接受敌方的建议，并对敌方破坏谈判做好准备，敌方就不敢贸然破坏谈判。在谈判进一步推迟过程中，由于我方果断地坚持自己的观点，敌方会做出新的让步。如果敌方不让步或者谈判破裂，那么我们应继续军事行动以便在敌方无法取胜的战争进程中去寻找改变目前状况的出路。

关于这一建议和我们的方针，我们会告知菲利波夫同志并征求他的意见。得到他的回复结果，我们会告知您。

此致敬礼！

毛泽东 今年7月15日3时”

“致毛泽东同志！

您今年7月15日3时的电报收悉。经过对电报进行仔细的研究和讨论，我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我们认为您对当前局势的分析是正确的。您考虑到我们目前的处境，通知我们，让我们今后坦率地提出我们所需要的援助，对此我们衷心地感激您。我们认为，在同敌方长期斗争中积极主动开展战斗是必要的。如果我们不积极主动战斗而继续消极防御，那么敌方就不会重视我们的力量而继续狂轰滥炸以向我们施加军事压力。因此，我们建议采取以下紧急措施：

1、必须加强高射炮部队，至少要有10个团。必须加强对平壤市和所有工业重要设施（如长津湖发电站、水丰发电站、北仓发电站）的对空防御。

2、必须让我们的空军积极进行空战：（1）改善空军指挥部门，使其能在朝鲜领土上准确地指挥空战。（2）空军行动的直径不应仅仅限于目前的沿鸭绿江一线。至少应延长至平壤一线并尽力加强首都和重要工业设施的对空防御。（3）派遣善于夜间作战的空军部队深入敌人后方并勇猛地轰炸敌方的机场、仓库、兵营以及其他军事设施。

3、陆军部队作战时必须在前线某些阵地上发动局部性攻势以对敌人施加军事压力。

请您研究上述意见并做出给予我们援助的决定。

向您致最崇高的敬意!

金日成 1952年7月16日21时”

毛泽东 1952年7月18日

1952年8月4日，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38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关于抗美援朝问题，他说：

“去年这一年，我们是边打，边谈，边稳。

朝鲜战争的局势，去年7月以后定下来了，但是国内的财政经济状况，能不能稳下来，那时还没有把握。过去只是讲‘物价基本稳定，收支接近平衡’，意思是说，物价还不能稳定，收支还没有平衡。收入少，支出多，这是个问题。因此，中共中央在去年9月开了一次会，提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10月，我又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上，提出增产节约。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相当严重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问题，到12月开展了‘三反’运动，接着又开展了‘五反’运动。现在‘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问题完全清楚了，天下大定。

去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等，一半一半。今年不同，战争费用估计只要用去年的一半。现在我们的部队减少了，但是装备加强了。我们过去打了二十几年仗，从来没有空军，只有人家炸我们。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如果明年再打一年，全部陆军都可以轮流去训练一回。**

这次战争，我们本来存在3个问题：一、能不能打；二、能不能守；三、有没有东西吃。**能不能打，这个问题两三个月就解决了**。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

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捡洋炮。敌人对我们很没有办法。吃的问题，也就是保证给养的问题，很久不能解决。当时就不晓得挖洞子，把粮食放在洞子里，现在晓得了。每个师都有3个月粮食，都有仓库，还有礼堂，生活很好。现在是方针明确，阵地巩固，供给有保证，每个战士都懂得要坚持到底。

究竟打到哪一年为止，谈判到什么时候？我说，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为什么和还是要和呢？30年战争、百年战争是不会有的，因为长期打下去对美国很不利。一、要死人，他们为扣留1万多个俘虏奋斗，就死掉了3万多人。他们的人总比我们少得多。二、要用钱。他们一年要用100多亿美元。我们用的钱比他们少得多，今年比去年又减少一半。‘**三反’‘五反’清理出来的钱，可以打一年半。增产节约出来的钱，就可以完全用在国内建设上**。三、他们国际国内都有难以克服的矛盾。四、还有一个战略问题。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他们出兵侵略朝鲜，没有料到我们出兵援助朝鲜。我们的事情比较好办。国内的事我们可以完全作主。但是，我们不是美国的参谋长，美国的参谋长是他们自己的人。所以，朝鲜战争是否打下去，我们和朝鲜一方只能作一半主。总之，对美国来说，大势所趋，不和不利。说马上要打第3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争取10年工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固的基础。

大家要好好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今天我们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全国人民的团结，我们在座的人的合作，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团结和划清敌我界限是非常重要的。**孙中山先生是个好人，但他领导的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了？其原因：一、没有分土地；二、不晓得镇压反革命；三、反帝不尖锐**。除了划清敌我界限之外，在内部还有个是非界限。两者相比，是非界限是第二种界限。比如贪污分子大多数还是个是非问题，还是可以改造的，他们与反革命不同。

各民主党派和宗教界要进行教育，不要上帝国主义的当，不要站在敌人方面。拿佛教来说，它同帝国主义联系较少，基本上是和封建主义联系着。因为土地问题，反封建就反到了和尚，受打击的是住持、长老之类。这少数人打倒了，“鲁智深”解放了。**我不信佛教，但也不反对组织佛教联合会，**联合起来划清敌我界限。统一战线是否到了有一天要取消？我是不主张取消的。**对任何人，只要他真正划清敌我界限，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要团结的。**

**我们国家有前途，有希望。过去我们想，国民经济是否3年可以恢复。经过两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而且已经开始有计划地建设了**。大家要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使我们的国家稳步前进。”

有党外人士在政协会议上向毛泽东询问，要多少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去，毛泽东说：

“大概二三十年吧。”

此时，毛泽东的大致设想是，经过“相当长久”一段时间，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就可以采取步骤，一步步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

毛泽东在政协会议上接见了这个月刚刚被任命为地质部长的政协常委李四光，他饶有兴趣地问李四光：

“‘山字型构造’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给我讲一讲？”

李四光听了非常感动，没想到博学多闻的毛泽东还如此虚心，如此关心地质科学，便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说明。

在政协会议期间，毛泽东特意邀请来北京参加会议的程潜到家里吃午饭。饭后，两人外出散步，边走边聊，来到了中南海边。毛泽东对程潜说：

“前人对中南海曾有‘翡翠层楼浮树杪，芙蓉小殿出波心’的赞誉，今日置身其间，不知颂公有何感受？”

程潜点头笑着说：

“名不虚传，妙不可言，妙不可言啊！”

毛泽东见南海边泊着一条小船，便提议说：

“我们划划船吧。”

说罢，他登上了那小木船，待程潜上船坐稳后，操起桨要亲自为程潜划船。程潜忙说：

“使不得！使不得！你是国家主席，怎能让你为我荡桨！”

毛泽东说：

“哪里，哪里，你是国民党元老，爱国高级将领，又是我的老上级、家乡人，还分什么彼此。何况你已是古稀之年，总不能让你划桨啊！还是客随主便吧。”

说着，他操起桨划着小船向前驶去。

8月7日，毛泽东召见梁漱溟。梁漱溟在谈话中提出要到苏联去做学术研究。毛泽东摇了摇头，说道：

“这不合适。派你去苏联参观访问，游历一番或去苏联进修一门学问，这两种情况都不合适。中国的什么单位派这么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先生去搞什么研究，人家不好理解嘛。像你这种情况，应该在国内各地继续参观访问，做社会调查。你愿意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喜欢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我可以通知各地负责同志，要他们给你提供一切照料和方便。”

8月21日，毛泽东给毛宇居回了一封信，他写道：

宇居兄：

来信收到，李漱清老先生及邹普勋兄前曾表示，希望来京一游，我认为可以同意，借此了解乡间情况。但请你向他们二位说清楚：1、须他们自己下决心，出远门难免有风险；2、到京住一至两个月即还家乡。如他们同意这两点，则可于阳历9月动身北上。到长沙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刘道衡部长处接洽，领取来京路费，办理乘车事宜。介绍信一件，请予转李、邹二位。其余要来京者，今年不便招待。

顺候近安！

毛泽东 1952年8月21日

8月间，江青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经毛泽东同意，她第2次去到苏联治病。

美国记者维克多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记述了江青这次在苏联治病的情形，他写道：“苏联医生直接把她拉进了外科实验室去观察她的肝脏，但没有除去集聚在胆囊里的水。经过外科抽样检查，提出治疗方案。她再一次被送到苏联南方的她所讨厌的雅尔塔。为了减退不断的高烧，她被注射了大量的青霉素，每次2千万单位，这样的剂量和次数只能使得她感到更糟。她痛惜她个人完全没有权势，但她的抗议是完全徒劳的。在那个令人讨厌的雅尔塔的冬天，她越来越思念家乡，但医生不让她回国。她想，他们要把她留在那里，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治好病而感到惭愧。最后，他们把她送回到莫斯科，安置在一个普通的医院里。后来她有幸被转移到了克里姆林宫里雄伟的宫廷医院，那里是为政府的高级官员而准备的医院。”

再说8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进行司法改革工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

关于**开展司法改革运动**的工作，中央前有几次电示，最近政务院已批准了中央司法部史良部长所作关于彻底改造和整顿各级人民法院的报告。各级党委应认真布置并推动政府机关切实执行。

各级人民法院机构的改造和反对旧法观点是相互联系的，应将二者结合进行。但肃清资产阶级的旧法观点，乃是长期的思想斗争，而对法院的组织整顿，特别是清除那些坏的无可救药的旧司法人员，调换那些旧审检人员，代之以真正的革命工作者，则是可以在一次短期的运动中基本上解决问题的。所以这次司法改革运动，必须是从清算旧法观点入手，最后达到组织整顿之目的。**法院的改革不宜用改造一般旧人员的办法来逐步地改进和提高，而必须采取一些必要的组织办法，以彻底改变各级人民法院的组织成份。对于法院中罪行重大且有民愤的坏分子，还须给以刑事处分，以严肃法纪教育干部和群众。**但**在组织处理中，必须严防草率从事，轻易开除的毛病，以免造成失业或难于转业安插**。因此，**除了应受刑事处分者外，即使对于那些恶习较深的分子，也必须妥善安置，给以生活出路。**现在司法机关的旧人员，原则上由司法部门尽可能的留用，将原任审检工作的旧司法人员调作技术性的工作，将不宜作重要工作的调作次要工作。**其不能留在司法部门的，也必须经由当地党政领导机关审查，或分配其它工作，或给以劳动就业机会，或资送还乡生产，务使各得其所。**

此外，各地还应利用这次机会，**把大学政法院系的教授组织到司法改革运动中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不能继续担任政法教授，对于这一部分人尤须妥善安置，或改教其他的课程，或改任中学教员，或帮助其转业改行。同时选拔适当的教师加强政法教育工作，以利政法院系的整顿和改造。

中央 8月30日

1952年9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培养高等、中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师资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

**全国高等、中等学校经过这次结合“三反”运动的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肃清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之后，极需树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建设。**而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水平，则是学校思想建设工作的中心环节。过去由于普遍缺少足够称职的政治理论师资，以致这些课程的教学水平一般都不高。为了加紧培养高等、中等学校政治理论师资，特作如下指示：

一、由中央教育部负责筹划，在中国人民大学创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为全国各高等学校培养一部分政治理论师资。第一期招收研究生300人，研究期限1年至2年。1952年秋季开始实行。

二、**在高等学校的助教和高等、中等学校高年级学生中选拔优秀的党员、团员在本校担任政治理论课程的助教或助理，经常地指导他们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逐渐培养他们成为高等、中等学校新的政治理论师资。**这是现阶段培养政治理论师资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各级党委必须加以重视，并应指定宣传部门的负责干部领导他们的政治理论学习，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学习中的各项问题。

三、各大行政区应选择具备适当条件的高等学校，举办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培养高等学校的政治理论师资；设立政治教育系或政治教育专修科，培养中等学校的政治理论师资。

四、各中央局、分局及有关的地方党委应加强对各该地区培养政治理论师资和学校政治教育的领导，指定各级党委的宣传部长或副部长经常亲自领导这一方面的工作；并应选派政治理论水平较高的干部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及政治教育系或政治教育专修科教课（专任或兼任），领导政治助教的政治理论学习。在目前各高等、中等学校原有的政治理论师资量少质低，新的师资尚待培养的“青黄不接”时期，尤需大力动员党委、政府、群众团体中政治理论水平较高的干部到学校兼课，或设专题讲座，帮助政治理论教师备课。

五、各行政区培养高等、中等学校政治理论师资计划，由各中央局负责拟订；华北5省2市高等、中等学校政治教师培养计划，由华北局会同中央教育部党组负责拟订。

上列计划均须在9月20日以前报告我们。

中央 9月1日

9月4日，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把他准备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会员大会上的讲话稿：《“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呈送毛泽东审阅。

9月5日，毛泽东看了黄炎培的讲话稿，把讲稿中的“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把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把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毛泽东在讲稿中“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加上了**“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去掉坏的方面，发展好的方面。**”

毛泽东还在讲稿的最后加上了一段话，他写道：

“我们在现阶段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可能超过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而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马上变更自己的成份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人是有可能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

毛泽东改完了讲稿，又给黄炎培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任之先生：

北戴河的信，9月4日的信及讲稿，均已收到，甚为感谢。

**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是否妥当，还祈考虑酌定**。

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说来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1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

**当作一个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

在现阶段，允许资产阶级存在，但须经营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事业，不犯“五毒”，这就是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也就是共同纲领所规定的。超过这个限度，而**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资产阶级想剥削赚钱的事情，只许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

今年上半年北京的《学习》杂志上有些写文章的同志曾经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我们已叫他们作了更正。

**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我同意先生的意见，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使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我想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在中国的条件下这样的人可能出现，特别是在几年之后，社会主义经济成份更加壮大，更加显示它对于国家和人民的伟大贡献的时候，这样的人可能逐步地多起来。**

先生近来思想前进甚快，例如北戴河信上所说国家主权的思想，此次所说社会主义的思想，都表示这一点，但在现在却是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以的。因为先生对于我们的高度信任，故率陈鄙见如右，是否有当，还祈审察赐教。

日内如有暇，想和先生面叙一次。顺致敬意

毛泽东 1952年9月5日

当晚，黄炎培就给毛泽东写信说：

“讲稿承亲赐斧削，对资产阶级一面照顾到多数不能接受，而一方面拿来鼓励少数前进分子，这样才符合新民主主义精神，不仅改正了讲稿，同时改正了我的思想，敬谨接受之下，不尽的感谢！”

9月5日这天晚上，原第3野战军第23军军长钟国楚、政治委员卢胜辖第67师、第69师、第73师，由辽宁安东入朝，隶属第9兵团（后隶属第19兵团）。

此后，原第3野战军第24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皮定均辖第70师、第72师、第74师，于9月12日由辽宁安东入朝，隶属第9兵团。9月15日，原第4野战军第46军军长萧全夫、政治委员吴保山辖第133师、第136师、第137师，由辽宁安东入朝，隶属志愿军总部（后来隶属第19兵团）。

9月10日，黄炎培根据毛泽东修改过的讲稿和指示精神，在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于中山公园举行的第四届会员大会上作了报告和传达。会后，黄炎培的讲话稿又印发给全国各地民建组织，反映很好，工商界很受鼓舞。

9月17日，毛泽东给李达写了一封信。

原来，毛泽东的哲学著作《矛盾论》在1952年4月1日重新发表后，李达用了半年时间撰写了《〈矛盾论〉解说》一书，9月11日寄给毛泽东审阅，同时请求毛泽东为长沙爱晚亭题字。毛泽东在给李达的回信中写道：

鹤鸣兄：

9月11日的信收到。以前的几封信也都收到了。“爱晚亭”3个字已照写如另纸。

《矛盾论》第4章第10段第3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8字应删，在选集第一卷第2版时，已将这8个字删去。你写解说时，请加注意为盼！

顺候教安

毛泽东 1952年9月17日

9月18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向“联合国军”发起战术性反击作战；接着，第12、68、65、40、38军和人民军第3、第5军团，在完成准备后也陆续发起战术性反击作战，使“联合国军”大为震动。

9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陈毅、聂荣臻、薄一波、罗瑞卿、粟裕、安子文、杨尚昆、饶漱石、习仲勋。

会议听取了周恩来关于就“一五”计划的轮廓问题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

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据薄一波在1965年“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问题致田家英的信”记载，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二中全会提出限制和反限制，现在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工业，私营占32.7%，国营占67.3%，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5年比例会更小（资小我大）**，但绝对数字（指资）仍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5年以后如此，10年以后会怎么样？15年以后会怎么样？要想一想。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政公开。”“**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了，离不开共产党了。**空前绝后，他们的子女们也将接近共产党了。农村也是向合作互助发展。前5年不准地主、富农参加，后5年可以让其参加。（下面讲一段战争形势）争取15年不打仗可能的。”

毛泽东的讲话，使与会者为之振奋。他们认为我国开始搞社会主义了，这是全党梦寐以求的大事。同时，大家认为这是毛泽东根据国内外有利形势做出的新判断，为全党指明了方向。公安部长罗瑞卿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向政法委员会和公安系统的干部作了传达。但是，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是非常慎重的。中央在发现了罗瑞卿的做法后，对他进行了批评。罗瑞卿作了检讨，并请求处分。为此，毛泽东后来于11月13日在给周恩来等十几位领导人的信中作了自我批评。请看后边详述。

9月25日，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国庆社论送审稿时，将文中“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一句划去，并在旁边批示道：

“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中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1952年10月1日，首都50余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国庆庆典，时称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国庆节”。

毛泽东、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林伯渠及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邓小平，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彭真，来访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泽登巴尔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在检阅台上的还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委员，各委、部、会、院、署、行的领导人，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首长，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在京常务委员，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

在观礼台上，有各条战线上的代表，有华侨回国各观光团的团员。出席观礼的还有苏联专家代表，在中国访问的外国朋友和贵宾，各国使节和外交人员等。

在天安门城楼和观礼台上观礼的国家领导人和嘉宾共有1万多人。

上午10时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庆祝典礼开始。全场肃立，军乐队高奏国歌，100门礼炮齐鸣28响。

朱德乘车检阅受阅部队。

接受检阅的武装部队分列式开始了，聂荣臻乘车率领武装部队进入广场，由东向西行进，共有66个方（梯）队，受阅人员11300人。与往年不同的是，徒步方队前面增加了高举“八一”军旗的“仪仗兵”。

受阅民兵来自全国各省区，分属汉族和蒙族、回族、藏族、苗族、彝族、满族、朝鲜族、黎族等10多个少数民族。他们携带着先进的轻武器，穿着五颜六色的民族服装，色彩缤纷，构成了与以往国庆节阅兵分列式不同的一道亮丽风景，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指导思想。

空军机群组成9个梯队，共有153架飞机从天安门上空飞过受阅。

阅兵式历时65分钟，全场观众一直都是欢声雷动。

“保卫和平”是这次国庆阅兵和游行队伍的主题。游行群众高举着各种标语，“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反对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高呼着“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的口号，在金水桥前放飞一群群白色的和平鸽，欢呼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热烈而坚决地表达了热爱和平的美好愿望与保卫和平的坚强意志。

10月2日，毛泽东因堂弟毛泽连来信说他家生活困难，就给东茅塘的堂兄、少年时代私塾老师毛宇居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宇居兄：

李邹二位来京，收到你的信，并承佳祝，甚为感谢。毛泽连来信叫苦，母尚未葬，脚又未好，兹寄人民币300万元（旧币——笔者注），以100万元为六婶葬费，200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请告他不要来京，可到长沙湘雅医院诊治，如湘雅诊不好，北京也就诊不好了。另寄200万元给泽荣（逊五）助其家用。他有信来，我尚未复，请转告他，不另写信了。

以上均请费神转致为荷！顺问康吉

（这些钱是我自己的稿费，请告他们节用。）

毛泽东 1952年10月2日

10月2日，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达苏联出席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

10月3日是中秋节，下午，中南海派来一辆小轿车，把毛泽全夫妇和3个女儿一大家子人接到中南海，与毛泽东共度佳节。

毛泽全是在前些时候由华东军区后勤部生产部长调来北京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生产管理处任处长，他的爱人徐寄萍也调到总后工作，居家迁到了北京。

毛泽全一家来到菊香书屋，见毛泽东身着旧衣和布鞋，正坐在一个凉棚下的藤椅上看材料。毛泽全老远就叫了声：

“主席！”

毛泽东见叶子龙领着客人来了，立即放下手中的材料，起身迎上去，看着他们全家人，笑盈盈地说：

“泽全，你有这么一大家子人，好，好。”

毛泽全、徐寄萍赶紧上前与毛泽东握手，孩子们也走到毛泽东跟前喊道：

“伯伯好！”

“好，好。娃娃们好！”

毛泽东高兴地应着，引着客人进了客厅，招呼道：

“坐，坐，大家都坐。”

工作人员端上茶水，给孩子们分发了糖果，退了出去。毛泽东问起徐寄萍的工作和家庭情况。徐寄萍说，她是1940年在上海参加学生协会，1941年随一批同学到苏北新四军一师参军。父亲是教员，已病故。现有母亲和两个妹妹。两个妹妹是解放前入党的地下党员，带着母亲在上海工作。毛泽东听了，连连说：

“好，好。你们是革命家庭。”

他话头一转，又问道：

“你是从上海去革命根据地的高中学生，为什么要找泽全这样一个土包子，种过地的泥巴腿子？”

徐寄萍闻言，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是笑而不答。毛泽东就说：

“这很好，**你们一个是工农分子，一个是革命知识分子，我们党就是要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互相取长补短，互相帮助学习。**”

他又指着徐寄萍说：

“看上去你身体较瘦弱，有什么病么？”

徐寄萍说：

“没大病，只是常头疼。”

“你去医院看看耳朵，有时耳朵有病治好了，头就不疼了。”

毛泽东说罢，又问孩子们在哪儿上学。毛泽全的大女儿毛远慧抢着说：

“我在11小学读3年级，妹妹远玲在五一幼儿园。今天同学们知道接我到中南海看毛主席，都要我代问毛主席好。”

毛泽东笑了，说：

“那你代我问问同学们好啰。”

此时，叶子龙按照毛泽东的吩咐，又从中联部招待所接来了一位客人。这位客人不是别人，正是毛泽民的遗孀王淑兰。

王淑兰和儿媳韩谨行这一次来北京，主要是为儿媳治疗支气管扩张。韩谨行出院后对婆婆说：

“我想借这个机会见见主席大伯。”

王淑兰说：

“那就写封信说一下吧”

于是，韩谨行以婆婆的口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介绍了王淑兰的近况，又说：

“现在儿媳韩谨行来北京治病，已经出院。我准备过几天和儿媳一起回湖南老家去。临行前，我们很想见见您，您百忙中可以接见一下吗？”

毛泽东接到王淑兰娘俩的信，很高兴，就派叶子龙去接她们。不巧的是，韩谨行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看苏联举办的“改造伏尔加河”展览去了。王淑兰四处寻找，均未找到。只好一个人闷闷不乐地来到了中南海。毛泽东见王淑兰来了，问她：

“你儿媳怎么没来？”

王淑兰还在生着气，说：

“她呀！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连个人影子也找不到。”

不一会儿，又来了几位客人，一位是毛泽东的姨表兄王季范；一位是毛泽东的堂兄兼塾师毛宇居，他是受韶山乡人民政府委托，来请毛泽东为新建的韶山学校题写校名的；另一名是毛泽东幼年的同学和邻居邹普勋，也是邹氏的胞弟、毛泽全的亲舅舅；还有一位是毛泽东少年时的“激进派”老师李漱清。他们是应毛泽东的邀请，来京叙旧并汇报乡情的。

毛泽全、王淑兰见乡亲们都来了，十分高兴。毛泽全这才明白毛泽东是要他们在佳节里和乡亲们会会面。大家在一起拉起家常，谈笑风生，十分热闹。

中午，毛泽东在家设便宴招待客人。叶子龙进来说：

“进屋吃饭吧。”

“慢。”毛泽东指着毛远慧姐妹3个说：“娃娃们不能吃辣椒，今天添一盆炒鸡蛋给娃娃吃。”

他又特别交代秘书：

“普勋有病，另外单独夹给他吃。”

众人用了餐，一起到客厅围坐着，毛泽东抽烟，客人们吃苹果。5岁的远玲天真活泼，自报奋勇对毛泽东说：

“伯伯，我给您跳舞。”

毛泽东高兴地说：

“好，好。”

远玲一边跳一边唱，毛泽东轻轻地拍着手，和着节拍。两岁半的小远平，很安静地坐在沙发上，睁大眼睛看着大人们。毛泽东笑着指一指远平，说：

“你们看娃娃这双明亮的眼睛，正在仔细观察周围的世界呢。以后世界是他们的，有他们钻研的时候。”

说话间，远平就睡着了，徐寄萍连忙对毛泽全说：

“远平睡了，先把她抱进汽车里吧。”

王淑兰急着要回招待所。毛泽东问道：

“怎么你就走？他们都不走哩！”

王淑兰说：

“我要去寻儿媳妇，因为她还没见主席伯伯哩。”

于是，毛泽东就派叶子龙送王淑兰回招待所找人。毛泽全便趁机向毛泽东和其他客人告辞。毛泽东吩咐叶子龙将桌上的鲜果和糖块拿一些给娃娃们带回去吃，并起身送客，忽然问：

“怎么少了一个娃娃？”

徐寄萍笑着说：

“远平睡了，已先抱进车中了。”

叶子龙送了毛泽全一家，带着王淑兰来到中联部，正碰上韩谨行从外面回来，王淑兰赶紧叫儿媳上车去了中南海。后来韩谨行从中南海回到招待所，王淑兰问道：

“你是怎么称呼主席的？”

韩谨行说：

“喊主席。”

“你这憨子，怎么连伯伯都不晓得喊？”

王淑兰忍不住把儿媳埋怨了一通。

10月5日，毛泽东给齐白石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在1952年国庆节期间，齐白石邀同几名著名画家，共同绘出一幅《普天同庆》图，献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在复信中笔走龙蛇，一挥而就，写出了一幅毛体珍品。他写的是：

白石先生：

承赠《普天同庆》绘画一轴，业已收到，甚为感谢！并向共同创作者徐石雪、于非闇、汪慎生、胡佩衡、溥毅斋、溥雪斋、关松房诸先生致谢意。

毛泽东 1952年10月5日

10月6日，邓华、杨得志、洪学智获悉美李军队调防的情况，决定发动第二阶段更大规模的战术反击，由西海岸到东海岸一字展开的志愿军第一梯队第65、40、39、38、15、12、68 军7个军参战。

黄昏时分，紧张防守了一天的美李军正在休息之时，志愿军7个军各以连排为单位，在东西两线180余公里的正面上，选择了40多个目标，向美李军的阵地发起了攻击。

10月8日，美军总司令克拉克为了迫使志愿军转入守势，扭转其所处的被动局面，悍然宣布和谈无限期休会。

这一天，克拉克又批准了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的“金化攻势”计划。美李军此次攻击的主要目标，是上甘岭地区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

此后，中方参与谈判工作的李克农和乔冠华，由于美国单方面中止谈判而奉命归国。

欲知朝鲜战场上敌我双方新一轮的较量结果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2年8月4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38次会议上的讲话是一篇重要文献，为读者正确理解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以及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又先后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的历史意义，提供了可靠的史料。按照毛泽东的话说，正是由于“现在**‘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天下大定。**”“**增产节约出来的钱，就可以完全用在国内建设上**。”“**经过两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而且已经开始有计划的建设了。”**正因为有这样重大的变化，毛泽东又提出了“我们要争取10年工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固的基础”。正所谓“天翻地覆慨而慷”，用这句话形容伟人此时的心态，应该说是很恰当吧！

**第38章**

“**地方事，我只愿收集材料以供参考，不愿也不应当**

**直接处理一般地方性的问题，使地方党政不好办事**。”

话说1952年10月8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西藏致敬团代表。他的谈话要点是西藏致敬团团长柳霞·土登塔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西藏地方政府僧俗官员和全体藏族僧俗同胞的广播词中引述的，抄录如下：

“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

“分地的问题，与宗教问题有所不同。在汉人区域已经分了土地，这里对宗教仍然是保护的。少数民族地区分不分土地，由少数民族自己决定，**西藏地区，现在谈不上分地，将来分不分，由你们自己决定，并且由你们自己去分，我们不代你们分。**”

“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是协议上规定了的，因为你们害怕，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们慢点执行。协议是要执行的，但你们害怕，只好慢点执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执行，如果明年还害怕，就等后年执行。”

“**西藏地方大，人口少，人口需要发展，从现在二、三百万发展到五、六百万，然后再增至千几百万就好。**还有经济和文化也需要发展。文化包括学校、报纸、电影等等，宗教也在内。过去的反动统治，清朝皇帝、蒋介石都是压迫剥削你们的，帝国主义也是一样，使得你们人口不得发展，经济削弱了，文化也没有发展。**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剥削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就是要执行帮助你们的政策。开始进去的时候不会有帮助，三、四年之内也不可能有多的帮助，但以后就能帮助你们的，那是一定的。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

“你们来了，我很高兴，最近你们可以到南京、上海、天津、广州、东北等地去参观。以后西藏僧俗各界如果能够有更多的人到内地各处参观，便可以加强我们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友爱的关系。”

10月10日，毛泽东因收到宋庆龄的赠书，就亲笔复了一函，他写道：

宋副主席：

承赠大著《为新中国奋斗》，极为高兴，谨致谢意。另承赠他物，亦已收到，并此致谢！

顺祝康吉

毛泽东 10月10日

10月13日，毛泽东发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纠正放松军事教育和纪律废弛现象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

　　一、据最近派人检查和各部队的报告来看，自今年5、6月以后，在部队训练上，表现出两种相反的现象：第一、文化教育普遍抓得很紧，因此，掀起了全军文化学习的高潮，并取得很大成绩，这一方面是好的。第二、军事教育和军事纪律普遍放松，因此，产生了部队生活散漫，技术降低，体力减弱和严重的损坏武器、装具、马匹等现象，这一方面是严重地不应该的，是必须立即纠正的。

　　为提起全军的严重注意，兹例举下述若干虽然不是普遍的，但却是极为严重的事实：如某营的演习，集合时间延长到1小时零8分钟；某师的测验，老战士中有十分之六连枪炮的口径和正确瞄准的要领都忘记了；某营点验，一小时内晕倒数十人；炮马集中饲养，无人调教管理，致马蹄变形，马体虚肥，不能驮挽；某师通知部队煮洗子弹袋，有某连队竟疏忽大意到连子弹一起放到锅里去煮；各级干部离职学习的比例过高，华北达68%，西北某些部队还高于华北，有的师竟达90%，致军事教育和军事生活形成无人掌管的状态；换装部队虽经过3个月的战备教育，但接着半年来没有继续执行30%军事教育的方针，致学到的东西不能巩固，动作十分生疏，甚至有的炮手不会退弹，用大锤敲打；尤以不爱惜武器装备，任其风吹雨打，日晒夜露，油漆剥落，木质裂缝和损坏武器、装具、马匹的现象，则更为普遍和严重。根据上述现象，已足以说明在最近期间部队军事生活和纪律松弛现象的严重性，和由此而必须影响到战备观念的薄弱和战斗力降低的危险。

　　二、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最主要的是由于各级干部中长期存在的游击性的习气，缺乏严格的军事管理的要求，缺乏严肃的内部秩序的建立；不是按统一的规定来组织部队的工作日程，常常是由个别首长的一时兴趣来决定或改变这些规定；以及长期存在的对于武器和装备的保管与爱护的不注意和不认真；甚至**个别的指挥人员，因为害怕严肃认真的管理可能在民主大会上受到战士的批评，或多或少地产生有意放松的现象**。其次，则是由于对文化教育这个正确的方针在执行上发生了若干偏差，有的人对于“以文化教育为这一时期（至1953年5月底为止）的部队训练中心”这个方针，任意加以解释，或者说“军事必须服从文化”，或者说“文化学习为主，工作为辅”，或者笼统地提出“文化教育是当前全军的中心工作”；而大多数的领导机关和干部，则只习惯于单打一的工作方法，而不善于照顾全面，适当地组织力量，使其他工作和中心工作很好地互相配合；甚至有的部队为了表现其成绩或急于求成，则任意延长文化教育时间，提出过高的要求，或增加许多课外的作业，超越制度范围，随心所欲，各行其事。

　　三、应当及时地严格地指出，上述各种现象的产生是不正常的，无论何时都是不应该的和不许可的；**特别是在目前我们尚有大规模的抗美援朝战争，美国仍占领我们的台湾、沿海及边沿经常需要防敌袭扰，以及新装部队对技术和装备的掌握尚不能熟习等等情况下，上述各种现象对我军战斗士气的保持和战斗力的提高是有危害的**。

　　因为“以文化教育为部队训练的中心”这个方针，尚需继续到明年5月底以前，因此，主动引起全军对于上述偏向的注意和加以坚决的纠正，这是十分必要的。为此，特指出下列各点，望各部队严格遵守执行：

　　第一，凡属能够进行以训练为主的部队，必须保持30%的军事教育时间，20%的政治教育时间的比重，并注意加强军事、政治教育的内容，防止敷衍应付现象；对于统一规定的时间配当，任何人都要视同法律，不经军委批准，不得修改；违者应受到纪律处分。其不能以训练为主，如担任剿匪、作战、警卫、看守犯人等任务的部队，则以其可能进行教育的时间，按军事30%，政治20%，文化50%的比例，组织教育，不应有所偏废。

　　第二，换装部队在换装之初，必须首先进行3个月期间以军事教育为主的军事训练，力求在此期间内，熟悉各种武器装备的掌握和使用；在3个月后进行以文化教育为主的训练时间内，仍应保持30%的军事教育时间，继续加以巩固和提高，并严格注意武器装备的保管和爱护。

　　第三，离职学习文化的军事干部，各级均以不超过一半为限，其留在部队的军事干部，则应以统率部队，组织部队的军事教育，加强对部队的军事管理工作为主，不应再强调以文化学习为主，以保持部队的军事领导。

　　第四，凡指定将担负入朝军事任务的部队，应在出动之前的3个月，即停止以文化教育为主，而改以军事教育为主的训练任务，以提高军事技术和战术，并保证充分的战斗士气为目的。

　　第五，所有部队，应在各大军区的统一规定下，在10月30日以前，以师为单位，进行一次点验，检查所有武器、装具、马匹，并进行详细登记；同时并进行一次整顿纪律的工作，以严格执行命令指示，严格军风纪，严格遵守制度，和严格保管和爱护武器、装具、马匹等为内容的教育，对于严重违反纪律和损坏武器、装备的行为，应予认真的追究责任，和给予应得的处罚。

　　第六，从1953年6月1日开始，部队训练的中心转入以军事训练为主。为迎接这个训练，各大军区部队应在干部训练上有所准备。因此，应采取分期轮训干部的办法，从明年1、2月间开始，实行军事干部的轮训，预习部队军事训练的各种科目，为开展部队军事训练准备条件。其具体办法由军委军训部另行规定之。

　　第七，还必须着重提出，一切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养成具有照顾全面的整体观念，既要抓紧当前的中心工作，又不要放松即使不是当前的中心、然而是不可缺少的工作，不要只求简单、单纯，抓住一件，放弃其余；也不要对于某一件工作进行任意解释，作不适当的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尤应注意，当一个运动在开始的时候，集中全力，争取运动的迅速展开，这是必要的；但在运动的进行中，又应及时地了解情况，发现偏差，加以纠正，不要单凭群众的情绪和下级的要求，甚至是领导者本人的兴趣，加以放纵，或不敢纠偏，因而失去领导的责任。

　　第八，**各大军区应该作出执行这个指示的计划，并将你们的计划和贯彻下去的情况，随时向军委报告**。

主席 毛泽东 1952年10月13日

10月14日4时，“联合国军”在上甘岭地区开始发起空前激烈的所谓的“金化攻势”，目标是夺取志愿军两个连守卫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进而夺取上甘岭，再夺五圣山。

10月16日，毛泽东在给李漱清先生的信中写道：

漱清先生：

惠书收悉。承告乡亲，甚感。**地方事，我只愿收集材料以供参考，不愿也不应当直接处理一般地方性的问题，使地方党政不好办事**。

尚祈谅之，顺致敬意。

毛泽东 1952年10月16日

10月17日，中央批转《中央教育部党组关于大中小学教育和扫盲运动等问题的报告》：

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

兹将中央教育部党组8月23日的《六、七月份综合报告》，8月20日《关于中小学教育行政会议的报告》，8月24日《关于接办私立中小学问题的报告》，8月25日《关于实施**小学五年一贯制**问题的报告》转发你们。中央同意这4个报告有关大中小学和**扫盲运动**的方针和计划，望各地党委及宣传部仔细研究，指导和监督下级党委和政府文教部门贯彻执行。从报告中，特别是从初步拟定的教育建设五年计划要点中，可以看到今后党在领导文化教育方面的任务之繁重，**在第1个五年计划中，国家开支的教育（不包括文化卫生）经费，将年达30余万亿元。这样大的计划，花这样多的钱，如果没有党的严格监督，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负责实行计划的比较健全的政府文教机构，那将是毫无保证的**。因此各地党委必须重视这个问题，应与抽调经济工作干部同时，把党的宣传部门和政府文教部门加强起来，使宣教部门和经济部门一样能够明了实际情况，制定精确的计划，控制计划的进度和保证计划的完成。**国家的教育建设计划是与国家的经济建设计划密切配合的，如果教育计划不能准确地完成，必将大大影响国家经济建设**，而我们现在的宣教机构是很难担负这样重大任务的，所以立即注意加强宣教部门是很重要的。

　 　 中央 10月17日

10月20日，刘少奇在苏联受毛泽东委托，写信给斯大林，阐述了关于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征求意见。

10月24日，斯大林接见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他说：

“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

10月24日，毛泽东为中央批转赖若愚《在私营企业工会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赖若愚同志、全总党组；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区财委及工会党组：

一、中央批准赖若愚同志《在私营企业工会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认为这一报告中所规定的各项政策是适当的。望各级党委督促工会工作同志及财经工作同志掌握实施之。

二、**在大企业中一律实行8小时制是正确的。**但根据国营纱厂改行8小时制的经验，在实行时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去实施，反对冒然从事。

三、规定在25人以上的工厂和5人以上的商店均须实行监督，作为一个努力奋斗的目标是可以的，但如果作为目前马上普行的办法则不妥当。因为目前各地监督生产的经验，均不成熟，相反，**有些城市有些厂店，由于不适当地“监督生产”，过分地打击了资本家的生产情绪，反而对生产不利。所以目前对监督生产一事，还应多做典型试验，俟取得成熟的经验后，再行逐步推广。**

四、**此指示及附件登党刊**。

中央 10月24日

10月24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起草了一封给彭德怀等的“祝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重大胜利”的电报，他写道：

彭、邓、杨、甘各同志，及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各大军区，军委各部门及军事学院各首长：

我志愿军协同人民军从9月18日开始对全线敌军的战术性的反击作战，**在一个月内，歼灭和击伤敌军3万人以上**，获得重大胜利，中央和军委向你们及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自从去年7月我军采取坚强的阵地作战以来，给予敌军损失的数量，远远地超过去年7月以前在各次运动战中给予敌军的损失数量。而**我军的损失则大为减少，其中人员损失，单就志愿军来说，从去年7月以来的15个月中，比较以前的8个月，平均每月减少三分之二以上（前8个月平均每月为25000人，后15个月平均每月为8000人)，**这种情况，就是依靠阵地实行上述作战方法的结果。而在9月18日开始的这一段期间内，则此种作战方法表现为更有组织性和更带全线性，所以特别值得重视。现当志愿军出国作战两周年之际，希望你们总结经验，更加提高组织性，提高战术和节省弹药，更加亲密地团结朝鲜同志和朝鲜人民，在今后的作战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央及军委 1952年10月24日

后来在10月3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中发起全线战术反击作战，到11月25日，收复全部失地。

在43天的争夺上甘岭的战役中，志愿军以伤亡11500余人的代价，使投入总兵力4万余人的“联合国军”，付出了近200万发炮弹、5000枚炸弹、毁伤270余架飞机以及伤亡25000（自认19000）余人的代价，也未能达到夺取上甘岭地区的目的，“金化攻势”这才不得不作罢。美国新闻界评论说：“这次战役实际上却变成了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自此以后，“联合国军”再也没有发起过像样的攻势了。

再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安子文关于结束“三反”运动的报告：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

中央同意安子文同志10月18日关于结束“三反”问题的报告及其关于处理“三反”遗留问题的3项意见，兹发给你们，望参照办理。

　　 中央 10月25日

据统计：“三反”运动共查出贪污1000万元（旧币）以上的有10万人，贪污的总金额达6万亿元。有关司法机关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缓的9人**。全国仅县处级以上干部，受到行政上撤职、撤职查办、逮捕法办3种处分者，共有4029人，其中省军级干部25人，地、师级干部576人，县处级干部3428人。

中共中央同时批准廖鲁言的关于结束“五反”运动的报告，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

中央同意廖鲁言同志10月17日关于结束“五反”问题的报告及其关于处理“五反”遗留问题的3项意见，兹发给你们，望根据当地情况参酌实行。**今后各地除判处死刑仍应报请中央批准外，只须由中央局每3个月将追缴退补罚款情形向中央报告一次。**

中央 10月25日

据廖鲁言在报告中说：“目前全国各地对于‘五反’运动中各类工商户的处理工作，除了部分城市尚余很少数应受刑事处分的案件和个别比较复杂的专案未行处理以外，其余均已处理完毕。根据华北、东北、华东、西北、中南5大区67个城市和西南全区的统计：参加‘五反’运动的工商户总共有99万9707户。受到刑事处分的有1509人（很少数尚未定案者不包括在内），占工商户总数的千分之一点五。其中判处有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缓期执行者1470人，占判刑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七点四二；判处无期徒刑者20人，占判刑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三二；已**经中央批准判处死刑者14名**，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者5名，共19名（按杀人犯判处死刑或死刑缓刑者：东北有4名，西北有2名，共6名，不包括在内），占判刑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二六。计：华东区死刑3名（上海2名、青岛1名），死刑缓刑1名（杭州）；中南区死刑4名（武汉2名，广州1名，汕头1名）；华北区死刑2名（天津、太原各1名），死刑缓刑1名（天津）；西南区死刑1名（重庆），死刑缓刑1名（昆明）；东北区死刑4名，死刑缓刑2名。以上共处死刑14名，死刑缓刑5名。此外，华东区尚有2、3人，中南区尚有1、2人，北京市尚有2、3人，需判处重刑，正由各该大区和市研究材料，尚未提出确定意见报到中央来，估计其中可能还要杀3、4名，共须杀十七、八名。”

10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同行的领导人有杨尚昆、公安部长罗瑞卿、铁道部长滕代远；还有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警卫处处长汪东兴；此外，还有王敬先、罗光禄和李树槐、李银桥、孙勇、马武义、张木奇几个卫士，以及摄影师侯波、保健医生王鹤滨、北京医院的院长周泽昭及其夫人。

毛泽东一行住在天津市委第一招待所。他们到天津后吃的第一顿饭是在街上包子铺里吃的“狗不理包子”。

天津这一名吃的名称，源自包子铺老板的雅号“狗不理”。

原来，在解放前的北方，被父母冠以“狗不理”乳名的人很多。那时候，穷人家的小孩子死后，埋葬很简单，大多被野狗刨出来吃掉了。许多穷人为了能让自己的小孩子成活，就给他们起一个“狗不理”的小名。没想到这位“狗不理”果然是狗不理，不但长大成人，而且还因为他做的包子好吃成了一个大名人。

毛泽东到天津时，天津市市长黄敬正患病，毛泽东亲自到他的住所去看望他。黄敬的夫人范瑾出面接待了毛泽东，向毛泽东介绍了黄敬的病情。

毛泽东此次天津之行，招待所里一张有关他们伙食标准的记录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记录的内容如下：

客人名称 职务 日伙食标准

毛泽东 干部 15斤小米

随行人员 干部 10斤小米

毛泽东在天津期间，由化学家、国家轻工业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李烛尘陪同，参观了天津轻工业展览，视察了塘沽新港第一期工程。

毛泽东一行驱车来到秦皇岛市一个玻璃器皿制造厂，已经是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了。

工作间内光线很暗，毛泽东仔细观察工人的操作，工厂领导不时在旁边介绍。只见工人双手持定一根近3米长、拇指粗细的钢管，将钢管的一端伸进融化玻璃的钳锅里，像用筷子粘糖稀一样，用管头粘起一团红红的玻璃熔球，用口含着管子的另一端，将气吹进玻璃的熔球内。随着气体的吹入，玻璃熔球逐渐膨胀起来。再将吹大的玻璃球移入模具中，转动管子造型，并用长长的火钳把器皿折出所需要的皱褶的边缘或其它所需要的形状。下一道工序，则是一些工人用砂轮在玻璃器皿上雕刻花纹。站在毛泽东身边的工厂领导介绍说：

“英国皇家有名的高脚玻璃杯，就是我们厂生产的产品。英国人花不多的钱，把我们制作的高脚杯买去，再在杯口上加上金线，就变成英国出品的皇家名牌酒杯了。”

毛泽东听后，不由得沉思起来。

接下来，毛泽东又参观了厂里的玻璃器皿成品展览。

参观结束后，毛泽东一行人从天津出发，南下视察黄河，李烛尘也应邀随行视察。

视察黄河的第一站是山东，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第二次去山东。途中，他全神贯注地读一本小说。深夜一时许，卫士给他端来一碗面条，他却头也不抬，仍然在看书。卫士把饭碗摆在他面前，又把筷子放在他的右手里。毛泽东光顾盯着书看，筷子插在碗里不动。他左手按着厚厚的书本，读到要翻页时，卫士提醒说：

“主席，吃完再看吧！面条都放凉了。”

毛泽东根本没听见，继续翻着看。

“主席，要不再给您热热去？”

卫士伸手就去端碗。

“嗯，不要。”

毛泽东说着，嘴慢慢地靠近碗边，眼睛盯着书，呼噜一声，一筷子面条吃进嘴里。此时，毛泽东因几个字靠近书脊看不到，就用左手一边握着书，一边让书展开些。卫士看在眼里，赶紧上前帮忙。他不明白，什么书使老人家这么专注。他趁机扫了一眼，噢，原来是著名作家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

这部长篇小说于1948年由东北书店出版，描写的是以萧祥为队长的土改工作队开进松花江畔的元茂屯，发动和组织广大贫苦农民开展对恶霸地主韩老六的斗争。韩老六被处决后，他的弟弟带领土匪武装进屯，进行反攻倒算，企图扼杀新生政权。在共产党员赵玉林和青年农民郭全海领导下，斗垮了阴险狡猾的地主杜善人。小说以磅礴的革命气势、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及丰满的人物形象，再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农村暴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江青在1949年1月给作家草明的信中说，她看了此书，被感动得流了泪。

10月26日傍晚，毛泽东的专列在济南车站停留，他的计划是在车上见见山东有关领导人就继续往前走。

此前，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得知毛泽东要来济南，十分高兴，就和省公安厅厅长李世英及省市领导人一起，早早地来到了火车站等候。罗瑞卿向毛泽东通报后，即请众人上车晋见毛泽东。毛泽东在客厅里与许世友等人一一握手。落座后，毛泽东说：

“这次来就是想看看你们，不想下车打扰地方同志。”

许世友说：

“主席，我们很长时间没见面了，山东的指战员盼你来，山东人民群众想见见你。你路过济南，应当下车看看。听说你还没来过济南，更应该看看，这里有很美的景观，有趵突泉、大明湖，还有北极阁。”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许世友在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司令员，参与指挥了济南战役，他与谭震林、王建安直接指挥攻城。毛泽东听许世友说起北极阁，自然就想到了济南战役，问道：

“北极阁，就是王耀武指挥部的那个北极阁吗？”

许世友说：

“是的。”

毛泽东看了周围的人一眼，笑着说：

“许司令这样留我，我就盛情难却了。好吧，许世友同志，明天我们看北极阁、大明湖。”

于是，许世友就扶着毛泽东下了专列，换乘汽车到了省交际处招待所。毛泽东简单吃过晚饭，就让许世友去给他借地方志。许世友很快就给毛泽东拿来了好几本书。

10月27日，毛泽东和许世友同乘一辆车，他的精神很好，一路上谈笑风生，他说：

“你们知道山东、济南的名称，是怎么得来的吗？”

许世友虽然熟悉山东和济南的地理位置及现状，但他对其历史却是一窍不通，其他的人就更不用说了。毛泽东见没有人回答，就说：

“山东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早生息的地方，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公元前16世纪商汤灭夏后，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建都‘亳’，在今天的曹县南。商的始祖契曾在蕃县，也就是在今天的滕县住过。商代早期的活动在今天山东的西部，河南东部。契传到孙（相土），势力达到今渤海一带，定都‘泰安’。商也曾在泗水建都，直到商第20代君王盘庚时，迁都到殷，也就是今天的安阳。

周武王灭商后，为了加强对广大被征服地区的控制，进行了大分封。在山东地区分封了曹、滕、齐、鲁等国。但主要是齐鲁，这就是山东也叫齐鲁的原因。齐国的首领就是姜太公，鲁国的首领就是周公的长子伯禽。齐鲁古时候还称‘邹鲁’或‘齐青’、‘山左’。齐鲁因在太行山以东，所以古代‘山东’有时指齐鲁，但有时山东的概念比齐鲁大。到战国时期，只剩下7个大国争雄了。人们以函谷关为界，西边的是秦国，东边的则是山东六国。

山东，作为地方最高一级的政区名称，是在金代开始的。山东这块富饶的土地，养育了炎黄子孙和众多的名人志士，据说三皇五帝中的舜帝和大禹都曾生活在这里。孔子、孟子、左丘明、孙武、孙膑、诸葛亮、王羲之、黄巢、李清照、辛弃疾、戚继光、蒲松龄等，都是山东人，他们为山东争光添彩，也为中国历史做出贡献。”

毛泽东侃侃而谈，许世友听得直眨眼。他是一员猛将，没有读过多少书，对这些历史知道的并不多，毛泽东所讲的这些历史，在他听来，很是新鲜。趁着毛泽东吸烟的功夫，他问道：

“那济南又是怎么回事？”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说：

“济南也是个古老的地方。为什么叫济南？原来古代这里有一条大河，发源于河南王屋山，从山东半岛入海，名叫济水。古时候济水、黄河、淮河、长江，并称中国4大江河。后来，济水上游发生变化，下游叫大清河，但仍然称为济水。清朝咸丰五年六月，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河水流入大清河，夺河床入海，以后并称为黄河，济水的名称也就没有了。现在济南北郊的黄河，就是古代的大清河，用的就是济水的旧河床。因为济南这个地方在济水之南，所以从汉朝起就叫济南。汉代的济南国所在地叫平陵城，就在今天济南市东郊龙山镇东北。西汉时，济南一度改为郡，后来又复国。曹操曾任济南相。到晋朝，济南郡的治所才由平陵城转到历城，就是现在济南市内的旧城区。现在的济南市区从此才正式成为郡所在地，经扩大修整成为初具规模的中等城市，而原来的平陵城逐渐衰颓。东晋时，济南郡隶属青州。隋文帝时，济南改为齐州，不久又改回来。唐朝济南属于济南道。宋朝把政区分为路，济南属京东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出任齐州知府，对城市建设有过卓越贡献。明朝初年在山东设省，省会在济南府历城县。尔后济南一直是省会城市。”

毛泽东又点燃了一支烟，继续说：

“济南自古以来，就是交通枢纽，北方重镇，也是文化名城。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就发生在济南南部，她哭的是齐长城，不是秦长城。大诗人李白、杜甫、苏轼等，都来过济南，而辛弃疾、李清照、蒲松龄，则长期生活在这里。所以，济南自古就有‘诗城’和名士多的美誉。”

毛泽东吸了几口烟，又补充道：

“要说济南名称的来历，其实在称济南之前就有别的名称了，它就是历下，由历山而得名。历山就是千佛山，在秦时，这里叫历下邑。济南郡由东平陵搬到历城后，历下就成为济南的一部分了。历下就是济南老区，很多著名景观，如千佛山、大明湖、趵突泉等，都集中在这里。这里是重要的文化区。”

说话间，车子已经到了趵突泉。毛泽东一行人来到园内，主人用煮沸的泉水，招待他们。之后，主人又安排导游引导他们一边参观，一边为他们讲解。导游介绍说：

“《老残游记》中说，济南‘家家有泉，户户垂杨’，确实如此。根据泉水出露的集中情况，出露处的地形，流出的特点和汇流的状况，可分为4大泉群，即趵突泉群，五龙潭泉群，珍珠泉群，黑虎泉群。”

导游指着马跑泉说：

“传说这个泉，与宋朝济南名将关胜有关。在金兵攻打济南时，知府刘豫准备投降，其部将关胜则主张出战。关胜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他的马看到主人死亡，仰天长啸，前蹄刨地，于是刨出一湾清泉，就是这马跑泉。”

毛泽东来到号称“第一泉”的碑刻“泺源堂”前，仔细看了那几个雄劲的大字，问身边的人：

“你们知道这泉水古代叫什么吗？”

一位地方领导人说：

“叫泺水。”

毛泽东说：

“对。据《春秋》记载，在公元前694年，鲁桓公和齐襄公曾相会于泺，就是这个地方。泺，是个水名，这是2600多年前的事了。”

毛泽东又看了漱玉泉。漱玉泉位于济南“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公园李清照纪念堂南侧，属“趵突泉泉群”。相传宋代杰出女词人李清照曾于此掬水梳妆，填词吟诗，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已散佚。后人辑有她的传世词作，就是以此泉命名为《漱玉词》的。毛泽东称赞李清照不仅词写得好，而且很有爱国思想。

毛泽东一行人离开漱玉泉，驱车到了济南四里山黄祖炎烈士的墓地。

本传前边已经讲过，黄祖炎是在1951年3月13日晚被反革命分子王聚民枪杀身亡的。毛泽东为此在一个月内连续作了3次批示。

毛泽东面色凝重，站在墓前向黄祖炎烈士默默致哀，又深深鞠了一躬。良久，他俯下身子，轻轻地抚摸着墓碑和碑上“黄祖炎”3个字，深情地说：

“祖炎同志，我来看你了。”

说着，泪水顺着脸颊慢慢地流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缓缓地对许世友和其他陪同人员说：

“祖炎是个好同志，对党忠诚。他的牺牲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

中午，毛泽东返回住地，吃过午饭，稍事休息后，和罗瑞卿、许世友等人聊了一会儿。此时，已是下午2点半，毛泽东说：

“走，我们看大明湖，看北极阁，看王耀武的指挥所。”

众人分乘轿车朝大明湖驶去。毛泽东对同车的许世友说：

“济南战役很重要，粟裕和你都指挥得不错。你们提出的‘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号很好，最后实现了这个目标。”

许世友说：

“济南战役所以能取得胜利，一是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指挥得好，思想明确，方针对头；二是广大指战员不怕牺牲，英勇作战。”

毛泽东说：

“你许世友也是有功的呀！听说最后攻城门时很激烈？”

许世友说：

“9月23号晚，我们对内城发起总攻。内城是济南军事的核心阵地，城墙又高又厚，又设有明碉暗堡。东西两大集团在炮兵火力支援下，对内城发起突击。各部英勇作战，相继突破城墙，但守军依托坚固的城墙阵地顽抗。我9纵队第25师第73团，在团长张慕伟带领下冒着炮火越过护城河，连续爆破，曾4次登城受挫，但他们越挫越勇，终于在24日凌晨占领突破口，首先登上城头，击退国民党军敢死队多次反扑，又在突破口左侧炸开约6米宽的豁口，为友邻部队开辟了向纵深发展的道路。这个团攻入城后大胆穿插分割，又大量消灭敌人……”

毛泽东问：

“是不是授予称号的那个团？”

“对，我们马上上报这个团的事迹和整个战役的情况，中央军委当天即授予该团为‘济南第一团’的称号。那个团的7连，被纵队领导机关授予‘济南英雄连’的称号。”

毛泽东问：

“听说王耀武差一点跑了？”

许世友一激动，摘下帽子，说：

“我们在9月24日下午，全歼内城守军，解放了济南，却没抓到王耀武。这可把我们急坏了，下令全军必须严密把守，认真查询。不久，来了报告，说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副司令官牟中珩和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等，化装混进难民群里，准备沿胶济铁路逃向青岛。28日早晨，王耀武在4个卫士保护下，到了长剑桥头，被我公安人员查获。开始他还不承认，后来经审讯才供出了自己的大名，并请求送往华东军区。”

毛泽东哈哈大笑，说：

“你们是布下了天罗地网了！整个战役歼敌10万，不简单！这次战役，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为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创造了经验和条件。”

说话之间，轿车已经到了大明湖。

大明湖位于济南市的偏东北方，它的西北岸，是明清两代城墙的遗址。由于这一带地势低洼，众多泉水大都流向了这里，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大的水域。在这一水域的旁边因建有大明寺，所以，北魏时这里就被称之为大明湖。

毛泽东一行荡舟大明湖，登上了湖心岛，观看历下亭，匾额“历下亭”3字是清代乾隆所书。服务人员介绍说：

“历下亭的修建，可以追溯到1500年以前，即北魏的‘客亭’。以后历下亭数易其地，宋朝以后，亭阁已经迁到大明湖畔。到了清代康熙32年，才在此地重新修建而成。历下亭闻名天下，主要是得益于大诗人杜甫的诗句。745年，杜甫到齐州临邑看望其弟杜颖，而后他到了济南，与时任北海太守的李邕相遇，二人宴饮于历下亭下。杜甫挥笔写下了《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一诗，其中的名句是‘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此后，杜甫的这句诗就成为历下亭的联语。现在的这副联语，又改成‘历下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了。”

毛泽东看过历下亭，便前往斜对岸的北极阁。北极阁耸立在大明湖北岸的高台上，在整个大明湖园区内非常显眼。毛泽东来到北极阁前，笑着说：

“我们来到王耀武的指挥所了。”

他又介绍说：

“这北极阁又叫真武庙，是道家的庙宇。据说，在金元之际，济南道教兴盛，全真教的祖师丘处机就曾在济南传教。北极阁始建于元代，上下有百级石阶，内有真武帝塑像。”

不知谁人插了一句话：

“全真教也没有帮上王耀武的忙。”

众人一听，忍不住哄笑起来。罗瑞卿问毛泽东：

“主席，还看什么？是否到此为止？明天再看千佛山、金牛山？”

毛泽东突然说：

“我们去看泺口大坝。”

罗瑞卿闻言不由一愣，事先没有这个计划，怎么做保卫工作？于是他就劝毛泽东不要去，无奈毛泽东坚持要去。他只好对司机说：

“走，去泺口大坝。”

车队向泺口大坝驶去。毛泽东问许世友：

“你知道为什么叫泺口吗？”

许世友说：

“不知道，我没读过多少书。”

毛泽东说：

“泺口也叫洛口，泺和洛通用，当湖水讲。泺口在黄河南岸，济南市北边。市内的泺水由此入黄河。”

许世友说：

“对，主席的记忆真好。”

毛泽东在泺口大坝脚下下车，兴致勃勃地登上大坝，看看泺水入河口，问道：

“你们知道黄河在山东段的情况吗？”

一位负责水利的干部汇报说：

“历城北部沿黄河地区，是一段狭长的地带。其东西长104华里，南北宽3至5华里，有耕地面积25万亩，包括以泺口为重点的吴家堡、西沙、药山、鹊山、华山等15个小乡的十几万群众生活在这里。从古以来，由于黄河的泛滥、变迁、改道，致使泺口一带的河底淤高，地下水位上升；再加上汛期南部山洪下泄，小清河排泄不及顶托倒灌，使这十几万亩土地越变越坏。历城旧县志已有‘野生碱卤，地尽不毛’的记载。直到解放前，这里还流传反映黄患的一首歌谣：‘春天一片霜，夏天明光光。豆子不结荚，地瓜不爬秧。’”

毛泽东说：

“黄患把这里的人民搞得太苦了。”

略停片刻，他又问：

“济水源出何地？”

那位负责人说：

“据汉书《地理志》、《水经》记载，济水自河南荥阳以北，分黄河东出，流经原阳县南、封丘县北，至山东定陶县西，折东北入巨野泽，又自泽北经梁山县东，至东阿旧治西，自此以下至泺口，就归入了现在的黄河河道。”

毛泽东问：

“泺口从古以来就常常淤断么？”

那位负责人回答说：

“对，是这样的。从古以来至济南解放前，这里曾发生过数不清的屡淤屡断、屡断屡疏的情形。甚至还发生过决口以后，连续七八年甚至二十多年堵不住的灾难。为了制止这种恶性循环，我们在此修了大坝。”

毛泽东赞赏地说：

“这大坝修得好嘛！”

毛泽东面向泺口，凝视着奔腾下泄的黄河水，陷入了深思。许世友见他神色凝重，便问道：

“主席，您在想什么？”

毛泽东说：

“我在想，过去二十多年都没有堵住这个决口，给山东人民造成这么大的黄患，为什么二十多年没有堵住这个决口？是因为那时社会制度不好。现在，我们建立了新中国，应该变害为利。黄河水泛滥会给人民造成危害，但我们治理黄河后，又能使黄河为人民造福。以后，我们要想出引黄河水的办法，把那首民谣中所说的‘一片霜、明光光、不结荚、不爬秧’的十几万亩卤碱地，改成稻田种水稻。我们可以引黄河水浇地，建设一些水浇田，这样，济南郊区的农民，不光是种玉米、种地瓜，也可以种水稻。这样，山东农民就可以多打粮食，少吃玉米、地瓜，也能吃上大米。现在就要考虑疏通小清河，搞排水工程，这样可以使黄河水变害为利。”

许世友兴奋地说：

“好极了。”

毛泽东转过身来，对陪同人员说：

“历城泺口，自古以来的黄河道，屡次淤断，屡次修复，自从你们修了这堵大坝后，那种在历史上屡淤屡断、屡断屡疏的恶性循环不见了。这样的事情，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才能做到。如果用引黄河水的办法，将泺口这一带的十几万亩卤碱地，改为稻田就更好了。”

他又嘱咐道：

“黄河水坝千万不能出事，出事就是大事，就会对人民群众造成巨大损害。”

此时，天已黄昏，毛泽东步下大坝，回到住处，和那位负责水利的领导人共进晚餐，二人一边吃一边谈。他仔细询问了黄河济南段的防洪情况，今后还要搞哪些工程？这些工程在夏季雨水大时，能不能顶用？能不能防止黄河水泛滥？

欲知毛泽东下一站视察何处，情况如何？且看下一章详述。

东方翁曰：关于济南的人文环境，许世友和其他地方领导人，只要看一看地方志，是不难了解的。毛泽东让许世友借济南的地方志，就是为了备课。他作为导师，也是需要不断地充电，不断地补充、丰富、扩大知识面。他不厌其烦地讲述济南的人文知识，并不是炫耀自己，而是有意识地启发这些地方官应该搞调查研究。毛泽东在济南是这样，到其它地方也是这样。他始终认为：作为一方“诸侯”，一个地方的“父母官”，对自己管辖的地方不了解，是治理不好这个地方的。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倡导调查研究是他的一贯作风。

**第39章**

**“革命总算成功了，但来之也不易。它是用亿万人民的血**

**汗换来的，是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经常回顾往事，就**

**是为了不忘过去，把新中国建设得更好。”**

话说1952年10月28日上午8点30分，毛泽东吃过早饭，罗瑞卿问：

“主席，是否再看几个地方？”

毛泽东说：

“不看了，我们走。”

许世友说：

“主席，到山东不看孔庙不好。”

毛泽东在1920年4月从北京去上海途中，曾在曲阜下车，参观了孔庙，至今已经32年了。他听许世友如此一说，便不假思索地说：

“对，应当再拜访一下孔老夫子。”

毛泽东一行在许世友的陪同下，乘专列离开济南，行至泰安火车站，他们下了车，在车站旁的小饭铺里，吃了一顿白水煮豆腐和白菜汤。

中午，专列到了兖州火车站，滕县县委书记王吉德应召上了专列。由于事先缺少准备，王吉德见了毛泽东，似乎不知道从何讲起。罗瑞卿看着王吉德十分窘迫，就对毛泽东说：

“主席，车备好了，我们去曲阜吧。”

毛泽东大手一挥，说：

“好，我们到曲阜看孔夫子去，出发。”

说罢，他率先下了专列，换乘汽车出发了。他对陪同的许世友等人说：

“你们知道曲阜是怎么来的吗？据东汉应劭解释说：‘**鲁城中有阜，委屈长七八里，故名曲阜’**。曲阜城东有一座土山名叫防山，如‘原’，高出于地面，《释名》这部书上说：‘土山曰阜’。应劭的解释和《释名》的说法近似。大概这就是‘曲阜’二字的由来。

曲阜的历史很悠久，曾是6个国都所在地。据说，最早来到曲阜的是神农。神农都陈，后徙曲阜。这位神农就是炎帝，他是黄帝的兄长，我们常说的炎黄就是指这二人，相传炎帝继伏羲为帝，在位60多年，后让位给黄帝。他住的地方叫‘犁铧店’，不知现在是否还有这个地方了。

据说少昊是黄帝的儿子，为嫘祖所生，初降居青阳。黄帝逝世后，公推他继位，迁到曲阜，帝于穷桑，就是现在的寿丘。少昊继黄帝之志，使这个地方发展很快。于是曲阜成了‘少昊文化’的中心，有‘少昊之墟’之称，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一页。后来曲阜出现了‘奄国故都’的称号。奄在商代长期为王都，到周初，因支持武庚的叛乱，被灭，史书上称为‘灭徐践奄’。商朝到盘庚时，都城由奄迁到殷，即今安阳。

‘灭徐践奄’后，为了征服东夷的战略需要，在曲阜筑鲁城，与‘成周’即洛阳成犄角之势。周王朝封周公于鲁，因当时中央离不开他，就命周公的儿子伯禽在这里建国，他就是鲁国第一位国君了。

曲阜作为王都前后有700年，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影响更大，一直是中国统治阶级的思想。过一会儿，你们看看孔林、孔庙、孔府就知道了。”

如今的曲阜与32年前大不相同，今非昔比的毛泽东故地重游，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孔庙主体建筑大成殿前，毛泽东驻足片刻，尔后边走边对身边的人说：

“‘大成’是孟子对孔子的评价。孟子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这里，孟子把孔子和几位先圣先贤进行比较，找出了‘圣’之所在。伯夷，因反对周武王消灭商王朝，逃避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孟子谓其清者；伊尹是商初大臣，辅助商王太甲，因这位王破坏法治，被他放逐，代理其政，3年后太甲悔过，又接回复位，孟子谓其任者；柳下惠是春秋时鲁国大夫，以学习讲究贵族礼节而著称，齐攻鲁，他派人到齐劝说退兵，孟子说他是和者；只有孔子集先圣先贤之大成，是圣人中最适合于时代的人。他把孔子推到了最高境界。

由于孔子的思想比较符合统治阶级的胃口，历代统治阶级给孔子戴了很多高帽子，他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与孔子同代人鲁哀公就尊称孔子为‘尼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学取得统治地位。唐太宗尊孔子为‘先圣’；唐高宗称孔子为‘文宣王’。宋朝加号孔子为‘先圣文宣王’。元朝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朝加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讲到此处，他不无幽默地说：

“孔子年年有进步，代代都加封啊！”

一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毛泽东一行来到孔府，孔府服务人员介绍说：

“宋仁宗时，把‘文宣公’改为‘衍圣公’。‘衍圣公’是我国封建社会享有特权的最大贵族。五代时相当于五品官；元朝时提升为三品；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其地位升得更快：明初为一品文官，地位仅次于丞相。到了清代，‘衍圣公’不但班列阁臣之上，还特许在紫禁城骑马，在宫中的御道上行走。随着孔家社会地位的提高，宅地也不断扩大，而且是在历代王朝支持下扩建的。孔府3路布局：东路为‘东学’，有一贯堂等；西路为‘西学’，有红萼轩、忠恕堂等；中府在中路，前为衙署，后为内宅，最后为花园。”

毛泽东身后的一位工作人员感叹道：

“孔家不愧为全国一号地主，一号贵族。”

孔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专用墓地。毛泽东一行来到孔林，当地负责人介绍说：

“孔子死后，他的弟子把他葬在鲁城北泗水之上，那时还是‘墓而不坟’，就是高土堆。到了秦汉时期，坟增高了，但只有少量的墓地和守林人。后来，随着孔子的地位提高，孔林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毛泽东说：

“这个孔林确有特点。”

负责人继续介绍说：

“孔林作为一处氏族墓地，2000多年来埋葬从未间断。这里有春秋之葬，秦汉之葬，每个朝代的墓葬都有。”

毛泽东说：

“**这个古墓群，不仅中国独此一家，大概全世界也找不到啊。研究中国的墓葬文化，不用到别的地方，这一处就够了。**”

毛泽东来到孔子墓前，认真看了墓前的巨碑篆刻，只见上边刻的是：“大成至圣文宣王墓”。当地负责人介绍说：

“这是明正统八年黄养正书。墓前的石台初为汉修，唐时改为泰山运来的‘封禅石’筑砌，清乾隆时又进行了扩大。”

毛泽东在返回的路上说：

“孔夫子有一位后人，他叫孔尚任。孔尚任在写《桃花扇》时，书桌上常放一把扇面上有桃花的曲阜‘鲁缟’扇，每当揣摩剧中人物，他总爱抖开桃花扇边扇边思考。有一天，孔尚任族里的孔尚镁前来拜访，见他在大风雪天，还摇着那把扇子沉思冥想，就赞叹道：尚任真是如痴如醉啊！据说，孔尚任为了写这部名剧，三易其稿，呕心沥血17年。”

毛泽东一行回到专列上，天已经黑了。吃过晚饭，毛泽东说下一站是徐州。许世友要继续陪同毛泽东前往。毛泽东说：

“许司令太辛苦了，我过意不去啊。”

许世友一再坚持，毛泽东只好同意了。专列在鲁西和苏北大地上飞驰。毛泽东毫无倦意，便与罗瑞卿、滕代远、许世友谈起了战争年代。他笑着对许世友说：

“许司令，济南战役之后，我们应该组织淮海战役了。”

许世友说：

“主席，1948年秋季以后，我们在军事上真是遍地开花，全国一片进军号声。特别是济南战役和辽沈战役的胜利，使全国的军事形势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我军与国民党军比较，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优势，而且在数量上有了优势。我们前线各部队领导和战士们非常兴奋，大家都希望接着打，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一直把国民党消灭干净。”

毛泽东说：

“当时，我和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我和恩来等同志也是夜以继日啊，很高兴啊。同时，还要随时掌握战争的全局，以决定下步工作。辽沈战役和济南战役之后，国民党军统帅部为避免徐州地区部队重蹈东北全军覆没的命运，决定以白崇禧部23万人，防御平汉铁路南段和长江中游地区，钳制我中原野战军主力；以刘峙部及白崇禧的几个兵团共70万人，加入徐州方向作战，改由国防部直接指挥，拱卫南京、上海，不得已时放弃徐州，依托淮河抗击华中野战军的进攻。国民党总兵力有80万人，他们自以为强大，企图在徐州地区与我决战。

再看我军情况，华东野战军及中原野战军部分38万人，集结在徐州、济南间休整。中原野战军13万人，大部集结在平汉铁路以西。此外，还有华东军区、中原军区及华北军区部分地方武装，共21万人可参战。我军总兵力60多万，士气高昂。华东、中原、华北3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后方力量大为增强。

纵观淮海战役战区，两军相比，我军数量尚不如敌人，战略上亦各有优劣。在这种情况下，统帅部如何下决心，也是很费脑筋的啊！”

毛泽东说着用手敲敲自己的脑袋，喝了一口茶，润润嗓子，起身双手掐腰，踱了几步，接着说：

“虽然难下决心，还得下决心。我们决定在淮海地区与国民党军队再进行一次决战。10月11日，电告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华东局和中原局。我们把整个战役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等地；第二阶段，以大约5个纵队，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并占领各城；第三阶段，可设想在两淮方面作战。整个战役大约用1个半月到2个月时间。”

许世友插话说：

“战役的发展完全证实毛主席的作战方针是非常英明的，战役基本上是按着主席设计的方案进行的。”

毛泽东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接着说：

“淮海战役的成功，与总前委正确指挥也分不开的。淮海战役后期，在我们部署好平津战役，确保傅作义部已无法南逃之时，于1月6日，我华野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这时的杜聿明集团已不堪一击。杜聿明企图突围不成，10日下午，我军全歼杜聿明集团，击毙第2兵团司令邱清泉，俘虏徐州‘剿总’司令部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歼敌55万人，最后以敌败我胜而告终。”

许世友见毛泽东说起淮海战役如数家珍，尽管自己是亲历者，也听得入了迷，他说：

“主席，淮海战役是大决战3大战役中，唯一一场在总兵力以少对多的情况下进行的战役，是60万对80万啊，听说斯大林都称赞这是奇迹！”

毛泽东朝许世友点点头，又轻轻地舒了一口气，似乎自言自语地说道：

“革命总算成功了，但来之也不易。它是用亿万人民的血汗换来的，是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经常回顾往事，就是为了不忘过去，把新中国建设得更好。”

专列在徐州火车站停了下来，因为时间比较晚了，毛泽东没有会见当地领导人，就在专列上休息了。

10月29日上午10点，毛泽东用过早饭，让罗瑞卿通知江苏省委负责人江渭清和徐州市领导人到专列上见面。

江渭清和徐州市委书记华诚一、市长张光中早已等候在外，听说毛泽东要接见，立即上车，向毛泽东问好。落座后，毛泽东说要听听徐州的工作情况。华诚一说：

“事先没有准备。”

毛泽东说：

“我就愿意听没准备的汇报。”

华诚一、张光中二人简单汇报了徐州市“三反”、“五反”、生产和生活情况，毛泽东说：

“这样汇报好，情况真实。我这次来徐州主要是休息，随便看看，听听，搞点调查，不想多打扰你们的工作。徐州是个好地方，这是我第2次来了。记得30年前，我从北京到上海，途经徐州，专门看了徐州古迹、市容、城墙，很开眼界。这次来就算旅游吧。”

华诚一插话说：

“我们徐州可是很有看头，很有听头。”

毛泽东说：

“**据史书记载，大约在4000年以前，大禹把全国9片陆地命名为九州，你们徐州即为一州。”**

江渭清插话说：

“另外，我们徐州应是养生学的发祥地。尧时有位叫篯铿（jian keng——笔者注）的，是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养生学家。尧封他到大彭，也就是徐州市区周围这块地方，建立了大彭国。这位篯铿就是彭祖，这块土地的开山人物。”

毛泽东说：

“你们徐州的这位篯铿可不是简单的人物，据说他是黄帝的后裔，颛顼（zhuan xu——笔者注）的玄孙，祝融吴回的孙子，陆终氏的第三子。他的母亲嬇（kui——笔者注）氏是鬼方人。这鬼方是华夏民族西部、北部的强梁外族，也就是犬戎、玁狁（xian yun——笔者注）、匈奴的前身。陆终氏和女嬇氏的结合，也许是民族和解的结果。传说这位女嬇氏分娩时难产，打开两肋，生下六子。大概因为剖腹产的创伤太重，不久这位母亲就去世了。后来发生了犬戎之乱，篯铿流离西域，受尽磨难，并学会养生之道。据说他在尧帝生命垂危之际，曾进献雉羹，也就是野鸡汤，治好了尧帝的病，因此给尧帝留下很好的印象。

彭祖为开发这块土地付出了极大的辛苦，他带头挖井，发明了烹调术，建筑城墙。传说他活了800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长寿之人，还留下了养生著作《彭祖经》。他建的大彭国，在夏商时期比较强大，后被殷商武丁灭掉，前后存在800年。大彭国灭亡后，彭城曾属宋、齐、楚。彭祖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孔夫子就非常推崇他。庄子、荀子、吕不韦等都曾论述过他。《史记》中对他有记载，屈原诗歌中也提到过他。大概因为他名气太大了，到了西汉，刘向在《列仙传》中，竟把彭祖列入仙界。”

说到这里，毛泽东站起身来，向外一挥手，说：

“走，不能光在车上坐而论道，我们出去实地考察一下。”

毛泽东等人下了专列，随行人员也都簇拥而下。王鹤滨走到滕代远的卧铺车厢时，见他仍然坐在铺位上不动，面色有些苍白，便俯身凑近他，问道：

“滕部长，有什么不舒服吗？”

“没什么。”

滕代远无力地回答，说罢起身向车厢门口走去，没走几步，突然倒下了，黄豆大的汗珠涌满了额头。王鹤滨判定他是由于疲劳过度，饮食不足，发生了低血糖。一位年轻的女乘务员也急忙赶了过来，焦急地问：

“发生了什么事？”

王鹤滨顾不上回答，连忙说：

“餐厅有糖没有？”

“有，干什么？”

“快！端一碗热糖水来。”

不一会儿，乘务员端来半碗白糖水，王鹤滨把滕代远的上身稍微抬高一点，说：

“滕部长，不要担心，喝下这碗糖水便会好的。”

滕代远把嘴凑近碗边，一口气喝了下去。他的病情很快好转了，冷汗停止了。他试着从地上站了起来，说：

“王医生，不要管我了，快跟上毛主席！”

说罢，用手帕擦去头上的汗珠。王鹤滨问：

“过去发生过这样的情形吗？”

“没有，第一次。”

“这糖水喝了就会好的。”

王鹤滨和乘务员一左一右把滕代远扶回到卧铺上坐下，滕代远脸上泛起了笑容，说：

“王医生，我没事了，你快去赶毛主席。”

王鹤滨说：

“滕部长，你休息一下，我去啦。”

说罢，他出了车厢，向毛泽东去的方向追了过去。汪东兴见他来了，不解地问：

“王大夫，干什么去啦？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王鹤滨稍微调整了一下呼吸，向汪东兴报告了滕代远的病情和处理情况。汪东兴一听，拉着王鹤滨向杨尚昆做了汇报，杨尚昆也加快脚步赶到毛泽东身侧，报告了滕代远的病情。毛泽东回过头问王鹤滨：

“病得重吗？”

王鹤滨忙跨前两步，说：

“病情缓和了。由于低血糖，晕倒在车厢的门口，喝了碗糖水，好了。”

毛泽东一行乘车来到徐州市市委招待所，在一间不大的会客室里休息。毛泽东坐在东侧靠山墙的沙发上，从卫士那里要来一支香烟吸着。其他随员坐在四壁前的沙发上，每人面前放着一个盛着茶水的带盖白色瓷缸。服务员又端来3个砀山梨，每一个足有2斤重。服务员将梨子削了皮，切成条状，在每一块梨上插两根木质的牙签，首先端到毛泽东面前，半鞠着躬说：

“主席，请尝尝这砀山梨。”

“我的牙齿不行，吃了会疼的，谢谢。”

毛泽东微笑着拒绝了，他环视一下他的随员们，说：

“大家尝尝吧！”

服务员端着盘子，在室内转了一周，削的梨子还没有分完。这种请客方式真巧，一个梨子请了一群人，尚有富余。毛泽东看大家都尝了梨子，就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握别了接待人员，乘车观看了市容，还要去看黄河故道。徐州有不少山头分布在市郊，每个山头都有动听的历史故事。毛泽东对众人讲道：

“徐州是古战场，是兵家必争之地，它是东西南北的咽喉要道。”

罗瑞卿接着说：

“这里也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争夺要地，占据了徐州，南可夺南京，东可取上海。淮海战役时，就是如此，我们一占领徐州，蒋介石就守不住上海和南京了。”

汽车在一条东西向的大街南侧停了下来，江渭清说，已经到了云龙山东麓。

云龙山位于徐州市南部，在唐代时习称石佛山。据史书记载：“山有云气，蜿蜒如龙”。南朝宋武帝刘裕年少时曾登此山，见有云龙环绕之异，他即位后即将石佛山改名为云龙山。

毛泽东下车后来到山脚下一道围墙的大门口外，见门口旁在墙上所嵌着的一条横石上镌刻着“云龙山”3个大字，走进大门，来到东半山的兴化寺，又叫石佛寺，在一尊石佛像前驻足观看。这尊大佛，头像大概是在北魏时期凿成，而两臂和前胸则是在清朝康熙三十四年所补建。只见他方面大耳，阖眸微笑，环手而坐，法相庄严。毛泽东仔细看了一会儿，说：

“国之瑰宝啊！”

从兴化寺来到放鹤亭，他对身边的人说：

“1077年，苏轼出任徐州知府。他当时刚过不惑之年，奋发有为，政绩卓著，给徐州百姓做过一些好事。在他离任时，徐州百姓成群结队为他送行，有的人挽住他的马头，献花献酒，依依惜别，甚至放声大哭。苏轼与张山人是好友。苏轼常与别的朋友到他那里登门拜访，他们一起饮酒赋诗。这位张山人驯养了两只鹤，并在云龙山修建了一座草亭，名曰‘放鹤亭’。苏轼为此写了一篇《放鹤亭记》，文情并美，成为流传千古的著名散文。”

毛泽东说罢，问身边的一位地方领导人：

“能背出《放鹤亭记》吗？”

那位领导人不好意思地摇摇头。毛泽东遂轻声吟道：

“……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纵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暮则傃东山而归，故名之曰放鹤亭……”

毛泽东吟罢，又看着亭前乾隆题诗的石碑，说：

“乾隆这个人好题诗。”

一行人登上云龙山山顶，极目望去，山脚下的山峦、河道、村庄、城镇、沟壑、林木，就像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薄纱。站在毛泽东身边的地方领导人，用手朝北边指着视线下的黄河故道，侧着头看着毛泽东，请毛泽东看黄河故道。毛泽东眯起了双眼，用力望了望，也用手指了指黄河故道，微笑着说：

“啊！那就是黄河故道啦？”

江渭清说：

“是，主席，那就是黄河故道。”

毛泽东皱皱眉头，说：

“**黄河故道穿城而过，威胁人民的生命财产，市委市政府应当及早采取措施，变灾为利。”**

华诚一、张光中连连点头称是。毛泽东接着议论道：

“徐州是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历史上很多重大事件、著名人物都与徐州有关。据统计，徐州籍的皇帝有十几人之多，除了远古时期的篯铿，还有刘邦、刘秀、曹丕、刘备、刘裕、萧道成、萧衍、朱全忠、朱元璋等。著名的文臣武将，有西汉的萧何、曹参、周勃、王陵，还有抗金英雄赵立，刚直廉洁的彻里氏，反清复明的阊尔梅，义不仕清的万寿祺，蔑视奸党的李向阳等等。近代则有辛亥志士王少华，以身许国的吴亚鲁，工人领袖姚佐唐，雨花巾帼吕励之，民族英雄李云鹏，我们的炮兵司令朱瑞等。

历史上很多名人来过徐州，做过很多有意义的事，如秦始皇为了秦政权的巩固和持久，曾亲临彭城，于泗水求鼎。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曾隐居在古邳镇，并在那里的圯桥见到了黄石公，黄石公给他一部兵书，帮助张良成就了大事业。著名史学家司马迁，诗人谢灵运、李白、白居易、李商隐、范仲淹、文天祥、李渔、苏轼、韩愈、李煜等，都来过徐州。

大诗人李白专程去下邳圯桥凭吊张良往事，写下《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一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我来圯桥上，怀古钦英风。唯见碧流水，曾无黄石公。叹息此人去，萧条徐泗空。这李白也想见黄石公，得到上天指点，干点大事业，可惜，黄石公不在了！

大诗人白居易父亲曾任彭城令，他9岁时便来过徐州，以后又多次来徐州。他曾写下著名的《燕子楼诗》，这首诗还引起了一些矛盾。**清朝的乾隆皇帝经常出巡，4次来徐州，在这里也研究过治理黄河的事**，并留下过诗篇和题词。

在徐州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很多：刘项楚汉相争。三国时期曹操、刘备、吕布等在这块地区群雄逐鹿，导演了多幕历史活剧。《三国演义》中写了许多故事，如曹操血洗徐州，泗水因此断流！吕布在沛县辕门射戟，张辽招降关羽等。南朝宋的建立者刘裕，曾是东晋北服军的战将，后掌握军队大权；刘裕发动两次北伐，收复了一些失地，并建立了新的朝代，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徐州；历史记载，他曾大兴土木，扩建了徐州城。总而言之，徐州不愧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很值得学习和研究。”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指着四周对江渭清说：

“**渭清啊，你说这石头山上没有植被，能不能搞绿化造林呢？**”

江渭清想了想，回答说：

“世上无难事嘛，石山绿化一是可以搞人工植被来解决，二是可以在石头上打眼，再向洞眼石缝中填土，播树种和植小树苗，我看总是有办法的。”

毛泽东说：

“那好嘛，就按你说的办吧。**这么大的一座山，荒秃秃的多可惜。我问过专家，种一棵树就可以含吸住一吨水，既能防止水土流失，保持生态平衡，又能美化环境，产生经济效益，岂不是一举两得。你们应当治好战争创伤，加快建设步伐。发动群众，上山栽树，绿化荒山，变穷山为富山。**”

华诚一、张光中等人表示，一定照办。

眼见日当午时，毛泽东一行便从北坡下了云龙山。

10月29日中午，毛泽东一众人等简单吃了饭，稍事休息，便乘车沿中山路向北行驶，前往九里山。

九里山在徐州市西北郊，东西走向，逶迤9里。西起第一峰名象山，当中是团山。九里山上保存了很多古迹，有樊哙磨旗石、白云洞、刘向墓等。

毛泽东坐在车上，非常兴奋，他对身边的人说：

“徐州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据文献记载，从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起4000多年里，在徐州发生较大规模的战事，就有400起。九里山则是一个重要战场，更是军事要塞。你们看过《水浒》吗？那里有一首歌谣：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这说的正是刘项楚汉相争的故事。”

有人插话说：

“主席，为我们讲讲楚汉相争的故事吧。”

毛泽东说声“好吧”。他点上烟，抽了几口。说：

“秦朝末年，由于统治阶级的残酷统治，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沛县人刘邦起义后，被称为沛公。下相人也就是今日宿迁人项梁、项羽，避仇吴中，杀死吴郡太守，也举起义旗。全国很多地方的农民以及原六国旧人纷纷起来反秦。当时的刘邦官居泗水亭长，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乡长吧，他已经48岁了。那位以‘万人敌’为志向的项羽，才28岁，是个年轻小伙子。

刘邦起兵后，在山东西南江苏丰沛一带，打了几个小胜仗。项梁、项羽率八千子弟兵挥师北上，而且力量很快扩大到六七万人，两军合并，力量更大。

陈胜、吴广西进起初顺利，当打到离咸阳不远的戏时，被章邯打败。陈胜退到今安徽蒙城一带，被车夫庄贾杀害。陈胜、吴广起义军失败。

这时反秦力量主要是项、刘两支。项梁因骄傲，在定陶被章邯打败身亡。刘、项把他们拥立的楚怀王，从盱眙接走，退守徐州。

章邯以为杀死项梁，楚军不再构成威胁，便挥师攻赵。赵大败退守巨鹿，向怀王求救。楚怀王命宋义、项羽、范增率一路人马救赵，攻打章邯；另外命刘邦率部西进，攻打河南，而后取咸阳。

此前，楚怀王对诸将有言：‘先入关者王之’。秦灭亡后，刘邦和项羽又开始争夺天下……”

毛泽东正说着，车子已经到了九里山。下车后，大家一边走，一边听毛泽东继续讲故事：

“刘邦乘项羽攻打齐国之际，迅速东进，数十万大军很快占领了彭城。但刘邦因为产生了骄傲，对项羽反扑估计不够。当项羽得知刘邦攻占了彭城，大为惊慌，急率精兵3万返彭城。这时的刘邦，却在彭城置酒与各路诸侯喝庆功酒呢！楚军在早晨向汉军发起进攻，先击破汉军驻鲁就是现在曲阜的樊哙部，又穿越胡陵，过九里山，大败驻萧县的汉军，而后直趋彭城。一日之内赶回彭城，可谓神速。刘邦急促开城迎战，溃不成军，大败而逃。汉军沿谷泗二水退逃，被杀十几万，在东濉水上又被项羽赶上杀死十几万人，史书上说：‘濉水为之不流’，可见死人之多。刘邦只带数十骑逃走，他的父亲和老婆都落到项羽手中，真是惨败啊！

刘邦逃到荥阳，收集逃散士卒，萧何从关中派来增援部队，他又把韩信的部队收来，汉军重新振作起来。

此后，刘项长期对峙，或拉锯战于荥阳、成皋一带。经几年对峙，项羽疲于奔命，只好提出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西为刘属，东为项属。刘邦表面同意双方都撤军，其实他听从张良、陈平建议，耍了个鬼把戏，当项羽后退时，他却偷偷从后边杀来。同时，刘邦命令韩信从齐，彭越从梁，英布从淮南，会战项羽，对项羽形成战略包围。

项羽边战边退，而刘邦步步进逼。民间传说在九里山，韩信曾指挥军队与项羽发生过激战，项羽由此退往垓下。”

毛泽东一行人来到团山樊哙磨旗石前，当地人解释说：

“相传楚汉决战时，汉军大将樊哙在山上竖起一面大旗指挥作战，因为旗能磨倒山石，所以叫磨旗石。”

毛泽东细看这团山之石，果然奇怪：岩石上有一个大洞，长3米，宽1.3米，深1.7米。一行人又来到象山半山腰的白云洞，当地人介绍说：

“据说它是项羽命令士兵挖的隧道，出口在汉军阵后，因而摆脱了汉军的包围。”

毛泽东笑着说：

“看来项羽还懂得地道战呢，要不是这个洞他早就完了。”

顺着白云洞向下，毛泽东又去看了刘向墓。在返回途中，毛泽东接着讲楚汉相争：

“项羽最后退到垓下，被汉军团团围住，刘邦、张良采用十面埋伏和四面楚歌的计谋，从军事实力上和心理上瓦解楚军。项羽绝望得慷慨悲歌，别姬南下，到乌江时自刎而死。这场战争最后以刘胜项败而告终。”

他吸了一口烟，继续说：

“项羽和刘邦几乎同时起兵，以实力而论，项羽比刘邦雄厚。灭秦后，战争由反秦转变为刘项争天下，其间各有胜负，最后刘邦胜利，原因有三：一是刘邦实行的政策比较符合历史潮流，得到人民的拥护。如约法三章，为义帝发丧等。而项羽则烧杀抢掠太甚，分封也不公平，阴谋杀死义帝。二是刘邦有一条正确的作战方针，正面由刘邦与项羽对峙；北面由韩信消灭魏、赵、齐后，南下对项羽施加压力；南边由英布、彭越侵扰项羽后方；总体上对项羽形成战略包围之势。同时，采取离间计，除去项羽大谋士范增，削弱其领导核心力量。而项羽则顾此失彼，疲于奔命，以一己之勇横冲直闯。三是刘邦用人政策正确，正如他自己说的：‘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克，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可见，刘邦是有自知之明的，比较明白自己胜利的原因。而项羽则不知道自己失败的原因。正如司马迁批评的那样：项羽‘自矜攻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5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司马迁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

欲知毛泽东在视察途中，还会道出什么宏论妙语，且看下一章详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评楚汉相争之刘邦胜利、项羽败亡的三个原因，的确是高论！**人心之向背、战略方针正确与否和用人之道，**自古以来都是决定创业、治国胜负成败的关键，后人可不慎乎？！

**第40章**

**“黄河是养育我们中华民族的摇篮，现在简直成了一条害河。俗话**

**说：‘黄河九曲十八弯，富了前后套，害了山东和河南’。它一出三**

**门峡，就像一匹收不住缰绳的野马，奔腾不止，不知在哪儿闯乱子，**

**使多少人民生命财产毁于一旦。现在到了我们手里，一定要驯服它。”**

话说下午4点，毛泽东返回到停在九里山机场专用线上的专列，尚有余兴，他连连说：

“今天大开眼界，受益匪浅。”

许世友等人说：

“我们陪同主席，听了一堂难得的历史课，长了很多知识。”

毛泽东说：

“刘邦在这里战胜了项羽，我们在这里战胜了蒋介石。我们不能学习楚霸王，我们要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也要牢记自己的经验教训。”

他对当地领导表示感谢，还应邀为他们题了词，说希望他们把工作搞得更好。尔后，他又与许世友、江渭清等人一一握手告别。临走时，毛泽东告诉王士英厅长说：

“下站到兰封，请你通知河南同志。”

5点零5分，专列离开了古城徐州。毛泽东去看望了滕代远，询问了他的病情，又说：

“你的健康情况不好，以后外出视察工作，你就不要再陪行了，派一个副手来就行了。”

专列直奔河南，停在了黄泛区简陋偏僻的兰封车站的一个岔道上，这里是兰封支线。

10月30日清晨，大自然在晨曦中苏醒了过来。一夜未睡的毛泽东穿着风衣，下了专列，众人也陆续跟了下来。大家站在小车站的岔道上，可以听到从远处的村庄里传来的报晓鸡鸣。

河南省省委书记张玺、省政府主席吴芝圃和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及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早已迎候在车站上。

张玺，职业革命家，原名王常珍，1912年出生在河北省平乡县东田村。1949年6月，他出任中共河南省省委书记；1956年患鼻咽癌，坚持工作；1959年病逝。

毛泽东和张玺、吴芝圃、王化云、陈再道一一握手，他问起陈再道的家乡、出身和经历，陈再道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

“你这个放牛伢子，现在当了司令，真不简单！我知道，在战争年代你是一员战将。现在你们既要做好军区的工作，又要积极参加地方的生产建设，要同地方党政机关一起，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深秋的清晨，冷空气迎面扑来，毛泽东一行人沐浴着晨曦，踏着朝露，向着一个村庄走去。

村头的打谷场上，站着两个像父子模样的农民，长者约莫50来岁，年轻的有30来岁，都是中等身材。他们肩上披着黑色粗布小棉袄，穿着夹布裤子，裤脚用黑色的带子捆绑在脚腕处，双手交叉抱着双肘。这两位农民半张着厚实的嘴唇，以微笑的目光，注视着这一群不速之客。毛泽东走到他们面前，亲切地向他俩打招呼，与他们一一握手，问道：

“今年收成怎么样？”

“还行喽。”

青年农民环顾了一下谷草堆，憨厚而高兴地回答着。年长的农民补充说：

“这里的土质不好，盐碱地多，有的收成不行，不怎的。”

毛泽东半侧着头，看着比他矮的农民，又问：

“够吃吗？”

“解放后，庄稼人的生产积极性高了，都为自己种地，精耕细作，够吃。”

年轻的农民这样回答。年长的农民吸着旱烟，在旁边点了点头。毛泽东说：

“要改造盐碱低洼地，就能提高粮食产量。”

“能行？”

年长的农民很有兴趣地问。毛泽东肯定地说：

“能行！**你们可以挖沟，疏通河流，翻淤压碱，可以植树，造林固沙，排灌。当然，这些要靠农民组织起来，生产形式再大一些，才能解决农田改造工程。**”

告别了两个农民，毛泽东顺着一条小路向西继续走去。在不远的一个小山沟的北山坡上，有几处农舍。毛泽东来到小山坡下，由省里陪同的领导做向导，向上爬去。李银桥、孙勇急忙加快两步，一左一右小心翼翼地扶着毛泽东，爬上了土坡。土坡上面是一块平地，北边有一排房子，用土墙分成数家，毛泽东随着省领导走进西侧中间的一家。这一家是两间房子，门上挂着有补丁的棉布帘。屋里的光线很暗，只有一个五六十岁的女主人在盛着玉米棒子的柳条笸箩里脱着玉米粒子，哗啦哗啦的声音像小曲一样，从笸箩里传出来。省领导将一条唯一可坐的长板凳搬到女主人的斜对面，请毛泽东坐下来。毛泽东缓缓地坐在了凳子上，背对着门口，弯曲着上身，面对着低着头脱玉米粒的老太太问：

“你家里其他人哩？”

“儿子当兵去了。”

老太太头也不抬，头顶对着毛泽东，手里不停地搓着玉米棒子。

“还有什么人哪？”

“老头子一早起来，就去赶集啦。”

“打的粮食够吃吗？”

“打的不多，盐碱地不爱长。”

“啊！”

毛泽东同情地应了一声。这家的女主人并不知道对面的客人是毛泽东，她一直埋着头，做她的营生，从没有抬过一次头，看一看和她交谈的人是谁。

“我们要走啦。”

毛泽东离开了长凳，伸直了腰，站了起来，向女主人告别。

“你们要走啦，不喝点水呀？”

女主人用农村中的客套话应酬着，她仍然坐在矮凳子上未动地方。

“不喝啦。”

毛泽东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了户外，顺原路返回。刚一下坡，迎面走来一位花白胡须的老农，约莫60多岁，粗壮的身体，穿着一身夹布上衣，腰间束一条粗粗的黑色褡包，夹衣外面披着一件黑色的小棉袄，见到毛泽东一行人，客气地说：

“要走啦，到家去坐一坐吧！”

“赶集回来啦，刚从你家出来！”

省领导打着招呼，又把脸转向毛泽东说：

“这位是那家老太太的老伴。”

毛泽东刚走到下坡的当儿，后面突然传来那老年妇女的声音：

“毛主席呀，您来啦！”

毛泽东扭头一看，只见那位老太太，已经站在了土坡的边上，笑眯眯地半张着少了几颗牙齿的嘴。她可能是刚从回到家里的老伴嘴里，猜测到是毛主席来到家里了。毛泽东脸上露出了笑容，在李银桥、孙勇两位副卫士长的搀扶下，举起右手，轻轻地上下摆动了几下，向她表示致意。**老太太看清楚了毛泽东那高举的右手，又高声问道：**

**“毛主席呀，斯大林来了没有哇？**”

**毛泽东和他周围的人都被问笑了。罗瑞卿笑着说：**

**“嗨，这位老太太还真有点国际主义精神哩！”**

毛泽东路过一个小学校时，听到了朗朗的读书声，这位曾经立志当老师的国家主席被吸引住了。他走到教室的窗前，认真地听了一下女教师的朗读，微笑了，评价说：

“教得好！”

女教师急忙跑出教室，追上张木奇说：

“同学们看到毛主席了，我想见一下毛主席行吗？”

张木奇不敢做主，便婉言谢绝了。毛泽东一行人回到专列上，用了早餐。河南省委的张玺、吴芝圃和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来见毛泽东。王化云准备向毛泽东汇报治理黄河的情况。毛泽东不熟悉王化云，就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王化云说：

“我叫王化云。变化的化，云彩的云。”

毛泽东微笑着说：

**“雨水多了，化云就开晴，逢到干旱，化云就下雨。我看咱们中国有了你，老百姓吃饭可以不发愁了。**”

众人闻言皆笑。毛泽东：

“走，咱们去看黄河，且看且说吧。”

一行人驱车来到黄河南岸的东坝头堤段。吴芝圃介绍说：

“这东坝头就是清朝咸丰五年黄河决口改道的地方，名叫铜瓦厢。”

毛泽东看到东坝头的防汛人员，正在检查、修整堤坝，就问王化云：

“像这样的大堤和石头坝你们修了多少？”

王化云回答说：

“全河修堤1800公里，修坝近5000道。过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代，这些埽坝很不坚固，现在都改成了石坝。”

毛泽东问：

“黄河6年内没有决口泛滥，今后再继续把大坝和埽坝修好，黄河是否会决口呢？”

王化云说：

“这不是治本的办法，如遇异常洪水，还有相当大的危险。”

毛泽东笑着说：

“黄河涨上天怎么样？”

王化云还是一本正经地说：

“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埽坝挡不住。”

说话间，众人来到了杨庄险工地段，毛泽东指着手持钢棍的技术人员，问王化云：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王化云立即用手招来一位工程师，说：

“请你向毛主席汇报一下，你们是在干什么。”

工程师兴奋地说：

“毛主席，我们是在探鼠洞，鼠洞是黄汛时决堤的重大隐患，如果洪水灌进鼠洞，就会顺着洞穴流向鼠洞的另一个开口，假如另一个洞口开在堤坝的外侧，洪水便会迅速地流向堤坝的背河道的一面，因为洪水的压力很大，加上堤土遇到水时就会软化，易被冲掉，鼠洞就在洪水的冲击下迅速地扩大、崩塌，而导致决堤。”

毛泽东听了，感叹道：

“千里之堤，溃于一穴。”

说罢，又问工程师：

“怎么个检查法呢？”

工程师向一位距离近的技术人员招了一下手，那位技术人员小跑过来，工程师接过他手里的钢棍，在毛泽东的脚前，一边做动作，一边解释说：

“我们用双手错开，持钢棍向下刺去，提拉一下，为了增强冲力，再往深部刺去，这样反复地向下刺去，如果遇到鼠洞，双手就会感到无抵抗的刺空感，就可以断定有鼠洞了。”

毛泽东又问：

“发现鼠洞之后，又怎么办呢？”

“如果发现鼠洞，就将钢棍刺入的小孔扩大，暴露鼠洞，然后把水泥浆浇灌进去，使其充满鼠洞。老鼠如果来不及逃走，就会被水泥固铸在洞内。这样一来，既堵了鼠洞，又杀死了老鼠，加固了堤坝。”

毛泽东听了，脸上泛起了赞许的微笑，他说：

“好，我来试试。”

说着，他兴致勃勃地把袖口稍微卷了一下，从工程师手中接过钢棍，刺入地下，不到两分钟，已经刺入地下1米多深。他的脸上露出了惬意的微笑，称赞说：

“可以，是个好办法，简单易行。”

工程师也高兴地说：

“这是我们的小小发明，别的地区的防汛人员，常常来到我们这里取经哩。”

毛泽东说：

“很好，谢谢你啦。”

他握别了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站在东坝头的堤岸上向对岸望去，用手一指对岸，侧头问王化云：

“那是什么地方？”

王化云说：

“那是西坝头。”

毛泽东问：

“咸丰年间，清政府为了对付太平军，就是在这里决口的？”

王化云肯定地说：

“就在这东坝头。”

毛泽东回到专列上，告诉汪东兴说：

“开车，继续向西，去开封。”

于是，专列离开了兰封车站，向西驰去。众人用过午饭，罗瑞卿劝毛泽东说：

“主席，你休息一会儿吧。”

毛泽东没有应声，正在思考着水利的事，他突然说：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来是可以的。”**

**这可能是他首次想到了南水北调的问题**。少顷，他又对王化云说：

“上午在东坝头收获不小，但这里看不出悬河，我想找个地方看看悬河，在哪个地方比较好？”

王化云说：

“在柳园口比较好。东坝头因决口，河道冲深了，所以悬河不明显。”

毛泽东问：

“那里的悬河能高出地面多少米？”

“3 到5米。封丘曹冈险段，高出8到9米。开封城内地面比黄河低5到6米，如果来洪水相差更大。”

“那我们就到那里去看看吧。”

罗瑞卿再次劝毛泽东休息一会儿，毛泽东摆摆手，意思是你们休息吧。他对黄河的事兴趣正浓，高兴地对王化云说：

“‘黄河’，你是好人啊！你为治黄做了很多工作，希望你能为办好黄河的事，继续努力工作。”

毛泽东戏称王化云为“黄河”，可见他对这位治黄专家是非常满意的。

下午3点10分，专列到达开封车站，毛泽东因看悬河心切，对张玺、吴芝圃说：

“先去看悬河，尔后再进城。”

毛泽东一行人换乘汽车到了柳园口。这柳园口是东坝头的上流堤段。毛泽东下了车，直奔堤坝而去，由于他爬得太急，到了坝顶累得直喘粗气，李银桥连忙把大衣放在地上，让他坐下，点一支烟休息一下。

毛泽东休息了一会儿，在两行柳林夹着的堤面上，大步向西走去。在堤坝西侧，摆放着两张桌子，桌上放着水壶和碗，桌子周围有几条长凳子，像农村招待客人一样。这是当地领导特意安排的，汪东兴看着桌子很满意，点头微笑说：

“办得好。”

大家劝毛泽东坐下休息一会儿，毛泽东看了一眼桌子，没有坐，继续往前走，他完全被黄河的景象吸引了。毛泽东身边的一位随员问王化云：

“这是1938年蒋介石炸堤的地方吗？”

王化云说：

“蒋介石炸堤决口的地方是在花园口，花园口是在郑州附近，是离这里不太远的上游。1938年6月，日寇占领了开封，进逼郑州，蒋介石政府竟下令炸毁了花园口的黄河大堤，致使被淹没的豫皖苏平原造成重大灾祸。”

毛泽东来到在柳园口最易发生险情的地段上，这一截堤段，还留有历史上决口以后堵上的痕迹，堵截部位显然是向南移了。毛泽东站在这里，向河面望去，但见黄水泥流波涛滚滚，比东坝头的流速更快。面对此情此景，他自然想到了唐代描写过黄河的两位诗人。他将视线缓缓移向上游，高声吟诵起王之涣的名句：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继之，他又把视线收回来，向下游眺望，吟诵起李白《将进酒》中的名句：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毛泽东看到大堤北面的黄河在地面上奔流，大堤南面的村庄树木和农田，好像落在凹坑里，高大的杨树梢，还比大堤低，就问：

“这是什么地方？”

张玺说：

“这里就叫柳园口。”

毛泽东感叹道：

“啊！这就是‘悬河’啦！黄河水比堤外的树丛还高，真不愧为是悬河啊！”

他又向远处隐约可见的开封古城望去。防汛人员介绍说：

“开封北门的铁塔，是城中最高的建筑物，它的尖顶与河道水面同在一个水平上。”

防汛人员还说：

“这个地方的堤段如果决口，黄河水的落差将会有10米之巨，后果将不堪设想。”

吴芝圃插话说：

“黄河在这一带经常发水，开封也多次被淹，再加上政治、军事的原因，这里的人民遭受的苦难更多。秦统一六国时，秦将王贲攻取大梁引水灌城，使大梁化为废墟。金明昌五年，黄河在阳武决口后，经开封城北向东流，大水灌城，历史名城再次成为废墟。道光21年，黄河又在开封西北张家湾决口，水困开封达8个月之久。据说最惨的一次是明末那次决口，全城有37万人，大多数葬身鱼腹，仅有3万人幸免。”

王化云说：

“这里是黄河防汛措施的重要保护地段。全国解放后，还没有发生大的险情，我们也决不会让它重演历史上发生过的惨事。”

毛泽东问：

“历史上，这段黄河在最大洪峰时，流量是多少？”

王化云回答了毛泽东的提问之后，又说：

“清王朝时，有个民谣，描述过一次大洪水的情况：‘道光二十三，洪水涨上天，冲走太阳渡，捎带万锦滩！’那次洪水是够大的了。”

毛泽东说：

“你们一定要好好防守，千万不能再让黄河决口了！”

说罢，他下了大堤向河边走，沿着河边折向东方，弯腰抓了一把泥沙细细看，问道：

“这是不是从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冲刷下来的？”

王化云说：

“是的。”

毛泽东又问：

“一年能冲下来多少黄土？”

王化云说：

“据陕县水文站测量，该地平均每年往下游冲去13.8亿吨。大量泥沙的淤积，是造成黄河改道泛滥的主要原因。”

毛泽东点点头，朝渡口附近一个小饭铺走去。饭铺里的掌柜是位老汉，一见来了一群人，便陪着笑脸迎了上去，让众人到屋里坐。毛泽东一边往屋里走，一边问身边的罗瑞卿：

“我们在这里用餐？”

他又问老汉：

“你这里有啥子吃的？”

“有面，里面坐。不吃也没关系。”

老汉一边高兴地说着，一边直盯着毛泽东看。他看着眼前这位大个子干部，好像是画像上的毛泽东。看着看着，他一下子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

“你……你是毛主席？毛……毛主席你好啊！你坐下，我给你做饭去。”

李银桥、孙勇见这情形，上前拉着老汉说：

“谢谢你老人家，毛主席还有事，改日再来，让他走吧。”

其他领导也都上来了，一边劝老汉，一边劝毛泽东。毛泽东只好对老汉摆摆手，歉意地说：

“那就以后再来吧。”

众人拥着毛泽东离了小饭馆，边走边聊。吴芝圃说：

“主席，柳园口斜对岸往东30里就是陈桥渡口，也就是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地方。”

毛泽东“噢”了一声问：

“那里还有什么遗迹吗？”

“那里还有个庙，有石碑，还有一棵系马槐。”

叶子龙见二人说起陈桥，怕毛泽东再到陈桥去，就给王鹤滨使个眼色，说：

“劝劝主席，不能再安排活动了，太紧张了。”

毛泽东似乎听到了他俩的话，瞟了他们一眼，说：

“时间太紧张了，不能去了。”

叶子龙这才松了一口气，又小声对张玺说：

“问问进不进开封城？”

张玺就问毛泽东：

“主席，到开封市内看看吗？”

毛泽东说：

“回去再说。”

此时已是下午4点30分，毛泽东一行乘车离开柳园口，返回开封车站。在车上，吴芝圃对毛泽东介绍说：

“开封原名叫启封，地址在今开封南20多公里的朱仙镇的古城村，是春秋时郑庄公所筑，是郑国东北边境上的一座驻兵屯粮的重镇。战国时期称大梁，魏惠王迁都大梁，并着意经营，在这里称霸中原。”

毛泽东说：

“开封的地位很重要，它北据赵燕，南临江淮，为中原争雄战略要地。历史上的窃符救赵、楚汉相争、陈桥兵变等著名故事，都发生在这一带。开封在历史上曾是古都，有着光辉的历史，除在战国时当过魏国的国都，五代时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相继建都于此。赵匡胤建立北宋仍建都于开封。北宋时期开封发展最快，也是顶峰时期，开封成为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汽车驶进古城北门，到了铁塔附近，毛泽东示意司机周西林停车。他下得车来，看那城垣已被黄沙吞噬了一半，心情郁郁，一种忧思油然而生。他心情怏怏地来到铁塔前，他仔细审视了一番。

开封铁塔位于市东北隅，那个地方原名叫夷山，北齐天宝十年在此建独居寺；唐开元十七年，玄宗封泰山归来过汴州时，改名为封禅寺；北宋扩建并改名为开宝寺。太平兴国七年，在寺内的福胜院建一木塔，以供奉佛舍利，名福胜塔。宋真宗因听说塔顶放光，改名为灵感塔。1044年，灵感塔被雷击毁，1049年，宋仁宗下令重建，其规制仿木塔八角形13层阁楼式建筑，材料则改为褐色琉璃砖。整个塔通体呈铁色，故称铁塔。

毛泽东在张玺、吴芝圃、陈再道、王化云等人的陪同下，围绕着铁塔仔细察看。吴芝圃再次说起明末水淹开封的惨祸：

“开封城在历史上被黄河淹没过多次，明朝崇祯十五年那次淹的最惨，全城37万人，葬身鱼腹的有34万，仅有3万人幸免。现在打井钻探时已经发现，开封地下有3层房屋建筑。原来铁塔是建在一个土丘之上，现在这个土丘连同铁塔的第一层都被掩埋在地下了。”

毛泽东在铁塔北面指着铁塔近顶部残缺的洞口问：

“那塔上的破洞是怎么回事？”

吴芝圃说：

“那是日本鬼子用迫击炮轰炸的。”

毛泽东说：

“日本鬼子真是作孽，好好的铁塔，又没拿刀枪和他们作战，为什么向铁塔开炮呢？”

他一边嘟囔着，一边用手指点着数铁塔上的洞，一共有六七个。他又问：

“日本人炮击铁塔和战斗有关吗？”

“没关系。据说他们是为了庆祝他们的胜利，故意开的炮。”

毛泽东高傲地说：

“打了这么多炮，也没有把铁塔打倒嘛！”

吴芝圃附和着说：

“铁塔设计精密，结构合理，有抗倾覆、抗震的良好性能。900多年间，经历地震40多次，暴风10多次，水患6次，都没有发生大问题。小日本打几炮怎么能打倒呢！”

毛泽东说：

“**炮弹穿了洞都没有打倒，说明我们的铁塔确实坚固，我们祖先了不起。我们要牢记这笔血债。你们地方要想办法，把日本鬼子打的洞修补一下，保护好祖国文化遗产嘛！”**

吴芝圃赶忙说：

“好，主席，我们一定尽快地抓紧时间把它修好！”

一行人又乘车来到位于开封市西北隅的龙亭。龙亭大门外的马路两侧，有潘、杨二湖。毛泽东在张玺、吴芝圃、陈再道的陪同下，穿过潘、杨两湖之间的通道，进入龙亭大门。这里据说是北宋皇城的遗址，清康熙三十一年在这里修建了万寿亭，每逢皇帝生日，文武官员在此朝拜，后改为龙亭。毛泽东看了孙中山的铜像，问：

“这是谁铸的？”

吴芝圃说：

“是冯玉祥主政河南时铸的。”

毛泽东说：

“冯玉祥是个好人，他在河南做了不少好事。”

他看到孙中山铜像的头部、臂膀和前胸有4个子弹坑，便问：

“这是谁打的？”

“也是日本鬼子打的。”

毛泽东气愤地说：

“噢，又是日本人打的！孙中山是打不倒的。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谁也打不倒！”

在龙亭石门前，他驻足观看横额上镌刻的康有为《登亭有感》一诗，边看边吟诵：

“远观高寒俯汴州，繁台铁塔与云浮。万家无树无宫阙，但见黄河滚滚流。”

吟诵完了，他还让秘书把这首诗抄录下来。踏上数十级石阶，登上高大的龙亭殿堂，他又问：

“这是不是赵匡胤的宫殿？”

吴芝圃回答说：

“赵匡胤的宫殿早已毁掉了，这是明朝周王府的旧址。”

此时天色已晚，可毛泽东游兴正浓，他问张玺、吴芝圃：

“这里还有什么可看的，既然来了就都看完。”

罗瑞卿说：

“主席，太晚了，回去休息吧。”

毛泽东看看天色，无可奈何地说：

“那好吧。”

5点45分，毛泽东一行在陈再道引领下，驱车来到了城南关有“红洋楼”之称的省军区招待所。

10月31日早晨5点多钟，天还没有亮，毛泽东已经坐到了专列的客厅里。他对送行的张玺、吴芝圃、王化云等人说：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张玺等人表示：

“一定遵照主席的指示，治好黄河。”

上午8点，毛泽东的专列停在了郑州附近的邙山脚下。早早在那里等候的郑州市委书记赵武成、市长宋致和等人，上前迎接毛泽东。

罗瑞卿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和下一步视察，乘专列穿过邙山涵洞继续向黄河北站的管理工段驶去。毛泽东则在赵武成、宋致和的引领下登上了邙山。他发现山上有村民，很高兴，便来到了刘宗贤家。刘宗贤30多岁，是邙山黄门村的生产队长。他见毛泽东来了，非常激动，立即用自家的粗瓷碗盛了一碗温开水，恭恭敬敬地捧给毛泽东，说：

“请毛主席喝口水，解解渴吧！”

毛泽东刚要伸手接碗，卫士赵鹤桐马上把自己带来的水杯递过去。这时候因为刚解放不久，卫士们为安全起见，都随身给毛泽东带着水。毛泽东未加思考，把赵鹤桐拨到一边，伸手接过刘宗贤的碗，将那碗白开水一饮而尽，还将碗口朝下向刘宗贤示意都喝光了，又用手抹抹嘴说：

“谢谢你。”

刘宗贤十分激动，马上拉着他的爱人说：

“快来，你看这是谁？”

刘宗贤的爱人叫李万玲，是村妇女主任。她看着毛泽东说：

“我看这位领导像墙上的毛主席。”

刘宗贤说：

“对，这就是毛主席！”

毛泽东一行离开刘宗贤家，沿着弯曲的山路爬上邙山东侧的小顶山，这是一个不高的岗子，有百米上下，但站在上面，可以俯瞰黄河和像带子一样的黄河铁桥。毛泽东环视四周，他用手一指，说：

“这西边是什么地方？”

赵武成介绍说：

“西边就是荥阳。从这里西去十几里路，就是刘邦和项羽当年打仗对峙的地方。”

毛泽东说：

“你们这里历史上称中州、中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春秋时期的郑国，就建在你们这里。战国时期这一带也常打仗。刘邦和项羽争夺天下，在荥阳、成皋一带打了很长时间的拉锯战，以鸿沟为界相持不下。后来，双方同意都撤军，刘邦用张良、陈平之计尾追项羽，把项羽打败。项羽撤退是经过这里吗？”

郊区公安局副局长李国光说：

“是的，鸿沟南北40多里长，邙山那一段称广武山，和这一段一样，北面是黄河，往东只能走上山路。在这小顶山西边有两个山沟，一个叫回头沟，据说项羽在那里回头发现了刘邦违约追击自己。另一个在回头沟东边叫摇头沟，据说项羽这时才意识到已经无力与刘邦争夺天下，承认自己失败了，只好继续向彭城方向撤退。”

毛泽东很有兴趣地微笑着听着。卫士李家骥指着一块平坦的地方说：

“主席休息一下吧。”

“好，好。”

毛泽东嘴里应着，面对黄河，顺势坐在一个像小板凳似的土坎上。赵鹤桐把水杯递过去，毛泽东喝了水，点燃了一支烟，一边慢慢地吸着，一边凝视着那向东流逝的黄河水。此时，正好有一列火车从黄河铁桥上驶过，摄影师侯波抓住了这个瞬间，按下了快门，将毛泽东的形象与奔驰的火车、流动的黄水，固定在同一个画面上。

毛泽东对赵武成、宋致和说：

“黄河是养育我们中华民族的摇篮，现在简直成了一条害河。俗话说：‘黄河九曲十八弯，富了前后套，害了山东和河南’。它一出三门峡，就像一匹收不住缰绳的野马，奔腾不止，不知在哪儿闯乱子，使多少人民生命财产毁于一旦。现在到了我们手里，一定要驯服它。不然，我是睡不着觉的。”

赵武成、宋致和都表示说：

“坚决按毛主席指示办。”

毛泽东又说：

“这里是交通要道，但只有一座铁路桥，还不够。”

此时天刮起了风，吹起了毛泽东的衣服，吹乱了毛泽东的头发，赵武成说：

“主席，风太大，我们下山吧。”

毛泽东说：

“好，我们到前边再看看。”

欲知毛泽东接下来视察黄河的具体情况，请诸君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读者诸君看到此处，可能已经看明白了，毛泽东自离开北京以后一路走来，并非为了游山玩水，而是在“三反”、“五反”结束、“天下大定”之后，工作重心的又一次转移。这次以治理黄河为主线的社会大调查，说明他的中心工作，已经进入策划经济建设和思考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阶段了。又一次未雨绸缪，这就是为人民利益勇于探索的谋略家毛泽东！

**第41章**

**“如果全国2000多个县，每个县都有这样一条渠就好了。能不**

**能在黄河下游各县都搞一个闸？黄河这条难以被前人驯服的蛟**

**龙，现在在你们手里，开始被驯服了，为人民造福了。”**

话说上午10点钟，毛泽东离开小顶山，在滕代远、赵武成、宋致和陪同下，缓缓朝黄河铁桥工段门口走去。工段队长乔廷选一眼认出了毛泽东，他和梁世久急忙上前与毛泽东握手问好。

此时，罗瑞卿乘坐的专列已经从黄河北边返回来了，毛泽东登上专列，向黄河北岸驶去。滕代远把乔廷选和梁世久介绍给毛泽东，他说：

“这两位是黄河铁桥工段的队长，他叫乔廷选，他叫梁世久。”

毛泽东一听就高兴了，说：

**“真巧啊，两个修桥的，一个姓乔，一个姓梁，两个姓合在一起，正好是‘桥梁’，真是太好了。”**

他顺手从桌子上拿起中华牌香烟，对两位队长说：

“请抽烟。”

二人连连摆手说：

“不会，不会，谢谢主席。”

乔廷选取出有关材料，准备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看他们非常严肃，就亲切地说：

“随便谈，随便谈。”

乔廷选就放下材料，汇报了铁桥5次加固的过程。毛泽东说：

“了不起，你们有功劳。”

乔廷选又汇报了安全情况，还说铁桥加固后行车速度每小时提高到30公里。毛泽东问：

“那为什么现在车还这样慢呢？”

滕代远说：

“现在车速慢，是想让主席多看看桥梁。”

“好一个机灵的滕代远，不愧为军事家。”

毛泽东说完哈哈大笑，滕代远与大家也跟着笑起来。专列越过铁路桥，毛泽东下车后，突然转身往回走，说：

“我再看看大桥。”

众人也只好随着他往回走。毛泽东走到河边，弯腰拾起一个小薄石片向河中甩去，小石片在水上跳跃了几下钻入水中，后边有人称赞道：

“主席抛石片的水平很高啊！”

毛泽东笑着说：

“不行了，与年轻时比差多了。”

此时铁路工程师刘鸿钧过来了，毛泽东一听说是工程师，就和他攀谈起来。他听说刘鸿钧是壬辰年生人，说道：

“那你长我2岁。”

毛泽东又问：

“这黄河大桥是何时所修，桥梁多长？”

刘鸿钧说：

“这座桥是光绪二十九年，也就是1903年由比利时贷款建的，1905年建成，1906年4月正式通车。全长3015米，102孔。维修前只能通过轻型机车，每列火车要分两次过，速度还要在每小时5公里以内。经过我们5次加固，有所改善，但还需要对桥墩子进行稳固处理。”

毛泽东问：

“处理后还能使用多少年？”

刘鸿钧说：

“大约6年吧。”

毛泽东对刘鸿钧的汇报很满意，紧紧握着他的手说：

“谢谢，谢谢！”

刘鸿钧激动地说：

“这是毛主席领导的好。”

侯波悄悄地拍摄下了毛泽东和工程师握手的这一瞬间。

上午11点，毛泽东乘专列来到黄河北站。黄河北岸已经是平原省的属地了。平原省委书记潘复生、省长晁哲甫、省军区司令员刘致远，早已从省会新乡市赶来等候。罗瑞卿下了车，对潘复生等人说：

“主席刚登过邙山，身体有些累，请你们上车吧。”

毛泽东在客厅里接见了潘复生等人，因为他不认识晁哲甫，罗瑞卿就介绍说：

“这位是平原省政府晁哲甫主席。”

毛泽东用右手在左手掌上画着说：

“你的姓是上‘曰’下‘兆’，托塔天王‘晁盖’的那个晁字。”

晁哲甫点头称是。毛泽东又说：

“我这次出来是休息，和你们随便聊聊，一不扰民，二不谈工作。”

潘复生马上说：

“我们昨晚商议过，还是请主席到我们省委机关休息，和干部们见见面。”

毛泽东说：

“这样不好，那不就改变初衷了吗？以后还有机会嘛。新乡这个地方，是什么时候有的 ，为什么叫新乡？你们知道吗？”

潘复生3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都摇摇头。毛泽东看他们都说不上来，就说：

“你们新乡可有历史了。周武王灭商后，分封这个地方为邺、庸、卫3国，让他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分别监之，管叔居庸地。汉时为汲县新中乡。隋开皇六年，取‘新中乡’首尾二字，始称新乡县。**这里自古就是军事要地，你们在这里做官，要懂得这里的一些历史啊。”**

潘复生不好意思地说：

“我们一定向主席学习。”

毛泽东说：

“平原省这个地方，情况比较复杂。解放后，公开的敌人消灭了，暗藏的敌人还存在，破坏我们的建设工作。加上这里又是黄泛区，正是为了剿匪、治黄，恢复战前元气，中央决定成立了平原省。你们3位在这里工作了3年，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我在开封听说你们的‘引黄济卫’工程搞得不错，这次想专门看看，听听。”

潘复生说：

“**3年来，我们发动全省干部群众，在1949年冬完成了土改任务后，又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和恢复工农业生产运动。同时，集中力量完成了‘引黄济卫’，也就是人民胜利渠的水利建设工程。”**

毛泽东问：

“为什么叫‘人民胜利渠’呢？”

晁哲甫说：

“因为这个工程，具有双重作用：在上游，能放水灌田；在下游能‘济卫’航运。这标志着党和人民在治黄事业上的胜利，所以我们给它起了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起得好。今天，我们就看看你们的胜利渠。走，我们下车。”

11点30分，毛泽东在潘复生、晁哲甫等人陪同下，在人民胜利渠支线站下了专列，改乘4面有栏杆、专供铁路工人使用的平板车。这种“小火车”，大家是第一次看到，尽管它声音很大，还是觉得很有趣。毛泽东大声问：

“人民胜利渠是什么时候测量的？”

晁哲甫也大声回答道：

“1951年1月，黄河水利委员会做出‘引黄济卫’的决定；实际上，从1949年12月就开始了全面测量工作。”

“测量了多少地方？用了多少时间？”

“测量的地方，西起武陟县，北至汲县城，南起黄河北岸铁桥，东至新乡市卫河以东400余公里的地方，面积1300平方公里。用了5个月时间才完成了全面测量任务，为后来的施工做好了准备工作。”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叫不打无准备之仗。”

12点10分，平板小火车来到了人民胜利渠路口。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赵明甫、引黄济卫工程处主任萧华、人民胜利渠管理段段长乔登云，早已在此等候。他们见毛泽东来了，跑步向前，与毛泽东握手问好。毛泽东和乔登云握手时，听说他姓乔，笑着说：

“噢，**又一个乔，南有乔梁，北有乔，还有没有梁啊！**”

毛泽东登上人民胜利渠的大坝，举目四望，指着总干渠和分出去的支渠问赵明甫：

“这大小渠道有多少？”

赵明甫说：

“总干渠由此向东，到新乡市以东的饮马口入卫河，全长25.7公里；沿渠建有防洪闸1座，跌水3座，桥梁30多座，干渠5条，支渠38条，斗渠351条，农渠2896条，共长1430公里，各类建筑物4597座。”

“用黄河水灌田好不好？”

“好，凡用黄河水灌溉的庄稼，都获得了丰收。”

“哦，都获得了丰收！如果全国2000多个县，每个县都有这样一条渠就好了。能不能在黄河下游各县都搞一个闸？”

“可以研究。”

毛泽东感叹道：

“黄河这条难以被前人驯服的蛟龙，现在在你们手里，开始被驯服了，为人民造福了。”

他又靠近晁哲甫，手指南边问：

“那边是邙山吗？”

晁哲甫说：

“是”

“西边是什么地方？”

“温县、孟县。”

“温县，为什么叫温县，你知道吗？”

“不知道。”

于是，毛泽东就从温县的由来，讲到司马懿，以及司马懿如何与诸葛亮打仗；又说豫北是个出人才的地方。

叶子龙走近潘复生指指表，潘复生会意地点点头，对毛泽东说：

“主席，到渠畔走走吧。”

毛泽东说：

“来了，就是要看的，走，看看去。”

他沿着胜利渠北畔浏览，来到第二个启闸前，问乔登云：

“为什么不开闸？”

乔登云说：

“现在麦子已经种过了，不需要水。”

毛泽东兴奋地登上闸门的水泥坝台上，指着闸门机械说：

“你们让这些机械露着天不好，工人操作修理也不方便。应该盖个小房子，让工人在房子里操作，对保护机器也好啊。”

乔登云说：

“毛主席想得很周到。当时我们只顾赶进度，没有考虑那么多。我们一定照主席说的办。”

毛泽东又问：

“这闸门需要几个人才能启动啊？”

乔登云说：

“一两个人就可以打开闸门。”

“一个人能行吗？”

“也可以摇得动。”

毛泽东顿时来了劲儿，他脱下大衣，将两个袖口向上挽了一下，手扶着螺旋盘扭转提升闸门机械，跃跃欲试。乔登云马上吩咐守闸工人打开了闸门的锁。毛泽东紧握旋盘，用力扭动起来，孙勇，王振海也来帮忙。随着闸门的升高，黄水便冲过闸门涌进了渠道，向北流去。毛泽东试过开闸之后，面部红润，露出了笑容。赵鹤桐赶紧给毛泽东递上一条毛巾，毛泽东边擦脸，边看着潺潺的流水，高兴地说：

“还是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啊！还好！不费力气。”

他指着浑浊的黄河水问乔登云：

“这水中有这么多淤泥，淤了庄稼怎么办？”

“在下游有个清沙池，水到那里经过沉淀，再放入支流灌田，这就解决了不淤庄稼的问题。”

“你们想得很周到嘛。”

此时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潘复生指指太阳对毛泽东说：

“主席，该喂肚子了。”

毛泽东说：

“好，你是东道主，听你的。”

于是，毛泽东一行由原路返回，于下午2点15分，上了专列。罗瑞卿在餐厅忙前忙后，招呼大家入座，吃午饭。毛泽东问赵明甫：

“赵明甫同志，引黄灌溉分几级？”

赵明甫回答说：

“5级，就是总干渠、干渠、支渠、斗渠和农渠。”

“这5级各起什么作用？”

“总干渠供干渠用水，干渠供支渠用水，支渠供斗渠用水，斗渠供农渠用水；只有农渠才直接灌田。”

毛泽东笑着说：

“噢，这也是一级管一级，上级管下级啊！现在你们这里有没有井灌田？”

“有。”

“效果怎么样？”

“与渠灌差不多。”

毛泽东似乎是在做总结，他说：

**“井水灌田是游击战，渠水灌田是阵地战。两种打法都用，这也是两条腿走路嘛。**”

吃过午饭，毛泽东说：

“休息10分钟，再看饮马口。”

下午3点零5分，毛泽东仅仅躺了10分钟，就一骨碌爬起来了，喊道：

“瑞卿啊，备车去看饮马口。”

众人乘车向新乡市驶去。在繁华市区，毛泽东探看市容时被年轻人认出来了，一时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车队也被涌上来的群众围了个水泄不通。省公安厅厅长王路宾和罗瑞卿急忙指挥工作人员疏导群众，好不容易才把车队引领出去。毛泽东却像没事一样，指着一片楼房对潘复生、晁哲甫说：

“天晓得，你们搞了这一大片，可真是不少啊！”

车队出了市区，还需要步行一公里才能到饮马口。走了一会儿，毛泽东指着漂在河水上的一双并连的小舟问道：

“那里漂浮的是什么，干什么用的？”

赵明甫说：

“那是一只打渔人用的捕鱼小舟。”

这只北方的捕鱼小舟与南方的捕鱼船的确不同，它是把两个1尺多宽、5尺长的小船以相距1尺多的空间并排起来，再用两根横杠从两端把两个小船连接起来。毛泽东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问：

“打渔小舟？一只就够了，为什么把两只连在一起？”

赵明甫解释说：

“这样做有好处。一只脚踏在一只上，一是脚下稳当，不易翻船，便于捕鱼；二是便于搬运，用一根扁担就能担着走。”

毛泽东笑着说：

**“这叫脚踏两只船嘛。**”

毛泽东一语双关，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下午3点50分，毛泽东一行终于来到了人民胜利渠渠水注入卫河的汇合处——饮马口。毛泽东问：

“为什么叫饮马口？”

赵明甫说：

“传说这里原来叫赵庄，到明朝末年，有几个大官驻在新乡南街，他们的马倌每天经过这里到卫河饮马，所以这里后来就改叫饮马口了。”

毛泽东看着汇合口，又问潘复生：

“农民对‘引黄济卫’有什么看法？”

潘复生说：

“很受群众的欢迎。这项工程极大地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群众说，蒋介石为了4大家族的利益，扒开花园口，造成了连续多年的黄、蝗、匪患；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人民才翻了身，过上了好日子。”

毛泽东说：

“还是我们的人民好，是你们的‘引黄济卫’好。”

毛泽东大概是真的累了，他在河畔的草地上坐下来，一会儿又头朝北脚朝南躺下，用手支撑着脑袋，后来干脆双手一伸全身着地，自言自语地说：

“啊，到小黄河了。”

罗瑞卿、滕代远、汪东兴见毛泽东躺在地上，只怕他受凉，潘复生、赵明甫等地方领导人见毛泽东如此，更不知如何是好；王鹤滨医生埋怨说，活动安排这么多，主席身体能受得了吗？正在大家悄声议论束手无策之际，毛泽东竟发出了鼾声。摄影师侯波一看可高兴了，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她将照相机对准毛泽东，调好镜头，“咔嚓”一声按下了快门。没想到这微弱的响动，竟然惊醒了毛泽东，他睁开眼，看看大家，才知道自己睡着了，笑笑从草地上站起来。潘复生、赵明甫等人歉意地说：

“主席，太累了吧？”

“不累，我到了小黄河，很高兴。”

毛泽东说着接过卫士递过来的水，喝了几口，又点了一支烟，问赵明甫说：

“引黄济卫有什么收益？”

赵明甫说：

“过去的卫河到枯水季节，就断了航，引黄济卫给卫河增加黄河水，不仅可以承受200吨重的汽轮，到了枯水季节，也能通航。同时还能缓解天津市的供水问题。今后还可以建设发电站。”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是你们黄河委员会和平原省人民，改造驯服黄河的胜利。”

他吸了一口烟，又问：

“水量增加，引起土质碱化怎么办？”

赵明甫回答说：

“现在虽然有些碱化，但不严重。根据苏联的经验，可以采取植树办法解决。”

“这是什么科学道理？”

“一棵树的树根，能吸收很多地下水，树多了，就可以控制地下水，从而解决碱化问题。”

“你们种树了吗？”

“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夸奖说：

“你真是个治黄的行家里手啊！”

太阳快落山了，罗瑞卿提醒毛泽东该返回了。于是，众人乘车返回了新乡市。

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的专列继续北上，进入岳飞的故乡汤阴县，毛泽东突然对罗瑞卿说：

“到了汤阴站，我要下去看岳庙。”

罗瑞卿吃了一惊，便想法竭力劝阻，并说已经给汤阴县负责人打了招呼，要来汇报工作。还不到9点，专列进入了汤阴火车站，徐徐停下来。

汤阴站台的东南方向，有一个歌颂岳飞的碑林，在这片碑林中，有个典雅的小亭子，亭子中央立有一尊1942年汤阴县知事张直主持镌刻的岳庙指路碑，叫《岳忠武王故里》碑。毛泽东不能去岳庙了，就走上小亭，站在《岳忠武王故里》碑的正面，端详着这6个圆润、奔放的大字，微微点头称赞。尔后，他转向碑的左侧，默读《七言律》，又转向碑的右侧，看了“镌刻经过”，最后在碑后停下脚步，仔细观赏《岳忠武王故里》碑，又小声念起了碑文：

“宋岳飞，字鹏举，汤阴人，……少负气节，沉重寡言，家贫力学，好左氏春秋孙武兵法……，力未冠，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靖康初破敌有功……飞绝酒，帝为飞营荑，飞力辞，或问天下何时太平，飞曰：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夜宿，民开门愿纳，无入者，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卒有疾，亲为调药，诸将远戍，遣妻慰其家……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终以不附和议，为桧所害……”

此碑高大且文字较多，毛泽东看起来很是吃力，有时不得不仔细辨认，但他还是耐心地一字一句地读完了碑文。他的眼睛盯着署名处的24个小坑，这显然是用锤子打掉的人名，便摇摇头，遗憾地问当地公安局长：

“这8个立碑的人的名字，为什么都给打掉了？”

公安局长报告说：

“他们都是汉奸，群众恨它们，才给打掉的。”

毛泽东说：

“汉奸想借岳飞给他自己扬名于世么，这是历史，不必打掉，留下来让他们做反面教员，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还是遗臭万年。”

上午9点刚过，汤阴县县长王庭文因上级通知他车站有人召见，便匆忙赶来。毛泽东在询问了汤阴的一般情况后，向王庭文提出了他所关心的问题：

“岳庙都有些啥子建筑？”

王庭文详细地介绍了岳庙的建筑群，又说：

“岳庙的碑碣石刻现在有近百块。”

毛泽东问：

“那里有岳飞的《满江红》吗？”

“有啊，有。”

“你看过吗？”

“看过，看过，我还会背呢！”

“好啊，能让我听听吗？”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眼望，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王庭文操着河北口音，很流畅地背诵了一遍。毛泽东又问：

“诸葛亮的《出师表》，你会背吗？”

“会！”说着，王庭文又背诵起来：“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途崩殂……”

“哈哈，你这个县长的脑子不错嘛，背得很熟的，现在岳庙怎么样？还好吗？”

王庭文报告说：

“战争年代，岳庙也遭到了破坏，解放后，我们拿出1500多公斤小米的费用维修了一下。”

“你们给人民办了一件好事。”毛泽东说：“还应当搞些钱，把坏的地方修一修，保持古庙的静穆才好。”

他又突然问：

“岳家有后代没有？现在表现怎样？”

王庭文说：

“岳家有后代，表现也好。据我们所查，岳家一门忠孝，没有一个当汉奸的。”

“很好，很好！”毛泽东赞扬说：“岳飞是大好人，岳家又没有一个当汉奸的，都保持了岳飞的爱国主义气节，好！”

11月1日上午9点55分，毛泽东的专列到了安阳火车站。先行来到安阳的潘复生、晁哲甫和安阳地委书记曹幼民、安阳行署专员程耀吾、市委书记刘方生等一群干部，早已在车站等候，他们见专列到了，立即一起拥来。毛泽东站在车厢口，问潘复生、晁哲甫：

“怎么，大家都来了？”

潘复生说：

“同志们都想见见主席。”

毛泽东说：

“大家都很忙，我不是说过，一不谈工作，二不扰民吗？”

潘复生顾不得再作说明，依次向毛泽东介绍前来迎接的安阳地区领导人。程耀吾的名字，引起了喜欢拿名字做文章的毛泽东的注意，他“噢”了一声说：

“陈耀吾，好一个名字，是耳东陈吗？”

程耀吾忙说明自己名字3个字的写法，毛泽东开玩笑说：

“**你这个名字不如我的名字好。程耀吾，就是你光耀自己，不耀别人；我的名字叫毛泽东，泽东就是光泽大海，普照东方。你是安阳人民的专员，为什么只照耀自己，不照耀人民啊！”**

程耀吾不好意思地笑笑。他本来可以解释，他原名叫程远增，因为做地下工作而改了名。但在这种场合，哪有时间做解释呢？

毛泽东在省公安厅厅长王路宾护卫下，乘坐市公安局的美式吉普，向殷墟方向开去。车队经南厂街、金钟烟厂道口，向西徐家桥村北驶去。

殷墟中心宫殿区，由小屯、花园庄、小庄和王裕口等5个村的地面组成。毛泽东一行在王裕口村东下车，步行来到花园庄。毛泽东脱下大衣，交给李银桥，在孙勇陪同下，向妇好墓那一带走去。此时，妇好墓尚不为世人所知。如果毛泽东知道在他的脚下，就躺着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女政治家、军事家妇好，不知道又会引出多少话题来。

毛泽东边走边对身边的人说：

“这里是中国最早的古都之一，商代最后一个王叫纣王，这个人很有本事，能文能武。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曾有过贡献。但那时商已衰败，加上纣王滥用职权，为自己享乐，在修建鹿台中不知耗费了多少劳动人民的金钱和血汗；那些酒池肉林，说明他极其放荡、荒淫、独裁和残暴。据说，他与妲己以砍断樵夫的脚胫取乐；比干冒死进谏，却被他在摘心台剖腹挖心；周文王也被他囚在羑里城监狱，一囚就是7年。由于纣王一意孤行，拒绝批评，又非常残暴，所以众叛亲离，终于被周武王在牧野打败。最后，纣王自焚在自己建造的鹿台上，殷商也就灭亡了。这里在3000年前是个很大的国都，后来成了废墟埋在地下，所以，表面上也看不到什么古迹了。”

议论完了，他又问程耀吾：

“殷墟面积有多大？”

程耀吾说：

“大约有20多平方公里。”

“你知道纣王的墓在哪里？”

程耀吾不知道，便应酬说：

“过去盗墓成风，把古墓搞得乱七八糟，现在没搞清纣王墓在哪里？”

毛泽东听了摇摇头，又问：

“你知道盘庚为什么要迁殷吗？”

程耀吾这才看出来，毛泽东是要考考自己了，好在自己是由安阳县长提拔起来的专员，事先也做了一些准备，一般问题还不至于被问住。于是他谨慎地回答说：

“据说，商在奄以前已迁都多次。阳甲死后，其弟盘庚即位。这时的商贵族很奢侈腐化，政治衰乱，兄弟之间争夺王位的斗争很激烈。盘庚为了解决奢侈恶习，借以缓和争夺王位的斗争，便强迫贵族和民众渡河迁殷。”

“还有别的原因吗？”

“其他原因，我就说不清了。”

“这里出土了哪些文物？”

“这里是殷商王朝的宫寝、宗庙、祭祀的地方，古物很多，现在出土的主要是甲片。据《续安阳志》记载，在甲骨未被破译之前，这里地面上就有很多甲片。村民犁地、打井时，时常见到。”

“还有什么？”

“除了甲片，其次是青铜器、骨器、陶器、玉雕等。周围村民解放前靠此发财的很多。还有因此而被绑架的。近年出土的主要是青铜器和玉雕。土改时，在花园庄挖出了三四个青铜器和玉雕，最大的青铜器有1米多高。王裕口村的贫雇农还挖出一块上面刻有马尾草图案的镶嵌玉石‘虎头鱼’，竖着看像虎头，倒着看像鱼尾。翻身农民提高了觉悟，无偿地献给了国家。”

毛泽东听到这里，点点头，表示很满意。他挥着帽子又问程耀吾：

“这西边、北边是什么地方？”

程耀吾说：

“西边是太行山，北边是漳河。”

“漳河就是曹操练水兵的地方。”

“对。”

说起曹操，毛泽东来了精神，他说：

“曹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这里属于古邺。邺北城始建于春秋齐桓公时。战国时这里属魏国，西门豹曾为邺令。西汉时邺城是魏郡治所；东汉末年是冀州牧袁绍驻地。曹操破袁绍后，于204年进邺建都，此后史称邺都为魏都。

东汉建安十八年，曹操被封为魏公，后为魏王，掌握中央一切军政大权。邺都成为朝臣聚集、发布政令的中央政权所在地，直到220年曹丕代汉，虽建都洛阳，但仍称邺都为‘北都’，七庙不废，直至265年司马炎灭魏建晋，故魏前后在邺建都52年。

曹操在邺时，进行大规模的扩建。著名的3台，即金凤台、铜雀台、冰井台，就是那时所建的。晋朝文学家左思曾写过《魏都赋》，对魏都进行了很好的描写。曹操在这一带实行屯田制，使百姓丰衣足食，积蓄力量，逐渐统一了北方，为后来晋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

程耀吾听着毛泽东这一番议论，深深感觉到自己在安阳工作多年，尚不及领袖对安阳及豫北这样的深切了解，不得不为之折服，至此他完全为毛泽东的博学强记所倾倒了。只听毛泽东又问道：

“洹北那两个村庄叫什么名字？”

“西边那个村子叫小司空，东边那个村子叫大司空。”

“你知道司空是什么意思吗？”

程耀吾又被问住了，他只好摇摇头。毛泽东解释说：

“司空，是古代王朝的一个官职名称，小司空的职责和你这个专员所管的事务差不多。”

此时，汪东兴向李银桥使个眼色，让马武义给毛泽东倒水，提醒一下时间。毛泽东喝了水，会意地向小屯西头的打谷场走去，走到从省城调来的小轿车旁，他说：

“走，到安阳市里看看。”

罗瑞卿事先安排，车队到安阳市内后，按程耀吾所说的有古迹布局的路线走慢一点，不要毛泽东下车，好让他走马观花。于是，毛泽东乘坐的车子便走街串巷，使他看到了文峰塔、旧县衙、城隍庙、高阁寺。

原计划是车队在十字大街调头向北去鼓楼、钟楼，再由北大街、北关、安阳桥，最后到袁林。可是，毛泽东一到十字大街这个市中心繁华的商业区，看到有一家新华书店，就对在视察中专为他开汽车的司机周西林说：

“老周停车。”

毛泽东本来是想像普通人一样，进这个书店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书。他待车子一停，推开车门，伸出一条腿，低下头，侧着身子就要下车。这时坐在他前面的罗瑞卿，刚刚反应过来，不禁吃了一惊，迅速起身下车，堵住了车门。毛泽东平静地说：

“我要到书店看看。”

罗瑞卿以不容商量的口气坚决地说：

“不行！”

说着，他用双手托住毛泽东的身子，往车里送，顺势又把车门关上。从停车到罗瑞卿关上车门，虽然只是短短的一个瞬间，可是群众已经把小车给围住了。老百姓很少见到小轿车，况且又是这么一个大车队，他们纷纷说：

“不知道有多么大的人物来了。看，停车了，走，看看是谁！”

罗瑞卿一看这情势，立即命令周西林：

“开车！”

“嘟、嘟、嘟！”周西林连续按喇叭，工作人员也都慌忙下车疏导群众，人们总算闪开了一条夹道，车队慢慢地通过了鼓楼。毛泽东感到很是扫兴，嘴里嘟囔着：

“在汤阴下了车，你们不让我看岳庙。现在又不让我进书店，这是为什么嘛！”

罗瑞卿也不吭声，车内一时沉默。不一会儿，车队就到了袁林。

袁林就是袁世凯的墓地，称为袁公林，简称袁林，位于安阳市北郊2.5公里的太平庄北面，北依韩陵，南临洹水，始建于1916年6月，建成于1918年6月，占地9万多平方米。其建筑设计沿袭民族传统形式，又吸收近代西方建筑特点，形成了一组中西合璧的陵地建筑群。那么袁世凯墓为什么不称“陵”而称“林”呢？原来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最初也是想效仿历代帝王，把他老子的墓地称为“袁陵”。徐世昌却表示反对，他说：“项城生前称帝未成，未曾身居大宝，且已取消洪宪年号，如果采取袁陵之名，实为不妥。林与陵谐音，《说文解字》上所载陵与林二字又可以互相借用，避陵之名，仍陵之实，这多好啊！”于是，袁克定便弃“袁陵”之称而谓之“袁公林”。

毛泽东在潘复生、晁哲甫、曹幼民、程耀吾、刘方生等人陪同下，沿着神道越过牌楼，他指着牌楼院内两侧栩栩如生的石像说：

“这些都是一块石头所雕，你们知道是怎么运来的吗？”

曹幼民回答说：

“据说，是泼水成冰运来的。”

毛泽东感叹道：

“不容易啊，这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应保护好啊！”

来到袁世凯墓碑亭前，毛泽东先绕着青白石赑屃趺碑石雕转了一圈，仔细看看上面镌刻的“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9个大字，然后出碑亭到享堂，穿过后堂门，来到墓台，绕袁世凯墓一周，登上墓顶，朝远处环视。李银桥提醒毛泽东，应该休息一下，吃点东西了。曹幼民也客气地说：

“主席，下去歇歇脚好吗？”

毛泽东说：

“好，你是地委书记，听你的。”

李家骥和李银桥搀扶毛泽东下了袁世凯墓，坐在一块条石上，点上一支烟吸起来。曹幼民指挥工作人员把简单的食品和热水、香蕉、苹果，放在毛泽东面前的石条上。程耀吾打着手势说：

“主席，请用吧。”

“谢谢。”

毛泽东说着，接过马武义递来的茶杯，喝了两口水。他见大家都未动手，便对潘复生说：

“大家都吃嘛，你们只让我一个人吃不好。你是省委书记，你来分，平分土地，每人一份。”

说着，他自己先笑了。一个地方领导递给毛泽东一个苹果，毛泽东摆摆手说：

“我享不了这个福。”

马武义给他剥了一个香蕉，他高兴地接了过去，见大家还是不动手，他又说：

“胜利果实，大家都应享受，每人一份，都吃，都吃。”

说着，他站起身来，把香蕉苹果分给大家，见大家都动手了，才把那个香蕉送到口中，还自言自语地说：

“我只能吃这个。”

他又转向王鹤滨，说：

“你说对不对，王大夫？”

王鹤滨连连点头。王鹤滨和卫士们都知道，毛泽东牙不好，不能吃苹果和桔子一些硬的酸的水果。毛泽东吃着香蕉又给大家讲起了袁世凯，他说：

“袁世凯是你们河南项城人，是一个大官僚地主。他在项城有很多土地，又在安阳搞了这么多土地。袁世凯特别惯于耍两面派手法，他从天津小站练新军起家，混入维新派，骗取了光绪的信任。戊戌变法时，他当面慷慨陈词，要实行兵谏，诛杀荣禄，软禁慈禧，拥戴光绪；但暗中又向荣禄告密，用出卖维新派的代价，换来了直隶总督兼外务部尚书的头衔。宣统初年，清廷已看出袁世凯有野心，要杀他，又怕袁世凯一伙造反，便令其回家养‘足疾’。袁世凯看中了安阳这个地方，来到洹上隐居。名为隐居，其实他一刻也没有闲着，他与自己在各地的势力紧密联系，伺机以动。”

毛泽东换了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又讲了起来：

“武昌起义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力量直接威胁清廷的命运，清廷又想起了袁世凯，让他镇压革命。袁世凯借机要挟民主革命派和清廷，大耍手腕，窃取了大总统的位置，不久又搞复辟。由于他倒行逆施，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只当了83天的皇帝就见上帝去了。可见逆历史潮流而动，肯定是短命的。”

讲到这里，有人说，像袁世凯这样的历史罪人，应当把他的坟平了。毛泽东说：

“不要平嘛，还要保护好，留作反面教材。”

他看看偏西的太阳，对曹幼民、程耀吾说：

“还有什么要看的吗？”

“门外还有两处。”

“那好，既然来了，就看个彻底。”

说完，他起身拉了一下曹幼民，两个人并肩而行，来到了玉带桥。小桥不大，但很精致，下面有流水。距玉带桥200米处，有一座很有气势的照壁。按照迷信的说法，照壁挡视线，“坟山贯气”。毛泽东欣赏着那高超的建筑艺术，又问曹幼民：

“这袁世凯祖上在项城，为什么在这里做茔？”

曹幼民略加思索，说：

“一般地说，皇帝去世，要离开祖坟，另造皇陵。袁世凯虽然是个短命的皇帝，也要遵奉这个习惯。洹上这片土地，西边与殷都遗址相连；西北则与邺城相连；洹北、漳水则是曹操战胜对手的古战场；洹南是大平原；洹上村是块风水宝地。袁世凯生前在这里隐居一段时间，并从这里东山再起。从各方面说，袁世凯都会满意的。”

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曹幼民真能识破袁世凯的良苦用心，不愧安阳人民的领头人。”

其实“袁项城”在弥留之际嘱其儿辈“扶柩回籍，葬吾洹上”，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曹幼民是不可能知道的。这个原因只有袁世凯的后人才知道。他的三女儿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中是这样说的：“我父亲的兄弟姐妹，一共9人。除了我的大伯世敦是嫡出的以外，其余兄弟5人、姐妹3人都是庶出。我父亲的生母是刘氏。……后来，我祖母刘氏死在天津。当时我父亲任直隶总督。他请了假，搬运灵柩回转项城安葬。但是我的大伯世敦，认为刘氏不过是一位庶母，所以不准入祖坟正穴，可是我父亲却和他争执了很多次，由于大伯坚决不答应，最后只得另买了新坟地安葬。从这以后，我父亲和大伯世敦就不再往来。还由于这个原因，以后就定居在彰德的洹上村，不再回项城老家，直到我父亲做了总统，他们老兄弟俩还是不相闻问的。”袁世凯正是因为生母未被尊重而愤然迁籍，从此一去不回原籍了。

再说下午2点钟，毛泽东一行乘车离开袁林，驶向火车站。

毛泽东走近专列，与潘复生、曹幼民一众省市领导人握手告别，他说：

“安阳是个好地方，战略地位很重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你们要好好工作，把安阳建设得更好。”

大家都说：

“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晚上10点钟，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欲知此后毛泽东做出了什么重大决策，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从1952年10月下旬天津之行开始，到11月1日的安阳之行结束，历经天津、济南、徐州、河南、平原3市2省，一路不辞艰辛，不顾鞍马劳顿，一边考察，一边讲学，既有喜悦，又有忧患，更有博论，有褒奖，有童趣。此一段历史，笔者不惜以3章半的篇幅一一道来，意在使读者诸君详细了解一个真实的人民领袖。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怀，平凡而伟大的人格，对部下教育之良苦用心，无不为后世之楷模。

**第42章**

**“组织与领导广大农民的互助合作运动，以便配合国家**

**工业化的发展，逐步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

话说1952年11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

“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但要分步骤，一是要消灭，一是还要扶持一下。”

11月9日，毛宇居第2次来到北京。

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南海家中接待了毛宇居。一番寒暄过后，毛宇居便说明了自己的来意，他说：

“乡政府对教育很重视，委托我来向您汇报工作。”

原来，韶山乡政府决定将韶山乡第三学校改建为韶山小学，特意委托毛宇居来京请毛泽东为新建学校题写校名。毛泽东听了，问道：

“学校建在哪里？”

毛宇居说：

“建在张家山，规模比原来大，新校舍将更加美观大方。”

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点点头说：

“那里很好，学校规模还可以扩大。国家搞建设，需要各方面人才。人才从哪里来？靠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嘛！不过，办好教育，需要人出力，需要一批教育工作者。你是教书出身的，有经验，要多出力，还要教育人家多出力。”

毛宇居见毛泽东兴致很高，当即提出请他为学校题写校名。毛泽东问：

“学校的名字怎么取的？”

毛宇居说：

“乡政府准备叫‘韶山小学’，不过还没有最后定好。”

“那题什么名好呢？”

“就题‘湘潭县韶山小学’吧。”

毛泽东想了想，认真地说：

“不，还是题‘韶山学校’吧。现在办小学，以后学校还要发展，还可以办中学、大学，反正都是学校，这一次不就全写好了吗？”

毛宇居连连说：

“好！好！主席想得真周到。”

于是，毛泽东便起身来到办公桌前，铺开纸，提起笔，认真书写起来，并且一连写了好几幅“韶山学校”，说是供毛宇居选择。毛宇居高兴得合不拢嘴，便将这几幅字小心翼翼地收藏了起来。此后，他被安排在招待所住下了。

11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他的提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农村工作部的决定》，《决定》中说：“**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从此起即要开始**，中央、中央局、分局和省委的领导重心必然要放在城市的工业建设上，为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减弱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中央决定在省委以上的党委领导下，一律建立农村工作部。**”“各级党委的农村工作部是各级党委在领导农村工作方面的助手。其任务是帮助党委掌握农村各项工作的政策方针，而**中心任务是组织与领导广大农民的互助合作运动，以便配合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逐步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

此后，毛泽东指定由邓子恢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由廖鲁言、陈伯达、陈正人、王观澜、刘建勋任副部长；由杜润生任秘书长。

11月13日，毛泽东**关于罗瑞卿传达实现社会主义的时间问题**，在给周恩来、朱德、陈云、薄一波、邓小平、邓子恢、高岗、谭震林、彭德怀、黄克诚、刘澜涛、罗瑞卿、杨尚昆、习仲勋、胡乔木、陈伯达、安子文的信中写道：

各同志：

此事因为我过去说时，没有如同在11月12日的会议上那样，明确说明此种意见的性质（尚不是决议），传达范围和什么人不要传达，故有些同志在相当范围内传达了。此事不应由他们负责，应由我负责。罗瑞卿同志因此事请给处分，应无庸议。

毛泽东 11月13日

11月15日，毛宇居要回湖南了。毛泽东吩咐秘书支取自己的稿费，又给一些生活比较困难的亲友买了一些布匹，请毛宇居把钱和布匹一起带回去分赠给家乡亲友。他怕毛宇居记不住，便在毛宇居的记事本上写了一个便条：

谭熙春200万元，邹普勋100万元，蔚生六婶100万元，毛月秋衣料4丈，邹香庭衣料4丈，张四维衣料4丈，毛笔珠（即毛碧珠——笔者注）衣料4丈。

毛泽东 赠 1952年11月15日

11月15日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决定。毛泽东根据贺龙的请求，任命他兼任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贺龙喜爱体育运动，在各类项目中，尤其擅长打篮球，在红军时期，他就曾亲手组建了“战斗篮球队”。

自此以后，贺龙艰苦创业，培养和造就了一支在国际比赛中为祖国争得荣誉的体育队伍。贺龙曾说：“三大球不翻身，我死不瞑目！”

195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通知》中说，为了充分准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央决定于1953年2月5日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知》在分析了“3年准备”的任务胜利完成、“一五”计划即将开始的国内形势后说，现在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具备，拟于1953年9月间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将制定宪法，批准“五年计划”纲要，修改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机关。

这是经毛泽东审定、由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准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第一个文件。

后来由于“高饶事件”和其它原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虽然没能如期召开，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筹备工作在通知发出后就开始了。

12月2日，毛泽东关于各地应设立捕歼空降特务的武装据点致电罗瑞卿，他写道：

罗瑞卿同志：

文件5份，图一份，请加研究，退回叶子龙。这些材料中，多数你处是有的。

从东北的材料看来，已发现和剿灭的是长白山区的5处（5个县所属）；此外敌尚企图在小兴安岭山区和闾山区空降，目的是**建立游击根据地和派人侵入城市爆炸和暗杀**。另据悉，马良（盘踞在甘肃、青海、四川3省交界的土匪头子——笔者注）在草地已准备机场，美机可能在那里着陆。另据朝鲜所获敌机特务所供，敌机在新疆西部、新蒙边境、甘孜附近、西康西南部都曾着陆接送特务。这件事在各苏新国家（指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笔者注）内都是有的，苏新已唤起注意，捕捉特务。

由此判断，敌在我全国各省的森林、沙漠、草原等无居民区，例如大巴山、大别山、武夷山、罗霄山、五岭、秦岭、绥、蒙、豫西、湘西、云、贵、川、康、甘、青等地，都可用直升机和大运输机在夜间空降或着陆，除已知者外，说不定有许多我们并不知道的。在非山区也可空降特务。据说北京、天津附近即已空降过。

请你考虑由公安司令部对此事专门作一次布置，例如在长白山区，小兴安岭区，闾山区（似即地图上之翳吾闾山），内蒙草地，大巴山区及其他山区设立武装便衣侦察据点许多处，**责成每个大军区和每个省各设若干这样的据点，专为对付敌人空降而设。无事则在山里生产和学习，有事即报信和捕捉特务**。如有必要，应召集各区的一些人来京开一次专门的会议。

**美国制定了所谓“共同安全法”，每年拨款一亿美元专为此类用途，空降特务即系由此而来。**

毛泽东 12月2日

12月2日这一天，美国刚当选的总统艾森豪威尔飞抵朝鲜战场前线视察。

艾森豪威尔不同寻常的举动，以及有关“联合国军”频繁登陆作战和空降作战演习的情报，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反应，他马上又把注意力集中到朝鲜战场上来了。

12月4日，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邓华向毛泽东报送了一份关于朝鲜战争形势与明年作战方针任务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上3个地方分别写出了重要批示：

“应肯定敌以5至7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并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5个军于这一线，其中要有4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不可有误。”

“第二个登陆危险区是通川元山线，第三个危险区是镇南浦汉川线。”

“决不能许敌在西海岸登陆，尤其不能许其在汉川鸭绿江线登陆。”

12月5日，艾森豪威尔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宣称要以行动而不是言语来打破朝鲜战争僵局。消息一传开，朝鲜半岛的局势进一步紧张起来。

12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制订五年建设计划应重视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并中央各部、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党组：

**现在中央正在制订五年建设计划，如何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及其他民族事务列入五年建设计划之内，是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必须注意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央现就几项问题提出若干原则性的意见，望各级党委加以研究后，根据本区少数民族情况作出具体计划，并应指导帮助各民族自治区制订该区自己的建设计划。其中属于地方可以办理者，列入地方计划之内，应请中央考虑列入五年计划之内者，报中央考虑处理。中央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注意将有关民族地区的建设部分列入自己计划之内。在制订计划时，各部门应与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协商进行。

一、**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和民族事务的基本任务是，全力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及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政策，在现有的基础上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逐渐改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大量而普遍地培养和训练少数民族的干部，并进行加强和巩固民族团结，提高爱国主义觉悟的有关工作。**

二、凡未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除有特殊情况者外，争取在1957年底以前，将民族自治区逐步建立起来。其中相当于专区及专区以下的民族自治区一般地应在1955年底以前建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也应在1955年内完成。

三、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应以农业、牧业、贸易、交通为重点，某些民族根据其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发展渔业、打猎、林业、手工业及各种副业为重点。在一切少数民族地区，均应以等价交换甚至在一定期间内实行补贴的办法大力推进贸易工作，并逐渐发展合作社。**除修筑铁道的地区外，应在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建立公路干线，修补重要道路和桥梁，并可有重点地在若干地区逐步建立邮政、电报、电话。除国家选定建设的重要工矿企业外，在少数民族的中心区域某些人口集中地区，应建立某些为人民生活所必需与发展人民生产有密切联系的不同规模的工业。**

四、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应着重在：**逐步建立中心区和人口集中地区的医院、卫生院、医务所和农村草地的医疗队、防疫站、驱梅站及其他卫生医疗工作，各种学校教育，成人补习教育和扫盲工作，电影和幻灯教育，少数民族语文的出版、广播工作，文艺及体育活动。**

五、**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在5年内应着重普通政治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训练，并培养迫切需要的专业和技术干部。应办好民族学院，并继续开办各种干部学校和短期训练班。**

六、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计划在目前情况下，是不易作到完全切合实际的，但应尽可能作到这点，以便能切实地在少数民族地区作几项建设工作。因此，在制订计划时，既要照顾到少数民族的要求与愿望，又必须充分估计各民族当前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各种不同的情况，并根据可能实现的条件，**不要提空洞的难以实现的计划。宁肯超额完成计划，不要把没有把握的事订入计划。**在做计划时还要留出一定的伸缩性，以便在执行过程中修改和增补。

　 　 中央 12月7日

12月7日晚10时，毛泽东单独同从朝鲜战场归国的邓华谈话。

12月8日下午4时，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问题。聂荣臻、邓华列席了会议。

12月9日，毛泽东致信邓华，他写道：

“应估计敌已决策在汉川至清川江线登陆，并在积极准备中，我方必须火急准备对敌，粉碎其登陆计划。”

12月9日下午，聂荣臻召集有关负责人会议，根据毛泽东对朝鲜战局发展的判断和决心，研究防敌于朝鲜我军侧后登陆的各项准备工作。

12月10日晚11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有高岗、聂荣臻、邓华列席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战局。

12月11日，毛泽东审阅批准了聂荣臻关于防敌在志愿军侧后登陆及各项准备工作的报告。

是日晚10时，毛泽东又约聂荣臻谈话（7日以来关于朝鲜战争问题的谈话和会议内容，请参看后边12月17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

12月间，杨步浩到北京参观国营农场，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主席很忙，还是别再安排他跟主席见面了。”

另一位工作人员说：

“忙，毛主席可以不会客，但来自延安的代耕人，咋能不见！”

于是，3天后，毛泽东派人把杨步浩接到中南海丰泽园，两位老朋友一见面，就紧紧握手，久久没有松开。杨步浩说：

“毛主席，我们多么想念你呀！”

毛泽东说：

“我也很想念你们。胡宗南进占延安后破坏的情况，现在恢复得怎样？材料带来没有？”

杨步浩说：

“带来了，是乡长写的。”

因为那位乡长文化低，字写得不整齐，毛泽东看不清，杨步浩就给毛泽东指点着，终于看完了材料。二人正说着，饭菜端上来了，毛泽东举起酒杯说：

“祝你回去顺利完成生产任务，干杯！”

杨步浩也举起酒杯，说：

“祝你老人家身体健康，干杯！”

二人相对一笑，一饮而尽。

吃过饭，毛泽东又详细询问了延安人民的生活、生产情况，要杨步浩回去好好带动乡亲们发展生产，把长年互助组搞成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将来条件成熟了，还可以发展为高级农业合作社。

毛泽东见杨步浩衣服单薄，就让秘书安排，给他做一身衣服。过了两天，毛泽东派人给杨步浩送来一套华达呢棉袄、棉裤、棉鞋、棉帽子，还有几丈花布，几丈花达呢，说叫给孩子们做衣服。

杨步浩要回陕北了，毛泽东临别嘱托他说：

“转告乡亲们，陕北对中国革命贡献太大了，我们绝不会忘记他们的。但要保持艰苦奋斗的延安传统，尽早恢复战争创伤。”

杨步浩从北京回去后，又给毛泽东寄来了延安的小米、瓜子和绿豆。毛泽东收到后，给延安地委写信说：

“杨劳动英雄给我送的礼物都收到了。谢谢六合乡人民，庆祝1953年大丰收。”

不久，毛泽东又指示有关部门向延安派去了慰问团、医疗队，拨去了救济款，慰问陕北革命老区人民。毛泽东还特意差人给杨步浩捎去了白糖、白酒。

后来，杨步浩回忆毛泽东说：“毛主席是个重感情的人，是个七情六欲都不少的普通人。”

12月17日，毛泽东关于朝鲜战争形势等问题致电斯大林，他在电文中写的是：

**由于朝鲜停战谈判的中止以及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损失尚未达到使美国人面对停战的程度，我们认为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比方说一年之内）朝鲜的军事行动要更加频繁。**

目前艾森豪威尔正在准备其上台掌权后将要采取的军事行动。仅仅根据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可以预计**敌人将有可能在我后方西海岸和东海岸一带发动登陆作战，而不大可能对前线的我方阵地前沿和后方较坚固的工事发动进攻**。所有的迹象表明，**敌方当前正加紧训练和加强李承晚的傀儡军队，敌海军部队在北朝鲜水域不停地进行演习，敌方间谍亦积极地在西海岸和东海岸一带搜集情报。**

至于敌方军事力量，总共有19个师、4个旅和7个独立团，这包括美国的7个师，英国、土耳其和其他国家的4个旅，李承晚军队的12个师和7个独立团。目前在战场上作战的有14个师、4个旅和5个独立团。**如果敌方要采取在西海岸和东海岸地区登陆作战，那至少要从南朝鲜后方地区调出4—5个师，还要从日本和美国调出4个美军师，只有这样敌方才能够组织大规模登陆战役。**否则，由于兵力不足只能在靠近我后方地区采取战术性和牵制性的登陆战役。战术性的登陆地点可能在东海岸的通川地区和西海岸的瓮津半岛和梦金浦里半岛。对空降兵登陆具有战略意义的登陆地点可能在东海岸的元山、咸兴、镇南浦地区和西海岸的新南州地区和铁山半岛。**在西海岸地区的战略性登陆对于我们有更大的威肋，因为我们的主要运输线路通过这些地区。**

也许敌方采取的登陆战役会在明年的春季，但也可能更早一些，在明年2月份就开始这些战役。**为了配合登陆战役，敌方也许会对中国大陆采取牵制性军事行动，如轰炸在中国领土安东地区的军用机场；让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军队在中国沿海地区搞军事活动；援助在缅甸领土上的中国李弥匪帮军队以加剧中国边境的军事行动**。然而，朝鲜战争仍然是关键问题所在。**如果我们成功地捍卫住在朝鲜我军后方的东海岸和西海岸，破坏敌方登陆计划和战场上的战术性协同进攻，使敌方有生力量遭到更大损失，那么朝鲜的军事形势将会更加稳定并将朝着更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在回答“如何能完成上述任务”这一问题之前，请允许我报告当前军事形势及其特点。

在粉碎敌人去年秋季攻势之后，朝鲜战场的形势开始相对稳定。我方军队利用这段时间加固了前方和沿海岸地区的防御工事，并且在与敌空军作战取胜的同时，于今年9月份为粉碎敌方当时即将发动的秋季攻势，恢复了铁路交通和公路交通，从而我们保证了对军队的不间断供应。我方军队首先开始了战术性进攻，结果是敌方军队的58个据点被清除。**在9至11月的3个月时间里我们使敌人有生力量遭到的损失死伤达11万多人，其中美国人有4万多。**10月中旬**敌人以两个师以上的兵力开始连续进攻位于金化以北4公里的约占3平方多公里面积的两处据点。这场战役一直持续到11月末，敌人被毙伤达 20000多人，敌人每日消耗炮弹20000多发，有时多达30万发。坦克和飞机每日都参加战斗。然而，最后阵地仍在我方手中，而敌人未能占领一寸土地。**由于进行如此激烈的阵地战，我军和敌军的炮火都十分集中。**为了消灭敌人的一个连，平均要集中30门火炮，发射约10000多发炮弹。在最近3个月时间里，我们消耗了240多万发炮弹（其中有110万发是苏联型号的），其中迫击炮弹占的比重较大。**苏联型号的炮弹（如152毫米榴弹炮弹、122毫米榴弹炮弹、76.2毫米炮弹、85毫米高射炮炮弹、37毫米高射炮弹、“卡秋莎”火箭炮弹以及122毫米、85毫米、762毫米坦克炮弹）起了极大的作用。

我方军队在今年秋季战役中取胜不仅仅是由于战士和指挥员的英勇、加固的工事、正确的作战指挥和不间断的供应，胜利的最重要因素实际上是强有力的炮火和炮兵的准确射击。至于我方炮兵与敌方炮兵的对比，**敌方有14000门各式炮，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部队有13000门各式炮。然而在我方的火炮中轻型迫击炮和火箭炮占多数，几乎超过全部火炮的半数。敌方的榴弹炮和坦克炮则比我方多得多。缺少炮弹，尤其是缺少苏联型号的炮弹，是我方的一大困难。人民志愿军部队只有2000门苏联型号的炮。**虽然在今年我们得到了各式苏联型号炮弹112万发，但在朝鲜前线的消耗巨大，多种苏联型号的炮弹在仓库内早已告罄。不久前，人民志愿军司令部还下令从正面第一线撤下一些由苏式大炮装备的榴弹炮兵师。采取这一决定的前提是：敌方不会组织大规模的冬季攻势。假如一旦敌方获知我方的真实情况并提前开始自己的攻势，就会使我方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所以**请求提供苏联型号炮弹是我这封电报中向您提出的最紧急请求。**

为了击退敌方的登陆战和我们设想的其可能提前开始的攻势，目前我们采取了各种备战措施。

**目前在朝鲜战场有人民志愿军16个军、4个榴弹炮师、4个坦克团、5个“卡秋莎”火箭炮团。在正面第一线有人民志愿军7个军和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人民志愿军的其他几个军在第二线并同朝鲜人民军部队一起担负着朝鲜东海岸和西海岸防御任务。为了加强军事力量我们决定于1953年1月份从中国内地再往朝鲜调4个步兵军、1个榴弹炮团、5个坦克团、2个“卡秋莎”火箭炮团并保持5个军去守卫平壤以北的西海岸地区，此外还决定沿海岸线和铁路线加固并构筑纵深配置的新工事以保证供应中朝部队的运输线在这一狭长地区的安全。与此同时还必须在东海岸和西海岸其他重要据点构筑纵深配置的新工事。

为了使后方沿海岸地区发生的战斗不影响对前线部队的正常供应，我们决定修建新铁路线和改善现有铁路线的状况，并决定修建新公路和加宽现有公路，以便改善对前线食品和弹药的运输与供应，建立起尽可能多的储备。为了给人民志愿军部队补充兵源，我们开始在国内征新兵，并打算在明年给人民志愿军部队送去25万补充人员。

我们认为，明年的军费开支可能要增加，军工生产必须扩大，所以1953年的建设资金将只投给最重要的工程，而某些能够延缓的建设项目将被削减。

鉴于朝鲜同志在这场战争经费上的困难，除修建铁路线、公路和建造工事完全由中国方面负担费用外，我们决定3年内每年向朝鲜无偿地提供价值6000万美元的产品和食品，并接纳大批朝鲜孤儿、难民、工人和职员以减轻朝鲜的重担。

为了认真地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朝鲜成功地进行战斗，**我们准备竭尽全力去打赢这场战争**。然而，取得胜利不是没有困难的。目前最大的困难是1953年我们还不能生产出朝鲜战场急需的所有苏联型号的武器，尤其是不同规格的苏联型号的炮弹。**只有在春季之后，我们才能开始生产供应朝鲜战场的某些苏联型号的武器和弹药，**即使这样数量仍然不足。

由于这一极其紧张的状态，恳切地请求您和苏联政府满足我们1953年朝鲜战场军需品申请单和1953年军工生产材料贸易额申请单。

第一份申请单已于1952年9月6日由周恩来同志交给莫洛托夫同志，第二份申请单已由目前正在莫斯科的外贸部长叶季壮同志提交给苏联外贸部。

随这封电报我们附上最急需的军用品申请单。请您依据所附清单加以审核，对您能向我们提供这些军需品寄予希望。

1、我们请求于1953年第一季度供给不同型号的火炮624门以及这些炮的牵引车和配套零件：……

2、请于1953年1月份提供给我们不同型号的炮弹805000发：……

3、请于1953年2至4月份提供给我们不同型号的炮弹1550000发：……

请把上述炮兵武器列入军事订货账户内。如果您同意按我们的申请单供应，请将上述炮兵武器从1952年9月6日的申请单中扣除。至于20个步兵师的炮兵武器和弹药，以及1953年将向其提供的武器和军事装备，我们请求仍按原先协议的计划供应，不要有任何变化。

4、请于1953年第1季度提供给我们军工生产的6种材料：……

请将上述军工生产材料记入贸易额账户内。如果您同意按我们的申请单供应，请将这些材料从已提交的1953年贸易额申请单中扣除。此外，为了保证在朝鲜前线作战的坦克团有成套的修理材料，请您给苏联外贸部以相应指示：根据1952年9月3日签订的坦克修理材料合同（23109号的80％和23119号的80％）应于1953年1月向我们提供尚短缺的1166种坦克修理用材料和62种供日常维修用的成套紧急材料，特别是自控系统用的修理材料，希望能尽早地提供这些材料以解急需。

请您审核上述一切并希望您先告知自己的意见。

此致敬礼！

毛泽东 1952年12月17日

12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志愿军党委等《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的指示电，他写道：

志愿军党委各同志并告东北局、东北军区，军委各部门首长：

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争取战争更大胜利的指示：

1. **根据种种情况（艾森豪威尔登台，谈判的中断，联合国通过印度提案），判断敌人有从我侧后海岸线特别是西海岸汉川江、清川江、鸭绿江一线以7个师左右兵力举行冒险登陆进攻的充分可能。**

二、**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有坚决粉碎敌人登陆进攻、争取战争更大胜利的任务。**

三、为此目的，我军必须：甲、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去极大的增强海岸及其纵深的坚固防御工事；同时增强三八线正面的纵深防御工事以为配合。乙、在对我侧后威胁最大的海岸线及其纵深部署充分的兵力和火力，保证粉碎敌人从海上的进攻及其大量空降部队的进攻。在其它可能遭受敌人登陆进攻的地区（通川、元山地区，瓮津半岛地区，镇南浦、汉川江地区及咸兴以东地区）则部署可能有的兵力和火力，同样要用其全力争取粉碎敌人的进攻。丙、坚决地迅速地采取加修新铁路线、改善旧铁路线（满浦球场间），加宽许多公路线，加设仓库场站以及预先运储大量粮弹物资等项措施，保证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我正面侧面全军（包括人民军）的运输畅通，供应不缺。丁、**我正面各军过去作战成绩很大，在1953年应争取更大的成绩，消灭更多的敌人**。戊、政治工作保证全军指战员都具有粉碎敌人进攻争取更大胜利的坚强斗志和高昂士气。己、特别注意从目前起到1953年4月这一段时间内的准备工作，这是战胜敌人的关键所在。庚、**以代理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邓华同志兼任西海岸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以梁兴初同志为西海指副司令员，西海指的其他干部应予加强**。

四、两年多以来，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在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军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中，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已经摸清了敌人的底子，克服了很多的困难，积蓄了丰富的经验。美帝国主义采用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到失败。现在剩下从我侧后冒险登陆的一手，它想用这一手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它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中央坚决相信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是能够粉碎敌人的冒险计划的。**希望同志们小心谨慎，坚忍沉着，动员全力，争取时间，完成一切对敌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只要准备好了，胜利就是我们的了。**

中共中央 1952年12月20日

这正是：耳提面命多谨慎，褒奖激励为一搏。备战缘是求和平，不战而胜是上策。

12月22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

**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业已开始。这一建设规模之大，投资之巨，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为了加速国家建设，除应动员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人力和财力以赴外，必须加强国家建设的计划工作，使大规模建设能在正确的计划指导下进行，避免可能发生的盲目性。**为此，中央各经济、文教部门的党组及各中央局、省（市）委以及大行政区行政委员会和各省（市）政府的党组应即根据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所发1953年的控制数字和五年计划轮廓草案，由首长负责，组织足够力量，编制1953年的计划和五年计划纲要。为做好这一工作，特就编制计划中若干应注意的问题作如下指示：

一、**我们国家大规模建设是在抗美援朝环境下进行的，因此必须按照中央的“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来从事国家的建设。**由于美帝国主义统治集团不愿和平，继续采取拖延甚至可能扩大侵朝战争的政策，估计朝鲜战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会停止，这一情况决定了抗美援朝的斗争必须继续进行。因此，我们既要保证国家建设的胜利，又要保证抗美援朝的胜利。抗美援朝和国家建设必须并顾，这是我们制订计划的出发点。必须由此出发来考虑国家工业建设的投资、速度、重点、分布和比例。

二、**工业化的速度首先决定于重工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在“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下，就要求我们集中力量而不是分散力量去进行基本建设，要求我们以有限的资金和建设力量（特别是地质勘察、设计和施工的力量），**首先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特别是确保那些对国家起决定作用的，能迅速增强国家工业基础与国防力量的主要工程的完成。我们必须在5年内基本上完成鞍钢等大工业基地的建设**，并开始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以此来发展我国的五金、燃料、机械、电力工业与国防工业，**使1957年的工业生产比1952年提高一倍到一倍半**。**为此，一切次要的可以推迟的建设必须推迟，一切对国家不起重要作用的工程投资必须削减，盲目铺摊子的现象必须克服，只顾小局，不顾大局的思想必须批判。**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建设符合于国家全体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有些同志光看到局部的需要，企图一下子把“好事”办完，处处搞大规模，样样搞大规模，分散使用国家有限的资金和建设力量，其结果必然使国家的主要工程无法完成，使国家大规模建设化为乌有。**显然这是一种很有害的作法，必须予以制止。

集中力量保证重工业的建设，特别是保证其中主要工程的完成，**决不能理解为取消了国家建设的大规模性质，决不能理解为可以忽视轻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地方工业的发展、贸易合作事业和运输事业的发展及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以至放松对这些事业的领导。**如果那样，显然也是错误的。各部门和各地方在自己的计划中，应根据国家建设方针和统一的计划，充分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加速国家的建设。

三、在编制生产计划时，必须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在力量，反对保守主义。预计1953年至1957年国家全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50%至60%，要依靠工业企业的积累来解决；同时，**除了必要的国内无法制造的机器设备必须靠国外订货解决以外，应依靠现有工业设备的生产来满足**；国家大规模建设的巨大需要，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也要求我们现有的工厂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因此，合理地利用现有工业基础和现有设备，充分发挥企业的潜在力量，就成为制订生产计划时最为重要的问题。为此，必须重新审定各种产品的技术经济定额，并以平均的先进技术经济定额作为制订计划的标准；应充分估计企业中各种有利的因素和**群众的无穷的创造力**，不能只强调困难和不利的因素，只根据薄弱环节来确定企业的生产能力，不仅应在产品数量（包括产品品种）方面有先进的指标，而且在产品的质量、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等方面，也应有具体的先进的指标。有些同志认为“生产到顶”、“潜力挖光”，满足于已得成绩和现有水平，不积极依靠群众，采取有效措施发挥现有设备潜在力量，甚至为了不费气力而完成与超过计划，多得奖金，竟企图压低生产计划的作法，以及某些同志埋怨旧设备破破烂烂，放松甚至放弃对现有企业的领导的作法，都是极其错误的。因此，与保守思想和官僚主义作斗争，是编制正确的生产计划的必要前提。

四、**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从事计划工作，使我们的计划正确地反映客观经济发展的法则。**离开科学的根据和不具体分析实际状况，以及不正确地估计我们主观力量增长的可能性，同样是不能做好计划工作的。因此，具体了解情况，作周密的调查统计，以便熟知国民经济的状况，工业的现有设备，原料的分布及其发展前途，天然资源及其合理利用的可能性，国家建设和人民需要的状况，人力和资金的可能性以及各种经济、各种工业之间正确的发展比例等等，正是我们正确制订计划的基础。目前特别要对1952年生产的实际数字、企业的利润、成本、劳动生产率的实际状况及由此而来的预计数字，进行统计分析，以便从此得出各种恰当的生产技术财务指标，并在这一基础上编制1953年的计划和五年建设计划纲要。

五、**在各部门和各地方订计划时吸收群众特别是各部门中先进人物参加讨论计划的编制，是必须采取的方法。群众是国家计划的直接执行者，经过群众讨论，可以考验计划的正确程度。**增产节约运动的经验证明，计划经过群众讨论后，即可把原计划提到更高水平，并可根据群众的智慧解决许多困难，有力地克服某些企业领导者的保守思想，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各厂矿企业部门在1953年的计划编制之后，应交职工讨论，以便根据职工的意见修正计划，把计划变成广大职工自觉的奋斗目标。**

六、编制1953年计划和五年建设计划纲要，是一件极为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我们不仅缺乏必要的经验，而且由于计划机构的不健全和统计资料的缺乏，以及编制时间的紧迫等等，都使计划工作增加很多困难。为了克服困难，按期完成任务，各经济、文教部门必须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真正掌握国家的建设方针，**依靠群众力量，采取科学的工作态度，克服某些干部的错误思想**。中央各经济、文教部门，各大行政区应争取按原规定于1月10日前首先编制好1953年的计划送达国家计划委员会和中央。

　 　 中央 12月22日

欲知后来如何编制1953年计划和五年建设计划纲要，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1952年12月22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是制订“五年经济计划”的纲领性文件。《指示》中首先强调“**为了加速国家建设，除应动员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人力和财力以赴外，必须加强国家建设的计划工作，使大规模建设能在正确的计划指导下进行，避免可能发生的盲目性”。**接着，毛泽东“就编制计划中若干应注意的问题”作出6点指示：一、考虑国家工业建设的投资、速度、重点、分布和比例；二、**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三、**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在力量，反对保守主义；四、**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从事计划工作，使我们的计划正确地反映客观经济发展的法则；五、吸收群众特别是各部门中先进人物参加讨论计划的编制；六、**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依靠群众力量，采取科学的工作态度，克服某些干部的错误思想**。请认真读一读这些文字吧！如果那些编制《计划》的“专家”们早一点警惕毛泽东告诫的“盲目性”，认认真真地落实“应注意”的6点指示，还会有后来的严重失误吗？

**第43章**

“**‘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

**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

**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话说1952年12月24日，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举行第43次会议。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向会议提议，由全国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议，“于1953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并开始进行起草选举法和宪法草案等准备工作。”

政协会议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议表示完全赞同，一致通过决议说：

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代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应该依据《共同纲领》规定，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

毛泽东的生日快要到了，这天傍晚，叶子龙见毛泽东从办公室出来活动，还没下台阶，就到了他面前，请示道：

“主席，兄弟党和外国首脑为您发来的祝寿电报怎么办？”

说着，他将手中的一沓子文稿，稍微向高处抬了一下，亮在毛泽东的眼皮下。毛泽东果断地说：

“收下来，都不要见报。”

叶子龙转身就要离去，毛泽东补充说：

“如果人家要问，为什么没有在报纸上发表他们的祝寿电文，就说这是我们国家的习惯。”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59岁生日。这天，毛泽东醒来后，吩咐值班卫士叫王鹤滨陪他吃饭。王鹤滨来到毛泽东住所的过厅，这里一直是毛泽东用餐的地方。工作人员已经在餐桌上摆好了与往日一样的腐乳、酱菜、辣椒3碟小菜，这些都是厨师老廖按照湖南的风味制作的；还有一盘酱牛肉片。桌上没有放往常的大米、小米混合做成的“二米饭”，也没有摆炒菜，在一个白色的搪瓷小面盆里却盛着半盆刚刚煮好的汤面条。桌子上还摆着两只高脚中型玻璃酒杯，里面盛着半杯琥珀色的葡萄酒。毛泽东从卧室来到过厅，待王鹤滨坐下，就微笑着举着酒杯说：

“王医生，来，干杯！今天是我的生日。”

王鹤滨急忙站了起来，双手擎着酒杯，与毛泽东伸过来的酒杯碰了一下，激动地说：

“祝主席身体健康长寿！”

说罢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毛泽东也喝了一口酒，高兴地说：

“王医生，咱们不祝寿，但是可以吃汤面的，是吧？”

他说着，伸过手将王鹤滨面前的小瓷碗拿过去，要先给王鹤滨盛汤面，王鹤滨急忙站起来，接过毛泽东手中的碗和勺子，先给毛泽东盛上了面条，然后给自己也盛了一碗。毛泽东夹了一点小菜，伴着面条吃了两口，微笑着说：

“做寿是不会使人长寿的，对吧！人活百岁就很不得了喽。哪里有什么万岁呀！”

王鹤滨说：

“人的正常寿命是应该活到100岁，或者更长一点年龄的。”

“是的。人是不会活到万岁的！”

毛泽东再次肯定了自己的观点。

12月27日，毛泽东吩咐工作人员，将友人蒋泽霖赠送给他的清末钱东壁临写的《兰亭十三跋》，转赠给故宫博物院保存。

据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吕济民回忆：1956年，**大收藏家张伯驹将自己收藏的李白《上阳台帖》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对李白诗词颇为推崇，面对这件可能是惟一的李白传世墨迹，自然是爱不释手。但他仍将《上阳台帖》转赠给故宫博物院收藏。**

12月27日，毛泽东为中央批转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12月16日致“毛主席并中央”的《关于工会基层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他写道：

全总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各大市委并中财委：

全总党组12月16日《关于全国工会基层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悉。中央同意这一报告，认为：1、**有计划地推广一个各方面经验都成熟的典型工厂的经验到全国各厂矿去是可以的。但在推广时，应切实照顾本地本厂矿的具体条件而不要硬套硬搬**。2、五三工厂的3项经验，即：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相结合；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建立一套正常的工作秩序；以及充分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是完全成功的经验，应予推广。3、全总这个会议的方法，只集中力量解决一个问题、只介绍一个成熟的经验，也是成功的。

全总党组所建议的为了推广五三工厂的经验的7项办法，望各级党委帮助督促其实现。

中央12月27日

12月28日，毛泽东将傅秋涛关于检查同苏联顾问的关系问题给聂荣臻的报告，批转给彭德怀。

此前，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人民武装部部长傅秋涛在12月26日关于检查同苏联顾问的关系问题给聂荣臻的报告中说，苏联顾问建议迅速建立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兵役机构，不建立就不能实行兵役法，兵役机构应在兵役法颁布的前一年建立。

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批语中写道：

彭：

请在军委例会上讨论一下此件中所提的建立兵役机构问题，如果后年实行征兵制，则明年应建立兵役机构。

毛泽东 12月28日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给华东局等“福建军区应以现有兵力粉碎敌军对福建沿海地区的可能进攻”的指示电，他写道：

华东局、华东军区，福建省委、福建军区，并告中南军区：

　　一、**为了配合美军在朝鲜的作战，台湾、金门敌人有以一部兵力（据报1个军）攻我福建岛屿并向福建大陆攻占我2、3个县的阴谋冒险计划。**

　　二、**我福建军区有以现有兵力（不要依赖任何外援）粉碎上述敌军进攻的任务。**

　　三、为此必须：甲、迅速地坚决地加强必守岛屿的防御工事，预储充分的粮弹饮水，鼓励守军作长期坚守的准备，**不许再犯南日岛那样的错误，否则须予负责者以应得的处罚**。　乙、预计敌攻岛屿的几种可能，决定明确的增援计划。丙、预计敌在大陆上某些可能登陆的海岸要点，做好若干非永久的战术性的防御工事，例如最近我以1个排坚守海岸工事，赢得时间，以1个连增援，歼灭了登陆敌人百余那样。这种以排以连以营为单位的战术性的若干防御工事，是必须做的，不是要你们做大规模的和永久性的大陆海岸防御工事。而在选定必守的岛屿上则必须是永久性的和十分巩固的工事。

　　四、**张鼎丞同志即回福建担任省委书记和省府主席，叶飞同志专任军事。在张鼎丞同志未到福州前，由他人暂行主持省委省府工作，叶飞同志立即抽出身来全神贯注于对敌作战方面。**从目前起两个月内是最关重要的时机，务必唤起福建全军及沿海要地党政及人民群众充分注意对敌斗争，不得疏忽大意，致遭不应有的损失。

　　你们的部署望即告。

中央 军委 12月28日

电文中所说的“南日岛那样的错误”是发生在1952年10月间，蒋军6000人侵犯南日岛，人民解放军守岛部队英勇抵抗，但寡不敌众，后续部队增援两个营，因指挥不当，遭受严重伤亡，全岛一度被蒋军占据，岛上的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受到严重损失。

12月28日晚，原第2野战军第16军军长尹先炳、政治委员陈云开辖第32师、第46师、第47师，由辽宁安东入朝，隶属第9兵团（后隶属第19兵团）。

在年末的一天上午，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找高智谈话说：

“组织上决定调你给主席当机要秘书。”

高智一听这话既高兴，又紧张。他怕自己说的一口陕北话毛泽东听不清，而毛泽东的那一口湖南腔有些地方自己也听不懂，弄不好会误了大事。可这是组织上的决定，自己也只能服从了，他对叶子龙说：

“我可以试试看。如果不行，就请组织上马上调整。”

第二天上午，高智来到菊香书屋报到，毛泽东因睡得很晚，还没起床，机要秘书罗光禄便找出一些文件，让他看，以便让他及早熟悉情况。罗光禄还告诉他，应如何整理存放文件，又指着办公桌后面一个多斗立柜的倒数第二格，轻声交代说：

“那里面，放的是毛岸英同志抗美援朝时在朝鲜牺牲的材料，以后你在主席身边工作，不要向主席提起它，这件事由周总理处理。”

看看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值班卫士打电话通知罗光禄说：

“主席睡醒了。”

罗光禄放下电话，对高智说：

“走，我带你去见主席。”

高智随着罗光禄来到毛泽东的卧室，见他正背靠着床头，一手拿着一支香烟吸着，一手拿着一张报纸在那里看。罗光禄报告说：

“主席，给您新调来的机要秘书高智同志来了。”

说罢，他将准备给毛泽东看的文件放在床头边的小方桌上。高智也赶忙走到毛泽东跟前，激动地问候道：

“主席，您好！”

“啊，欢迎，欢迎！”毛泽东边说边放下手中的报纸，缓缓起身，与高智握手，又亲切地问：“你是哪里人？”

“陕北佳县人。”

“啊！佳县我去过。你在哪里上过学？”

高智说他完小毕业后又考入绥德师范学习了一年多。毛泽东眉毛一挑，高兴地说：

“绥德师范我是知道的，那是陕北很有名的一座学校嘛。这么说，你还是我身边工作同志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了！你爱人在哪里工作？叫什么名字？”

高智回答说，他爱人在中央机要局工作，名字叫霍碧英。毛泽东没听清楚，说：

“你慢慢讲，是哪几个字？”

高智便一个字一个字地向他解释：

“霍是霍去病的霍。碧是王白石的碧……”

“英——是英雄的英。”毛泽东微笑着拉长声调：“霍——碧——英。”

高智知道毛泽东还没有吃饭，看时间已经不早了，便起身告辞。毛泽东说：

“好吧。欢迎你以后就在我身边工作，帮我做点事，好不好？”

毛泽东特别强调一个“帮”字，要高智“帮”他做点事，这使高智十分感动。高智赶忙说：

“好，好。”

1953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元旦社论中宣布：“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通过国家建设计划”是1953年的3项伟大任务。

1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地委和县委，并告中央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中央收到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1952年11月17日《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的报告》，现转发你们（原文1万8千字，现压缩为6千字）。中央认为山东分局这样集中地暴露党政组织中极端严重地危害人民群众的很多坏人坏事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是很好的，是完全必要的。这件事应当唤起我们各级领导机关的注意。这个问题，不但是山东的，也是全国的。**我党在“三反”中基本上解决了中央、大行政区、省市和专区4级许多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和浪费两个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许多领导者和被领导的机关人员相脱离的这一部分官僚主义的问题，但对于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离开自己工作机关稍为远一点的下情，不了解县区乡3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者虽然对于这些坏人坏事有一些了解，但是熟视无睹，不引起义愤，不感觉问题的严重，因而不采取积极办法去支持好人，惩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这样一方面的官僚主义，则在许多地区，许多方面和许多部门，还是基本上没有解决。**即如处理人民来信一事，据报，山东省政府就积压了7万多件没有处理，省以下各级党政组织积压了多少人民来信，则我们还不知道，可以想象是不少的。这些人民来信大都是有问题要求我们给他们解决的，其中许多是控告干部无法无天的罪行而应当迅速处理的。山东如此，各省市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没有接到像山东分局这样集中反映的报告，但已有不少的材料，可以判断，有很多地方是和山东的情况相似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就我们党政组织的领导任务和领导方法来说，这是交代工作任务与交代政策界限、交代工作作风没有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即没有和工作任务一道，同时将政策界限和工作作风反复地指示给中下级干部的问题。这是对各级干部特别是对县区乡3级干部没有审查，或者审查工作做得不好的问题。这是对县区乡3级尚未开展整党工作，尚未在整党中开展反命令主义和清除违法乱纪分子的斗争的问题。**这是在我们专区以上的高级机关工作人员中至今还存在着不了解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和不关心基层组织情况这样一种官僚主义，尚未向它开展斗争和加以肃清的问题。**如果我们的领导任务有所加强，我们的领导方法有所改进，则危害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就可以逐步减少，就可以使我们的许多党政组织较早地远离国民党作风。而混在我们党政组织中的许多坏人就可以早日清除，目前存在的许多坏事就可以早日消灭。因此请你们仿照山东办法在1953年结合整党建党和其它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山东的文件请你们认真地加以研究，并在党刊上登载。**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此外，山东文件中全部精神贯注在揭发坏人坏事，这样做是必要的，这样才可以唤起全党同志的注意。但**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了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就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我们相信，山东和各地这种典型的好人好事是一定不少的。

　 中共中央 1953年1月5日

1月7日，毛泽东在给总高级步兵学校第一期开学典礼的训词中写道：

总高级步兵学校宋校长（即宋时轮——笔者注）和全体学员、教职员同志们：

你们的学校已经结束预备性的文化教育阶段而正式开学了。我祝贺你们在今后的学习和教学工作中胜利地完成军委给予你们的光荣任务。

**我们的国家正在为着实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而进行大规模的建设**，而我国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则继续占领我国的台湾，并继续侵略朝鲜，威胁我国的安全。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我们必须向苏联的军事科学学习，以便迅速把我军提高到足以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取胜的水平。对于这个目的，你们的学习和教学工作负有伟大的责任，因为你们应当成为全军在步兵方面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模范和领导者。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努力学习和教学。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53年1月7日

1月9日，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指示说：“如果可能的话，拟于今年7月份在全军实行军衔制度与薪金制度。”指示要求各总部于3月份以前完成实施军衔的准备工作，4月份全军动员与评定军衔，“6月底以前完成军衔的审查批准与授予手续”。

1月11日，毛泽东召集有18位党外民主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就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问题，广泛征求意见。

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20次会议，讨论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问题。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说明。他说：

“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已向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提出建议，并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讨论，一致同意。特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通过决议，在1953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制定宪法，批准国家第1个五年建设计划纲要和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

与会者经过讨论，对中共中央的建议和政协的决议表示赞同。

毛泽东在会议讨论结束时作了结论，他说：

“就全国范围来说，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各界人民已经组织起来，因此，**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了**。这是中国人民流血牺牲、为民主奋斗历数十年之久才取得的伟大胜利。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更加发扬人民民主，加强国家建设和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仍将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统一战线的政府，它是对全国人民都有利的。”“我们的重点是照顾多数，同时照顾少数。凡是对人民国家的事业忠诚的、做了工作的、有相当成绩的、对人民态度比较好的各民族各党派各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有份。”

“中国人民从清朝末年起，五六十年来就是争这个民主。从甲午中日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个期间是一个高潮。那个时候是向清朝政府要民主，以后是向北洋军阀政府要民主，再以后就是向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要民主。”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同时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由朱德、宋庆龄、李济深、李维汉等32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

不久，中共中央又决定成立宪法起草小组，由董必武、彭真、李维汉、邓小平、张际春、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8人组成，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开展工作。

与此同时，以政务院内务部为主组成的宪法起草办公室，开始收集有关制定宪法的材料。由董必武、彭真、张际春等人组成研究小组。聘请周鲠生、钱瑞升为法律顾问；聘请叶圣陶、吕叔湘为语文顾问；专门从法律和文字方面进行斟酌推敲。

1月15日，毛泽东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周邓陈薄：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

**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税制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毛泽东 1953年1月15日

原来，**这个所谓的新税制即修正税制，是由财政部提出，由中央财经委员会党组讨论通过，又经政务院12月26日召开的第164次会议批准的**。**并向工商联负责人及工商界人士征求过意见**。**12月30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发表声明说：“热烈欢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公布的税收修正的通告。**”12月3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同时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和《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而且社论中还提出了一个“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1月9日和1月11日，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等3人和北京市委先后写信给中央，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各大区、各省市财委也纷纷写信、打电话给中央财经委员会，反映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毛泽东正是通过报纸报道和向明等的报告，才了解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两个副总理以及财政部、中央财经委员会党组等擅自出台了一个未经中共中央讨论的深受资本家们热烈欢迎的新税制，**这才写了上述那封信。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信，反复看了数遍，感到问题严重，连夜给毛泽东写信，谈了处理方法。他写完信后，把薄一波找了来，说：

“一波，你看，新税制主席批评了。”

他把毛泽东的信交给薄一波看。薄一波接信看罢，脸色骤然变了。据他自己说，“心情半是沉重，半是茫然”，他感到信中“词锋甚严”，这是他没有想到的。沉默了半天，他才说了这么一句：

“看来，问题严重了。”

周恩来接过信，说：

“这事主要怨我，事先考虑不周。”

周恩来作自我批评的原因就是前边所说的，**财政部提出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后，向他做了汇报，他在1952年12月26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164次政务会议，批准了这个方案。接着，他还向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及工商界知名人士征求了意见**。薄一波见周恩来表情很难过，就说：

“不，总理。这事是财政部办的，我这个当部长的，理所当然地应该负主要责任。”

周恩来向薄一波投去感激的目光，摆摆手说：

“先不谈责任了。还是把补救措施和解决办法议一议吧。你看我给主席的信中谈的行不行？问题说清楚了没有？解决的方法得力不得力？”

据薄一波回忆说：后来在“2月10日，财政部吴波、商业部姚依林、粮食部陈希云3同志联名写信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就修正税制的目的、新税制对物价的影响和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等，作了说明。接着，财政部又向毛主席、政治局作了一次汇报，由吴波同志把税制修正了哪些地方，实行中出现了哪些问题，如何解决的，一一作了说明。**毛主席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再说1月17日晚上7时，从武汉到达北京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和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到毛泽东住处报到。毛泽东在和他们谈话中说：

“关于农村工作，中央已经有了一个文件，要求把开展互助合作当作新时期一项历史任务。文件中提出农民的两个积极性，一个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个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你们农村工作部，要发挥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又必须保护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而不要挫伤它。

**我们不是谈过上下两篇文章吗？上篇搞民主革命，下篇就是搞社会主义嘛。**就农村来说，土改已经结束了民主革命，现在是要作第二篇文章了。子恢同志，调你来做农村‘统帅’。**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任务，是在10年至15年或更长些时间内，完成农业社会化，配合国家工业化，实现农业集体化，即把农民组织起来，经过互助合作，过渡到集体农庄。**完成这个任务，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现在就应开始。”

1月22日，原第1野战军第1军军长黄新廷、政治委员梁仁芥辖第1师、第2师、第7师，由吉林辑安入朝参战，隶属第19兵团（后隶属志愿军总部）。

1月30日，毛泽东的卫士李家骥接到父亲病重的来信，请了15天假回山西盂县探亲。李家骥去见毛泽东，毛泽东站起身来，嘱咐他说：

“这次回家探亲，别忘了搞调查研究。”

毛泽东掰着指头，亲自为李家骥拟定了调查提纲，他说：

“**一是了解群众生产生活情况；二是群众拥护什么；三是群众有哪些负担。**另外，回去不要对人家炫耀自己，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不要摆架子，这样就不好办了。回来以后向我汇报。”

1月31日，毛泽东在给后勤学院的训词中写道：

后勤学院李院长（即李聚奎——笔者注）和全体学员、教职员同志们：

我祝贺你们在预科学习和教学上的成绩，并希望你们在今后圆满地完成军委所给予你们的学习和教学的任务。

对于现代的军队，组织良好的后方勤务工作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任何轻视后勤工作、以为后勤工作不是重要的专门的科学、不需要有系统地学习、不需要精通业务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必须学习苏联军队完整的后勤工作建设，研究朝鲜战争中后勤工作的状况和经验，以达到我军后勤工作现代化和正规化的目的。**后勤学院全体教员、职员、学员，应当团结一致，为完成这一光荣任务而奋斗。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53年1月31日

1月31日下午，毛泽东在一个会议上说：

“对资产阶级，有几个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一是税收，二是劳资，三是商业调整，四是资金短绌，这些要解决。”

1953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一个会议上说，**他不同意某一个文件上所写的“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大规模的改组”的提法，**他说：

“现在只是国营工业、运输业、批发商已经改组了，其它并没有改组呀！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工业才刚开始改组，工业还远未完成，国营商业零售面有待逐步扩大。从农业上看，农民从地主方面拿到土地，从封建所有制变为个人所有制是改组，但从个体所有制变成小集体所有制，则正在开始。”

2月2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国情咨文，宣布取消台湾海峡“中立化”，做出放蒋介石出笼以配合美军在朝鲜军事冒险的姿态。

2月2日晚，原第4野战军第54军军长丁盛，政治委员谢明辖第130师、第134师、第135师入朝参战，隶属朝鲜西海岸防御指挥部（后隶属第20兵团）。

2月3日，艾森豪威尔同参加“联合国军”的各国代表会谈，说服他们支持对中国实行封锁的政策。

2月4日，毛泽东在转给聂荣臻和黄克诚的一个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聂黄：

**为了防御台匪空军向上海一带的可能的攻击，上海空军及防空两方面均须提高警惕，加紧整顿，准备随时可以对敌作战，确保上海一带的安全**。为此请与空司、防司筹商应敌计划告我为盼。

毛泽东 2月4日

2月7日，毛泽东在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4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对艾森豪威尔发出了严重警告，他说：

“要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由于美帝国主义坚持扣留中朝战俘，破坏停战谈判，并且妄图扩大侵朝战争，所以，抗美援朝的斗争必须继续加强。**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后来在2月22日，美国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由“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致函朝中方面，提议在停战前先交换伤病战俘，试图借机恢复从1952年10月8日起由“联合国军”单方面中断了近5个月的停战谈判。

2月1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立计划机构的通知》，他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并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党组：

一、**为适应国家有计划地大规模建设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已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央一级各国民经济部门和文教部门，必须迅速加强计划工作，建立起基层企业和基层工作部门的计划机构。**各大区行政委员会和各省、市人民政府的财经委员会应担负计划任务，其有关计划业务，应受国家计划委员会指导。东北各省人民政府的计划委员会应一律改为财经委员会。

二、**各省、市的财经委员会，应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与省、市党委及人民政府指示，综合编制全省、市的地方国营工业、地方公私合营企业、私营企业、农业、林业、水利、手工业以及属于地方经营的其他经济、文化事业的长期和年度计划；并负责编制必要的地区性的物资和劳动平衡计划；经常检查计划执行情况，发现和研究国民经济中的各种问题，总结先进经验，积极推动国营经济与合作经济的发展与壮大，保证各社会经济成份逐步按比例的发展和协调。**

三、在目前各大区的财委仍应负责汇总省、市报送的各种计划，并组织地区的物资和劳动平衡工作。

四、各大区行政委员会、省、市人民政府，应由财委主任或副主任专门负责领导计划工作。大区、省、市按照工作繁简在财委原有编制外，另设包括30人到50人的计划局或处，分设若干计划组进行工作，受同级财委及上级计划机关的双重领导。专署、县的计划机构的编制待5月全国编制会议决定。

五、中央一级各国民经济部门和文教部门在各大行政区、各省、市之国营企业和文教部门所编计划，除直接报送主管上级外，同时应将计划副本抄送大区的，省、市的计划局或处，以便大区、省、市综合编制地区的物资、劳动平衡计划。

六、**为适应计划工作的需要，在建立和健全计划机构的同时，必须建立和健全统计机构，**各级统计机构的编制各级党委应按全国编制委员会的规定，迅速把干部配齐；各大区、省、市的统计部门，应受各该级财委指导；各级统计部门应经常供给各级计划部门统计资料。

中央 2月13日

2月13日是除夕，毛泽东吃过年夜饭，对叶子龙说：

“明天我们出去走走。看过黄河了，这一次再去看长江。你把杨尚昆、罗长子请来，我们商量一下。”

杨尚昆、罗瑞卿从毛泽东办公室出来，连夜召开会议，对毛泽东出行进行部署。

2月14日，卫士李家骥从老家山西盂县探亲回来，向毛泽东报告了他父亲的病情，接着又汇报了他在家乡调查的情况。李家骥原本打算简单说说就行了，谁知毛泽东听得很认真，特别是对农村生产、生活、农民的意见，农村政策落实情况，农民的痛苦，问得很详细，还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下来了。

李家骥说到一个山区的21岁的农民生了病，为了给他治病，老乡3次赶着马车进城请医生都没有请来。毛泽东“噢”了一声，放下笔，沉思起来，停了一会儿，他问道：

“这个青年人叫什么名字？当地干部知不知道？”

毛泽东又自言自语地说：

**“为什么医生都集中到城市呢？”**

他的脸上露出了忧虑的表情。李家骥说：

“这个人因抢救不及时就死了。”

**毛泽东的眼圈立刻红了，他说：**

**“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对不起人民群众啊！”**

毛泽东听完汇报，放下笔，对李家骥说：

“你了解的情况很好，能否写个材料给我看？”

李家骥第二天就开始写材料，写出来的东西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像样子，他掂量了好几天，也不好意思交稿。谁知毛泽东办事从来都是很认真的，他主动问李家骥要了几次，李家骥没办法，只好将材料递了上去。

几天后，毛泽东将李家骥的材料交给了负责卫士组工作的秘书王鹤滨。李家骥一见就要要回来，王鹤滨不给，李家骥想抢也没有抢到手。王鹤滨说：

“这个材料暂时还不能给你，主席有批示，等组织同志们学习完了再给你。”

后来，王鹤滨组织警卫班和卫士组学习的时候，学习了毛泽东对李家骥调查报告的批语，传达了毛泽东要求战士们搞好调查研究的指示。

原来，毛泽东为了了解党在农村政策贯彻落实情况和问题，鼓励在他身边工作的中央警卫团战士回乡搞调查。

这时候，李家骥才见到了毛泽东给他修改过的材料。毛泽东在这个材料上修改了30多处，改了错别字和不通顺的句子，加上了漏掉的标点符号。有些重要的话，他还划了曲线或双曲线。材料上没有标题，毛泽东加上了“山西盂县情况调查”这样的标题。材料后面没有落款，毛泽东又写上“李家骥”3个字。毛泽东在最后一页上写了批语，他写道：

“写得很好，希望全班传阅，但有些错别字。 毛泽东”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组织卫士趁探家之际搞调查研究，请慢慢往后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写于1953年1月15日关于新税制的信以及新税制出现的过程，请认真一读。联系刘少奇1949年天津之行的讲话，再联系反高岗斗争的起因、高岗自杀等过程，以及在五十年代后期出现的“反冒进”、六十年代的“三自一包”等等矛盾和斗争，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思想基础，历来是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的（后面还要讲到这个问题）。这就决定了党内反复出现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方面的斗争，都是不可避免的。一些人罔顾历史事实，把这一切矛盾和斗争，统统归结为毛泽东生性好斗，的确是毫无道理的。

**第44章**

**“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

**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

话说1953年2月15日，正是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准备乘专列南下视察。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他感觉还需要下去作些调查，听听地方和基层干部的意见，也向下面一定范围的干部通通气，做些宣传，这就是他此次南下的目的。

跟随毛泽东南下的领导人有杨尚昆、罗瑞卿和铁道部第一副部长武擎天，还有汪东兴、叶子龙、罗光禄，摄影师侯波，保健医生王鹤滨，两位正副卫士长李银桥、孙勇及几个卫士，一个男护士朱宝贵。

2月15日晚12时，专列从北京站出发，沿着京汉铁路干线向南驰去。专列到了保定车站时，缓慢平稳地停了下来。毛泽东下车后，漫步在站台上，一边察看站台周围的景物，一边向车头方向走去。王鹤滨紧紧跟在后面。

此时，专列的司机也从驾驶室里跳了出来，弯腰、踢腿、抡臂，不停地活动着。正在此时，一阵铃声响过，绿灯亮了，绿色的小旗子正在摆动。

毛泽东一看专列就要开了，返身向后面的车厢走去。司机突然看到毛泽东，一下子惊呆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拉的客人竟然是毛泽东。这一惊非同小可，他拙笨而又缓慢地爬进驾驶室，由于过度的兴奋、激动和紧张，手脚已经不听指挥，竟然不敢开车了。

坐在车厢里的武擎天，用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目光看了一下手表，时间已经过去了3分钟，专列依然是一动不动。他急忙跳下车，小跑着奔向车头，大声叫道：

“为什么还不开车？”

待他看到司机呆呆地坐在那里，就像一个瘫痪的病人一样，也吃了一惊。他问明情况后，马上报告了毛泽东、杨尚昆、罗瑞卿，提出要另找司机。毛泽东叮嘱他说：

“要安慰司机，不要紧张。”

武擎天跑到调度室，找来一位年轻的司机，专列终于开动了。毛泽东听取了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的工作汇报。专列到了石家庄，毛泽东又听取了石家庄市委领导齐一丁、康修民的工作汇报。毛泽东说：

“城市不能发展太大。发展纺织工业一定要注意原料的来源和市场需要。要多生产一些农民需要的农机具。”

他又对马国瑞说：

“听一般的汇报不行，这次下来要做些调查研究，要找基层的同志谈谈。”

马国瑞建议让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上专列汇报工作，毛泽东同意了。

2月16日上午9时，毛泽东的专列到达邢台车站。大约10点钟，他接见了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据张玉美回忆说：

上午9时许，我正在六合居饭庄参加邢台地、市、县联合举行的欢迎赴朝志愿军回国报告团春节招待会，突然接到火车站要我和地委书记李吉平马上去车站的电话通知。李吉平向专员冯世英作了简短交待，便和我乘坐一辆美式吉普急忙赶到车站，车站负责人立刻把我们迎进候车室。省委副书记马国瑞陪同公安部长罗瑞卿下了专列，问李吉平：

“张玉美同志来了没有？”

李吉平指着我说：

“来了，这就是张玉美同志。”

罗瑞卿接着说：

“玉美同志请上车，吉平同志已经完成任务，你可以回去了。”

我走进列车接待室，马国瑞让我坐下，并给我倒了一杯水，然后说：

“毛主席外出视察，想听听基层工作同志的汇报，省委经过研究，决定推荐你来完成这项光荣任务。”

罗瑞卿说：

“主席大年初一夜里从北京出发，沿途要做些调查研究，第一个就由你来向主席汇报。”

听说要见毛主席，还要当面给他老人家作汇报，我顿时心潮澎湃、惊喜万分，可我又担心一点准备也没有，给毛主席汇报不好。罗瑞卿对我说：

“主席问什么，你就讲什么好了。”

我和罗瑞卿、马国瑞一块儿走进南面的车厢会议室，罗瑞卿介绍我与陪同主席视察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见了面，然后对我说：

“主席夜间工作，这时正在休息。你先坐下等候，顺便考虑一下汇报内容。”

我正要思考一下，忽听前面车厢内咳嗽了一声。罗瑞卿轻轻地说：

“主席起来了，咱们准备吧。”

车厢门外传来稳健有力的脚步声，所有的同志立刻站起来。顷刻间，毛主席出现在车厢会议室南边门口。一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我热泪盈眶，快步迎上前去，两手紧紧握住他老人家的手，千言万语竟不知从何说起。罗瑞卿介绍说：

“主席，这是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同志。”

毛主席微笑着向我点了点头，并紧紧握了握我的手。随后拉着我走到会议室桌子东侧，用手指了指身边的沙发椅，示意我扶着他坐在右侧。站在会议室桌子西侧的罗瑞卿、马国瑞和南端的杨尚昆、何载（记录员）也相继落座。我幸福地凝视着毛主席，只见他身材高大、双肩宽阔、天庭饱满、面容慈祥，虽然年近60来岁，看上去不过40岁左右，显得很年轻。主席着一身灰色中山服，穿一双棕色皮鞋，虽然擦得很亮，但鞋帮已磨起皮毛。罗瑞卿见我望着毛主席出神，便说：

“玉美，这就是主席。”

我顺口答道：

“见过。”

毛主席惊奇地问：

“在什么地方见过我呀？”

“见过你的像片。”

一句话把主席和在座的同志全逗乐了。主席见我心情紧张，便与我拉起家常，问我是什么地方人、多大岁数、读过几年书？当主席听说我只上过8个月夜校，认字主要是从工作中学来时，便递给我一支钢笔，说：

“你写几个字让我看看好吗？”

我随手掏出装在兜里的笔记本，在上面写了“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20多个字。毛主席看了之后，又默默地翻了一阵笔记本，笑着鼓励我说：

“字写得不错嘛，相当于中学生了。你这不是‘农大’毕业了嘛，已经够上农民知识化了。”

主席又面向随行人员说：

**“看来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也要劳动化。”**

主席又问我：

“家里几口人？”

我回答说：

“25万！”

主席高兴地点点头，说：

“好，你这个书记心里装着全县人民哩！”

我感到主席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心情随之平静下来。主席问我：

“建国后你们县镇压了多少反革命？这些人服管不服管呀？”

我报告说：

“镇反中全县抓捕了171名反革命分子，枪决了81名。经过镇反，被抓捕的反革命分子多数能够低头认罪，接受政府管制，刑事案件明显减少，社会秩序也很稳定。”

主席又问：

“你们县‘三反’、‘五反’搞得怎样？”

我说：

“县里‘三反’、‘五反’按中央通知进行了部署，去年10月份已经结束。‘三反’中一共查出158名贪污分子；因县里工商业很少，‘五反’没搞出什么问题。经过两个运动，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同志，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到了深刻教育。”

主席用商量的口气说：

“把你们县互助合作的情况给我详细谈谈好吗？”

我说：

“沾。手头没材料恐怕说不好，耽误主席时间。”

毛主席宽慰我说：

“不要紧，你们怎么搞的，就一五一十地讲嘛。”

于是，我便向主席汇报了全县的地理概况和互助合作运动的大致过程。毛主席说：

“**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群众观点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生产运动才能开展起来。你这个地方是个老区，应当总结经验。农民一定要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不走不行。”

主席问我：

“你对情况这么熟悉，都干过什么？”

我告诉主席，我1938年入党后，一直没离开邢台。先在村里当支部书记，后到区里担任区委书记，参加过打日本、反磨擦，搞过减租减息、锄奸反霸、支前参战。领导组织过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和恢复国民经济工作，1952年从区里调到县里。主席听后，拍着我的肩膀连声说：

“好！好！你是本县人，又长期在基层工作，是从基层一步一步上来的。这样好，人熟地熟，情况也熟。”

主席转过身对杨尚昆、何载打了一下手势，说：

“记下来，建国以后，干部应当稳定一段为好。”

主席点燃一支香烟，转过脸对着我说：

“继续谈吧。”

于是，我又向主席汇报了近两年来全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毛主席点点头说：

“是啊，**农民就是经验主义者，办社就是为了多打粮食嘛**。**增产与否应该成为检验农业社成败的主要标准，看来互助合作要比单干好啊。**”

接着，我又汇报了到秋收种麦前，全县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20个，参加农户1270户，占总农户的2.2%。同时，新建社在内容上也有一些新发展，如尹贾乡的尹化成农业社，不仅土地入股，而且牲口也折价入了社。毛主席听后把手一扬，诙谐地说：

“不错呀，人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驴子也组织起来走合作化了。”

在场的同志都跟着笑了。我继续汇报说：

“到目前，全县各区报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200多个，加上原先成立的6400多个互助组，社、组农户占全县总农户的87%。”

毛主席高兴地问：

“互助合作的进度这么快！原因是什么？”

我回答说：

“一是我县互助合作有10多年的历史，组织起来搞生产互助早已深入人心，二是我县试办农业社的实践证明，党中央在《决议》草案中提出的方针、原则及办法顺民心、合民意，广大农民群众打心眼里拥护欢迎。”

接着，我重点汇报了水门、东川口村建社时的情况。毛主席兴奋地说。

“是啊，**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这两个村群众办社的热情很高，思想发动工作搞得也不错。”

主席又问：

“办社当中有什么困难和问题？”

我说：

“主要是好建难管。”

毛主席夸奖说：

“高度概括，接着往下讲。”

我汇报了建社后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劳动管理。水门王俊生社仍实行“死分活评”，现正酝酿“包工包产”，问题不算太大。东川口王志琪社开始干活不评分，后改为“死分死记”，去年又改成“死分活评”，结果群众还是不满意。今年计划推行“按件记工”，情况估计会好些。”毛主席明确地说：

“生产关系调整了，需要摸出一套劳动管理办法来，这个办法要能够反映多劳多得。”

我说：

“通过试办农业社的实践，证明了农业社比互助组有更大的优越性，但也出现一些问题。”

主席关心地问：

“都是什么问题，给我讲具体一些。”

我说：

“开始入社时，多数村没什么阻力，但个别村群众认识不统一，思想斗争挺尖锐。有的富裕户仗着自己土地多、家底厚，老想搞独立，甚至和地主富农拉起手，与贫下中农唱对台戏，企图孤立瓦解贫下中农，阻碍互助合作运动。县委对此态度非常坚决，一方面支持贫下中农组织起来，参加农业社，一方面对思想不通的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对个别挑事或散布不满言论的严厉批评，属于地富分子的坚决打击，表现好的可吸收为候补社员，不好的不准入社。”

主席用指头敲了敲桌子，果断地说：

“这样好！**以前是少数统治多数，现在是多数统治少数。经验来自基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我接着说：

“农业社的另一个问题是分配办法不统一。有的是土地参加分红，有的是土地、牲口、果木树，甚至农具也参加分红。”

主席说：

“牲口、果树、农具入股，股金不能高于土地，不然贫农就要吃亏了。你们是怎样进行分配的？”

我回答说：

“农业社的分配基本上体现了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比例多是地二劳八，也有三七和四六的。”

主席摆了摆手说：

“不要，不要。三七是个界限，三是社会主义，七是按劳分配，这个界限不要突破。破了这个界限，不是伤害劳，就是伤害地。”

我继续向主席汇报说：

“当前农村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有的村出现了两极分化。特别是平原区个别村，有的户劳力少打不了粮食，还有的生活困难卖了孩子。而有的户却富了起来发了家，如前晋祠支书和10多名党员都是常年不下地，干活靠雇工。”

主席问：

“对党员雇工是怎么处理的？”

我说：

“撤了支部书记的职，党员进行批评教育。”

主席摇了摇头，似乎对单纯组织处理不大满意。接着，主席又问：

“还有什么问题？”

我说：

“主要是刚才谈的这些。”

不知不觉已到下午一点。这时，一位工作人员走进车厢门口，罗瑞卿请示说：

“主席，该吃饭了，上午就到这里吧。”

毛主席站起来说：

“不讲了，吃饭去。”

我跟随主席从会议室北门穿过接待室和警卫车厢来到餐厅，只见餐桌上摆着色酒和4个菜，主食是米饭、小饼和包子。主席先敬酒和我碰杯，接着让我吃饭，还不断往我碗里夹菜，让我每样菜都尝尝，使我感到在他老人家身边既亲切又温暖。饭后，我随主席一块儿回到会议室。毛主席问：

“合作化搞起来了，妇女的情况怎样？参加没参加呀？”

我说：

“参加了。不但现在参加了互助合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了。那时，老区的妇女组织起来搞纺织，在太行全区都出名。特别是折户村的郭爱妮，曾两次参加太行区群英会，被评为全区纺织英雄，1950年还出席了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受到您老人家的亲切接见。建国后，妇女由纺织转向田间生产，郭爱妮为使孩子母亲能够腾出手脚参加劳动，带头在全村创办了托儿互助组。随后，县委及时在全县进行了推广。到1952年初全县托儿互助组已发展到458个，入托儿童1229人，解放妇女劳动力1881人。”

毛主席欠了欠身子，提高嗓音强调说：

**“妇女要解放，必须在政治上解放，这是先决条件。但要真正解放，还必须在经济上和男人一样，必须参加生产，这是基础。”**

主席又问：

“《婚姻法》公布后，贯彻得怎么样？妇女地位提高了没有？”

我汇报说：

“《婚姻法》在全县已普遍贯彻。山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开始贯彻边区制定的《婚姻法》，妇女和男人一样参加政治活动，一样参加生产劳动，真正实现了男女平等。县委对妇女工作很重视，从1950年到1952年，3年有3位女劳模进京参加了国庆观礼，并荣幸地见到您老人家，一时在全县全省传为佳话。”

我还列举了郭爱妮、王葆荣、韩秀娥等妇女典型，具体说明了妇女地位的变化。主席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对我说：

“妇女的伟大作用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你们县妇女工作搞得不错，要充分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劳动，在生产中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主席又问：

“县委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是怎样进行领导的？”

我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抓点带面等6个方面向主席做了汇报。主席满意地说：

“你们的作法不错，概括起来就是积极领导、全面规划、典型引路、稳步发展。”

这时，窗外的光线渐渐发暗，工作人员进来请主席吃饭，我便和主席一块儿共进了晚餐。饭后，主席还从餐桌上拿了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送给我。这时，列车将到郑州火车站。回到会议室，毛主席拍着我的肩膀说：

“玉美，今天你谈得很好。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作法。今后有什么新情况、新经验，可写成材料报中央办公厅给我看。”

我说：

“主席累了一天，您该休息了，对县里工作有啥看法，请给予指示。”

主席略微思考了一下，语重心长地说：

“邢台是个老区，合作化可以提前。在合作化问题上，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办。你们县妇女工作也不错，要很好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主席又用商量的口气问我：

“出过门没有？愿不愿跟我们到外地转转？”

我心想，自己连北京都没有去过，要是跟主席到外地转几天，见见世面自然是件美事。

可我又觉着不合适。主席日理万机，连春节都顾不上休息，要到外地视察，自己咋能给他老人家添麻烦呢。于是我告诉主席：

“县里已经安排召开三干会，这次我就不去了。”

毛主席微笑着点点头说：

“也好。”

随后主席送我一盒烟、一筒茶叶和一支钢笔，问我：

“这几件东西怎么样？”

我连声说：

“好！好！”

火车进入郑州站，主席再一次问我：

“你在车上休息，还是下车呢？”

我说：

“我下车吧，明天还要回去呢？”

于是，主席就让罗瑞卿打电话派人接我，临下车时又一次握住我的手说：

“今后有什么事情就找我。”

此时，早已在2月16日早上7点就从开封赶来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黄委会主任王化云来到郑州火车站站台上迎候毛泽东。毛泽东下了专列，一边在站台上散步，一边问王化云：

“邙山水库为什么不修了？”

王化云正要汇报邙山水库不修的想法，毛泽东拉着他，和潘复生一起上了车，列车就启动了。毛泽东和他们在一张长方形办公桌周围坐下，问王化云：

“有图没有？”

王化云说声“有”，随即把邙山水库、三门峡水库、黄河规划设想的图纸展放在方桌上，汇报了邙山水库和三门峡水库的比较方案。他说：

“邙山水库的坝址是沙基，技术条件比有很坚硬的岩石基础的三门峡差。三门峡可以修比较高的混凝土坝，能够综合利用，虽然投资多些，但总的看来，比修邙山水库好处多。”

毛泽东问：

“三门峡修起来，能用多少年？”

王化云作了回答，并向毛泽东报告说，除了修三门峡水库，还要在上中游修干支流水库，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发展黄土高原的农林牧业生产，制止水土流失，延长三门峡水库使用期。毛泽东关心地询问了怎样安置库区人民，然后又指着图问：

“你们计划在干支流修多少水库，都在哪些地方？”

王化云一边汇报，一边把图上拟定的坝库址和名称，一一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打开面前的中国地图册，对干支流的大水库加以对照，找出坝库的所在县、区。他极仔细地一面听，一面看地图，随后问；

“你去过这些地方吗？这些地方现在的情况怎样？”

王化云回答说：

“去过。”

他把了解到的那些地方的现状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又问：

“你们计划修多少中小水库？”

王化云说：

“500座。”

毛泽东看着图说：

“这都是泥库，要做几千座吧！黄土高原有多少沟？”

王化云回答不出来，只知道黄河干流每一公里就有一条大沟。毛泽东说：

“不是几千座，是几万、几十万座吧？化云呀，去年你给我说的从长江上游通天河引水的事怎么样了？”

王化云汇报了从长江上游引水100亿立方的计划，毛泽东高兴地说：

“引一百亿水太少了，能多引一些好。”

两个多小时后，专列到达许昌车站。在站台上等候的许昌地委书记、宣传部长纪登奎被工作人员引上刚刚停稳的专列。3分钟后，专列继续向南驶去。

纪登奎被领进毛泽东的会客室，毛泽东见他有些紧张，微笑着打量了一下，与他握手，还递给他一支香烟，说道：

“像周瑜一样，还是个青年团呢！”

毛泽东拍了拍旁边的沙发，对纪登奎说：

“坐下来，咱们再谈。”

他为了放松纪登奎的紧张心情，随便问道：

“你是哪里人？”

纪登奎回答说：

“山西武乡人。”

“你知道关云长是哪里人？”

“我们山西人。”

毛泽东笑道：

“关云长是河南人，犯了人命案，逃往山西。他也不姓关，路过潼关时，人家盘问他姓什么，他不敢回答真姓。情急之中，一抬头，看见潼关二字，就随口说，我姓关。以后就落户山西，在那里造起反了。他和你恰好相反，他是河南人在山西造反，你是山西人在河南革命。你是怎么到河南来的？”

纪登奎向毛泽东简要地讲了自己的经历，又向毛泽东汇报了许昌的地理概貌、历史沿革、乡土风俗、经济文化、人口物产等情况，并着重汇报了土改、治理淮河、抗美援朝、如何建立党的宣传网。毛泽东最关心的问题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他要纪登奎详细汇报一下许昌的农业互助合作情况。纪登奎报告了全区成立了多少个互助组，多少个合作社，群众如何积极，领导怎样引导。毛泽东问：

“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合作社的情况？”

纪登奎将鲁山县苏殿选合作社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问：

“生产情况怎么样？”

纪登奎说：

“生产增长很快。互助组时，小麦亩产平均158斤，1952年增长到187斤，今年预计可达到300多斤，小麦亩产超过互助组时四五成，超过单干户一倍多。去年该社玉米平均亩产325斤，比1951年增产47%。在副业方面，社里办了磨坊、粉坊、豆腐坊，还搞运输，去年赚红利304万元（旧币）。分配上实行按劳付酬，男女同工同酬。夏季分红按土地六成劳动力四成的比例。秋季为土地劳动力各半。去年该社每个社员平均分玉米1305斤，比全乡收入最多的互助组还多出45%。通过比较，证明合作社比互助组好，互助组又比单干好。”

毛泽东对纪登奎汇报的情况很满意，他问：

“你们遇到过什么困难？合作社存在有什么问题？”

纪登奎说：一是互助政策贯彻得不够好。有的社用牲口入社时作了价，但社里长期不付款，不计息。有的农具采用无代价入社，一部分社员不满，他们认为被共了产。毛泽东说：

“这样共产不好，社员会不高兴的。”

纪登奎接着说：二是社里会计制度不健全，账目杂乱，公共支出过多，影响社员的积极性。毛泽东突然问：

“你们那个文香兰合作社现在怎么样？垮台了没有？”

文香兰是鲁山张良区贺堂乡的女青年团员，1952年春，她组织起了文香兰农业合作社。当时县、区政府要求每个合作社划出3亩地，作为高额丰产田。麦收时，张良区委书记在现场验收。3亩地单割、单打、单收，亩产高达676斤，引起轰动。新华社记者阚枫和《长江日报》记者吕建中赶赴现场采访，产生了怀疑，并报告给鲁山县政府。可1952年10月28日《河南日报》公布的小麦丰产模范受奖名单中又出现了文香兰合作社。阚枫看了十分生气，随即写了《鲁山文香兰农业合作社小麦“高产丰产”的实况调查》，刊登在《河南日报》第一版上，编者按也批评鲁山县、区政府弄虚作假，欺骗党和人民。此事引起轩然大波，文香兰一时成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新闻人物，毛泽东自然是知道的。纪登奎说：

“这个合作社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与压力，但没有垮台。”

纪登奎又说：文香兰从开封回去，大伙要分社散摊子。结果16户退了9户半，文香兰家一半退社一半留社，她的公婆退了社，她和丈夫留了下来。处境艰难，6户半农民兑上鸡蛋卖了，买回一个耙。乡长把3个月的津贴借给他们，又买了一头牛，硬是把合作社办了下去。毛泽东说：

“你们要帮助文香兰解决困难，不能让这个合作社垮了。”

说罢，他又突然问：

“你挨过整吗？”

纪登奎说：

“我挨过两次整。”

毛泽东说：

“我挨3次整，比你还多一次。整你是整对了，还是整错了？”

“整错了。”

纪登奎简略地讲了他在冀鲁豫挨整的情况。毛泽东笑道：

“挨点整也有好处。你整过人么？”

纪登奎回答说：

“整过。”

“整错过么？”

“也整错过。”

毛泽东又问：

“你杀过人吗？”

纪登奎一怔，马上答道：

“杀过。剿匪、反霸，杀了很多人。”

毛泽东追问：

“杀错过么？”

纪登奎如实答道：

“也有杀错的，那是情况紧急时发生的，我工作没做好。”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点了一支烟，吸了几口，转向众人转换了话题，他说：

“1918年我送勤工俭学学生乘火车去北京。路坏了，在许昌候车3天。到了郑州，黄河涨水。那时候，男人还有辫子，女人缠小脚。党成立后，到1949年，经过28年的长期斗争，革命成功了。现在都归我们管了，事情好办了。比如治黄，过去也有王化云，但因不归我们管，治黄的问题不能解决。只有现在才能谈到解决。”

他又启发王化云在制订《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时，要力戒骄傲，不要迷信苏联的经验，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离中国黄土高原和三门峡的地面实际，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他问王化云：

“你读过斯大林讲的那个安泰的故事吗？”

王化云回答说读过。毛泽东要人们从安泰的故事中吸取教训，一定不能骄傲，不能脱离群众。说话间，专列到了驻马店火车站。毛泽东把潘复生、王化云、纪登奎送到车门口，交代罗瑞卿说：

“给他们买车票，让他们回去吧！”

2月16日下午6时左右，专列到达信阳火车站，毛泽东召见信阳地委书记王黎之谈话。他下了专列，握住王黎之的手，笑着说：

“我们一起在车站走走。”

此时天已黄昏，空中飞着雪花，毛泽东边走边问：

“京戏《四进士》那个故事是不是发生在这里？宋士杰是信阳州人吗？”

他还说：

“宋士杰主持正义，打抱不平，一状告倒了3个贪赃枉法的进士，可不简单呀！”

二人回到车厢，专列向武汉驶去。毛泽东取来一张地图摆在办公桌上，问王黎之信阳地委下辖哪些县，有多少人口？他边问边划，并开玩笑地说：

“你管着几个国家啊，古时的上蔡、息县、固始、商城都曾经是个国家。”

王黎之汇报了豫南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群众生产、生活情况。他还谈到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起义前在信阳烧了不少民房，在河南做了一些损害人民利益的事，因此，在各界人民代表会上，信阳的代表对他仍在河南当官反映很强烈。毛泽东说：

“河南群众有意见，那就让他到北京做官好了。你去过北京吗？”

王黎之说：

“1951年去过一次，是参加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那时我当地委组织部长。当地委书记后就没去过了，因没人召集我们开会了。”

毛泽东问王黎之多大了，任地委书记多久了。当他知道王黎之31岁时，便问：

“河南省像你这样年龄的地委书记还有几个？”

王黎之回答说有3个人。毛泽东很高兴地连声说好，又问王黎之是哪里人，什么时候参加革命工作，在哪里念书？王黎之说：

“我是山东人，因抗日战争，书读不成了，1938年参加了革命队伍，文化程度不高。”

毛泽东说：

“那没关系，你还年轻，在革命队伍里是可以学习提高的。你知道谭震林吧？原来也没有文化，他很注意学习，现在很不错嘛。我们共产党队伍里像你这样的人不少，问题是要努力学习。”

谈话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说：

“我们去吃饭吧。”

王黎之随毛泽东到另一节车厢里，面对面坐在一个餐桌旁。服务员端来4个小盘，两荤两素，另加一个汤，两杯葡萄酒。毛泽东怕王黎之拘束，不断地让王黎之吃菜；饭后又在办公车里随便聊天。专列到了湖北广水车站，他问王黎之：

“你去过武汉吗？”

王黎之回答说去过。毛泽东风趣地说：

“那你就回去吧！大概你出来时，家里人还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大年初三风雪之夜王黎之失踪了。那还了得，说不定家里人正到处寻找你呢！”

2月16日晚上11点45分，毛泽东到了阔别了25年之久的汉口大智门车站，早有中南局副书记李先念、李雪峰及武汉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王任重等接着。毛泽东下榻在惠济路16号中南局招待所。

这个大院原来叫杨森花园，是国民党时期大资本家、大军阀杨森的别墅。院内环境幽静，院墙高似城墙。

2月17日凌晨5点，孝感地委书记王良接到通知，乘车赶到了大智门车站。他一下站台，就听到广播喇叭呼叫：

“孝感地委王良同志，请到站口来，这里有人接你。”

王良到了站口，见是省委的一位负责人来接他，便上了车。那位负责人告诉他，毛泽东来到武汉视察，要听他汇报基层情况，并叮嘱他：

“要沉住气，主席喜欢当场出题，随便谈，不喜欢照稿念。你掌握的情况多，只要不紧张，一定会让主席满意的。”

早餐后，毛泽东在招待所一个简朴的会议室接见了王良。他握住王良的双手说：

“你是王良同志吧！”

他又询问了王良的籍贯、年龄及学历等。王良回答他是山东人，毛泽东说：

“啊，还是一位‘山东好汉’。”

坐下后，毛泽东拿出笔记本，要王良谈谈土地改革后翻身农民的生活状况。他问得十分仔细，比如集市的萝卜、白菜几多钱一斤？猪肉几多钱一斤？农民情绪怎样？他们最迫切的要求是什么？王良将孝感地区的农村情况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一边听一边记，不住地点头。他又问：

“农民有了土地，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下一步我们政府应该做些什么事情？能谈点你的个人高见吗？”

王良回答说：

“主席，我认为当前首要任务是引导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毛泽东说：

“对，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生活是我们的头等大事！你们地、县党委的主要任务就是抓农业。”

他谈了在当前总的任务是向社会主义过渡。他说：

“我们正处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

他还扳着指头解释说：

“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10年到15年走完。”

毛泽东让王良把这话传达到县委书记、县长。他还说：

“**我们要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水到渠成，防止急躁情绪。”**

毛泽东问王良对中央、对省委有什么意见，可以当面向他反映。王良将当前地、县机关存在的“五多”现象如实做了汇报，毛泽东追问“五多”的意思是什么？王良扳着指头数着说：

“一是事务多，二是会议多，三是文件、报表多，四是蹲在机关多，五是一般号召多。”

毛泽东说：

“‘两头打着坝，中间淹死人’，你们基层难做人。这种情况要改变，要努力改变。”

他要王良谈谈关于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看法。王良说：

“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主席一贯倡导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必须大力发扬。应该自上而下，然后从下而上。”

毛泽东连连点头，表示赞许。此时，武昌县委书记赵学义也兴致勃勃地赶来了，头上还冒着热气。毛泽东询问了他的身世后，要他谈谈农村的情况。赵学义回答了主席提出的问题。毛泽东听后称赞道：

“你头脑很清晰，是个秀才书记。”

这时候的武昌县隶属于孝感地委，王良作插话说：

“赵学义同志深入群众，肯学习，有政策水平，地委已准备让他挑更重的担子。”

毛泽东夸奖说：

“当领导就是要善于发现人才，你能慧眼识英雄，说明你更明白。”

2月17日下午，毛泽东带着随行人员参观了紧靠长江江岸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故地重游，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20多年过去了，宛如弹指一挥间，他抚今追昔，心潮起伏。站在房子面前，毛泽东指点着每间熟悉的房间，如数家珍似的给身边的人介绍。他还指着一进大门就可以看得见的大教室说：

“就在这所教室里，举行的开学典礼。”

毛泽东还向大家介绍说，他在哪个房间办公，还有哪些房间是教室，哪位教师讲什么课程。

看完了讲习所旧址，毛泽东想去汉阳看看，便召来了中南交通部党组书记兼第一副部长刘惠农，他握着刘惠农的手说：

“刘惠农同志，解放前我到过武昌、汉口，就是没到过汉阳，我想去看一下。”

罗瑞卿事先已给刘惠农打了招呼，为了安全，要设法劝阻毛主席汉阳之行。刘惠农听毛泽东这样说，便支吾道：

“主席最好不要去。”

他摆了3条理由：第一，从汉口到汉阳既没有桥，又没有渡河的轮船，坐小木划子很不安全。第二，即使过了河，汉阳也没有码头，整个汉阳连一条可通汽车的道路都没有。第三，社会秩序还不够稳定。毛泽东笑着问：

“你去过汉阳吗？”

刘惠农回答说：

“去过。”

“你是怎样去的？”

“坐划子。”

“你能坐划子，为什么我不能坐划子？”

毛泽东步步为营，刘惠农一时语塞，只好说：

“那主席，我去准备一下。”

他从长航局调来了一条船，陪着毛泽东上了船，迅即起航。一路上，毛泽东兴致很浓，巡视长江、汉水两岸，边看边问。船到汉阳高公街一个码头靠了岸，毛泽东戴上一个大口罩，步入高公街。这是汉阳的一条老街，街道狭窄，仅能通过一辆三轮车，街面一片萧条。毛泽东问起汉阳兵工厂旧址，刘惠农指着龟山北麓一带说：

“就是这里。抗战时期，国民党将工厂迁到四川，厂房被日寇多次轰炸，破坏相当厉害。1950年下半年，我们在这里建造了一个棉纺织厂。”

毛泽东一行从北侧登上龟山，一直走到龟山东头。从汉阳返回时，他关切地问：

“老百姓过江都是坐划子吗？”

“是的。”刘惠农点点头，继续说：“这里是汉水、长江的汇合口，风大浪急，坐划子很不安全。第1个五年计划已决定在汉水上架设铁路桥和公路桥，将来与长江大桥一起，把武汉3镇连成一片。”

毛泽东高兴地连连点头。

2月17日晚上8点10分，毛泽东请李先念等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的几位领导吃饭，在饭时与饭后，他向王任重了解武汉市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的情况，王任重简要地作了回答。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谈话。据王任重日记记载，此次谈话要点如下：

一、**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张“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要有办法。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国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现在起大约需要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是和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同时进行的。**

二、全国解放后，富农不敢雇工剥削了，即使还没有搞完土地改革的地方，富农实际上也变成富裕中农了。斯大林建议我们在土改中要保留富农，为的是不要影响农业生产。我们发展农业生产并不依靠富农，而是依靠农民的互助合作。

三、我们现在家底子很薄弱，钢很少、汽车不能造，飞机一架也造不出来；面粉、纱布的生产，还是私营为主。

四、要团结民主人士，使他们的生活好一点，争取他们和我们一起搞建设。经济基础不强，政治基础也就不强。

五、私人工商业如何转？资本家转什么？他们如何生活？其中有些人会和我们一起进到社会主义的。只要不当反革命，就要给工作，给饭吃。

欲知毛泽东明日去何处考察，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3年2月17日晚同李先念、王任重等的谈话，值得认真玩味。第一，这个谈话反映了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出现在党内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严重分歧：**有人“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参看刘少奇1951年3月2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有人主张“四大自由”**（参看《邓子恢传》，1950年提出雇工自由和借贷自由，1951年提出贸易自由，1952年提出“土地自由经营，自由处理”）。毛泽东说：“**我看都是不对的。”**他认为：**“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第二，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三大任务。同时，他正在思考“家底子很薄弱”，在三大改造中要“依靠农民的互助合作”、“私人工商业如何转”、“要团结民主人士，使他们的生活好一点”等一系列问题。这说明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他的思路已经逐渐明晰起来了。综上所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之间，是存在着极大的思想差异和严重分歧的，这是在研究党史时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45章**

**“我们共产党领导农民完成土改，是为了满足农民对土地**

**的要求，考虑的是农民的根本利益。”**

话说1953年2月18日，已经连续下了几天大雪的武汉三镇迎来了第一个晴天。这一天是初五，武汉三镇非常热闹，有耍狮子的，有玩龙灯的。

这天早上，毛泽东听了李先念的汇报。李先念谈到黄石市和华中钢铁公司几年来的发展和民主改革的情况。毛泽东对此很有兴趣，表示将要亲自听听黄石市委的汇报。

吃过早饭，毛泽东乘船过江，去东湖和珞珈山游览。他参观了张公祠，到东湖疗养院探视在那里疗养的病人。病员们得知毛泽东到来的讯息，兴奋异常。毛泽东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走过去，与大家一一握手，亲切问候。

“郑位三同志在哪个房间？”

毛泽东走过了一个病区，未见到郑位三，就问疗养院的领导。那位领导人指着另一个病区说：

“郑位三同志在那一个病区。”

毛泽东来到郑位三的单人房间，郑位三急忙从床上下来，说：

“主席身体好！”

“你好，位三同志，好好养病，早日恢复健康。”

“谢谢主席！”

中午，毛泽东来到位于武昌阅马场的湖北省委大院，突然提出要上后面的蛇山看看。

一个时期以来，武汉人民设想修一座长江大桥的报告早已送到了他手里，因为需要勘察设计，方案还没有正式确定下来。这一次到武汉来，他就是想实地考察一下，看看计划中的武汉长江大桥修在黄鹤楼旧址处是否合适。罗瑞卿担心那边人多，不安全。毛泽东说：

“人多怕啥，坏人是极少数，我们要相信群众。再说，为了不惊动群众，我们可以来个出其不意，不就过去了！”

省委马上通知了大桥工程局负责人彭敏，让他赶到大桥桥址，准备汇报。

下午3时许，毛泽东一行人从省委大院后面上山，由东向西走，没费力气就登上了不太高的蛇山山顶。

毛泽东来到蛇山黄鹤楼旧址西侧数十米处，随行人员散立在他的左右，他面对着浩瀚的大江，精神振奋，举目西望。

早在1927年，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毛泽东曾经在蛇山吟出了“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这一忧国忧民的著名诗篇。而今旧地重游，他已经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了。

这一天，游山踏青的人不多。毛泽东在蛇山上从东头走到西头。此时，山上没有多少人，偶尔有一两个小学生。毛泽东穿着灰色大衣，保卫人员劝他戴上口罩。不一会儿，来到山上的学生越来越多了，有几个小朋友兴高采烈地跟着毛泽东走，工作人员动员他们回家，他们不肯。毛泽东微笑地看着小朋友，小朋友越是一步不离地跟着。毛泽东看见路旁有位卖油炸豆腐的老汉，就上前搭话，他弯着腰，用手指着油炸豆腐问道：

“老乡，你这是做的什么买卖？”

老汉说：

“我是炸豆腐的。”

毛泽东说：

“这个生意还好吗，能挣多少钱？”

老汉说：

“好，好，有的时候多些，有的时候少些。”

说完，他又礼节性地问了一句：

“游山来啦？”

“对，山上走一走。”

毛泽东身边的人，见他聊了几句，就请他继续往前走。走在后面的罗光禄问那位老汉：

“你知道刚才和你说话的是谁吗？”

老汉摇摇头说：

“不知道是谁，不过肯定是个大官！”

老汉的话，把周围的人都说笑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今生今日竟然能有机会和毛泽东面对面说话。毛泽东是一位不受拘束的人，他戴着口罩觉得很难受，走了一会儿便把口罩取下来了。一个刚吃了油炸豆腐的小姑娘，望着毛泽东，用手扯了一下她的小伙伴，带着惊喜、疑惑地口吻说：

“毛主席？！”

那个小姑娘也看出来了，惊喜地叫道：

“毛主席！”

毛泽东听到两位小姑娘的呼唤声，面带笑容，慈祥和蔼地看着她俩。两位小姑娘惊喜若狂了，激动得欢呼起来：

“毛主席！毛主席！”

毛泽东微笑着，弯着腰，伸出双手，抚着她们的肩膀。两位小姑娘各拉着毛泽东的一只大手，依偎在毛泽东的一左一右。这个情景被随行记者吕厚民摄入了镜头。

小姑娘的惊呼声，早已惊动了游山踏青的群众，他们一看，果然是毛泽东来了，都高兴得喊了起来：

“啊！毛主席来啦！”

这一下，众多的游人闻声赶来，离得最近的几个青年飞奔而至，紧紧地拉着毛泽东的手。赶来的游人都想往前挤，毛泽东微笑着向大家招手致意。他越往前走，人越多，群众将他团团围住。毛泽东热情地同群众们握手，同他们交谈。他的手再也收不回来了，人越来越多，伸出的手也越来越多，以至于把毛泽东都拉得摇摇晃晃了。挤不到毛泽东身边的人激动得连连高呼：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身边的卫士们一看这情形，顿时急了，他们前后左右拼命地把毛泽东保护了起来。此时，已经是人潮涌动，欢声四起，此起彼伏：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罗瑞卿一看群众越来越多，似潮水般涌来，急忙挤到毛泽东身边说：

“主席，到黄鹤楼旧址去休息一下吧，等等再走。”

毛泽东抽出被卫士扶持着的手，在胸前倾斜着摆动了一下，带着微笑，继续向前走去。大家都劝毛泽东不要往前走了。罗瑞卿说：

“这样的环境，这么多人混杂在一起，万一有坏人怎么办？”

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说：

“没啥子关系，我们是有准备的，敌人是没有准备的，怕什么呢？”

他一边说一边往前走。此时下山，谈何容易。毛泽东刚迈出一两步，就动不了啦，前面的群众像一堵墙一样堵住了去路，而且被冲击得不停地倒退着。身高1米8以上的罗瑞卿，拉着比他还要高几厘米的武擎天，迅速插到毛泽东的两侧，一左一右，搀扶着毛泽东，杨尚昆、李先念紧贴在毛泽东身后，其他的随从人员组成了一个不大的半圆形人墙，众人宛如一叶小舟，在人流中向山坡下缓慢地移动。

罗瑞卿的衣扣解开了，敞着衣服，满头大汗，焦虑得紧皱着眉头。大块头的武擎天也敞开了衣服，一边开路一边呼喊着：

“同志们热爱毛主席，请不要挤！”

罗瑞卿也呼喊着：

“请让开一条路，让毛主席走过去！”

毛泽东的随行人员们也都用同样的话语呼喊着，但是，无济于事。在毛泽东右侧的王鹤滨，因为右手还提着一个应急药箱，别说保护毛泽东了，就连他自己也保护不了，两次被踩掉了鞋子，挤来挤去，终于被挤出了人群。

罗瑞卿等人护卫着毛泽东，终于到了黄鹤楼旧址，终于进入轮船码头，终于登上了摆渡船。罗瑞卿也终于松了一口气，不断地擦着头上的汗，他说：

“好险啊！万一毛主席出点什么差错，我这个公安部长怎么向党、向国家、向人民交代啊！”

此时游山的群众顺着山势从山脚到山顶，布满了整个山坡，重重叠叠形成了一座人山，千万双手臂挥动了起来，他们热烈欢呼着：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面带笑容，抬起了右臂，不住地挥动着，与山上、岸上的群众告别。

一回到住地，杨尚昆、罗瑞卿等人就向毛泽东作检讨，请求严厉处分。毛泽东把右手一扬，说：

“什么严厉处分？我还要表扬你们，这次是我最实际的实地考察。你们是虚惊一场，在人民群众中是最安全的啰！”

吃晚饭时，毛泽东对在座的李先念、王任重等人说：

“群众很好嘛，秩序也很好嘛！老百姓是支持我们、拥护我们的，我们决不能让他们失望！”

晚饭后，毛泽东让武汉市管工业的负责人和武昌区委书记汇报手工业问题，询问了码头工人的情况。他还说：

“大革命的时候，有一次我路过武汉，乘船到上海去，被搬运工敲了竹杠。”

王任重说：

“我们准备在今年秋季对码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取消把头，成立统一的搬运公司，现在正在做调查研究，制定方案等准备工作。那些欺压工人作恶多端的封建把头，已经在民主改革和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打倒了。”

毛泽东对刘惠农说：

“这两天主要是看，没和你多谈，如果你不忙的话，和我一起到南京，我们在路上谈谈。”

2月19日早晨8点，毛泽东要身边工作人员通知王任重，请他找一位街长去谈谈街道工作。王任重立即找到汉口交易街（后并入大智街）街长陈光中，带他去见毛泽东。

陈光中被引进毛泽东的房间，毛泽东站起身，握着街长的手，微笑着问：

“你是哪条街的呀？”

“主席，我是交易街的。”陈光中挺了挺胸，立正身体，恭恭敬敬地回答。毛泽东风趣地说：

“啊！买卖街。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陈光中。”

“耳东陈，光明的光，中国的中，是不是？这个名字不错呀！”毛泽东高兴地说：“坐下来，今天我找你谈谈街道工作情况。”

陈光中见毛泽东平易近人，说话随和，刚才那种紧张而又激动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开始汇报街里如何反霸，如何进行民主改革。说得很快，满口武汉腔，毛泽东笑道：

“你这个湖北佬讲慢点嘛。”

陈光中笑了起来，于是慢慢地一层一层往下说，街政府如何发动群众开展禁烟禁毒运动；如何教育群众，提高群众觉悟，培养骨干分子；如何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和建立街政府委员会；如何开展群众扫盲工作。毛泽东认真地听着他的汇报，不时地向他点头，脸上露出微笑。当陈光中谈到街政府的机构设置，调解、治安、优抚、卫生、妇女等各个委员会的任务和分工时，毛泽东问：

“你为群众办了哪些公共利益的事情？”

陈光中回答说，修了马路，安装了水管、路灯，建了公共厕所，办了夜校，解决了部分人员就业。毛泽东听了很高兴，笑着点头称赞，又问：

“群众拥护你吗？”

陈光中如实地回答说：

“我在市、区委的领导下，为广大群众服务，群众拥护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信任共产党的干部。”

毛泽东问：

“你那个街有多大？”

陈光中答：

“全街3042户，11121人。”

他还把交易街的地域范围作了介绍。毛泽东笑着说：

“啊！这就是你的小天下。你有没有官僚主义？干部中有没有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现象？”

陈光中回答说：

“我们都是‘三反’、‘五反’运动以后到街道工作的，随时都在注意检查自己，防止发生官僚主义，到目前为止，在我们街道干部中还未发现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现象。”

毛泽东满意地笑了，又问：

“你谈了这么多，到底街道工作任务是什么呀？”

陈光中想了想，回答道：

“从我们全部工作来看，就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

毛泽东说：

“对！你很明确。你看街道应当设什么样的机构好？”

陈光中见毛泽东如此认真地听取和征询他的意见，便毫无保留地说：

“街政府既不出布告，不颁发命令，又不是一级政府机构，主要是宣传市、区政策和规定，落实上级布置的工作，起上传下达的作用，是区里的派出机关，只能是办事处的形式。”

毛泽东赞成地点点头。又问：

“你是哪个党派的？”

陈光中回答：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

毛泽东高兴地说：

“啊！是我们党的积极分子。**我非常羡慕你的工作，每天和群众打交道，最有意思。你是基层领导，应经常检查自己的官僚主义，防止干部贪污腐化、违法乱纪。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掌好政权，巩固政权。不要脱离群众，遇事多同群众商量，多关心群众生活。**好吧，你的工作情况，我已了解了，就谈到这里。今天我请你吃饭。”

他招呼陈光中坐在自己身边，服务员端上来四菜一汤，每人一小杯葡萄酒，共饮之后就吃饭。毛泽东喜欢吃辣椒，问陈光中爱吃不爱吃？陈光中点点头说，可以。毛泽东就给了他一些，其实陈光中并不能吃辣椒，毛泽东发现他辣得脸发红，汗直淌，就叫旁边的服务人员拿毛巾给街长擦汗，陈光中辣得张着嘴，自己也觉得好笑，毛泽东也笑了。

饭后，毛泽东叫陈光中坐在他身边的沙发上，又谈开了。一会儿谈到百货公司的袜子不大众化，一会儿说到某某学校的房子中不中，西不西，穿西装戴瓜皮帽式的。当谈到民间风俗时，毛泽东问陈光中：

“武汉市是土葬还是火葬？”

陈光中回答说：

“现在大部分是火葬，也有少数土葬的。”

毛泽东说：

“火葬好，移风易俗。”

针对街长提出的一些问题，他问王任重：为什么有些手工业要停工？王任重说要停工的主要是织毛巾、袜子的工厂，这是失业工人组织起来的合作工厂，他们技术不高，产品质量比较低，商业部门怕积压，既不加工订货，也不收购。毛泽东说：

“**让这些失业工人没饭吃是不行的。实际上到秋季是商业旺季，运到农村去是会有销路的。要把经济核算的原则与政治任务结合起来**。**国营商业不能单纯追求利润，要关心工人就业问题，**在不赔钱的原则下，应当加工订货、收购。”

谈话结束了，毛泽东满面笑容，再次和陈光中握手，并对工作人员说：

“街长要回去了，用汽车送街长回去。”

上午10点，毛泽东吃过早饭，在离开武汉前和李先念、王任重等人进行了简短的谈话，他说：

“你们的东湖不错嘛！昨天我在船上大致观察了一下，自然条件绝好，真是少见啊！”

王任重问：

“西湖和东湖哪个更好？”

毛泽东说：

“我看西湖、东湖都好，但东湖还有待开发。”

接着，毛泽东谈了几个很重要的问题：

一、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他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中国有3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已经被打倒了，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农业、手工业和文盲3个问题。当然对待这些人不能用对待前3个敌人的办法。**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手工业目前还要依靠，还要提倡，没有它不行。文盲要扫除。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

二、关于民族形式的问题。他说：你们在东湖盖的两座房子（指甲所、乙所）像个乌龟壳，有什么好看？**落后的东西都要逐步废除，木船是民族形式，要不要用轮船代替？为什么人们不喜欢旧茅厕，要用抽水马桶？飞机、汽车、坦克哪一样是民族形式？这是说，要提倡进步，反对保守，反对落后，还是大洋房子比小平房好。有些人对保护老古董的劲头可大了，连北京妨碍交通的牌楼也反对拆除。**

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作风。他说：对人要和气，说话要和气，你们有的人，为什么说话不和气呢？**官僚主义作风主要在上边，你们要敢顶、敢抗。对于上边来的错误的东西，要筑坝、要消毒。**对于上级布置的工作任务，要分别轻重缓急来执行。

关于贸易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主要针对武汉市的批评，毛泽东问王任重有什么意见？怎么看法？王任重说：

“我们主要担心工人失业问题，我们一定努力把产品质量抓上去。我们没有把情况向中央贸易部报告清楚，是个缺点。我们还是要求国营商业加工订货或收购。”

毛泽东说：

“实际上你也有责任，但我同情你们的做法。”

这天上午，毛泽东还接见了奉命从黄石赶来的黄石市委书记杨殿魁。他询问黄石的情况，对杨殿魁的回答也很满意，还说：

“我要去看看。”

杨尚昆、罗瑞卿考虑到安全问题，竭力劝他不要去黄石。毛泽东笑着说：

“那里是将来的工业基地，我就是骑着驴驹也要去看看。”

上午11时30分，毛泽东在李先念、李雪峰、赵毅敏、王任重4人陪同下，到江汉码头登上来武汉迎接他的东海舰队“长江”号军舰。

这一天天气很冷，空中飘着小雪。“长江”号军舰上的指战员，列队站在甲板上，接受毛泽东检阅。这是毛泽东首次检阅海军舰艇部队，他向指战员们发表了简短讲话，他说：

“过去你们在陆地上，那时要求同志们要爱山爱土，现在你们是海军，应该爱舰爱海洋。**过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大多是从海上来的，现在太平洋还不太平。我们应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

在谈到国际斗争形势时，毛泽东说：

“**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我们要争气，要认真对付。我们的海岸线这么长，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过去我们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现在我们已经有了飞机、也有了军舰，只要我们一起努力干，我们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检阅结束后，“长江”号徐徐离开码头，由“洛阳”号护航，顺江东下。毛泽东在休息室里听取了杨殿魁关于黄石市民主改革的情况汇报；听取了刘惠农关于长江航运和民生轮船公司公私合营情况的汇报。

毛泽东对民生轮船公司公私合营的情况十分感兴趣，详细地询问了该公司公私合营的全过程。他说：

“**要使长江上所有私营航运公司都走上公私合营的道路。**”

毛泽东还找中南水利部副部长林一山了解长江水灾成因、治理利用办法。林一山匆匆挟上一本《申报》地图，来到设在2楼的主席卧舱。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

“你过去见过我吧？”

林一山说：

“见过几次，那是西安事变放走蒋介石后，1937年春，中央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我是白区代表，主席曾参加过我们的小组会，我还问过很多问题。”

毛泽东说：

“真对不起，你认识我，我还不认识你。”

他指着林一山的手问：

“你的手是打仗时受伤的吧？”

林一山说：

“是的，是‘七七事变’后跟日本人作战时受伤的。”

毛泽东又问：

“你打过几次仗？”

林一山心里算了一下，说：

“较大的战斗不超过10次，小规模的游击战可能有一二十次。”

毛泽东说：

“好！打打仗可能有好处，可以减少主观主义。”

他指着林一山带来的《申报》地图问：

“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

林一山说是在东北打汉奸时弄到的。毛泽东说：

“这本地图还是不错的，长征开始时我路过湖南广东边界时也弄到过一本，以后打仗行军时还时常用它，长征中它给我帮了不少忙。”

他拿起一支红铅笔，把地图打开，笔尖在地图上慢慢移动，对林一山说：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

林一山立刻想起毛泽东在视察黄河时曾说过类似这样的话，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只见毛泽东把铅笔指在西北高原上，指向腊子口，指到了白龙江，然后又指向略阳一带地区，指向西汉水，问道：

“从嘉陵江的上游白龙江和西汉水，向北引水，行不行？”

林一山说：

“从这两条江向北引水不行。”

后来过了很久，林一山在一次汇报中曾对毛泽东说：“根据查勘资料证实，把白龙江和西汉水向北引水也是可行的。我过去仅仅从地貌的表面现象，就认为不能引水的看法是片面的。”

此时的毛泽东见林一山说不能引白龙江和西汉水，手中的铅笔突然飞越巴山蜀水，顺着汉中盆地、武当山地区，指向湖北均县附近，突然下笔画了一个圆圈，问道：

“引汉水行不行？”

林一山回答说：

“有可能。”

毛泽东凝视着地图上的三千里汉江，问：

“为什么？”

林一山回答说：

“汉江和渭河、黄河平行，中间只有秦岭、伏牛山一山之隔，它自西而东，越到下游，地势越低，水量越大。这就有可能找到一个合适地点兴建引水工程，让汉江的水通过黄河，引向华北。”

毛泽东抬起头，凝视着窗外的滚滚长江，问：

“这个问题，你考虑过没有？”

林一山说还没有。毛泽东说：

“你立即部署勘察，一有数据，就写信给我。”

正是：吃水不忘掘井人，南水北调有前因。不是毛公早谋划，何能汲水济京津。

这林一山见毛泽东叫他立即部署，便起身告辞。毛泽东说：

“你不要走，我请你吃饭。”

服务员端上来两菜一汤，除了辣味以外，没有什么鲜味和香味，可毛泽东吃得津津有味，一边吃，一边愉快地说：

“我在北京很忙乱，出来后空气新鲜，心情愉快，能自由地谈问题，自由地了解情况。”

2月19日下午4点左右，军舰到达湖北黄石港。毛泽东在李先念等陪同下上了岸，与黄石市委副书记高芸生一起转乘汽车，沿着长江的一条支流溯源而上，驱车前往黄石大冶钢铁厂。

李先念陪着毛泽东坐在后排，汪东兴坐在司机周西林的旁边，叶子龙和王鹤滨坐在后排座前面可以折叠的靠背软椅上。车到黄石市大冶钢铁厂时，太阳已经隐没在山后了。毛泽东在招待所里稍事休息就要去厂区，大家都说天已经黑了，他却说：

“天黑了，我也要把大冶钢厂炼钢过程从头看到尾。”

毛泽东站在钢铁厂扩建、改建的施工现场，非常关注地听着总工程师的汇报。总工程师说：

“我们已经在黄石市附近发现了新的铁矿资源，储量丰富，品位也高，给钢厂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毛泽东笑着说：

“你这个巧媳妇，这下可以做有米之炊了。”

来到高炉车间，毛泽东见工人们都穿着防辐射热的石棉衣裤、围裙，戴着防护帽子和手套，脖子上搭着一条擦汗的长毛巾。他们有的双手持着长长的钢钎，捅向炉门；有的把额上戴着的墨镜遮在眼前，察看熔融的钢水。他像在阅兵式上一样，把右手扬起，向工人们打着手势。来到一个适中的位置，这里能观察到高炉车间的全貌，他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工人们的劳动。

高炉车间里的温度很高，辐射热很强，就像一座巨大的红外线烤箱。从高炉中喷射出来的烟尘和带着硫磺味道的气体，使人觉得呼吸不畅，可是，工人们没有一个戴口罩的。王鹤滨事先准备了不少口罩，足够他们一行人用的。他把口罩从手提箱里拿了出来，首先向毛泽东递过去，毛泽东立即用严厉的目光向他扫了一眼，右手手心向下，果断有力地水平地摆动了一下。王鹤滨将伸出去的右手立即缩了回去，迅速地将口罩装进了衣袋里。他知道毛泽东是决不让一个口罩将他与工人们隔离开的。

**王鹤滨想起了一个曾经让他困惑很久的问题，那是他跟随毛泽东一起去医院看望病号，毛泽东问他：**

**“你们医生看病人时，戴着大口罩，是为了保护病人？还是为了保护你们自己？我看是怕病人把疾病传染给你们，对吧？不然，为什么住在病房里的病人，不都给戴上口罩哩？”**

**王鹤滨想了很久：医生戴口罩是无可非议的；可是，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考虑到的是医生的服务对象。是啊！如果说口罩没有防病作用，为什么要戴它呢？如果口罩有防病作用，那么为什么不给医院里的所有病人都戴上口罩呢？自己反复思来想去，却始终无法反驳毛泽东提出的这个论点。**

毛泽东在高炉车间站了很久，他看着工人们不时地用毛巾擦着脸上的汗珠，转身对工厂的领导说：

**“要关心工人群众的健康，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厂长马上说：

“主席，我们在这方面都有措施。”

他指着旁边一个白色搪瓷桶，说：

“这是为工人同志们准备的清凉饮料，盐汽水，是工厂特意为工人配制的。工人反映很好，可以随便饮用。”

那位厂长走到保温桶旁，用消过毒的白搪瓷茶缸，接了半缸盐汽水，双手捧到毛泽东面前，含笑说：

“主席，你尝尝。”

毛泽东客气地接过水杯，喝了一口，用舌尖轻轻地舔了一下左右嘴角，品了品味道，说：

“很好！”

随行人员也都跟着尝了几口，都说感觉不错。毛泽东就要离开了，高芸生问：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

毛泽东说：

“希望你们把工厂办大办好。”

毛泽东走出车间，路灯已经亮了，他在工人宿舍楼前仰视着发光的窗口看了一会儿，大概是想去造访工人家庭，只是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不便去打搅了。

返回到“长江”号军舰上，毛泽东就休息在军舰政委的办公室里，睡的是自带的行李和木板床。

2月19日晚，“长江”号军舰驶抵九江。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九江地委书记史梓铭到舰上迎接毛泽东。毛泽东说：

“尚奎，延安一别，有7个多年头了。你们几个回江西工作，已经习惯了吧？”

他点燃一支烟，问起了刘俊秀等人的情况。原来早在全国解放前夕，中央把陈正人、范式人、杨尚奎、邵式平、方志纯、刘俊秀等几个江西籍干部调回江西工作。1952年11月，中央决定调省委书记陈正人、副书记范式人去中央部门工作，由副书记杨尚奎接替陈正人的工作。毛泽东又说：

“陈正人和范式人去了北京，你们的担子更重了。”

杨尚奎说：

“我们一定不辜负中央的期望，把江西的工作做得更好。”

接下来，毛泽东听取杨尚奎、史梓铭的汇报，有时还会提一些问题。他在听了汇报后说：

“这几年，江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土改运动发展迅速，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差错，‘三反’运动摸索了不少好的经验，在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方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已经是晚上12点了，毛泽东依然是兴致盎然，杨尚奎为了让他早点休息，便起身告辞。毛泽东说：

“明天再谈。”

杨尚奎报告说，明天江西省委要召开常委会，我要赶回去，委托史梓铭陪同主席在九江的活动。主席对江西工作的要求，可由史梓铭同志向省委传达。毛泽东同意杨尚奎的安排。杨尚奎立即乘车返回了南昌。

2月20日下午，毛泽东在罗瑞卿和武擎天陪同下视察九江市容。他们3人身材都很高大，走在一起更显魁梧。罗瑞卿多次劝毛泽东上车，毛泽东没有理会，继续往前走。他们沿着滨江路边走边看边议论，有人认出了毛泽东，行至中心大街的尽头，迎面拥来了潮水般的群众。罗瑞卿拉着毛泽东就向左转，拐进了一个小胡同，上了尾随而来的小车，迅即离开。他们乘车继续在九江市区游览，不一会儿到了甘棠湖。毛泽东下了车，登上了湖旁的一座小山，向南仰望庐山。史梓铭在一旁向他介绍着庐山的风景。毛泽东注视着云雾缭绕的群峰，感慨地说：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曾经把庐山作为‘围剿’红军的大本营，亲自坐镇指挥对中央苏区的军事进攻。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只隔了十几年，庐山落到了共产党的手里，成了人民的天下，这不能不是对他莫大的嘲弄。”

他问史梓铭：

“现在上庐山的交通条件如何，是不是还要靠人抬轿子上去？”

史梓铭回答说：

“从九江到庐山的公路，正在修建，今年可望通车。”

毛泽东说：

“那就好。这样，**有更多的人民群众可以上庐山游览、避暑**，也给今后外国游人提供了方便。你们办了一件好事。”

下午4点多，毛泽东换乘“洛阳”号军舰缓缓离开九江港。

原来，在离开九江前，“洛阳”号护航舰上的士兵们提意见说，希望主席不要光在“长江”舰上，也能到我们“洛阳”舰上来看一看。毛泽东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便上了“洛阳”号护航舰。服务人员把他的床板也扛到了“洛阳”舰上。一路上，毛泽东继续和史梓铭交谈，他问史梓铭：

“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大规模地开展，工业战线急需干部。如果从地方上抽调一批骨干，加强工业建设，对地方工作是否会有影响？”

史梓铭回答说：

“虽然有些影响，但不会很大。”

“为什么呢？”

“3年多来，各地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培养了不少干部，即使抽走一批干部，也可以马上补充上去。”

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围坐在周围的杨尚昆、罗瑞卿、史梓铭等人，强调说：

“今年是我国大规模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年。国家建设，包括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文化建设，而以经济建设为基础。我们各级领导，一定要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熟悉经济工作，取得经济工作的领导权。同时，还要下决心抽调大批干部到经济战线，加强经济战线的领导力量。**这次我到几个省走一走，就是想听听下面的意见，从而有助于中央作出正确的决策。”**

他点燃了一支烟，接着说：

“**为了夺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要在指导思想、工作方式、组织领导等方面来一个转变。**战争年代，我们一切为了前方的胜利，各项工作都围绕着武装斗争进行，包括抽调大批干部到军队中去，以加强对军事工作的领导。**现在，我们提出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也必须坚决地从各方面抽调优秀干部，安排到工业战线上去，把他们培养成工业建设的骨干。我们号称世界大国，可是，却只能造桌子椅子、造茶碗茶壶、只能种粮食、碾大米、磨面粉，却不能造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这样下去，非挨打不可。**所以，我们全党要统一认识，下决心把工业生产搞上去。”

毛泽东又向史梓铭了解农村春耕、备耕的情况，问道：

“农民分到了土地，春耕准备得怎么样，还有哪些问题？”

听了史梓铭的回答，他说：

“全国二十几个省市，除个别地区外，绝大部分都已完成了土地改革。农民获得了土地，免去了向地主交纳苛重地租，必然会激发生产热情。因此，**我们要因势利导，采取各种措施帮助农民多打粮食。只有把农业搞好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才能有牢固的基础。**所以，你们统筹考虑，帮助困难户搞好备耕，这做法要坚持下去。

**我们共产党领导农民完成土改，是为了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考虑的是农民的根本利益。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后，我们共产党帮助他们发展生产，也是从农民的利益出发的。这一切，都体现了共产党的宗旨，也成为广大农民群众拥护共产党的最主要的因素。**”

史梓铭说：

“主席，农民还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

毛泽东问：

“什么问题？”

史梓铭说：

“农民分到了土地，发了地契，理应交地契费。可是，眼下农村正值春荒，所以，农民要求秋收割了稻子再交。”

毛泽东思忖片刻，很干脆地回答：

“农民的要求不过分，可以在秋收后再向政府补交地契费。小史，你可以把这个意见转告江西省委。”

晚上9点多，军舰在安庆江面停泊。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市委书记赵瑾山来见毛泽东。毛泽东问傅大章：

“一天工作多少时间？”

傅大章回答说：

“工作十几个小时。”

毛泽东点了点头说：

“做一个地委书记，没有十几个小时，工作是干不完的。今天晚上不谈了，明天再找你谈。”

他问傅大章家中还有什么人？明天能不能跟他一道走？有什么困难？工作能不能离得开？傅大章说没问题。毛泽东笑着说：

“好！”

欲知毛泽东要去向何方？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2年2月19日同李先念、王任重谈话时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由此，笔者想起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工人阶级没有祖国”那句话（意思是，**那时候的国家**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它是资产阶级的国家，不是工人阶级的国家。请注意：这里所说的**国家**，**即统治机器。**）。熟读《共产党宣言》200多遍的毛泽东肯定思考过这句话。这就给后人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深远的问题：如果你的祖国倒退了、变坏了，变成了一个坑蒙拐骗偷、吃喝嫖赌抽的社会，你该如何表态呢？

**第46章**

“**费了那么大的力量修支流水库，还达不到控制洪水的目的，那为什么**

**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这个三峡水库。”**

话说1953年2月21日晨，毛泽东为人民海军题词，他写的是：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毛泽东 1953年2月21日

上午9点，毛泽东同两条舰上的海军战士合了影，有个战士自言自语地说：

“如果每人给一张照片就好了。”

毛泽东听到了，回过头笑着说：

“好！每人一张。”

他又指着公安部长罗瑞卿说：

“他不给，找我。”

战士们高兴得再一次热烈鼓掌，毛泽东也微笑着鼓掌，又同随行干部合了影。

11点，傅大章和赵瑾山跟随毛泽东到江岸上察看江堤，为了摸清情况，还找来长江治理委员会负责人林一山。

毛泽东指着长江问林一山：历史上此段长江最大洪峰的流量是多少？他详细地询问长江的流量、含沙量等情况，并与黄河作了比较。他还问了马当一段国民党败逃时破坏航道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情况。当听说安庆上下400公里的一段，由于国民党不顾人民死活，长期不作治理，造成江岸崩塌严重，有的航道快要冲破堤岸，与后面湖泊相通时，毛泽东非常关心，说：

“你们要像治理黄河一样，设法把长江控制住。”

他站在江岸上，久久地望着振风塔，详细地询问塔的历史、结构，又问安庆为什么叫宜城？他解释说：安庆具有悠久的历史，东晋诗人郭璞说“此地宜城”，故别称“宜城”；南宋绍兴年间置安庆军，始得名“安庆”。他走到群众的菜园地，一边走，一边点着蔬菜的名字，并向人们询问群众的生活情况。

午饭后，军舰启航向芜湖、南京驶去。毛泽东继续同林一山谈话。漫步在甲板上，他对林一山说：

“要驯服这条长江，一定要认真研究！这是一个科学问题。长江的水文资料，你们掌握得怎么样？”

林一山汇报说：

“我们已经组织了一支力量，整编了长江历年的水文数据，这些数据页以万计，重以吨计，通通作了整理。但由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时期打了多年的内战，干支流、上下游各站的记录，时有残缺，互有矛盾。因此，在整编过程中，我们不得不采取各种方法辨别真伪，做些延伸或插补，有些记录还不得不用人工的方法去‘塑造’洪峰。”

毛泽东风趣地说：

“这个方法真有趣。”

他对水文数据很重视，问得很详细，又问长江流域的气象特点是什么？暴雨区的分布怎样？林一山一一作了回答。他着重汇报了位于湘赣南部的南岭暴雨区以及位于四川盆地周边的四川暴雨区，说明前者是在3至6月间先降雨，赣江水系和湘资沅澧水系开始涨水，随着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继续向大陆腹地延伸，到7至9月。暴雨出现于四川盆地，两个洪峰正好错开。如果川水洪峰到达中下游时，中下游也发生暴雨，往往极易造成严重的洪水灾害。毛泽东问：

“长江水灾成因主要是什么？”

林一山回答说是暴雨。毛泽东又问：

“长江流域暴雨成灾最严重的地方在哪里？”

林一山回答说：

“根据资料，1935年7月1日开始的一次暴雨，中心在湖北省五峰县，降雨量达1500毫米，一夜淹死了汉水中下游8万余人，澧水下游4万余人。至于‘川西天漏’地区，年降雨量可达2000余毫米。”

毛泽东说：

“真了不得！”

说着，他转过身去对一路陪同的公安部长说：

“罗瑞卿同志，你这个高个子有多高啊？”

罗瑞卿说约有一米八几。毛泽东说：

“长江真能下雨，有的地方年降雨深度，比你罗瑞卿这个高个子还要高！”

回到船仓，毛泽东还在考虑长江问题，他问林一山：

“怎样才能解决长江的洪水灾害？你有什么设想？怎样才能除害兴利？”

林一山说：

“目前首先要抓紧堤防加高加厚，辅以湖泊综合治理，然后要考虑兴建一批山谷水库综合利用。”

他展开随身带来的长江流域防洪规划草图，指着图上大大小小的水库说：

“我们计划在长江干流及其主要支流上，逐步兴建一系列梯级水库，拦蓄洪水，综合利用，从根本上来解除洪水的威胁。”

毛泽东凝视着地图，从青藏高原的长江源头、莽莽昆仑、金沙江、大渡河、岷江、嘉陵江、乌江、湘江、汉江、赣江直到上海、长江口，看了一会儿，他拿起铅笔，在规划图上长江干流三峡水库下面划了一个圆圈，说：

“太好了，太好了！修这许多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一个水库呢？”

林一山说：

“对于长江中下游的防洪作用来说，这些水库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

毛泽东伸出手指，指着三峡口说：

“**费了那么大的力量修支流水库，还达不到控制洪水的目的，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这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林一山说：

“我们很希望能修三峡大坝，但现在还不敢这样想。”

毛泽东笑了，说：

“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你不是也这样说了嘛！”

林一山汇报说，早在三十年代美国著名大坝专家萨凡奇博士就提出过一个扬子江三峡工程的初步计划。毛泽东问：

“当时的造价是多少？”

林一山说：

“约合13亿美元。”

毛泽东问罗瑞卿，美元的比价是多少？他自己算了一下，说造价不算高。他又问林一山：

“你们工程师有多少？”

林一山说：

“有280多人。”

毛泽东“噢”了一声说：

“工程师讲百呀！技术员有多少？”

林一山说：

“有1000多人。”

毛泽东笑笑说：

“噢，技术员讲千呀！”

他又问傅大章：淮河的水位比长江的水位高多少？他提出把合肥附近的将军岭切开，在洪水季节把淮河的水调一部分到长江来，以减轻淮河下游的压力。他还说：

**“黄河下游一带有个水源不足的问题，应该引丹（江）入黄（河），就是说把长江一个支流的水调到黄河去。”**

谈完长江问题，傅大章拿出不少材料准备汇报工作。毛泽东说：

“今天不要你们汇报工作，你们想想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随便谈谈。”

傅大章说，土地改革后对搞合作化缺乏经验，希望中央组织人到苏联参观一下。毛泽东说：

“自己要在实践中创造经验，各有各的情况。到苏联参观的人太多，人家也不方便。”

谈到土改后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时，毛泽东说：

“要搞好革命的转变问题。譬如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有10项任务，现在已经完成了七八项，那么要不要到把这10项任务都做完了，再去搞社会主义呢？不是的，而是那些条件成熟了，现在就要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工作。我们是革命阶段论者，但两个阶段不能截然分开。”

他问傅大章：

“土改后农民生活还有哪些困难？”

傅大章说：

“农民手中无钱，迄今还是以物易物做交易。”

毛泽东点点头，记下了傅大章反映的问题。他对傅大章等人说：

“做工作不能简单化。刚到陕北，当时开展反对张国焘的斗争，有个指导员给连队战士上政治课，讲张国焘的错误。一个战士站起来说，你讲张国焘坏，我看还不是那样坏。这个指导员向我反映，我向他解释，你不要急，你讲张国焘坏，这个战士还没有理解，要耐心细致地做工作，让战士从我们的行动上，看到中央是正确的，张国焘是错误的，这要有个过程，要等待，不要简单化。”

傅大章汇报说，大别山区的老百姓有很多得大脖子病。毛泽东说：

**“这个病是饮食缺碘造成的，多吃海带可以防治。”**

此时，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也赶到安庆，来见毛泽东，要求毛泽东给《安徽日报》报头题字。毛泽东说：

“你们什么事都找我。”

尽管如此说，他还是提起笔题了字。傅大章讲到高敬亭长期在岳西一带坚持斗争，群众反映是好的。经常提到他，他有错误可以整整风，是不是应该杀？毛泽东说：

“高敬亭不应该杀，是戴季英搞宗派捣的鬼。后来中央识破了，即发电报指示不要枪毙高敬亭，但电报到时已晚了。”

他问傅大章：

“陈独秀家在什么地方？”

傅大章说在怀宁独秀山脚下。毛泽东又问：

“独秀山是因陈独秀而得名，还是陈独秀因山而得名？”

傅大章说：

“陈独秀是因山起的名。”

毛泽东问：

“陈独秀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傅大章答：

“陈独秀有个儿子陈松年在市窑厂工作，当技师，生活上比较困难。”

毛泽东说：

**“陈独秀这个人，是有过功劳的，早期对传播马列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是有贡献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的影响也许比别人还大，我是他和李大钊那一代的学生。**后期，**他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1935年陈独秀出狱后，中央派人做他的工作，争取他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希望他发表个声明承认错误，但陈独秀拒绝了。对他这个人物要历史地具体分析。对于他的家庭，地方上还是应当给予照顾的，有困难可以帮助解决嘛。”

吸了一口烟，他又说：

“**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还是党的早期革命家和活动家，在狱中斗争英勇顽强，被蒋介石杀害，是革命的烈士。对于陈独秀这个家庭，还是要以革命烈士的家庭对待嘛！”**

毛泽东问到光明甫还在不在？傅大章说：

“还在，是个民主人士，总的来讲不错，只是1948年帮助过李宗仁竞选中华民国总统。”

毛泽东说：

“我在武汉革命政府和他共过事。”

2月21日晚上，军舰驶抵芜湖。芜湖地委书记张世荣、市委书记姚克应召上了军舰。毛泽东同张世荣边握手边问：

“你叫什么名字？”

张世荣回答说：

“我叫张世荣，名字有点封建。”

毛泽东微笑着说：

“不封建。世荣，世界荣华嘛！”

他又问：

“芜湖离南京有多远？情况如何？”

张世荣说：

“离南京很近，不到100公里。芜湖成立了中共地委、市委。政治社会情况良好。”

毛泽东对坐在身旁的罗瑞卿说：

“你说芜湖离南京太近，原是国民党控制区，情况很复杂，不能住。据老张讲的情况看，事实不是这样。解放已经几年了，经过镇压反革命，现在政治、社会情况很好嘛！”

快到南京时，毛泽东又找林一山谈话。他说：

“**三峡问题暂时还不考虑开工，我只是摸个底。中央分管这项工作的同志，你也不需跟他讲，但南水北调工作要抓紧。”**

2月22日凌晨1时，军舰抵达南京下关大兴码头。毛泽东和林一山告别，他握住林一山的手说：

“好，我算是了解了长江，了解了长江的许多问题和知识，学习了水利，谢谢你！”

从上海赶来的陈毅、谭震林、柯庆施、唐亮等有关方面负责人早已来到了码头上，迎接毛泽东。谭震林对毛泽东说：

“主席，你要保重身体啊！有事我们可以去北京向你汇报嘛。”

毛泽东说：

“还是自己下来走走好，心中有数么。”

毛泽东在西康路33号省委招待所中楼下榻。（据王鹤滨说：毛泽东一直住在军舰上，没有上岸去住。）

2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陈毅陪同下参观了蒋介石的总统府，随后，游览了莫愁湖、玄武湖。在玄武湖畔，他兴致勃勃地对陈毅说：

“陈老总啊，我倒是听得这么一首诗来：‘**唐宋元明清，匪盗未肃清，国民党当道，特务大横行。有了共产党，镇压反革命，社会大安定，人民享太平。’**”

毛泽东抑扬顿挫地把这首打油诗念得特别有韵味。陈毅也深受感染，他说：

“这是群众的心声嘛。南京是六朝古都，老百姓的体会也许更深一些。”

接着，毛泽东在玄武湖畔接见了省级机关部、委、办、厅、局的负责人，以及正在南京参加会议的各地、市、县的书记们，听取了华东军区和江苏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的汇报。他对江苏的工作还是满意的，尤其对南京市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所取得的成果非常高兴。他还说：

“南京是一个臃肿庞大的特等消费城市，是为官僚机构服务的城市。**蒋介石搞了一点装配工业、修理工业，那是为了装门面的。一定要把南京改造成为生产城市**。要利用南京原有的工业基础，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利用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来恢复和发展生产，还要搞点轻工业。”

黄昏时分，毛泽东在狭小的卧室里一个不大的写字台旁工作着，写字台上平摊着一张长江流域的大地图，因为空间狭小，那张大地图只有毛泽东看的部位他用左手按着，其它部位只好折叠着，或者垂下去。毛泽东右手拿着红蓝色的粗铅笔，俯视着地图，手指不停地在地图上游动，时而用铅笔在上面记着符号。

王鹤滨来了，见毛泽东停了下来，正在抽出烟点燃，就凑上前去，询问他的身体如何，旅途上适应与否？又为毛泽东测量了血压，听了一下心肺。毛泽东看他忙乎完了，就说：

“王医生，我忘记告诉你了，有几天不大便了，有什么好办法吗？”

王鹤滨知道这主要是海军式生活的结果，罐头食品加饮料，缺乏纤维多的蔬菜，再加上体力活动的减少，便秘是正常的现象。就说：

“最好是灌肠。”

王鹤滨认为这种办法比较稳当，他不愿意使用泻剂。毛泽东犹豫了一下，不愿接受这种疗法，嫌费事，于是说道：

“那好，如果明天还便不下来再灌吧。”

2月23日上午，毛泽东让通知刘伯承和总高级步校校长宋时轮，到他下榻的省委招待所，分别汇报他们院校的情况。刘伯承因在上海治疗眼疾，南京军事学院改由陈伯钧、钟期光代为汇报。

钟期光，在本传前面已经多次提到，他是人民军队中的一员儒将，有才学。1909年1月2日，他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乳名钟昱明。钟期光家是佃农，由于家境不好，5个姐姐和2个妹妹都是很小就出嫁了。钟期光父辈是兄弟两个，因伯父没有儿子，父亲就将钟期光的一半过继给伯父。所以，钟期光刚满4岁，父母和伯父就倾其所有送他去读书。钟期光聪颖好学，10岁时曾作了一首《燕子歌》诗，诗中说：“喜燕来时乐汝居，忽闻门外一声叽。呢喃恰恰山人意，汝筑新巢我读书。”钟期光12岁考入平江县天岳书院，经教师介绍加入国民党。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钟期光义愤填膺，参加了湖南农民义勇军平江第1大队。后来，这支队伍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钟期光从小酷爱书法，学赵孟頫甚有功夫。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直至晚年，他始终坚持用毛笔书写。钟期光在1951年和刘伯承等人一起筹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他任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听了汇报后，意味深长地说：

“延安有个清凉山，南京有个紫金山。”

他把南京军事学院比作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

2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谭震林、柯庆施、陈毅、罗瑞卿、江渭清陪同下，乘车专程到位于南京市东边紫金山中部第二峰小茅山南麓的中山陵凭吊孙中山。

中山陵是孙中山亲自为自己选定的墓地。1912年3月3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4月1日一早，他骑马来到紫金山打猎，看了这里的地势，对随行人员说：“候他日逝眠，当向国民乞求一块土，以安置躯壳耳！”

中山陵坐北朝南，占地8万多平方米，它北依青峰，南延平川，东边是幽深的灵谷寺，西边有宏大的明孝陵，可谓是气象万千，景色秀丽，场面壮阔，气势宏伟。从大门的石坊到上面的墓室，分10个平台，共392级台阶。在近代世界各国伟人陵墓中，中山陵是一个最为宏大壮观的建筑群。

在中山陵两侧，还有终生追随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元老廖仲恺和邓演达的墓地，也可供人凭吊。

车队停靠在中山陵墓北侧路西石牌坊的广场上。毛泽东一行沿着宽阔的水泥台阶，向孙中山先生的灵堂走去。众人来到陵墓的第一个大门前，驻足观看，这就是博爱坊。博爱坊样式取明清建筑模式，高10余米，用花岗岩建成。它有3个阙门，中门上方镌刻着孙中山手书的“博爱”两个大字。穿过大门是宽阔的大道，两侧松柏长青，越过广场拾阶而上，便是陵门了。陵门为三拱形，顶上蓝瓦覆盖。门额刻有孙中山手写的“天下为公”4个大字。过了陵门就到了碑亭，碑高6米。毛泽东走到石碑前，观看碑文，但见上面刻着：“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从碑亭这里朝上望，祭堂高高在上，气势雄伟。石阶层层延伸，从碑亭到祭堂共有292级。

2点50分，毛泽东一行登上祭堂的平台。

祭堂位于平台的正中，两旁的望柱，均用花岗石建成。祭堂成仿古的宫殿式结构，有拱门3座，门楣上分别镌刻有阳文篆字“民族”、“民权”、“民生”，这便是三民主义了。中间门额上还刻有孙中山手书的“天地正气”4个大字。祭堂大厅正中，坐北朝南有一尊巨大的孙中山白色大理石坐像，座基上刻有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浮雕。

毛泽东一行人在孙中山坐像前，举行了默哀仪式。仪式结束后，毛泽东自右向左认真观看镌刻在四周墙壁上的《建国大纲》。陈毅见毛泽东伫立已久，怕他累着了，便上前说：

“主席，还有几个地方呢！”

“哎，哎。”

毛泽东满口应允，却依然一块一块地读碑文，一直读完，才来到祭堂后面的一个两扇铜门前，只见门眉上刻有“浩气长存”4个字，也是孙中山的手迹。接着是穿过两重独扇铜门，上刻“孙中山先生之墓”，过了这个门就是墓室了。墓室里光线幽暗，气氛肃穆。柯庆施站在毛泽东身边，小声介绍说：

“这穹窿状的墓室，直径约16米，室顶图案是国民党的党徽。”

毛泽东抬头细细地望了一阵，问道：

“那中山先生遗体安放何处？”

柯庆施指着孙中山卧像介绍说：

“这上面的白色卧像是大理石刻制的，安放孙中山先生遗体的紫铜棺就在卧像下面5米深处。”

毛泽东朝孙中山卧像久久凝视，半晌没有说话。他无限感慨地吁一口气，又背着手，绕着墓穴转了一圈。

走出祭堂，毛泽东来到外面宽大的坪台上，双手叉腰，举目远眺，良田沃野，尽收眼底；山上山下松涛滚滚，宛如一片绿色的海洋。毛泽东不言语，徜徉良久。

从中山陵出来，毛泽东一行的车队到中山陵八号原孙科公馆休息。忽然门口出现了大片人群，他们是工人、学生和附近的居民。“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不断。

原来，毛泽东在祭堂瞻仰时，被南京航空学院的一个学生认出来了，他返回学校报告喜讯，校园里立时轰动了。几辆卡车满载师生员工，飞速驶入中山陵。毛泽东一行来到门口，立刻被热烈激动的人群包围了。负责警卫的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洪沛霖急忙向柯庆施等人报告。他们几人正在商量时，陈毅走了过来，听说后沉吟片刻说：“我来！”说着便大步朝外走去，朝着人群大声说：

“你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主席今天已经很疲劳了，要爱护主席的健康。”

激动的人群还是不肯散去。罗瑞卿同南京市公安局局长黄赤坡和洪沛霖简单商量了一下，来到人群面前大声说道：

“为了毛主席的安全和大家都能清楚地见到毛主席，我们应该有秩序地站成行。”

在警卫人员的安排下，人群很快排成长长的两列，坐在草坪上。毛泽东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柯庆施的陪同下，来到师生员工们身边。“毛主席万岁！”群众欢呼着。毛泽东披着军呢大衣，摘下草绿色的呢军帽，高高举过头顶，在空中不停地挥动，向群众致意，用他那湖南腔洪亮而又有力地高呼：

**“人民万岁！祖国万岁！”**

他健步走入欢呼的人群中，热情地握着向他伸来的千百只手。回到车上，毛泽东喃喃自语：

**“这就是人民啊，他们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

车队沿着蜿蜒起伏的东郊公路，来到紫金山脚下。因山势太陡，道路狭窄，大家纷纷下车，换上了越野性能较强的苏制“嘎斯69”吉普车，毛泽东的车子正要开动，陈毅忽然来到他的车前，笑嘻嘻地说：

“主席啊，咱们乘一辆车吧？”

“你的车呢？”

毛泽东不解地问。陈毅说：

“在后头呢，不管它。你看紫金山的风景这么好，在一起也好谈谈诗嘛。”

“也好，也好。”

毛泽东说着便往里挪了挪，但是他身材高大，也没有腾出多少地方。陈毅便挤在毛泽东身旁。

位于紫金山第3峰的中国科学院天文台，高耸的白色圆形建筑物矗立在翠绿的紫金山峰顶上，宛如一颗巨大的珍珠，闪着银光，镶嵌在一块祖母绿的宝石之上。

车队抵达山顶，毛泽东来到白色的建筑群前，要先拜访一下气象学家、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教授。

竺可桢，中国近代气象学的开创者之一，一代气象学、地理学宗师。他于1890年出生于浙江绍兴，1910年赴美留学，1918年获得气象学博士学位后旋即回国，开始从事教育、科研事业。抗战胜利后，竺可桢送爱女竺梅奔赴解放区。1949年9月，他作为教育界代表自上海赴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根据他的建议，将“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作为第43条，写入了《共同纲领》。10月1日，竺可桢作为政协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10月间，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孙克定迎上来，欢迎毛泽东的到来。孙克定说竺可桢教授事先没有得到通知，不在天文台，他陪着毛泽东等人首先来到大观测台。毛泽东在大观测台的平顶上来回踱步，举目远望，不觉有些激动，他自言自语道：

“是虎踞龙盘今胜昔啊！”

大观测台在南京沦陷时，遭到日本侵略者的严重破坏，此时仪器还没有修复，所以孙克定只简单地向毛泽东介绍了天文望远镜的性能和作用。毛泽东问道：

“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有多大？”

孙克定回答说：

“美国芝加哥大学所属耶基思天文台的望远镜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折射天文望远镜，长达18.9米。苏联设计了一架使用反射镜的望远镜，直径为6米，它的一块镜片重达70吨。如能顺利制造出来，那将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操作的望远镜。”

毛泽东点点头，接着又观看了几件古代天文仪器。他拍拍东汉的浑天仪，对孙克定说：

“这些仪器过去是为帝王服务的。现在回到人民手中了，你们要为人民服务。”

从大观测台上下来，毛泽东一行穿过一片树林，来到最东面的小观测台。那天云层比较厚，为了看太阳黑子，等了一段时间。毛泽东抬头看看天，转过身子说：

“我们要看太阳黑子，它害羞了，不让我们看。天公不作美，帮了它的忙。”

孙克定叫工作人员取来一块褐色的石头，介绍说：

“这是1952年在如皋发现的陨石。”

“哦，地球外面来的客人嘛。”

毛泽东不无幽默地说。他拿起陨石，仔细端详，反复看了好长时间，然后慢慢地放回托盘里，沉思着说：

“世界、宇宙是物质的。”

孙克定将毛泽东一行引进了一个圆形的建筑物内，只见室内放着许多仪器，中央安置着一台天体望远镜；那圆形的穹顶，像缩小了的天宇一样，罩在头顶。科技人员熟练而又敏捷地启动了机械，于是，穹顶的正中逐渐拉开了一条缝隙，闪出一条带状的天际。科技人员又把宛如高射炮一样的天体望远镜，调节到适当的位置，使那“炮口”通过穹顶上的缝隙，对准更大的穹宇，又反复看了一下，就首先请毛泽东观看天体望远镜所能观察到的天体，陪同的领导人也依次从天体望远镜中观察了一下。王鹤滨也很想去看一看，但他见毛泽东已经举步向门口走去，只好跟了上去。

“天体那么多的星体，需要多少代科学家辛勤的劳动，才能一个一个地研究清楚啊！”

“就是数个数，只怕也数不完。”

“天体间的距离要用光年来计算，甚至上万光年，上亿光年，这广宇真大呀！”

毛泽东听着大家的议论，笑着说：

“宇宙是无穷的，但人类总是得一点一点地认识客观世界，有时则会发生认识上的飞跃。我们现在是在观察，虽然难免片面，但总得有个观察的方法。”

孙克定将毛泽东一行人引入另一个建筑物内，这是一个图片展览室，陈列着中国天文学家们的劳动成果和发现。毛泽东的随行人员站在一张黑白反差很强的图片前，指着一个头部呈圆形，后面拖着一个很长很长而逐渐加宽变薄的大尾巴的星体，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解说员站在图片的一侧解释说：

“这是哈雷彗星。英国天文学家哈雷首先计算出了它围绕太阳运行的轨道和运行的周期，因此被命名为哈雷彗星。当它接近地球时，用肉眼可以看到。其实，早在中国的春秋时代，就有了关于这颗彗星的文字记载，在那个历史年代，这个彗星曾两次出现在北斗……”

毛泽东笑着说：

“看来，哈雷彗星是个庞然大物，其实它是很空虚的！”

“是的，”科技人员肯定了毛泽东的见解：“哈雷彗星的质量是很小的。”

毛泽东接过话头说：

“是哟！幸亏它的质量很小，不然，这个扫把星把我们所在的地球不知早给扫到何处去了。”

陈毅听了大家的议论，也感慨道：

“啊！偌大个宇宙。咱们这个小小的地球，跟着太阳转，太阳系又跟着银河系的中心转，银河系也不知道是跟着哪个更大的中心转，谁知道我们这个地球跟着转到什么地方去哟！”

走出天文台，毛泽东一行观看了当年太平天国革命军与清军浴血奋战的天堡城遗迹。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

“在西柏坡时，我就提出来，要大家看《闯王进京》，看来这出戏今后还要看。太平天国革命历史也要建个博物馆，这是极有意义的。”

来到紫金山山峰上，他在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俯瞰南京全貌，对身边的江渭清说：

“中山陵的树是国民党种的，我们共产党为什么不能把整个城市都绿化起来呢？渭清啊，这件事你要负责抓，书记挂帅嘛。”

江渭清说：

“主席，请过几年再来看吧！”

毛泽东笑了，说道：

“好，这就算我们的君子协定。南京这个地方，我看是个好地方。但有一位先生，他叫章太炎，他说虎踞龙盘是‘古人之虚言’，是古人讲的假话。看起来，这在国民党是一个虚言。国民党在这里搞了几十年，结果被人民赶走了。如今，它在人民手中，我看完全是实言，是现实，南京还是个好地方。”

毛泽东离开紫金山天文台，兴致勃勃地沿着盘山大道向下走，李银桥、孙勇看到坡路有点陡，就急忙走到他的左右，想搀扶他下山，被毛泽东微笑着拒绝了。不多久，毛泽东解开了上衣的扣子；陈毅等人也敞开了胸怀，有的连白色衬衣的领扣也解开了。

陈毅捡起了一条大拇指粗的棍子，制成一个手杖。他不高的个头，胖胖的体态，敞开着外衣。这根木棍既可用来支撑他的身体，更多的是可以用来指点江山，加强说话的语气。有陈毅在，人们不会寂寞。他自然也是毛泽东谈古论今的伙伴。

众人绕过一个山坳，来到玩珠峰下，在山坡的尽头，有一个很大的土包包，像个大山头一样被围在墓墙之中，这就是明孝陵朱元璋的坟墓。一行人从未关闭的东门走了进去，毛泽东在一块高大的石碑前看了一会儿，又转到石碑的背面看了一眼。

在朱元璋坟墓的正北面，有一个坐北朝南的祭室，祭室不算大，是清朝同治四年和十二年两次修建后的3间瓦房。在祭室北墙的中央部位，画着朱元璋的全身坐像，工笔重彩，庄重华贵，应是出自名家之手。可是，朱元璋的样子却画得滑稽可笑，一张长长的瘦脸，下垂着很大的下巴，厚厚的嘴唇向前突起，两个鼻孔向前张着。陈毅用右手中的木棍，指了指画像，操着浓重的四川话说：

“这个朱洪武啊！怕有人刺杀他，所以故意要画家把他画成这个样子的！其实呀，他长得并不这样难看。朱洪武死后，据说呀，南京的4个城门同时出殡，迷惑人们，不知道从哪个城门里抬出来的棺木里装的是他真朱洪武，他怕后人盗他的墓，才想出了这个办法，可谓用心良苦也。”

毛泽东笑着看了陈毅一眼，又看了一下朱元璋的画像，对大家说：

“这些都是些传说，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洪武听了朱升的话：‘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后取得民心，得了天下。”

众人从明孝陵下来，又遇到不少工人在此等候，要求见毛泽东。省委负责人建议毛泽东乘车从工人中间经过，毛泽东不同意，执意步行来到工人们中间和大家见了面。

车队来到1950年刚刚修建的雨花台烈士陵园的大门口外，毛泽东下了车，表情严肃地踏进了烈士陵园的大门。在人行小道的两边，一片片的幼松，在这初春的江南，一片青翠，生意盎然。

雨花台烈士纪念碑正面，竖刻着“死难烈士万岁”6个大字。这6个大字，是从毛泽东在1946年为东北烈士纪念馆题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主义不可抵御，死难烈士万岁”中选择出来的。在纪念碑的右侧，堆放着许多花岗石，大概是准备修建祭台用的石块。

在南京市领导的陪同下，毛泽东一行来到一个小土坡下的洼地处。据介绍，邓中夏、恽代英等十多个革命先烈先后在雨花台英勇就义，而这块洼地是掩埋烈士遗骨最多的地方。毛泽东取下帽子，低下头，双手垂下，默默地向烈士们致哀；陪同人员，列在毛泽东身后，也一起脱帽鞠躬致哀。这简单的拜祭仪式，就像是在战场上送别牺牲的战友一样。

是日晚，毛泽东请华东和江苏省的负责人吃饭，饭后召开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谭震林、柯庆施、江渭清、管文蔚和应毛泽东的要求请来的基层干部泰兴县委书记沙克。会议由柯庆施介绍江苏工作情况，毛泽东不时插话，询问华东和江苏的具体情况。座谈会时间很长，内容从党内到党外，从国家到地方，从政治到经济。谈到江苏的水利，江苏的土产，毛泽东对养猪多，利于农业生产印象深刻。谈到江苏的粮食征购和查田定产，毛泽东说：

“查田不是查命，搞不好，不算数，要准备5年搞好。在中央征购粮的计划基础上进行调查、指导和定产，党委要起政治部的作用，弄不好，要作检查。”

在座谈会上还谈到党的“八大”的准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新“三反”等问题。半夜两点钟，陈毅来催毛泽东休息，毛泽东说：

“没关系，陈军长你坐下来谈谈。”

到凌晨3点，毛泽东才说：

“好吧，就是大家谈的几条，把它记下来。”

2月24日下午1点，毛泽东检阅海军舰艇部队。

原来，毛泽东抵达南京与陈毅交谈时，讲了他察看“洛阳”、“长江”舰的感觉，他对海军舰艇很满意。陈毅笑着说：

“还有好的呢？要不要调来请你一齐看看。”

毛泽东欣然应允。于是，停泊在上海的“南昌”舰、“广州”舰、“黄河”舰和和101、104鱼雷快艇接到命令，立即装满油、水，开赴南京下关码头。

毛泽东身穿浅灰色夹大衣，头戴浅色便帽，由陈毅、罗瑞卿、张爱萍等人陪同，观看了“黄河”、“广州”等舰，然后走过“广州”舰甲板，来到“南昌”舰。他走进会议室，听取有关负责人的汇报，不时提出一些关于海军建设中的问题。得知海军大多数负责人来自陆军时，他问：

“同志们都安心海军工作吗？”

舰长曾泉生说：

“他们现在已经习惯了，都愿意干海军。大陆已经解放了，都希望能参加解放台湾。”

毛泽东说：

“还有帝国主义哩！我们国家穷，钢铁少，海防线很长，帝国主义就是欺负我们没有海军，100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大都是从海上来的。你们是海军了，干海军就要不怕风浪，一定要到大海里去锻炼。”

对原国民党海军人员，毛泽东说：

“要多从政治思想上帮助，团结他们，共同为人民服务。”

他十分关心舰艇部队的物质生活情况，他说：

“在海上生活，体力消耗大，应该有足够的营养，以保证他们的健康。”

毛泽东也很关心从陆军调来的老干部的学习情况，对“南昌”号军舰上的一些负责人说：

“我听你们萧劲光司令员讲，有人瞧不起你们，说你们是土包子，不能干海军。我说没有关系，我们有高度的阶级觉悟，有丰富的战斗经验。过去我们爬雪山、过草地都过来了，遇到这么点点困难还不能过来？”

毛泽东问他们对海军技术学得怎么样？当听到“不论干部战士，基本上都掌握了技术”的回答时，他高兴地说：

“好、好、好。要边学边用，边用边学嘛。没有文化的学文化，没有技术的学技术，技术也是可以学会的。我们建设人民海军，就是要靠政治思想好又有技术的人。”

毛泽东对海军武器装备的情况十分关心，仔细询问了当时造船工作的情况。当了解到军舰所需要的技术装备还不能自给时，他意味深长地说：

**“我们可以自己制造嘛，光靠人家是不行的，海军的建设一定要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

听说有人认为海军技术装备复杂，我们又没有建设海军的经验，要全盘地不走样地向外国学时，毛泽东说：

“**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但是，不要认为什么都是外国的好。海军是有自己的特点的，但是不能强调海军特殊。我军好的传统要发扬，不能丢！”**

他多次询问海军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他说：

“**海上也有群众，渔民就是群众。要依靠渔民，不要脱离群众。要到渔民中去，和渔民打成一片，一定要搞好军民关系。”**

毛泽东还与干部们进一步谈到海上作战的战略战术运用。对于作战原则，他说：

“事物不是静止的，战争也是在发展的，任何时候都不要机械搬用，需要因时因地灵活处置。”

听完汇报，毛泽东检阅了海军舰艇部队。曾泉生请求他为“南昌”舰题词。毛泽东欣然答应。提起笔一挥而就：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毛泽东 1953年2月24日

尔后，毛泽东与全体舰员合影留念。

下午4时，“南昌”舰在浦口靠岸。铁道部长滕代远已在这里等候。毛泽东一行在这里乘专列北上。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苏州市委书记刘中、苏州市市长李芸华登上了专列。毛泽东说：

“叫你们来，是想了解苏州市的一些情况。苏州在历史上就是一个著名的城市，苏州的手工业是很发达的，你们苏州的苏笛、苏锣，还有苏绣、丝绸、戏装等都颇有名气，这些都是面向全国的。恢复生产对全国其他地方有影响，要抓紧生产的恢复工作。现在苏州群众的生活怎么样啊？”

刘中、李芸华汇报了苏州手工业生产的恢复情况，刘中、李芸华说：苏州的大工业很少，还是一个消费性城市，现在苏州有42万人口，吃饭的人很多，光车夫、保姆、茶房等等就不少。苏州解放后，这些行业都清淡了，所以一部分人生活很困难。毛泽东说：

“要抓好生产的恢复发展工作，还要抓好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还有苏州的园林工作等也要抓好，**要逐步解决好群众的生活问题。注意向自力更生，生产自救的方向引导。**苏州的文化水平很高，你们苏州历史上还出过许多状元，仅明清两个朝代，苏州大约出了20个状元。苏州的古迹、历史文物都很丰富。苏州的城墙怎么办？你们是怎么想的，方针、政策是什么？”

刘中、李芸华说：这个问题我们议论过，总的是城墙要拆掉，但要保存有保留价值的部分。如在建筑学上、在观赏方面有价值的和有纪念意义的部分。毛泽东点了点头，说：

“这些要注意保护。你们街道工作做得怎么样啊？”

李芸华说：

“当前主要是生产自救等，其他不太清楚。”

毛泽东说：

“现在街道当中各种人都有，那可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要做些调查研究，把有才能的人都动员起来，发挥他们的才能，为经济建设服务。你这个市长的家可不大好当啊！特别是苏州这个地方，搞好街道工作非常重要。武汉的街道工作做得就不错，街道是宣传执行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重要阵地。不是一部分人的生活很困难吗？对他们要救济，组织他们自力更生、生产自救。还有社会治安、爱国卫生运动、调解群众之间的关系等等工作，街道都要去做。今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要发展生产，搞经济建设，不是需要资金吗？要多方筹集资金，把闲散的资金都吸收起来。现在群众在银行的存钱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李芸华说：

“最近群众在银行储蓄有下降的趋势。”

毛泽东问：

“为什么？”

李芸华说：

“上级银行变更规定，有对群众储蓄不够方便的地方，影响了储蓄款的吸收。”

毛泽东说：

“这不好吧！”

说着，他把这件事记在了本子上，又说：

“今天晚饭我请客。”

于是，3个人围着一个小方台子坐了，服务员端上4样普通的菜，其中有一样是有辣子的，每人一碗红豆米饭，一盘馒头，一小杯葡萄酒。毛泽东说：

“你们辛苦了，来，先喝一杯酒。”

刘中、李芸华说，主席请！干杯后，毛泽东又说：

“时间很晚了，你们饿了吧？”

他指着一个辣子菜说：

“你们吃不吃啊？不敢吃就吃别的。”

他还说：

**“现在群众生活还很苦，我们要认真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

晚饭后，毛泽东送刘中、李芸华到休息室。罗瑞卿、杨尚昆、谭震林等都在这里坐着，毛泽东还念念不忘银行储蓄工作，问大家在银行存了多少钱。有的说10元，有的说8元。他问谭震林：

“谭老板，你在银行存了多少钱？”

谭震林说，存了30块钱。毛泽东说：

“哦，你可是一个‘富农’啰！”

一句话引得大家都笑起来了。

2月25日上午10点，毛泽东专列到达徐州。毛泽东对刘中等人说：

“你们是住在这里还是就回去，要回去，由铁道部武副部长给你们安排。”

刘中、李芸华便向毛泽东告辞，并说连夜回去。

毛泽东接见了徐州市委书记华诚一、副书记柳林。在听取了他们的工作汇报后，毛泽东说：

**“要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

在谈及工商业税收问题时，毛泽东说：

“要按照资本家的情况，实行多等多级。”

毛泽东在徐州还凭吊了淮海战役战场。

下午3时，专列离开徐州，途经济南，晚上，到达天津。

2月26日9时许，毛泽东在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天津市委负责人黄火青、吴德、李耕涛，以及市公安局局长万晓塘等陪同下驱车前往天津汽车制配厂视察。

毛泽东下车后，黄敬将天津七区区委书记、区长石国珍和汽车制配厂厂长李玉盛等一一向毛泽东介绍。毛泽东握着石国珍的手问：

“你到这个区多久了？年龄多大啦？”

石国珍回答说：

“我到这个区不到一年，现在29岁。”

毛泽东转问黄火青天津市的干部状况后，说：

“你们要注意多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做领导工作，做到后继有人。”

他握着李玉盛的手问：

“你担任厂长多久了，钻进去了吗？”

李玉盛回答说：

“我一进城就在这个厂工作，对工业这一行，正在钻。”

毛泽东笑着说：

“你回答得好，就要好好去钻。”

黄敬、黄火青、李玉盛等请毛泽东先休息一下，再看车间。毛泽东说：

“不休息，还是先看吧！”

他从生产毛坯的铸工车间开始，走遍了全厂8个车间。在视察过程中，他对原材料来源、生产各道工序、产品名称、产品用途等都问得很仔细，既听黄敬、李玉盛介绍情况，又不断和工人交谈，几次嘱咐：

“你们要积极生产，要注意安全。”

在一个多小时的视察中，毛泽东对黄敬、黄火青、吴德等人说：

“我们这些人都是农村来的，打仗、发动群众搞土改，还有些经验，现在我们夺取了大城市，解放了全中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依靠工人阶级发展生产，学会管理城市，学会领导生产，做好经济工作。不这样，我们就站不住脚，就会失败的。”

他指着黄敬说：

“你这个部长，学管理城市，钻研工业，是带了头的。”

毛泽东转身对黄火青、吴德、李耕涛等说：

“天津是个大城市，工商业仅次于上海，你们要在这个好的基础上，把天津工商业搞好。我们要依靠工人阶级，就要教育他们学文化、学技术、学政治，使他们真正成为我们发展生产、管理经济、治理国家的主人。”

视察结束后，厂内职工纷纷汇集到厂院，拥在毛泽东周围，高呼：

“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不断招手，向职工们致意。离开天津汽车制配厂，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天津，回到了北京，结束了建国后第二次长时间（历时12天）大范围（跨越冀豫鄂赣皖苏津7省市）的调查研究活动。

2月27日晚8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介绍了他此次调查研究的情况。他在讲话中特别提到了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地委负责人的谈话。他说：

“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了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10到15年走完了。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10年到15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水到渠成，防止急躁情绪。”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1时才结束。

欲知毛泽东如何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制定方针路线，且待下面慢慢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中山陵面对南京的工人、学生和附近的群众欢呼“毛主席万岁”之际，用他那湖南腔洪亮而又有力地喊出了：**“人民万岁！”**他兴奋地走入欢呼的人群中，热情地和向他伸过来的千百只手紧紧相握。离开了群众，犹自喃喃自语：**“这就是人民啊，他们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这就是毛泽东！一个真人真性情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第47章**

**“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它工作都**

**是围绕着农业生产而为它服务的。凡是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

**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

话说1953年3月1日，斯大林在他的住所得了脑溢血症，摔倒在地板上，失去了知觉。

据数十年后解密的档案说，正在开会的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等人得到斯大林患病的消息后，谁也没有说话，而是继续关起门来开了4个小时的会议，尔后才开始组织人员对斯大林救治。

3月3日、3月4日，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连续两天发布了斯大林的病情公报。

正在苏联治病的江青及时打电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前边已经说过，江青是在1952年去苏联治病的。她在1953年初的情况，苏联翻译卡尔图诺娃曾在《我给江青当翻译》一书中作了描述：江青的病情稍有好转，就在卡尔图诺娃的陪同下去看望在苏联长期养病的毛岸青。卡尔图诺娃回忆说：“在从医院回来的路上，江青却讲起了谢尔盖·远福在朝鲜牺牲的情况（讲到他时显得那么怀旧）。毛远福在大学时就是一个有为的青年，我甚至可以说他是有天才的，又是博览群书。”卡尔图诺娃书中所说的谢尔盖·远福，就是毛岸英。毛岸英的曾用名叫杨永福，毛岸青的曾用名叫杨永寿。卡尔图诺娃还写道：“1953年2月底3月初，根据部领导的要求，我每天都带着斯大林的病情报告上她那儿去。”关于此时江青的行踪，维克多也在《江青同志》一书中描述说：“在斯大林逝世的前一天，她被转移到郊区疗养院。”

3月4日下午，毛泽东亲自来到苏联驻华使馆，对斯大林的病情表示关切和慰问。

3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在罗瑞卿等2月23日关于各地布置反伞特斗争的情形给毛泽东、彭德怀和聂荣臻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

罗瑞卿等在反伞特斗争的报告中说：国内各地均于12月下旬及1、2月份举行了由公安部队召集的反伞特会议，以建立反伞特便衣武装据点为主要内容，全面布置了反伞特工作，包括设立据点、建立各级指挥机构、发动群众、组织民兵、派对空监视哨等。由于各地情况和部队任务不同，在反伞特布置上也各有特点。**目前各地应该迅速解决据点部队装备问题，争取早日建起据点，提高据点部队的业务，深入检查反伞特工作的执行情形，开展群众性的反伞特斗争，以彻底歼灭降落的伞特，粉碎敌人的阴谋。**

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彭副主席阅后，送罗瑞卿同志：

在北朝鲜境内亦应实行安置反伞特据点的办法，可将此件中所述办法电告联司，并请联司和人民军总部商量，**由志愿军和人民军分担，在北朝鲜境内各山头上安置多数据点，专任反伞特斗争，定期总结经验，加强斗争技术战术，灭尽一切伞特。**

毛泽东 3月4日

1953年3月5日晚9时50分，斯大林终因脑溢血症抢救无效，与世长辞。

维克多描述江青说：“负责江青病情的俄国警卫员、医生和护士说，他们的领袖之死至关重要，毛主席应和其它各国首脑一道来莫斯科参加葬礼。**江青告诉他们说，那不关她的事，这样重大的决定应由中共中央做出。**”

卡尔图诺娃描述江青说：“对于他的逝世，**她感到十分悲痛，并去过联盟大厦停放斯大林灵柩的大厅守灵。**”

3月5日晚，斯大林逝世的噩耗传到北京，**毛泽东热泪涌流，夜不成寐，数次服用安眠药也不能入睡。**

3月6日晨，中国人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齐越那低沉而充满悲痛感情的声音里，**听到了斯大林不幸逝世的消息，他们流下了热泪，许多人泣不成声。人们自发地在手臂上戴上了黑纱，为斯大林致哀。**

3月6日，毛泽东向全中国发布命令，命令要求：自3月7日至9日，全国下半旗为斯大林志哀。在志哀期间，全国各工矿、企业、部队、机关、学校及人民团体，一律停止宴会、娱乐活动。

3月6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发往苏联的唁电中写道：

“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我自己，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获悉了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和伟大的导师斯大林同志逝世的消息。这不仅是苏联人民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整个和平民主阵营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无可估量的损失。我现在谨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表示最沉痛的哀悼。……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斯大林同志30多年来不断的关怀、指导和支持，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同志和在他领导下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又给予了慷慨无私的援助。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国人民这样伟大的深厚的友谊，中国人民永远感念不忘。斯大林同志的不朽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毛泽东还亲自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吊唁斯大林。

到3月7日，毛泽东一连3天没有睡觉，2天没有吃饭。警卫们都很紧张，任何人都警惕着，不允许周围发生任何声响。这几天，毛泽东怀着对斯大林的深切悼念，写下了《最伟大的友谊》一文，全文如下：

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伟大的导师，不朽的列宁的战友——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同志与世长辞了。斯大林同志在理论的活动上和在实际的活动上所给予我们当代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斯大林同志代表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新时代**。他的活动引导苏联人民和各国劳动人民转移了全世界的局面，这就是正义的、人民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在世界大规模的范围内，在地球上人口三分之一——八万万人以上的范围内取得了胜利，而且这种胜利的影响，正日益普及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斯大林同志的逝世，使全世界的劳动人民感到了无可比拟的沉重的悲痛，激动着全世界的正义的人们的心。这就是表明，**斯大林同志的事业和他的思想掌握了全世界的广大人民群众，而且业已变成了无敌的力量，这种力量将引导那已取得胜利的人民由胜利进入新的胜利，同时也将引导那一切还在邪恶的资本主义旧世界压迫下呻吟的人们能够对于人民的敌人进行勇敢的冲击。**

在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同志指导苏联人民，把他和伟大的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期共同缔造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成了光明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这不只是苏联人民的胜利，而且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胜利。**第一、**这个胜利用最现实的生活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限正确，具体地教育了全世界劳动人民应该如何朝着美好的生活前进。**第二、这个胜利保证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能够有战胜法西斯野兽的力量。不能设想，没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能够有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关系全人类的命运的，而这些胜利的光荣应当归于我们伟大的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同志全面地划时代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推进到新的阶段。**斯大林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理论和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首先胜利的理论；**斯大林同志创造性地贡献了关于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理论！贡献了关于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理论，贡献了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的理论，贡献了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理论。斯大林同志还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斯大林同志这一切创造性的理论，进一步地把全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进一步地把全世界的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使世界的工人阶级和一切被压迫的人们为解放和幸福的斗争及其胜利达到空前未有的规模。

斯大林同志的一切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朽的文献。他所著的《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历史》以及**他最近的伟大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是百年来世界共产生义运动经验的综合**。他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是给世界各国共产党人的一篇宝贵的遗嘱。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世界各国共产党人一样，是从斯大林同志的伟大的著作中去找寻自己胜利的途径的。

从列宁逝世以来，斯大林同志一直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我们围绕着他，不断地向他请教，不断地从他的著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斯大林同志充满了对于东方被压迫人民的热情。“不要忘记东方”——这是斯大林同志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伟大号召。人们都知道：斯大林同志热爱中国人民，认为中国革命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他献出了崇高的智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是遵循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得到了伟大的苏维埃国家和各国一切革命力量的支持，而在几年以前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现在，我们失去了伟大的导师和最真挚的朋友——斯大林同志。这是多么的不幸呵！这个不幸所给予我们的悲痛，是不能够用言语来形容的。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悲痛化为力量。为着纪念我们伟大的导师斯大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的名义下的伟大友谊将无限地加强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将更加紧学习斯大林的学说，学习苏联的科学和技术，以建设我们的国家。

苏联共产党是列宁、斯大林亲手教养起来的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最有经验的和最有理论修养的党；这个党在过去和现在是我们的模范，在将来也还是我们的模范。**我们完全相信以马林科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是一定能够继承斯大林同志的遗志，而把伟大的共产生义事业推向前进，并且发扬光大的。**

毫无疑义，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将变得更加团结，更加强大。

30年来，斯大林同志的学说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榜样，推动了世界的大踏步前进。现在苏联巳达到这样的强大，中国人民革命已获得这样的伟大胜利，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建设已有这样的巨大成就，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压迫反侵略的运动已有这样的高涨，而我们的友谊和团结的阵线又是这样的巩固。所以，完全可以断言，对于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都是不怕的。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都将被我们所粉碎，一切卑鄙的挑拨都是完全没有用的。

伟大的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之所以是牢不可破的，因为我们的友谊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的原则而建立起来的。中苏两国人民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全世界各国一切爱好和平、民主及正义的人民之间的友谊，也正是建立在这样伟大的国际主义原则上，因此，也就是牢不可破的。

显然，我们这种友谊所产生的力量是无穷无尽和真正无敌的。

让一切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战争贩子们在我们伟大的友谊面前颤抖吧！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万岁！**

**伟大的斯大林的英名永垂不朽！**

3月8日，毛泽东派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

3月8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对各大区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并转农村工作部及行政委员会农林局党组：

**关于农业增产的五年计划数字和互助合作五年的发展计划数字以及1953年这两项的指标数字，各大区所已经提出者，现在看来都嫌过高。在农业增产方面，不能根据3年恢复时期中每年的增产率来计划今后5年的增产，因为发展时期的增产要比恢复时期困难得多。**证之苏联第1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农业增产的计划也不能订得太高。而且我国在第1个五年计划之内，基本上可以说没有机器投入农业，农业增产主要还是靠农民群众积极性与互助合作，靠兴修水利与若干新式农具和初步的技术改良。如果计划一开始就订得太高，完成不了，将大大伤害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因此，中央现正考虑将农业五年计划增产数字缩减到以1952年实产量为基数的30%。其中1953年的指标是增产约7%。**在互助合作方面，计划订高了，也势必发生急躁冒进，贪多贪大，盲目追求高级形式与强迫命令形式主义。目前无论在老区（如华北等地）或新区（如四川等地)，均已发生了“左”倾冒进的严重现象，如不立即有效制止，将招致生产的破坏。**因此，中央现正考虑将互助合作的发展计划，5年之内，组织起来的农户，老区控制在占农村总户数的80%左右，新区控制在70%左右。其中农业生产合作社老区平均控制在占农村总户数的45%左右，新区平均控制在12%左右；常年组新区控制在占农村总户数的30%左右。以上这两项数字都是初步拟出的平均数字，望各大区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把你们原定的数字加以压缩，提出新的计划数字，在3月20日以前报告中央，以便汇编新的计划。

　 中共中央 1953年3月8日

接着，毛泽东致信达赖喇嘛，他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达赖喇嘛先生：

饶西·彭措扎喜（即达赖喇嘛的姐夫，来京参观——笔者注）带来的你于1952年8月19日写给我的信及你的像片均已收到。你对祖国和中央人民政府所表示的亲爱，你为西藏僧俗人民谋求幸福生活、做好各方面工作的决心，使我感到很大的欣慰。在为祖国和西藏民族利益奋斗的道路上，你达赖喇嘛先生和班禅额尔德尼先生和西藏僧俗人民永远会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帮助。

自然，在建设祖国和为西藏民族谋福利的道路上，我们是会遇到一些困难的；帝国主义和反动破坏分子也会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成为我们前进的障碍。因此，**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国防，巩固汉藏民族之间和西藏内部的团结，严防帝国主义间谍特务和其他反动破坏分子的阴谋活动，并克服我们建设祖国和为西藏民族谋福利的道路上的障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西藏僧俗人民的幸福前途。你和西藏人民如果在这一方面遇到困难，中央人民政府会帮助你获得妥善的解决。

西藏的宗教和在国内其他地方的宗教一样，是已经受到尊重和保护，并且还将继续受到尊重和保护。**只要人民还相信宗教，宗教就不应当也不可能人为地去加以取消或破坏**。

张经武同志不只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他为西藏僧俗人民谋福利的决心和你是一致的。你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和他商议，他会尽力地帮助你。希望你多找机会和他面谈，如有需要直接告诉我的事情，亦可由他转达。

附送最近像片一张，以志纪念。

顺祝健康!

毛泽东 3月8日

3月9日，莫斯科为斯大林举行了追悼大会。维克多描述江青这一天的活动说：“举行斯大林葬礼那天，莫斯科的气温下降到零度以下。毛主席虽然没有来，但发来了唁电。在这紧张的情况下，她仍与疗养院的其他病人一道守夜。她从她的窗口看到了殡仪队伍走向红场路上排队行走的人群非常混乱，使她感到非常惊讶。她评论说：**斯大林的失败之一，是思想上没有为他死的那天准备群众队伍。**”

这一天，北京60多万军民也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斯大林追悼大会。毛泽东向斯大林遗像敬献了花圈，朱德致了悼词。

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全文如下：

**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为此，特作如下决定，以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党中央的请示报告制度和党中央对政府工作的直接领导。

一、**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得执行。政府各部门对于中央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及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须定期的和及时的向中央报告或请示，以便能取得中央经常的、直接的领导。**

首先，所有政府各部门向中央的报告，应严格区分请求批示或报告的两种性质，并须随时注意改进和提高报告的内容及改善报告的具体方法。**属于请示性质的，须严格遵守每一请示只限一个专题的原则，并须在报告中注明请求批示及请求何人或何机关批示。**如时间紧急者，亦应特别标明。**属于报告性质的，一律不要写“是否有当，请求指示”的字样，**中央对这一类的报告，一般地不需批示，但如发现其中有须予指示的问题，中央当另作指示。定期综合报告即属于这一类性质。即使在综合报告中涉及需要请示的问题，亦必须将该问题另作专题请示，不得混淆。定期综合报告，一般应每两周一次，某些部门经过中央批准得每月或每两月一次，报告必须有内容，要能说明工作中的大事情和带政策性的问题，力戒琐碎。文字以精练生动为好。某些重大问题或带专门性质的问题应向中央作专题报告，时间不限，字数亦不宜过长。

其次，政府各部门还可采取以下几种方式向中央反映情况：甲、编印定期或不定期的简报或情报，内容须经过选择和整理，以反映能够看得出问题的，特别是新的问题的材料为主。简报或情报宜短不宜长。乙、将会议所讨论的或所决定的重要事项，用最简明的文字记录出来上报。丙、经常有计划、有目的地反映某些带统计性质的、必要的数字资料。

再次，**所有政府各部门召开的专业会议，凡属性质重要而不是解决纯业务性或技术性质问题的专业会议，均应执行事先报告并经过中央批准始得召开的原则。在会议接近开始或接近结束时，应将所讨论的问题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内容向中央作一报告。如属有关全局的、政策性质重大的结论，则须提请中央批准，始得向到会人员宣布。在会议结束以后，应再向中央作一总结性的报告。**为了便于了解和考察各种会议情况，政务院各委和不属于各委的其他政府部门，可于每月月底将下月份准备召开专业会议的情况，列成简表报告中央。

此外，**今后政府各部门一切给中央的文件电报的上款，均须将主致者和并报者或转报者，分别写清，同时应注明已经抄送哪些人或哪些单位。**

二、为了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以及便于政府各部门中的党的领导人员能够有组织的、统一的领导其所在部门的党员，贯彻中央的各项政策、决议和指示的执行，今后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并应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因此，**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已无存在的必要，应即撤销**。但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现在的组织情况，并使同一系统的各个部门便于联系起见，政务院各委的党组组织，暂时仍应存在，直接受中央领导，并分管其所属的各部、会、院、署、行的党组；这些部门的党组，应仍称党组小组。凡不属于各委而直属于政务院的其他部门，如外交，民族、华侨、人事等部门的党组，则应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

三、今后政务院各委和不属于各委的其他政府部门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工作均应分别向中央直接请示报告。如属于两个部门以上而又不同隶于一委的事项，则经由政务院负责同志向中央请示报告。**如系主席直接交办的事项，应直接向主席请示报告。**

今后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直接提请政务院批示或办理的事项，除例行事务外，凡属涉及方针、政策、计划的事项，均应限于中央已经讨论和决定了的问题，或是中央已经批准的计划或批准的原则范围之内的问题。政务院负责同志如发现此类事项仍必须向中央请示报告，应即提向中央。至于纯属政府日常业务的工作，应仍按政府系统的办公手续处理。**如应向中央请示报告的事项而竟未向中央提出，则最后经手的政府负责同志应负主要的责任。**为了更好地作到现在政府工作中的各领导同志直接向中央负责，并加重其责任，特规定明确的分工如下：

**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财经工作，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其他不属于前述5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责。**

前述这些同志应就自己分工范围内，确定哪些事件应向中央报告请示，哪些事件应责成各部门负责进行，哪些事件应按政府系统报告请示，哪些事件可以自行处理，以及承办中央所交付的有关任务和有关工作。

四、**今后应将政府各部门工作有计划地提请中央讨论，以便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目前政府各部门应即着手这一准备。为了能使中央及早地对政府各部门工作了解全貌，并对各部门今年的工作均能予以指示，而又不致稽延时间过久，决定第一期讨论计划，得按照政府各部门的性质分别合并提出讨论，在每次提出讨论中并应有一定的重点。第一期讨论计划暂定为11次或12次，计：政法工作两次，财经工作4次或5次，文教工作两次，外交工作1次，监察、人事工作1次，侨务、民族工作1次。此期讨论可从3月开始，以批准各该部门的工作计划或其工作方针为主。待全部讨论完了以后，再根据情况和需要，拟定以后的讨论方案。在每次讨论以前，政府各主管部门必须先作认真的准备，于讨论前的一定时间至少5天以前，向中央预先提出书面报告，并供给中央各同志以必要的参考资料。

3月10日这一天，毛泽东再次致信达赖喇嘛，他在信中写道：

达赖喇嘛先生：

感谢你1952年8月16日及9月3日（藏历水龙年7月14日）的信和礼物。

西藏地方政府及人民，在你领导之下，协助人民解放军的入藏部队，加强团结，并争取协议的逐步实现，使我感到很大的欣慰。

你所派的致敬团和参观团代表都肯努力工作和学习，你的办事处已正式成立，办事处的人员也努力工作。

中央对西藏的政策除已明确地写在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者外，我在接见致敬团和参观团的代表时曾又简要地告诉过他们。这些简要的话，柳霞·土登塔巴已经在他对西藏的广播中谈到（见毛泽东在1952年10月8日接见柳霞· 土登塔巴时的谈话——笔者注），想你已经知道了。

建设新西藏所需要的帮助，凡属能够办到的，中央当尽可能地办到，但因交通阻隔，有些事情一时无法办到，只好等待以后再办。西藏致敬团和参观团的代表们在这里所提出的要求，中央人民政府就是本着以上这种精神处理的。兹不赘述。以后你和班禅额尔德尼需要中央帮助之处，均可告诉张代表或请张代表用电报转告我。

**祝你领导西藏地方政府和人民逐步地建设，使西藏日渐繁荣，西藏僧俗人民的生活日加改善，藏族的前途日加光明，祖国的边防日加巩固。**

并祝健康!

毛泽东 1953年3月10日

3月间，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少的事，就是江西省政府有关方面开始寻找贺怡为之丧命的毛泽东与贺子珍的亲生儿子毛毛。在众多的史料中，刘晓农的《寻找毛泽东儿子毛毛之始末》一文的叙述比较详细，其过程是这样的：

在1953年春光明媚的3月，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长邵式平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从北京拍来的加急电报，委托他寻找1934年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前夕一些党政军干部寄养在瑞金等地群众家里的子女。邵式平想起不久前居住在上海的贺子珍也曾给他写来亲笔信，说她在瑞金生下一个男孩，由毛泽东取名叫毛毛，长征之前通过毛泽覃、贺怡夫妇把毛毛寄养在群众家里，拜托邵省长千万千万帮助找到毛毛。

邵式平要秘书通知省民政厅厅长朱开铨立即到他办公室来。邵式平对这位瑞金籍的老红军招手说：“来，这边坐，交给你一个大的任务。”随后便如此这般说了一遍。朱开铨回到省民政厅，拿起电话通知优抚处的干部王家珍来见他。

王家珍是赣南信丰县人，1950年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斗了3年，1953年1月初转业到了省民政厅。他接受了朱开铨交代的任务，立马来到了瑞金县。他在叶坪乡听说朱坊村有个叫朱盛苔的农民当年收养过一个红军的孩子，据说孩子的父亲是一位红军的“佬子”，便找到朱盛苔及其妻子黄月英询问。他们说：“我们是收养过一个红军的孩子，叫朱道来，已经被一个中年妇女领到南京去了。”回忆起接收朱道来的情形，夫妇二人说“小家伙的脸型有些方正，额头很高，皮肤偏白，又红嫩得可爱。身上那件用灰布军装改做的薄袄衫，让人看得心里亲切生热。白军很快就要打到瑞金来，为防不测，合计给孩子取名‘道来’，意思为半道上捡来的。”

朱盛苔夫妇所说的将朱道来领到南京的中年妇女，名叫朱月倩，她是持了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的介绍信，找上朱盛苔的家门，说是前来接儿子的。朱月倩的丈夫叫霍步青，当年是中央派到中央苏区的巡视员，后任红军学校政治部宣传部长，1933年在福建省建宁县牺牲。朱月倩后来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几年后嫁给了国民党的一个飞行员。她见到朱道来后一口认定那是她的儿子，在朱盛苔夫妇面前又是哭又是求，硬是要把朱道来带到南京去。

王家珍问，朱月倩来接朱道来的时候带走了道来小时候用过的什么东西没有？黄月英说没有，她什么都不要，连道来那年被送来时的那件小袄衫都不要，说没有什么用，可我还给收着呢。黄月英从床枕旁拿来那件当年朱道来被送到朱家时穿过的小袄衫。王家珍接在手里看了，只见小袄衫虽然历时20多年，但保存得挺好，一看就知道是用旧军服改做的。

王家珍带着朱道来的照片回到瑞金后将在朱坊村朱盛苔家了解的情况做了汇报。朱开铨又报告给邵式平，邵式平将朱道来的照片送给贺子珍辨认，贺子珍看后说：“多么像年轻时的毛泽东呀！”邵式平马上向中组部做了汇报。中组部很快回电，同意王家珍与黄月英赴南京把朱道来接到上海贺子珍处予以辨认。王家珍、黄月英经过一番周折，将朱道来带到了上海。

此时已经是6月中旬了。上海警备区空防司令员贺敏学派人在上海火车站迎接到了王家珍、黄月英和朱道来。当朱道来站在了贺子珍面前时，贺子珍仔细端祥了许久，眼里溢出大滴大滴的泪水，颤抖着嗓音自语道：“是毛毛，这就是我的毛毛！”王家珍从黄月英的提包里拿出了那件小袄衫，郑重地交到她手上。贺子珍看了，再一次热泪滚落。这件20年前她在灯下千针万线缝制的小袄衫，忘记得了吗？真没想到，这件小袄衫还能保存到今天，这是证明自己亲生骨肉的最好的物件呀！贺敏学与夫人李立英看了朱道来后，都觉得这孩子很像毛泽东！接连几天，华东局的饶漱石来了，上海市委的陈毅、魏文伯等人也来了。他们见了朱道来，都与贺敏学有相同的感觉。

贺敏学为了防止出差错，提出带朱道来到医院体检验血。部队一家大医院化验的结果，朱道来的血型与贺子珍相同。半个多月后的一天，贺子珍接到华东局转告的中组部通知，要朱道来、黄月英、王家珍同去北京，贺子珍则不要去。

第二天的下午，朱道来3人被接到了北京大栅栏鲜鱼口的中组部招待所。周恩来、朱德、谢觉哉、董必武和邓颖超、康克清、帅孟奇（女，中组部干部处副处长）等都曾来招待所看望朱道来。大家在私下议论说，这个朱道来从长相来说的确像毛泽东。谁也没有想到，从南京赶过来的朱月倩在中组部招待所大哭大闹，坚持说朱道来是她的孩子，不许别人夺走，并扬言要自寻短见。周恩来将“南京妈妈”哭闹的事报告到毛泽东那里，请他做出裁决。此前，朱道来的照片经周恩来转到毛泽东手上，毛泽东仔细辨认后没有说肯定的意见，只是说：“这孩子很像年轻时的毛泽覃。”此时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汇报，说：

“不要说这件事了！管他是哪个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这样，朱道来便被送到了帅孟奇老人家里，由她负责教养。

至于朱道来后来的情况，《寻找毛泽东儿子毛毛之始末》一文则语焉不详。据其它历史资料介绍，朱道来是在1953年9月间到清华大学附中插班读书，1957年考上了清华大学，学的是理科，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国防科研单位工作。1971年11月，朱道来被医生诊断为“癌症晚期”，因医治无效，于12月病逝于南京。

朱盛苔和黄月英的儿子朱运生曾印证说：“记得文革时期的一年，朱道来回到过朱坊村，后来在南京娶了妻子，名叫芦虹，第二年生有一女，名叫继英。后来贺敏学打来电报说道来病故。从此就与他们失去了联系。”

而刘晓农则在《寻找毛泽东儿子毛毛之始末》结尾部分中说，“王家珍于1974年专程来到瑞金朱坊，向朱家打听朱道来的下落。黄月英凄惨而痛心地告诉他：1966年的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武斗已经开始，朱道来在南京被打死了！是被什么人打死？她无从得知。”这一说法，至今没有任何旁证。

再说3月14日，原第3野战军第21军军长吴泳湘，政委谢福林率第61师、第62师、第63师，由辽宁长甸河口入朝，隶属第20兵团。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后一支入朝部队。

3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批判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指示》。他写道：

中南局，河南省委，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西藏工委：

一、收到张执一同志1月30日关于访问河南少数民族的报告，并听取了马杰同志的汇报，中央认为中南行政委员会这次派访问团到河南访问，收到效果很好，政治影响很大，基本上安定了河南回民的情绪。但所发现的问题很严重，望河南省委对这些问题根据中央的民族政策认真地加以研究和处理，对大汉族主义思想应进行严肃的批评，并向干部和人民进行民族政策教育。处理经过和结果，须向中央提出报告。

二、河南民族关系如此不正常（除郑州等处），各省恐怕也有类似情形，故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负责同志，统战部及民族委员会（有民委的地方）的同志抽出时间一读张执一、马杰两同志的报告。此种情形，对于共产党人说来，是决不能容忍的，**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即是国民党思想，必须立刻着手改正这一方面的错误。**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都要仿照中南的办法，派出像张执一和马杰这样懂得民族政策对于仍然被压迫受痛苦的少数民族同胞怀抱着满腔同情心的同志，率领访问团，前往访问，认真调查研究，帮助当地党政组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是走马看花的访问。根据不少材料看来，中央认为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大都存在着尚未解决的问题，有些是很严重的问题。表面上看来平静无事，实际上问题很严重。例如，一年以前甘肃定西地委派人访问靖远县打拉池一个乡的回汉关系时所发现的问题，新疆在去年中央会议上和在全省党代表会议上所发现的问题，西康在最近省委会议上所发现的关于我们同志在凉山彝族工作中的问题，以及二三年来西北、西南、西藏、中南、华北、华东、东北各地所发现的问题，都证明大汉族主义几乎到处存在。如果我们现在不抓紧时机进行教育，坚决克服党内和人民中的大汉族主义，那是很危险的。**在许多地方的党内和人民中，在民族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的残余的问题，而是严重的大汉族主义的问题，即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着这些同志和人民而尚未获得马克思主义教育，尚未学好中央民族政策的问题，故须进行认真地教育，以期一步一步地解决这个问题。**

三、此件及两个附件请登党刊。另外，应**在报纸上根据事实，多写文章，进行公开的批判，教育党和人民。**

　 中共中央 1953年3月16日

3月1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布置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经济特点的指示》；

华东局，山东分局，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委：

山东聊城地委关于“高唐县区干部脱离群众行为”检查情况向山东分局的报告收悉。同意聊城地委的检讨和分局、华东局的意见。**最近各地均发现在农业生产工作中有许多突出的严重的强迫命令错误，这种错误屡纠屡犯，实有一重大原因，这就是党政机关在布置任务时对小农经济的私有性，分散性这些本质的特点认识不足，不予照顾。**高唐县在布置农业生产的技术改革和基本建设的时候，忽略了工作的对象是以家庭为单位的靠手工经营的小生产者，即使早拔棉柴是一件好事，是可行的，有利的，但是因为分散的小农经济状况下，这一村与那一村，这一户与那一户，这一块地与那一块地经营条件均有其差别性，勉强要求整齐划一，必为群众所难接受，又**因为土地是各自私有的，不是共有的集体农庄，每个农民对于生产技术的微小的改革都抱有一种不放心的看法而不敢轻易去试验，**试验不成即影响一年的生活，甚至有几年翻不过身来的危险。因此，**有利于群众的生产改革，未经群众自己亲身的体察与经验，就急于推广，结果势必形成强迫命令，而一有损失就引来农民怨恨，将好事变为坏事。**因此，**应教育广大干部，使他们深刻认识，在向农村布置任务时候在农村进行工作的时候，领导农业生产的时候，时刻记住并且照顾到小农经济的特点，多强调自下而上，集中群众要求，因地制宜，而不可强调自上而下布置任务，强求一致完成。**即使在互助合作组织普遍发达的农村，也要照顾这种分散的特点，因为目前的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还是小型的组织，并且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使用落后工具的。中国农村中各地原来都有一些比较进步而且行之有效的先进技术与耕作方法，各县区乡干部应着重于深入农民，发现这种先进技术与方法，把它总结与提高一步，并逐渐推广。**至于外来先进技术与耕作方法（包括改良种子），即使在当地是可行的有利的，也不能命令群众一下子执行，而应在县立国营农场先行试验，俟试验确实有效，再吸引群众参观，加以宣传教育，再行逐步推广，切不可将行之于集体农庄及生产合作社的办法，机械地用之于个体农民。这一个原则如不掌握好，则所有好事都会变成坏事。**

（此件可登党刊。）

中共中央 3月17日

3月19日，毛泽东就朝鲜战场谈判问题给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周恩来发去一封电报。

周恩来是在3月14日率中国代表团前往布拉格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捷共主席哥特瓦尔德的葬礼的。毛泽东在电文中写道：

“关于克拉克于2月22日要求双方先交换重伤病而能行走的俘虏问题，我方尚未答复。乔冠华根据你的意见已拟好一个采取驳斥态度的讲话稿，在我处压下来未发，等你回来商量后再办。美方此次要求可能是杜勒斯上台后的一种试探做法。我方对策有二：一种是驳斥；一种是表示可以商谈，在商谈中看情形决定最后对策。你在和苏联同志谈话时，请将此事提出询问他们的意见。”

3月1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地委和县委；中央各部门和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一、1952年12月西北局检查组关于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报告，写得很好。这个报告集中反映了我们党政组织有农村工作中一些严重的脱离农民群众损害农民及其积极分子的利益的问题，即所谓“五多”问题。**“五多”，就是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这些问题，很久就存在了，中央曾对其中有些问题有过指示，要求各级党委予以重视和解决，但是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其原因，是没有将整个问题系统地提出来，尤其重要的是没有在中央、大区、省（市）、专区和县这5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展开反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因为**区乡的“五多”，基本上不是从区乡生产的，而是从上面产生的，是因为在县以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所引起的，**有些则是过去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时期的产物，未加改变，遗留至今的。因此，**必须在1953年内，在执行中央1953年1月5日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着重地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并将那些过去需要而现在已不需要的制度和办法加以改变**，方能解决这个问题。今后各级领导机关在规定任务的问题上，在召集会议和调人集训的问题上，在发出公文表册和向下级要报告的问题上，在规定区乡组织形式的问题上，以及在使用乡村积极分子的问题上，都要由县以上党委和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按照实际可行的情况，加以适当的规定，有些则要由中央作出统一的规定。过去由各级党政民组织的许多工作部门，各自独立地向下级分派任务，随便召集下级人员和农村积极分子开会或训练，滥发公文表册和向下级或农村随便要报告等项不良制度和不良办法，必须坚决废止，而代之有领导的统一的和适合情况的制度和办法。至于在农村中每个乡存在着几十种委员会以及积极分子兼职太多，均属妨碍生产，脱离群众，也应坚决地但是有步骤地加以改变。

二、中央一级党政民组织有关各部门，中央分别责成中央组织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其所属财经、文教，政法3个委员会的主管同志负责，对于过去引起“五多”问题的各事项迅速加以清理，并规定适当的制度和办法，向中央作报告。

三、各大区和省市，由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及各该级行政机关主管同志负责，对于“五多”问题加以清理，规定自己的解决办法，并报告中央。为达此项目的，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仿照西北局的办法，派出一个专为了解“五多”问题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一二个区乡（在城市是检查一二个区街）的情况，以为解决问题的参考材料。

四、专区级和县级的“五多”问题，由省委负责指导解决之。

五、西北局检查组报告中关于解决“五多”问题的各项办法方面的建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各地可以试行。

六、**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它工作都是围绕着农业生产而为它服务的。凡是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目前我国的农业，基本上还是使用旧式工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这和苏联使用机器的集体化的农业，大不相同。因此，**我国在目前过渡时期，在农业方面，除国营农场外，还不可能施行统一的有计划的生产，不能对农民施以过多的干涉；还只能用价格政策以及必要和可行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去指导农业生产，并使之和工业相协调而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之中。**超过这种限度的所谓农业“计划”，所谓农村中的“任务”是必然行不通的，而且必然要引起农民的反对，使我党脱离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群众，这是非常危险的。所谓区乡工作中的“五多”问题，其中有很大的成份就是这种过多地干涉农民的表现（另一部分成份是因为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的需要而产生和遗留下来的），已经引起农民的不满，必须加以改变。即就广泛发展中的农业互助组和现在还不多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说，也只是几家在一起或几十家在一起的小型的组织，而且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大多数尚不固定，又是使用旧式农具的。因此，对于这些互助组和合作社，按照中央已有的决定给以积极地提倡和适当地指导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决不应当将它们混同于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决不应当施行过多的干涉。**我党现在在农村中的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许多同志将分散的经济混同于集体的经济，就是干涉过多。所谓“五多”问题，也就是部分地反映了这种错误思想。**

七、本指示和附在下面的西北局检查组的报告，请登党刊。

中共中央 1953年3月19日

3月19日晚，毛泽东在给陈云的批示中建议陈云使用擦澡健身法，他写道：

“每天用毛巾沾热水擦身，先热后冷，又冷又热，锻炼皮肤毛血管又收缩又扩张，每擦一次可经半小时，多至1小时，擦完全身发热。每天一次至两次，擦一二年可收大效，似可试试。毛泽东 用酒似不甚好。”

3月22日，毛泽东给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复了一份电报。

周恩来是在3月21日率中国代表团从布拉格返回到莫斯科的。是日晚，周恩来应苏共中央约请，与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马立克、库兹涅佐夫商谈朝鲜停战方案。会谈结束后，周恩来立即致电毛泽东说：

“苏方提议的中心思想，即是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解决方案，是利用克拉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据日内瓦公约109条，双方先行交换重伤病战俘，其不愿回者暂交中立国，并恢复板门店谈判解决具体问题。然后即由中朝双方当局分别发表声明，主张战俘按分类办法实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余则交由指定的中立国（如印度或其他国，视情况再定），保证其得到公正解决。苏联外长跟着发表赞助声明，然后苏联在联合国代表即作同样活动。”

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复电中写道：

“赞同苏方的提议。这实际上即是去年9月上旬我们向菲利波夫同志（即斯大林——笔者注）所提3个方案中的一个方案。后来因美国在板门店采取横蛮态度，这个方案未能提出。现在提出这个方案是适合时机的。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为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具体步骤待你回来酌处。”

3月23日，毛泽东致电代替李克农、乔冠华在朝鲜负有谈判领导责任的丁国钰，并告金日成、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丁国钰同志并告金彭：

1. 3月21日12时电悉。对方最近在板门店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挑衅和威胁的性质，因此应该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做必要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方这些行动的目的则显然是逼我谈有关停战的主题，实质上表示对方着急。**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亚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主动，**其建议交换伤病俘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弯的一个试探行动。**在分析对方行动时，必须注意问题的这两个侧面。**对于对方可能拒绝接受我方文件甚至拒绝召开联络官会议的情况，你们应就事论事，在会内外据理力争，予以痛斥，但不要逼对方正式表示是否要最后决裂，对方亦不会作此种表示。对于违反协议事件，过去我们采取不分轻重一事一抗的方针，本已有些被动。最近一星期内，如无重大事件，望不要向对方送抗议。**

二、关于克拉克2月22日建议先行交换可以行走的重伤病俘虏一事，我方准备同意讨论此事，复文尚须数日才能拟好，暂时不要向外边透露。

毛泽东 3月23日

欲知板门店谈判能否继续进行？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3年3月10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中说：“**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政府各部门对于中央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及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须定期地和及时地向中央报告或请示，以便能取得中央经常的、直接的领导。”**由此可以看出，他对“新税制”事件的严重关注程度。通观这一指示草案的全文，很明显，毛泽东的目的是要加强党内的民主集中制，避免“独立王国”的再次出现。为此，他在《指示》中对政务院的工作提出了种种限制和要求，“为了更好地作到现在政府工作中的各领导同志直接向中央负责，并加重其责任”，又在《指示》中“特规定明确的分工”（分权）。尽管如此，后来数十年间在党政部门中依然时不时地出现一些“独立王国”现象，这大概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历史规律吧！

**第48章**

“**现在是打社会主义之仗，要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

**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全国人民的总任务。**”

话说1953年3月24日，毛泽东给邓子恢发去《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的批语和4段修改文字，内容如下：

一

子恢同志：

指示和社论都看了，只改了几个字。互助合作决议，改了3处，请你看过后，派人送高岗、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等同志一阅（一天轮完），如果你及他们都同意，请叫廖鲁言同志将修改处抄正，再送报社发表。

互助合作决议修改处，陈伯达同志已看过。

毛泽东 3月24日

二

这个决议于1951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以草案形式发给各级党委试行，至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成为正式决议，并作了部分的修改。

三

中央估计了它们的两方面的性质，即私有的性质和合作的性质。初级互助组的组员，他们的生产资料是完全私有的，但也带了共同劳动的性质，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常年互助组则使这种萌芽生长起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其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农民有土地私有权和其它生产资料的私有权，农民得按入股的土地分配一定的收获量，并得按入股的工具及牲畜取得合理的代价这些条件来说，它保存着私有的性质。就其在农民以土地入股后得以统一使用土地，合理使用工具，共同劳动，实行计工取酬，按劳分红，并有某些公共的财产这些条件来说，它就比常年互助组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的因素**。

四

在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是农业生产工作，其它工作都是围绕农业生产工作而为它服务的。**任何妨碍农业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必须避免。**

五

（13）在解决了有关农业互助合作的许多问题之后，党中央认为必须重复地唤起各级党委和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和非党积极分子的注意，要充分地满腔热情地没有隔阂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必须承认他们的单干是合法的（为共同纲领和土地改革法所规定），不要讥笑他们，不要骂他们落后，更不允许采用威胁和限制的方法打击他们。**农业贷款必须合理的贷给互助合作组织和单干农民两方面，不应当只给互助合作组织贷款，而不给或少给单干农民方面贷款**。**在一个农村内，哪怕绝大多数农民都加入了互助组或合作社，单干农民只有极少数，也应采取尊重和团结这少数人的态度。**”

后来，上述二、三、四、五这几部分载于3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

3月28日，金日成、彭德怀复函克拉克，同意交换伤病战俘，并建议立即恢复谈判。

3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声明中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共同研究了‘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于1953年2月22日提出的关于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双方病伤战俘的建议之后，一致认为根据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109条的规定，这一问题完全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我们认为，解决全部战俘问题以保证停止朝鲜战争并缔结停战协定的时机，应当说是已经到来了。”

“在开城和板门店的谈判中，双方代表除对战俘一项问题外已对所有问题达成协议。”　　　　“现在‘联合国军’方面既然建议按照日内瓦公约第109条的规定，解决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病伤战俘问题，我们认为，随着病伤战俘问题的合理解决，只要双方都真正具有互相让步以促成朝鲜停战的诚意，全部战俘问题的顺利解决，是完全应当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

3月3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应当重视手工业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中央农村工作部，合作总社，中央财经各部门党组：

一、湖北省委注意到在目前维持手工业经济的必要，由湖北省政府召开了一次手工业者代表会议，很好。这是一种十分重要的会议，各省可在适当时间仿照湖北的办法召开一次。现将湖北省报告转去，供你们参考。

二、**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不可缺少的一种经济形式。一部分手工业已经为现代工业所代替，无法维持下去，衰落是无可避免的。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手工业，尚未为现代工业所代替，尚有存在价值和发展余地，是不应当衰落的。衰落了，不但将引起广大手工业者的生活问题，增加城市乡村的失业人口，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民的生产，并将波及商业市场，使之呆滞。因此，在农业使用手工工具时期尚未结束以前（这种结束要有几十年时间），对于手工业经济的维持，对于手工业者生产积极性的扶植，必须十分重视。不重视是要犯错误的。**

三、对于手工业中存在着的劳资、雇佣和师徒3种不同的关系划分不清，处理不当，对于组织联营和合作社，采取强迫命令等等，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手工业者的生产情绪，不敢大胆雇请工人、学徒，增加资本，扩大生产，这些均应加以注意，有步骤地分别加以解决。

四、在手工业中分类排队，分别确定各行业的维持，发展或转业的问题，避免盲目扶植的错误，这是对的。但对手工业者，也应如同对待小生产者的农民一样，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主要是靠价格政策，市场产销关系，辅以必要的可行的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教育指导他们，影响他们，慢慢引导他们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而不可任意地制定计划，强制他们发展哪一行或闭歇哪一行，增产多少或减产多少。我们只应当晓以利弊，由各行业自己协商，不要任意干涉，更不要随便试行无把握的政策。一切问题，均应从照顾他们利益出发，由他们自己协商，取得他们同意，照顾到主客观需要和可能条件去求解决。

五、由于农民目前的生产资料（如农具、肥料等）与生活资料（如布、手巾、鞋袜、烟等）60%至70%，有的竟至有80%左右是依靠城乡手工业品供应（即是说目前农村依靠近代工业供应的物资，只占农村需要量的40%至30%或20%左右），而农产品亦有很大部分作为手工业原料销售。因此，各地供销合作社，应着重与当地手工业者建立密切联系，订立合同，帮助他们供应原料，推销他们所生产的而又为供销合作社社员所需要的成品。县区合作社，应根据社员需要，自己开办手工作坊，以供应社员生产资料的需要（如烧石灰、铁匠炉、榨油等）。与手工业者结合，应成为供销合作社目前的主要工作之一。

六、党的农村工作部应将手工业工作，列为本身的一种业务，帮助党委掌握这方面的材料，并推动政府有关各部门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

　 　 中共中央 1953年3月31日

1953年4月3日至23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1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农村工作基本任务的指示：就是要用10年到1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在全国基本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会议按照毛泽东这一指示，重新安排了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计划，适当压缩了原来规定的老区和新区发展互助合作的速度。

4月5日，毛泽东在彭德怀3月30日关于铁道兵部队建制问题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

彭德怀在报告中说，关于铁道兵部队直属军委归参谋部管，不属铁道部建制的建议，待朝鲜战争结束可予同意。平时人数少，保存骨干进行技术训练，以备战时按需要扩大。

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朝战停后，11个师，须以大部修路，一部（骨干）可属参谋部管，进行技术训练，以备战时与主力合并，以应作战需要。恩来意见请注意。

毛泽东 4月5日

毛泽东在批语中所说的“恩来意见”，是指周恩来4月3日在彭德怀的报告上批的意见：“现在铁道兵团共有11个师，建制属铁道部，但供给托后勤代管。即使朝战停止，铁道部队在国内修路仍有极大作用，特别是内蒙、西北、东北修路更需要他们，因此，此事似应从长计议。”

4月20日，邓华在给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并告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

“这次恢复谈判，停下的可能虽比过去要大，但拖的可能还是存在的。即使敌人迫于整个形势不能不停，但真正停下来还需要相当时间。且敌人狡猾，想采用军事压力来配合谈判中的讹诈，多得一点东西；也想争取一点时间，完成某些战略措施。根据这一估计，**我们必须遵照毛泽东主席关于‘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做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的方针，加强各种准备，不能麻痹松懈。**要继续完成东、西海防工事，能随时粉碎敌人的任何登陆和进攻。同时，必须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以积极行动来配合谈判，目前个别战术反击仍应进行。现东、西海防工事4月底大致可以完成，而举行夏季反击，打击的重点尽量放在美国及其外国仆从军头上。**这次反击，口不宜张大，力求全歼，采取集小胜、多胜为大胜的方针。**反击时间预定6月初开始到7月上旬结束，一切准备工作必须于5月底完成，尔后视情况再定动作。”

4月23日，毛泽东在邓华4月20日关于在朝鲜战场举行夏季战役反击的几点意见给杨得志等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上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彭：

　　此件似可批准，使他们好作攻击准备。至于停战得早，或不要打以利谈判，可则于5月间适当时机再行决定。请酌办。

毛泽东 4月23日

4月25日，全国妇联第二届执委会第1次会议选举宋庆龄、何香凝为名誉主席，蔡畅为主席，邓颖超、李德全、许广平、史良、章蕴为副主席。

4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纠正“技术一边倒”口号提法错误的指示》：

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委及宣传部，并告中央各部委、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报社：

天津市委3月26日关于工程技术人员会议的报告中，提到“技术一边倒”的口号。这个报告已由中央转发各地。**“技术一边倒”的口号流行颇广，但是这个提法是不恰当的，应以“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来代替。**

**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并没有阶级和阵营的分别，技术本身是能够同样地为各个阶级和各种制度服务的**。在技术上并不存在不是倒向这边就一定倒向那边的问题。**我们提倡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是因为苏联的科学和技术在广大范围内已达到世界上最高的水平，是因为苏联的科学和技术的应用（例如厂矿和机器的设计）能够充分顾及社会主义国家财政经济的全面利益和工人的安全，同时也因为在世界上只有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才能无私地给我们以技术上的援助。**

**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并不排斥可以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中技术上某些好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而“技术一边倒”的口号的片面性和它的不能服人的地方，就在于它好像表示我们完全拒绝这种必要性似的。**

此外，有些地方批评技术人员的“单纯技术观点”的说法，也不明确，容易使人产生技术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可以不重视或应该不重视技术的感觉。在大规模建设时期，我们正是要提倡重视技术。斯大林说：“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这对我们今天正是适用的。我们所要批评的不是“技术观点”，而是那种“非政治的观点”。

现在流行的这一类不明确的口号还有不少。例如批评生产单位不重视基本建设为“单纯生产观点”，批评完成任务不重视方法为“单纯任务观点”等。（本来应当说：“不要只重视生产而忽视基本建设”、“完成任务必须掌握政策和注意方法”等）这些口号的害处是使有不知其究竟意义何在，因而很容易从一个偏向转到另一个偏向。

**领导者应当善于找出正确的定型的言语来表达一定的思想，至少不要在领导性的工作中随意造出不正确不明确的言语。**此点望在干部中和报纸上加以宣传。

　 中共中央 1953年4月26日

195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批发了一个通知，专门规定：在庆祝集会的会场上可以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的像，但不要挂成一排，可以挂成两排。在游行队伍中，领袖的像也要有顺序。第1排自左至右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第2排为毛泽东、孙中山；第3排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以下为各国的领袖。

毛泽东一直坚持过去提出的原则：他与马恩列斯是学生与先生的关系，他不能与他们并列，而是与孙中山平列。

1953年5月2日，毛泽东就堂弟毛泽荣寄来家乡的茶叶、火焙鱼等土特产、要求进京相会一事，给毛泽荣写了一封回信，请人带回韶山。他在信封上写着：带交 毛泽荣先生 毛寄，使用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信封。毛泽东在这封复信中写道：

泽荣贤弟：

4月9日给我的信及馈赠食品，均已收到，谢谢你。因你眼睛有病，路上行动恐怕不方便罢，似乎不必来京看我。你有困难，可以相告，替你设法解决。

此复。祝你身体健康！

毛泽东 1953年5月2日

毛泽荣看到这封信时真生气了，对人大发脾气，他说：“我是谁呀，我是你五弟啊！你可以同意一批又一批的乡亲去北京，去你的金銮殿里作客，为什么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我的要求呢？你是嫌我没有文化吧？你是怕我到京城里丢你的面子吧？”

自此之后，毛泽荣的情绪非常低沉。可能是有人将这情况告诉了毛泽东，这年冬天，毛泽东终于同意让毛泽荣去北京了。毛泽荣喜出望外，高兴地说：“三哥还是心里没有忘记我啊！”在北京，他见到了久别的毛泽东。一日，毛泽东在饭后约他出去散步。毛泽荣很高兴，准备借机要求主席三哥找个工作，当个小官什么的。谁知他还没开口，毛泽东就说：

“**泽荣啊，你今后有什么困难，不要动不动就来找我，要靠当地政府解决。而且也要根据实际情况，政府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就莫扳蛮。你是我的亲属，我必须严格要求，谁叫你是我的亲属呢？”**

毛泽荣听着，久久没有说话，脸涨得通红。之后，他还是回到了韶山，继续当他的农民。直到过了好几年，他发现共产党办事真的和国民党不一样，心中的气这才消了。

再说5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华东局《关于一九五三年工业生产工作提纲》及《关于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厂矿生产改革经验的综合报告》的批示：

华东局并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并中央各工业部门党组：

现将华东局《关于一九五三年工业生产工作提纲》及《关于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厂矿生产改革经验的综合报告》转发你们参考。

一、华东局在1953年工业生产工作提纲中提出：1、坚决贯彻重点建设、重点发展的方针，充分利用现有企业的基础和设备，发掘潜在力量，为国家积累资金，培养技术和管理人材，以支援国家建设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2、抓紧工业生产的计划工作并全面的保证完成计划。3、大力加强对基本建设的领导，继续派遣干部，加强基本建设的领导机构，加紧勘察设计，积极组织施工，作好材料准备与运输工作。中央认为这些都是正确的。

二、在国营、地方国营企业中进行生产改革时，应根据不同的厂矿不同的情况，发动群众，主要作好计划管理，建立与健全各种责任制度，充分发掘企业潜在力量，均衡地完成与超过国家计划，并保证产品的质量。各地党委必须认识：**企业计划管理工作的薄弱，各种责任制度未能建立或很不健全，正是目前许多厂矿管理工作落后及产品质量低劣的重要原因之一，此点应引起各地党委与所有工业行政部门的极大注意。**

三、私营企业的各项改革应与国营企业有所不同。目前各地党委应指导当地财委及工商管理机关，作好对私营企业的调查登记与管理工作。对于那些制造生产资料的较大的私营企业（例如上海的私营机器制造业），尤应调查了解其全部生产能力及生产特点，并将调查材料报送大区财委与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便按照国家需要组织其生产，使之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

四、目前各地基本建设工程已先后进入施工阶段，主要的任务是保证工程质量、按期完成施工计划。对隐藏在基本建设工人中的某些反革命分子，除随时注意侦察与防范外（进行破坏活动者应即时处理），在施工紧张阶段不宜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忠诚老实、自觉交代”的运动，这一工作，可推迟到今冬整训时进行。

　 中央 5月7日

5月13日，中朝军队为实现毛泽东提出的“消灭敌人，配合谈判”的方针，提前发起了强大的夏季反击作战，重点打击李承晚伪军部队。

李承晚曾在4月24日转告艾森豪威尔说：如果达成允许志愿军继续留在鸭绿江以南的任何协议，他就将宣布南朝鲜军队退出“联合国军”，在必要时继续单方面作战。

5月15日，毛泽东给黄炎培送去了有关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两个材料，并给他写信说：

“私营问题的中心，和公营一样，是民主改革与增产节约。这个问题解决了，劳资关系等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

5月19日，毛泽东先后写了两个“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他写道：

一 “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否则无效”4个字下面均加有着重点——笔者注）。请注意。”

二 “（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8月1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5月5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二）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

据戚本禹说，他曾经问过江青，毛泽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刘少奇不满意的。关于这个问题，他在回忆江青的文章中是这样写的：建国初期，江青见毛泽东常常不高兴，便“问了主席，主席才跟她说，我从陕北来到河北，看见刘少奇代理中央期间，有些事情简直是胡作非为，搞土改，不经中央同意，不经我的同意，就乱发指令。什么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搬石头，整干部，打倒一大片，推行一些过左的政策，搞得农村很不安宁。连康生都听他的，也在搞过左。所以前方在打胜仗，后方却乱起来了。主席路过山西，作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批评了这种过左的倾向。主席说，他们发什么文件也不经过我。甚至提省一级的干部都不经过我批准。把在中央工作委员会时的工作习惯一直带到了北京。江青当时还跟我说，后来关于这件事中央还发了文件的。”

5月24日，毛泽东在萧克关于军委例会通过的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第3个草案的报告上批示说：

“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

5月27日下午，毛泽东致信彭德怀、黄克诚，他写道 ：

彭德怀同志，并黄克诚同志：

在中央会议中，每月或每两月，应有一次军委的议程。例如早几天克诚同志要和我谈的后勤会议的情况，即可向中央会议作一次报告，其办法是用文字简明地写出来，交杨尚昆同志印发各同志，列入议程，开会时由黄再作简单说明。其他各部门重要事项，准此类推。如同意，请照办。

毛泽东 5月27日

1953年6月5日，毛泽东要杨尚昆将有关新税制的5个文件印发给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与会者。他还给这5个文件加了一个总题目：“1953年1月至2月间关于新税制问题的几个文件。”

这5个文件是：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等人关于新税制的电报；北京市委关于新税制的反映；毛泽东给周恩来等人的信；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薄一波的回信；财政部副部长吴波等关于新旧税制的利弊及物价波动原因的报告。

6月6日，艾森豪威尔致信李承晚，敦促他接受停战协议，并提醒他说，武力统一朝鲜，只是一个“梦想”。

6月8日，朝鲜停战谈判拖延了将近1年半的战俘问题，终于达成协议，基本实现了朝中方面关于遣返战俘的提案。

6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各大区、各省市委和财委的负责人，加上列席会议的，共有163人。

这次财经工作会议主要议程有3项：一是财政问题；二是“一五”计划的问题；三是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后来，这个会议一直延续到8月13日才结束，整整开了两个月。

整个会议由周恩来、高岗主持，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进行。

高岗其人，身材高大，梳一个大背头，浓眉毛，高鼻梁，戴一副近视眼镜，目光闪烁。因他白皙的面皮上有一些浅色麻子，故人们在背地里称他为“高大麻子”。此人颇有工作能力，遇事敢决敢断，在东北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做出了一些成绩，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他还很受斯大林与赫鲁晓夫的欣赏。在1952年8月以后，高岗与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5人先后调入北京，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高岗同时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地位显赫，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

6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李维汉所作的《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报告。

早在4月份，李维汉根据毛泽东3月间强调用国家资本主义来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的设想，组织了包括国家计委和工商管理局参加的调查组，对武汉、南京、上海等几个城市资本主义企业公私关系进行了调查。5月间，他在调查报告《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中，提出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办法是改造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最适当的方式，并提出了进一步做好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团结、教育、改造”工作的具体方针政策。

毛泽东对这个报告非常重视，经他修改后，改名为《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他还亲自打电话告诉李维汉说：

“这个报告将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

毛泽东为6月15日这次会议准备了一个讲话提纲，就写在《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未定稿）的封面上。他写的是：

“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

有所不同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发展生产、经济繁荣，前者管着后者。

几点错误观点：1、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2、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3、确保私有财产。

党的任务是在10年至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

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1、农业；2、手工业；3、资本主义企业。逐步。

对于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成份是可以逐年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以教育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首次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他说：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他解释说：

“考虑来考虑去，讲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比较合适。根据几年来的经验，大概10年到15年是一定需要的。

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现在基本建设、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都有急躁情绪，比如急于要多搞合作社，‘五反’后对资本家进攻没有停止，使工人阶级自己处于进退两难地位。**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

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等人的3种观点：**一种观点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句话原是写在周恩来1953年2月4日向全国政协一届4次会议的报告稿上的，原话是：“以上这些成就，说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毛泽东在审阅时删去了这句话。他在这次会议上说：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是变动很剧烈很深刻的时期。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阶级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要在10年到15年使资本主义绝种。‘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另一种观点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毛泽东说：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15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第3种观点是“确保私有财产”。**毛泽东说：

“‘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

毛泽东还系统地论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实质和步骤。他说：

“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1、农业；2、手工业；3、资本主义企业。”

“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所谓逐步者，共分15年，一年又有12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

政治局扩大会议责成李维汉，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对他提交的报告加以补充和修改，然后提交全国财经会议进一步讨论。

6月15日下午，李维汉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要求，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报告，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

6月15日这一天，朝鲜停战谈判的各项议程全部达成协议。

中朝军队为了保证停战协定顺利签字，于15日19时发布命令说：

“从6月16日起，各部队一律停止主动向敌人攻击，但对敌人对我发动的任何进攻，则应坚决地给以打击。”

此前，中朝军队在强大的夏季反击作战第二阶段攻势中，歼灭敌军41000多人，几乎是第一阶段战绩的10倍。在这一阶段作战中，第20兵团代司令员郑维山、副司令员张祖谅曾经指挥3500多名步兵，几百门大炮，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潜伏长达20多小时，这不能不说是中外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战斗打响后，志愿军潜伏部队如同从天而降，仅用1小时零10分钟，就歼灭敌人1个团的大部，并占领全部预定目标。为此，第20兵团受到志愿军、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的通报嘉奖。

6月16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接见了从朝鲜战场归来的上甘岭前线指挥员、志愿军第15军军长秦基伟。秦基伟这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与秦基伟热情地握手后，请他坐在自己的身旁。

“我们过去没有见过面，你在太行当过司令？”毛泽东点上一支烟，微笑着对秦基伟说：“你们在上甘岭打得不错呀！”

秦基伟谦虚地说：

“主席领导得好。”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问：

“美国佬好对付吗？你在朝鲜呆了３年，有什么经验教训呀！”

秦基伟回答说：

“刚入朝时，对敌人规律摸不着，有点生疏。后来和敌人交了几次锋，就感到美国佬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并不可怕。美国佬有两个长处：装备好，有制空权；但有3条缺点：一怕夜战，二怕近战，三怕死。”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说：

**“张牙舞爪到处要吃人的大老虎，也被你们战胜了，可见它是一个纸老虎。**”

秦基伟说：

“通过和美国佬作战，再次证明主席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是十分正确的。美国佬死要面子，老怕人说它是纸老虎。他们说，共产党将从三八线停战中获得宣传的胜利，这个停战将使他们能够把美国说成是一个纸老虎。”

毛泽东说：

“他们也是一个铁老虎，钢老虎。他们凭着钢铁多，凭装备优势，貌似强大，内里空虚。钢铁多，气不足。我们凭指战员的智慧和勇敢，凭正义，凭一股气，一鼓作气打败他们。**战争规律，从来如此，劣势装备可以战胜优势装备。美国南北战争时候，北美的装备比南美差，也是北美打败南美嘛！**”

他扳着手指继续说：

“自美国1776年独立以后，打了８次大的战争，其中有３次发生在20世纪。它在第1次世界大战、第2次世界大战……在几次战争中，都是自己占便宜，朝鲜战争是美军在世界上第一次打败仗。吃了亏。”

秦基伟说：

“我们开始没想到，敌人会在上甘岭投入这么大的兵力，敌人也没想到投入这么大的兵力也没能拿下上甘岭。范佛里特开始计划使用两个营的兵力，用5天时间，伤亡200人，就可以拿下上甘岭。”

毛泽东说：

“牛好吹，戏难唱呦！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时，不是吹要在圣诞节前饮马鸭绿江，让美国士兵回国吗？南朝鲜李承晚他们也说‘战争一旦爆发，便立即占领平壤，在短时间内统一北方全境’。日本鬼子发动侵华战争，吹嘘３个月可以灭亡中华民族，结果呢？蒋介石打内战，陈诚也吹过牛，说什么‘在军事上对付中共，３至５个月便能解决问题’，结果还是打输了。”

6月16日这一天，李承晚就艾森豪威尔6月6日对他的劝告，复函给艾森豪威尔，拒绝接受停战协议。

6月18日晚，李承晚强行将27000余名朝鲜人民军战俘劫往南朝鲜军队训练中心，公然破坏协议，引起世界公愤。次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言人对媒体宣称：这是一件“很遗憾而极其令人反对的事情。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下议院宣读英国致李承晚政府的抗议照会：“女王政府强烈谴责这种……背叛行为。”

艾森豪威尔也通过美国国务院发给李承晚一份急电说：“你目前的命令和根据这个命令所采取的行动……给联合国军司令部造成困境。这种局面如果继续下去，只会牺牲联合国精锐部队用鲜血和勇敢为朝鲜赢得的一切。”

6月19日，彭德怀离开北京，前往朝鲜。他与金日成致函克拉克，要求他立即全部追回被李承晚强迫扣留的朝中被俘人员，并且强硬地质问：究竟联合国军司令部能否控制南朝鲜的政府和军队？如果不能，那么朝鲜停战究竟包不包括李承晚集团在内？如果不包括李承晚集团在内，则停战协定在南朝鲜的实施有何保障？

6月20日晚，彭德怀在平壤致电毛泽东，建议说：

“根据目前情况，停战签字须推迟至月底似较有利，为加深敌人内部矛盾，拟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再歼灭伪军15000人。”

6月21日，毛泽东复电给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彭德怀同志：

6月20日22时电悉。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毛泽东 6月21日

据此，中朝军队积极准备发起规模空前的金城战役，集中力量打击南朝鲜军队。

6月29日，美军总司令克拉克在给金日成和彭德怀的复信中，承认李承晚的行为是一个“严重事件”，并一再保证：联合国军总部以及有关政府当努力获得李承晚集团合作，“遇有必要之处，联合国军将尽其所能建立军事上的防范措施，以保证停战条款将被遵守”。

6月30日，毛泽东接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2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他在谈话中说：

“青年团对党闹独立性的问题早已过去了。现在的问题是缺乏团的独立工作，而不是闹独立性。

青年团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但在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当中，要有自己的独立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952年我同团中央的同志谈话，出了两个题目要团中央研究，一个是党如何领导团的工作，一个是团如何做工作。两个题目，都包含了如何照顾青年的特点。各地方党委反映，对青年团的工作是满意的，满意就在配合了党的中心工作。现在要来个不满意，就是说青年团的工作还没有适合青年的特点，搞些独立的活动。**党和团的领导机关，都要学会领导团的工作，善于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照顾青年特点，组织和教育广大青年群众。**

青年团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方面的革命工作，做出了很大成绩。无论工厂、农村、军队、学校的革命事业，没有青年就不能胜利。中国青年是很有纪律的，他们完成了党所交给的各项任务。现在朝鲜议和，土地改革结束，国内工作的重点正在转到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就要学习。青年团要学会领导青年，和成年人一道，在农村把农业搞好，在城市把工业搞好，在学校把学习搞好，在机关把工作做好，在军队把国防军练好，成为现代化军队。

14岁到25岁的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青年比成年人更需要学习，要学会成年人已经学会了的许多东西。但是，他们的学习和工作的负担都不能过重。**尤其是14岁到18岁的青年，劳动强度不能同成年人一样。青年人就是要多玩一点，要多娱乐一点，要跳跳蹦蹦。**不然他们就不高兴。以后还要恋爱、结婚。这些都和成年人不同。

**我给青年们讲几句话：一、祝贺他们身体好；二、祝贺他们学习好；三、祝贺他们工作好。**

**我提议，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现在是8小时，实际上只有六、七小时，普遍感到睡不够。因为知识青年容易神经衰弱，他们往往睡不着，醒不来。一定要规定9小时睡眠时间。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强迫执行。青年们要睡好，教师也要睡足。**

**革命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带来一个坏处，就是大家太积极太热心了，以致过于疲劳。现在要保证大家身体好，保证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干部都要身体好**。当然，身体好并不一定学习好，学习要有一些办法。

**现在初中学生上课的时间也多了一些，可以考虑适当减少。积极分子开会太多，也应当减少。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娱乐、休息、睡眠，这两方面要充分兼顾。**工农兵青年们，是在工作中学习，工作学习和娱乐休息睡眠两方面也要充分兼顾。

两头都要抓紧，学习工作要抓紧，睡眠休息娱乐也要抓紧。过去只抓紧了一头，另一头抓不紧或者没有抓。现在要搞些娱乐，要有时间，有设备，这一头也要来个抓紧。党中央已经决定减少会议次数和学习时间，你们要监督执行。有什么人不执行，就要质问他们。

**总之，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有些领导同志只要青年工作，不照顾青年的身体，你们就用这句话顶他们一下。理由很充分，就是为了保护青年一代更好的成长。我们这一代吃了亏，大人不照顾孩子。大人吃饭有桌子，小人没有。**娃娃在家里没有发言权，哭了就是一巴掌。**现在新中国要把方针改一改，要为青少年设想。

**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团中央委员尽选年龄大的，年轻的太少，这行吗？自然不能统统按年龄，还要按能力。团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名单，30岁以下的原来只有9个，现在经过党中央讨论，增加到60几个，也只占四分之一多一点。30岁以上的还占差不多四分之三，有的同志还说少了。我说不少。60几个青年人是否都十分称职，有的同志说没有把握。要充分相信青年人，绝大多数是会胜任的。个别人可能不称职，也不用怕，以后可以改选掉。这样做，基本方向是不会错的。青年人不比我们弱。老年人有经验，当然强，但生理机能在逐渐退化，眼睛耳朵不那么灵了，手脚也不如青年敏捷。这是自然规律。要说服那些不赞成的同志。

青年团要照顾青年的特点，要有自己的系统的工作，同时又要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并不是什么新发明，老早就有了的，马克思主义历来就是这么讲的。这是从实际出发。青年就是青年，不然，何必要搞青年团呢？青年人和成年人不同，女青年和男青年也不同，不照顾这些特点，就会脱离群众。你们现在有900万团员，如果不注意青年的特点，也许就只有100万拥护你们，800万不拥护你们。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多数，同时注意先进青年。这样，可能有些先进分子不过瘾，他们要求对全体团员都严一些。这就不那么适当，要说服他们。团章草案规定的义务多了，权利少了，要放宽一点，使多数人能跟上去。重点要放在多数，不要只看到少数。

你们的团章草案规定，4个月不参加组织生活就算自动脱团，这太严了。党章还规定6个月，你们也规定6个月不行吗？办不到的事，或者只有100万人能办到，800万人办不到的，都不要在团章上规定。原则性要灵活执行。应当是那样，实际是这样，中间有个距离。有些法律条文要真正实行，也还得几年。比如婚姻法的许多新文，是带着纲领性的，要彻底实行至少要3个五年计划。“不要背后乱讲”这一条，原则上是对的，但是不必写在团章上。反对自由主义是长期的，党内自由主义也还不少。不准人家在背后骂一句话，事实上办不到。不要把框子搞得太小，主要是敌我界限要分明。

**威信是逐渐建立的。过去军队里面有人编歌谣骂人，我们不禁也不查，军队还是没有垮。我们只抓住一些大的，比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队伍就慢慢上了轨道。群众对领导者真正佩服，要靠在革命实践中了解。**真正了解，才能相信。现在团中央威信已经相当高。有些人还不佩服，慢慢会佩服的。小伙子刚上台，威信不高，不要着急，不受点批评不挨点骂是不可能的。有“小广播”，是因为“大广播”不发达。只要民主生活充分，当面揭了疮疤，让人家“小广播”，他还会说没时间，要休息了。但是问题总是会有的，不要以为一下都能解决，今天有，将来还会有。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要经过3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3个五年计划就是15年。1年一小步，5年一大步，3个大步就差不多了。基本上完成，不等于全部完成。讲基本上完成，是谨慎的讲法，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谨慎一点好。

中国农业现在大部分是个体经济，要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要坚持自愿原则。不去发展，就会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右倾。搞猛了也不行，那是“左”倾。**要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我们历来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也不打只有准备但无把握之仗。过去打蒋介石，开始有些人犯主观主义错误，后来经过整风，反掉了主观主义，就打了胜仗。**现在是打社会主义之仗，要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全国人民的总任务。**青年团如何执行这个总任务，你们应当按照青年的特点，作出适当的规定。”

6月间，毛泽东已经察觉了高岗的反党阴谋，他认为，刘少奇在工作中的错误，还没有形成方针、路线性的错误，而只是一种思想认识问题，此时高岗要取而代之，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所以，毛泽东在与罗瑞卿的谈话中问道：

“我退到二线怎么样？第一线由谁来主持？”

原来，毛泽东早已提出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工作分工要分一线二线的问题。罗瑞卿见毛泽东重提这个问题，就回答说：

“主席退居二线，当然是少奇同志来主持。不过……”

毛泽东没等罗瑞卿说完，就说：

“你鼻子不灵，嗅觉不灵。世界上的人睡觉，有些人睡在床上，有些人睡在鼓里。我看你就睡在鼓里。你知道有人搞阴谋、在北京组织地下司令部吗？你们说拥护我这个旗帜，为什么听到一些话，不问问旗帜这些话是真是假呢？

这个组织地下司令部的人就是高岗。你以为他拥护林彪吗？这时候林彪没有了。他要在我退居二线时，当党的副主席。这个人欺骗了一些干部，要把这些干部夺回来。”

1953年夏，毛泽东的孩子们都放了暑假，回到了他的身边。毛泽东把王鹤滨叫到他的办公室，说：

“王医生，我很忙，抽不出时间来陪孩子们玩玩，请你带他们到北戴河去度暑假。”

毛泽东一边审阅着文件，一边说。他没听到王鹤滨的反应，可能是有些迟疑，就把文件放在左手边的桌子上，把头转向右侧，面对着王鹤滨说：

“我身体很好，不会出什么事，你能带孩子们去玩，就是对我很大的帮助了。”

王鹤滨这才高兴地接受了任务。

第二天，王鹤滨与罗光禄带领李云霞老太太，她的儿子王博文，毛岸英的夫人刘思齐，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还有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叶子龙的两个女儿燕燕和丽娅，去了北戴河。

王鹤滨作为保健医生，认为毛泽东吸烟是一种不良嗜好，他向毛泽东的儿女们讲述了吸烟的种种危害，大家决定仿照毛泽东发动群众运动的样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问题。

后来，他们回到北京后，向毛泽东发动了一次促使他戒烟的“运动”。参加的有医务人员、全体卫士、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有时叶子龙的两位千金也来助威。尤其是李敏、李讷、燕燕和丽娅这4位女娃兵，执行任务坚决、果断，她们可以从毛泽东的口中把烟卷拔出来，使他少吸几口，或者把糖块塞进毛泽东的嘴里，代替吸烟。这些，医生、护士、卫士都做不到。遇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只好笑着任凭女孩儿们摆布。

医务人员和卫士们还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把一支香烟截为两段，每次只点燃半支香烟，毛泽东欣然接受并坚持了下来。

毛泽东对吸烟的危害是清楚的，从思想上和行动上也愿意把烟戒掉，所以，他也同意医务人员、卫士和孩子们采取的戒烟措施，在他的衣袋里放瓜子、糖块，每当想吸烟时，就以嗑瓜子、含糖块代替。经过一段时间的戒烟实践，毛泽东对王鹤滨说：

“烟，我吸进去的并不多，大半是在手中燃烧掉的，没有香烟在手，或吸上几口，在思考问题时，觉得缺少点什么，有了香烟在手，就好像补充了这个不足。”

这是毛泽东的肺腑之言，用瓜子和糖块来戒烟的手段终于失败了。

1953年7月7日，毛泽东给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的校长符定一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符定一为再版他30余年苦心孤诣编著的400余万字的《联绵字典》，写信要毛泽东为其题词。毛泽东在给符定一的复信中写道：

宇澄先生：

今日收到惠书，说尊著《联绵字典》再版嘱为题词事。我对尊著未曾研究，因此不可能发表意见。所谓“秦皇汉武之业”，大概是先生听错了。先生是著作家，似不宜与古代封建帝王的事业作类比。方命之处，尚祈鉴谅为荷。

毛泽东 1953年7月7日

后来《联绵字典》于在1954年2月再版时，毛泽东为其题写了书名。

7月9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一个文件上作了批示，对“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即“国家资本主义”作了详细阐述。他写道：

“**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的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

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召开了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的座谈会。他说：

“国家资本主义对我们已经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

毛泽东要求中央财经各部门、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都要讨论这个问题。他还说：

“资产阶级不走国家资本主义，没有路走，大势所趋，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不走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别的路，因为我们根本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且需要它。”“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条件已经成熟了，资产阶级完全孤立起来了。”“**实行改造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变私营企业为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使其由国家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

毛泽东的重要指示，使全党进一步明确了国家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最适当的形式。

此时的高岗等人，看到财经会议在分组讨论中对新税制意见比较多，就鼓动一些与会者对薄一波进行不适当的责难，这与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战略部署大相径庭。毛泽东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对周恩来说，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好让大家把话摆在桌面上来说，解决问题。

欲知围绕新税制的斗争如何发酵，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3年5月19日写的“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以及在6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不指名地对刘少奇3种错误观点的批评，是在建国后继新税制事件之后对脱离党的领导、不经过党的会议讨论而乱发文件、乱发议论、企图在路线问题上标新立异的“独立王国”现象的又一次斗争。这一系列斗争竟然使高岗萌生了非分之想，假借新税制问题向刘少奇发难。他哪里想到，由此又使新税制的决策者周恩来十分难堪。于是乎，党内的一场大争斗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了！

**第49章**

**“要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地变私人资本主义为国家**

**资本主义，大体上要用3年到5年的时间完成。”**

话说1953年 7月10日，陈赓向毛泽东汇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筹建情况，毛泽东即请朱德一起听汇报。陈赓将一年来学院建设的情况扼要地做了汇报，然后提出面对国内外形势而急需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的看法，并将学院教学任务急，教员缺，建筑规模大，国防经费少等问题和盘托出。他还说，整个教学设施配套建成，需要投资5000亿，我们也考虑到国家困难，想放慢建设速度，减少投资，但苏联顾问团不同意。毛泽东说：

“你对形势的分析很对。战争还在打，战备不能放松，苏联援助我们的现代化武器装备正在不断送到部队，光靠几个顾问指导不行，急需有自己的军事工程技术干部。你提出的问题，我看都能解决。”

他回头问朱德：

“你的意见呢？”

朱德说：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朝鲜战争的经验教训，要求我们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军工学院培养现代化技术军官是部队搞现代化的一个先决条件，有武器没人去驾驭不行。国防费是少一点，但应区别先后缓急，有重点开支。军工学院所需经费，应该充分保证。”

毛泽东说：

“陈赓，你去召集军政有关各部首长，开会研究解决这些问题。”

陈赓说：

“我召集这个会不合适，名不正言不顺啊，还是请主席告总参谋部召集好。”

毛泽东说：

“就由你去告诉黄克诚，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解决问题。”

他又对朱德说：

“我让陈赓把哈军工建设成中国的第二个黄埔军校，看来他的野心不小呢，要超过他的校长蒋中正先生呢。”

陈赓对毛泽东说：

“军工学院准备在9月1日开学，请主席写个训词，再为学报起个名字吧。”

毛泽东说：

“我已是一个官僚主义，不常写东西了，交给萧向荣起个草，我修改修改吧。南京军事学院的报纸叫《军学》，你们的报纸就叫《工学》吧。”

说罢，他便在宣纸上写下了毛体中不多见的近似宋徽宗瘦金体的两个大字——工学。

7月13日，薄一波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作了第一次检讨。没想到会议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批评的调子越来越高，给薄一波扣了许多不适当的帽子，有人还说薄一波犯了路线错误。

7月13日21时，阴云密布，大雨欲来。中朝两军突然发起“金城战役”，1000余门火炮齐发。不到1个小时，中朝军队就突破了南朝鲜军队的全部前沿阵地。

7月19日，美国发表保证实施停战的声明，并向南朝鲜施加压力。中方也同意尽快签订停战协议。

7月24日，中朝军队在“金城战役”中，已经将李承晚的首都师、第3师、第6师、第8师全部歼灭，共计78000余人。

这一天，朝鲜战场上的谈判双方，最后校正了军事分界线。由于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向前推进，交战双方实际接触线有了变化，最后划定的军事分界线比6月17日南朝鲜当局强迫扣留战俘事件前划定的军事分界线，又向南推进了192.6平方公里。

7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祝贺志愿军夏季反击作战胜利的电报稿上，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希望全军指战员防止骄傲，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以后，仍应提高警惕，一面自己严格遵守协定，一面防止敌人可能做出破坏的挑衅。……越是在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7月27日，朝鲜时间10时，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由朝中方面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和“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正式签字。

自1953年7月27日22时起，在朝鲜的一切战斗行动完全停止。

**在此前和7月28日，停战双方把停战协议签字文本，先后送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上将克拉克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签署**。

中国人民志愿军所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历时2年零9个月，至此胜利地结束了。

**“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上将克拉克**对他的幕僚说：

“美国上将在一个没有打胜的停战书上签字，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克拉克后来还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与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俱有同感。”

朝鲜停战协定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突然昂首推门出屋，他站在台阶上，巡望蓝天，胸膛急剧起伏。这是毛泽东喜极或怒极时的一种常见的冲动表现。他运了一口气，放开喉咙唱了两句京剧。

毛泽东唱京剧也有忽然记不起唱词的时候，每逢碰到这种情况，他便会急不可耐地问身边的工作人员。所以，久而久之，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将他喜爱的京剧唱词背下来，以便随时提醒他，让他高兴地唱下去。

工作人员见毛泽东如此激动和兴奋，一问才知道是美国人在朝鲜停战协议上签字了，朝鲜战争结束了，中朝人民胜利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此次战争中，共歼灭“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109万余人。1953年10月23日美联社公布的“联合国军”伤亡总数是147万余人。美国在朝鲜战争纪念墙上公布美国阵亡54246人，失踪 8177人，被俘7140人，伤103284人，总计172847人。志愿军牺牲和负伤的也多达36万余人。

志愿军防空部队击落美机413架，击伤1559架；击毙美国“空中英雄”乔治·阿·戴维斯，击落美国空军“双料王牌驾驶员”哈罗德·爱德华·费席尔。

美国在战争中的战费支出是400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7300余万吨。志愿军也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余万吨，开支战争费用62.5亿元（相当于当时的25 亿美元）。

战后，美国远东空军阿尔基准将曾经说过：“在朝鲜的美军司令官们经常说，他们希望朝鲜战争整个结束后能见到一个人，就是共军的后勤部长。”美军司令官们希望要见到的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曾经从中央红军3军团调到1军团，又从1军团调到红4方面军，在西路军被打散之后，化装乞讨，千里寻党，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担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长重任的李聚奎！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给志愿军高级干部授勋，授予彭德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勋章。

朝鲜战争结束了，毛泽东终于下决心要把大儿子牺牲的消息告诉刘思齐了。他在一个周末请周恩来一同来做刘思齐的工作。

刘思齐回到家中，毛泽东在谈话中，又一次向她诉说毛家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毛楚雄，还有韶山党支部书记毛福轩……

刘思齐感到越听越不对劲，朝鲜停战协定都签订了，为何岸英还不曾寄回只言片语，难道他……

刘思齐不敢再往下想了，显得心慌意乱起来。周恩来见状，就委婉地说道：

“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无数牺牲了的革命战士，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岸英同志也是其中之一！”

周恩来的声音尽管故意放得很轻，但对于刘思齐来说，这无疑是一声霹雳！她痛不欲生，伏在毛泽东的肩上撕心裂肺地哭呀，哭呀！毛泽东木然地坐着，脸色苍白，无声的泪水顺着脸颊流淌下来。

周恩来扶着刘思齐准备让她坐到沙发上，没想到碰到毛泽东的手，吃了一惊！他急忙低声对刘思齐耳语道：

“思齐，你要节哀，你爸爸的手都冰凉啦！”

刘思齐闻言一愣，忙止住哭声，反而安慰起爸爸来。她为了不引起爸爸的悲伤，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偷偷饮泣。

该吃饭了，毛泽东看到刘思齐那又红又肿的眼睛，长叹一声，水米未进就放下了筷子，慢慢地起身离开了。

后来，毛泽东看着刘思齐日渐消瘦憔悴，就劝慰她说：

“战争嘛，总是要死人的。不能因为岸英是我的孩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人民牺牲。今后，你就是我的大女儿。”

再说7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发表了讲话，全文如下：

一、在过渡时期，我们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其性质和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相同的，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但实行的办法则有很多不同。**列宁在1918年指出的这条道路，我们实行了。资产阶级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别的路走，大势所趋，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对资产阶级不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别的路，因为现在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且需要他们。**使独立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变为受限制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大的进攻，**只有有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这5个条件，加上社会主义工业和经济的发展，才能这样搞。

二、**国家资本主义是带有进攻性质的，但在总的进攻中有部分退却，如对资本家的“三权”和利润分配。**现在资本家的“三权”已经不全，虽然所有权未取消，但管理权公方已经插进去了，他们的“三权”就受到了限制。现在要让一下，特别是**在红利上，要给资本家让利，使他们有所得，这就是进攻中的部分退却。**所得过少，他们就不愿意来。这里又牵涉到资本主义经济法则问题。**我对他们说：“你们不应唯利是图，而要两利是图，劳资两利，一利不行。”**“五反”中进攻得太远了，资本家躺下了，要给他一定的利益叫他起来，这就是25%的红利。应当说服工人作这个让步，以换得国家资本主义；如果不让这一步，资本家无利可图，无利可得，就不能换得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调整商业后，商业方面的问题解决了，我们也退却了，退到三比七。工业方面还要让一步，才能解决。李立三同志说灵活运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是对的，但不完全。在我们的社会里，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是受限制的经济法则，**所谓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就是剥削剩余价值，说穿了，就是唯利是图，**这一条已经受到了限制。但是现在有些工厂让资本家剥削得太少了，这就不能换来国家资本主义。

三、**现在所说的改造，还不是取消资本家私人所有制，使之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的最后改造步骤，而是指在承认资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条件下，使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即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用各种方式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和合作的、受工人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这种资本主义企业，已经不是解放前的那种资本主义企业，它们主要是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资本家已不能唯利是图。**当然，工人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部分利润，在整个盈利中至多占25%；而75%以上的盈利部分，是为国家（所得税）、为工人（福利费）和为扩大企业设备（公积金——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特殊的、新式的资本主义，即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它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有几种程度不同的情况，必须指出，目前不是一切或大多数的资本主义企业已做到了这一步，还需要经过几年努力才可以做到这一步，但是一定可以做到这一步。在国家资本主义中，公私合营是有社会主义成份的，它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把一切国家资本主义，比如接受加工订货，都叫作半社会主义是不妥当的，应该说它是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

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靠什么条件？第一、社会主义的几千个大工厂；第二、农业合作化，要有计划地、稳步地、积极地、自愿地搞互助合作；第三、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条件，包括党组织和工会，加上我们的领导，可以保证企业转到社会主义，取消资本家的所有权，同时把他们安排好。在这里，**头一步是变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把独立的、不受限制的、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变为不独立、受限制、没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由国家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消灭阶级。

四、对私营企业“有所不同、一视同仁”问题。在所有权方面是一视同仁的，工人所得可以自由支配，资本家分到的红利也可以自由支配。在原料供应、贷款、运输等方面，**“不看僧面看佛面”，“佛面”是工人阶级，为了工人，对资本家也需要给以必要的照顾。**工资待遇一般原则也是“一视同仁”，高的一般不降，低的也不一定都提，要看具体条件和技术水平。**“一视同仁”里面还包括资本家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这方面，形式上是每人一票，但因为工人人数多，实际上工人占优势。

五、国家重点搞重工业，但还必须搞地方国营工业（不要盲目性），搞国家资本主义，搞手工业合作化。手工业是洋，不是海。手工业一般要有发展，也有一部分要淘汰。**搞手工业合作化比农业合作化还要难，这两者又都比搞国家资本主义困难，对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农业不能采用剥夺的办法，因为他们是脚踏实地的劳动者，既不是资本家，下面又没有工人。对于他们，只能经过劝说，启发自愿，准备劝多少年，一步一步地实现。**不搞地方国营工业，不搞国家资本主义，不搞手工业合作化，就不能完成重点建设。

六、**我们党内有人反映了资本家的一种意见，即国家专搞重工业，轻工业让私人去搞。我们不能采取这种路线，不能是国家搞原料，资本家搞制造。**有大批私营轻工业厂要走国家资本主义的路，同时还必须发展地方国营工业，如纱厂、金笔厂等轻工业。人民新增的购买力，要靠国营企业主要是地方国营企业来满足，私营企业只能占去一小部分。国家资本主义也是积累资金的来源之一，如税收等，也可以训练干部、培养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搞地方国营工业。现在地方工业上缴9万亿元的利润太高，应降下来，以利地方工业的发展。地方工业上缴利润太多，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就太少了，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七、对“三高”即物价高、利息高、利润高政策的批评，不能过分，要分析。**降低工业品价格是工业的根本路线，但是要逐步地降低。物价还是受供求关系制约的**。现在的毛病是应降的未降，应提的未提，如粮价。糖降价后又脱销了，要提价。降低物价时要谨慎，要按情况用分析的方法解决问题。私商往往会钻物价的空子，而且价格降了再提高就比较难，群众会不满意。因此，不要笼统地批评“三高”政策。要看到物价有高有低，有的今天高，明天应当降，也有明天应当提高的。**工资也不能提得过高，提高容易降则难。**

八、要有准备地搞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准备则不要搞。搞国家资本主义要有条件，包括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条件。要像过去打仗一样，不打无准备之仗。干部要就地取材，培养训练工厂的工会主席和支部书记。**要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地变私人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大体上要用3年到5年的时间完成。**

九、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问题。在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支配下，适当地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受限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是发展生产，保障需要，这是主要的、基本的，是起领导作用的经济法则**。但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存在，法则当然存在，不能消灭；事物受了限制，法则也受限制。不执行劳资两利，把它变为一利，就是不了解这个法则。

十、从国营贸易企业批发商品并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出售的私营零售商，可以也应该算在国家资本主义之内。它是国营贸易的手和足，现在虽然财产还是你的，将来可以改为由国贸企业发薪金。从国贸企业批发商品而又转批发给别人的私商，算不算国家资本主义？我不作定论，由你们去讨论。**其他私商，同国营企业没有联系，跑自由市场，自由泛滥的，不能算国家资本主义。**

十一、再讨论一次价值法则的问题。看本子看不下去，还是按问题讨论的方式好。9月间把材料整理出来，发至各地。

1953年8月1日，薄一波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作了第2次检讨，仍不能通过。这样，会议就很难做结论，也结束不了。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说道：

“以为会议上一切发言的内容都是正确的，事实上，有一些意见是不适当的。”

他决定把陈云、邓小平从外地叫回来，参加会议。

8月6日，陈云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发言说：

“同志们在会议上提出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我在今天这样的会议上不能说中财委有两条路线。”

8月7日，**高岗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作了一个发言**，他没有像有的发言者那样声色俱厉，而是**把刘少奇在1947年土改时的一些话，1949年在天津的讲话，1950年关于对待东北富农党员问题的意见，1951年关于对山西农业合作社问题的观点，都安到薄一波头上加以批判，借以影射刘少奇。**

8月11日，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全体大会上，对会议作了总结。

此前，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为全国财经会议所做的结论时，在原稿引述总路线的内容后边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1949年3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

毛泽东还在原稿中关于新税制的错误问题所写的“带路线性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一句中，**将“带路线性”4个字删去了**。这一重要修改，涉及到对薄一波问题的定性。

毛泽东支持财经会议对新税制、对薄一波的批评，但**他不赞成说薄一波犯了“路线错误”，也不赞成说是“带路线性的错误”**。

8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本来他在会议结束时是可以不讲话的，但由于高岗等人一闹腾，他有点不放心，还是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他的讲话提纲是写在一份此前他仔细阅读和批点圈画的二中全会决议铅印本的封面上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新税制’的错误跟张子善的问题不同，是思想问题，是离开了党的总路线的问题。”

“最近，我去武汉、南京走了一趟，知道了很多情况，很有益处。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还要出外走走，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有的东西，地方上已经制成成品，中央领导机关就可以在全国加以推广，比如老‘三反’和新‘三反’，都是地方上先搞的。**中央各部乱发指示。本来中央各部发出的东西，应当是上品，现在是次品，并且有大量产品根本没有使用价值，大批报废。”**

**“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

“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就是薄一波。他的错误，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宣传新税制的社论，资产阶级拍掌，薄一波高兴了**。**关于新税制，他事先征求了资产阶级的意见，和资产阶级订了君子协定，却没有向中央报告。当时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不赞成，轻工业部也不满意。”**

“薄一波主张推行的‘新税制’，即对国营企业、合作社企业、私人企业在税收上，改变过去的做法，实行一律平等的税收制度。这是一个错误，必须坚决纠正。但是，**薄一波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是一个点的错误，一个点，构不成一条线。”**

“**在批判薄一波的错误中间，周、陈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我的错误在于：1、抓得少，抓得迟，这是第一条，也是主要的一条，过去忙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后应抓财经，抓了一些，但没有钻。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过去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2、统的死了，我也有份。我说过要统收统支，对统收我抓了，统支我没有抓紧，不注意。这一次会议提醒了我，要统一集中，但分级管理也是很必要的。3、预算问题。去年11月搞起，经过1月财经会议，中央也讨论了。**预算中16万亿是虚假数字，我现在才知道。**利润打的太多，支出的太多了。我虽然说了‘三道防线’——增产、节约、发行，但错误是报纸上公布的早了，应该慢慢来（苏联今年预算现在才公布），我也有急躁冒进。4、查田定产，我支持过。到武汉、南京后，听到对此问题有反映，我说做个五年计划吧。回到北京，邓子恢同志看我口气松了，说查田定产否定了土改成果，根本行不通。我说，听你的吧。5、扫盲，我开始是支持过，后来不行了，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修改了原来的意见。6、失业人员登记，是我的意见，失业的160万人加上半失业的人数很多。原因是我接到800封信都是这个问题，劳动部当时又说这样做没有问题，有些失业救济经费还花不出去。我让恩来同志召集了会议，宣布了劳动就业办法，给地方上增加了麻烦。但也给失业者些希望。……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这些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逐步地纠正中。”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3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各大区和省市要在适当时机召集有地委书记、专员参加的会议，展开批评讨论，讲清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问题。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我们现在要反对主观主义，既反对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也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小平同志也说有那么一点错误。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全国有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

最后一点，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韧的精神。

要坚韧。如抗美援朝，我们打痛了美帝国主义，打得它相当怕。这对我们建设有利，是我们建设的重要条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军队受到了锻炼，兵勇、干智。当然，我们牺牲了人，用了钱，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的县城只剩下一个，但我们并没有退出边区，吃树叶就吃树叶，就是要有一股狠劲。

要学习，不要骄傲，不能看不起人。鹅蛋看不起鸡蛋，黑色金属看不起稀有金属，这种看不起人的态度是不科学的。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对兄弟国家人民要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要有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对外贸易方面，有些人骄傲，妄自尊大，这是不对的。要在全党特别是要在出国人员中进行教育。要苦学苦干，在1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那时，我国强大了，也要谦虚，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

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

**有人建议要我和他用个人名义在上海命名两条街道，我当时回答说，做一件事，总要想到对人民是不是有些好处，改一个街道名字，就要重新油漆门牌，就要用人民的钱，改了以后，人们也不熟悉，还不方便。你也不要搞你的某某某路，我也不搞我的毛泽东路**。

总之，要坚持谦虚、学习和坚韧的精神，坚持集体领导的制度，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达到社会主义的胜利。”

8月13日，历时两个月的全国财经会议正式结束。

初秋的一个下午，傅连暲请苏联临床医学专家、内科教授、苏联医学专家组长瓦西林柯与米勒大夫，为毛泽东会诊。王鹤滨也在场。俄文翻译是一个混血儿，她的爸爸是东北人，母亲是俄国人。毛泽东对苏联医生说：

“我在四十年代初，曾经出现过在空旷的广场有恐惧的感觉，所以，在一段时间内，不愿意去广场参加大会。”

瓦西林柯教授说：

“您这是恐旷症。”

毛泽东说：

“我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傅连暲认为，这种一时出现的精神神经失调，不宜下恐旷症的诊断结论。他担心这一结论会引起毛泽东的思想负担，就打断毛泽东的话说：

“这种现象就像人登高时出现的腿软、出汗、头晕一样。不少人多登几次高，或者锻炼一下，这种症状就可以消失。”

毛泽东误会了傅连暲的好意，对傅连暲打断他的话非常恼火，但是，当着苏联专家的面又不好发作，他只好暂时忍耐下去。

第二天，值班卫士通知王鹤滨说：

“主席叫你去！”

王鹤滨一进毛泽东的卧室，立刻感到气氛异常。只见毛泽东左手叉在腰间，在室内激动地走动着。因为空间太小，他走上两三步，又来个急转弯，再走回去。见王鹤滨来了，他便停住脚步，怒气冲冲地说：

“王医生，今后我的事，不要他傅连暲来管！你不要听他的。”

王鹤滨不知怎么回事，心想：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呀？于是，他就笑着说：

“主席，他是负责中央领导同志保健工作的领导人，是我的业务上级，我不听他的怎么办？”

“你不要听他傅连暲的！听我的！他什么也不懂，还装懂。苏联专家来会诊，他不给我讲述病情的机会，他抢着代替我说，说的又不是我的病情！”毛泽东越说越火：“你打电话告诉他，说我正在臭骂他哩！”

“好！我去打电话。”

王鹤滨说罢，就想溜走，刚一动身，毛泽东一指大木床一侧的电话，说：

“你到哪里去打电话？我这里就有！”

话里仍然带着浓浓的火药味儿，王鹤滨心想：毛泽东可能不知道傅连暲的电话号码，不然，为什么叫我打呢？他眼睛瞟了一下电话，却不敢把电话拿起来。王鹤滨怕毛泽东正在气头上，电话一打通，他接过电话，训斥一阵，然后宣布撤傅连暲的职那就麻烦了。王鹤滨见过毛泽东对高级干部发脾气的情况：“我撤你的职！”他是说了算数的，真撤！

王鹤滨呆呆地站在毛泽东面前，不知所措地望着他。毛泽东起初还用两只睁大的眼睛盯着王鹤滨，一会儿，他的视线慢慢地变成了茫然的淡淡的光，凝滞在不远的地面上。王鹤滨见毛泽东的怒气消得差不多了，就轻轻地退出了房间。

次日，杨尚昆从毛泽东的办公室出来，在菊香书屋大门的北侧遇上了王鹤滨，他说：

“王鹤滨同志，主席对我说，他向你道歉。并要我向你解释，脾气不是对你发的。”

王鹤滨说：

“主任，我知道。”

杨尚昆又补充了一句：

“主席还说，今后你还是要听傅连暲同志的业务领导。”

过了几天，傅连暲见到了王鹤滨，他说：

“王鹤滨同志，主席发脾气要你给我打电话，你怎么不给我打呀？”

王鹤滨说：

“我怕主席当时正在火头上，他若在电话里撤你的职，怎么办？”

傅连暲说：

“那有什么，主席发脾气是对我的批评和教育嘛。”

8月24日，宋庆龄亲自率领中国福利会儿童剧团来到中南海，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了汇报演出。

随后，毛泽东邀请小演员们在怀仁堂为他请来的小客人作了多场精彩演出。

8月26日，在由陈赓主持筹建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即将开学之际，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的名义，给陈赓及教职员、学员们发去了一封由毛泽东审阅并修改过的贺电，贺电中写道：

军事工程学院陈院长和全体教授、助教、学员、工作人员同志们：  
    正当你们即将开学的时候，我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在此时机，我并向热诚帮助我们计划和创办这个学院的苏联政府、苏联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对于我国的国防事业具有极重大的意义。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地改善和进步。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迫切而光荣的任务。

向苏联专家学习，这是我们建军史上的优良传统，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工作部门，都应当如此。这点，对于你们这个学院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你们必须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知识，学习苏联军事工程建设的丰富经验，学习苏联专家同志的学习态度和工作态度，学习苏联专家同志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在学习上应该是虚心诚恳，不要学到一点就自满和骄傲。

保持和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特别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慨，这在你们学院是和全军一样，必须充分领会和一刻也不可忘记的。

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办好学院，尊重专家，努力学习，为完成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给予你们的光荣任务而奋斗。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53年8月26日

后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于9月1日正式开学。

8月27日，毛泽东给他的塾师毛宇居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宇居兄：

别后来信，久已收到，甚谢。尊恙已愈，甚慰，尚祈注意珍摄。乡间生产、贸易、公粮等项情形，暇时望告一二。

顺祝康吉！

毛泽东 1953年8月27日

8月28日，毛泽东根据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结束和国内土匪即将全部肃清，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执行的情况，为中共中央起草“军事系统（包括公安部队）应该在整顿组织、精简机构和冗员、加强技术训练、提高部队质量的基础上，大力缩减军费开支。”的紧急指示。

随后，全军进行了第3次精简整编。截至1953年9月底，全军部队人数减到420万人左右。

8月31日，毛泽东给他在东山学堂的老同学谭世瑛写了一封回信。

早在湘乡解放后，谭世瑛因曾在旧政府任职，工作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当地政府还对他实行了管制。谭世瑛家中人丁众多，又没有经济来源，生活十分艰难。他想起了毛泽东，带着试探的心情，给毛泽东去了一封信。正当他在忐忑期待之时，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给他回了信，信中询问：“尊况如何，甚念。”谭世瑛心中有了底，毛泽东是个不忘旧情的人，于是，他又给毛泽东去信，直陈自己面临的困难，想谋份差事。毛泽东很快就回了信，对他的实际困难“极表同情”，建议他的工作“就近解决为上策”。谭世瑛还是不甘心，于1953年5月再次致信毛泽东，要求安排工作。毛泽东便在给他的复信中写道：

世瑛学兄：

5月来信收读，又承赠以长歌，深感厚意。生活困难，极为同情。现在到人民政府所属机构做事，或到学校教书，薪入甚微，对于家口众多者不易赡给；又须入相当学校学些马克思主义观点，方能齐一步调，有共同作风。以吾兄状况观之，能就近获得工作职位，为最好；否则须远出参加短期研究班的学习，须准备吃很大的苦楚，又难以赡家，未知有此决心否？顺致敬意

　　 毛泽东 8月31日

1953年9月2日，毛泽东起草与周恩来联名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8周年致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的电报（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他在电文中写道：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同志：

当此抗日战争胜利的第8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苏联人民和苏联武装部队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长期艰苦战争中以及在最后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中，自始至终获得了苏联人民的支持和援助。特别是在1945年，因为苏联武装部队的参战，和中国人民一起，击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由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中国与苏联牢不可破的友谊已经并正在日益巩固和发展。这种伟大的友谊现在已成为远东和平与世界和平的坚强保证。

在这里，我们还要提到的，就是苏联给予中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帮助，乃是中国经济迅速恢复和走上有计划建设道路的重要因素。

最近，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显然是整个和平民主阵营在争取和平、制止新战争的努力中所获得的新的重大的成就。这一新的重大的成就业已有助于整个世界形势的开始和缓，同时，也将有助于日本人民要求与远东各国建立正常关系的努力，以便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再起。

中苏两国在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的正义事业中永久合作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

1953年9月2日于北京

9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城市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及中央各财经部门党组：

中南局7月12日电悉。中南局所反映的城市建设工作中的混乱情况很值得注意，而所提几项建议的精神也是好的。中央认为：

一、**随着国家工业建设的开展，工业城市的建设工作已日益迫切和重要，不少重要工业城市，因为没有城市总体规划，对城市发展缺乏整体布局和统一领导，已影响了工厂、住宅、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合理布置和建筑用地的正确分配，以至产生建设单位各自为政，分散建筑，造成了建设中的盲目、分散、混乱的现象。**这种情况如再继续下去，就会造成将来建设中的更大困难和严重浪费。为适应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及便于城市建设工作的管理，重要工业城市规划工作必须加紧进行，对于工业建设比重较大的城市更应迅速组织力量，加强城市规划设计工作，争取尽可能迅速地拟订城市总体规划草案，报中央审查。

为完成上述任务，各中央局、分局及有关的市委、市政府必须加强对城市建设的领导，建立和健全大区财委的城市建设局（处）及工业建设比重较大城市的城市建设委员会（关于成立上述组织问题本年5月12日中央曾有通知），抽调一定的得力干部及技术人员加强此项工作。

二、关于研究城市发展远景所需要的经济资料，可根据国家第1个五年计划对工业布局的初步意见，分别不同城市的性质和自然条件，研究工业建设比重较大的城市的发展规模与将来的发展远景，然后由有关城市根据需要与可能及重点建设的方针，拟订城市建设的指标。至于一般中小城市，在第1个五年计划内，只能拨给少数款项作为维护费用，一般不再扩大基本建设。

三、城市规划工作，除少数重要工业城市，由中央建筑工程部城市建设局直接帮助设计外，一般工业城市及改建城市均应由大区城市建设部门直接领导，由城市建设委员会参照去年9月中财委城市建设座谈会编制的《城市规划设计程序草案》拟订城市总体规划草案。在技术上，中央建筑工程部城市建设局，应给予指导和帮助。

四、**建厂所需资料，如地形、地质、地震、水文、气象等自然资料与必需的经济资料，应尽可能地由城市建设委员会组织各有关建设部门统一进行，以免重复浪费。**

五、有关城市建设的规章和办法，城市建设干部的培养，由中央建筑工程部门逐步拟订办理；建厂区工人生活资料的供应工作，由中央商业部研究办理；至于因建厂需要购买土地、拆迁房屋、调配劳力等问题，可由大区根据实际情况拟订，其中有关重大原则问题，应报中央批准。

**本件及附件，均登党刊**。

中共中央 1953年9月4日

9月7日，毛泽东在颐年堂邀请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李济深、陈叔通、黄炎培、章伯钧、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张治中、程潜、傅作义谈话。周恩来、陈云、陈毅、李维汉亦在座。毛泽东此次谈话要点，抄录如次：

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

1、过去3年多，做了一些工作，但忙别的去了，用力不多，现在起要多做些工作。

2、有了3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

3、**共同纲领第31条**（即“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笔者注）**的方针，现在应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所谓“明确起来”，是说在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还没做到，此次会议（指在次日召开的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笔者注）的目的，应当做到这一点。

4、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3年至5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

5、公私合营、全部出原料收产品的加工定货和只收大部产品，是国家资本主义在私营工业方面的3种形式。

6、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须研究。

7、占有大约380万工人店员的私营工商业，是国家的一项大财富，在国计民生中有很大的作用。私营工商业不仅对国家供给产品，而且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可以为国家训练干部。

8、**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的是为资本家谋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有一个表：所得税34.5％，福利费15％，公积金30％，资方红利20.5％……总计100％。

9、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

10、**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11、**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过去几年中已有很大的进步，相信再有3年至5年，这种进步将更大，所以3年至5年内基本上完成将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是有可能的。国营企业的优胜，则是完成这一任务在物质方面的保证。**

12、**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3、5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13、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被领导者，一个是不谋私利者，一个是还要谋一部分私利者，等等，这些是不相同的。但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下，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就利润分配上说，约占四分之三左右），因此可以而且应当说服工人，和国营企业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数量质量，这样对公私劳资都有利。

欲知毛泽东能否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请看后面详细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1953年8月12日在全国财经会议结束前的讲话中所作的6点自我批评，至今读来依然使人感动不已。正像在此次会议上一直受到批评的薄一波后来回忆所说：“一位受全党尊敬的伟大领袖，能在大庭广众之中诚恳地检讨自己的错误，给了大家以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的这番话，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承担了责任，就使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减轻了压力。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看出他的本意是希望这次财经会议能通过批评、自我批评来总结经验，提高认识。”斯言极是矣！毛泽东从来都是敢做敢担当的，从不文过饰非，从不言不由衷。身为领袖而率先自我批评的坦诚精神，堪为全党楷模！

**第50章**

**“你们家里又出了一个大学生啊！要努力学习啊。要多学一些自**

**然科学，掌握更多的专业知识。你是学航空的，国家急需这方面**

**的人才。将来，我们的国家要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飞机啊。我**

**们要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就靠你们年轻一代。”**

话说1953年9月8日，毛泽东见到表兄文涧泉的来信，信中说他的岳家赵氏有一个亲戚要到北京读书，同时，他也想来北京及去上海等地一游。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涧泉兄：

惠书收到。承告乡情甚谢。来京及去上海等地游览事，今年有所不便，请不要来。赵某求学事，我不便介绍，应另想办法。此复，顺祝康吉，并祝各戚友安好！

毛泽东 1953年9月8日

9月8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主持召开了全国政协常委会第49次扩大会议，专题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经济建设问题。

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题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

9月9日上午，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分小组讨论周恩来的报告。列席会议的梁漱溟在小组召集人章伯钧发言之后，也说了一些客套的话，他说：

“这一总路线原是人人意中所有的，章先生更发挥了周总理所讲的话，我对此深表赞同，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可说。”

他还举例说明“人人关心这一事业”，他说：

“《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时常有人把他所见到的问题写信提出来，而党报收到来信亦马上能注意检查或交给该主管机关部门去检查纠正，这就是最好最好的。”

下午大会发言，由各小组召集人交流各小组成员的意见。散会时，周恩来对梁漱溟说：

“梁先生，明天的大会你也说一说，好不好？”

梁漱溟应道：“好！”

9月10日下午，政协常委扩大会议进行第2次发言。由于发言的人很多，梁漱溟给周恩来写了一个条子，说他不准备发言了，改由书面提出意见。散会后，周恩来对梁漱溟说：

“会期还要延长一天，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你可以在明天的会议上发言。”

9月11日下午，梁漱溟在大会上作了发言，他说：

“由于建国的计划必须方方面面相配合相结合，我推想政府除了已经给我们讲过的建设重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两方面之外，像轻工业、交通运输业等等如何相应的发展，亦必有计划，希望亦讲给我们知道。”

他在发言中提出的“重点”问题“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他说：

“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但自进入大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市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向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引起重视。”

他还说：**“共产党丢了农民”，“共产党不如工商联可靠”等等。**

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参加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的人员列席了会议。到会的人员还不算多，只是个中型会议。在不大的礼堂里，前3排坐着参加会议的人们，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随行人员坐在第4排和第5排的位置上。汪东兴和叶子龙坐在4排的东侧，王鹤滨坐在他俩后面。这些位置行动方便，距离退场的门口也比较近。以前每次散会时，与会者都要让毛泽东先行，他的随行人员要便于退场。

彭德怀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其他与会者也发了言。

毛泽东在会议上即席讲话，作了总结。关于抗美援朝战争问题（参看《毛泽东选集》第5卷），他说：

“抗美援朝，经过3年，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

抗美援朝的胜利是靠什么得来的呢？刚才各位先生说，是由于领导的正确。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持，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

我们同美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作战，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许多倍，而我们能够打胜，迫使他们不能不和下来。为什么能够和下来呢？

第一，军事方面，美国侵略者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这种形势，去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看出来了。

作战的双方，都把自己的战线称为铜墙铁壁。在我们这方面，确实是铜墙铁壁。我们的战士和干部机智，勇敢，不怕死。而美国侵略军却怕死，他们的军官也比较呆板，不那么灵活。他们的战线不巩固，并不是铜墙铁壁。

我们方面发生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4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1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21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18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

第二，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

第三，经济方面，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

这几个原因合起来，使敌人不得不和。而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原因，没有这一条，同他们讲和是不容易的。**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在朝鲜战争中，敌人伤亡了109万人。**当然，我们也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的伤亡比原来预料的要少得多，有了坑道以后，伤亡就更少了。我们越打越强。美国人攻不动我们的阵地，相反，他们总是被我们吃掉。

刚才大家讲到领导这个因素，我说领导是一个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群众想办法。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我讲一个例子。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1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同时，把汽车路加宽，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汽车开过来开过去，畅行无阻。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40%，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后来，地下仓库修起来了，地下礼堂也修起来了，敌人在上面丢炸弹，我们在下面开大会。我们住在北京的一些人，一想到朝鲜战场，就感到相当危险。当然，危险是有的，但只要大家想办法，并不是那么了不起。

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门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讯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33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

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由于以上3条，就产生了第4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3次世界大战。**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今后，敌人还可能打，就是不打，也一定要用各种办法来捣乱，比如派遣特务进行破坏**。他们在台湾、香港和日本这些地方，都设有庞大的特务机构。可是，我们在抗美援朝中得到了经验，只要发动群众，依靠人民，我们是有办法来对付他们的。

我们现在的情况，同1950年冬季的情况不同了。那时候，美国侵略者是不是在三八线那边呢？不是，他们是在鸭绿江、图门江那边。我们有没有对美国侵略者作战的经验呢？没有。对于美国军队熟悉不熟悉呢？不熟悉。现在这些情况都变了。如果美帝国主义不推迟新的侵略战争，他说，我要打！我们就用前3条对付他。如果他说，我不打了！那么我们就有了第4条。这也证明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优越性。

**我们是不是去侵略别人呢？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

**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我们有人民的支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人民踊跃报名参军。对报名参军的人挑得很严，百里挑一，人们说比挑女婿还严。如果美帝国主义要再打，我们就跟它再打下去。**”

毛泽东在他所拟的讲话提纲中，还有这样一句话：**“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则必做到底，做到最后胜利。”**

接下来，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了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出现的一些不正确意见，不点名地批评了梁漱溟，他说：

“去年、前年收的农业税重了一点，于是有一部分朋友就说话了。他们要求‘施仁政’，好像他们代表农民利益似的。我们赞成不赞成这种意见呢？我们是不赞成的。当时，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对农民说来，对全国人民说来，是生活暂时困难一点，争取胜利对他们有利，还是不抗美援朝，不用这几个钱对他们有利呢？当然，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对他们有利。**去年和前年，我们多收了一点农业税，就是因为抗美援朝要用钱。今年就不同了，农业税没有增加，我们把税额稳定下来了。**

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

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

**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么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

“现在，抗美援朝已经告一段落，如果美国还要打，我们还是打。要打就要征粮，就要在农民中做工作，说服农民出点东西。这才是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哇哇叫，实际上是代表美帝国主义。”

梁漱溟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感到意外，同时也不服气。他认为毛泽东误解了自己的意思。于是在当晚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9月13日上午，梁漱溟在会议上当面把信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展开一看，只见梁漱溟在信中写道：

“你说的一些话，是说我。你说我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个雅量。我发言时你不在场，希望你给个机会，让我将原来发言的内容复述一遍，以求指教，解除误会。”

毛泽东看了信，当即约他晚上谈话。

是日晚，与会人员在怀仁堂观看京剧晚会。在开演前20分钟，毛泽东与梁漱溟开始谈话，梁漱溟扼要说明了他政协会上发言的内容，要求毛泽东解除误会。毛泽东说：

“你梁先生就是反对经济建设总路线之人，只是不得自明或不肯承认罢了，根本不存在误会。假若你梁先生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重视农业，虽然见解糊涂，却是善意的，可以原谅。可是，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是不可原谅的。”

梁漱溟闻言，更不服气了，他在言语间与毛泽东频频冲突，结果不欢而散。

9月14日、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继续开会。

15日的会议是由李富春作关于建设重工业的报告。尔后，梁漱溟在会议上请求发言，毛泽东同意他在明天的会议上再讲。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怀仁堂约请工商界著名代表人物盛丕华、荣毅仁、包达三、郭棣活、胡厥文谈话。时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根据他当天的记忆，追记了这场谈话的内容。现将其全文抄录如次：

毛泽东：3年来，政府在对于私营工商企业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也有缺点。主要是财经部门与私营工商业发生关系的很多，但财经委员会无负责人专管此事。现拟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任财委副主任，组织办公厅管私营工商业的事。李维汉和民主党派、工商界都合得来，可以办好。

（中间吃饭，以下是吃饭时所谈的。）

郭棣活：3年来工农的贡献很大，工商界没做多少事。

毛泽东：不能这样说。3年的恢复和发展如果没有工商界是不行的。

（包达三讲了一大段关于浙江人民生活情况等。以下是饭后所谈的。）

毛泽东：这次会上所谈的，跟工商界讲，会不会有什么波动？

（5人都说不会有什么波动，国家资本主义大家都会同意的。）

毛泽东：不要以你们的看法代替别人。如何传达，我们来研究一下。回去只谈《共同纲领》第31条，必要与可能。有必要，也要有可能才行。还要用鼓励的办法，不是非走这条道路不可，强迫人在这条马路上排队，不同意就关禁闭。（荣毅仁补充一句：是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对！是要发展。现在只是说，还要做起来看。工商界看一看政府。这回摸了底，到底“底”是不是那么一回事？只口里说，到底做起来怎么样？政府也要看一看工商界。彼此都看一看。三五年的时间，看明白了，事情也做出个样子来了，就好了。永利、久大合营得就不算好，有“有职有权”问题，有“红利”问题。先不忙讲社会主义。一看人心归向，不只看工农同意，工商界也要同意，要有90%以上的人赞同；二看工作安排。慢慢讲，讲几个月，讲一年，讲几年，讲清楚，彼此有益的事。

郭棣活：工商界从1950年初纱厂停工，政府给以支持，认识到国家统一计划的好处。现在鼓励公私合营大家都会想得通。

（荣毅仁在此说了一段话，强调国家资本主义应采取各种方式，说明上海大中小企业的情形很不相同。）

毛泽东：同意情形不同的说法。一个企业也不能由一个人决定，还要看董事会等大家的意见。关于大、中、小，过去有的同志认为中、小好，不对，企业越大越好，还是大的重要。

（胡厥文在此讲了一段机器工业在加工订货中因变动太多不能保持专业的困难。）

毛泽东：你们有问题尽量提出，但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很快解决。

毛泽东：四分之一左右（指按“四马分肥”的分配方法资本家分得的红利占全部企业利润的比例——笔者注。）如果提到工商界里面去，究竟会不会同意？如500亿办纱厂资本家能获利多少？

郭棣活：500亿可办1万纱锭，可赚50亿，（资本家）只能分得12亿5千元（表示似少一点）。但目前情况是有利可图，无利可得（意思即如能保住四分之一也可接受）。

荣毅仁：现在利润不止此数，锭子价低，因加工订货关系，流动资金用不了许多，所以500亿资金可以办一个2万5千锭的厂，应赚100亿左右。

毛泽东：我讲一讲广阔的前途。前途是非常广阔的，首先决定于市场。今年400万件纱，还不致减价，一减价就脱销。各个企业应好好经营，搞好劳资关系，发动劳动积极性，搞好劳动纪律，减低成本，提高产量，每年扩大设备，这样就有了前途。如不用此种办法，也可以发展，但小得多，而劳资纠纷无穷。将来要安排人员。安排即是有饭吃，其次是地位，即是选举。明年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代表，每年将国家的事向大会报告。这样，国家建设、重工业建设，大家都能参加了。政协机构也还存在。这个名字原是蒋介石的，蒋介石不要，我们要。在座的有3位是全国委员。将来开第二届全国政协会，选举还可以扩大一些。胡先生记得**我在重庆说过一句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具有同一的命运”。它们均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过去在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中立过、参加过，从历史上看，现在从企业情况看，我们没有理由不安排好。**

9月16日，梁漱溟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登台发言，复述了他9月9日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小组会议上的发言和9月11日下午在大会上的发言，再三声明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而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要求毛泽东收回他的话，并且说，看看毛泽东有无雅量。

9月17日，周恩来在会议上就梁漱溟的历史问题作了长篇发言。毛泽东插话说：

“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你究竟有没有‘骨气’？如果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那就把你的历史，过去怎样反共反人民，怎样用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榘、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向大家交代交代嘛！他们都是你的亲密朋友，我就没有那么多朋友。他们那样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我就怀疑，你这个人是哪一党哪一派？不仅我怀疑，还有许多人怀疑。

从周总理刚才的发言中，大家可以看出，在我们同国民党两次和平谈判的紧要关头，梁先生的立场是完全帮助蒋介石的。蒋介石同意和平谈判是假的。今天在座的还有来北京和谈的代表，他们都知道蒋介石的‘和平’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有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还说他美得很。他跟傅作义先生不同。傅先生公开承认自己反动透顶，但是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时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梁漱溟提出所谓‘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民却靠不住，党、团、妇联等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还差，因此无信心’，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的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不是合理化建议，人民政府是否能采纳这种建议呢？我认为是不能的。”

“梁先生‘要求多知道一些计划的内容’。我也不赞成。相反，对于梁先生这种人，应当使他少知道一些机密，越少越好。”

“梁先生把自己的像画得很美，他是在几十年前就有计划建国的伟大梦想，据他自己说，很接近于新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果然这样美吗？不见得。我同他比较熟，没有一次见面我不批评他的错误思想。**我曾当面向他说过，我是从不相信你那一套的。什么‘中国没有阶级’，什么‘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什么‘无色透明政府’，什么‘中国革命只有外来原因没有内在原因’，这回又听见了什么‘九天九地’的高论，什么‘共产党丢了农民’，‘共产党不如工商联可靠’等等高论，这一切能使我相信吗？不能。**我对他说过：中国的特点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你不承认这点，你就帮助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以，什么人也不相信你那一套，人民都相信了共产党，你的书没有人看，你的话没有人听，除非反动分子，或者一些头脑糊涂的人们。他好像也不反蒋，究竟梁先生有没有公开表明过反对蒋介石及其反动的国民党，我没有看过或听过他的所有文章和谈话，请大家研究。”

“我认为梁漱溟应当做一件工作。这件工作不是由他‘代表农民’向人民政府‘呼吁解放’，而是由他交代清楚他的反人民的反动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他过去是怎样代表地主反共反人民的，现在又如何由代表地主的立场转到‘代表农民’的立场上来了，他能说明这个变化过程，并使人们信服，那时方能确定究竟应当把他归入哪一类。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从来不考虑改变他的反动立场的。但我建议，为着治病救人，应当给他一个反省时间，并把这件事移交给政协去做，此次不做结论。”

“**‘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比如说，‘毛泽东比梅兰芳先生还会做戏，比志愿军还会挖坑道，或者说比空军英雄赵宝桐还会驾飞机’，这岂不是不识羞耻到了极点吗？**所以梁先生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正经的问题，又是一个不正经的问题，很有些滑稽意味。他说他比共产党更能代表农民，难道这不滑稽吗？”

“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所谓‘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

“和他这个人打交道，是不能认真的，和他是永远谈不清任何一个问题的，他没有逻辑，只会胡扯。因此，我提议移交政协双周座谈会去讨论这个问题，同时我也要警告诸位，切记不可以认为真正有解决问题的希望。决不可能的，结果还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无结果而散’。虽然如此，我还是劝大家举行双周座谈会试一试看，这比‘派两个人’去听他说教要好。”

梁漱溟听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一时按捺不住，不顾一切地要求当场发言作答。周恩来要他做准备，明日再讲。

9月18日下午，高岗主持会议继续进行。中等个头、又黑又瘦、留着平头的梁漱溟，穿着一身质地上乘的藏青色中式长袍，离开座位，站在了第1排前面的东南角上。他掏出准备好的稿子，面对着主席台上的毛泽东，又环视着会场，开始了发言，他说：

“昨天会上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很出乎我的意外。当局认为我在政协的发言是恶意的，特别是主席的口气很重，很肯定我是恶意的。但是，单从这一次发言，就判断我是恶意的，论据尚不充足。因此就追溯过去的事情，证明我一贯反动，因而现在的胸怀才存在很多恶意。但我却因此增加了交代历史的任务，也就是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我在解放前几十年与中共之异同，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就需要给我较充裕的时间……”

此时，坐在前排的司法部部长史良和其他几位部长，看出梁漱溟有点死拼的劲头，有点担心了，他们离开了座位，站在前排的西南角。史良打断梁漱溟的话，说道：

“梁漱溟先生，你少说一句吧！”

梁漱溟情急之下，便冲着主席台上的毛泽东说道：

“我现在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说话的时间。我还觉得，昨天的会上各位为我说了那么多话，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想共产党总不会如此。我很希望领导党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表明，**我还想考验一个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我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史良等梁漱溟的话一停顿，立即提高声调再次劝道：

“梁漱溟先生，你少说一句吧！”

毛泽东见梁漱溟依然是不依不饶的样子，就说：

“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

梁漱溟毫不退让，他抢过话头顶了上去，说：

“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

毛泽东一字一板地说：

“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

梁漱溟说：

“这一点倒无关重要。”

毛泽东生气地说：

“无关重要？如果你认为无关重要，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有关重要，等到第二届政协开会，我还准备提名你当政协委员。至于你的那些思想观点，那肯定是不对头的。”

梁漱溟站在原地，稍微仰着头，面对着毛泽东说：

“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谈。**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到底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您更加尊重。”

史良认为梁漱溟的话是在挑毛泽东的火，她忍不住高声插话说：

“梁漱溟先生！少说一句行不行？！”

毛泽东的火气又起来了，也不客气地说：

“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点像梁先生。‘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三盈三虚’，‘三月而诛少正卯’，很有些恶霸的作风，法西斯气味。我愿朋友们，尤其是梁先生，不要学孔夫子这一套，则幸甚。”

梁漱溟坚持说：

“我的意思是说主席有没有自我批评的这个雅量……”

会场顿时大哗。人们对梁漱溟当面顶撞毛泽东由震惊到愤怒，一些人大声喊道：“梁漱溟胡说八道！”“民主的权力不能给反动分子！剥夺他的发言权！”“梁漱溟滚下去！不能让他胡言乱语！”梁漱溟坚持不下去，望着主席台，听毛泽东发话。毛泽东缓和了一下口气，说道：

“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讲长了，把要点讲一讲好不好？”

梁漱溟说：

“我刚才说过了，希望主席给我充分的时间！”

“你讲到4点钟好不好？”

毛泽东说着，看了一下手表。梁漱溟说：

“我有很多话要讲，让我讲到4点哪能成？”

会场再次大哗。有几个人即席发言，指责梁漱溟狂妄之极，反动成性，不许他再说下去。毛泽东说：

“让他再讲10分钟好不好？”

会场上马上安静了下来。梁漱溟却说：

“10分钟怎么够？我要求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会场里又一次哗然。许多人接连发言，对梁漱溟的态度表示愤慨。过了一阵儿，毛泽东对大家说：

“不给他充分的说话时间，他说是不公平。让他充分说吧，他就可以讲几个钟头。而他的问题又不是几个钟头，也不是几天，甚至不是几个月可以搞清楚的。而特别是在场的许多人都不愿意听他再讲下去。”

他瞅了一眼梁漱溟，接着说：

“他的问题带全国性，应照薄一波的问题一样，在全国和全党去讨论。找典型，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全国讨论总路线。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梁漱溟，我们实行哪一条呢？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

批判梁漱溟，不是对他这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他代表的这种反动思想。梁漱溟是反动的，但我们还是把他的问题放在思想改造的范畴里头。他能不能改造是另一个问题。很可能他是不能改造的。不能改造也不要紧，就是这么一个人嘛！但是，同他辩论是有益处的，不要以为是小题大做，不值得辩论。跟他辩论可以把问题搞清楚。要说他有什么好处，就是有这么一个好处。现在辩论的是什么问题呢？不就是总路线的问题吗？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对我们大家是有益处的。因此我主张他继续当政协委员，现在我再提议让他再讲10分钟，简单讲一讲。好不好，梁先生？”

毛泽东话音刚落，又有几个人站起来指责梁漱溟，梁漱溟一句话也不说。毛泽东再次问他：

“梁先生，再讲10分钟好不好？”

梁漱溟依然坚持道：

“我有许多事实要讲，10分钟讲不清楚。”

会场又是一片哗然。毛泽东让大家静一静，然后对着梁漱溟说：

“你这个人呵，就是只听自己的，不听大家的。不让你讲长话，你说我没有‘雅量’。可大家都不让你讲，难道说大家都没有‘雅量’吗？你又说不给你充分时间不公平，可现在大家又都不赞成也不想听你讲话。那么什么是公平呢？在此时此地，公平就是不让你在今天这个会上讲，而让你在别处一个会上讲话。梁先生，你看怎么样？”

梁漱溟倔强地说：

“我不能同意主席这样的决定。”

周恩来在一片谴责声中对高岗说：

“请付诸表决吧，看让他讲话的人多，还是不让他讲话的人多，少数服从多数。”

高岗接受了这个建议。毛泽东补充说：

“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政府委员会所列的议程，列席的同志也可以参加表决。”

高岗点点头，便宣布说：

“请赞成梁漱溟讲下去的举手。”

毛泽东首先举了手，政府委员中的共产党员跟着毛泽东也举起了手，但还是占少数。毛泽东巡视了一下，举着手对梁漱溟说：

“梁先生，我们是少数呵。”

高岗又宣布：

“请不赞成梁漱溟讲下去的举手。”

大多数人立即举起了手。梁漱溟还想再说话，但会场里立刻响起一片高呼声：“服从决定，梁漱溟滚下去！”高岗也对梁漱溟说：

“你不要再讲了，把你要讲的话组织好，你将有机会到另外的会议上充分的去讲。”

梁漱溟这才不得不就此打住。

会后不久，梁漱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请长假，说是要闭门思过。毛泽东指示李维汉派人告诉他：今后需要出席的会议和活动，通知照样发给你，参加不参加请自便。自此以后，有关政协的会议和活动通知，果真照样发给了梁漱溟，工资也是照发不误，可梁漱溟却是什么地方也不去，只在家中闭门读书。

为了批判梁漱溟，陈铭枢要求毛泽东明确一下梁漱溟问题的性质，毛泽东说：

“梁漱溟这个人很反动，公开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但没有发现他暗中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发现他与美帝国主义和台湾有什么联系，因此**他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围的问题，因此我们提出保留他当政协委员的资格。对于他的反动思想，不充分揭露不行，不严厉批判也不行。我们是不是要借此机会和他绝交，从此不和他来往了呢？也不是。只要他自己愿意同我们来往，我们还是准备和他来往。在第二届政协会上，我还希望他当选为委员。”**

李济深和张澜则认为毛泽东和梁漱溟之间存在着误会，他们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批判了梁漱溟的傲慢，介绍了梁漱溟的性格和为人，说是希望毛泽东宽容梁漱溟的过错。毛泽东对此没有回应。后来李济深、张澜看到梁漱溟不但没有受到什么处分，而且又恢复了各种活动，就不再提及此事了。

且说9月23日，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进一步学习和讨论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解除了工商界人士的顾虑，从而促进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9月27日，毛泽东见到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9月16日发来的一封信及附件，他展开来信，方知沈钧儒在太湖疗养时发现在长江中下游各省血吸虫病流行极为严重。血吸虫病是一种人畜共患、传染极快的寄生虫病。这种寄生虫生在钉螺上，人们在有钉螺的水中劳动，病虫就会钻入人体，侵入血液，引起血吸虫病。患者到了晚期，腹大如鼓，丧失劳动能力，以致死亡。小小的血吸虫像瘟疫一样威胁着农村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存。

毛泽东阅罢来信和材料，双眉紧锁，从座椅上站起来。他点起一支烟，走到窗前，眼望着远方。是啊，早在1949年解放军在渡江前的水中练兵和渡江作战中，也有一些战士感染上了血吸虫病。建国后，党和政府已派出大批医务人员到血吸虫病区进行调查和初步防治，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要彻底消灭血吸虫病，任务还是很艰巨的。他重新回到办公桌前，将此件批转给习仲勋处理，又展开信纸，给沈钧儒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沈院长：

9月16日给我的信及附件，已收到阅悉。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习仲勋同志负责处理。此复。

顺致敬意

毛泽东 9月27日

9月27日这一天，毛泽东给当年的老同志、现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劳工部部长易礼容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礼容兄：

杨家生活问题，待接到杨开智兄的信以后，可以由我处解决。淑一能常去看视两位老人则更好。

毛泽东 9月27日

毛泽东信中提到的淑一即李淑一，所说的两位老人是指向振熙和她的姐姐。

9月28日，毛臻接到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打来的电话，说是下午5点毛泽东接见他。

原来在9月间，毛远耀和胡觉民的儿子毛臻从大连速成中学毕业，来到北京，住在西单魏家胡同舅舅胡锡青家里。他想见见渴望已久的毛泽东，就提笔写了一封信，通过毛岸英的爱人刘思齐带给毛泽东。

28日下午5时许，一辆黑色小轿车开进魏家胡同，田家英准时来接毛臻。在车上，田家英不停地询问毛臻的情况：是哪里人？和主席什么关系？在哪里读书？他还交代说：

“毛主席工作很忙，谈话时间不能太长，不超过1小时吧。”

毛臻终于见到了毛泽东，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

“叔公，您好！”

毛泽东满面红光，微笑着向他伸出手来，握着他的手说：

“你叫毛世美啊，欢迎你来看我。”

他拉着毛臻在沙发上坐下来，从一个小盒里拿出糖果，递给毛臻，说：

“吃糖。”

毛臻剥了糖果，一边嚼着，一边望望毛泽东那和蔼的面容，心里的拘谨打消了许多。

“你今年多大了？”

“刚满25岁。”

“在哪里学习？”

“今年7月在大连工农速成中学高中毕业，考取了南京航空工业学校，马上就要开学了。”

“那很好，你们家里又出了一个大学生啊！要努力学习啊。要多学一些自然科学，掌握更多的专业知识。你是学航空的，国家急需这方面的人才。将来，我们的国家要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飞机啊。我们要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就靠你们年轻一代。在学好自然科学的同时，还要学些社会科学，将来都有用处。”

毛臻听了毛泽东的话，很受鼓舞，郑重地说：

“我一定不忘记叔公的教导，刻苦学习、钻研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掌握好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

“好。”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又问道：“学习上，生活上有没有困难？有困难，可以帮你解决。”

毛臻说：

“叔公，我没有什么困难。”

毛泽东说：

“以后有困难，可以找田家英同志帮助解决。”

他看着眼前的年轻人，想到了侄儿毛楚雄，便问道：

“你怎么到了大连？什么时候离开韶山的？”

毛臻就把自己的经历叙说了一番。原来这个年轻人的经历还真不简单。他在父母毛远耀、胡觉民追随毛泽民参加革命期间，以及在1937年、1938年父母又先后去了延安以后，一直留在韶山家里。1941年，毛远耀想让毛臻到延安去，曾请毛泽东写过一份介绍信，毛泽东写的是：

八路军沿途各办事处：

请协助毛远翔、毛素娥、毛世美来延安为盼。

毛泽东

后来，因为国民党掀起第2次反共高潮，毛臻3人最终未能成行。1944年，16岁的毛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入到地下斗争中。1945年8月，毛臻、毛浦珠、毛楚雄一起参加了359旅湘北支队。抗战胜利后，毛臻和毛楚雄随湘北支队开赴宣化店一带，与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5师会合。毛泽东听到这里，又问：

“楚雄在‘长沙大火’后到了韶山，那时他生活怎么样？”

毛臻说：

“那时生活很艰难。楚雄和周外婆，还有舅舅周先生，3个人相依为命，没有生活来源，饭都吃不饱，往往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毛泽东问：

“楚雄后来是怎么牺牲的？”

毛臻说：

“参加八路军后，我和楚雄在一个班，我当副班长，楚雄是战士。那时，他身体瘦弱，但在行军路上表现得很坚强，训练从不叫苦。后来，部队发现他有文化，便叫他去搞宣传工作，他硬是不肯。1946年初，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此时，部队驻扎在宣化店一带。王震、李先念同志考虑到楚雄的安全，决定由毛泽普同志带领楚雄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再由董必武同志送往延安。到武汉后，由于国民党的阻挠，他们没能走成，只好返回新四军宣化店5师驻地。来去相隔一个月，我与楚雄又相见了。4月上旬，国民党反动派撕毁了停战协议，准备发动内战。新四军5师决定突围北上。党组织决定派湖南的几个同志回去加强湖南党的地下工作。于是，我和楚雄就分了手，离开了5师。后来，楚雄随王震司令员参加了中原突围，再后来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据说他是在突围时牺牲的，详细情况，恐怕要问泽普叔。”

毛泽东惋惜地说：

“楚雄那时还很年轻啊！真可惜。如果不牺牲的话，楚雄现在也会和你一样，在学校学习文化和技术知识啊！楚雄是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牺牲的，死得其所，虽死犹荣。”

是的，毛楚雄仅比毛臻大1岁，两人虽说辈分不同，年龄却相仿，是在一起长大的，又一起师从于毛宇居先生，还一起参军。毛泽东沉默了好长时间，这才又问道：

“刚才你讲到你离开新四军5师，以后情况怎样？”

毛臻说：

“离开5师后，我于1946年5月回到湖南，在湘潭、湘南一带做地下工作。当时直接领导我的是毛远翥、王以构同志，主要任务是发动农民反抗地主剥削和压迫，进行减租减息，反对国民党打内战。1949年7月，我接到在香港秘密工作的钱之光同志通过地下党转来的信，要我去解放区。我和舅舅离开湖南，经广州到达香港。这时，东北早已解放，我父母已到了大连。于是，我通过钱之光同志介绍，乘船去大连。到达时，我父母正准备南下，我们相聚一个星期，他们就走了。我便留在大连，1950年进入工农速成中学，以后读完了初中、高中。”

毛泽东听了毛臻的介绍，赞赏地说：

“看来，你还不简单咧，经受了不少锻炼！你十几岁参加了地下党，当过小八路，20来岁读完了高中，现在又考上了大学，这很好。”

他又询问了一些韶山的老人，还说：

“这些老人都还健在吗？都还好吧？”

毛臻自己也所知不多，有的不是很清楚。毛泽东说：

“你也离开韶山好几年了，现在韶山搞了一些什么建设，乡亲们生活怎么样，烈士的后代日子过得好不好，可能不大清楚吧？有时间的话，你回去看看，代我问问他们好。”

毛臻满口答应了，他看了一下手表，谈话已接近1个小时，便起身告辞。毛泽东起身握着他的手，说：

“世美，你以后到北京来，要多来看我呀。”

毛泽东把秘书田家英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毛臻，又嘱咐说：

“到了北京，给田家英同志打个电话，就可以了。”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况，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说某某某用笔杆子杀人，以前也有不少人说过用笔杆子杀人的话。从历史上看，说用笔杆子杀人，一点不假。古往今来用笔杆子杀人的事确实不少，而且所杀的大都是一些好人、伟人。最突出的事例莫过于对秦始皇、曹操及武则天等人的颠覆：一个有贡献的政治家，在一些人的笔下，竟成了千古罪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大诗人，在一些人的笔下，反而成了白脸奸雄，连郭沫若为之翻案也无济于事；一个很有贡献的巾帼女杰，在一些人的笔下，却成了残忍、自私、淫荡的坏女人。最可怕的是那些最巧妙、最具欺骗性、似乎又很公正的笔杆子们，他们在行文中往往将笔锋一转，一切历史事实就完全变样、变味了。比如，一些笔杆子说，毛泽东早年如何如何，但是——他的晚年又如何如何。这样一来，似乎毛泽东的晚年就成为历史的定论了。那些聪明的人们尽管可以随意耍弄手中的笔杆子，可是他们忘记了，他们抹煞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祖宗！

关于毛泽东和梁漱溟的那一场争论，一些人在毛泽东身后也竞相摇动笔杆子，肆意颠倒是非。请看一看梁漱溟先生的后人是怎么说的吧！著名访谈史作家马社香曾于2013年冬访问了梁漱溟的次子梁培恕。梁培恕说：“父亲去世前一段时间，社会媒体对父亲有很多溢美之词。”“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有段时间，有文章炒作，将父亲与毛主席进行比较或褒贬，这是不客观、不科学的。毛主席的主要建树是在国家统一和国家战略方面。所以，父亲生前对毛主席从心里是敬重或非常敬重的。1953年9月父亲在会上公开顶撞毛主席后，回家很长一段时间不愿说话，也不愿外出。父亲是个脾气很倔的人，但一冷静下来，也感到自己那天说话有点过了。倒不是觉得要维护哪一个人的威信，而是感到毛主席和自己一样，都是关心国事的文化人。毛主席不是神，是人，也是有常人的中国传统的讲台面吧，哪有让人不能下台的了。两人那一年都是60岁。再就是毛主席是制定方针政策的人，了解的事情和自己的了解面着眼点也是有重大区别的。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父亲感觉到了自己的弱点，很智慧的人，犯了很简单的过失。父亲心里懊悔，但从来不跟我们表示。随着时间的过去，我们一天天地感到这一点。毛主席是国家领袖，也是父亲多年的朋友，失去这个朋友，父亲心理深处是比较懊悔的。虽然政府对父亲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并没有什么改变。全国政协会议仍然像往常一样邀请父亲参加，工资没有任何变化，正常发放，父亲乘坐小车进出的待遇仍正常保持。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对父亲待遇有些改变的话，就是过去那种对父亲四处可见的发自肺腑的尊重看不见了。毛主席去世后，媒体重新翻出这一段‘公案’，将父亲抬得比较高。父亲心中并不以为然。他的晚年是比较寂寞的，心底一直怀念与润之先生那种指点江山的友谊。”这就是历史真相，反毛论者可以休矣！

**第51章**

**“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

**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

**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

话说1953年10月1日，首都各界40多万军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周年国庆庆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新华社1日讯是这样报道的：“今年的国庆节，首都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特别感到欢欣鼓舞，因为我国人民已经取得抗美援朝斗争的伟大胜利，基本上完成了肃清三大敌人残余势力的各种社会改革运动，胜利地结束了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作，并从而稳步地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今年就是国家建设第1个五年计划的第1年。”

“天安门前的观礼台上，站着10000多名中外观礼者。毛泽东主席在上午9时56分登临天安门，广场上的人们热烈地欢呼‘万岁！’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10时正，庆祝典礼开始了。军乐团高奏国歌，全场肃立，礼炮齐鸣。

阅兵式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乘车驰过整队而立的部队前面，检阅并向他们致节日的祝贺。阅兵后，朱德总司令登临检阅台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给全国武装部队的命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宗逊率领武装部队进入广场，开始阅兵的分列式。走在最前面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学员，他们都是身经百战和功勋卓著的解放军高级指挥员，现在军事学院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苏联先进的军事科学和技术。接着是高级步兵学校、步兵学校、通信学院、炮兵学校、工兵学校、坦克学校、海军学校、航空学校的学员，他们都是祖国国防建设的骨干，现在学校里学习苏联各个兵种的专门科学和技术。接着是公安部队的行列，他们警惕地保卫国家秩序、保卫生产建设，立下了许多光辉的功迹。”

“盛大的庆祝游行接着开始了。

1300名铁路工人组成的仪仗队，抬着巨大的国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金色字标，高举600面旗帜，庄严地走过天安门广场。”“少年先锋队的队伍过来了。10000名活泼、天真的孩子，在天安门前长久地欢呼‘和平万岁！’‘祖国万岁！’‘毛主席万岁！’无数洁白的鸽子和无数彩色气球从孩子们的队伍中飞起来。这时，全场掌声雷动。两个队员跑上天安门，向毛主席敬献鲜花，他们代表着全国少年儿童们向毛主席献出了热爱和平、热爱祖国、热爱领袖的心意。13万产业工人的伟大行列，以2800名腰鼓手为前导，以70路纵队浩浩荡荡地通过天安门广场。”

“当浩浩荡荡的欢乐的游行队伍通过广场，广场上的少年先锋队队员、机关干部的广大队伍拥向主席台，向毛主席欢呼致敬时，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向广场上、观礼台上欢呼着的群众、干部和来宾不住地招手致意。这时观礼台上的欢呼和游行队伍的掌声，像奔腾着的浪头，一个接着一个。下午2时15分，庆祝典礼在热烈的欢呼声中结束以后，最后一批群众还在广场上聚集着继续欢腾，经久不散。”

在这个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会议室里，负责财经工作的陈云正在向毛泽东汇报改变现行的粮食购销办法。

此前，全国的粮食市场还是属于自由市场，在农民缴了农业税之后，粮食就可以自由上市买卖。而经营粮食的，除了国营粮食公司和供销合作社之外，还有私人粮商，后者经营的商品量约占上市总量的三分之一。一遇到灾年，或是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粮食之时，那些粮商便同国家争夺粮源，哄抬粮价，以至于带动整个物价上涨，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的生活。截止到6月30日，国家收支粮食出现了40亿斤赤字，再加上东北等主要粮食产地遭受了水灾，于是便出现了经济波动，人心不稳，对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立即责成中财委拿出具体的解决办法。

陈云在汇报中建议：在农村实行粮食征购，在城市实行粮食配售。

汇报结束后，毛泽东指示由陈云代中央起草一个《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由邓小平负责起草一个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

10月2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首先听取了陈云关于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的报告。尔后，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结论性讲话，他说：

“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体农庄）。现在是‘青黄不接’，分土地的好处有些农民已开始忘记了，他们正处在由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时期。”“我国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它有两个翅膀，即两翼，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

最后，毛泽东委托邓小平到全国粮食会议上去讲话，并嘱咐他讲粮食征购一定要联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去讲。

后来在10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决议决定：粮食统购统销从12月初开始。

10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转发华北局“关于纠正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急躁冒进倾向后的情况及当前工作任务向中央的报告”对各级党委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委：

一、兹将华北局《关于纠正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急躁冒进倾向后的情况及当前工作任务向中央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

二、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很好地将此次纠正互助合作运动偏向的工作加以总结，并对广大干部进行一次系统的教育。**在过渡时期内，党在农村的基本任务乃是完成对农业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任务是绝对不能放松的，否则即会产生右的自流主义错误；但在执行这一基本任务时，又必须从长期存在的小农经济这一基本情况出发，逐渐的、稳步的前进，否则即会产生“左”的急躁冒进错误。**只有在运动中随时注意正确地进行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才能避免可能发生的重大偏差，以保持对广大农民的巩固的团结和农业生产的稳步提高。**由于在农民小生产者中必然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趋势和平均主义倾向都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这两种思想倾向又不可免地会反映在党的队伍中来，因而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左”右偏向是极容易发生的。**在过去的四、五年内，就曾经发生过一些偏差，如在土地改革结束后不久老解放区的某些地方，为了稳定中农在当时的动荡的生产情绪，曾片面地鼓励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轻视或放松了引导农民组织起来的任务，因而一度产生了自流主义倾向；又如去冬今春不少地区在发展和提高互助合作组织方面发生了急躁冒进倾向。这些偏差都在损害不甚严重地情况下及时地获得了纠正。**各地党委在纠正去冬今春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冒进倾向时，既注意了克服错误，又注意了保护成绩，注意鼓励群众和积极分子继续前进的情绪，一般来说是做得好的。但因为当时春耕已到，在多数地区仅仅做到暂时停止了互助合作组织的冒进式的发展，着手解决了一些由于冒进而直接影响春耕生产进行的具体实际问题，尚未能及时向广大干部逐级进行系统和深入的政策教育，对于那些“左”的冒进思想，和某些在反“左”的斗争中隐蔽地生长起来的右倾思想的分析和批判则很不系统，很不深刻。其结果就影响到有一些干部至今还没有从纠偏当中得到正确的教训，对于过去某些错误办法尚有留恋；也有一些干部至今还不懂得纠偏对于运动发展的积极意义，因而或多或少地产生了消极等待的情绪。这种已在萌芽的错误倾向如果不加纠正，很可能滋长成为大的错误。**因此在现时，对互助合作运动进行一次再总结，对干部进行一次再教育，由地委级以上领导机关负责，结合当地具体经验，将工作中的正确和错误的界线划分清楚，将中央文件上所指出的党的总路线和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向广大干部，特别是县、区领导干部交代清楚，借以扩大纠偏的政治收获，为今后互助合作运动更健全更大量的发展做好领导思想的准备，还是十分必要的。如不抓住这种总结经验的机会，而只孤立地进行政策教育，是不容易收到很大成效的。这个工作，最好在秋后的适当时间内完成。至于进行方法、材料选择诸方面的具体安排，可由省委地委分头进行之。

三、华北局在此报告中，确定当前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应以发展和巩固互助组为中心环节，是完全正确的。在目前的条件下，从全国范围看来，互助组依然是适合广大农民群众生产要求和文化水平的一种合作形式；同时也是目前在克服生产困难和向自然灾害作斗争中，便于广泛地发挥农民群众力量的一种组织形式。认为互助组的形式业已过时，认为它简易好办，因而只满足于组织起来的百分比，放松了积极、具体和深入的指导工作等等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必须予以批判和纠正。

在晚解放区，须以互助组为目前发展的重点，这是无疑问的。即在多数老解放区，虽然组织起来的户数比例已经很大，并且已经出现了相当数量的高级的合作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但由于互助组仍然为数最多，而且其中的多数尚处于不够巩固不够成熟的状态，也就是说将互助组大量的提高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条件尚不具备，因而，老解放区在今后一定时期内集中主要力量于互助组的巩固、提高以及必要的发展工作，仍是十分必要的。

当然，这不是说可以放松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已经办起来的起着旗帜和首创作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只许办好、不许办坏的，如果办坏了，对整个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是十分不利的。因此，仍须以必要的力量放在领导农业生产合作社方面。**

此件及附件均可登党刊。

中共中央 1953年10月4日

10月4日晚，毛泽东给毛月秋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月秋同志：

你给我的信收到。为了了解乡间情况的目的（**不是为了祝寿。为了节约，无论哪一年均不要祝寿，此点要讲清楚**），我同意你来京一行。尚有毛翼臣（不知住什么地方）、文东仙二同志过去来信，表示要来我处一看。如你及乡间其他同志同意的话，你可约同他们二位一道来京。除你们3人外，其他没有预先约好的同志，一概不要来。你们到京住一个短期仍回家乡。

你们来时，即持此信先到长沙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找那里的同志帮忙，发给你们3人来京的路费，并请他们派一人送你们来京。

另请你持此信，到韶山、石城两处乡政府及当地的两个区政府及党的负责同志处，和他们商量，如果他们同意的话，请他们将两乡两区的情况及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问题，写成书面材料，交你带来，作为参考之用（**不是为了直接解决乡间问题）。**你们3人来时，不要带任何礼物。你们到京时间，以早为好，希望不迟于阳历10月20至25日。

顺致敬意。

毛泽东 1953年10月4日

毛泽东在信中提到的毛翼臣，系毛锡臣之笔误。毛锡臣是毛泽东的远房叔祖，在革命时期资助过毛泽东。文东仙是毛泽东的堂表弟，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农会工作。

后来，毛月秋接到毛泽东这封特大的挂号信后，见落款处赫然写着毛泽东3个草体字，信笺上洒满了一行行潇洒、苍劲的毛体草书，他高兴极了，一页接一页的读着，整整5页。信上的毛体书法，龙飞凤舞，加之多处涂抹、修改，难以辨认。毛月秋又戴上老花镜，一遍一遍地读着。由于毛泽东笔误，毛月秋无法找到“毛翼臣”其人，于是，他按照毛泽东的吩咐，到大坪乡唐家圫，把消息告诉了文东仙。2人商量好于10月底上京。

10月5日，毛泽东在曾任湖南一师心理学教员的李大梁先生来信上作了一个批示。

李大梁在信中说他家庭生活困难，希望政府能够救济。毛泽东不熟悉这位先生，便向王季范询问情况，然后在信上批示道：

“此件请李维汉同志酌处。据王季范先生称：此人希望政府予以招待，请派人了解情况，商量处理。

毛泽东 10月5日

此人系民国初年湖南第一师范的心理学教员。”

接着，毛泽东又给教育部长马叙伦写信说：

夷初先生：

闻病甚念。务请安心休养，不限时日，病愈再工作。有何需要，请随时示知。敬祝早日恢复健康！

毛泽东 10月5日

10月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批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后统一战线组织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时安排民主人士的意见”》：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级党委：

中央批准本年7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后统一战线组织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时安排民主人士的意见》，并决定发至县委、省属市委、大城市区委，望各级党委结合当地情况研究执行。

中央认为需要在这里指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不仅在过去是必要的，而且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形式，是实现党的总路线、总任务的一个方面的必不可少的工作。**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及国内反革命残余仍然存在，由于我国经济、文化仍然落后，我们需要在加强工人阶级领导和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上，继续联合资产阶级、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代表、一部分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分子、少数民族和宗教界的中、上层分子等，团结他们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及反革命残余，并利用他们的积极作用，限制他们的消极作用，以利于国家建设；同时，经过教育和斗争，逐步地争取他们中的大部分服从或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党和工人阶级已握有日益强大的政治优势和经济优势，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可以而且也不能不跟随我们走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但必须认识：这是一个复杂的、深刻的、相当长期的阶级斗争过程；是过渡时期国内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这样作，是使我国稳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条件之一，是符合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最大利益的。因此，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不是可以减弱，而是必须加强的。

近几年来，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党内对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亦有进步。但仍有一部分同志对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必要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对于在过渡时期内教育改造上述阶级、阶层分子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于我党教育改造他们的力量和他们大部分被教育改造的可能性也估计不足。这种认识不足和估计不足，就会**在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中产生盲目冒进、关门主义、敷衍主义或迁就放任的错误。**因此，各级党委必须向党内反复讲清统一战线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长期性。同时，各级党委必须把统一战线工作经常列入工作议程，定期讨论和检查，并应确定统战部门的必要的编制，调派质量较好的干部去充实统战部门，以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中共中央 1953年10月6日

10月15日，毛泽东因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外地视察，就召见了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兹将他的谈话内容抄录如次：

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

在新区，无论大中小县，要在今冬明春，经过充分准备，办好一个到两个合作社，至少一个，一般一个到两个，至多3个，根据工作好坏而定。要分派数字，摊派。**多了冒进，少了右倾。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那就是自流了。**可否超过2个？**只要合乎条件，合乎章程、决议，是自愿的，有强的领导骨干（主要是两条：公道，能干），办得好，那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责成地委、县委用大力去搞，一定要搞好。中央局、省市委农村工作部就要抓紧这件事，工作重点要放在这个问题上。

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摊派而不强迫，不是命令主义。10**月开会后，11月、12月、明年1月、2月，北方还有3月，有4、5个月可搞。明年初，开会检查，这次就交代清楚。明年初是要检查的，看看完成的情形怎样。

个别地方是少数民族区，又未完成土改，可以不搞。**个别县，工作很坏的县，比如说落后乡占30%至40%，县委书记很弱，一搞就要出乱子，可以暂缺，不派数字，**但是省委、地委要负责帮助整顿工作，准备条件，明年秋收以后，冬季要搞起来。

**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社，也可允许试一试。走直路，走得好，可以较快地搞起来，为什么不可以？可以的。**

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

总路线，总纲领，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10月开会，要讲一下。

**“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都是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的。**为什么法律上又要写呢？法律是说保护私有财产，无“确保”字样。**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大合作社也可使得农民不必出租土地了，一、二百户的大合作社带几户鳏寡孤独，问题就解决了。**小合作社是否也能带一点，应加研究。互助组也要帮助鳏寡孤独。**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的；但能搞中的就应当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的，不要看见大的就不高兴。**一、二百户的社算大的了，甚至也可以是三、四百户。在大社之下设几个分社，这也是一种创造，不一定去解散大社。所谓办好，也不是完全都好。各种经验，都要吸取，不要用一个规格到处套。

老区应当多发展一些。有些新区可能比有些老区发展得快，例如，关中可能比陕北发展得快，成都坝子可能比阜平那些地方发展得快。要打破新区一定慢的观念。东北其实不是老区，南满与关内的后解放的地方也差不多。可能江苏、杭嘉湖一带赶过山东、华北的山地老区，而且应当赶过。新区慢慢来，一般可以这样讲，但有些地方干部强，人口集中，地势平坦，搞好了几个典型，可能一下子较快地发展起来。

华北现有6000个合作社，翻一番——摊派，翻两番——商量。合理摊派，控制数字，不然工作时心中无数。东北一番，一番半或两番，华北也是这样。控制数字不必太大，地方可以超过，超额完成，情绪很高。

**发展合作社，也要做到数多、质高、成本低。所谓成本低，就是不出废品；出了废品，浪费农民的精力，落个影响很坏，政治上蚀了本，少打了粮食。**最后的结果是要多产粮食、棉花、甘蔗、蔬菜等等。不能多打粮食，是没有出路的，于国于民都不利。

**在城市郊区，要多产蔬菜，不能多产蔬菜，也是没有出路的，于国于民也都不利。**城市郊区土地肥沃，土地平坦，又是公有的，可以首先搞大社。当然要搞得细致，种菜不像种粮，粗糙更不行。**要典型试办，不能冒进。**

城市蔬菜供应，依靠个体农民进城卖菜来供应，这是不行的，生产上要想办法，供销合作社也要想办法。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现在有极大的矛盾。

粮食、棉花的供求也都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不久也会出现极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应不上。

**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社有低的，土地入股；有高的，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

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扩大——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公私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

10月18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代表时发表了重要讲话，全文如下：

**我们要和各民族讲团结，不论大的民族、小的民族都要团结。例如鄂伦春族还不到两千人，我们也要和他们团结。只要是中国人，不分民族，凡是反对帝国主义、主张爱国和团结的，我们都要和他们团结**。团结起来，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工作。有些地方可以做得快一点，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慢一点，不论做快做慢都要先商量好了再做，没有商量好就不勉强做。商量好了，大多数人赞成了，就慢慢地去做。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商量办事，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国民党势力大就压迫人。他们不仅压迫少数民族，还压迫大多数汉人。国民党是做坏事的。坏事是不应当做的。我们的干部有了错误就要批评。**我们在西藏的工作有什么缺点和错误，请你们讲，你们不同意的和你们认为不利于人民的都可以讲，便于我们纠正。**有了缺点就马上纠正，这是我们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

过去两年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之间的相互了解以及汉藏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是有进步的，西藏地方对中央以及藏族和汉族之间都是一天一天靠拢的，相信将来会更加靠拢。

**整个中国现在还很落后，需要发展。这是因为过去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压迫的关系。**他们现在已被我们赶走了，这4年来我们就有很大进步。**在国家经济恢复以后，今年开始了第一个国家建设的五年计划，预计在3个五年计划以后，我们的大工业就建立起来了。**苏联在36年前赶走了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坏人，建设了36年才有现在的成绩。我们建设起来比苏联还要快些，因为我们有苏联的帮助。中国人口很多，有五万万几千万，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土地也很广大，有3个五年计划就能建设得很好了，对西藏就会有更大的帮助了。

中央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你们的一定会帮助你们。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和进步都是有希望的。

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发展，主要靠西藏的领袖和人民自己商量去做，中央只是帮助。这点是在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里写了的。但是要做，还得一个时间，而且要根据你们的志愿逐步地做。可做就做，不可做就等一等；能做的，大多数人同意了的，不做也不好。可以做得慢一些，让大家都高兴，这样反而就快了。

总之，我们的方针是团结进步，更加发展。

毛泽东这篇讲话，后来在1954年6月25日至27日由西藏国庆观礼团团长朵噶·彭错饶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藏语向西藏僧俗官员、人民的广播讲话中首次发表。

10月25日，毛泽东给唐家圫的表侄文九明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九明同志：

10月2日的信收到。你有关于乡间的意见告我，可以来京一行，自备路费，由我补发。毛泽荣，小名宋五，是我的兄弟，住在杨林，他多次来信想来京一行，请你找他一路同来。他没有出过门，请你帮忙他。他的路费亦由自备，由我补发。你们来时如可以不找省统战部则不找，如无路费，可以持此信找统战部同志帮忙。路上冷，每人要带一条薄棉被。不要带任何礼物，至嘱。其他的人不要来。

毛泽东 10月25日

能于11月上旬到京为好。

文九明接到毛泽东的信，就去找毛泽荣，和将要进京的毛月秋、文东仙一起，怀揣毛泽东的亲笔信及韶山、石城两处乡政府的书面材料，准备上京。

10月2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北京召开了第3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在10月15日和陈伯达、廖鲁言关于建立农村合作社的第一次谈话内容。与会者经过讨论，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谈话精神。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11月5日才结束。

1953年11月初，毛月秋、毛泽荣、文东仙、文九明一行4人抵达北京，住在一个宾馆里。

两天后，毛泽东派秘书到招待所，通知毛月秋等人去中南海会见。他们来到丰泽园门口下车时，毛泽东从屋里走了出来，后面跟着他的姨表兄王季范。

“主席，您好！”

毛月秋等人见毛泽东迎上来，纷纷向毛泽东问好。毛泽荣则一口一个“主席三哥”的叫着，毛泽东也一口一个“逊五老弟”的回应着。亲人们20多年未见，今日一见面，显得格外的亲热激动。毛泽东客气地说：

“你们这么远来了，真是不容易啊！快进屋坐。”

说着，他把客人迎进会客室。毛月秋刚坐下，便问道：

“主席，您还认得我吗？”

毛泽东说：

“认得。你给我写过信，你是月秋同志嘛。”

“您写给我的信，我收到了，今天还带来了。”毛月秋亮了亮手中的信，兴奋地说：“要不是您的御书，我们可来不了啰！”

“噢！”毛泽东若有所思，问道：“你是什么字派？”

“我是贻字派。”

“那你还是叔老子啰！”

毛月秋连忙说：

“不敢不敢！你是一国之君，我是一介草民。”

这一天，毛泽东没有办公，专门同毛月秋等人叙说家常。他问道：

“钟鼎夷、毛吉臣、毛明德、毛棠困、毛鸿初那几个人还在吗？”

毛月秋说：

“有的还在，有的死了。”

毛泽东又问了这几个士绅后人的情况，接着向担任农业初级社社长的文九明问起了家乡的生产和建设情况。他还特地把秘书叶子龙叫来做记录。文九明汇报说：

“土改结束了，区里、乡里，干部们没有好多事做了，说要发展生产，这样，从县到区，由区到乡，再到村，发下来许多表格。表格内容无所不包。比如，种了多少菜，萝卜多少，白菜多少。养了多少猪，肥猪多少，架子猪多少。积了多少肥，土肥多少，人粪畜粪多少，到来年春插还能积多少。区干部催乡干部，乡干部催村干部，干部们捧着表格，一户一户追着填。我说，这么多表格要填，我每天就守着尿桶茅厕房，还有猪屁股牛屁股，什么也别想干啦！这话传到区干部的耳朵里，他们就找上门来批评我，说我讲怪话，是骄傲自大。”

毛泽东越听越生气，说道：

**“不是你骄傲，是他们骄傲，连中央的指示都不听，不是骄傲是什么！”**

他说的中央指示，就是3月19日他为中央起草的专门解决“五多”问题的文件。他指着叶子龙说：

“你要中央办公厅查一下，在对待中央文件上，看哪些人当了耳旁风！”

中午，毛泽东设便宴招待客人，嘱咐厨师按韶山家乡风味办了8大碗，有扣肉、肉卷子、清蒸鱼和茄子等，还有文九明从家乡带来的火焙鱼。毛泽东叫毛月秋坐上座，毛月秋不肯，他说：

“天地君亲师，除了父母就是皇帝为大。你是主席，好比皇帝老子，我们是小小老百姓，哪有老百姓坐上席，‘皇帝’反坐下席的道理！”

毛泽东说：

“那是封建社会，是旧习俗，现在新社会了。老规矩要改啊！”

毛月秋说：

“那你平日开会，出席宴席，又总是坐上席呢！”

“那是国家大事。在公开场合，我当然要坐上席。如今是在我屋里，你们是客，我是主，哪有主人坐上席，客人坐下席的道理!”毛泽东说罢，又抑扬顿挫地念道：“‘在家不会迎宾客，出外方知少主人。’你们看，连《增广贤文》上面都讲了，还不坐上头？”

毛月秋拗不过毛泽东，只得勉强坐了上席。毛泽东不停地给客人敬菜，他把扣肉一片一片地夹到客人碗里，说：

“这扣肉烂了，多吃几块啰！”

毛泽东爱梳头，饭后拿着梳子梳头，一边梳一边对毛泽荣说：

“逊五，梳头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你们也要保护身体，要注意劳逸结合，饮酒不能过量。”

毛泽荣本来以为三哥当了国家主席，生活一定很奢华，衣食住行都是常人所无法企及的，哪知道他的生活十分简朴，穿的是褪了色的布衣，衬衣还打了补丁；住的房子里面陈设简单，没有什么花草和书画；吃的也是粗茶淡饭，没有什么美味佳肴。他有些不理解，他说：

“三哥，你当了主席，时时要考虑国家大事，要保重身体，生活要过得好一点。”

毛泽东笑着说：

“我的身体不是很好吗？生活也算不错，够得了中上水平了。”

毛泽荣不以为然，他说：

“听说当年慈禧太后的一顿饭要吃去800两银子，那当然要不得。不过，你也不要太刻薄了自己。”

毛泽东严肃地说：

**“我们国家底子薄，人民生活很不富裕，我们当干部的是人民的公仆，要时时刻刻为人民着想，不能贪图安逸和享受呀！**现在和将来，我们都摆不起阔气。唐代诗人李商隐有两句诗警醒世人：‘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你想想，我们能不养成一种勤俭节约的风气吗？全党、全国各级机关，各级干部，都要厉行增产节约，国家才能建设好。”

下午，李敏、李讷放学回来了，毛泽东把两个女儿唤到跟前，吩咐道：

“娇娇、李讷，快过来见见长辈。”

李敏、李讷朝客人鞠了一躬，就进房间里面去了。毛月秋、文东仙等人很高兴，问起毛泽东的妻室。毛泽东用家乡话说：

“如今咯个堂客叫江青，她身体不好，长期在医院养病。”

“那你原来的爱人叫什么名字？”

“原来的堂客姓贺，名子珍，在延安时患病，去了苏联，一直在那里治疗，解放前回国。如今住在上海。她走了以后，中央考虑我身体不能长期没有人照料生活，便批准我跟现在的这个堂客结婚。”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招呼表兄王季范与毛月秋等4人合影留念。当天晚上，毛泽东留几位客人在家里歇宿。

第二天早晨，毛月秋等人吃了饭，才回到招待所。

文东仙的眼睛患了一种怪病，眼睫毛往里长，乡下人称之为“红领锁眼”。毛泽东安排他到医院治疗，开了刀，剪除了睫毛。他住院一星期，病就痊愈了。出院这天，毛泽东把他接到丰泽园菊香书屋，寒暄过后，问道：

“二十五表弟，还记得当年围炉向火的事情吗？”

“记得。”文东仙说：“当然记得！”

那还是在1921年正月初八晚上的事情。毛泽东和两个弟弟、弟媳王淑兰、妹妹毛泽建在老家韶山冲围炉谈话，决定毁家兴邦，投身革命。那时候，表哥文南松和堂表弟文东仙当时也在场。毛泽东又问起乡下的生产和医疗卫生情况，他说：

“韶山那边的情况我了解一些，唐家圫的情况怎么样？”

文东仙回答说：

“有您和共产党的领导，贫苦农民翻了身，乡下的情况比起过去好多了。”

“乡下还有闹粮荒的没有？”

“基本上没有了。”

“不，我看有。”毛泽东摇摇头说：“乡下还有缺粮户。湘乡平均每人有1亩2分田，韶山才只有9分，产量不高，面积又小，除完成国家征购外，留下的粮食就不多了。怎么没有缺粮的呢？**我们要想办法提高产量，解决好吃饭问题。我们有五六亿人口，吃饭是一件大事，不解决好这个问题，人民就要饿肚皮，我们就面临危机。**”

文东仙认真地听着，他感到毛泽东身居高位，心系人民，体恤百姓疾苦，真是令人钦佩。只听毛泽东又加重语气说：

“**除了解决吃饭问题外，我们还要解决一个医疗问题。现在，据说农民生了病请郎中，要称肉打酒，送情送礼，花了四五块钱，药还没进口，还要花钱，这怎么行？今后，一个区要建一个医院，一个乡要有几个流动医师。**”

毛月秋等人在北京的日子里，毛泽东多次陪他们，或者派人陪他们游览长城、十三陵、故宫、历史博物馆，北京的名胜、风景差不多都游到了。他们住了几天，觉得心满意足了，便去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歉意地说：

“对不住，我工作忙，没有时间陪你们。”

毛月秋连忙说：

“快莫这么讲！我们住了咯样久，您咯里招待既热情又周到，我们都领受不起了。耽误了您许多时间，还花费您不少，我们真不好意思！”

“我没有什么好的东西送你们，就送点衣服和日用品，还有一点零钱。”

毛泽东说完，叫秘书拿来礼物，送给每人100万元，一套新棉衣裤，还有内衣、鞋帽、蚊帐；另外送给毛月秋一件呢子大衣，一支钢笔、一副眼镜；送给毛泽荣青蓝色呢子大衣。

毛泽东最后对文九明说：

“这次你给我送来两份厚礼。一是唐家圫的火焙鱼很香，我感谢你。二是你那条好意见，更是金不换。这样的意见我如今难得听到，你要常来。”

秘书在送毛月秋等人回招待所的路上对他们说：

“你们这次来北京，食宿和添置衣服，都是主席自己出的钱。他的钱并不多，这个月还用亏了哩。”

不久，毛月秋、文东仙、毛泽荣、文九明4人回到了家乡。

欲知毛泽东与家乡父老乡亲们以后的交往，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3年10月15日及下一章将要说到的11月4日召见陈伯达、廖鲁言的两次谈话，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的纲领性指导意见，只要认真读一读，就会感觉到他的思虑是多么的缜密，预见性是多么的准确！一个大国领袖若无此种胸襟、智慧和才能，谈何治国强国？倘若再胸无点墨，夜郎自大，甚而至于炫耀皇帝的新装，那就只会徒留笑柄耳！

**第52章**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即变私有制为公有**

**制，使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话说1953年11月4日，也就是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第3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毛泽东再次召见了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谈话内容如下：

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合实际就错了。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如果不去发掘，那就是稳步而不前进。**脚本来是走路的，老是站着不动那就错了。有条件成立的合作社，强迫解散，那就不对了，不管哪一年，都是错的。“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倒错了的，应当查出来讲清楚，承认是错误，不然，那里的乡干部、积极分子，就憋着一肚子气了。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好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各项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切都有统属了。

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内社外都有矛盾。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半社会主义的，社外的个体农民是完全的私有制，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互助组跟农业生产合作社不同，互助组只是集体劳动，并没有触及到所有制。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个人所有的土地、大牲口、大农具入了股，在社内社会主义因素和私有制也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要逐步解决。到将来，由现在这种半公半私进到集体所有制，这个矛盾就解决了。**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是稳的，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也叫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要叫集体农庄）。**一般讲，互助组还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

有一个时候，曾经有几个文件没有提到互助合作，我都加上发展互助合作或者进行必要的和可行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这样一类的话。有些人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因而就特别反对对农民干涉过多。那个时候，也确是有些干涉过多，上面“五多”，条条往下插，插得下面很乱。“五多”那一年也不行，不仅农村不行，工厂也不行，军队也不行。中央发了几个文件，反对干涉过多，这有好处。什么是干涉过多呢？不顾需要和可能，不切实际，主观主义的计划；或者计划倒合实际，使用命令主义的方法去做，那就是干涉过多。主观主义、命令主义，一万年也是要不得的。不仅是对于分散的小农经济要不得，就是对于合作社也是要不得的。但是，不能把需要做、可能做的事，做法又不是命令主义的，也叫作干涉过多。检查工作，应当用这个标准。凡是主观主义的，不合实际的，都是错误的。凡是用命令主义去办事，都是错误的。**稳步不前，右了，超过实际可能办到的程度勉强去办，“左”了，这都是主观主义。冒进是错误的，可办的不办也是错误的，强迫解散更是错误的。**

“农村苦，不大妙，措施不合乎小农经济”，党内党外都有这种议论。**农村是有一些苦，但是要有恰当的分析。其实，农村并不是那样苦，也不过10%左右的缺粮户，其中有一半是很困难的，鳏寡孤独，没有劳动力，但是互助组、合作社可以给他们帮点忙。他们的生活比起国民党时代总是好得多了，总是分了田。灾民是苦，但是也发了救济粮。一般农民的生活是好的，向上的，所以有80%至90%的农民欢欣鼓舞，拥护政府。**农村人口中间，有7%左右的地主富农对政府不满。“农村苦，不得了了”，我历来就不是这样看的。有些人讲到农村苦，也讲到农村散，就是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但是他们讲分散性的时候，没有同时讲搞合作社。对于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互助合作，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

总路线的问题，没有7、8月间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7、8月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批评薄一波就是批评他离开总路线的错误。总路线，概括的一句话就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次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于社会主义也是很大的推动。接着又开了这次互助合作会议，又是一次很大的推动。鉴于今年大半年互助合作运动缩了一下，所以这次会议要积极一些。但是，政策要交代清楚。交代政策这件事很重要。

**“积极领导，稳步发展”，这句话很好。**这大半年，缩了一下，稳步而不前进，这不大妥当。但是，也有好处。比如打仗，打了一仗，休整一下，再展开第2个战役。问题是有些阵地退多了一些，有一些不是退多了，而是本来可以发展的没有发展，不让发展，不批准，成了非法的。**世界上有许多新生的正确的东西，常常是非法的。**我们过去就是“非法”的呀，国民党是“合法”的呀。可是这些非法的社，坚持下来了，办好了，你还能不承认吗？还得承认它是合法的，它还是胜利了。

会上讲了积极领导，稳步发展，但是也要估计到还会有些乱子出来。你说积极稳步，做起来也会是不积极领导，或者不稳步发展。积极稳步就是要有控制数字，派任务，尔后再检查完成没有。有可能完成而不去完成，那是不行的，那就是对社会主义不热心。据检查，现在有5%到10%的社减了产，办得不大好，这就是没有积极领导的结果。当然有少数社没有办好，减了产，也是难免的。但是如果有20%甚至有更多的社减了产，那就是问题。

**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这一点同志们必须弄清楚。现在，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变为不合法。**在3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的路。**

县干部、区干部的工作要逐步转到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这方面来，转到搞社会主义这方面来。他们不办社会主义之事，他们做什么，办个体经济之事吗？县委书记、区委书记要把办社会主义之事当作大事看。一定要书记负责，我就是中央的书记。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各级书记，都要负责，亲自动手。中央现在70%至80%的精力，都集中在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事上。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是办社会主义。**各级农村工作部的同志，到会的人，要成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专家，要成为懂得理论、懂得路线、懂得政策、懂得方法的专家**。

城市的蔬菜供应，主要是要搞计划供应。大城市和新发展起来的城市，人口很集中，没有蔬菜吃，哪能行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在城市郊区搞互助组，蔬菜的生产供应不好解决，可以不经互助组，就搞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甚至搞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一下。

**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提出来了，今冬明春，到明年秋收前，发展32000多个，1957年可以发展到70万个。但是要估计到有时候可能突然发展一下，可能发展到100万个，也许不止100万个。总之，既要办多，又买办好，积极领导，稳步发展。**

这次会开得有成绩。现在不开，明年1月再开，就迟了，今年冬天就错过去了。明年3月26日再开会，要检查这次计划执行得怎样。这次会决定下一次会议的日期，并且决定下次会检查这次会决议的执行情形，这个办法很好。明年秋天还要开一次会，讨论规定明冬的任务。

11月5日，中央第3次农业合作会议根据毛泽东在10月15日和11月4日与陈伯达、廖鲁言的两次谈话精神，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

11月11日上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元帅应毛泽东的邀请，来华进行正式访问。毛泽东、周恩来特派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前往迎接。

金日成身材高大，微微发胖，他身着黑色呢子大衣，头戴黑色礼帽，乘坐专列由丹东入境，后经沈阳抵达天津。一路上，各省市党政军负责人均到车站迎送。

11月12日12时，金日成的专列驶出天津站，于下午3时整驶入北京站。在站台上欢迎金日成的群众挥舞着鲜花、彩旗，迎接客人。周恩来、彭德怀、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迎上前去，同金日成亲切握手。

11月13日，毛泽东在菊香书屋的会客厅里亲切会见了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政府代表团。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朝鲜民族是一个勇敢、刚毅的民族，朝鲜战争胜利的事实有力地向全世界证明，一个把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民族是任何一种力量也不能战胜的。朝鲜人民的胜利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反帝斗争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金日成首相对3年来中国人民在朝鲜保卫祖国斗争中给予的无私援助表示真诚的感谢。他称赞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不怕牺牲、敢打硬仗，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光辉业绩将载入朝鲜史册，千古流芳。

毛泽东和金日成还就朝鲜停战后的局势、朝鲜战后的重建和经济恢复工作及两国经济、文化关系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友好协商。

11月22日，周恩来、金日成就两国政治、经济及文化关系方面的有关问题达成了协议。**中国政府决定：从朝鲜战争开始一直到1953年底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费用，一律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同时从1954年至1957年，中国政府将再拨款人民币8万亿元，无偿地赠送给朝鲜。**

11月23日，《中朝谈判公报》、《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在北京正式签订，周恩来、金日成庄重地代表本国政府在公报和协定上签了字。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和金日成紧紧握手，互致祝贺。

11月23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胡志明，他写道：

“目前法国人民要求经过和谈结束越南战争的压力愈来愈大，法国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也认为侵越战争得不偿失，主张和谈，拉尼埃（法国总理——笔者注）也两次正式表示愿意谈判。但是美帝从朝鲜停战后便企图使侵越战争扩大化，胁迫法帝打到底。在这个时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正式表示愿意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越南战争，是需要的，合时宜的。只有这样，才能把和平旗帜抓在我们手里，更进一步鼓励法国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积极斗争，揭穿法国反动派说越南不要和平把战争责任推到越南身上的阴谋。也只有这样，才能利用和扩大法美之间的矛盾。和帝国主义和谈，同战争一样，也是一种长时间的尖锐的斗争。”“朝鲜停战的经验证明，只有我们力量强大，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愈多愈痛的时候，和谈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应当边打边谈，谈谈打打，两者不可偏废。决不可因为和谈而稍为放松自己在军事上打击敌人的努力。”

1953年12月上旬的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召见地质部长李四光。毛泽东问李四光：

“我国天然石油的前景究竟怎么样？我们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外国人说，中国贫油。如果天然石油不行的话，就要早一些下决心搞人工石油。”

李四光依据自己多年的研究，以乐观和十分肯定的语气回答说：

“天然石油的前景大有可为。在我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是丰富的。在我国新华夏构造体系内，在东北的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包括渤海），还有黄海、东海和南海；在江汉平原；在北部湾；在西边巴晋和硕，鄂尔多斯盆地，四川盆地，都有‘有经济价值的沉降物’。它们虽然都是中新生代的陆相地层，但从沉积的情况看，都有生油、储油的条件。我不同意‘中国贫油论’。现在，关键是要抓紧做地质勘探工作。我们应该打开仅局限于西北一隅勘探石油的局面，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以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石油地质普查工作，找出几个希望大、面积大的含油地区。”

毛泽东听李四光这么一说，高兴地笑了，当即做出了开展石油普查勘探的战略决策。

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总结了过去几年来的工作，确定了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总方针和总任务。会议讨论了军队的组织编制，加强部队训练、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制，以及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等有关军事建设的重大问题。

**会议决定继续第3次精简部队，把全军简编为350万人**，在体制上重新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设立国防委员会和国防部，并形成八总部（即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领导体制，同时还将6大军区改划为12大军区（即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武汉、昆明、成都、兰州、内蒙古、新疆、西藏军区，后又组建福州军区，发展为13大军区），将军区体制由4级改为3级（即军区、省军区、军分区)。到1954年6月，全军已精减47.2万余人，到年底基本完成计划。

12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关于修改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两项决议的通知”，对刘少奇的提法提出纠正，通知中说：

中央在经过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审议以后，认为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中“关于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的提法，是不妥当的。”“应改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国家就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的时期。党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之后，还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一切党员必须具有为彻底实现这些目的而坚持奋斗的决心。**’”

12月13日，毛泽东在给胡乔木并告杨尚昆的信中写道：

“此件已看一遍，比前好多了。我作了一些增改，请你邀伯达、凯丰看一下，看是否妥当。如有意见请告我。如无意见即送尚昆照扩大名单印发各同志阅看。最好今天即能印发，并请各同志明天（14）即看一遍，准备提出修改意见。估计还会有些修改的。”

原来，毛泽东要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一个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结果在提纲写出后几易其稿，他还是不太满意，看了第7稿才比较满意，便又作了一些重要修改和增补，并把这个提纲定名为《**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经过毛泽东修改的这个提纲，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了更为完整的表述：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毛泽东还写道：

“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工作的中心。”

关于过渡时期的开始时间，毛泽东觉得有解释的必要，于是他在提纲中加写了一段这样的说明文字：

“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而需要有两年至3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管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势。”

毛泽东还对一些错误的观点和提法提出了批评，他写道：

“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1949年3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做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背二中全会的原则。**”

毛泽东又在提纲中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一句话后面，加写了一段文字，他写道：

“**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的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及最后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

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经过毛泽东修改和审定的中央宣传部《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

有历史学家评论说：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一化三改’，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以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两翼，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统一，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即变私有制为公有制，使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12月13日，毛泽东给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的夫人廖静文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静文同志：

10月间的信和徐先生所绘奔马，早已收到，甚为感念。兹派田家英同志询问你们的情况，如有困难，请告之为盼！顺致敬意。

毛泽东 12月13日

徐悲鸿是在1953年9月26日全国第2次文代会上突发脑溢血而不幸逝世的。廖静文在整理徐悲鸿的遗物时，见到了徐悲鸿所画的一幅准备送给毛泽东的奔马。画面是用墨泼绘的骏马，它高高地昂着头，如疾风闪电般地向前飞奔。徐悲鸿在画面的右侧，用苍劲的字题写着：“百载沉疴终自起，首之瞻处即光明。”廖静文托人将这幅画送给了毛泽东。

田家英拿着毛泽东的亲笔信走出毛泽东的住室，准备到北京大学去找在那里读书的廖静文。毛泽东又把他叫了回去，嘱咐他说：

“要告诉廖静文同志，徐先生一生襟怀坦白，是个好人，我很敬重他。一定要把徐先生遗下的幼小儿女好好抚养成人，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全力帮助的。”

12月13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央农村工作部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时，为了说明发展初级农业合作社是推动互助合作运动、引导农民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社（即高级社）的适当形式，他特意加写了一段文字：

“这是自然地不勉强地吸引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这种形式，使个体农民和加入了互助组的农民在他们进到高级的、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组织的时候不感到突然，而是事先有了精神的和物资的准备的，因而能够避免由于突然上升而引起的种种损失。”

12月15日，苏联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尤金向毛泽东递交了国书。苏联政府是在12月2日任命尤金接替库兹涅佐夫为驻华大使的。

尤金在致词中说：我将不惜自己的一切进一步加强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同盟，增进同中国的兄弟般的友谊和亲密合作。

毛泽东在致词中说：中国一贯重视同苏联之间的兄弟般的友谊。我本人和中国政府热烈欢迎您出任苏联驻华大使，中国政府将全力支持您的工作。

12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制定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后来，《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于1954年1月9日向全国公布。

12月19日，毛泽东看了由彭德怀转来的华东军区参谋长张震写给中央军委的报告后，便将报告退还给了彭德怀。

原来在朝鲜停战后，彭德怀责成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在10月份制定出攻打金门的作战计划，并报毛泽东审阅。总参谋部在作战计划中提出，要在1955年1月以前完成解放金门的一切准备工作。毛泽东看了计划没有立即表态，他要求有关部门负责人认真考虑攻打金门的问题。于是，张震便将他们的意见上报给中央军委。报告中列举了目前攻打金门的各种不利因素，并提出两条建议：1、在攻打金门之前，可以先攻克上下大陈岛，使兵力便于集中使用；2、将攻打金门的战费节约下来，先修通福建铁路，便于攻取金门、台湾时的保证供应，就经济意义而言，也可以使物资得到交流。

毛泽东在报告上的批语是：

“此意见可注意。”

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目前政权性质问题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各分局各省市委，并告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关于现阶段我国政权性质问题，各地在学习总路线时有很多讨论，有些同志在向一般干部作报告时宣布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甚至片面地引用中央同志的话，说其他阶级（主要指民主人士）在联合专政中只等于零（忘记了又不等于零的一个方面）。中央认为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本无实质上的区别，省级以上高级干部了解这个问题是有必要的，但对一般干部这样解释和宣传却是不适宜的，发展这一讨论也是不必要的。**这是因为：

一、从实际上说，现在的政权的统一战线的组成并没有妨碍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相反地是有利于这一领导的，并没有妨碍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相反地是有利于这一事业的，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应当继续保持政权的统一战线性，而**如果广泛地宣传它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势必引起许多民主人士的不安、不满和种种揣测，引起资产阶级的恐慌心理，这在目前时期就是不利的，不策略的，**必须将对党内省市以上高级干部在谈到此问题时加以说明和目前有些地方那样对很多人普遍讲的办法加以区别，我们应取前者，不取后者，尤其不要引用中央同志的话。

二、**从理论上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两书中都已明确说明我们的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说明对于中国工人阶级在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的领导地位是适合的，不加修改并无不便，如目前即加以修改则反而不便。**因此，各地领导机关应注意控制这一问题的宣传，停止在广泛的干部中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实质上由共产党一个党决定纲领政策和计划）的宣传和讨论，如已宣布过的应予停止，并说明理由。

中央 1953年12月19日

12月22日，毛泽东审阅了华东军区关于攻打金门作战费用的预算，尔后连同他的批语送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传阅。

此前，总参在10月15日批复华东军区：攻打金门作战行动的代号为“联合作战演习”。陈毅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12月21日，彭德怀在将预算送毛泽东审阅前，也提出了意见：“攻金门问题耗费巨大，和陈毅同志商定，暂不进行，待勘察后再准备”；“预算甚大，无十分把握，宜暂缓准备，待侦察后看情况再决定。”

毛泽东在这份预算上写的批语是：

“请彭处理。陈毅同志意见，目前不打金门为有利，否则很被动，且无攻克的充分把握。我同意此项意见。需费近5万亿元，无法支出，至少1954年不应动用如此大笔经费。”

12月下旬，毛泽东鉴于高岗、饶漱石的阴谋活动日甚一日，这才下决心解决他们的问题。

原来在1953年9、10月间，4月份才由华东局第一书记调任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在第2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公开进行了反对刘少奇的活动。

饶漱石其人，身材短胖，满头黑发，两道浓眉，眼睛小而明亮，留有上髭。此人话语不多，且言不尽意，常常是欲言又止，作人做事十分小心谨慎的样子。

此时的饶漱石，一面带头批判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一面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以“反安倒刘”配合高岗的夺权活动。

为此，毛泽东在一天晚上和中央书记处的几位负责人找来饶漱石谈话，他说：

“饶漱石同志，你犯了众怒，知道吗？‘外沽清正之名，内结虎狼之势’，你肯不肯承认？”

饶漱石顿时像遭了雷劈霜打似的，目光散乱，神情呆滞，不知如何回答。坐在对面的周恩来赶紧提醒他说：

“主席问话，你为什么不回答？”

饶漱石将身子移动一下，结结巴巴地说：

“主席，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毛泽东并未生气，喝了一口茶，说：

“曲木忌日影，谗人畏贤明。你明白吗？”

饶漱石额上渗出了汗，站起来回答道：

“报告主席，本人浅陋，确实不明白您的话的深意。”

毛泽东挥了挥手说：

“坐下，有话坐下来说嘛。一行书不读，身封万户侯，你这个中央组织部长原来不读书啊。‘外沽清正之名，内结虎狼之势’，出自《红楼梦》第二回，是骂贾雨村的。贾雨村靠贾府之力，谋补上金陵应天府这一肥缺，他却贪赃枉法，被革了职，属于儒林败类。至于‘曲木忌日影，谗人畏贤明’，那是唐代孟郊的诗句，再浅显不过了。你饶漱石是不是曲木？是不是谗人？最好还是由你自己来回答。好了，闲话少说。中央委托你和少奇同志主持全国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你不按中央原先订下的方针开会，而妄自作主，政出旁边，呼朋引类，搞什么‘批安射刘’，吵吵闹闹，批批斗斗，已经一个多月过去了，直闹得会议开不下去……安子文、刘少奇果真就那么罪大恶极，非打倒不可吗？这里，**我不是说安子文没有犯严重的错误，包括刘少奇在内，有错误就要批评，甚至处理。但你饶漱石作为组织部长，上台即斗，外善内恶，巧言令色！**你饶漱石是不是这样？”

毛泽东的话，一字一句像是鞭子抽打在饶漱石身上。他感到不寒而栗。周恩来口气略显温和地对饶漱石说：

“主席这样苦口婆心教导你，你为什么不检讨一下，认个错？你作为中组部长，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带头闹事，整整一个多月，大会闹了小会闹，更想**把安子文、少奇同志或许还加上我一起拉下马**……你也是1925年入党的老同志了，倘若再把中央的指示和主席的教导当成耳边风，坚持你们闹分裂的那一套，不认错，不改正，最后只能采取组织措施来处理！”

饶漱石听了周恩来这番软硬兼施的话，头脑冷静下来了，感到这是他向毛泽东当面陈诉的最好机会，便硬着头皮说：

“主席，各位同志，我承认犯了严重错误。**我承认，我名义上是斗争安子文同志，实际上是针对刘少奇同志这几年来向资产阶级妥协投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也是主席多次严肃批评过的。我说安子文在财经会议上一言不发、沉着对抗、包庇薄一波也是冲着刘少奇的。”**

毛泽东再次敲了敲桌子说：

“你饶漱石错误估计了形势，自以为得计，不以为愚蠢，在背后大做手脚，以为中央没有察觉？**安子文私拟两份中央领导人员名单，错误严重。我历来劝诫大家，要搞阳谋，不要搞阴谋。你们这些背后动作，我绝不允许！”**

饶漱石见毛泽东对他穷追不舍，只得低头认错：

“主席，我愿意检讨，愿意改正，接受主席和大家的教育批评。”

毛泽东环视了与会者一眼，说：

“饶漱石愿意认错，我们无比欢迎。那么再问你一个问题，请当着大家的面回答，你们在组织会议上的活动，是自发的？还是有组织的？”

饶漱石赶紧说：

“主席，大家是自发的。我看了薄一波、安子文的档案，有很多历史疑点，是我先在会上提出来的，大家也有同感，就形成了一致的局面。”

这时候的高岗也仍然把毛泽东的警告当做耳旁风，到处找人谈话，曾经找过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黄克诚等人，企图联合中央各方面的领导人，与他一起搞掉刘少奇。

高岗到陈云处去探病，寒暄了几句，便切入正题，他说：

“毛主席现在正在考虑中央是否设总书记或副主席，你有什么看法？”

陈云说：

“近来身体不好，主要任务是养病，没有考虑这些问题。”

高岗开门见山地说：

“我不主张设立总书记，还是设副主席为好。副主席也不要总是刘、周，多搞几个，你一个，我一个。”

陈云说：

“这样不妥，副主席应该由政治局讨论，由全体中央委员投票选举。”

高岗又找邓小平谈话，他说：

“毛主席说党内要分一二线，他准备退到二线，你说谁到一线接班为好？”

“那还用说，不就是他们几位吗？”

邓小平指着挂在墙上的几幅画像说。此时党内规定，正式场合只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画像。高岗指着刘少奇的画像说：

“他不行，他不成熟，拱倒他，我们来。”

邓小平说：

“你这种想法不对，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

事后，陈云和邓小平都找到毛泽东，将高岗的这些活动如实报告给了毛泽东。

此一时期，高岗的家里门庭若市，车水马龙。他的会客室里放了不少刘少奇的讲话稿，随便让人翻阅。他也大讲刘少奇讲话稿中的那些毛泽东批评过的错误。

毛泽东提出中央工作分一线二线以及多次批评刘少奇思想认识上的错误以后，高岗认为时机已到，特别是在毛泽东休养期间，党中央的工作按照惯例由刘少奇主持，他更是竭力反对，企图把刘少奇拉下来，使自己成为毛泽东的唯一助手。毛泽东虽然多次当面或在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思想错误，但是，他还是要保护刘少奇的。

过几天，毛泽东就要去杭州了。他在临行前，开了一次会议，高岗、罗瑞卿都在场。毛泽东交代说：

“我不在北京时，由刘少奇同志代理。”

毛泽东又说：

“现在北京有人吹阴风，搞地下活动。我们大家要注意。”

当天晚上，高岗打电话给罗瑞卿说，要到罗瑞卿家里看望他，罗瑞卿说：

“你不要来，有事我去你那里谈。”

罗瑞卿放下电话，马上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

“快去，看他讲什么。”

罗瑞卿奉命来到了高岗的家里，高岗说：

“要好好注意主席的健康。毛主席检查身体时，要在附近不离左右地看着。”

高岗反复强调，要注意主席的健康，不要马虎。高岗还说：

“要成立部长会议，我赞成林彪。”

罗瑞卿说：

“我会注意主席的健康。部长会议的事，主席可能不赞成你的意见。”

罗瑞卿告辞后，马上将高岗的话报告了毛泽东。

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29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把高岗、饶漱石的问题端了出来。他说：

“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呢，不是阳风阳火压倒阴风阴火，就是阴风阴火压倒阳风阳火。他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

毛泽东建议，由政治局搞一个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12月24日下午，毛泽东偕同江青离开北京，带领宪法起草小组中的3个成员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去杭州。陪同他的还有罗瑞卿、杨尚昆、汪东兴、叶子龙。

此时，姚淑贤刚被分配到毛泽东专列上担任医务工作。毛泽东和卫士们聊天时，漫不经心地伸出两腿，裤管有些短，长筒线袜上有块赫然醒目的大补丁，姚淑贤看着非常惊讶。

晚上，卫士封耀松让姚淑贤给毛泽东补一件睡衣。姚淑贤看看睡衣，臂肘处已经磨得很薄了，还有一个洞。专列上没有布，只有医用纱布，怎么好用纱布补呢？姚淑贤说：

“这么大的国家，怎么能叫主席穿这种睡衣？”

封耀松却说：

“用纱布没事，叠上两三层就行。主席不讲究，听我的没错。唉，你还是不了解主席呀。以后日子长久了，你就明白了。”

姚淑贤只好用纱布给毛泽东补好了睡衣。没想到一直到1965年，姚淑贤在离开毛泽东时，毛泽东还始终穿着这件睡衣。

姚淑贤在专列上第一次陪毛泽东吃饭，餐车服务员把辣椒摆在她面前，毛泽东比划着手势说：

“不对，不对，辣椒是放我这边。女孩子受不了这个辣，把炒菜放她那边。”

他吃着辣椒比吃水果糖还有味，笑着说：

“敢吃这种辣子，世界便再没有不敢做的事。当年起来造反的红军，没有不吃辣子的。”

吃罢米饭，毛泽东又将筷子伸向酱豆腐，筷子没有夹碎酱豆腐，却把那半块一起夹了起来。他稍一犹豫，就全塞进了嘴里。姚淑贤看着说：

“哎呀，多咸呀！”

毛泽东边嚼边笑着说：

“它跟我捣蛋，以为我不敢吃了它。”

姚淑贤说：

“快吐了吧。”

毛泽东嚼着酱豆腐，说：

“我才不吐呢。我这个人哪，不喜欢走回头路，不愿干后悔事。”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60大寿，照理应该好好庆祝一番。但他不愿给地方上添麻烦，就在专列上过了一天。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们还是坚持要为他过寿，正在秘密地准备着晚宴。

晚上7点许，饭菜端上了桌，6个热菜：木耳炒肉、牛肉炖萝卜、苦瓜炒肉、油菜、米粉肉、鱼；4个凉菜：雪里蕻、小辣椒，豆豉、咸鱼；主食是长寿面、花卷。毛泽东一看就明白了大家的意思，望了江青一眼，严肃地说：

“中央已有决定，不能祝寿。你们为什么还要为我祝寿啊？”

李银桥忙说：

“主席，这是家常便饭，不过分，还是可以的。”

“银桥，又是你出的点子吧？”

“主席，这次你可说错了，这是大家想到的，我们集体决定的，共同来办的。”

“哎呀，是集体决定的事，那我就不好办了！好吧，我服从，那我们一起来过生日吧。”

李银桥见毛泽东同意了，忙招呼了一声，卫士、机要、医务等各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高高兴兴地跑了过来，围坐在毛泽东身边。孙勇说：

“主席，祝您生日快乐！”

“主席生日快乐！”

大家也异口同声地祝贺着。毛泽东站起身，高兴地点点头，说：

“好！谢谢同志们！拿酒。”

李银桥拿来葡萄酒，在每个人面前的高脚杯里都倒上了酒。李家骥也跑到值班室里拿来了用面做的6个蒸熟的大寿桃，一字儿摆在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微笑着端起酒杯，说：

“谢谢大家，祝你们健康成长！干杯！”

他和工作人员们一一碰杯，干杯。落座后点上一支烟，轻轻地吸了一口，以手示意大家吃菜。他两边的工作人员你一筷我一筷地给他夹菜，毛泽东连忙说：

“好，好了，我自己来。”

酒过三巡，该吃长寿面了，毛泽东接过一碗，吃了两口，说道：

“吃长寿面能长寿吗？祝寿能使人长寿吗？我看不能。如果能的话，那就天天吃长寿面天天祝寿就行了。这样能调节气氛才是真的。”

专列到了上海，毛泽东向前来迎接他的谭震林、张鼎丞、粟裕3人谈了饶漱石的问题。即将奉调到中央组织部任第一副部长的张鼎丞问毛泽东：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

毛泽东说：

“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这是很好的。对阴谋家、野心家可不能老实呀！对阴谋家、野心家老实是要上当的。”

12月27日，即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日，是齐白石的90大寿。毛泽东尚在去杭州的途中，他委派工作人员送上了4件贺寿礼：一坛湖南特产茶油寒菌；一对湖南王开文笔铺特制纯羊毫书画笔；一苗东北野山参和一架鹿茸。工作人员还说：

“毛主席祝老人家福寿康宁！”

齐白石激动地说：

“毛主席今天给我送这样重的礼，太看得起我了。古人讲，‘蔗境弥甘’，在新社会，我可是享了这份清福了。”

这一天，全国政协和中央美术学院为齐白石举行了祝寿大会，周恩来也到会祝贺。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代表文化部，授给齐白石“人民艺术家”的荣誉奖状。

后来，齐白石为了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感谢毛泽东的盛情，画了两幅画：一幅是《旭日老松白鹤图》，一幅是《祝融朝日图》，献给了毛泽东。旭日象征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光明与温暖；老松白鹤是祝愿毛泽东健康长寿；祝融朝日是指红太阳出在湖南。齐白石还应曼顾的嘱托，书写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一词。

12月27日晚，毛泽东到达杭州。浙江地方领导人谭启龙、李丰平和省公安厅厅长王芳早早来到火车站接着。毛泽东换乘小轿车驶进西子湖畔的刘庄大门，开到1号楼前。

刘庄坐落在杭州西湖西岸丁家山的半山腰，又名“水竹居”。早在晚清光绪年间，广东豪富举人刘学洵看中了这个地方，遂用巨资购地建筑了这个庄园。刘庄面对六桥，北仰双峰，囊括湖山胜境。刘庄的庭院景观全是民族风格，而且是依着《红楼梦》大观园设计建造的。建国后，刘庄经著名园林建筑家戴念慈重新设计，绿色琉璃瓦面，金黄色琉璃瓦翘角；楼房周围有回廊亭阁相护卫，更呈现出楼台隐现、回廊曲折、清新优雅的景观，被誉为“西湖第一名园”。

毛泽东虽然是在建国后第一次来到杭州，第一次来到刘庄，但他下了车还是十分高兴地对卫士们说：

“到家了。”

罗瑞卿、杨尚昆住南山路113号，这里解放前是蒋介石的别墅。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几位秘书住北山路84号30号楼，这幢房子曾是国民党将领汤恩伯的别墅。

欲知毛泽东在杭州期间的活动情况及其以后如何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请看本传第七卷：九天揽月。

东方翁曰：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日起，毛泽东亲自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4个野战军继续横扫国民党军残余；与此同时，公安部门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了禁娼戒毒的果断措施。接着，毛泽东又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革命运动；继之还进行了“三反”、“五反”运动。果真是五洋捉鳖也。禁娼戒毒，娼妓、烟鬼瞬间绝迹；土地改革，农民无不欢欣鼓舞；镇压反革命，数十万敌特束手就擒；抗美援朝，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伪军等组成的“联合国军”俯首讲和；“三反”、“五反”，大小贪官和“五毒”奸商纷纷落马。可以说，毛公领导的每一次运动无不是轰轰烈烈，旗开得胜。短短4年间，九州处处海晏河清，盗贼亡种；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且有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心思公，奋发向上，营私为耻；真可谓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观。以其思想、智慧和凝聚力，能使数万万人民在思想上大一统，劲儿往一处使，步子往一条道上奔，有大作为之如此者，舍毛公其谁也！读史至此，岂不令人拍案叫绝！